杨奎松文选

杨奎松

目录

随笔杂议

答不知名友人

杨奎松简介

[简历]

一年务农　　（湖北襄樊国家计委五七干校二连）

八年工人　　（北京第二机床厂第七车间）

半年坐牢　　（半步桥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王八楼）

四年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五年编辑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

三年讲师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十年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现为教授　　（北京大学/上海华东师大历史系）

常用笔名　　青石　　邱路

[专著]

1、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40 万字（香港三联书店 2000 年出版繁体中文版）。

2、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45 万字。

3、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36 万字。

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与陶文钊、王建朗合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45 万字，个人完成 13 万字。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35 万字。

6、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3 年版，24 万字。

7、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37 万字。

8、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16 万字。

9、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与杨云若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约 40 万字，个人完成 18 万字。

10、中山先生与俄国（与蒋永敬合著），台北中山基金会 2001 年版，约 20 万字，个人完成 12 万字。

11、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30 万字。

[论文（国内）]

1、走向“三二 0”之路，《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2、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的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 4 期。

3、资本主义化还是现代化？－读胡绳遗稿札记，《中国现代化论坛》2002 年。

4、容共还是分共？－1925 年国民党因容共而走向分裂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5、蒋介石从“三二 0”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 年第 6－7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 年第 6 期，《历史教学》2003 年第 1 期。

6、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现状与进展，《福建论坛》2002 年第 3 期，《中国社会

科学文摘》2002 年第 3 期。

7、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与陈兼合作），《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8、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情感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中国外交》（复印报刊资料）2002 年第 3 期。

9、蒋介石与 1936 年绥远抗战，《抗日战争研究》2001 年第 6 期；《中国现代史》（复印报刊资料）2002 年第 3 期。

10、20 世纪三个中苏条约的形成与比较，《俄罗斯研究》2001 年第 4 期（8 月）。

11、有关张学良"通共"的情报和蒋介石的态度，《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

12、浅议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5 期。

13、孙中山与共产党－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14、Origins of the American-Soviet Cold War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1,No.2.

15、莫斯科决定联合孙中山之经历，（台北）《近代中国》第 142 期，2001 年 4 月。

16、新中国从抗法援越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

17、有关解放战争时期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18、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 年第 2 期。

19、Chen Duxiu and the Comintern-Also on Chen Duxin’s Right Opportun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0, No.3。

20、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2000 年版。

21、5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22、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历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23、评《中国共产革命 70 年》，《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24、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 50 年，《抗日战争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25、Zhang Xueliang and the Solution to the Xi'an Incident,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First Issue, Spring 1999.

26、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 年第 2 期。

27、国企改革为何如此艰难－杨启先访谈录，《百年潮》1999 年第 2 期。

28、1969 年毛泽东决策之谜，《科学决策》1998 年第 6 期。

29、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 年第 6 期。

30、克林顿访华后台湾统独形势分析与建议，《对外学术交流情况》增刊 7，1998 年 11 月 4 日。

31、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32、走向破裂－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33、中国经济从大起大落到软着陆－杨启先访谈录，《百年潮》1998 年第 4 期。

34、从珍宝岛之战到缓和中美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7 年第 12 期。

35、遵义会议前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炎黄春秋》1997 年第 12 期。

36、The Ward Case and the Defining of New China's Policy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Third Issue, Autumn 1997.

37、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38、1950 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百年潮》1997 年第 1 期;《新华文摘》1997 年第 4 期。

39、有关西安事变几则电报内容与时间的考辩，《党的文献》1996 年第 6 期。

40、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41、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瞿秋白研究》第 8 辑；《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

42、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5 期。

43、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发起组成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44、山城堡战斗的幕后及其影响，《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4 期。

45、有关西安事变发生经过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1996 年第 4 期。

46、1937 年国共和谈揭秘，《团结报》1996 年 7－9 月。

47、论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48、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49、有关平型关战斗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2 期。

50、究竟谁说服了谁？－关于 1936 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1 期。

51、美国介入国共冲突的由来及其后果，《美国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52、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1995 年。

53、中共抗日外交战略的形成，《中共党研究》1995 年第 4 期。

54、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55、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56、1936 年国共谈判揭秘，《团结报》1995 年 4－6 月。

57、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重要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58、1949 年国共和谈始末，《党史研究资料》1995 年第 1－2 期。

59、向忠发是怎样一位总书记？《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

60、介绍几位早期共产党人的自传材料，《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1 期。

61、1925－1932 年在苏联军校学习的中国学员调查表，《军事历史》1994 年第 1－3 期。

62、有关朱德去苏联的的背景资料，《党的文献》1994 年第 3 期。

63、"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3－4 期。

64、1936 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4 期。

65、牛兰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吗？《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11 期。

66、 华德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历史研究》1994 年第 5 期;《跨世纪的中美关系》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

67、《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若干史实辩正，《党的文献》1994 年第 5 期。

68、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与策略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3 期；《皖南事变研讨论文集》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6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与前瞻，《中共党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

70、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及策略，《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71、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72、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党史研究资料》1992 年第 12 期。

73、七七事变前中间派知识分子抗日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2 期。

74、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2 年第 2 期。

75、1937 年至 1946 年的国共两党谈判，《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76、论四十年代中共与苏美关系及其政策的演变，《美国研究参考》1991 年第 10 期；《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现代出版社 1992 年版。

77、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

78、立三路线的形成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和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

79、抗战胜利后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与苏联，《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增刊。

80、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评述，《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81、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文史哲》1990 年第 6 期。

82、1946 年国共两党斗争与马歇尔调处，《历史研究》1990 年第 5 期。

83、对《周恩来传》若干史实的考辩，《党的文献》1990 年第 4 期。

84、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4 期。

85、也谈《刘鼎在张学良那里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 年第 2 期。

86、关于 1936 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87、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关系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4 期。

88、王明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1 期。

89、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清华大学研究生学报》1988 年第 1 期。

90、中国红军打通国际战略方针的演变，《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增刊。

91、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

92、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 年第 6 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十讲）》，四川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93、社会主义从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学术界》1987 年第 5 期。

94、刍议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对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影响，《政治学研究》1987 年第 3 期。

95、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史实辨析，《党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96、大革命失败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围绕中国问题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

97、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热潮，《政治学研究》1986 年第 3 期。

98、红军东征战略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其演变，《党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

99、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理论交流》第 10 期，1985 年 8 月。

100、李大钊与河上肇，《党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10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党史研究》1985 年第 2 期。

102、李大钊思想政治演变的历史考察（与彭明合作），《近代中国人物》第 2 辑，1985 年。

103、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论文（海 外）]

1、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新探，香港《紫荆》2002 年第 4 期。

2、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共中央停战谈判决策经过，（韩）《6・25 战争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 年版。

3、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日本《现代中国研究》2002 年。

4、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苏联背景，（台北）《近代中国》2002 年第 147 期

5、莫斯科决定联合孙中山之经历，（台北）《近代中国》第 142 期，2001 年 4 月。

6、Changes in Mao Zedong’s Attitued toward the Indochina War, 1949-1973, CWIP, Working Paper No. 34。

7、毛泽东的冷战观，（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 年 10 月号。

8、《季米特洛夫日记》题注，（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 年 10 月号。

9、中国共产党史研究的历史与课题，（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第 8 号，2001 年 3 月。

10、现代中国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日本)《EX ORIENTE》2000，Vol.4。

11、八路军平型关战斗史实之考证，（台北）《纪念蒋永敬教授八十寿诞论文集》,2001 年 9 月。

12、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 From the Zhenbao Island Incident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V. 1, First Issue, 2000/2001.

13、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与周恩来会面之谜，（台北）《历史月刊》（2000 年 12 月）第 155 期。

14、蒋介石不杀张学良之又一解，（香港）《明报月刊》2000 年 12 月号。

15、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剖析与考察，（台北）《近代中国》（2000 年 7 月）第 137 期。

16、苏联、中共因应韩战之背景及利弊剖析，（台北）《近代中国》（2000 年 7 月）第 137 期。

17、中国出兵朝鲜之研究，North Korean Stuies Review, Vol.3, No.1，2000。

18、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台北）《近代中国》（2000 年 8 月）第 138 期。

19、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9 年 3 月号。

20、浅谈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9 年 3 月号。

21、Chinses Politics and Collapse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关于自由主义史观，（日本）《21 世纪中国》第 2 卷，1997 年。

23、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的失败及原因，（台北）《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 年版。

24、论抗战初期的国共关系，（美国）《纽约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 1996 年刊印。

25、对两岸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现状的省思，（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6 年 3 月。

26、美苏冷战与毛泽东的外交战略，（日本）《20 世纪中国与日本》（上卷），日本法律文化社 1995 版。

27、莫斯科新发现的《邓小平自传》，香港《明报月刊》1994 年 9 月号。

28、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国民党谋求苏俄军事援助的最初尝试，（台北）《郭廷以先生九秩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2），1994 年 9 月。

29、金日成阻止了毛泽东进攻台湾的计划，香港《明报月刊》1994 年 7 月号。

30、共产国际在华间谍牛兰案的真象（与蒋永敬合作），（台北）《国史馆馆刊》第十七期，1994 年 12 月。

31、The Soviet Factor and the CCP’s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 in the 1940s, Chinese Historian, No.1, Vol. 5, (Spring 1992).

32、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日本）《历史评论》1988 年第 6 期。

33、关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状与思考，（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通讯》第 2 卷第 43 号，1988 年 12 月。

[书评、学术感言]

1、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中华读书报》2002 年 5 月 17 日。

2、末代的皇帝与末代的悲剧－重读《末代皇帝》有感，《博览群书》2002 年第 5 期。

3、国民党代表谁？-由胡绳先生生前对国民党的评论想到的，《读书》2002 年 4 月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 年第 5 期。

4、评《抗美援朝战争史》，《史学月刊》2001 年第 6 期（12 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 年第 2 期。

5、大历史，小道德-评黄仁宇著《黄河青山》，《紫荆》2001 年 10 月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 年第 6 期。

6、恩怨中的思考-《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书后，《博览群书》2000 年第 5 期。

7、平等与人权的悖论－读《冷眼向洋》一书札记，《博览群书》2001 年第 3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 年第 3 期。

8、请放下你的棍子－质疑沙健孙教授对胡绳先生的批判，《百年潮》2000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 年第 2 期。

[资料集、译著、集体著作、史话等]

1、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1870－1922），主编，第 1－2 辑共 6 卷，中共中央党校 1985－1987 年出版，200 万字。

2、政治协商会议纪实，副主编，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

3、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副主编，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

4、抗日战争（外交卷），（与陶文钊、王建朗合作编译），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200 万字（个人完成英译 15 万字）。

5、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与沈志华、齐德学合编），军事科学院 1997 年印行，65 万字，个人译校 20 万字。

6、中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新星出版社 1995 年版，4 万字。

7、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50 万字，个人完成 7 万字。

8、中国近代史，群众出版社 1999 年版，50 万字，个人完成 10 万字。

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10.9 万。

10、国际冷战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2 辑），主编，北京大学教材处 2002 年 3，7 月印制。

专题论文

5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

首先应当说明，要在两三万字的篇幅内完整地说明 5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与成就，不是笔者所能胜任的工作。而回顾 50 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历程，论功行赏排座次，更非笔者能力之所及。因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想就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有关的研究状况表达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且也不打算系统介绍反映这些进展的各种成果，只准备就笔者观感所及，集中讨论与 5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关系的某些问题。若由此造成读者不能了解这 50 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全貌，甚至有厚此薄彼的感觉，笔者将深感歉意。但笔者的目的，不过希望此文能够让所有熟悉和不熟悉中共党史研究的读者，多少了解一点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如果多数读者读过此文后终于明白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何以至今未能尽如人意，知道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一）

自 1949 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至少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读本就出版了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说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各种历史研究当中独领风骚几十年，想不为过。但是，如果说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似乎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 50 年当中，至少前 30 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很少学术研究的成份。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

说 1979 年以前中共党史有“研究”而少学术，是基于笔者对“学术”二字的理解。何谓学术？梁启超解释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1]如何观察事物才可得“真理”并以为用？则非人人或时时均可为者，必须先有独立治学与实事求是二条件不可。换言之，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独立性与科学性。没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却不计其功”的精神，即没有学术之存在。陈乐民先生有云：要求真学问，就必须能够并敢于“为学术而学术”，即“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2]“纯然地去求事之然和所以然”，可谓道出了学术研究之真谛。“纯然”，就是不为外力所左右，不受利禄所影响，且不因感情所蒙蔽，绝不为亲者、贤者、

尊者乃至王者讳，也不因疏、劣、卑、贫而彰其恶；既不曲意暴露，也不存心护短，严格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就是要在搜集、验证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在分析和说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扎实的史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取双重标准，或简单地拿以一己一派的感情好恶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

这样一种态度，其实就是毛泽东也是赞成的。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认识虽然始终受到其政治判断的影响，其理智上却从来都是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张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强调对中共党史必须"进行客观的研究"，研究"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的。[3]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借用叶圣陶先生一句比较形象些的话来说，就是要"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自陷于是非之中，听凭主观情感左右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可以研究，也可以有"成就"，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大容易取得学术成就。

以建国后最早出版的有系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例。它原本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于 1951 年上半年为刘少奇起草的一篇在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因其较 1944 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完整地总结了三十年来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4]，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故毛阅后当即指定改以胡乔木名义迅速发表。在这本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天才"的简明中共党史读本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史自建国以后就已成为歌颂毛泽东战无不胜的正确路线和他在各方面丰功伟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已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了。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第二，强调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他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第三，以毛泽东的著作解读中共历史。[5]

在建国伊始就由中共宣传部门最主要的负责人来发表这样一部中共党史著作，虽然多少有点事出偶然，却也是事出有因。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历来对斯大林评价不高，并且心存怨意，但他却高度重视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延安整风时起，该书就被评价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并被列在党的高级干部必读书之榜首。而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大兴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二是以路线斗争为线索诠释党的历史。该书最令人瞩目之处还在于其高度权威性，凡权力所及之处，一切事关党的历史的解释，都只能以此书为准，不能有第二种说法。十分明显，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对斯大林如此做，是相当赞同的。

毛泽东推崇斯大林的这种作法，在延安整风时首先是基于统一全党思想的考虑。因为从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的迷信的角度，当时确实存在着树立毛泽东权威的必要性问题，怎么树？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历数党的历史，根本解决应该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仿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通过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比，来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6]而此例一开，在 1949 年以后，当中共取得如同苏共一样一统天下的执政党地位之后，进一步模仿斯大林的做法，写出一部更系统的类似《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中共党史

教科书，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讲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7]经过铁与血的战斗才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突出宣传自己的胜利，并希望通过宣传自己一贯为民造福的业绩来换取人民的长久拥护，这不难理解。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尚没有人了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是集粉饰、歪曲，甚至伪造历史之大成，以其为楷模，中共党史难免也要落入其沉浮的怪圈。

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一出来，很快就成为以后有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著作的范本。在此之前，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曾一度令人瞩目。胡书乃由吴玉章耳提面命，继承了张闻天延安时期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史论结合的写法。[8]但胡乔木书出来后，中共党史基本上就进入以论代史的时代了。受教委委托，何干之主编的最典型的以论代史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从此成为最主要的教材。[9]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史从论出。[10]此后的中共党史读本竟无一例外地也照此办理了。而且，随后出版的这些中共党史著作，特别是稍晚些受到 50 年代中后期那种政治气氛影响的著作，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对路线斗争的强调方面，经常不受胡书的局限。特别是涉及到那些所谓"错误路线"的代表，不少书批判否定之不遗余力，更是胜过胡书许多。[11]但它们不过是进一步夸大和突显了胡书政治宣传的一面而已，并非是因为有了更个性化的史实上的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从 50 年代初起，宣传部、教育部等就陆续做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12]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史更是很快就以"政治理论课"的形式进入了各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课堂。先是规定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然后是规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之后则规定直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的学习，逐渐更普及到各行各业。中共党史自此在形式上也彻底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至二三十年之后，即当中国大陆普通学者已经多少可以从个人的角度，而非从组织的角度独立地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之后，不少人干脆搞不清它究竟是属于理论宣传呢，还是也可以算做一门学问；如果它也应该具有科学的性质，可以算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究竟是应当属于政治理论呢，还应当属于历史学。

把中共党史等同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伴随着中共路线及政策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斗争的起伏与发展，中共党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 50 年代后期即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来。从批判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投降，人物臧否备受影响。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北京市委主持编写的新的中共党史讲义，干脆提出"一根红线"的观点，不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讲党史，要从韶山冲开始讲，不要说陈独秀不能讲，就连李大钊也不能多讲，否则就有"抬李压毛"之嫌。进入到 60 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所谓中共党史终于也成了典型的个人崇拜史，成了毛泽东与一次又一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的名字在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中能够出现数百次之多。不仅如此，中共党史还成了一种政治晴雨表，谁在台上就捧谁，谁下台就骂谁。党史教科书翻来覆去地改写。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史的作者就大书特书，居然

连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也改成了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林彪叛逃摔死，中共党史的作者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从头到尾都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连同林彪过去的战功也一笔抹杀。[13]类似的现象不一而足。如果说开粉饰、伪造历史之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斯大林在世时一以贯之，多少还能给人一种虚假的真实感的话，中共党史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已经是翻天覆地，让人无所适从了。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政治宣传的内容通常都只具有时效性。不是宣传不重要，问题是简单地把中共党史同需要应时而变的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难免因其过分具有宣传意味或变来变去而严重贬损其自身的价值。《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成为世人笑柄，"文革"中中共党史被人涂来改去的可悲命运，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将历史问题简单地政治化绝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人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凡是公开宣传的中共党史就一定不会太真实？80 年代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揭秘"史学的流行，最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关于中共党史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就公开讲："1921 至 1949 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著作表示生厌。"因为"此类著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14]实际上，相当多的党史学界人士也持有几乎同样的心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国史研究等其他相近的现代历史研究天地被打开，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状况被打破，甚至不久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也被取消，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结果是许多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跳槽"。事实证明，那些基础扎实又较早改了行的研究同仁，多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少人成为一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共党史在一些年里也还是没有脱离泛政治化的轨道，不仅学生没有多少学问好学，教师也实在没有多少问题可以研究和发挥。因为，既然是政治理论课，自然就是宣传意识形态，因此也就有观点问题、立场问题、倾向问题等等使独立的学术研究动辄得咎的政治障碍；自然也就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做到独立治学和实事求是，难以切实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不仅是教中共党史的教师，就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最牢靠的"学问"还是熟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至少 1949 年以前所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几乎都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说法。

在经历了同"两个凡是"观点的胜利斗争[15]，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仍然存在这种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现象，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其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党史界与全党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已经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那些主张必须照《毛泽东选集》的观点研究和宣讲中共党史的人，在公开的文章和讲话里其实也是反对"一句顶一万句"的观点的。他们通常也讲，过去"假党史"的表现之一，就是"把领袖描写成'先知先觉'"，"说什么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只是，在他们看来，"假党史"只是指特定的"文革"而言的，批评"一句顶一万句"不等于说那些已成定论的中共党史问题有必要另出新的说法。毕竟你一个学者、教师不可能比毛主席、党中央更高明吧！

80 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史仍旧属于"政治理论课"，即仍旧属于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

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不要说让党史教师和党史研究工作者完全改变唯上唯书的习惯不容易，就是让上级主管部门承认“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同意将中共党史的宣传与研究分开，事实上都很困难。关于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正本”，以统一党史宣传和教学口径的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提出来的。当然，随着全党、全国都开始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记得关于编定“正本”的说法刚一出来，虽然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必要，却有不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在各种场合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在提倡思想解放，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正在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和“拨乱反正”，这个时候急忙“定于一尊”，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毫无疑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意见产生出来，就是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上，自 1979 年以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走向学术化的新气象。

（二）

历史研究本身既不是为谁找说法，也不是为谁讨公道。所谓“拨乱反正”，不过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历史研究的一种附带的功效罢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本身应有之义。但 80 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阶段。好在这种“拨乱反正”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推进，是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的。这是因为，不管人们怎样理解这四个字，这时的所谓“拨乱反正”，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文革中那些胡编乱造的“两条路线斗争史”而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建国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错误倾向而来的。比如研究者们不仅为刘少奇、瞿秋白等大批在“文革”中倍受冤屈的党史人物鸣不平，而且也提到了大量“文革”以前就久已存在的问题，像为彭德怀等人正名；写五四运动主张要肯定陈独秀的功绩；写中共一大的代表主张应不回避张国焘、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名字；写广东农民讲习所不能只讲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还要讲以前的几期及其主办人，以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不能只谈毛泽东一个人的作用，如此等等。[16]不过，主要从拨乱反正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及其历史，难免会较多地侧重于政治评价。而过多地从政治评价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必然存在着掌握政治标准或宽或严和不易避免掺杂感情因素等问题，研究时容易太多地纠缠于“左”右对错的争辩，或者忽略研究者应持的客观平实的学术态度，或者因政治本身的局限而使研究无法深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讨论最热烈的陈独秀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关于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说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陈独秀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中间以中国急进的民主派著名；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17]

胡乔木在这里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一个事实的认定，即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即被推举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第二层意思却是囿于长期以来关于陈独秀“右倾投降”导致中共在大革命失败的观点，着意在政治上对陈独秀的早期作用加以限定，即强调陈“五四”时只是“急进的民主派”，虽然后来成了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但“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仿佛这样就可以证明，陈独秀后来为什么会走到“右倾投降”的地步。

这样一种议论的方式，与后来盛行的“出身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就是凡是在中共历史上

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不论其是否有贡献于这个党，都必须与党的正确路线划清界限，并且要追根溯源，断定其所犯错误并非偶然，一定有这样或那样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甚至阶级根源。陈独秀大概是中共党史中这一逻辑的最早的一位受害者了。胡乔木的这个说法延续了几十年，但陈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干脆变成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则纯粹是中共党史界进一步的演绎了。就连陈之当选中共领导工作，后来也被说成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缺乏经验”和过于“幼稚”。而为了避免人们由此推导出其他结论来，“文革”中的党史著作中还不得不专门补上一句，说是“这丝毫也无损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党正是在逐步清洗自己队伍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18]

有关陈独秀的政治评价问题，严格说来不是历史学范围内学术研究必须讨论的课题，但这种人物的政治评价严重妨碍正常学术讨论的展开，却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中共党史学界中很快就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1979 年 2 月，中共党史界即就此召开讨论会，会上虽然有人仍坚持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但已有不少人提出，陈独秀在五四后期，即建党前后“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了，他“已经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我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19]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会后，国内几十种社会科学杂志和学报，都不约而同地就此发表了研究论文。[20]除了极个别的文章坚持陈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几乎所有文章都持同一口径，即肯定五四后期建党前后的陈独秀已经“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21]在几乎同一个时期，各期刊如此集中地发表如此多的有着几乎同样观点的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同中共党史中其他一些更敏感的问题相比，围绕着陈独秀早期作用的评价问题所展开的这场讨论，对推进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影响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上述说法看似较新，却未必与胡乔木的看法有多大的抵触。因为这时几乎所有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文章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胡乔木关于陈“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以便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脱出权威的轨道。而事实上，从后来公布的胡乔木文的过程稿显示，胡在最初起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时，原本也没有否定陈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肯定陈当时已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了。后来仅仅是因为考虑到“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与“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说法易生歧异，才在毛泽东的赞同下，把那个“最”字取消，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换成了“社会主义宣传者”这种语义含混的用词。[22]这也就是说，包括毛泽东在内，“最高权威”未必认为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的时候，以及在成为党的领导人以后，还是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因此，虽然肯定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属于拨乱反正，但这在当时确实也很难说在学术上有多大的突破。

在陈独秀问题上的“雷区”，最主要的是他的所谓“右倾投降主义”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还是在《毛泽东选集》当中，对此都有过很尖锐的批判。《决议》中明确讲：1924－1927 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除了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叛变、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的力量过于强大以外，“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23]什么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英明指示呢？这

主要是指 1927 年那个主张马上大规模武装工农的所谓“五月紧急指示”。而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则主要是指毛泽东等人当时强调两湖农民运动“好得很”，否认农民运动（也包括工人运动）“过火”的文章。

突破《决议》和《毛选》的说法，在 80 年代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即使在 80 年代初，一些学者已经在尝试着这样做了。陈独秀是否应该像《决议》和《毛选》中所说的那样承担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呢？向青 1979 年即在自己的文章中表示了异议。他显然不同意关于陈独秀因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英明指示而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认为这是对当时的情况“没有历史地科学地加以分析”。他强调，那个时候中国党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共产国际代表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化身，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示工作是共产国际章程所规定的。所谓陈独秀的错误，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纪律的问题，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的问题。因此，他提出：“我们在党史上所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古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24]建国初年就曾接连出版过有关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方面中共党史著作的廖盖隆，次年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过去所说的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多次应该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没有反击，其实是和共产国际把主要希望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指导方针，和共产国际代表以及苏联顾问的主张有关的。特别是大革命进入后期，即 1927 年上半年以后，形势变化很快，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在几千公里之外遥控指挥中国革命，要及时地正确地指导实际斗争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时有些指示是对的，也来得太晚了。“例如共产国际曾建议我们党武装工农，但是革命都快失败了才来建立武装，怎么来得及呢？”[25]

1980 年，《党史研究资料》第 5 期发表了刘少奇 1937 年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其中突出谈到了 1927 年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左”倾的问题。这大概是迄今为止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党的高级领导人批评大革命后期“左”倾错误的文字。刘少奇在信中举例说明了这种“左”倾的种种严重危害，特别指出，正是由于这些“左”倾的作法，不仅破坏了统一战线，使党和工会陷于孤立，而且加速了革命的失败。[26]显然是受到这封信的观点的鼓舞，一些长期以来对所谓陈独秀压制工农运动，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导致革命失败的说法抱有疑问的学者，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比如，郭绪印在当年就发表文章认为，过去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等高等学校中共党史教材中关于“陈独秀机会主义者一贯否认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农民的革命斗争”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陈独秀指出农民运动中存在大量“过火”行为，“是尊重客观实际的”，并非像一些教科书所写的那样，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运动的污蔑”。问题在于，我们过去总是对如实地汇报情况，提出意见的同志，动辄扣上什么“阶级立场”、什么“右倾投降”之类的大帽子。[27]

对《决议》和《毛选》的这种突破，之所以没有遇到特别的“关照”，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论者都没有否认陈独秀存在有“右倾错误”。在承认这个基本认识的前提下，说明共产国际也有错误，工农运动也有“过火”表现，相对来讲这个突破就只是局部的，不大容易触“雷”。相比较而言，富田事变问题的重新探讨和结论的改正，则是这时对《毛选》中已有历史结论的一个更具典型性的突破了。

富田事变长期以来被说成是江西苏区内部暗藏的反共组织 AB 团策动的一场反革命事变。通

常所说的经过是：1930 年 12 月上旬，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奉总前委书记毛泽东之命率红十二军一连士兵，前往省行委所在地吉安富田去抓 AB 团分子。后被红二十军 174 团政委刘敌带部队将被捕的上百名 AB 团分子抢回，并杀害了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上百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一事变很快被平息。《毛选》据此多次提及这个 AB 团，并讲到 AB 团在富田、东固一带对群众影响很大，导致群众与红军对立。其注释中更明确讲：“AB 团是当时国民党潜伏在红色区域内的反革命特务组织”。[28]

然而，1979 年底，《江西大学学报》登出戴向青的《略论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其历史教训》一文，对富田事变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说明，明确认为这场事变并非反革命事变，对事变参与者的镇压是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随后戴向青又进一步写出《富田事变考》，对所谓富田事变领导人杀害上百名拥护毛泽东的干部和群众的说法进行了具体的考证，说明此说纯属子虚。根据戴向青的深入调查与研究，证实所谓富田事变完全是一起冤假错案。实际情况是，因开除毛妻贺子珍妹夫刘士奇等问题，当时担任总前委的毛泽东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省苏维埃领导人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毛误信省行委内有所谓 AB 团的谣言，于 1930 年 12 月 3 日派李韶九带部队去抓省行委的领导人，李又用逼供信的手段逼出一连串假口供，逮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刘敌得知此情况后，率独立营将被捕人员救出，并认定此事为毛泽东所为，故次日的士兵大会上，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省行委派常委段良弼前往上海向中央斥说事变详情及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段将报告送到并与博古等谈话后，即不知下落。而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却作出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 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并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中央代表团 4 月中旬到苏区后，即将已认定富田事变为党内矛盾的代理书记项英免职，代之以毛泽东。结果便发生了一系列镇压行动。先是原省行委及参预事变的刘敌等红二十军干部被如数逮捕处决，三个月后更将红二十军调至于都平头寨，把近 800 名排以上军官全部杀害。而后开展的所谓“肃反”工作中，据有关部门统计，有大约 7 万人被冠以所谓 AB 团分子的名义而杀害。[29]

在中共早期历史上，这大概是最骇人听闻的一起大冤案了。其实，毛泽东本人对此也不是毫无认识。还在 1956 年，当斯大林问题披露以后，毛本人也几度从教训的角度提到过富田事变和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承认当时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假口供。言外之意，这一事件确有冤情。只不过，事情过去多年，毛没有考虑过公开纠正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戴向青等重提此事，由于一开始就得到了从江西省到中共中央许多从苏区出来的老干部明确支持，因此没有遇到太多的阻力，中央组织部并组织力量就此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做好了公开平反的一切准备。1989 年平反文件起草完毕，不想意外地赶上一场政治风波，此事随即被束之高阁。好在 1991 年新版的《毛选》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对此还是有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说法。当然，两者的写法还是有些区别。《毛选》新写的注释态度含混，称：“从一九三 0 年五月起，赣西南开展了肃 AB 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给人印象好象当年反 AB 团的斗争还是对的，只是斗争扩大化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则比较全面地汲收了戴向青等人的研究成果，并且肯定“肃清‘AB 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80 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因为，中共党史上的这种突破，经常并不完全是一个学术上的问题，往往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富田事变问题就反映出这种情况。但富田事变毕竟过去了五六十年，受害一方的当事人在位的几乎没有，换到其他一些问题上的情况就复杂多了。比

如，西路军问题，虽然也有许多“老同志”支持，但由于中共中央过去就这个问题有过专门的决定，又有大批当事人在位，虽然无所谓“平反”问题，解决起来还是相当艰难。

西路军问题的核心是“张国焘逃跑路线”的问题。由于张国焘于 1935 年 10 月在红军长征途中坚持退往西康，并另立中央，因此被指为退却逃跑路线。按照《毛选》中的说法，“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选》并且在注释中具体解释说：“1936 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30]

对于上述说法，《党史研究》杂志 1982 年第 1 期发表署名严实的文章，首先就所谓张国焘擅自将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并令其渡过黄河向青海西进这一史实做出考证。文章指出，西路军的组成是在渡过黄河之后，而非在此之前；渡河后是向甘肃西部河西走廊，而非青海；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也并非是张国焘“擅自决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宁夏战役计划，按照毛泽东等人的电报指示行事的。[31]这一考证已清楚显示《毛选》的说法在史实方面存在明显的错误。

1983 年，参加徐向前回忆录整理工作的从进接连发表文章，进一步对《毛选》有关内容提出质疑。文章指出：“上述断语和注释，是多年来党史界论述西路军问题的依据，也是一些革命回忆录的基本口径。有些党史著作和文章并有所发挥。……至今，全国各高等院校的中共党史讲义的说法也大致如此。”但不仅上述不是事实，而且西路军本身的任务也是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不能说是“按张国焘的错误命令沿甘肃走廊西进”。文章并且特别就《毛选》中提到上述断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成文时间表示怀疑。因为，此文标明成文于 1936 年 12 月，但文中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和有关西路军失败的结论，都明显地与成文时间不符。与从进文章同时发表的竹郁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则比较全面讨论了西路军问题的来龙去脉。文章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与张国焘的逃跑路线无关；第二，红四方面军西渡是根据中共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方针，按照宁夏战役计划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并非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第三，西路军的失败除敌我力量悬殊、环境困难等客观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安事变后它担负着牵制配合河东中央红军作战及国共谈判的任务。西路军未能及时突向新疆，而是在条件极端不利的河西走廊浴血鏖战，创造完全无法实现的根据地，是服从中共中央全局部署的一种结果，并非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行事。[32]

但是，从进、竹郁的文章，以及随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陈铁健的《论西路军》[33]一文，显然受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刊登竹郁、从进待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要求收回，《历史研究》也因此被要求今后不要刊登中共党史方面的文章。在 80 年代的中共党史研究中，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政治干预。[34]其实，这种干预是否必要，着实令人怀疑。因为随着大量新的史实的发现，几年之后，即 1991 年《毛泽东选集》再版时，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接受了。在新版的《毛选》当中，这样的观点实际上也还是被接受了。尽管毛文中的说法难以改动，改写的注释却对西路军给予了全然不同的评价。新的注释称，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师后，“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

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35]新的注释肯定西路军执行的是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与张国焘路线无关，这在事实上就否定了毛文中关于“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的说法。

（三）

把历史研究与许多现实问题联系起来，是困扰 80 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现象。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这一类的问题都被定为研究禁区的。这个时候有些禁区是被明文限定了的，比如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研究，就有很长一段时间被严格限制，据说是因为张学良当时在台湾还未完全恢复自由，怕对张不利。而有的问题是深入研究之后引起某些方面的重视才被定为禁区的，比如有关 30 年代中央特科问题的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一度广泛征集史料，后来却被禁止发表深入的研究成果，据说是担心有负面影响。不过也有另一类与现实联系也很密切，并无禁令的问题，研究起来也备受困扰。比如围绕着皖南事变问题发生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皖南事变发生于 1941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总共 7000 人被国民党军围歼，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等被叛徒杀害，这是中共在抗战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事变刚刚结束，许多情况尚未来得及调查和汇集，中共中央当即就通过了一项决议，严厉批评新四军政委项英自抗战开始以来就与中共中央存在着政治原则和军事方针上的分歧，“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做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而项、袁（国平）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决议认为项英不仅“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且像张国焘一样犯了不服从中央的组织错误。[36]再以后，随着延安整风将王明树为右倾投降主义的党内代表，项英则进一步被定性为王明路线的主要追随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围绕着如何认识项英错误，以及如何看待皖南事变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最富戏剧性的，是作家黎汝清的大胆介入，并尖锐批评党史工作者把一潭清水搅混了，不仅断言项英要对皖南新四军失败负全部责任，而且抛出一个项英的“三山计划”来，说历史不仅要研究资料，而且要研究心理，史学界过去不仅不研究心理，就连资料的研究都是各取所需，不少根本就搞错了。他认为，项英选择南下茂林根本就是抗拒中央关于要他到江北敌后去与陈毅部汇合的方针，打算拉上部队南进到国民党后方大山里去的冒险计划。[37]此说一出，更是引起中共党史界大哗。

所谓中共党史学者把清水搅混的说法自然是极而言之，但研究皖南事变的党史工作者在资料引用上容易各取所需，感情的倾向性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却是时有发生的事情。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当年在江南项英领导下和在江北陈毅、刘少奇领导下的许多新四军干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到争论中来，或者对争论的一方给予支持。结果是把一个历史问题搞成壁垒分明的样子，甚至你有你的阵地，我有我的阵地，研究者不沾皖南事变问题则已，沾则往往会弄成一方称道，而另一方驳斥的复杂局面。[38]

类似皖南事变这样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自然远不止这一个。西北局的历史问题、东北抗联的历史问题等等，都与皖南事变的问题没有什么两样。任何一篇涉及到这些问题的研究文章，

都可能引起一场“官司”。于是，也就有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 说法。就这种事情看起来，似乎也有一些道理。因为这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经常涉及到许多活人的利益。一个富田事变，对立面几乎不复存在，调查研究工作还反复进行了十年之久，弄到最后还是未能发出一纸平反令，又何况那些直接关系当事双方利益人的事件呢？

由此不难看出，完全无视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是当前中国唯一执政党的历史，二是它距离今人太近，一个说法的改变都可能触动某些部门的神经，或者影响到某些在位者及其相关亲友的感情和利益。也正因为如此，现实政治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也就很难完全避免。为此，在一些过于敏感，涉及今人过多的问题，保持某种适当的谨慎似乎并不为过。不过，换个角度来考虑，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就使得中共党史中存在的疑点、难点和需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的问题较中国古代史、近代史要多得多。只要不去触动那些明显的“雷区”，肯于从史实的角度去钻研，它也还是能够给普通研究者提供大量出成果的机会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学者们在许多基本史实的研究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建国 30 多年来，注重宣传中共党史，却连中共党史上的许多基本的史实都没有设法去弄清楚。包括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组成情况；俄共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及活动的情形；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代表人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工作的情况及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提出的经过；苏联顾问鲍罗廷来华及其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时间及经过；三二 0 事变发生的原委；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经过；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谓十万农军围长沙的问题；八七会议的情况；十一月紧急会议的情况；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情况；赣南会议的情况；宁都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内容；遵义会议的召开时间及会后传达的内容……，几乎所有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史实，大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才基本上弄清楚的。用“丰硕”两个字来形容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实研究方面的收获，无论如何都是不过分的。而中共党史学术化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些深入的史实研究来推动的。

史实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促进了中共党史学科性质的最后界定。论从史出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以往那种 “穿靴戴帽”式的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自然愈来愈多地受到了冲击。比如以往在谈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 30 年代中期的中共党史时，势必要对王明和共产国际加以批判，有的文章甚至连 1935 年的《八一宣言》也给捎上了。凡是王明和共产国际关于主张联合国民党的言论，都统统以妥协投降视之。而为了强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一切主张都要戴上“右倾”的帽子，因而任何认为中共中央受到过共产国际影响的说法都不能被接受。至于 1937 年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派王明等人回国，就更是被许多人怀疑是要夺毛泽东权的重要政治步骤而严加斥责。[39]对此，有学者接连发表文章，从史实上对于一些缺少史实根据的说法一一加以辨正。此后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更系统地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在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做了正面的说明，对一般党史书中所谓毛泽东 1937 年底 1938 年初坚决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的说法，也依据史实重新做了解释。[40]这些研究显示，对党史上某些人物，不能简单地照搬当年政治批判的语言，动辄冠以“××主义”的政治帽子，而应当严格地依照史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历史人物脸谱化，并采取双重标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就像我们在过去的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那样，“好人”、“坏人”一目了然。只不过，在中共党史的文

章和著作当中，人们不是通过那些刻意丑化的形体和语言来表现“坏人”，而是通过大量具有贬损或批判意味的政治术语（即所谓“帽子”）和作者“无限上纲”的归纳法来描写他们。说“好人”，一切都好，即使有严重错误，也要再三肯定动机好；说“坏人”，一切都坏，即使动机未必不好，也一定要按照“动机效果统一论”将其动机解释成居心不良。党内斗争如此，国共斗争也是如此。中苏关系恶化后，涉及到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关系的写法同样如此，好象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其党性原则和阶级立场。殊不知，在历史研究上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能是越研究越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越研究离历史真实越远。

举一个写“好人”的例子。长期以来，写中共三大以及写陈独秀三大后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经过的中共党史读本，大都强调当时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因为他既反对陈独秀的右倾，也反对张国焘的左倾。[41]但毛泽东当时真的是既反右，也反左吗？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史实上的依据。而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者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当时发表过一篇《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其中所表露的观点与陈独秀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后来马林档案所记录的毛泽东当时的谈话，更清楚地显示了毛泽东与陈独秀观点相近的情况。但是，直到 80 年代，大家依旧视而不见，没有人提及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好象它根本不存在。即使有人注意到当年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在回忆中引用了当时批评毛泽东这种倾向的信件，也断然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主观上就判定了它是伪造的。

再举一个写“坏人”的例子。仍以上述对王明的评价为例，一些著作在讲到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中和回国后一段时期的表现时，基本上无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和召开后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所做的积极工作。多半仍旧是一个“上纲”三段式：先认定王明是“坏人”，扣上一项“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然后在王明的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找出几句可以归结为“右倾”言论的词句罗列出来，最后经过一番如此这般的分析，便得出王明美化、抬高蒋介石国民党，要共产党向国民党妥协投降，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这样一个吓人的结论来。[42]其实，哪怕稍微客观一点，我们就不可能从王明当时的文章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更何况，在当时统战的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讲的是一回事，心里则往往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这些考虑有时只有在一些内部的高层会议讲话里才能看到。奇怪的是，当人们主观上认定某某人是“坏人”以后，经常是连读他的讲话的感觉也变味了，眼睛里只剩下那些可以被视为有问题的词句了。很显然，有些研究者是读过王明这时在内部会议上的发言的，但却只是注意到他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没有注意到他紧接着所讲的：因此，现在尤其要注意保存红军的独立性，第一要保障党的领导；第二要保障自己干部的领导；第三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与政治工作；第四要使之成为打胜仗的模范。要将我们的军队扩大到三十万。他们只注意到王明说：我们不应当说谁领导谁，而应当提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却视而不见他紧接着强调的在政治局以外不能说的话，即“对于革命前途问题，我们对外说中国抗战胜利是民主共和国，而我们自己要明白，中国将来是由民族阵线转到人民阵线最后到社会主义的胜利。”“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但“我们应认识到，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加强国共合作是争取将来不是国共关系破裂，而是革命与反革命完全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的分子到我们领导下来，“使右派最后滚出去”。[43]很显然，如果我们不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王明的文章和讲话，是不可能得出那些吓人的政治结论的。

（四）

进入到 90 年代以后，大多数中共党史研究者在这方面变得客观多了，尽管许多人很少受到过史学训练，但中共党史不属于政治理论，而属于历史学的大局已定，中共党史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开始大量接触史学研究的方法与规范，因此不少著作文章的写法明显地减少了许多武断的定论，而多了几分依据史实的分析。比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谈到王明的问题时，就没有了关于王明要把政权和军队让给蒋介石之类让人感到太过武断的结论。它们在分析王明的问题时只是强调：第一，王明当时相信抗日必须依靠国民党，因此"眼中只有国民党，好象为了抗日，就只能一切听从国民党，唯恐得罪国民党就会造成破裂，于是只强调团结不讲斗争"；第二，王明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而当时"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就对王明这样的人起了强烈的影响"。[44]这个分析虽然不足以解释书中为何仍要将王明问题定性为"右倾投降主义"的理由，并且也不足以让读者了解王明当时的真实想法，但它起码让人觉得比较合乎情理了。

把 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以及新版《毛泽东选集》注释，同以往的中共党史读本和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加以对照，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80 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一些重要的进步。引人注目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新的史实的研究方面，一个是在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已经成为一部内容丰富的以史实叙述为主的著作，不再是过去那种"政治理论"读物了。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包括《毛选》在内，也特别强调了"客观和准确"的问题，即使不得不做政治评价，也力求语言平实，故大量删去了诸如"早年投机革命"、"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走狗"之类明显带有丑化意味的政治断语。[45]而对于学术界来说，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上最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80 年代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时提出的"正本"的概念，这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包括 80 年代中共党史界中经常可以听到的，关于一切教学与研究都不应违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说法，进入 90 年代以后也很少能够听到了。尽管，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旧是一种"组织行为"，其目的也在宣传介绍，不属于学术研究范畴，但不坚持"定于一尊"，不人为地设定一个禁止前进的界限，即使这种"组织行为"存在任何缺陷或不足，都不至妨碍学术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的角度，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提及的情况。

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是更多的研究者转到研究 1949 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影响到有关方面也把更多的关注集中到 1949 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有关 1949 年以前中共党史的研究，因为与现实牵涉甚少，因而研究禁区也明显减少。这对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学术化，显然颇为有利。当然，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重心转移，也影响到有关 1949 年以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较前十年为少，再加上大多数题目 80 年代已经做过，结果是许多所谓新的研究成果对以往研究几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出现大量低水平的重复性研究。不过，比较而言，90 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应该说还是很引人注目的。例如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46]虽然，作为一种"组织行为"，该书不可能非常全面地反映周恩来的一生，另外上卷中也还有一些史实上的讹误（全传已做了部分订正），但一本官修领袖传记，能够运用大量常人难以见到的档案文献史料，在写法上、分析上，以及史料引证和注释上，都能够做到基本上严谨可靠，这足以显示出 90 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无论是毛泽东生平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研究、中共对国民党的策略研究、陈独秀研究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个性化的、能够反映学者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不同的声音"。[47]80 年代的一些研究禁区已经被突破。如 80 年代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肖延中的《历史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

的意识起源及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90 年代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向青、罗惠兰的《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等，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当然，即使进入到 90 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仍不能同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什么样的中共党史著作文章才算是真正具有学术水准呢？不能给人们提供重要的符合历史真相的新史实和新观点的研究，只是修修补补，或讲些抽象的“意义”，题目再大，角度再新，也是炒冷饭，谈不上学术价值。这一点，相信中共党史界的学人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异议。问题是具体到研究工作当中，许多研究者往往习惯于论述种种“思想”、“意义”、“贡献”、“作用”之类，而不能够发掘和提供多少新的史料和新的史实。中共党史研究既然公认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其衡量学术水准高低自然不能离开对研究者史学训练及素养的判断。[48]对此，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似乎也重视不够。因为他们往往相信弄清历史事实很容易，关键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因此，似乎很少有中共党史学界中人谈史学素养和史学训练如何重要，大家谈得更多的都是如何把中共党史的研究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上来。胡绳先生就讲：“历史事实的真象是需要弄清楚的，不弄清楚就谈不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弄清事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开始。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没有经济学的修养，不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进行认真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49]这个但书反映出中共党史学界对史学训练远不如对理论训练重视。

不错，中共党史研究者大都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没有这样一种素养和能力，对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语境都弄不明白，不可能从事中共党史研究。但是，中共党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并且是处于极端复杂环境中的一种历史，弄清“历史事实的真象”就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需要专门的知识和素养。而我们过去许许多多中共党史的著作文章之所以总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它们往往只是凭借着几条自认为最有意义的史料就敢于高谈阔论，轻率地得出结论，甚至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去分析、归纳和演绎，去讨论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殊不知，弄清事实固然是历史研究的“开始”，但历史研究的一切结论却都是建立在这个“开始”之上的。要想弄清事实，就必须具备史学的一般素养，比如占有史料要全面，运用取舍要合理，引证要准确，注释要规范等等。

弄清史实之不简单，关键还在于研究者是否有一双治史的眼睛，这就涉及到史学界所再三强调的态度要客观，视野要开阔，史料诠释要合乎“当时之实事”等标准了。前引胡绳先生那段话的秩序颠倒一下，其实恰恰应当是对史家视野的一种要求。即应当说：“历史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哲学的修养，如果没有经济学的修养，如果……”，恐怕很多时候连史实都未必弄得清楚。近年来，学术界大力推崇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成就，也正是基于他们具有“中”学“西”学融汇贯通的学术素养。当然，对历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能否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共党史学界又恰恰最难。甚至“客观”两个字长期以来在中共党史研究问题上就受到非难，当年大批判盛行时曾有过一项政治帽子，就叫做“资产阶级客观主义”。80 年代前半期，这顶帽子还常常出现在一些人的嘴里。自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强调“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在政治上已经不再犯忌，但这不等于当你改变一种陈说、提出一种新观点时，肯定没有人会追究你的“政治倾向”或“政治导向”问题。即使在中共党史研究学界，至今还是有不少人固守陈说，不愿意听到任何不同声音出现。任何个性化的研究，弄得不好，还是有被人扣帽子、打棍子的危险。

要改变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应该给学者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坚持言者无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外，中共党史研究队伍自身的调整和提高也十分必要。一方面应充实历史学科班出身的研究人员，另一方面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似乎有必要努力加强自身的史学训练和提高自身的史学素养。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应当迅速提高中共党史研究刊物的学术水准，最大限度地堵塞泛政治化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出路。总之，中共党史研究如果不能按照史学的要求向着规范化、高质量的路上走，怕是很难真正成为一门得到社会公认且受人尊敬的学问，不仅出不了王国维、陈寅恪，甚至也出不了早年曾成就斐然的郭沫若、范文澜……。

（五）

如果说研究 1949 年以前的中共党史难，那么，研究建国以后的中共党史照理就更难了，因为越是接近现实，其政治敏感度自然越高，禁区更多。但令人称奇的是，十几二十年来，这一研究反倒开展得蓬蓬勃勃。虽然其前进道路也是曲曲折折，时起时伏，但由于社会关心程度高，再加上文献档案和报刊资料保存完整、文革中流散出去的高层资料又多，许多老同志还留有日记或笔记，因此在不少问题上的研究难度有时反比 1949 年以前的中共党史要小，故不时有重要成果问世。许多鲜为人知的决策内情和重要事件内幕一波又一波地被披露出来，引起众多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读者的强烈关注。

第一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 1980－1981 年间。当时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由胡乔木主持。进而又发动党政军学各界高层 4000 人讨论初稿，直到 1981 年 6 月 27 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为止。这一波讨论虽然大多集中在内部，但影响所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关心和讨论建国后中共党史的热情。从当时讨论的情况来看，整个讨论是十分民主的。相当多的人尖锐批评建国后毛泽东所犯的种种错误，不少人对《决议》草稿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加以区别，强调毛泽东思想只有正确没有错误，毛泽东的思想才有错误的说法，表示难于理解。对 30 年来的历史，大家基本肯定的也只有两段，一是经济恢复时期，即 1949 年 10 月以后到 1952 年；一是经济调整时期，即 1961－1965 年。对凡是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作法，都认为是错误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从 1955 年毛泽东开始加快农业合作化的步伐，1956 年提出反冒进之后，整个政策实际上就已经左倾了。对此，主持文件起草的胡乔木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比如，他明确讲，不能说从 1949 年建国之日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直到 1957 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都是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且公私合营等等是搞快了，另外许多运动本来是不必要搞的，包括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的斗争等等，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完全可以不发生，“关键是出在大鸣大放上”。而他最重要的说法是：“党的历史传统就潜伏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性”。再加上跟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的说法宣传领袖专政，结果民主没有了，毛泽东一切都学斯大林，要绝对权威。“南宁会议奠定了毛主席在中央的特殊地位”，“在一定范围内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专制主义国家，把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专制主义的党”。“毛主席自己反对教条主义，但是他又把对他的学说的教条主义发展到了顶点”。[50]

坦率地说，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一批“秀才”，起草一个文件，对长达 30 年的复杂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即使有 4000 人参加了两三周的讨论，也会有太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但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而是一种政治上宣言。在文革已经搞乱了一切，人们的思想处于极度混乱的情况下，邓小平相信这样做有助于恢复党的形象和统一人们的认识。因此，包括对毛泽东的错误，最初的讨论稿也是尽量少讲，因为照邓小平的说法，是文革结束以来“讲得太重了”，这不利于党和国家的形象。不难看出，起草《决议》包含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性，邓小平讲得很明白，第一是要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还是主要的；第二是要肯定党在 30 年中的成绩，特别是文革前十年的成绩还是主要的。[51]虽然，《决议》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部分讨论参加者的意见，但对多数意见，包括起草人的许多看法，事实上也很难吸收进去。很明显，《决议》的目的是力图恢复党的正面形象，这与史学研究专以弄清史实为目的的出发点，是有区别的。期望一个《决议》一劳永逸地澄清和解决建国以后中共党史上发生的各种问题，也不现实。

第二波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大讨论发生在 80 年代后期。当时出版过一批代表着那个时候建国后中共党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其中尤以庞松、王东的《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戴知贤的《文坛三公案》、谢春涛的《大跃进狂澜》、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等著作令人瞩目。[52]而格外能够表现出当时学者们的独立治学精神的是，从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年轻一代的党史学者庞松等，都开始突破 1981 年《决议》的说法，对中国为什么会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生产关系方面出现重大的历史反复，提出了新的思考。

《决议》认为，1949 年到 1956 年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在党领导下“有步骤地实现”的，1952 年提出以“一化三改”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而随后的事实也证明，这一阶段“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缺点和偏差是：“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53]

但是，《决议》中的解释还不足以全面解答许多人的疑问，即如果说当初废弃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经济体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反映了历史的必然”，“完全正确”，那么 20 多年后有什么必要再搞经济体制改革，重新将已经实现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单一所有制，退回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体制上去？如果说单一所有制结构的建立“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为什么 20 多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大大落后于本来与我国处于大致相同水平上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什么到1978年解放近30年人均消费粮食的水平还不及解放初，为什么几亿农民尚未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而且当年一些曾经是革命根据地的地区，人民的生活甚至不如解放前？[54]

对此，薛暮桥在 1988 年即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应当看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得太早了，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忙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私营企业。而且社会主义改造原定 15 年完成，结果四五年就搞完了，把资本主义经济和绝大部分个体经济统统消灭了，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衡量一种经济成份有无存在的必要，应当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 50 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它当时都是有利于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55]

1989 年，庞松等在《滑轨与嬗变》一书中，更列举大量数字和文献资料，进一步从更深层次做出分析，认为新中国在经过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之后，再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最正确的一种选择。“骤然而至的经济结构大变革虽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使中国广大城乡主要从事商品生产经营的私人经济绝大部分被消灭；组织起来的农民进行商品流通交换活动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而趋于萎缩；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前提下，愈来愈多地被纳入到国家计划的单一轨道；曾经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环境下比较活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长时期受到不合理的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缺乏相应的商品经济的条件而陷于停滞状态。所有这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实际上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滑轨与嬗变所带来的，它超出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一类概括，具有不容忽视的更为严重的性质，即它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阻滞作用，事实上超过了使国民经济维持一时增长的表层作用；它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多方面影响和惯性力，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益发展，并在一浪接一浪的‘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四清’运动中一再顽强地显示出来，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端。”[56]

不难想象，在 1989 年如此鲜明地对《决议》的说法提出不同的观点，难免会受到某种压力。只是，这种压力并非是来自公开的辩驳和争论，更多地却是来自内部的批评。尤其庞松又是中共中央党室研究室的研究人员，胡乔木又有过“党内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的严厉说法[57]，其结果可想而知。

第三波的讨论发生在 90 年代末。首先是文革史以及反右运动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禁引人注目。多年来，尽管文革史和反右运动史的研究受到整个社会的强烈关注，这种研究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也对党和国家的建设有益，但有关方面始终考虑到形象问题和恩怨问题，严格控制这方面的研究和出版。80 年代只出版过两部有关文革史的书，其中只有王年一的一部算是史学著作，而这一部还是借助于丛书并且是在图书审查刚刚开始实行之际得以出版的。[58]关于反右运动史的著作则一部没有，就连研究的论文也鲜有见到。终于，事隔多年，到了 1996 年前后，经过严格的审查，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得到了出版许可。1998 年，朱正的《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也在历经反复之后，成为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研究和介绍反右运动历史的重要史学著作。[59]而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20 周年的到来，大批反映改革开放决策内幕的书籍也相继出版了，其中透露了大量当年高层讨论经过的文献资料和档案。如此近距离的大批档案资料这样快地得以披露，这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波讨论最能够反映出中共党史研究在建国以后这一段的学术进展的，仍旧比较多地集中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问题上。再度鼓起研究者勇气的，似乎是 1995 年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的讲话。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的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绝不能想象从封建经济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因为它是那种帮助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有用的”资本主义。[60]

冲破“凡是”派的思想禁锢已经 21 年，但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来说，有时不靠“本本”撑腰还真不行。毕竟，胡乔木明确讲过，那些关于“中国应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之类的说法都属“谬论”之列[61]，如果没有更高权威的话，比如新发现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做根据，要想探讨毛泽东是否带有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重提“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几个字，会艰难得多。[62]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讨论发起者不再是一般的中共党史研究人员，而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负责人。而这次的反对者也没有完全采取十年前的办法，从内部进行批评，而是公开地在会议上和刊物上进行反驳。尽管从反对的文章当中我们有时还会看到某种大批判式的政治语言，但公开地讨论问题，毕竟有助于将这类讨论学术化，从历史看应该也是一种进步。

1996 年，中央党史研究室龚育之副主任最先开始发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断言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过快过早了，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随后，胡绳主任公开发表谈话和文章进一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是符合实际的要求呢，还是主要依靠政权力量人为地促成？”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从生产力的角度衡量一下。实际上，“拿 1949 年－1953 年和 1945 年相比，资本主义恐怕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一点”，甚至比 1936 年都少。中国革命在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情况下取得胜利，“不具备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和可能”。因此，按 1949 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过快过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盲目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结果“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这种提高不但不是真正的提高，而且只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阻碍作用。”[63]

有关建国初有无必要急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过渡或转变究竟推动了中国的前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前进；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和学者中间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带头打破禁区讨论这个问题，足以说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关切之深。尽管关于围绕着毛泽东是否有民粹主义思想的问题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64]，但从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末人们三度顽强地重提这个问题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现实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之后，要阻止人们进行必要的理性思考，不仅不智，而且也难以办到。尽管，围绕着上述观点再度引发了相当尖锐的争论，反对胡绳观点者甚至重新开始拾起“文革”语言，扣帽子、打棍子，但这种争论至少还没有超过文字争论的范畴，并没有因为有人上纲上线就被引到政治斗争上去。这也还是让人多少感到宽慰的一件事。可以肯定，当学者们在思考、在争辩的时候，无论对错，他们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在表达他们个人的一种思想、一种观点罢了。过分担心学者们的科学思考会动摇社会上人们这样或那样的信心，恐怕是太过杞人忧天了。改革开放到今天，历史进步到今天，中国人民对是非曲直的判断力绝不是比以往弱了，而是比过去强了。不争论不等于不思想。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真的脆弱到连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都难以承受的地步，那倒是真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了。因为那绝对不是学者们的勇气出了问题，而是制度本身出了大毛病。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 20 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初见成效，至少从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氛围来看，如今的研究环境比 20 年前要相对宽松得多。以言定罪的现象基本上已不存在了，因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而受到“整肃”（开除、批斗、降职、判刑等）

的情况也较少见到了；甚至即使是发表了被认为是有“严重问题”的成果，通常被处罚的也是出版机关，而很少像以往那样直接追究研究者的责任。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对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发展是有益的。当然，因为关怀现实导致发生所谓“政治倾向”问题，或因为学术观点上的所谓“错误”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也还难以完全杜绝；而不加区别地要求把一切有关领导人生平思想和重要党史国史题材的著作交由有关部门审查出版的作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共党史研究在学术发展上受到局限，许多历史问题至今还难以深入研究和探讨。甚至，在有的时候，只要少数个人提出了异议，哪怕是一本得到了大多数人好评的中共党史著作也还是可能会出人意料地遭到“封杀”。种种情况显示，中共党史研究确实难。

好在，人是思想的动物，思想是不会停止的。历史每天都在向前延伸，无论如何曲折，它也总是要前进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50 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和变化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党史学界“前赴后继”三度顽强地提出建国初“转变”问题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 3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影印版，第 12 页，

[2] 转见段吉福编：《中国现代学术文化随笔》，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25 页。

[3]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 年 3 月 30 日，《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6 页。

[4] 1944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对抗战爆发前十多年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总结，对抗战爆发后中共历史上最成功的十多年历史未做说明。

[5]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再版其选集时曾明确表示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年 4 月 20 日）不满意。这是否因其对毛泽东的功绩颂扬不够（只讲到了抗战开始之前），尚不得而知。参见《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955－999 页；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转见《胡乔木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76 页；并见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106 页。

[6] 前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 转见邵燕祥为朱正著《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所作序，见朱正：《1957 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6 页。

[8] 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延安解放社 1937 年版；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义》，新华书店 1950 年版。

[9] 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 年版。

[10] 由于陈伯达也是毛泽东的秘书，因此当时陈伯达的书和文章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

一度也被史学界奉为经典的陈著有：《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和《中国四大家族》；以及《关于十年内战》；《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等。

[11] 如缪楚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学习杂志社 1956 年版；王实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徐元冬等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2 年版。

[12] 张静如、唐曼珍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1 页。

[13] 《学习中共党史参考提纲（内部讨论稿）》，1970 年；广东省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1974 年。

[14] 茅海建：《不同的声音－读「中间地带的革命」》，《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

[15] “两个凡是”即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逾地遵循。”这一观点最初是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的指示，提出于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的社论中的。1978 年 5 月，胡耀邦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指导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对“两个凡是”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此一争论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

[16] 这时这一类文章中比较重要的有，蒋杰：《百团大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陈铁健：《瞿秋白与「多余的话」》，《历史研究》1979 年第 3 期；苏克尘：《历史的见证：“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3 期，等。

[17] 胡乔木前引书，第 11 页。

[18] 参见徐元冬等前引书，第 22 页；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1976 年，第 14 页。

[1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人物评价讨论会》，《党史研究资料》1979 年第 1 期。

[20] 据统计，自 1979 年初至 1980 年 7 月止，全国报刊发表的评论陈独秀的文章就有 100 余篇，评论五四及建党前后者就有 80 余篇。见王洪模：《近年来评论陈独秀简况》，《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

[21]这时唯一坚持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大概就是沙健孙的《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 期）一文了。对于沙健孙的观点，邓野在《试论五四后期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4 期）一文中全面地阐述了不同意见。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6 页。

[23] 转见《毛泽东选集》，第 956－957 页。

[24] 向青：《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转见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7－151 页。

[25] 廖盖隆：《在全国政协第三次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0 年 12 月 4 日，转见廖盖隆：《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2 页。

[26] 《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5 期。

[27] 郭绪印：《重评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

[28]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204，211，236 页。

[29] 参见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30]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 192，234－235 页。

[31] 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党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

[32] 竹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从进：《对“毛选”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党史研究资料》1983 年第 9 期。

[33] 陈铁健：《论西路军》，《历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34] 刊登竹郁、从进等文章的这一期《党史研究资料》未及全部送到读者手中即被收回。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通讯》于 1987 年第 6 期并受命为此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强调“对中央已经明确结论的重大历史问题，有的报刊未经中央授权，未向中央请示，即擅自发表文章，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引发势必会妨碍党内团结的争论。这种作法显然是不妥当的。”要求对这类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果研究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应当在党内向上报告，使党中央及时了解这些情况，以便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加以解决。”

[35] 见《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41 页。

[36]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941 年 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33 页。

[37] 黎汝清：《皖南事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68－792 页。

[38] 当然，可以争论总还是有些好处。比如项英的铜像就可以在家乡竖起来了，而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纪念碑也可以立了。这些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39] 参见向青等：《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9－46 页。

[40] 杨奎松：《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史实考辨》，《党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同前引第 6 期；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7－469 页。李良志、郭德宏等也曾有专文比较客观地描述了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41] 王实等前引书，第 43 页。

[42] 向青前引书，第 204，215 页。

[43] 转见青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

[44] 分别见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3－164 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2 页。

[45] 参见《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6－113 页。

[46]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47] 茅海建前引文。

[48] 有关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共党史学界中人也曾有所提倡。如何东曾著《中国现代史史料学》（求实出版社 1987 年版）；陈明显曾著《中国现代史料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 1987 年印行）；张注洪曾注《中国现代革命史史料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另外近代史学界荣孟源先生著《史料与历史科学》中也曾涉及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问题。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对此也有专章论述。

[49] 见胡绳：《谈党史研究工作》，《党史通讯》1984 年第 1 期。大致相同的观点还可见邢赍思：《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等。

[50] 参见《胡乔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讲话》，1980 年 7 月 4，5，8，18 日；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 年 3 月－1981 年 6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6－77 页。

[51] 见邓小平前引文，第 73－97 页。

[52] 庞松、王东：《滑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戴知贤：《文坛三公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谢春涛：《大跃进狂澜》，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同年出版的虽非历史学著作，但具有相同揭示历史真

相作用的纪实文学作品还有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等书。

[53] 同前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54] 在讨论《决议》的过程中，一些人提到他们刚刚考察过的陕甘宁边区和辽宁的朝阳、河北的承德等地区，称那里的群众在战争年代与我们同甘共苦，现在许多公社的人民“衣不遮体”、“一贫如洗”。他们问：“我们党怎样领导这件大事的？为什么竟使群众遭受这样困苦达二十年之久，而不能改进？”为什么“相当多的队甚至比合作社之前、比建国前的陕甘宁边区更加贫困了”？

[55] 见薛暮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动态》第 802 期，1988 年 10 月 20 日。

[56] 庞松前引书，第 296，318－319 页。

[57] 见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几点说明》，1981 年 5 月 19 日，《胡乔木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8 页。

[58] 王年一前引书；高皋、严加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严格说不能算是史学著作。这时研究文革史的学者，为出版文革史著作，只好与海外出版界联系。如文革辞典等就是送到海外去出版的。

[59]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朱正：《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涉及到文革史方面的写得较好的一本书，199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过一部丛书中的一种：郑谦、韩钢著《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关于反右运动史 1998 年得到批准出版的还有叶永烈的一部纪实文学作品：《反右运动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60] 见《毛泽东在七大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6－127，189－190 页。

[61] 胡乔木前引书，第 158 页。

[62] 最早十分委婉地提到毛泽东在三大改造问题上有没有受到民粹主义思想影响问题的，是石仲泉。但这是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的批评国外学者所谓“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座谈会上的发言，因此其发言基调自然只能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具有民粹主义倾向”这个观点的。参见石仲泉：《关于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2 年第 6 期。

[63] 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 年第 1 期；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中共党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64] 参见《中流》1999 年第 5 期。

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 50 年

要想完整地说明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很难把目光仅仅局限在 1937－1945 年这八年时间，因为这八年之所以能够有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特殊形态的国共关系，是从 1936 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开始的，而这种关系的结束，又是到 1946 年才最终结束了的。这也就是说，谈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必须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当然，既然是国共关系，就不完全等同于“国共合作”，因为合作一词实在无法完全涵盖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正是基于上述想法，本文概述的研究时限当从 1936 年起到 1946 年止，讨论的对象则是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

（一）

国共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起源于 80 年代。记得最早看到的有关国共关系的一个小册子，还是日本学者波多野善大写的《国共合作》。但那里面对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包括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问题，几乎没有多少新鲜的史料，更谈不上深入的研究。[1]当然，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并形成一部著作，日本学者还是开了风气之先。

严格地说，中国学者并非没有研究过国共关系史，只不过，它从来都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内容之一，因为任何中共党史著作和中国革命史著作几乎都离不开对这一关系变化的说明。只不过，在 80 年代以前，这种说明通常只是作为毛泽东英明决策产生的背景和实现的对象而附带出现的。甚至，就连抗战期间是否存在着“国共合作”的问题，中共党史著作也语焉不详。它们提到了红军改编，但对红军为什么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不做任何说明；它们强调说蒋介石“阴谋地计算在抗日战争中假手日本军阀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势力”，为此“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去担负最前线和敌人后方最严重的作战任务”，但蒋介石为什么竟然能够指挥共产党的军队，他是如何“假手日本军阀”的，以及所谓最前线和最严重的作战任务是什么，也没有做任何解释。[2]

把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也叫做“国共合作”，似乎是 1980 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是邓小平在这一年从和平统一台湾的角度公开讲：“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因此完全可以再有第三次合作。[3]邓小平的讲话不仅肯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个概念，而且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研究的展开。

从文革后到 80 年代初，整个中共党史的研究重心基本上都还集中在党的创立到红军长征这一段，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关的种种问题，包括抗日战争的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至少在 1985 年以前，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到来之前，无论是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研究，都很少有比较成熟的成果产生。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尚未开放。能够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的研究者太少。结果，这个时候能够做出一些成绩的，只有几个部门的人，一是全国政协研究室的相关人员，因为与第二次国

共合作形成有着密切关系的西安事变的研究，按照规定是由全国政协直接领导的，大部分相关的资料和相关人员的回忆录，都保存在政协，因此他们那里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的研究人员，因为按照规定，他们所在部门保管着一些内部出版的成套的党内资料，如《中共中央文件汇编》、《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等。另外就是中共中央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他们自然有近水楼台之利。这段时间能够发表一些有史料内容的研究成果者，大都是在这些部门工作或曾借调到这样的部门工作的人。如最早披露出部分具有相当价值的西安事变档案文献资料的申伯纯、丁雍年等；最早发表有关 1937 年国共和谈文章的李良志、杨圣清；最早系统介绍皖南事变前后中共中央工作方针的曹雁行、蔡霆光等。[4]

1984 年《文献和研究》杂志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李海文的《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一文。[5]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过去人们只是通过吕振羽 1980 年和谌小岑 1981 年发表的回忆录，以及在此前蒋介石、陈立夫、邓文仪等人的回忆录中，约略知道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6]此文第一次利用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部分珍贵档案，披露出国共两党 1936 年秘密接触的一些细节。几乎同时利用了相同的档案资料进行这一研究的还有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李坤。[7]李海文和李坤在这个问题上的突破，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的发展。

受到政治上加强对台统战工作的需要，80 年代下半期到 90 年代初中国现代史学界明显地形成了国共合作研究的一个高潮。仅全国性的国共关系研讨会就接连举办过四次之多，在此期间发表在学术研究刊物上的涉及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文章就在百篇以上。而捷足者更在 1987－1990 年间就接连出版了几部国共合作史的著作[8]，李海文、李坤的上述研究成果对这些著作的完成无疑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这些书中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过程的说明，有相当多的细节都来自于她们的文章。不过，80 年代的中国现代史研究基本上还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尚未形成一套良好的研究传统和学术规范。因此，研究者们不仅比较多地喜欢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大考虑相关专题研究的条件和水平是否足够形成专著，而且往往习惯性地拒绝在自己的著作中注明自己在哪些地方利用或转引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尽管，对于那些撰写这些大部头著作的研究者来说，几乎没有谁能够占有他所要探讨的专题的全部公开史料，并一一做出具体的研究，却没有谁在利用或参考李海文等人的研究成果后，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一一做出注释予以说明。而 1985 年《文献和研究》第 4 期发表了李海文等利用的部分重要文献[9]，似乎也便利了大家这样做。殊不知，这样简单照搬已有研究成果又不加以说明的作法，不仅在学术上缺乏负责精神，而且这种简单照搬也容易因为良莠不分以讹传讹，使整个研究流于低水平重复，无助于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事实上，有关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的经过，李海文和李坤当时的文章在不少问题上还没有弄得很清楚，特别是以吕振羽和谌小岑的回忆为参照之处，很多情况根本就搞错了。比如关于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王明、潘汉年等接触谈判的时间和结果；中共北方局与南京政府代表秘密接触谈判的时间、经过的情况；关于董牧师、张子华等担任联络的经过与接触的内容；关于潘汉年受命与国民党谈判的时间和经过，甚至关于双方历次所提谈判条件的时间、经过和内容等，二李的文章都未能做出清晰和准确的说明。[10]在这种情况下，过快地形成专著，简单地照搬前人的说法而不加以深入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重复类似的讹误。

在 80 年代末，围绕着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除了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揭示以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进展就是关于美国调处国共关系的研究。在这方面，国共关系的研究显然是得益于中美关系研究的进展，而有所深入，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第二章（扶蒋反共政策的形成）、第三、四章（马歇尔调停），和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11]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牛军的书，充分利用了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和相关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三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成功地为我们描述了自 1944 年至 1946 年间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和美国政府两度派特使调处国共冲突失败的经过。[12]

80 年代的国共关系研究当中，大概没有哪部著作在学术上能够达到牛军这本书的研究水平。严格说，把牛军这本理应列入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著作和他的相关论文[13]列入国共关系史研究，无异于将 80 年代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提升了一个档次。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遍查这一时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和读过这一时期出版的几部通史性国共关系问题的著作后，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前述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和关于美国调处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之外，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无论在史实方面，还是在观点创新方面，几乎再也找不到具有突破性进展的研究成果了。仅以四次国共关系研讨会的论文为例，第一次 63 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仅 8 篇，无论史实还是观点均无多少新意；第二次 53 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 16 篇，也只有两三篇文章在涉及国民党抗战准备问题上提出了一点较新的观点，史实研究方面仍无建树；第三次 52 篇论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 21 篇，第四次 117 篇，与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有关的论文 20 篇，两次会议 40 余篇论文中也只有两三篇论文在选题开拓上略有新意。[14]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研讨会上，包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上百篇论文当中，谈经验教训和展望前景的、带有政论色彩，甚至着眼于建议、规劝之类的文章，就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他文章和这时出版的相关著作，往往也都会加上如此这般的一些内容。其实，正确的经验教训是建立在最基本的史实研究的基础上的。没有客观、深入和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能实事求是地弄清楚长期影响着两党感情的种种历史矛盾和冲突的来龙去脉，仅仅满足于早已设定的政治结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尚未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就“下车伊始，哗哩哇啦”，既不利于学术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从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整体成绩不显著，有很复杂的原因。现实政治的影响自然是原因之一，因为要强调国共合作，有关国共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和势不两立往往就难于成为研究的重点，从而使学者不得不在政治需要与学术需要之间煞费苦心地寻找平衡。记得笔者当年写《战时国共谈判实录》时，出版社要求书名都要有一个醒目的正题，就很是让人伤脑筋。因为按照历史本身的内容和此书叙述的主旨，战时国共谈判更多地还是国共两党为了维护和争取各自利益的一个斗争过程，因此笔者的本意打算叫“另一种战争”，但出版社编辑更愿意看到统战的效果，于是只好换了一个比较入时的题目：“失去的机会”。笔者最后只能特意在后面加上了一个问号，算是表示某种程度的保留吧。同样的情况，这个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之所以大都要在开头或结尾处加上一些伟大意义或历史教训之类的分析说明，甚或干脆通篇就是指点江山，慷慨陈词，为“第三次国共合作”总结经验，显然也绝不是因为历史研究的需要，大概是众多研究者热心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罢了。

（二）

80 年代国共关系研究存在的不足，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原因。因为，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工作者都热衷于为现实政治献计献策，

问题是要弄清史实，必须占有充分的史料。而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的演变，大都取决于两党高层的内部决策和相互之间的谈判与交涉。但所有这些反映高层动态的文献资料，大都没有公开。虽然，从 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文献和研究》等刊物陆续刊布了相当数量的有关档案文献，然而要利用它们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把各个环节有机地连接起来，弄清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所有脉胳，还是相当困难的。牛军能够顺利成书，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美国调处国共关系，许多资料可以从美国和台湾已经公开了的档案中得到。如果直接研究国共两党交涉和冲突，条件就困难多了。因此，80 年代中能够推动这一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北京那些可以接触到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中央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 80 年代末，除了李海文等就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秘密接触问题已经发掘出新的重要史料以外，全国政协研究室的张魁堂整理发表的刘鼎在 70 年代中后期追记的“西安事变笔记”（即《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也属于涉及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份史料之重要，关键在于 1936 年西安事变爆发前到西安事变发生期间，刘鼎作为中共中央派驻张学良身边的联络人员，曾经耳闻目睹了许多重要的情况。笔记中也记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不仅详细追忆了刘与张学良历次谈话的内容、周恩来与张学良 4 月 9 日晚延安会谈的内容，而且还追忆了“张学良一度要求和红军一起打游击”的情况。这些对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具有重要意义。[15]不过，作为 40 年后的一种回忆，这则史料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明显的疑问与讹误。1990 年，邱路撰文对此做了简略的补充和订正，不仅说明周恩来与张学良有过第二次延安会谈，纠正了刘鼎所记安塞会议的时间和内容，而且特别提出：刘鼎所记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接受了张学良关于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抗日”方针的建议，和张对“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十分高兴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有资料表明延安会谈后张学良迅速开始转向了“抗日反蒋”，并密谋与中共共同实施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16]

研究抗战期间国共关系，不能不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经过。但对于这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 80 年代争论不已。包括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方针的转变究竟是从 2 月开始，5 月开始，还是从 8 月开始，它是否受到过张学良的影响，这在中共党史学界都是争论已久的话题。尤其是在 80 年代下半期，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一度相当热烈。[17]但可以看出，随着越来越多的俄国档案的披露，许多长期坚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出来，逐渐开始承认这一政策和策略的制定和转变的过程，曾经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能把“独立自主”简单地理解为一定是要与共产国际的的所谓“右倾”进行斗争。可是，一直到 90 年代初，在涉及到中共中央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是受张学良影响转向“逼蒋抗日”，还是张学良受中共中央影响转向“抗日反蒋”的问题上，中共党史学界还是众说纷纭。

1991 年出版的张魁堂著《张学良传》进一步发挥了关于张学良影响了中共中央对蒋策略的说法。不过，《张传》显然是西安事变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一部著作。因为它几乎可以被视为是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领导）编写组近 30 年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的一个学术总结。[18]《张传》利用了许多政协研究室查阅和征集到的西安事变档案资料和回忆史料，特别是对张学良与共产党发生关系的历史经过，进行了相当具体的说明，其中许多情况在过去是鲜为人知的。但《张传》在史实考订上有所欠缺，并且过分依赖刘鼎的回忆，因此仍旧未能完全弄清楚 1936 年间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种种内幕。他一方面注意到张学良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甚至密谋成立“抗日反蒋”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一方面却继

续坚持说“张学良的联蒋抗日主张促进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同年 5 月 5 日，红军发表的东征回师通电，即已不再提反蒋口号。9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终于最后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转变。”[19]事实上，不弄清楚 1936 年中共与张学良之间统战关系的种种内情，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共与张学良究竟谁影响了谁，是几乎不可能的；甚至，要想实事求是地说明西安事变发生和解决的经过，也是十分困难的。几十年来，西安事变研究一直突破不大，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对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研究， 1995 年终于有了一部专门的著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此书虽然在台湾出版，由于 1997 年陈铁健在《历史研究》专文做了介绍和评价，作者又接连发表了一些文章，因此对国内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也有一定的影响。[20]陈文分“延安会谈：谁影响了谁？”、“张学良‘决心反蒋’辩”、“共产国际影响和苏联援助”、“诛蒋，还是放蒋？”和“悲剧，还是喜剧？”五个方面介绍了《新探》一书的新意所在。据陈文介绍，《新探》一书对 1936 年间张学良与中共的关系，确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实，同时对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纠正了一些过去研究中的缺失”。陈文明显地赞同《新探》一书关于中共中央通过延安会谈影响了张学良，而非张学良反过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它所怀疑的只是：张学良是否因此就“决心反蒋”了呢？[21]对此，《新探》一书作者随即发表了《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的专文，对张学良在中共中央影响下一度走上反蒋道路的情况做了更加详尽的分析说明。[22]按照此文介绍的资料和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延安会谈前，鉴于夺回东北非南京力量所能及，而蒋之安内攘外又遥遥无期，张已对蒋介石剿共政策发生严重动摇。随着东北军与红军作战损失惨重，南京又取消被歼两师番号，张遂下决心联络中共，一来寻求和平，二来试图通过中共接通苏联。3 月下旬，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张自然更加重视联苏，并赞同东北军内左翼分子联苏联共、组织西北大联合，与苏联结盟的设想。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后，张很快即下决心联苏联共，并表示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并取得苏联的支持，他相信：“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随后两广事变发生，张立即四出活动，打探消息，有意起而响应，并明确提议中共加派专人帮助其训练干部，甚至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只因两广事变很快失败，蒋又有联苏动作，再加上中共中央也放弃了“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联蒋”抗日策略，张学良才最终放弃了实行西北大联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联结盟，“抗日反蒋”的计划。显然，只有真正了解这一背景，了解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继续保持着的那种寄希望于苏联的秘密合作关系，我们才能深入了解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和为什么会有后来的那一系列结果。

应该说，自 80 年代末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当中，西安事变研究的进展是极为令人瞩目的。[23]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它成功地揭示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这一十分隐秘和复杂的历史内幕，而且在于它在涉及到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苏联、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和许多具体的历史情节的研究上，都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自进入 90 年代以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明显地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除了上面谈到的有关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研究以外，90 年代相关论文的数量不仅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上也有了令人可喜的提高。马仲廉的《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第一次具体地研究了国共两党抗战初期军事合作的战例。[24]习五一的《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通过对当时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对抗战开始前后一段时间国共两党一度试图实行组织上合作的经过，交待得十分清楚。杨奎松的《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的变动》与李良志的《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分别深

入讨论了中共中央皖南事变前后对国际形势和当时国民党态度的估计问题。[25]金冲及的《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 1944 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和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则从不同的角度详尽地探讨了中共提出"联合政府"口号的背景、原因和目的。[26]另外，像常家树的《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对比研究》、章百家的《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27]等，也都颇具新意。

在专著方面，抗战期间的国共关系研究 90 年代也开始出现了有一定研究深度的学术成果。比如李良志的《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和杨奎松的《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都属于这样的著作。[28]只是，前者全面探讨了将近十年间国共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而后者的侧重点则在于系统研究十年间国共两党的历次谈判的经过。两书都运用了大量新的史料，对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事实经过，做出了新的解释。而研究历史，诚如陈铁健先生所云："倘能揭示历史真相，有所突破和发展，固然可喜，而能提出新的问题，引起深层思索，则尤其可贵。"[29]两书在这后一方面，也明显地做出了各自的努力。虽然都是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变化的过程，但李书与杨书叙述的主旨有显著不同。前者着重于强调国共合作抗日；后者则明显地侧重于说明两党之间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的妥协与斗争。当然，如果从较高的水准要求，两书也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后者，尽管有论者评论该书是"内容丰富，结构严谨，体系完整，史料翔实，论证充分"，议论"平易而精当"[30]，但由于作者成书较急，书中文字有不少错漏之处，经过第二版修订才有所改观。更重要的是该书对资料的处理，一来是遗漏了一些本应利用的台湾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二来是对中共资料也没有做到融汇贯通，不少地方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更深入的背景的说明，以致有时给人以资料堆积和罗列的感觉。

（三）

9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当数一本本"国家级"的课题的出版了。如马齐彬主编，纳入国家"七五"规划的重点课题《国共两党关系史》；毛磊、范小芳主编，属于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样份量的专著，如黄修荣的《国共关系七十年》；田克勤的《国共关系论纲》；王功安等的《国共两党关系概论》，和范小芳等的《国共谈判史纲》等。[31]由于这些著作，特别是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和毛磊等主编的《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理应代表着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研究的最高水平，笔者在此特略做评析。

让我们首先来看《国共两党谈判通史》。把国共两党谈判分成中央级谈判、地方级谈判和海峡两岸的谈判，从头到尾地联系起来，贯穿成史，这个想法显然比较新颖。从作者的设想来看，作者是想要由此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门新课题的体系"。但从已经成型的体例和内容看，这一尝试恐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不要说海峡两岸谈判像作者自己所说明的那样，"称它们为国共两党中央一级的谈判也不很准确"，就是所谓中央级、地方级谈判，从两党关系的本质要求和书中实际归入的五花八门的例子来看，两者之间也缺少可以成系统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事实上，作者自己也清楚地看出，书中所列举的各种地方性"谈判"的例子，多数根本就"称不上为谈判，只是'谈心'、'谈话'"罢了。硬把中共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和兵临城下时对国民党个别将领的劝降工作，都算成是国共"谈判"，充其量不过是为两党谈判添些佐料而已，无助于体系的建立。因此，该书唯一能够成史的内容，其实只有中央级谈判一部分；而中央级谈判中，又只有围绕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系列谈判才可以成史。

[32]

作为一部立意出新的《通史》，作者除了在体例上应有独到的设计和成就外，尤其必须最大限度地汲收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争取有所创新。而该书对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两党谈判研究水平的高低，关键在于看它是否真正汲收了《失去的机会？》及其此前的其他有关论文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自己的综合分析和进一步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比较的结果，可以看出该书是注重汲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弥补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并且努力在做更全面的研究，力求有所创新的。[33]不过，做为高校教师共同编写的一部集体著作，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参加写作者未必都是该部分研究的专门家，结果不仅容易造成各部分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会弄出一些研究水平想高反低的东西来。因为一些作者实际上并没有可能在汲收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时做进一步的“深加工”，而为了避免过大量地转引一两个人的著作和论文，只好对各种研究成果和一二手资料做简单的 1＋1 的重新组合，结果是新的反而不如旧的。《通史》一书中就存在着类似的一些情况。

比如，关于 1936 年董健吾赴陕北苏区的公开身份问题，1990 年即有专文做出考证，指出以董当时的身份和临时任务，南京政府财政部绝不可能给他什么“财政部委员”或“西北经济专员”的名义。关于这一点，当时博古接见了董健吾后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讲得很清楚，即“董牧师系由宋庆龄介绍见孔祥熙、子文，由孔财部给调查员名义派来”。《通史》一书注意到此文，并有所引注，却不知为何竟忽略了这一考证，仍旧不加说明地根据 1981 年石肖岩的一篇文章，称董得到了一张财政部长孔祥熙给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因此才畅通无阻。不仅如此，《通史》这一部分的作者不知从何处得出印象，断言董第一次陕北之行即被阎锡山发现，告到南京，迫使“宋子文只好收回董健吾的通行证，董健吾的使者使命也就此完结。”此说明显地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董的委任状乃孔祥熙财部所给，要收也是孔祥熙，久已下台的宋子文如何有权去收，而且还是收什么“通行证”？二是作者显然没有注意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书，因为即使作者不了解文献资料方面的情况，只要读过《西行漫记》也就不难注意到董健吾并非第一次赴陕就被取消资格，因为斯诺清楚地记述了董第二次赴陕的情况。

又比如，关于 1936 年北方局代表与国民党 CC 系接触的情况，1990 年也有专文依据当年北方局的报告等文献资料做过较详尽的考证，指出吕振羽、谌小岑等 1980、1981 年的回忆许多地方不准确，一些重要史实完全弄错。但《通史》一书却一面部分引用上述文章中的关键资料，一面不做任何考证和说明地几乎全部照抄两人回忆中的说法，致使不少史实出错。而有些情节，作者则明显是出于主观想象了。如说 1936 年 3 月政治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接见张子华，把致董健吾电报中的五点谈判意见“对张子华做了详细交待，指示他在谈判中坚持原则，为早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贡献”；如说张子华回到南京后“将林伯渠复覃振函私下交予谌小岑”；说张子华二次赴陕是因为曾养甫未能从张子华手中取得中共中央的文字凭证，对其所谈难以置信，等等。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可能对《通史》一书中的类似史实错误一一指正。但其在具体史实方面讹误之多，确实有点超出想象。这大概也是高校教师集体联合编著大部头著作的一种通病。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该书主编等自 80 年代就开始着力于研究国共关系史，并且已有多种成果，此成果又列入国家重点资助项目，作者又有意开拓领域，自成体系，本应精心设计、精研细磨，使之一炮打响，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和权威性。

与《国共两党谈判通史》相比，《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的作者队伍的个人研究实力明显比较整齐，个人所研究的范围也大都与此课题有关。因此，该书无论在结构设计、史实研究，以及在观点论证方面，整体上都明显较前者的水平要高。具体地说，该书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叙述，特别是对十年内战中国共两党关系的介绍稍嫌简略，但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即 1936－1946 年国共关系的说明则较为详尽，重点及章节的划分也比较合理。最引人注目的是，依照该书前言所说，它讲述国共关系的主旨，意在说明："国共两党关系中两次合作与两次分裂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的两大主要矛盾－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共两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不同所决定"。这也就是说，作者认为，国共两党所以具有合作基础，是因为两党在反帝反封这一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两大任务方面有一致性，只是两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彻底性上有所不同。这无疑是一个多少区别于以往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新观点。[34]全书开篇也显示出作者的这一意图。全书第一章即从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国共两党的形成谈起，点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代表着中国两大新兴的革命阶级，肯定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作者的这一意图到此再没有往前延伸。讲过孙中山以后，全书的观点就又回到传统的说法上去了。

在讲到南京政府成立时，该书就明白肯定南京政权"是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政权"了。作者甚至照搬解放战争期间陈伯达那个"四大家族"的说法，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僚，利用各种特权使自己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及陈果夫四大家族就是这样逐渐形成起来的。"问题是，在 90 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必须严格依据史实说话，而不能只是简单地照抄和搬用过去的一些政治词汇。比如，既然谈到蒋介石等"逐渐成为新兴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甚至形成"四大家族"，就有必要说明："官僚资本"是什么？为什么说蒋等已成为"官僚买办资本家"？"四大家族"又是如何化公为私，聚敛财富，成为"极少数最大的资本巨头"的？说金融、交通等行业国有化、建设委员会以及资源委员会等国家行业垄断机构的设立，是蒋介石等人凭借其政治权力，直接干预和控制国民经济，但如何从史实上来说明蒋介石等人具体是怎样因此而成为"资本巨头"的？[35]不仅如此，能否一言以蔽之，说南京政府大修国营铁路和公路，完全是"为了发动反共内战"？为何一面说南京政府成立后，民族资本发展严重受阻，一面却又承认民族工商业"在 1927－1930 年获得了一些发展"，"1935 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事实上，如果只是把 1931－1934 年间的萧条归结为国家官僚资本垄断的结果，则难免让人有所疑惑，因为这期间的萧条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影响，并非纯然是中国一国之特例。况且作者所承认的那个"1935 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恰恰是战前中国民族工业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因为抗战爆发前的 1936 年，中国经济达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最高水平。对此如果不加分析和研究，只是笼而统之地拿"1935 年以后""又有所发展"几个字一笔带过，如何能够让人弄清楚作者究竟是一种什么看法？况且，大概许多人还会进一步提出疑问：既然你说南京政府成立近十年，内战连绵不断，民族工业又大受压制，外寇入侵更使民族陷于绝境，"国家愈加破碎混乱，人心愈加涣散分离"，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蒋介石在 1936 年底被张学良扣在西安，责其停止内战，抵御外侮，自然应当受到全国舆论和民众的欢呼，为何蒋介石反而还会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蒋脱险回京时竟还会受到社会各界和舆论的热烈欢迎？[36]显然，在 90 年代研究国共关系，如果不能依据史实来解答读者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只是简单地套用一些过去的政治概念，统统"一言以蔽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其实，不论作者的观点如何，在今天来评论南京政府，确实需要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和更扎实的研究。因为对南京政府性质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性质的认识，至少在形式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的基础。《国共两党关系史》不仅全盘否定南京政府，毫无保留地肯定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而且在"对日侵略的两种方针"的标题下，为否定"国民党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竟连中共党史学界早已否定了的"九一八"事变后"左"倾中央的口号也一并肯定下来，一概以"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视之，实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该书将国民党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在客观上仅仅解释成是日军入侵使南京关税、盐税收入受损，在主观上则断言"蒋介石为了适应英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和维护他的半殖民地统治地位，被迫对他的对日政策作出某些调整"[37]。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反对关门主义、重新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为什么在与国民党的交涉和谈判中一步步退让，从最初坚持要首先推翻南京政府，到承认联合国民党，但要打倒蒋介石；从坚持两个政府的合作，共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到同意放弃苏维埃，但要求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全国议会和成立全国国防政府；到最后干脆做出"四项保证"，完全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承认这个极力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宣布拥护蒋介石，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实行苏维埃改制和红军改编？

应当说，《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没有能够真正找到把握国两党关系变化的历史线索。它甚至没有具体地去研究和说明中共中央，包括毛泽东在内，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认识和策略，曾经经历了怎样一种历史性的变化。该书并没有从基本的史料出发，历史地来说明这个问题，而是简单地根据已经修改过的《毛泽东选集》中的几篇文章的论断，不加分析、不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地到处套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概念。实际上，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毛泽东他们对国民党认识的发展变化，是难以说明国共两党为何能够在抗战初期相互合作，难以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抗战初期为何高度评价蒋介石和国民党，积极支持与国民党进行组织上的合作，肯定国民党在抗战中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甚至打算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38]自然，该书也就绝不可能告诉读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认识和策略的改变，经过过怎样的变化和反复，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态度又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与反复？

不难看出，《国共两党关系史》一书虽然在前言中提出了新的想法，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却没有脱离传统观念的轨道。结果不仅其内容与前言主旨存在矛盾，而且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存在不少问题。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在史实研究的方法上也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比如，该书严格说来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史实，也没有提出多少新的观点，但该书的引文注释却差不多都是直接来自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给人印象好像作者很少参考和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39]同时该书对涉及两党关系的事件，资料使用上也有明显的疏漏，经常是大量使用中共一方的资料和回忆，而不注意利用和分析国民党方面的的相关资料。一些史实的说明也明显与近年来已经得到史学界公认的新的研究结论相矛盾，如只谈蒋介石南京政府在 1937 年前的妥协退让，不谈在国民党当局指挥下的局部抗战和相关的抗战准备，甚至在谈到上海"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等抵抗作战时，根本否认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调度与指挥，而是把它们说成是违背南京政府意志的"国民党内部的分化"。[40]一些资料的使用也缺少考证，如在"国民党的反共策略和措施"一节中，该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分析说明国民党当时实施的"溶共"、"限共"、"防共"、"反共"政策，如何"凶暴残忍，阴险毒辣，无所不包，无所不入，无所不用其极"，但作者对书中所列举的《限制共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

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等文件，却未做必要的考证[41]，以说明这些文件分别是什么人制定的，哪些是正式通过实行了的，哪些只是腹案或少数人的提案未曾实行过。因为，如果不弄清文件由什么人提出或制定，是否实施以及何时，在何种范围内实行，只是不加分析地主观认定这些文件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为，不仅不利于具体弄清国民党内部当时对中共的真实态度与分歧，而且也容易给人以误导。另外，该书的引文注释也十分不规范。许多注释没有注明著作的出版社，或注了出版社却不注出版年；有的甚至不注页码；一些电报信函明明有出处可注，作者却只注电报信函的名称，而不注其出处；更有许多明明该加注，也有注可加，却不加注的地方。

（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目前的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研究，大致尚处在一个过渡期中。局部的个别的专题研究是有成绩的，而系统的成体系的研究水平不高。造成系统研究水平不高的原因说起来很多，既有现实政治的影响，也有研究队伍本身的问题，但还有一个不能不提到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众多研究者受传统的党史教学体系和观念的影响很深，还不大能够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利用史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来具体地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往往习惯于从一些概念化的政治思维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能深入到具体的个案当中去，严格地从事实出发，从经过考证的史料出发，实事求是地弄清楚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就很难在整体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应当看到，尽管我们目前个别专题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但相对于整整十年的国共关系来说，这种进展仍只是局部的和个别的，个案研究目前仍然是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研究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实际上，史学研究者也只有深入到个案研究当中去，才有可能发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从而真正摆脱思维模式概念化的痼疾。比如，当我们习惯性地使用“亲日派”、“投降派”、“顽固派”之类的政治概念来说明某些国民党人的时候，如果能够深入研究所说这“派”那“派”的成员及其具体的所作所为，我们往往能够发现情况远比这种笼统的概括复杂得多，因而在以后使用这类概念时就会十分慎重和更注意实事求是。再比如，当我们空泛地争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权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把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十年中不同时期的所有相关的言论、指示和对国民党的态度，按照时间顺序做一具体考察，大概也就能够清楚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的认识经历过怎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是什么，而不会简单化地从只是从政治意义的角度去争论这种问题了。

深入个案研究，就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谈国共合作，显然不能仅仅把眼睛盯在国共合作形成的经过上面，还应当具体考察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在各个方面和不同的地区究竟有过一些什么样的合作。记得 1995 年赴台时，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一位国民党老兵的发言，讲他当年在山东敌后打游击多年，经常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相互间从未发生过磨擦冲突的情况，当时颇感诧异。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认识过于侧重于两党磨擦和冲突的一面，几乎没有对这方面的情况进行过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因而无法想象两党军队之间在敌后竟会有存在着这样的合作。那么，是不是说我们总是谈论两党磨擦和冲突，就对当年两党磨擦和冲突的情况研究得很好了，大多数情况搞得很清楚了呢？恰恰相反。我们如今在谈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问题时，虽然经常谈到这样或那样的磨擦和冲突，我们的认识往往也只是停留在当年延安报纸所说明的那种水平上，很少对每一个个案做过深入的研究。

仅以研究者讨论最多，成果也最多的皖南事变而言，究竟有哪篇文章或哪本著作大量研究过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对蒋介石、重庆政府军事当局和第三战区事前的情报、反应、计划与部队调动配备的实际情况等，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能够回答众多读者的疑问，即如果皖南新四军不走南下茂林的路线，皖南事变是否仍会发生？同样，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河北、山西、山东、华中敌后等地，发生过许多引人注目的磨擦和冲突，甚至是“惨案”，但有多少文章和著作依据国共双方的各种文献档案和回忆资料，对每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原因、背景和经过，蒋介石或重庆当局的态度、具体处置等，做过实证性的研究和分析，进而综合一个个个案的分析，总结出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当局在其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哪些是直接的，哪些是间接的，哪些并无重庆的意图在内，多半只是地方性的事件，从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化，究竟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他个人的问题，还是他周围人的鼓动，他在多大程度上受国际上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他也像大多数其他独裁者那样，很容易受到那些最善于揣摩上级心理、迎合上级需要的下级报告的左右？如此等等。

还是那句话，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弄清史实，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做些判断历史是非对错和从现实关怀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之类的事情。史实弄得不清楚，或者似是而非，任何主观的判断和总结都可能变得毫无价值，甚至对读者产生误导。回顾 50 年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研究，更深感史实研究的重要，但愿今后国共关系研究能够在这方面进一步做出扎实的成绩来。

----

[1] 波多野善大著，罗可群译：《国共合作》，广东档案史料丛刊（增刊），1982 年。

[2]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58 页。

[3] 转见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69－670 页。

[4]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丁雍年：《关于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11 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其特点》，《教学与研究》1981 年第 1－2 期；杨圣清：《抗战初期国共两党的两次谈判》，《党史研究》1981 年第 2 期；曹雁行、蔡霆光：《皖南始末》，《党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

[5] 李海文：《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文献和研究》第 7－8 期。

[6] 吕振羽：《南京和谈始末》，《群众论丛》1980 年第 3 期；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3 期；陈立夫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传记文学》第 31 卷第 1 期；邓文仪：《从军报国记》，台北正中书局 1979 年版；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 1973 年版。

[7] 李坤的研究似乎早于李海文，但文章发表却晚于后者，且只是未刊稿的缩写。见李坤：《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未刊稿）；《略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党史研究资料》1985

年第 8 期。

[8] 如林家有：《国共合作史》，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王功安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徐矛等：《国共合作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张广信：《国共关系史略》，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苏仲波等：《国共两党关系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等。

[9]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 4 期

[10] 对于李海文和李坤文章中的讹误与欠缺，杨奎松于 5 年后撰文做了较为详尽的订正。见杨奎松：《关于 1936 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与此同时，潘合定在《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第 29 辑，1989 年。）一文中，也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

[11]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12] 应当指出，牛军的这本书在研究规范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即很少通过严格的注释来说明自己转引和利用了哪些美国和国内学者提供的文献资料和他们的研究成果。

[13] 牛军在其专著发表前曾在《近代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过两三篇专题论文，如《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和《战后初期美苏国共在中国东北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等，内容均属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的范畴。

[14] 第二次研讨会上在观点上略有些新意的论文是丁雍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与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开始时间》等；第三次研讨会和第四次研讨会中在选题上较有新意的论文分别是王赓唐的《从沪宁路东抗日时期敌后武装的组合和分化看国共关系》，和邵雍的《1939 年至 1942 年国民党利用帮会反共述略》，但上述文章的研究尚不深入。

[15] 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89 年第 2－4 期。

[16] 邱路：《也谈「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1990 年第 2 期。

[17] 如金再及：《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杨云若：《简析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与共产国际七大关系问题的争论》，《教学与研究》1986 年第 4 期；李良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问题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1986 年第 5 期；刘经宇：《论“抗日反蒋”与“逼蒋抗日”》，《党史通讯》1987 年第 7 期；荣维木、赵刚：《中共“逼蒋抗日”策略方针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李义彬：《关于“逼蒋抗日”方针形成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18] 中共中央统战部 1961 年成立西安事变领导小组，即开始事变史料的征集工作。文革中工作停顿，至 1979 年恢复。以后只在 1986 年出版过一部 7 万余字的《西安事变简史》（中

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几十年征集的大量史料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19] 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6，177－185 页。事实上，这种说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因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等，均持同样的说法。

[20]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杨奎松：《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究竟谁说服了谁？－关于 1936 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1 期；《有关西安事发生的几个问题》，《民国档案》1996 年第 4 期；《山城堡战斗的幕后及其影响》，《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4 期；《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6 期；《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6 期，等。

[21] 陈铁健：《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22] 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

[23] 值得提到的著作还有李义彬等：《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以及张培森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 年第 3 期)等文章。

[24] 马仲廉：《国共两党军队协同作战之典型一役－忻口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 1 期。

[25] 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策略的变动》，《抗日战争研究》1993 年第 3 期；李良志：《皖南事变前夕中央对委员长估计的失误》，《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6 期。

[26] 金冲及：《抗战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 1944 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增刊；杨奎松：《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同前引。

[27] 常家树：《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对比研究》，《社会科学辑刊》1995 年第 3 期；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

[28] 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战时国共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29] 陈铁健前引文。

[30] 毛磊、李明强：《一部展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两党谈判的力作－评「失去的机会」》，《抗日战争研究》1995 年第 2 期。

[31] 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毛磊、范小芳主编：《国共两党谈判通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田克勤：《国共关系论纲》，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王功安等主编：《国共两党关系概论》，武汉出版社 1996 年版；范小芳、毛磊主编：《国共谈判史纲》，武汉出版社 1986 年版。

[32] 该书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两党间一些交涉和斗争也归入中央级谈判，也显得极不和谐。毛磊等前引书，第一、二章。

[33] 比如该书对《失去的机会？》一书中漏写的皖南事变后两党交涉的内容就列了专门小节加以说明，并在秘密接触一节中汲收了潘合定文提供的新的资料。

[34] 马齐彬前引书，第 4－5 页。传统观点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战开始后占主流的仍旧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英美派集团。见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第 2 卷，第 23，40 页。

[35] 马齐彬前引书，第 366－375 页。

[36] 马齐彬前引书，第 60－661 页。

[37] 马齐彬前引书，第 487－488，542－543 页。

[38] 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 57 期，1938 年 11 月 6 日。

[39] 书中唯一注意引用的前人的研究成果，大概只有少量传记作品，如《周恩来传》、《叶剑英传》、《陈布雷传》、《龙云传》等。个别地方用到了大事记之类的书籍。

[40] 马齐彬前引书，第 497－500 页。

[41] 马齐彬前引书，第 698－706 页。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历史研究的进展，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长期隐秘于云雾之中的混沌史实得到厘清；有的是一向谬误的看法终获纠正；有的是在档案文献的发掘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还有的却可能只是一些新资料的发掘使人得出一些新看法，进而对传统观念形成了某种冲击，引发了一些思考或是争论。这些年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相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上述这几种不同的情况，甚至更多的可能还是档案文献的发掘和新观点的提出。不过，历史研究是以时间为对象和参照的一门学问，因此，上述任何一种进展对历史学工作者来说，都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即使只是发掘出了新资料，引发了一些新思考，也是有意义的。何况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是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至今，在长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早已自成体系，有着既定研究范式和独特话语系统的“中共党史”。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定，乃至执政党形象的现实要求，都对中共党史研

究的学术化提出了十分严苛的要求。但即便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还是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这一事实表明，任何一种新的史料发掘，或新的思考以及争论，最终还是会对中共党史的研究起到推动和影响的作用的。在这方面，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值得重视。

（一）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党史研究曾经一度成为显学，从者甚众。造成这一状况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当时条件下政治上“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所致。但是，这里面也还有着一般人很少注意，却相当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的作用，那就是前苏联此前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文献资料与回忆史料，它们为大批从事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教学工作，却几乎没有资格前往各地档案馆系统查阅相关档案资料的高校及党校普通教师，提供了一片多少可以施展一些拳脚的天地。在其他研究领域的门禁尚未打开的情况下，全国各地不少中共党史研究者挤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独木桥，实非偶然。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80 年代，大陆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有关的论文、译文和其他各类文章就有八九百种之多，各出版机构出版的论著、回忆录和档案资料集之类的专书也有七八十种之多。不过十年时间，在北京及各地召开的不同规模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亦超过十次以上。北京、四川、安徽、上海等地都出现了相应的研究团体，齐心协力翻译出版前苏联的各种文献资料和回忆录。尤其是当时的“现代史料编刊社”、“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等，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些涉及这一课题的最基本的研究史料，几乎都是在 80 年代中前期翻译出版的。像王明的《中共五十年》[1]、孙平的《延安日记》[2]、李德（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3]、张国焘：《我的回忆》[4]、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5]、王凡西：《双山回忆》[6]、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7]、诺思等编的《罗易在华使命》[8]、达林的《中国回忆录》[9]，以及共产国际历任来华代表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米夫等在中国的有关言论资料辑录、共产国际乃至前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10]，包括根据荷兰所保存的档案编译的《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11]等等，都为当时条件下外语程度欠佳，且难以接触到国外文献资料的众多研究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研究条件。

前苏联的这一类出版物，大都发表于中苏交恶的六七十年代，它们中的一些叙述或文献的使用，难免会受到当时条件下政治形势的左右，自然不能尽为我用。再加上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内对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也尚未开禁，研究者们讨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时每每容易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甚至“政治挂帅”，也在所难免。这些都使得当时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但应当看到的是，与中共党史其它面相的研究相比，来自前苏联的大量文献资料和回忆史料，到底还是给中国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深入探讨以接近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以及进行合理想象和推理的空间。证之九十年代前后公开的大批俄国档案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资料，我们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八十年代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的讨论，在涉及中共早期建党、共产国际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乃至大革命的指导作用、王明对中共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共产国际帮助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等问题上，均已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与进展。

在开始进入 90 年代之后，随着前苏联的迅速解体，俄国档案大量公开。除了部分中国学者

得以前往俄国相关档案馆查阅档案以外，俄国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帮助下开始系统整理和出版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献资料，对国内涉及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帮助极大。迄今为止，这一档案整理出版工作已基本上完成了 1919－1937 年的部分。其后涉及 1937－1943 年部分的工作虽因柏林自由大学退出，尚未最后确定整理出版方式，但估计不至就此停止。而且，由于俄国已经整理出版了涉及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方面的档案资料，以及共产国际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各种重要档案文献，保加利亚出版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工作日记[12]，美国出版了斯大林与莫洛托夫通信集[13]，美国与荷兰并分别收藏了全套的共产国际及其各个委员会历次会议记录和相关决议、报告、来往信件的缩微胶卷，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无疑也可以对上述未完成的资料集起到相当的弥补作用。

与 80 年代相比较而言，90 年代中国学者接触国外文献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条件已经得到相当大的改善。特别是随着一些年轻学者开始介入这一研究领域，他们的外语能力及其涉外活动能力，使他们大可不必像 80 年代众多研究者那样，坐等有关机构组织翻译人员把这些档案资料译成中文。他们不仅可以广泛地与海外学者进行专业交流，通过各种方式前往档案所在国去查阅相关档案，而且可以直接购买阅读已经发表或出版的海外的档案资料，甚或通过上网来寻找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最新公开的档案信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内编译工作从此可以被忽视。因为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者能够熟练掌握俄文的人极为有限，编译俄文档案文献的工作依旧十分必要。在向中国学者推介这一套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关系档案文献资料的问题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就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已经陆续组织人力，紧随俄德版本之后，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其 1919－1927 年部分，并且即将出版 1927－1931 年部分。[14]有关共产国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策策略文献，季米特洛夫日记等文献资料，目前也都在编译出版的过程之中。今明两年，有关俄国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相信会有一个更大的进展。不难了解，大量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或出版，将是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最为有利的基础。而这样一种基础，即能够利用海外公开的档案文献来弥补大陆相关档案开放不足的缺陷，恰恰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其他面相在一段时间之内所难以企及的。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性，最直观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为中共曾经长期从属于共产国际，是它的下级支部，要接受莫斯科的指导与帮助，不仅要在莫斯科指派的代表和机构的协助下进行工作，而且从干部培养到领导核心的确定、从思想灌输到政策策略的形成、从财政支持到军事作战的干预，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无不受到其监督与提携。不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就无法真正弄清中共二三十年代，甚至包括四十年代中前期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发生的原因及其来龙去脉。二是因为莫斯科对中共长期存在的监护关系，使中共中央在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不能不将自己的各种会议记录及其相关文件决议制成副本送交共产国际保存审查。由于中共长年处于地下或战争环境之中，不少档案材料损毁失落；一些地方组织，也包括个别时期的中央组织甚至只能直接受命于莫斯科或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方当年的来往文电也只有在莫斯科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因此，若不能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进而披露和发掘至今仍保存于莫斯科的各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档案文献，就难免会因为许多关键档案资料的缺失而无法对中共党史上的重大问题做出客观和准确的厘清。关于这种情况，只要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即可说明。

一个例子是涉及到中共早期建党的经过与内情的。在 20 年前的中共党史著作中，提到建党，基本上是一个三段式，即强调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因为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五四运动登上了历史舞台，俄国的十月革命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两相结合，中国就产生了共产党。在 80 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著作都不会提到共产国际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当 80 年代初向青教授有文章试图强调共产国际在中共建党过程中的作用时，还受到了部分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的尖锐批评。在此之后，虽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当年确实存在着俄国党和共产国际派人来华帮助建党的情况，多数中共党史著作对此也往往用一语带过，尽量不做具体的考察与说明。因为，在许多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看来，共产党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理论如此，实际生活中也不能两样。太过强调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作用，似乎就会给人留下一种外力“移植”的嫌疑。

其实，由于中共建党时期的历史文献大都未能保存下来，直至 90 年代中期为止，人们研究中共建党经过主要利用的资料多还是不十分可靠的回忆或口述史料。依据几十年后众说纷纭且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回忆史料来重现当年建党的历史，出现“以论带史”以及把历史简单化、概念化的研究结果实不可免。90 年代最后几年，随着俄国相关档案的公开和海外学者的进一步发掘，涉及中共建党时期的一批珍贵档案文献浮出水面，从而开始揭示中共建党的情况远比今天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要复杂得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而就已经比较清楚的情况来说，共产国际和俄国党当时的作用明显地要比我们过去所强调的那个自主“结合”的作用要大得多。因为，已知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及其随后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小组织，也不是中国最后一个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政治团体。我们虽然可以肯定，这个时候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中国已成一种必然，但当年在中国知识界当中出现过的若干“共产党”组织，若不能得到共产国际承认和资助的，最后都难逃解体消亡的命运。包括当年被共产国际选中的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不能不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来提供活动经费。[15]与此同时，正因为中共早期组织在维经斯基等俄国共产党人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相当欠缺。包括陈独秀等人在内，因为思想转变过快，多数成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了解都相当肤浅。这不仅影响中共早期各地组织的组成带有明显的统一战线性质，很快便迅速分化甚至分裂；影响到到中共一大所提出的纲领明显脱离中国实际；而且也影响到中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主要也是在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之后，依照苏俄代表所介绍的俄国革命经验，“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地逐渐模仿来的，缺少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这些情况充分证明，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之所以会全面依赖共产国际，而缺少独立性，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在原因。太过强调自主“结合”，讳言共产国际和俄国党的介入，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会造成对历史的误读，使人难以理解中共此后成长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而助长那种一切唯中共领袖陈独秀是问的“成王败寇”式的政治思维方式。

一个例子是涉及到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的。在传统的中共党史书上，对陈独秀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几乎从始至终都冠之以“右倾”二字。只不过时而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时而称之为“右倾投降主义”。之所以要冠之以“右倾”的名词，就是因为人们从来相信，陈独秀对国民党总是错误地采取妥协退让的作法。从 1923 年提出“二次革命”论，到 1927 年不接受共产国际关于马上武装工农的激进“五月指示”，处处都表现出软弱的态度。但是，随着俄国和中国档案资料的大量公开，人们日渐发现，陈独秀几

乎从共产国际提出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方案之初，就是这种合作方案的怀疑论者。1924 年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不久，陈独秀就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 5 月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加强阶级斗争观念的激进主张，进而推动了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斗争策略。当孙中山同意召开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弹劾共党案，苏联顾问鲍罗廷曲意迎合之际，又是陈独秀怒不可遏地予以拒绝，要求中共党员不得出席国民党中全会，并强烈反对鲍罗廷代表中共作出妥协。在鲍罗廷不顾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反对，提出由两党成员组成国际联络委员会解决两党争端的建议并获通过后，又是陈独秀公开表示抵制，一面强烈要求共产国际惩戒鲍罗廷，一面派员前往广东责令广东区委通过决议，要求鲍罗廷必须服从中共中央的一切决议。而在几乎整个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始终坚持批评国民党错误政策和方针的作法，虽屡遭国民党方面的警告和责难，他却几乎没有中止过这种批评。包括备受指责的所谓"二次革命"论，亦即对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陈独秀在事实上后来也经常表现出不同于其 1923 年言论的情况。比如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伊始，陈独秀就提出了"资产阶级不革命"的激进观点。当发现 1926 年"三·二 0"事件后，蒋介石从左倾转向右倾，主导通过了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之后，又是陈独秀提出了要准备从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夺回革命领导权的新方针。在 1927 年 3 月北伐军占领上海之后，注意到蒋介石磨刀霍霍，同样是陈独秀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才能服从革命的力量。即使抵抗失败，上海工人纠察队也不能听任国民党军队收缴自己的武装。

十分明显，新披露和公开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都说明，陈独秀并非如传统党史书所云，只是一味地对国民党妥协投降。恰恰相反，在许多情况下，陈独秀正是中共党内强硬派的代表，是抵制苏联顾问妥协退让的关键性人物。对于那些涉嫌妥协退让的事件，新披露和公开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它们多数情况其实都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指示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的劝告下实行的，未必应当由陈独秀个人和中共中央承担责任。其他个别的情况，如 1927 年拒绝执行"五月指示"的问题，在陈独秀则纯粹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的形势估计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谈不上思想路线上的妥协退让问题。实际上，陈独秀无时无刻不在积极谋求扭转局势，变被动为主动。比如他 6 月下旬与蔡和森贸然提出组织上海工人冲击租界，制造外交事端，转移视线以缓和武汉内部矛盾的建议，就是最极端的一个例子。而他 7 月上旬主持中央常委会议时支持蔡和森、毛泽东将武装的工农民众送入军队以保存力量，或干脆"上山"保留火种的作法，也是非常明显的例证。注意到这样一些新的档案文献和史料所展现出来的过去鲜为人知的新史实，继续简单地坚持把陈独秀说成是一贯"右倾"或妥协退让的总代表，坚持当年存在着一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不能不是一件值得争议的事情了。[16]

还可以提到的一个例子，是关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共产国际长期不信任毛、压制毛、打击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重新取得领导地位，恰恰得益于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还在 80 年代中期，就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7]因为人们只要愿意尊重事实，就不难从共产国际和前苏联的各种重要报刊当中，发现莫斯科并非长期不信任毛、压制毛和打击毛。恰恰相反，莫斯科的领导者们还在 1927 年就开始重视毛泽东在中共当中的作用。先是高度肯定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后是高度关心毛在井岗山如何落脚生根。随后，当事实显示了毛的红军和根据地确有生命力之后，莫斯科不仅给予毛的红军以高度的评价，而且要求仍旧执迷于城市中心主义的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的重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一直重视并肯定毛的作为，1931 年毛泽东才得以被指定为刚刚成立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1932 年毛泽东与多数中央领导人在军事战略上发生分歧，临时中央建议将毛送往苏联休养，又遭到了莫斯科的明确反对，并要求以留苏学生为首的临时中央必须与毛泽东搞好关系。1934 年在苏区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却进一步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还为宣传毛泽东印制了精美的著作单行本。1935 年，即当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有幸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几乎同时，莫斯科也公开发表长篇文章，高度颂扬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杰出领导人才。同年夏季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更获得了与国际共产主义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人同样的殊荣，其大幅画像被悬挂在会场上，受到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的热烈欢呼。

以往，由于人们相信共产国际长期不信任毛，因而往往把 1935 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一事，与 1937 年底王明等人被派回国看成是相互联系的一种逻辑关系。相信季米特洛夫等人这时因为不信任毛，因而特地派王明回来贯彻莫斯科的主张，甚至有夺毛泽东权的意图。结果，当人们发现共产国际在几个月后因为王明与毛泽东等人就领导核心等问题发生矛盾，转而明确表态支持以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袖，反而难以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来了。为了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一些中共党史工作者不惜曲解这时前往莫斯科汇报的任弼时的工作报告。声称任弼时如实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内部围绕国共合作方针所发生的争论，和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方针所取得的成绩，因而赢得了季米特洛夫的赞扬。然而，只要仔细读过任弼时的工作报告和补充报告，就可以知道报告丝毫没有批评和否定王明所带回的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恰恰相反，任弼时的报告正是建立在高度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基础上赢得了季米特洛夫的称赞的。毛泽东得到共产国际的推举，绝不是因为共产国际赞赏毛泽东敢于抵制莫斯科的指示，恰恰是季米特洛夫相信毛泽东及其中共中央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取得领袖资格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最突出的表态，就是利用自己做政治报告的机会，系统地提出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国共合作的各种新建议。说季米特洛夫因为误信任弼时的报告而推举毛泽东做领袖，至少是对历史不求甚解。[18]

（三）

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最大价值，严格说来还不在发掘出了怎样多的具体文献和对哪些具体史实作出了怎样不同于过去的解释。共产国际不过是莫斯科用来输出革命意识形态和维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渠道、一个工具而已。只要了解到这种情况，把莫斯科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种种教条、武断、生吞活剥，与后来苏联因教条僵化，不能与时俱进，在政治上日渐衰弱竟至一朝倾覆的历史，同中国因改革开放才避免了紧步苏联后尘的事实联系起来，就不难了解，尽管毛泽东 30 年代末已经取得领导地位，尽管共产国际 1943 年就已经解散，尽管中苏两党 60 年代以后更反目为仇，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就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从此一刀两断。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充满民族自豪感地谈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而中国革命在 1949 年的成功，也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并敢于标新立异。然而，仅仅注意到这一点，或者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主要看成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战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坚持独立自主和民族利益的一种经验总结，却是不够的。因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不仅可以看到中国革命成功背后莫斯科扶助和影响的重大作用，同样也可以看到中共历史上的种种问题以及后来的种种曲折背后，也都与俄国的党以及来自俄国的革命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说中国革命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斯科的帮助，只要举出一个最直观的事实就足够了。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共的存在与发展，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是得益于来自莫斯科的财政援助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目前已知的早年中共从莫斯科获得的党的活动经费为例，做一张简要的图表加以说明。[19]

年代	党费总数	党员总数	人均开支
1921.10-1922.6	0.66 万元	约 170 人	约 40 元
1923.1-8	1.5 万元	约 380 人	约 40 元
1924	3.5 万元	约 700 人	约 50 元
1925	约 4 万元	约 900 人	约 40 元
1926	12 万元	约 1 万人	约 12 元
1927.1-7	18 万元	5.8 万人	约 3 元
1928	66 万元	13 万人	约 5 元

注：上表数字只是概算，无法做到十分精确。主要原因为三，一是 1923 年以前的党费常与其他开支相混，难有准确的数字。二是有的年度特殊状况较多，这会影响到莫斯科临时追加党费或改变计算方法。三是中共党员人数有时也会有较大变动，如 1927 年中共五大时统计还在 5 万以上，国共关系破裂后迅即减少到 1 万余人，以后因转入农村，发动农民暴动与割

据，一年后即猛增到 13 万人。

以上所列只是党费一项，中共二大以后莫斯科即开始根据中共的发展及工作的需要，逐渐将党费与团费、工运费、农运费、兵运费、反帝费、济难费及特别费等区分开来，分别提供。仅以 1927 年为例，中共所得党费不过 30 万中国元左右，而这一年来自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农民国际、济难国际和联共（布）党等，用于帮助中共的各种经费，总数就有百万元之多。该年度中共自筹经费却只有 3000 元左右。1927 年莫斯科提供财政支持之多，主要是因为当年中共发展迅速，而突发事件又不断出现，因此急需应付。如这一年为上海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运动海军即提供了 3000 元;为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提供了 17000 元；为开办党校提供了开办费 49700 元；为马日事变后复兴湖南农运提供了将近 40000 元；为 10 月两湖地区秋收暴动提供了 10000 万元；为组织北方暴动提供了 3000 美元；为 11 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提供了 2000 元；为 12 月广州起义前前后后提供了 10 万元。[20]中国革命并非只要有了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精神就能成就一番事业，革命的每一步行动，包括办报、办学，甚至开会、出差，在在都要用钱。当陈独秀等人还做教授、编辑时，他们拿着每月一二百元的高薪，在过着较优裕生活的同时，还可以拿余下来的钱办个同仁刊物，发发议论。等到他们组织起共产党，按照俄国党的方式，基本上都成了职业革命家之后，他们连养家的钱都要从莫斯科提供的党费中来支付了。其革命的规模、深度乃至于革命的自主性，当然会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莫斯科的左右与束缚。

中共开始摆脱莫斯科巨大身影的笼罩，得益于其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全面失败。1927 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就已全面转入地下。处于城市地下工作状态的共产党人，受共产国际的束缚自然更甚。1928 年以后党用于应付临时事件的费用虽然逐渐减少，共产国际曾设想过削减中共党的费用，但事实上十分困难。直至 1931 年，中共中央从莫斯科那里仍旧必须要得到每月五六万元的经费才能维持党的正常活动。中共开始能够自筹相当部分活动经费，已经是 1932 年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因为中共从 1931 年以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逐渐将 60％以上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转入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当中，将工作重心做了较大的转移。随着 1933 年初中共中央全部迁入苏区，城市工作更是大大收缩，对莫斯科的经费要求自然也随之大大减少。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共从此就不再需要莫斯科的经费援助了。根据零星的档案文献资料，已知中共因南方根据地军事作战失利辗转长征至西北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莫斯科求援，莫斯科当即承诺为之提供上百万美元的经费援助，部分款项并已在 1936 年底和 1937 年初寄送到中国，并被转送给中共。[21]抗日战争开始后，莫斯科也曾数次提供经费援助，最多的一笔也是一次即达百万美元，其余各次多则几十万美元，少则几万美元。30 年代中期以后的这些援助虽然已远不如过去固定提供经费那样对中共的生存发展具有几乎是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但对缓解中共一时的严重困难仍有重要帮助则是肯定的。[22]

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显然对来自莫斯科的这种援助缺乏应有的了解与估计。不少研究者的文章和著作，只看到 30 年代后期毛泽东政治上崛起的过程，看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看不到或者说不了解毛泽东的崛起是有条件的。据此来总结历史经验，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根本上在于后来坚持了“独立自主”，无异于是对历史的生吞活剥。应该了解的是，对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来说，不管人们今天对当年的政策策略有着怎样的批评与争论，没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帮助，恐怕连那样一种局面也难以得到，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何况，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帮助还远不止是财政援助这一个方面。深入考察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全面对比当年中共领导人与莫斯科之间存在的众多分歧与争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总体而言，莫斯科在思想、政治、组织、军事、党务，财政，到干部培养、政策规定，乃

至各种技术手段的传授和秘密工作的训练等各个方面提供帮助的意义，要明显大于他们主观教条和瞎指挥所带来的危害的意义。中共的成熟与成长，包括最终走向独立自主，是其在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中，经验与理论知识不断丰富的客观结果。但是，这种成熟与成长不能不经历一个必要的过程。正如中共要想取得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必须首先在经济上创造出独立自主的条件一样，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只能是一种空谈和理想。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可以了解，只有当中共从城市转向农村，并且在农村中成功地创立了革命根据地，在经济上逐渐取得独立自主的条件之后，其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时代才会逐渐地到来。毛泽东没有崛起于 20 年代，而是崛起于中共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虽然一度还曾拿过国民政府的钱－的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是有重要的客观历史原因的。

既然中共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全面帮助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那么，我们同样也不应该回避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在中共的血管里流淌着的，多半是与联共（布）党一样的血液。毛泽东后来的“独立自主”，以及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不能改变双方之间曾经血脉相连的这种亲缘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并不因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的存废而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成功地实现了独立自主之后，中共所经历的种种成功与挫折，其实也仍旧与联共（布）党的思想、观念及其相关经验有着复杂与微妙的联系。

说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不因共产国际这一国际组织的存废而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这应当容易理解。因为，几乎每一个深入研究过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史的人都不难看出 1945 年抗战结束以后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不难看出双方在战后中国东北前途问题上有过紧密配合；不难了解到中共军事上刚刚开始走向胜利，毛泽东就急于前往苏联就教于斯大林的种种资料；不难了解到 1949 年大势底定，毛泽东马上宣布“一边倒”，新政府迅速与苏联结为互助同盟关系的种种事实；更不难注意到 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乃至越南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在前苏联在后，共同支持小党小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大胆宣战……。

说中共以后的成功与挫折，仍旧与联共（布）党的思想、观念及其相关经验有联系，应当也不难理解。中共能够在战后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举战胜国民党，建立新中国，除了自身的政策策略运用得当以外，美苏交恶，冷战发生，中共顺利取得东北根据地并得到苏联在军事、技术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援助，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在政治、经济政策及其行政机构设置等方面，一度全面借助于苏联模式，利用苏联经验，并且全面引进苏联的专家、顾问具体指导帮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在这里更应当提到的，还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共产国际时代就已经接受的关于革命和建设的一整套思想观念。它们显然对中共后来的历史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还在建国前夕，中共中央讨论并设想未来国家的革命与建设方案时，所依据的一个基本文献，就是共产国际时代俄国人在莫斯科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决议案。毛泽东明确讲：六大决议案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只是十条里当时没有提到没收官僚资本，没有提到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罢了。[23]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曾长期影响着中共的革命理念。这就是它所强调的中国革命的唯一前途，即“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的问题。毛泽东的

新民主主义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由这样一种政治理念派生出来的。因为，正是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一方面断定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只能是民主革命，同时又明确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争取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历史任务。而它对何以必须严守革命的阶段性原则，何以必须尽快转向“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原因解说，根本上竟只是在于阶级斗争和力量对比的转换。用六大决议案的说法：“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要到甚么时候完成，他将要怎样快的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24]

毛泽东他们严格地遵守着革命阶段性的原则，他们这时并不认为自己在力量对比上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优势。然而，即使在这时，他们相信必须遵守革命阶段性的理由，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是力量对比的问题了。军事革命的巨大优势，使他们并不特别担心中国经济上个体的和私人的资本主义数量还很大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这时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因素的优势力量了。他们谈到所以要继续保持新民主主义方向的原因更多的只是两点，一是在全国政权问题以及整顿经济的问题上，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经验，为此还需要下功夫抓住农民。二是俄国革命 12 年之后，即 1929 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到 1936 年才最终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中国比俄国还落后，理论上过渡的时间自应比苏联长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会明确表示同意刘少奇关于今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观点。很显然，毛泽东已经相信，建国后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将会很快地转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既然如此，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能是，随着政权稳固，经济恢复，国营和集体力量迅速发展，个体和私人资本的力量极大缩小，毛泽东马上就会重新记起六大决议案关于“只有阶级力量的对比能够决定”何时应当开始结束民主革命，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他之迅速放弃不资不社的新民主主义，转而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总方针，不可避免。

对于毛泽东过早放弃新民主主义和过于强调阶级关系以及力量对比的问题，自然不能仅仅从中共六大决议案的个别论断中去找原因。但今天的研究者理应看到，正如列宁当年批评共产国际染上了太多俄国色彩一样，所有曾经“孔步亦孔，孔趋亦趋”地向俄国取经，并靠“走俄国人的路”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人，都难免会习惯于按照俄国式共产主义的经验和观念来认识问题。虽然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总结会有不同和差异，虽然以往在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上，毛泽东曾经远比俄国人更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但有谁能够否认，当力量对比的问题不再能够威胁共产党人之后，毛泽东与那些部分地丢掉了革命热情的俄国人比，反而还多了一些教条和僵化呢？毛泽东建国后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包括在对革命和战争的问题的认识上，之所以会越来越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列宁主义或斯大林主义，而远离变动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难道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经验之使然吗？注意到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后放弃斯大林主义印记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注意到一些中共党史著作在谈论国内以及党内斗争问题上，至今仍或多或少地带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影响的痕迹，我们理应更容易感觉到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重要性。

----

[1] 王明：《中共五十年》，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

[2] 伏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3] 李德：《中国纪事》，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9 年版。

[4] 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5] 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

[6]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版。

[7]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8] 罗伯特·诺斯等编著、王淇等译：《罗易在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9]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10] 如《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米夫有关中国革命言论》，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卡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7），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三辑），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1986，1988 年版；《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苏联顾问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崔可夫著：《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贾比才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80 年代翻译出版的重要回忆录还有巴库林著、郑厚安等译：《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勃拉戈达托夫著：《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著：《中国大革命见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等。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

[12] ГЕОРГИ ДИМИТРОВДНЕВНИК,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издателство Св.“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 София, 1997.

[13] Stalin’s Letters to Molotov, edited by Lars T. Lih, Oleg V. Naumov, and Oleg V. Khlevniu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6，1998 年版。

[15] 根据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存下来的档案文献可知，中共一大之后的 1921 年 10 月至中共二大召开的 1922 年 6 月，中共中央支出经费 17655 元中，自筹经费仅为 1000 元。一年后中共三大召开时，党的经费更“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分别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 年 6 月 30 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7，168 页。

[16] 参见拙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2 期。

[17] 拙作：《三十年代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若干史实辨析》，《党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 年第 6 期。

[18] 参见拙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一章。

[19] 根据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Tony Saich, 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4 期，等。

[20]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й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Fond 514, Opis 1, Delo 820.

[21] 参见拙作：《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重要尝试》，《近代史研究》1995 年第 1 期；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季米特洛夫日记〉选介》，《二十一世纪》2001 年 8 月号；ECCI Secretariat to the CC CCP Secretariat, March 2, 1937,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vol.30, no.1, January-February 1997, p.67.

[22] 参见华谱前引文。

[2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 年 9 月），《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35－146 页。

[24]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共中央党校 1989 年版，第 301 页。

社会主义从改良到革命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以及中国革命的发生，得益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讲的正是这种情况。但是,“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人，包括中国当年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赞同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俄国社会革命的理论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过程,最初不能不受到中国社会复杂的经济发展条件和思想环境的制约。

俄国恍惚? 国人恍惚?

19l7 年 ll 月 7 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把全世界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彼得堡上空飞扬的红旗,使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政府感到心惊肉跳。这种惶恐的情绪迅速传遍了各国舆论界，也同样感染了自俄国二月革命以来一直忧心忡忡的中国人。

在此之前,经历了无数次浴血斗争才推翻了专制统治,却始终不能摆脱动乱、分裂和列强压迫的进步的中国人,从俄国一举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中领略了极大的喜悦。但这种喜悦没能持续多长时间。l9l7 年 4 月开始,各报就陆续对“俄国社会主义流辈”、“抱极端主义者”、“极左党”与临时政府相抵牾,且力主与德国停战议和的消息,表示严重关切。[2]有些甚至相信:“极端反对战争”之俄国社会党首领列宁回国,与德国当局的“唆使”有关。[3]进而,关于俄国“党派分歧,政令不一，职工与兵卒飞扬跋扈”；俄国前敌兵士醉心平等自由及社会党均产主义,多藐视命令及弃械潜归者；布尔什维克运动罢工,俄国内又大起风潮之类的报道频繁出现于各报。一些人甚至为此焦心如焚,扬言不能“隔岸观火,漠然无动于中”。 [4]

然而,俄国革命的进程毕竟不因中国各报力主“急缓二派之新者通力合作”,“不要过于激烈”,而有所改变。[5]由“激烈派”导演的新的“政变”,终于以急遽剧烈的方式突然发生了。面对近邻的俄国正在发生的一切,人们不能不感到愕然、“困惑”以至“恐惧”。改良主义者的报刊首先沉不住气了,称布尔什维克“得寸思尺,得尺思丈”,不惜重蹈“法兰西革命之覆辙”,演成此“杀人流血之惨剧”。[6]他们认为:“俄国过激主义的传染非常可怕”,非想法子“预防”不可。[7]即令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不能不公开对十月革命表示严重的忧虑,称二月革命“奋起为大破坏大建设大创造之事业”，吾人对此本“不胜其希望也”,殊不料十月革命竟“颠覆新政府”,“使全国重蹈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吾国民自辛亥以来经验之恐怖、悲哀、不安、愤激诸苦，俄国国民亦又经验之,乃较吾国为甚矣。”[8]一时间，人们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充满了失望的情绪。这就是革命的结果?!俄国“恍惚”，国人更不胜其“恍惚”!

“只要皮子永远不洗湿……”

列宁在谈论俄国旧知识分子对待革命的态度时,曾借用了一句德国谚语来形容他们一方面幻想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面又害怕革命暴力的心理，即“只要皮子永远洗不湿,他们愿意把皮子洗一洗”。[9]这种评论和比喻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这时各种希望变革的进步知识分子。事实上,他们并非对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无所知,在十月革命爆发前他们就已经意识到了。[10]因此,十月革命刚一爆发，许多报刊立即指出了它的“社会革命”的性质，认为“现下俄国内乱纯为阶级战争”，其发动者“以工场劳动者为基础,祖述加尔氏及马尔库斯氏之社会主义,务以激烈手段实行”。[11]也就是这个“激烈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华革命党人最初对十月革命“因不得不流血而告成”所抱的那种谨慎的赞赏；也使得向来对革命抱以反感的改良主义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十月革命的“极端”和“过激”表示不满。人们并非笼统地反对社会主义,“皮子”的确应该洗一洗，可是，怎么能把“皮子”洗湿了呢?

在中国,最早坦率地表示欢迎十月革命的,是一群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创办的杂志在十月革命后第五个月打破了几乎笼罩着国内舆论界的那种恍惚的情绪。而与此同时,俄国列宁政府日渐巩固,其社会革命的主张迅速在欧洲各国发生影响的事实，也渐渐开始为国内进步知识分子所了解。于是,国内进步报刊不能不先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俄国问题的

立场。5 月 27 日,《民国日报》公开开始改变对俄态度，6 月 17 日首次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12]7 月 6 日,改良派的《晨钟报》也被迫承认列宁政府施政方针“合乎民心”。[13]到 19l8 年夏季前后,人们终于开始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了。孙中山甚至致电列宁政府,对其社会革命的胜利表示祝贺。《民国日报》也连篇累犊地发表文章,预言社会革命思潮“复波及东亚中国”，“此社会革命之不可免,而亦不能免也”。并主张：“昔以民权为先驱，民生为后劲者，今当翻然一变”，“民生主义当拔帜以兴”。[14]就连崇尚英美政治的《太平洋》杂志的作者，也一改厌恶“极端社会主义者”之口吻，称俄国革命“影响世界思潮增进人类福利者，则极无涯量”。宣称社会主义“方今如火如荼，有一日千里之势，欲摧天而遏折之，势固有所不能”，非细心研究不可。[15]

l9l8 年底,社会革命果然如人们所预感的一样,开始在欧洲大陆震荡起来。一时间,欧洲各国赤潮汹涌,红旗翻卷。人们敏感地意识到:“现在有一股浩浩荡荡的世界新潮起于东欧”,“俄国式的革命一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自十月革命后始终借助于日本报刊悉心观察和研究欧俄社会革命形势的李大钊,这时公开认为:“自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1shevism 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因此,他明确主张:“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16]

“世界已根本改造”,中国“若不根本改革,焉能生存于未来之新时代?”改良派的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喊。但是,这“根本改革”,或“根本改造”，是不是一定要象俄国那样,做那种均贫富的勾当,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把国家弄到“四分五裂”、“天翻地覆”的地步呢?[17]深为中国前途忧虑的人们,对滚滚而来的社会主义潮流逐渐开始投以热切的目光,他们中多数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走去。

“浑朴的趋向”？ 混沌的趋向?

1919 年,欧洲汹涌的赤潮正滚滚而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大声欢呼这汹涌的赤潮,告诫国人：“只能迎,不可拒”,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那些担心中国今天“知识程度”、“经济程度”极幼稚的,也不能不于五里雾中口口声声地说什么“所谓社会政策社会主义者,实夙为吾国之所唱导”。甚至就连安福系头子也吵吵嚷嚷地要发起什么“社会主义研究会”。[18]

冯自由对当时的这种状况有过一种描述。他说:“这回欧洲大战后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潮流,真有万马奔腾之势,睡在鼓里的中国人便也忽然醒觉，睡眼惺忪的不能不跟着一路走。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睡眼惺忪”几个字,未必恰当。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确如瞿秋白所说，是“隔着纱窗看晓雾”,“不十分清晰”。社会思想“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19]可是，在社会主义的喧嚷中，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这社会主义不应该是“激烈”、“流血”的和“破坏”的。也就是说，这社会主义不应该是革命的。因此,在 19l9 年开始的那些日子里,包括最早欢呼十月革命的李大钊等人在内,许多人多半都注意到了“民主”、“平和”、“未雨绸缪”的英国,热切主张中国人应该学习“英国的进化”,“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20]一句话,主张改良的革命。

改良和革命,在今天无疑是两个严格区别的概念。但当时它们及其相关概念的涵义却要复杂得多。既要“革命”,又要改良,这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一个极微妙而又极特别的历史现象。这种情况在孙中山等人以往的言论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他们担心“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另一方面,他们承认欧美社会弊病严重,想出“定地价的法”以为“社会革命”的捷径,冀图于“政治革命”的同时完成“社会革命”,一劳永逸地求得中国的社会问题“根本和平之解决”。[21]这种观念正是“改良的革命”的观念。因为所求在于“根本”,不是“皮相”、“枝节”,不是简单的政府更替,因此未尝不算“革命”；因为“解决”立足于“平和”、“互助”、“调和”、“渐进”和“忍耐”，因而又实实在在只是改良。这不是很矛盾吗?是的。形势是革命的,环境是革命的，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热潮本身就是这种革命形势和革命环境直接影响的结果,但人们最初却主观地力图防止其革命性,寄希望于“根本和平之解决”。甚至不少人公开宣称：“我们国家的建设,社会的组织,在目前这个时代”,“是绝不能够照那阶级压迫的主义去实行的”。[22]

无须说,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可能离开自身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在这种社会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世界观来考虑问题。传统思想的影响和阶级分化远不如欧美严重的社会现实状况，使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看不到进行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但这只是促使多数人像过去同盟会的人那样,把这种差距看成是容易实行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激烈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据。像以往孙中山把“定地价的法”,当成社会革命的方法,把国营铁路当成跨进社会主义的台阶一样,许多人这时提出的种种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一般地也很少真正带有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这种革命社会主义的色彩。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妄想用和平妥协的办法,不得罪任何人”,“不经过激烈的彻底的阶级斗争”,“就能够在政治方面,在劳动民众的地位方面,得到某些重大的改善”,甚或“消除资本的权力和统治,消除雇佣奴隶制”。[23]然而,人们这时毕竟是在那里认真地幻想着,无论是“教育平等”、“普遍选举权”和“地方自治”；无论是发展实业,“实现国民自治”,改正关税,废除厘金,实行累进地价税和所得税法；无论是实行慈善制度,规定工钱的最低限额,“推翻遗产制”或实现经济的民治主义,人们都在各自的角度把它们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或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他们这时还特别注意用“精神改造”、“文化运动”来根本解决社会问题,主张改造社会先从改造个人做起,甚至开始“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以图联合成大社会,实行道德新生活。“恍惚大家的意思,都以为这个社会主义,不久一定要实行的”。[24]

恽代英对“这个社会主义”曾经做过说明,很符合人们这时的认识。他说：过去一提到社会主义，便想到“暗杀革命”,“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甚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25]这也就难怪人们要把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愿望，而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以及某些社会政策之类的东西,也都当成社会主义的措施来认识和鼓吹了。张东荪说得干脆：社会主义,就是一种“浑朴的趋向”。[26]

好一个“浑补的趋向”！实在地说,这时大多数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一个混沌的趋向吗!

“无产阶级万岁！”

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彻底成熟了的不是无产阶级解放问题,而是政治自由问题,也就是（就其实质来说）充分的资产阶级自由问题。”因此,决定了这个时候的中国多数进步知识分子一时还难于真正了解和把握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概念。即使是大多数激进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真诚地把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看成是真正的救国之道。19l9 年到 1920 年间,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脑髓中泛滥起来的互助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学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和种种互助团体、“新村”等,不就是这种“精神”,或者说这种乌托邦真诚性的写照吗?历史只能提出它本身所能提出的问题。

空想的、或者说小资产阶级改良的社会主义思潮,固然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实践上是难以通行的,但在当时,它们却起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作用。因为，十分明显，在它里面有着列宁所说的那些“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27]这种“批判成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几乎随处可见。有人已经公开发出“扑灭资本主义”、“推翻吃人的资本家”，“打破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的呼喊。有人明确认为：“尊重大资本家、大地主之个人自由,不啻宣布社会上大多数人民之死刑”。连从来没有使自己的主张超出过资产阶级范畴的张东荪等,也口口声声声讨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社会主义。[28]按照列宁主义的理解，这种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家阶级的批判及其普遍的憎恶情绪,在工人阶级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过程中，不能不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农民、兵士的革命,而俄国和中国一样都是“农业国”,这促使许多人一开始就认真对待劳动问题和劳动运动。尽管当中国最早的以《劳动》命名的月刊编者申明劳动者当“联群自救”，实行“社会主义”时；当《东方杂志》的记者鼓吹泛劳动主义,主张“今日下层苦力之民”“减少其劳动时间”,“读书报,听讲演,讨论政治,探索真理”时；当蔡元培、李大钊欢呼“劳工胜利”,鼓吹“劳工神圣”，呼吁人们“快去作工”，声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时,人们甚至还搞不清马克思主义中那个“无产阶级”概念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但十月革命毕竟从一开始就迫使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去重视劳动人民，而在五四运动和日益激荡的世界工人运动风潮的刺激下,他们毕竟也迅速地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念同劳动问题、劳动运动联系起来了，并且日渐深入地认识到,所谓社会问题,核心其实就是劳动问题。因此,劳动运动的状况,必然地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状况。尽管当时主张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自不同阶级和阶层，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把社会主义同劳动运动联系起来,积极鼓吹劳动运动,宣传劳动光荣、劳工神圣,客观上对于广大激进知识分子和激进的青年学生了解刚刚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的中国工农群众的力量，促使他们中一部分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都有重要的启蒙作用。

迄此,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物，大量被资本家、官僚、军阀掠夺了去,造成贫富不均,这是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最大弊端。其根本原因,“只有‘私有财产私人企业’八个字”。俄、奥、匈、德各国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彻底改革这贫富不平均的革命”,“这种风潮不久一定也要飞奔过来的”。[29]一些人断言：中国今天固然“产业极不发达”,但中国并不需要资本主义,“由世界的趋势看来，我们劳动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非占得中心的地位”,“非求真真的社会主义不可”,“非打破这资本和劳动两重阶级重新建设新的社会不可”,否则中国的问题“是绝对没有法子去解决的”。[30]于是,人们主张立即组织工会,举办工人教育,由“我们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大大的团结起来,提携着大多数的无识无产的体力劳动者,组织一个东方无产阶级的大联合”,“和资本家争斗”。一些人甚至大声喊出了“无产阶级万岁”这种带有激烈气味的口号。尽管这个口号当时实质上并不是革

命的,人们多半也还是抱着那种混沌的社会主义观,但不可否认,许多人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革命的时代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把自己改造社会的愿塑同即将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的力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社会主义概念的分裂,那种混沌不清的社会主义再也难像五色旗那样在中国进步舆论界的上空飘扬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

远远的鼓声动了。1920 年元旦,颇负盛名的《星期评论》“新年词”写道:“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随着这“新潮”的冲击，社会主义联合战线不可避免地开始分裂了。

在 19l9 年初,社会上许多人对俄国革命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因为俄国是‘布尔塞维克’主义产出的地方,恐怕这种主义宣播出来扰乱世界”。[31]但这种情况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多数进步知识分子渐渐“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而渐趋惊奇的疑信态度”了，各种谣言渐渐的鲜有人信了,甚至连“恐怖政治”的骂名,也随着“废止死刑的布告”“渐渐消灭”,粮食缺乏的惨状,也由大丰收“救济”了。过去相信俄国“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的人,现在反倒觉得这种消息“真是奇怪极了”。到了 1920 年,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俄国革命的看法已大为改观,许多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可行的了。因此,当俄国政府 1919 年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之后,国内进步舆论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大声宣布:“俄国布尔塞维克的主张,已经得到世界人类一部分的同情,不是军阀政府等威权可以抵抗了”。他们疾呼：与俄国人民携手并进“通力合作”，共同铲除压迫社会的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32]

对俄国革命认识的改变,进一步促进了激进知识分子改良观念本身的变化。他们曾经对泛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工读主义等渐进的、改良的社会观,抱以极大的热忱。然而，所有这些主义几乎都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碰得鼻青脸肿。这对于一心致力于“组织理想的小社会”,企图最终取代旧组织旧制度的有些人来说，打击是极其惨重的,教训也是宝贵的。不少人由此懂得了:“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一些激进青年“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因此“破坏是不可少的”。[33]

对各种改良的社会观发生疑问,迫使人们进一步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共产党宣言》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也陆续开始被译成中文。许多人头脑的社会主义开始由改良走问革命。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代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迅速生长起来。

必须指出,这时促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批产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人们探索社会主义前途的革命的理论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实际满足。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迈进的时侯,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派维经斯基等人先后来华，送来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维经斯基于 1920 年 4 月来华后,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了多次座谈,使他们了解到了完全不同于他们过去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使他们中一些人从俄国的生动事例和俄国人所带来的理论材料中,看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实际变革运动结合起来的巨大作用,从而沟通了中国激进知识

分子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在思想上的联系。这一历史条件的变化，无疑促进了相当一批激进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维经斯基来华前不久，还在主张“大家狠狠心肠拿出一部分剩的价值(他们说是什么红利)来，办几个贫儿公育院”,以此等改良的办法救济贫困、发展生产的陈独秀,迅速接受了俄国的社会革命理论,对列宁的国家学说和革命学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并很快就开始“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34]

同年 8 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不久,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以及日本等地,也先后产生了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织。这对于后来的中国，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当然，更多的人还在徊徘,而不少人则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往前跑。这些人知道一点一滴的改良不会产生他们希望的结果,因而他们期望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甚至也想革命！然而他们毕竟还是有些摸不着底。社会革命的“鼓声”越近、越急，他们就越是容易摇摆。不过，到底还是有不少人开始和改良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镖了。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1920 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织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有系统的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积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组织青年到俄国去学习。他们还按照俄国的方法,深入劳苦工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启发工人觉悟,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35]这一切使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梁启超沉不住气了。他斥责道：中国哪来的“新式企业组织”,既无“新式企业组织”,何来“劳动阶级”?中国之劳苦者连谋生就业都不得，何以为劳动运动?既无劳动运动，又何以为社会主义!?就连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也看出中国发生“劳农革命”的危险来了。他告诫中国人：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36]

罗素先生轻而易举地说出了一些人长时间来冥思苦想，犹豫不决,且难以启齿的“心里话”。那些曾经一度向社会主义寻求出路,参加过宣传和主张社会主义的行列,在热热闹闹地叫唤了一阵改良的社会主义之后,终于发觉中国还远没有达到照社会主义样式实行的条件，由此以往,势必造成俄国式的前途，甚至搞成“伪劳农革命”。[37]于是,他们的态度日益右转了。不久前还参加过同维经斯基座谈的张东荪到“内地”转了一圈以后,“忽然”发现自己过去“及早提倡”社会主义的主张不过是“空谈”罢了。他这时急忙借用别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故“中国即有社会改造,亦当在五十年以后”。一直宣称中国决不应当经过资本主义的彭一湖,也发现“从前以为后进国总占便宜”,社会主义容易实行的想法“错误”了，明白了“社会的进步是走的,不是跳的这个道理”,确信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他们开始为中国的资本家鸣不平：“彼辈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在太忍。”中国前途之“不堪问”,在于外国资本主义压迫中国实业的发展,社会主义者们何不去“联络各国社会党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呢?[38]

这些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时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们与那些试图把自己同工农劳动群众联系起来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不同的了,与大批还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在

思想观点上也有重要不同了。他们注意到中国经济上的极端落后，确信中国绝不能越过资本主义，而一步迈向社会主义。他们怀着极度疑惧的心情来看待日渐活跃和组织起来的城市工人及其它的下层劳动群众,相信其中相当部分“无产业”、“无知识”的下层群众甚至可能是社会的一个溃疡,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结果难免会造成“均贫富”的“伪劳农革命”。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展开了。如果说过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曾经一再出现调和以至混合的情况的话,那么，这一次的讨论则是一次彻底的分裂了。在同样主张变革，同样渴望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进步知识分子阶层的两端,在政治立场上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势力。在一个对新思潮趋之若鹜，相当多数知识分子急切地盼望着一步摘掉中国老大贫弱帽子的时代，大概很少有人会愿意中国继续跟着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向前走。几乎同样落后的俄国的榜样作用，激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想象力。因此，改良派的发难在社会舆论上一开始就不能不处于劣势。张东荪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发表,立刻就遭到众多报刊的同声谴责。张东荪等人尽管很快打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号,却再也无法掩饰其主张保护中国资本主义的意图。面对这种情况，那些开始热衷于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能不明白宣布:“我们老实不承认这些人是我们底朋友”,革命与改良决不能调和。[39]

对于这个时候刚刚转向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选择俄国式的社会主义这种暴力革命的方式，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同毛泽东一样，许多人过去想避开政治,单纯从经济上、教育上、思想文化上着手来改造社会,但实践的结果终于明白:“设若不把现存的政治势力打倒,把政权夺到无产阶级底手上来,以排除各方面改造的障碍,绝对达不到改造的目的”。[40]《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41]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人们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思想转变的程度和趋向。而实践，自己的和俄国的实践则给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一个强烈的印象,促成了他们世界观的转变,也把大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推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一边来,推到同情俄国革命的一边来了。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2]事实正是如此,1921 年 7 月,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社会革命在中国开始步入了它的实践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用十月革命的方式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了。与此同时，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因此在中国大地上渐渐成了气候。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Ⅰ卷，第 9 页。

[2] 参见《晨钟报》1917 年 4 月 4 日;《民国日报》19l7 年 4 月 14 日等。

[3] 《民国日报》19l7 年 5 月 12 日等。

[4] 同上注，1917 年 5 月 6 日，5 月 19 日，6 月 29 日，9 月 14 日。

[5] 周春岳：《调和之革命》,《太平洋》第 1 卷,第 4 号,19l7 年 6 月 15 日；记者：《廿世纪世界之大变化》,《太平洋》第 1 卷,第 3 号,1917 年 5 月 15 日。

[6] 沧海：《革命后之俄罗斯政变》,《太平洋》第 1 卷，第 8 号,1917 年 11 月 15 日。

[7] 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 年 I 月 29 日。

[8] 孙洪伊：《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社论),《民国日报》l9l8 年 1 月 1 日。

[9] 《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376 页。

[10] 参见庶熙：《革命与生计问题》,《晨钟报》1917 年 3 月 30 日；沧海：《俄德社会党之和平运动与德政府之狡谋》,《太平洋》第 1 卷,第 4 号,1918 年 1 月 l5 日,及《晨钟报》l9l7 年 4 月 13 日，《民国日报》1917 年 4 月 14 日，9 月 18 日，等。

[11] 见《民国日报》1917 年 12 月 13 日；《顺天日报》l918 年 l 月 20 日。

[12] 《民国日报》1918 年 5 月 27 日，6 月 17 日。

[13] 见《晨钟报》1918 年 7 月 6 日。

[14] 《孙中山全集》第 4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53 页；华林：《革命之趋势》,《民国日报》l918 年 7 月 27 日；楚伧：《三大主义之途中》(社论),同前,1918 年 6 月 30 日。

[15] 皓白：《波斯之新局面》,《太平洋》第 l 卷,第 10 号，19l8 年 7 月 15 日；彭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趋势》，同前。

[16] 罗家伦：《今日世界新潮》,《新潮》第 1 卷,第 l 期,l9l9 年 l 月 l 日；孟真：《社会革命一-俄国式的革命》,《新潮》第 1 卷，第 1 期；李大钊：《Bolshevim 的胜利》,《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1918 年 11 月 15 日.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 3 册,l918 年 7 月 1 日。

[17] 见《国民公报》1918 年 1J 问 22 日.

(30)知非：《劳兵会真可怕》,《国民公报》,1918 年 11 月 19 日；《国外大事述评：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每周评论》第 4 号，l9l9 年 1 月 l2 日；并见《每周评论》第 3 号，l9l9 年 l 月 l5 日。

[18] 见《李大钊选集》，第 110，l17 页；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l9l9 年 7 月 14 日；参见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 3 号，19l9 年 6 月 22

日,蔼人:《社会改革与劳工报酬》,《南洋》第 4 期,19l9 年 8 月 l5 日;伧父:《对于未来世界之准备如何》,《东方杂志》第 l5 卷,第 10 期。

[19] 冯自由:《社会主义与中国》1920 年;《翟秋白文集》第 l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3-25 页。

[20] 参见季陶:《社会民主化的英国政治》,《星期评论》第 4 期,19l9 年 6 月 29 日;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三),《晨报》l9l9 年 2 月 9 日;《国外大事述论.英国的劳工大会》,《每周评论》l919 年 3 月 l6 日,等。

[2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 l 卷,第 326一329 页。

[22] 参见《梁乔山答知非、若愚两君书》,《晨报》1919 年 6 月 23 日;季陶:《工人教育问题》,《星期评论》第 3 号;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同前,第 2 号,l9l9 卒 6 月 l5 日,等。

[23] 见《列宁全集》第 l8 卷,第 349 页。

[24] 参见若愚:《劳动者的权力》,《晨报》l9l9 年 5 日 2 日;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每周评论》第 20 号,19l9 年 5 月 4 日;陈独秀,《实行民冶的基础》,《新青年》第 7 卷,第 l 号,1919 年 12 月 l 日;本社同人:《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东荪:《过激主义之预防策》,《国民公报》1919 年 l 月 29 日;丁业新:《推翻遗产制》,《南开思潮》第 5 期,l920 年 2 月 8 日;《李大钊选集》,第 238 页;沈仲九:《我的人生观》,《星期评论》第 2l 号,l9l9 年 l0 月 26 日;张东荪:《社会主义与中国》,《时事新报》l919 年 1l 月 6 日;刘秉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可以实行?》,《新群》创刊号,l919 年 ll 月。

[25] 恽代英:《社会主义论》,《少年中国》第 2 卷,第 2 号,1920 年 8 月。

[26] 见《李达文集》第 4 一 5 页。《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新民学会通信集》;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 29 号,1919 年 7 月 6 日;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 l 卷,第 1 号,1919 年Ⅰ2 月。

[27] 见《列宁全集》第 17 卷,第 35 页。

[28] 一湖:《中国的经济社会还应该经过资本主义时代吗》,《晨报》19l9 年 l2 月 l 日;玄庐:《吃人的资本家》,《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 年 5 月 1l 日;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同前,第 46 号,l920 年 4 月 18 日;刘秉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可以实行?》;东荪:《社会主义与中国》,《时事新报》19l9 年 ll 月 6 日;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 l 卷,第 l 号,l919 年 9 月 l 日;东荪:《我们为甚么要讲社会主义?》,同前,第 l 卷,第 7 号,Ⅰ9l9 年Ⅰ2 月 1 日。

[29] 一湖:《二十世纪之大问题》,《晨报》l9l9 年 5 月 l 日。

[30] 参见季陶：《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旨趣》,《星期评论》第，l920 年 2 月 29 日,徐苏中：《劳动会议与特殊国》,《星期评论》(新年号)，1920 年 l 月 3 日；去吾：《社会主义与劳动问题之关系》,《南洋》第 2 号,19l9 年 7 月 22 日；季陶：《关于劳动问题的杂感》、仲九：《香港机器工会的同盟罢工》,《星期评论》(劳动纪念)，1920 年 5 日 l 日；玄庐.《工人应有的觉悟》,《星期评论》第 46 号,1920 年 4 月 l8 日。

[31] 慰慈：《俄国的新宪法》,《每周评论》第 28 号,1919 年 6 月 29 日。

[32] 慰慈,《俄国的新宪法》,《每周许论》第 28 号,1919 年 6 月 29 日.

(6l)仲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星期评论》第 42 号,l920 年 3M 日。

(62)参见《浙江学生联合会答俄国劳农政府书》,《钱江评论》第 9 期,1920 年 5 月 2 日；渊泉：《我国确立对俄方针之必要》,《晨报》l920 年 3 月 26 日；《答俄国劳农政府的通告》,《时报》1920 年 5 月 2 日；季陶：《俄国劳农政府通告的真意义》,《星期评论》第 45 号,1920 年 4 月 ll 日;仲九.《学生运动的过去与将朱》,《星期评论》第 46 号,1920 年 4 月 l8 日；《李大钊选集》第 238 页;毛泽东.《学生的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 l 卷,第 2 号，l9l9 年 12 月 l 日；仲九：《我的人生观》,《星期评论》第 2l 号,l9l9 年 10 月 26 日。

[33] 参见季陶：《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星期评论》第 42 号,1920 年 3 月 2l 日；周炳林：《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国民》第 2 卷,第 2 号,l920 年 6 月。

[34] 参见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新青年》第 7 卷,第 4 号,l920 年 3 月 l 日；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 7 卷,第 5 号，l920 年 4 月 l 日；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l 号,l920 年 9 月 1 日。

[35] 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 2 号,l920 年 l0 月 10 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 6 册,1920 年 9 月 19 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 16 册，1920 年 11 月 28 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 1 卷第 4 号,l92l 年。

[36] 见杨端六：《与罗素的谈话》,《新青年》第 8 卷,第 4 号,l920 年 12 月 l 日；《罗素讲演录》,《世风》创刊号,l921 年。

[37] 见《新青年》第 6 卷，第 4 号；《改造》第 3 卷，第 6 号，1921 年 1 月 15 日。

[38] 东荪：《答张君劢书》（续），《时事新报》1920 年 7 月 14 日；彭一湖：《我对于张东荪和陈独秀两先生所争论的意见》,《改造》第 3 卷,第 6 号,l92l 年 1 月 15 日；东荪：《答高践四书》,《新青年》第 8 卷,第 4 号,1920 年 l2 月 l 日。

[39] 施存统：《读新凯先生〈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新青年》第 9 卷，第 6 号，l922 年 7 月 l 日。

[40] 《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新民学会通信集》第 3 册；无懈：《夺取

政权》，《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41] 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C.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 5 号,1921 年 6 月 7 日。

[42] 见《毛泽东选集》第 1408－1409 页。

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及其策略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的这段话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靠谁革命？革谁的命？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看起来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对于某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共产党人比较容易确定它们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但是，对于另外一些社会阶级或社会政治势力，这样做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一极大地影响着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社会政治势力，由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人们的认识及其策略不能不经历了一个极其曲折的变化过程。

敌乎？友乎？

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来说，资产阶级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共产党自宣告成立之日起，它就开宗明义地宣布：共产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2]　第二，人们这时对于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明显地还抱以某种怀疑的态度。一方面强调自身的使命是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另一方面怀疑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这是否有点自相矛盾呢？其实，它们之间并无矛盾。问题仅仅在于，早期共产党人这时对于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还不十分清晰。

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界已经开始普遍使用“阶级”的概念分析和说明社会经济上乃至政治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区别了。这种情况导致一部分激进的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迅速开始模仿共产主义的理论，把世界上的人根据劳动与不劳动、无产业与有产业、被压迫与压迫等等标准，截然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阶级。于是，即有所谓“劳动阶级”、“无产阶级”、“平民阶级”、“第四阶级”、“被压迫阶级”与“资本阶级”、“有产阶级”、“中产阶级”、“第三阶级”、“财产工商阶级”、“绅缙阶级”、以及“征服阶级”、“压迫阶级”等对立的阶级概念。尽管，人们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无论“劳动阶级”也好，“资本阶级”也好，都应当是资本发达即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而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极端落后，但是，人们显然相信，这样一种阶级的对立，在中国也同样存在。因为，“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

人”。[3]

相信世界上实际上只有两个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即“资本家的国家”和“劳动者的国家”，这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最初受到来自俄国的阶级斗争理论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基本看法。[4]这种看法使他们开始时很容易只从劳动与不劳动、有产与无产，以及被压迫与压迫这些表面现象上来理解阶级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简单地把除了苏俄以外的国家统统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和苏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接触，渐渐改变了人们把中国的社会阶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混为一谈的情况，但这些来自苏俄的共产党人多半同样相信：“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这导致新成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组织一开始就认定：“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5]因此，尽管人们根据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的现实，开始怀疑中国是否存在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但是他们仍旧相信自己的任务是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开战。所不同的是，他们注意到，“中国的资本阶级，是国际的。资本家差不多都是欧洲人美洲人日本人”，只有最少数的中国资本家在内。[6]

自信立于向全世界资本家统治挑战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地位，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自然不会把“本国的几个可怜的资本家”与外国资本家区别对待。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前山的老虎要吃人，后山的老虎也要吃人”，何况“中国已经兴起了的几个资本家，和将兴起的资本阶级，不过为五大强国资本阶级的附属罢了”。他们直接或间接的都“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因此“是扶不起的懒狗，教训不好的坏小子”，“决不配行使中产阶级的德莫克拉西政治”。有谁想“只〖指〗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世纪也没有希望”。[7]

但是，作为一个清楚地了解中国现状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怎样看待中国的资本家，他们事实上都很少可能把后者看成是中国当时的首要敌人。他们或者断言“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8]，或者直截了当地告诉国人：你们的重要仇人，第一是官僚，第二是军阀，第三才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只是“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来“作恶”，而实际上“中国社会的资本已集中在最少数的武人官僚手里”了。[9]甚至，到了１９２１年，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一些中共代表已经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军阀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因此，共产党“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包括联合“那个将要夺取政权的阶级”，因为“代替当前统治者的那个统治阶级或许不会象封建老爷那样进行压迫”，这样，共产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自由，“以集中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最终推倒新的统治阶级。[10]尽管中共“一大”的纲领并没有接受这些代表的意见[11]，但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在本质上恰恰符合列宁这时就落后国家革命所提出的策略思想。

在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议代表就列宁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有关的决议和补充决议。这些决议的中心思想就是相信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运动还仅仅处于萌芽状态，在这些国家里目前还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多半会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性。[12]随着１９２２年１月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开始具体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决议，中共中央也很快改变前此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陈独秀首先肯定了援助国内“别的阶级”进行反封建革命，以取得劳动阶级政治自由的重要意义，并承认中

国必须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13]

１９２２年７月的中共"二大"显然是中共正式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并具有革命作用的开端。"二大"的宣言公开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他们的"初步积累阶段"，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重要的发展。它甚至"已能结合全国的力量，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而国民党此前所组织的广东政府，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开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运动"。[14]然而，中共这时对资产阶级力量的估计无疑还有某些保留。尽管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已经在担心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有可能试图支配或反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因此明白告诫中共必须独立进行组织中国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共产主义工作[15]，但中共却断言"此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无产阶级同一幼稚"，以至相信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16]因此，它虽然提出了"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和与民主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的方针，却或多或少的把中国这时唯一强大的"民主派"国民党仅仅看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甚或"不是代表那一阶级的政党"。因而，它的实际计划只是：首先使工人和贫农"环绕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然后"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即"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17]

能够说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或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吗？很显然，共产国际最初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分歧的。就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和召开之际，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之一维经斯基至少已两度在莫斯科公开发表文章认定：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反映着"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日益明显地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18]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这时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却告诉共产国际：不应把国民党看成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在一份报告中说，国民党只是由四种人组成，即起主导作用甚至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广东省和华侨中的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的工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士兵，以及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马林保证说，国民党领导人从未表达过这部分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作为国民党实际政治纲领的所谓三民主义，实际更是"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因此，他明确建议还只有几十个人的"前景暗淡"的中共小组织加入到国民党中去进行宣传工作。[19]考虑到共产国际"二大"有关决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的不允许将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派以及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20]的要求，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显然比把它视为资产阶级政党更有实际意义。于是，共产国际很快肯定了马林的说法，并据此发出指示，断定"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并要求中共加入其中进行工作。当然，它没有忘记提醒中共注意：国民党"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因此中共必须准备应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子间的日益明显的分裂"。[21]这表明，它多半相信，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决不会象马林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

确定国民党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党，自然便利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实现与"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22]的合作，但这并不等于共产党人由此可以排除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的必要。当中共代表在１９２２年１１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四大"上突出强调自己加入国民党只是争取群众，以及把"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结合起来"的"一种手段"时，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表示异议。他们明确主张中共必须"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采取明智的态度"。[23]这种情况很快导致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中国的

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绝资产阶级之左倾的观念”，并“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但问题是，当作为“民主派”的国民党失去了具体的阶级性质之后，究竟如何看待和联合“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革命力量”呢？共产党人因此不能不直接向“中国资本家和商人”们发出呼吁了，要求他们也“一律聚集于国民革命党旗帜之下”，并以国民党为自己的“政治领袖”。[24]很明显，他们只能把国民党当作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了。于是，共产党人开始得出结论，即“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何谓“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资产阶级将以国民党为统帅，而工农阶级将以共产党为领袖，国民党通过自身的组织而与受到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阶级进行“联合”。[25]

亦友亦敌？

要在理论上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因而具有某种革命的倾向，这或许不难；但是，要在实际上承认立于工人头上处于剥削者和压迫者地位的“中国资本家和商人”是自己的朋友，这对于共产党人却颇不容易。１９２０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出现的那种争论照样出现于中共的内部。不管共产国际怎样说，总是有些激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不相信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直到１９２３年中共“三大”召开之际，仍旧有相当多的中共代表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会起革命作用。他们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有两种，即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指的就是大资产阶级，但大资产阶级实际上是由军阀官僚组成或依赖于帝国主义的国际资本和军阀政府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是革命的因素”。[26]甚至就是那些对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赞同的中共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等，内心深处其实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极不信任。他们一面承认中国的“商人阶级不但暂时够不上勾结外国资本，而且天天受挤轧；不但受不着军阀的庇护宠爱，而且天天受他的勒索压迫”；一面又断言“中国商人要狗仗人势才敢反对军阀，要土匪碰伤了他们的‘洋大人’，再趁势请外国人不承认北京政府，……这是自然的倾向”。因此，中共“三大”虽然肯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必然会与帝国主义及军阀冲突，但它同时却又不能不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大部分依赖帝国主义的列强或军阀，极易妥协而卖平民”。[27]

围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所展开的争论，无疑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对中国资产阶级作进一步的实际的考察和分析。陈独秀还在中共“三大”召开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着对中国资产阶级做具体的分析了。陈独秀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即（一）“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指的是新旧交通系之类官僚买办金融资本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因为素来依靠与外国资本的勾结和利用国家财政与军阀官僚势力的帮助，不能不依附于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二）“非革命的资产阶级”，它是指那些经营规模极小，没有发展前途的小工商业资本家，他们因为没有政治上的直接的需求，所以往往容易对革命取消极的中立态度；（三）“革命的资产阶级”，它包括海外侨商及长江流域新兴的工商业资本家之一部分，他们因为封建军阀及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多半赞成革命。[28]在中共“三大”以后，瞿秋白显然也试图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有革命可能的，和没有革命可能的，前者包括海外侨商、小工业家及商人中稍能自立者，和中国新兴的工业资本家，特别是大批的在外国资本压迫下迅速走向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小农、小手工业者、知识界）”；后者即依赖于外国资本和军阀官僚势力的“大商阶级”。[29]这种认识看起来也是陈独秀所同意的。在几个月之后，陈

独秀显然也开始相信应当把那些小工商业家划入革命的资产阶级一边，从而使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即革命的“工商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和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30]

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无疑是因为他们同意共产国际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现状的看法，相信“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瞿秋白甚至明确认为：“在目前的中国，仅仅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尤其是靠上〖这〗几十名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 [31]但是，如果无产阶级还十分幼稚，资产阶级就不那么幼稚吗？中共党内围绕着这一点明显地有着极为不同的意见。有人断言：不论无产阶级多么幼稚，毕竟在各个革命阶级之中，最重要的主力军“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32]但也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的“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因为事实上“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33]随着中共领导人日益多地参加到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工作之中，人们显然更突出地感觉到自身力量与实际运动要求之间的差距。以至陈独秀或多或少地开始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相信“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34]

不过，这样一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可能太久。共产党人很快就开始发现自己与国民党人在许多方面格格不入。尤其让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就是，国民党既然是一个“各阶级合作的党”，为什么在劳资纠纷时总是压制劳动阶级？[35]甚至就连共产国际代表也注意到：国民党的社会成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最终是否能够同他们决裂，如同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那样反对他们，并开始转向劳动人民，这就是当前决定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主要问题”。可是，“国民党对大商业资本家举旗不定”，其右派在多半代表着这一阶级的利益，而左派领袖如孙中山等却为了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到所需的款项而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36]把与中共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状态的国民党右派定性为大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导致中共迅速开始重新怀疑资产阶级，特别是上层资产阶级的革命性。陈独秀明确说：“我们固然不能武断资产阶级永远是不革命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他们的革命热总是间歇的，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那些财阀以及资本家，“不但不是革命派，而且是反革命派”[37]。至１９２４年１０月广州商团事件发生后，人们更是公开认为：“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至少，绝不能指望它们来做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则干脆在苏共《真理报》上宣布说：今天的中国劳动群众已经越来越清楚，“中国的资本家既是阶级敌人，也是民族敌人”。[38]

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否定，必然伴随着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积极肯定。陈独秀已经认识到：“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紧接着，中共“四大”更进一步断定：“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与此同时，中共“四大”以决议案的形式正式肯定了前此党内关于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看法。决议案称：大商买办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而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还在由买办官僚的资产阶级到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之过程中，“所以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39]。

在１９２５年，中国革命不仅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而且还要打倒反革命的买办

阶级，这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共识。[40]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因上海总商会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态度而不能坚持到底，更加激起了共产党人对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感。以至陈独秀坚信，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说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已经由此得到了“证实”。[41]而更趋激进者则干脆认为：“大商人、资本家、名流、学者、律师、教职员，一切在社会上所谓比较有地位或者自以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其中有革命者也是‘少数’且不免中反革命妥协的‘毒’)”，只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小商人才是革命的势力。当然，就国民党内部的统一战线本身而言，在“大资产阶级”即“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右派组成了反共的所谓“西山会议”派脱离了国民党之后，至少中共中央这时并不想借机把国民党立即变成一个“工农政党”。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现在分化，恐怕“还稍早一点”，因为无产阶级与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不那么严重，而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由于本国的工业没有发展的条件，因此也还不能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42]

“民族的资产阶级”，这是共产国际针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倾向而提出的一个特定的阶级概念。它是专门用来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事民族主义运动，试图推进本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那些具有某种革命作用的资产阶级的。维经斯基大概是最早肯定中国存在着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并建议中国的劳动群众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共产国际“四大”更是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确信不移。但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却意见分歧。陈独秀不相信中国存在着一个有着独立政治形态的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却宣布：中国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陈独秀主张把国民党内部那些介于右派与左派之间，试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实只是“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代表的“中派”或“新右派”保留在国民党内，而毛泽东等人却“毫不犹疑的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留在国民党内，“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那一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也只能划分为大、中、小三个部分。所有“买办阶级”、“官僚”、“军阀”、“大地主”以及“反动派知识阶级”，统统都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乃极端的反革命派”；而那些“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许多高等知识分子”，都是“中产阶级”，对他们固然可从其是否沾上“洋货”“洋气”来区别“右翼”和“左翼”，但他们毕竟都是“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唯有包括“小商”、“手工业主”、“自耕农”和“小知识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其“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也只得附和着革命”。因此，“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其右翼“即现在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固有可与其他阶级合作革命者，也人数不多，且“不是真正的朋友”。与其努力使他们逐渐分化，不如将他们立即“分出去”。[43]

既然相信“资产阶级不革命”，陈独秀其实同样对所谓“中产阶级”没有好感，他甚至对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颇表怀疑。[44]问题仅仅在于斗争策略，在大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阵营之后，是否应当紧接着排斥中小资产阶级呢？很显然，共产国际对于采取这种作法深感担心，它明确支持中共关于大资产阶级必然背叛革命的观点，并主张无产阶级必须与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团结一致，但它要求中共保持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以便“设法加深资产阶级和地道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分裂，不让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劳动群众”。维经斯基告诉中共中央：“象其他任何党派中的情况一样，中派是背叛者，不要信任他们”，但这并不妨碍我

们同他们进行谈判并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在目前情况下，革命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抛弃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45]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中共中央在１９２６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会议过程中贯彻了继续团结国民党“新右派”的策略方针。而这意味着中共必须重新确定联合资产阶级的态度。尽管人们迅速开始公开劝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向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让步，并从妥协政策的迷误中“觉悟”过来，重新站到革命平民一方面来，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不对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感到怀疑。[46]考虑到国民党老右派与“新右派”之间的区别，和共产党与“新右派”之间事实上的敌对关系，陈独秀甚至开始把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加以明确区分，断言老右派是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的，“新右派”则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显而易见，陈独秀正在试图把“新右派”置于必然叛变必须极力排斥之列。[47]只是，“三二０事件”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以排斥共产党人攫取国民党领导权为目的的“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使得这种怀疑和作法很快变得不再有意义了。因为事情很清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既然取得了对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共产党人或者必须根本放弃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或者只能承认这一“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势力为自己的联合对象。而事实上，共产国际是不可能允许中共考虑退出国民党的。

从１９２６年５月开始，中共中央重新强调起“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成立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联合战线”问题了。７月，共产党人更进一步承认“大资本家、小中商人”等“无一不受外国资本和军阀的双重压迫”，因此仍有联合的必要。人们甚至开始宣布说：“商人除买办阶级以外，其余都是很困苦的”，故农工阶级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阶级斗争也要不妨碍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据中共中央七月全会的政治报告称：“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48]

中国共产党人真的相信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吗？这的确是真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共之所以对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他们发现过去大大地低估了这个潜在的对手。陈独秀在七月的中央全会上不无遗憾地指出，无论是在中国的俄国同志，还是中共本身，过去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都了解得太少了，“在我们的同志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看不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把它和买办阶级混为一谈”。以至当人们注意到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的时候，广东的革命政权“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里去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向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极为严峻的现实问题：“谁将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谁将领导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也许，“左倾的同志”会主张现在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还要直接反对资产阶级，但在民族资产阶级控制着国民党的情况下，这势必导致国共关系的根本破裂，并且势必会把民族资产阶级逼到帝国主义、军阀和买办阶级一边去，而我们是否有力量同时对付如此之多的敌人呢？陈独秀明确地予以否认。他说：我国目前有五百万工人，有组织的工人只有大约１２５万，而最重要的产业工人，如矿工、铁路员工、冶金工人等，不是没有组织起来，就是在组织上还很薄弱，甚至纺织工人也只是在上海一个地方组织起来了，并且无产阶级的斗争多半还没有越出自己本厂的范围，还很少能够独立地进行政治斗争。考虑到无产阶级的这种情况，和共产党在农民中还缺少影响，他显然认为：“现在即否认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之作用，不能从帝国主义夺取中国的资产阶级，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所利用”，势必“使革命运动流产”。因此，“‘打倒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共

产党目前的策略只能是，在“竭力使它成为自己的同盟者，竭力使它脱离买办阶级”的条件下，“将争取中国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问题提上日程”，以便“夺回领导权”，“排除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领导”。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以共同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49]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显然批准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它提出，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必然要经过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在第二个阶段，无产阶级作为首要的政治因素登上斗争舞台，并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在第三个阶段，整个资产阶级将被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发展程度不高，力量微弱。经济实力较强大的部分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买办）……从未参加整个反帝斗争。在民族革命运动具有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曾经参加过运动，但稍一有革命征兆，它便要么脱离运动，要么企图阴谋破坏之。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是革命因素。“但它不能独立行动－－要么是跟随资产阶级，要么是跟随无产阶级”。现在，运动处于向第三阶段过渡时期，阶级力量的重新改组正在进行，无产阶级将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并共同结成革命性更强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不过，共产国际告诫说：“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之外。除了中、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的某些力量，也还能在一定时间内成为革命的同路人”。[50]只可惜，共产国际的决议刚刚来到中国，整个形势就已经不同了。

从１９２６年７月开始的北伐战争把国民革命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北伐军所经之处，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起来，斗争矛头直指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大批小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统治集团也利用北伐迅速摆脱苏联势力和共产党人的影响，日渐羽翼丰满，开始公开准备与受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分裂了。到１９２７年２月底３月初共产国际决议传达到中共中央之际，陈独秀已经对继续争取留住“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51]失去信心了。他声称：“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52]但事实上，蒋介石一个“四一二”事变就把共产党争取资产阶级支持革命的计划一笔勾消了。几天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公开宣布：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与农民以及城市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联盟的阶段，大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中、小资产阶级正在并且最终都将退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应当据此改变自己对待资产阶级的策略，今后的共产党人“不仅要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同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将领们进行斗争”。[53]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相继退出革命的统一战线之后，所谓“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竟也不愿忍受剧烈的阶级斗争的冲击，很快就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分道扬镖了。在一个小资产阶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度里，这样一种变化显然是太大了。

由敌变友

共产国际当然了解民族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他们甚至在１９２２年最初肯定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他们必然会因为工农群众参加到革命运动中来而脱离出去。[54]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指出，甚至也没有准备小资产阶级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从来说，中国的无产阶级必须与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结成巩固的革命联盟。即使到了武汉国民党政权已经注定要退出革命的１９２７年６月，它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说："我们不能排挤有可能同我们一道前进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同小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因为"斗争的结局要看工人阶级能否把小资产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55]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小资产阶级真的退出革命了吗？或者说，武汉国民党是不是真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呢？斯大林看来对此深信不移。当武汉政府刚刚开始实行分共政策还不到两周的时间，他就公开宣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着民族资产阶级走了"。他告诉人们：民族资产阶级本来就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本来就是"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同盟者"。换言之，这样的分裂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这种分裂对革命好还是不好？斯大林明确认为这种分裂对革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千百万农民群众却因此更密切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认为无产阶级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领袖和领导者"，无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领导权的由此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正确的政策才能引导到这样的的结果，这难道不明白吗？"于是，根据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意见，中国革命应当开始准备进入一个更高的革命阶段了，无产阶级则只能以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作为自己的同盟者了。[56]

必须立即排斥与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当然深信不移。但迅速改变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并立即开始排斥小资产阶级，这却多少有些不合实际。事实上，斯大林最初也多少希望能够留住小资产阶级，因为正是他亲打电报要求中共中央"造成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暂时不要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据此，中共自然一度尝试着"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群众运动方面来"。他们断言，只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被反革命派吸引去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57]但是，他们看上去到底还是不能决定足以吸引小资产阶级的具体方法。在他们这时所通过的文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们并非不了解只有确实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才有可能使小资产阶级留在革命阵营里；但他们同样也很清楚，如此必定不能满足那些店员、徒工以及种种城市贫民的平均主义愿望，从而"牺牲"后者的利益。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断然表示，对小资产阶级"不要顾惜"。而大革命失败后，对彻底革命的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对"改良"、"右倾"和"妥协"观念的强烈反感，也同样使他们把阶级斗争的深入与否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于是，他们不能不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革命，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而左倾，愈能站到革命战线上来"。[58]为此，他们竟明确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杀尽地主"，"杀尽地豪"，"杀尽贪官污吏"，"杀尽农贼、改组委员"，"杀尽一切反革命分子"，并坚决"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阔老住宅给工人住"，"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以至阻止群众剧烈的革命行动，"不可恐怕冤枉和残忍"，"反动商店尽可没收，小商店有必要时亦可没收，或勒令筹款，不必过于顾虑"。[59]而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自然没有收到吸引小资产阶级的作用。于是，１９２７年９月，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放弃这种努力，把中国革命推上以工农民主独裁为内容的苏维埃革命的轨道。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改变前此为争取小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如不没收小地主土地，适当保护小商人的财产等等，因为一个多月以来的"经验"表明，"这些分子在土地革命激剧的发展中，必然走到反革命的方面"。甚至，瞿秋白公开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店

东小厂主等等以及所谓中小商人，……现时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当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放弃吸引“小资产阶级群众（小贩、贫民）”参加革命。[60]但实际上，人们这时所说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群众”其实已经不再是他们这时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小资产阶级”了，它更多地已经变成区别于店东、商人、小业主、手工业主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贫民劳苦群众”或“城市贫民”了，而这种城市贫民本来就是“工农民主独裁”的构成成分之一。[61]

但是，围绕要不要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问题，在中共党内依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不了解，在资产阶级的加入已经使敌人的阵营变得空前强大的情况下，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对于中国革命将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甚至共产国际代表也相信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政权，因此目前还不应当象俄国革命胜利之后那样拒绝联合小资产阶级，但没有人能够解决小资产阶级对剧烈的阶级斗争的恐惧。在１９２８年1月３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人们虽然再度表示“主观上并不反对与小资产阶级同盟”，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土地革命的激烈作法“必吓坏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于是，会议仍不能不决定坚持“工农与贫民的政权”，“候中国本部我们的革命成功，再来讨论小资产阶级问题”。[62]可是，仅仅４个月之后，随着济南惨案发生后群众性反日运动的再度兴起，相当一部分共产党人又重新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热情，进而大胆地提出了“将小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拉开”的斗争任务。[63]为此，他们专门发布了告小资产阶级书，表示：共产党的苏维埃革命“决不是抛弃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他们保证：共产党将“保障小商人营业”，“废除苛捐杂税”，因而呼吁小资产阶级站到自己一边来。而为了吸引小资产阶级，考虑到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缺乏号召力，他们甚至再度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和“实行民众政权”的主张。[64]

对小资产阶级策略的这种动摇，反映了中共党内仍旧存在着联合小资产阶级的实际需要和强烈愿望。在１９２８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前夕人们向共产国际领导人集中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当中，有关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的就占了三条。人们问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的革命政权应当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专政”的公式，现在是否仍然有效？而在工农专政的条件下，我们应当对富农和小商人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能否用武汉时期的具体例子解释一下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65]然而，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除了重申应当区分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与没有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和强调必须站在店员一边，不能阻碍群众要求的基本原则以外，没有给予中共领导人任何新的思想（９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试图重提争取小资产阶级的勇敢尝试，自然都只能遭到严厉的批评并归于失败。而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甚至更加明确地规定：“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它表面上虽然并不反对联合小资产阶级，但却明白指出其剥削者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的方面，而反对剥削者的阶级”。[66]至此，小资产阶级（即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不仅被彻底排除在革命阵营之外，而且被正式地纳入到与地主、资产阶级一样的剥削阶级的行列中去了。

其实，人们并不仅仅是不了解应当如何正确地制定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他们事实上也并不十分了解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对付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敌人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他们这时提出的１８个问题当中，相当多的问题恰恰是针对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们不了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几个阶层或派别？它们各自代表什么力量并起什么样的作用？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作为背叛了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它是否

还能够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作斗争？我们是否不应当没收资本家的企业？如果他们怠工，难道我们也不没收他们的企业吗？如此等等。[67]但布哈林似乎并不认为这些问题具有多大的意义，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之最无情最残酷的敌人”，了解了这一点就足够了，至于它的派别、它的定义、它与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关系，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68]然而，问题真是这样简单吗？

不错，自国共关系破裂以来，中共中央一再宣称：“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它“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因此，它永远不能成为反革命的领导力量，只能充当豪绅买办地主阶级的走狗，反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是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69]但是，随着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与国民党各派势力的斗争中渐渐得到巩固，和其内政外交明显地与北洋军阀政府有所区别，人们不能不注意到，这种“与我们理论上差不多，但政纲却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突飞地发展着”，“在全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取得了有力的地位，至少在最近的期间以内他成了一切政治事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人们不能不相信，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晓得制定减租条例、纳税条例，设佃业理事局，办御用的农民协会；晓得实行劳资仲裁，定分红制度，制定劳工法，组织黄色工会，还晓得大谈土地问题，劳动问题，宣传他们的‘以治法律方法解决耕者有其田’，宣传他们的福特主义（阶级合作）”；由于他们还“晓得以和平的外交方式哀求列强放弃不平等条约”，同时还保持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的口号，“并且还做一做抵制外货的运动”，乃至一心“想脱离帝国主义而抱着富国强兵的宏愿”，从而使得民族资本的状况“是进步了些”，外交如关税等也“相当的改善了”。[70]不仅如此，他们还注意到，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关税自主等”，“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和买办地主阶级发生激烈的斗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根本上是与帝国主义买办地主阶级相矛盾的”，这种“根本的矛盾，没有方法可以一致”。[71]这也就是说，共产党人这时已经渐渐地开始相信，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为独立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的中国市场而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显然取得了某些成功。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是不是他重新左倾，重新起革命作用呢？”尽管，中共中央这时明确否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任何革命作用，断言“他是要和封建阶级争反革命的领导权，他是要帝国主义不帮助封建阶级而单独帮助他”。[72]但党内仍旧有些人怀疑：资产阶级是不是完全不革命了？毛泽东就认为：还不能说资产阶级完全反革命了，至少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还在斗争。因为他相信：“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领导了去，立即跑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家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同样碰着打击”，因此“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买办豪绅阶级的民族民权运动”，它同样“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民主革命之一部分”。[73]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想要发展民族资本，它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阻遏民族资本生长的势力之间是不是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显然，在理论上，承认这种情况存在的本身就包含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仍旧可能具有某种革命性。而在现实政治生活当中，任何一种承认资产阶级可能具有革命性的想法本身，又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对反对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必要性的怀疑。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为此，共产国际不能不迅速发出指示，告诫中共：不论是关税自主，还是一年多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民族资本的某些发展，只是“主要有利于恢复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工商业”，要想进一步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固然，共产国际不能否认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因而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豪绅之间“存

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但是，它断言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本性导致资产阶级只能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屈膝投降”。它严厉地批评中共中央“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要求后者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再不肯为消灭封建残余而斗争”，更“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中国的革命任务，即统一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压迫和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只能由工农革命来完成。[74]

共产国际的批评迫使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看法，并对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矛盾的发展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间有矛盾吗？有。中国资本主义将来会不会有“相当的发展”？会。但是，“我们不能夸大这一事实的意义”。因为其关税自主和修改条约的主张，只是“使中国更深入殖民地化（更为帝国主义所奴隶报统治）的过程”；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终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与其所利用的封建势力的束缚”。至关重要的是，“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全脱离其买办性和地主性”，因此它最终只会“一步一步的出卖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妥协封建势力”。认为资产阶级还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的要求，“更是极大的错误”。[75]更进一步，当党内托洛茨基派出现之后，为反对该派关于中国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政的主张，中共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还改变了前此将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主要看成是资产阶级代表的态度，断言蒋介石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南京政府则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军阀联合统治的政权”，或称之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称现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并不是前此所谓以桂系和冯（玉祥）阎（锡山）等为代表的“豪绅买办阶级”与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以蒋介石、桂系、冯阎等为代表的军阀、封建地主和土著的大资产阶级与以汪精卫改组派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中小资本家、小地主和城乡上层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后者最终只能与前者“合并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76]

对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和策略，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后得到了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尽管考虑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和苏区经济生活的需要，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人们至少在形式上没有继续采取革命开始时的那种一概没收的政策，保证允许商业自由和一般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与房屋。但在政治上，根据共产国际起草的各种正式法律和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地主、富农一样显然统统被排除在“公民”的概念之外，“半点政治上自由都不给他”。[77]当然，法律或法令也并不是永恒的，它也还是会随着各种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一切取决于实际的需要。不过，在这个时候，影响中共政策变化的看起来主要还并不是这种实际上的需要，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阶级斗争愿望和来自共产国际的各种理论规定。这种情况决定了共产党人多半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理论观念出发来考虑自己的政策。尽管人们或多或少地已经注意到：“过左的要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有害”，“过早的消灭资本家的错误尝试”导致很少有资本家敢于在苏区进行投资和经商，从而使得苏区“日常用品减少，商品价格昂贵，给农民的生活以不好的影响，以至引起他们的不满”。但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仍旧使他们要求自己的下级“必须无情的镇压苏维埃区域内一切地主残余，与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并且没收他们的一切土地、企业与财产，从经济上给他们以致命的打击”。结果，下级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只能“依靠武力与行政的手段”去对付那些资本家和大小商人，就连过路的商船，人们“除了用枪去射击，或没收他们的财产外，也从没有想到……一方面可以征收通过税，同时……还可以发展我们的对外贸易”。[78]事情很清楚，在政治分野高于一切的时代，不论政策上如何规定，敌人就是敌人，人们在事实上是不可能把政治上的敌人看成是经济上的朋友的，即使是“利用”也难以做到。

李立三说过："革命是要彻底的直线的，改良是修改的弯曲的，因此改良是反革命的"。[79]李立三的这种观念反映了这时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对革命的理解。为了要彻底，人们只好宁左勿右；为了要笔直又笔直地前进，人们不得不放弃任何一种试图借助于策略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但是，在１９３１年9月１８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之后，现实的力量对比是不是能够允许中共继续彻底的直线的革命呢？富有经验的共产国际领导人显然是最早注意到中共应当运用策略手段曲折前进的。当然，他们首先注意到在中国东北地区中共有必要重新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来强化中国人反对日本占领的斗争，多半是从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考虑的。但无论如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是根据这一主张，最先开始改变中共前此的彻底革命立场，提出了"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策略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场合和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的颇为大胆的设想。[80]不管中共代表团这时的策略与设想还有着怎样的先决条件，它毕竟预示着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从此又要发生某种改变。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中共代表团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应当"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即属于上层小资产阶级甚或资产阶级的"一切名流学者"，来支持中共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81]进而，在１１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第一次宣布过去被斯大林断定已经脱离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重新"倾向于革命，倾向于共产党"。他同时并尖锐批评"我们的党和群众组织中的一些同志还在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所面临的这些具体的策略任务和实际任务"，声称他们远没有跟上客观形势的变化。[82]然而，在跟上客观形势变化这个问题上，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代表团，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尽管人们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提出"反日反蒋"的策略口号，但是，由于人们仍旧只能"教条地、公式化地、机械地和静止地理解和执行"党的阶级政策，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实行这一策略的任何可能。直到将近在两年之后，即１９３５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并正式确定中共有必要实行"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之后，中国共产党才开始意识到在这一方针背后具体的阶级关系变动的内容。他们第一次开始承认："在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中国小资产阶级是和反革命一直来反对革命的，那么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了，目前中国不俟是小资产阶级被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所警醒，被民族革命战斗〖的战鼓〗所激动，都投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洪流中来了，甚至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国民党的军官政客也鉴于'满洲国'，'共存共荣'的借错〖镜〗而混入反日反蒋的革命漩涡中来，因此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不论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的程度如何，"革命〖者〗都不能拒绝与之联合战线"。据此，中共主张："不管什么阶级（从工人起〖至〗资本家止）……，不管什么党（从生产党至社会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83]

重新肯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某种革命作用，这意味着中共前此的黑白分明的阶级政策正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化。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虽然再度肯定工人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但同时也承认"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并重提"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口号。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到反日战线中来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有利用的可能。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共开始改变前此的阶级政

策。会议第一次宣布愿意给“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第一次表示愿意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给城乡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保护；第一次郑重表示愿意“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欢迎他们到苏区投资开厂设店，答应保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许诺尽可能的减低他们的租税。[84]

有必要指出的是，把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从排斥的对象之一，一步提升到革命的可靠同盟者的地位，这反映了中共党内对联合小资产阶级问题是颇为积极的和一致的。但是，人们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就远不那么简单了。虽然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大胆地提出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工作，以至可以吸收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入党、参军等等，但却并没有宣布给予资产阶级分子以公民权，即便如此，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这种宽大，也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严肃批评：这样怎么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而且资产阶级“有可能从内部破坏”啊！[85]

毫无疑问，对资产阶级的宽大纯粹是由于共产国际正式批准的那个“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引起的。既然要联合一切愿意“抗日反蒋”的阶级和派别，那当然要区别对待仍旧处于统治地位的各个阶级。比如，人们只能把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蒋介石集团看成是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把愿意“抗日反蒋”的张学良、宋庆龄等视为有相当革命性的民族资本的代表；而既然肯定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决定实行联合战线的政策，那么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吸收他们中的少数革命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管理工作的主张，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当然，在１９３６年8月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改取“联蒋抗日”方针之后，问题变得相对复杂了。因为联蒋政策本身的提出势必要求人们改变前此对蒋介石集团阶级属性的看法。在理论上，共产党毕竟不可能与地主买办阶级结盟。既然相信蒋介石可以转向抗日一边，那也就是相信蒋介石也可以参加民族革命，这意味着蒋介石实际上应该代表资产阶级而不是地主买办阶级。于是，在过去了几年之后，人们重新又用“资产阶级”的概念来泛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时用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概念来区分其中的不同派别。进而，考虑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逐渐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人们又进一步把蒋介石等看作是区别于坚持对日妥协和对内反共立场的资产阶级中间的大资产阶级“中间派”。尽管，共产党人开始时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认识几乎是各种各样的，有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有说是“买办与资产阶级的”，也有说是“腐败的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团”。但随着１９３７年国共两党正式谈判解决两党关系问题之后，人们已不能不渐渐一致肯定国民党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了，至少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派的力量现在已开始占有优势”的党。[86]这是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联合已经不可避免，而这种联合与合作理论上只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而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之间进行。

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不能不重新唤起人们对２０年代中期他们之间合作经历的回忆，因而提醒他们重视历史上失败的教训。共产国际对资产阶级破坏作用的告诫，更加强化了人们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感。中共领导人很快注意到今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将“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民族资产阶级将会用一切方法“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在１９３７年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更告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资产阶级只是为了对付日本才与红军妥协的，因此，“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87]

相信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这当然是共产党人的阶级观念所使然。但是，

在１９３７年共产党人最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革命的形式以后，人们同样根据共产国际建议所定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不能不是包含着资产阶级在内的。甚至，在国共两党实力相差极端悬殊的情况下，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共和国，多半还是由资产阶级国民党来唱主角的。很明显，共产国际不再坚持中共必须反对与资产阶级在政权问题上的合作了，即使是苏区政权本身。[88]相反，他们开始鼓励中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并作更长远的设想。这意味着，中共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不仅仅局限于抗日战争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恐怕也很难过多地注重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和对立，并不能不在暂时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更多地加以调整了。

这样一种调整突出地反映在他们新的阶级政策上。在１９３７年底，随着王明等人带着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有关指示回到中共中央来，中共再度改变了他们一年以前所提出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思想，开始把资产阶级包括在内了。王明提出：“在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阶段上，革命所要推翻的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政权。参加这个民族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一切抗日的力量。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切阶层和党派的中华民主共和国。”[89]显而易见，中共中央是赞同这样一种认识的。到了１９３８年，毛泽东还进一步将“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具体化为“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斗争目标。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已经切实准备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并准备在承认资产阶级国民党居于“领导的与基干的地位”的前提下，承认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作为这个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旗帜了。[90]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共产党准备把与自己在阶级关系上根本对立的敌人当成朋友了，而且还准备做较长时间的朋友。

非友即敌

由上不难看出，在进入到３０年代中期以后，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根据一种固定的理论观念和经验模式来决定了，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根据实际政治关系的变动和自身策略的变动来决定的。尽管，在这许多的变动中，共产国际的作用还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这接二连三的策略变动中如何认识和判断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显然多半只是中共自己的事情。由于自１９３５年以来统一战线策略不断变动，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得不频频变化，这使得中共在对资产阶级及其派别的认识和判断问题上不能不发生某些困难。以至毛泽东从１９３７年起就强调认为，应当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作出理论上的说明。然而，直到１９３８年底为止，由于策略本身的频频变动，导致认识对象本身总是处于一种极不确定的状态，这使得人们几乎难以在一种基本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在１９３９年，情况有了不同的变化。１９３９年，从１９３５年特别是从１９３７年以来一步步看好的蒋介石国民党开始重新暴露出其必与共产党为敌的真实面目，其“防共”、“限共”文件接连出笼，反共军事磨擦更是步步逼紧，从而使得共产党不得不对１９３８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所确定的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日渐发生怀疑。终于，共产国际１９３９年５月间关于国民党的反共可能包含着投降阴谋的指示，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强调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６月，毛泽东在肯定“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首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同时，首次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甚至再度把“地主”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91]很清楚，毛泽东再度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表现出极端的不信

任，而这种不信任又是同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的判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共产国际关于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指示[92]，使人们进一步确信资产阶级是最没有前途的。毛泽东开始相信："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展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93]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当然有重新估价的必要。

从１９３９年秋天起，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开始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他显然坚持共产国际在１９２９年对中国资产阶级所做出的基本判断，即由于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它不仅"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因此，他相信，资产阶级固然在一个时期可以参加革命，成为革命的动力之一，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但在另一个时期，就要叛变革命，并转过来压迫革命，成为革命的敌人。考虑到这种情况，资产阶级当然要"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看作是不利于他们，而要加以限制，而采取欺骗、诱惑、溶解与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即拿这个政策作为他们投降敌人与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的"。毛泽东断言："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原故。在今天，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鉴于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爆发以后，当今世界已经被截然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而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暴露出其腐朽性而日渐崩溃，国际资产阶级及其政权已经没有前途，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当然也失去实际意义。据此，毛泽东大胆推翻前此关于与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三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政治主张。那么，今后决定着中国命运并将要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基本构成的，应当是哪些阶级呢？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与其他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坚信：共产党已经领导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它们必然要成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94]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又再度把中国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主张取消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直截了当地主张由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而不是由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把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的动力之外，并否认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命运的发言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就此失去了革命的作用，而成为革命的敌人呢？显然，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在国民党仍旧继续抗日的情况下，笼统地否定整个资产阶级，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利益。事实上，毛泽东也并没有这样做，他甚至相信资产阶级还没有完全丧失革命作用。为此，他具体地提出："资产阶级有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买办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外国资本家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半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买办阶级决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仅因为买办阶级是分属于各个帝国主义的，在革命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可能在极小的程度上与极短的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统一战线。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本来就是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即有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有矛盾而成为革命动力的一面，也有依赖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反对革命的一面。而"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

大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区别。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则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当然，毛泽东相信，民族资产阶级必有革命性完全使用枯竭而只剩下反动可能性的一天，但他也了解，还不能简单地把仍在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排除在革命的阵营之外。[95]

相信国民党代表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毫无疑问是以国民党参加抗日的事实为依据的。因为国民党抗日，所以相信它有革命性；因为它有革命性，所以判断它主要不是代表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地主买办阶级。但是，笼统地判断国民党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并根据蒋介石的反共措施相信资产阶级正在失去革命性而开始走向反动，这必然要导致有朝一日因为共产党与蒋介石关系的破裂而不得不与所有资产阶级为敌。而事实上，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这种作法不仅对共产党不利，而且也不能适合资产阶级内部的实际状况。实际的状况是，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矛盾，它们对共产党以及对抗日的态度都有相当大的区别。经验已经告诉共产党人，笼统地把它们都看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并有朝一日因为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而将它们统统视自己的敌人，对共产党并没有任何好处。

１９４０年３月，毛泽东开始系统地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主张，和建立“三三制”政权的积极设想，决心把进一步争取地方实力派和中等资产阶级作为孤立和反对蒋介石等顽固派的有效手段，这就使得毛泽东不能不进一步考虑修改自己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显然，笼统地把必然争取的大批中等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和势必要加以孤立与反对的大资产阶级统统归入“民族资产阶级”，不利于共产党人客观地作出阶级估量和制定政策。十分明显，鉴于蒋介石国民党反共态度日益强硬，毛泽东这时已经断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大资产阶级与“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大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并断言：国共关系“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争取中间势力的原则，他不能不下决心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那些与蒋介石态度不同的地方实力派和其他中等资产阶级分子区别开来，并据此于１９４０年７月间提出了“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的观点。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再是包括蒋介石以及过去所说的“大资产阶级”在内了。[96]

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月，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应该“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的观点。他特别说明：“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即是过去所说的“买办阶级”，他们是现时主要的当权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家联系少，现时基本上没有政权”的部分，即过去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97]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新的认识和斗争策略，中共成功地解决了前此与国民党关系当中那些十分棘手的战略难题。按照前此的情况，共产党或者必须整个破裂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或者只能在承认资产阶级占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与其“长期合作”，“共同建国”。而如今，中共不必再担心有朝一日由于不可避免地破裂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关系，以致不仅无法孤立蒋介石，反而使自己重新陷于孤立。这样一来，中共自然不必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斗争时畏手畏脚，他们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理论空间和政策空间。毛泽东对此自然十分满意。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没有指出大资产阶级才是买办阶级，直到１９４０年７月才正确认识清楚。现在，必须要使全党了解它，并且要把这种理论与实际政策联系起来。[98]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发布指示，具体解释了对于资产阶级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他明确要求全党：凡可团结者团结之，凡可利用者利用之。对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必须破坏，但对反共的顽固派仍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并且“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士绅，加以区别。”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争取中间派的问题，主张在政治上“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在经济上“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99]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开始对重新印刷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根据新的观点做了相应的修改。修改后的文章清楚地表述了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新看法，这就是：“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与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尽管“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它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100]

将大资产阶级的概念与买办阶级的概念合为一体，并从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之中区分出来，这就决定了中共此后的阶级政策是必然要首先反对这个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而断言这个大资产阶级即使在参加统一战线时“仍然是很反动的”，这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大资产阶级只能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毫无疑问，这个大资产阶级指的正是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大资产阶级反动性的确定，导致共产党人不能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和投降可能抱以高度的警惕。因此，１９４０年秋冬之季当蒋介石反共态度异常强硬时，毛泽东不能不强烈地怀疑国民党准备投降日本并夹击共产党，因而准备先发制人。[101]而当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又不能不判断蒋介石准备全面反共分裂，因而下决心“放弃联合的政策，采取单一的斗争政策”。[102]但当注意到蒋介石仍旧继续抗日，并且还没有决心与共产党分裂之后，毛泽东自然又改变态度，重申“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策略。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不可能相信甚至不可能与这个蒋介石国民党妥协是肯定的。一旦国际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共产党的变化，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取代蒋介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设想乃至计划。这种情况最终决定了整个４０年代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毛泽东区别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孤立和打击大资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则极大地加速了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可以肯定，在经过了将近二十年时间的摸索和摇摆之后，中国共产党在４０年初期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也是比较成熟的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与中共前此的阶级政策相比，它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强调区别对待的政策，主张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人，可团结者尽量团结之，可利用者尽量利用之，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区别对待的政策使得它甚至能够清醒地注意到:“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级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它有不少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它的军队以至政府机关中有着不少民主分子，甚至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分为几派，并不是一个统一体。[103]这就为它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中制定具体的分化政策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团结利用的策略也使得中共在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能够坚持到底，它并未因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并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有一部分人表现出某种要求独立的倾向，而抱以敌视甚或改取全面打击的态度。它甚至在几乎整个４０年代里坚持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的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04]联系到前此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可以想象，长时间地坚持这种态度对于坚信资产阶级是自己的敌人的共产党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４０年代，它做到了，也因此而战胜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

[1]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３页。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４８－５５０页。

[3] 陈独秀：《告劳动界》，《晨报》，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4] 《蔡林彬致毛泽东的信》，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１页；并见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９卷第４号，１９２１年２月１１日；陈独秀：《对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８卷第１号，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

[5] 同注 2。

[6] 江春：《社会革命商榷》，《共产党》月刊，第２号，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７日；并见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

[7] Ｐ.生：《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３号，　１９２１年４月７日；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陈独秀致张东荪的信》，《新青年》，第８卷第４期，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

[8] 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

[9] 吉生：《告劳兵农》，《共产党》月刊，１９２１年５月７日；田诚：《共产主义与知识分子》，１９２１年６月印单行本，原件存上海博物馆“一大”组；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

《新青年》，第８卷第３号，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1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１９２１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５５８页。

[11] 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中共都明确表示了不与任何其他党派发生关系的强硬立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３，８页。

[12]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２０－２１，２９－３２，４０－４６页。

[13]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７期，１９２２年５月１日；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８月２６日

[1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６４－６６，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６页。

[15] 见《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人的态度的报告》，和《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会议记录》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１日－２月２日

[16] 《陈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１９２２年９月１９日；陈独秀：《造国论》，《向导》，第２期，１９２２年9月２０日。

[17] 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２期，１９２２年９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６４－６６，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６页。

[18] 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１日；维经斯基：《中国南方的斗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８日。

[19]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１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９月版，第７０－７５页。

[20]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４７页；《萨发罗夫同志在远东各国劳动者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上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和共产党态度的报告》。

[2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２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７６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１９２２年８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３辑，第７４页。

[22]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１９２２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１卷，第１２１页。

[23] 《刘仁静和拉狄克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的发言》，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６２，６５页。

[24]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蔡和森：《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向导》，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25] 同上，并见和森：《外力、中流阶级与国民党》，《向导》第１６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１８日。

[26]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的代表就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讨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０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３辑，第８３－８５页；《斯内夫利特笔记》，１９２３年６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２３４－２４２页。

[27] 秋白：《政治运动与知识阶级》，《向导》，第１８期，１９２３年１月３１日；屈维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前锋》，第１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党纲纲领》，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１４０页。

[28] 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

[29] 屈维它：《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前锋》创刊号，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

[30]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

[31] 《瞿秋白致季诺维也夫的信》，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２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８月版，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32] 邓中夏：《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９期，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33] 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３１－３２期，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１日。

[34] 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

[35] 独秀：《国民党与劳动运动》，《向导》，第７１期，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８日。

[36] 维经斯基：《中国当前的政局》，１９２４年６月，《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４－８５，８９－９１页。

[37] 同注 35。

[38] 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２号，１９２４年１１月；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新青年》季刊，第４期，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工人阶级》，《真理报》１９２４年9月6日。

[39]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１９２５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40] 双林：《孙中山辛亥革命后之第二功绩》，《向导》，第１０８期，１９２５年3月２１日；瞿秋白：《孙中山与中国的革命运动》，《新青年》第２期，１９２５年6月1日；和森：《冯自由反革命运动的解剖》，《向导》，第１１１期，１９２５年4月１９日。

[41] 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１３６期，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42] 但一：《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中国青年》，第８３期，１９２５年7月２３日；楚女：《反抗五卅惨杀运动中所见的阶级斗争》，《中国青年》，第８６期，１９２５年8月１日；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１２９－１３０期，１９２５年9月１１日。

[43] 维经斯基：《中国“内战”和帝国主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5月１１日；维经斯基：《中国南方的斗争》，《真理报》１９２２年7月１８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６６－７２页；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第４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１日；子任：《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４期，１９２６年1月１０日；恽代英：《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国民革命军一军三师政治部１９２６年印。

[44] 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１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和《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１９２６年３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１３８页，第３辑，第１２４－１３３页；转见《陈独秀同志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46] 瞿秋白这时对于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显然十分矛盾，他一边劝告资产阶级“觉悟”，一边却表示强烈的担心，称：“只恐怕！只恐怕在这个联合战线里面，资产阶级故意怠工破坏”。见屈维它：《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和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新青年》，第３号，１９２６年3月２５日；秋白：《国民会议运动一联合战线》，《向导》，第１４４期，１９２６年2月3日。

[47] 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4月3日。

[48] 独秀：《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间的中国工人劳动运动》，《向导》，第１５１期，１９２６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１９２６年7月１２日，《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１４７页；代英：《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革命生活》，第１７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２５日；恽代英：《工农商学联合政策》，《黄埔日刊》副刊《革命之路》，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８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政治报告》，１９２６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１６８页。

[49] 《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情况给共产国际的报告》，１９２６年７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１６８－１７１页。

[5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２７６－２７９页。

[51] 在１９２６年下半年以后，中共中央已经逐渐确定了国民党左右各派的阶级关系，称："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由于老右派已经出去，他们这时通常直接把"新右派"称作右派。见《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１９２６年11月４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２卷，第４２４页。

[52] 参见《中共特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５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６日。

[53] 布哈林：《中国革命问题》，《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９日；斯捷茨基：《斗争的辩证法》，《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１日。

[5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关于东方问题的总提纲》，１９２２年１１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辑，第６６－７２页。

[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报告》，１９２７年５月３０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１卷，第２３８页；布哈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介绍》，《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８日；采特林：《新阶段》，《真理报》１９２７年６月１７日。

[56]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８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６２－２６８页。

[57]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58] 中共中央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３日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中曾明白地说明："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这说明，他们知道没收或严重损害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将难以使其不倒向反动。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２９６页；《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同志书》，１９２７年８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59] 《中国现状与党任务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１０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3卷，第４５８－４６１页；《中共广东省委发布革命口号》，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四）》，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２７年卷，第２７６，１９７，１６２－１６３页。

[60]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１９２７年9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３７２－３７３页；秋白：《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布尔塞维克》，第7期，１９２７年１２月5日；《中央通告第十五号》，１９２７年１１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４３８页。

[61]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具体解释了这两种“小资产阶级”的区别，并说明“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４５８－４５９页。

[62] 《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广州暴动大纲的报告》，１９２８年1月3日。

[63] 《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１９２８年5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１９８页。

[64]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１９２８年8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５６０－５６５页；《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１９２８年6月２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２７３页。

[65]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１９２８年6月。

[66]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１９２８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２９９，３１８页。

[67]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１９２８年6月。

[68]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１９２８年6月２９日。

[69] 《中国现状与党任务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９－１０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４５８－４６１页；《中共广东省委发布革命口号》，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广东省委报告（四）》，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广东省委致海陆丰县委函》，１９２７年１１月，《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１９２７年卷，第２７６，１９７，１６２－１６３页。

[70]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１９２９年3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５８页；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中心任务》，１９２９年2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６２９－６３１，６３９－６４５页；忠发：《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相持局面中的斗争》，《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4期，１９２９年2月1日

[71] 《中央通告第三十号》，１９２９年2月8日；李立三：《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

的中心任务》，１９２９年2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４５，６２９－６３０页。

[72] 忠发：《民族资产阶级之反革命的理论及其政策》，《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2期，１９２８年１２月1日

[73] 毛泽东：《边界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１９２８年１０月5日；毛泽东：《井岗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2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2卷，第３－６页。

[75]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１９２９年5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１２６－１２９，１８５－１８８页。

[76] 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１８４，７９２－７９３页。

[77]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７９５－７９７页；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宪法大纲，只有工、农、兵和城市贫民才可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７７２－７７３页；毛泽东：《今年的秋收》，１９３３年9月。

[78] 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斗争》，第１４期，１９３３年6月5日。

[79] 《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政治问题的报告》，１９２９年3月5日。

[80]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１９３３年1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卷，第３０－３２页。

[81] 《王明、康生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７日。

[82] 《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讨论库西宁报告时的发言》，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３０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选辑》，第2卷，第２３２页。

[83] 《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卷，第５６３－５６６页。

[84]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卷，第６０４－６１２页。

[85]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１９３６年8月１５日，转见《中

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8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外交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７日；刘少奇：《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１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６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１２６页;《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１４１页；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２２９页；王稼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问题给中央的建议信》，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６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０９页；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

[87] 洛甫：《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提纲)》，１９３７年５月２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５页；《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军事外交问题的报告》，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２日。

[88] 根据国共两党１９３７年的谈判，国民党曾坚持要求共产党同意由国民党方面派人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中共曾一度允诺。后因人选问题与国民党方面发生争执拒绝其派人任职，但王明等回国又曾决定接受方面的要求。

[89] 陈绍禹：《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１９３８年３月１１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４６３页。

[90] 毛泽东：《论新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１４日，《解放》，第５７期，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91]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０日。

[92]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指示》，１９３９年9月１０日。

[93] 毛泽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１９３９年9月１４日。

[9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１期，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发刊词》，《共产党人》，第１期，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

[95]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第５期，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５日。

[96]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１９４０年7月１３日。

[97] 《毛泽东关于对地主资产阶级军官进行调查给恩来等电》，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

[98] 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曾两三次谈到他解决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资产阶级区别的问题，最初曾提到在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起草《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政策的

决定》时才认识清楚，后来又谈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还没有搞清楚。从最初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看，可以看出毛泽东后来的说法是准确的。

[99]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６０－７６６页。

[100] 从目前可以看到的１９４１年以后再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看，其中有关资产阶级问题的文字，都已经作了修改。

[101] 《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４日。

[102]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９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９页。

[10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１０４７页。

[104]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４３８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

马克思主义不是在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自然生长起来的，它最初是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与理论观点，被引入和介绍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被民族化，即中国化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却是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许多极其复杂和曲折的情况。在千辛万苦，付出无数牺牲，花 20 年时间把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逐步改造成为适合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成功地迎来了自己的 1949 年。但胜利的喜悦与骄傲，也使得他们把战争时期的经验和列宁斯大林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自己加以教条化、神圣化，因而再度经历万苦千辛，付出沉重代价，费 30 年时间来重新认识和修正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使之适合于中国建设实际的需要，这里面的曲折与反复尤其引人深思。

呀呀学步孔趋亦趋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一种工具，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过程其实也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 1919 年以后特别是在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帮助之下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自然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1]。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2]。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一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象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3]

但是，中国是否具有与俄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革命条件呢？在那些明显地留有俄国人印迹的中共最初的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把中国和俄国等量齐观的情况，他们显然认为中俄两国都处于大致相等的发展水平上，即两国都是"农业国"，只是"大""小"有别罢了。既然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条件相近的中国不能如此呢？何况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入穷途末路，社会主义则方兴未艾，难道中国人能放着社会主义阳关大道不走，反而要去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当然，人们未必不了解中国还远比俄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未必不了解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还处于极不发展的状况之中，但他们却因此更加重视自己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4]。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与理论条件，然而时代和环境客观上却促使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毗邻俄国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疑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

不过，"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不能不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他们在理论、经验与物质条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的"以俄为师"的心理，并因此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由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种纯粹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最初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他们早就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一下”的任务[5]。还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人们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谈到了中国革命必须“两步走”的问题。陈独秀明确指出：“吾党”应首先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向封建势力进攻，然后再尽速推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也有代表提出了类似的观点。[6]显然，到了 1922 年初，人们已经能够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7]。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其革命经验的欠缺，特别是由于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局限，必须以俄国革命为参照系，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

最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能不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当多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切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之际，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决议当中一改他们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的目标，统一了对中国社会基本性质的认识，并提出了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革命方针[8]。同样，也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并具体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切实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二十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当然，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必须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更不可能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所能够完成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而这首先并非是由于他们同共产国际存在着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他们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这使得他们只能紧紧地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甚至，就在共产国际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苏联并全力支持国民党实行军事革命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在中国就可以有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存在。十分明显，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的共产党人，这时更习惯于从现成的结论和经验出发来认识问题。为此，他们明确批评致力于军事革命的国民党不该“占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搞什么军事革命。他们断言：“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在中国也和俄国一样，只有一条道路好走，“就是只有全

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而要实现这样一种工农兵联合的大暴动，国民党就必须立即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广州政府及其军队，全党动员“到民间去”[9]。

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机械地套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这在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涉及如何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党人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对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革命方式的迷信，就更加典型。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实践，都没有提供过除了群众性的总同盟罢工和总暴动以外的任何一种革命的形式。能不能设想另外一种革命的方式呢？在这方面，斯大林多少表现出某种远见灼识。他明确指出：“在中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10]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于欧洲社会革命的特殊的武装革命方式，这在斯大林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共产党人应当为实现十月革命方式的群众起义而努力的思想，他在承认了中国革命的这种重要特点之后，只是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比如加强其政治工作，研究军事，直至逐渐担任某些军事领导职务等等，显然，他在谈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一特点的时候，并非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为对象的。他完全不清楚，他所谈到的那个“革命的武装”，其实是不可能按照他的愿望来实现他所提出的革命任务的。而他同样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未来的革命多半也只能是武装的革命。正因为如此，当国民党公开实行分裂之后，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包括斯大林在内，人们当时所能够想到的革命方式，多半还只是欧洲式的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由此出发，人们甚至迅速地开始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俄国革命的历史相类比，并且公开树起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它能够一举成就俄国革命所成就过的一切。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十年磋砣尺功寸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却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共产党人自己有意无意的干挠和阻碍。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不能不尽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又不能不设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以使之不被庸俗化。尽管事实上这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早已被俄国化，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更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党的指挥，但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显然都相信：这种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经过苏联共产党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事实上日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种特殊权利，而世界上又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到 1927 年前后，苏联党的领导人及其共产国际不仅公开地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11]。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

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要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定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毕竟开始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毛泽东等人已经能够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及土地革命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蔡和森等已经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并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而大革命刚一失败，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断言共产党的失败正是失败在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上[12]。不难看出，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人们并开始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但大革命的失败，毕竟把共产党人引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从而使共产党人骤然置身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严峻局面之中。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这恰恰适应了共产国际这时强化俄国革命模式和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需要，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随着斯大林开始拿中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 1917 年 7 月的失败相类比，人们很快就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必将迅速走向自己的“十月”。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阶段的说法，无疑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一时间，不论条件成熟与否，到处是一片暴动之声。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由共产国际代表乃至苏联外交人员亲自出马的广州起义也迅速失败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简单的模仿和类比是不适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注意到有必要实行区别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方式以保存实力的，并不是俄国人，却是最早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因为，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军事上出现不利局面时，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除了带领部队撤上井岗山实行武装割据以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考虑到这个时候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试图把中国革命引上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道路，毛泽东把革命的基地建立到偏僻的山乡里去，建立到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农村当中去，这不能不使得那些格外注意苏维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的中共领导人感到严重不安。为此，他们立即给了毛泽东以严厉的处分。然而，事物发展的逻辑很快就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就连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注意到应当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因而提出了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妨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的问题。这种情况至少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多半并不是已经到了俄国的 1917 年 7 月，而且“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13]。

当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最初采取这种“游击式斗争与农民割据”方式的斗争形式的时候，显然还并没有把问题的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上去，他们这时多半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在城市中的起义统统失败，而农村中武装割据却明显地容易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那些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的共产党人没有理由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个策略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一方面却明白告诉共产国际：许多同志相信“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很显然，在许多共产党人的头脑中，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未免距离俄国革命模式太远，它怎么可能引导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当然，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开始相信中国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中心城市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了，他们甚至第一次注意

到中国“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上是许多半独立的区域”，各地的军阀统治也有强有弱这样一些事实。可是，他们还是没有摆脱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欧洲革命模式，只不过，他们开始提出：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14]。

当一种经验形成以后，它同样可能被神圣化和教条化。由于没有前车之鉴和自身的成功实践，共产党人这时几乎不能不依据俄国革命的模式来考虑问题。毕竟，理论上也不允许他们产生创造性的思维：除了在中心城市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实行暴动夺权以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革命方式吗？把共产党建立在农民革命的基础上，还叫什么共产党？这也就难怪中共“六大”召开时，当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明确肯定暴动政策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斗争形式之后，一些人立即开始公开指责“割据”是非无产阶级的，并宣称所谓一省数省、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念，也都是革命的阶级性所不相容的“农民割据”的观念，是以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旧式农民革命的观念来指导今天的中国革命，结果只能使革命失去城市工人的领导，最终使苏维埃的暴动政策失去其特有的阶级革命的意义。

先有成套的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后有党有生长和革命，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的种种差异，以及研究时间、研究条件的极度匮乏，特别是两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革命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使得必须按照这种已经被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念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在重要的历史事变关头，难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付诸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不能不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以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目标之后，人们就始终在革命的性质、阶段、形势、任务、对象、动力等等概念上纠缠不清，因为中国革命的一切实际条件都明显地与俄国当年有所不同，而人们却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把它们统统捏合在一起。当然，造成这些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共中央有人仅仅是出于通俗的考虑提出应当改“苏维埃政权”为“人民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大为光火。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则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那些在他看来简单象“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去认真考虑如何使俄国的革命形式转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

事情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字典当中，“苏维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俄国特有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包含着具体的革命内容，标志着具体的革命阶段和革命形式，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成功范例的革命模式。人们绝不能怀疑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同样也绝不能拒绝把它作为自己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具体斗争形式和根本目标。因此，尽管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革命已经出现的割据苏区和工农红军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却仍旧不能想象它们存在的具体方式。布哈林声称，红军在一个地方长期割据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必然会把当地的母鸡都吃光。因此，他仍旧相信，革命的成功终究还要靠群众暴动解决问题。[15]而在他们主持下制定的政治决议案中，他们照样机械地仿照俄国 1917 年 7 月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样子，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形式，并明确限定共产党人只能以工人、农民中的贫农作为革命的动力，而以城镇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农为可能的却多半是动摇的同盟者，同时则必须把其它一切社会阶级看成是自己的敌人[16]。

把阶级政策极端化并把革命手段模式化，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就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新的“左”倾盲动倾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也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

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存在这种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奇怪现象”的特殊原因，并注意到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17]。而 1930 年，斯大林也终于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仅不存在象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而且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开始，首先创立和扩大红军，建立和扩张革命的根据地，然后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最终夺取中心城市。据此，共产国际终于开始重视中国的红军及其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承认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18]

应当肯定，从一味强调以城市工作和工人工作为重心，坚持以中心城市的起义为革命根本出路的俄国模式，到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中央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甚至日益把红军和根据地视为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19]，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进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前此那种僵化的思想方法，因而能够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自己的政策了呢？事情却并非如此。真理并不是莫斯科首先发现的，但真理必须经过莫斯科权威的解释才能成为真理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由于共产国际仍旧相信只有它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它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从这种变化中发现它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仅如此，它甚至为了使中国党更忠实和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竟不惜亲自出面干预中共党内的组织事宜，以便把它认为信得过的大批留苏学生安插到中共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这确实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修正了僵化的革命模式；一方面却又生怕中国革命脱离俄国式的革命轨道，以致强行使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毫无疑问只能促使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一步极端化，从而使它全力加强根据地和红军工作的大胆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才迅速导致了中共在几年之后的严重失败。因为正是这些只习惯于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以及有关决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布尔什维克”们，把一切适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僵化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党内倾向斗争等等，全面引向了极端。

一朝觉悟斗转星移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变的过程。十分明显，苏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原则上其实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具体结合。由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也曾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问题在于，他们不仅缺乏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条件与可能，而且莫斯科的利益本身还处处制约着他们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来考虑问题。他们坚持以他们的利益和经验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基本依据，导致他们事实上充当着某种宗教裁判所的角色。这自然会妨碍他们理智地了

解自己的能力，以致促使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试图脱离俄国的书本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

要在共产国际还直接决定着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多半不仅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且对党内一切不同见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标新立异，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所以直到三十年代中叶以后才得以明确提出，当然是同这种情况有密切关系的。从 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共产国际逐渐开始根据中国国内崌情势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新提出统一战线政策，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迟迟不能理解，以致失去了挫败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机会这一情况看，可以知道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比那些制造教条的人头脑还要僵化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事实之后，中国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并且通过更换领导人的方式来达到摆脱盲目的教条主义统治，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必须指出，在 1935 年以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第一次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走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20]，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当年，中共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就是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这一决定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应当把共产国际有关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思想的[21]。

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其实质就是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尽管张闻天这时关于“民族化”的提法主要还是鉴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很少涉及中国问题这一具体情况而言的，但是，要把国际指示“民族化”，这本身就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格外重视中国的“具体环境”了。当 1936 年中共中央经历了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出而导致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的重大调整，甚至不能不完全放弃了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革命经验必须适合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体会，无疑变得更加深刻了。因此，在 1937 年 5 月中共党代会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张闻天不能不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明确表示：“现在严重问题就是如何灵活的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必须“要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因为实践已经证明，“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显然，在共产国际也已经特别注意到必须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进行具体分析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必然会更加迅速地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首先，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其实主要还并不是对各国党自身的要求，而是对自己本身工作的一种原则规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还并没有放弃它在政治上对各国党的领导和监控地位，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和策略路线”[22]。因此，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它所信任的长期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的王明等人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其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具有极高的威信，而长期以来人们还不习惯为自己标新立异，加上党内王明等相当一批带有教条

主义倾向的领导人还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思想方法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显然，这一工作只是当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并一度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好感，因而支持毛泽东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才变得容易了一些。

1938 年 10 月，毛泽东在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始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地显然是“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是有着特别的政治意义的。

早在三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党内存在某种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倾向，因而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24]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更显得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党内大批在党内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工作。因此，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重要理论任务。可以肯定，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就没有胜利可能；而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而要想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又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拿到自己的手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地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后来曾经直接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不难看出，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张闻天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岷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就是要求独立自主，这无疑是向

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究竟是应当以中国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还是应当以苏联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这个问题终于在1940－1941 年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对国共关系的不同考虑，和德苏战争爆发后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在援助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地反映来了。十分明显，中共中央坚持只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出发来考虑一切问题，把中国革命的利益放在一切关系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具体地实践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原则了。当然，也是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中共中央迅速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进一步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来具体地和全面地制定和完善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了。与此同时，真正彻底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1941年9月，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王明等人的思想斗争，到 1942 年 2 月，他又乘热打铁地展开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善于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的毛泽东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正是由于毛泽东成为了党的最高权威，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凭借毛泽东的丰富经验和灵活的指导，一举战胜了强大的国民党，几年时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

行百里者而半九十

历史是无情的。它从来不以主观动机论英雄，它所看重的只是客观效果。夺取政权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以共产党代替国民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种政权更替，共产党所要证明的，不仅仅是它能够夺取政权，也不仅仅是它能够巩固政权，它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关键在于，它要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民族的兴盛与人民的幸福。因此，任何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都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过去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他们改造中国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也正是因为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和武器，他们才能够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常注意调整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模式，甚至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也不可能到此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不过为共产党人提供了接近自己目标的一种便利，一种工具。确立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到底也只是解决了立足于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立场问题，以及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问题。夺取了政权，共产党成为了国家的统治者，并不等于他们就有了呼风唤雨的力量，不等于他们从此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模式来改造社会，建设国家。事实上，如果说，在革命年代、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在异常复杂多变的形势和极端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断地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包括使他们赖以为理论依据和

斗争武器的马克思主义适合于革命的实际，以便为自己创造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坐稳了江山，不再存在生存威胁的情况下，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或理论需要出发的努力，将变得更为关键。因为，在战争年代里，面对强大敌人和险恶环境，任何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作法，都可能迅速把共产党人引上绝路，他们几乎没有可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使之适应现实的需要。但在没有强敌威胁的当政的条件下，在不再需要像战争年代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情况下，共产党人思想观念的任何僵化与教条，表面上似乎不会马上带来致命的危险，然而，正因为其为害较慢，正因为它容易使人麻木，当它为害之时，往往危害更甚，影响更广，以至于一朝发难，就往往无以补救。同样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样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再度经历了种种严重的挫折，直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国家和人民遭受到空前严重的浩劫。这种情况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整风运动或规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的。深入地和客观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实际，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密切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使历史进步、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的目的，是一个长期的和永无止境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这首先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信仰和性质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定地信奉马列主义，并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党，因此，它不能不始终面临着如何把这种源于欧洲和俄国，因而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的或俄国的色彩的理论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来的问题。尽管，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就具体来说，“并非上了书的都是真理”，马克思的或列宁的许多具体观点和结论，都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相对的意义，特别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在理解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未必可以教条式地、不加区别地把他们的一切学说或观点简单地套用到中国来。然而，事实证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本身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到党的信仰乃至党的性质的大问题，由于理论的解释权始终掌握在个别理论权威的手里，要想做到不是教条式地，而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观点，哪怕只是个别观点，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还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本身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本身变化和发展的种种实际需要，促使共产党人绝对不能停留在以往经验和知识的水平上，总是依赖过去的，尽管曾经是成功的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各种新的问题，它必须根据正在发生重要变化的实际，努力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适合于这种新的实际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正确地运用这些全新的方法来认识已经变化了一切，以便实事求是地规定自己的斗争任务，并找到适应自己独特的现实需要的正确的前进道路。但是，要摆脱那些成功的经验和传统方法的强大影响，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实际本身往往超出了马克思列宁议论的乃至经验的时空范围，因而要找到一种可以现成搬用的分析模式和理论观点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而所有那些来自于书本的新的知识和方法能否有效地帮助共产党达到预期的目标，同样还要靠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具体的检验。结果，要想正确地了解已经变化了实际，并准确地制定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就成了一件异常艰巨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分析模式，高度重视自己传统的成功经验，并时刻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的共产党来说，这件事就更加困难了。

十分明显，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至少在上述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一向提倡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几乎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刚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日起，就重新开始面临着如何克服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影响的难题了。这是因为，随着民主革命逐步成为过去，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迅速到来，共产党人以往经过长期探索和种种挫折换来的指导民主革命的成功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到来，而出现的大量新问题。共产党人必须进一步到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那些现成的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而事实上，同他们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时期的情况一样，他们仍旧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和消化这些新的理论知识，他们只能现学现用，甚至模仿苏联的那些现成经验。以致建国几年之后，毛泽东就不能不再度提醒人们，不要照搬苏联的模式和经验了。

然而，防止照搬苏联其实并不十分困难，而要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思想来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就远不是那么简单了。作为一个曾经一再受到怀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一个长期受到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实践训练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不能不经常强烈地意识到捍卫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性的重大意义。多半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毛泽东还在新中国刚刚开始诞生的 1949 年，就明确告诫中国共产党人：马列主义在中国是完全的法则，完全适用，必须遵行，不能作任何修正，这是原则性。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机械地搬运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话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因此他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也要添枝加叶，即要有灵活性，否则走不通。但是何谓原则，何谓灵活，哪些算是枝叶，哪些算是根本，这仍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由于延安整风中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事实上取消了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党内重新形成了教条化、神圣化的倾向。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个人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距的人敢于标新立异，中国共产党才没有简单地重复当年所犯过的错误。但毛泽东一方面大胆地标新立异，一方面又最坚决地反对那些试图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进行修正的企图，不过是使得在 1949 至 1976 年间长达 27 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乃至只言片语，成了新的理论教条而已。所谓“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所谓“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再清楚不过地展示出共产党人这些年所经历的一幕幕悲剧缘何而来。很明显，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和囫囵吞枣，一方面经常深陷于某些理论观念的窠臼中难以自拔，一方面又经常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列宁的某些观点并把它们引向极端。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冲破莫斯科的教条奋斗了 20 年时间，才找到了一条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竟不得不在更长的时间里将自己置于新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阴影之下。此正所谓：“行百里者而半九十”。

一念之差百弊丛生

建国以后，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犯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呢？要在这里详细地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过于困难。但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因为把自己熟悉的阶级斗争看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灵丹妙药，以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化的条件及阶段的理论标新立异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其错误产生的一些原因。

比如，毛泽东明确批评列宁关于经济愈落后，它同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困难的观点，认为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他认为，从中国等落后国家革命的经验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因为“人愈穷，才愈革命”，“越富，

革命也越困难”。而生产力的问题，机械化的问题，在革命以后容易解决，重要的是人的改造，即人的革命性问题。事实证明，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现在革命十分困难，因为资本主义愈发展，生活愈好，那里的人们就愈不要革命了。因此，毛泽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观点不是不可以做一些修改的，例如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先进文明国家胜利的问题”，就应当加以修改。[25]

据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关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和革命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它必须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观点，不同意任何关于生产关系通常只是被动地适应或适合生产力，而不能人为地预先改造的说法。毛泽东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恰恰相反，首先赞成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也不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而是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和条件，就应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创造条件，而不是等到社会物质条件和阶级条件已经完全成熟，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到了旧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下的程度，再来进行变革与革命。在这里，由生产关系的变革所带来的能动的反作用，对生产力的发展显然有决定意义。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迅速过渡，是完全合理的。[26]

基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先于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毛泽东突出强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政治挂帅、政治决定经济、政治决定一切，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鼓励与思想改造，强调“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强调“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为此，毛泽东坚决反对斯大林等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物质刺激、技术决定论、干部决定论、分配决定论、唯生产力论等等，主张从“公”与“私”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与斗争，把破私立公作为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因此，他明确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以后又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适应与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矛盾与不平衡是永远的、绝对的，主张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通过“不断革命”来保持人民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情，通过大破大立来不断加速人心与社会的改造，并力图通过不断变革生产关系，造成“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组织结构，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27]

要依靠革命来促进生产，依靠不变大破大立、斗私批修来加速人心的改造，自然就要不断地为自己树立革命和批判的对象。因此，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要经过三个阶段的观点也颇表怀疑，提出：“究竟过渡时期包括什么阶段，要好好研究。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是既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呢？”显然，他并非完全不清楚马克思、列宁所讲的三个阶段指的是：第一，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革命转变时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时期）；第二，再从过渡时期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时期，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阶级已经消亡，但在分配上还存在着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那个的“半国家”时期；第三，再从社会主义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已经完全消亡，物质上极大满足，人的自由充分实现的共产主义时期。显然，毛泽东反对把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时期同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成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主张，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不应该分为两个阶段，而应当看成是

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共产主义不必包括两个阶段，相反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叫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个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叫做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28]

显然，如此划分是适合于他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学说和坚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的观点的。他明确认为：列宁关于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消灭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不同意说社会主义时期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批评斯大林过早地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和说什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只剩下了防御外部敌人的职能了。他断言：“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即使旧的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也还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无矛盾、无冲突，社会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这是不能想象的。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时期要贯彻始终，而无论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还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斗争都将长期存在，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地存在下去。[29]

敢于标新立异，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个性。但毛泽东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修正，根本上只是服从于他的阶级斗争经验并适合于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的。事实上，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来强化其阶级斗争观念，从根本上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的逻辑依据。但党内高度集中的一元化体制，使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一意孤行。他一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中与他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相一致的地方，一方面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某些观点进行任何一点符合实际的修改，甚至把那些敢于提出不同看法，或者只是表现出不相适应的党的领导人，统统视为“修正主义”而痛加贬斥。这种一面灵活，一面僵化；一面主张标新立异，一面却又把马列主义和自己的观点教条化的情况，在建国以后，特别是中苏两党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观点出现意见分歧以后，在毛泽东的身上就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了。

必须看到，建国以后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是有其思想渊源和政策基础的，并非一夕之功。远的不提，1948 年毛泽东就明确提醒全党注意，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将要成为主要矛盾。因此，他特别告诫党的领导人：时刻不要忘记阶级立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写到阶级问题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讲清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进城以后，毛泽东更是时刻不忘阶级分析，密切注意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国内，镇反、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集团”、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进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等等，无一不是娴熟地运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文化战线上展开革命。甚至加速农业合作化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发行运动，在毛泽东看来，也是为了在经济战线上开展革命，以便尽快消灭资产阶级。在国外，从反南斯拉夫、到坚决主张苏联武装平息匈牙利事件，以至为了英国共产党和苏共二十大关于“和平过渡”的设想而与之发生意见分歧，这一切同样是为了坚持阶级斗争的原则。

1956 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考虑资产阶级经济上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和苏联已有的实践，毛泽东一度不能不承认“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30]也一度同意过中共八大关于今后主要矛盾将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

说法，并且接连在几年的时间里力图在他所不熟悉的经济领域里运用战争和革命的经验实现“大跃进”。[31]大跃进失败的严酷事实并不能使毛泽东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与此相反，这反倒使毛泽东开始摆脱一切繁杂的政务，集中精力考虑阶级斗争的大问题。

自从 1957 年反右运动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就对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还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心存疑虑了。只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能够弄清楚他是否有能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出重要的修正。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后已经不再需要“革命”了，这对于一向宣称自己只是对一件事可以说有经验，“那就是阶级斗争、干革命”的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宣布说，阶级矛盾虽然基本解决，但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存在，资产阶级还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进而，他更宣布说，即使到了无阶级的社会，也还会有对抗性的矛盾，还要革命，君子动口也得动手，因为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永久动力。[32]这说明，毛泽东无论如何难以改变用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毛泽东到底还是不能同意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的说法，因为它毕竟妨碍毛泽东按照久已习惯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随着反右斗争的进行，毛泽东再度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现实的根据。他断定，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还未解决。不久之后，他推翻了中共八大决议中的说法，再度宣布阶级矛盾仍旧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一切又尽在经验之中了。

在公开的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过去的地主资产阶级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公开对抗的可能之后，重新宣布阶级斗争为纲，寻找敌人和发现敌人的阴谋就成了一件极其复杂，甚至是需要丰富想象力的问题了。毛泽东早就说过，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学生闹事可能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我们那些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对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心存疑虑，多半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33]

于是，“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观点被动摇了，一方面是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必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一切认识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社会矛盾、甚至经济政策、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统统可以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的思维逻辑渐渐成为党的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民的福祉与国家的强盛，反居其次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针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对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所造成的破坏提出的直率批评，不仅没有使毛泽东感觉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反而激起了毛泽东必欲加强阶级斗争的强烈意志。而中苏两党之间围绕着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更是使毛泽东越发感到保持自己特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代言人地位的重要性。

加强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坚持马列主义正统，反对一切试图从“右”的方面来修正马列主义观点的企图，导致了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任何意见分歧都成为不可能，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任何一点动摇，都有可能使人怀疑，毛泽东是否

完全正确，从而动摇他的正统发言人的地位和资格。

思想、理论、观点一旦被同政治的权威性联系在一起，就不免被纳入到政治斗争的轨道，最终形成“一言堂”。何况是在讲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年代。因为向马列主义故乡的各国党挑战而感受到马列主义正统性的强大压力的毛泽东，不可避免地会以他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一道政治分水岭，任何敢于怀疑毛泽东不正确，或与毛泽东所想所说不相一致（甚至只是因为毛泽东怀疑其不相一致）的党的领导人，从彭德怀、王稼祥、邓子恢，到彭真、刘少奇、邓小平等等，最终都只能被视为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言人乃至“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统统打倒之。

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公式化至如此地步，以至不仅要斗一万年，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仅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阶级斗争的方法看等并解决政治问题，而且把一切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统统归结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斗争的问题来认识和处理之，甚至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学说；不仅以人们对阶级斗争的态度坚决与否来衡量真假马列主义，而且以阶级斗争开展得深入与否和彻底与否作为评价整个社会和每个单位正确与错误、前进与倒退的唯一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毛泽东要为一切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大开绿灯，使当年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得以借尸还魂至登峰造极。

毛泽东何尝不喜欢“左”。在 1957 年准备开始进行反右运动时，他就曾经明白写道：那些有“左”倾思想和教条主义的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真正的教条主义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所以“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但党内“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4]

不难看出，正是自毛泽东开始，在主张革命、主张搞阶级斗争和主张改良、主张淡化阶级斗争的人们之间划了一条左与右的分界线，并把“左”倾定性为思想认识问题，抱之以明显的同情；而把“右”倾定性为阶级立场问题，抱之以极端的反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建国以来，宁“左”勿右及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竟至泛滥成灾。毛泽东谈阶级斗争喜欢强调百分比，下面就大打“右派”、“反革命”，极力凑数字，唯恐不积极；毛泽东喜欢高指标，下面就是饿死人，也要弄虚作假，取悦于上。中国虽未重演苏联斯大林时代肃反闹剧，大开杀戒，但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各种运动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竟至以千万计。而由此造成的亿万中国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造成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发展等各方面的损失，那就不是用数字能够计算得出来的了。

实事求是突破樊篱

同样是一个毛泽东，何以建国前和建国后有了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建国前的毛泽东更多地关心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不惜同那些自以为正统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而建国后的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形势变了，地位变了。

建国前，毛泽东只是一个在野党的领导人，他的面前有强大的敌人，他必须按照中国的实际，找到适当的方法，才有可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真正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政策错误的恶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建国后，毛泽东成了一个国家的领袖，除了境外那些处心积虑却又无可奈何的敌对势力以外，他几乎没有了对手。他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一切，决定一切，他哪怕只是一个号召，就足以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社会。因此，他显然感觉不到任何失败的威胁。即使是像 1959－1960 年那样饿死两千万人的惨剧，也不能使他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错误。他所关心的，只是如何能够创造一种制度，一种可以千秋万代地保持共产党的政权不变颜色的制度，把自己开创的江山永远地巩固下去。为此，他不惜进行任何翻天覆地的革命尝试和政治运动；为此，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一贯正确的形象，努力保持马列主义正统的化身，坚持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划线，不仅中国必须照此办理，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就是修正主义，就应该打倒并推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自然不复存在了。

建国初期，毛泽东也曾一度提出过要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在某些方面寻找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但这种尝试说到底，很大程度上仍旧是以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为基础，以列宁 1918－1919 年的观点为根据的。[35]因此它丝毫也不妨碍他在 50 年代后半期迅速走上反对修正马克思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道路，最终停止了这种实际上尚未正式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过程。以反教条主义起家的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竟然经验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并极力使之教条化、公式化，把中国共产党刚刚培养起来的敢于思考、敢于标新立异的优良作风扫荡殆尽，使“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甚嚣尘上，使宁“左”勿右的思维方法长久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遗害无穷。

显而易见，是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以我为主，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敢于修正，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不是刻意地以中国革命来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和观点。同样，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是因为作为党的至高无上的领导人的毛泽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教条化、公式化，不是以实践为标准，而是以理论为标准；不是力求理论适合于实际，实事求是，而是强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适合其理论观点上的要求，乃至作为其理论的试验场。从反右到反右倾，从到“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到毛泽东关于“不断革命”（以后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政治实践中去，运动的规模越搞越大，以至全国大乱，无休无止，党和国家蒙受了无以弥补的巨大灾难。

历史教训了人们。中止于 5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 70 年末终于又开始了。以 1978 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为起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决心全力扫除以“两个凡是”为特征的教条主义的思想倾向，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逐渐形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针和政策，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走上了一条既有别于马克思、列宁，又有别于毛泽东的前所未有的独特道路。这些方针和政策主要有：

一、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共中央重申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接受实践检验，以此来证明其是否正确的观点，强调不论什么人，任何没有经过初中检验的理论观点都不能被认为一定是正确的。毛泽东固然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但晚期的毛泽东却坚持把马克思、列宁和他自己的某些说法神圣化，不容任何反对或改变，从反对本本主义，到一切从本本出发。邓小平就此明确指出：世界天天在变化，新的事物，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关起门来不动脑筋，就一定要落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新的客观实际相联系，不接受新事物，就一定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发展就没有生命力。他断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让思想接受实践的检验，大胆地试，错了就改，对了的就坚持。与此同时，在与各国党的关系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一反毛泽东前此把一切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的兄弟党统统斥责为修正主义的作法，明确承认："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因为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事情很清楚，既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生搬硬套套俄国革命的模式，我们又能什么理由要求别的国家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模式或俄国革命的模式呢？中共中央的这一作法，充分反映出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实践，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

二、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坚持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准来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坚持"拨乱反正"，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否定了毛泽东前此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党和全国的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来。很显然，"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和"一大二公"为目标，这是毛泽东将近 30 年社会主义实践最为看重的一笔，而邓小平却对此给以明确的否定，说:《近 30 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因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坚决地提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为此，必须重新提出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以迅速发展生产力当作我们今后一切工作的中心，横下一条心，"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清楚地说明他们决心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决心首先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而不再像毛泽东那样以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化，来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否。

三、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打破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现存的生产关系，建立适合于生产力迅速发展需要的新的生产关系。与此同时，必须大规模地吸引投资，迅速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并且还必须极大地改变马克思、和毛泽东等原有的生产观念和消费观念（诸如认为第三产业不

创造价值和不了解消费对生产的积极作用，甚至把消费更多地看成是一种浪费等等），广泛开拓新的生产渠道和新的市场。这一切都需要打破毛泽东时代那种闭关自守的状态，积极引进国外的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引进外资，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运作方面的一切长处，即需要改革和开放。显然，无论是借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其经营方法来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还是把社会主义的国家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开放，这些都大大超出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原有的设想。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从实践的标准和生产力的标准出发，相信：改革开放是迅速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必须的，凡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经济操作方式、增加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所必须的，凡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与经济操作方式，不论其“大”与否、“公”与否，一律必须改变；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科学技术、管理、经济理论乃至消费方式，不论姓“社”、姓“资”，都应当引进。邓小平的观点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现在还很穷，因此“现在虽说我们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而要快实现尽快实现这一目的，只有改革开放，除此别无出路。这种方针，无疑是一种创造。[36]

四、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要搞社会主义，这是新一代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相一致的地方。为此，中共中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但究竟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什么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这仍然要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和规定。毛泽东所说的党的领导，是以党代政、个人决断、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率一切的“一元化”，新一代中共中央则明确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集体领导、多党合作、经济先行的新体制；马克思、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纯粹共有、没有商品、货币，更无所谓市场，完全按劳分配，一切有计划发展的理想社会，远不是我们今天所能达到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承认货币和商品的部分属性，毛泽东只是在斯大林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商品的存在，但斯大林概括的公有制（以国有化为基本标志）、计划经济（以排斥市场作为基本要求）、按劳分配（以平均主义的“铁饭碗”、“大锅饭”为基本特征），几十年来一直被共产党人视为社会主义的三大属性。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则从实践中认识到：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究竟何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并没有搞清楚。

但至少，第一，公有与否，以及公有的比重多少，与社会主义没有本质的联系。公有制应居于主导地位，但公有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所有。毕竟，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从没有把国家所有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过。并且，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只是社会所有或共同所有，即共产，而非公有。当然，所有制本身仅仅是实现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我们未必要拘泥于马克思的某种设想，但不顾实际条件，为公有而公有，更是极端错误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究竟搞什么样的所有制，关键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不一定非要过渡到国有制，而以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三者结合的股份制，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私有、外资同样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并服务于社会主义。

第二，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它们归根到底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反映社会制度的基本属性，从而彻底否定了前此以主观计划取代市场机制、限制市场作用的传统经济模式，为全面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拓了道路。

第三，按劳分配不是“铁饭碗”、“大锅饭”，甚至不等于工资制，而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动者多得“食”，甚至少能力者少得“食”，少赢利者少得“食”，而能力多者、赢利多者，则多得“食”。即打破人们前此关于社会主义就是经济上绝对平等的传统观念，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起来。

显而易见，新的中共中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有着十分独特的看法，这使得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人民民专政以及党的领导等等，都有着明显地区别于前人的理论说明。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说明尽管还不能完整准确地说明究竟我们今天的和未来应当建成的社会主义究竟应当怎么一种情形，但它毫无疑问已经大致勾勒了一个粗线条的图画，并打破了人们过去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些理论误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而这既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出发的，因而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的，因而又是明显地具有中国特色的。

不难看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其实践的标准、生产力的标准，十分明显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改革开放的方针和力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又明显地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实践，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所进行的修正和创造。这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且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经过了种种曲折和反复之后，终于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创造性思维下，得以再度向前延伸了。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历史性课题。它不能不经历种种艰难曲折，并仍将可能经历新的艰难曲折。只要马克思主义仍旧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只要人们对什么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等众多政治理论问题仍旧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那么，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对于这种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否应该去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和应该怎样具体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争论以至斗争。争论的实质，其实还是一个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诸如 40 年代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适合于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南，它不受任何国家和民族的限制，因而不存在因国家和民族的区别而国家化、民族化的问题，不存在因为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的不同而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进行必要的修正乃至创造新的观点的问题。因此，他们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不科学，甚至迫使毛泽东将他创造的这一概念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37]，力图以此来限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思维，阻止其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思想将信将疑的人，诸如过去和今天一些有“左”倾思想的共产党人，相信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愿意把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来，原则上也同

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但是，他们同样怀疑是否有必要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他们本质上其实同当年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一样，更多地关心的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是否适合于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某些理论观点，反对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实践的和生产力的标准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观点进行某些必要的修正，使之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说到底，他们同样也是反对在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书本面前独立思考、标新立异。

然而，自有马克思主义以来，整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都已经清楚地证明，如果马克思主义要想具有政治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个国家是按照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发展进程和革命方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且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是完全相同的。不论马克思怎样断言“工人没有祖国”，不论列宁怎样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共产党情报局怎样反对所谓“民族共产主义”，无论胜利的还是没有胜利的宣布代表各国工人阶级的共产党人，事实上都很难甚至不可能完全离开他们自己国家的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考虑问题。同样，时至今日，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不能不站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根据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使当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的具体解释千差万别。相反，那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模式化，那种试图把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统一在一种格式下，反对民族化的努力，如当年共产国际批评毛泽东、九国情报局反对南斯拉夫之类，结果证明都是失败的和毫无意义的。只要存在着国家和民族的区别，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不同的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背景和环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将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现象，就永远不存在一个对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适用的理论模式。邓小平说得好：“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自改革开放以来，明确对过去一度用一种模式去批评别的党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先后同那些受到过自己批判的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乃至社会党，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关系，尊重各国党和各国人民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去寻找道路和解决问题。[38]

与此同时，整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还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变化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事实上，不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以及邓小平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和条件有极大的不同，因而影响到他们对许多具体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他们自己的思想本身也有着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以致影响到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归纳和领会他们的思想的进修，经常出现关于早期马克思与后期马克思、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思想的对立和争论，甚至出现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打语录仗”的情况。事情很清楚，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条件和环境的的变化，从而不能不决定着人们思想和主义的某些内容也要相应地有所改变。如果人类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到马克思就可以终止不变了，那又何尝会有列宁主义？如果列宁主义走到了人类认识的顶峰，那又怎么会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变化是正常的，相反，不变化却是不正常的。时间在变，世界在变，环境和条件都在不断地改变，把我们的思想、主义固定起来，僵化起来，不能怀疑，不能修正和创新，只允许一种解释、一种声音存在，这不仅是对人的思维权利和人类思想进步的阻窒，而且只能是使共产党在变化的大千世界面前失去应变的能力，从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自马克思主义诞生 100 多年来，人类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已经远远超出了马克思

当年的预想，甚至已经极大地不同于列宁和毛泽东当年的认识，要么共产党人否认自己搞的是社会主义，要么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创造出一种可以解释现实并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新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二者必居其一。生搬硬套老祖宗是肯定行不通的。而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必然的也只能存在于共产党人的独立思考中、存在于他们的标新立异中，存在于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中。中国共产党人的改革开放，他们对社会主义内容和本质的新的说明，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根据中国具体实际的需要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灵活的应付之策，正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的关键所在。

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由之路。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革命就要失败，建设就要受挫折，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过去的胜利，才可能有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今天的巨大成就。

在这里，需要再三说明的是，第一，把理论联系实际仅仅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地应用于实际，从某些理论原则出发，努力使实际服从于理论的需要，绝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晚年也谈论理论联系实际，但他更多地只是从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出发，坚持要把中国的实际乃至各国的党统统纳入到他的理论轨道中去，并坚持以此来评判真假马克思主义，结果一步步走向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二，把理论联系实际理解为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随心所欲地从所谓“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也是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的。实际要靠人来认识，离开正确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客观实际仍旧难免被主观歪曲。晚年毛泽东也看重实际，主张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但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理，片面地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人的精神和主观意志的作用，夸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作用，从而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在估计上发生严重偏差，错误地了估计实敢际，结果是错误地选择了严重违反客观实际的方针和政策。

第三，仅仅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而不敢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不敢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从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出发，大胆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达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要求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精神，没有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的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如果不敢向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大胆地否定前人的某些观点，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代中共中央如果不敢大胆地否定毛泽东的错误，修正和发展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学说，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又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同时更要坚持独立思考，标新立异，敢于大胆地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使之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为此，共产党必须吸取毛泽东高度集权、大搞“一言堂”的沉痛教训，大踏步地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以便创造一个民主、宽松与团结进取的政治氛围，使思想理论问题

的探讨和争论成为一种正常的现象，为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为进一步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客观实际的需要密切地结合起来，而集思广益。

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并且必须相应地变化和发展。在苏联等国家共产党政权相继解体，社会主义实践纷纷失败的国际大背景下，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大胆实践，大胆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并努力去探索去实践去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前途之可言。

----

[1] 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 2 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中文版，第 643－645 页。

[2]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中文版，第 178，389－390 页。

[3] 《中国共产党党纲》，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 年 11 月，《中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49－3550 页。

[4]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 年 1 月 19 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 年 8 月 13 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32 页。

[5]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 8 卷第 5 号，1921 年 1 月。

[6] 在陈独秀 1920 年的文章当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过这一观点。见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 8 卷第 3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 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558 页。

[7] 见《先驱》创刊号，1922 年 1 月 15 日。

[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1922 年 6 月 15 日，《先驱》第 4 号，1922 年 6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99－117 页。

[9]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５８９－５９１页。

[10]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11]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２册，第１２１页。

[12]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5 年版，第５８页。

[13]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１卷第１０期，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０日。

[14]《 秋白给国际的报告》，１９２８年2月8日。

[1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１９２８年6月２９日。

[16]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８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第 299－300 页。

[17]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９５页。

[18]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6 卷，第 652 页。

[19]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１１９页。

[20]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１９３９年版，第４－５页。

[21] 《张闻天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８２页。

[22]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１９３９年版，第４－５页。

[2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５００页。

[24]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１１页。

[25] 参见《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195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

[26] 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见于《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 年 2 月 19 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

[27] 毛泽东对于斯大林和苏联人在这些问题上的批评，以及他对政治挂帅的强调等，大量散见于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如《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

[28] 关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划分问题，最早见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此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此进一步分作三个部分作了更为详尽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1，99 页；《列宁全集》，第 25 卷，第 446－461 页。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见《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

[29]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国家职能问题的论述，见前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可见《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2 年 8 月 6 日，8 月 9 日，等。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卷，第 245 页。

[31] 毛泽东对经济问题、生产问题的陌生，通过他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而表露无遗。

[3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 年 10 月 9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卷，第 326 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978 年版，第 331－332，333－335，336－337，351 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卷，第 460－470 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67－288 页；《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858 年 5 月 17 日。

[36]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3，133，278－279 页。

[37]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显然是毛泽东在苏联人帮助修改出版《毛泽东选集》时，出于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的顾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在文字上所做的违心的修改。参见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 57 期，1938 年 11 月和《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34 页。

[38] 《邓小平文选》，第 278 页。

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

——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

１９９５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年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一次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及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１９９７年１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本来，“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种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二十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1]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保持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建国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发展轨道，不可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内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１９４５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极力主张新民主主义，接着又迅速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不论我们怎样认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有一点是不能不了解的，那就是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缘起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１８８２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象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2]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２０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欧洲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象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１９２０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

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3]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一九一七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4]。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一九０五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１９２３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距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

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5]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6]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他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7]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一九０五年，而非俄国的一九一七年。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地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１９２５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目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１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上与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一九０五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8]。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根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9]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１９２６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０”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

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一九一七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10]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一九０五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１９２６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11]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的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运命”。这样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１９２７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即使革命胜利，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12]

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是要承认，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十分明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一九０五年的中共领导人，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一九０五年，而只是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他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象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那样要等十二年的时间，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13]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明确讲：“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

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０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14]

为了一步成就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义。它之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１９１７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作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两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15]

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是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16]，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做了具体的解释。

１９２８年６－７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17]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

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

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一九０五年。即使俄国１９０５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

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18]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当中。决议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能够决定”。[19]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着，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20]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１９３０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须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21]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得不接连组织力量，分门别类地制定了１０个以上的有关中国苏维埃各种政策的决议和文件，以具体规范中共中央的理论思维。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第一次做出了详尽的指示。

来自共产国际的决议显然不反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包含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说法。它声称：中国革命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于它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的成分不同，它不仅没有联合资产阶级并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是在同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中国的民主专政必将没收那些属于中外资本的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民主革命将不得不采取一些极其重大

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步骤。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强大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在国家政权上顺利地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而且可以通过与贫农群众的联合影响农民支持一切必要的过渡措施。因此，中国革命在许多方面已经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前提条件，它的胜利，自然会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并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间。

但是，与李立三不同的是，决议强调认为：中国社会自身的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决定了它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要比俄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经过更多的过渡阶段；决定了中国革命后不能立即把资本主义从社会关系的所有方面排挤出去，特别是在农业方面消灭了封建压迫与剥削之后，资本主义必然会表现出相当的发展趋势。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因此，一切非资本主义的过渡措施，必须努力同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相一致；一切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的步骤，应当考虑到各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区别、农民群众组织与觉悟的程度，以及宗法氏族和其他陈规陋习的影响，避免使无产阶级脱离自己的同盟者。同时，共产党应当通过革命的政权机关利用其所取得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地位，为发展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逐步创造优越的条件。它们可能需要通过下列步骤才能达到，即没收外资；没收一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企业和资本；将土地、水域和灌溉设施等收归国有；对各种企业实行监督；逐步推动劳动者实行合作化，进而根据自愿的原则在国家帮助下实行集体化；利用制订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使国家日益增强其经济实力，等。[22]

一方面继续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步骤，一方面强调物质的和经济的条件将极大地制约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因而要求中国共产党了解，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多少是一种进步。它至少没有像以往一样简单地凭借主观愿望和所谓力量对比来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决议甚至第一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步骤以及生产方式的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解释，肯定了它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从而使人们可以比较具体地去设想：在未来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可能存在着一个以创造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为基本目的的、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是，这是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呢？没有人能够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一年以后共产国际也只是把这个“过渡时期”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了某种程度的区分。这种区分固然未必等同于列宁过去关于“间接过渡”的观点，也不同于布哈林关于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革命的一九０五年的说法，但共产国际至少同意说，即使是中国的工农民主专政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迅速转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逐渐为中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

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无疑可以看作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具体实践这种“过渡时期”在政治上的一种尝试。然而，把社会革命的目标和任务纳入民主革命轨道本身对苏维埃运动就是致命的，人们没有可能把政治和经济区分开来。彻底反对一切剥削阶级，包括反对和排斥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极端倾向，不仅使苏维埃政权在与比它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事机器的尖锐对立中，无法取得苏区以外的任何助力，而且使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也经常处于异常紧张的状况。到１９３１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之后，由于四面出击所造成的弊端就更加明显了。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放弃苏维埃革命的方针，充其量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强调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承认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段过渡时期，还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之“新”，一个关键问题是领导权。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可以由国民党来领导，而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使之区别于旧的民主主义革命，强调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的。因此，新民主主义说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环境下，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需要的产物。毛泽东确信，只有提出新民主主义，才有助于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斗争，才有助于推动中国战后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领导权问题是由共产党放弃苏维埃革命，以承认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实行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为代价实行国共合作而引起的。

依据现实的利益需要改变苏维埃革命的路线，最初是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事情。鉴于苏维埃革命的极端政策严重地损害着共产党人的生命力，在当时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变“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的提议，毫不犹豫地开始全面修正自己的阶级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提议，给予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切实保护小资本工商业；欢迎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来苏区投资设厂；停止没收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允许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工作；不再以社会出身来限制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等等。随着中共中央进一步宣布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愿意停止自己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斗争，和重新肯定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革命的动力，富农乃至地主都可以是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国际前此规定的各项苏维埃革命的重大使命都已经根本取消了。[23]用不着用苏维埃政权去代替国民党政权了，用不着去反对地主富农乃至资产阶级了，用不着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和资产阶级的产业了……，也就是说，无论是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等等，统统都改变了。其结果，不仅是“工农苏维埃”不复存在，就是“苏维埃共和国”本身也都失去存在的意义。１９３６年8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政府讨论苏维埃和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１９３６年8月１５日，共产国际发出政治指示，委婉地同意放弃苏维埃的名义，提议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主张在普选基础上召开中华全国议会和成立中华全国国防政府”，而苏区将愿意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入这一统一的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华全国议会，并准备在自己区域内实行适用于全中国的民主制度。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拥护，它甚至断言：这“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它“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24]

不过，从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民主共和国还只能是斗争的口号而已。１９３７年2月１０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明确表示愿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及“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

的彻底的民主制度”。随后，中共中央在与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中正式表示了“拥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的态度，两党谈判很快取得实质性进展。[25]根据９月间达成的最后协议，原苏区政府和红军从此正式成为南京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统辖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结果，至少在形式上，共产党１０年流血牺牲力图推倒的国民党反成了中国领导的和支配的力量。

这个时候共产党的武装只有４万余人，根据地只有陕北一隅之地，与国民党大约１８０万军队和遍及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范围形成鲜明的对照。力量对比的严酷现实，是促使共产党作出如此之大让步的关键。不管中共领导人怎样在内部强调：“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国民党是过渡的”，合作之初，他们并没有看出在短期内有改变这一力量对比的现实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不承认：“目前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种情况不仅会继续下去，很可能还会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也就是说，国共两党不仅要共同抗日，而且要准备共同建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国民党可能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照毛泽东的估计，很可能“中国在此长期抗战及建立民主共和国期中，谈不到社会革命问题”，只能努力争取“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为此，中共中央只能把自己的斗争目标确定在：“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承认蒋介石国民党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这使得共产党人在设想未来这个“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上不能不大伤脑筋。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中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非资本主义的，但有谁能够保证蒋介石国民党会按照共产党人所指引的这条道路走下去呢？毛泽东深知其中利害。他明确提出，第一，必须努力使党和红军逐步发展壮大居于实力领导地位；第二，必须设法改造国民党。毛泽东估计，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未来的中国可能不需要来一个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因为“中国可能和平的走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和平的过渡方式可能需要经过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包括从工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转变到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再转变到工农民主联盟。面对现实，他坦然承认：“由南京占优势到延安占优势，这须要长的过程，这依靠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一可能一蹴而就。重要的仅仅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非资本主义前途”。[26]

关于国共长期合作、共同走向民主共和国的设想，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的政治报告中有着清楚的说明。毛泽东明确肯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是长期的，这种长期的合作应该并且可能决定着战后两党的共同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至于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具体内容，概括言之，“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具体言之，就是：“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于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

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比较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共产国际帮助修改通过的具体解释三民主义的宣言，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对于抗战胜利后准备建立的这个“三民主义共和国”的设想，是相当温和的。他这里对民族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反帝内容；其对民权主义的说明，由于考虑到国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没有明确的限制反革命分子和组织的权利的内容；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说明，同样由于考虑到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关于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之中外企业收归国有，节制资本、分配土地等内容。[27]

可惜，即使对这样一种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的合作建国方案，蒋介石国民党也绝难接受。因为，蒋介石不仅没有与共产党共同建国的愿望，而且根本没有与共产党团结合作的愿望。蒋介石与共产党妥协，只是时势所迫，被迫“容纳”。因此，“容纳”之后，他仍就是要设法削弱共产党，或者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28]，而共产党又必欲发展壮大，双方之间的磨擦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国共合作不过一年半，也就是在中共中央公开提出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建议之后不久，国民党为防止共产党力量扩大的有计划的“防共”“限共”的各种措施就纷纷出台，并付诸于实践了。国共双方的关系迅速开始恶化。共产党人自然也开始逐渐对原先改造国民党的设想失去信心，对他们刚刚确定的争取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方针发生动摇。这种情况必然要促使他们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前途重新作出革命的估计。

１９３９年５月，共产国际根据英国驻华大使秘密出面“调停”中日战争和国民党忽然加紧“限共”、“反共”活动的情况，判断英美正在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提醒中共中央谨防国民党妥协投降的危险性。[29]鉴于１９２７年国共关系破裂的沉重教训，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断言这是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确信国民党的主干是资产阶级，因此，它相信，国民党的投降反共也是不可免的。据此，中共中央一面继续强调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是“党的基本任务”，一面已经判断地主资产阶级必然叛变，国民党必将分裂，“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就必须“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大会那样解释”，使之成为“真三民主义”，一方面以此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相对抗，一方面则准备使战后中国的政治前途迅速按照共产党的意愿发展。他由此开始断定，战后一定会出现一个“革命民主政权”。[30]

要确定地相信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能够成为重要的决定力量，这在国共实力对比极其悬殊的１９３７年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差距已经开始缩小，但共产党还缺少巩固基础的１９３９年，也还是颇为困难的。然而，在１９４０年，当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从１９３７年的４万余人发展到将近５０万人，它的根据地已经从陕北一隅之地扩大到整个华北敌后地区，中共有了稳固的发展基础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１９４０年２月，毛泽东明确告诉外国记者：与国民党战后合作的问题今天还谈不上，除非将来国民党能够同意“实施我们的纲领”，“否则就有困难”。其实，中共这时所设想的战后建国纲领的主要内容，仍不过是政治上民主自由，经济上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人工资、地主减租减息，即实行民主政治、保证工农群众合法权益之类，它甚至仍准备承认外资并保护其权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低水平的建国主张，他们认定国民党也是根本无

法接受和做到的。因为他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既不想与共产党合作，也不想实行扶助工农的政策。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具体系统地形成有关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相区别的观点，但他关于“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分，已经显示出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在形成之中。[31]

终于，共产党人开始放弃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的目标，重提共产党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了。只是，他们这时对于这个“民主共和国”的认识，已经与前大不同了。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果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而在今天，当世界已经划分成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即使无产阶级还不能独立的承担起革命的领导责任，它也必然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并且必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中国革命必然要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起“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国家，这个国家既不同于已经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它必然是“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那么，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将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与特征呢？毛泽东指出：第一，“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从而必然要形成“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第二，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并实行由国民大会到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区民大会，乃至乡民大会等各级大会选举政府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充分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实现“民主集中制”。第三，它将在经济上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一方面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为国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方面“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同时并不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2]

概括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说明，不难看出他所谈论的新民主主义，很大程度上仍是根据前此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而来的。比如，他关于世界已分成两部分，中国革命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观点；他关于中国必然走上新民主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是因为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是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但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而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观点；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任务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一方面要将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大银行、大工业收归国有，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另一方面“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显然都可能从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和共产国际的相关指示中找到说法。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他明确讲：他“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当然，反复谈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过渡这一话题的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没有谈到，也不曾设想过这种“过渡”本身是否会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式。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贡献显而易见。他的新民主主义观，最引人注目之处也就在于，它明确指出并肯定，民主革命胜利后会建立一个与统一战线相适应的，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虽然是“过渡的

国家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一种国家形式”。在这个社会和国家中，不仅“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且“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33]

这还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设想的那个“三民主义共和国”吗？当然不是。无产阶级起主要领导作用；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各级民众代表大会选举政府的民主集中制；将大资本收归国有及没收大地主土地，等等，无一不是表现着共产党的意志和特色。那么，它是不是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工农苏维埃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呢？自然也不是。它仍然是统一战线的，是肯定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是主张联合除了反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外、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中间势力的，是强调对社会上一切抗日的人民实行普遍平等、民主自由的，是主张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强调要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的。中共中央此后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提议设立的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即所谓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清楚地表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确实没有超出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也许更接近于国民党一大时所宣布的那个纲领，也就是毛泽东再三强调的那个“真三民主义”。

当然，毛泽东理想中的新民主主义是以突出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和参加领导为特色的，是以寻求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前途为目标的。在这一点上，新民主主义的阶级意识相当鲜明。因此，我们似乎不能简单地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的过程，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发挥的过程。１９４１年9月，毛泽东和王明之间围绕着《新民主主义论》曾经爆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核心就是该不该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这场争论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确实是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的。这也就难怪，自他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以来，他就明白宣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当政之时，中国的问题就“不能有彻底好转”。真正的彻底的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34]

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俄国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曾经详尽地解释过中国革命所应经历的不同政权阶段问题。据他们说，第一个阶段应当是“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时期，实行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二个阶段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必然要转到反革命营垒去，就会进到工、农、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不大可靠的和动摇的”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将脱离革命，自然就会开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联合专政的阶段，即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最后一步社会革命到来，大部分农民退出革命，无产阶级单独掌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就开始了。[35]

按照斯大林有过的解释，中国革命早在１９２７年就已经经历了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了。如今，尽管否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作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显然仍旧不出“全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范围。而他所以强调未来国家政权还只能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四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自然还是对当时的力量对比深思熟虑的结果。注意到毛泽东这个时候发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谈到未来政权的领导力量时，还只能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种不十分有把握的措辞，几年后即将此段大加修改，

删去“或参加领导”的字样，加上新中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这种毫不含糊的语句，不难看出他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虽然有志于取代蒋介石国民党，但考虑到革命的阶段性，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他对斗争目标的设定仍相当谨慎。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敌后根据地陷于严重困难期间，我们甚至看到，毛泽东要国民党代表转话请理论上已经被排除在统战对象之外的蒋介石放心，说：共产党主张“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至于社会主义，中国绝“不会在英美德日之前，而会在他们之后”，因为“现在无条件”。[36]

在渡过了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一段时期之后，特别是看到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军队发动的新攻势面前一败涂地的惨状，长期坚持敌后并深受新民主主义前途鼓舞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更加鄙视，相信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恰在这时，美国官方通过派遣观察组等形式表示了对共产党力量的重视，这自然激起了毛泽东决心打破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强烈愿望。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当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向毛泽东透露美国政府有意促使国民党放弃一党统治，建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的领导人对提出这种等于公开否定国民党政府正统地位的斗争口号是否明智，还十分踌躇。直到联合政府的口号一炮打响，毛泽东才转而承认自己估计不足。[37]

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越是接近抗战胜利，毛泽东就越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现革命的变化。因此，联合政府的口号未必是共产党人最理想的选择，毛泽东就明确讲，它其实还只是一个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但是，至少两大因素制约着共产党人提出更为激烈的斗争口号和斗争目标。第一仍是力量对比。比如毛泽东在谈到目前还不能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时，就明确讲过，“日本人还在前面”，“外国人还要他”，“群众还未觉悟”，“他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如此等等。这就如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当初犹豫要不要提出联合政府口号时的情况一样，不管他们怎样看不起蒋介石国民党，具体比较起来，他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哪怕只是革命的色彩浓了一点，力量对比就肯定对自己不利。第二是理论制约。毛泽东是熟读过列宁的《两个策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的。他很清楚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的道理。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断言既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毛泽东所谓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无条件”，所谓英、美、德、日将会走在中国前面，根本上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因此，还在１９４４年８月，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向来访的美国记者许诺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只是自由主义的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为了与美国的合作，共产党人还考虑过要不要改变自己的名称的问题。所有这些，说到底都是为了“中国必须工业化”这个目的。因为他们这时相信：“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38]

列宁《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的论断，对毛泽东这时的影响甚大。抗战胜利在即，毛泽东对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取得部分政权，充满了渴望和信心。但在统一战线政权下，如何制定正确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政策，不致重蹈苏维埃革命时的复辙，对于毛泽东还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联系到１９４８年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多次要求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请教有关建国方略的各种问题，不难想象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可能是怎样一种心态。他这个时候突出宣传战后中共不会改变民主革命的要求，转向社会革命，多半就是从争取统一战线的宣传需要和列宁现成的理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１

９４５年３月中旬，他甚至在与美国外交官的谈话当中明确表示，共产党人没有马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计划。“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39]

断言在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会有一个“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如同相信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一样，明显地区别于毛泽东５年前开始提出新民主主义观时的说法。在５年前，毛泽东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还是突出强调“国营经济”的，对“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仅仅以“不禁止”三个字说明之。而如今，他不仅泛泛强调资本主义要“广大发展”，而且确信中国的工业化必须要借助于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生长和外国资本家的投资，断定新民主主义阶段将不可免地要有一个以资本主义私人经济的发展为特征的漫长时期。对于这种变化，在随后举行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了一定程度的解释和说明。

毛泽东在内部报告中明确承认，新的提法“与《新民主主义论》是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虽然也强调要有三种经济成分，肯定“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但重点在于强调私营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为什么要强调“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呢？从毛泽东说明的理由看，首先还是一个力量对比的问题。他强调说，国民党“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因此，即使是联合政府，也仍然存在着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他给我们官做”；“第二种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第三种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军队发展到一百五十万以上，人口一万五千万以上时，政府设在我们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而且还要准备不得已时“委曲求全”，接受第一、二种可能性。毛泽东所以突出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太急”，务必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坚持统一战线，并许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绝不会超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要求，这不能不是考虑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当“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对中国战后政治进程影响极大的美国人表现出种种疑虑的时候，从孤立蒋介石国民党，促成国内和国际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考虑，具体地说明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宽容态度，解除中间势力的疑虑，争取他们的支持，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党提出任何一种政策策略主张，通常都是要找到一种理论依据的。在这方面，毛泽东也绝不例外。他关于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反而要提倡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观点，很明显从列宁那里来的。从毛泽东在他的报告和说明中多处提到和复述列宁在《两个策略》中的论述，可以确切地知道他这时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列宁的这篇著作。

列宁的《两个策略》写于一九０五年革命前夕，它着重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的幻想，突出强调了俄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资本主义太少，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扫清道路，才能迈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理由。毛泽东以此为依据指出，我们党内许多人

其实就存在同俄国民粹派一样的思想，“左”得要命，主张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显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列宁“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40]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说明中，对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好处和它的必要性，却并无深入的解释。他关于“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说法，主要只是援引苏联的例子。那意思是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更何况中国？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且还要“广大的发展”，他可以称之为解释的只有两点，一是说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是说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社会向前发展有益，因此“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至于为什么需要大量的资本主义，它究竟如何有益社会，如何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没有说。[41]结果，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观点讲是讲了，究竟有多少人理解了，却是一个问题。

“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深入解释清楚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理由，严格说来同列宁的那本《两个策略》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有一定关系。

通观列宁的《两个策略》，其中关于俄国为什么需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的解释，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说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俄国的任何一种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即使是最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比如说通过群众起义建立起工农民主专政，结果也“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至多只能实行民主主义、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开辟道路，“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二是说俄国“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为俄国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工人的解放必须经过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残余，对无产阶级绝对有利。

列宁的上述解释中明显地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他关于资本主义是必由之路，即所谓“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

己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说法，与在中共党内早已深入人心的有关“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列宁关于即使实现工农民主专政只能实行平分土地、改善工人生活水平，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不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说法，同样不符合自１９２３年以来共产国际就反复强调的，民主革命要将一切有独占性质和规模过大的中外企业收归国有，从而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观点。第二是他仅仅强调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对于工人觉悟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丝毫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俄国社会的当前和未来，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意义。对于主要依靠组织教、育和提高农民就取得了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对整个资产阶级公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训练和教育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很难理解的。

利用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便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这不仅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说立身之本。因为新民主主义说之所以成立并具有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从而明确肯定了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到逐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条件下，补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这一课，并稳步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补课的必要性问题，事实上没有解决。

客观地说，毛泽东未能深入地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确实有一定的原因。这首先在于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毛泽东从未跨出过国门，除了２０年代初一度在湘赣边做过工运之外，他２０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农民打交道，对何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它与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联系如何，确像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陌生得很”。仅仅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了解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是很难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在推进人类文明程度，以及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有深切体会的。其次，马恩列斯系统论述过渡问题的著作就少，直接谈到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著作更少，除了列宁早期的一些著作以外，系统论述这方面问题的几乎没有。再加上过去革命程度距离过渡问题还远，注意收集不够，因此，从已知的情况看，毛泽东这时利用来做他新民主主义过渡说参考和指导的著作，多半只有列宁的《两个策略》，再有也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42]但无论是《两个策略》，还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不仅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讲透，而且还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自然也妨碍了毛泽东对问题的认识。随着抗战胜利，内战开始，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问题迅速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首先受到考验的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广大农民强烈地提出了土地要求，１９２７年曾经遇到过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出现了。当年，由于两湖地区大批获得解放的无地少地农民不顾一切地掀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曾经导致了统一战线的严重破裂。如今，绝大多数刚刚解放的农民不满足于共产党抗战中实行的较为温和的减租减息政策，甚至不满足于中共七大刚刚提出的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强烈地要求平分土地。要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须准备承担像１９２７年一样的民族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口号，准备“资产阶级跑掉”。[43]

紧接着，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入自己手中，既要满足下层工农劳动群众的强烈革命愿望，同时又要保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又成了一个极端困难的问题。按照新

民主主义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曾接二连三地发布指示，纠正基层组织各种打击侵害工商业者利益的“左”倾政策，“反对‘左’倾冒险主义”。他们甚至再三提醒全党注意：“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毛泽东也一度公开批评了在党内和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工农群众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称其为“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44]

但是，自从１９４６年４月毛泽东出于夺取政权的需要，开始认真研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后，他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从他在这部系统论述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著作中几乎所有写有“革命”、“消灭”、“暴力革命”的词组和段落旁边，用粗笔一遍一遍地划杠圈圈的情况，不难看出即将取得全国政权的他对列宁所强调的来自资产阶级的反抗充满了怎样一种战斗的渴望。其实，从反复读过多遍的《两个策略》之后，毛泽东就已深悉列宁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两个策略》一书中关于资产阶级天性妥协变节、关于对资产阶级同盟者应当“犹如对敌人一样”、关于愈能在民主革命中排斥资产阶级民主派对革命就愈有利的说法，几乎比比皆是。在蒋介石国民党还是强大对手的情况下，毛泽东对资产阶级还多所顾忌。随着蒋介石国民党大势已去，无论从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从俄国革命经验的角度，毛泽东很难不注意到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大成者列宁所留下的这些充满火药味的经验之谈。毕竟列宁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前途“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决性”。[45]

强调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１９４８年中共中央８－９月间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了。看来绝大多数人只是很勉强地接受了关于只有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经营商业、发展工业，我们有什么必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做这一切？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确信不移，由于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接收了大批官僚资本，建立起占国民经济比重１０以上％的国营经济，他们完全有可能用各种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来阻止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至少，我们现在必须设法限制那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营。比如，人们开始怀疑“保护工商业”的口号是否正确，因为如果说资本主义工业还有些发展生产的作用，纯粹投机倒把性质的资本主义商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同样，私人性质的银号、钱庄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为什么不能全部由国家接管过来？另外，我们不要把国家的钱贷给资本主义企业，去帮助它们，而应设法使它们转移到国家的手里来。总而言之，不少领导人相信：“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来，而后再去打倒他”。我们应当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而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能立即消灭，也不应当帮助它来发展。

通过大批没收国民党官僚资本，使自己能够如此顺利地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国营经济的基础，这对于大多数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出乎意料的。毛泽东坦率地承认他开始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设想时还不清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因而缺少了没收官僚资本一条。直到１９４７年年底才意识到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到领导地位上来了。再加上农民的合作社经济，按照列宁的理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即是跟社会主义走，它本身也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了。因此，毛泽东在九月中央政治局会上开始说：现在就应该讲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了，尽管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但应看到，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经济体系。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人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特别是在多大程度上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上，开始发生微妙的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刘少奇在九月会议的发言中明确认为：既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包含着几种经济成分，那么，“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要来跟我们争领导权，要把国家引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特别提醒党的领导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两种形式，竞争和没收，现在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国民党，联合它发展生产，没收现在还不要，但竞争现在就开始了。[46]

九月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严格说起来还较比谨慎。因为他们估计，国营经济所占比例还很低。毛泽东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国民经济的）１０－２０％”。因此，他们认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还不能一下子搞掉资本主义经济。同时，他们知道，“没有机器就不能有社会主义”，而中国工业化水平还太低，因此，毛泽东提出，苏联在工业基础及国有化程度高于我们很多的情况下，革命后还花了１２年的时间才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我们中国恐怕还要更长一点的时间。但是，既然明确了资产阶级就是下一个对手和敌人，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容忍，自然就转化为一种纯粹的策略手段了。一直到１９４９年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始终在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只是暂时的同盟者，要时刻提防其叛变的可能性；宣称：进城以后，必须时刻牢记阶级立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一切文件、文章，凡讲到阶级问题的，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或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做肤浅。[47]

许多情况是没有想到的。在毛泽东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的时候，他甚至还不能十分肯定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地位问题，以至于不能不用“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这样不十分确定的措辞。同样，当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共产党在未来过渡时期中政治上可能握得领导权之后，他对动摇于国共之间的国际国内中间势力的担心仍较多，更没有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会给自己留下举足轻重的经济实力，因此还在为共产党未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而不安，不能不格外注重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国家构想的提出，自然与这种情况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构想，缺少着对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革命后的社会及国家）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他始终坚持这一未来政治构想的“过渡”性质，肯定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或“过渡的国家形式”。种种情况显示，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考虑中，力量对比仍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旦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们明确提出把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事实上，在中共中央确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之后，作为一个设想中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前途，至少在逻辑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因为毛泽东早就指出：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既然规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当然也就规定了这个新社会的基本性质将不可能是民主主义的，它只能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而那种构想中的以统一战线和混合经济为特征的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从此失去了存在的理论基础。

简单地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来规定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这在理论上未必是正确的。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当一个新社会应运而生的时候，生产力总是落后于生产关系，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发展生产力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只是当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越了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生产关系内部矛盾冲突，实际反映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才可能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为解决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途径。新民主主义无论是作为一个新社会，还是作为一个过渡时期，它的主要任务理所当然地首先都应当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即是要补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这一课的问题。因此，即使我们按照毛泽东《矛盾论》提供的方法来分析问题，也不难看出决定这段时期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应当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刚刚得到改造的相对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不应当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应当是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不分时间、条件、地点地一概把生产关系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生产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成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关键，相信按照理想模式解决了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就可能造成理想社会，这很难说不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很可惜，深受俄国模式影响的毛泽东恰恰陷入了这个误区中。

毛泽东再度深受俄国革命模式影响的情况，从１９４８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他和不少与会者都在在拿中国革命的程度同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相比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明显，毛泽东这时已经在考虑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问题了。尽管几乎所有与会者更多地谈到的都是“和平转变”，但问题是，准备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动员令已经发出。在对照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之后，他很明确地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时间表：１５年。而这个１５年，不过是参照俄国十月革命后那个１２年的过渡期提出来的。照毛泽东的说法，俄国十月革命后差不多还花了１２年的时间才最后向资本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中国更落后，自然要更长一点时间。但不论时间长短，在这里，理论上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了。因为，既然苏联那个１２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这个１５年当然也只能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而绝不可能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时期了。

其实，革命转变问题的提出，对于熟读了《两个策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毛泽东来说，也绝非偶然。任何稍微细心地读过《两个策略》一书的读者都会记得，列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个中心旨意，就是主张尽早尽快地排斥资产阶级，以便加速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因此，尽管列宁宣称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不可避免，他同时却一再强调提出：“在具体的环境中必须提出具体的政治任务。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民主共和制一争取到手，资产阶级的、甚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就将全部完结，而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斗争就会开始。……我们就会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即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来‘代替’……民主专政的口号”。“为了不致留下任何暧昧不明的地方”，受到毛泽东格外推崇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更是直截了当地发挥了列宁的这一革命转变思想。它指出：“列宁在力争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成立民主共和国时，丝毫没有想停留在民主阶段上，把革命运动的规模限制在最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这个范围之内。恰恰相反，列宁认为民主任务一完成，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剥削群众争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马上就应开始。”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48]

毛泽东是唯物论者，他理论上“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运用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谋略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往往使他更注重“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一面讲：“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一面却更加强调“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4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说的提出，到实际上放弃的整个过程，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这种矛盾看法。他一方面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出发，肯定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跨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另一方面又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模式出发，侧重于依据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来决定这一阶段的存废和过渡时期的长短。

当然，从提出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明确否定存在着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毕竟建国初期属于民主革命的诸多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还没有最终完成，新政权还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相当艰巨的经济恢复工作，社会主要矛盾还不能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所谓“外部斗争”和“外部矛盾”还极大地影响着共产党的国内方针和政策。毛泽东还不主张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不同意说“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强调还需要利用民族资产阶级来协助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特别是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来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因此，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提法，肯定了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性质，和经济上的几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做法。毛泽东以后也还在说：“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此等等。但是，即便如此，从刘少奇 1949 年 7 月 4 日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即可看出，这种认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刘少奇的报告明确提出，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日益突出，但考虑到“外部矛盾”和“外部斗争”，即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仍然会长期存在，因此，“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可能需要 10—15 年的时间。显然，从实践上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短短几年之后就不是新中国最突出的问题了；从理论上看，决定一个新社会性质的，最终也还是要取决于其“内部矛盾”，而非“外部矛盾”。所以，短短几年之后，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改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50]

随着新中国建立后解放全中国任务的基本完成，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重大斗争相继获得胜利，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大任务基本结束了，按照１９４８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的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自然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与此同时，国民经济顺利恢复了，不仅政治上的力量对比问题已经根本解决，经济上的力量对比问题也出乎意料地基本解决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２年９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讲：工业中国营资本已经占到了６７.３％， 商业零售中也占到了４０％，国营经济，即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已经取得了优势的和主导的地位，即使从经营的角度，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来取代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已经很明显，民族资产阶级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似乎可有可无了。

面对这一形势的变化，或者毋宁说是力量对比的决定性改变，在１９５２年６月，毛泽东就正式开始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

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51]紧接着，在征求了斯大林意见之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于１９５３年6月１５日正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１０年到１５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论者。在旧的矛盾解决之后，他总是会坚决地提出新的斗争任务以解决新的矛盾。在意识到１９４９年建国的革命任务大功告成，而新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他很清楚地看出继续泛泛地谈论和肯定新民主主义，势必要造成人们在“过渡”问题上的概念混乱。因此，他开始公开否定新民主主义存在的必要性了。他宣布说：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事实上已经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尽管在建国最初的两三年里，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还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人决不会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上，他们“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争取尽快全面实现社会主义。[52]

----

[1] 《胡绳访谈录》，《百年潮》，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中文版，第２２０页。

[3] 列宁选集》，第３卷，１９６５年中文版，第５６３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９－２４页。

[4]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２９－３２页。

[5] 毛泽东在三大期间表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无产阶级也人数太少。或者出现一个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或者出现一场世界革命，因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出现。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３，２３１，２３６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３９－１４０页。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８１－８３页。

[7]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席会议记录》，１９２４年1月１日；中夏：《论劳动运动》，《民国日报》副刊，１９２４年3月２２日。

[8] 《中共中央选集》，第１卷，第３２９－３３８页。

[9] F.M.(恽代英)：《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８９期，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２日；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５期，１９２５年５月。

[10] 正庸：《我们的功罪》，《中国青年》，第１１９期，１９２６年4月２４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中国青年》，第１３１－１３２期，１９２６年8月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１９２６年7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卷，第１５２－１５４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9月２５日。

[11]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０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２６３－２８６页。

[12]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１９２７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１９－２２页。

[13]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１９２７年7月２８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第２８０－２８３页。

[14] 前引《湖南致中央函》（毛泽东稿），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３５４页。

[15] 罗明那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３－４期，１９２８年2月２９日。

[16] 米夫：《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３－４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１辑，第３５０页。

[17]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１９２８年６月，《政治谈话会记录》，１９２８年6月１４－１５日，等。

[18]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莫斯科１９２９年４月版，第２８－４４页。

[1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８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４卷，第２９８－３０１页。

[20] 克鲁：《目前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２３期，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０日。

[21] 参见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３卷第４－５期，１９３０年5月１５日，《柏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３０年４月７日。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１９３０年６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２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９９－１０２页。

[23]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卷，第６０９－６１７页；陶尚行（刘少奇）：《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自由评论》，第２２期，１９３６年2月8日。

[24]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６年8月１５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第７－１０页；《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１９３６年9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９５页。

[25]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１９３７年2月１０日，《中央关于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１９３７年４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卷，第１５７－１５８，１７８－１７９页。

[26] 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第２８期，１９３７年１2月２１日；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提出的九个问题》，１９３８年5月４日；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等人的谈话》，１９３８年7月２日。

[27]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５７期，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

[28] 《陈绍禹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给中央的报告》，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卷，第5页。

[29]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１９３９年5月３０日。

[30]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１９３９年6月１０日，东北师大中国革命教研室１９５３年油印本。

[31] 《毛泽东与美国记者马丁的谈话》，１９４０年2月。

[32] 参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１９４０年1月１５日。

[33] 同上，并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７６３－７６５页。

[34] 毛泽东：《目前时局与政策》，１９４０年7月１３日，《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１９４０年3月6日，前引《毛泽东选集》，第７３５－７３６页。

[35] 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中国问题》，等。

[36]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１９４２年１２月1日。

[37] 《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５４６－５４７页。

[38]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１２－６１４页；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０页。

[39] 谢伟思前引书，第３２７－３２９页。

[40]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１９４５年３月３１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５３－５

６，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６－１２７页。

[41] 同上，第５５－５６，１２７，１９０页。

[42] 参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1986 年版；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43]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选集》，第１２５３－１２５５页。

[44] 《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新华社社论），１９４８年２月７日;《中央关于讨论划分阶级草案的指示》，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６日;《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卷，第２９－３１，３５－３６，２３６－２４２页。

[45] 前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７４页。

[46]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１９４８年９月；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３日,《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１９４９－１９５２）》，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６－２６页。

[47]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５１，１４３２－１４３５页；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１９４８年９月;《中共东北局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草案》，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３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３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８７－６８８页。

[48] 前引《列宁选集》，第１卷，第６５０－６５１，６９３－６９４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８０－８３页。

[49]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３１３－３１４页。

[50] 毛泽东：《不要四面出击》，１９４９年６月６日，《毛泽东选集》，第５卷，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７年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１９５０年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卷，第２９２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２，７页；《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4 日，见《当代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等。

[51] 《毛泽东致罗迈》，１９５２年６月６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３卷，第４５８页。

[52]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１９５３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８１－８２页。

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一、国共两党具有民族主义的共性

自从 1922 年秋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一直到 1949 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国共两党始终分分合合，打打谈谈。如果计算两党分合的时间段，我们会发觉，双方谈判或合作的时间，甚至比双方战争的时间还要长。[1]当然，除了二十年代初的一段时间以外，两党间纵使有过合作，相互也甚少互信，不乏大敌当前兄弟阋墙之举。但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对立，并没有妨碍它们在一定条件和一定基础上，长期保持和平的甚至是合作的关系，这表明，两党间仍旧存在着某种共性的东西。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究竟相互间存在着哪些带有共性的东西，当然不是今天这一短时间所能讨论清楚的问题。比如双方对民权自由的理解，对民生平等的赞同，特别是把 1948－1950 年间国民党内部大批党员干部自我批判及其检讨的文字，与共产党各种言论和政策加以对照，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确有许多可以相通之处。[2]但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还是双方所共有的民族主义特质。

长期以来，国民党断言共产党是苏俄侵略中国的工具，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傀儡，双方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真爱国。事实上，当年孙中山也好，蒋介石也好；陈独秀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成立或参加国民党（包括兴中会、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或共产党，多半都不是基于均贫富的冲动，其最初的动机反而大都是不满于国家和民族遭受列强压迫欺凌的现状，必欲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二十年代国共两党能够实现党内合作，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双方在「打倒列强」，即实现民族革命和解放这一关键性的政治目标上有着几乎一致的看法。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再度建立统一战线，还是因为双方都把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同样的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尽管明明力所不及，它上来首先着手进行的一件事，就是推行所谓「革命外交」，力图通过谈判尽快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而共产党建立政权后，也照样首先把反对帝国

主义的方针列入到自己的议事日程当中。并且由于他们这时的实力远超过当年的南京政府，因而态度上更彻底更激烈。它不仅公开宣布废除一切旧有条约，坚持暂不与欧美列强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归还外蒙和放弃其 1945 年通过条约形式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一切特殊权益，如此等等。[3]

很明显，尽管国共两党各自追求的理想有所不同，依据的理念区别甚多，借助的社会力量差别很大，所走的道路以及采取的革命手段也大相径庭，尽管它们都强烈地怀疑对手的民族性，曾经使用过许多极端的语言来抹黑对方，但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中谁也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像对方所斥责的那样，心甘情愿地成为列强的附庸。看一看蒋介石笔下对美国干预自己内部事务的强烈不满，注意一下毛泽东对俄国不惜破裂关系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国共两党，包括它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这一点上，基本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双方之所以坚持指责对方，除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所导致的分析模式和政治立场的影响以外，藉用蒋永敬教授之言，多半也是操之在谁的问题。「操之在我」，一切都对；操之在人，则一切皆非。[4]熟悉当今政治角力和政治话语者，对此当不会感到太过陌生。

二、民族主义优先，还是意识形态优先？

谈到历史上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共性特点，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在此必须回答：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它们通常是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在首位呢，还是会把民族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或者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什么情况下会把意识形态放在首位？这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民族主义肯定可以成为连结国共两党的纽带。毕竟，国共双方之所以始终缺少互信的基础，意识形态的区别乃至对立有很大的关系。所谓「操之在我」，政治上就是以我划线。而以我划线的背后，意识形态的作用至为关键。

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指的是受到某种特定观念左右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政策模式和政治目标。不难想象的是，当人们的思维方式固定化以后，他们通常很难不站在某种特定的立场，透过某种特殊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对手的思想与行为。抗日战争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国共两党基于抗日的共同愿望而妥协与合作，但它们却经常怀疑对手抗日的真诚性，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结果是你疑我，我疑你，进而你防我，我防你，磨擦冲突愈演愈烈。导致它们无法信任对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彻底的捍卫者。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同他们各自所特有的观念意识是分不开的。从国民党的理念出发，共产党本来就是国际性的组织，是受苏俄指挥，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共产党人当然不爱国；而从共产党的理论出发，国民党不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内部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它不是依赖于这个帝国主义，就是依赖于那个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列强妥协投降则是理所当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国民党极力防制、打击甚至试图根本取消共产党；共产党坚持壮大自己的力量，努力争取取代国民党，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既然观念上把对方看成是自己革命的敌人，为什么双方又能够妥协甚至合作呢？换言之，如

果双方根本就不相信对方是民族主义者，它们又如何能感觉到自己需要与对方妥协或合作呢？其实，就历史上的国共两党而言，它们在一些情况下确实不是简单地因为认识到大家具有共同的民族主义立场而联合在一起的。但不论它们各自如何看待对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标和共同敌人仍然是双方重要的妥协基础。所谓「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离开了两党的成员都是中国人这个基本的要件，它们很难会从内斗迅速转向外战。当然，直接促使国共两党做出这种选择的，还另有原因，这就是实力本身的局限性和来自外部的现实压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会选择妥协，通常都是由于它们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角力场中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实力严重不足，甚至面临危机，同时受到外部压力，因而必须要基于某种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区分主次敌人和制定灵活的策略。如果对自己的实力有十足的把握，相信对手已微不足道，没有对不妥协、不合作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的重大担心，即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同样强烈，也未必会掉转枪口，跳进同一条战壕。[5]

在此，我们仍以两度国共妥协的起因略作分析。

从 1922 年秋天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或国民党接纳共产党员，到 1924 年国民党一大最终确定容纳共产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政策，国共两党都有相当现实的利益考量。在共产党方面，由于它的人数太少，需要借助国民党走向群众，实现掀动民族革命的计划；在国民党方面，由于它的组织长年涣散，又连续遭受失败，也存在着利用共产青年来推进党务，增添活力，使自己变成名符其实的群众性的革命党的某种现实需要。不仅如此，它们双方的合作也还带有满足苏联和共产国际愿望的现实考量。因为它们都必须要得到莫斯科的援助。只有两党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变得生机勃勃和充满革命的气息，进而赢得莫斯科的高度重视。

同样，1936 年的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一举扑灭燃烧了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战火，也并非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念之差。当时的国民党、共产党事实上都面临危机。一方面，日本步步进逼，华北随时可能重蹈东北覆辙，南京政府退无可退，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从一年前，即华北事变发生之日起，就已经在秘密地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途径了。另一方面，共产党战争失利，军事形势恶劣，临近华北前线，它也面临日本入侵的直接威胁，因此也早就表明了愿意和解的意图。双方没有能够及早地从秘密接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双方的政策目标都还不是十分清晰，沟通上也颇多问题，蒋介石更顾虑妥协后苏联的作用，共产党则在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只是以反蒋派作为统战对象。随着西安事变爆发，蒋清楚地看到十几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存在着转向红军的严重危险，同时他也看清了苏联的态度，得到了周恩来拥蒋抗日、愿受指挥的亲口承诺，再加上有日本入侵威胁和国内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因此，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这个时候下决心和共，共产党这个时候转而全面挺蒋，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分析国共两度妥协与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即使在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有时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双方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去，民族主义是基础，实力不足是条件，外部的压力和各自现实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动力。正是由于在中国政治的角力场上，双方都不具备决胜的把握，甚至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的目标才不期然地成为它们现实政治利益需要与考量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目标则不得不被暂时束之高阁。

三、以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变化为例

要深入了解历史上国共两党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在事实上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的情况，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恶化，是 1939－1940 年以后的事情。而美苏开始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共斗争，也都是在四十年代这段时间。按照毛泽东当年的概括，这一段时间的基本态势是「国共反映美苏」，即国共两党这时的一举一动，都与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连。照理说，国民党的背后是美国，共产党的背后则是苏联。而当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确实都强烈地指责对方受到了列强的支持。共产党严厉批判「美蒋反动派」，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戡乱内战，是因为美国企图控制中国，而不惜大量向国民党提供军援和经援；国民党最著名的是在联合国搞了一个「控苏案」，蒋介石又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坚持国民党不是败于共产党，而是败于中共背后苏联的阴谋。但事实上，四十年代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和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恰恰处于相当矛盾和吊诡的境地，与当年双方的说法颇多差距。

就共产党而言，从 1940 年秋天起，毛泽东就开始与莫斯科之间发生磨擦。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磨擦，大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蒋介石把自己等同国家，毛泽东则是把中共的利益直接视同民族的利益。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毛两度拒绝莫斯科出兵牵制日军的要求，断言如果中共被打坍，不仅不利于中国革命，而且也不利于苏联，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共与苏联利益的不同。正是由于与莫斯科之间的这种分歧，毛泽东于 1941 年秋到 1942 年春开始发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毫不留情地清除了党内「国际派」的影响力，此举更清楚地在展现出毛不受苏联控制的决心。史达林等人对毛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也因此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他们 1942 年以后对美国人的许多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对中共的批评。一个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些「人造黄油式的共产主义者」。言外之意，莫斯科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罢了。

令人称奇的是，就在俄国人怀疑中共的共产党性质的几乎同时，与共产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美国人却在对延安发生好感。而他们发生好感的原因，又恰好印证了俄国人的猜疑。1941 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最高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罗斯福说：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其实不过是一些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与此同时，相当一批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派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在和共产党人接触，他们不断地向国内发回各种赞美中共的报导和报告，也明显地同情共产党人。他们确信，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特别是从战后美苏关系变动的前景看，真正能够有助于美国确保其在东亚地区利益的，可能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就国民党方面来说，这个时候的情况其实也相差不多。四十年代初期，美国虽然给了国民党极大的援助，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表现得相当强烈。发生在国美军事合作热络期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蒋并没有因为罗斯福及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经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提携，而容忍美国将军凌驾于自己之上。同样，美国政府也并不因为国民党更接近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就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美国部分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对共产党高度同情和赞赏的现象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并且在赫尔利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很快有所改变，但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双方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就有所削弱。甚至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开始成为左右美苏政策的基本政治考量，国民党也仍旧被排斥在美国战略盟友的大门以外。从马歇尔到艾奇逊，美国国

务院的领导人宁愿在中国培植第三势力，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一步步接近胜利，也不愿意下大力气拯救国民党。来自美国的援助，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态度而时断时续，完全达不到国民党方面的要求。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反感与不满，自然与日俱增。他之所以未能公开与美国人翻脸，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处境的日趋恶劣，使他不能不在公开场合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罢了。

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处理同苏美两国的关系上，民族主义的情感明显地占据支配的地位，意识形态的作用反在其次。这是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在和美国人或苏联人打交道时，都无法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掩盖由于民族差异而存在的利益分歧。同样，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它们所关心，根本上也是它们各自的利益。美国的外交官们当年之所以看中中共，一是美国军方出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需要，急于借助中共在沿海地区的根据地和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一是美国政府的决策部门高度关心战后美国同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力量抗衡，他们相信，如果中共倒向苏联，以国共力量发展的趋势，内战势不可免，结果不仅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连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赫尔利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向，同样是基于其现实利益的考量。因为首先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成功地实现了跳岛作战，美国军方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大陆来进攻日本本岛了。其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美国已经准备对苏联就两国战后在东亚地区的相互利益问题达成某种妥协，相反，美国更需要利用蒋介石的支持来安排战后世界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战后美国之所以对国民党逐渐抱定了离弃的态度，其实也是由于它不能不把自己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放在近东，结果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用于中国大陆，不管共产党的背后有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上它的对华政策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而不是以所谓道德、信义和意识形态的亲疏为基础。

战后的莫斯科同美国一样，它所关心的也是自身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大国政治格局，导致了著名的雅尔达协定。这个协定成为美苏制定各自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所谓苏联一开始就蓄意违反雅尔达协定以及中苏条约，秘密支持中共向国民党挑战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俄国人战后在远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只要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权益，它并不在意美国把中国大陆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同它处理欧洲的问题一样，对于其势力范围以内的国家和地区，它毫不退让，强硬到底。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则拱手交出，毫不顾惜。正因为如此，对于东欧国家，它坚持要全面控制，没有共产党也要扶起一个共产党来，不许美英干涉。而对共产党势力本来较强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反倒抱以相当温和的态度，听任英美等国为所欲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史达林在战后给毛泽东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和平，希望毛泽东也能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交出武装，到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去当部长。因为他相信，中国不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毛泽东不应当制造麻烦，破坏美苏之间已经达成的妥协。在史达林的这种态度里面，我们同样看不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

重庆谈判期间，苏联的上述态度确曾一度发生过变化。但这同样是基于保护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考量。导致莫斯科产生这种严重担心的，是 1945 年 9 月美军在未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贸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大举登陆华北，并公然协助国民党军队强行打通陆路交通，开入东北。美军登陆华北，对东北苏军造成极大刺激。为阻止国民党把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苏方一度不顾中苏条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意把共产党的军队引入东北。但随着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同时考虑到自己与美国在欧洲和近东的种种纠纷，苏联很快又回到了中苏条约的

立场上来，把共产党的军队统统赶出重要城市和工业区，并逼使他们远离交通要道，重新开始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试图通过经济合作的谈判，使国民党同意不让苏联以外的第三国染指东北。如果不是蒋介石坚持拒绝苏方的合作要求，很难想象苏联会违反中苏条约放手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发展。正是由于国民党太过明显的亲美态度，终于促使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开始制造麻烦，共产党也因而得到了大批日军装备。

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莫斯科已经相信了毛泽东。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利益上相互需要的结果。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随着 1947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狄托与苏联闹翻，苏联重又开始怀疑与狄托同样强势的毛泽东，公开认为毛泽东是「半个狄托」。此后，苏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的情况下，令其驻华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积极活动，推动各国外交官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和平；在毛泽东反复提出要求访问苏联的情况下，再三拖延甚至寻找各种藉口不让毛泽东成行；史达林相信中共中央内部有人会随时向西方透露机密消息，他派在毛泽东身边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中共领导人中存在着亲美派……，凡此种种，在在表现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结果是，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愿意帮助拯救国民党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苏联也不热心推动共产党的胜利。具体到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简要地讲述这段历史，只是要说明，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美苏的亲疏远近。蒋不满美国也好，后来仍不得不依靠美国也好；毛反感史达林也好，后来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也好，最主要的还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上权衡现实利益得失的结果。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也同样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选择盟友的，它们的实用主义特点同样不亚于中国人。

四、几点结论

由上面简略的分析，我们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区别国共两党，并且是导致它们长期对立冲突的基本要件。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通常是透过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权关系表现出来的。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构成一个政党或政权的现实政治利益的全部要素。换言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它们不得不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考量和决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时候，通常很难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生长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党或政权来说，与意识形态作为一面规定政党或政权政治性质及其政治理想的旗帜相比较，它的民族主义基础对于它的生存与发展，明显地更为重要。

其二，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换言之，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及其对外来干预和歧视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半殖民地中国给他们打下的毕生的烙印。实际上，他们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等诉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与自己意识形态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虽然，就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着想，基

于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对这类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往往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更多的往往只是一个操之在谁的问题。

其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能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现实利益及其政策调整目标的评估，通常是和政党或政权的实力评估成反比的。实力评估越强，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小，结果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少；实力评估越差，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强，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大。与此相联系，实力评估越强，对意识形态的诉求就会越发升高，其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也就容易趋于激烈；实力评估越弱，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就越会趋于节制，其民族主义情感也相对地比较容易保持理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角力场上的这种实力评估通常是以当政者的自我判断为主的，特别是遇到外来的或内部的压力过大时，这种判断就更容易发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不仅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有，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从来高唱国际主义的苏联人同样也有。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与援助，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同与接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所谓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而任何一种利益交换，又都必须基于等价的原则。因此，当美国或苏联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而当它们发现自己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设法免除这种无休止的麻烦与负担的想法，就会导致其很快改变自身政策的现实目标。因此，国共两党虽然长期以来背后都有美苏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靠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

----

[1] 两党谈判或合作的时间大致分两阶段，即从 1922 年秋到 1927 年夏两党关系破裂，和从 1936 年底西安事变结束，两党重开谈判，到 1946 年冬两党关系再度破裂，总共十五年左右。而双方全面对抗和战争的时间则包括从 1927 年夏到 1936 年底西安事变结束，和从 1947 年初到 1949 年底国民党退踞台湾，总共十二年左右。

[2] 如 1948 年 8 月举行的有 400 多党内中高级干部参加的党务座谈会，许多发言人都指出：国民党失败，败在脱离工农贫苦大众，只有上层，没有下层，只注重争取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民生平等毫未实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多数人民不仅不得温饱，而且还要受党政军的压迫。他们因而主张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将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统统驱逐出党，使党能够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农工和进步知识分子，同时考虑在经济制度上选择社会主义方式，以便实行民生主义的革命。国民党在台湾的领导人一度积极推行所谓英国式的社会主义，即与此种教训之总结有相当的关连。

[3] 实际上，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中央政权建立伊始都不具备公开向列强挑战的实力。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最终难以继续，毛泽东 1949 年底 1950 年初赴莫斯科谈判之所以未能达到彻底取消苏联特殊地位的目标，都与他们当时的实力不足有关。但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刺激了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4] 「操之在我」，蒋永敬教授 2000 年 6 月 15 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对余敏玲文章评论中的用语。

[5] 这里可以提到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蒋介石 1936 年 11 月对于陈立夫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时的指示，当时蒋刚刚取得了对红军在甘肃黄河沿岸作战的胜利，把红军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因而提出的妥协条件一度十分苛刻，坚持红军只能保留三千人，其余统统遣散或由中央军收编。另一个是毛泽东在 1948 年底 1949 年初取得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的大部分主力部队之后，面对国民党和谈的要求所开出的条件，如 1949 年 1 月 14 日的八项条件和 4 月 15 日的〈和平协定草案〉，同样如同一纸降书，毫无商量的余地。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外许多学者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1]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2]当１９３５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

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3]由此不难想象，当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 30 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 1938 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40 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作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毛泽东早在抗战开始之际就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防人之心不可无”之类的策略原则，强调自我保护。后来，因为这一观点不能得到党内和军内多数领导人的理解与拥护，再加上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带来共产国际关于“抗日高于一切”的指示，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一度致力于巩固与发展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4]随着 1939 年以后中共在敌后大规模独立发展局面的出现，国共之间围绕地盘和政权问题的磨擦与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不能重新开始高度重视与国民党的斗争问题。1939 年秋天欧洲战争爆发前后，共产国际重新树起反对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旗帜，为他在思想上否定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强调斗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观点表现出相当高度的政治热情。想不到，一年以后，德国威胁再度迫近苏联，共产国际重又强调统一战线，极力主张国共缓和。这种把苏联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的作法，使毛泽东难以理解。双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即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围绕着 1941 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歼一事而发生的争论，是毛泽东有生以来与莫斯科之间第一次直接发生重大意见分歧。他的确早就估计到国民党要有所动作，并一再提议对此作出反应，但莫斯科就是不相信。事变后他再度主张进行反击，又接连遭到拒绝。面对千辛万苦在江南发展起来的这支近万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举消灭，莫斯科方面甚至不愿做出任何毛泽东所期望的反应，毛泽东自然深受刺激。联系到抗战初期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他明显地意识到，莫斯科并非象他那样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想法，促使他下决心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一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他拒绝在军事上采取莫斯科所建议的针对日军的战略牵制行动，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莫斯科的分歧所在。[5]

为了推行一条旨在自我保护的独立自主路线，毛泽东不得不乘着 1942 年俄国人自顾不暇的机会，发起了一场党内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原本只是为了让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党史成败的对比来了解：中国共产党所以会有今天，就是因为毛泽东克服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在高级干部中间整风所揭露出来的教条主义的种种劣迹，显然进一步激励了毛泽东破除迷信的勇气。当然，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继承性，毛泽东没有也无法根本改变对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某种崇敬心理。他所以大量印发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有关指示作为全党整风学习文件，继续使用相当尊敬的语言谈论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以及苏联党的地位和作用，如同他自己后来所说，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仍旧相信，只有斯大林才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因此，即使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当已经不再是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预毛泽东对王明的处理的时候，他也依旧表现出相当的尊重。[6]

而再度使毛泽东深为不满的是，斯大林始终不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应有的地位上。就在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满怀希望地在中共七大向全党宣布：战后苏联一定会援助我们夺取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苏共中央竟于抗战结束后发来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逼着他去与蒋介石讲和。[7]1946 年，苏联方面更建议中国党学习法国共产党的经验，放弃独立武装，去当议员，去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到了 1948 年，当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明显地能够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时候，俄国人又怀疑毛泽东是“半个铁托”。[8]所有这些情况都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感情，使他还在建国之前，就对斯大林和苏联开始在感情上存在隔阂。斯大林逝世后，他曾明确讲，还在他去莫斯科见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因为斯大林给人的感觉“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9]这也就难怪，当苏共二十大开始批评斯大林之后，毛泽东几乎对每一位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要大谈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讲当年俄国人如何相信王明那些留苏学生，不相信他，压制他，打击他。十分明显，他内心深处对历史上来自俄国人的那种压制和猜疑，始终耿耿于怀。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

关于独特性格的影响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第一、第二号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相继访问莫斯科。但是，这两次访问给两个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7 月，刘少奇率团访苏，他很自然地在与斯大林的交谈中把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地位，对斯大林的任何说法乃至自我批评，都采取十分谦逊的态度处之。[10]而毛泽东几个月后访苏时的态度，则与刘少奇颇为不同，他很明显地想要把自己摆在与斯大林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问题。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刘少奇初见斯大林时使用的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寒暄与问候，第一次交谈的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敏感问题；毛泽东初见斯大林时却了无顾忌，当斯大林用俄国人的方式开门见山地赞扬他的客人之后，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却是：“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结果，做惯了所有人的领袖的斯大林很容易和刘少奇沟通，和毛泽东的接触却颇多误会与猜疑。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和陪同他同往莫斯科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可知在访苏期间，毛泽东仅发脾气“大吵”就有三四次之多。[11]当然，毛泽东与刘少奇访苏所负的使命各有不同，斯大林的想法也经常在变，几个月前与几个月后也不尽相同，因此毛、刘二人的境遇也可能不尽相同。但不难断定的是，即使在遇到同样麻烦的时候，由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性不同，他们处理起来所得到的结果与印象也会有所不同。

毫无疑问，在中苏两党关系的当中，领袖个人的性格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斯大林的多疑，赫

鲁晓夫的心血来潮，都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样，毛泽东的个性也是很突出的。他是那种极好强，易敏感，爱冲动，不大掩饰其内心感情及好恶的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的这种耿直的个性就表现得相当充分。1925 年，因与党内意见不合，他曾一度负气回乡达 8 个月之久。20 年代末年在井岗山担任红四军党代表时，他与军长朱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30 年代初在江西苏区时，他又先后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一批领导人发生过争执。在一些中共的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他个性方面的一些尖锐批评，比如说他动不动就“咆哮起来”，甚至“骂起娘来”，说他“态度(脾气)不好”，“好揽权”，“排斥异己”，过于威严，使群众和同志“个个怕他”，等等。以至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都得出印象，知道毛泽东“好争吵”，因此告诫中共中央：要尽量发挥毛泽东的作用，但不要让他进书记处或进常委，因为不能把党的工作机关变“争论不休的讨论俱乐部”。[12]

毛泽东的这种个性，同他的经历有关。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 10 岁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因为不愿挨打而离家逃学，竟至“流浪了三天”。到了 13 岁的时候，他已经敢于公开顶撞父亲，甚至当着客人的面与父亲争吵。据他说，有一次，“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一下激怒了我，我回骂了他，接着就离家出走。我母亲追着我想劝我回去，父亲也追上来，边骂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并且威胁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进水里。”[13]一个 10 岁、13 岁，仍然少不更事的孩子，就敢于顶撞严厉的父亲，甚至以死相抗，其个性之强，可想而知。

毛泽东的这种突出个性，促成了他争强好胜的性格。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离家求学之初抄录的诗句：“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反映了他早有很强的抱负心。他从小聪明过人，学业出色，但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中却颇多不顺。在学校被城里的和富裕的学生看不起，在学历上仅及中专未能入高等学校深造。本来有机会象大多数同伴一样出国留学，又因为热心国内政治运动未能喝上洋墨水。所有这些，都给这位从韶山冲乡下出来的自尊心极强的农家子弟带来了心理上的压抑感。毛泽东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情况时，那种压抑感就跃然纸上。他说：“由于我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14]

即使在投身革命之后，他也每每感到压抑。特别是在他创造了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之后，不仅不受信任，而且倍受歧视与打击。好不容易从逆境中崛起，做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甚至在中国打出了一片天地，却还是得不到莫斯科的信任，并被疑神疑鬼，这些都极大地强化了他的这种受压抑的心态。比较一下毛泽东风华正茂时渴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壮年时笑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自诩“风流人物”的诗句，不难想象志向至大至远的毛泽东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巨大差距，会抱有何等强烈的不满。它们无疑会更加加强毛泽东性格的特点，并促使他变得高度敏感。而越是在意气风发之时，他内心里在这方面也就越难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1949 年 12 月 16 日，已经做了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他，见到斯大林的第一句话，竟是充满怨气的渲泻。

毛泽东的经历其及性格，使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摆在了“小人物”、“下等人”、“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地位，并形成了一种对“大人物”、“上等人”、“富人”和“压迫者”的极端轻蔑与反感。革命期间，即在中国革命还极端需要苏联这根重要外部支柱的情况下，他都很难压抑自己的这种个性，在成为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亚洲头号大国的主人，尤其是在整

个政权日渐巩固之后，在面对处处习惯于把自己摆在宗教裁判所地位的苏联党时，他的这种个性特点就越是容易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比如，毛泽东所回忆的在莫斯科访问时几次发脾气，大都是由此而发。他说他第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发觉斯大林冷落他，把他摆在旅馆里一周时间不露面。另一次发脾气，是因为约好苏中两国以官方名义声明驳斥美国国务卿的一次谈话，苏联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而他则习惯性地以中央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了谈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因此拐弯抹角地批评了他，使他深感自尊心受到伤害。[15]又比如，50 年代初，毛泽东请苏共中央派个理论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并帮助他修订著作，他本意多半只是想让斯大林了解他，对他放心，想不到这个理论家来到中国之后，竟大放厥词，声称：我们苏联都没有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概念，你们有什么必要提“毛泽东思想”呢?毛泽东当时并不认为把自己的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是恰当的，但俄国人的指手划脚却严重地伤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1956 年，毛泽东虽然指示从中共八大新拟的党章中删去了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他对俄国人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正像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他因为发现米高扬致辞中不提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在米高扬致祝词的时候竟故意不参加会议，说是对米高扬贬低中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贡献一事“表示抗议”。而毛泽东所说的这个理论贡献，不就是中共七大所高度评价的“毛泽东思想”吗？由此可知，毛泽东当着米高扬的面，大谈当年苏共如何“发号施令”，声称：“过去我们憋了满肚子的气，现在可要出气了”，确实是憋了太多不满的缘故。

在 1956 年苏共召开二十大，秘密批判了斯大林以后，毛泽东对苏联已经没有什么可忌讳了。既然不必忌讳斯大林，自然更容不得资历远在他之下的赫鲁晓夫等人对他指手划脚。因此，借着批评斯大林错误的机会，他这时多次向外国党领导人表示，他最不能容忍别人站在自己头上发号施令，党与党之间决不能再搞“老子党”与“儿子党”那一套。[16]

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确实要比斯大林谦逊得多，也小心得多。从 1954 年到 1957 年，苏联内部及东欧国家集团内部问题层出不穷，赫鲁晓夫要求助于毛泽东的地方太多。因此，至少从表面看上去，双方的关系应该很容易走向互信、互助、互通有无。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苏中两国，一个强，一个弱，仍旧很难讲平等。而最困难的在于，双方的强弱已经不同于当年的情况。当年苏共是什么都强，而如今，他相信，苏联强的只是物质力量。从“苏联是今天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资产阶级害怕苏联，不害怕中国”这个角度看问题，毛泽东仍旧主张“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头”，强调苏联还应当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中国至多只能算是个“副总司令”。可是，从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从实际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角度，他却相信赫鲁晓夫所差甚多，认为中共在某些方面要起主导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使他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变得更加复杂与微妙。

中国在精神方面的优势不能抵消在物质方面还必须要求助于苏联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双方交往方面明显地比过去变得更加敏感。1958 年的联合舰队事件，之所以会激起那样大的风波，甚至促使毛泽东说出：俄国人从来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等等激愤之辞，很大程度上都与毛泽东的这种敏感的心态有关。[17]

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的倾向，而当时他在这件事上的本意未必就是要控制中国，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的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根本

就是小巫见大巫。何况要求是中方提的，苏方提出自己的设想还可进一步交涉与谈判。毛泽东发脾气后，赫鲁晓夫又亲自赶来中国，向他解释并寻求谅解。事情完全不至于闹得这样大。毛泽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既是因为事关国家主权这样的大问题，同时也反映出其个人的经历和性格。这件事后来竟成为导致两党矛盾迅速暴露，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迅速恶化的一个导火索，不难看出，对于 1959 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恶化，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确实是有影响的。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同遇事多疑，但处理外交问题相对小心谨慎的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恰恰是那种性格过于鲜明的领导人。用俄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赫鲁晓夫受教育太少，过于心直口快，太容易冲动，有时几乎是口无遮拦，常常不加认真思考就做出惊人的举动。最典型的就是他竟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脾气，脱下皮鞋敲桌子，和公然把导弹运到古巴，向美国挑衅，最后又不得不把导弹撤回来这两件事。这即使在苏联的外交史上也是最令人尴尬的两件事了。不难想象，中苏关系之所以在赫鲁晓夫时代，而不是在斯大林时代发生严重破裂，确实是与两位领导人过于鲜明的个性有关的。

如果可以进行简单的类比的话，两位在商场或外交场上性格和能力上的强人相遇，也许还能成为好朋友，但他们一旦进入家庭，成为夫妻，那就难免要吵架，甚至闹离婚。可悲的是，50 年代的中苏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外交关系，倒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本来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民族、政治实体，却偏偏要根据所谓意识形态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当父子，当兄弟，甚至当夫妻，每一方都要求对方按照家庭关系来思维和行动，而事实上每一方都有自身的利害关系，哪一方都不可能轻易妥协，都难免会在相当程度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和利益，因而每一方都会觉得对方对自己不忠诚。结果也只能是我们所看到的样子。

关于民族利益的分歧

不可否认，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诸多不满，确有相当一部分是同民族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他对民族和国家的概念的理解是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说法不同的。毛泽东通常更喜欢用“人民”这个字眼儿来说明他的利益所在和追求的本质。比如说他的军队是“人民军队”，说他的政权是“人民政权”，说他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等等。而他在这里所讲的“人民”，其实仍是建立在阶级概念基础上的，即是指下等“劳动人民”。因此，“人民军队”、“人民政权”通常又可以称之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同样，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除了同样使用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概念界定他的民族和国家以外，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感情的“强”与“弱”、“大”与“小”、“穷”与“富”这样一些上等与下等、贫贱与高贵的尊卑观念，显然也同这种深入脑髓的阶级观念一起，成为他判断国家关系以及党的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才比较容易理解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民族观。

毛泽东与俄国人最早的磨擦，发生在 1940 年秋。当时正值欧洲大陆沦陷不久，国际形势对抗战不利，国共关系亦高度紧张之时，他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判断蒋介石有与日军联合夹击中共的阴谋，因而设想过派 15 万精兵先发制人，由西北打入国民党西南基地，抄其老窝。[18]此电自然受到莫斯科的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甚久。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准备对蒋予以报复，而无论是莫斯科，还是重庆的苏联大使及苏方军事顾问，都明确反对。为此，毛泽东再度与俄国人发生争执，他直截了当地要求苏联务必立即“停止

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接济我们"，特别是"援助我们夺取兰州"，接通苏联，取得飞机大炮，占领甘肃河西走廊，进而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19] 同年 5 月，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山西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由于国共关系还未能从皖南事变沉重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八路军也因 1940 年底的百团大战而损伤了元气，因此，中共中央没有按照国民政府的命令部署靠这一地区的部队采取直接的救援行动。苏联顾问对此颇为不满，以至说三道四。对此，毛泽东十分恼怒，专门去电重庆，强硬地警告苏联顾问"不要随便乱说"。[20]在这里，毛泽东一切策略考虑的出发点，都是要保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在形式上，毛泽东这里的一些作法似乎不利于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但在他的观念里，民族也是有阶级的，他相信要保护和争取的，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它才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把中共的军队与政权视为中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就使得毛泽东对 1941 年《苏日中立条约》，1945 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等，承认起来并无困难。在他们看来，这些条约的产生，恰恰是国民党无能的表现。他们相信，一旦轮到他们掌权之日，所有中国曾经失去的权益都会很容易地被收回，只有到那时，中国才会有真正的独立与尊严。但是，涉及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几乎是寸步不让的。

苏德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拒绝派八路军去为保卫苏联而采取牵制行动，就是这种态度的一种反映。他对此解释得很清楚，即："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21]

毛泽东在整风期间讲过一句话，最能反映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这是在他批评王明时说的。他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得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得太少。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要依靠苏联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种心态，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这种"民族主义"仍旧是建立在列宁主义阶级观基础上的，他仍旧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苏联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他与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同的。驻延安的莫斯科联络员伏拉基米洛夫相信，没有苏联，就没有中共，大河没水小河干；而他相信，没有小溪不成其为大河，中国革命对苏联也是一种支持。因此，毛泽东这里的"民族主义"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的民族情感的流露。当苏联 1947 年批判南斯拉夫之后，当"民族主义"一词成了专指那些只考虑本民族利益，自私自利，不讲国际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用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也批判起这个概念来了，毛泽东更是坚定地主张要反对民族主义。

既讲阶级利益，又讲民族（国家）利益，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对毛泽东来说，它们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正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相信，民族也好，国家也好，都是要按阶级来划分的，只有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党与国，阶级与民族，在毛泽东看来，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唯如此，民族（国家）利益，有时还要服从党的利益的需要，因为只有代表阶级利益的党，才更能反映和代表国家及民族的根本利益。

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主张"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因为无产阶级到底是国际的，是负有世界革命重大使命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仅仅站在民族的

立场上爱自己的国家是不够的。即是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吾爱中华，尤爱阶级。

什么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际主义”？概括成一句话，就是“革命时外援，胜利后援外”。这里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的过程中，首先是要外部援助而不是去援助外国，但它在胜利之后，就应当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援助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义务。因此，在革命期间，毛泽东格外重视来自苏联的援助，而对以牺牲本国革命利益来援助苏联不以为然，更不满意俄国人在援助中共的问题上总是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在建国后批评俄国人“自私自利”和“民族主义”时反复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他所谈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特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产物。

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出于自私的目的，在抗战期间把武器统统给了蒋介石，只给延安送了些药品和马列书籍。另一个例子是批评俄国人在抗美援朝的问题上，一面鼓动中国出兵援朝，主动向中国提供大量武器装备，一面却在中国无偿地大量损失生命财产的情况下，要求中国为苏联的武器装备付款。[22]出于同样的道理，毛泽东也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俄国人对那些尖端技术总是那么神神秘秘的，生怕中国人拿了去。不就是那么点儿东西吗，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有什么了不起?

在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就象中国人在朋友吃饭时习惯于一个人请客，而一些欧洲国家的人习惯于各自付款一样，毛泽东对援助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应当遵循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重义轻利”的原则。中国的古训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讲的都是一个“义”字。朋友之情是为“义”，个人钱财是为“利”，同样，国际主义是为“义”，武器技术当为“利”。因此，他极其鄙视那种重“利”轻“义’的行为，崇尚“君子不言利”。

建国以后，毛泽东的作法自然与苏联极其不同。至少在整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亚、非、拉美各国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尤其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的 60 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就是在 60 年代初，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几年里，其援外金额仍超过其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额。光是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两倍还多。在这方面，毛泽东从不主张讲中国国家民族之“利”。他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因此会损害中国的某些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中国的建设、老百姓的生活要受影响，勒紧裤腰带也要干。他为此再三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说：援助就是无偿的，“要买、要还帐，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23]

那么，毛泽东是否不讲民族之“利”呢?当然不是。问题是，他在许多场合更多地还是从“义”上来看这个“利”的问题。比如，建国前后，毛泽东几度与苏联讨论过归还抗战结束后被苏联占去的诸如中长铁路、旅顺港等问题。他提出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当年你们占去这些权益是对的，因为它们当时是国民党的，而现在天下已经是我们的了，共产党当然不能占共产党的东西，否则别人会说闲话，说你叫什么共产党?毛泽东曾明确讲，苏联当年控制中国东北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是对的，“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而中共夺权后则应该归还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24]这里所表现的思维特点仍是强调一个“义”字。因此，当他在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归还苏联占去的中国权益问题不得不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时，其内心极感困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兄弟党，马列主义的党，却想方设法去占有一些不“义”之财，“实在不光彩”。[25]

不难想象，毛泽东 1949 年底到莫斯科去，原本是希望斯大林能够痛痛快快地从兄弟之情和国际主义的大义出发，主动废除中苏两国间以往的一切不平等协定，想不到，斯大林不仅不是他希望的“谦谦君子”，而且有时表现得就像是中国人眼中那种斤斤计较的“小人”。[26]特别是围绕着苏方非要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要两块“势力范围”；坚持苏联技术援助必须采取合办合营公司的形式，苏联的股份必须占到 51%；苏联有权利用中长路运兵等明显地不平等的要求，毛泽东更是极其不满。

在 50 年代中国与苏联的交往中充满了相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中国方面，最多的批评就是俄国人对中国人态度傲慢并颇多戒备，事事向中国方面保密。[27]毛泽东在 60 年代多次说他对一件事不理解，说我们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俄国人卖给我们设备时常要留一手，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就是不告诉我们？还在 1954 年，毛泽东其实就向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抱怨过，说在中苏合营的公司中，苏联方面不仅在技术上对中国严密封锁，在人员使用上对中国技术人员加以排斥，就是在公司的利润问题上也总是搞小动作，让中国方面大吃其亏。赫鲁晓夫确实也承认苏方的这种行为有些过分，很快将有关合营的协定废止了事。

但类似的事件是禁绝不了的。因为中苏两国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利益需要和文化背景。不要说当年苏联对所谓“兄弟国家”的政策要首先为自己考虑，而且大多数苏共领导人还把独立色彩甚浓的中国看成是一种威胁，至少也是一匹无法驾驭的野马。[28]因此，像赫鲁晓夫那样不顾苏联自身能力地提供援助的情况毕竟是不可能长久的，大多数苏共领导人主张对中国“留一手”是难免的。然而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却颇难理解。当 1958 年的“联合舰队”问题之所以会被提到主权问题的高度上来，引起毛泽东那么大的火气，就典型地反映出双方认识上存在的这种差距。

在毛泽东看来，核潜艇也好，原子弹也好，不过都是从地球上挖出一些东西把它变成某种物质的东西而已，只能算是“利”的范畴，而国家主权、意识形态，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义”的范畴。只要是基于“义”，苏联完全应该主动把自己的东西送给朋友。可惜，苏联却总是恃强凌弱，不仅对自己的东西待价而沽，还总是对人家的家务事说三道四，指手划脚。他所以认为苏联搞“老子党”，搞“大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看不惯俄国人重利轻义，总是企图指挥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甚至占这些兄弟国家便宜的政策和行为。毛泽东对“联合舰队”问题的激烈反应，就是因为他痛恨苏联重“利”（潜艇）而忘“义”（中国的主权），不仅不能主动帮助中国发展核潜艇，而且还想要借机占中国的便宜。

关于革命理念的歧异

如果说民族问题是利害之争，那么，革命问题则是义理之辩。义既然高于利，那么，在毛泽东与苏联党的争论当中，关于革命理念的争论究竟占有多重的地位，应该不难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无论从历史上的恩怨出发，从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出发，毛泽东对斯大林都有一肚子的怨气。照理，赫鲁晓夫 1956 年公开反对斯大林，应该得到毛泽东的欢迎和支持才对。但是，事情恰恰相反，他坚持要对斯大林“三七开”(即把斯大林的错误和功绩总和为十，肯定其错误只占十分之三)，明确认为赫鲁晓夫公开批评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丢了一面革命的旗帜。结果，历史上的恩怨也好，个人的或民族的情感也好，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

围绕着要不要斯大林这面旗帜的问题，他反而同赫鲁晓夫以及苏联党越来越尖锐地冲突了起来。由此一点即不难看出，毛泽东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与苏联党关系之破裂，究竟何为主，何为从。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说来说去，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为什么要求得斯大林的信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毛泽东相信他和斯大林一样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在他批评斯大林的各种言论之中，份量最重、重复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指责斯大林当年曾经不许他革命。这是指的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之后，斯大林接连发来电报，逼着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承认蒋介石的统治那件事。几乎在每一次谈论到苏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他都要提到这件事，并强烈地表示他的反感。最典型的如 1958 年 7 月 22 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他气愤地接连四次提到斯大林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这件事。[29]在毛泽东看来，这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犯下的一个很难宽恕的错误。而在此之后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大都同这个问题有联系。象毛批评斯大林不该在 1947 年延安失守时提议与蒋和谈，不该在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已经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时还要中共停下来与南京谈判，尤其不该怀疑他可能是中国的铁托，如此等等。同样，围绕着 1950 年朝鲜战争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再三求助于中国，并且因为毛泽东决定出兵而对毛泽东改变看法，这又使他十分满意，以后多次提到这件事。这些情况都说明，毛泽东把斯大林的信任看得很重，同时也表明，他对斯大林虽有不满，但多属于个人情感上和一般利益上的矛盾，本质上并无太多恶感。

毛泽东所以能够保持对斯大林的某些好感，无疑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体系在许多方面是基本一致的。这个一致，正如他在 1949 年形象地说明的那样，就是在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0]有了十月革命这一榜样，又有了主张阶级斗争的列宁主义作为指导，中国才会有共产党，才会有毛泽东，才会有它的 1949 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不论斯大林有怎样的问题，不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多少错误，斯大林毕竟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是少数能够理解中国革命特殊意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之一。特别让毛泽东欣赏的是，中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斯大林就当着前去访问的刘少奇等人的面，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对落后国家革命的榜样作用，肯定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中国应当担负起领导亚洲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责任，等等。这样的评价，对于多少具有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精辟了!

实际上，还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少中共领导人就公开宣传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对整个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些人在，毛泽东始终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自觉思想尚未成体系。如今斯大林明确加以肯定，这无疑让他深受鼓舞。毛泽东是那种总是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姿态，一心希望对中国、对世界有所贡献的政治家。因此，他非常看重他的革命在理论和实际上的历史贡献。而这个时候，区别于俄国革命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毛泽东把他的这一贡献称之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讲的“马列主义”，就是指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而所谓“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则是指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通过中心城市群众起义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独特形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很显然，毛泽东相信，至少希望，他所开创的这一新的革命道路能够对那些落后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当毛泽东得知斯大林高度评价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他自然深受鼓舞。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过一个月，毛泽东就颇为自信地指示有关部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的榜样作用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刚刚取得胜利，中

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对苏联和东欧各国不重视、不了解中国革命，会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不满。[31]

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发现他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正在遇到挑战。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最开始发起这种挑战的是英共。1954 年 3 月 29 日，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致信中共中央，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一篇文章时，需要删去毛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等论断。英方认为，这个原则在英国已经不适用了。否定这个原则的普遍性，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因为它不仅和他的经验不同，和他的理念不同，而且几乎等于要否定他的革命经验和理论贡献的普遍适用性。因此，他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联络部告诉波立特："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的到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做什么修正"。他并且告诉波立特，苏联同志在发表他的这篇文章的俄文版时，也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任何异议。言外之意，苏联党也是赞成他的这个观点的。[32]但英共依旧我行我素，毛泽东的那些论断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发表时还是被删掉了。一年以后，当波立特来到中国时，毛泽东对这件事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当面强调"工人阶级只有用武装才能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取得政权"，告诫英共绝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和工党混为一谈，去侈谈什么"议会道路"与"和平过渡"。当然，波立特也是不以为然。[33]

英共对武装斗争以及暴力革命的态度固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但他最初还只是把它看成是孤立的现象。他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作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思想发源地的苏联也会产生同十月革命方式背道而驰的"和平过渡"思想。这个冲击之大，使他倍感吃惊。当赫鲁晓夫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肯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之后，毛泽东的不安看起来比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还要严重。在苏共二十大尚未结束，中共中央还不十分了解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之际，毛泽东就明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紧接着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会因为米高扬的祝词没有称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理论贡献而大动肝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兰和匈牙利由反斯大林主义到反苏反共的政治事件之后，他更是直接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鼓吹"和平过渡"联系起来，强调"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这把刀子不能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集体发表文章，主张"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并断言：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明显，保卫十月革命道路，说到底，其实就是要保卫他所开辟的新的列宁主义的革命道路。[34]

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明确告诫党内：要警惕苏联的错误倾向，因为，批判斯大林，等于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提出"和平过渡"观点，事实上等于连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不要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就等于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也就等于否定共产党。[35]

如果仅仅从民族利益的角度，和同志关系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赫鲁晓夫等人肯定要比斯大林好处得多。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分特权，坚持要中国同意接受条件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斯大林在世时，苏联开始了为 50 个援建项目提供设备的工作，但

更多的援助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关于援建 91 个大型工业项目，关于为 15 家国防企业提供设备和援助，关于建立 51 个军工企业和 3 个军事工业科研所，关于新建扩建 41 个工业企业和电站，关于援建冶金、化学、煤炭、石油、机械、电器、无线电等 78 个大型企业和电站，以及帮助提供实验性核反应堆和加速器，直至签订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发展最新宇航技术，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图纸资料，以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协议，等等，都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实现的。[36]同时，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恭。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使毛泽东建立起对赫鲁晓夫的信任感。相反，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人越来越不信任了。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与苏共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接触中，他吃惊地发现，他和这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共同语言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尤其意想不到的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对自己的力量毫无信心，几乎已经没有任何革命的愿望!

毛泽东是讲唯物论的，但在他的经验里，一定的物质条件具备之后，没有什么不是由人心所决定的。人心向背，不仅可以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同样也应该可以决定世界帝国主义的垮台。更何况共产党人还握有绝对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他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象波兰这些早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共产党，竟连在国内宣传反对美国的勇气都没有。哥穆尔卡告诉毛泽东说，他关于加强反帝反美的宣传的建议，在波兰就行不通。波兰人要是搞无记名投票，结果共产党肯定下台，东德的情况就更糟。他因此不能不再三为那些对美国怀有深深的恐惧的共产党领导人打气，强调：“物质力量的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政治是决定一切的”。“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毛泽东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得出来的结论。[37]

1957 年 11 月，当世界各国共产党集会莫斯科时，毛泽东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共产党以为张本的许多东西，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苏联和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抛到脑后去了。他不能不把这一切归罪于斯大林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无法劝说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根本改变对革命的看法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逐渐开始考虑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中国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同国家实力联系在一起的。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讲：原子弹是纸老虎，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力量对比问题，“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事实上他却不能不承认：你没有东西，人家就看不起你。

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毛泽东终于按捺不住了。不就是比谁有原子弹，看谁钢铁多吗?中国有的是人，人多智慧多，热情高，干劲大，又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性，为什么不能调动起这几亿人的积极性，来一个经济上的“大跃进”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他们准备用 15 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 15 年赶上美国，我们可以在 15 年赶上英国。15 年后英国可能达到 3000 万吨钢，那时我们可以达到 4000 万吨钢。因此，从 1958 年初开始，毛泽东就憋着一股劲儿，到处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道理，声称过去因为对工业一窍不通，所以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有很大的迷信，其实几年过来也就懂得了，有什么了不起!说“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38]于是，在毛泽东关于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公开号召下，一个赶英超美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掀起来了。由于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粮食、钢铁和原子弹这些东西，因此，从城市到乡村，几亿中国人被组织起来大办农业，大办工业，

去大炼钢铁。从 15 年赶上英国，半年时间又变成了 7 年超过英国，15 年赶上美国。[39]

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到这时充其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赫鲁晓夫把毛泽东看成是一只“好斗的公鸡”，毛泽东则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企图通过抹煞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与和平共处的“懦夫”。实际上，还在 1958 年 5 月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时，毛泽东就印发了《马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在内部开始批评苏共中央。当 1959 年 6 月赫鲁晓夫得到美国总统向他发出的访美邀请之后，苏美这两大敌对阵营核心国家之间明显地出现了走向缓和的重要迹象，中苏两国之间自然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走向观点上的对立。[40]

真的能够实现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吗?毛泽东对苏联党不要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作法极端不满。他开始明确提出：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阶级革命的，在今天，国际上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不革命还算什么共产党?”不反帝，尤其是不反美帝，“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什么和平过渡，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压力太大，有些党就要找寻方便”罢了。“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提和平手段?”当然，毛泽东不反对讲一讲策略，问题是，他认为，不能自欺欺人，而赫鲁晓夫的作法，根本上“就是向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屈服”。[41]

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已经和苏联党完全分道扬镳了。

结论

毛泽东与苏联党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历史上的积怨，有个人性格上的冲突，也有民族利益上的对立，所有这些矛盾冲突都不可避免地在双方之间造成了隔阂，特别是促成了毛泽东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与苏联日渐疏远。这些矛盾冲突，在不同的时期，也分别起着程度不同的影响双方关系的作用。但是，所有这些矛盾或冲突，都不曾，也不能根本改变毛泽东对双方关系本质的看法。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主要不满是哪些呢?归纳毛泽东的历次谈话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斯大林始终不信任他，先是在中共党内扶助支持留苏学生王明等人，长期压制他，打击他，以后他仗打胜了，又怀疑他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另一个铁托。

2、抗战时武器给了国民党，不支持共产党；1945 年抗战胜利了，可以推进中国革命了，斯大林竟又强迫他去与蒋介石谈判，“不许革命”；以后仗打起来了，斯大林始终怀疑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3、斯大林总是盛气凌人，摆出一幅教训人的样子，处处凌驾于他人之上，大摆老子党的架子，在他访苏时有意冷落他、教训他，让他憋了一肚子的气。他始终不喜欢斯大林的书和文章，也是为此。

4、批评斯大林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要中国为苏联建橡胶园，将东北、新疆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不许第三国染指，建合股公司，要控股权等。

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上述怨言可以看出，他的感受过程大致是：斯大林先是不信任他、压制他，不支持他，然后又不许他革命，仗打起来不相信他能胜利，仗打胜了又怀疑他是民族主义者，冷落他，摆架子，最后是不能真正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不能平等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几个方面，毛泽东讲得最多，感受最深，也是最不满的，其实主要是前三项，即压制他，不许革命，和冷落他。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斯大林有怨言，不喜欢，最后却还要尽力地维护斯大林?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利害之争。换言之，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分歧，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就其主要方面而言，甚至也不是民族主义方面或国家利益方面的。毛泽东的不满集中表现在：他认为斯大林早就应该支持他、信任他、帮助他来实现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理想，并且能够平等地对待他。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定出兵援朝之后，斯大林开始频繁地与毛泽东互通信息，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感观迅速好转了。照他自己的说法，斯大林从此终于相信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地改善了。

从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变化的过程来看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关系变化的情况，我们看到的事情发展的方向正好相反。如前所述，赫鲁晓夫上台后尽力与毛泽东搞好关系，在民族利益方面尽可能满足毛泽东的意愿，修改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提供各种可能的援助，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趋势。当毛泽东发现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则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对赫鲁晓夫抱以不信任的态度。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导致毛泽东在许多问题都曾大发脾气。但是，使毛泽东根本失去对苏联信任，导致双方关系迅速走向破裂的根本原因，还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否定斯大林，否定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毛泽东过去一切成功实践和一系列正在进行的新的革命尝试，就是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在把意识形态视同生命的毛泽东看来，是最不可原谅的。

----

[1] 《毛泽东给陶毅的信》，１９２０年2月；《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１９２０年3月１４日，《新民学会资料》，第６１，６５页。

[2] 有记录可查的这种谈话即有两次，１９２３年6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在另一次毛强调：“要帮助中国开展运动，唯有靠俄国的积极支持（外交和军事上的）”。见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２１３－２１４，２３６页。

[3]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１９４５年5月３１日。

[4] 参见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6—428，436—442 页。

[5] 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 344—351 页。

[6] 参见〈季米特洛夫致毛泽东电〉，1943 年 12 月 22 日；〈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4

年 1 月 2 日，1 月 7 日，RPSDMH，495/74/342.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接见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1963 年 9 月 9 日，等。

[7] 参见〈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 年 3 月 31 日。除中文记录外，并见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 期。

[8] 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另外，在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948 年 6 月开除南斯拉夫之后，以蒋南翔为团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曾访问过波兰和苏联。他们注意到，在波兰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的代表们起立欢呼几乎每一位国家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就是不欢呼铁托和毛泽东的名字。据留苏学生反映，苏联党这时经常有人在机关和学校作报告，说中国党走的是南斯拉夫道路，搞富农路线。见林利:《我对中苏关系的几点回忆》，1981 年 7 月。

[9]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9 页。

[10] 《刘少奇致毛主席并中共中央电》，1949 年 7 月 11 日；7 月 27 日。

[11] 《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1956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与契尔年科的谈话》，1963 年 2 月 23 日；师哲前引书，第 431－461 页。

[12] 前引 RPSDMH, 495/19/217；延安整风期间，博古等曾明确谈到共产国际代表当时对毛泽东的看法。

[13]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 6，8 页。

[14] 前引《毛泽东自述》，第 33 页。

[15] Sergei Goncharov 著，马贵凡译:〈科瓦廖夫谈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最初态度〉,《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2 年第 5 期；师哲前引书，第 437—438、454—458 页；裴坚章前引书，第 19—20 页。

[16] 参见《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1956 年 9 月;《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4 页。

[17] 《毛泽东接见英共代表团的谈话》，1956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 年 9 月 23 日；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3 页。

[18]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的信》，1940 年 11 月 4 日。

[19]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 年 1 月 30 日。

[20] 《毛泽东致恩来电》，1941 年 5 月 14 日。

[21] 《毛泽东致季米特洛夫电》，1941 年 7 月 15 日。

[22] 根据徐焰披露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 64 个陆军师和 22 个空军师的装备，除 20 个陆军师的装备和 375 架米格 15 战斗机是斯大林无偿提供给中国志愿军的以外，其余都是有偿提供的，并且一部分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给苏联的租借物资。这段时期中国仅欠苏联的军火款就有 30 亿人民币，约相当于 7 亿美元。见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与回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990 年版，第 31—32 页。另外，毛泽东自己讲，中国欠苏联的帐总共 70 多亿卢布，其中只有 3 亿美元是借款，其余都是朝鲜战争买武器的钱。《毛泽东与日共中央委员的谈话》，1964 年 1 月 5 日。

[23] 在中共党内，在许多年里，任何敢于对毛泽东这种对外援助表示异议者，均受到打击。王稼祥 1962 年就因为写报告向毛详细说明这种援助对国家损失太大，而遭到贬斥。当然，在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初，为了对抗苏联，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作法才有所改变。因此文不涉及与苏联决裂之后的问题，故略之。《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讲话》，1963 年 4 月 25 日。

[24]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3 页。

[25] 前引《米高扬的秘密赴华使命》；并见前引《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毛泽东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谈话》等。

[26] “谦谦君子”一词出自中国古代《诗经》，以后泛指讲仁讲义之人。故中国从来有“君子言义，小人言利”之说。

[27] 参见师哲：《回忆刘少奇同志的国务活动》，1982 年 3 月；50 年代担任过中方俄语翻译的林利，在 1981 年写的有关中苏关系的回忆中，也突出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

[28] 根据已知的资料，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里公开对中国表示赞赏并主张其强大的，多半只有莫洛托夫等少数几个人。前引师哲回忆。

[29] 见前引《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2—333 页。

[3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第 1476 页。

[31] 刘少奇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直率。1949 年 11 月和 1950 年 1 月，刘少奇都有过关于应当重视中国革命理论经验的谈话。在 1950 年 1 月的谈话当中，刘直截了当地对苏联人表示了不满。称，外国同志只知道苏共的历史，对中共更为艰苦和危险的斗争几乎不了解，即使知道，也是皮毛，这个问题需要苏共高层领导与中共高层领导共同研究来解决。前引 Sergei Goncharov 文；库里克：《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远东问题》，1994 年第 5－6 期。

[32]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即《战争和战略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1—542 页；《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954 年 8 月 1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卷，第 530—532 页。

[33] 《毛泽东接见波立特的谈话》，1955 年 4 月 29 日。

[34] 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 4、18—19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卷，第 283—284 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25 页。

[35]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 年 11 月 15 日，《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21—322 页。

[36] 参见裴坚章前引书，第 39－42 页；王泰平前引书，第 220－222 页；Sergei Goncharenko, The Military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37] 《毛泽东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发言》，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91—298 页。

[38] 转引自彭继超：《原子弹爆炸前的彭德怀》。

[39] 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潮》，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6—77、108 页。

[40] 参见赫鲁晓夫著，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52—555 页

[41] 《毛泽东接见澳共总书记的谈话》，1959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客人的谈话》，1961 年 12 月 5 日，等。

孙中山与共产党
——基于俄国因素的历史考察

众所周知，孙中山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经由当年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再由孙中山作主，将共产党人引入国民党，授予重要职务，而逐渐形成的。在两者关系中，俄国的因素显而易见。问题是，俄国的因素对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究竟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容共"究竟是"联俄"的诱饵呢，还是确实看重了共产党人的才干？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好坏，是否也是受到他与莫斯科关系的影响？或者说，是俄国因素的影响多些，还是中共自身政策的影响多些呢？提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孙中山在世时对共产党问题发表过不少态度大相径庭的谈话，共产党人当年对孙中山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时好时差。如果我们不注意事情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不做深入系统的研究，只是出于一己之角度，抓住一两条线索，对孙中山的言论各取所需，就只好听任立场各异的研究者在那里自说自话，而无所适从。[1]鉴于过去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缺少有针对性的探讨，本文试图依据已经公开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就此做一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合作"问题的由来

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就个人而言，历史上早有交往与合作。[2]只不过，最初两部分人主要

是意气相投，不存在组织之间的问题。正是由于意气相投，当中共最初成立时，国民党中的个别骨干或国民党前身老同盟会的成员，还积极协助，甚至参予其间。[3]因此，即使中共初创，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也仍有发生。如 1920 年中共在上海建党后，国民党人即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陈独秀也欣然赴任，即是证明。同样的情况，1921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甫告成立，就配合共产国际代表，主动邀请国民党人与中共等各个革命团体的代表一起，组成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共同策划东亚的反帝革命运动。[4]孙中山对此也慨然同意，指定张秋白为国民党代表，且授予正式委任状。[5]说中共成立后即排斥国民党，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6]

从中共“一大”及其会后的表现看，中共内部对国民党的态度一度确实不尽一致。“一大”曾有决议主张“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甚至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7]然而，由会议报送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却清楚地解释说：多数与会者相信，依据中国的现状，“我国的军阀就是社会上一切其他阶级的敌人。”[8]共产党需要与其他党派共同行动，以反对共同敌人，这“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因此，与国民党合作的想法，实际上又是共产党方面主动提出来的。这是因为，1921 年中共成立时，只有区区 50 余人。一年之后，即当中共二大召开时，也仅有不足 200 人。力量如此弱小，又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要想切实推动中国革命和谋求自身组织发展都极端困难。曾经在爪哇从事过工人运动，有过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一大”后一听说共产国际有召集中国各个革命团体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消息，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他几乎马上就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取得了联系，并积极谋求会见孙中山。1921 年 12 月，马林得到孙中山的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在那里停留了 9 天，与孙进行了三次长谈，并广泛接触了国民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9]随后，马林又进一步赴国民党的根据地广州访问，与更多的国民党人进行了沟通。此次就近对国民党进行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列宁也向在莫斯科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共两党代表表达了同样的意愿。[10]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就共产党方面而言，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实在是大势所趋。

有关这时孙中山对马林建议的态度，留下来的资料不多，但孙中山对自己的信念和力量充满自信，无意与共产党联合的情况显而易见。在桂林，孙中山明确告诉马林：他与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对中国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刻意模仿苏俄的作法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1]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赞成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他直率地告诉为马林做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12]在几年后马林公开回忆的这些只言片语的对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后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小组织的看法。而他在这里特别批评的所谓小集团，无疑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

孙中山的数次长谈，以及国民党当时所显示出来的力量，显然对希望能够像在爪哇那样大干一场的马林，产生了影响。回到上海之后，他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不已。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他对国民党的状况做了一番热情扬溢的描述，不仅强调在国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接触过社会主义，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断定“孙中山同工人已经有了长期的联系，党的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强调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非常响往俄国，说国民党虽得到少数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国民党

在政治上从未反映过资产阶级的要求。他的结论是：共产国际应当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全力去帮助中国共产党。至于力量弱小，又与工人运动毫无关系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出路也许就是加入国民党，因为在那里他们才可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看来，国民党的“纲领为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入党提供了可能性”。[13]

马林是如何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具体提出这一建议的，还不得而知。但首先提议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无疑是马林，而不是孙中山。已有资料显示，他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接连同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领导人，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商谈。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在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张继等人看来无疑是一件好事，因此他们明确表示欢迎。但当马林转过来建议中共中央移往广州，“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时，却遇到了阻力。得知马林将转而前往莫斯科做游说工作，陈独秀在 4 月 6 日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写了一封态度强硬的信，详细说明了他们的不同意见。内称：

马林君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

（一） 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 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 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 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 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14]

尽管陈不愿在孙陈之间做出选择，但 50 余天后，即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就炮轰总统府，发动了武装叛变，中央不得不很快督令依靠陈炯明活动的广东共产党人站在孙中山国民党一边，甚至不惜为此开除了不听命的广东党的负责人。注意到越飞、马林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代表正在积极谋求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共中央支持孙中山，赞同与国民党合作，实乃大势所趋。[15]

中共中央赞成国共合作，但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他们坚持在这种合作中两党至少要平起平坐，并且理应由共产党来负政治指导之责。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来开展工作，这或多或少损害了共产党人的阶级优越感。马林刚一返回莫斯科，中共就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白提出：以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扶助民主派起来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

投降附属与合并”。他们坚持，对与国民党的合作问题，应由自己“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16]

但是，在了解到国共两党力量相差异常悬殊的状况之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还是接受了马林的观点，要求中共“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17]8月 12 日，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上方宝剑急匆匆赶回上海，马上拉上张太雷会见了张继，说明了共产国际的上述指示精神。然后即开始做陈独秀等人的工作。为了等待北京的李大钊和张国焘到沪一同讨论，中共中央的会议被迫延至月底举行。在此期间，孙中山恰好因军事失利由广东退回上海，马林遂向孙中山转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与孙中山和张继等具体讨论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及改组国民党的相关问题。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做国民党的党员，孙中山当场表示赞成。故马林立即与李大钊、张国焘、翟秋白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个别交谈，再做说服工作。28 日至 30 日，马林与中共领导人更集中到杭州西湖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一点持有异议，但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参加讨论的执委会委员们一致认为，通过积极参加这个民族主义运动可以为我们的工作创造最有利的条件”。[18]会后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9]

在说服了中共中央之后，马林相继与张继和孙中山等再度进行了具体讨论，孙中山很痛快地表示愿意亲自接纳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人入党。在孙中山委托张继等与在沪各负责人商议，并通电国民党相关支部后，国共两党终于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达成了协议。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了国民党。[20]随后，根据与马林商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很快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参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21]他同时还任命与吴佩孚来往较多的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同吴佩孚联络的代表。当李大钊等向他说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的情况时，他则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22]

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

孙中山为什么愿意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一，与孙中山这时对党的认识有关。长期以来，孙中山始终认为，党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比较孙中山以往动辄宣布接受整队整队的军阀军队的士兵入党，而毫不在意这些士兵实际上仍在军阀势力指挥控制之下的做法，不难想象他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会有同样心理。其二，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当然不会改变对中共的轻视，但他却不能不看到陈独秀这些人背后存在着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支持。孙中山接纳陈独秀等人入党的时间，恰好在他再度遭受地方军阀的排挤，被迫退出广州之后。自 1917 年依靠西南军阀在广州另立政府以来，这已是两度遭遇排挤或叛变，被迫退回上海了。还在广州率海军舰艇坚持抵抗叛军之际，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信给契切林，明言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3]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两度严重受挫的孙中山这时对苏俄的援助会抱以怎样一种期望。一方面想要得到苏俄的援助，另一方面从列宁开始，一直到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都再三提议国共合作，孙中山当然明白这里面的轻重关系。而联合苏俄，首先理顺与共产国际，特别是与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也确属必要。毕竟，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看来，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受其约束，至少要比让中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

力量，与国民党竞争政治资源来得有利。[24]

十分明显，接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就孙中山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容纳”问题。它与俄国因素密切相关。特别是两度严重受挫之后，孙中山也已经深切地感觉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必要了。[25]他接受共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多少含有想要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振兴国民党的意图。这正是为什么他不仅“容共”，而且一上来就赋予共产党人相当职务和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从俄国人介绍的成功经验和自己革命的种种教训中，他不能不意识到，单靠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还不够。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国民党；要振兴国民党，就必须在组织和宣传方面下功夫。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国民党自身的干部显然没有可能。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正是孙中山试图利用共产党，以汲取俄国经验的一种尝试。毕竟，在宣传组织方面，共产党人更具奋斗精神，更有才干些。[26]孙中山后来在解释他将共产党员谭平山引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担任要职时就说过，他看重谭就是因为谭“有能力和有才智”。[27]用他的话来说：“彼共产党成立未久，已有青年同志二百万人，可见彼等奋斗之成绩。”[28]引入共产党员为我所用，理所当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当马林建议说，国民党应仿照俄共（布）的形式，召开全国性代表大会，建立建全组织机构，通过决议和纲领，集中并贯彻党的意志时，他马上表示了肯定的态度。[29]

自 9 月初起，孙中山就开始了改进国民党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4 日，孙召集在上海的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举行谈话会，一同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6 日，他指定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一个半月后，党纲及总章草案形成，交孙中山审阅后，再交国民党本部集议审查。11 月 15 日，孙中山召集范围更大的第二次谈话会，讨论和审议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党纲与总章。12 月 16 日，他再度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和修改宣言草案。在随后任命的国民党本部重要干部名单中，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被指定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则就任宣传部干事。[30]

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 1923 年 1 月 1 日公开发表。其中扼要地阐述了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和革命目标，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31]这是中国国民党自 1919 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具体说明自己的奋斗目标。[32]孙中山就此解释说：

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失败。军事进行，现在也有了多年，靠着他来改造国家，还说不定成功与否。所以政、军两种进行，成败都未可必。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古人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宣传便是攻心。又说：“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我们能够宣传，使中国四万万人的心都倾向我党，那便是大成功了。……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我们要晓得宣传这种武器，服一人便算得了一人，传入一地便算有了一地。不比军队夺了城池，取了
土地，还是可被人推翻的，还是很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工夫。不如此，这目的就难以达到。[33]

汲取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

但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而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相异趣。其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34]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虽然全力争取苏俄的援助与同情，并且不惜吸纳共产党员，却坚持不同意在中国另搞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就在其接纳共产党员并通过宣言、党纲仅 20 多天之后，他就在上海与苏联政府的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他在声明中坚持写上了“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等字样。[35]可见其必欲区别于苏俄态度之坚决。尽管孙此举多少含有想要避免刺激列强的成份[36]，但以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之热衷与坚持，和他以往对共产主义与苏维埃制度之怀疑，此举绝非单纯为了掩人耳目也是可想而知的。

孙中山对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看法，言论很多。但最能典型地反映出他这时内心看法的，还是 1922 年 6 月陈炯明叛变之际他在广州与达林（A. S. Darlin）的一段谈话。在达林详细地说明了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优越性，以及共产党人为何认为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等问题之后，孙中山表示了他的意见。他认为，俄国实行的，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均平主张，或者说更接近于太平天国洪秀全搞的那一套。他怀疑，在现代文明的条件下，这样一种方式多半会与现代人的理念背道而驰。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三民主义起源于美国，与林肯（Abrabam Lincoln）总统所谓“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的口号意义相通。而中国的问题更与西方不同，外国是患不均，中国是患贫，因此，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还不存在西方社会那样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问题是如何用温和的和建设的方法，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弊病的问题，而不是用共产主义去提倡阶级斗争，用苏维埃制度去实行阶级专政。鉴于达林等再三宣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好处，他的建议是如果俄国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也只能到容易接受均平思想的落后地区去，而不要在城市里直接做试验。他慷慨地表示：“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37]

共产党对孙中山的态度

孙中山的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努力创造一个比西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平等一些的改良的社会。他与共产党人的相同点，主要在于他们当前所面临的主要敌人和决心用激烈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的观念是相同的。而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孙中山没有特定的依靠对象，因此也不存在固定的敌人，一切取决于人们是否赞成和接受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却是坚持以阶级划线的，他们相信社会上存在着压迫与被压迫、有产与无产等相互对立的不同阶级，他们是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只能依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革命中实行真正反映被压迫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策，坚决与压迫阶级和有产阶级为敌。从他们的角度出发，他们当然不会接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政策主张。恰恰相反，在理论上以及内心深处，他们充其量不过把孙中山国民党看成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领袖及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相信或迟或早，他们都要发动十月革命，造成自己的政权。因为他

们坚信自己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阶级的代表，是人类的未来命运的主宰，最具远见卓识且最能反映全体人民利益，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优越感和政治使命感。[38]由此不难想象，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根本上只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状大。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关系，自然会存在矛盾甚至冲突。

陈独秀已是中共党内这时比较看重孙中山和支持加入国民党的一派领导人了。即使是陈独秀，刚刚加入国民党，也明白提出：对国民党既要联合，也要斗争。他在写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这样写道：

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得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更要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39]

在莫斯科的俄国领导人，毫无疑问比陈独秀等更具政治上的优越感。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当然上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自信已经革命成功的社会主义俄国，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源泉和力量源泉。特别是刚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战胜了十四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他们中许多人明显地对推动中国革命也充满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按照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他们相信应当帮助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但他们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把在中国发展共产党视为他们情感上和政策上都必须争取的目标。更何况，他们在理论上也深信，国民党终将随着中国阶级分化的加剧而走向分裂。推动这种分化，迎接这种分裂，就成为他们对国共关系的一种理所当然的期待与政策。共产国际再三告诫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把促进中国阶级斗争作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一项基本任务，实在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40]而推动阶级分化，促进阶级斗争，国共关系纷扰不断自不可免。

就在马林 1922 年夏天从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支持建立国共“党内合作”关系的八月指示不久，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明显有些不同的较为激进的决议，以强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决议告诫说：“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屈从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心，不论是张作霖的中心，吴佩孚的中心，还是孙中山的中心，都是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于，要以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中国统一的倡导者的身份开展活动。”要在建立统一国家和争取与苏联结盟的斗争中，“支持那些给予工人阶级以发展和建立组织的充分自由，并拒绝与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集团。”“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41]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共产国际内部，还是中共中央内部，对马林不满的倾向迅速升高，甚至很快就出现了指责马林右倾的声音。[42]这种批评自然使马林的工作遇到阻力。

为了证明自己的方针正确有效，马林于 1922 年 12 月 23 日再度返回莫斯科申诉意见。他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四个月时间两党关系的情况，做了十分乐观和充满希望的描述。在他看来，不仅中共从此有了更便利的宣传条件，而且他们可以经常性地自由批评国民党的某些缺点，这种方式已经在国民党内得到了认可。他坚持，任何试图修改几个月前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指令，“希望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众性共产党的人，在我看来是

完全不顾现实情况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把我们的在中国的策略建立在我们的一般方针和我们的一般立场上”。而应当采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因为现实的情况是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即使存在，也只有与民族主义运动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才能发展。而他在中国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后所得到的切身体会是：“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和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即使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团体的活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43]

马林的报告明显受到部分与会者的质疑。维经斯基坚持必须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的要求，把教育落后国家共产党开展对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斗争，和发展无产阶级运动作为共产国际特别重要的任务。而在以往的指令中，对此强调得不够。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共有丧失自身独立性的严重危险。马林对此坚决否认，他坚持过去的指令没有修改的必要。他断言，在中国，应当把革命民族主义，而不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应当认识到：“全部问题只在于如何调整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只有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顺利的发展，才有可能“在将来建立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真正的工人政党”。[44]

对于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争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这时采取了“和稀泥”的策略。这是因为，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的前两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刚刚开过会议，作出了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的决定，并且要求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里支付援助国民党的费用。[45]在这种情况下，刚刚参加过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布哈林，自然必须努力在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贯彻“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决定精神。但即便如此，他也十分清楚共产国际不能单纯从苏联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他既不反对维经斯基提出的建议，也不反对马林的观点。他的说法是：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任务是成立工人政党”，二者不可偏废。[46]会议最后形成的文件事实上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决议肯定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强调国民党由四种人组成，工人运动尚不强大，中共党员应当留在国民党，这大都符合马林的看法。[47]而指出国共党内合作“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却无疑是维经斯基等人的意见。[48]而只要有了后面这种意见，马林在中国的工作就注定会遇到不少麻烦。

一方面强调“全力支持国民党”，赞同越飞和马林关于“必须立即着手把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9]的观点，准备向国民党提供大笔援助；一方面却坚持要独立地开展共产党的工作，强调共产党要大力组织和争取工人群众，争取“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这明显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任务。如同莫斯科对越飞与孙中山签订声明，只承认它所想要的有关孙中山承诺的那一半，却不支持越飞承认的孙中山想要的另一半一样[50]，它所带来的麻烦难免造成莫斯科政策本身的紊乱。因为，从苏联自身利益的角度“全力支持国民党”，着手将国民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的努力，必然导致国民党中心地位和发展势头的迅速增强。与此同时，又让本来就坚信代表最先进阶级，最反映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也把争取建立强大群众性政党作为自己“重要而特殊的任务”，结果必然会使国共两党因争夺群众而陷入纠纷，以至出现相互抑制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也或多或少地有所意识。马林离开莫斯科后不久，维经斯

基等人就开始隐晦地批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方针。他们对马林把中共中央搬到孙中山身边去不以为然，断言中共中央设在广州“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并不得不通过政治上的种种让步而交换国民党政府所给予的种种“好处”。他们甚至明确主张，绝不能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除非孙声明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治原则，并与张作霖等军阀划清界限。在此基础上，他们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明令马林：“指示他不要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而要向孙逸仙提出条件”。[51]

事情很明显，孙中山为争取苏援而接纳共产党，想要借此发展壮大国民党，便利革命。而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却更指望中共自身迅速发展，对要不要“全力支持国民党”意见冲突。这种情况难免不会对本来就极其微妙的国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马林路线”的失败

虽然共产国际向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时提出了发展群众性政党的目标，但这样一种目标最初距离中共毕竟还十分遥远。马林对此更是不以为然，声称：“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 250 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中国如此之落后，“要在当前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52]

1923 年 2 月 7 日，被中国共产党人引为骄傲的京汉铁路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遭到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镇压，一度颇具声势的北方工人运动一朝倾覆。这种情况对那些一心希望独立发展的共产党领导人震动极大，他们因此开始意识到孙中山国民党及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价值。于是，马林的观点终于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因为如此，马林回到中国不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批评共产国际一些人“想入非非”了。他异常坦率地宣称：“在中国建立群众性政党，今后许多年内都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要在中国采取建立独立的共产主义政党的政策，既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这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当前，在中国唯一重要的工作，只有国民革命运动，也“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53]
1923 年 6 月，中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负责指导会议工作的马林与中共部分领导人之间再度发生争论。开始赞同马林观点的陈独秀，在他起草的决议案中承认：因为中国产业落后，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但负责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和负责工会组织工作的张国焘，以及北方工会组织的代表则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在中国没有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能与工人力量的发展相比，海员和铁路工人的罢工显示了他们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地方我们可以控制工会工作，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影响”，“我们完全有机会发展我们自己的组织”。而“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能帮助他们，不能扩大他们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去。[54]

问题是，“二·七”惨案发生之后，党内的情绪已大为改变。蔡和森和张国焘等人的主张没有能够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马林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既然中共几年之内很难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中共有条件发展壮大之后再来进行国

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又具有国民革命的明显倾向，苏联也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当然责无旁贷的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总不能因为“怕加入国民党有危险，而留在党外”。更没有必要担心工人群众会因为加入国民党而被扼杀了革命精神，恰恰相反，要想推动国民党走向革命，就必须在国民党大量充实革命分子，培养强有力的国民党左派，从而克服国民党的种种错误倾向。马林最终促使中共三大作出决议：不仅正式批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且没有直接提到任何旨在争取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实际目标。[55]

马林对通过共产党来发展、推动国民党充满了热情。他为此甚至不惜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尖锐批评那些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策略是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莫斯科的意向是让党在共产主义旗帜下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吗?”实际上，中国“党是个早产儿”，“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它的“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鼓励同志们到国民党中去，并把用这个办法支持国民革命看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不应凭想象去工作”。“绝对不要为此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能在工会的宣传中利用这面旗帜”。因为，第一，许多人“害怕共产主义”；第二，它会“削弱俄国同中国国民党人的合作”。“那些希望我们集中全力去建设群众性共产党的人”，恐怕“是完全忽略了事情的实际情况”。[56]

问题是，马林的热情并未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配合。在 1923 年初，广州克复，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因此逐渐停顿下来。这不能不让马林倍感沮丧。马林到底还是一位共产党人，在他的观念中，革命只能是像法国以及俄国革命那样，在中心城市宣传和组织群众来进行。为此，自与孙中山接触以来，马林始终都在强调党的组织和宣传的意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利用军阀夺取地盘的革命方式。为此,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在中共的刊物上化名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只会使自己日益背离下层民众的意愿和需要。[57]在孙中山丢掉广州的情况下，马林的这些批评意见确实很少引起国民党人的反感。但在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之后，他却无法再用过去的方式向国民党提意见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5 月 6 日山东临城发生土匪抢劫火车，打死一英国人，劫掠 26 名外国人。事后，孙中山委任负责外交事务的伍朝枢起草电报，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要求各国撤销对此事应负责任的北京政府的外交承认，以予中国人民另行建设全国公认政府之机会。对国民党请求列强帮助的作法，马林极感不满。他除了写文章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批评这一作法以外[58]，还当面向孙中山提出异议。结果，他发现孙中山不仅无动于衷，而且对他重提加紧改组国民党工作和加强政治宣传的问题，干脆也一口回绝，坚持一切必须等到军事问题基本上解决之后。[59]

对孙中山态度的变化，马林十分焦虑。他终于不能不转而开始注意到中共的作用。他提出了用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去“引导这个政党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的想法，提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60]马林据此推动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决定，以中央委员会诸委员的名义联名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联合会组织成为自治政府。[61]他建议，如果孙中山不能接受这样的建议，“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62]

按照马林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陈独秀等五名中央执行委员起草并向孙中山提交了他们

的建议信。信中强调，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站出来领导民众的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为此，"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以便争取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新的政府，进而建立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国革命的新军队。但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孙中山明白表示，他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把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因为他看不出这会有什么结果。他坚持，当前关键的问题，还是要争取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军队。据陈独秀报告说：当他向孙中山提出，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中山的回答是："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63]

关于在西北或东北建立一支军事力量的设想，是孙中山久已有之的一个梦想。为此，他坚持与张作霖保持密切关系，同时极力劝说苏联政府的代表支持他在西北地区，如新疆和蒙古边境等地建立军事基地。随着 1923 年 5 月孙中山得到莫斯科同意提供 200 万金卢布援助，并愿意与他的代表讨论西北军事计划的消息后，他明显地对坚持广州根据地和发展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给予了更多的关注。[64]在极力协助苏联外交代表越飞为孙中山争取到俄国的援助之后，马林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注意到孙中山在军事上的进展，广州根据地的巩固和苏联的支持，马林开始失去耐心了。在他看来，只要孙中山仍然身在南方，他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控制广东。而军事上越有利，他就越会满足于政治谋略，"而更不乐意与我们接近。"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承认 ："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因此，他尖锐批评越飞不该为孙中山争取到 200 万金卢布财政援助，断言"以前拿钱支持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过去这 200 万元对孙中山也许至关重要，但对一个已在广东立足并能驾驭局势的统治者来说，就远不是那么重要了。如果莫斯科继续"让孙保持控制权，那对于整个运动将是有害的。"与其为了帮助孙中山控制广东把 200 万元塞进南方将领的腰包，真不如用 2 万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65]

但到这个时候再来鼓励共产党进一步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与竞争，已经太晚了，它反而会让正在期待苏联援助的孙中山怀疑共产党人蓄意拆台。7 月 18 日，在马林最后一次与孙中山等人进行谈话时，孙中山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66]

据马林后来报告说，孙中山当时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溜走了。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做些辩护。但无论如何，孙中山坚决维护国民党，不允许身为国民党员的中共领导人公开批评国民党的态度，是再清楚不过了。为此，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就紧急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严重情况。根据各方

汇集的情况可知，不仅孙中山对中共的批评强烈反感，而且上海和广州的国民党人都表现出同样的情绪。他们甚至怀疑陈独秀等人只是想利用国民党，孙中山委任他为大本营宣传委员长，他却在利用这一职务做同国民党决裂的事情。面对这种情况，不能不留在国民党的中共领导人深感为难。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共产党自身的立场，他们无法不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问题，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组织上的独立性；但基于共产国际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决议，他们又不能轻易破裂与国民党的关系。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决定是，继续过去的路线，在批评上避免激烈词句，同时加强有利于国民党的宣传。[67]这样一种方针，显然不可能解决问题。

其实，国共关系中的麻烦，也并不仅仅是国民党人的感受问题，中共自身也困惑不已。仅以中共中央驻地问题为例，马林千方百计把中共中央弄到广州来，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连马林自己都发现这是一个馊主意。在孙中山身边，任何与孙中山意见分歧的言论都难免会引起纠纷，孙中山严厉批评陈独秀，就是因为得知香港英文报纸不满国民党在广州不能管束陈独秀等人言论的消息所致。而与此同时，把中央搬到广州来，原本来是马林想要更有效地通过中共中央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工作的进行。事实上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几乎无事可做。相反，北方政治出现危机，中共反而没有力量去领导和组织强有力的政治宣传。

到 1923 年 7 月，马林不仅自己灰心丧气，而且也失去了共产国际的信任。眼见在马林的影响下，中共中央转而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自身的发展宣传工作受到影响，共产国际东方部对这位荷兰人有理由强烈不满。一位在北京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报告尤其能够反映出他们的这种不满情绪。报告称：由于党员全部加入了国民党，“党的工作这里进行得很少。本来它的规模就不大，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68]马林成了东方部官员嘴里的“右派”的代名词，自然不足为奇。当得知马林终于要被调离中国之后，一位东方部工作人员忿忿不平地表达了这些人的心情：

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外交人民委员部需要这样，但不要把党牵连到这种事情里去。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同它一起经受种种冒险、病痛、阴谋、欺诈等等。[69]

孙中山的希望与两难

马林在 1923 年 7 月下旬离开了中国。步其后尘，莫斯科很快派来了另一位“马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莫斯科给这位名叫鲍罗廷(M. M. Borodin)的新代表的指令当中所提出的要求，与马林路线几乎毫无区别。
在这份由中央书记斯大林签署的指令当中写道：“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70]这意思明明白白，就是鲍罗廷的工作还要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国民党为中心。如果鲍罗廷只是像越飞那样，纯粹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倒也说得过去，问题是鲍罗廷同时也受命担任共产国际在华南的代表。过去马林只因为帮助越飞做了一些外交性质的工作，就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强烈批评，如今鲍罗廷本身就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

不得不接受他为自己的代表，其地位之尴尬显而易见。

当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鲍罗廷与马林还是有所不同的。这首先因为他是俄国人，16 岁就参加了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1903 年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站在多数派一边，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因而不仅政治上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也都有很好的关系。鲍罗廷所以被莫斯科看重并派往中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英语很好，曾长期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达 12 年之久。而且自从共产国际于 1919 年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参予共产国际的工作，并负责指导过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的联合战线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私交不错。当加拉罕被受命前往中国接替越飞担任驻华全权代表之后，加拉罕立即就想到了鲍罗廷，把他推荐给斯大林，建议由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首席政治顾问，以便于他能够全面掌握中国南北方的情况，灵活协调对华外交。

鲍罗廷 8 月经由中国东北进入中国，先后到达北京、上海，并在上海与张继及陈独秀交换了看法。10 月 6 日，他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到达广州。鲍罗廷到达当天，孙中山就接见了他。而这个时候，恰值孙中山因为军费所累，试图强行截留广州海关的关税余款，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各国开始发生冲突之际。且几个月来，“广州几乎无日不在叛逆势力的围困之下与骄横军人的蹂躏之中”，“财政困难达于极点”[71]，这不能不让孙对广东根据地危急形势和争取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更增添了紧迫感。与以往在广州时小心翼翼地不愿与莫斯科扯上关系的情况相比，孙中山这时的态度变得异常坚定。而他格外重视鲍罗廷，还因为他注意到鲍罗廷与马林有很大的不同，鲍罗廷不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在莫斯科有良好的人缘，而且是苏联驻华外交使团的正式成员之一，受到曾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的高度信任。对鲍罗廷给予高度礼遇，将有利于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施加影响。

孙中山久经政坛，深知欲寻求外援，实现政治抱负，非要有所凭藉不可。他在 1922 年 11 月 24 日给蒋介石的信中就明白地表露了他的这种心态。他告诉当时急于取得苏联援助的蒋介石说：要想取得苏援，“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有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72]如今凭藉在手，又有苏联外交使团成员到来，他自然会不失时机寻求援助。他不仅要求苏联由海参崴通过海路向广州运送援助物资，而且明白告诉鲍罗廷，只要他还能守往广州，他就一定会与苏联建立起直接的联系。[73]

一方面孙中山需要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内外交困的局面，也促使孙中山再度对俄国人的组织宣传方法发生兴趣。而在这后一方面，作为俄国布尔什维克老党员，鲍罗廷的现身说法尤其具有说服力。他用亲身的经历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显然极大地触动了孙中山。仅仅接触了短短的两三天时间，孙中山就对鲍罗廷有了很好的印象，并对鲍罗廷所介绍俄国经验深以为然。鲍罗廷到后第四天，孙中山就在双十节举行的国民党党务会议上首次公开以俄国革命为借鉴谈论起国民党的问题来了。次日，他即下令重新启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他公开承认：“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关键就在国民党缺乏组织、缺少革命精神和巩固基础，“故十年来党务不能尽量发展，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为此，他明确提出：以后当 “效法俄人”，“以党治国”。[74]马林在孙中山身边数月不能实现的目标，鲍罗廷到后几天便顺利推动，其个人魅力之大不难想见。

鲍罗廷显然擅于发现问题所在。过去，每有外人问到国民党时，孙中山都会以 10 万乃至 20

万之数告之。[75]鲍罗廷一来就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 3 万，缴纳党费者仅有 6000，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 3000。即使这 3000 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它偶尔发表的由孙中山签署的有关三民主义目标的宣言，多半只是作为新闻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就一切照旧，党丝毫不能因此而得到发展。事实上“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再加上持续战争，或因军费巨额开支造成滥征捐税，或因战争需要大量强制征兵、征夫、征粮，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政权甚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76]当鲍罗廷把这些问题一一分析给孙中山听之后，孙中山也承认问题之严重，因而更看出加强党的工作，以扩大群众影响的重要。[77]

必须集合有献身精神的党员个人的力量，革命才有希望，这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交谈后得到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受命前往上海的廖仲恺在解释孙中山所以必须改组的理由时，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他说，孙先生在广州已经历三次失败，“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过去虽曾组织集体入党，但“当时以团体加入之党军即为后日攻总统府之人。可见入党者须以个人，不可用团体也。假使广州方面有相当数目（如有十万党员）之党员，何致得历次失败之结果，党员本在民众之内，果有多数党员，庶足制伏军队，因为徒恃军队必至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 [78]

党员多，则民众多；民众多，则足以制伏军队。这也是孙中山在与鲍罗廷谈话后所得到的一个重要的结论。而要有效地发展党员，聚拢人心，扩大宣传，实现以党治国的目标，也只能借助于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很快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下令成立了包括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和共产党员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根本原因。显然，孙中山这回是真正下决心要模仿俄国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开始全面改组国民党了。

既要改组国民党，扩大宣传，发展组织，共产党员的作用自然又显露出来。10 月 25 日，孙中山召开会议，正式宣告改组决定之后，马上就在鲍罗廷的建议下，指定了包括中共领导人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有鲍罗廷的推举和孙中山的批准，更多的在广州的共产党员投身到改组工作中来了。

鲍罗廷不仅成功地争取到了孙中山的信任，同时也成功地与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领导人建立起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他不是像马林那样毫不隐晦地贬低中共的作用，否定中共理想的目标，而是向中共党员反复解释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决定性作用和壮大国民党就是为了壮大共产党的道理。他一边不断地与中共党、团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一边经常提醒党团领导人说：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使国民党的工作面向群众，面向人民”，使所有的工人、学生都迅速觉悟起来，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但这不妨碍我们同时把最革命的人吸收到共产党内来。只有我们才能把国民党变成革命的大熔炉，“从这个熔炉中提取我们自己的党所需要的材料”，为将来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打基础。[79]当然，他坚持共产党人必须步调一致听指挥。他明确提出：“党中央必须把关于纲领的准备好的发言稿发给它的代表，而为了不使我们的计划落空，我们的人必须有组织的发言。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发言甚至不应有任何修改”。[80]

当然，鲍罗廷对国共两党同时具有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他能够使孙中山与共产党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孙中山这时的一段批示中得到清楚的印象。

11 月 29 日，华侨出身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领衔上书孙中山，指陈鲍罗廷时与陈独秀等共产党人集会讨论国民党政纲政策，似可见此“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这显示“为苏俄政府所给养”的共产党，正在“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81]

孙中山这时确实在委托鲍罗廷代为起草制定国民党的政纲及党章等重要文件。他也清楚鲍罗廷与共产党人之间有来往甚至会议。但是，整个政纲党章的讨论和修改，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指定的委员会在负责，最后还要经孙中山亲自审定批准，所谓“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自然纯属子虚。因此，孙中山对此明白解释说：政纲草案等“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

但“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这句话，却清楚地反映出孙中山对共产党的不满。十分明显，注意到鲍罗廷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一心希望得到苏联全力帮助的孙中山，难免会对中共与俄国的关系心存芥蒂乃至醋意。他严厉地指出：以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当然，孙中山并不认为这是俄国人的问题，他反对把俄人与中共相提并论，且因此愈加相信有吸收中共党员入党之必要。他为此特别解释说：“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乃俄国自动也。”“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党政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遇〈遏〉，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且要彼等必参加国民党与我一致动作，否则当绝之；且又为我晓喻之谓民族主义者正适时之良药，并非过去之遗物，故彼等亦多觉悟而参加（对）吾党。”“不能以彼往时反对吾人，而绝其向善之路。”但他最后仍旧强硬地表示了他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事的决心，声称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82]

从孙中山的上述表示，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味道。他之所以会接受俄国人的干预和劝说，吸收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虽然有欣赏共产党人能力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却还是由于“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因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这实在过于困难。如果说他开始时还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话，那么他这时显然早有领教了。他之所以能够对马林脱口而出地表示：“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就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陷入到这样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然，在孙中山看来，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做出抉择的地步。万一逼不得已，他还是能够做出壮士断腕的举动的。他曾经明白告诉共产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83]

共产党人处境尴尬

孙中山对中共态度两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同样也使自己到陷入两难的境地中。

1924 年 1 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召开了它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就其形式和规程都是仿照俄共（布）党的方式来的。事先起草了大会宣言和党章，组织了宣言、党章、组织宣传、党务等议案审查委员会，成立了大会主席团，最后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从此开始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事一决的议事制度。其党的总章关于会议制度、上下级关系、组织设置、各级职权范围及纪律制裁等项规定，几乎照搬了俄共（布）党章的内容。[84]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做了与共产国际近乎一致的解释。共产国际在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根据与代表团讨论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决议，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于在中国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革命目标的理解。其民族主义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军阀，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同时承认国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其民权主义坚持区别于"天赋人权"说，强调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自由权利；其民生主义主张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85]国民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宣言，除了在民生主义的解释上坚持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观点以外，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解释明显地与共产国际决议的解释相一致，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也突出强调了依靠工农和工农利益等问题。[86]这种情况让俄国人极为满意。

接到鲍罗廷的报告后，加拉罕在写给契切林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大会宣言"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其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87]包括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也"与我们党即共产党的章程接近"。加拉罕感到尤为庆幸的是，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表现"十分出色"，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没有用任何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言论给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给党纲、党章的制定制造麻烦"。显然，包括加拉罕在内，莫斯科的一些人对此曾经相当担心。[88]

比较马林走前中共方面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态度，不难看出共产党人此时对两党合作抱以怎样的期待。他们这时无疑对鲍罗廷的努力给予了相当的肯定，并尽力与之配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一大前后都极力保持低调。即使在内部，他们也明确地规定了避免引起纠纷的方针。这包括对会议期间的人事安排，为了避免嫌疑，确定了"共产党员不应该在各委员会中谋求职位"的原则，和尽量不采取推荐自己人担任各级职务的办法。对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初也只计划由鲍罗廷推荐两名自己的同志。在选举代表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消极的做法，"拒绝当候选人，大家都选孙为代表，他们在选票上只写'孙逸仙'，别的什么都不写"，"以便不给如此热衷于保护每个席位的国民党右派提供说闲话的任何借口"。[89]共产党人的这种做法自然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它反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加入国民党不久的中共党员虽然尽力保持低调，其所得地位仍显得十分突出。中共及青年团这时总人数虽然只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二，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到了全体代表人数的百分之十。代表大会上新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跨党的中共党团更

占到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90]。出现这种情况显然与对代表产生和推举委员拥有指定和最后决定之权的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同样，在会后设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跨党的中共党团员在一个秘书处和六个部中占据了两个部长（组织部、农民部）和三个实际为副部长的秘书（组织部、工人部、农民部）的席位[91]，同时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里还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发言权[92]。特别是同意把秘书处和组织部交给中共党员来负责，虽然或多或少可能会有鲍罗廷建议的成份在内，它能够得到孙中山的首肯，也足以反映出孙中山有利用中共发展组织的想法。

改组国民党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要让国民党人理解自己引进共产党员的良苦用心。因此，为了消除对引进共产党人的疑虑，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曾做过两次发言来做释疑工作。

大会开会第二天，他就专门发表民生主义的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不同。说过去"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极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故俄人极力称赞国民党所主张之三民主义，而中共亦悉心研究并认定救国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93]

然而，对于孙中山的说法，与会的国民党人仍旧表示怀疑。称：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来自上海的代表何世桢就明确提出应当禁止国民党员跨党的动议。对此，中共方面基于内定的原则，的反映十分温和，回答亦力求诚恳。其党团会议委托李大钊于 28 日的会议上说明了跨党的原因，解释说中共不能解散是因为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并非纯粹中国人自己的组织，其党员要加入中国国民党自然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解散这一国际的组织。况且中国革命也需要这样的组织在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中间做联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基于国民革命的共同目标，并非想要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李大钊还郑重地保证说："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94]孙中山要的就是服从，有了中共的保证，国民党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和胡汉民都自动为容共的办法辨白，此事才不了了之。

但中共组织新立，党员数量寥寥，却能利用国民党在各省组织欠缺又急谋发展的机会，在众多地方党部中取得支配地位，同时一举取得国民党中央重要职权，因此虽有孙中山的坚持，和李大钊在大会上的保证，国民党内反对中共跨党的声浪依旧一波强似一波。国民党一大后广州几位国民党老党员甚至组织秘密小团体以抵制共产党，各地的老国民党人也纷纷拒绝与跨党人员合作，或拒不到任，或分庭抗礼。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国共两党人员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对立，并导致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形成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对此，力图巩固现有成果的中共中央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它在国民党一大后专门召开了三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进一步告诫党员：

"本党所以必须与国民党合作，因就中国眼前之经济状况，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国民革命，这是国民党对中国的历史使命"。"今以国民党明达领袖的决心，我们素所期待的改组国民党的理想，竟一一开始进行，这实是中国革命前途的幸福。我们在国民党改组以后更当以努力

扶持他们，不可因他们以往的缺点，预存嫌恶藐视的心理”。“对他们中间极腐败的分子，亦宜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须尽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对于国民党比较不接近我们的分子，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而“为求本党同志与国民党能圆满的合作”，尽量避免国民党内发生左右之分歧，“我们的同志，应站在国民党立脚点上”，“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以免“使国民党党务，及国民党对于本党的信任，俱受不良的影响”。甚至，会议还特别提出，在发展本党组织时，亦须十分慎重，不应使国民党“误会我们有意拉去他们的党员”。今后一切工作均“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95]

事实上，在国民党各级部门的中共党员最初也确是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去做的。自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工作之后，中共的组织发展就已经受到影响。谭平山就报告说：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 30 多人，国民党一大前，广州 12 个区只组织起 12 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 9 个区委，64 个支部，拥有党员 7780 多人，我们在 5 个区委和 13 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结果他们总是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使我们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据阮啸仙 4 月间的报告，广东的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在国民党内，虽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看见我们努力的成绩暗生嫉妒，或因我们影响其升官道路而向我们攻击，我们都以“忍辱负重”之精神，“为革命家唯一的信条”，不与之纠纷。以至于今天，一般工人、农民只知我们是“好国民党”、“新国民党”，而不知有共产党。鉴于国民党内状告中共的案件日渐增多，尤其众多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一大轻易取得其中央及地方高位不满，经中共中央批准，谭平山和林伯渠等还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等职，以示诚意。[96]

不过，国共终为两党，中共中央虽有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担任国民党内各种职务，尤不应包办其党务的规定，贯彻起来到底十分不易。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以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为常务委员兼组织、宣传部长等，日常工作实际上均由组织部秘书毛泽东、宣传部秘书恽代英等跨党人员负责处理，他们要想在上海执行部分管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上海 4 省 1 市顺利开展党务工作，较多援引自己同志在所难免。北京执行部管辖范围更多达 15 省，从组织、教育宣传，到青年等各部部长及秘书、助理等，大半也都是李大钊、蔡和森、朱务善、于树德、张昆弟、王尽美等跨党人员。国民党原来在北方多数省份就缺少基础，唯一有些基础的北京地区的国民党组织又与共产党人格格不入，分庭抗礼，李大钊等要想进一步在各省筹党部和开展工作，亦只能选派其熟悉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及其他自己的同情者。汉口执行部管辖湖北、湖南、陕西三省党务，原委派老资格国民党人覃振、张知本主持，二人均因汉口执行部跨党人员太多而未到任，最后不得不改由中共党员林伯渠主持，结果汉口执行部自然也就成为中共人员及其同情者的阵地。这种情况只会进一步加剧两党人员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国民党人不了解的是，如此大量地将为数有限的中共党员投入到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中去，其实也并非中共中央所乐见。

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大量开始了发展党员的工作，仅北京执行部一年时间就发展国民党员上万人。但与同时，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1921 年 7 月中共一大时，党员 50 余人；1922 年 7 月二大时，党员 195 人，一年增加近 4 倍；1923 年 6 月三大时，党员 432 人，一年增加两倍多。此后至 1924 年 5 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召开，即国民党改组前后一年时间，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一些地方还明显减少。[97]

各地报告党员不见增加的原因："一因同志现注意国民党的工作，所以对于一般人，都介绍进国民党去了；二因介绍本党同志，务在严极，故新党员人数自然不易骤增；三是同志宣传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98]在这里，后两项原因过去就存在，并没有太多影响党的组织发展，因此受国民党工作影响导致中共自身组织发展停滞，无疑是这时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

共产党、孙中山泾渭分明

以牺牲中共自身的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的发展，这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看来，显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相信："国民党所以必需共产党者，以其可以藉手共产党对于广大群众得以组织之、操持之"，"盖国民党之发展，纯恃共产党于其工作之中予以各种之协助也"。[99]但是，以共产党发展的牺牲为代价，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看来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明确提出：关于工人阶级究竟应当在国民党的旗帜下成为民族革命力量，还是应当直接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应当尽快得到解决。[100]注意到中共代表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公开声明，维经斯基更是感到不安。他并非不知道李大钊此举乃是中共党团为对付国民党内反对势力的一种策略，未必真有若何意义。[101]但在紧接着发表的文章中，他仍旧批评了鲍罗廷在这个问题上的指导和态度。有什么必要为国民党制定严格纪律和集权化的章程呢?他为此写道：考虑到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阶级的分子，包括部分地主、工业家和商业资本家的代表，"过于使党集权化的章程，可能在将来对国民党左派不利，如进一步发展，则可能使国民党变成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国民党内争得更多的民主，俾使国民党左派有较大的回旋余地"。毕竟，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它需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具有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特殊使命，它不仅要促使国民党走上反帝和民主化的道路，而且还要担负共产国际所赋予的阶级斗争的任务，幻想在国民党内保持绝对的统一，而不发生左右派冲突，是不可能的。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刚刚发生的土耳其革命的教训，维经斯基明确认为，中共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民族运动结合起来"。[102]

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东方部内部始终存在着一股反对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发展任务的力量。这些人过去强烈地反对马林路线，如今进一步发现鲍罗廷其实也在妨碍中共发展。过去苏联大力援助土耳其凯末尔（Kemal）民族主义运动，结果凯末尔取得政权，共产党成为阶下囚的历史，时刻刺激着他们必欲在帮助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时，迅速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只是，在加拉罕等人看来，维经斯基等人实在是有点庸人自扰。他声称：这些同志"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考虑到对孙中山的援助力度远大于当年援助凯末尔，并且有鲍罗廷等苏联政治和军事顾问直接介入和参加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又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加拉罕根本不相信在中国会存在类似的危险。他坚持说："国民党在中国的运动根本不同于土耳其，越飞当时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土耳其的民族革命运动把共产党投入监狱，或者干脆将他们暗杀，它宣布共产党非法，还指责我们支持共产党，因此（同）我们的关系十分冷淡。我们同国民党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对土耳其，我们只提供了几万支步枪、大量火炮、机枪和 1000 多万元的金卢布。"在这里我们的顾问参加这个国民革命运动党的中央，我们在这里享有极大的威信，而我们的指示和建议对于党具有特殊的意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它在广东境内，在国民党执政的地区完全合法地开展自己的活动等等，等等。""差别是不寻常的"。[103]

像任何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一样，尽管在莫斯科所有的一切，无论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

还是共产国际的政策，最终都是由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那几个人做出最后决定的，但基于不同利益的不同工作系统之间，从来都难有有效的沟通机制。抱着各为其主的心态，每个工作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都难免从自己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并固持己见，除非最高决策层会做出有别于自己部门判断的决定。对中共比较有利的情况是，这个时候，由于苏联在外交上还受到大多数列强的孤立，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因此，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很少有人能够轻视共产国际的作用。这种情况自然加强了维经斯基等人发言的力量。不管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说些什么，维经斯基等人还是照样我行我素。

1924 年 5 月，维经斯基受命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支持孙中山，肯定国民党一大重要意义等问题上，维经斯基没有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根据维经斯基的观点，会议对国民党的性质，以及国民党内的矛盾，得出了相当激进的结论。这包括：第一，国民党就其性质而言，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它必然趋于妥协，不能奋斗到底，故其内部的左右派斗争不可避免。“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而我们的同志实为左派的基本队伍，“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第二，为巩固国民党左翼，减杀国民党右翼势力，必须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的作法，并设法改变自己在国民党改组问题上过于强调集中与一致的缺点，必须了解：“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因此，应努力在各种场合开展对右派的公开斗争，“迫令国民党全体左倾”，绝不能“因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第三，“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一个狠大的错误”，它不但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只能将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用国民党的名义加以组织。在工会运动方面，必须由我们自己组织纯粹阶级斗争的工会，而不能帮助国民党设立各种工会或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会全体加入到国民党中去。第四，鉴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将阶级斗争引入国民党，因为“民主主义的政党内，阶级利益的调和不但不能增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而且足以使之减少”。[104]

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是中共放弃自我约束的谨慎政策，重新开始采取积极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会议并没有否认继续扩展国民党的必要性，并且肯定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同属左派，但反对盲目扩大国民党，反对在工人中发展国民党，主张在国民党内开展左右派之间的斗争，这些都必然会使国共两党之间已有的隔阂与矛盾更加加剧。再加上中共本身的干部资源就十分有限，又要肩负国民党的工作，又要把重心转到发展共产党方面来，结果必然会顾此失彼，引起国民党人更多的猜疑。其实，国共两党因共产党员跨党所引起的矛盾，早在 1922 年底就已经显露出来。上海、北京、汉口等地都有相当多的纠纷发生。以北京为例，国民党人早就结社拒绝“二重党籍”者加入。李大钊被委为北京支部总干事后，依照国民党改组计划设立“青年国民俱乐部”，结果反而形成新的纠纷。至国民党一大推选代表，到北京执行部成立选用干部，中共中央虽有明文要求避嫌，真正要想做到也相当困难。毕竟派往周边各省市组建党部的同志，大都是自己人或同情者，遴选范围十分有限。而愈是这样，就愈会造成壁垒森严的局面，双方的隔阂也就愈深。[105]

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孙中山通常总是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他的治党原则就是要求下属服从。他对党内任何担心和怀疑共产党作用的意见从来都是一句话：我自有办法。他最反感党员对他的决定提出异议，包括对接受共产党员入党一事，其态度也是：“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106]只要“我及汪精卫、胡汉民等可称为综合派”者居中调和

掌握，“定可支配大局无疑矣”。[107]这一心态，多少与他在思想上将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有关。他一向自认革命要靠他这样极少数“先知先觉”者想出道理，想出办法，居中把握，同时取得相当一批“后知后觉”者的拥护扶助，身体力行，最后推动大批“不知不觉”者冲锋陷阵，才能成功。从这一认识出发，孙中山坚持党内一切都要由他独断独行，过去组织中华革命党，要入党者印手模宣誓效忠是如此，如今换了中国国民党，其对下属的要求也无多少改变。他显然对他的国民党充满自信。他曾不无骄傲地告诉那些满腹疑虑者说：“某党不敢公然独行乃假冒本党之名者，足见本党牌子之老而能受人信仰”。即使中共服从三民主义并非真心，也不要紧，只要其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就对我有好处。“我意惟恐其不假冒，君不见今日市上老牌子之巨肆乎？假冒愈多，则彼牌子愈响，如此不花钱之宣传，吾等又何乐而不为哉？”[108]

那么，孙中山就真的毫无戒备之心吗？也并非如此。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孙中山虽然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他同时也指定明明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109]，并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110]因此，孙中山这时对那些纷纷告共产党状的老国民党人，不仅从来网开一面，而且每每相当坚定地告诉他们不必过虑。比如，国民党一大刚一结束，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就私下召集华侨及各省党员数十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问题。此事随即被人告发，鲍罗廷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孙中山对四人予以申斥。孙为此召四人于士敏土厂，当面询问。据鲍罗廷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几个在孙中山面前表现得像“胆小鬼”一样，都不敢承认自己有小集团活动。一个说自己是偶然参加进去的；一个说自己原打算向孙报告的；一个“张着嘴，什么也说不出来，话卡在嗓子里，脸在抽搐，脸色发青”；只有一个人表示不满：为什么共产党人可以有自己的党，“而我们这些忠于孙的老国民党员，连开会都不行”？[111]无论鲍罗廷所述是否真实，孙中山对四人显然没有任何惩戒的意思，只是循循开导而已。几天后，孙中山并发出通告，宣称他对四人的解释“甚满足”，“此事当作了息”。[112]不仅如此，因不久后汉口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纠纷被令停止活动，孙还特意选派对中共极端反感的刘成禺前往，“全权办理湘鄂豫军政大事”。据刘成禺记述，行前孙中山特别告诉刘说：要他去，就是因为知道他“与共产党人水火”，故让他远离党务。对刘成禺强调共产党跨党居心不良的问题，孙当场表示：不必在意其真心与否，“只问我诚不诚”。“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113]

孙中山这里所说的“默化之”，指的就是希望能够使共产党人最终服膺三民主义的意思。将其概括为“溶共”，也并非不可。毕竟，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其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很快就全面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其中详细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从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

孙中山明确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都以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为中心，在这一点上二者没有不同。不仅没有不同，而且还应该是“好朋友”。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民生主义则相信“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因为人类要求生存，便要为大多数谋利益。因为人类不断地基于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才发生了社会进化的问题。在这里，阶级战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

中发生的一种“病症”，并非社会进化的原因。马克思“倒果为因”，甚至断定资本制度一定要消灭，因而主张用农工专制和革命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许多事实与预想不符，造成无数纷争，这是二者的区别。所以，讲民生主义，也讲共产，但“我们所讲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更不会用革命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

孙中山在谈到中国的情况时说得更明白。他说：在中国，“今天讲社会主义，极时髦的人是赞成马克思的办法”，尤其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更希望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来实行，因此“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来活动”。而他们不了解，中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贫穷，不能照共产党主张的那样马上来均贫富，而是应该在吸取欧美贫富悬殊的教训的情况下，一方面采取措施节制私人资本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却要赶快用国家力量来振兴工业，发达资本。孙中山特别举出俄国来做例子，说明落后的中国绝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来均贫富。他明确讲：

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这个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国实行马克思的办法，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要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国、美国，我们中国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行马克思的办法呢？所以照马克思的党徒，用马克思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114]

孙中山详细阐述其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之异同，目的很清楚。一方面是要消除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人的疑惧，说明无论俄共，还是中共，他们的主张里面都有和三民主义相通的地方。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因此，三民主义实际上比共产主义还要彻底。而另一方面，孙中山也是希望人们都能了解，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不仅如此，他显然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不仅在欧美不适用，在俄国不成功，马上拿来解决中国问题，就更是南辕北辙了。中国距离欧美的发展水平几乎是天上地下，即使与俄国相比也差得甚远。俄国革命后都因经济程度太低而不得不转而改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又怎么能够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呢？中国的病症根本上是一个穷字，故解决中国的问题，首重发展实业。他虽然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那只是防患于未燃的措施，与共产党人主张夺取人民已有财产来实行共产或收归国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115]

孙中山与弹劾共党案

知道孙中山内心的信念与愿望，就不难了解他在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共两党纠纷时为何会采取调和的立场了。事实上，无论是鲍罗廷，还是陈独秀，也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孙中山其实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种“左派”。随着各地国共两党之间的组织人事纠纷越来越多，特别是 5 月 31 日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不顾国民党人的一再抗议，坚持与北京政府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政府为一国之合法政府之后，鲍罗廷更明显地看出孙中山与共产党人距离之大。因为，无论是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北京政府，还是双方谈判过程中围绕

外蒙古地位问题的讨论，国共两党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完全相反。中共基本上以苏联的立场为立场，而国民党人却多半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尤其让鲍罗廷感到不安的是，围绕着《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的签订所发生的一系列国民党人公开抨击苏联政府的言论，其实是得到孙中山某种程度的认可的。这种情况清楚地显示出，孙中山不仅不可能走到共产党人这边来，而且随时可能与苏联的民族利益立于相反的地位。[116]鉴于此，作为身负苏联外交使命的人员，鲍罗廷不能不利用孙中山还需要苏联援助的现实需要，设法抑制国民党内这种对立的情绪继续发展。据此，他很快开始压制那些敢于公开发表反对苏联政府言论的国民党人。当然，这仍然要以国民党的名义来进行。鲍罗廷的策略是，在国民党内鼓励派别之争，逐步造成事实上的分裂，以便最终把右派赶出国民党。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为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严格地说，国民党人这时得到的这些中共文件，正是中共极度小心谨慎，努力自我约束，注意避嫌与团结，力主发展国民党时制定的文件，对国民党并无明显不利的言论。但由于众多国民党人从根本上疑虑中共跨党之目的，必欲排斥共产党员，因此此等文件的发现，仍旧让一些人如获至宝，造成强烈反响。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南下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党案，一面找上门去与鲍罗廷理论。

在鲍罗廷寓所中，张继等直截了当地提出："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看来，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全为苏联指挥，因"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解释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至于党团问题，完全是由于国民党自己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又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而引起的，并非蓄谋如此。事到如今，"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强调："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117]

这时，国民党内向中监委控告共产党人的案件已有20件之多，连署党员将近2000人上下。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乃至农民团体，都因共产党人和排共的国民党人相互对立，而出现分裂对抗的局面，国共纠纷已呈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情势，鉴于中央监委正式提出弹劾案，一向力主调和的孙中山，也不能不考虑对共产党人有所惩戒。故不顾鲍罗廷的反对，决定在8月前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共党案。

由国民党来讨论裁决共产党的问题，这对刚刚通过决议要求加强独立自主和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当头闷棍，顿时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激起强烈不满。他们深信，对孙中山此举只能反击，而国民党很可能会借机要求中共党员退出，两党关系难免破裂。因此，中共中央迅速发布党内通告，强调：虽然"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鉴于国民党右派对我们的攻击和排挤

日甚一日，今后态度上必须更加坚定，不仅要公开谴责右派，在国民党内展开派别斗争，而且凡是表示左倾的分子，都不应再介绍其加入国民党。为预防万一，现在应努力争取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可能时即发起国民对外协会，以便不得已时取代旧国民党而做“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118]

自从加入国民党以来无穷无尽的纷扰，早已让陈独秀对此种政策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孙中山决定受理弹劾案的态度，更进一步使他对孙中山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他明确讲：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是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都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支持国民党，只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中派乃至右派，因为他们控制着国民党的全部机构，在他们的国内政策中有许多反劳工的东西，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则有许多反苏联的东西。他断言：继续这样支持国民党，必将给远东地区的革命带来严重影响。他强烈地“希望共产国际据此制定新的政策”，再“不应当毫无限制地支持国民党了”。[119]

陈独秀的反应不论在哪一部分俄国人看来，都是过于激烈了。甚至，几天前还在国民党中监委面前表现出强硬态度的鲍罗廷，都对孙中山的决定感到惶惶不安，担心继续对抗下去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20]因此，他立即对中共中央准备破裂的态度提出了异议，并推动中共广东区委通过了一项反对中央态度的决议。[121]为缓解国民党人的疑虑，考虑到孙中山等人的主要担心是中共企图借助于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因此，鲍罗廷开始考虑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有关事宜。据此，鲍罗廷开始缓和态度，并频频与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进行商谈，将上述建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讨论，主张以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联络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对中共的不信任问题。应鲍罗廷之邀来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瞿秋白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让国民党来监督自己与共产国际关系这样一种措施。因此，它迅速作出决定，强硬地提出：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国共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22]

8 月 19 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讨论弹劾共党案问题，相关提案达 34 件之多。与会中执监委总共 20 人，中共党员占五分之一。在摘要宣读相关提案后，张继首先说明了两党纠纷之情况。他分别从“共产派在党中为党团活动之实事及其刊物”；“海内外党人与共党派分子冲突之真象”；“共产派分子加入本党之始源（原）以信义为指归，现在发生纠纷，应负其责”；“第三国际、共产党是否适宜于中国社会情形”；“革命党人应有自尊精神。以俄为挚友则可，以俄为宗主则不可”；以及“主张实际的协同工作，名义上跨党益滋纷扰”几个方面做了冗长的说明。由于 20 日中央政治委员会已经最后内定解决方案，故 21 日国民党领导人决定迅速结束争论，就政治委员会的方案达成协议。会议主席胡汉民明确提出：“这次党内纠纷主要原因即在发见团刊之后，情感愈形险恶，但细察团刊内容，用语不当处固多，

而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有一个阴谋的党团。现在惟一的解决方法比较的照政治委员会草案甚为适当。”[123]结果，在 8 月 23 日的会议上，二中全会最终通过了政治委员会拟定的《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和《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两项决议草案。决议同意共产党员对于与中共之关系，及其与共产国际之关系，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但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内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通报于该委员会，以便能为国民党人所了解。[124]

一届二中全会的结果，显然不是国民党中监委所期望的，甚至也与孙中山原先的设想有相当的距离。这也就是为什么，“决议案一通过，中派（指孙中山等－引者注）显然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于是向全会提出还应该发布关于这一问题的训令以‘教育党员’。”结果，围绕着这个训令稿，又发生激烈争论，最终“中派”还是不得不做出妥协。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十分明显地是因为会议召开时，正好出现了极端不利于国民党的严重局面。这次大会开幕之际，恰好是得到港英支持的广州商团为要求释放因走私入境被扣押的军火公开准备全面罢市之时。广州的形势在会议进行期间相当紧张。会议闭幕当天，商团已拒绝孙中山的告诫，提出了一系列强硬要求，随时可能爆发严重事变。显而易见，这种严峻的形势对孙中山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加上苏联的军火正在运往广州途中，会议自然不便通过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和明令约束共产党员言行的决议。为了表示不偏不倚，孙中山甚至还发表演说严辞训斥了那些继续鼓噪的老国民党员，并下令开除了不听劝说，坚持公开组织反共活动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125]

不过，即便如此，中共中央还是不能满意。听说国民党二中全会仍旧通过了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决议之后，陈独秀当即召回了瞿秋白，斥责其“擅称代表”。瞿秋白虽依据鲍罗廷的解释再三说明这种做法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但中共中央仍以此为耻辱，并坚持认为瞿秋白等理应利用这种机会公开地向国民党右派展开进攻。[126]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报怨说：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给了我们以沉重的打击，孙中山和其他领导人继续保持中派态度，他们既不能开除我们，又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动派，反而利用反动派的压力和宣传来压制我们，鲍罗廷却要求我们向这种压力屈服，接受国民党的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我们虽然为此致电鲍罗廷，说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以及我们的坚定态度，不幸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仍旧这样决定了下来。陈独秀显然对鲍罗廷最感失望。他在信中说：“象我们这样年轻的党，很难把工作做好。我们经常需要共产国际的好的建议和指示”。因此，我们“请建议共产国际提醒鲍罗廷同志，同孙中山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他还会上圈套，还要提醒他始终要同我们党进行协商”。[127]

孙中山的去世及影响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对共产党的伤害，毕竟只是形式上的，因此，中共中央的不满很快就告一段落了。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国民党的批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弹劾案导致感情恶化而开始变得更尖锐了。在共产党人看来，尽管召开了国民党一大，决定了一些激进的政策，事实上孙中山的主要精力依旧是用在了军事和政治方面，一切还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为中心。中共中央重新注意到当年马林的那些意见，进而开始强调革命不能依靠军阀，诉诸武力，而要发动组织工农群众，一切以宣传和组织群众为中心。他们因此把自己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受到压制的情况，也都归结成是孙中山为维系政权、军队和北伐所造成的结果。

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后，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国共两党人员之间的关系更加趋同水火。先是邵力子在上海遭右派国民党人痛殴，进一步又发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仁被国民党右翼打死，并使另外数人受伤的更为严重的情况。在广东方面，国民党掌控的机器工会与中共领导的工会之间，也是无日不斗。国民党县长、工厂厂长乃至公安局长随意拘捕工农、阻禁罢工、妨碍成立工会或农团军等情况，也是经常发生。面对这种情势，眼见孙中山进一步公开支持军阀之间的江浙战争，再度开始准备北伐，五月中执委扩大会议后决定要加强自身组织，并在国共合作中引入阶级斗争的中共中央，明显地认为已经到了非把自己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的分歧公开不可的时候了。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政策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国民党内动辄得咎的亲身经历有关。在共产党内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鲍罗廷的意见应该说是最信服的，但谭平山也明确讲：只要共产党员仍然和国民党捆在一起，共产党就一事无成。他举例说：国民党的工人部长参予镇压工人罢工，农民部长在工作时大抽其鸦片，你叫我们在工人部和农民部的党员怎么工作呢?我为此向中共中央多次报告过这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来信说得很坚决：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不得同国民党中派一道去镇压罢工和压迫工人。当国民党中派领导人执意反对工农的时候，共产党员可以退出工人部和农民部，同工人农民一道进行反对中派的斗争。而事实上，不要说退出国民党，就是要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又谈何容易？他在 10 月举行的广东区委联席会议上向鲍罗廷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马上就遭到了鲍罗廷的反对。因为事情很明显，在俄国人看来，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最主要成就，就是成功地树立了苏联在国民党中的巨大影响。而他们很清楚，这种影响的造成，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众多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起作用，而不能只靠几个苏联顾问。因此，鲍罗廷明确表示：只要退出一个部，那就意味着退出国民党。而退出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取得的大量阵地都会白白丧失掉。但问题是，这些阵地是否真的具有实在的价值呢？谭平山对此颇表怀疑。他强调，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他抱怨说：

孙博士同我们的韩麟符同志谈话时公开讲，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面前破坏国民党的威信，说什么国民党是一个不好的党。博士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的，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可是，中国共产党人破坏了国民党的威信，结果陈独秀成了共产党的创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还能够继续同国民党共事吗?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让他们去闯，不要管他们。国民党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产党，根本不想同共产党人一道工作。这些事实表明，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难同国民党再继续合作下去。我要说，我们最终只有两条路：要么消灭反革命的右派，根据国民党的纪律把他们开除去，要么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党。不这样，反动势力，即国民党右派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会日益壮大，会拖着国民革命向后倒退。即使国民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也会出现土耳其那样的局面，那里的民族革命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共产党也垮台了，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压迫并不比资本家好些，可以说是毫无区别。[128]

谭平山的说法，反映了相当多数共产党人这时对国共党内合作内心的困惑与不满。

中共中央的态度远比广东共产党人更为强硬。在注意到鲍罗廷总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或明或

暗地支持孙中山的做法之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要想改变孙中山和国民党目前的错误方针，唯一的办法就是直接要求苏联停止在军事方面为国民党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只要孙中山继续坚持他的军事方针，继续从与军阀的各种形式的联盟中寻找出路，他就绝不可能真正左转，国民党也不可能走向革命。到头来，苏联的“军事援助等于是在武装右派和中派来反对工人、农民和我们”。在参加了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讨论之后，瞿秋白悄悄写信告诉鲍罗廷说：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激烈地要求中共中央正式向共产国际控告您，“因为您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更主要的是因为您一向不把中央放在眼里”。[129]

为了设法抵制鲍罗廷的“错误路线”，中共中央于 9 月下旬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坐阵，以便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有关决定。同时还要瞿秋白打电报“召请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如果鲍罗廷同志认为这是必需的而且他做得到的话”。[130]只是，中共中央的这一系列决定来得颇不是时候。由于这时广州商团公开向国民党政府宣战，原本不赞成维系广东政权的共产党人马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最终也不得不站到国民党这边来。

商团事件的发生，本与广州商界乃至相当多数市民对广东政府为维持庞大军政开支而征收苛捐杂税的积怨有关。再加上港英当局的挑拨和地方军阀作祟，广州商界领袖陈廉伯等由自行组织商民武装自保，渐至走到与政府公然对抗的地步。自其走私武器被扣之后，商团与广东政府之间的冲突更不能不日趋白热化了。面对广州政府可能被推翻的严重危险，共产党人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鲍罗廷说得好：“现政府尽管依靠的是军阀，但它比以沙面、香港和伦敦为靠山的陈廉伯政府要好些。在许崇智支持的现政府下面，我们仍可以继续进行我们既定的必要的大量合法的工作。陈廉伯上了台，工会就将被消灭，我们的组织就将被消灭，我们自己也得转入地下”。[131]于是，要不要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有没有必要维系广州政权的问题，统统都成为次要的了。在得到首批苏联武器[132]之后，鲍罗廷立即推动孙中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将已经落入右翼军阀势力手中的广州政权夺回来，同时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联合的军事力量总司令，迅速发放武器武装工人和农民，随即展开了对商团的进攻。

在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与警察部队，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商团事件被一举平定了。这大概是孙中山去世前国共两党之间最值得提及的一次合作了。孙中山对此相当满意。事件的平定也缓和了鲍罗廷与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紧张的关系。过去，在政治委员会上，鲍罗廷提出的每一项激进的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几乎都会受到反对。国民党领导人很明白地告诉他，苏联许诺援助武器，至今未曾见到一枪一弹，既不援助武器，又怂恿国民党去到处得罪列强和国内各派势力，让人无法接受。而如今，这样的意见不见了。国民党不仅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军队，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消灭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商团武装，而且由于苏联公开提供武器来装备国民党的学生军，使广州附近心怀鬼胎的各派军阀一下子变得恭敬多了，孙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了。

10 月 23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成功地把曹锟赶下了台。他进而发出通电，呼吁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共同进京，成立全国和解政府。面对这一突发性事变，一向希望孙中山能够在北京发挥作用，一举成就中苏同盟关系的加拉罕力主孙中山应该接受邀请。鲍罗廷因此极力劝说孙中山北上进京。对此，中共中央的态度却依旧是反对的。即使在商团事件发生以后，他们的观念也丝毫没有改变，依旧公开批评国民党，不相信任何政治路线或军事路线可能达成革命。他们声称：坚持军事行动和广州政权，只能不断地造成“战争、苛税、杂捐、开赌、拉夫……等等恶政”。“革命党不拿政权则已，要拿便得拿一个全的，部分的政权

不仅于革命党无益，而且有害，前前后后的广州革命政府便是铁证”。[133]在得知孙中山准备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的消息后，他们的看法依然是：北京发生的一切并无特别意义，那不过是帝国主义美国决定抛弃吴佩孚，代之以冯玉祥，孙中山不应当到北京去与军阀们搞在一起。[134]总之，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革命只能按照俄国的方式，即通过动员宣传民众，最后以群众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任何通过政治妥协或依靠军队逐步打败对手的办法，都不能算是革命，而且必然带来腐败和对群众运动的反动。
当然，中共中央的这种观点无论如何都过于机械了。孙中山对此不屑一顾，鲍罗廷更是积极推动孙中山北上。就连维经斯基也不同意中共中央的看法。毕竟，能有机会把革命的影响迅速扩散到全国范围来，这总是有利的。[135]随着维经斯基在 1924 年底再度来到中国，中共中央的这种机械的论调开始消失了。但更让维经斯基不能满意的，则是国共纠纷愈演愈烈，共产党却仍旧处于被动状态，半年多来党的组织只发展了 400 余人[136]的这种状况。在 1924 年 12 月初举行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再三解释说，这是因为鲍罗廷总是一味地向孙中山妥协，妨碍了中共积极进攻。维经斯基却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问题的关键不在鲍罗廷，而在于中共中央自己。因为不管鲍罗廷是否注意这些问题，中共自己都要能够坚持独立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国民党在反抗帝国主义者，甚至在俄国，在莫斯科的许多群众大会上，听众也只知道国民党是中国的革命的党，孙中山是中国唯一的爱国的革命者，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却没有人问：中国是否有共产党，他们在干什么?为什么我们共产党自己不能在反帝斗争中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呢?[137]

受到维经斯基的鼓动，在紧接着于 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的主张更加充满革命性，也更具有战斗精神了。它开始更加突出地强调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密切联系，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参加民族运动时保持独立地位与阶级斗争目标的极端必要性，甚至更一步提出了要争取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主张。据此，会议检讨了自国民党一大以来党所犯的各种“错误”，再度指出最危险的错误就是：“（一）以为我们既然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便应集中全力于国民党的工作，不必同时进行我们党的工作”；“（二）以为我们既然加入多阶级的国民党做国民运动，便只好采取劳资调协的政策，不便鼓动阶级争斗”；“（三）以为我们应该帮助整个的国民党，不必助长左右派之分裂。”会议决定新的方针是：（1）反对国民党内部的阶级调和倾向，加强阶级斗争观念；（2）承认国民党的重要作用，但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作用，并揭露国民党中派领袖的游移态度；（3）加强国民党左派力量，扩展工农成份，推动中派左倾。[138]

让国共两党领导人都意想不到是，中共四大结束不久，孙中山就突然去世了。在此之前，国民党一切事务均由孙中山一手操持。对共产党员跨党问题，虽有众多国民党人再三再四地控告，孙中山也坚持他定的政策，下属无权置喙。特别是到 1924 年底，他已注意到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组织、宣传等各级部门中工作勤奋，成绩斐然，因而更坚信引入共产党员确有必要。他为此严辞斥责持异议者称：“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那意思分明是想说：“十三年来，民国绝无起色，党务并不进步，皆由尔等不肯奋斗之过。”若尔等当初肯奋斗，我又何必引入共产党员呢？[139]不难想见，以孙中山之独裁和他对共产党员工作的印象，只要不发生共产党方面公开挑战其权威并威胁到国民党基本利益的情况，他就能够把两党关系继续下去。在他的权威震慑之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都不能不受到相当约束。如今孙突然撒手尘环，两党间的制约力量顿时不复存在，国共关系自然会陷入到一种极其微妙并且危险的境地中去。

还在孙中山病重之时，已被孙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就联络一批坚决排斥共产党员的国民党老同志，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拥护国民党同盟会”，并在明知孙中山不会同意的情况下，坚持提出七项要求：（一）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部会的共产党员一律免职；（二）与共党有关的党内印刷所、学校、杂志的津贴一概停止；（三）有关一切现阶段的政治问题，请在共产党员以外指定三人处理并经办之；（四）派往各省的宣传员，属于共产党籍者，一律撤换；（五）二全大会应在北京召开，时间越早越好，剔除共产党员之代表；（六）各地党员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件，应由纯粹国民党党员组织特别裁判委员会予以裁决；（七）本党一切事情，今后不许外国人干涉。[140]不仅如此，鉴于孙中山已进入弥留期，他们更进一步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打出了排斥共产党的旗号。冯自由等人的做法，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势必会因为共产党问题而发生分裂。

国民党正在出现的这种危机，同样也引起了鲍罗廷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面对开始陷入群龙无首的国民党，鲍罗廷甚至颇为兴奋地报告莫斯科说：“我们还没有把孙逸仙送进坟墓，实际上在我们同国民党直接接触的整个时期已经不可避免的分裂就开始了。而且是国民党右派率先挑起的。”“当分裂真的发生时，国民党内的力量对比会是怎样的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种回答：将对我们有利。”只要清除了右派，那么就“可以大胆地说，国民革命运动整个战线的实际工作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掌握在左派手中。”[141]受此影响，中共中央也迅速行动起来，明确主张立即“公开的征求党员”，“乘此时机将左派扩充有力”，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第二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和右派竞争选举”。[142]

一方面国民党内排除共产党的倾向急剧发展，另一方面共产党内争取全面控制国民党的愿望与日俱增。十分明显，孙中山的去世，使国共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都进一步得到释放和发展。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乃至全面对抗，在所难免。

----

[1] 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不同结论，可比较以下两种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台湾方面者为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奖助委员会 1966 年版），大陆方面者为马齐彬主编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版）为代表。

[2] 中共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早在辛亥革命时就曾与国民党（当时还是同盟会）人合作，做过革命后安徽省都督、同盟会会员柏文蔚的秘书长。中共另一创始人李大钊也早就与国民党人张继过从甚密，在李当年好友白坚武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与张继曾常相来往的情形。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白坚武日记》（1），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42、44、54、56、77 页。

[3] 如沈玄庐、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等，原本就曾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中共早期组建活动的邵力子、戴季陶等当时就是国民党党员。

[4] 张太雷 1921 年 8 月回到上海，传达了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各革命团体参加伊尔库茨克会议的建议，并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一起承担起联络中、日、朝等国革命团体的任务。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 页；《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9－330 页。

[5] 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现易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Socio-Political History），全宗号 495，目录号 154，卷宗号 181，第 36 页。

[6] 多数中共党史著作依据中共一大通过的文件，均相信初期中共是严厉排斥国民党的。有些国共关系史著作并有专节说明此点。如王功安、毛磊：《国共两党关系史》，武汉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7 页。

[7]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 页。

[8]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4 页。

[9] 有关马林与孙中山会面的一些情况，可参见邓家彦：《马丁谒总理纪实》，《革命文献》，第 9 辑，第 203－207 页。

[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1 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第 198 页。

[1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 年 7 月 11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72 页。

[12] 马林：《和孙中山在一起的日子》，1926 年 2 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373 页。

[13] 没有证据证明有过“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语）的情况。达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从未提及此点，且马林此前早已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人表明了希望允许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见，达林亦难再提此议。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 年 7 月 11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70－71 页。

[14] 《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31－32 页。

[15] 吴相湘：《陈炯明与俄共中共关系初探》，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152－156 页。

[16] 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19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65—66 页。

[17]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 年 7 月 18 日；《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发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委任书》，1922 年 7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 年 8 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77－80 页。

[18] 关于这次会议讨论的情况，马林和陈独秀的说法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的地方。马林在会后的笔记中和随后给共产国际的口头报告中，都明白地说明“这个问题没有遇到激烈反对”，

“反对意见只是来自我们广州的地方组织，该组织支持陈炯明对孙逸仙的政策，因此该组织的领导人被我党开除。”但陈独秀和张国焘的回忆却强调会议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只是当马林“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马林：《工作记录》，1922 年 8 月 12 日－9 月 7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2—83 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 10 日，转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1 页；张国焘前引书，第 241－245 页。

[19]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 年 11 月底－12 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91 页。

[20] 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间，李云汉根据国民党公务部交际日记，断定为 1922 年 2 月上旬。但据李大钊自述，当为 1922 年孙中山在沪期间。因据马林笔记，李大钊 8－9 月间曾来上海参加讨论决定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杭州西湖会议，会后即有陈独秀等入党之事发生，故此判断李之入党当与陈独秀大约同时。参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157 页；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90 页。

[21] 马林记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 年 10 月 14 日；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4，92 页。

[22]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 5 期，第 12 页。

[23] 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6。

[24] 李云汉在其书中曾引用于右任的一段谈话，颇能反映出孙中山及国民党中部分领导人这时愿意采取容共政策的一个出发点。针对张作霖对孙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释说：“中山先生与你同一心理，但异其手段。有人驱逐共产党，共产党便想法独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产党转变为国民党，即共产党自然不存在。”李云汉前引书，第 214 页。

[25] 据李大钊回忆，当时孙中山在接收他入党时曾与他详细讨论这个话题。见李大钊：《狱中自述》。

[26] 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 年 11 月 21 日，《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357 页。

[27] 孙中山：《与〈顺天时报〉记者的谈话》，1925 年 1 月，《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5 页。

[28]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357 页。

[29] 参见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 年 12 月 2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182 页。

[30] 李云汉前引书，第 135－136，138 页。

[31] 《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 年 1 月 1 日；《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全集》，第 7 卷，第 1－5 页。

[32] 中国国民党改组以来，仅发表过一个组织规约，后于 1920 年 11 月做过一次修正，均极简略。《中国国民党通告及规约》，1919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国民党总章》，1920 年 11 月 9 日，《孙中山全集》，第 5 卷，第 127－131，401－403 页。

[33] 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 年 1 月 2 日，《孙中山全集》，第 7 卷，第 6－7 页。

[34] 前引《中国国民党宣言》。

[35] 前引《孙文越飞联合声明》，《孙中山全集》第七卷 51－52 页。

[36] 有关孙中山因担心列强敌视苏俄而牵连自己，不愿与苏俄太过接近的情况，在马林和达林等人的笔记和回忆当中，以及在给契切林等苏俄领导人的信中，都有所记载。比如，孙中山就曾告诉达林说："请你不要忘记了，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见达林前引书，第 113 页。

[37] 达林前引书，第 103－108 页。

[38] 陈独秀等共产党人这时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类似的观点。参见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 21 期，1923 年 4 月 18 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 22 期，1923 的 4 月 25 日；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 2 号，1923 年 12 月 1 日。

[39]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121 页。

[40]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1922 年 7 月 18 日。

[41]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 年 12 月 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62－163 页。

[42] 转见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拉狄克和萨法罗夫的信》，1923 年 5 月 30 日，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80 页。

[43] 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1922 年 12 月 29 日。

[44]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 年 1 月 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 188－190 页。

[45]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2 号记录》，1923 年 1 月 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 186－187 页。

[46] 《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 年 1 月 6 日。

[47] 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组织内是适宜的”一句，马林曾建议使用更为明确的语言，比如“他们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但没有被维经斯基接受。

[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 年 1 月 12 日，前引《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76—77 页。

[49] 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1922 年 12 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00－101 页。

[50] 莫斯科在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时，有意将声明中谈及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的一段删去，只保留了对其有利的内容。

[51]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的信》，1923 年 3 月 8 日；《维经斯基给萨法罗夫的电报》，1923 年 3 月 27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 228－229，238 页。

[52]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红色工会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东方部远东局－关于中国形势和 1923 年 5 月 15 日至 31 日间的工作报告》，1923 年 5 月 31 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 年 5 月 31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90－191，196 页。

[53] 《马林致拉夫斯坦的信》，1923 年 2 月 26 日，4 月 3 日，《马林致布哈林的信》，1923 年 5 月 31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31、146，196 页。

[54] 马林：《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1923 年 6 月 12－20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27—242 页；〈张国焘给维经斯基和莫辛同志的信〉，1923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3 辑，第 5—8 页。

[55] 同上引注；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 年 6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147—148 页。

[56] 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 年 6 月 20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43—250 页。

[57] 见孙铎：《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 9 期，1922 年 11 月 8 日；孙铎：《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第 24 期，1923 年 5 月 9 日，等。

[58] 孙铎：《临城案件与国民党》，《向导》第 28 期，1923 年 5 月 23 日。

[59]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的信》，1923 年 6 月 20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61

－262 页。

[60] 同上引注，第 263 页。

[61] 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1923 年 6 月 25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65 页。

[62] 《马林致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越飞和达夫谦同志的信》，1923 年 6 月 25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66 页。

[63]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1923 年 6 月；《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 年 7 月 13 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 年 7 月 15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67－268，281－282，288 页。

[64] 有关情况可参见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65]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 年 7 月 13 日；《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 年 7 月 18 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 年 7 月 20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83，293，295，297，299 页。

[66]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 年 7 月 18 日。

[67] 《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 年 7 月 20 日。

[68]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 年 8 月 25 日。

[69] 《斯列帕列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 年 8 月 2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 267 页。

[7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1 号记录》，1923 年 8 月 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 266 页。

[71] 李云汉前引书，第 164 页。

[72]《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616 页。

[73]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 年 12 月 10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资料档案丛书》（1），第 366 页。

[74] 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党务会议上的讲话》，1923 年 10 月 10 日，《孙中山全集》第 8 卷，第 267－268 页。

[75] 在达林与孙的一次谈话中，孙告诉达林，所谓十万之众是指那些公开声明支持他的上

海学生会和承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各色军队。达林对此非常吃惊达林 1922 年见孙中山时，曾特别问到孙如何运用党的力量及国民党员的人数，孙的回答让达林十分意外。因为："孙中山竟把这十万雇佣兵看作自己的党员！"达林前引书，第 111 页。

[76]《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

[77] 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 年 10 月 15 日，《孙中山全集》第 8 卷，第 280－286 页。

[78] 《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第十次会议会议记录》，1923 年 12 月 9 日，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228 页。

[79]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 年 1 月 1 日。

[80]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 年 1 月 1 日。

[81] 转见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 9 辑，第 66 页。

[82] 孙中山：《批邓泽如等的上书》，1923 年 11 月 29 日，《孙中山全集》第 8 卷，第 458－459 页。

[83]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94 页；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联席会议》，1924 年 10 月。

[84] 参见《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52－162 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1），中国人民大学 1954 年出版，第 594－599 页。

[8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 年 11 月 2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342－344 页。

[86] 其宣言关于民族主义内容的写法几乎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决议的翻版，关于民权主义的说明在重申了孙中山过去所强调的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和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原则外，也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决议关于民权主义区别于"天赋人权"，必适合于中国革命之需要的革命原则。《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年 1 月 23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118－122 页。

[87] 有关民生主义的内容，加拉罕在给莫斯科报告中与他在给鲍罗廷的信中的评价明显不同。在给鲍罗廷的信中，他的说法是："唯一令人不满的是孙逸仙对自己党内的'地主'派所做的让步。我认为，对于这一点还是应该像以前那样给以谴责，以便使孙以最激进的方式贯彻执行土地法令。"参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 年 2 月 9 日；《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 年 2 月 13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410－414，418 页。

[88]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 年 2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

资料丛书》（1），第 414 页。

[89]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 年 1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与青年团联席会议》，1924 年 1 月 1 日；《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 年 2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443，444－445 页。

[90] 在 25 名中央执行委员中，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为中共党员；在 17 名候补委员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为中共党员。

[91]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决定设立一处八部，但调查部和军事部暂缓成立。秘书处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为中共党员。

[92]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共三人，廖仲恺、戴季陶为国民党员，谭平山为中共党员。

[93] 《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924 年 1 月 21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1－23 页。

[94]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 年 1 月，《李大钊文集》（下），第 704－706 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 50－54 页。

[95] 《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1924 年 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22—225 页。

[96] 《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1924 年 2 月 10 日；《阮啸仙关于团粤区一年来的工作概况和经验》，1924 年 4 月 4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1924 年)，第 1 辑，第 223 页。

[97] 以上数字多根据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17 页。关于 1924 年 5 月扩大执委会时的数字，根据执委会各区报告统计，可知上海区原有 56 人，现有 47；汉口区有 47 人；湘区略增达到 149 人；京区 75 人；山东区 17 人。这里虽缺少广东区的报告，但从谭平山与鲍罗廷的谈话中已知广东区这时也只有同志 30 余人。即使再加上江西、四川等地的少数党员，总的人数也不过 400 人左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56、262、266、275、277 页。

[98] 《上海地方报告》，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56 页。

[99] 《中国共产党简明历史》，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民国二十七年)，转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 779、785 页。

[100] 《维经斯基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工作报告》，Tony Saich, 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 pp.864—866.

[101] 根据俄国公布的当时有鲍罗廷参加的中共党团会议记录可知，针对当时国民党改组过

程中两党争论问题，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向，即我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本身只是“为了利用它”，因此大可不必过分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与国民党人进行争论。前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468－469 页。

[102] 维经斯基：〈国民党和中国革命〉，1924 年 4 月 1 日，(俄)《布尔什维克》，1924 年第 1 期。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编译:《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32 页。

[103]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 年 2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414－415 页。

[104] 此会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称国民党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而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介绍此次会议时则称，此会“谓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分别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30—233、237、243—244、253 页。

[105] 包括成立北京执行部，初亦因如何解决跨党人员与其他国民党人之间的配合问题，大伤脑筋。见《汪兆铭为整理北京党务致廖仲恺胡汉民函原件》，1924 年 4 月 17 日，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277－278 页。

[106] 孙中山：《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1924 年，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354 页。

[107]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 年 6 月 25 日；孙中山：《与日人某君的谈话》1924 年 2 月，《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536 页。

[108] 孙中山：《与青年党员某君的谈话》，1924 年 11 月 20 日，《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350 页。

[109] 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五人为候补委员，也均为国民党老党员。

[110]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 年 1 月 20－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 73 页；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 2000 年版，第 132－133 页。

[111]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1924 年 2 月，前引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447 页。

[112] 孙中山：《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1924 年 3 月 1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538 页。

[113] 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223－224 页。

[114]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 年 8 月 3，10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355－394 页。

[115] 同上引注。

[116] 除一些报刊消息公开提到孙中山因中苏大纲事向鲍罗廷表示强烈不满，孙未出面澄清外，孙也针对《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赞同外蒙独立言论文章事做过严厉批示，称“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颁纪律，禁止本党各报之狂妄。”李云汉前引书，第 302 页。

[117] 《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 年 6 月 25 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0—312 页。

[118]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 年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82－283 页。

[119]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 年 7 月 13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07 页。

[120]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 年 7 月 1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03 页。

[121]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 年 7 月 1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08 页。

[122]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信》，1924 年 8 月 27 日。

[123] 《中央全体委员第二次会议录》，1924 年 8 月 16－23 日，原件存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2.2/2。

[124] 转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4—75 页。

[12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讨论与共产党人关系问题情况通报》，1924 年 8 月 30 日；《孙逸仙在国民党中央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24 年 8 月 30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17－522，524－526 页。

[12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一九二一—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0 页。

[127]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 年 9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29 页。

[128]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 年 10 月 1 日、3 日、6 日。

[129] 《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 年 9 月。

[130] 《瞿秋白致鲍罗廷的信》，1924 年 10 月 8 日，《瞿秋白文集》，第 2 卷，第 648 页。

[131] 《中共广东区委联席会议记录》，1924 年 10 月 6 日。

[132] 首批苏援武器 10 月 1 日抵港，7 日运抵黄埔，包括 8000 枝配备刺刀的步枪和 400 万发子弹，及各种炮等。《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10 月 3 日。

[133] 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向导》，第 88 期，1924 年 10 月 24 日。

[134] 转见鲍罗廷：《关于国民党》，1924 年 12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65 页。

[135] 《维经斯基给季诺维也夫的电报》，1924 年 11 月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55－556 页。

[136] 至 1925 年 1 月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仍只有党员 994 人。王健英前引书，第 30 页。

[137]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1924 年 12 月 5 日。维经斯基所谈到的情况，还可以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得到印证。斯大林随后在与维经斯基的谈话当中，坦率地对共产党人必须寄人篱下，遭受国民党的“虐待”表示遗憾。当他听维经斯基介绍说共产党有自己的组织，比国民党更团结，且比国民党人更有能力时，十分惊讶。《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5 年 4 月 2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607 页。

[138] 中共四大：《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 年 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329—341 页。

[139] 孙中山：《与石克士等的谈话》，1924 年 11 月 21 日，《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357 页。

[140] 据李云汉称，实际上冯自由等还在广州时就“不惜独树一帜，与广州（政府）立于对立地位。”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355 页。

[141]《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 年 4 月 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597－602 页。

[142] 《中央通告第十九号》，1925 年 4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404 页。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早期与苏俄合作的大致经过，早已尽人皆知。其北伐革命之发动与最初的成功，曾得到苏俄相当助力，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北伐的实现，首先就在于有了广东这一至关重要的战略出发点。为了建立和巩固这块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及其国民党经历了许多周折与艰辛。但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在几经磨难后，孙中山以及蒋介石等最初求助苏俄的时候，其实主要并不是要在广东，而是要背靠苏俄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从那里向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当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访问」近三个月时间，其本意也同样是为了同俄国人一起去研究和具体实施这个西北军事计划。蒋介石兴致勃勃而去，却又极度反感而归，恰恰也是与苏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定了他们的西北计划一事有关。了解这一切，对于深入了解孙中山、国民党与苏俄合作关系最初的形成过程，以及蒋介石与苏俄以后的恩恩怨怨，无疑都是有益的。

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初步提出

1918 年 5 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因西南军阀的背叛而失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之后，孙中山「专理党务」，致力于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工作。但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寻找境外的支持者。一方面，孙中山秘密同日本银行界接触，寻求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对俄国革命的胜利格外感兴趣，开始了与苏俄领导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只是，这时苏俄恰恰正受到十四国的军事干涉，其本身尚未巩固，孙中山自然也不会迅速提出求援问题。但孙中山早就对联合俄国并取得后者援助抱以期望，这是没有疑问的。此可证之于孙中山 1918 年 1 月 28 日在广州一次宴会上的谈话，他当时曾明确讲：「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1]而 3 月 13 日，孙又一次谈到他的这一想法。当天他曾有电报给重庆靖国军总司令代省长黄复生，说明：「义师讨逆，及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2]他这里再三强调的注意中国西北边，寄希望于西北方面大发展云云，其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

欧洲和日本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到 1920 年逐渐归于失败。1920 年 4 月所谓「远东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苏俄新政府的统治已经开始扩展到俄国的远东地区来了。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也迅速开始了在中国寻找支持者的工作。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会见了前沙俄海军军官，后拥护苏俄政府的波达波夫（Potapoff）、陆军中尉波波夫（Popoff）、上海俄侨事务局负责人马特维也夫－鲍雷德（Matriev Borid）、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等人，对苏俄的稳固和强大开始有了较深的印象。而在此前后，他还收到了参加苏俄内战的华人红军战士和旅俄华工联合会辗转从基辅打来的声援革命的电报。[3]这使孙中山对利用苏俄援助及其在西北方向招募军队，进攻北京政府深感兴趣。在这一年夏天，在俄国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局[4]刘江返回中国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讨论了从新疆、蒙古和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的军事可能性问题。根据刘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向俄共（布）阿穆尔州委会提供的报告说：双方约定，立即把华南、俄国中部和远东地区的中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为此计划在远东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设立领导中心，同时把新疆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结地，在在新疆地区征召志愿者。为此，孙中山马上将向莫斯科派驻两名代表，他们不久即将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5]

刘江提到的孙中山的代表之一，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警卫团团长和大元帅府参军的李章达。

这一年 9 月，李章达受孙中山派遣经黑龙江前往苏俄。孙中山要求李章达务必到达莫斯科，代表他本人正式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次年，即 1921 年春季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进兵中国的新疆，深入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李章达当年 10 月底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但直到次年春天才到达莫斯科。[6]。关于李赴苏使命的这一内容，我们可以在另一位苏俄来华代表的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1920 年 11 月进入中国东北的这位苏俄代表的名字叫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Soclov Stlahoff）。他这时的公开身份是记者，来华后曾前往北平和上海，会见了国民党方面的领导人。他在 1921 年 4 月 21 日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国民党人曾两次向他提出关于请苏俄从西北方向给予援助的问题。报告称：1921 年 1 月 12 日，《民国日报》的编辑戴季陶提出，他应该见一见刚来上海的国民党领导人及广州政府成员李烈钧。[7]会晤预定在一所私人寓所进行。由于白天寓所受到严密的监视，所以他是在编辑部给他派去的一位向导的陪同下，深夜才前往那里去会晤这位国民党要人的。在法租界华龙路四十四号这处私人寓所里，李烈钧强调，整个国民党都「力求通过秘密派遣代表沟通情报，特别是缔结必要的协定，来实现与苏维埃俄国的亲密诚挚的关系」。这位国民党人所说的关于缔结必要的协定的内容，「证实了李章达事先讲过的情况」，即国民党人希望苏俄方面能够从中国的西北边疆为中国革命党人提供援助。斯特拉霍夫在报告中具体解释了关于李章达在海兰泡对他所说的计划内容。称：

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时候，于 1920 年 11 月结识了国民党员李章达，他给我写了引孙逸仙博士、李烈钧等人的信，并告诉我说，他想来莫斯科，要以孙博士的名义向苏俄政府建议签订在华联合行动的协议。孙逸仙博士想签订的军事协议，是旨在使红军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向新疆发动春季攻势，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据章达说，四川省约有 4 万名国民党人，已经做好策应这次行动的准备并会兴高采烈地迎接红军。

当斯特拉霍夫怀疑让苏俄红军深入中国境内来担任这样的进攻任务，是否可行时，李烈钧却表示相信，既然「国民党和广州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国内消灭封建制度」，那么，「为了革命的成功，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手段」。[8]

在 1921 年初另外一份有关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也曾隐隐约约地提到过这件事。[9]不过，在已知的这时提到过这个西北计划的俄国人当中，既没有人对它表现出明显的热情，也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看法。斯特拉霍夫在他的报告中只是强调说：「最近几年来，国民党几乎是唯一强大的政党」，「在中国，还没有其他更革命、更有组织的力量。显然，无论是在劳动群众当中，还是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国民党都深受爱戴」。因此，他的结论是：「１、尽快与广州政府建立联系，是我们远东政策最迫切的任务；２、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在于，在居民和广州政府中寻找有能力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以反对整个远东地区美、日资本压迫的分子」。[10]

苏俄政府支持孙中山的计划

苏俄政府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这一建议的反应，最初看来还是比较积极的。只不过，几乎还在斯拉特霍夫进入中国之际，孙中山对争取苏俄援助的热情，就已经在开始在降温了。这是因为，孙中山于 1920 年 11 月底又得以在部分西南军事领导人的支持下，重新回到广州，并很快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踌躇满志地开始准备发动推翻北京政府统治的北伐战争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孙中山自然不会再考虑请求苏俄援助的问题，毕竟这个时候的苏俄几乎遭到所有西方国家的排斥。因此，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Mring）[11]1921 年 1、2 月间前往桂林与广州，同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接触时，虽然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仍旧相信有必要通过苏俄，「要么在蒙古，要么在西伯利亚，组织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孙中山却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据马林报告说：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他不联俄，他就能够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而联俄则会给中国「造成不利局面」。因此，「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过早的联俄会立即引起列强的干预」。[12]甚至直到 1922 年 2 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仍旧搞不清楚孙中山究竟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13]

再度提出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又是在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之后。1922 年 6 月，因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根据地和刚刚开始发动的北伐作战毁于一旦，孙中山为此痛心不已，曾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称：「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14]至此，党内同志，特别是军事领导人蒋介石等，都力主联俄，孙中山亦不得不痛下决心，再度要求苏俄从西北向其提供援助。

8 月 25 日，孙中山甫到上海就意外地收到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Adolf Joffe）从北京的来信，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越飞的建议与孙中山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写信给这时还在福建的蒋介石，要其「早来备筹一切」。函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办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矣。彼有一军事随员同行，已请彼派此员来沪，以备详询军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15]

孙中山这时提到的越飞的军事随员，名叫格克尔（A. I. Gekker）。越飞与孙中山之间的联络，基本上都是由格克尔在中间传递信件。在经过一段接触之后，9 月 29 日，格克尔、马林及担任翻译的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古尔曼三人与孙中山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孙中山详细地介绍了他对苏俄从西北方向提供军事援助的设想。他强调：中国需要统一，也能够统一，但国民党需要一个支持统一的朋友。「这个朋友只能是俄国」。他想在西北边境地带或土耳其斯坦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并可以从俄国得到武器弹药，因为国民党在其他地区的军事组织装备很差，而要进行统一的战斗必须组建起独立而可靠的武装力量。他再三询问：「俄国是否帮助他在西部（西北部）组建这样的武装力量呢？」「俄国能为这样一支革命军队提供交通工具、弹药和武器吗？」俄国能否援助飞机、汽车、火炮，以及是否有很多机构，等等。他还特意指着地图告诉格克尔有哪三条路线可以提供援助，而他最看好的则是经过土耳其斯坦，尽管这条路线最长但也是最可靠的路线。[16]

10 月上旬，孙中山在其上海的寓所再度会晤了这时既是共产国际代表，又在协助越飞工作，因而负有苏俄外交使命的马林。孙中山又一次解释了他关于由苏俄帮助在西北创立军事基地，组织自己军队的设想。他随更进一步告诉越飞的代表说，他的计划是，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请求，苏俄派一个师的红军占领东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 4000 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而新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在那里建立中俄德三国联合公司来开发这些资源，建设钢铁厂和兵工厂。而他本人也可以到新疆去，他同意在新疆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是苏维埃制度。他为此愿意派他的一位将军到北京来与越飞秘密商讨这件事。[17]对于让苏俄红军进攻新疆一事，马林颇不以为然，他在写给越飞的信中明确讲，

他不认为红军可以轻率地进入中国。越飞这时对马林的意见也完全赞同。当马林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之后，越飞相当肯定地支持了马林的看法，称：「孙的关于在东土耳其斯坦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异想天开的计划，我已经报告莫斯科，并附上我的意见，我也认为只要孙博士还不是正式的中央政府中的人物，我们就不能做占领中国的打算，甚至不能向他提及此事。」[18]

格克尔以及马林对苏俄红军出兵新疆的犹豫态度，使孙中山意识到向苏俄求援「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并非如最初想象中那样简单。[19]但这并不能使其放弃要求苏俄援助的初衷。12 月 20 日，孙中山直接写信给越飞，一方面劝告越飞不应当承认北京政府并与之谈判，一方面更直截了当地向越飞提出了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大胆设想。函称：

总的形势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使我现在可以提出一项建设性的政策，即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　从我离开广州以来，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是英国势力和海军强国支配的中心。然而，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不能放弃广州。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如果能够，将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如果你们的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么，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同我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20]

孙中山在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引人注目的是，孙中山取消了他前此设想中的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取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其实，还在孙中山以文字形式向苏俄政府正式提出他的西北计划之前，苏俄方面已经得到了越飞转去的有关信息，并且明确通知越飞可以对援助孙中山的计划加以考虑。因此，在 1922 年 12 月由越飞与马林共同起草的关于苏俄在中国的工作提纲中，「俄国必须答应给国民党以援助」的原则事实上已经确定。[21]问题仅仅在于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和具体从哪一方面来提供这样一种援助。而越飞和马林这时更多注意的只是，「谁是中国真正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越飞在随写给莫斯科的一封全面分析对华政策的信中特别写道：「如果说现在，事态将按可以预见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同孙逸仙的直接联系将通过蒙古和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确立下来，那时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像孙逸仙在最后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要求的那样去做更好些呢，也就是说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22]

根据 1923 年 1 月上旬苏俄政府的指示，越飞在与北京政府就蒙古以及中东铁路问题的谈判不得要领之后，转而于 1 月下旬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正式的谈判。越飞的态度很明确，即他有必要要求孙中山为了苏俄的援助在这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做出让步。谈判的结果，双方达成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文件，这就是有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果然得到了孙中山关于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和同意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的承诺，而越飞则保证：「共产组织，

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孙中山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2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上海就孙中山提出的「长远计划」（包括组建尽可能集中的领导机构和加强国民党党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组织自己的军队，如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等）和「应急计划」（包括迅速提供资金和运送武器到南方帮助国民党夺回广东等）达成了某种共识，越飞同意提请苏俄政府考虑在一定限度之内提供这种援助的可能性。在会谈后越飞上报给莫斯科的电报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双方讨论的具体内容。

越飞报告称：孙逸仙向他提到了两套打败北京政府的计划。其第一套计划要首先消灭陈炯明，然后与东北的张作霖一起对曹琨、吴佩孚政权实行两面夹击。根据孙本人的意见，这套计划的致命弱点是：第一，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孙逸仙不可能投入必要数量的军队去进攻吴佩孚，因此也就不可能将他彻底打败。为了消除这种危险性，他需要最多约 200 万墨西哥元（相当于几乎同样数目的金卢布）的资助，而他坚定不移地希望我们给提供这笔款项。第二个危险是，张作霖占领北京后由于吴佩孚把注意力放在同他作战上，张可能改变主意，不愿把北京交给孙。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坚定不移地指望得到苏俄的帮助，即希望红军能够佯攻东北，以便把张的力量从被他占领的北京引开。考虑到第一套计划不能成功的话，他已经制定了第二套较长期的计划，这套计划即他此前反复考虑过的西北军事计划。而这套计划，将促使孙把自己的纲领建立在完全不依赖帝国主义列强而单纯依靠苏俄的基础上。孙就此解释说：他长期以中国南方做为自己的根据地，但也因此备受列强，特别是英国的牵制，不得不按照它们的笛声跳舞。故他更期望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国内腹地，比如更靠近苏俄的省份。他相信，在东土耳其斯坦及其毗邻的省份，他的影响力相当强大。只要占据这一地区，然后通过广西、四川、山西等省份，他可以把 10 万军队转移到蒙古边境地区去。这样就可以经过东土耳其斯坦和库伦取得苏俄的直接援助。经过一两年时间的装备和训练，他就可以成功地发动对北京的进攻，而不必再担心列强的干涉。[24]

为了更进一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孙中山随后还专门派廖仲恺陪同越飞前往日本热海进行了秘密会谈。很显然，越飞被孙中山的革命热忱打动了。他用书面形式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对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完整意见书，建议既要准备向孙提供 200 万金卢布的援助，也要考虑到必要时向张作霖发动佯攻，同时尤其要准备在一两年内向孙的 10 万军队提供武器及军事教官，因为「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也不应忽视南方的根据地。[25]终于，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和越飞的意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于 1923 年 3 月 8 日开会正式讨论了孙中山的提议，会议决定同意在中国西部建立一支由孙中山控制的军队－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同时向孙中山提供约 200 万金卢布的财政援助，并同意为孙中山派遣军政人员充当顾问。[26]5 月 1 日，仍在热海疗养的越飞通过电报向孙中山通报了苏俄政府关于同意其计划的鼓舞人心的正式决定。电报在说明苏联政府准备为国民党提供 200 万金卢布的援助以外，特别提到了对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答复意见。电报说：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四门「奥里萨卡」炮和两辆装甲车。如您同意，则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这就可以为在北部和西部的革命军队准备好举办政治和军事训练班的条件。[27]

严格地说，苏联政府的决定距离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不小的差距。孙中山在提出具体建议时，曾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会提供「帮助 10 万士兵」的装备，并且希望新的战略基地能够建立在蒙古边境地区等超出北京政府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去。但即便如此，能够得到这种程度

的援助，对国民党也已经是空前规模了。它毕竟使一向只能利用各种军阀武装来革命的国民党人，从此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来了。因此，孙中山的反应十分积极。他很快于 5 月 12 日致电越飞，称：

贵国五月一日复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政府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28]

蒋介石受命出使莫斯科

既然苏联方面决定支持国民党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孙中山本应迅速开始派人前往莫斯科就此一计划作具体商谈。但因支持孙中山的军队于 1923 年 1 月再度克复广州，孙中山于 2 月又回到广州并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整日里陷于争夺广东和应付陈炯明的战斗之中，具体实施西北计划的工作因此而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孙中山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尽可能保持住刚刚到手的广州这块根据地，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只能被暂时放到一边去了。因此，他这时接连去电越飞告急，要求立即「支付已承诺的援款中的第一次付款」，称「文急需经费以解决广州事，届时方能抽身为最后解决全中国问题制定出西北计划」。[29]

这时越飞、马林等人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十分不解。越飞三番五次地要求孙中山从目前的战争中抽出身来，首先帮助苏俄解决与张作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争执。声称：「我们给中国人民的太多了，这个不可能再给了。孙必须看到，整个中国，还有他自己，都处在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之中，……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是唯一同中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我已为孙做了许多事，将来还要尽可能为他办事，但是目前在铁路问题上孙必须帮助我，否则会出现麻烦」。[30]而马林则反复强调：「如果援助只是有利于旧策略的继续，供养那些与革命的国民党毫无关系的将领们，如果这种危险存在，就不要给予援助。最好是在对方保证不把援款用于南方的军事行动之后，再开始提供援助」。他认为，应当把援款的三分之一用于改组国民党和进行反帝的宣传工作，「余款用来在北方或西部地区建立一个军事组织」。「从经济上支持孙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因为把俄国的钱用于援助广东的战争，「就意味着慷慨解囊资助热衷于继续争战的将领们」。[31]

结果，一方面是孙中山忙于广东的战争，一方面是越飞和马林因不满孙中山的行动而态度消极，因此派遣代表到莫斯科去具体商谈西北计划的事情，一直拖到 7 月中旬才最后确定下来。但孙中山显然更希望能够迅速在北方招募到相当的士兵，为此他甚至提议是否先到苏俄的西伯利亚去征召华侨组建军队。他让廖仲恺去向马林说明他的这一想法，即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具体负责在西伯利亚组建军队的问题。这个小组中的人全是中国人，其中 4 人是国民党员，小组的任务是对西伯利亚乡镇的华裔人员进行调查，以便判断能否由这些人组成军队。马林对此显然表示怀疑。[32]考虑再三，孙中山最终还是下决心派蒋介石以其代表的身份，组织一个「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要求苏方尽快提供第一批援款，派遣军事顾问前来广东，协助他编练军队，指挥作战。同时，孙中山还与蒋介石具体讨论了此次访问的中心任务，即实施西北军事计划的具体方案问题，并委托蒋起草了军事计划书、宣传意见书和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等带往莫斯科。随后，蒋介石辞去了大元帅府总参谋长一职，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 8 月 16 日由上海出发了。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四人组成，蒋介石为团长。从 9 月 3 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日起，它就受到了较高规格的接待。5 日，会见了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Georgii Chicherin），7 日会见了俄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鲁祖塔克（Luzutak），9 日拜访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I.M.Sklansky）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S.S.Kamenev)，11 月 11 日再次会见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16 日拜会见俄共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23 日拜访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27 日会见了苏联红军最高领导人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其间代表团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军营和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考察，还应邀出席了苏联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蒋作为贵宾被安排上了红场的观台上。

蒋介石到达莫斯科后，很快于 9 月 5 日拜会了契切林，说明了孙中山要求立即付款的问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接着，他于 9 月 9 日与斯克良斯基的会谈中说明了孙中山的设想，希望苏方能够派人前往广东协助展开军事工作，他被告知鲍罗廷等人已经在去广州的路上。事情开始似乎进行得十分顺利，蒋介石也相当满意。但当蒋介石正式提出他和孙中山具体商定的西北计划的方案之后，情况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

在 9 月 9 日的会谈中，蒋介石首先说明，这次代表团的中心使命其实是在军事方面，代表团事实上应该是一个军事代表团的性质，因此他最为重视的也正是与苏联军事当局的讨论。蒋介石随即说明了代表团三项任务，这就是：

一、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可能多地派人到中国的南方去，仿照红军编练中国的军队。

二、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孙中山的代表提供方便，以考察红军。

三、代表团请求共同商讨中国的军事作战计划。[33]

蒋介石并具体解释说，目前国民党虽然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但因广州已没有军火工厂（特别是弹药厂），港英当局又严密封锁广州的军火进出，因此武器弹药极其匮乏。特别是「设防的英国要塞香港，始终使孙中山军队的后方广州有芒刺在背之感。南方军一经北上告捷，英国人随即策动为他们所收买的邻省督军骚扰后方。军阀陈炯明去年所为即是如此。再者，外国派驻长江的庞大舰队，也是孙中山军队自长江流域北上的一大障碍。南方军每次进抵该地准备渡江，英美炮舰即加阻扰制肘。可想而知，外国人据广州、上海（还有长江）两大基地，加上握有巨额资金用以收买人心，南方军要彻底击溃有大多数外国帝国主义者作靠山的吴佩孚，那是难上加难的」。再加上那里的士兵装备不足，素质较差，完全没有革命精神，因此，蒋介石明确告诉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说：「鉴于上述考虑，南方军队总参谋部和国民党在代表团动身来莫斯科前夕决定，把战场转移到中国另一个地区，即西北地区。为此目的才派出了本代表团。」[34]

随后，蒋介石扼要地说明了孙中山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其核心内容是想要在库伦以南邻近蒙中边界的地区，招募居住在蒙古、满洲和中国交界地区的中国人，以及从满洲西部的一部分中国人，按照红军的模式和样子组建一支真正属于孙逸仙的军队。以后即从这里，也就是从蒙古南部发起进攻。[35]根据斯克良斯基的建议，蒋介石于会后根据斯克良斯基的要求，进一步充实整理了带来的三份意见书，并将军事意见书标以〈中国革命之新前途〉的题目提交给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研究。

在三份意见书，较为重要的为〈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和〈中国革命之新前途〉。蒋在意见书中说明：「中国之民党总理孙逸仙先生，于本年四月间，接得越飞君转来苏俄政府商议中国西北部军事进行之电。当时派定蒋介石来俄就商，已有复电在案。今介石等奉弊（敝）党孙总理之命，特来苏俄就商此事，并愿闻各教。」他具体说明了中国革命过去的历史及其列强的压迫情形，强调中国革命过去是「主义坚定而方法差误，精神坚强而环境险恶，如能变更其方法，改善其环境，则中国革命期其三年，必有成效可睹。」其全书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主张「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36]

〈中国革命之新前途〉长约 9 千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重要的历史文件。[37]它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范围内，即在中国东南地区奠定巩固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在靠近俄国友邦边境的中国西北地区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来作为我们实行革命计划，同中国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战斗的军事基地。」接着，它在第二部分，即军事计划部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各派势力的相互关系、兵力分布、武器配备及军火生产规模，比较了在新疆和外蒙建立军事基地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出了国民党希望组成的西北军队的编制和武器配备，说明了向北平发动进攻及统一全中国的准备过程、进攻路线等等。[38]文件建议以库伦和乌鲁木齐为国民党的西北军事根据地，并比较了两者的优劣，希望苏方能够同意以库伦为进攻北平的「临时根据地」，而以乌鲁木齐为永久根据地；在库伦组建主力部队，而在乌鲁木齐组建后备部队。如果苏方只同意一个地点，则建议以库伦为最终选择。文件对此具体分析如下：

在中国西北地区有两个地方适宜于做军事根据地，一个是蒙古的库伦，另一个是新疆的乌鲁木齐，即中国的土耳其斯坦。这两个地方靠近俄国边境，交通非常方便。但我认为它们各有利弊。

Ａ）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和军事目标之间的距离从乌鲁木齐到北平约八千华里，从库伦至北平还不到三千华里。所以，库伦比乌鲁木齐距目标近十分之七的路程。

Ｂ）地理位置上的利弊

从乌鲁木齐至甘肃省的兰州府有二千五百华里，隔着一个大沙漠，道路难行，水供应很缺乏。……从兰州府至陕西省省会西安府还有二千五百华里，这个地区自然结构是重山峻岭，崎岖难行，特别是军队更难通过。……如果我们用乌鲁木齐做我们的军事根据地，不仅在地理上是不利的，而且我们在进攻北平之前，还必须攻克甘肃省省会兰州府、吴佩孚司令部洛阳、河南省省会开封府和山西省省会太原等重要城市。从库伦至北平比从乌鲁木齐要近得多，高原大道，行路较易。我们可以乘汽车，水也可以充分供应。那里只有绥远和张家口等几个小城镇。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库伦比乌鲁木齐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国民党在华北各省和内蒙古还具有潜在的势力。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支训练精良的部队做我们革命军的主力，我们就能获得一支五万人的部队同我们一起进行反对敌人的战斗。

Ｃ）从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到最后目的地所花的行军时间一万士兵从乌鲁木齐行军至北平，不经战斗，至少要用六个月。从库伦乘汽车，只要四天就到铁路终点站张家口，再花一天就

到北平。所以，从时时间上考虑，用库伦做军事根据地也比用乌鲁木齐更为有利。

D）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与国防的关系

乌鲁木齐靠近印度边境，在那里建立军事根据地会引起英帝国主义的特别注意，但我认为英国的干涉不会起作用。在库伦建立军事根据地则会引起日本的猜疑，但我认为日本不会用武力进行干涉。张作霖可能不赞成我们这样做。为了防止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干涉和张作霖的阻挠，我们可以用红军的名义训练我们的士兵。……在我们完成我们的练兵计划以后，我们就可以率领这批士兵在国民党的革命旗帜下南下，那时，我相信张作霖会同我们并肩进行革命的。……

拟议中的军事根据地与战略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库伦做我们的军事根据地，工作会容易开展，而由于它离关内很近，我们不会丧失任何进攻敌人的时机。在两年以后，我们就能开始我们的进攻，并很快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我们在乌鲁木齐建立我们的军事根据地，准备时间将从三年增加到五年，因为我们得教育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处理内部的事务，并使那块地方成为东方革命的永久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完全建立和我们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发动进攻以前，我们将不能继续东进。……

根据这些事实，我认为库伦是一个适宜采取快速行动的理想的军事根据地，而乌鲁木齐则是一个适宜进行持久防御的军事根据地。所以，最好是用库伦做进攻北平的临时根据地，争取尽早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同时用乌鲁木齐做永久根据地，同俄国合作，帮助东方其他被压迫民族为争取它们的独立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所以，我主张在这两个地方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伦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后 备部队。如果不能在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我希望用库伦做为组建军队和进攻北平的临时的军事根据地。[39]

文件随后具体设想了用库伦做根据地和以进攻北平为目标的各种军事准备。这包括组建军队的编制及其武器配备，比如可以组建至少三个混成旅，每旅 6000 至 10000 名士兵，使之达到 18000 至 30000 人之数。同时为他们提供 15000 条至 24000 条步枪；12 门至 18 门大炮；1500 匹至 3000 匹马或骡子；6 架至 10 架飞机；50 辆至 300 辆汽车，等。即使立即从 1923 年 10 月起就为组建这支军队和进行必要的作战做准备，至少也需要用一年半的时间来做诸如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组织军队，以及准备军事供给等项工作。在此一切完成之后，最早从 1925 年 5 月起，或者可以调遣部队南下至靠近绥远和察哈尔的蒙古南部地区，准备对北京政府发动进攻。在一切顺利的条件下，也许能够在 1925 年 11 月开始这一进攻行动。至于具体的进攻步骤可以考虑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占领绥远和察哈尔地区，目标是占领北平。第二阶段，占领黄河流域，兰州－－海州铁路，目标是占领吴佩孚司令部驻地洛阳和河南省省会开封府，以及江苏省的徐州。第三阶段，占领长江流域，目标是占领湖北省省会武汉，和江苏省省会南京。一旦占领了长江流域，全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40]

孙中山西北计划胎死腹中

苏联方面早就同意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因此，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想象，他所提出的上述关于西北军事根据地的设想，会为苏方所拒绝。

蒋介石是在 10 月上旬将〈中国革命之新前途〉提交给苏联军方最高领导人的。几乎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中负责中国事务的重要人物，驻华大使加拉罕却明确表示态度消极。他在 10 月 6 日给这时刚刚去广州做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的一封信中，特别提醒鲍：「从以前的通信中您可以了解到孙的从北方进军的空想计划」。必须让孙知道，「在莫斯科没有我参加未必能作出什么决定」。「如果他（指孙中山－引者注）再次重提这个计划，您要向他说明，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因为，在决定实施任何一项重大计划之前，我们要首先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特别是巩固自己在满洲的地位，要解决中东铁路问题。[41]而对于习惯群众革命方式的共产党人来说，这个时候国民党自身的组织也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加拉罕极为不满地告诉莫斯科的领导人：「实际上孙逸仙领先的是忠实于他本人的个人和团体」，许多国民党员只是徒有虚名。中国革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军事计划，而是「必须改组整个国民党。」[42]据此，托洛茨基自然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他表示：「从加拉罕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中国的事情在继续恶化。资金都用在纯偶然性的军事举措上。没有任何党，没有任何认真的宣传工作。」「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逸仙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43]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44]

与苏联官员的接触，也很快使蒋介石发现，自己代表孙中山提出的西北计划，似乎并不受到苏方的重视。按照苏方的理解，所谓西北军事计划，应该是由国民党运用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首先建立一个战略根据地，由苏俄方面负责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教练人员，国民党将依据它来训练军队和展开行动。然而，蒋介石的计划书中提出的两个地点，都明显地超出了苏方理解的范围。根据蒋介石所提出的方案，在乌鲁木齐建立根据地，仍旧需要先「在俄国境内成立军队」，然后由俄国境内发起进攻，「攻占乌鲁木齐」。[45]这显然不符合苏方的要求。而在库伦以南建立基地的设想，同样与苏联领导人原先的认识相左。按照越飞向莫斯科提供的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初设想，所谓中国北部省份应当是「蒙古边境地区，并富产粮食和富裕的省份」，并不是具体指外蒙古。[46]在苏联人这时看来，虽然即使在〈孙文越飞宣言〉中，他们也从未否定过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但外蒙古既在红军占领之下，自然也就不能让他人再来染指。更何况，部分苏联领导人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考虑，这时事实上在内心里并不想让外蒙古继续归属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很难支持孙中山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当他们注意到蒋介石提交的计划书里明白写着要以库伦为新的军事基地的时候，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就不能不开始搁浅了。

10 月 21 日，蒋介石拜会了契切林，双方具体讨论了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上，契切林明确表示这很少可能。他直言不讳地告诉蒋说：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那里进行军事行动，因为这会引起严重误解。对此，蒋介石深感难于理解。会谈结束后，蒋越想越觉得难以接受。根据瞿秋白后来的说法，「蒋介石很生气，说托洛茨基（疑为契切林[47]）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需要我们给予它独立，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直到收到孙中山的电报，「孙在电报中说，唯一的朋友是苏联，它现在履行了我们同越飞谈到的许诺。这以后蒋介石缓和了一些，好象改变了态度。」[48]于是，蒋专门给契切林写了一封信，一面再度委婉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面仍旧要求苏方务必「用一切办法」支持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坚持还是应当在蒙古建立基地。他在信中说：

昨天我接到孙逸仙博士的电报，他告诉我，俄国政府的代表鲍罗廷已到达到广州，孙逸仙博

士对俄国政府给予的物质帮助表示感谢。他着重指出，俄国和国民党的利益有很大的共同性，它们之间绝对必须进行合作。他坚信，俄国政府不会拒绝用一切办法帮助国民党，他要我和我们的俄国同志讨论西北的军事计划。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你指出蒙古人害怕中国人。至于最近发生的事件，这完全是事实。蒙古人害怕中国军阀，但不应害怕国民党。国民党按照自己的原则，尊重自治和自由，我们希望同我们的蒙古同志互相了解并同他们进行合作。我相信，俄国政府人士和共产党的领导人将会把国民党介绍给我们的蒙古同志，以便相互间取得完全的了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 有为我们的蒙古同志做什么事情，但是中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将会给他们提供适当的机会，使他们在内部事务上实行自决。我们的西北计划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蒙古同志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并在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同我们一道行动，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进入蒙古。[49]

蒋介石随后又多次与正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经斯基，以及其他苏俄高级官员就此进行了讨论，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效力。

11 月 11 日，斯克良斯基等再度接见蒋介石，对孙中山和蒋介石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的方案作出了正式的答复。其意见如下：

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全部情报，仔细地讨论了(代表团)提出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50]

斯克良斯基转而以俄国革命的经验说明了在中国当前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却只字不提蒋介石所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问题。对此，蒋介石反复解释，说明国民党已经开始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目前开展此种工作阻力巨大，效果有限，必须配合以强大的军事行动，西北军事计划正是目前所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的最佳方案。然而斯克良斯基坚持认为：「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当然，苏俄仍旧同意帮助国民党训练军事干部和建立军校，但鉴于广州已经夺回，这些工作应当也有可能在莫斯科和广州进行。[51]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在这里被苏方完全否定了。尽管斯克良斯基再三解释，说这只是因为目前还不是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必须首先加强政治及宣传工作，但任何人都清楚，苏联政府之所以最终否定了他们曾经明确赞同过的这一计划，其原因根本上并不在于国民党欠缺政治工作的准备。事实上，此一计划之被否定，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这时在中国北方确实没有足够的基础，找不到一块靠近苏联，并可以有效控制的地点；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孙中山、蒋介石提出的西北计划涉及到了苏联这时最敏感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苏联政府不仅不能允许国民党借用苏联的领土训练军队进攻乌鲁木齐，它尤其不能同意孙中山关于利用外蒙古来进行军事活动的想法。苏联当初赞同在中国北方或西部的省份帮助国民党建立军事基地，就没有把外蒙古考虑在内，它只是同意可以从库伦经过蒙古边境来对从四川北上的国民党军队进行援助而已。

11 月 27 日，蒋介石最后会见了托洛茨基，在列宁生病的情况下，托洛茨基这时可以说是蒋介石会见的苏俄最高领袖了。然而，结果还是一样，蒙古的问题成了整个西北计划的一个死结。托洛斯基明白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在自己的斗争中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国民党也

应当把自己的目标转向北方，但是「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托洛茨基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西北军事计划被拒绝的关键所在，即苏联领导人相信蒙古不是中国人「自己国家的本土」。因此，他指出，在目前情况下，不仅孙中山所希望的苏联直接出兵援助国民党不可能，而且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的设想也是不可取的。目前唯一可行的就是在中国本土上发动对北京政府的战争。但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国民党政治宣传工作进行得如何，一张好的报纸往往比千军万马都管用。如果孙逸仙只是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军事工作绝不应当超政治工作的二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应当超过政治工作的十分之一。[52]

11 月 29 日，蒋介石在对苏俄进行了将近三个月的访问之后，极其失望地离开了莫斯科。很明显，蒋介石没有能够完成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特别是苏方对外蒙古视同己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给蒋介石留下了十分恶劣的印象。蒋最初无疑是极力主张联俄的，在陈炯明叛变之后，他曾多次提出联俄意见，坚信只有争取苏俄援助才有办法。即使广州收复后，蒋仍对访问苏俄，争取苏援充满热情，甚至不惜为此舍弃一切工作。他曾表示：「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53]而如今，蒋介石此行几乎完全失败，不免大失所望。以至访苏归国后，他仅从老家溪口寄给孙中山一份报告了事。[54]直到孙中山等接连电催之后，才于一个月之后前去广州。但蒋对苏联之恶感，已由此而生矣。[55]

大概是想解释点儿什么，或者感到对于孙中山本人应该有所交待，在蒋介石等人刚刚离开莫斯科不几天，契切林又想起来有必要给孙中山本人写一封信，正式说明一下苏联政府不同意他的西北军事计划的主要原因。这大概也是双方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的最后一份文件了。契切林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们的榜样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的军事活动是成功的。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组织和领导了我们的群众，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有组织的政党，一个能战胜一切敌人的政党。整个中华民族一定会看到国民党－－这个广泛而有组织的政党同中国各个地区军事专政之间的区别。国内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国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国民党是支持他们的自决权的。所以，你们不许在这些地区使用武力。这就是我在这些问题上所考虑到的一些想法。[56]

同斯克良斯基一样，契切林在这里同样说得十分委婉，甚至没有直接提到他们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究竟如何看法。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这封信的中心意思其实只是一句话，这就是：不许在蒙古使用武力。换言之，就是苏联不同意国民党在蒙古进行活动。因此，他们只能拒绝了孙中山关于在西北，特别是在蒙古建立根据地的想法。但一面口口声声表示承认中国对蒙古之主权，一面却将蒙古视同己出，力主蒙古独立，苏联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标榜自然令人生疑。也难怪蒋介石得出结论称：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就中国革命而言，「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57]

1] 〈孙中山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与何某的谈话〉，1918 年 1 月 28 日，《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 卷，第 320 页。

[2] 〈孙文致黄复生电〉，1918 年 3 月 13 日，同《孙中山全集》，第 4 卷，第 394 页。

[3] 转见李玉贞：《孙中山与第三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 年版，第 50，54 页。

[4] 该局 1920 年 7 月成立，直接隶属于俄共（布），其俄文名称是Ｃентральное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китайски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при РКП（б），译成中文即俄国共产华员局。

[5] 〈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 年 10 月 5 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合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部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45 页。

[6] 关于李章达前往苏联之事，周谷先生文章中曾有记述称：「俄国革命一起，……孙中山拟派人前往俄国留学，特嘱廖仲凯、朱执信、李章达、李朗如四人学习俄文，还请了一位俄国教师每日到廖仲凯家教他们俄文。只有李章达后来去了俄国学习」。参见周谷：〈孙中山早期与俄国革命党人的来往〉，《传记文学》第 58 卷，第 3 期。

[7] 〈索科洛夫－斯拉特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 年 4 月 2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61－62 页。

[8] 斯特拉霍夫前引文。

[9] 〈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1921 年。（该报告既无署名，也无具体时间，但从报告中提到「极左的国民党（现称中华革命党）」的情况来看，报告的最初形成时间应该更早些）。CCA，中共代表团档案，第六批，第六件。

[10] 斯特拉霍夫前引文。

[11] 马林，荷兰人，本名斯内夫利特(F. M. Sneevliet)。

[12]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 年 7 月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73 页。

[13] 张秋白是 1921 年 11 月持孙中山、居正、张继三人所发的委任状前往苏俄远东的伊尔库茨克去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党代表大会的。此会 1922 年 1 月移到莫斯科召开，张秋白曾受到列宁的接见，并与契切林进行了长谈，但无论在各种场合，张均未提及要求苏俄援助问题。从契切林 2 月 7 日给孙中山的信也可以看出，俄国人这时甚至不

明白孙中山与苏俄打算「在什么范围内可以建立联系」。参见李玉贞译：〈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契切林致孙中山的信〉，1922 年 2 月 7 日，转见《近代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第 305－306 页；并见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The Russian Center for thePreservation and Study o f Documents on Modern History ）档案（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 495，目录号 154，卷宗号 181。

[14] 孙中山：〈致海外同志书〉，1922 年 9 月 18 日，《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555 页。

[15] 〈孙文复蒋中正函〉，1922 年 8 月 30 日，《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535 页。

[16] 〈马林为格克尔同孙逸仙的谈话所作的记录〉，1922 年 9 月 2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135－138 页。

[17] 马林：〈关于杭州会议后活动的报告〉，1922 年 10 月 14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4－85 页；〈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 年 11 月 7，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149 页。

[18]〈越飞致马林的信〉，1922 年 11 月 7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9 页。

[19] 孙中山 11 月曾有信给蒋介石，劝其勿因福建军事一时之困难而「稍萌退志」，其并举对苏交涉之事为证，称：「兄前有志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可知与马林商谈并不顺利。《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616 页。

[20] 〈孙中山致越飞的信〉，1922 年 12 月 20 日，转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1 期，第 56 页。

[21] 越飞、马林：〈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1922 年 12 月，斯特拉霍夫前引文，第 101 页。

[22]《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54 页；〈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 年 1 月 1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197 页。

[23]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 年 1 月 26 日，《孙中山全集》，第 7 卷，第 52 页。

[24]〈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 年 1 月 2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13－215 页。

[25] 同上引注。

[2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53 号记录〉，1923 年 3 月 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26 页。

[27] 〈越飞给马林转孙中山电〉，1923 年 5 月 1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70－171

页。

[28] 〈孙中山致越飞电〉，1923 年 5 月 12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53－154 页。

[29] 〈孙中山致全权代表越飞电〉，1923 年 5 月 23 日；《孙中山致马林转越飞电》，1923 年 6 月 30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55，165 页。

[30] 〈越飞给马林的电报〉，1923 年 5 月 19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63－164，173－174 页。

[31] 〈马林致越飞、达夫谦、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 年 5 月 31 日；〈马林在孙中山致越飞电后面的附言〉，1923 年 6 月 30 日；〈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 年 7 月 13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98，165，283 页。

[32]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 年 7 月 18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92 页。

[33] 参见卡尔图诺娃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 V. K. Bluehel in China，1924- 192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22 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 年 9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84－285 页。

[34] 同上引注。

[35] 同上引注。

[36] 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1923 年 8 月 5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中正筹笔，总号 001。

[37] 此文件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1937 年印行时更名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提到的那件蒋介石在莫斯科起草，但未曾公开过的「书凡八千二百余言」的报告。《初稿》说明：9 月 13 日，「公在宾馆拟代表团意见书（书凡八千二百余言，说明中俄国共两党互助关系。甲、绪论，乙、军事计划书，丙、宣传，丁、结论。）」。见毛思诚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 1933 年版，第 133－134 页。另王聿均先生称，此稿即为蒋起草的代表团访苏报告，在回国路上又再次对此报告进行修改，之后寄送孙中山处，显系有误。因此报告起草于代表团刚到苏俄不久，且内容完全与访苏经历及观察结果无关。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７年秋季号（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Fall 1987, Vol.xxl No.1）。

[38] 蒋介石：〈中国革命之新前途〉（New Prospec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 年 9 月，北京中央档案馆（以下简注 CCA）档案，235：7。

[39] 蒋介石前引文。

[40] 蒋介石前引文。

[41] 〈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 年 10 月 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95 页。

[42] 〈契切林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3 年 11 月 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307 页。

[43] 1923 年 10 月 23 日，德国爆发革命起义，苏联舆论立即对欧洲革命抱以极大期望，幻想德国革命可以引发整个欧洲革命的爆发。

[44] 〈托洛茨基给契切林和斯大林的信〉，1923 年 11 月 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308－309 页。

[45] 蒋介石前引文。

[46] 〈越飞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1923 年 1 月 2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214 页。

[47] 关于这一点，笔者同意蒋永敬教授之考证。详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赴俄考察记〉，《近代中国》第 136 期（2000 年 4 月），第 41－42 页。

[48]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 年 12 月 1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382－383 页。

[49] 〈蒋介石致契切林的信〉，1923 年 10 月 23 日，CCA，中共代表团档，第 24 批，第 4 件。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先生年谱初编》中所称 10 月 26 日「致俄外长齐采令函」，但《初编》所录并非原文，因而内容上与原函略有出入。毛思诚前引书，第 137－138 页。

[50] 参见卡图诺娃前引书，第 23－26 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 年 11 月 1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310－312 页。

[51] 同上引注。

[52] 参见鲍罗金：〈蒋介石访苏前后〉，《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9 期，第 24－25 页；〈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 年 11 月 2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340－341 页。

[53] 〈蒋中正致杨庶堪函〉，1923 年 7 月 13 日。关于蒋介石早期对联俄的积极态度，可参见王聿均：〈蒋介石访苏及其观察报告〉。

[54] 此即毛思诚撰《蒋公介石年谱初稿》中所说的蒋于 12 月 14 日在归船上所写之「游俄报告书稿」。前引毛思诚书，第 143 页。

[55] 参见〈蒋中正复廖仲凯论党政诸病要并述在俄考察意见函〉，转见谢信尧：《国父联俄容共政策研究》，台北帕米尔书店 1981 年版，第 281 页；并前引毛思诚书，第 166－168 页。在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蒋感触最深的在于两点：第一，即「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此显然由于苏俄在西北计划问题上出尔反尔所致；第二，即俄人「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进而估计其「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此显然是因为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所致。

[56] 〈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1923 年 12 月 4 日。

[57] 蒋介石：〈与廖仲恺书〉，1924 年 3 月 14 日，《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167 页。

蒋介石走向“三・二 0”事件的思想变化及其性格因素之分析

长期以来，除个别研究者[1]外，人们习惯于依据蒋介石自己的说法，把他对苏联及其俄国革命的看法，区分为两个时期或两个阶段，即 1923 年蒋赴苏访问之前和之后。蒋介石自己说：他对俄国革命，“第一时期的感想是同情的，第二时期的感想是失望的！是反对的！这种变迁，乃是实地考察的结果。”[2]由此出发，人们多半相信 1923 年秋天蒋介石访苏的结果，和 1924 年 3 月 14 日他给廖仲恺信中对苏联和中共的批评，已决定了他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基本态度。谈论此后的蒋介石，或者避而不提他当年也曾按照孙中山的意愿贯彻、宣传联俄容共政策的言论与事实，或者稍有触及，即用“伪装革命”，或“阳示进步”一语以概括。对于蒋发动“三・二 0”事变，更被认为是“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表面上与汪（精卫）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的。[3]这种说法，合乎逻辑，但却未必合于历史事实。因为这其实是站在政治人物后来的立场和说法上所得出来的结论，与历史事实本身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

历史事实的真相是，除了 1924 年 3 月 14 日那封孤立的，并且还有相当争议的信件[4]以外，至少在 1924、1925，甚至直至 1926 年“三・二 0”事件之前，我们都看不到蒋介石有任何反对或怀疑联俄容共政策的其他言论。既然如此，蒋介石又何以会走向“三・二 0”事件呢？这就是本文必须要进行考察和说明的问题。而要说明这段历史，我们必须结合蒋介石的独特性格，并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并深入分析蒋介石从 1923 年访苏到发动“三・二 0”事件的思想言论，注意其思想变化发展的逻辑过程与其人格特质因挫折而焦虑进而转向攻击的心理变化轨迹。笔者相信，这一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1）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与其行为之间有时未必总会保持同一取向，换言之，效果与动机未必统一。（2）简单地运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而不注意历史人物的性格与情境互动所造成的心理变化，对其行为取向的影响，很可能是过于片面和武断的。[5]

提倡“师法”苏俄

国民党的容共政策是由联俄政策而来的，联合苏联又与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思想密切相关。以往，人们通常会把国民党人的“以俄为师”主要看成是孙中山个人的主张和意志，并以不同方式把蒋介石看成是国民党内反对苏俄的始作俑者，却很少注意到，其实在国民党人当中，蒋介石还是“以俄为师”的最早主张者和坚持者。根据已有史料记载，还在 1918 年国内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公开欢迎俄国革命之际，蒋就已经有了学习俄文，留学俄国的想法。1919 年 1 月 1 日，还在福建军事前线的他，就曾暗自决心：“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6]当年因人事纠纷坚持告假离闽后，蒋再萌留学想法，仅因孙中山坚持要其留在国内而未成，但他还是一度尝试习读俄语，并密切注意俄国革命的进展。正是由于对国内政治的极度失望和对俄国革命的高度关注，使 30 岁出头的蒋介石在思想上受到了五四时期激进思潮的影响，明显地流露出同情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倾向。在他的日记中，动辄即可看出此种言论。他不仅经常表现出同情劳动阶级的态度，而且直截了当地把矛头指向资本家，称：“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利自由之机会。”[7]读俄国革命史，他会联系到中国革命的曲折艰难，发自内心地表示赞叹，“企仰靡已”。注意到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脉进入西伯利亚，他更会感到振奋，断言：“列宁政府之地位，更加巩固矣！”[8]在这种情况下，久不得志的他对孙中山单纯依靠地方军阀势力革命的作法愈加难以忍受，以至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状倍感厌恶，再三提出要去俄国“考察政治”，寻找出路。当然，自诩为孙中山军事专家的蒋介石，不像这时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动辄强调学习列宁及其党人“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的作风，而是每每会强调苏俄军事强大的原因，主张军制上当“参考劳农兵制”，引入其适合于中国军队性质者。[9]

蒋介石对政治及社会的厌恶态度，和坚持要去俄国寻求革命出路，不愿在孙中山之下继续与地方军阀敷衍纠缠的心理，还引起过其在国民党内挚友对蒋过分向往俄国的强烈担心。邵元冲即曾批评蒋不应太过生厌恶社会之心，而仅以赴俄为唯一志向。他说：“兄既谓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则兄必已自任为负改革责任之一人，如是则兄无论赴粤赴俄，实皆为欲完成此目的而起，兄之志在赴俄，既非预备在彼处作隐逸，则当然在彼处准备一部分力量，回国担任改革社会也。如是则兄必非厌恶中国社会之人，乃不满意现在中国社会之现象而已。如是则吾人所以要求学，要作事，要负责任，皆所以达此目的，以打破我等所不满意之社会现象，而造成一吾人所希望所满意之社会而已。”[10]

蒋介石“素性暴躁”，好猜疑，易激愤，对人对事常常意气用事，事后自己也不能不反复检讨忏悔。[11]但蒋之性格又相当固执，认准的事通常很难改变看法。对于学习俄国革命一事，他就不顾他人非议，始终坚持己见。1920 年 3 月，他甚至借上书孙中山的机会，用俄国革命成功的例子，批评孙中山应放弃对欧美日本外交之期待。他在历数孙中山借重对日对美外交屡屡失败的经过之后，明白指出：“列强各国对于俄国之压迫，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兵力压制之不已，继之以封锁，及其封锁之无效，又利用波兰及反劳农军以捣乱俄国。而俄国卒不为其所固者，亦以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他甚至认为，国民党的主张其实与苏俄相去不远，称：“吾党标榜显著，外人目中无不视吾党为劳农制之化身，故无论为美为法与吾党个人有极善之感情者，至一顾及其本国之政策，鲜有不为其所反对与阻梗者。故本党惟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以谭义金等反动军凭籍外交之失败为殷鉴，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自有发展之余地也。”[12]显然，在蒋介石这时看来，无论政治、军事、外交，中国革命都只能“师法”苏俄，才有出路。因此，他坚持认为：“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13]对照三年后孙中山才决心派蒋介石

赴苏考察，并明白提出“以俄为师”，蒋介石在这一点上走在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领导人的前面，似显而易见。

赞成“阶级斗争”

在蒋介石坚持之下，并经历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 1922 年 8 月终于决定正式向苏俄求援。30 日，事情刚有眉目，他就马上函告蒋介石称：“某事近已由其代表专人带函来问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之法，予已一一答之。从此彼此已通问讯，凡事当易商量也。”[14]

孙中山历经苍桑，他在联俄问题上自然要比蒋介石冷静许多。当 11 月蒋因人事问题发生猜忌而再度决心离开福州前线之际，孙曾有长函对此详加解说。孙函称：“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已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藉不可。”[15]

由上函不难看出，孙中山这时很大程度上还只是把联俄看做取得外援之一种途径，因而格外强调自身要具有讨价还价之资本，即所谓“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这与蒋介石关心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问题，仍有相当距离。

蒋介石在 1923 年 8 月终于有了赴苏考察的机会。当时，孙中山委任蒋为代表团团长，前往苏联考察一切并接洽援助。蒋 8 月 5 日回到上海，当即约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国民党人张继、汪精卫等商组代表团等事宜。他先后起草了军事和宣传意见书及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总计万余言。其中心仅在强调：“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16]

蒋介石此番苏联之行，对其思想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很难简单地根据蒋回国后 3 月 14 日给廖仲恺的信，以及蒋自己后来的回忆为依据，认为蒋此行“非常失望”。[17]

蒋介石此次访苏有没有失望与不满？有。其突出原因在于苏联政府原本已经答应帮助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军事训练基地，当蒋具体提出想以库伦作为主要军事训练基地的计划之后，苏联方面却转而表示反对。称：“在今后几年内，(国民党)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政治工作。开展军事行动的内在条件成熟之日，才是采取军事行动之时。依照提供的方案采取军事行动，无异于冒险，注定要失败。”同时借口蒙古人害怕中国人，强调国民党无论如何不应在外蒙古进行军事行动，声称这会引起严重误解。这让深具民族主义倾向的蒋介石敏感地怀疑俄国人已经把蒙古视同独立，故而有意不让国民党的势力进入外蒙古。[18]蒋 1924 年 3 月 14 日给廖仲恺的信中所谓“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即因此而发。他之批评“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也与此有关。[19]

但是，即使我们相信目前被广泛征引的这封信不存在后来加工修改的情况[20]，我们也不能忽略此信产生的特殊背景。即蒋介石写信时恰在对孙中山的做法极度不满，辞职出走之际，其看法带有某种情绪化的成份。

蒋介石这时的不满，原因甚多。一是与国民党一大改组的结果有关。蒋在理智上虽然看重名节，时时以人臣自居，强调对孙尽忠，自认不重权位，但依其性格，他对自己在孙中山眼里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一向仍十分敏感，[21]如今，国民党改组，众多在蒋看来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只因有共产党员的身份，就得以一跃而跻身于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他却连一大代表都当不上，这难免会让蒋心情不很愉快。二是不满孙中山、廖仲恺在广东的用人任事"不讲条理不定次序"。这既包括廖任广东省长，用人行政仍旧一袭旧习，尤其把财政权力交给并无经验的孙中山儿子孙科办理，致百弊丛生，也包括让他来办军校，却迟迟不解决经费和权限问题。而更重要者还在于，蒋属于那种有强烈抱负心的人，访俄后志得意满，自认颇有心得，对党事国事更有发言权，不想报告交孙后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孙中山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党政工作的设想，全由苏联顾问鲍罗廷设计，这让自尊心极强的蒋深以为辱，"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22]

由上不难看出，蒋 3 月 14 日给廖信贬低批评苏联和中共，明显地是与其在党内的处境及其当时的恶劣心态有关，未必可以视为其思想上转折的表现。而事实上，从这个时候蒋介石在思想言论上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蒋介石刚到莫斯科不久，俄国人就得出印象：他"同我们很亲近"，尤其关注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及其装备情况。9 月 16 日第一次参观军队，他就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热诚，"说了许多夸奖和感到惊讶的话"。并一再要求向士兵讲话，以表达他的感受。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的激情。[23]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他更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24]直至他离开俄国前几天与共产国际领导人会晤时，他仍旧在用共产国际式的语言解释说：我们在目前之所以还不能像苏联那样开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只是因为，第一，大多数中国人民不识字，所以在人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异常困难。第二，大多数中国人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但我们一旦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宣传共产主义原则的工作了。比较其他一些国家，"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他不无豪迈地建议说，俄、德、中三国"组成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的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25]

蒋在莫斯科期间，又是读《马克思学说概要》，又是读《共产党宣言》，"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他对苏联整体的印象，虽也时有批评，但更多的还是感慨与触动。称："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皆比我国人诚笃恳挚，令人歆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苏俄军队）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味，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俄国武器研究及其进步可与欧美各国相竞，非若我国之窃败也。""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意培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厚农工而薄士商之制度，吾亦无间言矣！"故断言："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相当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敢轻量。"[26]

蒋在莫斯科如此，回国后又如何呢？我们注意到，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在他向孙中

山和廖仲恺表示不满之际，他也不曾改变他相信俄国革命理念的心态。最典型如他对阶级斗争问题所持的态度，他并非不知孙中山的观点[27]，却公开主张应当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比如，他在 1924 年 2 月 17 日的讲演当中，就强调指出："现在世界只有二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被压迫民族一定要起来斗争，求独立，这是人类的天性。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一定要反抗资本阶级，不仅不再做资本阶级的奴隶，而且还要根本摧毁资本阶级不劳而食的社会基础。这两种斗争，最终事实上都要通过武装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为此，他公开主张："中国与外国的革命党，统统联合起来，解决世界一切不平等的问题。"并声称"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28]

注意到以上的情况，我们自然也就能够理解，何以蒋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会一面批评苏联与中共，一面明言："对俄党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我们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至事实于不顾。"[29]在这里，他虽不满于俄国党人于事实上之态度，但对俄国党主义之认同，却十分明显。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判断，即蒋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贬低苏联和中共，多半只是其一时自负心态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心理的一种反映，未必可以视为其走向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从联俄到"联"共

蒋介石赞成联俄容共政策，从他 1924 年 5 月 3 日正式就任黄埔军校（即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开始，就表现得很清楚。军校办校的形式、制度、人事组织等，都是苏联式的。军事教官的核心实际上是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政治教官的骨干也多选用了共产党人。甚至连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一届包括蒋在内 5 名执、监委中，3 人均为共产党员，第二届则除蒋一人以外，另外 7 名执、监委，全都用的是共产党员。他并且十分重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30]显然，只读过日本军事补习学校的蒋介石在军校的建设上，是高度重视他在莫斯科所得到的经验的，尤其看重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帮助。正是由于有了包括军校经费和武器装备在内的苏联援助，以及共产党人的倾力相助，黄埔军校才得以顺利建成和发展起来。仅一年的时间，军校就已经吸收了三期学员，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两千余名学生的重要军事单位，并作为学生军参加了平定商团之战及东征作战。蒋亦在此基础上，得以兼长洲要塞司令、东征军总司令，并由设立军校教导团、组成校军，最终建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兼任军长，从而成功地创立了第一支真正属于国民党的"党军"，也使蒋第一次有了自己属下的并且是嫡出的部队。这种情况自然使蒋对"师法"苏俄的意义会有更深切的体会。蒋介石所以经常讲："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之所以刚一开始组建自己的军队，就全力推行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并要求共产党员来出任主要的政工人员，[31]实在是因为联俄容政策带给蒋介石、黄埔军校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建设太多实惠。

正因为蒋介石在联俄容共问题上受益日多，我们不难注意到蒋介石在思想言论上也愈来愈展现出其革命色彩。建校之初，他几个月的讲演大都集中在如何做人，如何当兵，尤其是如何守纪律讲卫生上。虽然经常讲到学习俄国革命，但也主要是讲中国的党员如何不如俄国的党员能奋斗能牺牲。几个月之后，特别是孙中山基于"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的信念，视蒋介石为国民党内少数学习俄国的坚定派而引入革命委员会前后，蒋的言论明显更接近于共产国

际的思想主张了。

蒋这时不仅宣传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尤其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鼓动和教育官兵，有着特殊的心得。他强调：中国的乱源在帝国主义，因为“外国帝国主义来压迫我们中国，夺取我们原料，垄断我们商场，所以使我中国地价与物价昂贵。帝国主义者，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来压迫本国人民，保护帝国主义者来垄断市场。所以军阀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亦就是卖国奴，所以我们认他是第二个敌人。”而“这地主与富商，是使得我们生计穷苦的原因，亦就是我们最后的敌人。”因为“地主操纵地价，弄得我们无地可种；富商操纵物价，百货昂贵，弄得我们衣食无着，所以生计穷苦。”“打不倒乡下的地主，你们的敌人仍旧不能够除去，你们仍旧要被人家压迫，没有出头的日子。”他声称：“惟其社会贫富如此不平，所以我们要革命，必定使得人人要劳动，人人可以安乐。”“革命是为全体人类求幸福，尤其是对于劳动阶级，如农人工人的幸福最为注意。”“不许有劳逸不平，贫富悬殊，也不许人民以劳工得来的钱，被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暗中夺了去。”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32]他甚至解释说：我们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只是因为民生两个字足以代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决人类生活，谋求社会生存的要义，所以我们叫他做民生主义，而不再分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33]

1925 年 8 月，廖仲恺被刺。原本并不十分信任蒋的鲍罗廷，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认定蒋已成为广东国民党最可靠的左派将领，故全力把蒋推上前台，使其充任广州卫戍司令，与汪精卫、许崇智组成三人权力中心。因随后发现胡汉民胞弟卷入刺杀阴谋，许崇智属下的粤军将领中亦发现有谋反迹象，于是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胡汉民被送去莫斯科，蒋亦将许崇智强行解职递解出境。此一行动，被人称为广州政变。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蒋更进一步跃入国民党的决策中心，成为除汪精卫以外的国民党第二号领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蒋联俄容共的言论更趋激进。他不仅公开宣布要“与反共派的人为敌”，相信“国人相惊之赤化，在事实上确无根据，在理论上亦非恶名。”而且声言廖案的根子在帝国主义，激烈主张：“对于帝国主义者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直接和他开战”。[34]

蒋介石内心是怎样看待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呢？蒋这时有一段训辞讲得非常诚恳，应当不是虚言。他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到达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国际的势力，与其革命的使命，起来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帝国主义者所造的谣言，最有力量、最能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应受俄国人指挥。’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的，而且是应该接受的。去年总理将要北上的时候，对我不但有面谕，而且是有手谕。总理的面谕是：‘鲍罗廷同志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情总要容纳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个样才好。’……事实上，苏联同志并非居在指挥的地位，不过我们以世界革命党员自居，也很愿意受革命先进国同志的指挥。这并不是妄自菲薄、甘居人下的一件倒霉的事，实在是世界革命、联合被压迫民族的战线，指挥统一是现在对帝国主义者作战最要紧的一个战斗原则。”[35]

蒋介石这时又是如何谈论容共政策呢？他的态度同样十分积极，不仅肯定过去的“容共”，而且干脆认为两党就是“联合”的和“合作”的关系。他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其他团体肯同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

的，就很少了。所以去年当本党改组之始，虽有许多党员激烈的反对，而我们总理总是照着原定计划，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总理下了这样决心，不是随便的事，自然另有眼光和主张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就下这个大决心，不为众论所摇动。”[36]

蒋讲这话不是毫无思想和感情基础的。诚如他在 1925 年 12 月《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录序》所写：“今春孤军挺进潮梅，同志死伤者，六百余人，桂军袖手旁观于东江，滇军且通敌以谋袭我后；孟夏回师广州，讨伐叛逆之杨刘，死者伤者，以百数计；而沙基之役，至二十人之多，而伤者不计也。……十月奉命，重征东江，进攻惠州，世皆视为天险之老巢，人人以为难攻莫敌者，而本军将士，目无全牛，视若坦途，自刘团长尧宸以下，如耿泽生、谭鹿鸣、徐廷魁、但德芳、张忠熙、彭继儒、金鸣章、刘铭、陈作云叶振南、王嵩、周德保诸子等，死者百三十余人。伤者如詹忠言、曾扩情、蒋先云、杜从戎、冷欣诸子且四百余人。此其前赴后继，视死如归者，何哉？主义之所感，敌忾之所兴，亲爱之忱，油然勃发而不能自已耳。海丰之役，以三百之众，而敌三师之强寇；横江之战，林逆主力，悉数来犯，谋以三面包围我军者，反为我所各个击破。惜乎陈子厚、王步忠、侯吉文、范涛诸子，皆亡于是役。华阳一战，以三千初集之卒，而攻一万五千，背城借一，困守死斗以抗顽敌，殉难死者，自周团长保生，党代表姚世昌、周玉冠、车鸣骧诸子以下一百二十五员名。卒能转败为胜，扶危为安。呜呼，可谓荣而哀矣。……嗟乎，总理逝矣，先烈亡矣，而其神其灵，不昧不丧者，惟在其所遗本校后死而未亡同志一线之命脉耳。吾人之聊足告慰先烈者，亦惟此而已。此一线未绝之命脉，所造者为何？是乃总理一线相传之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二者凝集而成之血统也。”

对国共两党官兵能够在自己的率领下共同效命沙场，前赴后继，身为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不能不感慨万端，更不能不深感国共合作的好处。他显然希望能够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继续这样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愿看到两党之间有任何纷争。因此他明确表示：“吾愿与党内死者诸同志，同穴安眠于地下，吾愿本党后死诸同志，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始生死，本我亲爱精诚之校训，团结精神，继续我先死者之事业，以完成我国民革命之责任，直接以实行我总理之三民主义，即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称：“吾辈死者，但知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而为二，则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而徒使吾辈死者痛哭于九泉乎？”[37]

在这种情况之下，1925 年虽有反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相当部分国民党中执监委在北京召集西山会议，提出驱鲍、分共、惩汪的主张，在国民党内掀起分共的浪潮，蒋介石却丝毫不为所动。他不仅在日记中深表“痛恨”，而且很快就公开发表了《告国民党同志书》，尖锐批评西山会议，不惜旗帜鲜明地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以及鲍罗廷、汪精卫和共产党人出面辩护。称：“赤化也、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所以诬陷我者，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年，成绩俱在。‘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总理于遗嘱中认为与‘唤起民众’同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者也。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总理自信三民主义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岂在中国国民革命尚未完成之时，而已惧于何种主义之蚕食，总理有如许伟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后死之同志惴惴焉，惟被共产主义蚕食之是惧。其师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谓不肖之甚者矣。”[38]这一告同志书清楚地显示了蒋这时坚定支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态度。

护党与联共的矛盾

蒋介石思想激进，支持并拥护联俄联共，但这并不表明他对共产党或俄国人全无戒备心理。这种戒备心理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蒋对他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民党这一集体的内在的思想感情。事实上，蒋介石的个人权位及其政治抱负，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与国民党的组织生命结合在一起，不可须臾分开的。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蒋介石对联合共产党与戒备共产党问题的矛盾态度，应当不难发现蒋存在这种矛盾的态度和心理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蒋对共产党态度的好坏，其实是与共产党对国民党组织生命的影响消极还是积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人的言行有利于国民党的发展，蒋就坚定地站在联共政策的一边；共产党人的言行不利于国民党的发展，蒋就不能不保持一种戒备的甚至是抵触的心态。[39]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在蒋无疑是第一位的。

如何保证国民党的团结与统一？基于中国传统的观念，自然需要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而唯一能够统合国民党政治和精神的权威，当然就是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以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为最高权威，以国民党为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组织载体，要求所有党员忠诚于三民主义和国民党，这在蒋介石看来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故蒋介石办校伊始，就决心把黄埔军校办成真正实现三民主义和党的意志的学校。为此，他在 1924 年 7 月 30 日对军校第一期学生训话时，就明白告诫说："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事，也不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党员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三民主义，或变更三民主义的人，那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党员对于我们的三民主义，绝对不许批评与怀疑！"[40]

黄埔军校开办的最初几个月里，学生中虽然也有不同主义宣传的存在，主要却不是共产党的主义宣传，而是流行于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散布。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和随后的军事行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渐渐不再成气候了，国共两党的矛盾却开始由校外渗入到校内来了。从国民党中监委的弹劾共党案发生之日起，黄埔军校内部学生乃至教员中间，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了具有派别斗争性质的分歧与磨擦，更渐次生出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思想上明显区别的学生组织。这种区别与磨擦，因国共分歧而逐渐扩大，到 1925 年孙中山逝世、"戴季陶主义"出现，乃至廖仲恺遇刺前后，已经形成相当规模，再难视而不见了。

国共两党之间因性质、目标和具体方针政策之不同，存在相当的隔阂与误解，实难避免。但让国民党人最感不安的，还是共产党人身为跨党人员，不仅跻身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权力中心，而且动辄将国民党人分为左右派；不仅在国民党内暗中发展中共党员，而且常常采取简单生硬的划分标准，凡参加孙文主义学会者则一律拒之门外，凡同情工运农运者不论愿意参加与否反复劝诱极力工作。结果，黄埔军校军官学生贺衷寒因属于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虽 8 次申请加入，仍被拒之于门外；[41]而上海国民党人葛建时只因街头斗争表现激进，虽无意参加，却被反复动员。[42]

蒋介石这时也发现这一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12 月 3 日，十余学生因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李侠公的一封秘密信，与李拉拉扯扯地闹到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来。次日，又有更多的学生闹到办公室来。原因是这些国民党学生无意中发现，李公侠向共产党上

级密告说："我已随第一师到达石湾三日，尚未填具报告者，以四周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师长参谋长等），政治部虽自成一处，亦以杂有外人，遂使多无有机会填具报告，只好暂作信函写上，乞鉴谅。"并称"军官方面，如何师长，对政治工作，颇能认识其必要与价值，故我们工作尚无妨碍，可以暗中畅行，及藉机会宣传我们的主义。"当两党学生为此争吵时，共产党学生又放言批评孙中山。李侠公视国民党人"非同志"，并"暗中"工作，"藉机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乃至共产党学生在校内公开批评孙中山，这不可避免地激起了部分国民党学生的极大不满，齐声鼓噪要求蒋必须"监视"共产党人。蒋对此亦十分震惊，第一次开始担心："近日共产与非共产之争，几使本校、本军内部分裂，后患正长也。"并且在日记中严厉批评共产党学生："欲继承总理遗产而不认总理为总理，天下宁有是理耶"？但是，由于李侠公"为政治部人员，带兵官不能干涉"，蒋当场亦只能口头表示必予"严办"，以安慰愤怒之学生。[43]不过，几天后，蒋为此召集政治部与党代表讨论的"严办"之法，却并无"严办"之实。他提出并经会议通过的建议只是："一、校内准共产党员活动，凡有一切动作均得公开；二、总理准共产党员跨国民党，而未准国民党员跨共产党，然亦未明言不准，现在本校亦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惟加入共产党者须向特别校党部声明请准也。"[44]

在这里，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员的不满显而易见，但在处理上的模棱两可与矛盾犹豫之状也一望即知。十分明显，蒋以其军人式的线性思维特点，不仅重视权威，而且强调服从。由于他自信为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最忠实的信徒和代言人，因此难免会把部下对自己的忠实与服从，与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忠实与服从混为一谈。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在忠实于三民主义和服从于蒋的权威这方面，毫无疑问要较受共产党影响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成员好得多。蒋更容易同情孙文主义学会，并更容易听信其言论，实难避免。但这时蒋得益于联俄联共之处亦多，他也深知国民党就其即将展开的革命运动而言，需要苏联与共产党人帮助之处甚多。因此，他即使常常被孙文主义学会成员的种种不满言论所影响，对校内共产党员的作法不以为然，却也不能不考虑到两党合作的大局，不愿因校内问题而影响与共产党的关系，更不致将问题引致怀疑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基本政策上去。

蒋介石这时的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各打五十大板。对孙文主义学会，了解到该会有同情西山会议之言动，他当即"严电阻止"，并下令如有胆敢公开响应游行者，则立即逮捕。且一面"大骂该会卖党并卖本军，不应与邹鲁等勾结，及痛责王茂如、惠东升、贺衷寒等不应操纵学会，藉图个人名利"，一面明白电示：上海孙文主义学会已"为反革命窟穴"，在粤之孙文主义学会必须断绝与上海孙文主义学会之关系，并"切实驳正，免淆听闻"。[45]而对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动辄批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情况，他也力诫蒋先云等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期期以为不可。蒋这时的目的很明确，即无论如何要在维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绝对权威地位的方针下，尽力维护党内及军校的团结与统一。为此，他不止一次地说明："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认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哭。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是革命思想的中心，千百年后也是不能变更的，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绝对要以他的三民主义做基础。"尤其是"军队之中，绝对不好有两个主张，应当要完全以三民主义来做中心。"而由此出发，不好分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见解来，"不可以有共产党来非难三民主义，亦不可以国民党来排斥共产主义的现象发生。"[46]

在蒋介石的反复督导与告诫之下，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对联俄容共政策的态度，自然也不同于上海、北京等地区的其他孙文主义学会。对上海、北京等地孙文主义学会群起响应西山会议的举动，该会骨干、第三师党代表缪斌和军官学生贺衷寒等甚至不能不公开致函汪精卫

予以谴责。缪函称：若辈不明现在反帝国主义时期，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实同在一轨行动，“致歧视共产派份子，必欲分离之而后已，此实可痛心矣。”贺函亦称，听了蒋校长的演说，益相信“今日之中国只有反帝国主义与军阀之革命党，没有其他纠纷之必要。就是帝国主义与军阀一日不消灭，甚么主义都是空谈，无补于实际的东西。”国共两党党员之闹出许多纠纷和误会，“两派都不能不承认有相当的过失。在争闹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主义与组织。其实孙文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理论和原则，把他分析起来，固然有多少差异，但是把他互证起来解释，却是一贯的精神。所以好的孙文主义信徒，应该本孙先生创造主义的精神，去详悉研究马克斯主义；而好的马克斯主义信徒，亦应丢开客气去切实作孙文主义的工作。”[47]

“三·二0”：逼上梁山？

1926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拥护联俄容共政策态度之坚定，思想倾向之激进，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继续宣传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一切“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资本家、大地主、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48]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外，他更在宴请与会代表的演说中，明白阐述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联俄，是欲借外国力量，来平内乱，这完全是弄错了。”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要打倒军阀，但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打倒军阀，就是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总理毅然联俄，即在联合世界革命党，因为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他甚至告诉那些担心俄国人会重蹈帝国主义覆辙，到中国来揽权窃柄的人说：只要注意到苏维埃宪法与制度，就可以肯定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俄国的党员和民众，万不能允许他政府有如此行动的。“所以我们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同样，蒋也公开为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强调：“共产分子是本校本军为最多，可是他们在本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强烈批评党内反共产党的思潮和由此而生的种种纠纷，坚持必须“以总理之心为心，以总理之志为志，以总理之政策为政策，以总理之主张为主张”，一方面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一方面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在他看来，“本党反对共与拥护共产者，皆非主义之争，不过为私人的权利和意气之争。”故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对于反共产同志，可以问问他们，本党的共产分子现在所做的，有那一件是行共产主义？那一件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来答复。”[49]

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蒋对于国民党二大上共产党人地位的加强与上升，并无太多的反应。[50]至少，在蒋介石这时的日记当中，我们看不到蒋对二大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权力明显扩张这一点有什么样不满的反映。在整个二大及二届一中全会召开期间，蒋的主要注意力其实更多地还是集中在北伐的问题上。

北伐是孙中山一贯的主张，也是完成孙中山遗愿的最主要的途径。但作为新成立的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最初却是由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的。早在 1925 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拟出初步计划，并分别提交给了国民党中央和莫斯科。蒋这时已有了相当的军事资本，且正在上升的势头上，雄心正大，因此对北伐由衷表示拥护，并很快也拟定了一个全面的北伐计划书。[51]按照他的设想，1927 年 8 月就应“克复武汉”。因此，从 1926 年 1 月初开始，他就在极力推动北伐的实行。无论在春酌演说中，还是在二大军事报告当中，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北伐的必要性。对此，鲍罗廷最初也曾给予了相当的支持。但蒋无论如何想不到，1925 年 7 月间，即在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正式编就国民革命军之际，他最

为信赖的加伦将军奉调回国了。1926 年 1 月，支持北伐，对他也帮助最大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也突然辞职回国了。接任军事总顾问不久，全面接替加伦和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竟然对北伐大加阻拦。

蒋介石当然不会了解，鲍罗廷的突然回国，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莫斯科听信了以季山嘉为首的部分军事顾问的谗言。而苏联顾问对北伐行动的坚决反对，也纯粹是因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这时都有明确的指示要阻止广州进行北伐。[52]因此，不明就里的蒋不会把帐算到莫斯科的头上，他只会对季山嘉等人在北伐问题上的出尔反尔和不容商量的武断干涉，产生极大的不满甚至是猜疑。过强的自尊心使蒋难以接受把话放出来又吞回去的窘境，何况自陈炯明叛变以后，北伐早已成为检验国民党军事人员对孙中山忠诚程度的一项最重要的指标。在这种情况下，蒋难免会把季山嘉的反对看成是季山嘉与他之间的一种个人恩怨。一向疑心很重的蒋介石怀疑季山嘉是冲着自己来的。为此，他先是以脚痛心闷拒不出席国民党二大的闭幕式，忿忿然曰："我以诚往，彼以诈来，非可共事也。"继而联系到党内各种问题与困难，慨叹"人才缺乏，精神涣散，同志不明事理，挑拨离间务尽其能"，深感党内环境"艰险"，心情渐坏以致难以名状。[53]

北伐之结尚未解开，军事委员会忽然又削减了已经定好的黄埔军校经费，凭白无故把减下来的部分挪给了本来经费已经不少的他第一军属下的第二师。该师师长王懋功自代理广州卫戍司令以来，与季山嘉和汪精卫走得较近，表现左倾，引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忌恨，早有许多流言，让蒋猜疑和不满。[54]如今军委会的做法更不能不引起蒋的怀疑。鲍罗廷等苏联顾问几个月前运筹帷幄，翻云覆雨，利用自己卫戍广州的便利，赶走许崇智，再一步把自己推上权力颠峰，对此有过亲身经历的蒋介石自然记忆犹新，知道其中利害，不免"意颇郁郁"，心里痛责苏联顾问"倾信不专"。联系到季山嘉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蒋尤不能不怀疑季山嘉别有企图。以至与季山嘉谈政局与军队组织，也总是感觉季山嘉"语多规讽"，暗忖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55]蒋的性格一向是，合则聚，不合则离。既然大权在季山嘉等人手里，你看不上我，我也不伺候你。于是，蒋不仅辞去第一军军长一职，不就国民革命军总监，而且鉴于"苏俄友人疑忌侮慢防范欺弄"，"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等原因，更先后要求辞去广州卫戍司令和东征军总指挥的职务，甚至向汪精卫提出要"赴俄休养"。[56]

蒋介石遭遇逆境时容易发脾气、使性子，甚至离队而去，有史可查。当年，蒋在跟随孙中山的不到 8 年时间里，动辄因为对人事问题不满，不管不顾擅离职守从前线返回上海或老家就曾多达十余次。即使孙中山或党内同仁反复劝诱批评，自己每每也反省脾气太坏，结果遇事还是照旧。[57]足以见其暴躁、任性的本性根深蒂固，移无可移。然而，蒋当年之所以总是旧病复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那时都是做为孙中山委派的军事参谋人员去军阀部队里做参谋或参预指挥工作，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他之所以总是难以与前线的军事将领合作，一个基本原因也是因为多数手下有兵的将领或者不听调遣，或者对他的介入心存戒备和抵触。如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蒋手下已有一军一校，并且是国民党最精锐的力量。对于这两支力量，尽管他理智上把它们视为党军党校，并且真心想让它们为国民党的事业服务，但受传统和环境的影响，他从一开始其实就像其他将军们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把它们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某种重要资本。如今无论遇到怎样的纠纷，他都断不会像过去那样轻易甩掉部队回家去了。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视这支军队和学校一如己出，一旦认为有人阴谋把它们拆散或夺走时，他注定会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卫的反应。

这种情况很快就发生了。2 月 24 日，国民政府组成两广统一委员会，在原有的 6 个军的基础上，不知何由，空出第七军的名义，而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九军。季山嘉等人这种奇怪的作法立即惹起蒋的强烈反弹。联系到将近两个月来种种可疑的情况，他断定此举一定是季山嘉等想通过把王懋功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为第七军，进而削弱自己力量，并夺取广州控制权的一个重大阴谋。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26 日即采取行动，重演驱逐许崇智的故伎，一举将王懋功扣押起来，随即遣送上海，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接替了第二师师长一职。事后，他在日记中忿然写道：王懋功“狡悍恶劣，唯利是图”，有人则“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58]

王懋功被除去，第一军得以巩固，蒋一度相信季山嘉等再难以向自己挑衅了，因而心情一时明显好转，相信已“稍获安定”。他在 27 日上午找到汪精卫，力陈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除，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扬言：“如不准我辞，就应令季山嘉回俄。”汪虽稍加劝慰，也“允即进行”。下午再见汪时，汪称季山嘉已自知其错误，并露辞去之意。蒋更为放心，暗自庆幸，估计季山嘉当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59]

自然，蒋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因为季山嘉一时的示弱而放松警惕。恰恰相反，注意到季山嘉并没有马上辞职回国的意思，蒋不能不担心季山嘉还会采取其他手段对他进行报复。3 月 4 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来谈国共纠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趋势，断言将来“结果为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到时候惟有靠黄埔军“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而已”。邓演达的说法提醒了蒋，他不能不警觉共产党的作用和力量。于是重又感到担心，暗中哀叹：“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60]而随后新任第二师师长刘峙和邓演达送来的油印反蒋传单，更进一步证实了蒋介石的猜疑，即共产党人很可能会被人利用来反对自己。尤为让蒋担心的是，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活动向不公开，这就更增添许多危险的因素与变数。好在汪精卫这时对蒋的一些想法还颇能体谅和接受，蒋尚未感到太大的危险。他依旧公开演讲称：“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怀疑三民主义，亦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三民主义者，决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共产主义者，亦决无怀疑三民主义之理。”告诫军校学生一定不要“自家反对自家的主义，自家拆散自家的战线”。[61]

这时的蒋介石对汪精卫应该说还是尊重的。毕竟，蒋虽然极其暴躁任性，但严格说来，他到底还是那种受到旧式文化和教育影响，熟知纲常礼义，有一定自知之明的人。[62]在这里，一个最典型不过的例子是，1924 年 10 月孙中山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决心建立革命委员会，并决定吸收蒋加入而意欲排斥长期在孙身边且为孙所重用的胡汉民与汪精卫，蒋得鲍罗廷通知后不仅没有因为自己从此可以位居胡、汪二人之上而暗生欢喜并幸灾乐祸，相反倒诚惶诚恐，“期期以为不可”，与鲍罗廷当面争辨。他在随后给孙中山的信中更直言要孙重新考虑此一安排。函称：“中以为必须展堂（即胡汉民－引者）与季新（即汪精卫－引者）之名列入为妥，若列入之后，彼自不来，则为另一问题，而组织名单万不可无胡、汪，否则不如暂缓组织之为上也。”“若恐其主张不一或反对执行，则最后决定仍在先生，任何委员不能违反，何必先拒人于千里之外也？”[63]蒋之所以经常自我反省，对有养育之恩、知遇之恩的亲朋至友念念不忘，很大程度上也都反映出其性格缺陷的种种表现，未必完全符合其内心的情感与道德尺度的标准。而基于这种情感的和道德的尺度，蒋的军事资本未必与他在权位上的抱负或野心全成正比。也就是说，他其实很难像其他一些军阀那样，为谋私利而动辄背信弃义，犯上作乱。特别是他自知自己资历上远浅于这时的国民党政治领袖汪精卫，汪对其迅速崛升又有相当帮助，汪在蒋与季山嘉的矛盾当中最初也并未明显地偏袒后者，故蒋这时亦仍把汪

视为可与之交心的上峰与朋友，还在与汪切商各种问题。因心情不好未回答汪的问题，发现后还“甚为歉惶”，批评自己“固执太过，使人难堪而启衅隙”。得知汪一如既往，毫不介怀，更会心生“感动”。也正因为如此，与季山嘉的过节乃至整个政策的把握问题，如怎样避免大权旁落，既与共产国际一致行动，又不失自动地位等，他都愿向汪精卫提出并讨论。有汪精卫的理解，即有国民党组织为后盾，其虽对共产党人有所担心，这时也止于批评：“不能相见以诚，办世界革命之大事”，“貌合神离，则未有能成者”。[64]

让蒋再度意想不到的是，3 月 14 日，当他与汪精卫谈话时，他发现居然连汪也开始对他表现出不耐烦和轻视的态度。这表现在汪明显地相信季山嘉的话而听不进蒋的解释，且“有讽余离粤意”。这一情况显然使神经已经十分脆弱的蒋深受刺激，怀疑汪“受谗已深，无法自解”。蒋思想上由此更陷于极度焦虑之中。想到汪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若汪亦不信任自己，再有季山嘉在旁怂恿策划，加上共产党从旁相助，后果岂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多疑的蒋马上开始怀疑安排王懋功脱离第一军的计划中也有汪精卫的份，因而后悔自己竟没有看出汪其实早就卷入到这场反蒋的阴谋之中了。想到这一层，蒋自然变得更加神经质，15 日一整天坐卧不安，就连他自己也发觉自己“忧患疑惧已极”，难以自制了。他反复检讨，更后悔自己“缺乏政治知识，又少组织能力”，一向“以为政治组织完全（可以）信任同志，不必研究”，对汪竟“不能察言观色”，结果不但“为人之傀儡”，而且竟被“困于核〖垓〗心”，落到了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65]

分析蒋介石这些天的心理状态，我们不难看出蒋直到这时都还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依旧只是一介军人。其实，蒋更具军人特点这一点，在他刚到俄国时，苏联的陪同人员就敏锐地发现了，他们明确认为：蒋“在军人当中有点直言不讳，也不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他们遵循的习惯和提出的问题说明他们是军人。”[66]职业军人考虑问题及处事直来直去的方式，加上其自身的多疑性格，在政治上和人事上稍遇复杂情况与变化，就难免会陷于极度疑惑乃至焦虑之中。何况在相信汪精卫已倒向季山嘉一边后，蒋自认已不再有国民党组织可以依靠，自然更会惶惶不可终日了。到 17 日晚，他已痛苦到“入地狱”一般，以至于在日记中痛陈：“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于佛入地狱耶？”[67]

就在这时，又一个十分偶然、鬼使神差的误会使蒋介石本来就绷得过紧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住了。他终于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3 月 18 日傍晚，因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定安号被匪抢劫，有人向黄埔军校求助，军校值班人员当即电请驻省办事处速派船来，以应急需。办事处主任随即向海军局请援，海军局当天夜里即令中山舰出动。次日晨 7 时，中山舰遂驶往黄埔。中山舰驶出不久，因俄国考察团上午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身为共产党员的局长李之龙于是又打电话请示正在广州的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一事，询问可否将中山舰调回。这时又恰好汪精卫两三度问他是否或何时回黄埔，蒋正疑心汪的用意，一听说中山舰没有他的命令已开去黄埔，顿时怀疑其中有诈。他当即猜测：“为什么我既没有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这究竟是什么事？”[68]联系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当中的他马上就得出结论，相信多半是有人“欲摆布陷我也”，准备用他对付许崇智和王懋功的办法，把他架去苏联。[69]

既如此，蒋介石像以往遇到此类事情的反应一样，一气之下，不顾一切，撂下工作马上走人。当然，这时的走，不过是“准备回汕（头东征军司令部－引者）休养”而已。走在路上，他

一直处在极度愤怒之中，始终认定“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以至越想越气，几乎到“怒发冲冠”的程度。蒋这里所说的“对方”，显然是指汪精卫与季嘉山。但左思右想之后，蒋终于发现悄悄溜走绝非上策，反而容易给汪、季等打击自己进一步提供口实。结果，如蒋的日记所记，“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回到东山寓所后，蒋与部下连夜开会，“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70]

蒋介石所以会去而又返，并不惜动武，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已有了武力的凭藉，大可不必像过去完全以消极的办法处之。对王懋功的断然处置，已经清楚地显示出这一作法的效力。但更重要的是，既然蒋相信汪、季意在打击自己，他自然会注意到微行出走的害处。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悄然遁迹，蒋介石自认为怀疑得到证实，因而断言：“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71]此足以证明蒋临机之际也必定会有一样的考虑与担心，害怕消极躲避反而会让汪、季怀疑自己做贼心虚。即如此，蒋不惜一搏以表明自己不愿任人摆布的态度，实属必然。

蒋介石爱使性子，容易走极端的性格自然也是重要原因。半年多来他正处于权力地位急速上升的态势，这使其心态上已远不同于孙中山时代。自负的心理和强烈的抱负心因此已变得更加亢奋，北伐的提出与坚持，就是明证。当年的党是孙中山的，蒋虽自认有许多宏大设计和长处，却苦于没有自己置喙的余地。而今党内蒋自恃已没有几位真有资本和威望可以承担孙中山重托的人选，在党面临如此重大的历史选择面前，是拱手把党让给汪精卫和季山嘉去摆布，最后像邓演达所预计的那样，使国民党“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还是不顾一切阻止党权旁落，自己冒险挺身而出，不惜犯错误以证明自己问心无愧呢？联系到蒋过去一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历史，我们也不难想象他一定会选择后者。

问题是，在这个时候迈出这一步，却未必是蒋介石所希望的，至少与其思想发展的逻辑与趋向未尽合拍。

（载《历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

----

[1] 杨天石、余敏玲对于蒋介石早年思想和发动“三·二 0”（中山舰）事件的原因的研究，是笔者所见目前相关研究当中唯一较少预设主观价值判断的论文。杨基本上认为蒋早年思想的主要倾向是“追求进步”的，“三·二 0 事件”的发生，亦属偶然，非蒋之蓄谋。余则相信蒋“既不是一个反共的先知先觉，也不是表里不一的反共阴谋家”。分别见杨天石：《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未刊稿）（以下记为前引文 1）；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以下记为前引文 2）；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三十四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 年 12 月。

[2] 蒋介石：《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10 卷，台北 1984 年版，第 390 页。

[3] 这里可以提及的较具代表性的中文研究著作有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华学

术著作奖助委员会 1966 年版），黄道炫的《蒋家王朝·民国兴衰》（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年版）以及汪荣祖、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

[4] 汪荣祖和李敖，以及余敏玲，对 3 月 14 日信都有比以往的简单说法，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汪荣祖等前引书，第 93－96 页；余敏玲前引文，《集刊》第三十四期，第 72 页。

[5] 本文只想适当地借鉴心理学关于人格与情境相互作用研究法（person-by-situation approach），故无意引入心理学的专业词汇。

[6]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 1。

[7]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 1。

[8]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 1。

[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55 页。

[10]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57 页。

[11] 蒋一生中批评自己性格及处事方法的文字甚多。此时较集中者可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50－56 页。

[12]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62 页。

[13]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 1。

[14] 《孙中山复蒋中正函》（1922 年 8 月 30 日），《孙中山全集》，第 6 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35－536 页。

[15] 《孙中山致蒋介石函》（1922 年 11 月 21 日），《孙中山全集》，第 6 卷，第 616－617 页。

[16] 《蒋中正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1923 年 8 月 5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筹笔 2010.10/00001/001。

[17] 转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129－131 页。

[18] 有关孙中山西北军事计划提出及孙逸仙代表团赴苏接洽失败的经过，可参见拙作：《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载蒋永敬、杨奎松：《中山先生与莫斯科》，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 2001 年版，第 177－226 页。

[19] 转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136，142，167－168 页。

[20] 目前所能见到的蒋介石日记、文稿，除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台北国史馆、党史会原

藏，确属当年亲笔者外，多应慎重使用并加考证。因蒋向有整理修订日记习惯，而录有大量重要日记、文稿的《蒋介石年谱初稿》、《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先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以及《事略稿本》、《困勉记》、《省克记》等等，更常有经编纂者改动原文，致使各书引用同一文字，却各不相同的情况。

[21] 1920 年 3 月 31 日蒋日记曾记述廖仲恺、胡汉民等对他受召前往福建漳州前线事“群相祝贺”“殊感不快”的情况，称“此皆余资格犹浅”，廖、胡等才会因“诧异”而当成一件大事来祝贺，故深恨自己“实不副名”。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蒋对自己地位格外计较的心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日记类钞·（三）》，《民国档案》1999 年第 2 期。

[22] 蒋这时曾曲言批评孙“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断言：“如吾党同志果能深知中正，专任不疑，使其冥心独运，布展菲材，则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临时纷乱，以陷危境”。《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161，164－168 页。

[23] 《杜霍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情况的札记》（1923 年 9 月 10 日）；《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 144 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 年 9 月 17 日），《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国》（1），第 288，290－292 页。

[24]《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1923 年 10 月 18 日），《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国》（1），第 301 页。

[25]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 年 11 月 26 日），《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国》（1），第 330－338 页。

[26] 《困勉记》1923 年 9 月 9，17，21，22，23 日，10 月 10，13，16，18 日，11 月 4，7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27] 参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 年 8 月 3，10 日），《孙中山全集》第 9 卷，第 355－394 页。

[28] 蒋介石：《中国革命之要义与学生之责任》（1924 年 2 月 17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中华书局 1964 年未刊稿，第 197－200 页。

[29]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167 页。

[30] 转见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36 页。

[31] 蒋介石：《俄国党员活动的方法及其成效》（1924 年 6 月 29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 311－313 页；《黄埔丛书》第二集，第 63 页；《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 11 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2），第 77 页。

[32] 蒋介石：《中国现状及俄国革命成功之原因》（1924 年 9 月 25 日）；蒋介石：《新兵精神教育问答》（1924 年 10 月）；蒋介石：《当兵的意义和责任》（1924 年 11 月 30 日），《蒋介

石言论集》第一集，第 368－371，391－401，485－488 页。

[33] 蒋介石：《主义不行，党员之耻》（1925 年 4 月 9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69－72 页。

[34] 蒋介石：《追悼廖党代表应努力实现三民主义》（1925 年 8 月 31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201－202 页；蒋介石：《祭廖党代表文》（1925 年 8 月 31 日），《革命军》第 8 期；蒋介石：《真革命党必决心成仁》（1925 年），《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210－212 页。

[35] 蒋介石：《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苏俄革命纪念宴会演讲辞》（1925 年 12 月 11 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 1926 年版，第 56－57 页；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 年 1 月 10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337－338 页。

[36] 蒋介石：《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1925 年 9 月 9 日）；蒋介石：《团体训练的重要》（1925 年 9 月 13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226，233－235 页。

[37] 载上海《民国日报》1926 年 1 月 1 日元旦增刊一、二版。

[38] 《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1 月 1 日十一版。

[39] 包括对西山会议派，蒋虽公开严厉批评，内心里却颇念旧情，基于不愿根本破裂和尽可能维护党内团结的角度出发，曾设想不把西山会议问题提交国民党二大做裁决。《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40] 蒋介石：《军校学生应绝对信仰三民主义》（1924 年 7 月 30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340－341 页。

[41]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 年 2 月 15，17 日），《共产国际、联共与中国》（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0 页。

[42] 葛建时：《忠告我们的好朋友－共产党》，上海《民国日报》1926 年 1 月 7 日“觉悟”副刊。

[43] 《非同志》，上海《民国日报》（言论）1925 年 12 月 22 日；《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民国档案》1998 年第 4 期。

[44]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45] 《王懋功关于未从孙文主义学会勾结西山会议派反共遭恨和表示忠于蒋中正致张静江函》（1926 年 3 月 7 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9 页；蒋介石：《致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电》（1926 年 12 月 23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315 页。

[46] 蒋介石：《坚持最后五分钟是一切成功的要诀》（1925 年 9 月 9 日）；蒋介石：《团体训

练的重要》，《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226，233－235 页。

[47] 转见《关于党内问题之重要函》，《广州民国日报》1926 年 1 月 11 日十一版。

[48] 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二团训话》（1926 年 1 月 28 日），；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一团训话》（1926 年 1 月 30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373，377 页。

[49] 蒋介石：《再论联俄－在黄埔军校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俄国同志演说》（1926 年 1 月 10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册，第 337－340 页。

[50] 在国民党二大选举的结果中，中央执行委员 36 名中 8 名是中共党员，候补委员 24 名中 6 名是中共党员，约为四分之一弱。在随后选举的中央常务委员当中，更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席位，即 9 名委员中 3 名为中共党员。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八部一秘九个部门中，则更进一步实际取得了 3 个部长，和 8 个部秘书（即副部长）、一个书记长的席位，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详见李云汉前引书，第 474 页。

[51] 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 1926 年国民党军事规划》，转见卡尔图诺瓦：《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2－224 页。

[52] 有关联共（布）中央这个时候反对北伐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第 74－78 页。汪荣祖、李敖书关于“俄顾问不过是觉得北伐尚非其时，蒋以此与季山嘉争论，不过是制造中山舰事变诸多借口之一”的说法，以及黄道炫关于季山嘉只是反对蒋北伐武汉，顺长江底定东南的计划不表赞成，主张由武汉挺进西北，与冯玉祥的国民军汇合的说法，均与史实出入较大。参见汪荣祖、李敖前引书，第 127 页；黄道炫前引书，第 103 页。

[53]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54]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5－196 页。

[55] 转见杨天石前引文 2。

[56] 1926 年 1 月 15 日蒋上书辞第一军军长。2 月 1 日军委会任命蒋为国民革命军总监，蒋未就。2 月 22 日，蒋请军委会解除东征军总指挥职。2 月 7 日通电辞一切军职。2 月 9 日拟电准备辞军事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分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台北党史会 1994 年版，第 198－199 页；《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362，381－382 页；杨天石前引文 2。

[57] 参见汪荣祖前引书，第 59－87 页。

[58] 杨天石前引文 2。

[59] 参见杨天石前引文 2；《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0]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1] 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开学典礼训话》（1926 年 3 月 8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387 页。

[62] 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可分为伊底（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即满足自我需要的欲望，对现实情境的权衡与道德意识的约束。每个健康人身上，这三者总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对立的，只是何者更强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蒋的道德感也未必弱于其自我放纵的部分。

[63]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243 页。

[64]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5]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6] 前引《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问第 114 步兵团情况的书面报告》。

[67] 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68] 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1926 年 4 月 20 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 447 页。

[69] 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考证，可参见杨天石前引文 2，黄道炫前引书第二章（三），及汪荣祖、李敖前引书第二章第四节。

[70] 有关蒋介石各种历史文献当中所记述的 1926 年 3 月 19 日日记的内容，是一个最容易说明慎重使用这类文献的例子。比较《蒋介石年谱初稿》中蒋亲笔修改前和修改后的文字，再对照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中的文字，当不难发现，《蒋介石年谱初稿》（包括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等）断难作为可靠史料直接引用，非有相当佐证材料和相当分析不可。因其文字内容改动之大，足以产生严重误导。如按照日记类钞，其一段文字本应是："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思之，怒发冲冠。"蒋改后，成为："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蒋再改后，更变成："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

[71] 杨天石前引文 2；《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瞿秋白与共产国际

瞿秋白，1921年在苏俄入党，1923年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四年后正值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受命担任中共历史上地位显赫的总书记，一年后即退为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 年六届四中全会因被指责在三中全会期间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而被迫退出政治局，从此不受重用，至1934年竟被临时中央领导人下令留在陷落的江西中央苏区打游击，以致被捕遇害。

瞿秋白的一生，大起大落，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但与此同时，天生具有多愁善感的文学家气质的瞿秋白，之所以会牺牲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跻身于他并不善长的政治斗争的舞台，除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大势所使然之外，多半也是同他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的。尤其是瞿秋白一波三折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成也共产国际，败也共产国际，若无共产国际和苏联人的作用，瞿秋白的一生也许应当是另一个样子。

与苏联结缘

瞿秋白1899年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世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很小就表现出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破产，父亲离家出走，自己被迫中途辍学，母亲又不堪债务缠身服毒自杀，瞿秋白对人生颇多伤感。直到1916年来到北京投靠堂兄之前，他只是打算“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世，甚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1]来到北京之后，他虽通过了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入学考试，准备在他所酷爱的文学方面进行深造，却再度因为无钱付学费而未能如愿。一个偶然的机会，瞿秋白进了北京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这使得他开始与俄国结下不解之缘。

瞿秋白决心学习俄文，并不是因为知道当时俄国已经革命，也并非因为了解到俄国文学的伟大，当时不过是出于对“寄生生活”的痛苦，考虑到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又许诺毕业后能够有固定工作，因而“当作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2]想不到，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陡然打破了他“孤寂的生活”。对旧社会种种不平的疑惑和仇恨，驱使他迅速开始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并投身于政治斗争的旋涡，试图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和平博爱的“新社会”。一年以后，他又接受《晨报》所邀，以特邀通讯员名义前往当时还扑朔迷离、充满神秘的社会革命色彩的苏俄，希望“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3]

苏俄之行无疑根本上改变了瞿秋白的世界观，他从此开始笃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同时，瞿秋白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向往与热爱，也使他很快成为一个受到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欢迎的中国人。赴俄初始，他就与俄共在远东的重要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随后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的撰稿人之一。紧接着，远东书记处先后推荐瞿秋白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4]，和担任新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中国部的翻译。在此前后，瞿秋白在莫斯科遇见了当时正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中学同学张太雷，并很快在张太雷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之后，瞿秋白又作为翻译在1922年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召集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并在1922年11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内，瞿秋白几乎是唯一的俄语翻译。[5]

瞿秋白在苏俄的经历，特别是共产国际对他的好评，使得他人在苏俄就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够到远东书记处去工作，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共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6]　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瞿秋白在苏俄期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问题了。这使得他在 1923 年应中共中央的要求回国之后，当即被授予理论宣传的重任。尤其刚刚回国的一段时间里，瞿秋白在北京一方面要设法挣钱维持生活，一方面完全一个支撑着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出版工作，辛苦异常[7]。以后，瞿秋白来到上海，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固定的生活补贴，生活得到保障，他又进一步负责起宣传国共合作的《前锋》杂志，并开始为党的机关刊物《响导》周刊撰稿。这位只有 24 岁，刚刚从苏俄回来，在党内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瞿秋白很快在理论宣传方面显示了他的特长。他不孚众望，把两个刊物都办得有声有色，充满理论性和战斗性。而对于共产国际这时所提出的国共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面对中共党内众多反对意见，瞿秋白也能够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并且一再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因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方面的好感。马林高度评价瞿秋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8]因此，当 1923 年 6 月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也交给瞿秋白来起草。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更顺利地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由此得以初步奠定。

鲍罗廷的得力助手

1923 年 10 月，根据苏联政府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在苏联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推荐下，鲍罗廷前来中国的广州担任国民党的政治总顾问，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占据广州的国民党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进行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的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必须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员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起作用。因此，鲍罗廷来华后很快就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推荐，坚持将懂得俄语的瞿秋白调去广州，组织了一个只有几个人(包括胡志明在内)的的办公室。[9]而瞿秋白在俄语方面的特长以及在苏俄的经历，使他迅速成为鲍罗廷与中共中央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

自从瞿秋白来到广州之后，他与鲍罗廷几乎形影不离，成为鲍罗廷的得力助手。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廖仲凯、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问题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团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少不了瞿秋白的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也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的关系。多半也正因为如此，鲍罗廷相信应当让瞿秋白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1924 年 1 月，鲍罗廷在与中共党团联席会议上明确批评中共在上海对国民党的工作缺乏重视，与国民党缺少联系与合作，不能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为广州的改组工作提供足够的情报。当时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广州正准备进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建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和确立新的党纲及党章。由于广州距离内地较远，交通不便，又与北京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在内地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

长期在那里发行，影响全国甚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对在全国范围内促成国民党的真正改组，使之成为群众性的党，实现国共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鲍罗廷特别重视上海国民党的工作，并推举瞿秋白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上海国民党支部、特别是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所以提议瞿秋白离开他的办公室参加上海国民党支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显而易见是希望通过瞿秋白来贯彻他的改组意图，并加强他以及中共中央与内地国民党之间的联系。[10]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的同意就赋予瞿秋白以如此重任，充分显示出他对瞿秋白是高度信任的。[11]

瞿秋白 2 月 7 日到达上海，开始积极参予组织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同时还兼任由老资格的国民党人于右任担任校长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讲师，致力于在理论上培训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特别是改组后的《民国日报》，在瞿秋白的直接参予下，在政治上开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为新近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拥护苏联运动积极辩护，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猜疑和反对，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声称《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则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12]4—5 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协定问题的谈判的消息传开，更引起坚决否认北京政府的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孙中山这时也接连致电鲍罗廷和加拉罕，要求苏联放弃与北京政府谈判的努力。随着中苏协定于 5 月 31 日在北京签订，国民党内右翼势力一时群起鼓噪，许多国民党人公开主张与苏联断绝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等中共党员不得不挺身而出，与右翼国民党人进行斗争，孙中山虽出于取得苏联援助的目的，说服了国民党内主张破裂与苏联关系的党员，但却难以平息党内右翼对中共党员无条件拥苏态度的强烈不满，致使国共两党关系竟因此出现严重危机。

对于国民党内出现的这股反对与共产党合作的潮流，陈独秀很快提出了使国民党内派别斗争合法化的主张，要求瞿秋白通知鲍罗廷，设法支持中共“在国民党内形成左翼派别”。[13]6 月 25 日，鲍罗廷在与国民党右翼代表张继等人的谈话中，明确地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开始强调党内分派之必然。[14]但事实上，在几次与孙中山等人谈话后，鲍罗廷就意识到广州的形势已经对自己和中共十分不利了。鉴于形势十分严重，他不得不一面去电北京苏联大使馆，向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为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要瞿秋白能够赶回广州协助他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尽管这个时候“中央仅有三人，《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但鲍罗廷明确认为，“最重要的是保证广州有工作人员”。由此不难想见鲍罗廷对瞿秋白是如何的重视。[15]

8 月初，在得知国民党中监委有人就中共党团问题提出弹劾中共党员案之后，陈独秀同意瞿秋白前往广州，代表中央协助鲍罗廷，负责与孙中山等人就此进行商谈。瞿秋白返回广州后，再度开始配合鲍罗廷在国民党领导人中间进行劝说工作，力争保持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存在。但孙中山为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仍旧坚持开会讨论弹劾中共党员案。在征得加拉罕同意后，鲍罗廷决定采取退让政策以避免因此形成两党关系破裂的局面，而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明确主张苏联不应继续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更反对任何退让。[16]就在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几乎同时，得知鲍罗廷准备提议在国民党内组织一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之下，由国、共和共产国际各出一名代表组成，将所有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训令交给委员会审查，同时并负责解决两党关系中的一切纠纷。对此，瞿秋白不得不通知中共中央研究对策。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

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为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17]但是，由于瞿秋白的信没有及时送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到达时，国民党二中全会《有关容纳共产分子之训令》已经正式通过，鲍罗廷和瞿秋白均参加会议，并表示赞同。此事引起中共中央极大不满，瞿秋白很快被召回上海，并被陈独秀等斥责为“擅称代表”。瞿秋白虽再三解释此国际联络委员会实“为哄骗右派之一种方法，事实上该项工作，殊难实现”[18]，但中共中央坚持认为这一组织难免不成为国民党今后束缚中共的工具，最后终于迫使瞿秋白“认错”。当然，在这个问题上，瞿秋白并不十分服气。在他 9 月 23 日回到上海之后写给鲍罗廷的一封长信中，他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主张，认为陈独秀和蔡和森关于立即向国民党右派发动进攻，坚决反击国民党中派，强调苏联应立即停止对孙中山国民党的一切援助，以便转而加强中国工农运动和共产党自身力量的主张，未必是策略的。毕竟对这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国民党可以用来束缚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反对国民党的右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情的结果。瞿秋白告诉鲍罗廷，他虽反复申诉，仍不得要领，中共中央已拒绝他再回广州去为鲍罗廷工作，明确决定：“瞿秋白应在上海情报局和上海大学工作”。[19]

鲍罗廷、瞿秋白与中共中央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这一年的 12 月份。此前，中共中央专门派高尚德前往广州向广东地方委员会传达自己的意图，并同鲍罗廷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只是因为 10 月间广州商团事件的爆发，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接受国民党广州政府以抵抗受到港英当局支持的商团武装，才使这种争论停息了下来。紧接着北京冯玉祥发动兵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鲍罗廷坚决主张孙中山予以响应，瞿秋白坚决响应，陈独秀、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与鲍罗廷、瞿秋白之间又发生矛盾，为此甚至批评瞿秋白不该与中央唱反调，进而将瞿秋白调离中央。这时恰值瞿秋白在上海受到通缉，被迫避往北京，而中共中央很快也改变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态度，此事方才告一段落。当瞿秋白 1925 年 1 月 15 日为出席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回到上海之际，他惊奇地发现：中央内部的左的倾向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但反对军事行动、反对孙中山北上的“左倾病”已经荡然无存了。他甚至到上海不久，就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不过，瞿秋白因此也失去了继续在鲍罗廷身边工作的可能。陈独秀显然反对瞿秋白继续协助鲍罗廷工作，因此，中共中央不顾鲍罗廷的反对，坚持决定，瞿秋白作为中央执行委员，必须在上海长期负责党的报刊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将为鲍罗廷另配翻译人员。[20]这样一来，瞿秋白与鲍罗廷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关系正式结束了，瞿秋白不再是鲍罗廷办公室的一员，不再继续从鲍罗廷那里领取薪水。

大乱之中左右为难

自中共四大以后，瞿秋白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共中央局 5 名委员之一。但严格说来，除了总书记陈独秀以外，瞿秋白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排在张国焘、彭述之和蔡和森三人之后。甚至，在实际工作中，瞿秋白也还处于彭述之的领导之下，因为彭述之是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只是具体负责主编中共机关刊物。

瞿秋白在上海工作的两年左右时间里，除了夜以继日地从事宣传工作，以及短时期出外执行任务以外，一项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协助中央领导人接通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之间的关系。因此，瞿秋白在这段时间始终与共产国际代表有着密切的接触。两年间持续从事政治宣传工

作，使瞿秋白在理论方面有了更加长足的进步，与这时主要的中央领导人比较起来，他显得更容易与革命经验相对较为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沟通，这些无疑都使先后来到上海的国际代表普遍对瞿秋白抱以好感。但瞿秋白已渐渐注意到，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和鲍罗廷之间，明显地存在着矛盾，使他颇感为难。象 1925 年 12 月，鲍罗廷正在广州全力筹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设法赶走国民党右派，打击那些尖锐批评共产党的国民党中派领袖，努力扩大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势力。而上海这边维经斯基等远东局代表却对国民党中派领袖提出的撤换鲍罗廷的要求不置可否，甚至拉上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三人去与做孙科、邵元冲、叶楚伧这些中派领袖的工作，表示在国民党二大上中共保证不要求超过 1／３以上的中央委员名额。1926 年 8 月，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在广州与鲍罗廷、维经斯基举行联席会议，鲍罗廷提出“社会革命政纲”，主张迅速提出土地革命的斗争任务，维经斯基却坚持只能实行“民主革命政纲”，反对立即提出土地革命任务，双方意见分歧。面对这种情况，瞿秋白显然处境困难。[21]

好在瞿秋白并没有过深地介入到国际代表之间的矛盾冲突当中去。1927 年 2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送达上海中央之际，中央局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和瞿秋白三人曾经有过一次讨论。据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称，在这次讨论中三个人的看法分歧，彭述之“反对这些决议，认为决议中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早就预见到决议中所说明的一切。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决议中所说的)工业资产阶级。”“陈独秀不清楚决议是对还是错，他要看看它的效果才能决定。”只有“瞿秋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个决议”。[22]不论三个人这时的具体意见究竟如何，在这一时期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中共中央政治决议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对于这一决议确实存在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决议虽然表示：“中央政治局已经过讨论与辩难之后，接受国际这个提案，并决定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23]但政治局“经过讨论与辩难”的说法表明，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央三位常委确实对这个公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的激进决议，有过某些重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共产国际的不满。这时在上海的数名国际代表一致认为，彭述之的意见实际上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的观点，因此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彭述之“不应留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在这件事上的激烈反映，可以清楚地说明他们在中共中央里面这时仍旧比较信任瞿秋白。显然，彭述之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决议的态度，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的严厉批评，是促使瞿秋白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就《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并很快在武汉出版的重要原因。在中共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公开出版点名批评仍然在位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并且是自己顶头上司的小册子，这多半也是唯一的一次。联系到 3 月间本来在中央局排名最后的瞿秋白来到武汉，竟被指定主持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4 月上旬讨论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新中央人选时，准备接替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明确提议，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应当由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来组成，彭述之必须退出政治局。从罗易提出的这一名单顺序不难看出，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对瞿秋白的看法如何。[24]

当然，同党内大多数领导人一样，对于急剧变化的革命形势，瞿秋白无论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严重准备不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与前此历次共产国际有关决议和指示相比，是一个要求中国革命急剧左转的文件。瞿秋白毫不犹豫地予以响应和鼓吹，难免在当时的党内引起一些非议。〖ZW(〗据蔡和森说：这时“有人咒骂秋白是国际决议到后称好汉”。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 9 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40 页。〖ZW)〗事实上，在紧接着到来

的急风暴雨中，瞿秋白也并没有能够按照他那个小册子所描述的“一次革命”的轨道一往直前。[25]

瞿秋白在武汉遇到的第一件进退维谷的事情，就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之后中国革命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步骤。由于负责指导国民党工作的鲍罗廷与受命前来贯彻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决议的罗易之间出现尖锐的意见分歧，瞿秋白的处境十分微妙。4 月 12 日，由于还不清楚蒋介石在上海叛变的消息，瞿秋白支持罗易提出的应当就地深入开展工农运动，特别是通过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改组军队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暂时不忙于进一步北伐。但第二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事变的消息传来，鲍罗廷向瞿秋白指出：在现有地区，守着那些植根于封建土地关系基础上的军事领袖，无法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只有继续推动武汉政府北伐，尽快向西北方向接近外蒙边界，背靠苏联建立巩固根据地，才能摆脱过于依赖旧式军队的情况，回过头来巩固占领地并进攻蒋介石。因此，瞿秋白在 13 日晚的联席会议上，又告诉与会者：“今天我得到了很多消息，现在我赞成北伐”。只不过，他主张折衷鲍罗廷和罗易两人的意见，确定北伐的方针，但“不立即进军”，先做一段深入革命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最后，会议终于就此达成妥协，由瞿秋白起草决议，支持先北伐后巩固，但北伐暂以占领陇海路，连接冯玉祥为目标。[26]

与鲍罗廷和罗易之间意见分歧比较起来，瞿秋白这时最感到无所适从的的事情，就是如何在共产国际接二连三的要求加速革命进程的指示和中国革命现实的条件当中作出选择了。比如，鲍罗廷一直在鼓吹开展土地革命，瞿秋白对此也一向深表赞成。按照共产国际七次执委会决议，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以致当毛泽东写出赞扬湖南农民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和造反行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后，他第一个站出来为之叫好，声言：农民造反“‘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27]但面对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态度和层出不穷的军事危机，瞿秋白显然和陈独秀等中共领导人一样，逐渐对共产国际的激烈政策表示怀疑。

自 6 月 3 日瞿秋白成为中央常委之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回复共产国际的电报，无一不反映出这种复杂心情。象著名的中共中央 6 月 15 日电，就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特别迅速”，其主力多是失业和无地的农民，“他们不仅要求平分土地，而且要求平均分配一切财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租地者和自耕农之间的冲突。”由于“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夏斗寅叛变和长沙事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28]当然，这样一种态度也是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特别是鲍罗廷所赞同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鲍罗廷在谈到莫斯科来电关于要求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训令时，明确认为没收土地是一个过程，首先应该实行减租、反对土豪劣绅，最后才是没收土地。对此，瞿秋白明确表示赞同，并提出了一个和国民党交涉的土地政纲草案，主张不要提出没收土地的条文，将土地问题暂时限制在减租减息、保护佃农和乡村自治的水平上。此后，在 6 月 30 日，他又进一步起草了一个主张全面退却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认为从维持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角度，有必要向国民党保证：“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和法令”；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解雇、企业的管理，更不得惩罚业主；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业主的经济能力；工农武装及纠察队等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除非政府允许，不得逮捕、审讯和巡逻。这一文件在 7 月 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通过。[29]

过渡的“总书记”

6 月 17 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向鲍罗廷提交了解聘书，这使鲍罗廷感到极其意外。鲍罗廷此后虽极力挽回，但已无济于事。眼看国共合作大势已去，国民党将迅速走向反苏反共，鲍罗廷不能不准备后事。7 月上旬，接到共产国际决定破裂与武汉政府关系的指示，陈独秀告假不出，鲍罗廷要张国焘等组织新的中央局暂时领导工作，说是武汉即将出现反动，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和蔡和森等目标太大，应该尽快到莫斯科去。随后，鲍罗廷拉上瞿秋白顺江而下，经九江上了庐山，密商国共分裂之后的撤退办法，直到 7 月下旬才又回到汉口。这时，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已到武汉，共产国际指示也接连到达，鲍罗廷将瞿秋白引见给罗明那兹之后，罗明那兹坚持要瞿秋白留下负责中央工作。原来，鲍罗廷与瞿秋白回汉口之前，罗明那兹已经与新中央局有过工作关系，双方合作不甚愉快。因此，瞿秋白来后即被留下，开始和罗明那兹一起领导中央工作，具体部署对国民党的激烈反抗行动，同时准备召开紧急会议，以便照共产国际要求的改组中央，“否认破坏了共产国际底纪律的领袖们”。[30]毫无疑问，陈独秀离任后，瞿秋白突然接班，一方面还是基于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一方面也多少有点儿偶然。当然，依照惯例，此举很快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

共产国际是不是不了解瞿秋白在武汉时期的摇摆态度呢?未必。问题在于，当此关系中共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除了共产国际上上下下比较了解和信任的瞿秋白之外，他们找不出其他人能够担此重任。[31]尽管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要求改组的中央要加入工农运动的领袖，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罗明那兹却几次明确表示反对，坚持中央必须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尤其对进入中央之人必须进行严格的能力考察。[32]这种情况说明，共产国际这时考虑最多的，多半还不是谁更能胜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职务，而是用谁更容易贯彻和实现共产国际的指示，并能够保持中共组织及工作上的连贯性。

8 月 9 日，在新一届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罗明那兹提名瞿秋白为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并负总责，自此，瞿秋白成了“总书记”。只是，由于新的政治局的改选没有经过党的代表大会，瞿秋白的这个“总书记”只有其实，而无其名，并且在实际上同政治局一样，也是“临时”的。

在瞿秋白“主政”期间，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干劲。他不仅日以继夜地与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各级领导人讨论工作、听取汇报，而且仍旧大量地亲自写文件，为党刊写社论，乃至还抽时间写长篇理论文章。他不仅领导了包括著名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内的各地武裝暴动，还组织中共领导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探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力图使自己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革命形势，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积极探索和民主讨论的精神，颇为引人瞩目。但同时，这种过于重视理论思维，凡事总是力图在理论上找到答案的思想方法，也使他不能不象以往一样，过多地依靠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代表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罗明那兹强调中国存在着两种发展可能，说如果革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的话，“中国就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对此，瞿秋白虽然相信：“工农革命胜利的前途的可能要更多些”，但不能提出不同意见。[33]罗明那兹断言，中国革命所以不能马上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是因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政权形式，到了苏维埃时就不能再联合小商人。瞿秋白虽然对罗明那兹的解释认为不能满意，但也只能相信问题的关键在于小资产阶级。只不过，他一面注意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数量太大，与小国的不同，很难一下子拿住他们，一面又同意罗明那兹的观点，认为不能顾惜小资产阶级，

联合的时候就要想准备打倒它，主张“很快的将革命的人民政权转变到苏维埃”，争取“小商人一去则马上变为苏维埃的政权”。 [34]在这样一种理论观念的支配下，当斯大林突然来电指示立即提出苏维埃口号以后，瞿秋白很自然地要接受罗明那兹的“无间断革命”论，相信：“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进程，必要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必有所顾忌。[35]

瞿秋白在理论上的误区和对共产国际代表的过分依赖，导致他领导的中央表现出严重的左倾盲动倾向。瞿秋白当然不是那种不愿意独立思考的人。他曾以羡慕的口吻赞扬毛泽东是中国党最有独立思想的人。在经历了刻意模仿俄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的失败过程之后，他也大胆地提出了首先控制乡村，进而通过农民游击战争汇合好几县暴动军，再进一步夺得省城，“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量力而行，波浪式推进的区别于俄国革命的暴动方针。通过这一思考，瞿秋白还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不平衡的观点，[36]但归根结蒂，他的思想观念还不能脱开共产国际指示及其代表的观点的框子。这使得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与思辩，显得十分艰难。

被保护的“理论家”

瞿秋白领导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没有能够探索出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道路。进入1928 年以后，各地的暴动明显地失去后劲儿，中国革命迅速转入低潮，这种情况引起瞿秋白的极大不安，即使在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执委会决议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激进观点之后，瞿秋白仍旧极力主张应当“肯定的承认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因为“如不很好的解释是可以给机会主义分子投机的”。很明显，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时的许多激进作法受到了来自党内的尖锐批评，瞿秋白对此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37]甚至当他在 5 月应召前往莫斯科筹备和召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之际，当着斯大林的面，他还在辩称：“革命的客观形势仍是向前去，是向上涨的，走向高潮，简单说高涨这两个字或许引起误会，但真正的意思是不错的。”在六大政治报告中，他仍然坚持说：“现在的革命是上升的，而不是低落”，“革命客观上是走向高潮”，虽然高潮还没有到，“但是许多高潮将到的象征已经可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以准备暴动为总方针”，因为“暴动是夺取群众的方法”。 [38]瞿秋白的这一态度，受到与会者不同程度的反对。甚至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也对瞿秋白的说法表示疑问。当瞿秋白表示：“盲动主义的危险现在已经减轻了，请布哈林同志放心”时，蔡和森明确反对说：“我的意见与他相反，我以为大会应与这新的危险倾向—盲动主义，严厉地奋斗”，即使在瞿秋白的报告里，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

在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显然没有估计到自己会成为众矢之的。他始终积极地主持会议、起草文件，向联共(布)中央和国际代表提供各种建议，依旧按照自己的思想方式，毫不顾忌地在大会小会上与不同意见者进行着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各种争论。意想不到的是，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作为前此中共盲动倾向最高负责人的他，几乎动辄得咎。就连他自认为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来的一省数省乃至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点，也在会上受到批评。对于他关于可以首先控制农村，通过农民游击战争逐渐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汇合几县农民暴动军造成地方割据，进而夺取一省乃到数省的说法，几乎没有任何代表赞同。张国焘甚至明确讲：“秋白同志现在还不肯放弃他一省或数省直接革命形势的说法”，“以为用农民游击战争，可以包围一大城市而成为割据局面。中国历史告诉我们，洪秀全时代，可以由乡村起来夺取大城市的政权，辛亥革命时代就不同了。……现在我们不能再有用农村革命包围大城市的革命形式

的观念了。”张国焘声称：如果真的以农民来打城市，只怕是这些缺乏组织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会把广州城也给烧掉了呢![39]

当然，瞿秋白依旧与共产国际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共产国际对瞿秋白也依旧颇有好感。尽管斯大林这时已经注意到太习惯于理论思辩的瞿秋白不适合做中国党的最高决策者，决定要把工人领袖向忠发扶上台，但在经过斯大林、布哈林和米夫等人内定的名单里，瞿秋白照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之一。只不过，考虑到大会上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他们相信让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沟通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代表，也许会更少矛盾。因此，当中共六大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布哈林明确表态支持瞿秋白进政治局。他特别向中央委员们做工作说：不要把过去一切左倾的责任都加到秋白同志身上去。大会上许多同志反对秋白，秋白过去也有过左倾盲动错误，但这并非他一个人的错误，共产国际代表也负有相当的责任，把账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去是不对的。一定要把政治路线正确、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同志—即使他们过去犯过错误—选到政治局里面去，一定要在国际留下有工作能力和有经验的政治局的代表，“象秋白与国焘”，而“秋白是理论家，留在国际有很大用处”。布哈林表面上说：我个人不能说谁谁应当进政治局，这要看同志自己的意见，“选与不选听凭你们决定”，但布哈林的这种态度无疑具有影响力。结果，在总有效票 22 票的情况下，瞿秋白以 16 票入选新的政治局。

中共六大之后，瞿秋白和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驻共产国际代表留在了莫斯科。瞿白还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在以后的两年里，瞿秋白虽然不得不应付代表团必须要处理的许多事务性工作，但他显然把更多的时间花到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方面去了，几乎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理论家”。他参加了这两年间共产国际针对中国问题提出的大多数决议的讨论和起草工作，为此先后研究了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苏维埃运动和其他各种现实问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理论斗争。他在这段时间里，还不能不花很多时间来批判苏联党内和中国党内不断“冒”出来的各种政治“反对派”，批判布哈林，批判托洛茨基，批判陈独秀……。但布哈林的迅速倒台，也成为瞿秋白的一种灾难。随着莫斯科一批在熟读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留学生成长起来，瞿秋白在理论上的“权威”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战。当作为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的瞿秋白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负责处理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间的派别斗争的时候，一些自认为比瞿秋白更具有理论家资格的年轻学生很快把斗争矛头指向了瞿秋白。不管瞿秋白自己后来怎样说明他与这些学生之间的矛盾，他当时显然对中国学生中一批工人学生反对自以为是的学生干部和校长米夫官僚主义的斗争，采取了某种支持的态度[40]，因而引起了新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严重反感。共产国际通过了一个专门的决议来批评瞿秋白领导的中共代表团，要求中共中央刷新代表团的成份，取消瞿秋白的代表团负责人资格。[41]当然，共产国际这时对瞿秋白也并非完全失去信任。据周恩来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意见说，瞿秋白政治路线上没有问题，反陈独秀以及反右倾斗争都起了重要作用，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缺点错误，一个是对富农问题认识不正确，没有随着布哈林的倒台和苏联反富农斗争的展开，跟着共产国际立即推动中国革命中的反富农斗争；一个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不能有正确的斗争精神，介入学生中的派别斗争，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在 1930 年 8 月瞿秋白回国之际，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仍旧找他谈话，委以重要使命。

“一失足成千古恨”？

瞿秋白和周恩来 1930 年 8 月先后回国。二人回国前，正巧遇到共产国际决心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倾向，作为政治局委员，二人理所当然地都负有贯彻共产国际此一意图的责任。但是，由于二人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还不了解李立三曾经有过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42]再加上这时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党内，都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因此，二人回国后对李立三的错误并没有采取过于严厉的态度去上纲上线，反而通过主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肯定前此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想不到，瞿秋白回国还不到一个月，共产国际就得到了李立三严重冒犯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报告，共产国际领导层因此激愤异常，迅速通过决议将李立三的问题上升为政治路线问题，并决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的内部监督。恰好周恩来走前曾要求共产国际派在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米夫来中国指导工作，米夫又正好出国治病，这一使命自然也就落到了米夫的头上。瞿秋白因支持莫斯科工人学生批评米夫和米夫信任的学生(即所谓“二十八个半”)刚刚受到共产国际的公开批评，如今再度在立三路线问题上采取错误态度，这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授人以柄。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上纲上线，迅速在中共党内掀起巨大波澜。对三中全会调和倾向以及三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政治局的强烈反感，促使瞿秋白和周恩来必须出来承担责任。二人因此很快向米夫承认错误，表示愿意退出政治局，但是，这时在共产国际内部颇受好评的周恩来并没有因此而受到责难。[43]12 月 29 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以及米夫早先的学生陈绍禹(王明)与远东局代表举行联席会议。结果，远东局明确提议，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米夫的学生陈绍禹等人加入。得到消息后，瞿秋白并不感到意外，甚至深为自己不能看出李立三问题之严重感到内疚，相信只有由他来承担责任才能在政治上起到教育作用。因此，他当即表示赞同远东局的意见，并检讨说：我的退出，绝不是自责式的退出，而是在政治上斗争上的需要，因为自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我始终负有政治指导上的责任。我的退出，具有政治斗争的意义。在紧接着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更进一步郑重地表示愿意承担错误的责任，说：这次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以后至今，我在许多问题上与立三路线是一致的。立三路线不过是我六大以前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因此，“立三路线，亦可叫他做秋白路线”。[44]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接连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并发表声明书，深刻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错误根源，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但是，这种过分的自我批评，只能给已经受到以陈绍禹、秦邦宪为代表的一派留苏学生影响的新的中共中央以更多不信任他的口实。这些学生在莫斯科时本来就是所谓“反秋白”的代表，影响到中共中央对瞿秋白日益另眼相看。中共中央这时虽然相信只分配他去翻译《列宁文集》有些不相适宜，但同时根据瞿秋白自己的上纲上线，又断言他理论上现在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因此，即使米夫和远东局考虑到加强各个苏区工作的需要，提议派瞿秋白到苏区去，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都表示反对。总书记向忠发明确说：苏区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必须派政治上强并且反立三路线的同志去，否则不能很好地贯彻正确的路线。因此，四中全会后，正如瞿秋白自己所回忆的那样，他很快“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45]

但是，瞿秋白既然还是共产党员，他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舞台。1934 年初，他还是被遣往江西苏区，去担任不必负太多政治责任的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的工作去了。这个时候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秦邦宪为代表，留苏学生已经占据了中央和中央苏区各个权力部门的领导岗位，瞿秋白自然更加不受重视，并且动辄还要被扣上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之类的帽子。终于，当几个月之后，因为军事上严重失利，中共中央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撤退几乎所有重要人员

的时候，三人团[46]的负责人秦邦宪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必要带瞿秋白一道走。三人团的决定，无疑是导致瞿秋白最后被俘致死的重要因素。但这个提议和决定的背后，仍是莫斯科的那些记忆在起作用。

瞿秋白似乎从来没有抱怨过莫斯科。即使在几年后临死前写下那篇非常著名的《多余的话》，他也没有认为自己的悲剧莫斯科方面应负多少责任。相反，他只是残酷地解剖着他自己。他认为这一切滑稽剧的造成，都是缘于一种"历史的误会"，即以自己的性格，本不应去充当什么政治家。然而，死时才不过36岁的瞿秋白，既然赶上了那个时代，出身于那样一种家庭；既然碰巧学了俄文，去了莫斯科；既然像其他激进的青年学生那样对新事物容易热血沸腾……，他就难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应当了解的是，有过类似误会的，其实远不止一个瞿秋白。只不过其他人或顺或逆，或生或死，不如瞿秋白有名气罢了。

----

[1] 《瞿秋白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2] 《瞿秋白文集》，第689页。

[3] 《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8，27页。

[4] 关于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客人身份，可见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发给中国代表团的证书。其中说明：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为张太雷和俞秀松，客人为陈闻影和瞿秋白。

[5] 张太雷当时虽在共产国际工作，但他使用的语言是英语。

[6] 这个计划草案的落款日期为1923年1月1日。见李玉贞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2页。

[7] 《瞿秋白致维经斯基信》，1923年3月22日。

[8]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46页。

[9] 关于鲍罗廷不与中共中央认真商量就点名调走瞿秋白的情况，蔡和森曾经在1926年2月1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他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蔡和森：《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26年2月10日，《中央档案馆馆刊》，1987年第2—3期。

[10] 《中共与青年团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

[11] 关于鲍罗廷不经过中共中央就指派瞿秋白担任《民国日报》政治编辑的情况，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2] 《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5月6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出

版社 1988 年版，第 520—521，538—540 页。

[13] 《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 年 6 月，《瞿秋白文集》，第 2 卷，第 607 页。

[14]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11—313 页。

[15]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内生活向共产国际的报告》。

[16] 《陈独秀致维经斯基信》，1924 年 8 月 13 日。

[17]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信》1924 年 8 月 27 日。

[18] 此段引文转见向青等著《苏联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0 页，但查该书原引出处《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 1982 年版)第 80 页，未见此引文，估计为原注有误。

[19] 《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 年 9 月。

[20] 《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5 年 1 月 26 日。此后应鲍罗廷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张太雷给鲍罗廷担任翻译。

[21] 参见《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1928 年 6 月 20 日。

[22] 《麦耶尔与罗易的谈话》，1927 年 2 月 26 日。

[2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 页。

[24] 但是，瞿秋白在五大时虽入选政治局，却未能立即进入常委会。其中原因是否由于盛传的瞿秋白与陈独秀不和，还不得而知。关于二人矛盾以及五大召开前鲍罗廷反对瞿秋白提出的撤换陈独秀的情况的描述，在张国焘、郑超麟等当事人的回忆中有详略不同的记述。

[25] 按照瞿秋白在小册子里的说法，当前的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的，又不是资产阶级的；既不是社会主义的，又的确是社会主义的”，因而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应当“采取政权”，“一次革命”到底。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六大以前》，第 726 页。

[26] 《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纪要》，1927 年 4 月 12—15 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罗伯特·诺斯等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第 176—177 页。

[27] 《〈湖南农民革命〉序》，武汉长江书局 1927 年 4 月版。

[28] 自瞿秋白担任中央常委以来，已知绝大多数中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的电报都是瞿秋白起草，经陈独秀签署后发出的。并且，瞿秋白做常委前后，还被中央委托负责中央农民部的工作，因此，农民部当时一些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文件，也是瞿秋白起草和发出的。关

于这一情况，张国焘在六大发言中曾经特别谈到过。转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28 年 6 月，抄件存莫斯科汉学图书馆；《罗易赴华使命》，第 324—325 页。

[29] 蔡和森称此决议为“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案”。参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135，137 页。

[30] 转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626—628 页；《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77 页。

[31] 这时中央常委中地位在瞿秋白之上的张国焘和蔡和森在共产国际眼里都是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们曾不止一次地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发生过尖锐冲突，怀疑甚至反对过共产国际的决定。

[32] 《“八七”会议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 年 8 月 7 日，转见《中央档案馆馆刊》，1987 年第 2 期。

[3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第 330—332 页。

[3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第 336—337 页。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第 453—454，458，530 页。

[3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第 440，459—460 页；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 10 期，1927 年 12 月 19 日；《秋白给国际的报告》，1928 年 2 月 10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 年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8—29 页。

[3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第 86—87 页。

[38] 《瞿秋白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3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40] 曹仲彬、戴茂林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32—137 页；并见《瞿秋白文集》，第 7 卷，第 135，710 页。

[4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研究室编：《中共党史教学资料》，第 15 册，第 15 页。

[42] 参见《立三路线的形成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及远东局的争论》，《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

[43] 关于周恩来这时在共产国际所受重视的程度，可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卷，第 438—439 页。

[44] 参见《瞿秋白文集》，第 7 卷，第 124—125 页。

[45] 《瞿秋白文集》，第 7 卷，第 711 页。

[46] 1934 年 8 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秦邦宪、周恩来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三人组成的三人团，决策根据地撤退的各项重大问题。

向忠发是怎样一个总书记？

总书记一职，曾经是中共党内最高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成为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之前，中共至少有过五任总书记[1]。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曾经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教授，第二任总书记瞿秋白同样是相当有名气的记者兼教授，第四任总书记秦邦宪和第五任总书记张闻天也都受过高等教育，张闻天还进过莫斯科的红色教授学院。但这五任总书记当中，却有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总书记，他就是向忠发。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工人出身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仅此一位。因此，向忠发的经历，以及他如何能够在知识分子众多的党的领导人中异军突起，他在何时起过何种作用，等等，应该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课题。

然而，向忠发到底不能因为其工人出身而引起后人的兴趣。这是因为这个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在位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尽管向忠发被捕三天就被处死，但这种死显然不能洗刷他向国民党供出自己组织的机密而带来的耻辱。他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位最受鄙视的党的领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可以看到的有关向忠发的说明，都是相当刻薄的。向忠发的工人出身，被说成是“流氓无产者”；他的文化程度，被说成是“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在党内的作用，自然只是“挂名”；而他的品质，更是让人触目惊心，因为据说他自任总书记以来，在那种极端危险的白色恐怖的条件下，竟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甚至还包了一个妓女叫杨秀贞的整天在他的住鬼混”，以至“党”反过来“研究决定”派人监视自己总书记的“种种不轨行为”。[2]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以上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至少，在近两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中，对于向忠发的说法多多少少有了一些重要的改变。比如，关于向忠发根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的说法没有了，承认他是个工人，至少是“仗着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的。关于向忠发“大字识不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的说法，换成了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关于向忠发长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贪污了党的很多经费，吃喝嫖赌什么都干”之类，则被比较简单地概括为追求生活安乐，跟妓女姘居。不过，看起来关于向忠发是“挂名的总书记”的说法是难于改变了，作者只是换了一个更贴切的字眼儿，叫做“名义上的总书记”，并且断言此人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自己也对总书记的职务厌倦了”。[3]

过分地贬低共产党的总书记，结果只能是使人对共产党本身的水平与能力产生严重的疑问。一个人才济济的共产党，怎么可能容忍一个只是对嫖妓感兴趣的庸人来做自己名义上的领袖？如果说，这纯粹是共产国际的主意的话，那么，第一，难道它就不了解向忠发的能力？难道它就不知道，让一个毫无德行的人来做中共的领袖，即使不会引起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会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信任？第二，稍微熟悉中共历史的读者都会知道，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绝不是共产国际的驯服工具，发生在向忠发就任总书记之时的““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斗争，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当时的中共中央绝不可能听任共产国际安排一个蠢才来做自己的领袖。

事情很清楚，时至今日，人们关于总忠发的种种说法都还不尽准确。对向忠发的情况，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说明。

向忠发起家工运

向忠发，1880 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小学五年辍学。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14 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 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 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 4 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 1921 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冶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有四名党员是从早年土生土长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发展而来的。他们就是邓培、向忠发、王荷波和苏兆征。邓培是 1921 年入的党，向忠发和王荷波晚邓培一年，而苏兆征更晚他们 3 年，是 1925 年入的党。但就党内地位而言，向忠发和苏兆征最初远不如王荷波和邓培。王荷波和邓培是最早成为中央委员的，在中共三大与四大时，他们先后被选为中央执行或候补执行委员。他们在中共的工会工作中，也曾占据着相当突出的地位。直到 1925 年省港大罢工时，苏兆征才开始成为中共工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向忠发则只是在武汉地区成为革命中心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时，即 1927 年 4 月底至 5 月初，由于邓培在广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监察委员，苏兆征和向忠发才取代邓培和王荷波而异军突起，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开始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说向忠发在党内崭露头角很大程度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汉的结果，并不等于说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领袖这块金字招牌，谁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发这时的崛起，靠的还是其不同寻常的突出表现。

当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刚刚攻克岳阳，湖北区执委机关为准备北伐军进攻武汉，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向忠发、许白昊等 4 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作为汉口当时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最高负责人，他与许白昊等全力以赴，废寝忘食，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很快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了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在总工会成立之后，27 天里武汉三镇的工会从最初的 13 个猛增到 270 个之多，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数十万。加上具有执法队性质的几千工人纠察队的组成，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移到

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当然，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地位，还不能与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苏兆征相比。苏兆征在中共五大不仅入选中共中央委员会，而且一步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然而，有谁能够想到，正是由于这一步之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之交臂，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这是因为，当时的武汉政府邀请中共入阁，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选派在共产国际专门研究过农民问题的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担任农政部部长，选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去担任劳工部部长。结果，不仅在两党合作期间，他们领导的“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群众面前消失(了)共产党的面貌”，而且当 1927 年 7 月国共关系破裂在即，苏兆征进一步因为与谭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的电令公开抗议武汉政府的政策并声明退出，而是递交了一纸被共产国际称之为毫无原则的和怯懦的“请假”条[4]，使其工人领袖形象在共产国际那里大大打了折扣。与此相反，因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并不特别重视向忠发之流的工人领袖，向忠发在武汉地区虽有相当实力和影响，并已经当选中央委员，与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却不能与闻中央之事，致使向内心颇不平衡。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了在武汉的俄国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

向忠发虽然在中共五大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但他毕竟仍旧是一省工会系统负责人，不仅离中共中央甚远，而且连中共湖北省委的领导工作也很少能够涉足。向忠发的突然得势，显然得益于共产国际 1927 年 7 月 14 日一纸电令。该电令称：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由于其对国民党的种种妥协政策而表现出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党的领导的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改造中共中央。而这种改造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使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以及在内战时长成的党员，在党的中央内取得决定的影响”。[5]

机会主义错误是怎样产生的？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共 1927 年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认定，这是由于“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根据这样一种认识和共产国际的明确要求，“八七”会议当然要设法“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而党内现成的“工人和农民组织的领袖”还能有谁呢？那只有三个人，这就是苏兆征、向忠发、王荷波。[6]结果，经过投票，苏兆征、向忠发均以仅有的两个全票（20 票）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则以多数票（17 票）当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7]值得注意的是，与苏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发由于过去在武汉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汉政府公开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汉口法租界，之后又转到湖南乡下，没有能够出席此次会议。其能在缺席的情况下以仅有的两个全票之一当选政治局委员，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共产国际有选举工人的指示，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同向忠发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已经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有关。

当然，“八七”会议并不能使向忠发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多数人对向忠发远不如对苏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发事实上不能参加武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并没有特别重视向忠发的作用问题。不仅如此，罗明那兹对共产国际关于把工农领袖充实到党的核心领导机关去，并使他们在党的中央取得决定性影响的指示，这时也没有给予特别重视。他甚至远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识分子领导人那样重视新中央的工人成份问题。当“八七”会议上许多与会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领导人主动要求“选

出工人同志来作领导”时，他甚至不以为然，断言“此会无权改选中央”，并表示，即使选出工人同志也还要“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因为他无法判断这些工人是否能够胜任中央领导工作。由此可知，在这一紧急时期，他所重视的仍旧是工作的能力和对中央工作的熟悉问题。在他提议下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实际参加常委工作的四个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苏兆征一个，其余 3 人瞿秋白、李维汉以及罗亦农仍是知识分子。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书记，由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领导的中共中央对向忠发根本不重视，竟一个多月没有安排工作。到 9 月下旬，他们才决定“调向忠发到上海去搞工人运动”，但却既不给他具体任务，也不给他某种必要的名义。[8]因此，向忠发的政治局委员这时其实也只是名义上的。他不仅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在武汉（从 8 月－9 月）和上海（10 月上旬）开过的 20 多次常委会议和四次政治局会议，而且自国共关系破裂以后几乎就没有接到过具体的任务。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领袖中，向忠发这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旧是最低的。

一方面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方面却又得不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这自然又要让向忠发心存某种程度的不快。他当然知道共产国际主张发挥他这种工人领袖的领导作用，但自己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开始怀疑，党的领导机关的改造远没有达到共产国际的要求，党的领导层知识分子仍旧占据着支配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各种问题的主要症结。[9]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时的中共领导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却不仅真诚地相信应当由工人同志来作领导，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坚定地主张否定知识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称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经完结，明确决定今后原则上不再派一个知识分子去莫斯科学习，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党员统统提升到领导位置上来，一面却又毫不犹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放到部队里去当兵，直至最后损失殆尽。[10]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价值观的变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见一斑。有谁能说他们不重视党的工人成份?看来，他们与向忠发这时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多半很少意识到，否定知识分子其实也正是在否定他们自己。

主张鞭笞党的向忠发

共产国际几乎同向忠发一样，不那么满意“八七”会议的改造结果。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几乎只是旧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实际上的总书记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并且是陈独秀中央时的重要成员；另一位常委李维汉与瞿秋白一样，而他在 1927 年 5 月 21 日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反共事变之后甚至阻止过农民对长沙的反攻，这件事更让共产国际感到不满。常委中虽然也充实了一位工人领袖，但又是众所周知在退出武汉政府问题上表现软弱的苏兆征，这当然不符合共产国际理想中的工人领袖标准。因此，进一步选拔合适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责任，并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来，不能不成为共产国际这一时期反复强调的问题。只是，连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适的工人领袖来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责任，还不那么容易。

机会终于送到向忠发手上来了。那是 1927 年 10 月初的事。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从苏联在上海领事馆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 10 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这时，南昌暴动刚刚失败，相当一批中共中央领导成员还在广东、香港不能回来，瞿秋白、苏兆征以及李维汉等又正在从武汉前来上海的途中，且

中央工作无法离开，加上各地工作同样极其紧张，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让刚来上海不久的工人领袖、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当然是再合适没有了。因此，共产国际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以便赶在 10 月中旬由上海组团出发。

10 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达上海，向忠发向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通报了此一情况，并商定了代表团的基本构成。李维汉同时表示向忠发可以以中央委员身份作中共驻国际代表，负责转达双方的有关信息。[11]

10 月 15 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 2 个武汉工人和 5 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 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向忠发 10 月革命节当天又是参加莫斯科红场的庆祝活动，又是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之后接连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东方民族兄弟大会、国际苏联兄弟大会，在德国和比利时举行的反帝同盟扩大会议和反对中国白色恐怖委员会会议等，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到处作报告，当委员，可谓风头出尽。而向忠发的报告，包括他在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报告，确实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12]共产国际东方部很快就乐于让向忠发参加处理一切有关中国的具体事务问题。而向忠发也确在处理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13]共产国际印象最深的显然是这时向忠发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问题。此一风潮发生于１９２８年１月间，１００多名中国学生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劝说无效，不得不请向忠发出面解决。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来，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此事的最后解决，基本上是按照向忠发的提议办的。这不仅迅速奠定了向忠发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发乘机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欲望。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突出强调了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份问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绝不能使党的指导工作保持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从支部、到区、县、市、省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14]但是，会议却没有提到对中央一级领导机关的改造问题。恰恰相反，由于此时王荷波被捕遇害，会后又决定派苏兆征前往苏联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内几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补入中央常委会的周恩来和罗亦农，照旧是知识分子出身。

1928 年 1 月，向忠发被共产国际从休养地召回莫斯科，准备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他同时得到了中共中央 11 月会议的各项决议和罗明那兹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消息。这立即给了向忠发发难的理由。2 月上旬，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组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斯大林、布哈林与向忠发、李震瀛等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向忠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机会来了。当然，向忠发很聪明，他并不指望能够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会议上当着中国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发难，而是接连写了两封信给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在这些信里，他非常强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满。

在这两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 11 月会议决议的说法，宣称：这个决议在评价中国党的领导成份时是完全正确的，即我们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他们“仅

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的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问题在于，决议并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同样严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与前任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间存在着严重争论，蔡和森、罗亦农与总书记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不仅思想上右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坚定，长江局负责人之一陈乔年擅自改组长江局各级组织，原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已公开与党分裂，原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正在与谭平山合流。“类似这样不服从中央领导的动摇分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断言，中国党近来种种失败，多半都是由于这些领导者的无能，因此，“对他们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15]

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视，因为这恰恰也正是他们所担心的问题。2 月 21 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又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尽管，向忠发的这个报告其实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旧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批评现在的中共中央。他断言，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共产党不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少群众的基础，结果早期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进行活动；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由各个不同的进步组织中产生出来的，虽然在共产党形成之后，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但这些组织的成员之间的感情依旧存在，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必然在党内有所反映；第三，由于党在理论方面相当欠缺，近些年来先后从莫斯科回国，经过相当理论训练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据党的领导地位，结果，他们不可避免地与那些缺乏马列主义理论训练，但有实际工作经验、原来握有重要权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产生矛盾。因此，当前中国党内的最大问题在于：（１）存在着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２）带有小资产阶级色彩的党的高级领导人互相之间争夺权力。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但他并不主张采取过于激烈的组织措施，而是主张“鞭笞这样的党，但不要大张旗鼓”。[16]

向忠发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当年中国党的领导人看来，应该很容易了解。但在当年，特别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这样一些本质上不信任知识分子，一心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的外国人看来，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报告虽然在文字上或者逻辑结构上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作者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明显地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况，向忠发这时也并没有表现出那种让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仅没有攻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尽管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确地批评党在理论方面的欠缺，赞成由莫斯科训练出来的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干部出任领导工作。这说明，向忠发并非完全没有自知之明，他这时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党的高层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己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实而已。

1927 年 11 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自己的全权代表，以便更及时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已经开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显然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此，他们特别决定派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当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体说明：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振瀛三人组成中共中

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而以苏兆征为书记，李振瀛为秘书。因此，当 1928 年 3 月 7 日，苏兆征正式通知共产国际东方部他已到任[17]之后，向忠发也开始名正言顺地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的身份进行工作了。

不用说，在国内领导干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发言人，却把苏兆征派来担任中央驻莫斯科的主要代表，这并不符合向忠发的愿望。但让向忠发感到满意的是，共产国际显然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当然，向忠发未必了解共产国际对同样是工人领袖的苏兆征不甚满意的具体原因，但经过 3 月份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几乎人人都可以发现，苏兆征至少不如向忠发那样机敏活跃和善于言辞。[18]因此，尽管根据主次顺序，中共代表团在内部分工上，苏兆征应当负责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向忠发则负责赤色职工国际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共产国际东方部却仍旧要求向忠发继续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结果，苏兆征虽然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而实际上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却仍旧是向忠发，而不是苏兆征。

事情就此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3 月下旬，共产国际作出决定，不惜冒极大风险、花大量金钱，组织大批工人作为 100 至 110 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来，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彻底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19]此举意味着，共产国际对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经有了相当的信心。这种信心从何而来？考虑到此前共产国际始终未能确定此会的召开地点和时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显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国际这时终于选中了具有中国工人领袖“金字招牌”的向忠发，决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上来。毫无疑问，即使对于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来说，这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政治步骤和组织步骤。通过外力的作用把一个在中国党内并不十分出众的工人，推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 l 如果没有对这个工人政治活动能力的相当信任，无论如何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时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来说，判断一个中国的政治领袖的能力毕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他坚持共产国际所规定的阶级路线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其次才是他为实现这一阶级路线的主要目标而进行组织、鼓动，以及调度指挥全党团结斗争的能力。对于中国党，斯大林等人这时最关心的，显然是它能否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使其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必欲找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来担任中共的最高领导职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向忠发是工人出身，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确实较其他共产国际所了解的中国工人领袖更有组织和指挥能力，这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多半也就足够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响综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为凡是大的问题，都有莫斯科在指导把关呢。

那么，向忠发的反应如何呢？从已有的资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态的这种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他事前并没有想到他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还在 1928 年 6 月 15 日，即中共六大开幕之前三天，这位未来的总书记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上，第一次发言就讲了几句显然不符合其未来身份的自谦的话。他说：“第一，我离开中国很久，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第二，我对于党的理论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说，还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观察力”。不过，向忠发的发言一上来就与众不同。当时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领导人，而向忠发则声称：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的产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第二，中央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更不能不顾事实，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中央的。[20]向忠发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态度始终坚持到六大的结束，按照周恩来后来的评价，说他当时的这种作法是“左右开弓”，既反对会议中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的倾向，又反

对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的倾向。向忠发之所以有如此表现，很显然是他这几个月在共产国际耳熏目染的结果。只是，这些看法有些是来自于国际，如他批评瞿秋白政治报告受到罗明那兹理论的影响，显然是因为罗明那兹的观点早在苏联受到公开批评；他强调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也正是共产国际内部判断的中国革命失败原因的基本结论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中共中央，批评张国焘反对农村割据和自发斗争的观点等，也确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纯粹是照搬共产国际的说法。[21]

没有资料说明向忠发什么时候开始确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将出现重大转折。但从会议代表的成份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要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有多大。两年前，即 1927 年中共五大时，代表 82 人，工农分子仅 11 人，其余 71 人均为知识分子。而这一次，由共产国际审定的六大代表 84 人，工农分子即占 50 人，知识分子只有 34 人，以至周恩来后来愤愤不平地称这次的代表中其实是“暴徒一大堆”。[22]可以想象，经常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向忠发应当了解，全面加强工农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产国际召开这次大会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准备安排向忠发担任什么样的党内工作，在 6 月 17 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可以说已经初露端倪了。根据这一日程安排，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虽然仅仅通过这一通常更具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人们一时很难看出向忠发将来在党内的地位如何，但到 7 月十日，即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这个 36 人的名单里，工人就占到了 22 个，而且，向忠发的名字头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共产国际代表的提示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23]

向忠发并非傀儡

做了总书记的向忠发当然不会再做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很快将代表工作交待给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张国焘，然后与新的政治局委员蔡和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先行转道欧洲回国工作。

8 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 9 月 2 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台伊始，向忠发就做了几件颇值一提的事情。一件事是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开除的原因只是因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顺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倾且经验欠缺，造成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严重，而省内又出现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对中央的严重不满情绪。根据刘少奇和陈潭秋的 9 月 10 日的调查报告，蔡和森于 15 日正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主动申请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尽管与会者在蔡和森等人的处分问题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显然要向忠发来拿。对此，向忠发毫不客气，断言顺直党的错误大部分应由蔡和森负责，主张“对他的处罚同意本人的意见，即公布错误，退出政治局”。同时认为：“此事不好好解决，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断送一半”。[24]会议当即根据向忠发的意见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决议。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在这一

根据向忠发意见起草的长达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强调应当反对种种不正确的观念，包括过于重视合法运动，或者害怕群众产生幻想，反对一切合法斗争；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或者专注乡村工作，受农民意识所支配；轻视反帝运动，或者把发动群众的工作纯粹寄托在反帝运动上，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强调了必须坚决反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他所列举的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有：极端民主化倾向、小组织倾向、以个人意气、个人攻击代替反机会主义斗争的倾向、雇佣革命的倾向、消极怠工的倾向，以及机械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份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对一切知识分子的倾向，等。其意显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纲领。[25]

再有一件事就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象总工会并工委、宣传部并农委、军部取消并组织部，政治局下设军事委员会，甚至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等等。这些建议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赞同，然而以中共中央来兼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国民党严密统治的上海毕竟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领导人的怀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负责江苏工作的项英的反对。但向忠发声称："我们受了六次大会的重大委托，我们如何来实行？新中央工作至数月但有多少成绩呢？我们深深感到组织上是一个问题，的确感到工作方式之错误。我们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苏可给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响，同时群众的情绪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来"。因此，他一意坚持，根本不听项英的意见，并当面指责项英对江苏的问题总是带有感情色彩，断言江苏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苏才是唯一的办法"。由于向忠发的这一提议，江苏省委与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连开了十几次大小会议加以解决。而向忠发的意见，也只是在周恩来从外地回来后提出了极为充分的反对理由，并得到几乎所有领导人的支持之后，才极不情愿地放弃了。不过，他仍旧相当固执地表示："放弃我的主张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来－－引者注）说服了我"。[26]

显然，这些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只会人云亦云的人。这个人脾气暴燥、思想方法也较执拗，根本就不大能够听得进他人意见，远不是那种可以轻易做别人傀儡、当挂名总书记的人。不仅如此，他也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有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做事决断，很想做出点成绩来。因此，政治局多数领导成员虽然是知识分子出身，对他也还是比较尊重的。就使是同样工人出身，同样不大藏得住火的项英，事实上也得让他三分。即使是对通常被后人视为向忠发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样不稍客气。如 1929 年 1 月底李立三起草过一个中央通告，说明当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主要任务，公开提出了他几个月来一直宣传的一个观点，即认为，南京政府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美国因为与英日两国有矛盾，正在极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趋于暂时稳定，军阀战争不会马上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党必须把如何战胜改良主义的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对于李立三的这种看法，向忠发一直持有异议，因此当即宣称：李立三的说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国同样是帝国主义，不能说它与英、日有什么区别，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有稳定的企图，却绝没有稳定的可能，即使暂时的稳定也不可能。虽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领导人基本赞同，向忠发不能不批准下发，但他实际上并不服气。结果，两个月后，共产国际 2 月指示信对中共党内的这种观点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向忠发立即大翻其案，批评李立三过高估计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右倾的危险"，并且声称中国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种缺点，往往因为统治阶级修了一条马路，就对统治阶级作过高的估计，认为改良主义很厉害。[27]不难看出，说向忠发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着边际。

当然，李立三在向忠发作总书记期间确实起过极为重要作用。只是，李立三之所以有如此机会，也还有向忠发的作用。原来，李立三在六大时不仅不是政治局常委，而且不是政治局委员，他只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是向忠发作出了开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职务的决定，为李立三迅速晋升开辟了道路。并且，当 1928 年 10 月 4 日政治局会议正式追认 9 月 15 日常委会关于解除蔡和森的职务的决定后，又是向忠发提议由李立三递补因蔡和森退出政治局常委及委员的缺额。[28]于是，在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回国后，李立三就正式接替蔡和森成了中国党内举足轻重的 4 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

李立三早年留学法国，政治活跃，思想敏锐，文字及讲话能力均较强。他从 1922 年起就长期从事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担任过各种党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工作，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李立三一向较为偏激，1925 年“五卅”运动中作为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他，就曾因激烈地主张发动武装起义而受到过指责。[29]1927 年十 2 月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他作为中央代表，在处理暴动善后工作中又因严厉打击知识分子干部，不顾事实地坚持要搞第二次广州起义而受到批评，影响了他在六大中当选中委。[30]基于这些情况，李立三在初任政治局常委职务时，还比较注意务实。他之所以能够得出诸如美国对华政策与英、日不同，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一年多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在取得明显进展之类的观点，正是这时观察问题比较实际的结果。但想不到又被总书记批评为过高地估计统治阶级，因而带有右倾的危险。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看法的事实上的肯定，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认为：中共六大所强调的反对盲动主义的任务已经完结，中国党的盲动主义客观上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已经到了不动的程度，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右倾危险”，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31]

共产国际在 1929 年也提出了“反右倾”的任务，但那是 7 月份的事了，正式传达到中国更是 4 个月之后的事了。而向忠发提出必须把“反右倾”当作唯一的任务，则是在 1929 年 3 月间，可算是有先见之明。作为党的总书记，极力反对所谓党内的右倾危险，甚至宣布说左倾盲动倾向已经不复存在，其结果自然只能使党的领导层日益左转。说李立三是在这种条件下日益左倾，当不为过。当然，所谓“立三路线”的形成，向忠发还有更直接的作用。

向忠发率先提出反右倾，这本来可以成为一种政治资本。却不料，当 11 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 的决定传达到中国之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竟通过了一个决议，指责中共中央还左得不够，因此犯了右倾的错误。[32]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向忠发知道后，立即强烈地批评远东局“是一贯的右倾的错误，吹毛求疵来指责中央，掩饰他们的错误”。在与远东局接连三次面对面的争论不得结果之后，中共中央当即提出了书面的抗议，并上告国际控告远东局。[33]但在处理与远东局的争论问题上，向忠发自知不仅自身能力不及李立三，即使周恩来也不如李立三能言善辨。于是，中共政治局作出决定，将一切有关与远东局争论的问题统统委托李立三去处理。紧接着，因政治局确信 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些隔膜 ，又派周恩来于 1930 年 2 月底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组织部工作亦交给李立三代管，从而使李立三有了充分展现其才能的条件。

当然，“立三路线”要想形成，还需要共产国际“批准”。向忠发一心想做出点儿石破惊天的大事业来，因此他早就在主张尽快地“动”起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反右倾”的决定，正合向忠发的口味。恰巧中共中央讨论如何贯彻“反右倾”精神之际，共产国际 1929 年 10 月指示信又到了。这封信中关于中国革命已经开始进入高潮，“已经可以而且应当”立即开始准

备实行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的说法，确实更使人热血沸腾。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不进则退，不左则右。中共中央迅速通过决议，表示完全拥护。而后，李立三又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缭乱的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设想。这一套革命设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国革命已经到了通过一省数省的首先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紧接着世界革命的爆发。因此，不仅共产国际应当批准中共立即开始发动夺取武汉的总暴动，而且苏联和共产国际也要准备采取进攻路线，配合中国革命。[34]　　不过，如果说立三提出的这一整套进攻路线的要害是“左”的话，那么这时最“左”却未必真的是李立三。因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中央里面主张消灭右倾危险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发。尽管在构制革命宏伟蓝图方面，向忠发的想象力与李立三比确实相形见绌，但在过高估计革命力量而不是过高估计敌人力量方面，向忠发毕竟从不后人。当李立三还在那里含糊其辞地说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向忠发则直截了当：“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李立三还在那里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向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一句”，事实上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李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向忠发更是表示“我绝对不同意”，称“这样说足以使一般同志观念动摇，将革命分作两个东西，忽略城市无产阶级领导，只简单看见了几个枪杆子、赤卫队”。中国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和洪秀全的时代，“如果特别看重农村，那和洪秀全时代有何区别？”必须指出：“农村与城市不是两个东西”，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城市斗争更尖锐。[35]

向忠发和李立三究竟谁走得更远，不是一目了然吗？

1930年6月初，所谓“立三路线”已经在向忠发的鼓励和推动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甚至开始从中央到各省区，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机构，组织各级所谓的行动委员会，积极准备实行10月革命式的一击而中的全国暴动计划，打算以进攻武汉为中心，分别组织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罢工。不想，这时恰恰传来消息，说是共产国际怀疑中共所设想的以进攻武汉为中心的暴动计划，周恩来在莫斯科则接受了关于在中国首先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思想。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并没有到全国胜利的可能，革命的发展仍然严重不平衡。中共中央对此极为不满，紧急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明确表示“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批准他们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随后，他们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了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准备迅速动员全党展开夺权斗争。[36]

6月11日决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共产国际正在就中国革命问题制定系统的政策文件，而中共中央却决议在全国平行布置夺取政权的工作，反对建立根据地，此种作法十分不妥，目前只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对此，负责与远东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确表示，中国革命已经到关键时刻，“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也要对中国革命负责”。向忠发立即给支持，声称远东局总是拿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进行刁难，对于这种纯粹“强奸式的批评，我们绝不能接受”，“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同时还要向写信给周恩来和共产国际说明情况。随后，向忠发很快写信周恩来，大谈革命形势如何高涨，夺取全国政权的方针如何正确，严厉指责远东局当时的临时负责人罗伯特“总是在许多细小的技术问题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胜其烦”。断言罗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几省来夺取政权的观点，是一种露骨的地方割据的观点，表面上很激进，但实际上是对客观情势估计不足”，“是一条极其错误的路线，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现在这种革命形势下，如果不能坚决贯彻这样一条路线，“就是对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挠

革命”。[37]

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批评有根据地的发展的观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割据”观念，断言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必然引起统治阶级全面围攻，非有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不能巩固，结果只能得出中国革命的胜利必然引起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非有苏联的直接援助和世界革命的全面爆发不能真正胜利的观点。7 月，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平行组织南京士兵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而以武汉暴动为中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决定正式出台，李立三不能不开始设想苏联援助和世界革命的保障问题。但这样一来，不仅立即引起以陈绍禹、博古为代表的留苏回国学生的公开反对，而且再度造成与远东局的激烈争执。

7 月底，红军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来，使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布置夺取全国政权工作的中共中央欢欣鼓舞。谁知这时共产国际又来一电，断言中国革命主观力量太弱，全国暴动计划纯属盲动。对此，中共中央自然难以接受。8 月 1 日和 8 月 3 日，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情绪激昂，人人批评国际不能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李立三甚至气愤地说出，“如果我们对总的路线动摇了，对国际的来电是忠实了，但对中国革命则是罪恶”的话来。他明确主张：“国际必须迅速采取进攻的路线”，苏联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满洲，外蒙必须立即开始准备出兵中国华北，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掀动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阶级决战。这一问题非常严重，丝毫不能延缓。中国党应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向忠发更是直截了当，声称：国际的几次来电都表现出“还不能了解中国实际情形”，国际事实上提出了一条与前不同的不正确的路线，这“证明国际的错误”，“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并且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当然，由于周恩来没有能够让国际切实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在政治上也负有“严重责任”，“暴露他右倾的危险”。因此，向忠发坚持认为中央前此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使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成为“革命的罪人”。[38]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李立三和向忠发由此给自己惹了大祸。只不过，远东局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欣赏的这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还不敢大张挞伐。尽管在按规定送给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会议记录里，向忠发所表现出来的对共产国际的不敬丝毫不比李立三好一些，但远东局还是把矛头指向了这位有系统理论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人。在 8 月 5 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远东局声称李立三犯有反对共产国际的严重错误，并开始在下面找团中央和总工会的干部搜集反对李立三的材料。[39]对此，向忠发同样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与远东局大吵，指责远东局挑拨中国党的纠纷，破坏党的统一。

8 月 6 日，双方开联席会。向忠发一上来就连珠炮般地发问：远东局是否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认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领导中国革命？是否认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经破产？如果承认，为什么要越过政治局在中国党内搞小动作，煽动其他党员来反对政治局？如果不承认，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但罗伯特并不示弱，严厉批评李立三不应当与共产国际的路线相对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决定都必须与共产国际共同作出，在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到来之前，一切暴动计划必须推迟进行。对此，向忠发越听越气。当远东局秘书杰克威胁说，共产国际可以开除任何象李立三这种敢于反对共产国际并试图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人时，向忠发不禁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嚷道：“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资格！”双方当即吵了起来。向忠发因此站起来大声告诉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我是以国际执行委员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来这里讨论工作的，不是来讨论这些无原则的争论的，更不

是来听那些不负责同志的发言的”。“今天或者远东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则我们还是要继续执行我们的计划，直到我们被停止工作为止”。[40]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对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承认“这是犯了政治上的错误，特别对远东局不应如此”。但他同时亦表示，远东局本来只是一个传达机构，并非指导机关，却总是在枝节问题上找麻烦，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国际，并专门挑出李立三个人来攻击，甚至挑动中国党的干部反对党的领导，这实在难以忍耐。他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向来是集体指导，绝不能同意远东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开来批评。既然远东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远东局汇报工作的责任就改由邓中夏来担任。同时，政治局会议迅速通过正式决议、政治局致远东局的信、政治局复远东局 8 月 5 日信关于李立三同志发言的材料，等，为李立三辩护。[41]向忠发起草并属名的政治局决议称：“远东局来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与八三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话，完全是断章取义，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严重抗议远东局的来信，“在政治上坚决反对说中国党有以冒险代替革命领导与有反国际斗争的危险的结论，以及抛开政治局的集体指导指摘政治局个人，破坏中央政治局两年来一贯集体指导的精神”。当然，为了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紧张关系，向忠发在“要求远东局以后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的同时，也主动“要求远东局派人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讨论的会议”，以便在目前工作异常紧张和困难的环境中，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起政治上的责任”。[42]

仅仅设法缓和与远东局的关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中共中央特别劝说远东局联名急电共产国际，请其重新讨论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动计划。向忠发并亲自写信给斯大林，仔细说明整个革命形势的进展情况和中共的暴动计划，说明尽管国际主席团已覆电反对，但“我觉得国际主席团未得到中国最近革命猛烈发展的实际情况的详细报告，故有这样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将实际情形报告国际请示批准中央的决定外，特将目前严重形势告你，请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联共中央提出，予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他特别强调：“这一严重形势不只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异常严重的世界问题，请你迅速的答复”。[43]

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况吗？事实上，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政策，这时恰恰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制定的。因此，向忠发的申诉当然不会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结果。

向忠发何以“堕落”？

共产国际几次电报，中共中央却仍旧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国际指示。1930 年 8 月 19 日，周恩来先行回到上海，并于 22 日向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国之际，共产国际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 8 月初的两次会议记录，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说明建立苏维埃中央政权问题、肯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重要意义、强调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仅没有否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甚至没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暴动布署。以至政治局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反而认为：国际“不是根本反对武汉南京的暴动，而是要我们更积极的准备武装暴动”。直至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忠发的领导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均无任何改变，因此，中共中央不仅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而且断定自己与国际之间的分歧，其实只是一些“误会”，现在已经解决了。所以，当远东局说明共产国际决定调李立三去莫斯科时，向忠发仍旧敢于表示反对，“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调立三同志去”，直到共产国际再来

电报坚持，向忠发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国际应让李立三在两个月后即赶回国内。[44]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时对冒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严重后果，还缺乏深刻的了解。

11 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先是陈绍禹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大发雷霆的消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对此，作为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竟还蒙在鼓里，以至于他还敢在 11 月 17 日的宣传工作人员会议上借着批评留苏学生沈泽民，把陈绍禹等痛骂了一顿。但当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根据从远东局得到的关于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关报告和中共中央 8 月初两次会议记录，断言李立三和其他几个政治局同志已经形成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反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45]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在 11 月 18 日的会议上，向忠发心情沉重地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信。在 22 日与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被迫开始承认自己负有主要责任。到 12 月 6 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过去那点打抱不平的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甚至开始畏畏缩缩地想把自己摘个干净，说什么："我缺乏理论，过去对立三错误不能说服他，不能与他争辨"，加上"我不能写，没有帮手，使我自己觉得立三不对也不能反抗，这是我过去的责任—助长'立三路线'"。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陈绍禹等留苏学生背后有苏联的大手在撑腰，因此还是咬着牙不收回过去对陈绍禹等人的处分决定，并且不能容忍陈绍禹等人对中央的态度，坚持要"与之斗争"。然而到 12 月 16 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彻底老实了。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

"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46]

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瞿秋白第一个反对，肯定向忠发自六大以来领导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紧接着于 1930 年 12 月 29 日米夫和远东局为六届四中全会拟定的改选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上，李立三自然被删掉了。而与"立三路线"完全不沾边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责任者，也因为在莫斯科时一度与米夫作对而被删掉了。再一个被删掉的是李维汉，而他实际上只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成了国际来信中所提到的那个支持"立三路线"的"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唯独"立三路线"的最高主持人向忠发岿然不动。不仅如此，在 1931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几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领导成员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责，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连人们这时所公认的在党内工作能力最强的周恩来也不能幸免，却没有一个人向这位总书记发难。虽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发这个"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发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错误，我个人要负特别的责任"，仍没有人把矛头指向向忠发。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忠发是个工人。正象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所说的，周恩来犯错误，"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向忠发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为是工人，因此不仅"决不让他们滚旦"，就连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国际代表直截了当地说：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线"？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结果，新改选的政治局委员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47]

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

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他开始把宝押在陈绍禹的身上，极力想让刚刚当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陈绍禹进入政治局常委，来帮助把关。因为他这次政治上的严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不能象过去那样呈英雄了，他几次提出需要有个“帮手”。而这个帮手最好就是陈绍禹。其实他早就知道，陈绍禹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将。但过去他过于自信，竟没有把陈绍禹放在眼里。如今他翻然悔悟。虽然米夫和远东局最初并不同意让陈绍禹迅速进入常委工作，但他还是每每必定拉上陈绍禹来开会，并且一反过去那股从不服输的劲头儿，即使是陈绍禹当面顶撞他，他也尽量不动肝火，好长一段时间里，每逢开会，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过，四中全会以后，向忠发还是做过两件对中共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决定。第一件是不让张国焘到江西苏区去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四中全会结束后，远东局立即提出加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问题，并建议派将要从莫斯科回国的张国焘（六届四中全会选举的政治局常委之一）来担任书记。对此，向忠发极力反对，称张国焘长期不在国内，对国内工作不熟悉，同时与江西苏区的毛泽东过去在一些问题上有矛盾，难以合作，在苏区工作刚刚走上正轨之际派张国焘去担任领导职务，对整个工作是不利的。远东局虽然坚持认为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不会产生严重问题，但最终还是同意了向忠发关于张国焘应暂时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见。从以后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大搞一言堂的情况来看，这个决定显然为毛泽东减去一个具有重要威胁的政治对手。

再一件事是让毛泽东来做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主席。本来，在六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过建立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单，向忠发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自然也被规定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会之后，远东局建议即将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名单不必过于注重形式，群众还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单里。因此，关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来担任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向忠发做政府主席“没有必要”；有人则认为苏维埃主席需要全国有威信的，尽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发来做个挂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发）外，没有别的人”更有威信来做这个主席了。张国焘则明确主张：“在全国威信上，还是特生好”。而向忠发却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苏区去，没有必要担任这个主席职务，“我觉泽东可做主席”。[48]显然，想到应当并且可以由毛泽东来做这个主席的，这时也就是向忠发了。由于这一意见最终得到了会议和共产国际的批准，毛泽东也就真的当上了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向忠发的这一提议，很明显为毛泽东以后在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但是，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 25 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理论上有陈绍禹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实际工作上有周恩来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远东局代表汇报一次工作，参加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听几个报告，发两次言而已。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陈绍禹不可一世的样子，动不动

就和陈大吵，使得远东局一度为两人的关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顾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不仅弄得负责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来等人好一段神经紧张，而且搞得部分领导人对此议论纷纷。因此，周的评价是，向忠发这时“堕落”了。

其实，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 36 个，其中工人占了 22 个，而这 22 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 1931 年 6 月 22 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 14 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49]这也就难怪，当向忠发被捕并被杀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明确表示想要接替向忠发做总书记，却不被共产国际所考虑。继向忠发之后，共产国际宁肯找一些自己信得过的，即使是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来维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来做中共领袖的事了。

----

[1] 这里仅按习惯称呼。实际上历届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名称并不完全相同，如一大时称书记，二大、三大时称委员长，六大时称主席，等。

[2] 见高军：《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等。

[3] 见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3，58 页。

[4] 关于共产国际和“八七”会议之后临时中央对此事的严厉批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２８１－２８２，６２７页。有关此事的情形还可参见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１１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６２８页。

[6] 确切地说，这时被当作工人补入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还有一个顾顺章。但顾顺章其实只能算是半个工人，因为其本人虽早年当过工人，但后来已做了职员。并且，顾顺章过去也并非工会组织的领袖，他只是在中共的领导下担任过上海工人纠察队的负责人。

[7]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中央档案馆丛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8]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５１４，目录号１，卷宗号８１１。

[9] 《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 年 2 月 15 日。

[10]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11] 在向忠发关于《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的报告》中，曾说明他离开上海前李维汉同意他“以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在共产国际进行工作，但在向忠发走后的一份中央常委会议记录上，却写明驻国际代表应“以中央委员身份”进行工作。这里从后者。

[12] 参见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１９２８年９月１４日；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９１７。

[13] 参见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５４，卷宗号３４３。

[1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卷，第４６９－４７２页。

[15] 《向忠发致布哈林的信》，1928 年 2 月 15，20 日。

[16] 《向忠发关于中共党内问题致彼得罗夫转布哈林的信》，1928 年 2 月 15 日；《中央书记同斯大林、布哈林等谈话纪要》，1928 年 2 月 21 日。

[17] 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７７１。

[18] 苏兆征秉性沉稳、不善言辞，共产国际东方部其实早就了解。因为在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十分频繁，但苏兆征实际上从来都很少发言。

[19] 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１８，卷宗号９３１。

[20]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谈话会记录》，１９２８年 6 月 15 日。

[21] 同上注。

[22] 这些工人代表大多是从当时的暴动分子中挑出来的，多半只是看其勇敢与否。故周恩来有如此说法。另外，周恩来在一次回忆中提到的代表人数有所不同，称，六大时代表 75 人，工人占到 41 个。

[23] 有关情况可参见《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３９页注释；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第５３页；第４期，第６７－７０页。

[24] 《中央常委会记录》，1928 年 10 月 15 日。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第 695—710 页。

[26] 《中央常委会议》，1929 年 1 月 3、13 日。

[27]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 年 10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 年 3 月 26 日。

[28] 《中央常委会议》，1928 年 10 月 4 日。

[29] 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 181 页。

[30] 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4—76 页。

[31] 《中央政治局会议》，1929 年 3 月 26 日。

[32]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 年 12 月。

[33] 《中央给国际的报告－关于远东局第十次全会决议对中国问题部分决议的意见》，1929 年 12 月。

[34] 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1930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电》，1930 年 6 月 12 日。

[35] 关于共产国际文件上提到的"革命高潮"的定义问题，中共中央曾反复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势"。参见《中共中央政治会议第 8 号》，1930 年 4 月 7 日。

[36] 见《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1930 年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第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６页。

[37] 《向忠发致周恩来的信》，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５日。

[38]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 年 8 月 3、5 日。

[39] 《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0 年 8 月 5 日。

[40]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 年 8 月 7 日。

[41] 《中央政治局致远东局信》，1930 年 8 月 7 日；《关于立三同志发言的附件》，1930 年 8 月 7 日。

[42]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远东局 8 月 5 日来信的决议》，1930 年 8 月 7 日。

[43] 《远东局、中共中央联名给国际电》，1930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致斯大林同志的信》，1930 年 8 月 8 日。

[44]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 年 9 月 29 日。

[45]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６卷，６４４－６５５页。

[46] 《中央政治局会议》，1930 年 12 月 6 日。

[47]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1931 年 1 月 7 日；《共产国际代表在四中全会上的结论》，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卷，第３８－３９，１２９页。

[48] 中心档案，全宗号５１４，目录号１，卷宗号８２１。

[49] 参见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85 页。(本文收入此选集时曾做了较多的删改)

王明上台记

王明，21 岁入党，随即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三年后，即 1929 年 25 周岁时回国，从区委宣传干事干起，接着是《红旗》报及《劳动》三日刊的编辑，不到一年时间做到了中央宣传部干事的职位。但没有人能够想到的是，一场突然的变故，竟使得这位刚刚回国一年多的小个子留苏学生，在两三周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中共最重要的一个省－江南省的省委书记、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后，他更进一步取得了政治局常委的资格，成了中共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 1930 年底和 1931 年初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不过，从历史本身来看，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来。因为事实上，如果不是在 1930 年 6 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李立三，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

1927 年国共分家，共产党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积聚，到 1930 年初，共产党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上海，赤色工会有了相当的影响，组织起上千人的政治性示威游行已经不在话下了。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 年 2 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根据战争引起革命的理论，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2 月 17 日，中共中央依照惯例召开每周一次的政治局会议。身为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一上来就做了一个极具煽动力的形势报告。他明确讲：我们目前的行动方针应当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战争”。“因为军阀战争削弱统治力量，加重群众痛苦，这一混战的确有可能爆发一直接革命形势”。李立三的形势估计显然鼓舞了与会者，关向应断言：“在

军阀战争的形势下，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并非难事”。周恩来也主张：要“以主观力量，造成直接革命形势，夺取政权”。要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作为我们目前的中心策略。会议决定，组织长江局，首先在发动湖北暴动，以此作为全国暴动的开始。

3 月，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立即分别向武汉、南昌及广州等中心城市挺进，同时并召集军委、农委、总工会及地方党的各种会议，具体部署中心城市的暴动与红军进攻的配合问题。要通过俄国式的暴动方式来夺取政权，工人的力量明显不足，因此，李立三这时突然强调红军的作用和各种力量的配合。他声称，只要红军一向中心城市挺进，就会促使工人、农民起来响应；即使工人尚未准备好，如果红军能够打下武汉，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等待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月 5 日，上海党组织指挥祥昌纱厂罢工工人冲厂，与工头及巡捕发生冲突，一名工人被巡捕开枪打死，数人受伤。此事迅速激起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普遍愤怒。8 日，近 2000 名工人和学生涌上南京路，并引起上万群众的响应和围观，10 余辆电车被砸，群众和警察及巡捕再度发生冲突。紧接着，南京和记蛋厂因资本家雇佣流氓打伤工人，又引起南京学生及工人的不满。4 月 5 日，资本家请日本水兵登岸压迫罢工工人，大批学生赶往声援，与警察发生冲突。上海部分工人学生更受刺激，情绪激昂，起而响应，到处都有讲演和集会。一时间，上海和南京地区出现了浓烈的火药味，很有点革命气氛。

4 月 7 日，李立三开始在政治局会议上设想中国的十月革命了。他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他断定，中国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取代了过去俄国的位置。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他明确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一爆发，帝国主义必然要以全力来镇压，结果势必促成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革命的爆发。由于担心莫斯科可能忽略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他提议，应该给国际一个详细的报告，促使它就此做出明确的决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多半比李立三更加冲动。

一些与会者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仅仅说我们革命形势复苏已经不够了。

李立三表示：我们已经指出革命高潮一天一天逼近了。

向忠发对此不以为然，讲：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

究竟何时可以宣布已到革命高潮，政治局为此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李立三甚至已经在担心会不会发生“左”倾危险了。

为检验群众发动的程度，中共中央为在上海组织五一示威游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 27 日，江苏省委在“仁济善堂”召开上海“五一”总罢工第二次筹备会时，被国民党侦知，各工厂指挥人员数十人被捕，组织好的 200 余人的纠察队也有 120 多人被捉了去。“五一”那天，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强行示威，动员了基本群众 2000 余人埋伏在南京路旁的马路和弄堂里，只等红旗一展即冲上南京路集中。不过，由于当局戒备森严，负责指挥的总行委虽两

度派骨干打出红旗，骑着车冲上南京路，引来围观者甚众，示威游行没能组织起来就被军警冲散了。向忠发盼望的几万人上街的局面自然没有出现。

但即便如此，中共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丝毫没有减低。“红五月”里，仅江苏省就在将近 10 个县市举行了规模不等的工农示威和集会。上海方面以声援印度革命为号召的五卅示威省活动也取得了比五一示威要大的声势。再加上蒋、冯、阎中原大战正酣，长江流域国民党兵力空虚，红军大显身手，进入到 6 月份，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进一步升级。

6 月 9 日，李立三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任务已经摆到党的面前来了。眼看临近最后的决战，他断定，一旦中国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一定要压迫中国革命。或者中国革命掀起世界革命高潮，战胜帝国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没有世界革命，中国革命归于失败。“这一点非常严重”。因此，他强调：“必须使每个人了解，中国革命有掀动世界革命的可能”。“世界革命一起，进攻苏联的战争必会马上爆发”，结果全世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也将胜利展开。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这时几乎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直到最后胜利。不料，他们突然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这个消息立即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喧然大波。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 11 日通过了一个正式的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13 日，李立三在递交中共中央决议和电报时与远东局德国“毛子”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既然并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中共中央这样仓促反应是否明智。况且，新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既要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即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二者究竟有多大区别？据此，罗伯特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决议和代发致共产国际电。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罗伯特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政治局还有人生病，这个决议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李立三要承担一切责任。

19 日，在得知远东局的正式意见后，政治局内的气氛变得激烈起来。项英宣称：这个决议无论如何必须发下去。远东局的指导是无原则的，妨碍中国党工作。向忠发也尖锐地表示：说什么这个决议只能是草案，简直是开玩笑！立三的答复非常正确，我们对国际负责，同时要对革命负责。对远东局的这种态度，“我们一定要来一个政治上的抗议”，太软弱是不好的。22 日，向忠发正式致书远东局，表示“严重抗议”，要求远东局立即停止罗伯特的工作，同时强硬表示：“中央为对革命负责、对无产阶级负责、对国际负责，已经决定即刻发出这一决议，不能接受远东局停止发出的提议”。

25 日，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王明，自视比宣传部秘书潘问友更适合为中央出谋划策

宣传部长与远东局发生争执，给自认为比李立三更懂得列宁主义真谛的王明提供了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毕竟，如果从两人所受理论教育的背景来看，王明留学苏联的经历远比李立三留学法国的经历更值得炫耀，何况他与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还有一层师生关系呢。但如果说王明这时已经在密谋取李而代之了，却也未必。因为，王明这时才刚刚进入宣传部当一名小秘书，距离李立三的位置未免还太远了点儿。应当说，如果王明这时真的存在什么野心的话，正如后来博古所说的，他第一个想要取代的，多半是宣传部大秘书潘问友的位置。

还在李立三与罗伯特直接发生争论之前，刚到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就已经注意到潘问友的作用了。因为李立三的许多大块理论文章，大多都是潘起草的。王明显然看不大上潘的理论水平，尽管潘和他一样也曾留学苏联。来宣传部不久，王明就毫不顾忌地同他的顶头上司李立三就"革命高潮"是否等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发生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王明的矛头明显地是冲着潘去的。只是，李立三颇不以为然。王明也无可奈何。当 6 月 11 日决议形成，又得知远东局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还在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住的旅馆里，告诉他们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头，在江苏省工作时他就已经向负责江苏省工作的项英提过。在现在中央里面，向忠发在理论上懂得不多，项英对一些提法是犹豫的，李立三其实也是上了潘问友的当，因为他的东西大多都潘问友搞的。因此，他的意见，最好大家都去向中央的同志反映问题。三人随后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随后确也分别向项英以及李立三反映过意见。

6 月 11 日决议形成后，开党小组会时，王明等人再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7 月上旬，得知李立三要召集中央工作人员开政治讨论会，讨论贯彻新决议的问题。一得到消息，王明等人就汇集一处，商量办法。最后决定开会时王明首先发言，依次是王稼祥、何述之，博古最后对批评者进行反驳，尤其要把矛头对准潘问友。

7 月 9 日当天，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只两三个人发言拥护，王明即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说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说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说如果笼统说世界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必至走到等待主义；说中国革命完全可以保持它的胜利，即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保持胜利也完全可能；说革命高潮不等于直接革命形势；说不没收富农土地、强调中国封建势力占优势、断言中国不能首先胜利等，都属于右倾表现。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也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是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

王明三人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强烈反感。当时就有五六个人发言表示反对，同在莫斯科留过学的潘问友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结果，25 个与会者当中，清楚地区分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李立三当时即感到，四人似有“小组织的倾向”。

李立三在做结论时批评了王明等人。他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而王明四人的发言最坏的，是完全不无视中央决议，反而站在另一条路线上来反对中央路线。他指出，在临近夺取政权阶段，一切均转入军事化，党的决议即是命令，谁也不能反对，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李立三话里有话地说了两个多小时，何子述当时就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但王明却表示，他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他将保留他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第二天，即 7 月 10 日，王明还进一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并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上级决议，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王明等人在政治讨论会上的态度，引起了政治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向忠发态度明确：召集几个人谈话，承认错误便罢，否则就采取组织措施。随即，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几人谈话。向忠发当场痛骂了王明一顿，并要求四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

谈话之后回到旅馆，王明气鼓鼓地不服输，嘟嘟囔囔地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则看出事态的严重，主要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此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把四人召去正式宣布了中央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重新分别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述之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在受到处罚之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在上海仍经常见面，但惧于被开除的危险，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只好偃旗息鼓，不再敢多所活动。尽管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进一步发生严重冲突，王明也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不过，向忠发和李立三大概绝对没有想到，由于继续让王明留在上海，竟会便利了他几个月之后来了一个秋后算帐。

远东局断言，中共中央正在陷入反对国际的严重危险中

1930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开始达到了顶点。16 日，向忠发不顾远东

局的反对，坚持要求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武装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为此，“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27日，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红军的力量已经强大到足以攻取像长沙这样重要的中心城市，中共中央自然对胜利更加充满自信。

正在这时，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是脱离实际的。31 日晚，李立三不顾有病在身，赶往会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解说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第二天，即 8 月 1 日，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我们虽然忠实于国际的电报了，但我们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与会者都一致赞同李立三的看法，向忠发也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但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由于 1 日的会讨论国际指示占用了太多的时间，3 日政治局再度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的问题。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的暴动，因为这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暴动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显然，李立三这时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他声称：“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胜利决战，李立三开始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来了。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将西伯利亚几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回国向敌人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进攻北方。“如果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说：“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的忠实的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不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日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在中国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如此赤裸裸地批评共产国际，如此毫无顾忌地要告诫莫斯科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既使毛泽东实际上开始脱离共产国际指导的

40 年代初的那两三年里，即使在政治局会议上要对共产国际和莫斯科如此这般地说三道四，也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不难想象中共中央当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样。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固然不必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但会议记录必须呈交远东局再转莫斯科，以便于莫斯科随时能够监控。8 月 1 日和 3 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刚一交到远东局那里，李立三和政治局领导人对莫斯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不敬的态度，顿时就在外国“毛子”中间引起了喧然大波。

5 日，远东局迅速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领导人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由于翻译的问题，李立三在记录上的有些说法被演绎成了向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挑战。比如，译文中有“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不能不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不要说李立三还在向莫斯科发布指示，要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向中国出兵，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了。这简直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远东局的声明最后告诫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6 日，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会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

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答复称：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答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马上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答复说：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随后李立三站起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但远东局方面的一位叫杰克的年轻人站起来打断了李立三的话，生硬地指责中国党有很大的危险，李立三是在组织政治局反对国际。他话未说完，向忠发就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大声吼道：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但会议终究不欢而散。

留苏学生联成一气，政治局决心挫败“陈韶玉向党进攻”

8 月 8 日，为求得共产国际对自己暴动计划的理解，向忠发亲自致函斯大林，请求支持。他在信中明显地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夸大其辞的描绘。称现在武汉、南京的工人都迫切要求暴动，农民群众正在向着武汉进攻，沙市、大冶、孝感、花园等不少中等城市已被红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主要驻军或大部分或全部都倾向我们，异常迫切地要求暴动。为此，他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并通过联共（布）给予切实的援助。

14 日，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出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甚至几天后周恩来回来，中共中央仍旧一度加紧部署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攻占岳州，击溃江西敌军，占领南昌、九江，夺取武汉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时已有很清楚的报告得知武汉充其量只有几十个自己的同志，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李立三却初衷不改，相信可以马上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去，迅速加强武汉的力量。为此，当得知有一艘运输枪械的商船将要离开上海，他立即找来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异想天开地要顾派人去夺枪。顾表示公开截船夺枪根本不可能，李立三则说：你们可以派人潜到船底下去凿一个洞嘛！

9 月初，远东局亲自派人去武汉调查，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知道根本不存在成功暴动的可能，于是坚决要求停止暴动计划。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最终停止了这一系列纯属盲动的行动部署。到 9 月下旬，大家终于开始冷静下来了。在这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会议仍然肯定党的路线与国际并无二致。甚至对于 8 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也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一种歉疚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种事的严重性。

当初在把周恩来和瞿秋白派回国的时候，共产国际还全然不知道有 8 月 1 日和 3 日政治局会议前后的那一出戏。尽管莫斯科知道政治局与远东局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但还不认为中共领导人存在着反国际的倾向。因此，当远东局转去的 8 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马上就在共产国际大楼里面引起了一场喧然大波。这时，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五人刚好要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国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断言政治局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立三路线"，性质很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它坚决斗争。

由于王盛荣等回来太快，莫斯科那边尚未形成决议，因此它的态度变化不仅中共中央这时不了解，就连远东局也不清楚。对于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问题的说法，远东局也是听之任之，事后甚至还帮着中共中央批驳党内何孟雄等人的怀疑观点，说什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李立三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正当的倾向"。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向在上海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会议这一精神时，不明就里的王明和博古对会议的决议也都表示了拥护的态度。但 11 月上旬王盛荣等人到上海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很快，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开始公开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轻描淡写表示不满。

13 日，王明和博古故伎重演，联名写信给政治局，一面肯定地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一面给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尖锐批评李立三领导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浪基主义的混合物"。

共产国际关于李立三错误性质的来信中共中央是在 11 月 16 日收到的。周恩来回忆王明他们还在中共中央之前就得到了来信，但博古则回忆，他们看到来信是得益于同为留苏学生的沈泽民，因为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沈泽民马上就将共产国际的来信偷偷拿给王明他们看了。正是因为看到来信将李立三的错误明确定性为“机会主义的”、“反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王明确信得到了上方宝剑，他和博古马上又写了一信给政治局，除了把自己说成如何如何最早与立三路线势不两立，却受到残酷打击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中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博古写第二封信时，党内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两派势力。两派都是以在立三路线当政时期受到批评和压制的干部为首的。一派以何孟雄为首，上海地方党和工会组织中的干部大部分都同情何；另一派则是以王明为首，在上海的回国留苏学生几乎都站在他一边。 这边有王明、博古的上书，那边有何孟雄的意见书，两部分干部观点接近，他们自然迅速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则不能不陷于被动。

还在 11 月 18 日第一次讨论共产国际来信的时候，政治局就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提议，对他们这种超越组织的行为必须进行斗争，必须指出他们的错误，并给予警告。但事实上，既然政治局是三中全会选出来的，三中全会又没能指出立三路线的严重性，共产国际与政治局之间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动摇了政治局在众多不满立三路线的干部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王明和何孟雄两派人对中共中央的几乎所有决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里。

在随后举行的各种谈话会，甚至在上海的各级党支部的会议上，都出现了针对政治局的严重对立情绪。

面对这种情况，政治局深感困惑，青年团书记温裕成明确表示，拿这些孙悟空没有办法。不得已，政治局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几乎全体出动做解释工作，以平息下面的不满。远东局代表也专门找王明等人谈话，要他们不要闹，服从分配，正常工作，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注意到王明等人对过去受到的处罚耿耿于怀，周恩来最终主张先软后硬，即承认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大适当，肯定其来信有对有错，要求他们在国际和中央路线下积极工作，帮助中央，若不听再闹，则不能顾惜。12 月初，政治局决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坚决反对破坏党的小组织活动，以挫败“陈韶玉（即王明）向党进攻”。

但仅几天后，由于远东局已经得到莫斯科方面关于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的指示，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陈郁等一大批省委、工会、军委方面的中层干部以及王明、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这时也在上海）、方英、博古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几乎一致改组政治局。有要求召开七大重选中央的，有要求开紧急会议的，有成立决议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席团要求撤换政治局领导人的。由于党的许多组织都集中在上海，而立三路线也好，三中全会精神也好，统统是靠领导整个地区的江南省委贯彻的，因此，中下层干部要求撤换省委书记李维汉，改造省委的呼声甚高。整个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一时间几乎完全陷于瘫痪。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此不能不感到万分焦虑，用周恩来的话，就是“闹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周恩来不得不考虑承认过去对王明等处罚失当，但向忠发坚决反对，说“他以

前也并没有站在正确立场啊”。

12 月 8 日晚，周恩来与远东局代表再度商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远东局代表明确认为，三中全会所犯调和错误是系统的，如果一味地想要部分肯定其正确成分，只能使中央更加丧失威信。对于王明等人过去与李立三的争论，在有机会的时候要肯定他们当时是对的。根据与他们谈话的情况，可知王明等人最不满的还是中央不信任他们，因此，只要他们肯帮助党，要适当分配他们的工作。

次日，政治局正式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的错误，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一星期内由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团中央委员共同举行紧急会议，以便通过这样的决议。至于对王明等人的处罚，大家同意在《党的生活》上公开宣布撤销。但到具体分配工作问题时，人们对这些搞小组织活动的行为仍旧很难谅解，因此，仍决定对何孟雄必须处分，“陈韶玉到中央苏区去”。

政治局里不只一个人表示：王明加入可以加强指导力量

政治局的上述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差不多 12 月上旬，曾经当过中山大学校长，这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就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到中国的上海来，这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米夫不能不来。因为，像 8 月初发生的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莫斯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的旨意回去，竟然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三中全会甚至肯定前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一致，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这自然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非亲自出马不可了。

中共中央必须改造。问题是怎么改造，改造谁，补入谁？

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由候补补入的外，政治局正式成员其他六人确实与立三路线时没有变化，即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在莫斯科未归，周、瞿刚回来，真正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只有向、李、项三人，但就连李立三也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不用说，在莫斯科看来，李立三必须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与批判。但当初出面顶撞的总书记向忠发、参予同远东局谈判的项英，都是工人出身，能够把他们看成是立三路线分子而排除出政治局吗？显然，这在注重工人成分的共产国际看来是不可取的。找来找去，莫斯科最后决定除了要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因为一定要让中共领导人明白，容忍向共产国际挑战的行为，同样是一种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

拿瞿秋白开刀是基于他此前在莫斯科时就因为卷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斗争，而受到过处分，被解除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加入政治局呢？在共产国际随后召开的

一次讨论立三路线问题的会议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成员库秋莫夫明确讲：谁能够保证他不会继续犯这样的错误？

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瞿秋白耿耿于怀，显然与他在莫斯科时站在那些受到莫斯科欣赏的少数学生的对立面这件事有重要关系。要知道，在立三路线时受到打击和在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压制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是这些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库秋莫夫不无激动地谈到了王明的遭遇，称："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 3 个月到 6 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说库秋莫夫在这里说得还够清楚，那么，负责共产国际组织系统的重要领导人皮亚尼茨基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作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要王明等留苏学生加入领导机关，是不是就是要让他们一步登天，加入政治局呢？从米夫来上海后远东局的举措看，事情似乎也不那么简单。12 月 16 日，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通过发出了《关于撤销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米夫通过远东局提议，让这些留苏学生进入中央各部担任某些负责的职务，比如沈泽民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参加党报，博古进团中央等。沈泽民暂时负责宣传部，王明去组织部作秘书，王稼祥去党报等，看来都很顺利，只有博古进团中央去则费了些周折。团中央书记温裕成最初表示拒绝，继而拖着不办，直到 12 月 23 日才最终同意让博古做团中央的委员，负责团中央的机关报。

没有人知道米夫是否授意远东局暗示周恩来，王明等人应当补入中委，但以往那些关于米夫要求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的说法，应当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从近些年披露的来自俄国的档案资料能够看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米夫并不赞成全面变动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江南省委书记改选的问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远东局要求的结果，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江南省委的改造，简直就是一种无政府行为，"是开玩笑"。

12 月初，由于江南省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周恩来亲自出席省委会议，进行说服工作。与会者言辞激烈，说服工作难以进行，最后周不得不同意对省委进行部分改组，待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即行解决。事后，李维汉明确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周、瞿、向等也表示待中央紧急会议开过后可以考虑。

12 月 22 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多数再度强烈要求改组，并对中央政治局拖延决定提出质疑，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李维汉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数人一致决议自行改选，陈云等虽表示反对，最后仍以多数同意选举了王克全为代理书记，并增补何孟雄等为省委委员。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严重不满。

23 日，政治局开会，瞿秋白一上来就表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这样自行变动江南省委，"是

否太不尊重国际代表意见？”周恩来也明确认为，江南省委不经过中央如此处置，中央实在无法领导。但是，李维汉则强调，他确实已不能尽领导的责任，请中央顾及实际情形，与远东局商量找人代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才不得不开始考虑代理人选。此前人们已议论到召开紧急会议，增补中央委员的候选名单问题，王明的呼声明显较高，关向应、周恩来等都赞同推举王明，关并肯定“他反立三很久，尤其是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等问题”有较正确的看法，因此，当有人提议王明为代理书记时，会议当即一致通过，决定：“韶玉代理省委书记”，他在组织部的工作暂由他人代理。以后等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由刘任书记，王明再回去。

第二天，周恩来与远东局就紧急会议以及江南省委书记代理人选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磋商。远东局对由王明代理书记的问题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但对召开紧急会议解决问题的提议表示还需要研究。

据俄国档案透露，王明等留苏学生此前也是积极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但这个时候米夫秘密召见了他，据他自己介绍，米夫告诉他，紧急会议有太多临时的性质，不像正式的代表会议，因此不能有很好的权威性，它的决议案事实上也不如正式的中央全会的决议案有效力，在改组问题就更是如此，因此不如召开四中全会的好。

12 月 29 日，远东局全体代表出面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周恩来等会面，商谈改组中央的会议问题。远东局新来的德国毛子正式通知中共中央：第一，紧急会议不足以表明三中全会犯有路线错误；第二，紧急会议没有足够的权力改组中央。因此，应考虑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对于参加人选，远东局主张凡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均应参加，扩大的人数以不超过与会中委的三分之一，即六七人为宜，但根据政治局会议主张应允许公开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参加会议的精神，周坚持非中央的参加人数应增加一倍。

至于表决权，周主张凡与会者都有表决权，远东局则坚持按照规定，只有正式的中央委员才能有表决权。涉及到比较重大和争论较大的问题，可考虑变通办法，如中委表决一次，并由全体参加者表决一次。

当谈到改组问题时，周恩来汇报了党内各部门的种种意见，远东局根据周所提名单研究后提出，中央委员补选不能太多，以七八人为宜，同意增补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荩仁、徐畏三、沈先定及苏区一人。政治局则可考虑瞿秋白、李维汉退出，同时补入王明、王克全、陈郁等。

在 30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远东局的意见自然没有引起任何异议。需要稍加说明但未必应当加以重视的是，第一次参加这样会议的王明，在会上倒是说了几句谦让的话，说“我的工作能力不够，还应到群众中去学习”，故“不同意我自己做中委与政治局委员”。沈泽民也觉得：“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不应到政治局”。让人感到惊奇的倒是一向对王明等人颇多反感的向忠发的发言，他明确说不同意王明的说法，说王明参加政治局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对过立三路线，而且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有进步与发展，工作上也显示出有相当的经验，增加这样的同志才有助于加强中央指导的力量。当然，有类似看法的人在会上并不只向忠发一人。

舆论都造到了这种程度，不满 27 岁，回国后从事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跃入政治局，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了。

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

王明是怎样入选政治局的呢？他是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争议人物吗？关于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误传不少。而第一个披露四中全会记录的李维汉的回忆录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可以算作始作俑者。那就是，回忆录把参加四中全会的“国际代表”说成是米夫。后来著作，凡是谈到四中全会的，几乎没有不误入歧途的。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他回忆的引述而对四中全会情景大加发挥的纪实作品了，那里面错的就远不止一个米夫了。

参加会议的那个国际代表是个什么人呢？他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新来的德国毛子，名叫艾伯特。在俄国档案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用德文写的对会议的总结性的发言。

既然主持会议的不是米夫，我们自然也不必像有的纪实作品那样去想象他为王明的入选费尽了多少唇舌。其实，整个会议集中争论的只有两点，一个是开紧急会议，还是开四中全会；一个是彻底否定现中央，重新改选，还是依据远东局的名单只做部分调整，何孟雄、罗章龙、袁乃祥、韩连会、王凤飞、史文彬等全总、海总及北方工会的干部大部分赞成前者，反对后者。尽管王明在会上也有长篇大论，但会上几乎没有人把矛头对准王明。

最足以反映出会议气氛的是选举。自艾伯特提出选举问题开始，双方就激烈交锋，几至白热化。

罗章龙首先表态，“主张彻底改造政治局”，否则不举手。

余飞也要求：三中全会政治上已完全破产，因此三中全会选出的同志完全无效，全部另选。

史文彬、徐兰芝、韩连会、邱泮林等当即响应，韩连会甚至与几个人另外拟出一个政治局名单准备要求表决。会场上顿时七嘴八舌，吵成一团。

徐锡根是这时的大会主席，他不得不放大声音道：大家冷静些，远东局提议的办法不妨碍大家另提名单。

艾伯特也大声主张：停止这样的讨论，照远东局与政治局提的名单先进行表决，同志们也可以自己提出名单来表决。

袁乃祥坚持：三中全会选出来的全部退出，一定要另选！

艾伯特也毫不退让：这样做是不对的，他们中有许多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并且瞿秋白已经承认了他的调和错误，他应当留在中央工作。而李立三的问题则必须要由国际来解决。

王凤飞怒气冲冲地指着艾伯特说：你这样做是要负责的！

罗章龙眼看这种情况，也明确表态：我不同意按照远东局的名单进行选举，干脆国际代表指

定好了，我们放弃表决权。

艾伯特不理他，要徐锡根就这一有争论的议题付注表决。表决结果，赞成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全部退出去的 11 票，反对的 15 票，袁乃祥、罗章龙等人的意见被否决。罗章龙、史文彬、王凤飞等人强烈反对这种作法，罗干脆气鼓鼓地站起身来要退出会场，顾顺章一把把他拉住，连劝带拽地把他又拖回到座位来。但罗仍旧冲着艾伯特喊：你指定好了，不必表决了。

艾伯特也严厉地表示：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赞成的可以举手，不赞成的可以不举手。

但韩连会仍坚持：由国际代表指定好了，不要表决了。何孟雄、史文彬、罗章龙、余飞等也都不满地随声附和。

艾伯特开始使出杀手锏。他不动声色地说道：这位同志的话六个月前我们也听到过，那是李立三说过的，但那是对共产国际的冒犯，是轻率的。现在又有同志这样说话，这是李立三的作法，同样是对共产国际的一种冒犯。我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方式讲话。我以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要求马上将名单付注表决。

艾伯特的话顿时让会场冷静下来了许多。周恩来重新宣读了名单后，因为何孟雄、罗章龙等拒绝投票，参加投票者只有 20 余人。远东局提名增补的 9 名中委全都顺利通过了。其中留苏学生三人，王明得赞成票 18 票，反对 4 票；沈泽民得赞成票 17 票，没有反对票； 夏曦得赞成票 17 票，反对 1 票。而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引起争论的只有周恩来和卢福坦两人。经表决，以 18 票对 6 票否决了要求周恩来退出政治局的动议，同时以差不多同样的票数通过了赞成增选卢福坦加入政治局的动议。留苏学生加入政治局的只有一人，即王明，没有人提出异议。

王明没遇任何阻力就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他成为政治局常委还经过了一点周折。

四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即 1 月 9 日，远东局召集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等商谈新政治局的分工问题。向忠发首先提议，为加强政治局的政治领导力量，使常委能够多注意一些政治问题，考虑以向忠发、任弼时、王明和张国焘为常委，周恩来因为党内争议较多，建议代理江南省委书记从事实际工作。

对此，远东局明确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提议，分正式常委和候补常委，正式的仍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担任，候补的可考虑王明、陈郁、张国焘三人。但在随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王明是否应当马上回中央工作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王明应当回中央做候补常委工作，而多数认为王明仍应负责江南省委一个时期，等有合适人选再考虑回中央。最后，会议通过了向忠发的提议，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为陈郁、卢福坦、徐锡根。

对于政治局的决定，远东局表示了赞同。但不过一周后，即发现徐锡根、陈郁均卷入罗章龙一派人的分裂活动之中。因此，从 2 月份开始，王明就再度得到提名进入常委了。从这以后，王明渐渐在政治局里，因而也在中国党内，成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了。

在那种崇尚“左”倾教条的时代，把莫斯科的指示和利益看得远比中国革命更重要的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宋庆龄何时加入共产党？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４日晚，因患慢性白血病已经卧床一个多月的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得到通报后，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于１５日一早就赶往宋庆龄住处探望。据说，这时宋庆龄神智尚属清醒，她自知余下的时间不多，因而有气无力地接连三次表示了希望在临终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１）

眼看宋庆龄可能不久于人世，彭真等急忙于当天上午10点半将宋庆龄的要求报告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胡又迅速转告邓小平等政治局领导人。这一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接受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定称：宋“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２）当天下午6时许，即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列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就驱车赶往宋庆龄住处，正式通知宋庆龄这一决定。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前去探望，并祝贺宋入党。只是，宋庆龄这时病情进一步恶化，已经不大能说得出话来了。（３）

在宋庆龄弥留之际宣布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度受到海外个别并不真正了解历史上宋庆龄与共产党关系的人的非议。他们甚至对宋庆龄是否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表示怀疑。其实，众所周知，宋庆龄自二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追随共产党。还在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前，她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地或者秘密地协助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以后，她更是中国共产党十分信任的朋友，相继担任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多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几十年追随共产党，她不希望加入共产党，那才是咄咄怪事呢。值得一问的到是，宋庆龄何以到临死前才提出入党问题？

在中共中央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５日的决定中，明确提到宋庆龄“多次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已经公布的材料看，只有一份回忆提到，１９５７年４月宋庆龄曾经向前去探望她的刘少奇提出过入党的要求，当时，由于中共中央认为宋“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没有批准宋庆龄的要求（４）。此外，我们再未见到其他更直接的材料反映宋庆龄曾要求入党。这多半也正是引起海外一些人产生狐疑的主要原因。不过，从新近公开的一份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宋庆龄不仅早有入党要求，而且在事实上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也就是说，宋庆龄并不是在１９８１年临去世前才初次加入共产党的。她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加入过共产党了。

这份文献，是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位代表，在１９３４年５月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负责人谈话的备忘录。在谈话中，他详细说明了当时在中国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内部的矛盾和秘密工作屡遭破坏的情况。谈话的最后部分特别提到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与宋庆龄的关系。报告

人称："关于孙新林（孙夫人）的问题。她是个好同志，可以留在党内，但是，把她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是代表（指共产国际此前派驻中国的政治代表）提出接受她入党的。她愿意献出一切。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５）

在这里可以看出，还在１９３４年春天以前，宋庆龄实际上就已经加入共产党了。只不过，她入党并没有经过当时的中共中央或中共在上海的秘密机关，而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直接发展的。有过这种经历的在当时远不只宋庆龄一个人。共产国际当时直接负责中国问题的远东局成员对她的工作和忠诚评价很高。只是，当时秘密吸收她加入的是共产国际，即所谓世界共产党。而在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很长时间并不清楚宋庆龄的这一特殊身份，也没有她入党的任何记录，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仍然要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来，并且直到临去世前才正式取得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称号。

当然，关于宋庆龄被共产国际代表吸收入党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详实的档案材料可以具体予以说明。我们甚至还搞不清楚她入党的确切年代。不过，考虑到上述备忘录中报告人提到，吸收宋庆龄入党的那位共产国际代表在１９３３年底以前已经奉召回国，大致可以相信，宋庆龄入党的时间应该更早一些。从廖承志回忆１９３３年５月初宋庆龄代表共产国际与他秘密接头的情况看，宋庆龄的入党时间似乎还应当再早一点。因为，从廖承志这个每一分钟都记得清清楚楚的片断回忆当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宋庆龄当时不仅已经成为共产国际的秘密接头人，而且明显地受过某些秘密工作的训练，正如上述报告所说："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

据廖承志回忆，这件事发生在１９３３年５月间，当时他刚刚从英国巡捕房被保释出来。宋庆龄突然神秘地来到他家与他秘密接头。她巧妙地支走了廖承志的母亲，她自己的挚友何香凝，找到了单独与廖承志谈话的机会，明确告诉他说："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廖承志一时有些惊异地望着宋庆龄。

"国际！"宋庆龄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廖承志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回答说："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廖承志母亲房间走去。

廖承志飞快地在一张纸条上写出名单，只十分钟，宋庆龄就出来了。她接过纸条，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先后同何香凝、廖承志道过别后，就匆匆离开了。

廖承志写道："尽管过了将近五十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６）

不难判断，这个时候代表"最高方面"来秘密接头的宋庆龄，已经加入共产党了。

（１）见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６月２日。

（２）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６日。

（３）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７日。

（４）见《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６月２日。

（５）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５１４，目录号２，卷宗号２２４。

（６）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５月２９日。

抗战前夕陈立夫赴苏秘密使命失败及原因

在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曾积极与苏联谈判，谋求与苏联结盟；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界舆论特别是国民政府又曾再三推动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抗日。而中苏之间最终只订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虽曾一度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以种种原因终未出兵助战，致使本来同受日本战争威胁的中苏两国，只有中国一国陷入到旷日持久的对日作战之中。

苏联为其自身利益考虑，自然不愿卷入中日冲突，与日本为敌，但以战前日本北进南下方针未定之时，深惧日本威胁之苏联又孰知其必定不会与中国结盟？外交运用，存乎于时机与策略的机敏掌握，若能恰当把握时机，灵活运用，焉知不能拉苏联以挫日本？

事过近六十年之后，查阅俄国档案可以看出，中苏两国在１９３５年底至１９３６年间确乎存在过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机会。陈立夫秘密潜赴柏林"蜇居"待命，准备赴莫"商讨军事同盟"，其实并非国民政府之一厢情愿（１）。事实上日本在夺取中国东北之后，步步侵占热河、察哈尔并迅速深入绥远，沿苏蒙边界对苏联形成包围态势，也使当时的苏联政府万分紧张，担心其有进一步包围和进攻苏蒙的企图。陈立夫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发生之后奉命赴苏谈判"军事同盟"，事实上正是苏中两国政府这时在对日问题上相互需要的一种结果。只可惜，这一机会竟因我策略运用不够灵活而失之交臂。

苏联曾愿意与我军事互助

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始终在寻求大国干预，避免与强大的日本爆发全面战争。由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最初很明显地包含着进一步进攻苏联的意图（２），同时苏联这时也仍在暗中支持中共以武力反抗国民政府，蒋介石当然不打算向苏联求助（３），国民政府这时只是千方百计地推动国联和英美等西方大国来主持公道，试图以此来阻止日本南进。但不论蒋介石对苏联抱有怎样一种复杂的心态，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面对日本的共同威胁，中苏两国由于相同的利益需要，已经开始努力恢复已经中断了几年的两国外交关系了，双方甚至还开始讨论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４）。只不过，有关互不侵犯条约的商谈无法取得应有的进展，国民政府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这时明确讲：“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只有在（苏联）成为抗日可靠保证的情况下才有价值”（５），相反，国民政府中这时不仅没有人相信能够指望苏联帮助自己来抵御日本，而且许多人一直在努力促成中日两国的妥协，或多或少地寄希望于日本转而对外蒙发动进攻，促成日苏之间的对抗和冲突（６）。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国民政府对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并不热心。以至国民政府的领导人表面上一再讲，缔约商谈无法深入是由于中方要求苏联公开承诺支持中国抗日，苏方必欲坚持中立立场，而苏联大使的印象却是：“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决定对第三国政府可能持何种态度的那些条款上，而是在那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和适用于国内局势的条款上”（７）。换言之，苏联方面注意到，蒋介石等人虽然不满意苏联必欲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但他们更重视的，多半还是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如果后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两国互不侵犯条约乃至苏联方面提议的有关贸易协定的谈判，在蒋介石等人看来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到了１９３４年夏秋之后，蒋介石的认识多少有了一些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事实证明，西方大国既无帮助中国抵制日本之可能，日本对中国之入侵也丝毫不因其有攻苏企图而减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为担心的共产党在军事上已经被打败，一时不再能对国民政府构成威胁。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或多或少地开始设想联苏抗日的可能性了。他这时无疑已经感觉到，要想制约和牵制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与同样受到日本侵略威胁的苏联建立密切联系，争取苏联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狂妄的日本军人不能不有所顾忌。

在与苏联中断了外交往来数年之后，蒋介石于１９３４年秋天第一次派蒋廷黻作为自己的非正式代表赴苏访问，这反映出蒋介石当时已经开始有了初步的联苏准备（８）。当然，从蒋廷黻访苏期间与苏联外交人员的谈话内容看，蒋介石这时还没有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打算。他这时首先关心的还是，在他从１９２７年与苏联公开翻脸之后，俄国人是否仍然记恨自己。（９）

蒋介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打算与苏联缔结军事互助协定呢？根据莫斯科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政府最早是在１９３５年7月初开始向苏联政府比较明确地提出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的。根据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molov）７月４日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于前一天突然来访，声称要向大使介绍察哈尔的局势。孔祥熙称，日本军队已经在察哈尔安营扎寨，准备迅速渗透绥远，其目标是想要发动对外蒙古的进攻。孔祥熙明确提出：在目前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同中国签订互助条约？”（１０）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提议，苏联方面无疑颇感意外。正如其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当面向孔祥熙

所解释的：苏联对此感到惊异。“中国政府慑于日本压力而拒绝互不侵犯条约，担心有人评说而拖延贸易条约的回答，可是忽然间谈起互助条约来了。”要知道，“互助条约的签订应以良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即在贸易条约、互不侵犯条约都早已成为定局的情况下才能谈及。”（１１）更何况，苏联方面这时不断获悉南京政府始终在或明或暗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妥协谈判，甚至与之讨论缔结反苏军事同盟问题，照苏联大使的说法，只要国民政府继续它同日本的谈判，它就绝不会认真地看待它与苏联的关系。既然如此，它当然要怀疑蒋介石此举的动机。

鉴于苏联方面毫无反应，蒋介石决定亲自出面。三个月后，即１０月１８日晚，根据孔祥熙的要求，蒋介石亲自到孔宅与鲍格莫洛夫秘密会晤。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蒋介石解释了苏联政府的立场，表示苏联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并主张通过签订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来达到这一目的。但蒋介石回答说，他毫无疑问赞成缔结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然而问题是，“这些条约都只是表面举动，他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他在进一步回答鲍格莫洛夫关于何为“非表面性”协定的问题时强调指出，他不是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来谈论这一协定，而是以中国军队总司令的身份来提出这样的建议的。他告诉鲍格莫洛夫，日本政府确实向中国要求缔结关于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军事同盟，从日本人的观点来看，这当然是包括反对苏联的目的在内的。他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同意这样的建议。但他同时提出：“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１２）

在这里需要注意到蒋介石突然一反常态地提出缔结两国军事互助条约的特定的时间和背景。

７月初，即孔祥熙向苏联大使提议缔结军事互助条约的时候，正是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放弃对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际控制权的关键时刻。尽管孔祥熙在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中仍旧突出强调日本此举的意在通过夺取察哈尔，进一步深入绥远，“然后开始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１３），但蒋介石更担心的恐怕并不是蒙古。在日本方面于１０月７日进一步提出要中国听任日本摆布的所谓“广田三原则”之后，蒋已经再清楚不过地意识到，至少日本现在的进攻目标还是苏联，而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或者答应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然要一步步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拒绝日本人的要求，那就必须准备冒与之全面冲突的危险。显然，蒋介石只能选择后者，为此只好下定联苏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方面的处境。日本制造华北事变表面上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但日本夺取察哈尔，并且全力渗入绥远的行动也同样严重地威胁了苏联的安全。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苏联方面一直对日本进攻苏蒙的危险保持着高度警觉。而日本方面一面要求南京政府与之缔结反苏军事协定，一面在军事上沿着苏蒙边境迅速延伸其对苏蒙的包围圈，苏联人自然很难相信日本人这种行动不是针对自己来的。不论中国方面的警告动机如何，苏联方面确实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的真实意图深感紧张。正因为如此，在反复研究之后，苏联政府这时对于蒋介石的建议竟作出了相当积极的反应。在将近两个月之后，即１２月１４日，苏联外交部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其中肯定地回答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而在两周后的另一次由信使递交的更详细的外交指示中，它更进一步表示：苏联政府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也就是说，“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

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１４）

蒋介石有先决条件

苏联政府正式同意与国民政府具体讨论并签署军事互助协议，这对于正在面临着日本侵略巨大压力的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１２月１９日，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的会面中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不仅当即表示了对苏联政府的感谢，而且急切地希望进一步得知苏联政府对于这一谈判的具体意见。他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求苏联方面立即安排南京驻苏武官邓文仪与２０年代曾来中国帮助过他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Galin，即布留赫尔 Bluher）将军进行会面，明确表示希望能够与加伦将军再度共事（１５）。仅两天后，即２１日，邓文仪就急急忙忙赶回莫斯科。又过了两天，即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翻译张冲，化名江淮南，以驻德大使程天放随员的身份为掩护转道柏林，也准备迅速转往莫斯科。显而易见，此种举措正是对苏联方面赞成两国进行军事互助条约谈判的一种反应，陈立夫则是蒋介石派去莫斯科进行此项谈判的秘密代表。只不过，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将陈立夫动身之事通知苏联大使，他也不想让陈立夫直赴莫斯科，而有意要他绕道欧洲，在柏林停留，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蒋介石所以如此安排，自然另有缘故。

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看一看蒋介石１２月１９日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内容或许会对我们了解蒋此时的想法有所帮助。

在１９日的谈话中，鲍格莫洛夫一上来就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关于愿意与南京具体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决定。引人注目的是，蒋介石在得知这一决定后着重强调的并不是如何具体安排谈判的问题，反倒是回过头去大谈孙文越飞宣言的重要意义，强调“必须把确定孙文、越飞宣言作为苏中关系的基础”，即是说苏联必须重申他们赞同宣言中关于“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条款（１６），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蒋介石表示，他很高兴苏联政府愿意与国民政府谈判军事互助协定问题，这反映出苏联政府愿意支持在南京政府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因为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中国能够顺利地进行抵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他希望“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言外之意，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放弃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劝说后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言行，归顺国民政府。为此，他特别解释说，“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象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只要共产党不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他就可以不采取以往那种“严厉措施”（１７）。不难看出，苏联方面同意就中苏军事互助协定进行谈判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重新密切两国关系的前景已经展露出来，但越是如此，他也就越是对苏联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充满疑虑，担心中苏之间的接近会便利国内共产党势力的重新壮大。

蒋介石对中共的恐惧由来已久。他１９２７年底下决心“要对俄绝交”，正是由于他确信，苏联是中共暴力革命政策的秘密支持者（１８）。而他在１９３４年秋之所以亲自派蒋廷黻去莫斯科重新开启亲近之门，又正是由于南京军队在与江西红军的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确信中共在军事上已经不再对国民政府构成直接威胁之后。尽管蒋介石这时对自己在军事上的胜利信心十足，但他毕竟清楚，中共的力量仍有壮大的可能，只要苏联存在一天，要彻底消灭中共就绝非易事，何况日本侵略步步加深，非取得苏联的援助则南京现有之统治都将难以维系，目前也不容自己花太多的时间和力量来集中对付共产党了。所谓“两害相权

取其轻”。在中共已经极大削弱，日本吞并华北迫在眉睫之际，首先对付日本已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照蒋介石的想法，共产党始终是“心腹之患”，而日本侵略不过是“疮疥之痛”，如果不能根本避免中共再度成为可怕的力量，联苏抗日适足养虎为患，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蒋介石虽欲联苏抗日，他的前提条件却是：首先必须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使之彻底放弃武装对抗的政策，服从南京政府。依据这一原则，蒋介石这时开始明确提出“政治解决共党问题”的设想，他显然相信，在中共军事上遭受惨败，而苏联亦准备公开与他携手之后，通过政治谈判的方式来达到使中共服从于国民政府的目的已完全可能。

蒋介石关于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提出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得而知（１９）。但可以肯定的是，还在他得到苏联政府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正式答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做此努力了。俄国档案显示，１２月中旬之前，蒋介石已经得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公开呼吁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共同组织全民族的抗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消息。正在国内的邓文仪立即从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找来载有这方面消息的苏联报刊，找人译成中文后送给蒋介石。蒋读过之后，大感兴趣。（２０）由于一贯相信中共政策背后为苏联作用，蒋介石显然认为中共政策的这一转变反映了苏联政府的态度，说明苏联政府已经注意到南京所取得的稳固的统治地位，故而开始促使中共改变激进革命政策，转而支持中国统一。鉴于此，蒋介石不失时机地要邓文仪与陈立夫先后拜会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打探苏联政府的确实意图，一方面透露国民政府有意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积极态度。特别是在得到鲍格莫洛夫关于苏联政府准备与之谈判军事互助协定的正式通知之后，蒋介石更是估计苏联方面有牺牲中共之可能，而鲍格莫洛夫１９日关于“苏联拥护中国的政治团结”，并“欢迎中国得到统一”的说法（２１），更使蒋介石充满幻想。因而，他当即要求邓文仪不等过节，马上于２１日从上海动身赶往莫斯科，利用邓同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学的同学关系，与王明就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进行接触（２２）。而为了迅速取得突破，他这时还特地选派负责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陈立夫化名赶往德国柏林，就近指导邓文仪的谈判，并准备于国共谈判取得接近之后立即开始根据南京的指示与苏联政府接洽讨论军事互助条约问题。

从蒋介石选派既无外交经验、又无军事经历的陈立夫去苏联谈判如此重大的两国军事互助问题，不难看出蒋介石这时在对苏关系问题上首先看重的究竟是什么。正是由于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怕仍旧制约着一切，因此，他这时并不特别看重缔结两国军事条约的具体方式以及各种技术问题，他首先看重的仍旧是要一劳永逸地根本解决共产党问题，然后才是谈判互助条约的问题。陈立夫之受命赴苏，正如鲍格莫洛夫此前所说，与其说是同苏联政府商谈针对日本的条约，倒不如说是去奠定未来中苏关系之政治基础。在蒋介石看来，既然苏联政府肯于同南京签订军事互助条约，那么它也必定会同意由自己来统一中国，只要苏联愿意出面说服中共服从自己的统治，一切问题自然都应当可以在莫斯科迎刃而解。不过，蒋介石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儿，他采取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邓文仪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谈判，在达到预期目标后，第二步再由陈立夫出面与苏联政府秘密商洽军事互助问题。后者须视前者的结果为转移。不仅如此，蒋介石既没有告诉苏联大使邓文仪赶莫斯科的真实目的，也没有告诉预先通知邓文仪陈立夫将前往就近指导。甚至，尽管蒋介石已经授意陈立夫当面向苏联大使表示过国民党中央准备派代表前往苏联的愿望（２３），但对于陈立夫动身经欧洲“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的情况，蒋介石对苏联方面却秘而不宣。显然，蒋介石对于邓文仪在莫斯科与王明谈判的结果此时尚无十分把握。鲍格莫洛夫１９日的通知和谈话虽然给了蒋介石某种乐观的印象，促使他忙不迭地把邓、陈二人派了出去，但在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关于支持他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确实承诺，或与中共取得正式妥协之前，他看

来并不认为马上与苏联讨论缔结军事协定是适宜的。

蒋介石突然中断谈判

关于邓文仪这次赴苏的经过及其使命，在邓自己的回忆中也曾两度谈到过。但同陈立夫在历次回忆中没有谈到其赴苏使命中有着与中共谈判的使命一样，他同样没有谈到他此次莫斯科之行与蒋介石要他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一事有关（２４）。具体记录了这些谈判情况的，是目前保存在俄国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几件当年的谈判纪要。这些谈判纪要证实，邓文仪于１９３６年1月３日到达莫斯科，而后立即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代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见面，但未得消息。邓不得不转而找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请其代为介绍。从1月１３日开始，到2月２３日，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和王明总共进行了四次具体的商谈。从这些谈判纪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知陈立夫到达柏林后的一些情况。

根据1月１３日和１７日的谈判纪要，邓文仪清楚地讲述了国民党在国内是如何寻找共产党进行接触的，和他这次来莫斯科的具体使命。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的委托，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间合作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过共产党的关系，进行了一周的时间，全无结果。后来，我们曾想到四川和陕北直接去找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联系，恐怕进不去。最后蒋先生看到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次大会上的讲演，以及最近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即派我来找王明谈判彼此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过几次高级干部会议，蒋先生亲自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大家全都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以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条件，具体的合作条件，双方当然还要请示。（２５）

综合邓文仪与王明几次谈判所讲述的情况，可知邓文仪最初确不了解蒋介石决定派陈立夫出面指导这次谈判的情形，相信也不十分清楚蒋介石急于与苏联谈判军事同盟的内情。邓文仪谈话的中心集中在劝说共产党接受蒋介石关于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国共合作条件上，突出强调蒋介石赞同国共合作的诚意，但与此同时，邓文仪也反复说明了南京方面联苏抗日的设想。据邓文仪说，国民政府要抗日的决心已经定了，但抗日以后武器弹药包括粮食储备和各种物资供应都打不了持久战，蒋先生说过，我们的军事装备对日作战最多只能支撑三个月，因此非想办法找到援助不可。国民政府的外交，对英美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不救近火，并且一旦中日爆发战争，日本就会很快占领和封锁中国的海上交通，使中国无法从英美获得军事装备，中国那时唯一的武器来源就是与中国西北地区接壤的苏联。南京已经得到情报，日本今年（１９３６）肯定要进攻外蒙，所以我们更有理由要求苏联与我们合作，让他们帮助我们军火和粮饷，这一点非常重要。邓文仪断言，苏联方面也对日本进攻外蒙的消息感到担心，并对南京表示了他们一定援助外蒙的决心。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中苏两国不能共同作战呢？可是，苏联政府对南京要求其提供援助的答复却是：他们可以提供援助，前提是国联同意采取集体行动。邓文仪明确表示，他的任务就在于，要设法说服共产党承认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促成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并经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了解苏联的真实意图，推动苏联援华。（２６）

邓文仪关于国共合作和联苏抗日必要性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蒋介石，尚有研究之余地（２７）。但不难判断的是，邓文仪关于争取苏联援助的原因的解释，多半也是这时蒋介石

身边那些力主联苏抗日的人的基本看法。当然，指望通过中共代表，或者通过和共表示，来影响苏联援华政策，在这时多半还只是一种奢望。

对于邓文仪的表示，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的反应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拿回代表团去讨论，然后写报告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请求指示而已。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表示了愿意谈判的意愿。然而他明确提出，由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均在国内，因此，两党谈判应当也只能在国内进行。值得注意的是，邓文仪在２２日的谈判中出人意外地当即表示赞成，他甚至告诉王明，他已经收到蒋介石的来电，同意他和中共代表一同返回南京进行谈判。双方因此迅速商定，中共代表团派潘汉年为代表，由邓文仪陪同，于２５日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海参崴，然后乘俄轮前往上海，再转去南京谈判（２８）。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决定并十分不符合蒋介石要在莫斯科解决中共问题的初衷，而且也完全没有考虑到陈立夫已经等在柏林准备就近指导莫斯科谈判的重要背景。

蒋介石何以会同意王明提议回国谈判？相信邓文仪在这一点上尚不敢假传圣旨，自作主张。因此，可以看出至少在１９３６年1月２２日以前，蒋介石对国共谈判颇抱乐观态度，相信中共方面不能拒绝他的条件，因而同意具体谈判可以回到南京去谈。但是，就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即１月２３日，邓文仪却突然匆忙求见王明，说明蒋介石紧急来电要他取消同中共代表同去南京谈判的计划，马上改去柏林见李融清，准备参加李融清所进行的谈判。据邓文仪声称，李融清不仅负责与苏联的谈判，而且还要直接参加与莫斯科的中共代表的谈判。而蒋介石已明确要求，必须首先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再拿着协议到国内苏区去签字。（２９）

邓文仪真的去参加陈立夫在柏林主持的对苏联的谈判了吗？非也。据邓文仪回忆称，2月间接到电令前往德国柏林，“等候会见我国派赴欧洲的高级代表，……会商重要外交问题”，但未曾见到陈立夫。在柏林会同南京驻欧洲各国武官开了五天会后，又接令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会见陈立夫，“但在布达佩斯住了三天之后，仍未得到消息，第四天我在一家书画店买画，刚巧遇上陈立夫先生也在那里买画”。至于谈判事，无论是重要外交问题，还是国共关系问题，从此再未提起。（３０）陈立夫的回忆与此大同小异。据陈说，蒋介石这时也给他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说，赴苏时机尚未成熟，命令他离开柏林到欧洲其他国家去走走。因此，邓文仪按照蒋令赶去柏林之后，自然见不到陈立夫。直到数日后陈立夫通知他和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到布达佩斯会晤，他们才有机会在布达佩斯见了一面。但所谈内容则与中苏谈判或国共谈判没有太多关系了。（３１）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１月２２日，即邓文仪在莫斯科接到蒋介石要停止与中共代表谈判，改赴柏林电令的当天，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曾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明确告诉蒋介石：苏联政府“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鲍格莫洛夫并且拐弯抹角地劝说蒋介石立即派遣陈立夫等人前去莫斯科进行谈判。他为此特别询问蒋：“前不久陈立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告诉他陈立夫已经等在柏林的情况，而且明显地不再提及与苏联政府进行军事谈判的问题，他对鲍格莫洛夫的提议回避搪塞，根本不作正面答复。（３２）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蒋介石这时的态度与一个月前已经发生了１８０度的转变。无论是对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国共谈判，还是准备举行的与苏联关于军事互助问题的谈判，他都突然间

不感兴趣了。

“安内”高于一切的代价

邓文仪在与王明的谈话中曾明确提到过，蒋介石在联苏对日问题上已经有具体的时间表，他准备花一年时间，即在１９３７年6月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三个月之后即开始对日武装抵抗。事实上，蒋之估计确实不错，一年之后中日冲突全面爆发，因此，若能依照原定计划，预先同苏联实现结盟，不论在战争发生之后，还是在局限战争范围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都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从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看，苏联人同意与中国谈判军事互助条约，同意相互承担军事援助义务，也仅此一次。因为，只是在这时，苏联政府对日本向中国察哈尔和绥远扩张，逐渐形成对外蒙和苏联的包围态势才真正充满了危机感，搞不清日本是否真的有计划很快进攻外蒙和苏联，因此，它也只是在这时一度想要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事实证明，苏联方面的这种危机感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蒋介石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机遇，但却未能牢牢地抓住它。随着有情报表明日本尚未准备进攻外蒙，苏联政府很快就放弃了与中国结盟的想法。换句话说，这是当时处于华北事变严重危机中，试图避免遭受战争重创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结盟的几乎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蒋介石为什么会突然间改变了迅速与苏联商谈军事互助协定的想法呢？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留心一下蒋介石１月２２日与苏联大使的谈话内容就不难明白。

这次谈话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得知苏联政府愿意进行军事互助协定的谈判之后，蒋介石就急切地希望知道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意见，特别是想要知道苏联政府将怎样处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鲍格莫洛夫当即向莫斯科报告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一周之后，即１２月２８日，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斯托尼亚科夫就写信给鲍格莫洛夫，详细说明了苏联政府研究之后所作出的答复意见。这封通过外交信使专程递送的信件，到达南京苏联大使馆时已经是１９３６年1月２１日了。

１月２２日，根据鲍格莫洛夫的要求，蒋介石再度与他进行了秘密会晤。这次晤长达两个小时的时间。鲍格莫洛夫首先传达了莫斯科来信的主要内容。其要点包括如下：第一，苏联政府支持中国进行抗日解放战争，并决心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为此，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的具体问题进行谈判。第二，既然苏联准备承担如此重要的义务，它就需要了解南京方面有什么样的抗日计划，它有多少军队，以及它准备对苏联承担什么样的义务，等。第三，苏联政府相信，国共两党应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方面不能了解，“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红军，那么他怎么安排抗日”。第四，蒋介石如果想要与中共达成统一战线，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并且可以在莫斯科进行这样的谈判，但苏联政府不会扮演调停者的角色。（３３）

苏联政府的这一答复让蒋介石深感意外与失望。在整整１２０分钟的谈话中，双方只花了很少的时间谈到拟议中的中苏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大部分时间都被蒋介石用来说明苏联为什么应当劝告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问题。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说明：“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鉴于鲍格莫洛夫反复解释苏联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他干脆带有明显暗示地声称：“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

军施加压力，那么苏联政府由此所表明的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必定会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其言外之意，如果苏联政府不能这样做，它就不能赢得南京政府的信任。由于蒋介石完全不听鲍格莫洛夫的解释，坚持劝说苏联政府出面影响红军，鲍格莫洛夫不得不改变态度，严肃地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据鲍格莫洛夫事后报告说：“我看到谈话继续朝着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下述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政府。历时２小时的会谈有８０分钟用来谈这个内容”。（３４）

蒋介石之所以坚持要求苏联充当国共之间的调停人，坚持苏联必须劝说中共放弃武装，服从南京，根本上仍旧是对苏联与中共的关系心存疑惧，担心联合苏联可能带来可怕后果。这也就难怪，当鲍格莫洛夫曲折地表示苏联政府不能帮助中国方面解放那些已经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时，蒋介石明确表示，他只希望条约能够规定，当日本入侵蒙古、绥远和山西等西北地区的时候，苏联政府能够承担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义务（３５）。显然，蒋介石对苏联的援助仍有颇多疑惧。正因为如此，苏联政府对他所关心的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意见的答复，以及鲍格莫洛夫拒不妥协的态度，更加剧了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关系的恐惧。蒋介石似乎突然发现他在这之前对苏联意图的估计完全错了。几乎就在一天以前，蒋介石还似乎充满自信，相信与莫斯科中共代表的谈判能够得出预期的结果，因而同意将进一步的谈判移到南京来举行。而现在，他突然发觉，苏联不仅不准备为了同南京的结盟而放弃它昔日的盟友，甚至对遭受严重打击的中共红军的力量仍有较高的估量。这意味着，它仍有可能在背后支持中共。这种前景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无论如何不可想象。一旦同苏联签订了军事互助条约，当日本对西北发动进攻，苏联军队根据条约出兵中国助战之际，有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帮助那里的红军呢？多半是考虑到这种情况，蒋介石在与鲍格莫洛夫会谈的当天晚上就改变了主意。他不仅很快打电报通知邓文仪停止与中共的谈判，而且致电等在柏林的陈立夫，说明对苏谈判时机尚未成熟，要其暂时离开柏林他去。

当然，蒋介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尽快实现苏联谈判缔结军事互助协定的设想。这也就是蒋介石一时并没有下令召回陈立夫，反而要陈立夫周游欧洲，等候机会的原因。但蒋介石的希望多半只是寄托在苏联政府对他２２日谈话的答复上，而这种希望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在莫斯科随后给苏联大使的指示中甚至更进一步强调说：苏联政府不仅不能承担劝说中共服从南京政府的责任，而且不能接受蒋介石关于必须以孙文越飞宣言为中苏关系的基础的建议，因为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样做“会给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背后捅上一刀。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３６）即然如此，陈立夫的使命自然无从实现了。

这时直接导致陈立夫使命夭折的，主要有两大因素。

其一是蒋介石在联苏问题上的犹豫与反复，再度引起了苏联政府的疑虑。考虑到这时日本西进意图愈发明显，外蒙古处境可虑，南京政府对日本所提广田三原则又态度含混（３７），苏联政府等到２月间，终于按耐不住，决定不管南京政府的意向如何，先直接与外蒙古政府缔结盟约，使日本不敢对外蒙古轻举妄动。因此，苏联政府很快就同外蒙古当局进行了闪电般的谈判，于３月２９日正式宣布两国订立了《苏蒙互助同盟条约》。此举毫无疑问使本想与苏联缔约的南京政府在政治上陷入极大的困境。４月７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不得不发出照会给苏联政府，抗议苏蒙互助条约的签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其二是因为自2月下旬以来红军在从陕北东征山西所显示出来的军事实力。这时红军在陕北原本只有一万余人，但它不仅连连挫败了其周围十几万国民党军的围攻，而且还大举越过黄河，向临近华北日本势力范围的山西省发动了强有力的进攻，占据了大片的土地。再加上两个多月之后，川康黔边数万红军也浩浩荡荡向西北杀来，要与陕北红军汇合，表明中共红军又有进一步壮大的可能，这种情况不能不极大地刺激着蒋介石。与这时的外蒙古问题相比，在对苏政策中中共问题无疑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因此，尽管因苏蒙条约而引起的中苏紧张关系一个月之后就已经缓和了，但蒋介石丝毫没有开始与苏联谈判的愿望。

正是基于上面这样一些情况，蒋介石注意到，继续让陈立夫留在欧洲短时间内已毫无意义。因此，这一年的4月，他终于下决心把陈立夫召了回来。

大约在１９３６年3月前后，蒋介石已经接通了同陕北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关系。这时，他干脆撇开苏联，直接开始与共产党方面进行秘密接触，决心自行解决共产党问题。因此，鲍格莫洛夫一连几个月都再也听不到蒋介石提起缔结军事互助条约问题了，恰恰相反，他注意到："蒋形成了一个看法，若不同红军预先谈妥，就不可能同我们达成协议。"不仅如此，随着红军重新显示出其生命力，蒋介石甚至不止一次公开表示：红军是他目前最大的敌人，无论联俄或抗日，都必须首先"完全抹去红军这个问题"。俄要我与中共合作，而我要他投降，如中共不答应，则决不抗日，如俄要我容共，我决不联俄。（３８）由此不难看出，只要中共的势力仍旧能够形成威胁，只要苏联不愿出面劝说中共服从南京，蒋介石就不可能同意与苏联结盟。因此，陈立夫赴苏使命之失败，纯粹是一种必然。

令人惋惜的是，１０个月之后，当蒋介石平息了两广事变，紧接着又腾出手来在甘北黄河东岸取得了对红军作战的重要胜利之后，他虽旧话重提，想要再谈中苏军事互助条约问题，在苏联方面却已是事过境迁了。不论南京政府此后怎样坚持，反复提议，苏联政府始终都是婉言相拒。到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陷入中国战争泥沼，这样的可能性就更是不存在了。最后，虽然国民政府曾经再三表示不愿意签署一个不痛不痒的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最终还是不得不在１９３７年8月间同意讨论并签署了这样一个事实上并无太大意义，也丝毫不为他们所喜欢的条约（３９）。不论对苏联出兵相助的可能性作何种估计，总之，一个可能迫使日本三思而行，甚至可能促使苏联对中国抗日承担更多义务的重要外交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放弃了。

（１）根据陈立夫的回忆，蒋介石１９３５年圣诞节前夕派其"赴苏进行秘密交涉"，待到德国柏林之后，又电告"为时尚早"，可到欧洲一游，等陈立夫在欧洲几个国家游了几个月之后，又电示改变计划，命其"返国与苏俄鲍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从陈回忆其回国后与鲍格莫洛夫的谈话看，似乎苏联政府这时对中国关于"订立军事同盟"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兴趣。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９页。

（２）自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以来，它就始终以苏联为第一假想敌，准备实行北进战略，彻底征服苏联，为此不仅拒绝苏联关于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提议，而且几度制定"对苏作战计划"。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　　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３）蒋介石讲，当时对联俄问题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是担心“使中国重蹈十五年广州之覆辙”，第二则是搞不清日本究竟是准备南进还是根本就打算北进攻苏，担心联俄抗日，反“促使日本南进”。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７１页。

（４)负责谈判中苏复交的中国外交代表颜惠庆于１９３２年6月２２日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提出复交问题，同时建议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6月２９日，莫斯科通知李维诺夫，苏联政府不反对复交，复交之后即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7月6日，李维诺夫以书面形式将此一决定通知了颜惠庆。见〈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李维诺夫的电报〉，１９３２年6月２９日；〈李维诺夫致颜惠庆的信〉，１９３２年7月6日。

（５）〈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１３日。

（６）在国民政府的代表与苏联代表的谈话中，曾不止一次地提到日本准备进攻外蒙古的问题，断言日本侵入热河，占领察哈尔，多半就是想要进攻外蒙。参见〈加拉罕与颜惠庆谈话纪录〉，１９３３年3月２７日。

（７）同前引注５。

（８）蒋廷黻：〈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台北）《传记文学》第３１卷第５期。（９）《斯托尼亚科夫与蒋廷黻的谈话记录》，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李玉贞译：〈苏联外交文件〉（选译），《近代史资料》第７９号（以下凡引该文件者只注电报名称及日期），第２１０－２１４页。

（１０）（１１）〈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7月４日。

（１２）（１３）〈鲍格莫洛夫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

（１４）〈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鲍格莫洛夫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４日；〈斯托莫尼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８日。

（１５）〈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１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２页。

（１７）〈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１８）见〈蒋介石在上海对于时局之谈话〉，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３日，载《申报》，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但实际上南京政府随后只是决定将苏联驻中国各地之领事及商业机构一律关闭，相关人员驱逐出境。两国正式断交是在１９２９年南京进一步挑起中东路事件之后。

（１９）蒋介石断言，１９３４年底，即对江西苏区五次围剿成功之后，国民政府“一面着

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为此，当时他即指派陈立夫担当这一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任务。但蒋在回忆中明显地将周恩来１９３６年9月1日给陈立夫兄弟的信，误记成１９３５年，同时从国民党１９３５年底开始动员各方面力量寻找中共关系的情况看，可知蒋这里所说的时间多半有误。蒋介石前引书，第７２页。

（２０）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以下简称中心档案），全宗号４９５，目录号７４，卷宗号２７６。

（２１）〈鲍格莫洛夫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

（２２）关于邓文仪启程的时间，见于鲍格莫洛夫１２月１９日的电报。

（２３）〈鲍格莫洛夫致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1月２２日。

（２４）邓回忆与王明见面事有两次，一次在１９３５年夏，说是王明主动打电话约谈的。但从邓与中共代表１９３６年1月的谈判记录上可以看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邓在谈判过程中明确讲，这是他留苏回国后第一次见王明，并且是费了极大周折才找到王的。另一次是１９３６年3月初，说是2月去德国返回莫斯科之后见到中共代表的。这个时间显然也不对，因为据中共代表团的文件，邓文仪与代表团代表的接触只有一次，就是１９３６年１月间的四次谈话，之后再未见过面。因此，邓多半是在回忆中将１月的这次谈判误记到３月去了。见邓文仪：《冒险犯难记》，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６７－６８页。

（２５）同前引注２０。

（２６）同前引注２０。

（２７）据邓文仪回忆，当他把他与王明等人的谈话备忘录报告蒋介石之后，蒋很快来电斥责他说：“你是否吃了毒药，何以前后判若两人？”邓因此被迫提出辞呈。其中原因为何，邓之回忆未言其详，估计应同其关于国共合作的某些说法有关，而不应与其关于联苏问题的说法有关。前引邓文仪书，第７０页。

（２８）同前引注２０。

（２９）同前引注２０。

（３０）邓文仪的回忆在时间和事件顺序上都是混乱的。见前引邓文仪书，第６７－７６页。

（３１）陈立夫前引书，第１９８页。

（３２）参见〈斯托莫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８日；〈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1月２２日。

（３３）〈斯托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

（３４）《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1月２２日。

（３５）在这次会谈中，当鲍格莫洛夫说明，由于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越来越多，中方不能指望苏联能够承担过多的义务，蒋介石对此回答说："中国政府并不强求苏联帮助中国保卫那些已被日本占领的地区，……但是他想可以签署一个条约，一旦日本企图侵占蒙古、绥远或山西，苏中两国政府根据条约承担互助的义务。"这似乎说明，即使在战争的条件下，蒋介石对苏联的帮助仍旧抱有某种戒心。同前引注３４。

（３６）〈斯托尼亚科夫致鲍格莫洛夫的信〉，１９３６年5月１９日。

（３７）鲍格莫洛夫这时曾当面询问蒋介石准备如何应付日本所提出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回答说："日本要求谈判，我们应该同意，因为日本强大。"

（３８）参见〈刘鼎致中央电〉，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２日；〈鲍格莫洛夫致斯托尼亚科夫的电报〉，１９３６年１１月6日。

（３９）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７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曾明确告诉苏联大使：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不需要，甚至不如没有的好。另外，根据俄国外交档案记载，南京方面至少在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７日之后，直至１９３７年8月下旬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夕，曾数度重提订立军事互助条约问题。

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

——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

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肯定者可以历数自 1928 年济南惨案、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其在日记中和讲演中的种种激愤言辞，可以例举蒋指挥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直至 1937 年七七事变起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领导全国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的种种业绩；而怀疑否定者也可以指陈蒋当年如何奉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主导签下屈辱的塘沽协定、"何梅""秦土"协定，甚至可以举证其直至抗战期间仍不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不断与日本秘密接触谈判，寻求妥协的种种事实。

蒋介石抗日，今天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但既然抗日，为何仍会有以妥协换取和平的想法呢？七七事变前国家积贫积弱，四分五裂，日本侵略也以蚕食为主，对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尽力避免全面战争，也许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全国上下一致奋起抵抗，继续秘密寻求和平途径，则多少有些让人不好理解。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化地从"和""战"不两立的观点出发，把妥协等同于投降。但蒋自抗战开始后何以要与日本秘密交涉，这些交涉中有没有丧权辱国的投降行为，历次交涉失败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十分明显，如果我们说蒋不过是在"捉弄日本对华的谍报核心"，并通过"玩

‘和平牌’”以“钓取‘美援’等大鱼”，这是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说蒋仅仅是因为“力争保留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不可得，或受到国民党内外各种抗日势力的强大压力，才没有走上妥协之路，这又是一种看法。[1]而这两种看法是截然不同的。换言之，不弄清楚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之间这些秘密交涉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蒋介石对交涉的真实态度，要想客观评论抗战中的蒋介石，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问题，目前学界依据的史料大都来自中日双方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其中关键性的文献资料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回忆录本身当然不足以为史实之凭据，而过多地依据日方史料来说明这种基本上属于谍报工作的秘史，无疑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憾。尤其这些史料基本上来自于日本目的各异、背景复杂的各式人等，而这些人当年又是从那些身份亦真亦假的中国中间人那里得到的内容半真半假的函电或消息，这些情报是否确实来自于蒋介石，能否真确反映蒋介石的态度和看法，不能不让人怀疑。台湾蒋中正档案的开放，为我们在对照检证这些史料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蒋的抗日态度，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2]尽管蒋档保存的相关史料极不完整，但笔者仍然相信，它们的出现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与过去的说法差别很大的历史讯息，足以促使我们对问题做更深入一步的研究。

关于陶德曼调停问题

抗战前期的中日秘密交涉，头绪繁多，但基本上以日方为主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开始是日本官方为避免战争长期化而采取的两手策略，之后则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战争的长期化开始对战争前景产生悲观情绪，并引发分歧所致。日本军人的狂妄，曾导致日本军方最初并不热心于这种“和平”工作，而是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彻底打垮蒋政权，迅速征服全中国。日军占领南京后，近卫内阁很快于 1938 年 1 月 16 日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再清楚不过地展示了日本军方的这种傲慢心态。[3]日本官方初期的“和平”工作，诸如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诱使国民政府接受中日和谈的努力，也因此而被迫中止。然而，武力征服的结果，日本被迫在中国大陆投入了二十多个师团，总数超过 78 万人的庞大军队，却迟迟不能实现征服的目标。眼看自己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且双方渐成僵持，日本统治集团内自然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估军方以往对华政策的声音。1939 年 9 月欧洲战争大规模爆发，在亚洲有着众多殖民地的英、法两国遭受德国的沉重打击，为延续战争正苦于找不到足够橡胶和石油的日本军方，自然急于想要乘机南进夺取富有这些战略资源的英法两国殖民地。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内部本来就存在着的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把主要军力抽调出来，更成为其统治集团内各派势力必须要突出考虑的迫切问题。可是战争的现实，以及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宣示，极大地堵塞了沟通日蒋关系的渠道。从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前，日本上上下下各派势力秘密出动，分头寻找接通重庆政权的各种关系，即与日本在停战问题上的这种复杂背景有关。

日本对“和平”工作的重视程度，从已经披露的日方史料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据日方史料记载，这段时间里日本方面致力于沟通日蒋关系的主要线索就有五六条，军部、情报、外交各系统，乃至经济界和民间组织，几乎都有人在从事此项“和平”工作。比如直接受到满铁总裁，后出任日本外相的松冈洋右支持的西义显；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曾任日本关东军参谋，太原特务机关长的和知鹰二大佐；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局局长松本重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二课兼第四课高级参谋今井武夫大佐和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驻香港机关负责人铃木卓尔中佐；早年与孙中山及同盟会有过密切关系，

这时以民间人士身份活动的萱野长知、小川平吉等，都曾率相当人员在中日双方间积极谋和。[4]问题是，日方的这种动作对蒋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在这方面，过去的研究较多地利用了经过中间人转述的蒋的谈话，和蒋基于外交目的所做的谈话，但对蒋内心的想法似乎注意不够。这里不妨从蒋对 1937 年秋冬陶德曼“调停”态度变化开始，略作分析与研讨。

蒋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是在 1937 年 11 月上海、太原失陷，抗日军事遭受重大挫折之后。上海、太原失利，意味着整个华北、华东均将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中国对日作战将不得不转入持久战的局面。以中国现有之政治经济条件，持久抗战，难免会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蒋当然希望能够有所避免。[5]但蒋毕竟更具军人性格，深知此时求和必成城下之盟，极端不利。因此他内心十分反感党内高层的妥协议论，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痛斥“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叹息“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6]蒋这时最大的希望其实还是寄托在苏联的援助，甚至是出兵参战的可能上，相信军事的胜利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所以委婉同意接受陶德曼“调停”，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一向对通过国际干预解决问题抱有期待，而这位德国大使转达的日本方面的七项条件，与蒋自战争以来一直强调的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要求竟然比较接近，也使他难予断然拒绝。[7]惟鉴于军事失利的情况，蒋内心对此其实并不看好，相信这种调停形式，“以我国之实力如此，若九国会议无坚决制裁之表示，决无效力”。[8]12 月 2 日，当蒋介石接见陶德曼，正式表示可以接受德国调停，并强调了不承认日本战胜，华北主权及完整不得侵犯等基本条件之后，当即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这种复杂的心理，称“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果能觉悟，则可与之谈乎？”[9]

依据蒋内心的判断，日本绝不可能做如此让步。他早就估计：“甲、如我与倭妥协，无论至何程度，彼少壮派侵略之宗旨必得寸进尺，漫无止境，一有机会，彼必不顾信义，继续侵略而不止矣。乙、即使与倭解决东北问题，甚至承认彼所要求者，彼亦必继续侵华，毫无保障，一时之妥协，不惟不用（会）奏效，徒自坏人格，自破国格而已。丙、倭之望我与彼妥协者，其惟一目的，乃在破坏余之人格，使中国无领导中心也。丁、此次抗战，无论结果如何，如不抗战而与倭妥协，则国乱形势决非想象所能及也。”[10]因此，接受陶德曼“调停”，并不能稍释其内心之疑惑。仅几天后，蒋即开始断定调停绝不可能成功，暗自决心“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11]

从陶德曼第二次传达日方条件前后的情况可以看出，无论蒋对日本的判断是否正确，其要做持久战的决定也并不那么容易。12 月 13 日，南京陷落，蒋紧急召集会议商讨应对之策，结果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蒋虽再三强调“此时如和，无异灭亡！”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战决心，主和之声仍甚嚣尘上。汪精卫甚至提出蒋、汪一同下野，由第三者出而组织政府，以换取日本方面之谅解，令蒋备感困扰。他在日记中慨叹道：“各方人士及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12]

面对这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蒋最担心日方会以和缓条件诱惑党内高层，使国民党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好在 12 月 26 日，日方经陶德曼转达的所谓四项原则与九项条件极端苛刻，且以承认“满洲国”为前提[13]，这才让蒋如释负重。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观其四个原则：一、中（国）政府放弃亲共抗日反满政策，而与日满共同防共。二、必要地区划不驻兵区，并成立特殊组织。三、中（国）与日满成立经济合作。四、相当赔款。又另附二件：

甲、谈判进行时不停战。乙、须由蒋委员长派员到其指定地点直接交涉云云。余见此为之心安。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14]

当然，即便如此，国民党高层内部仍旧是意见分歧。27 日，在蒋召集的决定和战大计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仍颇多主和者。蒋发言表示怀疑，党内元老于右任等却讥笑蒋太过优柔，不够英明。气得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大骂：“呜呼！此种糊涂讥评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则昔日趋炎附势之辈，今皆变为下井投石矣。元老糊涂至此，此革命之所以失败至此乎！”他的态度很明确：“今日除投降外无和平，舍抗战外无生存，彼等实昧于大势，不知国家利害，此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而以致于此也。”[15]

28 日，蒋再与汪精卫、孔祥熙、张群会商，强调决不能理睬倭寇所提之条件。蒋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示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以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虽侵占，我国民随时可以有收复主权之机会也。”次日，为劝说党内元老赞同不向日本妥协之态度，蒋又专门找于右任、居正谈话，反复说明“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16]

由陶德曼“调停”一事蒋内心看法变化之经过，我们不难看出这时蒋对抗日问题的基本态度如何。蒋所以会接受第三国的调停，来自其内部的压力之大，明显超出了过去研究所得出的认识。[17]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蒋从战争一开始就在期盼国际干预的情况。由于深信单靠自身力量无法打败强大的日本，自然就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国际的力量上面。从早先寄希望于九国公约组织施加压力，到希望英美介入，到向苏联求援，到指望德国能够有所作用。直至最后转而准备持久抗战，他也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动，相信坚持下去就会带来国际的干涉。[18]但也正因为如此，蒋对德国的调停并不看好。一是因为基于对日本侵略心理的长期了解，蒋深知绝不能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和日本做城下之盟。二是因为他所期待的国际干预，也绝非是这种只会助长日本气焰，丝毫不能给其教训的战争调停。蒋所以会一度改变态度，接受调停，除了党内的压力以外，关键是因为日本方面最初提出的条件出乎意外的和缓，其不仅没有提出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而且显示愿意在相当程度上回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上去。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条件不仅“遗漏了”承认“满洲国”一项，而且也没有得到日本关东军等强硬派势力的认可。[19]所以，当日本方面进一步提出必须承认其侵略现状的种种要求之后，蒋断然予以拒绝，是可想而知的。换言之，在陶德曼调停问题上，蒋并没有妥协退让的想法。相反，倒是蒋坚持抗日，最终克服了国民党内动摇恐慌的情绪，做出了有利于抗战前途和国家前途的重要决定。

关于高宗武的秘密使命

继陶德曼调停问题之后，另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是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 1938 年秘密使命的问题。当时，高、董曾负有秘密使命先后潜赴香港与日本。一种说法认为高宗武等是受后来当了汉奸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周佛海策动，并得到蒋的批准；另一种说法是认为高本来就是受蒋本人差遣。[20]而不少著作都依据当时担任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的回忆，称董是 1938 年 1 月在上海偶然结识了受到南

满铁路总裁松冈洋右支持秘密从事和平工作的西义显，经西义显介绍前往日本会见了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等人。回到上海后遇到得到蒋批准前往香港以搜集情报为名密谋和平的高宗武，两人一同去香港与西显义等进行了会谈，然后于 3 月底返回汉口向蒋等人汇报。之后经蒋批准于 4 月中旬再度赴港，转达和平条件。此后高 5 月底再回汉口汇报，并于 6 月上旬三度赴港，受蒋指使“与日寇进行‘和平’勾结”。据此，高遂于 6 月 22 日秘密由港潜赴日本。[21]随后，高干脆成为了汪精卫、周佛海等降日的牵线人。

今天大概应该不会有人因怀疑高宗武的使命，而怀疑汪精卫 1938 年底的叛逃与蒋有关了。但高宗武等当年的秘密使命及其赴日，与蒋介石的关系仍旧是一个谜。依据蒋档目前所公开的文献资料情况，似乎还不足以全面揭示高宗武等往来穿梭的全过程，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个问题有较以往更真切的了解。

从蒋档中保存下来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南京及太原陷落后的军事形势，并没有使蒋的抗日决心有所削弱。特别是 1938 年 1 月 16 日日本近卫政府发表不以蒋政权为对手的声明之后，蒋更是坚信“必使倭寇知中国非武力所能制服”者。他明确讲：“第一期抗战失利后，苏联应参战而未参战，英美应干预而未干预，九国公约已失去约束力，原先对来自国际联盟的制裁的期望也落空了。有人认为各国将会继续保持沉默，或者转而对我方不利。这种观念根本就是错误的，更不得抱持这种心理。”在他看来，只要坚持抗战牺牲，就一定能够取得各国的同情并最终促成苏、美、英对日本的战争。为此，他不仅公开呼吁国人不要悲观失望，宣称“我们直接与日本决战的时刻已到”，而且很断然地拒绝了第三国这时的调停活动。[22]直到 3 月下旬，虽然汪精卫等再三提醒蒋应重视日本转托意大利大使前来调停的情况，蒋的态度仍旧没有明显的松动。他在一次与汪精卫谈话当中仅仅表示说：“如倭言和条件仅以东北为限，且有保障，则不惜与之言和，然而未到其时也。”[23]

蒋态度有所变化，与 4 月 2 日高宗武从上海回到武汉明显有关。高回来时蒋恰好得到一个重要信息，即是日本本月下旬即有进攻苏联的计划，故急于停止中日战争。正处于军事失利沉重压力下的蒋初闻此一消息，真有喜出望外之感。因为一旦日本攻苏，对中国的进攻自然要全面停止下来。但问题是，这个消息可靠吗？会不会又是日本人的一个诡计？而且，如果日本真是因为攻苏而急于与中国妥协，中国若坚持不妥协，日本会不会放弃攻苏而全力对付中国？对此，他在 4 日的日记中反复猜度，伤透脑筋，也不得其解。他一面有些庆幸地表示：“如倭真欲攻俄，则应守秘密，何必泄露。”一面又疑惑倭“指明期间在本月下旬，何也？”一面不无担心地猜测：“如其要我先与之言和，使我信其将攻俄，故愿与我诚意言和，否则如我不与言和，则彼将避俄而全力攻我矣，是仍为恫吓作用也。”一面又估计日本人是在搞阴谋，称：“其实，彼对我急于言和，而对俄则不敢进攻，徒欲达其恫吓求和之目的耳。”一面还是相信消息定有根据，因为：“其军事行动则对俄攻势之急渐明，又何也？”[24]为此，蒋急召高宗武于次日晨前往报告。高的报告显然使蒋相信日本急于攻苏确有其事。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听高宗武报告后，“乃知倭急欲求和，而其急于攻俄之意亦昭然若揭矣。”[25]

把苏联或美、英引入战争，以便巩固自身并最终战胜日本，这是蒋自战争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如今既然断定日本会自己主动进攻苏联，蒋当然是求之不得。既然日本要同强大的苏联作战，它在中国自然必须罢兵停战，直至将其主要兵力集中于苏蒙边境，即满蒙一带，因此蒋相信要求日本退出关外并非没有可能。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蒋对和战的态度明显地开始有所变化。几天后，即 9 日，蒋介石在与汪精卫、张群等谈对日策略时已坦然表示：“此

时可战可和，应注重和局与准备作战到底。”[26]董道宁随后所报密赴日本会见其军政大员的情况，也进一步坚定了蒋的这一猜测。[27]以致蒋此后日俄关系高度重视，反复分析，甚至当莫斯科召其大使回国述职，也让蒋怀疑苏联是否已侦知日本进攻企图，故有意鼓励日本加紧进攻武汉，以避免苏日战争。总之，为加速日苏战争的到来，蒋可谓颇费心思。其和战考虑，均与此密切相联。

在反复探听日方动态，却迟迟不见回应的情况下，考虑到机不可失，蒋终于下决心主动向日方透露中方愿意考虑停战的态度。6 月中，蒋再把高宗武派回香港，要其向日本方面转达中国政府同意考虑和平的意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蒋要改变其基本的立场。他转托高提出的条件与当初他对德国大使陶德曼所宣示的条件其实并没有两样，只是考虑到日本进攻苏联，必不会让出沿苏蒙边界的满蒙地区，故其在强调长城以内，包括整个华北的领土和主权，都必须归还中国外，据说曾特别表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可以留待他日再议。[28]蒋还特别要求高告诉日本方面：（一）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二）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以使其放弃以战逼降的幻想。对此，高于 6 月 20 日有密函呈报蒋称：“西（义显）君于十五日由港返国，已遵照面谕各点作‘我当局’之意见告之，但并未提何人之意见，请其充分运用。松本（重治）于十七日由沪抵此，与职曾晤谈数次。”“职与松本商讨打开僵局之方策而仍无结论，松本对（一）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二）即使攻下武汉，内部亦决不会起变化两点十分注意。每次谈话彼总问有无善策。以职观察，大概日政府在攻武汉之前尚有所期待与考虑也。彼定廿四日返国，职仍当遵照面谕各点与之周旋。”[29]

由高函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蒋这时有利用日苏矛盾促成中日和平的意图，但其解决中日问题的基本立场并无改变。此后，高宗武突然秘密潜赴日本，蒋则被蒙在鼓里。当蒋得知正在秘密求和的日本，突然又由其陆相公开发表蒋必须下野的强硬声明，颇感莫名其妙。当他得知高擅自潜赴日本后，当即判断日本此举与高之行为有关，断定日本最近突然态度强硬，实“高宗武自赴倭以故。”[30]7 月 22 日，蒋得到高宗武发来的报告，更直言“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哧者，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31]蒋之所以会得出这种认识，显然是因为他原本判断日本基于攻苏的战略考虑，必须尽快结束在中国的作战，因而四出求和，故如策略运用得当，必须要让步的理应是日本。日本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在蒋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高宗武这样的中国官员在违背他的旨意，擅自做出过分的求和姿态，以致造成日本人的错觉，以为中国方面已经示弱。这不能不让蒋大为恼火，他不仅马上中断了与日本的秘密接洽，而且断绝了同高宗武的关系。

高宗武擅赴日本，以及日本态度转趋强硬的结果，促使蒋再度回到原先的态度上来。他进而再三强调：“中倭战争问题，实为国际问题，非有国际干涉共同解决，则决不能了结。否则，直接讲和，则中国危矣！”“倭则非至崩溃或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特权，而中倭和平则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决不能解决。故我不可望倭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开始与之谈判。”[32]

由上可知，在高宗武使命问题上，蒋确曾指使和派遣，甚至确曾暗托高向日方“输送‘和平’条件”。但蒋赞同议和别有背景，此虽属估计错误，其接洽条件之提出却也并未违背抗日初衷。所谓高宗武赴日是直接奉蒋介石命令行事的说法，当属不确。[33]

关于孔、日密谈的问题

蒋记述发现高宗武擅自赴日，表现强烈不满，是 1938 年 7 月 9 日。仅三天后，他就在日记中又记述了他对孔祥熙的强烈不满。当天，两人围绕孔秘密派人与日方谈和事发生了争执。在蒋看来，任何主动对日谈和的作法，都是向日本示弱，而孔显然固持己见，认定自己不过是试探对方的底牌，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蒋无法说服孔祥熙，因此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庸之对敌行动求和犹不知为误事，可叹！"[34]

在抗战前期，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接触与往来，在国民党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也是当时和后来最为国人所诟病者。加之孔这时又是蒋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蒋必须以为依靠，孔与蒋又是连襟，蒋夫人宋美龄尤其信服孔的话。因此世人通常相信孔的所作所为必为蒋所指使。但事实上，蒋、宋、孔的关系相当微妙。蒋的侄孙，时为侍从室侍卫官和蒋介石副官的蒋孝镇描述蒋、宋、孔三人这种关系的说法最为传神。据蒋孝镇这时说："委座之病，唯夫人可医。夫人之病，唯孔可医。孔之病则无人可治。"[35]由此不难看出三人间"一物降一物"的情况，和孔在三人中地位之特殊。因此，尽管蒋为党国元首，说一不二，他反倒拿孔颇无办法。了解了这一层关系，我们对以往所说蒋介石通过孔祥熙及其代表，秘密与日本人勾结妥协的说法，就应当有所分析。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关于 1938 年夏天蒋、孔秘密勾结日本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1938 年 6 月孔祥熙密令其秘书乔辅三去香港，同日本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会谈。[36]日本方面提出承认伪满洲国、在华北和内蒙共同防共，以及蒋介石下野及另建新政府等要求，乔 7 月 15 日回汉口做了汇报。经孔与蒋密商后，乔代表蒋于 18 日便向日本提出了复案。此复案除蒋下野及改组政府一点外，甚至提议"通过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承认内蒙自治"和共同开发华北经济，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条件"。只因日本坚持要蒋下野，双方这次谈判迟至 9 月 1 日未能达成妥协半途而止。[37]对此，我们只要注意到上面提到的发生在 6－7 月间蒋对日态度的一系列变化，就不难产生疑问。因为，以上所说乔回汉口汇报和蒋、孔做出接受日方大部条件的时间，正值蒋对高宗武的作法大为恼怒，对孔秘密"求和"行为备加责难之时，何况日方条件又包括屈辱性的要蒋下野及承认伪满洲国等内容，说蒋这时会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日本条件"，明显不合情理。

如果说蒋、孔 1938 年有过所谓"秘密勾结日本"的事实，其实恐怕并不是在夏天，而是在秋天。说明这一情况，恰好可以证明上述说法之不确实。因为，我们在传说中的乔辅三与中村丰一秘密谈判期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不满孔祥熙向日方探和的重要文字。

先是 8 月 9 日孔祥熙电蒋称："顷据香港来电称，访晤诸昌年夫人，据谈日本东京陆军最高长官之全权代表，曾向少老（即唐绍仪－引者注）提出以下条件：（一）停止反日运动；（二）反共；（三）经济合作。并谓决无领土野心，愿保障中国主权完整，无赔款。诸夫人表示，此次因系院座再三劝慰，少老始肯与日人见面，探询条件。该日军代表之来，亦极不易，所持条件可作基本谈判之初步原则，但日人方面是否再改条件，彼亦难保。如我方认为可商，当再与进行详洽。惟该代表定五日再返沪。如有所命，请在十五日前示下，免过时机，在日人前反露我求和之意。诸又称，日人云，此次和议如由少老出面调停，日方条件可以较优，在少老方面则渠个人年事已高，并无何心，全出爱国之忱。"[38]

孔电之意一目了然，就是希望蒋能够考虑日方条件，抓住时机。但蒋全然不予理睬。蒋得电后第二天即复电，告诫孔说："关于少川接洽和议事，弟极端反对，请其于政府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以前，切勿再与敌人谈话，以免为敌藉口。又日人近特放一种空气，甚（盛）传兄屡提条件交日人，皆为日敌所拒。此种空气作用影响于我内部心理甚大，而且俄人亦以此相谈。请兄注意为祷。"[39]从蒋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点，第一，蒋尚未决定整个政策与具体办法，因此坚决反对与日本人再做接触。第二，蒋不了解孔与日本人接触的详情，但发现自己 7 月 12 日已向孔清楚地表明态度后，孔不仅未加收敛，反而又动员做过北洋总理大臣和广州军政府总裁的唐绍仪出面接洽，且通过情报得知孔曾屡提条件交日人，十分不满。仅碍于关系，蒋的话不好说得很尖锐而已。

对此，孔 11 日也有回电解释说："承嘱一节，自当注意，少川为人，秉性及过去在粤经过，为我兄所深悉。前因首都沦陷后，日人对少川多方诱惑，时思利用，且闻伊不甘寂寞，曾发牢骚，恐其万一为敌利用，影响大局，同志中屡为弟言，嘱早设法，故利用其亲友尽力劝慰，设法羁缠，使其为中央用。谈及和议问题，完全彼方自动，时有报告前来，所以未曾拒绝者，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日人放造空气，原属惯计，与弟绝无关系。此次诸夫人谈话，显系买好。原电转陈藉供参考。不意增兄烦虑，殊觉不安。"[40]此回电亦清楚显示，不论孔是否曾通过手下向日本人屡提条件，蒋对此并不知底，因此孔才可能加以辩解，说明自己从未提及任何条件，包括鼓动唐绍仪见日本人，亦仅为"观察敌情，供我参考"而已。

当然，孔祥熙所谓"供我参考"，明显地是想影响蒋介石，接受他认为适当的和谈条件。孔所以不断地通过各种线索与日本人保持接触，目的即在想要探知可以接受的和平条件，以便推动蒋迈出关键一步，抓住机会，促成停战。因为在长年负责财政的孔祥熙看来，蒋虽明了中日两国国力之差距，却过于迷信外援或国际干预，对艰危情形与危险前途认识不足，以致对日态度太过坚持而不够灵活。注意到欧洲 9 月 29 日慕尼黑协定签订[41]，足以打破国人依赖外援的幻想，孔即托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前往汉口向蒋再度陈说应注重时机实现对日议和的必要性。稍后，孔又亲函恳切陈词，称"现在日虽感觉势成骑虎，但又不肯向我先行示弱，而我亦不能表示言和，故我惟一之希望仍在国际切实之援助。兹据顾（维钧）大使报告及各方事实观察，国际援助既不可能，则此后对于内政外交均有切实检讨之必要。""现在国际情势已又变化，不知我兄对于今后办法主张如何，各大使亦来电询问，亟应瞻前顾后统筹准备。如外援方面不能再求进展，而军事方面亦无十分把握，则此后遇有解决机会，即应乘时进行，否则机会至时，我无应付之策，稍纵即逝，更难再得。"[42]

对英法在欧洲出卖盟国捷克的绥靖主义态度，蒋亦十分失望。基于武汉可能不保，和党内充满"低调"的现实[43]，他也不能不开始重视诸如孔祥熙等人的意见。事实上，还在 8 月底，日本特务和知鹰二就曾秘密潜来汉口，透过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向蒋说明日方高层正在考虑全面撤兵之利弊得失，建议中方应抓紧时机与日方媾和。当时蒋颇不以为然。至发现英法两国必欲压迫自己的盟国捷克向德国肢解捷克的压力屈服，蒋的心态则不免有所变化。9 月 23 日，他已经在汉口主持会报，研讨对日本所提和平建议的具体对策了。由于估计日本派和知冒险潜来汉口，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再加上和知透露日方有退出华北之动议，蒋自然相信也许确有议和机会。故他特别指示了议和方针，强调"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谈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至于对过去所再三强调的，任何交涉都要通过第三国或九国会议实现国际保证的方式，鉴于捷克的教训，蒋则决定不再采用了。[44]由此也不难看出慕尼黑协定之消极影响。

为避免丧失有利的议和机会，蒋迅速转托孔祥熙派人前往香港追赶此时已离开汉口的和知鹰二，以便继续接洽和了解日方条件。他并且开始具体研究“停战撤兵之要点”，比如如何分区划片逐一交接主权；交接前后如何维持地方治安，防止误会和冲突；如何预防察绥与冀东伪组织之反抗，并顺利解散伪政权；如何对内宣言，如何抚慰死伤军民，日本撤兵后双方应先订立互不侵犯条件，而后再考虑可否订立互助协定问题等等。其对议和成功之期待，不难想见。然而，日本高层内部如何解决中日战争问题，长期意见分歧。和知传达的讯息，只是部分日本高层人士的想法，远未成为其政府的政策。依蒋之性格与阅历，对此其实也未必有多少信心。因此，他一方面暗自筹划停战议和之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疑心重重，再三研究“和议之弊害”，深恐日本搞阴谋。他反复在日记中问自己：“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在华北部队如迟延不撤，应如何？三、在上海与察绥部队如不撤，则应如何？”[45]

就在蒋寄希望于能促使日本停战撤兵不过 20 多天之后，武汉、广州就先后失陷，日本政府诱降汪精卫的秘密工作也接近成功，近卫首相遂于 11 月 3 日公开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劝降，要求蒋介石下野。面对日方之狂妄态度，蒋深感受辱，当即要孔停止了与和知的联络工作。随着武汉失守，蒋一面公开发表声明，坚持抗战，一面以陪都重庆召集党政领导人谈话，为众多对前途充满悲观的高层干部打气。他特别说明了这种时刻言和的危害性，声称战争虽然失利，但“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盖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不怕一时失败也。”[46]换言之，蒋 1938 年虽确曾委托孔对日进行过秘密接洽，一是时间与过去所说者不同，二是有慕尼黑协定成立的特殊背景，三是再度对日本人的行动有所误判断，而归根结底，这次接洽实际上还没开始即告终结。

进入到 1939 年，有关孔祥熙与日本之间的秘密接触的传闻似乎更多，蒋同样也被牵涉其中。在那些由当年日本人保存的史料当中，甚至出现了蒋介石署名的电报。对于久经政战，一向多疑且行事谨慎的蒋介石来说，这实在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情况。

当时的形势是否到了让蒋自乱阵脚的严重地步呢？这一年中对蒋威胁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 1938 年底汪精卫的公然叛逃了。蒋密令刺汪，表明蒋对汪降日担忧到极点，客观上确是存在着以特工方式破坏汪日勾结的迫切需要。但是，说汪精卫刚刚叛逃，举国震惊和愤慨的情况下，蒋介石、孔祥熙等就敢于秘密通过所谓“亲信”杜石山、柳云龙等[47]与日本大亨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秘密接洽谈判，蒋并会亲电杜、柳，请其向日方转达诚意，这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据说，蒋随后正式授命孔祥熙安排张季鸾、贾存德等人继续与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继续密谈并报告，再由孔根据报告联络重庆元老及握有实力者，向蒋要求和平，再由蒋提出国防会议，正式议决代表来港谈判。孔甚至亲自致函萱野，蒋亦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一切皆在设法抢在汪伪政权建立之前，与日本取得妥协。只因日本军方坚持扶植汪精卫，此一接触才不得不中止下来。[48]

上述说法，实在破绽多多。仅就日方披露之所谓蒋电的行文格式与内容看，就有中间人假造之嫌。[49]至于所称蒋授命孔安排张季鸾、贾存德与日人密谈并向孔提出报告，蒋派郑介民、王子惠秘密赴日等等，亦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因为，不仅张季鸾在对日问题上一向由蒋亲自咨询调用，与孔祥熙之秘密活动无干，蒋这时对贾存德，特别是王子惠也并不十分了解，一年前虽两三度要孔严令贾某停止活动[50]，但因贾、王都是孔秘密使用之人，蒋知其活动

只能从孔处报告得来。关于这一点，即使不去考察 1939 年间蒋对和议的评价与看法，从 1940 年蒋对孔的责难，以及孔为自己的辩解中，即可发现蒋对孔之手下及孔之活动，其实并非完全掌握。

1940 年蒋、孔之间的这次冲突，又是因为孔与日人的秘密接触而引发。先是蒋得情报称，有贾存德、王子惠、蔡森者，受孔祥熙指派，往来于重庆与香港和南京之间与日伪通款谋和，且得日本专机接送。对此，蒋除一面下令戴笠密查外，一面也直接要求孔做出解释。孔迅速写一长函，并附上相关材料呈蒋。其函一上来即不得不详细解释贾、王、蔡三人的情况。称贾乃过去中央银行行员，与日人交识颇多，故战争开始后即托其代探日方消息，去年始令停止。称王子惠原为汪伪实业部长，但早年追随孙总理，纯粹以环境及与田俊六友好关系误被牵入。后辗转求友介绍，向我中央表示愿意随时脱离伪组织，为国效力。“某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呈钧座，当蒙电复指示加以勉励，令其脱离伪组织，勉图报国。”“最近敌人拟乘欧战紧张之际，急图南进，颇欲结束在华战事，板垣乃出而托王介绍与贾相晤。板垣曾当面表示谋和之意，声明可以恢复七七以前状态，如得我方同意，并可请求天皇下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嘱贾向弟转陈。”说“弟以我方国策既定，在敌人未完全觉悟自动撤兵以前绝难有所表示，遂置之未理。时当溽暑逼人，我兄辛荣万分，故事隔多日亦未敢以此烦扰清神。不意彼方以贾久无复音，复托有蔡森君来渝重述前情。”而蔡为靳翼青旧部，过去并不相识。蔡来渝后日方听候消息更急，且来电云已备妥专机，派人赴粤迎接。孔做上述解释则再度为自己透过秘密管道保持对日联络加以辩解。称：“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纷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磨擦，于我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51]

然而孔写信给蒋详加解释之际，戴笠又接连查得消息报蒋称：孔祥熙代表蔡森、吴复光由日伪赠以巨款，从事议和活动。前潜来重庆，同住南温泉孔公馆。后以工作调动为名，由孔密派赴港，与前汪伪实业部长王子惠属下接洽然后转宁。蒋当即要戴笠向孔函询。孔复函说明吴乃贾之化名，蔡森并非旧识，两人工作仅为探取情报性质。且不满地宣称：“于现在国家大计，惟最高领袖有权决定，其他任何人不能妄参末议，且一普通人员，敌人虽愚亦不至如此相信，更未必肯以巨款赠之。”[52]但蒋对孔所说仍颇怀疑。果然很快又有情报说明王子惠由日人岩崎供给港币 30 万元作民间发起和平之经费，王贿买贾、蔡二人出入重庆，且敌以专机送至广州，然后入渝，回来亦由敌由港接至广州，再专机送往上海，且带有孔致板垣与头山满等人之亲笔函件。蒋闻知更为恼火，当即手书一函，并将报告附上，直接派人送孔公馆，其用意十分明显。孔得其手书后，急忙回书，再加解释。除进一步澄清自己与贾、蔡二人的关系外，还特别说明：“所谓寄致板垣与头山等之亲笔函件，则绝无其事。”只因贾、蔡来时携有中日老友名片，故于二人临行时，亦报以名片，以示礼貌而已。[53]

因自觉前书言辞未妥，蒋接孔回书后，当天即回函，恳切说明，抗战形势艰危，动辄派人游说活动于日人中间，甚至与日人专机迎往，无论真意如何，是足以撼动军心民心，切不可为。若以我之名片，供敌以口实，更属不当。然孔接蒋函后，反倒是满腹委屈，复函声称，自己安排贾、蔡及王子惠等人活动，均有细密之计划，绝无授人以柄之处。种种消息所以没有及时呈报，实因“我兄辛劳万分，弟亦养疴南泉，既乏密谈机会，复恐冒昧失言”。对日方各种言论，更不愿“聒我兄之清听耶，故未遽以上达”。“不意作情报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其实，身为政府大员，“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

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开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谅亦无此胆，敢事伪造。”在孔看来，蒋对此根本不该怀疑。依孔之见，蒋实在是对间谍运用缺少现代知识，过于大惊小怪。因“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欧美各国平时即收养此等人物，储为己国之用，并备重金搜购重要情报，平时如此，何况战时？故遇有觅得能深入敌窟之侦探者，均视为奇宝。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至于说此种活动可能影响军心民心，孔也颇不以为然。相反，他认为：“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之军心民心，而我之军心民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信写到最后，他还忘不了痛骂戴笠及其手下，其愤愤然曰：“弟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54]

不论孔之辩解若何，上述蒋、孔之文字足以显示，蒋对孔此时利用贾存德、王子惠等人对日人活动的情况并不知情，且极不满意。对与敌人交换文书、函电，哪怕是名片，均极其敏感，坚决反对。而孔、蒋之间，实际上并不十分通气。孔做此类秘密活动，不仅经常不向蒋通报，而且自以为是，自行其事，非认为十分必要时，也仅做情报搜集而已，并非事事报告。既然如此，说 1939 年蒋、孔指使同一拨人长年从事对日谋和工作，并不断得到有关交涉内容之报告，给以指示，甚至直接函电往还，自然不大可信。

关于“宋子良”香港使命问题

在中日秘密交涉中，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甚至伪造文件以换取日方信任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那个时候，无论在香港，还是在上海，打着各种接洽中日和平的名目，活跃于日本人圈子中的中国人实在不少。已知仅孔祥熙用来与日本人联络接触者就有八九人之多，如贾存德、乔辅三、马伯援、唐绍仪、居正夫人、孔令侃、胡鄂公、王子惠、蔡森等。其他人，如宋子文、张群、戴笠等也都有自己系统的人在上海、香港等地秘密活动。再加上部分政客和文人也主动在其中穿针引线，情形更加纷乱。为力争有所表现和作为，大家各显神通以套取日方信任，乃至虚张声势，弄虚作假，实不可免。在这方面，最典型者大概莫过于所谓“宋子良”事件了。

宋子良乃宋子文胞弟，时任西南运输处主任，负责国际物资经滇越、滇缅公路输入境内的工作，经常往来于香港、昆明与重庆之间。据说 1939 年底为驻港日本军方代表发现，遂努力接近，后经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介绍引见成功。宋子良亦于 1940 年 2 月开始以经过蒋介石及最高国防委员会授权的资格，与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以及中介张治平等一同，正式从事与日本军方的秘密谈判工作。据日方史料，双方此后于 3 月、5 月、6 月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宋等人甚至出示过蒋手谕和有蒋签印的授权文书等重要文件。但谈判最后并未成功，且日本人后来发现，这个宋子良原来是个冒牌货，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直系的得力干部”曾广冒充的。[55]即便如此，后来的人通常还是对日方史料原文照录，并确信这次香港、澳门谈判等于是“蒋、日会谈”，只是基于不同的观点，人们对此事之评估各有不同。然而问题是，这次行动真有蒋授意和操控吗？

根据蒋档，蒋初知张治平其人，应在 1940 年 3 月。当时，戴笠将张治平从日本驻香港武官

铃木卓尔那里得到的和平条件（即所谓八项觉书）呈报蒋，蒋曾在日记中怒斥日本“其愚实不可及”。这是因为，这时汪精卫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在南京成立伪中央政府，蒋对汪正恨之入骨，刚下令公开卖国的“日汪密约”，而铃木竟希望推进蒋汪合流，自然让蒋怒不可遏。故当蒋得知张治平原附汪伪，2 月间刚刚弃汪投蒋，在军统局戴笠麾下“以特工技术”与铃木接触时，当即下令：“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56]鉴于此，戴笠很就把张调回重庆，闲置一月之久，直至 4 月下旬才许其返港。张回港后，铃木又数度与张联络。张因有戴笠的命令，始终对铃木强调非去汪否则不能与谈，尽量保持距离。只是到 5 月上旬，铃木秘书受命找到张，表示让步，其新提出的五项和平意见内并且写有“日本对汪政权拟于一二月内不予承认，预为中日和平最后时机”等语。张上报后，戴认为有阻止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之可能，遂重新批准张与铃木接触。[57]对于这一秘密接触，张治平随时有密电向戴笠通报。直到 9 月初蒋令戴笠将张紧急召回重庆时为止，按照戴笠所布置的张治平工作，均未与所谓“宋子良”扯上关系。

张治平奉召回渝，却纯系受宋子良事之牵连。尽管有关宋子良如何与日方密商，甚至约定张群前往武汉迎接板垣总参谋长到长沙会晤蒋介石的种种情报早就纷至沓来，但蒋从不置信。这时蒋似乎也尚未掌握任何确实证据，只是有情报称宋乃由张介绍与日人接洽，并担任联络，故叫戴笠严询张与宋事之关系。故 9 月 6 日戴奉命与张谈话时，也只是一般性地问张：“铃木、今井辈既认定你是有中央确实路线，何以据我所得情报，铃木与宋子良又有接洽呢？”张则答称：“宋子良的关系我可以说绝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相信铃木与宋必无来往，否则委员长方面定必可得到宋关于此项之报告的。至于外间所传，铃木与许崇智、许世英等亦有接洽，前几天孔祥熙亦有两个代表到澳门与和知（鹰二）见面哩。”[58]

但 9 月 2 日和 3 日，蒋接连得到负有特殊使命前往香港的张季鸾发回的电报，情形当即发生改变。张季鸾电称：“板垣现正期待九月十五日以前与我委员长会于长沙，而先由张岳军先生到汉口，然后伴板垣赴长沙。”“敌方何以相信此事，则因（1）最初接洽之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2）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3）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信，板垣果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回信，示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像片带回。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明确认为：一方面，对宋子良“宜嘱其特别谨慎”；另一方面，“有人竟敢伪造委员长之信，此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彻查。”而“问题中心为张治平。敌方谓张为留英学生，而与宋熟识，故宋君若系受利用影射，恐皆张治平之故。”“是否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真正纠查恐须取得物证，最好由敌方将假信照片索来，此事似亦可能。”[59]

张季鸾来电显然使蒋大为震怒，他一面令陈布雷电张设法取回物证，一面仍不相信宋子良与此有关，认定必为张治平所冒充。故他很快将戴笠找去，出示所得情报各点，断言张治平“招摇撞骗”，“有反间重大嫌疑”，必须严加看管并询查。戴笠当即将张治平软禁，并派第三处（即行动司法处）处长徐业道亲自担任聆讯工作。但张治平坚不承认冒充宋子良，称其与铃木等过从已久，早通姓名，决不能冒充宋子良。张也坚不承认有与章友三和陈超霖二人同见铃木之事，称八个月来始终只是与其联络人曾政忠二人与铃木、今井、臼井（茂树）等接谈。至于伪造蒋信一事，当然更是否认。徐业道检查其亲笔供词，亦发现其平常不用中国字，连中文表达都多有脱落和辞不达意之处，故也不相信张能伪造蒋之信件。[60]

对初查之结果，蒋明显不满意。他很快将各方情报进一步分析整理后，交戴笠再审。其所提张问题之疑点共分四项：一、1939 年底张治平持委座任命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为研究

对日问题之咨议委任状与敌驻港武官洽谈和平；二、张介绍宋子良、章友三、陈超霖等三人与今井、臼井、铃木在香港日商大胜洋行举行会谈；三、今井携板垣亲笔函示张等，张等亦以委座亲笔复函示铃木等；四、在委座函内写明同意派张群负责长沙会晤事。对此，张的答复是：铃木与他抗战前即相识，铃木 1939 年 11 月到港后即请张协助打通重庆路线，开展和平工作，张当时尚在汪营，并无路线，故未应允。后结识军统驻港情报人员曾政忠，又经曾介绍认识军统驻港区曾之联络人卢沛霖，进而得中央允许，以特工技术进行。故张把曾政忠介绍予铃木等，化名章友三，谎称其有中央路线，可以转达，从未介绍过宋子良，更无陈超霖其人。且宋子良过于醒目，日人早有调查，找人冒充亦很少可能。至于委任状和委座亲笔函，前者因求和为铃木主动，铃木受今井所托，今井与张已有十几年之交往，不需要用委任状来取得信任；后者他相信委座墨宝中外皆有，以敌人之技术，不难辨认真伪，他亦不可能冒此风险。这时，戴笠为核实张治平的说法，已特地将张之联络人曾政忠从香港召来单独询问，曾的说法与张的说法也基本吻合，故戴笠亦判断蒋之情报不确。其结论为："张治平接受铃木、今井之求和，原属探取情报性质，以撤销汪伪组织为一试题，以觇敌人求和之诚意与其求和之缓急也。张治平本系伪东亚民族协进会常务委员，与敌伪当有关系，张谓铃木、今井均其旧交，有相当信赖，此语固未敢尽信，惟张自本年二月经港区运用以来，在工作上尚未见其有不忠实处，但是否伪造文件，冒充咨议，经多方侦查与研询，尚不能证明其确有其事。"[61]

依据上述种种文献，似可清楚地看出，所谓宋子良与日本军方在港、澳密商和平，无论有无事实，都与蒋本人没有多少关系。甚至所谓宋子良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直系的得力干部"曾广冒充的说法，都颇不可信。因此事如与蒋有关，蒋断不致如此动怒，并再三在内部追查；如此事与蒋无关，以戴笠之地位及对蒋之敬服，再加上当时蒋耳目极多，戴亦绝不敢事先擅行妄为，事后又如此轻描淡写。[62]但如此一来，此事透露出来的信息，就相当令人吃惊。因日方保留的交涉文件与记录相当完整[63]，从开始到后来，张治中在其中都担任有重要角色。而张亦明确表示他与今井、铃木等均为旧识，故日方关于张如何参与之种种记述不会有误。张又承认将曾政忠假冒章友三，这显示今井、铃木等人不可能在港、澳同时与两个张治平、章友三会晤，如确有三次中日港澳秘密会谈，张治平、曾政忠必在其中无疑。由此就可能出现两种结论，其一是张治平、曾政忠所述为实，前后只有张、曾二人与今井、铃木等人进行交涉，今井、铃木等向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及各种记录材料等均为造假，所谓"宋子良"者纯属子虚。其二是日方记述为实，张治平、曾政忠确曾一直受人指使，与宋子良，或冒牌的"宋子良"等一同秘密与日方谈判，二人在受戴笠讯问时的说法则纯属搪塞和虚构。

日人造假并非全无可能。仅以所谓长沙会谈一事看，今井等人的心态就有可疑之处。以事后披露的"桐工作"（按即宋子良工作）各项文件之内容，可知日本方面始终坚持蒋汪必须合作，至少蒋汪双方关系必须协商解决。[64]但依据张治平 6 月密报，铃木等当时却明白告诉张，说："板垣之意，只须中国方面有和平诚意，则前言去汪而后言和，亦未尝不可。惟于日军占领区内进行此事，既与日本信义有碍，且日本亦将起而革命矣。故板垣对此事意见：（一）委员长如能予以谅解，请指定地点，如长沙或重庆，板垣当偕同汪逆前来谒见，将汪逆交还我中央，当面请和。（二）由委员长指派干员，在中立地点，如香港或南洋等地，约汪逆商谈中日大事，板垣当策动汪逆前来晤谈，则汪逆即离日本之占领区域，则一切悉听中国之处置。"[65]就一般逻辑判断，张显然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编造铃木的讲话，因此铃木的说法或者是投蒋所好，引蒋议和；或者是日方文件规定记述是一套，实际操作为另一套。总之，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方史料未必完全真实。

但有关宋子良参与谈判之事，当时无论在日方内部，还是在中方内部，已是沸沸扬扬，为众多情报人员所侦知，日人完全虚构的可能也不大。事实上至 9 月间宋子良准备赴美之际，仍与铃木接谈的消息，当时即被侦知并报蒋。[66]故张、曾二人隐瞒真相的可能依然存在。问题是张、曾背后既非蒋，又非戴，更不可能是与戴笠颇多矛盾的孔祥熙[67]，其主使者之地位，必定十分特殊，方能使张、曾二人甘心受其指使，又敢冒欺“君”之罪。[68]而以当时情形，能使张、曾二人为之冒如此风险，且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想到和借用宋子良名义，与日本持续谈判，甚至假传蒋电，假造文书与蒋函，不怕万一曝光而为蒋罪者，惟有一人，即宋美龄而已。日方记述，港、澳几度谈判时，宋美龄都借故来港，“对此会谈大力支持”，似并非偶然。联系到前文所述 1939 年也有所谓蒋电出现于香港谈判中的可疑情况，当时宋美龄在双方密谈过程中也同样频频出现于香港，甚至与日人及中方联络人见面晤谈，更让人怀疑这其中大有文章。[69]事实上，除上述蒋、宋、孔“一物降一物“的微妙关系外，凡研究蒋宋（包括与宋家）关系者，亦均可感觉其间之复杂与深奥。故宋在宋子良事件中之作用，实在有深入考查之必要。

不论宋美龄对宋子良事介入深浅如何，蒋对宋子良恐怕也未必毫无怀疑。从蒋得知宋子良事件不久，即劝说宋暂时离职赴美，并电促其速行[70]，和随后有情报说明宋准备赴美前专门与铃木接谈等情况判断，蒋对宋子良很可能已有戒备。[71]然而蒋对此类“家丑”，如同战后宋美龄力保投机倒把的孔令侃免遭“打虎”，蒋只好勉为其难一样，他不仅无计可施，而且还不能不尽力粉饰遮掩。最典型莫过于 9 月 26 日，日本方面已经正式停止“桐工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上海的情报员仍旧有情报给李，称仅因敌方条件奇苛，蒋无法掩护宋子良，整个谈判才渐告中止。蒋见此不禁大光其火，当即亲笔批示：“此乃敌方板垣、和知等和平攻势，扰我军心民心之阴谋。此早且为我谍报员侦得，已证明其所指之宋子良全为冒充之另一人，而非宋子文胞弟之子良也。而敌谍必始造此谣言者，即以宋子良为与我有亲属关系之故，可使其政府取信以为真也。凡此种无中生有可笑和平之无稽谣言，不一而足。最好由贺主任直电李长官说明此事大略，并嘱其对于其老河口与上海通电之电台特别注意敌方之反间工作，徒为敌方所利用，实只有害无益，不如与之断绝通电，并切责此间谍之为敌利用而不察其妄也。”[72]此情报原本即为重庆所截收，纵有不确亦难启齿指责；且消息来源是李宗仁自己的谍报人员，蒋亦无干涉可能。对此蒋却全然不顾，似可见他这时发的其实很可能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名火。

蒋介石亲订的议和条件

蒋介石在 1940 年夏又是批评孔祥熙动摇军心民心，又是软禁张治平调查宋子良事件，这是否意味着他这时根本反对议和呢？非也。同前此一样，在蒋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和是战，必须依据国际国内之大势，有全盘之规划和慎密之设计，能达到不战而胜之目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操之于己。

其实，在这一年夏天之前，蒋就不断得到各种情报，知道日本人在香港大肆活动，急于寻找路线，与重庆谋和。但 5 月底之前，鉴于日本政府公然扶植汪伪政权，蒋并未动心。6 月中旬，宜昌意外失陷，重庆门户洞开且连遭轰炸，同时英法在欧洲对德作战惨遭失败，中国获取英美及华侨援助的西南通道，也因英法在安南和缅甸的殖民政府迫于日本压力而相继宣布关闭。[73]至此，蒋对日方谋和动向不能不开始有所重视。7 月 2 日，蒋接到张季鸾来函，

得知日人和知表示日本已有撤兵停战决心，其在日记中对此还颇表疑惑，暗自决心“应暂置不理”。几天后，蒋即改变态度，进一步研究了张函，考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即所谓“一、谈政策不谈条件；二、谈情感不与利害，而不谈权利与得失；三、对于中国人心应令特别注意，（并应注意）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之宣言；四、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应放弃；五、汉口租界应先取消；六、内河航权应取消；七、青岛与海南岛应完全交还；八、热河应先交还；九、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十、天津与上海租界应定期交还；十一、保障问题应稳妥；十二、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74]

进入 7 月中以后，日本急于乘英法在欧洲战败之机，向东南亚以及南太洋各岛推进的意图已经相当明显。一时间，张季鸾、温毓庆、胡鄂公、张治平、何世桢都有情报呈送，说明日方谋和已不择手段。再加上和知鹰二直接转托希腊商人上书蒋，态度谦卑至极。又得到板垣愿亲至长沙与蒋会晤，甚至将汪精卫交中方处置的消息。这些反令蒋满腹狐疑，怀疑敌意在分化利诱，因而开始反复提醒自己“应切戒严防，勿摇惑！”据此，蒋在八一三上海抗战纪念日公开发表告民众书，继续号召坚决抗日。[75]但注意到日军急于南进，日方谋和态度前所未有之急迫，蒋又不能不抱以幻想，怀疑这可能是一个不战而收复失地的极好机会，故又不得不在暗中做争取议和的种种准备工作。他因此特别委托张群、陈布雷和张季鸾等人研究议和之利弊与实现和平之基本条件。蒋相信，只要能够达到“（一）打破敌国灭华政策；（二）消灭敌人奴华心理；（三）恢复中国独立自主地位”，就可以谈。而目前情况下，因“（一）我有实力可恃，不患其违约；（二）我有根据地存在，不患其和议决裂；（三）敌有求于我；（四）敌有惧于我”，也不怕谈。[76]

张群、陈布雷、张季鸾等根据蒋意，于 8 月下旬分别起草了《中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中日和平协定》、《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说明》等多个重要文件，经蒋修改并共同讨论后，形成一项文字，交张季鸾带往香港。在这里，可以看出蒋之坚持者主要在撤兵及废约二点。另外，蒋也十分强调“日本侨民除在租界与通商口岸外，其他各地者应同时撤退”，和“热河应不属于东三省范围。”[77]

从张群等起草的文件可以看出，蒋之幕僚对和战的基本认识是相当一致的，即日军必须限期完全撤出长城以外，同时自动废止过去两国间一切不平等条约。对东北问题，则意见略存分歧。有人相信：“我国既不能收回，又不容放弃，故利在延搁不决。”“实质的收回在将来为可能”，惟以现在日本兴趣转向南太平洋，“中国若坚持收回空名，似非不可能。”[78]但也有人主张做成甲乙两案，“甲案现在不提，战后另作交涉。乙案现在先取得一种谅解，约期交涉。”就后者，他们提议再分两案：“（一）要求日本承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我中央派驻满指导长官一人，常驻长春，代表中央，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二）要求日本先改革满洲制度，使傅仪之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废除日籍官吏制度，还政东北人民，此项改革完成之后，我中央得与傅仪之政府直接协商，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前者即先收回空名，后者则照顾现状，有一过渡。[79]

经过讨论并最终合成之文件，内含两项各四点，并附记一点。全文如下：

一、基本原则：（一）两国相互绝对尊重对方之独立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两国相互尊重对方之国体政体，不用任何藉口干涉对方之内政与政治的及社会的组织。（三）两国相互保证今后两国间遇有争端，皆用和平方法处理，决不以武力或武力的威胁为企图解决争

端之用。为确定以上诸原则共同信守之计，两国宜尽速缔结互不侵犯及和解公断之条约。（四）经济合作以绝对平等互惠并各保自由为原则。

二、恢复和平之绝对必要条件。（一）凡因作战而来之日本军队应限期完全撤回，其在北方长城内外之部队应全部撤出河北察哈尔省境以外。（二）凡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所占领之中国南北地方，包括察绥两省及沿海大小各岛屿，应完全交还中国。（三）凡占领地内之伪组织，均应自战斗终止之日由日本负责撤消，不能作为中国内政问题。所有伪组织之法令契约，一概不能承认。日方并不得要求任何占领地内行政之特殊化，中国行政完整必须完全恢复，不容有任何干涉内政之举。（四）凡占领地内日方所占领之中国公私产业，须一律交还。凡日方所办具有垄断性质之公司，中国不能承认。凡经济事业一概依中国现行法令及条约办理。除租界及通商口岸之外，凡占领地内之日本侨民，应随同军队撤退。希望条件。日本自动声明愿废止不平等条约，放弃领事裁判断权、租界、内河航行权、辛丑和约驻兵权等，定期实行此项声明，望恢复和平之日同时发表。

附记：东北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80]

从上项文件之附记可知，蒋相信通过和谈取得对东北主权甚少可能，不如暂时不提，以后再议。在另外一件题为“坚持之件”，也要求张季鸾遵守的内容相当的文件当中，蒋更具体地提示张必须坚持“热河不在东北范围之内”，和东北问题则“须待和平完全恢复后另案交涉，现在不能提议。”[81]

从最后经蒋确定的谈判文件可以看出，蒋及其幕僚对通过谈判收复长城以内之失地，实现关内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颇有信心与决心。尽管蒋对东北问题之根本态度与其幕僚并无两样，甚至更为敏感，但作为议和停战之最低限度之条件，蒋在东北问题上仍主张牵就现实，对目前通过谈判争取东北回归或名义回归，明显不如部分幕僚态度积极，反而是对争取热河在停战后即从满洲划出显得相当坚持。

8 月 27 日，蒋再度与张季鸾讨论文件细节，并详细说明和战方针及其政策依据，为张鼓气，要求张交涉时务必坚持所议之原则，不可稍有迁就。29 日，蒋再度召见张及陈布雷，再商文件措辞，详细叮嘱各项要点，再次提醒张对所拟条件不可让步。可见蒋对此次交涉极其重视。

1940 年 8 月 31 日，张季鸾携带蒋亲自改定之和平条件飞去香港。这应该是蒋第一次正式决定并指导议和，故其在当天的日记中显得颇为感慨。称“敌倭时时以日满支名词为对象，如何而可望其彻悟？我国损害伤亡如此重大，如何而可轻易议和？今姑妄试之。惟坚持勿稍迁就，保我人格国格！”他并且安慰自己：“对倭情与和战问题研究透彻，手拟最低限度之条件与原则，自信不致有误。”[82]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张季鸾抵港后，发现敌人所有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在宋子良身上，并积极准备在 9 月 15 日前实现板垣与蒋介石的长沙会谈。此时插入其中并提出在重庆商定的诸种条件，又不能公开说明蒋在背后指导，明显得不到敌人的重视。故张一面紧急要求重庆彻查所谓宋子良事件，一面通过何世桢向和知鹰二揭露所谓长沙会谈纯属子虚。但和知很快因事离港返日，张在香港全无施展余地。反而是惹起众多猜测和是非。如有情报宣称，张因见不到和知，不惜公然表示到港前曾十次见过委座，且多次单独召见，欲“夸大宣传其身份，以

冀引起和知之重视云”。[83]性情刚烈的蒋介石自然觉得有失颜面，愈加懊恼，在日记中直骂“季鸾多事”，“为可叹也”。[84]

9 月 20 日，蒋下令陈布雷电告张，不可在港久候，以免自招其侮，且今后断不可再与和知等人来往，因其纯为欺骗也。对此，张则极力为和知辩解，称和知向与今井、铃木等人立于明争暗斗之地位，且和知一向反对利用汪精卫，是日方少有的坚持必须与重庆对话的重要干部，不可轻易断此渠道。他并且强调说：“现在抗战全局，除非站在共产党之立场，断不能无条件乐观。是则对敌诱导之工作，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现留此一线，自是有益无损。”[85]然而蒋态度已定，坚持要张回重庆。蒋介石自抗战以来唯一一次正式筹划，再三准备的秘密议和，竟因此胎死腹中。

从此，蒋对和谈再不抱有任何幻想。用他这时的话来说：“中倭构（媾）和为下策，盖倭对华之野心与其最近建设占领区及移民之状况观之，决非一纸和约所能解决，且世界战争未了以前，何能使彼交还琼州及沿海岛屿，即使我出任何代价，亦不能也。若我为保持西北与西南根据地，则倭本已无力西进，我又何必与之构（媾）和哉？” [86]此后，日方虽然又经过德国外长调停，并且又有所谓“钱永铭路线”探和，蒋仅出于牵制日本正式承认汪政府的策略考虑略做敷衍了事。据说，这个时候的国民政府甚至已经公开宣布：今后凡是敢谈论中日和平问题的中国人，都将一律以汉奸看待。[87]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系列风波和教训，对日议和之声，日渐风平浪静下来。一年之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美英之战争盟国，对日议和之事算是寿终正寝了。

简单的结论

根据以上种种事实之剖析与说明，我们应该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性的看法：

第一， 蒋介石是坚持抗日的。他自抗战开始，即坚持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基本诉求。当然，在此诉求下，蒋也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但就目前所知，几乎所有与蒋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而蒋接受议和，除受内外形势压迫以外，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使他误以为敌方准备接受其关于接受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乃至撤兵至长城一线的要求。因此，就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而言，无论蒋有否同意对日议和，其态度从未有所动摇。

第二， 蒋对卢沟桥事变前状态的解释根据内外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亦有调整的空间与趋势。如战争爆发初期，整个党政高层心理承受力较差的情况下，蒋对要求日本停战撤兵至长城内，还是长城外，是退入东北，还是可以继续占据内蒙古地区，态度上明显有所犹豫和摇摆。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持续，他则逐渐把自己的要求扩展到包括长城之外部分地区的整个绥远、察哈尔，甚至是热河地区去了。进而更基于民族主义的心态，再三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其他种种限制日人特殊权益的要求。其所谓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后来在实际上被大大突破。

第三， 蒋对抗日战争所带来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较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故其抗日态度明显较众多国民党高层领导人更为坚定。但蒋也无意完全堵塞对日秘密沟通渠道，故对自己信任的，特别是有亲属关系的党政要员或明或暗地从事

此项沟通，蒋感觉有需要时便不坚决反对。惟因对此种人平时过分依赖，有时反而往往难以左右，结果难免会感受其消极情绪的冲击，甚至因其擅自向敌人秘密接洽条件而备受困扰与牵累。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未必有蒋介石直接参与其间。

第四， 蒋在抗日问题上最值得讨论者，即抗战前期实际上缺乏持久作战的足够思想准备，较多地寄希望于依靠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尽速结束战争。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蒋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抗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之中，受此思想影响，企盼能早日结束战争，也是原因之一。当然，国民党人历史上习惯于把国家统一的范围划在长城以内的事实，也妨碍着蒋把收复东北三省列为当务之急。但这并不等于说蒋有心放弃东北主权，他从不承认伪满洲国，极端反感日本将“日、满、华”并列的提法，都显示他在东北问题上仍有坚持。故蒋持久战思想的欠缺以及在东北问题上的暂时妥协，并不影响他坚持抗日的基本立场。其到底没有走上妥协与和平的道路，最终把收复东北及一切失地规定为抗日目标，并走向持久抗战，与他的这种坚持不无关系。

----

[1] 参见藤井志津枝著：《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台北文英堂 1993 年版，第 201－204 页；黄友岚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4－415 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63 页。

[2] 对蒋档中这一方面史料利用较早并有多项重要成果者为邵铭煌。其已先后发表〈高宗武对日谋和活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近代中国人物论文集》，1994 年；〈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台北中国近代史学会暨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编印：《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6 年；〈萧振瀛工作：抗战初期日本以何应钦为对象的谋和触角〉，《抗日战争研究》1998 年第 3 期；〈直蹈虎穴秘档－解读董道宁战时潜访日本刺探报告〉，《近代中国》第 137 期，2000 年 6 月。然邵文对蒋介石与抗战前期国民党人的谋和行动的关系虽有涉及，却未做正面之研讨。

[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1－412 页。

[4] 参见藤井志津枝：《诱和－日本对华谍报工作》，台北文英堂 1997 年版，第一、五、六章，及第 55－56，57，75－79，110 页；黄友岗：《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0－84 页；参见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与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 年第 1 期；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9 页。

[5] 蒋将此严重后果概括为以下八项，即“甲、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乙、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丙、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丁、人民厌战，民心背弃；戊、政客反动，伪政权纷起；已、各国与倭妥协，瓜分中国；庚、倭俄以中华为战场，陷于西班牙水深火热地位；辛、财政竭蹶，经济枯槁，社会纷乱。”见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浙江奉化王宇等编：《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1 月 2 日条。

[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1 月 20－21 日条。

[7] 这七项条件是：（一）在内蒙古设立与外蒙古同样拥有国际地位的自治政府；（二）在华北设定从满洲国边境延至平津的非军事区，由中国警察维持治安，华北全部行政权即归属南京政府；（三）扩大上海的非军事区；（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外侨权利。（参见《汪伪政权资料选辑－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109 页。）蒋在 11 月 5 日接见陶德曼时，也重申了中方的既定方针，即“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愿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转见黄友岚前引书，第 54 页。）

[8]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1 月 17 日条。

[9]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2 月 2 日条。

[10]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0 月 1 日条。

[11]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1 月 5，7 日条。

[12]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2 月 14，16 日条，并见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台北中央日报社 1987 年版，第 2472 页。

[13] 其四项原则是：一、中国放弃容共政策，协助日“满”推行防共政策；二、在需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设置特殊的机构；三、日“满”华三国保持密切的经济关系；四、中国应对日本赔偿。九项条件是：一、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二、中国放弃排日及反“满”政策；三、在华北及内蒙古设立非武装地带；四、华北在中国主权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的共存共荣而设定适当的机构，并对该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以达成日“满”华经济合作之实；五、在内蒙古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同；六、中国应确立防共政策，协助日“满”二国贯彻该政策；七、在华中占领地区设定非武装地带，又在大上海市区域由日华共同合作维持治安及发展经济；八、日“满”华三国应缔结有关资源开发、关税、交易、航空、通信等所必要之协定；九、中国答应对（日本）帝国赔偿。附记：（1）日军在华北、内蒙古及华中之一定区域，为安全保障之目的，在必要期间内驻防；（2）前各项日华协定成立之后，才开始谈判停战协定。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九》（日中战争），东京みすず书房 1964 年版，第 51 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东京原书房 1973 年版，第 380－381 页。

[1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2 月 26 日条。

[15]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2 月 27 日条。

[1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五，1937 年 12 月 28，29 日条。

[17] 90 年代在大陆出版的抗战史著作和文章已较多地肯定是蒋拒绝了日本的亡华条件，只是对国民党内及知识界当中的妥协倾向未予重视。见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的枢

纽》，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1 页。另外也有继续坚持传统说法者，如称“蒋介石畏于共产党和人民的压力，以及国民党内多数不愿妥协投降的要求，不敢贸然接受这些十分苛刻的条件。”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0 页。

[18] 在蒋这一段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谈论我之政略在促进各国之干涉；或外交重点在使敌侵入黄河以南，引英俄不得不参加远东战争；或务必使九国会议怒倭而施以经济制裁，并允俄出兵助我；或应准备三年苦斗以促国际出而干涉等种种外交设想。

[19] 参见胡献：《简评陶德曼“调停”期间蒋介石的对日立场》，《抗日战争研究》1994 年第 3 期；并见藤井志津枝前引书，第 34－35 页。

[20] 有关这两种说法的具体内容及出处，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41－442 页注释 3。

[21]见黄友岚前引书，第 71－76 页。对于高宗武赴日一节，黄书的说法则与今井武夫的说法有所不同。今井称，蒋只是命令高在香港搜集日方情报，并不许高再去香港，高却受周佛海的鼓动，违反蒋的意愿到了香港，并贸然潜赴日本怒斥。见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9－73 页。另藤井志津枝亦依据当年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秘书罗君强之回忆，断定“一九三八年七月（应为六月－引者注）高宗武访日，是直接奉蒋介石的命令行事的。”藤井志津枝前引书，第 73 页。

[22] 意大利大使这时不止一次地提出希望调停。《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2 月 1 日，2 月 23 日条。并见蒋总统言论汇编委员会编：《蒋总统言论汇编》卷十三，台北正中书局 1966 年版，第 104 页。

[23]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3 月 22 日条。

[2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4 月 4 日条。

[25]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4 月 5 日条。

[2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4 月 9 日条。

[27] 《董道宁呈报赴日详情》，1938 年 4 月 12 日，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7 卷，第 45414 件。惟据董道宁报称，其赴日之行系奉高司长宗武之命，于 2 月 25 日东渡，其唯一目的在刺探敌国大本营最高当局对华真实态度，以供当局参考。

[28] 关于蒋托高宗武委婉转达和平条件一事虽为事实，但蒋托高转达和平条件之具体内容尚无史料披露，这里仅据今井武夫及松本重治之回忆。所以引述此回忆材料，仅因其内容与蒋这时对日本攻苏动向之判断相合而已。参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 71 页；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东京中央公论社 1975 年版，第 280－285 页，转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引书，第 442 页注 3。

[29] 《高宗武呈蒋委员长》，1938 年 6 月 20 日，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7 卷，第 45412 件。

[30]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7 月 9 日条。

[31]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7 月 22 日条。

[32]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7 月 31 日，8 月 19 日条。

[33] 关于高宗武纯粹是擅行赴日一事，还可见《高宗武呈蒋委员长》（1938 年 7 月 21 日）函。其函说明今井所谓高因胸部旧病复发，决定不回汉口，只写了报告寄给周佛海一说，亦不确实。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 73 页。高函如下："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此函及报告系着专员送汉（本拟亲自送来，惟职初行返港，又复飞汉，深恐引人注意，一俟有具体问题时再行前来请示）合并陈明，肃此谨颂钧安。职高宗武谨呈。"见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7 卷，第 45413 件。

[3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7 月 12 日。另据邵铭煌〈孔祥熙与抗战初期的谋和试探〉一文所引，可知蒋这时还特别要孔祥熙"切嘱马伯援、贾存德，勿再活动"。

[35] 见唐纵前引书，第 99－100 页。

[36] 关于乔辅三赴港密谈的时间，说法不一。有说 6 月 23 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引书，第 443 页；有说 6 月 15 日就开始谈，如黄友岚前引书，第 83 页。

[3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前引书，第 443 页。贾存德此时也曾作为孔与日人萱野长知之间的联络人穿梭于汉口与香港之间。见贾存德：《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 29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7－78 页。

[38] 《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1938 年 8 月 9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7 卷，第 45417 件。

[39] 《蒋中正致孔院长电》，1938 年 8 月 10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7 卷，第 45418 件。

[40] 《孔祥熙致蒋委员长电》，1938 年 8 月 11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7 卷，第 45601 件。

[41] 德国 1938 年 5 月以保护捷克苏台德地区日耳曼人为由，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强迫捷克割让这一地区给德国。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的保护国的英、法两国，于 9 月 29－30 日同德、意两国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举行会议，达成协议，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于 10 月 1－10 日间从苏台德地区撤退完毕，由德军分阶段占领。此即所谓慕尼黑协定。协定签订第二天，波兰即出兵强占了捷克境内波兰族聚居区，随后匈牙利也侵入捷克境内匈族聚居区，捷克斯洛伐春因此惨遭肢解。

[42] 《孔祥熙致蒋介石函》，1938 年 10 月 15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7 卷，第 45593 件。

[43] 这时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为首，极力倡导“可战可和”，积极“酝酿和平运动”。周佛海等并在汉口、广州、长沙、西安、重庆等地组织所谓艺文研究会，实为反对唱抗日高调的“低调俱乐部”。

[44]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9 月 23 日条。

[45]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3 日条。

[46] 《困勉记初稿》卷四十六，1938 年 12 月 9 日条。

[47] 杜石山究系何方人士，是否真为蒋之“亲信”，并秘密负责所谓蒋在香港事务，至今未见有任何资料可资证明。包括柳云龙，是否真为陈诚之人，亦尚未见有具体之考证。

[48] 参见杨天石前引文。

[49] 据杨文披露之蒋电两则，3 月 4 日内容为：“柳云龙科长译转。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豪。”4 月 13 日内容为：“转石山兄鉴：文电及小川翁、萱翁台示敬悉。一是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歉甚。惟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代为致意也。希与马君联络，并将详情电告。蒋元。”此两电一落款为“蒋中正”，一落款为“蒋”，而抬头受电人却以“兄”相称，显然不合一般之习惯与规矩。遍查蒋之电函，除对方地位较高且须十分郑重者外，很少用“蒋中正”之全名。通常予下属及平辈或熟悉者，向仅署“中正”，或“中”字，不仅不会用“蒋中正”三字，更不会用一“蒋”字。且蒋一向处事谨慎，以亲电形式处理此种绝密之行动，又署真名，又以示敌，更非寻常。

[50] 已知蒋 1938 年即曾两度要孔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其 9 月 11 日函称：“贾某事，应严令停止活动，否则即作误奸通敌论罪。”见邵铭煌前引文。

[51] 《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 年 8 月 24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1 卷，第 45616 件。

[52] 《戴笠报告》，1940 年 9 月 10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9 卷，第 45516 件。

[53] 《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 年 9 月 22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1 卷，第 45618 件。

[54] 《孔祥熙致介兄函》，1940 年 9 月 30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1 卷，第 45619 件。

[55] 今井武夫前引书，第 122－163 页。

[56] 《戴笠报告》，1940 年 8 月 12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9 卷，第 45504 件。

[57] 《戴笠报告》，1940 年 9 月 15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9 卷，第 45519 件。

[58] 《戴笠呈报与张治平谈话经过》，1940 年 9 月 6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1 卷，第 45515 件。

[59] 《炽章致布雷先生电》，1940 年 9 月 2 日；1904 年 9 月 3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38，35539 件。

[60] 《徐业道报告》，1940 年 9 月 9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9 卷，第 45509 件。

[61] 《戴笠报告》，1940 年 9 月 15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9 卷，第 45519 件。

[62] 其实，所谓“蓝衣社”，究为何样组织，归何部门，由何人负责，几十年来始终未见有所澄清。所谓戴笠为其首领的说法，亦缺少足够根据。

[63] 见今井武夫前引书“资料”第 15－29 件，第 328－382 页。

[64] 今井武夫前引书，第 346，354，356 页。

[65] 转见《戴笠报告》，1940 年 8 月 12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29 卷，第 45504 件。

[66] 《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 年 9 月 21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46 件。

[67] 关于孔、戴不和，影响到对日秘密工作问题的情况，除前引孔函外，还可以从唐纵当时的日记中得知。见唐纵前引书，第 155 页。

[68] 亦有称王新衡为宋子良与日本军方接洽之搭线者，但王之背后亦必另有其人。

[69] 参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 132，142，339，356 页；杨天石前引文。

[70] 《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 年函，9 月 4 日条。

[71] 特别是张季鸾 9 月 21 日函所称“子良近对铃木言，彼将为治闻疾病出洋外游，中日和平交涉急速需要结束”等话，明显只能是出自宋口或由宋所授意者，宋在其中扮演角色似无可疑。见前引《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 年 9 月 21 日。

[72] 《蒋就敌与宋子良间之和运已告停顿情报之批语》，1940 年 9 月 26 日，特交档案－民国二九年 292 册，第 290129 件。另唐纵日记当中也记述了这件事，见唐纵前引书，第 163 页。

[73] 滇越公路和滇缅公路相继于 1940 年 6－7 月间开始实行禁运。

[74]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一，1940 年 7 月 2 日，7 日条。

[75] 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省克记初稿》，卷十六，1940 年 8 月 10 日条；《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一，1940 年 8 月 6 日，9 日，11 日，12 日，13 日，15 日。

[76] 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 年函，8 月 25 日，26 日条。

[77] 参见《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1940 年 8 月；《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说明》，1940 年 8 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36 件，第 45537－1 件。

[78] 《对敌策略的几个疑点》，1940 年 8 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31 件。

[79] 《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1940 年 8 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28 件。

[80] 原件无标题，仅用铅笔注明“8/31 张携港之件”。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33 件。

[81] 《坚持之件》，1940 年 8 月，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28 件。

[82] 《省克记初稿》，卷十六，1940 年 8 月 31 日条；《蒋中正事略稿本》，1940 年函，8 月 31 日条。

[83] 《情报》，1940 年 9 月 16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1 卷，第 45626 件。

[84]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二，1940 年 9 月 22 日条。

[85] 《炽章致布雷先生》，1940 年 9 月 25 日，特交档案－中日战争 030 卷，第 45550 件。

[86]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三，1940 年 10 月 30 日条。

[87] 《困勉记初稿》卷六十三，1940 年 11 月 18 日，20 日，28 日；并见今井武夫前引书，第 175 页。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材料的比较与考察

（一）

迄今为止，张学良就西安事变所做的最为完整的回忆材料，仍旧是 1964 年 7 月《希望》杂志在台湾刊出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该材料当初刊布后，很快即被国民党当局收回，故外界知道的人很少。只是当 1968 年香港的《明报》月刊据以再度公之于海外以来，才引

起了广泛的注意。显然，几乎所有关心张学良生平和西安事变史实的人都读过或利用过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材料。但令人遗憾的是，似乎并没有人知道张学良写下这篇文字的原委，更没有人读到过这一文献的全本。这种情况不免使它的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此后 30 多年间，细心的读者只是在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 94 辑《西安事变史料》一书中印证了此一文献的真实性，并发现了一两段已经公开的摘要中所没有的文字[1]，除此之外仍无所获。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方面的学者议论到这一回忆材料时，不免多有保留，称其虽“非全然伪造”，“从文字和内容上看，显然经过删节甚或改动。”[2]

进入到 20 年世纪末的 1999 年，我们终于可以一睹此文献之全貌了。首先，张之宇在台湾《历史》月刊 1999 年 1 月号上具体说明了张学良此文写作之经过，并披露了张最初写给蒋中正这一长函开头部分的文字。[3]郭冠英亦在香港《明报》月刊当年第十二期，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撰文披露了前遭删节的重点。[4]两文均具体说明，张文乃应蒋介石要求所作，虽有检讨反省之意，但最初并不为蒋满意，且并无标题，仅以长函方式复呈。随后，台湾国史馆张鸿铭先生根据《蒋经国总统档案》第 0904 号档所存，已删去信函内容，成为“反省录”形式的此一材料，全文披露于《国史馆馆刊》第 26 期（1999 年 6 月）上。我们因此进一步了解到，此一文字几经修改后，在蒋经国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时已有定稿，且已定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5]由此亦可断定，当年在《希望》杂志，以及多年后在国民党党史会编辑出版的《革命文献》第 94 辑上所发表者，均是蒋氏父子依据此稿请人进一步修改后，提供给军内及党内高层传阅的文字。惟当时正值强调「反共复国」之期，其删改难免具有颇多政治因素考量的背景，标题之所以改为《西安事变忏悔录》，想亦为此。

比较已经公开的这些文字可以看出，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这篇文字至少应当有四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张根据蒋意起草并以函件形式上呈，即经张之宇、郭冠英部分披露者；第二个版本是经过初步修改，即张鸿铭根据蒋经国个人档案所发表者；第三个版本是台湾官方进一步修改后在军队将领内部传阅，即 60 年代《希望》杂志发表，而为世人所熟悉者；第四个版本则是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根据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上蒋经国请人在《希望》稿的基础上，略作修改后印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单行本，利用《革命文献》加以刊布者。根据张之宇的看法，第一个版本与第二个版本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6]但第二个版本和第三、四个版本之间，却仍有较多删改，因此内容上的差别相当明显。故此，笔者特将上述几个版本略加整合，以供比较，并简略地贡献一些个人的分析和看法。

惟须说明者：（一）原已发表者（即上述第三个版本）共为 27 款，下文皆照原有序号标注，凡序号颠倒或内置者，显示发表时曾经改动；（二）凡上述第三版本者均列为楷体；张之宇、郭冠英披露之信函部分列为仿宋体；其它当年删去而未发表者列为黑体；〖〗中字为前发表时被改正者；【】中字为前发表时另加者。）

（二）

以下为张文。

总统钧鉴：刘乙光同志转下的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评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近年来，更不愿自寻苦脑（系恼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　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

上供　钧座之参考，下垂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人之昭介（原文如此）。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忆，真不知从何下笔。即奉　钧示，而如此大事，良不敢不具实以对，亦不能不具实以对，更不应不具实以对。[7]

一、追忆往事，皆在二十年以上者，百念从涌而来，心中十分酸痛，想起甲则忘了乙，想起乙又忘了甲，由东攀缘（系援字之误，笔者注－原注）至西，由西又转南北。而反把主题忘却，又须重新返回追溯。因之，前后或有倒置，叙述有些杂乱。

二、不愿把良个人事，言之太多，更不愿回录有关他人之事，但不说明，又不能追源某念或某事发生之由来也。

三、良少读诗书，文笔拙劣，辞不能达意，又因心气悲怆，语文多有不恭谨或有形容词之过甚之处。总之，此书主旨在真实。良从来未向任何人吐录（系露字之误，笔者注－原注），尽今日所能想到者，尽量掬诚呈述。

四、数日来，反躬自问，再四思维。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较为真确。祸首为谁？祸首则为我心。自当由良之个人说起，方能容易明了前因后（系後字之误，笔者注－原注）果，整个事体发生之由来也。良不计颜面问题，坦白的先约略自我介绍，然后尽其能客观的追述事实。[8]

（1）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渡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此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种薰陶，如今思来，恐受西方之师友者，为多也。

（2）过于同情他人，不审远近存薄之一义，常有同情对方之感，而对于失败者更时生怜惜之心，化敌为友之念。

（3）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4）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致歧异方向也。

（5）为不心愿之工作而工作。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夫父子关系，不可同论）。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

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似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归国当时之志愿：（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私情所累，与他们仅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因此之故，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事。但其结果，事与愿违。

（25）方当良归国之后，蒋公对良特殊优遇，有三事，没齿难忘者也：（1）蒋公令良同车，往见汪兆铭于其宅；汪不在，而蒋公亲告其阍者，嘱告知汪，言张副司令曾亲来拜方。此等苦心，良深为敬感。（2）某日同车，蒋公规戒良勿再事荒嬉。（3）任良选择某项工作，挽回国人之观感，以增声望。此三者，已超过部属关系，非情同骨肉者，何能出此。

（6）当蒋公指示剿讨刘桂堂土匪或三省边区共匪，任良选择时，实皆非所愿，但由于情感及服从上的关系，毅然表示，愿担任比较困难之剿共任务，良从未自动请求调用东北军，一则不愿东北军离开华北；二则不愿意同他们再发生旧日亲密的关系。调用东北军，多由于蒋公的命令。尔后当蒋公命良担任整理军队之命时，听闻之下，十分兴奋，因此，正合良之志愿，可为将来抗日作准备工作，但事未成功，此为第一次重大失望。

方当边区共匪逃窜至陕，在良心目中，预想可告一段落，留鄂练兵，殊不知入陕命下，当时良在峨嵋，曾向蒋公表露，可作抗日后方根据，何不应命；所以良到陕北之后，修建医院，筹设卫生材料厂，在平凉购地，大兴建筑，在西安为眷属建新村，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此皆未向公家请拨款项，而自作之抗日准备也。本预想在短期间，可将匪肃清，殊不知，蜀匪全部窜来，此为第二次失望也。

（9）陕北剿匪失利，良在南京立即返陕，本先，一百十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次则一百0九师又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皎皎（佼佼）者。何则严正纯洁，牛则廉明忠厚，现在东北军人，想皆能道及。而一百十师，为东北军之劲旅，纪律修明，陕人对东北军本有烦言，惟对一百十师则称道之。迨何师长死事，陕人多为叹息。今在台之陕省人士，或于右任先生，当能作公道论断。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一如昔年，在其他国内战争中所经历者然。

（10）当返陕之后，召开会议，良为促进部属剿匪努力，曾表示东北军如此无能，余当引咎辞职。此论一出，彼等不但未能接受，反而哗然。风言流语，潮涌而来，最使难受者：一则云：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一日同归故土，到不得已时，又舍弃我等而去，“何等心肠”？一则云：良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良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死路”一条。（因“死路”一说，迩后有名为“活路”鼓动之刊物），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9]，言听计从者；非虽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10]；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11]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12]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同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13]，真使良伤心万分！

良对共党殊少研究和认识。昔年在北平时，曾奉命捕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文，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觉[14]此辈青年，思想上虽有错误，其热诚，其魄力，如善能利用，使其为国家[15]效力，必可有所作为也。

（11）当良在鄂时，李杜曾向良表示，拟返北满，招集旧部，再从事抗日工作；良深表赞许。彼要求数事：（1）去北满，必须由〖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2）路费及活动款项【由良供给】。（3）请良选派二人，帮彼办事，并任联络。良皆同意，乃派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随李出国，行至德国，未能到达目的而返。应赵二人，仍回总部任事，此为后来，交结中国共产党之线索也。

（8）在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上感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其反有内心为亲日者。患得患失，逢君之流亚，安能望其赞襄大业。（六）汪兆铭被刺时之怪现象，事后众语纷纭。（七）在良个人之观念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八）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12）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再见不能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良不能委罪于他人，虽然策出于他人，实有动于我心。但当时，未知共党真意何在？研讨之下，必先设法同共党取得联系，方能知其真意，而良等皆从未同共党有过来往，遂想到李杜往事，派人到沪，向李杜征询，李派一代表来，名刘鼎者，彼自称曾参加共党，被捕经保释放，彼可向沪方共党负责者接洽，彼自身并非全权代表也。由彼介绍，共党表示，愿同良个人一谈，但不敢来西安。良到沪，在沪西郊外，某西餐馆会见一人（彼未露姓名，据刘言，彼似系潘汉年）谈判未得要领。因当时良以招抚态度，而该人言词含混，未有结果。

返回西安，在当时之先后，有一人（良忘其姓名）持有财政部公函见良，要求进入匪区，良亲为谈询，彼不吐实，良告以若不露真实任务，难获通过，被迫无奈，告良负有接洽任务。良云匪区危险，共匪素不讲情面，以当年在鄂招贺龙之人被杀相告。于是彼吐露系共党同路人。遂令王以哲将该人送入匪区，俟其返回，告良接洽经过，并同良约，迩后互通消息。因此使良认为中央对共匪有可容纳之意。此时进剿前线，发生变化－共匪改换[16]作风。今日思之，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最成功的策略之一也。[17]

（13）共匪将被俘军官多数放回，声言东北军人，内心抗日，彼方认为同路之人，良曾将被匪释回，而散放共匪之言者，分别处刑或看押，因此越增东北少壮辈之忿慨。又曾将苗呈实、张潜华等看管，令高崇民离境，而左右责难更甚。

（14）当此之时甘泉自动解围，共匪表示，不敌视东北军之诚意。王以哲来电言，共匪派来

负责代表一人，到彼军部，请良亲为接见。此时良忆及昔年左文襄收抚马化龙之故事，同时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种种，遂飞洛川，会见该人，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约地点和时日。

良本对李克农之约，谅彼未必真敢前来，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即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本前已自动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来，如能化敌为友，岂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将此一群强悍，为国家收抚，从事抗日，自以为对国家，对领袖为无上之贡献。并可实现良一往心中之诸幻想。即毅然答复，约周来延安会见，嘱周师长福成妥为款待。

（15）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良告彼，中央已实施抗日准备，蒋公宵旰为国，双方辩论多时，周询及“广田三原则”事，良答以蒋公决不会应允，并举良曾参加某次会议，席间蒋公曾以“等待。死去，再讨论承认伪满”事，答复某人语以证之。[18]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但左右如何乎？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如中央既决心抗日，为什么非消灭日人所最限而抗日最热忱之共产党不止？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进而讨论具体条件：（大致如下）

（1）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2）担保不欺骗、不缴械。

（3）江西、海南、大别等地，共党武装同样受点编。

（4）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

（5）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

（6）共党停止一切斗争。

（7）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

（8）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

（9）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19]

（10） 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

（16）周更提出，如良存有怀疑，彼等言不忠实，愿受指挥，意受监视，任何时可以随时谴责。当时良慨然承允，并表示良有家仇国难，抗日未敢后人。上有长官，不能自主，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各以勿食言为约。良先震于李、周之胆壮，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

惊周恩来之才干[20]，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

（17）同周恩来会谈之后，良甚感得意，想迩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矣。今日思来，当时良之理想，愚蠢可怜，幼稚可笑。良本一狂热爱国者，痛恨被人侵略，不愿受日人之压迫，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所以曾有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抗俄之举。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

同[21]周恩来会谈之后，所虑者，惟恐蒋公不加允纳[22]，遂思[23]待机，向蒋向委婉相陈，此种停止剿匪共同抗日等计划，曾向阎百川、张季鸾先生等征询意见，得彼等同情赞许，越[24]增良之信心。所以屡至南京、洛阳以待良机。

（7）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投诚之意；当时蒋公问，有什么办法吗？本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蒋公嘱良同参典礼，良因未著军服，未果。当日夜间，再至孔宅晚餐，本拟再续陈述，因东北军军饷事，蒋公责良时以烦琐相扰，并催促速返，良遂未敢陈述，因之错过机会。尔后，蒋公至洛阳，又逢阎百川先生同在，良豫想此乃一好机会，不料蒋公在阅兵训话后，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为端纳、阎百川先生所见，皆曾以温言相慰。良彼时又生一幻想，决意求去，然而又恐东北人士责难，假如蒋公能派良出国，脱此苦海，暂避一时，曾向蒋公请求，派良赴英为贺使，正使已内定，求其次亦未允准。惜当时蒋公未能明了良之隐情也。尔后反复再思，必须不顾一切，向蒋公痛陈。曾在某次火车中，犯颜相述，惜未尽其词，而车已抵站，迎者至矣。

（18）良由洛返陕，答复共党，一时无法向蒋公请求实行停战计划，遂乃共相约商，局部暂停，仍由良担负向蒋公从容陈情。共党曾派叶剑英来〖求〗见，并携有双方停战计划和毛泽东之约书。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挥〗。良要求彼等须暂向北撤退，以期隔离，给予时间，容余酝酿，彼等认为河套地瘠天寒，需棉衣和补给，良曾以巨额私【款】赠之，令彼自筹；共匪撤出瓦窑堡，向三边北行。该时共党在西安设有代表处，邓发已曾到过西安。救国会，学联会，皆有代表。上海日人纱厂之罢，良亦曾以私款接济，彼时阴沉空气，已笼罩西安矣。

（19）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甲）有关刺激军队者：（1）请求抚恤、补给皆无结果。（2）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乙）有关良个人者：（1）陕人续某在总理陵前自杀未遂，良至中央医院慰问，彼之谈话。（2）双十节政府授勋，有冯玉祥而无良。有人向良解释，冯曾在华北抗日；良思冯在张家口之事，乃反抗中央，曾令庞炳勋进讨；何言功乎？动心者，非为一勋章（此句为革命文献补充发表者）。认为中央有轻视和奖励不正行动之意存焉。（3）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唐生智而无良，把良置于后方，为预备队之长，此事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已。再三自问，余何点不如冯焕章乎？[25]余诚年幼[26]轻躁，学识浅鲜[27]；但冯玉祥屡抗中央，发动内战。其为人良实有不敢恭维者，良自念归国以来，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诸如敦促阎百川同中央恢复旧感；不拟调动东北军等等。）。不过归国之后，蒋公骤付重任，对党政军教[28]，乱加参预，嫉恶如仇，妄加批评，时有恶语侵人而不顾。自问一本良心，为国为党，毫无私人利害存在，同志统是为公，自然

定能见原余之粗莽，尤念诸民主国政治家之故事；殊不知中国官场，则大谬不然者也。

（20）良对中央数同志怀有不满，因之更加忿恨，加深必须实现良之幻想。即：（1）促请蒋公登用良心目中所谓之贤哲。（2）容纳共产党，如总理北伐时然，给政府加添新刺激，以图耳目一新，挽回国人之观感〖念〗。（3）停止内战，团结作抗日工作，以免把有为之青年优秀自相牺牲。自认此念纯洁，遂力下决心，甘愿牺牲一切，不达目的不止。但该当时，当无存劫持之意。不过屡想强颜几谏，不顾一切，能使动容，得遂其志而已。（良秉性躁急，又素乏戒惧集养工夫，每从事谈陈，动则欲将心事急于一言尽呈方快。因之冲动不已，言词形容恶劣，则不自知。不但不能下气详为解说，反而言词常变了方向；走出正道之外，反乎初衷。此良生平最大弱点，而今日仍常不能痛改者。）

（21）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促成事变，彼亦藏有恶缘作用。（假如良仍旧是同何雪竹、张岳军共处，如今思来，恐不致发生该事。）方当一百十师失利之后，重拟围剿计划中，授杨虎城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彼对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称剿匪为“（无期徒刑”等牢骚话语。并言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良虽以好言相慰，但亦表示爱莫能助之意。然勉为筹拨十万元接济之。再当一0九师之败，良亦曾向彼表露倦于剿匪之心情。同时前后，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但此时良尚未明告杨虎城，拟同共党勾结之计划。不过在某一时期，杨已知之。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彼时杨之幕中有一王炳南，今日方知确系共党也。）关于停止剿匪，团结抗日，杨深表同情，力促良向蒋公进言，以期早已实现，节省双方消耗。迨至良从洛阳返来，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决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蒋公由洛阳来西安时，出心相随，实恐他人生变，殊不知他日作孽者，乃良自身也。

（22）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23）【西安之事，言来深为痛心，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发〖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秦邦宪），另一人则记忆不清矣。周到此时，俨然为西安之谋主矣。（一22）【事发之后，约周恩来之来，主要原因，系良自觉良部及杨部之无能，以及南京方面之作法，希周来共同谋划。】周等到西安时，告知良彼等初闻西安之变，深为惊讶，共党内部分为两派：主张激烈一派，主张不利于蒋公，叶剑英则其一也；一派主张和平解决，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周本人属之。共产党之决案是拥护蒋公领导抗日，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爱指挥；周等遂即参加已成立之委员会，当时西安所谓“三位一体”：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也。讨论当时情况，决议，坚决实现八项要求，勿再使变动扩大，早日和平解决。所求得

遂，拥护蒋公回京。同时调动共党军队，集中耀县、三原以备万一。事变当时，所谓八项要求，并非宣传空语，所求只希望政府应允，所计划者，仍为蒋公领导。（24）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再三追想[29]，何当时执迷不返？[30]【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31]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32]为何中日战事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良着重声明，非有丝毫委罪于天之意，因回思再三，微小如良者，个人一念之差而能引起如此之大乎？心哉！心哉！其力如斯乎？后之人，安可不戒慎也。

（一22）当事变之后，良曾召集西北剿匪总部全体同人训话，及在西京公园民众大会上之讲演，皆曾有纪录可考，当年在场者，今日在台湾想大有人在。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良该当时公开之言论，尊崇蒋公仍为吾等之领袖也。（26）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同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我等既已看过蒋公之“日记”，确知蒋公有抗日之决心，并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由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向，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蒋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所以力加说辩。良在该当时之处境，十分困苦；一方面对蒋公安全，须要竭力照顾，而蒋公又从不假以词色，总秉“成仁”之决心，责良无论任何堂皇请求，在威胁情形之下，决不应允，亦不同良等商讨；对蒋公则如是，对部属及各方面又须竭力说服，以期勿再扩大。而蒋公同良之关系，亦十分微妙，痛恨之，有若仇雠；爱护期许，则如骨肉，真是前无之事，使良在回忆之中，有永不能忘却之一幕。迨良随从蒋公飞抵洛阳，下机时，天色已垂暮，蒋公同欢迎者第一句话问：“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的照拂[33]他。”这是何等慈祥爱护精神之流露，良在当时，难过的几乎在人前落下泪来。今日追忆这些往事，一幕一幕地出现于脑海，心中十分酸楚，真是不愿往下再写了。

（27）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1）满腹忧患，胆大妄为，固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只用自身过去之经历为演绎，（如于学忠原系对敌，可为忠实之部属；宋哲元、傅作义可作好友，良同国民革命军曾对抗，一旦而为蒋公之部下等等。）殊不知，前提已错比，而推断自然大错而特错矣。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假若金石之坚，虫又能安生乎？良之不坚之处，正如夫子所云，在当时忧患、忿恨、好乐、恐惧。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义，自用自专；又未能趋就老成，才会酿成西安之变。否则，共产党何得施其技俩乎？所以，敌对必须要“知己知彼”，“同仇敌忾”；请准良说明引用这两句成语之意义，该当时，在西北剿匪之部队和将领（包括良在内），对共匪的主义，共产党确是怎么一回事，则殊欠研究，而对共党之理论，仅知其皮毛而已。多认为同共匪对敌，亦如过去一样，所以不发你死我活，同仇敌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里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的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来更彻底认识，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恕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个错误的人不少。否则，在大陆反共战争之表现，则同抗日战争之表现如何不同也。今日反共之斗争，必

须使大家确实认清共匪之真面目，自发斗争。“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古有明训；所以良觉得西安事变最大之教训，是在我们自己的方面，世界上并无强敌，乃系自弱耳。其次，才轮到研究共产党问题，至于共匪彼时乃趁虚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尔后，所用之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同道好友，自堕其壳中，毫不自觉。“知己知彼”，共产党可谓确善发挥。我们之宣传，多本主观，空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之作用也。

（三）

从以上的文字中不难看出，对张氏原文的删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文字上为行文或逻辑着想；二是事涉其他仍在位之重要人物避免负面影响；三是涉嫌过事张扬自己容易引人同情之处；四是基于政治考量纯为宣传效果者。以下就此四个方面删改之必要与意义，略作一些分析。

第一，就文字方面的修改而言，原文确有个别用词或语句不通者。如第十一款中「去北满，必须由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两项原因，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将「由俄」改「经俄，」同时删去「两项原因」，加一「故」字，全句变为「去北满，必须经俄，北满已有共党活动势力，故必须向共产党取得联系。」确较原文为通顺。但此种文字加工数量不很大，且个别语句的变动也有令人不解的地方。如第二十二款最后一句中有「除非其别有用心，当皆可能实证」，与原文「除非其别有用心，当该可证实」相比，原文中「证实」一词显然比修改后的「实证」一词更为贴切。同样，在文字变动上最多的段落调整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由上列内容可以看出，早先提供内部传阅之二十七款，较原文变动颇大。像第七、八款原本分别在第十一款和第十七款之后，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款也被全部打乱重排，第二十五款原本在第五款后，却被后提二十款之多。而这些变动无论就逻辑，还是就行文，似乎都无必要。如早先公开之第七款，原文中是在第十五、十六、十七款之后，时间上有因果之联系。因为十五、十六、十七款谈的是张氏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周慨然承允张所提十项条件，因此才有产生第七款张解释说他此后几度试图向蒋公陈述自己与共产党有所接触，后者已有投诚之意，却均未能达到目的的情况。而段落变动后，这一款内容被提前到第六款之后，而第六款说的还是张刚刚奉调陕甘，尚未开始剿共时的情形。其这时与共产党尚无任何关系，突然接入第七款内容，无论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明显欠妥。

第二，就事涉敏感人物的修改而言，应当说并不太多。这是因为文中提及人物不并很多，且部分人物或无可回避，或已被判定为反动，因此，所删者不外是张提到何雪竹（成濬）、张岳军（群）、曾养甫、蒋廷黻、阎锡山、张季鸾、于学忠、宋哲元、傅作义等人名字的地方。惟此种删节，个别地方确实存在改变原意之处。最引人注目者如第八款中谈及曾养甫、蒋廷黻等人之处，一经修改，几乎面目全非，明显地可能扭曲作者原意。原句为「友朋之讽劝，如曾养甫之书诗相赠，蒋廷黻之不拘形迹，促膝而谈。沈钧儒、王造时等则云，良同蒋公密切之关系，以及今日之地位，与过去之历史，应破釜沉舟，向蒋公陈谏；当无不听纳之理。他人不敢言者，以良当言之。」修改后则变成「友朋之讽劝，如沈钧儒、王造时等之鼓励。」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其中之问题。

第三，就涉嫌过事张扬自己之处，内部传阅稿中删削甚多。如张原文中强调自己「先大夫在世之时，已常有冒犯之表示。迨先大夫遭难之后，更加深国家必须统一，全国互相握手一致对外之观念，凡有作为，皆向此一目标迈进，往事可考。殊不知这些观念，其后果致使导至

歧异方向也。」此种说法似有过事夸耀自己之嫌，且将西安事变之发生与此相联系，似为当局所忌。又如，反复强调自己如何忍辱负重，称「彼时外人多认良为蒋公之亲信，言听计从者；非不能进言，是不肯痛切陈词。良之左右，则误会良对蒋公私感至上，忘却一切，只知逢迎，而不计及东北人之利害。良内生烦闷之心，外听侮辱之言，当时之心情，真笔墨难以形容者也。求去不得，欲罢不能；图进不成，而心秘藏所图者，被他人误解则不计，而左右亲密僚属同袍，希望他日共患难者，对良误解如是，真使良伤心万分！」此种表白，亦很难视同自省之词，且容易引起同情之效果，故亦不能保留。再如，张原文中说明自己当年倍受各方重视、僚属爱戴，却甘愿服从于蒋公之情形，亦涉此嫌。原文称「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好些旧日僚属，当良归国途中，到港迎迓。在船上数日，良对彼等态度表示冷淡，彼等安知良心中之事，遂致忿忿，恐当时之人，今日尚有在台湾者。」另如太多强调公忠之心不得理解，致冤屈难伸之处，即所谓「一秉忠诚，处处为国家，为领袖，从未计及个人利害」；对事变之发生，总认为并非纯系个人之力所造成，有所谓「再三追想，何当时执迷不返？为何屡失直陈之机会？为什么夫人在那时，未早有所参预？为何中日战争不提前早爆发？致良酿成巨祸，百身莫赎，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延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然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凡此种种，无疑也与当局所希望于张氏「反省」或「忏悔」者间有距离，对激励当时岛内将领反共意志及提高防共统战之警觉不利，故亦在删削之列。自然，原文中那种太过张扬蒋氏对张之「宠顾」[34]的文字，也有多处删节，其用意自不难明了。

第四，蒋要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情况之时，正值其全面反省前此失败，总结教训之际。由此而重视张此一文字的政治宣传作用，实属必然。实际上，蒋要张写回忆之时，恰值蒋在不分日夜赶写修订《苏俄在中国》一书之际。从该书过程稿中可以看出，蒋十一月的修改稿对西安事变一段写得十分简略，十二月的修改稿中即大段增加了有关张学良回忆的内容。这表明，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命张就西安事变写出书面回忆，确与其要充实这一方面内容的需要有关。故十二月得到张的回忆之后，蒋马上就将张回忆中有关的内容补充到自己的书稿中去了。可见蒋对张回忆的内容十分重视。其随后印成内部本提供给众将领传阅，以后蒋经国将其印成小册子在中央全会中传阅，意皆在此。

据郭冠英引述承命转知张写此文的特务队长刘乙光独生子的回忆说：张「第一次写了蒋总统看了很不高兴，对我父亲说：『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又把报告退回来重写了一次。」[35]联系到蒋当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和目的性，以及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意义及自身作用的理解程度，张第一次成稿后受蒋责备，确有可能。毕竟以张政治之教育及训练、觉悟之程度，他确实未必能一次写出符合蒋要求的内容。即使再度重写之后的内容，也注定难免会与蒋之要求仍有距离。故从政治层面对张文有所把关和修改，然后再拿来教育党政军高层干部，仍为必然之举。

传阅稿中此种修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宣传角度统一口径，规范文字；一类严格削删张对中共人物表示赞佩，或可能引起类似误解的用语。前者如第十八款中「共党曾派叶剑英来见」，修改后变为「共党曾派叶剑英求见」；叶带来毛泽东之约书，表示愿在抗日前提下，共同合作，「军队则听受指导」，改为「军队则听受指挥」，等。此种修改虽为个别文字，但在在显示当局必欲坚持正统之观念。传阅稿中将张自称在延安会谈中所提十条件中「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条删去，其用意亦在于此。因此十条所称共党武装接受点编，取消红军名称，停止反对政府，同国军待遇，准备抗日等等，中共当年都曾赞同并接受。惟后来造成两党冲突之关键，乃在共产党仍旧拥有自己的武装，只同意接受指导，

并未如蒋当年所期望者，真正接受指挥，更不曾为国民政府所「收编」。「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员遣散」一句，明显地认同中共在抗战中可以保有自己的武装，这就如同「军队则听受指导」一句中「指导」一词不合要求一样，自然需要有所修改。同这一类文字相比，后一类文字更足以显示张政治上之幼稚。如张一面大谈中共统战及宣传「技俩」，一面却津津乐道于早年奉命捕到「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才，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其言词中对共产党人「其热诚，其魄力」之钦羡，跃然纸上。尤其是在谈到与李克农、周恩来会谈的情形后，更是突出强调中共干部之胆识才干，称自己「先震于李、周之胆装，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如此之类，自然也是非削删不可的。

依据对上述不同版本的回忆材料之对比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即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确曾受到相当程度的删改，有些修改对其原意也确有某种损害，但也仅此而已，与所谓「伪造」无涉。严格地说，虽然经过删改，其基本内容以及张当时对此一事变发生经过和原因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而受到扭曲。故新的全本的出现，不会根本改变以往《西安事变忏悔录》所留给我们的印象和看法。

（四）

对于张学良此一回忆材料之真伪，早已不复有争议。惟其是否由衷之言，是否经过删改，一向争论较多。蒋经国档案中存稿刊布，经与前已公开之内部传阅稿相互对照，其是否因为受到删改而遭全面扭曲，相信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张的由衷之言？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张作此文，是否会有太多违心之论？

关于张在 1956 年 11 月应蒋之要求所写的这一回忆可信与否的问题，显然需要从事实与情感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就事实而言，张所言经过至少就他自己的记忆应当说大体属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张学良这一回忆材料与其获得自由后有关的谈话材料加以映证即可得出大致的印象。[36]惟个人的记忆与历史事实本身难免会有许多出入，何况张学良为蒋写回忆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二十年之久，九十年代再度回忆时更远离当年达半世纪还多。因此，就事变形成及其发生的经过，许多具体的情况，其回忆与事实本身存在较多的出入，当不可免。过分相信其回忆，以为只有张的回忆才可信，此种态度自不可取。再加上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内幕，如事变期间蒋、周会面时所谈为何，张也未有丝毫的透露。故在事实方面，张的回忆远不如许多依据档案材料深入研究的著作可资借鉴，其史料价值相信已不甚重要。

就张此一回忆材料而发生的争论或疑问，也许更多地还是在其情感认识的层面上。确切地说，即是在仍旧遭受软禁，没有人身及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张应蒋要求所做的这种回忆，是否可能如实表达其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以及对中共当年作用的真实认识？有关这一点，也许张获释后就此所做的一段说明较能反映他内心深入的想法。他说：对于西安事变，「蒋介石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着（应为如－引者注）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37]「不能只说好的」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他当年在写此回忆时确实心存某些困惑。

张在此所说的「写出了大纲」，当是指蒋要张写的这个回忆材料。就此文字的初稿而言，应

该肯定张确实是想好的、坏的都要如实写的。惟当时的条件局限性之大，张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表达看法，亦不难想象。而更重要的是，以当时岛内的情势和蒋对总结前此失败教训，以便找到反共复国方法之执着，张的这个回忆不免也会被要求以此为目的，如此要想兼顾事实之叙述和个人理性之总结，自然相当困难。张力图多少说得全面一些，好的、坏的都要提到，实际上处处想为自己暗做辩解，因此第一稿被退回，重写后的文字仍要受到删改，皆难避免。

严格地说，不论蒋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38]很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39]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当然，时势与环境之骤变，往往会带给人相当的心理冲击。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面对此种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蒋的谴责，张一度被迫扪心自责，曲意邀宠，甚至相信自己罪孽深重，并有所谓「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至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的说法，将事变之发生归因于上天之力，均在所难免。基于此种心态，服从于蒋之要求，在回忆中怨天尤人，努力表白，强调中共作用，提供防范共党技俩之藉鉴，亦为时势与环境所使然。但以张相当特殊的经历、教育背景和草莽性格，其显然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世雄杰，而非历史的罪人。此种心态，不仅在张自由后的言谈话语中经常有所流露，其实细读张上述回忆，应该也不难品味。因此，一旦时过境迁，张之看法和说法必然都会发生改变。

1991 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40]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张学良被押上军事法庭时的态度，就应该可以了解这大概是张内心一贯的想法。当年，张送蒋回京，「负荆请罪」，但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41]。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其所谓「主张」是什么？就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也即是张再三说明的，他与蒋之间那个「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42]既然「宛若仇雠」，又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与否的重大「政

见之争」，张坚持其主张不错，绝不后悔，甚至声称如时光倒流也「还是一样那么做」，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对张学良应蒋氏要求所写的上述回忆材料，必须有分析地来了解。因为，其中的说法未必都是反映其内心深处的想法的。就内心深处而言，张对西安事变大概从未真正有所「悔过」。

----

[1] 此实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印发与会者参阅之件。参见《革命文献》第 94 辑（西安事变史料），台北 198 年版，页 109。其中摘录的内容较已公开的文字略少，但却增加了张学良回忆他与某持有财政部公函要求进入匪区者谈话的文字等。

[2] 毕万闻就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所作注文（1）。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1191。

[3] 之宇：〈关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历史》月刊，1999 年 1 月号，页 67－69。

[4] 郭冠英：〈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明报》月刊，1999 年第十二期，页 57－61。

[5] 惟此修改究系根据当局意图由张学良自为，还是经过其他人之手，目前尚无进一步的资料可以印证。张鸿铭谓「观其内容，应为张氏亲笔所写」，颇足质疑。因以此文之内容，固可断定系张氏自为，却不能因此作出「应为张氏亲笔」之判断。况据郭冠英在《张学良侧写》中介绍，张以长函复蒋时，「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其又如何能够「亲笔」誊写上万字的改正稿。

[6] 在张之宇前引文中张仅公布了长函抬头起首的部分，对正文部分认为主要只是对蒋中正的称谓有所变化，即由「钧座」改为「蒋公」矣。

[7] 此段文字在张鸿铭披露的定稿文字中已被修改为：“关于西安事变，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近念总统蒋公对良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领袖之参考，下垂後世之昭戒。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记，真不知从何下笔：”

[8] 以上文字为张之宇前引文所披露者，惟一、二、三、四项内容可参照张鸿铭前引文。

[9] 郭冠英文中此「亲信」两字为「心寄」。

[10] 郭文中此「逢迎」两字为「酬谊」。

[11] 郭文中「听」字为「集」字。

[12] 郭文中「秘」字为「密」字。

[13] 郭文中「如是」为「如此」。

[14] 郭文中「觉」字为「且」字。

[15] 郭文中无「家」字。

[16] 郭文中「改换」为「改变」。

[17] 此款曾经《革命文献》94 辑补充发表。

[18] 此句曾经《革命文献》94 辑补充发表。

[19] 此条曾经《革命文献》94 辑补充发表。

[20] 此句在郭文中为「再实惊于周恩来之才干」。

[21] 郭文中「同」字为「与」字。

[22] 郭文中「允纳」为「与纳」。

[23] 郭文中无「思」字。

[24] 郭文中「越」字为「烈」字。

[25] 此句曾经《革命文献》94 辑补充发表。

[26] 郭文中「年幼」为「年轻」。

[27] 郭文中「浅鲜」为「浅显」。

[28] 郭文中无「教」字。

[29] 郭文中「追想」为「追思」。

[30] 联系下文，这里「何」疑为「为何」之误。另郭文中此句为「当时为何执迷不返？」

[31] 郭文中无此句。

[32] 郭文中此句为「为什么夫人在当时不早有所参与？」

[33] 郭文中「照拂」为「照顾」。

[34] 见张之宇前引文，页 86。

[35]见郭冠英前引文，《明报》月刊，1999 年第十二期，页 58。

[36] 参见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 年 6 月 17 日，8 月 4、5、6 日；张学良：〈记谈东北军两三事〉，1991 年 5 月 4 日；张学良：〈答美国之音记者问〉，1991 年 5 月 19 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1149－1166，1183－1189。

[37] 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 年 4 月 25 日，《张学良文集》（2），页 1181。

[38] 已知张在回答记者就中共作用问题的问话时只是提到：「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抗日抓住了民心。」见前引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

[39] 在这一点上，连蒋都多少有些感到意外。从《苏俄在中国》十二月过程稿增加的内容，亦即定稿的内容可以看出，蒋对张强调事变并无中共直接策动一点也颇感「意外」。见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北 1957 年版，页 。

[40] 《张学良文集》（2），页 1165，1187。

[41] 《张学良文集》（2），页 1111。

[42] 《张学良文集》（2），页 1143。

美苏冷战的起源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战后中国走上革命道路，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分析了战后中国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推动革命的种种动力，却多少忽略了对外部条件和作用的探讨。迄今为止，注意到分析说明战后中国革命外部条件的文章著作与那些强调中国革命内部原因的文章著作相比，可以说屈指可数[1]。而不少谈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又往往习惯于把这种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简单地归结为具体描述中共成功抵制外国干预或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的过程。因此，有关战后外部世界变动及其对中国革命所起作用和意义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讨论。

何谓战后中国革命的外部原因？通常，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都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战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结果，中俄两国档案公布的迟缓就极大地妨碍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是，严格说来，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苏联究竟在何时何地向中共具体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它其实更重要地反映在，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迅速分

化与改组，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机会，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便利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关于外部因素和作用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革命成败的情况，战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提供了一对最具可比性的例子。两国同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共产党的力量当时在国内都占绝对优势，并且远较战后中共当时在国内的力量为强，结果却是一个惨遭外部干涉而失败，一个轻而易举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所以出现如此相异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 1944 年 10 月丘吉尔与斯大林有过一个划分双方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希腊划在了英美一边，结果不仅英美敢于大胆干涉希腊革命，而且当希腊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时，俄国人却不动声色，袖手旁观，眼看希腊共产党人被强敌所压倒。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者是否有坚强的决心和能否独立自主，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中革命一方是否居于优势的地位，外部条件有时会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 1945 年 2 月雅尔塔会议事实上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战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很大程度上恰恰接近于希腊，而不是南斯拉夫。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很可能会重蹈希腊革命的复辙，遭到美国的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美军在华北登陆助蒋接收……，一切都显示共产党人正在陷入希腊共产党人曾经遭遇过的困难境地。但是，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并没有干涉，共产党只用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由弱变强，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取得了世人意想不到的全面胜利。共产党真的不曾得到过苏联的帮助？美国人为何不敢出兵干涉？……十分明显，仅仅用毛泽东如何“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似乎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本文准备就战前战后中国革命过程中国际因素的生成和作用做一扼要的分析，旨在说明，战后国际局势出现了怎样的变动，它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七十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 20 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2]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 •S •谢伟思、约翰 •P •戴维斯和约翰 • C • 文森特等人。[3]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

因为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4]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 1942、1943 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6]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要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落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于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作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苏联的怀抱之中。[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8]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做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罗斯福 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9]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10]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

制的经济发展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11]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12]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然而，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断言谢伟思、戴维斯的主张为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真的倾向于渐进改良、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火的做法”；等于说如果美国当年选择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策，即使中共掌握了政权，新中国也不会倒向苏联，而且还会采取能够让美国人认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实事求是地说，谢伟思、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儿一厢情愿。而据此来指望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共引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也是靠不住的。

既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也不清楚共产党的理论，多半是造成谢伟思、戴维斯等人一厢情愿的关键所在。任何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虽然通常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号召，但他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的手法和目标却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的理论也很清楚地规定了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阶段，被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所看重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本来就是其理论题中应有之义。仅仅因为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取了温和的社会政策，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向后倒退了”，强调他们是由于认识到“以往的过火做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谐，因而决心“迁就人类意志薄弱的一面”，真诚地走向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和独立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谢伟思、戴维斯这些年轻外交官，甚至也包括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上层领导人在内，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所知甚少。[13]

当然，必须看到，对中共在政治上的同情，的确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中共：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崇尚暴力，一个主张改良；一个坚持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一个强调要发展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显然，后者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民主理念。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其实仍旧是严守着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的。他们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观念出发，对苏联以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的戒心。谢伟思、戴维斯对战后苏联东扩的高度警觉与担忧，就突出地反映出他们在观念上是排斥苏联，并把它视为潜在敌人的。换言之，一旦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将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甚至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逐渐凸显出来。抵制苏联，并殃及各国共产党人，是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这一点出发

来认识问题，设想战后美国会实行联合中共拒止苏联的政策，或是设想中共会采取迎合美国疏远苏联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

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其实，随着欧洲战争接近胜利，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渐渐暴露出来了。而它所带来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美英与苏联之间的问题。

还在围绕着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中，苏联与美英之间就已经开始产生分歧。莫斯科怀疑美英有意坐山观虎斗，部分美国将领也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制度的苏联两败俱伤。[14]为了战后苏联自身的战略利益，苏联开始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相继开始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军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亚等国，也极力扶持共产党成为统治的力量。同样，面对东欧以及巴尔干等国共产党的崛起，英美政府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下流的无名之辈的一时高涨的欲望"而抛弃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因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化一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他们决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建立民主政治。[15]在这里，人们事实上已很难区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双方政治和战略考虑中究竟有什么不同。无论英美还是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显而易见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说到底其实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而不是主要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势力范围，正是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对欧洲战略地位重要的一些小国的争夺，最先触发了英美和苏联之间一度被战争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对立。1944 年 2 月，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注意到其强烈的反苏态度，并获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据此，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着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告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6]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乘苏军进抵华沙城外之机于 8－9 月间在华沙发动的起义，很自然地被斯大林视为是波兰流亡政府企图排斥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17]的重大阴谋。[18]结果，英美和苏联之间围绕着应否援助华沙起义问题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立即向华沙波兰爱国者空投物资和军火"，"不然你是否同意火速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进行此事？"斯大林对此断然回绝。他得到的情报使他有理由宣称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完全是"一小撮权欲熏心的罪犯"，这个时候发动起义是别有用心，因此他不仅坚决拒绝"同华沙冒险发生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帮助英美空军实施空投行动。可想而知，苏联的态度不能不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批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指责苏联"基于残酷无情的政治考虑"置抵抗战士于死地，丘吉尔则主张通过舆论揭露俄国人的这种"古怪而阴险的行径"。[19]

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导火索。只不过，这个时候不仅盟军在欧洲作战离不开苏联人，就是美国在远东战场上也还要指望苏联人帮忙，再加上盟军进展缓慢，苏军已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眼看就要染指巴尔干半岛，

希腊、南斯拉夫又都出现了共产党同流亡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整个形势对英美明显不利。因此，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能不一面要求盟军指挥官尽可能抢占欧洲地盘，一面对斯大林作出某些妥协。华沙的起义者刚刚放下武器，丘吉尔就压抑住强烈的愤慨，与外相艾登急匆匆飞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讨论希腊的命运问题了。

丘吉尔之所以如此重视希腊问题，是因为希腊卡在英国通过地中海接通其东方殖民地的咽喉处，对英国极具战略意义。而强大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却突然间否认流亡政府，准备独立掌权，这等于说将来地中海的通道很可能会处于俄国人的炮口之下，丘吉尔当然要坐卧不安了。他这时在考虑用武力来对付希腊共产党了。他一面要求英军总参谋长准备紧急调动一万或一万二千军队进入雅典，呼吁美军协助英军行动，一面强硬地表示，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英美必须准备鼓动和援助希腊人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20]

要对希腊共产党动武，丘吉尔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反应。因为，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谅解，英军即使能够占领首都雅典，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取得对整个希腊半岛的控制权。早就熟悉了殖民主义那一套强强交易的丘吉尔，于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主动提议苏联战后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主要的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反正苏军已经大举进入罗马尼亚，并逼近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边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势力强大，英美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最多也只能争取到如此程度。考虑到苏联在经济上和军备上还不得不依靠美国，在波兰以及以后占领德国等问题上也还必须设法取得英美的合作，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的提议。据此，双方于 10 月 9 日商定，罗马尼亚苏联占 90％，希腊英美占 90%，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各占 50％，保加利亚苏联占 75％，英美占 25％。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21]

不论后人对“百分比协定”有何种批评，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希腊共产党从此成为英军干涉的牺牲品，但英美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党人的囊中物。甚至不只是罗马尼亚，就连 75％的保加利亚、50％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当希腊共产党的反抗遭到英军镇压时，斯大林显然并不感到内疚。[22]相反，当时，特别是英美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变强以后，对与苏联的这一交易始终有些耿耿于怀的，却是始作俑的丘吉尔本人。很明显，如果说斯大林从来都是拿阶级划线，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共产党专政的话，丘吉尔则从来都是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黑白的政治标准，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主张深恶痛绝。还在华沙起义过程中，丘吉尔就曾与罗马教皇大谈“共产主义的危险”，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苏联人把他们的那一套推行到这么多国家中来呢？他这时曾公开发表文告，不指名地告诫欧洲人民不要接受苏联向欧洲推行的苏维埃制度。他宣称：在当今世界，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选择。如何检验各国人民究竟是否享有自由与民主，就是：“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不屈从于暴民威胁？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做到一视同仁呢？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23]

毫无疑问，这决不仅仅是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它同时也是欧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家的看法。因此，丘吉尔的讲话当时就得到不少美国官员的支持。哈里曼甚至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把它在东欧的这一套照搬到远东去了。他为此曾接连提醒华盛顿说：苏联正在通过暴力手段向东欧国家推行其“秘密警察（这就取消了个人自由）、新闻检查、奴化教育等”的做法，“当他们能够向中国和太平洋方向觊觎时，这种政策就会伸展到那里。”美国决不应该让苏联为所欲为。[24]

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到了 1944 年底和 1945 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容置疑了，但是，越是接近胜利，美国人就越是关心这最后的代价问题。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绝对优势，减少美国人的牺牲，罗斯福也不得不采取丘吉尔“百分比协定”的办法，通过与苏联交换某些利益，来取得苏联的合作。[25]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达成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划定了战后美苏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国，长城以外归苏联，长城以内归美国。但是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签过字的秘密协定条文中可以看出，美苏两国并没有就此达成明确的协议。从斯大林再三提到其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沙俄因 1904 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明确要求租借大连、旅顺两港和中东及南满铁路的要求，可知斯大林是有把中国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的某种打算的，但罗斯福并没有全盘接受。双方最后达成的条文规定：“1、维持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 1904 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在这里，一个“大连商港国际化”，一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合营， 再加上“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同意把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和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的态度。[26]

很难认为斯大林不清楚美国人的这种态度。问题仅仅在于，雅尔塔协定签字之日，欧洲战争尚未结束，莫斯科与英美间在欧洲还有许多麻烦要解决，况且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无建树，只凭一纸出兵许诺，就得到沙俄当年丢掉的在中国东北的主要优惠权益，不仅被美国拉入大国行列的中国因此无法就外蒙归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在太平洋得到对自己极具战略意义的不冻港，可以取得逼近日本列岛的千岛群岛，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提出更多的要求，斯大林这时还缺少足够的筹码。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苏联在东欧诸国扶植共产党上台的步步成功，斯大林已经形成了一种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他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那就是：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27]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深受英美抗议的行动。包括逼迫罗马尼亚国王解散联合政府，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不允许英美派观察员或代表团访问波兰，不允许其代表前往波兰处理苏军在波兰解救的英美战俘问题，等等。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此提出交涉时，斯大林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28]

既然凭实力讲话[29]，斯大林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可能界限自然也看得十分清楚。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于英美盟军占领下的国家和地区，则明显地采取了旁观的姿态。斯大林对“百分比协定”的严格遵守，就连丘吉尔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对处于英美占领区内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其在民众中是否占据优势，都一概要求其与英美支持的当局合作。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抵抗力量最终解除武装，党的领导人加入政府，走上议会道路，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在雅尔塔及其以后明白承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再三表态支持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是这一政策在远东的延伸。[30]希腊共产党的遭遇，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斯大林的观点，即二战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只能而且应该由苏联或者英美的军队来决定。共产党发动的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革命，都必然会遭到英美军队的武装干涉，最终归于失败。

熟悉列宁著作的读者都会了解，斯大林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出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列宁的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也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31]为此，列宁当时不仅坚决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还采取了积极推动欧洲革命的方针。不过，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道理，而且依据斯大林的逻辑，也并非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上述立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在回答有关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就曾清楚地表达过他的看法。他当时写道：“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保证来摆脱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企图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特别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其一是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其二是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32]

不难看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和通过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保护苏联的目的，始终是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强大军队和在几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并突出强调其意义，更多的只是因为历史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而这与列宁通过推动欧洲革命来巩固本国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显然，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给红军提供了大举进入东欧各国的机会，依照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条件，要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尚不知何年何月。因此，斯大林非常看重这一机会，也生怕任何无序的革命会毁坏了共产党人盼望了 20 多年才得来的这一系列胜利成果。更何况，要医治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创伤，使苏联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国，以追求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化，在完全有可能利用战时与英美达成的谅解，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下，他也绝不愿意把苏联拖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当中去。[33]

相信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不仅要求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

而且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无条件服从它的一切需要，这是生活在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念之中的斯大林认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斯大林多少遍地把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也不论斯大林多少次地把自己说成是俄罗斯（或者说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我们都不能把他简单地等同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者，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时只是在谋求俄国的民族利益。必须看到，斯大林维护的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苏联。所谓苏联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首先是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俄国民族的利益是在其次的。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和决定政策；从来没有忘记苏联根本上不同于现在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他和大大小小的丘吉尔、罗斯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二战后苏联的走向，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鼓励其他国家革命，它都不可避免会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特别是与一心想要在全世界充当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陷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之中。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磨擦可谓层出不穷。这边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难平息，那边苏联又向土耳其提出了领土和海军基地的要求，力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拥有黑海的出海口；向伊朗提出了获得其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以确保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达到目的，苏联甚至不惜在沿土耳其边境的伊朗和保加利亚一侧调兵遣将对土耳其示以武力威胁，在伊朗则采取拖延撤军和扶植亲苏的分裂政权的办法以相要挟。[34]

不仅如此，苏联在远东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 5 月 8 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大批苏军如约开始向苏联远东地区集结，准备投入对日作战之后，斯大林对占领中国东北较前也更加充满了信心。既然苏军将要占领中国东北，依照“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逻辑，苏联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从苏联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斯大林不会为此去违反与英美达成的协议。毕竟，雅尔塔协定涉及到不少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美国政府遵守协定才可能落实的有关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等领土的重新归属等问题，苏联方面对协定的任何变更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但是，轻易地根据协定中的主权规定就把东北交还给国民党，斯大林也心有不甘。因为国民党过于亲美，而美国一旦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进入东北，对苏联的安全不能不是一种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 7 月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措辞不严密的空子，提出了许多大大超出协定规定的具体条款的要求，并且以中共即将进入东北相威胁。[35]斯大林新要求的实质，说到底，其实就是想要逼迫国民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中国东北主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围绕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公开出面加以干预[36]，这使中苏谈判多少有些起伏。但斯大林最终还是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斯大林很清楚，一旦百万苏军跨过中苏边界，到时候苏联还可以有所作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当然，基于雅尔塔协定的约定，斯大林也作出了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承诺。[37]并且在签订了条约之后，斯大林还专门致电毛泽东，要求后者立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38]斯大林这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很清楚，只要东北能够基本控制在苏联的手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与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一样，都不应该爆发革命，因为这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可能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影响苏联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此，毛泽东完全可以向法国共产党学习，而没有必要像希腊共产党那样自讨苦吃。他显然没有想到，不过一个多月之后，

他所寄希望的美苏合作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还在德国刚刚投降之后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明确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定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不仅外蒙、满洲、朝鲜都将逐渐纳入其轨道，整个中国，甚至日本，最终也将受其控制。[39]随后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坚持要控制东北铁路和大连主要行政权，并且要依照沙俄的旧例划定军事区的种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敌意进一步加强。正在莫斯科的戴维斯和已经调赴华盛顿担任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的文森特，都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观点。戴维斯多少有些悲观地预言：中共看来必定会在苏联的轨道上运行。而有了中共的支持，苏联无疑会在远东，特别是会对满洲、华北和朝鲜采取行动。而文森特则提议，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反对蒋介石对苏联做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最终在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也会处于比现在更有力的地位。[40]此前始终主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方，这时的态度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命令麦克阿瑟务必独占日本和朝鲜南部，以闪电动作阻止苏军进入，而且主动制定了一个帮助蒋介石占领包括上海、烟台、秦皇岛在内的几个重要港口的计划。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甚至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大连和旅顺港之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后来更是声称：原子弹的其实炸给苏联人看的，为的就是可以使民主国家在外交上获得一种急需的均势，以对抗共产国家战后的庞大势力。[41]

1945 年 8 月 9 日，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总共 150 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向满洲日军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美英中三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但要求不损害天皇做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眼见俄国人已经大举攻入满洲，一直没有就此松过口的杜鲁门这时改了口，说是由于俄国人正在深入满洲，有可能乘势占据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共，因此批准就此做出妥协，以限制苏军南进。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紧急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发出指示，要求美军除了要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以外，还应该迅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关键地区。强调美军占领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而为了避免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赶不及调运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要麦克阿瑟转告日本人，威胁说，任何向中共交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42]

美国对苏态度转为强硬，还进一步直接反映在 9 月 11 日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莫洛托夫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而最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削弱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 24，25 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

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结果，二战刚刚结束，几大国外长会就开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43]

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或多或少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战后参加占领和管制日本对苏联未来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单独占据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想不到如今美国却必欲排斥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开始调整了其对中国东北的政策。[44]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

还在 8 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就急于派兵进入东北，但始终无法与苏联取得协商，不清楚苏方态度，因此只能派临近东北的地方部队就近与苏军接触。苏军当时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因无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虽一般表示友好，并明显同情中共而厌恶国民党，但碍于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条约，尚不敢公开承认和帮助中共武装。9 月中旬，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军开始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部分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苏军代表并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考虑到苏联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取放任态度。[45]而这时进入到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苏军，更是主动派出代表与八路军接洽，要求八路军准备接防苏军即将撤出的地区，并全力加以控制，战略中心千万不要南移，以免国民党占领这些地区后再度割断双方联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援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也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46]很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也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中共中央才提出和制定了对中共此后军事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占据东北[47]。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

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美军在既无条约做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 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其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了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迅速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更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不能不进一步刺激了斯大林，其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占据东北的意图更加明确。

10 月 3 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多名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刚刚到达东北不久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他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鉴于东北局对控制全东北把握不大，强调要做背靠苏蒙朝三国边界的军事部署，他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 15 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

部署 10 万部队，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他声称："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48]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4 日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这次会谈后不过两周时间，已知中共方面就得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49]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刚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当机立断，决定依目前部队调动情况确保山海关一线虽暂时做不到，但仍可按照苏方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50]

为协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这时可以说也是尽其所能。它先是不顾美蒋方面的外交交涉，拒绝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然后把美舰可能登陆的东北营口和葫芦岛两地转交中共军队接收，宣称苏军对两处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将概不负责；同时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接收；还将中共武装引入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布防，要其严防国民党军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苏军代表 10 月 25 日甚至通知中共东北局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如果国民党军在 11 月 15 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敢于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关内作战的军事形势也明显对中共有利，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这一十分强硬的政治主张，主张公开宣布："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51]

但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料到国民党会以退为进，发动外交攻势。11 月 17 日，眼看大批中共军队开入东北，苏军处处制肘，接收东北已成泡影，国民党派往长春与苏军接洽接收行动的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蒋介石并将苏方违反条约的行为告到了杜鲁门那里，美国海军因此也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弄得 15 日刚刚开始的苏军撤退行动不得不中途停止不说，还被迫紧急向大连空投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 4 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了前已放弃了营口重新布防。

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波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在确保苏联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对苏联才是有利的。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势将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两军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一个 180 度的改变。苏军代表很快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52]结果，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改变了刚刚确定了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它明白告诉东北局：现在方针必须顾及苏联国际信用，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据此，中共中央放弃了独霸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53]

从上面的情况中不难看出，随着苏美关系的渐趋恶化和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反复，中共中央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也在随之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不论这种改变与变动的内容中共是否都那么喜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苏美关系变动而造成的莫斯科对国民党的严重不信任，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强大的实力支持（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相当部分地区）和重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共获得了渴望已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

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

1945 年 11 月 17 日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当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苏军公然支援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严重情况，并且声称："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54]魏德迈对这种情况也有着更加清楚的说明与估计。他报告称：目前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十分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而苏联明确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形势，为此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层层障碍。事实上，中国已经变成"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大陆。但是，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就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势必要动用大量的美国军队，而这无论从美国国内民众的愿望来看，还是从美苏关系的全局来看，事实上又是办不到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除非蒋介石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否则他不仅不可能得到东北，就连控制华北也难。[55]

显然，美国政府并非不了解苏联已经在支持中共。[56]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即使是其中最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也没有人主张像英国在希腊那样，直接派军队投入到打击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为什么？邹谠的分析有三："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以及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57]但第一个因素这个时候其实已不复存在，因为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都已看出，中共已经与苏联走到一起去了，不管其性质或意图如何，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对美蒋有利。第二个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时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以及此后美国支持的某些反共政府，情况未必比国民党政府好多少，它们不是照样为之出兵？说到底，第三个因素才最重要的，这就是，美国这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涉及到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近东，中国远在其次。因此，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有可能要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何况美国是个不得不注重民意的国家，二战后的美国民意是渴望和平，美国的政客们都极力在要求政府裁军问题上作文章，以争取选民的好感。这也不能不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决策。[58]

因为不能采取军事的方式阻止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进行扩张，又始终幻想可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牵制苏联，结果就出现了马歇尔出使中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调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根本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解决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独占日本后苏联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问题。不仅如此，就在马歇尔使华的几乎同时，苏联为了能够既不违背其外交承诺，又能有效地阻止美国插足东北，别出心裁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苏在中国东北实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对此，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抵制，有意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把谈判代表张嘉

敖派到华盛顿去走一圈，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自然更是从中作梗，声称："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坚持"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表明了必欲插足东北的决心。[59]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不仅正式向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扬言"中苏政府就满洲的工业进行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歧视了美国人，而且与英国一起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致使苏联遭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抨击，把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严重受挫。[60]

斯大林这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逼着国民政府摊牌："你们要么和我们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在美苏之间必须做出选择。而要倒向苏联，仅仅不许美国人沾指东北还不够，还不能让美军驻在中国。他明确告诉这时到莫斯科去的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61]这话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即苏军此前之所以联合中共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了。只要驻华美军不走，苏联就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痴迷不误，跟定了美国，这自然也就使苏联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与国民政府在东北合作的希望。

马歇尔使华的头两个月，正值苏联寄希望与国民党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过程中。因此，苏联政府虽拒绝参加调处，对马歇尔使命倒也没有表现出反感。美英苏三国 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反而比 9 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显得气氛融洽，会议公报中美国甚至和苏联一起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双方都要尽早从中国撤军。[62]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利用美苏这种暂时的并且是表面的"合作"，左右开弓，一时间也成功地促使国共两党互相有所妥协，达成了一纸停火令和几个政协文件。但从 2 月份美苏因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引发一系列冲突之后，美苏间敌对气氛明显加剧，国共妥协的趋势自然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2 月间美苏关系恶化的最典型的反映，是美国驻苏联代办凯南力主遏制苏联的著名长电，和苏军再度鼓动中共在东北抵抗国民党。凯南 22 日的这封电报对华盛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致成为一年后美国对苏冷战政策的基本依据。凯南在电报中断言，苏联领导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绝不相信苏联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从苏联正在遭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观点出发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切方法，包括参与国际活动和暗地里搞颠覆与离间，来削弱西方和加强自己。美国政府和人民绝不应再对苏联抱有任何幻想，应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坚定自己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信仰，并用以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不使共产主义有可乘之机。[63]

就在凯南发出这封电报的当天，苏军代表再度找到中共东北局，一面说明苏军主要负责人希望与东北局负责人见面，一面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说：苏方正全力争取在除大连、旅顺外的整个东北插足，与国民政府谈判经济合作，就是为了迫使其承认苏方在东北的地位。但苏方努力必遭美蒋阻挠，为此中共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中共在武器方面有任何要求，苏军都将尽可能给予满足。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和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做进一步研究和磋商。在第二天双方负责人的会见当中，苏方更进一步表示：过去苏军因顾虑与美国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较软，如今态度已变。苏方不论与国民党的谈判成功与否，支持中共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的目标将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64]

美苏之间的冲突在 1946 年 2 月以后已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这时也开始发生争吵。在中近东，双方更是剑拔弩张。在土耳其，因为怀疑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竟采取了强硬的炮舰政策，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开抵土耳其以访问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苏联撤军，苏联心有未甘，坚持要成立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但美英态度强硬，苏联极感被动。

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十分明显地促使国共两党的态度都迅速强硬起来。2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军队国家化方案实际采取抵制态度。国民党也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蒋介石甚至还乘机公开煽风点火，告诉美国记者说，美国应当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65]面对这种情况，苏联终于开始不顾外交条约，还美蒋以颜色。

3 月 8 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苏方行动似乎并未引起美蒋的恐慌，蒋介石由于已经有 5 个多军开入东北，因此态度倨傲，十分强硬，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同关内一样的停战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三方意见发生分歧。东北局力主夺取全部苏撤区，不怕与国民党大打；负责与马歇尔谈判的周恩来等强调长春路及其沿线存在接收问题，主张让出以实现停战；毛泽东意识到东北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愿意和平，但只同意将已占领的部分苏撤区让给国民党。苏方明显对中共方面的这种态度不满，苏军领导人在会见高岗时特别问：你们为什么答应让国民党开 5 个军到东北来？听说你们中央对美国人很客气，为什么？[66]据此，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按照苏军愿望，争取控制自四平、本溪以北的大半个东北。他因此提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67]

4 月初，苏方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将于 15 日和 25 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并且说明，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68]而为了帮助中共作战，苏军还进一步向东北局转交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根据苏军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开始在东北做出全面部署，拦截国民党军北上的阻击战迅速在四平和本溪打响。14 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9 日，得知部队完全占领长春后，毛泽东十分兴奋，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要准备以长春做我们的首都，首先成立东北自治政府。[69]

1946 年 4－5 月间，国共之间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战。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的"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的四平守卫战历时一月有余，最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推进，但苏方对此次作战评价甚高。在长春得而复失后，苏联政府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甚至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不管。此举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与此不无关系。[70]

但是，时至于此，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苏方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并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

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 5－6 月里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 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 100 多车皮。中国的内战已经名符其实地全面爆发了。蒋介石顿时捉襟见肘，在东北被迫转入了守势。极大地决定着此后中国革命命运的东北根据地由此得以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就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美苏还在中近东进行着激烈地的较量。欧洲的战略地位，中近东的石油，所有这些都更直接地牵动着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开始全盘接受凯南的"遏制"理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秘密拟定了"对于一旦爆发对苏战争的计划"。问题是以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苏军兵力上在欧洲明显占据绝对优势，在远东更是大大强于美英。军方估计，届时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71]这种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也就注定了腐败和顽固的国民党政权在与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只能日渐陷于被动。当然，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就越是容易感觉到苏联威胁之可怕，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所共有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神经就会绷得越紧，直至引发全面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出台。

美苏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只是缺少双方的宣言罢了。

----

[1] 比较多地谈到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的著作，主要有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 1992 年版）；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8 年版）；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等。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任东来的《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原文载于《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等。

[2] 除了 60 年代 Anthong Kubek 所著《远东是怎样失去的》从相反的角度探讨美国丢掉中国的教训以外，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一书大概是最早从论证美国与新中国早应友好这个角度谈问题的书了。埃谢里克书，罗清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3] 伊利・雅克・卡恩给这群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美国年轻职业外交官起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中国通"。在他所列举的名单上，比较有名还有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以及迪克西使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等。参见伊・卡顿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4] 谢伟思的有关报告，主要部分已经收录在埃谢里克前引书中；戴维斯的有关报告，除了可以在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中看到相当部分摘要以外，还可以见 FRUS，1942, China, pp.226-228; FRUS, 1943, China,

pp.258-266, 397-399; FRUS, 1944, Vol. 6, p.308, 667-671.

[5] FRUS，1943, China, pp.193-199.

[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594－595 页。

[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第 587－588，592－593，595 页。

[8] 埃谢里克前引书，第 249－269，271－274，304－307，317，326－332 页。

[9] 转见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 1980 年版，第 542－545 页。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3, China, pp.258-266.

[11] 见埃谢里克前引书，第 221－225 页。

[12] FRUS，1944, Vol. 6, pp.667-671.

[13] FRUS，1944, Vol. 6, pp. 667-671.

[14] 时任东南亚盟军副参谋长的艾伯特 •魏德迈就清楚地表示过这种态度。转见迈克尔 •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56 页。

[15] 见温斯顿 • 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5 卷，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第 825－827，838 页。

[16] 参见叶戈罗夫主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 8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4－346 页；苏联外交部编，潘益柯译：《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1 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5－197，201－204，207－208，243，246－247，251－252，292－293 页；苏联外交部编，宗伊译：《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2 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 128－129，153－156，178－179，181－183，184－185 页。

[17]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设在卢布林而得名。

[18] 有关波兰国家军敌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的程度，可以从苏军在华沙起义期间得到这下面这则国家军的传单中略知一二。传单称：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作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

德国人在仓惶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

自由波兰万岁。”转见吴伟编辑《苏联与 1944 年华沙起义》中№07925 号文件：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1944 年 9 月 19 日）。

[19] 丘吉尔前引书，第 6 卷，第 198，201，205 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378－379，381－382，385，386 页。

[20] 丘吉尔前引书，第 6 卷，第 167－168，171－172 页。

[21] 丘吉尔前引书，第 6 卷，第 337－339 页；哈里曼前引书，第 399 页。根据苏方的档案记载，当时经过莫洛托夫和艾登修改后的百分比协定对苏联更加有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三国苏联 80％，英美 20％，南斯拉夫各占 50％。见拉津斯基著，李慧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75－576 页。

[22] 由于英军开进雅典，支持保皇派的希腊军队和流亡政府回国，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度在苏联的要求下与流亡政府妥协，参加了联合政府。但随后英军司令斯科比下令民族解放阵线交出武器，后者举行抗议遭到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起义。起义从 12 月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2 月，由于民族解放阵线起义之初采取了扣压人质等一些丧失人心的作法，再加上希腊面积有限，军事上回旋余地过小，又得不到苏联的赞同，因此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归于失败。

[23] 丘吉尔前引书，第 6 卷，第 177－178，192－193 页。

[24] 哈里曼前引书，第 385，387－389 页。

[25] 有关美国当时需要采取这一妥协的原因，哈里曼的解释是有根据的。哈里曼前引书，第 442－443 页。

[26] 萨纳柯耶、崔布列夫斯基编，北京外国语学院 1971 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 1978 年版，第 258 页；哈里曼前引书，第 443－447 页。

[27] 吉拉斯著：《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页。

[28] 丘吉尔前引书，第 6 卷，第 618 页；前引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首相的通信，第 309－310，316－317 页；前引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 195－198 页。

[29] 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只懂得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师”？见《杜鲁门回

忆录》，第 1 卷，三联书店 1974 年版，第 519 页。

[30] 转见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4 页。

[31] 见《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80－82 页。

[32]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68－169 页。

[33] 根据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可知即使在战争期间苏联领导人也从未真正改变过对美英等国帝国主义性质的本质认识，但他们并不主张因此在战后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1944 年 1 月 11 日苏联副外长迈斯基提交给莫洛托夫的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明确主张：为了争取战后能够保持 30－50 年的和平局面使苏联治愈战争创伤，推进欧洲的社会主义化，苏联有必要在通过军队向周边国家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同时，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合作关系，为此应避免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因为这会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过于尖锐。报告相信，尽管美国是最具进攻性的帝国主义堡垒，但由于它在世界范围内需要扩张的地区十分广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可能与苏联妥协的。

[34] 参见张盛发：《苏联与战后初期的中近东危机：缘起与结果》，1999 年 3 月 20 日首都师范大学“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散发论文。

[35] 有关斯大林过分要求的细节可详见邹谠的解说。邹谠前引书，第 240－241 页；并见 FRUS, 1945, Vol. 7, pp.967-969.

[36] 参见 FRUS, 1945, Vol. 7, pp. 960-965, 965-966.

[37] 综合蒋介石给宋子文的指示，可以看出蒋对苏联的中心要求即在中共问题上。前引战时外交（二），第 593－594，596，621 页。而美国的态度虽一度强硬，但苏军进入满洲后，也明显软了下来。可对照美国政府 8 月 5 日和 11 日给哈里曼的指示电。FRUS, 1945, Vol. 7, pp. 955-956, 969-970.

[3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8 页。

[39] FRUS, 1945, Vol. 7, pp.869-870.

[40] 戴维斯前引书，第 405－406 页；邹谠前引书，第 247－248 页。

[41]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 页；James V. Forrestal,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by Walter Millis, New York 1951, pp. 202-203; Current Richard,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7.

[42] 邹谠前引书，第 270 页。

[43]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 5 册，台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 1990 年编印，第

172－188 页；Sumner Welles, Where are We Heading? New York, 1946, p. 380.

[44] James Matray, Captive of the Cold War, The Decision to divide Korea at the 38th Parallel,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0, no. 2, May 1981, pp. 145-168.

[45]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4 日。

[46] 《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7 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 年 9 月 20 日。

[47] 《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78－279 页；《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 年 9 月 18 日。

[48]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 年 10 月 3 日。

[49] 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4 页；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 2 集，第 228 页；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44 页。

[50]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364 页。

[51]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条件致周恩来等电》，1945 年 11 月 3 日。

[52]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 年 11 月 18 日。

[53]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1 月 19 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线开展东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电》，1945 年 1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429－432 页。

[54] 电报称："当日军投降时，东北诸省原无中共军队，此一事实即斯太林元帅亦曾予以证实。彼于八月下旬与哈利曼大使谈话中曾经如此中说（该谈话经赫尔利将军告余）。最近东北诸省境内有大部中共军队存在，自系由于苏军之支援。"苏军并且"使中共军队入占营口、葫芦岛等港口，以阻挠中国军队在该各地登陆。" 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一），台北 1981 年版，第 149 页。

[55] FRUS, 1945, Vol. 7, pp. 627-628, 681-684.;《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 1959 年版，第 309 页，转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4－165 页。

[56] 美国政府始终声称他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证明苏军向中共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但严格说来，这多半只是其避免公开与苏联冲突的一种借口罢了。

[57] 邹谠前引书，第 310 页。

[58] 根据邹谠披露的资料，美陆军在德国投降时约有 829 万人，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的强烈要求，到 1945 年 12 月，其陆军已削减了将近一半，只剩下将近 423 万人，半年后又削减了一半多，只剩下不足 190 万人。一年之后，即到 1947 年 6 月，美国海陆空三军全部加起来也只剩下了不到 100 万人。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即使在对苏联的恶感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很少有人赞成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邹谠前引书，第 317－318 页。

[59] 《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五）》，《传记文学》，第 36 卷第 4 期。

[60] 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卷，第 617 页。

[61] 哈里曼前引书，第 600 页；FRUS, 1945, Vol. 7, pp. 848-859;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 1973 年版，第 15 页。

[62] 在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曾反复就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问题提出质疑，坚持要美国说出撤军时间。FRUS, 1945, Vol. 7, pp. 841-844, 845-846; 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22－323 页。

[63] 转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0－52 页。

[64]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 年 2 月 23 日。

[65] 前引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426－427 页；FRUS, 1946, Vol. 10, p. 166.

[66]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 年 3 月 10 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 年 3 月 11 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 年 3 月 13 日；《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 年 3 月 14 日。

[67]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 年 3 月 24 日。

[68] 《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 年 4 月 3 日。

[69] 《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 年 4 月 19 日。

[70] FRUS, 1946, Vol. 10, pp. 1046-1047; Vol. 9, pp.1042-1044, 1082-1083.

[71] 华庆昭前引书，第 97－98 页；《新华日报》，1946 年 9 月 12 日。

20 世纪三个中苏条约形成经过之回顾与比较

20 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这就是 1924 年 5 月 31 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 1950 年 2 月 14 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一）

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 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 1919 年 7 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 1920 年 9 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 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19 年 7 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 1920 年 9 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

1921 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

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东铁路和外蒙古的问题，从此成为中苏两国交涉中两个长期纠缠不清的难题。这里面中东铁路问题实际上是确保苏俄既得利益的问题；而外蒙古问题则是出于其自身的战略安全考虑。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安全考虑，在这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显然都属于国家利益。问题是，随着自身实力的变化，而把国家利益放大到可能损害邻国领土和主权的程度，在意识形态和道德上都可能发生问题。包括苏俄自己的外交人员，最初对此也难以适应。1922 年苏俄政府的全权代表越飞来华后，就深信应当援引 1919 年和 1920 年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中的承诺，展开与中国人的谈判，因为这是真正可以使苏俄区别帝国主义，从而赢得中国和世界人民同的政策。为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明确指示越飞说："在同中国谈判时，从 1919 年到 1920 年的总宣言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当时中国对这个宣言并未作出相应的反应。"对中东铁路，必须使俄方享有特殊权益，要坚持共管；对外蒙古，应设法通过协议来解决"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把受到红军支持的蒙古独立政府的意志排除在外⑤。

1922 年 8 月 31 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上述指示，确定了此后苏联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项基本诉求。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还不够强大，其意识形态的宗旨和外交政策的需要，都或多或少地制约着它维护既得利益和扩大防卫范围的外交行为。因此，其在 1924 年谈判《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过程中，仍不得不向坚持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享有主权的北京政府作出相当的妥协。按照这一协定，苏联政府公开声明放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放弃一切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且同意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在此之前，与该路有关之所有关系中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政府办理。苏联代表所能坚持者仅为二项，其一，苏联驻外蒙军队须待两国政府另行会议商定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后，始得尽数撤退。其二，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决定，不许第三者干涉。在其前途未定之前，两国共同组织理事会、监事会和铁路局以管理之⑥。

如果我们不了解苏联政府这时的真实意图，相信我们很容易得出该协定"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这样一种结论。⑦问题是，历史的真相并不完全表现在字面上。《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及其签订，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中苏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北京政府没有能够迫使苏联政府依据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承诺，无偿交还中东铁路路权，它甚至没有办法迫使苏联立即从外蒙撤军；而苏联方面也没有能够将中东铁路路区永远划入自己的版图，更没有能够实现促成外蒙古独立建国的预想。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不得不承诺准备将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由中国方面赎回，不得不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苏联将撤退其军队。但是，对于两个实力相差悬殊的国家来说，当势力强大的一方相信必须放大其国家利益才能确保自身安全和为民族赢得荣誉时，它侵害弱小一方的利益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二)

相对于 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而言，1945 年苏联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无疑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持续扩大其国家利益的一种必然结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之最大不同，就在于苏联政府成功地实现了 20 年前它在与北京政府谈判时没有能够实现的外交目标。先是外蒙古问题。中方被迫宣告："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其次是中东铁路问题。中方亦被迫承认："日本军队驱出东三省以后，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 1924 年已经被苏联政府公开宣言放弃，且在与北京政府谈判中完全不曾提及的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一度攫取的大连、旅顺出海口租借权一事，竟重新成为苏联政府的要求之一。中方被迫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但该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半，及指定码头与仓库，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苏联有权在除大连市以外的旅顺港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并以其为海军根据地，期限定为三十年。⑧

1945 年 8 月 14 日签订的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典型地反映了大国政治交易之下弱国可能的遭遇。很明显，同样作为战胜国，中国再度遭遇了当年在巴黎和会被出卖的悲惨境遇。1945 年 2 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美、英两大国同样出于利益交换的目的，应苏联的要求，背着中国政府，将外蒙古和旅顺港送给了苏联。所不同的是，巴黎和会还有中国代表列席，而雅尔塔会议却完全是大国之间的秘密交易。等到欧洲战争结束，对日战争开始，美国才出面督促中国接受这一交易的结果。

十分明显，1945 年中苏谈判时，苏联所处的地位与 1924 年时已有极大不同。其一，它这时不仅与美、英两大国有着秘密交易，其主要要求都得到后者的承诺和支持，而且还掌握着出兵中国东北的主动，并足以威胁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权利的巨大优势。无论国民党政府接受其要求与否，它都可以轻易地造成既成事实，置国民党政府于更大的被动之中。其二，由于红军的介入，外蒙古早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在字面上肯定了中国的利益，事后苏联政府几乎从未将外蒙古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外蒙古已经有 20 多年完全脱离了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不论国民党承认与否，外蒙古的独立已是既成事实，难以改变。其三，战后国共纷争有急起之势，中共在北方地区占据着大量敌后根据地，具有迅速接收政权的极大便利，国民党要想将其远在西南的军队运抵北方接收各地政权，特别是进入工业重地东北地区，非取得苏联的同情，并借助于苏联的帮助不可。鉴于上述种种情况，1945 年的中苏谈判尚未开始就已成一边倒的形势。在此形势下进行谈判，苏方态度之无所顾忌，和中方态度之委曲求全，实不难想象。

要肯定的是，即使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亦曾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努力地进行过争辩。比如他曾表示不同意将雅尔塔协定中"维持外蒙古的现状"一语，解释为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独立；他曾争辩说中长铁路的所有权应归中国，但由中苏两国共管；他强调对旅顺港不能使"租借"，必须在协定中显示该港可由两国共同使用，以免引起国内民众的不安；他亦曾坚持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不能妨碍各国自由使用大连港和铁路运输设施，以及在东北境内发展商业的企图。他甚至做好了"万一史（斯大林）坚持外蒙必须由我国承

认其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的准备⑨。但是，苏军出兵已是箭在弦上，中国东北及新疆的统一更全在苏联的威胁之下，蒋介石最终还是出于内政的需要，决定"牺牲"。

他的指示是："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关键之点，在于苏方能够切实保证：尊重中国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和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B10 对此，斯大林均一一允诺。结果，中方交出了外蒙主权和东北中长铁路、大连港、旅顺港等项权益，而苏方在条约的照会中则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以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分，对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重申尊重，并对其领土与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1945 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强各国均已公开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废弃不平等条约，而苏联作为一个公开自诩为民族解放运动大本营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坚持要在战争中赢回沙皇时代的殖民主义荣耀感，并不惜为此损害弱小国家的主权和利益，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意识形态目标与当权者的民族主义心态及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未必没有因果的联系。国力的强大，以及当权者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耀的过分迷恋，无论何时何地，都可能使强国与弱国处于严重的不平等状态。

当然，分析 1945 年中苏条约的不平等性质时，有必要注意到国家关系当中战略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因为，造成这次条约谈判中苏方不惜损害中国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相信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一点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使苏联领导人不能不把国民党与苏联战后最主要的假想敌美国归为一类，因而保持高度的防范意识。苏联政府必欲把其战争的防波堤构筑到中国的东北乃至北部朝鲜的疆土上来，与此显然不无关系。

（三）

对于中国人来说，20 世纪中苏关系当中，真正能够表现出相对平等性质的条约，还是 1950 年 2 月 14 日苏联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对于 1945 年，1950 年时中苏两国的强弱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但相对于 1945 年，1950 年时苏谈判的对象则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945 年苏联谈判的对手是亲美反共的国民党，而 1950 年苏联谈判的对手则换成了亲苏的共产党。换言之，1945 年谈判的双方更多的是相互间的防范意识和戒备心理，而 1950 年谈判的双方则明显地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在表面上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所决定的，实质上却是相互之间的利益需要的一种结果。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不能替代中苏双方对各自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的典型例证，是斯大林对外蒙古归属问题的强硬坚持，和最初反对重订或修改 1945 年条约的态度。作为民族解放事业的代言人，中共中央在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过程中，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强烈民族要求。外蒙古问题的提出，在中共与联共（布）的交涉中，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当 1949 年 1 月毛泽东与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谈话当中要求让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时，就明确地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B12 尽管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

实现外蒙古的回归，是新政权展现其争取捍卫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之一。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它却可能对苏联的国家利益构成隐患。斯大林并没有像在 1945 年与宋子文谈判时那样，明白地提到外蒙古的地理位置容易为敌对势力提供威胁苏联安全的极大便利，然而其坚持拒绝显然仍旧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的长远考虑，与他同对手之间在意识形态的异同并没有多大的关连。

同样的情况，当毛泽东 1949 年底访苏时，虽然再三要求与斯大林签订新约，斯大林却坚持保持旧约，理由是 1945 年的中苏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而缔结的，废除它可能会为美、英两国借机否认雅尔塔协定中的其他承诺制造口实，因为苏联战后取得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法律依据，就是雅尔塔协定。Ｂ13　在这里，斯大林首先关注的，显然也不是苏中两国盟友关系和意识形态上的道德标准，更不是毛泽东所理解的国家利益，而是苏联自身的国家利益。

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决定了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存在不同的利益需要，因而也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与矛盾。存在差异与矛盾并不奇怪，消除这种差异所带来的矛盾冲突，创造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睦相处和平等关系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共同的利益基础。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之所以能够展现出平等的气氛，关键也正在于双方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之间当时条件下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双方之间消除猜疑与不信任，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对于双方的安全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由于认识到这一前提，斯大林很快接受了毛泽东缔结新约的提议，并明确肯定了 1945 年条约所含有的不平等性质。新的条约谈判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达成了预期的目的。就条约文本的表述内容而言，新条约与旧条约形式没有重大的区别。但就相关的协定而言，除了外蒙古问题由于其独立已成既成事实，未能得到解决以外，苏联通过 1945 年条约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特殊权益均已宣告放弃。

有关中长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公开承诺：一俟对日和约缔结，至迟不晚于 1952 年底，"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旅顺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有关大连港问题，苏联政府同意："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Ｂ14

与斯大林最初的态度和条约谈判开始时苏方的草案相比，最后缔结的条约与协定毫无疑问是中苏双方相互交涉、磨合与让步的结果。尽管苏联方面由于担心完全放弃过去在东北构筑的防波堤，可能影响其周边安全，因而力主缔结了一项补充协定，要求双方在各自边界连接地区，如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地区，确保不让第三国势力进入，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一补充协定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正在向边疆地区挺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也是一件利大于弊的好事情，因而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赞同与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的成功、国力的提升等等条件的改变，其实也同样会影响到弱国领导人

对国家利益的判断。特别是在中国这样具有特殊意识形态背景和革命特色的国家当中，领导人的革命热情以及民族自豪感的增强，也会促成他们过强的民族自尊心。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对斯大林在 1950 年中苏谈判问题上，以及中苏协定部分内容的批评，就清楚地反映出这种情况。曾经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的补充协定，被批评为斯大林在中国要了两块殖民地。原本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由中苏共同组建帮助中国尽快发展高技术行业生产的合营公司的协定，也被批评为是斯大林不信任中国人的表现。B15 到 1958 年围绕着长波电台以及联合潜艇舰队的争论，事实上已经重新变成了民族平等问题的严重争执，变成了俄国人是否"看不起中国人"的一场涉及民族情感问题的政治冲突。

可以想象，195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规定有效期 30 年，实际不过 10 年中苏两国关系就出现了裂痕，20 年后则完全破裂，甚至差一点就走上了战争的道路，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的教训值得总结和汲取。但千条万条，最重要，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在于，无论中、苏，若不能找到并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点，就难免会随着时空的转换，或强化自身的民族情感，或夸大周边的威胁，进而不自觉地放大自己的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相互间的猜疑、戒备和冲突。

注释：

①俄国于 1917 年十月革命后曾首先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建立了四个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俄）。1922 年 12 月 30 日，始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的决定。
②《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1919 年 7 月 25 日），转引自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4 页。
③转引自李嘉谷前引书，第 59 页。
④《告中华民国政府宣言（即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1920 年 9 月 27 日），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九一九——一九三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5 页。
⑤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4 号记录》（1922 年 8 月 3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5 页。
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4 年 5 月 31 日);《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924 年 5 月 31 日)，前引《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第 198－200，206－207 页。
⑦见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5 页。
⑧《照会二》（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李嘉谷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3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44－649 页。
⑨《行政院长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5 年 7 月 4 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二），第 592－593 页。 B10 《蒋介石致行政院长宋子文电》（1945 年 7 月 6 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二），第 593－594 页。
B1《照会一》（1945 年 8 月 14 日），前引《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643－644 页。

中苏之间的民族主义碰撞

——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

民族主义，虽然是产生于对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及其起源的一种自然的民族情感，但它并不等同于这种自然情感，也不是与民族诞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把这种民族感情政治化，是近代以来才有的历史现象。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化的潮流而出现的，力图通过实现领土和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以国家的形式保持本民族特点及其延续性，不被其他民族吞并或侵害的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政治诉求。对国家的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非抵抗资本主义列强，否则不能保证自身生存发展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其民族主义的情绪就显得格外高昂。整个 20 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无疑极大地推动了各国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

中国革命自其开始以来，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就是摆脱屈辱的半殖地地位，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他们也从不否认自己的民族主义使命。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只是习惯于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前面加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或“广义的”这样的一些限制词。他们从来就相信：在落后的被压迫民族当中，民族主义“正发展着进步的、革命的旗帜的作用”。只有首先实现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才有谈到这些民族中阶级解放的可能。[1]而不论共产党人后来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的看法有过怎样的变化，在涉及到国与国关系的情况下，人们头脑中的民族主义目标及其情感，依旧在极大的影响着他们的政治判断和对外政策。包括在中苏这两个共产党国家之间，这种情况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中苏两国由最初的同盟，很快走向关系破裂，毫无疑问绝不仅仅是因为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怎样严重的分歧，而是与双方之间民族主义的碰撞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要深入了解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还是应该从新中国建国前后中苏两党两国围绕着如何理解各自权利和利益问题发生的民族主义碰撞开始谈起。[2]本文即试图就此略做尝试。

实现平等的热切期待

革命通常都是和理想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的成功，即应是理想的实现。1949 年，眼看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渴望一举成就革命理想的心情之迫切与强烈，当不难想象。而在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处于半殖民悲惨境地的中国人看来，革命的最主要目标，当然是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要想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自然取决于能否根本上取消关系大国的一切特权并取得其外交上的正式承认。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刚刚开始考虑建国问题，就面临着一种两难的境地。其原因很简单，就取消列强特权而言，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等原因，中共不难用强力取消美英各国在华特权，却难以取得美英各国的正式外交承认；就外交承认而言，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新中国不难得到苏联的外交承认，但中共对苏联能否放弃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却没有十分的把握。由此可知，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就相当微妙与复杂。

1949 年开年不过一周时间，中苏两党之间就发生了一件颇能反映双方关系微妙的事情。当时南京政府为延缓军事崩溃的趋势，向苏、美、英、法四国政府提请协助调处国共内战。斯大林把南京的请求转发毛泽东，并建议委婉拒绝外国调停，但在相当条件下接受和谈请求。毛怀疑斯大林有意干涉中国革命，对此大为不满。后来，斯大林进一步说明了他所提议的接受和谈，只是一种争取国内外舆论的策略手段，苏联并非真的希望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战争停止下来。而毛最终也在 1 月 14 日按照斯大林的建议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同意举行国共和谈。但是，他明显地还是不喜欢斯大林卷入到这种本应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事情上来。[3]直到毛几天后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对外交工作的指示时，他还念念不忘地在其中特别加写了一段话，即"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4]这里所说的"外国人"，显然包含俄国人在内。而所谓"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清楚地显示毛在 1949 年初就已经完成了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换，开始有意识地把中苏两党关系方面的问题也放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上来看待了。

既然做好了执政的准备，中共领导人自然要高度关切恢复民族权益的问题。而新政府能否收复国民党政府丧失的权益，彻底实现民族独立，不仅关系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能否实现其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而且对共产党和新政府的政治形象影响甚大。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各种不平等条约已大部废除，长期成为历史屈辱象征的各种租界和租借地也多半不复存在。唯一在事实上仍旧在中国拥有特殊权益，包括占据着中国领土者，只有苏联和英国。苏联利用参加对日作战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同意其驻军旅顺港 30 年，共同经营中长铁路和通过公投完成外蒙古独立手续等项协定，在战后给国人留下了相当不好的印象。[5]中共中央无疑必须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中苏两党领导人第一次秘密接触，就不能不迅速涉及这一问题。

战后中苏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 1949 上 1 月 30 日至 2 月 8 日之间。当时苏共中央特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潜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一周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地，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6]当然，毛泽东未必急于立即收回旅顺军事基地，在新中国还没有海军可以威慑侵略者的情况下，苏联暂时保有在旅顺的驻军，对震慑美国，保证东北解放区的安全，确有相当价值。但这并不等于多数中国民众和社会舆论能够理解。而考虑到即将执政的前景，毛泽东不能不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面对这种要求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见，哪怕它来自资产阶级方面。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外蒙古的归属问题。苏联（当时为苏俄）自 1921 年就开始驻军外蒙古，后即基于自身安全利益的考量，开始致力于使外蒙古独立于中国。苏联的这种努力，断断续续直到 1945 年利用出兵参战，才最终得以达到目的。对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中共从民族自决的观点出发，也曾积极赞同过苏联的立场[7]，但毛泽东相信，革命胜利后，完全可以通过成立"中华联邦"来解决这一问题。即到那时，"外蒙古共和国"可以"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8]眼见革命胜利在即，如果能够使国民党被迫放弃的外蒙古重回中国，毛泽东自然希望实现中国的大一统。因此，在会谈当中，他尽管是委婉地，却是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个人愿望。[9]

战后苏联坚持要控制中国东北，一个基本的考虑就是想要保证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用向

中国东北和北朝鲜扩张来建立一道防波堤。眼见新中国成立在即，继续保有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明显不利于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形象，同时在战略上也不再十分必要，因此，斯大林刚一得知毛泽东提出旅顺港问题，马上打电报给毛泽东，肯定中苏协定是不平等的，说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军马上就会从旅顺口撤退，如果中国方面认为最好现在就撤，苏军也可以马上撤出。但是，坚信自己在中国东北有实际利益的斯大林，对 1945 年中苏条约规定的中苏共管的中长铁路问题，却难以割舍。尽管中共中央只字未提，他还是再三透过科瓦寥夫打听中共中央的意向如何，并要求米高扬向毛泽东强调：中长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他完全不记得这条铁路的相当部分早在 1935 年就被卖给过日本和伪满洲国，继续坚持该路是由俄国出资修建而要求继续共同管理，多少有点不合情理。[10]至于对外蒙古问题，斯大林的态度就更不一样了。因为，在俄国人看来，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蒙古的地位对苏联的国家安全置关重要，而且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外蒙古早在 20 年代就已经独立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外蒙古回归中国与否，反到是中国的内蒙古会不会步外蒙古后尘的问题。斯大林因此警告毛泽东说：内外蒙古合并，只会对中国不利，因为他不愿看到由于外蒙古坚持独立，反而把内蒙古也从中国分离出去。

与米高扬的会谈已经显示出双方之间存在某些分歧，沟通颇为不易，考虑到新中国建立在即，需要苏联支持之处甚多，多数领导人显然不愿意因为东北局部的权益问题而与苏联意见分歧。几个月后，即 1949 年 6 月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时，中共中央在向联共中央和斯大林提交的书面报告中，虽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自己的愿望，但其强调重点已发生了改变。报告中再度提到了旅顺驻兵、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中国东北运走机器的问题，且说明在民主党派、青年学生和工人当中对此存在着不少议论。但其所强调的却是不赞同这样的议论。在外蒙古问题上，报告虽然依旧提到了欢迎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联合"的态度，同时却明白表示应该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其独立的事实。[11]包括对 1945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共中央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称：中苏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民主是有利的，不仅"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就是在今后也仍产生更伟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与前稍有所不同的只是，鉴于新中国成立在即，人们已开始考虑"另起炉灶"的问题。即使他们并不怀疑国民政府时代所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平等性质，却也更愿意另搞一个新条约，以展现一种全新的外交关系。故报告委婉地表示说：一旦新中国与苏联建交，中国政府既愿意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也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当然，也可以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等适当时机再签新约。[12]

显然，对于中共中央的上述表示，斯大林并不认为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他只是解释说："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经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以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即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以便中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回旋余地，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对于如何处置 1945 年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对刘少奇报告提出的三个方案，只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说："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都用不着，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这个问题"。[13]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苏联等东欧国家相继宣布承认

新政府，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陆续开始做出姿态，外交工作，包括全面审查过去国民党政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各种条约的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何处置，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显然是赞成“另起炉灶”的。何况，无论中苏条约平等与否，其相关协定毕竟存在不平等的情况，国内各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对此始终议论纷纷。立于执政党地位，又是建国伊始，自然有重新建构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与美国的对抗已经把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国内民众及其舆论也势必会拿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衡量其对苏联的态度。如果厚此薄彼，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动摇共产党彻底捍卫国家主权的政治形象。因此，当毛泽东决定尽快实现访苏之后，他即决心提出重订新约的问题了。他为此向斯大林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专门解释说：只有在同苏联缔结了关于友好、军事、经济和政治同盟，以及关于贷款、贸易等方面的条约之后，才能允许外国的外交使团到中国来。也只有依靠同苏联缔结的条约，我们才能够着手重新审查和废除蒋介石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14]

11 月 8 日，毛泽东正式致电莫斯科，表示希望乘斯大林七十诞辰之际访问苏联。并且说明，在访苏期间他希望能够与斯大林讨论中苏条约问题。如果到时候需要签订新的条约，周恩来将会前往莫斯科签字。随后，毛泽东进一步致电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王稼祥，并委托周恩来会见苏联大使罗申，说明其打算前往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同时讨论中苏条约问题。[15]比较一两年前毛泽东计划访苏时所开列的一长串问题清单，毛这次访苏的目的可谓简单明了，就是想要另订一个足以显示两国平等地位的新条约。[16]由此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最急于达成的目标是什么。

中共中央急于签订新约的心态，还可以从其情报部门负责人李克农随后的一次谈话当中观察出来。这次谈话就发生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访苏要求一周之后。李克农当时在会见苏联大使的过程中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他说：中共了解到美国有一个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国共产党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敌人现在正在“攻击 1945 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在那里的所有工业设备。[17]李克农的谈话给人的印象很清楚，即中共中央对继续保持 1945 年的中苏条约颇感担心，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人用来攻击新政府的一个把柄。而事实上，李克农特意提到这件事，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已经完全统一了认识，相信继续保持这样一个带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对新中国有弊无利。

从毛泽东年初对米高扬提到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对旅顺口协定的非议，到李克农年底强调来自美国的批评看法，我们不难看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舆论，特别是民主人士当中逐渐升高的民族主义压力。不仅仅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藉着批判美国白皮书，极力鼓动国人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而且一个新中国冉冉浮现出地平线的现实也极大地刺激着那些充满爱国热忱的人们，渴望看到共产党能够一扫旧中国所遭受的中种耻辱。因此，中苏关系的现实当然不能让多数人感到满意，甚至不少人对要不要太过靠近和仿效苏联，也颇多怀疑。这时在中国的一位意大利共产党人即谈到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共高层干部和普通民众间存在着的这样一种心态。他说：“许多人认为，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无需走西方国家甚至是俄国走过的路。”“尽管青年人嘴上也说同情苏联，对苏联有好感，但事实表明，青年人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不必模仿苏联的榜样。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还有这样的谈论，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似乎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港和大连弄到了自己手里。”[18]显而易见，革命的胜利不仅使毛泽东，而且使广大干部和民众都开始充满民族自豪感。这种心态不仅针对美国，

同样也吞没了苏联。而上下层交互影响的结果，自然会使前往莫斯科寻求“友谊的援助”的毛泽东背负上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但是，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实在过于特殊。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意味着他们之间还要更多地照顾到阶级利益的一致性，而无法简单地从双方各自民族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正是这种太过复杂的关系，再加上双方沟通上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不可避免地在毛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他对现实可能性的评估之间形成了较大的落差。关于这一点，从毛作为新中国最高领袖，第一次正式出访苏联，却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前往，即很可看出一些端倪来。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1949 年 12 月 16 日中午，毛泽东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北站，前来迎接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以及苏军元帅布尔加宁等人。新中国最高领袖抵达莫斯科，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没有到场亲自迎接，这在众多中国人看来显然不够礼貌和尊重。尽管苏联人可以提出种种合理的解释，比如斯大林从不亲往车站迎客，又是被祝寿的对象，各国贵宾很多，不能厚此薄彼等等，中国人中还是有许多人不能理解。“中国新闻总署”为此通报说：“许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上海工商界人士和旧社会出身的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欢迎（实际应为欢送－引者注）日本外交部长，但没欢迎毛泽东，这很不好。一些人尖刻地讽刺说，毛泽东是去‘鞠躬学习’去了。斯大林是主人，是导师，所以自然不一定亲自迎接他了。……一些人说，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武汉商会主席说，通常国家首脑在边境地区会见。现在毛泽东到莫斯科，斯大林不亲自去车站迎接，像是被叫到莫斯科的。中国好像是一个仆从国。类似的讨论在天津工商界和大学生中也有。”[19]尽管我们不清楚毛泽东对此是否也有同样的感觉，中国新闻总署就此所做的通报也特意题为“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但把这样的消息如此具体地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原封不动地通报给苏联当局，这其中未必没有某种隐含的喻意。[20]

16 日当晚，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双方立即展开了第一次会谈。会谈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 1945 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但他话锋一转，却建议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他说：“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是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在斯大林看来，中苏条约不平等的关键，在于旅顺口驻军问题。“特别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在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获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情，共产党人做到了。”[21]

从斯大林的谈话当中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中苏条约的基本态度与年初米高扬秘密访华时，和年中刘少奇秘密访苏时相比，并无变化，仍肯定条约的不平等性质，只是强调重点是在旅顺驻军的问题上。但在对条约的具体处置上，斯大林过去从未有过明确的表示，显示当时态度有些犹豫不决，拿捏不定。如今，他的想法已经十分确定，即条约暂时不宜修改。原因就是任何修改都有可能使美英找到公开推翻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从而损害到苏联战后从日本那里夺取的实际利益。

为了恢复自己的主权，要使苏联承担可能失去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危险，这使高度重视中苏两党阶级利益一致性的毛泽东顿感为难。他明确表示对此十分意外，但能够理解。他说："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22]

16 日晚的会谈整整谈了两个小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双方具体讨论了包括和平的可能性、中苏条约、借款、解放台湾以及出版俄文版毛选等许多问题，斯大林虽然说明中苏条约因雅尔塔协定的关系，两年之后才可能作大的修改，目前暂不宜改变，但其"情意恳切"，提出旅顺问题可以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鉴于这种情况，对于周恩来总理是否还有必要来莫的问题，斯大林的意思是只签个声明，可以不必飞来了。毛则考虑，最好还能够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23]，比如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搞个签字仪式，还是由总理来签。在 18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当中，毛泽东将会谈的情况以及他的想法做了介绍和说明，同时建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加以讨论并提供意见。[24]

从毛泽东给政治局的电报当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虽然婉拒了毛泽东改订新条约的提议，但毛还没有马上感到太多的不快。如果能够将商务、借款、航空等一起签订下来，请周恩来过来搞个仪式，于新政府也算有些尊严。21 日，在苏联国家大剧院举办的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毛泽东被邀请同斯大林一同步入会场，接受欢呼，并被安排第一个致贺辞，这些也都让他感到某些欣慰。他在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当中不无高兴地提到："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他并且十分欣赏苏联塔斯社就此所做的报道，为此专门要求新华社发消息时要用塔斯社的新闻稿。想不到，国内的政治局开会讨论的结果，大家都主张周恩来没有去的必要。刘少奇等人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相信：苏联方面不仅不想马上修订条约，而且也不准备现在就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定，它只是打算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和毛发表一个声明罢了。既然如此，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25]

政治局的看法使毛感到不安。他很快把科瓦廖夫找来，提出两项办法要斯大林早做决定，以弄清他可能的处境。毛的建议一是按照他的希望，解决借款、通商、航空等项协定问题，召周恩来前来完成协定签字手续；二是依照政治局所估计的，只对上述问题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恩来即不必来。[26]而 24 日与斯大林的会见，竟意外地证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估计，斯大林果然同意第二种办法，主张周恩来不必来。[27]斯大林的这种态度终于让毛泽东生了气。据毛后来多次回忆，他以后几天曾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方面的联络人员大发脾气。不论其实际生气的时间和程度与其后来回忆的情况有无差距，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毛确实感觉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28]而这并不仅仅事关个人颜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毛民族自尊心的一种强烈反弹。

从 12 月 16 日到莫斯科之日起，毛泽东在莫斯科活动的消息不断出现在苏联的报纸上。但自 22 日苏联政府大型祝寿宴会之后，毛在莫斯科似乎消声匿迹了。这不能不引起一些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动向的外国通讯社的极大猜疑。而中国新闻总署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的通报，看起来也触动了斯大林一向敏感的政治神经。在进一步听说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对苏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 1950 年 1 月 1 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文字稿时，自然是又惊又喜。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29]

2 日一早，苏联报纸即刊发了毛泽东答记者问。当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又一同来拜访毛泽东，特别提出希望了解毛对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有何意见。毛泽东这时仍不能十分确定苏联到底准备怎样做，因此依旧提出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当然，毛热切地期望能够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特别解释说："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据他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30]

斯大林最终同意签订新约，使毛泽东如释重负，几天的不安与不满一扫而光。此行如不能取得足以显示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的成果，不仅会伤害到毛及其他所领导的新政府的形象，而且会使亿万对新中国充满期待的国内各界民众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并便利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的宣传。尽管，毛很清楚斯大林所同意的新约其实可能主要只是在旅顺驻军问题上有所改变，外蒙古独立问题仍须面对现实，但他仍旧深受鼓舞。他明白电告国内的领导人，至少要让人民了解：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同时，他亦特别叮嘱周恩来动身前，一定要召开政务院会议，明确宣告此行即为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应召集在京所有政府委员宣告此事。[31]

与毛半月前出访时的轻车简从不事宣传的作法相比，不难了解毛此时内心的感受。同样，在京政治局委员及各党派负责人对此一进展也颇感振奋。刘少奇在 4 日的电报中告诉毛泽东：政治局同志 3 日夜开会讨论，完全同意来电所示各项办法。恩来决于 9 日晚车由北京动身，19 日可抵莫斯科。走前已定 5 日开全国委员会常委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协商会议，6 日开政务会议，7 日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均将遵照来电所示方针解释。几天会议的结果，各方人士亦均表支持。[32]在外交部召集的社会名流讨论中苏条约的会议上，大多数人的发言尤为引人注目。除王铁崖等个别国际法专家以外，多数与会者都一致主张一定要将条约重新订过，并认为"苏联放弃中长铁路及旅大的租借，并不违反雅尔塔协定"。"只要斯大林愿意，中长路和旅大都可以收回"。据会上有人介绍说：许多大学生都不能接受中共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解释，直到看到报上发表毛主席在莫斯科要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家才舒了

一口气，认为这一来问题可以解决了。[33]

新约签订在即，毛泽东再度焕发了活力。1 月 13 日，他正式批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的计划，以便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对美方随之而来的抗议和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的作法，毛完全不屑一顾，断言“此事对我们极有利”，“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随即特意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苏联方面，并且强调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34]

1 月 17 日，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告诉毛泽东，1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讲演中公然声称苏联正在采取新的手段把中国北部地区并入苏联，除了外蒙古地区已经完成了这一步骤以外，苏联还在努力使东北、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莫洛托夫建议由苏联和中国的外交部分别正式发表声明对此加以驳斥。毛泽东对美国顽固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态度早已深恶痛绝，对驳斥美国人的宣传更是驾轻就熟，自然表示赞同。只不过，事后特立独行惯了的毛泽东不劳外交部官员动手，很快亲自挥就了一篇充分体现其个人风格的言辞犀利尖刻的短文，痛斥美帝国主义官员正在一天天地变成“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断言美国人除了制造苏联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谣言以外，已经再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对付中国人民了。[35]而这样一篇充满嘻笑怒骂的文字，当然不适合由外交部来发表。因此，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公开发表谈话的方式，发表了这篇“官方声明”。尽管在俄国人看来，毛泽东此举有失郑重，没有做到步调一致，但在毛自己看来，这却是最能够表达其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远比四平八稳的外交声明痛快得多。

毛泽东我行我素的做法，据说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委婉批评。这对刚刚成功地促使斯大林同意签订新约，正感受着胜利喜悦和自豪的毛泽东来说，在自尊心上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伤害。从毛几年后多次强烈不满地提到这件事的情况看，他当年对俄国人像教训小学生一样告诉他什么叫步调一致，内心确曾充满反感。[36]这种反感固然没有立即影响到毛做出不满的表示，但对斯大林同意签订新约的满足感，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在周恩来一行 1 月 20 日到达莫斯科之后，涉及中长铁路协定的讨论一展开，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得明显起来了。

维护权利的艰苦谈判

1945 年的中苏友好条约，让中国方面感到最不平等之处有三。第一是强使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第二是迫使中方同意其在旅顺港驻军；第三是把在 1935 年已经卖给日本的中东铁路迫使中方同意在各占 50％资产的基础上共同经营与管理，而经常管理权又为苏方所有。但就第一点而言，还在 1949 年初中共中央就已经注意到其改变之不可能。对于第三点，新政府自成立以来，尚未深入研究，再加上苏联方面早已表明看法，因此始终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换言之，所谓重订新约，主要问题就是要根据中苏双方所达成的共识，改变有关旅顺港驻军的协定。而如何改变这一协定，则又由于新中国尚无海军，面对来自美日可能的威胁，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前，不易定夺。因此，在 1 月 22 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再度会谈时，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毛的态度与前并无太多的改变。当斯大林询问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协定有

何建议时，毛当时的态度还是："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斯大林对此特别重视，马上问道："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毛慷慨地回答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他又特别提到担心废除旅顺口协定可能要牵涉到雅尔塔协定，从而"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的问题。对此，斯大林一面做出满不在乎的态度表示说：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让美国人"见它的鬼吧！"一面却非常满意毛泽东关于旅顺口协定在对日和约签订前继续有效，签订后苏军撤走的想法。[37]

然而，就在这次会谈当中，中苏领导人之间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意见分歧了。双方的分歧主要是围绕着对中长铁路协定的修改内容而展开的。苏方自斯大林表示可以重订新约之后，就一直在一稿一稿地重拟新约草案。从 1 月 5 日第一稿形成起，至 16 日苏方已六易其稿。在起草过程中，苏方领导人对如何在相当程度上保留 1945 年旅顺口协定、中长铁路协定和大连港协定中有利的内容等，颇费心思。会谈当日经斯大林正式批准的草案中，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议定书，依旧明确主张 1945 年中苏之间签订的旅顺口和大连港协定及其议定书，须待对日和约签订后重新审议。毛泽东在会谈当中对旅顺协定的表态，符合苏方的预案，自然颇受斯大林的欢迎。但对中长铁路问题，苏方新的议定书与 1945 年的内容相比，除了提出领导职务采取轮换制以外，不仅主张保留原来的 30 年有效期，而且还增加了诸如免征海关税和货运税，缴纳铁路营业税等更有利于保障苏联利益的新内容。[38]对此，中方的态度明显不同。

周恩来从北京出发前，中共中央已经对中长铁路的有关情况向有关部门进行了了解，并意识到这一协定在国内各界认识当中，仍属不平等协定，如不加以修改，甚或予以收回，以体现中方主权，势必难以取得国人之认同。而解决这一问题之关键，除必须缩短过去协定的有效期外，尤其要使过去由苏方拥有管理权变为由中方拥有管理权，为此还应将各占 50％资产的规定改为中方占 51％，如此虽保留了共同经营与管理的方式，却足以体现中方的主权及主导地位。周到后即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在会谈中，毛就此表达了中方的看法，提出新协定应考虑缩短原来的时限，重新规定双方的资产占有比例，并写明中方在管理中起主要作用。周恩来亦补充说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新协定应规定成立铁路管理委员会负责经营管理事务，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都要由中方担任。双方占有资产比例，也应由过去的各占 50％，改为中方占 51％，苏方占 49％。鉴于中方的态度，斯大林当场表示愿意缩短年限，但基于内定的议定书，苏方坚持认为旧协定如果带有某些不平等的印迹，也只是在管理权的问题上，只要规定今后双方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即不存在不平等。如果改变双方资产占有比例，结果反而与双方追求的均等原则相互抵触。对于苏方的解释，毛泽东、周恩来虽表示愿意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再做研究，但双方看法存在分歧显而易见。[39]

23 日，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谈。首先由苏方提供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4 日，经过一天紧张的内部讨论，当天午夜，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受命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修改后的草案交还给苏方。中方对条约内容未做重要的修改。[40]但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即根据刘少奇关于中长铁路问题的来电精神和与毛泽东讨论的结果，提出了三项重要的意见。一是中长铁路历史上已经过六次波折[41]，照目前经营的现状和中国民众反映的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而这样才对中苏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二是如果对日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及中长铁路归还中国。三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和租借的企业由中国政府接收。这三项要求大大突破了苏方原定的方案，自然引起苏方领导人的极大不满。可是，

既然下决心加强中苏关系，注意到周转述的中国国内的舆论与民众的情绪，斯大林不得不重做考量。经过联共（布）政治局紧张讨论之后，斯大林最终表态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中方马上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除了领导职务采取轮换的办法同意苏方的意见以外，中方的草案与苏方的预案已极大不同。第一，中方主张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第二，中方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中方要求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四，中方希望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第五，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加上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等文字。[42]

28 日，苏方反复研究中方草案后，被迫接受了中方的意见。在其复案中，除了对把旅顺口全部财产无偿交中国政府接收改为有偿外，表示同意苏军最迟三年自该地区撤退，大连行政及其苏管企业立即交中国政府接收，中长铁路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和财产。但苏方同时也增加了三条新的意见：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43]对此，周恩来的反应是，必须增加相应的条款，以保证中苏双方权利对等。例如，他在苏方交回的复案上加写了一段话，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44]

从毛泽东提议旅顺及中长路协定保持原状，“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到周恩来要求苏方声明放弃其在东北的一切权利和利益，三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并无偿移交旅顺及中长路等所属一切财产，中国方面态度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这种变化无疑是国内民族情绪影响的结果，也是听取周恩来汇报并与周交换意见后，毛泽东对此行必须达成的目标有了进一步认识的结果。让毛、周颇感惊奇的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就说服了斯大林。比较苏联方面最初起草的协议内容，不难看出斯大林并非真的意识到过去的协定都是不平等的。从俄国人的立场出发，从中国东北夺回旅顺口和中东铁路，不仅是洗刷 1904 年沙俄被日本逐出南满的屈辱历史的见证，而且本来就是索回沾有自己祖先血汗的财富，理所当然。[45]考虑到长远的战略利益而放弃这些到手的权益，无疑是重大的牺牲。从这种心态出发，苏联多数领导人自然无法接受周恩来坚持要完全平等地体现双方权利的态度。在谈判过程中，每当周恩来着意强调中方的权利时，都会引起苏方代表倍感不快，甚至满怀醋意。[46]因此，当周恩来提出中方应享有与苏方相同的在对方境内调动军队的权利时，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显得大为恼火。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47]在 2 月 2 日的会谈当中，米高扬态度强硬地答复周恩来说：苏方认为中方所提出的要求享有经过苏联境内向新疆调动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权利的建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为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还要再步行一千公里才到乌鲁木齐，这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远得太多，也极不方便，“中方没有享有这种权利的任何必要”。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针对苏方关于沿中长铁路在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方部队的建议的反提案，并且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为此，周恩来再三解释，说明中方的建议并非旨在反对苏联沿中长铁路调动部

队，它不过是为了证明双方权利平等。因为如果中方没有得到可以从苏联境内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苏方也没有权利在中国境内调动自己的部队。对此，米高扬断然表示："如果中方反对苏方的建议，那么，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取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最终，周恩来不得不表示让步。[48]

关于军队调动问题的这场争执，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苏双方各自不同的历史情结与民族立场。由于中国有着近百年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压的惨痛历史，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都不可避免地会具有相当强烈的悲情意识，对民族平等和权利对等问题高度敏感。而俄国人没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他们对弱小国家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他们更关心的往往是既得利益的得失，更习惯于为自己的小恩小惠得到弱小民族的感恩戴德而沾沾自喜。他们往往很难体会中国人对民族平等的渴求，与力争平等权利以扫除历史屈辱感的强烈愿望。当然，周恩来坚持两国权利对等的态度到底还是使苏联领导人在思想上受到了一些触动。他们在相关的条文上开始注意到要适当限制自己的权利，比如关于军队调动问题根据中方愿望做了限制性的规定；也注意到某些权利要有对等性条文，比如他们在随后提出的一个补充性新的协定草案，在规定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与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的同时，也相应规定邻近中国东北和新疆的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同样不许第三国势力介入。[49]

2 月 8 日，即中苏两国有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基本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向国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一次相当全面的汇报。电报从 1 月 22 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谈起，逐一介绍了自 1 月 23 日谈判开始以来中苏两国代表着重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及其具体经过，并特别强调整个谈判，包括条约起草，都是按照中方的意见进行的。电报说明：谈判始终是在毛的指导下，先谈条约，后谈各项协定，最重要的成果是促使斯大林同意 1952 年以前将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归还中国，包括三年内苏军得在满洲里至绥芬河之间运兵及运送军需品的规定，也改为必须在远东发生战争威胁时始可实行。而在贷款协定的议定书中，苏方原提出中国应将所有剩余的战略原料钨、锡、锑、铅卖给苏联，后经我方争取，"最后苏联同意我们的提案，将铅去掉，并减少锡头四年和锑十四年的供给数字。"[50]从电报的内容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谈判的结果基本满意。

中苏之间围绕条约谈判的最后一个分歧，发生在双方对公布谈判文件的不同认识上。就在 14 日双方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的头一天，苏联方面突然提出有些协定不能公布。周恩来对此表示不能理解。他解释说：即将在莫斯科签字的协定的中文本均已寄回北京，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做了汇报。如果在签字的协定中有什么不能公布的，则必须向政务院成员再做专门的解释。而他强调：包括毛泽东在内，我们一致认为，"公布所有签字的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鉴于周恩来相当坚持，前往传达苏方意图的维辛斯基只能表示，关于这一问题，他必须向苏联政府进行汇报。[51]当晚，在周恩来给北京的电报当中，他依旧相信应当公布全部文件。但同时也不得不提醒中共中央，这一问题尚未最后决定。电报称：苏方提议若干文件签字不公布，我们则主张全部公布，究如何，待今晚决定电告。因此，今晚如已开过政府政协座谈会，则须补行声明，公布日期未定，暂勿外泄。如尚未开，最好改在明（十四日）晚开，以便确定是否全部公布后再作处理。[52]

2 月 14 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仪式结束后的第三天，中苏两

国报纸上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正式宣布中苏两国达成了一项条约和两项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并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白宣告两国将结成军事互助同盟，"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则在强调维护"中国国家的独立自主与领土完整、民族的荣誉及人民的尊严"的基础上，正式宣布苏联将于 1952 年底以前把两国共同管理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苏军也将于 1952 年底以前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该地区的一切设备有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还将于 1950 年内与中方组成联合委员会，完成向中国政府移交所有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的工作，大连的行政亦完全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与此同时，《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则宣布苏联将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低息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53]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相关协定，除贸易协定、航空线协定以及组建合营公司等协定尚未完成暂时不能签字以外，有关苏联专家待遇及不允许第三国在东北、新疆地区活动的补充协定等，虽然已经签字却未能公开。十分明显，尽管中国方面相信这样的协定在双方权利义务规定上并无不妥，斯大林等人却深知其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周恩来到底没能说服苏联领导人。

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应

1950 年 2 月 16 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动身回国了。此行迫使斯大林同意改订新约，无条件放弃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其收获之大，不仅超出毛泽东最初动身时的想象，与毛初到莫斯科时所陷入的困境相比，更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带着这样一种成就感返回北京，他们的心情应当可想而知。我们在毛、周以及中共中央这时发表的各种谈话和相关社论中，都可以清楚了解到他们对中苏条约及其相关协定的高度肯定态度。[54]但也正是这种成就感，进一步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当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了解到毛泽东在莫斯科大起大落的谈判经过之后，不仅斯大林最初拒绝毛泽东重订新约的态度令人难以接受，苏联方面坚持要签订一个限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新疆的补充协定的作法，也逐渐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在国内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的影响下，毛泽东等人对此行的成就感竟渐渐地开始打起了折扣。中苏两国之间所签订的协定，是否都做到了完全平等也成了一个疑问。而最让毛泽东疑惑的，一个是补充协定的问题，一个则是合营公司的问题。

根据以往的说法，对苏联提出的补充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后即表示异议，只是由于斯大林一再坚持，"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55]事实上，苏联这个限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新疆的提议，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适合新中国巩固自身安全的现实需要的，特别是适应了中共中央当时对美、英、日等帝国主义高度防范与戒备的心理。尤其是在新疆问题上，由于交通不便，少数民族杂居，周边环境复杂，境外敌对政治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在境内十分活跃，苏联如果愿意协助中国有效控制边境地区，禁止第三国势力进入，对新中国政府巩固新疆安全自属有利。对此，当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处理新疆事务的邓力群就有很肯定的说法。[56]也正因为中方有这样的利益需要，再加上苏方又主动加上对等权利的内容，毛、周当时十分痛快地同意了这个协定，只在文字上做了个别文字的修改。[57]周恩来随后之所以很快将这一补充协定报告国内，并明确通知苏方准备公开发表所有协定，显然也是因

为他和毛泽东都不认为这些协定存在着有损自身利益和形象的内容。否则的话，周恩来也不会告诉苏联领导人说：这些协定“无论是对中苏两国，还是对其他民主国家都是有利的”，“可以更加提高他们在全世界的威信”。

当然，以如此方式划定范围排斥第三国的作法，国内那些本来就不愿意看到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或抱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力主中国不应受人摆布的民主人士，却很难理解。由此而引发的议论也促使毛对这一协定所带有的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性质有所警觉。因为这种议论很容易让毛泽东联想起自己早先的言论。比如 1946 年底，他对当时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商约》，就有过类似的批评。当时西方记者对中国共产党人激烈批评形式上双方权利完全平等的《中美商约》感到不解，问毛：共产党为什么反对中美商约？毛回答说：因为中美商约准许美国人在中国随便购置房屋、地产，建工厂，开商店，美国船只可以到中国内河航行。记者对此表示疑惑，说：英国内河也允许美国船只去，商约同样规定中国人也可以在美国买房屋、开工厂，为什么说中美商约不平等？毛的解释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资本去外国开工厂、买房屋，还没有船舶到外国去。言外之意，条约上虽然写上了对等的条件，中国没有实行的可能与必要，就等于是单方面的权利，不能算是真正的平等。[58]无论后来的人们对这种解释存在着怎样的争议，毛泽东事实上很容易发现补充协定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苏联方面虽然在补充协定上也写上了相应的权利，但中国没有必要，也很少可能去苏联远东及中亚各共和国实行这些权利。何况，依据苏联要求，而非首先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自己边境地区划定范围禁止第三国人员存在，这对毛泽东所理解的中国自主地位也在情感上形成了某种伤害。可以想见，正是由于受到国内强烈的民族情绪影响，毛泽东才逐渐意识到协定的问题所在，进而改变看法，直至把补充协定等同于苏联在中国要了两块势力范围。

如果说毛泽东对补充协定看法的改变，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因素，还难以简单地从他们自身民族情感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对中苏合营公司看法的改变，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心态的渐趋高涨了。

中苏合营公司，指的是中苏之间这时“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的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船舶公司。成立这样一些合营公司的最初建议，实际上是中方提出的，并非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59]。1950 年 1 月 2 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说明：“此次由彭德怀同志带来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议定在新疆设立金属与石油两股份公司协定草案，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亦议定大体同样的协定草案，以便利用苏联资本，开发新疆富源，发展新疆生产。”刘在具体说明了原草案资本各半，净利平分等内容之后，提出：“这就是一种租让的或中苏合办的企业，而中国从中得一半的利益。但期限似乎定得太长（原草案规定公司经营期为 45 年－引者注），以定为廿年或廿五年为宜。请你考虑是否即由你向苏联负责方面提出这个问题谈一谈，在原则确定后，具体条文则交外交部与大使馆谈判。又，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我们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作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要求的。”[60]

从刘少奇的电报可以看出，基于建国初始，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资金缺口甚大，中共中央部份领导人对利用外国资本开发富源，发展生产态度积极。而考虑到政权在手，刘等甚至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可能要求来办类似合营工厂和企业，也无意反对。接电后，毛、

周显然也同意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中苏经济合作，恢复和发展国民族经济。周恩来到后，在毛、周与斯大林首次会谈中，毛即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61]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更进一步提出了双方合组几个合营公司的具体设想。[62]苏方同意后，双方就此一一达成协议，在毛、周回国后陆续完成了签字手续。而中共中央为此也曾专门表示过充分肯定的态度。《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社论还特别叙述了苏联实行租让制的历史，和当前经济恢复时期利用外资发展经济的极端必要性，强调这种合作方式是充分尊重我国主权的，在公司内部也是完全平等的，这是苏联方面向我所作的“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的重要投资”。[63]但是，《人民日报》专门为此发表社论，并特别强调主权问题，清楚地显示国内对此是有不同看法的。

果然，随着斯大林以后接连建议由苏联出资在中国建罐头厂、建橡胶园，毛也逐渐把它们同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了，坚持要搞就必须归中国。[64]罐头厂和橡胶园的话题意外引起毛的不快，难免会促使他对资本各半的中苏合营企业的属性也产生疑惑。在赶走了所有外国在华资本之后，中国上百年来第一次完全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苏联资本的存在，以及苏联方面某些损害中方权益的做法，自然会让毛越来越感觉难以接受。很快，取消这几个合营公司成为不可避免之事。不仅如此，毛泽东从此对以任何方式利用外资都持坚决排斥态度。从几年后毛尖刻批评建立这几家合营公司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实际上更多地还是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他告诉俄国人说：当年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搞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为什么坚持要搞这四个“合作社”，还不是因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但只要搞“合作社”，就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为什么要各占百分之五十，还不是要控制，要租借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65]

从最初以经济恢复与发展为基点，主动提议、积极支持建立中苏合营公司，到把建立合营公司，同民族歧视和侵害主权相提并论，甚至声称是斯大林强迫所致，这再典型不过地折射出建国初期毛泽东等人民族情感发展变化的轨迹。对于一个历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却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而言，它的复兴与崛起不可避免地会与民族主义的革命结为一体。而任何引导革命成功的革命党及其领导人，都必然会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特别是在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等重要革命指标渐次达到，整个民族完全摆脱被侵略、被欺侮的悲惨地位，开始以崭新的独立自主姿态展现于世界面前之际，人们内心的民族主义情感自然会表现得异常亢奋。但是，上百年的屈辱历史和国家贫弱落后的现状，毕竟是深深地嵌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道依然在流血的伤口。越是自尊和自信，其心态上也就越是容易转向敏感，对一些问题做出过度的反应。赫鲁晓夫讲过这样一件事，说的是 1954 年他在率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时，曾提议利用中国多余的劳动力帮助开发苏联的西伯利亚。毛泽东听后立即表示不满，指出赫鲁晓夫的这种提议实际上是在污辱中国人民，因为西方列强多少年来就把中国看成是一个落后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66]实际上，后来中国方面再三考虑后，还是接受了苏联的建议，派出了数十万民工到西伯利亚去帮助开发，因为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益无损，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事实上也并无损害。毛之所以会对这样一个提议如此敏感，显然与其越来越强的民族自尊心有关。

总而言之，对于政治家来说，民族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它可能成为争取民族解放以及维护和捍卫国家主权的强大内在动力；调适不周，也难免因悲情意识亢奋而在国家关系问题上形成困扰，发展到极致甚至可能造成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的悲剧，最终伤及自身。

新中国建国前后对苏联关系的这段历史显示，它最终走向与美苏对抗和自我封闭，除了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着一些意识形态观点上的分歧以外，受到美国顽固敌视态度，和充满民族优越感的苏联领导人忽视中方利益的某些作法的刺激，致使自身民族主义情感愈益高涨，也是原因之一。注意中苏两国最初民族主义碰撞的情况，从中吸取某些教训，对于后来的人未必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

[1] 参见博古：《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群众》第 20 期，1938 年 4 月 30 日；朱瑞：《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际斗争的一致》，《大众日报》1941 年 8 月 1 日；《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整风周报》第 3 期，1943 年 12 月 11 日；《关于世界革命问题》，《群众》第 9 卷第 5 期，1944 年 3 月 10 日，等。

[2] 这种碰撞的结果，在毛泽东的谈话当中可以了解得很清楚。在斯大林逝世后毛即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对 1950 年谈判结果的强烈不满。他说 1950 年谈判中斯大林不仅企图独占中长铁路，而且要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海军基地，还在中国开办四家合营公司，甚至把东北和新疆实际划为苏联势力范围。他并明确说："一九五 0 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包括"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参见尤金日记，李玉贞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 年 3 月 30 日，《国外社会与经济》1995 年第 2 期；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记录》，1958 年 7 月 22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3 页；《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3 月 10 日。

[3] 参见杨奎松前引书，第 267－271 页。

[4] 前引《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

[5] 《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照会》，1945 年 8 月 14 日，复旦大学历史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61－272 页。

[6] 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7] 最典型的言论可参见 1924 年 3－4 月间施存统：《论反对中国现在政府收回外蒙主权之主张》；李长蕃：《崇拜帝国主义与压迫蒙古》；沈玄庐：《蒙古独立问题》等文章。《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 年 3－4 月。

[8] 毛泽东说："等到人民的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外蒙古共产党将根据自己的意志，自动成为中华联邦的一个部分。"埃德加·斯诺著，奚博铨译：《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54 页。

[9] 《米高扬就 1949 年 1－2 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的报告》，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10]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1903 年由有沙俄、法国和中国合股的华俄道胜银行出资建成，属西伯利亚铁路穿越中国东北地区之一段，从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旅顺，成丁字形，全长 2400 公里。1905 年日俄战争后，长春至大连段被日本占据，改称南满铁路。自 1935 年 3 月 23 日，苏联不顾中方抗议，与日本及伪满洲国代表在日本东京签订了《关于中东路让渡基本协定》，将长春以北之中东铁路作价 1.4 亿日元，卖予日本及伪满洲国。

[11] 《刘少奇给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及斯大林对报告的批语）》，1949 年 7 月 4 日，《关于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2 期。

[12]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1949 年 7 月 4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5－16 页。

[13] 同上引注；并见刘少奇：《与斯大林谈话向中央毛主席的报告》，1949 年 7 月 18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5 页。

[14] 科瓦廖夫前引文。

[15] 《A·拉夫连季耶夫同王稼祥会谈记录（摘要）》，1949 年 11 月 10 日；《罗申与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谈话记录（摘自罗申日记）》，1949 年 11 月 10 日。（见沈志华等编译有关苏中关系档案资料，以下简注苏中关系资料）

[16] 1948 年 8 月毛泽东就其访苏想要讨论和请教的问题所开列的清单，可参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17] 《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 年 11 月 17 日。见苏中关系资料。

[18]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Π．Α．希巴耶夫同意共党员斯巴诺·维利尤谈话记录摘要》》，1949 年 12 月 13 日。见苏中关系资料。

[19] 中共中央新闻总署通报(№50)：《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1950 年 1 月 1 日。见苏中关系资料。

[20] 毛泽东对国内外对自己访苏的反应十分重视，曾电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将消息及时整理摘报。此类材料经报毛后，通常并不分送苏方。通报 50 号却被转送苏方，似非无意。参见毛泽东：《关于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19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辑，第 193 页。

[2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 年 12 月 16 日，见张木生译，沈志华编注：《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22] 同上引注。

[23]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6 页。

[24]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7－18 页。

[25] 裴坚章前引书，第 17－18 页。

[26] 科瓦廖夫前引文。

[27] 毛泽东在 1956 年曾回忆说，斯大林在这次会谈当中坚持周恩来不必来莫斯科，说这样做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大肆叫嚷中国政府就设在莫斯科。尤金著，李玉贞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纪录》，1956 年 3 月 30 日，转见《国际社会科学与经济》1995 年第 2 期。

[28] 对于毛生气程度和时间的考证，可参见杨奎松前引书，第 296－299 页。

[29]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1950 年 1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辑，第 206 页。

[30] 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 年 1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辑，第 212 页。

[31] 同上引，第 213 页。

[32] 《刘、朱、周给毛主席的电报》，1950 年 1 月 4 日；刘少奇：《关于党派协商会议等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 年 1 月 8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辑，第 240 页。

[33] 《乔冠华就外交协会讨论情况致毛主席电》，1950 年 1 月 5 日。

[34] 毛泽东：《关于向联合国派出我国代表等问题给刘少奇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辑，第 235 页；《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与毛泽东会谈纪要》，1950 年 1 月 17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35] 毛泽东：《关于发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的电报》，1950 年 1 月 19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辑，第 245－247 页。

[36] 参见师哲前引书，第 454－457 页。有关对此事的分析可参见杨奎松前引书，第 303－305 页。

[37]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 年 1 月 22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辑。

[38] 见苏中关系资料。

[39] 同上注。

[40] 参见苏中关系资料；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7 页。另据周恩来 2 月 8 日电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但此一说法与目前已公布之俄国档案存在矛盾，尚待进一步查证。目前暂依俄档。

[41] 所谓六次波折，主要是指在 1904 年日俄战争，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谈判，1929 年中东路事件，1935 年苏联让售日满，以及在 1945 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中长铁路问题始终成为制肘中苏关系中的一个负面因素。

[42]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 年 2 月 8 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 年 1 月 26 日。见苏中关系资料。

[43]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 年 2 月 8 日。

[44]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1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45] 参见斯大林：《告人民书》，1945 年 9 月 2 日，《斯大林文选（1933－1952）》，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37－439 页。

[46] 比如，在讨论贷款协定时，提出用"中国不再使用的全部剩余钨、锑、铅、锡提供给苏联政府，购买价格以国际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期限为 14 年，即从 1950 年至 1963 年，按每年易货协定的方式进行"，代替苏方所拟"所有剩余的钨、锑、铅、锡在前 10－12 年间按照每年的易货协定规定的方式卖给苏联"的文字时，苏联谈判代表米高扬对周恩来一定要增加"中国不再使用的"几个字，就显得极不理解且格外敏感。

[47]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3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48] 同上引注。

[49] 见《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1950 年 2 月，《党史资料研究》1998 年第 5 期。

[50]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 年 2 月 8 日。

[51]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的会谈纪要》，1950 年 2 月 13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52] 《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杨、李、乔木》，1950 年 2 月 13 日。

[53]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文献》，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1－99 页。

[54] 参见《毛泽东在中央东北局的讲话》，1950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 年 4 月 1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290－291 页；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2 页，等。

[55] 参见裴坚章前引书，第 25 页；师哲前引书，第 446 页。

[56] 沈志华对邓力群的访问记录。

[57] 苏方 2 月 10 日提出补充协定草案，毛只是把文中“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见《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12 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5 期。

[58] 毛泽东：《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1946 年 12 月 9 日，《毛泽东文集》，第 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5 页。

[59] 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

[60] 刘少奇：《关于中苏两国在新疆设立金属和石油公司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50 年 1 月 2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册，第 219－220 页。

[61]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 年 1 月 22 日。

[62] 《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 年 2 月 3 日。

[63] 《欢迎有利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社论），《人民日报》1950 年 4 月 5 日。

[64] 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6 页；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

[65]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 年 7 月 22 日。

[66] 赫鲁晓夫前引书，第 387 页。

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

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中苏力主避免冲突

１９４５年8月，苏军解放了北朝鲜。而后，金日成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在北朝鲜建立了劳动党领导下的政府。由于在美军占领下的南朝鲜也建立了反共的李承晚政权，南北朝鲜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１９４８年底，为迫使美军撤离，苏军首先撤出了北朝鲜。然而，苏军撤走之后半岛的局势却变得日趋紧张，从１９４９年1月1日到4月１５日，南朝鲜军队就３７次在三八线挑起军事摩擦，并且秘密向三八线附近调集了多达４１０００人的军队。北朝鲜政府压力极大。

出于安全的需要，还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和１９４９年1月，金日成就两次向苏联方面要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和提供武器援助。考虑到美国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攻击苏联有意永久分裂南北朝鲜，苏联没有同意金日成关于迅速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的提议。但根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的报告，斯大林批准了由苏联远东军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只不过，这一援助主要还只是些轻型武器。

１９４９年3月，金日成率朝鲜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期间，与斯大林直接讨论了有关北朝鲜的安全问题。对此，根据苏联大使和在朝鲜的军事人员的报告，斯大林明确表示：加强北朝鲜的军队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害怕南朝鲜人。

然而，１９４９年4月中旬，即金日成回国之后，一份来自北朝鲜的情报显示，美军准备在５月全部撤出南朝鲜，南朝鲜人决定，一旦美军撤出，就于6月对北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两个月结束战斗。为此，斯大林非常担心，毕竟金日成这时只有3个步兵师，武器装备还十分欠缺，而李承晚则有6个全部经过美军训练的全副武装的师。因此，苏联方面提议，与北京协商，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族官兵编入朝鲜人民军部队。据此，金日成一方面向斯大林求援，要求苏联方面于5月底之前帮助朝鲜人民军实现机械化，于9月底以前转让航空技术；一方面向刚刚打过长江的中国共产党请求在兵员上提供帮助。

5月，金日成的特使秘密访问了已经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平，向毛泽东说明了北朝鲜面临的严重局势，突出强调了南北朝鲜难以并存的情况，并转交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信。毛泽东显然赞同平壤的看法。他承认，北朝鲜与南朝鲜的冲突在所难免，“既可能是闪电战，也可能是持久战。对你们来说，持久战是不利的，因为到时候即使美国不干涉，也会唆使日本向南朝鲜提供援助”。但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为此担心，苏联和中国都站在你们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就会派兵与你们并肩作战。他强调，金日成应当坚定不移地争取实现统一朝鲜的目标，但近期还没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国际形势还不利，而且目前中国共产党还不能有效地和大规模地支援北朝鲜，一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任务，情况就不同了。

北朝鲜人此行的最大收获就是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关于在北朝鲜受到进攻时将给予实际援助的具体保证。毛泽东甚至还明确承诺，布防在东北地区的两个朝鲜族师可以很快编入人民军，一旦中国共产党统一中国的战争基本告一段落，人民解放军中的其他朝鲜族士兵和军官，也都可以编入人民军，以便加强北朝鲜军队的实力。

随着南朝鲜李承晚政权对北朝鲜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敌视态度，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双方之间边界冲突的次数到6月间更加频繁。6月１１日，李承晚甚至公开宣布，南朝鲜人正在准备给共产党人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平壤的不安情绪更加明显，

苏联方面这时也开始考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了。他们一方面坚持平壤应当极力发动和平统一攻势，另一方面则认为，在应付南朝鲜方面的进攻的同时，北朝鲜人有必要做反攻的准备。到了这一年的９月份，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大批苏联军事装备运抵北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９万人，北朝鲜领导人第一次开始提出，应当对南朝鲜的挑衅采取进攻行动。据苏联大使向莫斯科的报告说，在金日成看来，如果国际形势允许，“他们能够在两个星期之内占领南朝鲜，最多是两个月”。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他们不了解的是，还在他们之前两个月，中共中央就已经在请斯大林帮助解放台湾呢。

毛泽东计划进攻台湾，莫斯科对此态度含混

１９４９年４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般地跨过长江天险，开始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企图盘踞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但是，由于解放军既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诸岛一时还鞭长莫及，无可奈何。蒋介石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早早就把自己的大本营移到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要完成统一中国的计划，就不能不考虑进攻台湾的问题。

对国民党的巨大军事优势，使毛泽东最初对进攻台湾的艰巨性缺少足够的估计。他虽然知道进攻台湾必须跨海作战，没有海军困难极大，但他相信，既然自己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没有海军和空军，他靠步兵和渔船也能占领台湾，长江天堑不就是这么渡过来的么？当然，毛泽东表示，如果到时候自己的空军能够初步形成，有空军掩护并协助攻击，则“把握更大”。

７月中旬，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准备秘密访苏。出发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关于是否向苏联提出协助中共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手段的问题，会议同时建议刘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给斯大林的信中，试着提出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的问题。但是，根据多年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他们并不对此抱太多希望。随后，在访苏期间，刘少奇即根据政治局关于必须立即开始准备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的建议，向斯大林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在１９５０年进攻台湾的设想，要求苏方提供２００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争取赶上在进攻台湾的战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中共的请求。不过，对于刘少奇带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议的，请苏联在作战时提供空军和海军援助的要求，斯大林明确表示难以赞同，说是这样做的结果，必定会引起美国的介入，从而诱发美苏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而苏联人民已经遭受到巨大的战争灾难，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

毛泽东能够理解斯大林的顾虑，他多少年就是自力更生走过来的，他这时并不十分介意苏联的援助问题。但他的看法很快就发生了改变。因为，人民解放军在１０月下旬和１１月初先后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岛屿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步岛的战斗，两场仗打下来，部队损失惨重，跨海作战的难度终于使毛泽东了解到准备技术条件的极端必要性。直到这时，他这才比较深切地感觉到再度向苏联求援的必要。很显然，这两次作战失利都是因为渡海工具过于简陋。沿海作战近岛作战尚且如此，跨海攻击台湾焉能想象。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１６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他就当面向斯大林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

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

鉴于中共领导人再度提出援助请求，斯大林没有一口回绝，而是含糊其辞地表示：“这样的援助不是没有可能的，本来是应当考虑这样做的，问题是不能给美国一个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挥人员或军事教员，我们随时都可以派给你们，但其他的形式还需要考虑”。

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即使是只用志愿人员和只出动潜艇来帮助中共跨海作战，也难免会被美国人发现，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斯大林在会谈中再三提到他在１９４５年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达成的那个《雅尔塔协定》，称破坏这个由苏、美、英三个大国对远东政治格局所作出的共同承诺，未必是明智的。联想到斯大林这时因为担心与美国在远东发生直接冲突，甚至连对是否应当根本废除旧的中苏条约，另定新条约一事都犹豫不决，可知他这时是不可能向毛泽东伸出援手的。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更策略些的方式来解放台湾，比如，是否可以先向台湾空投伞兵，组织暴动，然后再去进攻呢？

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应当帮助毛泽东，就在他始终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对待毛泽东，把毛泽东搁在莫斯科坐冷板凳的时候，一个十分意外的情况戏剧般地改变了斯大林的态度。

１９５０年1月5日和１２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声称“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并且宣称美国的安全线既不包括台湾，也不包括南朝鲜，美国不会为了保护这些地方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美国政府的这种公开声明使斯大林的胆子壮了许多。原来不想签的条约同意签了，原来犹豫的军事援助不犹豫了。既然美国自己放弃了《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把中国和朝鲜划在自己的防御圈之外，这就等于把它们交给了苏联。因此，斯大林同意毛泽东就适当时机“解放”台湾进行必要的准备，同意将苏联给中国的３亿美元贷款，一半用于购买进攻台湾最需要的海军装备。不过，直到最后，斯大林还是小心翼翼地没有同意利用苏联的飞机和军舰来进攻台湾。

苏联人能够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和军事顾问（包括军事技术人员），这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足够了。所以，“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作为１９５０年中共军事工作的首要任务，紧锣密鼓地进行了起来。苏联人也加紧协助中国军队进行各种装备的和技术的改进工作，中共的空军和海军迅速开始初具雏形。

金日成决定先发制人，斯大林倾向统一朝鲜

与长期同莫斯科存在隔阂的毛泽东比较起来，金日成和相当一批北朝鲜领导人在苏联远东的军营中度过了相当多的日子，因此，对中朝两国领导人，斯大林显然更加相信北朝鲜人。但是，斯大林不会因此就愿意为金日成的设想冒险。对于金日成１９４９年9月的提议，他同样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苏共中央明确答复说：“美国在中国失败之后，可能会比在中国更直接地干预朝鲜事务”，更何况北方的军队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对南方发动一场成功的速决战的程度。战争一旦形成相持局面，“就给美国提供了在各方面干涉朝鲜事务的理由”。

然而，金日成不会放弃统一朝鲜的设想。南北朝鲜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要根本消除战争阴

云就必须铲除南朝鲜反共政权。而作为朝鲜共产党人，自然要以解放全民族为己任，眼看着毛泽东一举统一了中国，而朝鲜还有半壁江山和一多半人民没有解放，金日成就焦心如焚。因此，艾奇逊声明刚刚发表了５天，金日成就不失时机地重新向苏联外交官提出了加速统一南北朝鲜的问题。

１月１７日，在为北朝鲜驻中国大使赴任举行的午餐会上，金日成拿着酒杯走到苏联驻朝鲜大使馆顾问的跟前，有些激动地说：目前中国正在完成它的解放事业，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完成统一朝鲜的问题了。他宣称：毛泽东已经保证过，当中国统一完成之后，朝鲜统一就是最迫切的任务，中共将支持他完成这一任务。斯大林也曾经亲口答应他，一旦南朝鲜发动进攻，他可以进行反攻，结果，南朝鲜没有进攻，朝鲜的统一问题就这样拖延下来了。金日成说："一想到不应辜负人民的热切希望，我就夜不能寐"。他明确要求再次会晤斯大林，以便说明局势。

斯大林最担心美国干涉。但是，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没有干涉毛泽东统一中国？如果连中国大陆都不愿干涉的话，美国又怎么会去干涉一个小小的朝鲜呢？如今，杜鲁门和艾奇逊又公开声明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防御圈内，自然就更加没有必要为美国的干涉忧心忡忡了。既然如此，斯大林第一想到的也是朝鲜问题。这是因为，日本从来都俄国人的心腹之患。与对苏联安全无关轻重的台湾比较起来，朝鲜的统一会极大地巩固苏联远东的边防，并使日本直接处于苏联的威慑之下，斯大林对此可谓梦寐以求。在比较了金日成和毛泽东的要求之后，斯大林明确认为支持北朝鲜要比支持中国人划算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更看重朝鲜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是因为帮助金日成几乎不需要一个苏联士兵。毕竟，美国对远东保持不干涉政策很可能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苏联也必须严格地采取守势。一旦美国政府发现有苏联人秘密加入到远东地区的战争中去，杜鲁门和艾奇逊未必还会遵守他们的声明。

经过了将近两周时间的考虑之后，斯大林终于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底开始倾向于接受金日成的援助要求了。他在１月３０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情绪，但他必须懂得，诸如他想要着手解决的关于南朝鲜这样一件大事，需要有周密的准备。事情必须要组织得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要与我讨论这件事，那么我将随时准备接见他，并与他进行讨论。把这些转告金日成，并告诉他我准备在这件事上帮助他"。

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已经决心要帮助金日成了，这时离毛泽东离开莫斯科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斯大林没有向毛透露半个字。他们之间只是偶尔提到过朝鲜问题。当双方谈到中共中央１９５０年１月关于按照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泽东对金日成所做的承诺，把人民解放军中的其余１２０００名朝鲜族官兵，连同配备的武器，全部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决定时，他们才提到了朝鲜问题。而毛仍然在说，现在还不是北方如何进攻南方的问题，而是北方如何防御南方的问题。在他看来，更现实的还是中国解放台湾的战斗。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苏联方面很快就与金日成商定，苏联对北朝鲜的军事援助将采取有偿的方式来进行。北朝鲜以９吨黄金、４０吨白银和１５０００吨其他矿石来换取价值１３８００万卢布，足够装备三个师的苏联的武器弹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苏方还同意，北朝鲜可以提前使用原定要于１９５１年才提供的７０００万卢布的国家贷款来装备自己的军队。

在北朝鲜为统一事业加速装备军队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在为解放台湾做积极准备。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只不过，毛泽东不了解，金日成投入的力量比他大得多。斯

大林是唯一了解双方情况的人，他显然认为，金日成有必要就他的计划与毛泽东进行必要的勾通。正因为如此，在他批准金日成访问苏联的同时，他就特别要求他的大使提醒金日成，在朝鲜统一问题上，金日成应当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南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一直剑拔弩张，李承晚不时地发出战争叫嚣，北朝鲜经常有南朝鲜计划进攻北方的情报。这些情况，无论莫斯科还是北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何况，毛泽东就是以武力方式统一中国的。因此，金日成确信毛泽东不会反对他的计划。在他出访莫斯科之前，他经过北朝鲜驻中国大使通知毛泽东说，他希望就统一朝鲜问题对中国进行一次访问，与毛泽东交换意见。对此，毛泽东欣然表示同意，他告诉朝鲜大使说，他欢迎金日成的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是秘密的；如果还没有具体计划，最好进行一次正式的访问。由于这时北京在平壤既没有大使，也没有军事观察人员，因此，毛泽东丝毫也不了解北朝鲜统一工作的进程。他一面肯定以武力统一南方的必要性，一面仍旧提醒北朝鲜应当加强警惕，说北朝鲜目前应当首先做好一切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加强自身的力量，以应付可能的战争。

３月３０日，金日成等人秘密访问了莫斯科。这次访问一直持续到４月２５日才结束。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金日成介绍说，由于苏联的帮助，朝鲜人民军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对南朝鲜的优势，再加上南朝鲜人民的支持，他现在应当说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统一朝鲜了。由于苏联情报系统这时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给华盛顿的一份秘密报告，其中主张美国不要干预南北朝鲜之间发生的冲突，因此，斯大林也对形势感到乐观，相信现在是统一朝鲜的机会。

斯大林在这次会见中第一次对金日成的统一计划表示了肯定的态度，并称，如果说他在一年以前认为金日成的这个计划行不通的话，那么今天这样计划就是可行的了。因为无论是朝鲜国内还是整个国际的局势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帝国主义目前不会对朝鲜内部的冲突问题进行直接的干涉。当然，他仍旧强调说，统一朝鲜的作战应当建立在对南朝鲜的进攻发动反攻的形式上。他最后没有忘记提醒金日成，他的计划必须通报给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也同意的话，他不会有反对意见。

斯大林之所以始终向毛泽东封锁消息，直到最后才要求金日成去征求毛泽东的同意，很大程度上恐怕并不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计谋。考虑到中共中央早就提出了请苏联帮助解放台湾的要求，毛泽东又亲自向斯大林本人提出请求，不难想象，斯大林很难摆平毛泽东与金日成的关系。与其从一开始就向毛泽东去解释这样选择的必要性，与毛泽东争论孰轻孰重，倒不如造成一个既成事实，使毛泽东无话好说。毕竟早在１９４９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时，双方就已经商量好，朝鲜问题仍由苏联方面负责。在朝鲜问题上，不事先与中方商量，也在情理之中。当然，即使这样做了，他也必须还给毛泽东一个形式上的“公平”，尽管这种“公平”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但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让金日成去请求毛泽东的“批准”，在心理上可以或多或少地给毛泽东以安慰。何况，朝鲜半岛的动荡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一旦出现任何意外，中国的态度都是最为重要的。如果毛泽东反对，那么，采取进攻行动无论如何都是冒险的。

斯大林的再三叮嘱，促使金日成从莫斯科返回平壤之后不久，就再次与毛泽东联系，要求访问北京.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我们一定打过去。

５月１３日，金日成和朴正爱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在当晚的会谈中，金日成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他解释说，南朝鲜的侵略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南北朝鲜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南朝鲜人民急切地盼望着祖国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斯大林也明确给予肯定，并认为现在统一朝鲜是可能的，只是，斯大林同志强调，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后决定，必须取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这就是他此行访问的主要目的。

毛泽东不是没有想到金日成会有一个统一计划，但他还是对金日成通报的情况深感意外。因为，在斯大林已经明确表示同意中国进行解放台湾的军事准备，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各项先期工作也已经按步就班地迅速展开的情况下，他怎么也想不到斯大林会突然间转而赞成首先统一朝鲜。

毛泽东很委婉地对金日成表示：你们的大使已经几次来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现在还不可以。金日成则解释说，苏联已经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准备，斯大林也同意了，只要中国同意，我们不要任何帮助。不得已，毛泽东告诉金日成，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他需要请苏联大使立即向斯大林核实一下。毛泽东随后中止了会谈，紧急约见了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要求大使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

第二天晚上，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菲利波夫（斯大林使用的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示　如下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实现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问题的解决就应延迟，直到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中的细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转述。

鉴于斯大林已经明确表态，毛泽东自然无法持反对态度。他对苏联大使说，他已经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情况，他完全同意朝鲜同志的估计，即由于美国势力逐渐退出南朝鲜，朝鲜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他认为，恐怕有必要象中苏条约那样，在中国和朝鲜之间迅速签订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显然对金日成的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有些担心，因此相信中国需要为直接援助北朝鲜做好准备。

在与苏联大使会晤后，毛泽东立即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周恩来等中共政治局在京的重要领导人开了会，讨论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和金日成没有事先与他商量这件事相当不满意。几年之后，他在与苏联大使，以及与米高扬、与赫鲁晓夫等人的谈话中，曾经多次重提这件事，认为自己实际上是被蒙在鼓里，直到金日成跑来告诉他说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他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不论他是不是感到窝火，中共却只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这是因为，斯大林１９４５年以来几度干预中共，“不许革命”，曾经引起过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外来的干预是极其错误的。在这些情况记忆犹新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又怎么会去扮演斯大林过去扮演过的那种角色呢？因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接受既成事实。

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他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将会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

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金日成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三阶段计划，即第一步进一步加强兵力；第二步公开向南方提出和平统一方案；第三步，在和平统一方案遭到南朝鲜拒绝后则准备斥诸武力。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他强调，作战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部队行动要迅速，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要为占领城市而延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过，毛泽东还是对美国驱使日本军队或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有所担心。他告诉金日成，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他相信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因为到那时，苏联出兵是不方便的，它受到与美国签订的协定的限制，而中国则不受这样的条约约束。

金日成相信，日本军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人民军的士兵将战斗得更加坚决。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他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在５月１６日，即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表示同意毛泽东所提议的中朝缔结一个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建议，只是，这不应当是在战争发动之前，而应当是在朝鲜已经成功地统一之后。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已经箭在弦上，金日成此时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相比之下，鉴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将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的沮丧也不言而喻。几乎就在金日成访苏之前不久，中共还特别就武力统一台湾的问题与苏联军事当局就一些具体的作战设想进行过深入的讨论。而由于中共这时空军和海军的装备正在陆续到达，进攻台湾的技术条件问题正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而逐渐得到解决，因此，中共中共中央已经重新开始有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取台湾的决心，并初步考虑在１９５１年条件基本具备后，选择适当时机实施作战行动。毛泽东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朝鲜战争会排在了他夺取台湾行动的前面。他最担心的显然是，一旦朝鲜战争的爆发，无论胜负，美国政府都必然会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从而使他解放台湾的计划面临巨大的困难。

美国干涉横生枝节，"解放台湾"被迫搁浅

５月２９日，金日成通知苏联大使，他已经收到了斯大林答应提供的武器和装备的主要部分，他们准备在６月发起进攻，６月１０日前部队将全部集中到预定的进攻地点。随着按照既定方案北朝鲜提出的和平统一主张在６月１１日遭到南朝鲜当局的拒绝，第三阶段，即军事进攻阶段开始进入了倒计时。根据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制定的这个"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人民军应当在２２到２７天内分三个阶段实现解放南朝鲜的作战。６月１８日，作战计划下达到人民军部署在三八线的各个部队。２５日，受命参加进攻的７个师随着反击南朝鲜军挑衅的一声枪响，大举越过了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了。

面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领导人的心可以说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焦虑地注视着国际上，特别是美国的反应。两天之后，一个最让毛泽东担心的局面随之出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于６月２７日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因此他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进攻，确保台湾及台湾海峡的中立化，防止战争蔓延。在毛泽东看来，美国的这一行动，显然无异于

救了国民党的命。

对于美国的行动，毛泽东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号召“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但在内部指示中，中共中共中央则不能不承认：自己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海峡挡着”，结果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与此同时，由于６月２７日美国总统也同时宣布美国将出兵南朝鲜，中国东北边防以及可能的增援朝鲜问题日益紧迫，中共的战略重点也被迫转向东北地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逐渐停顿下来，以至最终不得不在事实上放弃了这一作战计划。

这是一件让毛泽东感到极其不满的事情。7 月 2 日，周恩来约见苏联大使，在讨论如何应付联合国卷入朝鲜战争的外交问题后，就清楚地表明了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他极为反感地告诉大使说：早在 5 月与金日成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就已经提醒他，美国可能干涉的问题，而金日成当时不相信。事实证明我们当时的估计是对的。与此同时，通过他们给苏联方面的一份综合反映外国人对朝鲜战争的看法的情报，中共领导人也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苏联选择这个时候支持统一朝鲜行动的疑惑。在报告中，他们写道，一位英国代表对中国领导人说，苏联鼓励朝鲜内战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台湾。

毛泽东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朝鲜战争，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本来想首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寻找适当时机协助金日成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武装进攻南朝鲜，既需要通盘考虑，也需要合适的机会。而且，他始终认为，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建立起来的朝鲜人民军，实际上还很少经受真正的全过程的战争考验，因而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成熟起来，卓有成效地进行这场统一朝鲜的速决战，更不可能对付可能直接参战的优势的美国军队。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有所怀疑。只是，斯大林的支持使他失去了反对的可能。等到 9 月中旬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轻而易举地围歼了人民军进攻部队的时候，毛泽东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了。但越如此也就越遗憾。所以，当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在这个问题上埋怨斯大林。他肯定地说：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是百分之百的错了”。但毛泽东心里想的多半是，如果当初斯大林不是轻率地支持在朝鲜采取行动，那么不仅不会犯这样大的错误，而且也不会使中国的台湾问题陷入如此困难的局面。当然，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人或许用不了付出在朝鲜战争中那么大的代价，就有可能解放台湾了。

关于朝鲜战争爆发的中国因素问题

关于中国作用问题的争论

从 1960 年代初开始，人们就在争论，对于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或中国到底负有怎样的责任。最初指责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的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1962 年邓小平和彭真参加苏共二十二大时，赫鲁晓夫等曾当面指责说，这场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

同策划的。这种说法遭到了曾经亲历了当时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的邓小平和彭真的激烈反驳。他们坚持认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最初并不知道斯大林和金日成有怎样的计划。[1]

由于中国与苏联、朝鲜同属共产党国家，朝鲜战争爆发 4 个月后，随着美国及其联合国军大举干预，中国政府也迅速出兵援助朝鲜党。因此，怀疑毛泽东或中国事先了解这场战争最初计划的，自然不只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也包括相当一部分西方的学者。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如果不是事先参预了策划，至少也是知情的。[2]

中共中央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问题上究竟起过多少作用，至今依旧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事实上，1990 年代初，前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已经部分开放。仅仅从俄国总统叶利钦提供给韩国政府的 200 余件相关档案中，就可以基本弄清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打响的一些关键所在了。这些档案文献至少能够说明一点，即直到 1950 年 5 月中旬以前，朝鲜党都不曾将其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透露给北京方面。即使金日成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于 1950 年 5 月 13－15 日之间访问了北京，当面向毛泽东说明了朝鲜党统一朝鲜半岛的大体设想，他也没有透露过任何更具体的战争计划。这种情况甚至一直延续到 6 月 25 日战争打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不仅不知道战争何时会打响，而且在战争打响后也不知道人民军作战的具体进程。周恩来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后的第三天就直截了当地向苏方报怨了这种情况。他指出，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除了报纸上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几乎得不到任何具体的情报。包括驻在平壤的中国大使馆，也无法了解到超出报纸电台以外的任何具体的军事作战信息。[3]换言之，透过前苏联档案，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1950 年的朝鲜战争，完全是在平壤和莫斯科之间酝酿出来的，具体计划则是由苏联军事顾问协助朝鲜党制定的。而中国方面当时却是被排除在这一具体过程之外的。

那么，这是不是说，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就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呢？当然不是。前苏联档案披露了几件很关键的资料，它们说明，毛泽东或中共中央并非没有起过作用。这主要是指 1949 年 5 月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和斯大林在中共中央的私人代表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与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谈话内容的报告；1950 年 5 月什特科夫关于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与毛泽东谈话内容的通报，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的通报等。[4]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新披露的档案证明毛泽东了解事实，“显示了毛在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甚至大大超过了传统学派的结论。”因为，在 1949 年 5 月和 1950 年 5 月这两度谈话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了解，毛泽东不仅不反对用军事的手段实现朝鲜的统一，而且承诺在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将愿意给朝鲜党以军事上的直接援助。[5]只是，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的，它们对朝鲜战争的爆发作用有多大，却需要更深入的分析。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是，1949 年 5 月毛泽东并不赞成马上进行统一朝鲜的作战，一年之后，中共中央对金日成关于即将开始统一朝鲜的作战的通报也相当慎重。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中国人后来成功地介入了这场战争，并阻止了美国人的推进，毛泽东还是会在斯大林逝世后相当严厉地批评说：这场战争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认为斯大林应该对此负有责任。[6]至少，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对莫斯科和平壤的决定是有些看法的。而邓小平和彭真后来更是明确指出，斯大林当年策划了这一切，却把中国人蒙在鼓里。在他们看来，当金日成 1950 年 5 月前来北京通知中共中央他们的统一计划时，中国人实际上除了同意之外，已经没有做其他选择的余地了。注意到上面这种情况，简单地说“毛在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有多么大，显然是不适当的。在这里，原则上赞成采取军事手段实现统一是一回事，具体地策划和准备战争是另一回事。毛泽东不反对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却并没有具

体参加“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把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的作用问题，与中国人直接参加“策划和准备朝鲜战争”等同起来，或相提并论，显然是不合适的。

关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刺激作用

我们不否认中国在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起过作用。但这首先并不在于毛泽东 1949 年 5 月和 1950 年 5 月两度在与朝鲜党领导人的谈话中，直接或间接地肯定或赞同朝鲜党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而在于中国共产党人 1949 年的革命胜利给予平壤以及莫斯科的直接的影响和激励作用。

朝鲜劳动党政权是在入朝苏军的帮助下，于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在 1948 年春天，也就是驻朝苏军撤走之前的几个月时间里，它才刚刚组建起自己的正规军－人民军。苏军撤走时，给朝鲜人民军留下了包括坦克、自行火炮、重炮及鱼雷快艇在内的一批重武器，还提供了足够装备几个满员步兵师的轻武器。但直到 1949 年春天为止，朝鲜党不仅不具备用武力来统一朝鲜半岛的足够实力与信心，甚至还不能不对来自南方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掉以轻心。从现有的文献记录看，金日成 3 月访问莫斯科时，几乎没有提及统一朝鲜半岛的具体设想。包括对南方军事挑衅的态度，斯大林也明确要求金日成不要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当南方军队先行攻击，北方的人民军才可以转入反攻。[7]也正是出于对自身力量不足的担忧，5 月间金日成又派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代表自己去北平见了毛泽东，特别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从什特科夫和科瓦廖夫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样认为北方目前还不存在着统一朝鲜半岛的军事实力，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即使美国人走了，日本人没有来，“我们（也）不劝朝鲜同志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主张）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一旦贸然进攻，“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援，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因此，类似的行动，只有在中国已经完成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而国际形势又变得有利时，才可以采取。[8]

那么，中国何时才算是完成了统一全国的战争呢？而国际形势又怎样变才算得上是有利呢？对于这一点，朝鲜党，包括斯大林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看法。

如果说在金日成访问莫斯科和金一访问北京之际，朝鲜半岛以及整个远东或国际形势对于朝鲜党还不能乐观的话，那么 1949 年 5 月份以后，情况则发生了重要变化。这首先是因为在苏军于 1948 年秋天撤退的压力下，美军在 1949 年 6 月也终于不能不撤出了朝鲜南部。美军的撤退在朝鲜党的领导人看来，无疑朝鲜半岛和整个国际形势转向有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次是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建国准备，召开了新政协，公布了《共同纲领》，这更是被朝鲜党的众多领导人看成是中国革命已经成功和中国的统一基本完成的重要标志。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党的建国行动，明显地刺激了朝鲜党内渴望迅速解决朝鲜问题的情绪。他们明显地没有考虑到中国党还在进行中的统一国家的战争问题，事实上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曾经有众多朝鲜人或朝鲜族人为中国革命流血牺牲，金日成等“显然认为”，胜利了的“中国人也应当帮助他们。”1949 年 9 月初，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金日成开始向莫斯科“请求准许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以夺占瓮津半岛，以及从瓮津半岛以东到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以缩短防线。”“如果国际局势许可，他们准备继续向南方挺进。”这里的所谓“如果国际局势许可”，指的其实就是寄希望于美国届时不加

干预。如果美国不加干预，党内比较乐观的一派坚信“他们能够在两周，至多两个月内，夺占南朝鲜。”当然，金日成在发现莫斯科方面质疑人民军的战力后也承认：“如果内战拖延下去，那时他们会陷于政治上不利的地位。而现在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指望速胜的”。因此，他很快改变了太过乐观的态度，强调“不主张发动国内战争，而只是建议夺取瓮津半岛和该半岛以东到大约开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鲜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并没有反对金日成的军事设想。恰恰相反，同样也是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的刺激，他们对于用军事办法统一朝鲜半岛的设想丝毫没有反对的想法。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关心的仅仅是军事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准备程度如何。莫斯科没有批准金日成的计划，只是因为从苏联大使、代办到苏共中央都一致认为，“要对南方进行胜利的速决战，北方军队还不够强大”。“如果军事行动由北方主动发起并具有持久性，那么这可能给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以借口。”[9]然而，他们明显地是期待着朝鲜的问题也能够像中国的问题一样，成功地借助于该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来解决的。

为了帮助朝鲜党实现军事统一的目标，莫斯科几乎马上就开始向人民军提供了相当可观的军事援助。再加上朝鲜党开始着手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接收由朝鲜族人组成的两个师的兵力，进入到 1950 年 1 月，即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公开表示朝鲜半岛不在其防卫圈内之后，金日成很快就再度提出了军事统一的要求请斯大林予以批准。他极动感情地表示说，眼看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了，而南朝鲜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常常夜不能寐。“现在人民军比李承晚军强大得多”，三天就能拿下瓮津半岛，几天之内就能进入汉城。况且“毛泽东（也）曾答应他在中国战争结束后将给予援助”。因此，“他必须再到斯大林那里去一趟，接受指示并获准让人民军发起进攻，解放南朝鲜人民。”[10]而这一次，也是由于注意到美国失去中国之后，不仅没有表现出必欲更坚决地干预朝鲜事务的态度，反而大幅收缩自己的防卫范围的情况，斯大林进一步对中国式的革命有了更多的信心，因而毫不犹豫地批准了金日成的请求。由此不难看出，朝鲜战争的爆发，确与中国革命 1949 年的胜利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无论平壤，或莫斯科，这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和刺激。

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影响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为与美英实现和平共处，在欧洲坚持要法国、意大利和希腊共产党交出武装，走议会道路，在远东逼着毛泽东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了解这段历史，就会知道，斯大林战后在对英美的态度上曾经相当谨慎，极力避免破坏战争结束前夕与美英就各自势力范围所达成的妥协。同样的情况，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苏联战后实际上也一直坚持以三八线为界，与美国互不相犯。为什么进入到 1949 年秋天之后，斯大林反而会不顾美苏之间久已划定的分界线，试图通过援助朝鲜人民军，用武力去夺取明明属于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南部朝鲜呢？在这里，最关键的显然不是斯大林对南部朝鲜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因为这种重视与需要显然不是这个时候才出现的。它明显地是与此时远东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而这段时间里，远东局势变动的最大因素，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明显地改变了斯大林对在远东地区处理与美国关系的既定方针。按照既定的方针，苏联应该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局限在中国关外东北地区和朝鲜北部，而承认美国在中国关内地区和朝鲜南部的优越地位。正因为关外东北地区被斯大林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在东北支持共产党，抑制国民党，可以说并无多少顾忌。反过来对中共在关内的战争，却表现得小心谨慎，生怕中共惹祸，引来美国的干涉。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推进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节节败退，美国政府不仅束手无策，而且干脆就袖手

旁观，避免承担责任。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斯大林对改变美苏在远东地区的现有格局逐渐开始抱有强烈的冲动和期望。

斯大林不满美苏在远东现有的力量格局，关键在于苏联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受了美国人的愚弄。由于俄国人始终把日本看成自己东部疆界最危险的敌人，与日本的交手又遭遇过旅顺战败的历史屈辱，因此在经历了 4 年之久的欧洲战争，牺牲了上千万人之后，俄国军民仍旧能够接受斯大林的动员迅速投入对日作战。基于苏联人的民族感情，和盟国就占领德国所达成的共识，斯大林理所当然地相信战后苏军理应和美、中等国军队一同参加对日本的占领。这一方面是为了雪 1904 年旅顺战败之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对日本的压制，避免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而为了使美国安心，斯大林甚至不惜在明明可以占领南部朝鲜的情况下，主动将苏军停止在三八线以北，而将三八线以南留给迟来的美军去占领。想不到，苏军主动让出了南部朝鲜，美国却拒绝苏军登陆和共同占领日本。美国的这种态度不仅让斯大林感到屈辱，而且也让他倍感威胁。鉴于 1945 年斯大林因为无法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而不惜违反中苏条约，转而支持中共的情况，可以想见，当美国拒绝苏军进入日本之后，斯大林对让美国取得对南朝鲜的控制权会有多后悔。这也是为什么，当朝鲜党提议要夺取南部朝鲜时，斯大林几乎从来都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对态度。他所关心的只是，此举会不会太过冒险。莫斯科突出强调金日成 1949 年 9 月提议的致命弱点在于无法速决，根本原因也正在于它认为北方的军事优势还没有强大到可以打起来使美国来不及干预的程度。

但是，即使北方的军事优势已经强大到足以使美国来不及干预就可以夺取整个朝鲜半岛的水平，对南部朝鲜的军事行动就不会引起美苏关系的高度紧张，直至发生局部的尖锐对立吗？对于这种前景，斯大林不可能预见不到。那么，为什么二战以来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一向谨慎行事的斯大林，这时却只是关心美国有没有机会在朝鲜半岛上进行军事干预呢，而不怕引发美苏在更大范围的冲突呢？显而易见，这又是因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在起作用。在斯大林看来，南北朝鲜的地位，几乎就是 1945 年以后中国关内和关外地位的翻版。中国的关外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关内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当年援助中共不及关内，就是因为生怕引来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干预而威胁到自己的利益。让斯大林深感诧异的是，中共在关内军事上的大举进攻不仅没有引来美国的干预，而且还迫使美国完全退出了中国大陆。还在 1948 年 2 月，即中共在关内转入全面进攻半年之后，斯大林就已经发觉自己过去对中国革命的担心和干预不仅多余，而且还是一个错误。在破天荒地承认自己由于估计错误而愚蠢地干涉过中国革命之后，他当然不会再轻易地去干涉朝鲜等国的革命了。他不仅不会轻易干涉朝鲜党，而且还从根本上开始肯定毛泽东关“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观念，因而改变了对战后世界政治发展趋向的看法。

斯大林改变二战期间形成的依靠大国外交来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方式，重新转向支持世界革命，至少是支持东方国家共产党像中国那样通过开展武装斗争来取得政权，改变美苏对抗的力量对比，开始于 1949 年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注意到这种情况，无疑对于我们理解苏联这个时候支持朝鲜党的军事统一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实上，还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苏联其实就已经在公开肯定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并极力推动亚洲各国共产党开展中国式的解放斗争了。还在 1949 年 7 月刘少奇访苏时，斯大林就力主由中国党负责指导亚洲国家共产党及其革命运动，意在要借助中国革命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国家革命。两个月后，当世界工人理事会明确表示反对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亚洲委员会的会议上发表号召各国工人展开武装斗争的讲话时，又是莫斯科出面干预，明确表态支持中共中央的立场，甚至主张公开发表刘少奇号召武装革命的讲话。[11]随后，1950 年 1 月，当莫斯科发现美国人试图对日单独媾和，

有扶持日本来牵制苏联的企图时，受苏共主导的共产党情报局更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日本共产党根据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斗争方针，意图走议会道路，主张“和平革命”的思想。其机关报公开宣扬中共中央的观点，称：“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获得胜利的结果的一个决定性条件，就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人民解放军。”说“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在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受到这样一种观点的支配，莫斯科甚至不顾各国的具体条件，开始明确指示日本、印度等国的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革命的经验，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对根本解决毗邻的朝鲜问题的办法，理所当然地也只会选择武装斗争这一条路。很明显，在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影响下，不仅许多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的道路看成是自己寻求解放的唯一途径，而且在美国冷战政策的刺激下，斯大林也重新祭起暴力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通过推动东方各国共产党人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一步步蚕食美国的势力范围，以求与美国相抗衡。[12]1950 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显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日渐弥漫起来的这样一种认识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关于毛泽东对战争不满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经验对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还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有关 1950 年进攻战的具体决定是在平壤和莫斯科之间秘密商定的，完全没有中共中央的事。5 月 13 日，即金日成已经就行动方案在莫斯科取得了斯大林的认可之后，他才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来到北京寻求毛泽东的支持。而当天罗申大使的电报则证实，毛泽东对金日成所转达的口讯相当慎重，特地停止了会谈，召来苏联大使，要后者马上致电斯大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13]而第二天斯大林也确实来电证实了金日成的话，并且表示：“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在中国同志不同意的情况下，问题必须留待下一次讨论解决。”[14]这种情况，及其以后平壤和莫斯科继续在不向中共中央通报的情况下，秘密拟定具体作战计划的情况，都足以撇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的直接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因此认为中共中央不赞成平壤和莫斯科的方针，甚至相信毛泽东 1956 年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表明了毛当年其实是反对打这场战争的，那又是大谬不然了。

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共中央当年对中国革命经验或中国革命道路的那种坚持的程度。既然中国革命的经验，即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共产党人，那么，受到中国革命胜利鼓舞最大，因而最希望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也必定是中国共产党人。既然相信中国革命的经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具有示范作用，那么，中共中央自然也就会在指导和帮助周边国家共产党人的时候，坚持要用自己的经验来做为衡量正确与错误的一种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共中央得知越南党为了巩固自己控制下的政权，不惜解散了党的组织，放弃了武装斗争，宣称愿使越南成为中立国时，马上表示了强烈的批评态度。而当它得知越南党迫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压迫，被迫又重新组织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抵抗时，马上就表示了高度肯定的态度，并迅速给予大力的援助。[15]而当 1949 年 5 月金一前来北平要求中共中央同意将人民解放军中的三个朝鲜籍师转交给朝鲜人民军时，金一虽未负有讨论朝鲜统一方案的任务，毛泽东却出人意外地指出，未来朝鲜要想实现统一，必须要使用武力。问题仅仅在于正确地把握形势和时机而已。[16]

最足以反映中共中央领导人试图要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来影响世界革命，特别是影响亚洲国家

革命的一个讯号，就是 1949 年 11 月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他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认为："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为此，他不顾中国新政府可能受到美、英等大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政府反对和抵制的情况，公开"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17]中共中央坚持和推广武装夺取政权经验的这样一种态度，具体如何影响了朝鲜党设想的统一方案，固然没有任何资料的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中央是绝不会反对朝鲜党准备用武力来解决问题的。根据列多夫斯基提供的证据，毛泽东 1949 年底访问莫斯科时，就曾具体提出过一个以中国革命经验为指导，推进亚洲各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雄心勃勃的革命设想。[18]毛泽东在 1950 年初毫不犹豫地批准将三个朝鲜籍师转交朝鲜人民军，更是清楚地显示了他对朝鲜半岛未来革命前景的一种估量。这三个师，特别是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已经南征到湖南、广西的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师，明显地成为了新组建起来的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周边国家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武装斗争高度重视，说他们在 1950 年 5 月 13 日得到金日成的正式通报前对平壤和莫斯科的计划毫无所知，也未免言之过甚。事实上，毛泽东 2 月中旬从莫斯科回国后，他就一直在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当 3 月底金日成开始莫斯科之行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金日成可能要同斯大林讨论朝鲜统一的问题了。3 月底，毛泽东会见了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明确表示了愿意随后在北京会见金日成的态度，并"把预期的会晤同朝鲜统一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如果有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19]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指的就是"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关于必须要采取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一点，毛泽东的态度相当肯定。他指出："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他并且十分乐观地为朝鲜同志打气说："对于美国人，不要怕他们。美国人不会为了这样一块小地盘就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20]由此不难了解，即使毛泽东这时还不清楚金日成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的最后决定是什么，或者更关心自己解放台湾岛的军事行动问题，但是，他已经相当肯定并认可朝鲜党"在近期"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了。他提出要金日成秘密来访，就是想要和金日成具体讨论对南方发起军事行动的计划问题。毛泽东后来之所以表示不满，也正与他的这种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来，有着丰富军事指挥经验的毛很想和金日成具体讨论朝鲜党的军事行动计划，却不料金只向他通报了军事行动的决定。以后的军事行动计划，完全是朝鲜党和苏联顾问在暗箱操作，根本就没中国人什么事。而这一计划事后又证明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计划，致使战争失败，还把中国拖下了水，这就自然更让毛泽东生气了。

中共中央不满意朝鲜党不和中国商量，就贸然发动进攻的情况，还可以从薄一波的回忆录中看出来。据朝鲜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薄一波的回忆透露，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战争的计划和指挥有相当多的批评。对于有着多年大战经验的中共领导人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朝鲜战争爆发后，除了最初几天的军事进展以外，整个军事行动远不如金日成 5 月来北京时所描述的那样理想。战争进入到 8 月份，明显进入相持阶段，人民军推进极其困难。战争的持续、朝鲜半岛的狭长地形和没有任何防御工事的漫长的海岸线，都给了拥有海空优势的美军具有极大的行动自由，这种情况自然要引起有着丰富战争经验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极度焦虑。即使朝鲜党还没有发出求助的信号，他们在 8 月初就已经明确指出，要看准时机，准备参战，现在非要把中国的因素加上去，才能解决问题。[21]因为，在他们看来，缺少实战经验和高度指挥艺术的朝鲜党领导人，是不可能把这场战争进行到底的。从 8 月政

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的这种气氛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不满的，更多的并不是军事行动本身，而是没有中国人参与，最终注定又要拖中国人下水的错误的军事计划和军事指挥。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没有能够参预朝鲜战争爆发的具体酝酿过程，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催化剂，而中国革命的经验更是促使莫斯科和平壤主动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的判断依据。中共中央虽然没有能够具体参预 1950 年 6 月 25 日战争的决定和计划的过程，却明显地支持这一行动。即使他们参预到具体决定和计划的过程之中，6 月 25 日战争也还是会发生。

----

[1] 《中共中央代表团与苏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团会谈纪录》（1963 年 7 月）。

[2] A.D.Barnett,《共产主义中国和亚洲》(New York:Vintage Books, 1961), p.152; Harold hinton,《世界政治中的共产主义中国》(波士顿：Houghton and Mifflin Co.,1966), p.27。到 1990 年日本学者小林庆二也还在怀疑在 1950 年初的莫斯科之行中，"毛泽东多半已经了解到战争开始的时间。"

[3] 参见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未刊稿）。

[4] 见齐德学、沈志华主编：《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 1996 年印，25－27，75－76 页。

[5] 金学俊：《朝鲜战争的起源－北朝鲜领袖与斯大林、毛泽东之间的相互关系》，沈志华主编:《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第二研究室 1996 年印，第 103 页。

[6] 《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6 年 7 月 23 日）。

[7] 《斯大林与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49 年 3 月 5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11－14 页；《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采取军事行动问题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1 月 19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61 页。

[8] 《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内容致菲利波夫电》（1949 年 5 月 18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26－27 页。

[9] 《顿金关于金日成准备夺占瓮津半岛问题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9 月 3 日）；《顿金关于南北朝鲜军队情况及金日成拟夺取瓮津半岛致 AY 电》（1949 年 9 月 14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 71 次会议关于批准给什特科夫指示的决议》（1949 年 9 月 24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41，42－44，54 页。

[10]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采取军事行动问题致维辛斯基电》。

[11] 《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12 月 26 日）。

[12] 参见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4－321 页。

[13] 《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致莫斯科电》（1950 年 5 月 13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76 页。

[14] 《菲利波夫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致毛泽东电》（1950 年 5 月 14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76 页。

[15] 参见拙作:《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1 期。

[16] 《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内容致菲利波夫电》。

[17] 参见《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 年 12 月 26 日）；刘少奇在《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0－138 页。

[18] 1993 年笔者在访问列多夫斯基时，后者曾出示了一份毛泽东当年提交给斯大林的备忘录，内中主要谈及亚洲革命的设想。

[19] 《伊格纳季耶夫关于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等事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4 月 10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73 页。

[20]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1950 年 5 月 12 日），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第 74 页。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 页。

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始末

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５日，朝鲜战局突变。在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下，美军共７万多人，在５００架飞机、２６０艘军舰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后路。９月１６日，洛东江前线美韩军共１０个师大举反攻。

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当美国陆战队开始推进到汉江南岸，而美国飞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时，斯大林沉不住气了。他一面下令国防部长紧急制定一项出动苏联空军去保卫

平壤的计划，一面致电金日成，强调美国人在仁川的登陆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与北朝鲜后方的联系，朝鲜有必要迅速从南方撤出４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考虑到人民军主力正在对釜山发动新一轮攻势，苏联驻平壤的大使和军事顾问没有认真贯彻斯大林的上述指示。

９月２５日，汉城陷落，釜山的进攻战也告失败，美军已开始大举北边。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主力几乎损失了所有坦克、大炮，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面临被围歼的严重危险。带着斯大林的撤走命令刚刚到达朝鲜不久的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化名马特维耶夫的苏共特别代表团团长明确认为，必须立即向中国人请求帮助，至少应当请中国朋友派遣１５００名以上的司机到朝鲜来帮助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队。

斯大林这回相信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２７日，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但斯大林特别申明，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要让一个在朝鲜的苏联顾问被俘。当然，斯大林认为请中国人到朝鲜去是必要的。只是，他在给马特维耶夫的电报中强调，在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时，切记"不要提莫斯科"。

２８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实现莫斯科提议的具体办法。但会议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在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了；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剩余的人民军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北朝鲜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政治局领导人一致同意向苏联和中国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显然，提出这种请求是令人沮丧的。因为金日成想用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

１０月１日凌晨２时５０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仅仅不过１０分钟，斯大林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了他人着想，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他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到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当这封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金日成的特使朴宪永也带着求援信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成了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战局不仅显示出美国军队在装备及火力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表明它在指挥和战术上也不可小视。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缴获敌人五花八门的各种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是否就能够达到歼灭和驱逐美国人的目的呢？根据周恩来列举的数字，可知美国一个军仅７０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１０００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５００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３６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２９０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１９５１年2月才能有３００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次，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显而易见，同两个月前相比，朝鲜战局的恶化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从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后方近、兵力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只要苏联的装备能及时运到，空军的掩护问题能够基本解决，就不难打败美国军队；如果在朝鲜打胜了，美国还敢对中国大举进攻吗？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了。因此，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接着，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１３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战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毛泽东在列举了美军与解放军在火炮及其它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争取使每个军能够有５００至６００门火炮。但是，他表示并不准备拖延出兵。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集的１２个师于１０月１５日开始出动，到达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争取在实战中，用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

然而，在１０月２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战则必胜，胜不了还出什么兵？毛泽东终于也犹豫起来了。

这时，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彭德怀还没有到北京，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叫彭德怀来，听听他的意见。但连夜起草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发了。考虑到必须给斯大林一个答复，毛泽东在３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了一封电报，内称："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八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

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颇感不安。因此，他在电报结尾处特别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

毛泽东３日的复电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１０月５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整整讨论了一整天。所有的与会者都确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为了最后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承担苏联本应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当天又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他针对毛泽东的担心逐一解释，让毛泽东放心。他断言：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日本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想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至于苏联是否会被拖入战争的问题，他用颇具煽动力的语言鼓动说：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会被拖入战争。但是，"这需要害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

其实，毛泽东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努力，问题仅仅在于，军队领导人能不能有信心。４日，彭德怀赶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会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针对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的话，彭德怀承认："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但是，在毛泽东提出"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的问题后，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得到彭德怀这样的回答，毛泽东显然十分满意。他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由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商量解决，出兵的准备继续做，由彭德怀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在５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有了转变。据此，毛泽东提议，一方面成立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周密准备，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说明出兵与不出兵的利弊得失，最后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７日，毛泽东再度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要他转告斯大林，他同意斯大林来电的基本观点，并准备过一些时候派９个师入朝作战，只是有关入朝作战和苏联援助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详细的讨论。

８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电告了金日成。当天，周恩来与林彪也从北京飞抵莫斯科。周恩来当时带去的是两种意见：苏联能够迅速提供中方所需的装备。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但很显然，周恩来和林彪的谈话比较多地谈到了出兵困难的一面，联系到毛泽东准备"过一些时候"出兵的电报，斯大林显然对中国方面的意图发生了误会。在反复强调出兵的好处而仍无法说服周恩来之后，变得激

动起来，大声说："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而朝鲜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崩溃了。"

１０日和１１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将近两天的会谈。他在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明，斯大林一面肯定愿意提供１６个志愿空军团进行空中掩护，一面又对立即出动空军掩护表示困难，声明苏联远东空军准备不足，至少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有可能给予掩护，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强调可否向中方提供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一再告诉斯大林，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不仅中方接运困难，而且也没有飞行人员可以利用，何况还有一个由中方付款的问题，这在财政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必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于是，讨论来讨论去，双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据此，他们分别正式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

不管周恩来带去苏联的是几种意见，在毛泽东这边始终还是在做着出兵的准备。在收到周恩来关于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和决定暂不出兵的通知之后，毛泽东立即下令暂停执行有关部队出动的原定计划，并电召高岗和彭德怀来京会商。１３日，彭德怀、高岗赶到北京，他们虽然对苏联暂时不能给予空军支援也感到意外和不满，但对于让金日成到东北来建立流亡政府，把美国人放到鸭绿江边上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担心所在。在反复讨论了这种情况之后，政治局领导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了。因此，毛泽东马上于１３、１４日接连三电周恩来，说明"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至于作战，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待苏联的装备到了，我们在空中和地上均占优势时，再取攻势。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１３日，苏联大使罗申将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了斯大林。毛泽东告诉罗申说：中国方面的唯一要求只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

１４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斯大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些年后，陈毅甚至肯定地说，斯大林当时被感动得掉下眼泪。他十分兴奋地正式通知金日成说："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

中国对朝鲜停战问题态度的变化

在有中国人参加的朝鲜战争中，除了最初几个月的时间双方真正是在作战以外，从 1951 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 1953 年 7 月战争结束，双方基本上是处在一个打打谈谈的状态之中。其中，谈的时间远比打的时间长。因此，研究朝鲜战争，必须要研究朝鲜战争停战的过程。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开始及其经过艰难曲折最后取得成功，自然是战争双方反复努力的结果，但是这种努力背后的情况却是千差万别的。对于中共中央来说，它对停战谈判的态度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了解这一变化的来龙去脉及其原因，理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

介入这场战争背后那些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

斯大林对联合国干预的应对策略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显然过高地估计了经过苏联顾问计算的北朝鲜军队的军事能力，以至竟没有考虑到应当采取适当的外交手段来阻止可能的国际干预。事实上，还在 1 月底，他就以抗议美国等国拒绝驱逐国民党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名义，要求他的代表离开了联合国。对他来说，此举也许能够避免苏联在联合国公开卷入争论，从而引发有关苏联与战争关系的不恰当联想。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并不在意苏联对战争会做何种反应，几乎当天就做出了干预战争的决定。不仅如此，美国还利用其影响下的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在在 7 月初的安理会上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一系列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包括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各国军队直接干预朝鲜战争，以援助刚刚加入联合国的韩国政府。对于这一严重事态，苏联因为没有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竟然失去了利用其否决权加以阻挠的重要外交机会。

当然，联合国的介入对于共产党人并非都是坏事。这是因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中间，毕竟并不都那么赞同美国的军事干预政策，这就给了苏联重回联合国，发挥其外交影响力，以牵制美国军事干预计划的机会。苏联方面首先试探着利用英美之间的矛盾，推动英国出面提出和平调停的建议。此举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而印度驻苏联大使却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随后以个人身份提议由美、苏、印三国组成朝鲜问题委员会，共同审议和调停朝鲜战争。对此，斯大林给予了相当的重视。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因此出面代表苏联政府表示了欢迎的态度。他告诉印度大使说，苏联的建议是：这件事应当在有中国和北朝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由五大国代表协商解决。[1]而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其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斯大林迅速决定利用 8 月苏联代表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议事章程，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发挥作用。

但是，斯大林的这些反应根本上都不是想要促成朝鲜停战。按照最初的军事计划，北朝鲜人民军应当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解决问题，在此期间美国或者是联合国军应当难以做好大举干预的军事准备。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在 7 月间继续对战争保持乐观的看法。他对美军介入在军事上所做的准备，仅仅是同意向北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派出“穿着文职人员的服装，作为《真理报》的新闻记者”的军事顾问，以便加强部队的有效指挥力量，同时赞同中国政府关于“集中 9 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战争发生意外时能够迅速“入朝作战”的建议。[2]直至 8 月底，北朝鲜人民军的推进在釜山一带受到美军的顽强阻击，陷入僵局，他依旧继续给金日成打气，声称：“苏共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3]

8 月，苏联代表重新回到联合国安理会并出任主席。他对朝鲜停战问题提出了两项先决条件，即：第一，必须考虑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以及朝鲜人民的代表参加；第二，外国军队应当撤出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撤销在苏联代表缺席时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作出的各项决议。显而易见，苏联人并不指望这些要求能够取得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赞同。苏联代表的努力唯一取得收获的，是 9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了一项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议案。[4]

9 月 29 日安理会通过上述议案的时候，北朝鲜的军事形势已经随着 15 日美军在仁川成功登

陆而全面恶化。但即便如此，斯大林也并不指望能够在联合国阻止麦克阿瑟向北朝鲜推进。他显然更希望中国能够按照它所做出的承诺，出兵援助朝鲜。因此，苏联政府这时并没有设法提出一个能够被联合国安理会接受来作为讨论基础的和平方案。它坚持主张：朝鲜半岛的交战双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然后由北朝鲜的最高会议和南朝鲜的国会作为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选举组成统一的朝鲜政府。而在实际上，斯大林在莫斯科明白告诉来访的周恩来和林彪：现在局势下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们出兵把美国人顶回去，或者你们让金日成的人撤到你们的东北去建立流亡政府，二者必居其一。[5]结果，事情正如斯大林所估计的，在麦克阿瑟指挥下的联合国军对苏联的劝告置之不理，必欲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上来，中国人被迫出兵援朝。

毛泽东的作战目标？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出动，无疑带有不得已的性质。毛泽东用来劝说多数领导人的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基于道义和感情的因素，因为都是共产党人，过去金日成等朝鲜同志曾长期与中共并肩作战，因此反复讲："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二是迫于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因为北朝鲜毗邻中国重工业基地东北三省，因而强调对朝鲜不能不帮，让美国人骑到鸭绿江边来，就会威胁我们，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6]

但是，从志愿军参战之日起，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本人，仍多少抱定了要在军事上解决问题的想法。还在 10 月 2 日，毛泽东最初起草给斯大林的复电，准备表明自己的态度时，他就详尽地说明过自己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他的观点很清楚："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而在毛泽东看来，"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革命都是有利的了。"毛泽东虽然注意到朝鲜战争有"两军相持成为僵局"的可能性，但他显然更看好"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毛泽东提到的唯一困难，就是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差距过大。因此，他的意见是，志愿军出动后，"第一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7]十分明显，毛泽东这时是以彻底战胜和驱逐美军为目标的。

当然，长期从事战争指挥的经历，也使毛泽东能够对军事形势做相当冷静的判断。比如在志愿军入朝之初，即第一次战役打响之前，毛泽东就曾专门分析过可能影响朝鲜战局结果的三大因素。"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否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山峰在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果

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内心里对战争的前途仍是相当乐观的。他明确强调：“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8]

志愿军入朝作战头两次战役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毛泽东的乐观估计。尽管在战役开始之际，毛泽东还在主张保持谨慎的战法，尤其主张暂时避开美英军队，以免被其胶着，至少应当做到先打韩国军队，然后再打美英军。但眼见战役展开顺利，他的胃口就渐渐地开始变大了。进入到 11 月以后，他更是接连不断地提出一举歼灭美军几个师的极具想象力的作战目标。[9]他甚至认为：“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10]第二次战役发起后，即 11 月 28 日，他明确提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11]12 月 5 日夺取北朝鲜首都平壤之后，毛泽东更估计美军将要全面撤退。“至迟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这一情况。[12]

依据上述情况不难判断，毛泽东从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始终不曾有过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想法，也不曾准备把自己的作战目标局限在南北朝鲜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上。正因为如此，即使负责前线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在第二次战役结束之际已经明确提出，对朝鲜战争必须做长期打算，不能急于求成，并考虑在三八线以北休整部队，毛泽东还是明确主张必须打破美英利用人们头脑中三八线的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企图诱我停战”的阴谋，否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为此“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 当然，他同意，要根本解决朝鲜问题，非“经过严重的斗争”不可，故“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但是，他仍然极力强调战争的最终目标，即要迫使美军退出朝鲜半岛。因此，他一面委婉地表示同意彭德怀关于应当主要打伪军打的意见，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同时却仍然强调还要歼灭几万美英军，称“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因为“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13]

第一次拒绝联合国停火提议的经过

12 月 5 日，眼看志愿军把联合国军打得节节败退，以印度为首的 11 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刚刚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频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14]

几乎就在印度等国停战呼吁的同时，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

中国方面之所以会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态度。因为有消息说，维辛斯基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对此，葛罗米柯的答复很明确：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乘热打铁”。[15]随后，苏共中央政治局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16]

莫斯科的答复显然符合毛泽东上面的想法。在深入讨论了印度等国关于停火问题的动议和苏联政府对停火问题的态度之后，周恩来于 12 月 7 日凌晨 3 点受命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说明了中国方面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恩来告诉罗申大使说：近来，联合国秘书长、印度、英国和瑞典的代表不止一次地询问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伍修权，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如下：“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将在下列条件下停止：

１、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２、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３、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５、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

如上述五项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被采纳，五大国（指美、英、苏、法、中）即可派出自己的代表，以召开签订停战条件的会议”。[17]

对此，莫斯科当然赞成。只是，他们相信，印度等国代表“其实是美国的探路人”，对他们不能过于坦诚，“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的牌的时刻。”“况且，中国的五项条件可能被美国利用，去打联合国决议的耳光。不应当给美国这种好处。”斯大林提议，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并迫使联合国和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18]

12 月 9 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倍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 14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

但是，要停战，即使只是要表示赞同停战的意向，就不能不慎重考虑越过三八线的问题。然而在实际上，越过三八线已经成为中苏两国一个既定的方针，全无回旋和犹豫的余地。既然如此，继续与印度等国围绕停战问题进行周旋，看起来就毫无意义。因此，12 月 22 日，就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大举越过三八线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不会上联合国所谓“停火”方案的当，除非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美国武装撤离台湾海峡，中国政府获得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否则决不停止战斗。[19]

第二次拒绝联合国停火建议之经过

第三次战役从 12 月 31 日起，一直打到 1951 年 1 月 8 日。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 100 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线。这边是斯大林大为兴奋，电贺“这是人民爱国力量对反动力量的伟大胜利”[20]，那边联合国内部停战的呼声却又再度高涨起来。

还在 1950 年 12 月 29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在一旦战线不守时，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作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 1 月 11 日突然提出来，并且得到英国等国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地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作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21]

1 月 13 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立即实现停火；（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人并不是真想接受这个五步方案。但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表白，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都只能是美国领导人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如果中苏朝三方这时接受五步方案做为停火和谈判的条件，即使这仅仅是出于策略的目的，不仅美国政府的企图不能得逞，而且势必会使美国政府在外交上更加被动，它的任何军事反攻的企图都必然造成联合国军内部的尖锐分歧，从而使它从战争初期的一呼百应，迅速跌落到严重孤立的境地。何况，五步方案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国政府梦寐以求的，承认它本身在美国就是外交上的极大失败。

对中国方面来说，这时更重要的是，入朝作战的大约 40 万志愿军经过三次战役减员已近 10 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 500 公里，有 400 公里没有空军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不仅士兵疲惫不堪，而且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停火提议，美国在它所赞同的联合国决议的压力下，自然不能不暂时停止反攻作战，这不仅可以把停火线暂时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附近，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一定时间的休整补充时间，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

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因此，联合国的停火提议，对志愿军至少在策略上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然而，中、苏、朝三方对美军的反击能力和战争的艰巨性，明显估计不足。

就在联合国通过五步方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金日成发了一封电报，次日并转发给斯大林。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表明，他这个时候不可能接受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电报估计战争前途只有三种可能，一是"在中国和北朝鲜军队的压力下，敌军将进行微弱的抵抗，然后撤出朝鲜。二是"敌军将在釜山－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三是"客观原因迫使我们于 2 月进行一次战役，此后即继续进行休整，以便彻底完成最后一次战役的必要准备工作。"此电是为了支持彭德怀关于休整部队的意见，强调只有充分准备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其决心夺取彻底的军事胜利，统一整个朝鲜，把美国军队赶出去的意图十分明显。16 日在进一步给金日成的电报当中，他更进一步指出：春季再次发起进攻时，就是要"最后解决朝鲜问题"了。[22]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形势估计，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 1 月 17 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正式拒绝了五步方案。电报称："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电报建议，必须在同意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由有关各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和美国撤出台湾海峡等问题；必须立即在中国召开包括中、苏、英、美、法、印度、埃及七国会议，并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23]

尽管中国政府的主张中实际上包含着部分承认五步方案的意向，这种拒绝的态度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印度等中立国家虽然看到周恩来电报所提谈判条件与五步方案有着某些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经不必在这个问题上再行敷衍了。随着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开始反击，美国代表也在联合国借机大谈中国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 月 1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在战场上，中国方面都开始由主动转为被动了。

坚持战争的最后努力

第三次战役是 1951 年 1 月上旬结束的，经过彭德怀的极力争取，并得到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支持，连续作战三个月之久的志愿军终于得到了休整补充的机会。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于 1 月 25 日乘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大规模反攻。联合国军的进攻，打破志愿军预定的两个月的休整计划。彭德怀深知部队困难已极，马上再战，弊多利少，因而当即提出：可否根据 11 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的决议，为增加帝国主义内部之间的矛盾，播发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已从乌山、太平里、丹邱里线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的消息？毛泽东对此马上表示异议。他于第二天电告彭德怀说："中国和北朝鲜军队向北后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及发布关于赞同暂停军事行动的公报，这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敌人恰好希望当我军向北撤至一定距离，以便使他能封锁汉江时才停止军事行动"。"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其目的是消灭二至三万美军和伪军及占领大田－安东一线以北的地区"。毛泽东同时询问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声称"从国际的观点看，不让敌人占领仁川和汉城，以使中朝部队给敌人的进攻部队以重大打击，是完全合适的。"[24]

为反击美军进攻而仓促发动的第四次战役，前前后后打了将近三个月时间。由于敌人这次摸清了志愿军连续作战能力不超过一个礼拜，利用志愿军粮弹耗尽，疲惫不堪，进攻能力几近衰竭之际大举反击，结果使志愿军遭到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次挫折。虽然志愿军各部队打得十分顽强，战役组织上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误，但这一仗打下来部队不仅损失了 5 万多人，而且没有能够实现毛泽东和斯大林提出的战役设想。相反的，志愿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 100 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还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就隐约地开始意识到自己对朝鲜战局前景的看法可能有些过于乐观了。他虽然拒绝了彭德怀关于利用联合国停战提议伪装停战的建议，但却第一次谈到了可以与美国进行谈判的问题。尽管，他所提到的谈判，未必与放弃赶走美国军队的目标相矛盾，但至少，他已经注意到，单纯依靠战争的方式，并不完全有利。毛在电报中估计："敌人现在就指望夺回汉城－仁川一线以南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并对汉江进行封锁，以便使汉城处于敌方炮兵火力的威胁之下，进而迫使我们停止军事行动和开始和谈。敌人想借此使中朝处于不利地位，对此，我们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他同时肯定地说："结束第四次战役之后，敌人有可能同我们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和谈，那时再进行谈判将对中朝有利。"[25]

随着四次战役进行困难，在听取了彭德怀回京的汇报之后，毛泽东于 3 月 1 日第一次对与美军作战的严重困难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他在这一天致电斯大林为志愿军被迫撤出汉城，退至三八线进行了辩护。他说：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 9 个军减员 10 余万人，3 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 6 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不可避免。鉴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他甚至坦率地承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当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志愿军的作战目标并未改变，只不过"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26]

斯大林还在美军进攻开始时，就特别表示希望不要放弃仁川和汉城。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与苏联有关的。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更是与苏联的援助密切相关。为了鼓励中共中央把战争进行到底，在得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斯大林接连做出了一系列决定。这包括进一步提供 6000 辆汽车，迅速帮助中国完成装备 37 个全副苏式武器的步兵师的任务，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再从苏联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的空防任务；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飞行员配备 10 个后备的飞行员；无偿为中国提供 372 架最新型的米格－15 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 6 个米格－9 歼击机师。[27]不难看出，斯大林这时对支持志愿军继续作战倾注了相当高的热情。

既然相信志愿军的主要困难来自于运力薄弱、兵力不足，以及敌人在火力上占有优势，在得到斯大林许诺给予大力援助，再加 37 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已陆续到达，新开进的部队多已换上较先进的苏式装备，苏联火炮组建的 4 个炮兵师和 4 个高射炮师也陆续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已增至 6000 多门，中共中央显然没有理由不把战争进行到底。因此，尽管毛泽东已经肯定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而中共中央这时的指示却提出，朝鲜战争还是应当"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结果，毛泽东不仅决定要再打第五次战役，而且第五次战役的目标从开始时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到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要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

第四次战役的结果已经很不理想，战役 4 月 21 日刚刚结束，第五次战役马上就从 4 月 22 日开始打响了。战役发动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敌人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撤，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虽然没有发现情况异常，但也改以解放战争打蒋介石的例子，去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对美军每次的作战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对战场的选择，也特别提出，出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仍要设法发挥我军运动战的特长，如果三八线以南敌人防线强固，不妨想办法把敌人引到北面来打，只须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线就可以了。[28]但斯大林甚至连这种灵活的战法也不同意。他特别提醒毛泽东，切勿拿美军与蒋介石的军队来类比，他们没有蒋介石那样愚蠢。因此你们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北退，不仅丢了平壤会严重影响北朝鲜人的士气，而且你们在前线后方也没有预先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地建立起自己的防线，一旦那样，志愿军转入进攻势必要付出巨大的牺牲。[29]

志愿军没有能够大踏步后退，但仍旧在美军的大举反击下全线被迫后撤约 40 公里。整个战役明显地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不仅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 3 兵团 60 军 180 师未能归还建制。仅此一个战役，志愿军就有 1.7 万人被俘，占了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 80％还多。

中苏两党关于停战问题的交涉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一时还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要想照毛泽东所说，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在事实上也不大可能。不仅北朝鲜和苏联不会同意，就是自己国家也难以保持如此长期的战争状态。正因为如此，5 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始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要想实现统一朝鲜的战争目标，暂时也全无可能。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毛泽东显然已经注意到这样的意见。

6 月 2 日，毛泽东得到通报称，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 5 月 31 日曾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拐弯抹角地表示美国希望在联合国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方面谈判结束朝鲜战争的办法。[30]显然，美国人虽然军事上取得了进展，但自身也有困难。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当然，在 6 月 4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31]

斯大林这时似乎不愿意看到中国人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他在 5 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

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但他相信，志愿军目前遇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要按照目前计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加强敌后游击队的活动，进一步装备新的大炮和其他必需的武器，情况就会改善。他担心的反而是，几度后撤，志愿军的士气已经出现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32]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意识到继续作战的严重困难，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了。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终于开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了。他在 5 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 9 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33]

6 月 13 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 60 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有些不安。他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面临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34]

斯大林的答复，使毛泽东很快下了决心。他一收到电报当天就致电高岗和金日成，要他们与斯大林协商争取停战的办法。毛泽东表示：“现在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都得采取防御态势”。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停战，很容易被敌人看成是软弱的表现，即使能够谈判，中朝方面也必定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最好这样做：或等待敌方提出，或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或两种方法同时进行。[35]

既然决定争取停战，自不必等美国来提出，完全可以利用苏联的地位。6 月 23 日，经过斯大林的批准，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36]25 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 月 10 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中共中央对停战谈判的策略

确定了谈判的方针，具体谈判起来却是一个相当复杂和技巧的问题。提出过高的条件，必使谈判陷入僵局；主动进行退让，又难免给对方造成错觉，从而步步进逼，使自己陷于被动。何况，朝鲜战争双方，互有胜负，谁也不想订城下之盟，因此虽然进入谈判，双方态度都相当强硬。经过斯大林同意，由毛泽东拟定的中朝方面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协议草案，包括

以下几点：

（一）双方同时发布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二）双方军事力量从三八线各后撤１０英里，建立非军事区。

（三）双方停止从外部向朝鲜的一切军事调动。

（四）在停止军事行动后３个月内分批全部交换战俘。

（五）所有外国军队在３个月内分批全部撤离南北朝鲜。

（六）南北朝鲜的难民在４个月内应返回从前居住的地区。[37]

从上述条件可以看出，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这比 1951 年 1 月 13 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即使比 6 月 13 日毛泽东给高岗、金日成的电报中所提出的条件，也有明显后退。[38]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谈判条件，也还是不足以让美国人接受。难民问题不用说了，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怀疑美国人和南朝鲜方面是否能够接受。就是被中、朝、苏方面视为“最基本的原则问题”的两条，即限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以三八线为界，恢复 1950 年 6 月 25 日以前的状态，美国方面也不答应。不得已，中、朝方面被迫又作出让步。就撤退所有外国军队问题争论一周后，毛泽东即明确提议：“不要提出把外国军队撤退问题作为停止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因为事实上我们目前也没有这个实力。金日成也表示，只要各自军队能够从三八线后撤１０英里，可以暂时放弃这一要求。[39]

而后就是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了。双方围绕着这个问题整整争论了一个月。由于美国和南朝鲜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多于中朝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美方不仅不肯以三八线为界，甚至还提出什么“海空补偿论”，要求中朝军队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后撤，来划定军事缓冲区的界限。考虑到“敌方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在这方面不可能让步，因此，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谈判代表团在双方相持不下一个月后即明确提出，为避免谈判破裂，“最好考虑在当前战线所在地区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不再为三八线而进行斗争”。但斯大林最初对这种让步感到担心，他并且明确反对毛泽东这时提出的关于邀请中立国家代表介入谈判，以制约美国的意见。他再三强调：应该“是美国人更愿意继续谈判”，而不是我们。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将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中朝方面更需要尽快签订停战协议”，这是示弱的表现，“没有任何好处”。[40]结果，停战谈判终于在 8 月 23 日被迫中断。

双方军队重新在战场上进行了大约两个月的激烈较量之后，美军在整个战线上平均又推进了两公里左右，但付出的代价相当沉重，美国人也意识到没有办法坚持它的所谓“海空补偿论”了。因此，新的一轮谈判于 10 月 25 日重又开始，只不过谈判地点按照美国人的要求，移到位于双方实际接触线中间的板门店去了。谈判继续围绕军事分界线问题进行争论。但由于美方不再坚持“海空补偿论”，中朝方面不再坚持以三八线为界的要求，主张“以双方实际接

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谈判开始取得进展。虽然斯大林仍不断地提醒中朝方面要“实行强硬路线，不能有急于结束谈判的表现”，他实际上也转而同意“采取灵活战术”了。[41]终于，谈判双方在 11 月 27 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原则上达成了妥协。[42]

斯大林支持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随后的谈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了。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43]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朝鲜战争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 11.2 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 2.08 万人；而中朝方面掌握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 4417 人，南朝鲜战俘 7142 人，相差有十倍之多。这一方面是由于志愿军从战争开始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采取在战场上释放战俘的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朝鲜人民军大量吸收战俘当兵和从事后方工程建设。再加上志愿军及北朝鲜战俘中确有一定数量的原俘虏兵存在着不愿回到共产党政权下的要求，韩国李承晚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情治单位又乘机介入其间，进行宣传鼓动，结果使中国方面在政治上陷入严重被动，不得不全力相争。

中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处境不如朝方主动，是因为志愿军战俘中绝大多数都是原国民党军的俘虏兵，政治上容易动摇，自愿遣返的只是战俘中的少数。而北朝鲜方面谈判时背着中苏两国隐瞒了数万战俘[44]，其主要被俘人员又是部队胜利推进时被美军仁川登陆作战拦截于南方而被俘者，前韩国俘虏兵极少，因此不容易受反共宣传的影响，大多数愿意回到北方。这两部分人员相加，北朝鲜实际上并不吃亏。这种情况明显地使北朝鲜方面不愿太过纠缠于战俘问题。特别是因为战争没有结束，联合国的空军仍可以对北朝鲜狂轰滥炸，这给了北朝鲜方面以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当 1952 年 2 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妥协，决定在签订停战协定后 90 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以解决问题时，金日成就主张尽快结束谈判，“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他看不出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何况，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政治上也不可靠，所以他相信“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见”。他为此特别指示人民军的谈判代表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且辗转通过外务相朴宪永向毛泽东表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向。[45]

当 1952 年 7 月 13 日，美国表示愿意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从最初的 7 万人增加到 8.3 万人之后，金日成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金日成直接给毛泽东发了电报，建议接受美国人的提议，尽快就停战问题达成协议。他明确讲，因为为几万名战俘，北朝鲜方面正在经受着巨大的损失，仅 7 月 11 日到 12 日夜，平壤居民就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死伤了 6000 多人。但是，毛泽东于第二天告诉他说：“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两天的研究，一致认为，正当敌人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其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不利的”，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我们必须迫使敌人让步，或者采取军事行动来寻找改变目前形势的出路。对于朝鲜方面的困难，中国人民将

竭尽全力予以帮助，“请您不客气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所要求的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46]

毛泽东与金日成对美国提议的不同看法，有着重要的背景。周恩来 8 月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时谈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问题出在美国人同意遣返的 8.3 万人中，7.6 万人是朝籍战俘，中国战俘只有 6400 人，这还不到中国被俘战俘的三分之一。他告诉斯大林，中朝之间的分歧在于，毛泽东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金日成认为这样不利，因为每天损失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未能得到遣返的战俘人数。但毛泽东确信，继续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有助于打破美国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企图。[47]

对此，斯大林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他指出：“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 20 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同意：“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同意：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但谈判中态度必须强硬，仍应首先坚持全部遣返，要逼迫美方先做让步。[48]

战俘问题的争论使板门店谈判在 10 月份再度陷入僵局，并导致停战谈判长期休会。尽管联合国就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且在 11 月 17 日通过了印度代表提出的，由四个中立国代表组成特别遣返委员会，交战双方在议定的非军事区的交换地点，按议定的人数将战俘移交给遣返委员会，愿意接受遣返的战俘在该委员会的监护下即时返回家园。仍未遣返的战俘则在停战协定签署期满 90 天后，提交给停战协定规定召开的政治会议来解决。[49]对此，周恩来于 11 月 28 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反对。他表示赞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先停战然后解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的建议，并重申：“战俘全部遣返问题仍然须依照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国际处理战俘的惯例来解决。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周恩来同时还致函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断言联大通过的这项决议，实际上是强行扣押战俘的借口，要求联大撤销该项决议，呼吁在苏联建议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板门店谈判。[50]

事实上，战俘问题这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归还人数多少的问题。对于高度重视“道义”形象的中国领导人来说，它更多地已经变成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政治问题。为此，只要能够保持目前的相持局面，使美国不能再演仁川登陆的一幕，中共中央就决心长期打下去，直到美国人妥协为止。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现在虽然我们已挡住敌了人。并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还没打到使它非停战不可的程度。美国之所以破坏战谈判，就是这个原因。因此，明年的抗美援朝斗争还应加强，继续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在这条战线上打得美帝国主义罢手，不管一年也好，两年也好，继续下去也好，总有一天要打得它罢手。”[51]因此，中国方面甚至压缩了谈判代表团的人员，也不打算再与印度接触，商谈战俘问题了。[52]

面对中方的强硬态度，1953 年 2 月 22 日，美国方面首先做出姿态，打算恢复谈判。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这一天发表声明，建议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有关规定，先行遣返病伤战俘。但由于不了解美方的真实态度，为了不让对方产生幻想，基于“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

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采取行动为止”的既定方针，毛泽东仍不认为有必要马上重开谈判。他告诉志愿军谈判代表说：“在观看发展后再行决定是否予以答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周后，即 3 月 5 日，始终支持中国方面采取强硬态度的斯大林突然逝世了。这使得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共中央在停战问题上的妥协

斯大林逝世不久，莫洛托夫在苏共中央内率先提出了一份关于立即在朝鲜停战问题的备忘录。这一文件认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以往曾经有过几次实现停战的机会，但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

莫洛托夫的提议迅速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的同意。根据这一文件起草的苏联政府致毛泽东和金日成的信提出：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推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从中国、朝鲜和苏联三国的利益出发，应当在停止战争方面表现出一种“主动精神”。据此，苏联方面提议：立即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就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 2 月 22 日发出的关于交换伤病战俘问题的呼吁，做出积极的回答。然后由周恩来和金日成分别发表声明，说明积极解决战俘问题，保证朝鲜停战和缔结和约的时机已经到来。[53]3 月 21 日，苏共领导人与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周恩来就朝鲜停战问题举行了会谈，并正式递交了这一信件。

不难看出，苏联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有了极大的不同。在中国政府刚刚拒绝了印度代表在联大通过的议案，毛泽东又就遣返战俘问题表明了强硬的立场不久，突然得知要马上改变态度，这让周恩来颇感困难。他在与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最后表示：这个让步“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新的方针”。“在过去一个时期，我们弓弦拉得很紧。毛泽东同志在政协讲话，也强调了为遣返俘虏的正义性的斗争。”因此，他必须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并经过讨论后才能就苏联的提议做出答复。[54]

周恩来随后在电报中报告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 109 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同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55]

北朝鲜的态度早已明了，如今苏联也持如此态度，中共中央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不过，朝鲜战争毕竟也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方面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无论怎样坚持争取在战俘问题取得正面效果，中共中央事实上也不能完全无视志愿军战俘中存在大量政治上动摇的国民党俘虏兵，难以硬性争取的问题。因此，它实际上也多少意识到拒绝印度方案未必完全有利，至少给自己造成了“不利影响”。包括对克拉克的声明，毛泽东也多少有些犹豫不决，因此虽然指示外交部起草了严厉驳斥的谈话稿，随后却又考虑其实也“可以商谈”，要周恩来向苏联领导人征询意见，看是否可以“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56]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方面态度的转变，最终促成中共中央态度的改变。毛泽东一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就很快回电表示赞同。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

夫(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57]

苏联方面的态度，以及苏中达成的妥协，使北朝鲜领导人欣喜万分。据说，金日成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激动得欢呼起来”。苏联特使库滋涅佐夫和费德林报告说，金日成明确认为“目前的形势进一步拖延下去对朝鲜和中国，或者对整民主阵营都是不利的”。“苏联政府的建议是最明智和正确的”。考虑到“朝鲜方面在前线和后方的损失（每天几乎 300－400 人）非常大，而与美国人进一步讨论关于遣返战俘的数字不是十分明智的。”[58]

3 月 23 日，毛泽东电告参与负责板门店谈判的丁国钰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湾（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为此，他要求谈判代表团再不要采取凡事抗议的强硬态度，尤其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无重大事件，甚至不要向对方送抗议书。[59]

3 月 26 日，周恩来回国，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并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随即，中共中央派负责全面谈判领导工作的李克农、乔冠华返回板门店。28 日，中朝方面正式复函克拉克，表示可以讨论交换重伤病战俘问题。30 日，周恩来正式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进一步表明了中国方面准备在战俘问题上让步的姿态。

但是，到 1953 年 4 月，志愿军前线阵地巩固，并且已经完成在沿海地区反登陆作战的部署，整部部队的装备及兵员都空前强大。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在战俘问题上妥协，也并非中共中央所愿。当毛泽东得知前线指战员求战心切，一致要求发动战役反击时，自然高度重视。他因此明确批准同意志愿军的反击作战计划，明确指示：争取和，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60]

4 月 26 日，朝鲜战争双方重新恢复谈判。但谈判如中共中央所预想的一样，并不顺利。双方之间艰难交涉一个月之久，仍无结果。5 月 13 日，美国代表更提出了中国方面无法接受的反建议：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藉战俘就地释放。鉴于美方的强硬态度，志愿军提前发动了夏季反击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明确指示说：“目前停战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所提出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61]板门店谈判因此再次中断。

注意到反建议所带来的强烈反应，美国方面采取了适度妥协的立场。5 月 25 日，美国代表提出并经联合国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波伦对莫洛托夫解释说：只要将联合国的新建议“与朝中方面 5 月 7 日的提案相比，明显看出联合国做了很大让步。第一，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以前的提案，该提案规定，不愿遣返的朝鲜战俘应在停战协定生效之日予以释放。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规定，朝鲜战俘将中中国战俘一样，应移交中立国委员会。第二，联合国的新提案规定，允许朝中方面有 3 个月时间向战俘作解释工作。联合国原先为此目的

而规定的期限是 2 个月，而对方提出的期限是 4 个月。”此外，“在联合国的新提案中，采纳了对方关于朝鲜战俘问题移交政治委员会的提案。作为对这一提案的补充，联合国代表现在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票的方式通过决议。因此，联合国代表放弃了他们原先关于这一问题提案，该提案规定了这个委员会的 5 个成员应一致同意的原则。”[62]

显然，中共中央注意到：“对方新方案和我方 5 月 7 日方案基本方针是相符合的。”[63]但鉴于军事进展顺利，志愿军并没有马上停止这一次夏季反击作战，而是稍微调整了进攻的目标，要求部队把主要进攻矛头指向韩国军队。这次攻势到 6 月 16 日结束为止，成功地扩大了 58 平方公里的阵地。

6 月初，停战谈判重又恢复，并很快在联合国新提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进而于 6 月 8 日正式达成了朝鲜停战协议。但就在志愿军正式宣布结束夏季攻势的第二天，李承晚政府就单方面进行了释放战俘的行动。此一事件引起中朝方面极大不满。中国方面不仅致函克拉克提出抗议，中断了谈判，而且再度迅速组织了报复作战。在已经通过停战协议，就差正式签署，而克拉克又迅速回函表示歉意之后，发动这次进攻势必要向苏联方面进行通报。故周恩来受命于7月3日凌晨委托伍修权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对目前停战谈判情况和克拉克来信的对策的文字说明，具体说明了中国方面准备采取的和战步骤。尽管苏联政府对中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并不十分赞成，但也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据此，毛泽东于 7 月 8 日明确通知志愿军总部说，停战协定的签署，必须推迟到 7 月 20 日以后，并须视军事进展的情况而定。因为“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是破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字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不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64]

7 月 13 日，即在停战谈判恢复三天后，志愿军再度发动了金城战役。此役一直打到 7 月 27 日，即双方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当天才告结束。据志愿军方面统计，此役总共毙俘伤敌 7 万余人，收复土地面积 192 平方公里。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会再三对此时结束朝鲜战争表示遗憾了。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如果“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大致用一年的时间继续打击美国人，以占领沿汉江更为有利的边界，是可以。”因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 1 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 21 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 18 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65]“如果再打八个月，我们可以打垮他们的全部阵地。假如在这之后进行和谈，我们可以取得更有利的条件。可是，这个时候斯大林逝世了，苏联同志不要打下去了，因为要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金日成同志也不要打下去了。”[66]

当然，毛泽东的这种遗憾，并不是说如果再打下去就可以决出胜负，而是指可以在更有利一些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毕竟，整个朝鲜战争中，最让中共中央感到遗憾的，就是战俘问题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最后只得到了占中国战俘三分之一强的 7110 名战俘，更重要的是，1.4 万名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这件事本身，极大地便利了美蒋的反共宣传，有损于新中国的政治形象。

----

[1] 彼得·卡尔沃科西雷编著，王希荣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APRF，45/1/331/79.

[3] APRF，45/1/347/56.

[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 645 页。

[5] 师哲前引书，第 496－498 页。

[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3 页；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02－403 页。

[7] 《关于决定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39－540 页。

[8] 《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2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88－589 页。

[9] 《军委关于加强同美国军队作战的思想教育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22 日）；《关于三十八军等部的作战部署给彭德怀、邓华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78，640 页。

[10] 《关于释放俘虏等问题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1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72 页。

[11] 《关于鼓励士气争取大胜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 年 11 月 28 日），《建国以前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89 页。

[12] 《关于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 年 12 月 11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719 页。

[13] 《关于朝鲜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部署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50 年 12 月 21 日）；《关于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全军主力后撤休整的电报》（1950 年 12 月 26 日）；《关于打好第三次战役和准备春季攻势给彭德怀的电报》（1950 年 12 月 29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731－732，735，741 页。

[14] 《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第 670－672 页。

[15] APRF，3/65/371/35-37.

[16] APRF，3/65/828/23-24.

[17] APRF，3/65/336/17-19.

[18] APVRF，059a/5a/3/11/196-197.

[19] 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 页。

[20] APRF，3/1/336/88-89.

[21]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9 年版，第 381 页。

[22]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1 年 1 月 16 日，APRF，3/1/336/81-82 页。

[2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118－119 页。

[24] 王焰前引书，第 446 页；《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 年 1 月 28 日，APRF，45/1/337/41-43; 《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 年 1 月 30 日，45/1/337/43-44.

[25]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 年 1 月 28 日。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151－153 页；并见 APRF，45/1/337/78-82.

[27] APRF，45/1/337/118; 45/1/ 338/87,91。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331－332 页。

[29] APRF，45/1/338/98-99.

[30] 参见 FRUS，1951，Vol.7, pp.483-486, 501-511.

[31] APRF，45/1/339/4-6.

[32] APRF，45/1/339/17-18.

[33] APRF，45/1/339/23, 28-29.

[34] APRF，45/1/339/31-32.

[35] APVRF，059a/5a/5/11/35-37.

[36]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11 页。

[37] APRF，45/1/340/19-20.

[38] 毛当时在电报中表示，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可以不提出作为条件，因为联合国已经成为侵略工具，中国现在不认为加入联合国有特别意义。但应当考虑把台湾问题提出来作为条件，以便讨价还价。当然，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作出相应让步，以便首先解决朝鲜问题。

[39] APRF，45/1/340/93-94.

[40] APRF，45/1/340/89.

[41] APRF，45/1/342/100.

[42] 《国际事务概览，1952 年》，第 406－407 页。

[43] APRF, 45/1/342/16-19, 100.

[44] 据后来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报告：北朝鲜扣留了 13094 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 6430 人在朝鲜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 42262 人。“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转见沈志华：《1953 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45] 《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 年 2 月 8 日，APRF，.45/1/342/81-83。并见沈志华：《1953 年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46] APRF，45/1/343/72-75.

[47] APRF，45/1/329/54-72.

[48] 同上。

[49]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2）》，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年中文版，第 440－442，445－446 页。

[5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70、273 页。

[5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5 页；《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72-273 页。

[52]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279 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31 页。

[53] APRF，3/65/830/66-71.

[54] 转引自熊华源：《关于 1953 年朝鲜停战谈判恢复的情况》，在“朝鲜半岛的分裂与统一”

学术讨论会（2000 年 10 月，丹东）上的发言提纲。

[55]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3 年 3 月 21 日，转见《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 118-119 页。

[56] 转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5 页；《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 117－118 页。

[57]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第 119 页。

[58] 《库兹涅佐夫、费德林致莫洛托夫电》，1953 年 3 月 29 日，APRF，.3/.65/830/97-99。

[59] 《毛泽东关于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俘问题的电报》，1953 年 3 月 2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第 148 页。

[60] 转见沈志华：《1953 年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

[6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95、399－401 页。

[62] 《莫洛托夫日记摘录》，1953 年 5 月 28 日，APRF，.3/65/830/6-13。

[63] 《周恩来年谱》上卷，第 304-305 页。

[64]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3 卷，第 453 页。

[65]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第 354 页；《库兹涅佐夫致外交部电》，1953 年 7 月 29 日，APRF，3//65/830/187-189。

[66]《毛泽东与英共执行委员会主席波立特和总书记高兰的谈话记录》，1957 年 11 月 8 日。

新中国从援越抗法到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变

新中国建国后几乎立刻就被卷入到两场大规模的境外战争当中去了。一场是发生在中国东北部疆界之外的朝鲜战争，另一场则是发生在中国南部疆界之外的印度支那战争。这两场战争差不多同时演变成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战争，并非偶然，它们显然都与新中国自身的政治特性密切相关。如果说中国被迫以志愿军的形式直接参加朝鲜战争，并在事实上成为战争的主要承担者，还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卷入，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充其量只是为了延续其一度丧失了的殖民统治，它并不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何以新中国政府仍旧给予了除了出兵以外的几乎一切形式的支援？[1]十分明显，无论是朝鲜战争也好，还是印度支那战争也好，促使新中国政府必欲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援助的，并不仅仅由于它

们关系到新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必须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安全的大后方，由于有了中国的战争经验及其直接的军事和物资援助，越南独立同盟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由弱变强，扭转了战场形势，开始成为足以向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挑战的强大力量了。但就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1954 年一个日内瓦会议使越南和法国之间达成了划界停战的协议，数以万计的越南独立同盟的部队和干部不得不从越南南方以及老挝、柬埔寨撤往越南北方，原来设想中的解放全越南以及解放老挝、柬埔寨，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标因此放弃了，越盟只得到了半个越南。而力主划界停战的，恰恰是始终积极支持着印度支那解放战争的新中国领导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而急遽的改变？近年来，一些亲历者和研究者已经就新中国政府向越盟派出军事顾问以及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等问题做出了一些说明，但对新中国政策转变的情况及其背景似乎尚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2]本文旨在结合新中国政策转变的经过就此做一尝试。

解放印度支那？

1945 年 9 月 2 日，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通过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诞生，胡志明就任人民临时政府主席。但是，由于同盟国宣布印度支那北纬十六度线以南为英国军队受降区，以北为中国（即国民党）军队受降区，随后法国军队在英军的支持下大举开入，力图恢复其被日本人夺去的殖民统治。胡志明不得不在法军大举北进的情况下，为争取越南独立和统一，宣告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发动抗法战争。

越南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越南党过去只打过一些游击战争，部队既缺少训练又缺少正规战争的经验，再加上没有较先进的武器，面对装备精良，尤其是有优势空军支援的法国军队，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其中央根据地虽地处越北山地，又临近中国边界，却经常遭到法军的扫荡与轰炸，边界通道及其重要战略要点均被法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消息后，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事，抗法战争爆发后已经与中共中央建立起电台联络的胡志明，几乎马上就派人赶来北京，要求中共中央给予援助。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3]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积极鼓励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学习自己的榜样。尽管，考虑到亚洲一些国家的革命活动还十分困难，“切忌张扬”，他们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时不能不有所保留，但他们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为其他落后国家人民开辟解放道路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4]刘少奇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5]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因此，当他们发现越南党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政权，解散了共产党并宣布保持中立时，他们立即在内部予以了批评。而对胡志明重新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并向他们求援，他们自然会积极支持。

1949 年 12 月，胡志明派出的代表李班、阮山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 10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因毛泽东这时已经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访问，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全面主持了援越工作。他不仅给刚刚开到广西不久，尚未完全结束作战的林彪及陈赓所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侦察由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准备向越南党提供必要的援助，而且特别电告越南党，希望他们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讨论和决定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中的各项问题。得知越南方面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前往帮助越南人民军作战，刘少奇等很快即决定调派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带人亲往越南考察情况，以便决定如何选派军事人员。当然，考虑到新中国刚刚建立，统一尚未实现，战争仍在进行，经济上更是极端困难等情况，在京的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商量后，只“答应给越南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和一部分物资，没有满足越方提出的关于三个师的装备和 1000 万美元的要求。而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得到相关报告后，态度比国内中央甚至还更为积极。他表示，援助问题可以更慷慨一些，并支持派军事干部去协助指挥作战。他主张告诉越方：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南党逐渐熟悉掌握。[6]

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对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视，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表现。1950 年 1 月，越南党派黄文欢作为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中共中央予以了热情的欢迎。对靠近越南边界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中共中央也再三强调要设法协助越南党解决问题，“和他们的代表竭诚讨论，尽可能吸收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困难”。当毛泽东在得知胡志明将亲来北京之后，更他是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去车站迎接。”鉴于越南党事实上是赞同和坚持武装斗争的，他甚至还开始对越南党过去的做法开始表示某种理解，说“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7]

1950 年 1 月中旬，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即，胡志明秘密经过北京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会谈中，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8] 根据中苏两党的分工，中国方面很快组建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同时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边界运送越方所需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甚至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将越南人民军 308 师（缺一个团）和 209、174 团秘密接入中国境内的云南砚山和广西靖西专门准备好的基地内，由云南、广西两军区负责为它们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

1950 年 6 月，越南党中央在反复与中共中央代表罗贵波，并通过罗贵波与中共中央商量后，决定发起边界战役，以便打破法军对越北根据地的封锁，接通中越交通线。为此，中共中央不仅根据越南党的要求命令中国军事顾问团迅速赶往越北前线，组织成立支援委员会，负责粮食、弹药、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筹集和运送，在边界附近的中国境内设立收治越军伤员的野战医院，而且还加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协助进行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陈赓等人于 7 月上旬动身秘密前往越南，在就边界战役的设想和具体方案与毛泽东反复研商后，于 9 月 16 日，即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二天，协助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指挥越南人民军打响了这场战役。毛泽东这时一面高度关注朝鲜战争的形势，与斯大林磋商中国出兵援

朝的可能性，并极力说服党内高级干部做出兵朝鲜的准备，一面仍旧亲自参予指导越南边界战役，批阅前线发来的战报并作出具体指示，要求越南人民军抓住敌人后务求“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9]正是在中国方面的大力帮助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前夕，边界战役就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此役歼敌 8 个整营，毙俘敌约 8000 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 5 个市、13 个县镇，法军在中越边界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中越交通线被彻底打通，整个长达 750 公里的边界地区成了越南党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此后援越抗法斗争的进行，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中国政府尽管面临着恢复经济、朝鲜战争和政权巩固等一系列事关整个国家利益的复杂问题，理应缩短战线，减少外援，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更多考虑的显然是自身的国际主义义务，而非单纯的国家利益。他们这时不仅从并不宽裕的国内部队中抽调了大量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给越南人民军，帮助后者装备及训练步、炮、工兵等部队，同时还具体协助越南党中央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行动。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解放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还积极支持越南党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去，帮助解放老挝和柬埔寨的斗争。到 1953 年前后，抗法战争已经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并形成了以越南独立同盟为骨干的印度支那三国抵抗力量。[10]

走向日内瓦

新中国对援助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争取解放斗争的积极态度，与几乎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突出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勇于承担援助亚洲革命运动历史责任的决心。特别是 1950 年 10 月出兵朝鲜，两个月左右便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其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长驱数百里，帮助朝鲜劳动党重新夺回了已经丢掉的北朝鲜，并最终在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八线附近站稳了脚跟，这件事更是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帝国主义又多了几分蔑视。结果，在中、苏、朝三方当中，承担着最主要作战责任的中国一方，反而是最后一个赞同与美国停战妥协的。[11]

1953 年 3 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领导层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急剧转变，再加上北朝鲜也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中国政府虽然在战俘等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强烈不满，考虑到这种情况也采取了妥协的方针。7 月，朝鲜战争在经过长达两年左右打打谈谈的局面之后，终于实现了停战。朝鲜停战，特别是苏联高层态度的转变，预示着整个国际关系，特别是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随着这一事态而开始转向缓和。经历了持续近三年的战争和紧张之后，受到苏共中央支持和主导的这种缓和政策也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众多领导人的赞同。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明显地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让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共党内这时倡导和平外交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这时明确提出：尽管两大阵营的对立仍然是基本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会发生。“如果新的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当前，“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12]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与美国人交手，也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尽管战争的结果鼓舞人心，但党内许多领导人已经看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经验明显地不足以应付美国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事机器。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使新中国不仅要付出比美国大得多的牺牲，而且还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有效

地保持与美国在战场上作长时间军事较量的能力。这样一种事实也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1950 年，国家财政支出的 52％是军费，其中 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到 1952 年，虽然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军费开支仍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 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据说，为了这场将近三年的战争，中国耗费了约 100 亿美元。[13]尽管 1952 年周恩来率团访苏时已着重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及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具体的援建项目还难以完全落实。包括毛泽东 1950 年初在苏联访问时签订的三亿美元贷款，和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前的苏联援助，大部分都不能不被用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和部队的装备更新上。因此，随着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特别是这一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在朝鲜划界停战，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说也是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乐于看到的一种战略选择。

朝鲜停战了，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很快就开始成为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同朝鲜战争一样，印度支那战争事实上也已成为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一个战争热点。还在 1950 年，法国恢复在越南的统治就得到了美国某种程度上的公开支持。[14]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这一年的 5 月 11 日曾专门发表声明，扬言为阻遏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美国将向印度支那提供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此后，尽管朝鲜战争极大地牵制着美国的力量，但它仍旧一直在从外交上和物质上帮助法国进行战争。从 1951 年到 1954 年 7 月，美国政府仅计划中要提供给法国用于印度支那战场的援助数额，就高达 20 多亿美元之多。[15]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必然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印度支那，中国与美国在印度支那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对美国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危险性的估计，无疑是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政策考虑的主要出发点。在刚刚结束了朝鲜战争之后，再在印度支那同美、法等国展开一场新的军事较量，显然不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所期望的。当年出兵抗美援朝，就曾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即使是高度重视国际主义，力主出兵的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而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好不容易结束了朝鲜战争，如果再度直接在印度支那与美国发生战争，不仅朝鲜停战所形成的有利于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将不复存在，中国将重新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而且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条件也与在朝鲜作战的条件大相径庭。当年之所以必须出兵朝鲜，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因为中国的重工业都在东北三省，让美国骑到鸭绿江边来，东北地区将永无宁日。而之所以可以出兵朝鲜，也是因为朝鲜距离中国的工业基地和军事援助的提供国苏联近在咫尺，足以保证战争所需物资和装备的及时供应。在印度支那作战则不具备这样的前提。不仅外部的威胁没有那样严重，而且在整个南部交通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要想跨越整个中国，将战争所需的物资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到南疆，也过于困难。更何况印度支那的地形地貌也不适于大兵团作战。注意到这些因素，当苏联政府提出在印度支那也照朝鲜一样划界停战的设想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自然很快趋向于支持和平的选择了。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时候，恰好大多数的法国人也希望停战。连续六年多的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乃至法国青年的生命，却眼睁睁地看着越南独立同盟的力量日渐强大，

消灭胡志明政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再加上朝鲜又实现了停战，法国国内民众的厌战心理自然与日俱增。对此，越南党也相当了解。尽管他们与中国和苏联对和平条件的估计还不尽相同，但胡志明在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建议之后，也很快于 1953 年 11 月公开发表谈话做出了响应。[16]

在得到中、越两党的同意之后，1954 年 1 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美、英、法、苏四国召开的柏林外长会议上提出了缓和国际局势并讨论采取有关措施问题的提议，其中就包括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的问题。由于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响应，结果在 2 月 19 日外长会议结束的时候，四国外长一致声明同意两个月后召开日内瓦会议，专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在印度支那停战的问题。[17]得到这一消息后，周恩来明确认为：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不仅应该积极参与，而且还要争取在日内瓦解决一些问题。首先要争取南北以十六度线为界实现停战，通过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促使法军撤出，反对美国干涉，努力使胡志明政府成为全越南人民选举出来的唯一合法政府。即使在会议上达不成任何协议，也要使这种和平谈判不致完全中断，争取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以增加法国内部和困难和法美之间的矛盾。其次就是要争取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乘机加强自身的外交和国际活动，分化帝国主义阵营，破坏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在 3 月 2 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批准。[18]

印度支那这时的军事形势明显地对越、老、柬三方有利。还在 1953 年秋天，中共中央就根据它所获得的法国印支远征军总司令纳瓦尔的军事计划，向越方提出了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19]北部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及高棉[20]，威胁西贡的战略方针。中国军事顾问团并据此制定了以夺取整个西北地区为目标的冬季作战计划。纳瓦尔显然也意识到越南西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因而不惜孤注一掷突然派 6 个营空降到越南西北靠近老挝边境的战略要地奠边府，进而陆续增加兵力，开辟机场，构筑工事，囤积军事物资，构成坚固防御的集团据点群，同时增兵上寮，派 6 个营窜占孟溪、孟夸等地，建立起连结上寮和奠边府的南乌江防线。法军的这一行动正好为集中力量准备西北作战的越南人民军提供了一个歼敌的机会。中越双方迅速商定了奠边府战役计划，并毫不迟疑地将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的人民军榴弹、高炮部队，连同人民军原有炮兵、工兵部队，陆续调往奠边府周围。与此同时，人民军其他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分别大举南进。到 2 月中旬，人民军向上、中、下寮和西原北部的攻势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打通印度支那南北战略交通线的计划，并控制了越南通向老挝和柬埔寨的 6、7、8、9、12、19 号等六条东西向公路，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战略交通线大多都被切断。这样一来，其在奠边府投入的大量兵力，不可避免地成了瓮中之鳖。

积极的打是为了争取和。越是临近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日期，中共中央就越是主张要打得狠一些。“以打促和”的方针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提出来的。[21]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就专门打电报给这时在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要求顾问团和人民军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22]实施奠边府战役的问题于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奠边府战役对于越南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外交的主动权，迫使法国政府同意划界停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3 月 13 日，战役打响。中共中央军委密切关注，随时帮助人民军解决各种问题，包括调派工兵干部赶赴前线，帮助挖暗壕用炸药摧毁其据点，临时增援一个火箭炮团共 24 个炮营以及调集大批汽车帮助运送战役所需的大量弹药、器材和粮食等。毛泽东的

态度很明确：非打痛法国人不能解决问题。越南人民军不仅必须准备拿下奠边府，迅速占领老挝琅勃拉邦，而且要准备日内瓦会议万一没有结果，好夺取河内，进攻西贡，解放整个印度支那。[23]

在4月19日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当天，他就特地接见了一直在中美英之间传递讯息的印度大使，要他“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末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末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中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24]注意到美国的危险作用，毛泽东这时也很快开始告诫军委领导人：估计越南有停战可能。包括在奠边府战役大胜法军，进攻老挝和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之后，他也仍旧要求前方控制作战规模，不要扩大，只保持适当的压力，以争取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25]中共中央的这一策略，达到了牵制美国，中立法国，促成妥协的目的。

促成印支停战

中、越、苏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商讨日内瓦会议谈判方针时，奠边府战役刚刚开始不久，战争形势虽然明显地对越南党有利，但在中苏两党的多数领导人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越南人有可能把法国人很快赶出印度支那。这不仅因为法军仍旧占据着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控制着越南半数人口，尤其是因为美国人正跃跃欲试地想要进行干涉。在刚刚结束了朝鲜战争之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明显地不愿意在印度支那重现朝鲜战争那一幕。因此，当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基本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很快就致电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建议越南党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并拟定谈判的各种方案。正是周恩来再三主张，应当准备像朝鲜那样划定一条停火线，使自己能够保有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进而实行普选，完成统一。[26]对此，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三度开会研究，然而他们的看法与中共中央的看法多少存在着一些差异。因为越南独立同盟这时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取得了不少根据地，敌人虽然仍旧占据着各大中城市、港口、主要交通线和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区域，但它已经可以在越南将近四分之三的地区行使政权了。如果划界停战，它将会被迫放弃南部，甚至是中部地区的许多根据地，大批人民军和党的干部都将北撤，这对于党内那些来自要撤退地区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此，尽管中、越、苏三党会议确定了谈判方针，越南党中央决定派范文同副总理代理外交部长出席日内瓦会议，原则上也同意接受东西划线南北分界实现停战的建议，但其中央内部的意见实际上并未完全统一。

5月7日，越南人民军利用强大的炮火和坑道炸药，彻底摧毁了法军防守奠边府的核心阵地，迫使法军投降，从而取得了奠边府大捷。此役歼灭法军一万六千人，俘虏一万人，生擒了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奠边府大捷之后，本来就对划界停战主张持怀疑态度的越南谈判代表范文同，相信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认为原来东西划线南北分界的方案应当改变，不如要求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以便一举统一越南。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根据越方介绍的情况商定的坚持越、老、柬三位一体一并解决，以便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在谈判中也成为难以克服的和平障碍。范文同坚持印度支那三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有一个完整的解决办法。[27]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法、英两国代表以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进行外交接触的结果，却发现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联邦中的三国，在历史上就曾经是不同的国家。战后三国事实上都已各自独立，老挝

王国和柬埔寨王国已得到了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政府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否认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只承认由越南支持的寮国与高棉的抗战政府，不接受法、英提出的印支三国问题必须分开解决的提议，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就连范文同自己也清楚三国情况差别很大，越南可以划界，柬埔寨完全没有划界的可能，在老挝要求划界也缺少足够的资本。特别是在柬埔寨和老挝，抵抗力量的主力都是越南人民军。[28]但若承认分开解决，越南人民军也就成了外国军队，必须撤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南越暂时要被放弃，老、柬两国也势必会落入王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与越南党以及寮国、高棉抵抗力量原先的设想实在相差太远。

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日内瓦会议期间各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注意到越南党的方案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美国代表力图利用这种争执而使会议无法达成和平结果，周恩来在与苏、越两国代表团协商后，于 5 月 27 日明确提出停火问题可以根据三国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此一建议推动会议于 29 日达成了三国完全同时停火协议，这是自谈判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协议。30 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强调了做出这一让步的必要性。他在电报中说："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这种界限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三国人民当中也是如此看待的。""柬埔寨、老挝两个王国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看来仍然是合法的政府，并且是被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承认的政府。"因此，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他提请中共中央对这一点加以认真考虑，如同意即请电商越南劳动党中央。[29]

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取得了越南党中央的认可。在这个时候，法国以往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倒台，日内瓦谈判明显地受到影响。由于受到美国代表的鼓动，西方国家于 6 月 15 日中断了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而在老、柬问题的谈判中由于中、苏、越三方坚持不承认越盟的军队进入了这两个国家，谈判也陷于僵持状态，第二天也面临着西方国家终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严峻局面。据此，中、苏、越三方代表于 15 日晚进行了紧急的内部磋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是我方是否承认越军在高棉和寮国。如我坚决不承认，则高、寮问题无法谈下去，越南问题也将受牵连而谈不下去。所以应当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高、寮作战，但有的已经撤出，如果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与此同时，越、老、柬三国问题应分别解决，应当考虑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力量过于薄弱，靠越南的力量在这两个国家打下去只能使现在的王国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甚至促使美英搞东南亚条约，把美英等搞到一块去，不如使它们成为东南亚型的中立国家。[30]次日，根据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周恩来通过会见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在限制性会议上发言，明白表示愿意就此作出让步。此举挫败了美国代表准备中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企图，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出现了转机。[31]

印支三国分开处理的问题解决后，如何实现停战的问题就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统一思想与谈判方针，中、苏、越三方代表于 6 月 17 日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越南劳动党中央 13 日来电提出的划区方案。但范文同对周恩来所提以越南为争取重点，而在高棉、寮国酌情让步，高棉不划区，寮国只划边区的建议难以认同。周恩来随后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解释说，他的建议是基于三国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越南各方面的力量较强，不但可以保得住，而且能够逐渐巩固和扩大影响。"如果我们在高棉和寮国问题上作出让步，则越南就可以多要一些，求得补偿。问题是范文同甚至越南党中央对形势的估计都过于乐观，要价过高。特别是法国孟戴斯－弗朗斯内阁上台，于 6 月 17 日公开许诺以一月为期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否则自动辞职，这更是使越南党感到有坚持到底迫使法国政府让步的可能。在他们看来，着

急的应该是法国人，而不应当是他们。据此，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越两党领导人举行会谈，以便将关键性问题向越南党领导人说清楚，取得一致。[32]对此，中共中央迅速表示同意，并给予了进一步的指示。

7 月 2 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赶往广西柳州参加预定的中越两党会谈。会谈 3 日开始 5 日结束，3 天里共开了 8 次会议。根据武元甲的报告，奠边府战役以后，形势对越南极为有利。敌军虽仍有 47 万人之多，但包括法军在内的远征军仅 19 万，24 万是越南伪军，老挝军仅 2 万人左右，高棉军仅 15000 人左右。印度支那抗法力量已达到 30 多万人。敌军力量主要在越南，有 40 万左右，越北有 18 万，五联区有 8 万人，南部 12 万均系伪军，而越南人民军则为 28 万人，主要集中在五联区和中北部，实际力量对比强于敌人。

在听取了武元甲的报告后，周恩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的情况打下去，我们多久才能取得整个印度支那？"武元甲表示，打得好，两三年就可以拿下。胡志明则表示"时间至少是三五年。"他承认：三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越南的基础比较好，老挝和柬埔寨的基础较差，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干部实际是越南人。另外，即使在越南，也是越北的情况较好，中越次之，而南越的力量较差。同时，武元甲以及中国顾问韦国清、罗贵波等也都强调交通是大问题，如果要大打的话，还要首先花时间把公路修起来，否则很难。

据此，周恩来进一步增强了要说服越南党的信心。他指出：应当看到，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是印支三国与法国之间的问题了，它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这种国际化甚至超过了朝鲜问题国际化的范围和程度。印度支那不仅影响着整个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而且对澳洲、新西兰等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也有影响，因此毛主席说："稍一不慎，则影响 10 个国家近六亿人口。"并且，印支问题直接影响着法国，因而也就间接影响了欧洲的形势。日内瓦会议导致法国改组内阁，好战的拉尼埃政府下台，主和的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上台，说明同法国和下来，不仅能够挫败美国的阴谋，而且有可能团结更多的国家。

他同时解释说，大家都清楚，即使美国不干涉，解放全越南至少也需要三年时间。何况美国在干涉方面已经动员了半年。现在吴庭艳上了台，更值得注意。因为其言论表现完全亲美，实际是美国在指挥一切，因此美国帮助南越伪政权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们所提方案要求过高，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势必会干涉。朝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增援，其增援速度之迅速，出乎意外。中国加上去，也只能打个平手，不能取胜。现在印度支那又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旦美国卷进来，我们靠军事手段拿不到越南，条件只会更困难，甚至连现有的局面都可能保不住。考虑到这些情况，恐怕还是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全越南好些。因为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国家看来也不反对将来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来统一越南。所以，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可能性比朝鲜还要多些。况且战争还会促使老挝和柬埔寨倒向美国，使法国强硬派重新上台，并把英美推到一起去，搞东南亚条约组织。

周恩来的发言从 3 日下午、晚上，一直继续到 4 日下午。4 日下午周发言结束后，胡志明当场表了态。他说：现在越南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可能和，也可能战，主要方面是争取和，准备战。我们要帮助孟戴斯－弗朗斯，使他不下台，这对我们有利。在 11 月份以前，必须和法国搞好关系，取得和平，因为 11 月以前美国要选举，对干涉有顾虑。

胡志明的话等于做了结论，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当晚，中越双方有关人员连夜准备文件，

第二天大家逐条讨论修改，很快通过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方案和谈判问题》的会议文件。次日，越南党中央即将会议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划区方案通知了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通知说明，目前谈判的指导思想是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宜消极等待。具体方案是：在越南仍争取以十六度线停战，考虑到 16 度线以北的九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可能不会让步，故可在十六度线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在老挝则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抵抗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则只能争取政治解决。

但是，范文同对有无必要做如此让步仍表示怀疑，没有采取措施去推动谈判。眼看距离孟戴斯－弗朗斯承诺实现和平的最后期限只剩几天时间，周恩来 12 日一回到日内瓦，当晚就同范文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以朝鲜战争忽略了美国干涉危险的教训和抗战后中共以退为进取得成功的经验为例子，反复劝说，最终使范文同改变了态度。第二天，周恩来和范文同分别向法国代表提出了以北纬十六度线作为临时分界线的新方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随后又各做让步，法国放弃了以十八度线划界的要求，越南放弃了以十六度线划界的要求，商定以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十二又二分之一英里处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最终的妥协。

7 月 21 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的和平协议正式签字。这几项协议除了规定了分界线以外，还就国际监督、法军南撤和越南人民军北撤、两年后在全越南范围内举行普选、老挝抵抗部队可在桑怒、丰沙里两省集结、柬埔寨抵抗部队复员遣散，以及老、柬一年后实行大选等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规定。[33]新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至此算是按照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成功。

可以探讨的问题

从积极援助印度支那武装抗法，到全力促成日内瓦的和平协议，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政策变动的意义如何，从日内瓦会议期间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估计当时的战争形势，即如果越南抵抗力量坚持打下去，美国是否一定会像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估计的那样进行武装干涉？几十年过去之后， 研究美国已经公开的各种档案资料，考察美国后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历史，似乎还是不能完全否认当时存在着这种可能。换言之，拒绝和平与妥协，仍旧带有某种冒险性。即使越南党不需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实现统一，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危险仍旧是多方面的。正如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这种军事进攻很可能会使老挝、柬埔寨投向美国，会使整个东南亚转向反共，会使本来与美国存在矛盾的法国和英国在亚洲问题上被迫赞同美国的主张，会使美国阻挠和平的阴谋得逞，如此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的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或者是一个主战的法国政府和南越政权，或者是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最终还是会借机进行军事干涉。一旦出现这种结果，越盟所要面对的敌人多半就更多了。

关于美国干涉可能以及越南党能否迅速实现统一的争论，很容易让人想起朝鲜战争。周恩来之所以特别以朝鲜战争为例强调对美国干涉要有足够的估计，正是因为当年也曾经出现过几乎同样的情况。由于最初对战争的进展过于乐观，没有预料到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进行干涉，结果导致了军事上的严重后果。即使后来中国出兵保住了北朝鲜，也只能和美国打一个平手。何况朝鲜还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越南党这时严格说来还不如当年的朝鲜党有把握。朝鲜战争当时是以周计，这时越南党的军事统一时间表则须以年

计，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各种变数之多更是难以预测。[34]说美国一定不会干涉，无论如何都缺少足够的依据。

只要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可能，对于尚未得到国际承认的越南独立同盟来说，签订日内瓦和平协定就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经历了三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达成的这个协定，使越南党得以完全控制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 1200 万人口和土地，“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此也成了一个得到国际公认的名符其实的国家。美国不仅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对越盟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理由，而且即使在 60 年代中后期美国直接出兵南越，直至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野蛮的轰炸，它也不能不考虑到国际公认的这一事实，因而对其军事行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限制，即不让它的军队跨过十七度线。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存和巩固了越南党已有的胜利成果。固然，日内瓦协定并没有如周恩来等人所估计的那样促成越南的普选和统一，但美国特别是腐败的南越政权阻挠普选与统一，却为几年后共产党人重新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足以让世界上多数人同情的理由。而由于北方的巩固与建设，此后的印度支那战争无论如何艰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毕竟使它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前进基地和可靠后方。只要把一个分裂的朝鲜与一个最终取得统一的越南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坚持进攻未必就是有利的。暂时的妥协与和平，结果反而是便利了后来的进攻与统一。

当然，对于新中国而言，它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转变中仍旧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面尤其需要检讨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掺杂进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使其政策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目标，与现实政策作为一种追求实际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之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在政策考虑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因素，势必会造成政策功能的紊乱。如果说，一个强势政府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较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通常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感觉到其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层面上的话，那么一个弱国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并且难免还会引来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内政策所面对的只是在一个利益统一体内的不同利益关系，而对外政策所面对的却是利益完全不同的主权国家。前者只要政府处于强势状态，目标与手段的混淆可能极大地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它们对统一体本身的影响却是相对缓慢的，对不同利益关系的这种改变可能带来的道德问题也很容易淹没在强势文化的政治背景之中。后者却完全不同。由于事实上不存在利益统一体，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某种意识形态联系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必定会带来道德层面的问题，即当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时，为自身暂时利益的考虑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等提出划界停战的和平主张时，首先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道德困惑。在柳州会议上周恩来就特别着重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印度支那寻求和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否有矛盾？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优先的思维方式与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政策考虑之间发生了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解放印度支那，而寻求和平将使这场解放战争半途中停顿下来，并使这一国际任务大打折扣。十分明显，在印度支那改行和平政策直接影响到的首先是越南党的利益，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一方的中国党，无形中必须承担起此一政策是否与意识形态目标相违背的历史疑问。尽管周恩来再三说明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强调现实的力量对比，相信老、柬两国最好的前途是保持中立，在越南通过普选实现统一要比通过战争实现统一更现实，如此等等，但只要越南党原定的解放目标被打了折扣，只要事实证明越南的统一仍旧要靠战争来解决，中国党的这次政策转变就难

免会成为一个要被人提到道德层面上来加以讨论的问题。

其实，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 1945 年 8 月抗战结束之际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一事件。比较日内瓦会议对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斯大林当时可能更希望中国能够用老挝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基本看法也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和战后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共产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可以与国民党划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主没有出路，共产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上给予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严格地说，上述两件事是颇为类似的。把日内瓦期间周恩来的做法与斯大林当年的做法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共产党人通常很难把意识形态的目标与现实利益的政策考量严格地予以区别。

1954 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35]，是新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现实利益而开始走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在已经习惯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突然把自己一国的利益摆到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来，甚至以此为转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一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让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所倡导的这样一种政策转变的趋势并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几年之后，当毛泽东发现苏联“不革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考虑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究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多一点，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多一点，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受到毛泽东“反帝”“反修”思想影响的中国对外政策越来越表现出革命外交的倾向，是不容置疑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甚至明确赞同否定 1954 年周恩来在日内瓦所做过的和平努力，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当年也同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向兄弟党表示歉意。[36]

在中国，对外政策重新回到周恩来 1954 年所倡导的路线上来，即把外交政策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现实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过多地同意识形态的目标联系起来，是 70 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

[1] 这包括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和技术支援人员、提供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在自己境内为越南人民军装备和训练，以及由中央军委直接参与制定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等。

[2] 可以举出的相关出版物有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雷英夫：《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中共党史资料》第 69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3 月出版；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4 年版；曲星：《试论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Chen Jian. China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1954, China Quarterly no. 133, 1993;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 China Quarterly no. 129, 1992; and Zhai Qiang.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 Model: Chinese Militar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 1950-1954,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57, October 1993.

[3]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29 页。

[4]参见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49 年 8 月 14 日；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42，134－135 页。

[6] 同上引注，第 165，186－187 页。

[7] 《中央致中南局电》，1950 年 1 月 16 日；《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12 日；《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24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 年 1 月 31 日，同上引注 3，第 165，187－188，278，347 页。

[8] 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卷，第 343－348 页。

[9] 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 页。

[10] 《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 年 7 月 26 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 年 10 月 6 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 年 10 月 10 日；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2－74，96－97 页；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22，56，60，88－89 页；《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42 页。

[11]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酝酿过程及苏联、朝鲜和中国对和谈的态度变化，可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一书第 12 章。

[1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05 页。

[13] 参见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1 页；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

[14] 所谓某种程度，是指美国支持法国帮助越南保大政权抵抗共产主义，但不同意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体系。

[15] 据雷英夫在《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中共党史资料》第 69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3 月出版，第 57 页）一文中称，美国这段时间的援助数额达 26 亿美元。但据 8 月 2 日《纽约时报》披露的情况，这段时间美国向印度支那投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实际应为 12.35 亿美元，原先公布的估计数字中有近 10 亿美元在战争结束时尚未拨出。转见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1954 年》，云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1 页，注 5。

[16] 《胡志明选集》第 2 集，第 263 页。

[17] 前引《国际事务概览，1954 年》，第 23，178 页。

[1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5－356 页；参见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4 年版，7－11 页。

[19] 即老挝。

[20] 即柬埔寨。

[21] 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3－244 页。

[22]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 88－99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8 页。

[23] 《毛泽东致彭德怀信》，1954 年 4 月 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4－475 页。

[2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60－361 页。

[25] 《毛泽东致黄（克诚）、粟（裕）电》，1954 年 4 月 17 日；《中央致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电》，1954 年 6 月 20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480，509 页。

[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8 页。

[27] 转见郭明前引书，第 49 页。

[28] 老挝这时有政府军 2 万人，寮国抵抗力量只有 0.4 万人，另外 1.4 万人是越南人民军的部队；柬埔寨政府军有 1.5 万人，而高棉抵抗力量则只有 0.3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还是越南人民军的部队。

[29] 《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 年 5 月 30 日，参见《周恩来传》（三），第 1126－1127 页。

[30]参见曲星：《试论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57，264，266 页。

[31] 16 日下午的限制性会议就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了进一步谈判的协议。参见李连庆前引书，第 277－281 页；《周恩来传》（三），1128 页。

[32] 同上引注，并见《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1954 年 6 月 19 日。

[33] 《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60－269 页；《新华月报》

1954 年第 8 期。

[34] 有关朝鲜战争爆发前对美国干涉的估计问题，可见青石：《1950 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百年潮》1997 年第 1 期。

[35] 此一原则初见于周恩来与印度谈判代表团 1953 年 12 月 31 日的谈话，后公开正式表述于日内瓦会议过程中，即周恩来 6 月下旬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3 页。

[36] 参见《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 年 6 月 4 日。

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态度的变化

（1949－1973）

文所谈到的印度支那[1]战争（Indo-China War），主要是指在冷战期间，美国为阻止共产党势力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扩展，从帮助法国，到自己直接卷入越南[2]、老挝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冲突，而发生的一系列战争。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时断时续地发生于 50 年代、60 年代，直到 70 年代初。由于印度支那毗邻中国南疆，美国又长期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中国不能不把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和扩张视为对自己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各国共产党人，甚至积极争取东南亚各国民族主义政权，不可避免地成为它抗拒美国威胁的重要手段。但是，在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了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以意识形态为分野的冷战期间，中国对印支战争的态度，如同它的整个外交政策一样，不能不受到毛泽东日趋激进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不能不受到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中苏分歧的严重干扰。由于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安全的重视程度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各不相同，结果就导致了中国在对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时左时右，有时甚至前后矛盾。

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涉及到中国与这一时期越南战争(Vietnam War)的关系问题。有关中国与越南战争关系问题的研究，已有学者分阶段做过某些讨论。[3]但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 50 年代前半期和 60 年代后半期中国政策的层面，且主要着眼于阶段性事件，所依据的资料也较为有限，因而我们要想根据已有研究对毛泽东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的前后态度变化的情况勾勒出一条比较清晰的线索，仍旧相当困难。[4]事实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不清楚毛泽东对印支战争态度变化的经过及其原因，要厘清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以及印支战争问题上的政策变化经过及其背景，也势所不能。考虑到近年来中、越、俄颇多新资料相继披露[5]，本文拟据此对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变化经过做一概要的说明，藉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在印支战争问题上政策变动经过和原因的了解与研究。

从支持武力解放印度支那，到力主实现东南亚和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6]与此同时，作为革命的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又是阶级论者，从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他们从来都相信存在着一个“世界革命”，相信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取得巩固的胜利。因此，在他们看来，“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时（应当）援外”，这是共产党天经地义的国际主义原则。[7]

一方面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另一方面坚信国际主义原则，这就不可避免地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开始向那些正在革命中的亚洲各国共产党，表示积极的同情，甚至提供相应的帮助。尽管这种帮助本身也不排除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到了地缘政治安全的问题，但意识形态的考虑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在建国初年是十分明显的。他们甚至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8]正因为如此，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越共 1945 年 8 月利用日本战败的机会，在胡志明（Ho Chi Minh）的领导下，一举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并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临时政府。由于战后法国人卷土重来，力图恢复一度被日本夺去的殖民统治，而临时政府又建立在由中国国民党军队负责受降的越南北部地区，胡志明为保住已有的成果，曾公开宣告解散越共，并表示越南将永远保持中立地位。但此举并没有能够消除法国人的敌意，1946 年 12 月，战争仍旧爆发了。

胡志明的作法，明显地与战后毛泽东的作法不同，因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内部引起过批评。但随着越南抗法战争的爆发，毛泽东等人的态度明显地有所改变。1949 年 12 月，胡志明派人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 1000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中共中央虽然考虑到统一全国的战争尚未完成，连年战争使财力有限，未能全部满足越共的要求，但还是迅速指示前线部队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而这时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对胡志明坚持武装斗争并向中共求援这件事则更加重视。当他得知在京的中共中央没有全部满足越方要求时，特意电示中共中央转告胡志明的代表：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是先给一部，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共逐渐熟悉掌握。他同时叮嘱刘少奇等，对越务必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要批评，“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时再依实情酌量提出”。并认为“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9]

1950 年 1 月中旬，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胡志明随即秘密赶往北京，然后又乘苏联飞机飞往莫斯科，以便会见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胡志明在莫斯科与史达林（J. V. Stalin）、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而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支持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只是，根据 1949 年刘少奇访苏时中苏两党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中国党将负责解决越南党的各种需要和问题。[10]随后，中国方面很快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越方开始运送所需的各种

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并在中国境内为越南人民军 308 师（缺一个团）和 209、174 团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枪炮和弹药等，而且还具体协助越共中央组织了一系列的重要战役行动。毛泽东更是经常亲自审阅作战部署和具体指导作战计划。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甚至还明确提出了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即寮国，下同)和柬埔寨去，帮助老挝和柬埔寨解放的主张，顾问团还亲赴老挝协助指挥作战。[11]

越南抗法战争的进行，恰好与韩战同步。中美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现实，使众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是，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12]随着 1953 年 7 月朝鲜半岛实现停战，美国正在把更多地的注意力投向印支战争，苏联政府开始寻求国际缓和，周恩来等众多中共领导人也基于 1953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现实需要，力主创造国际和平环境，毛泽东思想中国际主义的使命感自然也受到影响，开始让位于对现实国家利益的关心了。

韩战刚刚停止，中国政府就与苏联相互配合，呼吁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了。实现印支和平从此开始成为苏、中、越三国共同的宣传口径。在苏联政府的倡导之下，1954 年 2 月 19 日美、英、法、苏四国柏林外长结束后的声明宣布两个月后将召开日内瓦（Geneva）会议，讨论朝鲜和平和印支停战问题。此一声明立即得到了中越两国的积极响应。当然，即使赞成谈判，毛泽东还是更相信军事胜利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法军还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特别是在法军以上万兵力突入越南西北战略要地奠边府（Dien Bien Phu），对越共在越北的中央根据地和接通老挝的通道形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要想通过一个日内瓦会议达到印支和平，他颇感怀疑。正因为如此，越是临近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日期，中共中央就越是主张要打得狠一些。“以打促和”，是这个时候中共中央解决印支问题的一项基本方针。[13]包括力主和平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刚刚确定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原则之后，也是立即打电报给这时在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急切地提出：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14]

由于上述情况，实施奠边府战役的问题迅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不过，毛泽东这时对日内瓦会谈的态度仍旧多少显得有些悲观。这也就是为什么，4 月初周恩来率团与胡志明等越南党领导人赶往莫斯科会商如何争取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毛泽东在国内却明确指示中国军事顾问团：越南人民军无论如何必须尽快拿下奠边府，然后直捣老挝琅勃拉邦，为进一步夺取河内，进攻西贡，统一全越南创造条件。很明显，毛泽东虽然赞同谈判，事实上却是在做两手准备。为此，他特别指示要为越南人民军再组建 4 个炮兵团和两个工兵团，教员和顾问要全部从入朝参战的中国炮兵部队中出，火炮不够就从中国炮兵部队中抽，装备和训练可以在越南北部进行，如果不方便就在中国广西进行。[15]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几天后发生了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得知美国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在印支战争中的介入情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3 月 29 日和 4 月 5 日为此发出公开威胁，扬言要像韩战那样再度实行联合武装干涉，以阻止“共产党俄国及其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另一方面也是 4 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越三党会谈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强调要尽一切可能争取谈判成功。注意到有可能再度卷入一场与美国直接对抗的危险的境外战争，注意到中、越、苏三方代表团在莫斯科已经就印支和平达

成了共识，毛泽东不能不迅速放弃了扩大战争的想法。他很快告诉军事领导人：估计越南有停战可能，前议方针停止实行，新建炮兵训练亦不宜在中国境内。此后，包括在奠边府战役大胜法军，进攻老挝和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之后，毛泽东也仍旧要求前方控制作战规模，不要扩大，只保持适当压力，以争取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16]这反映出毛泽东已赞同通过妥协的办法来争取在印支实现停战与和平了。

由于美国方面对在日内瓦讨论印度支那停战和平问题态度消极，甚至从中阻挠，要争取印支停战，对中国方面来说，首先是要设法使美国陷于孤立的状态。在这方面，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做了大量的工作，有效地争取到了包括英、法和老挝、柬埔寨王国代表在内的有关方面的同情与谅解。但与此同时，在日内瓦谈判期间，最让中国方面感到为难的还在于，越南方面的条件与实际可能达成的妥协相比显得过高。特别是在5月7日奠边府战役取得大胜，全歼法军 1.6 万人，俘虏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Colonel Christian Movie Ferdenar de La Croix de Castries）准将之后，越南代表似乎更赞同毛泽东先前的军事计划，主张或者法军完全撤出越、老、柬三国，或者干脆用军事手段花上三年左右时间以武力实现统一。与此同时，越方坚持印度支那越、老、柬三位一体，应一体解决，坚持在老、柬两国的越南人民军不属外国军队，不接受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要求法国和越南军队同时撤兵的要求。

在 4 月初莫斯科会商时，中国方面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情况很少了解，只是根据越南党的看法，相信印支三国同为法国殖民地，老挝人和柬埔寨人其实是越南的少数民族，故应一体解决。到日内瓦之后，通过各方交换意见，才发现按照越南党的要求坚持印度支那一体解决没有出路。因此，周恩来的态度很快发生发改变。他主张：越、老、柬三国问题应分别解决；越南问题，即使美国不干涉也要再打上几年。共产党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力量更弱，在这两个国家打下去只能使现在的两王国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甚至促使美英搞东南亚条约，把美英等搞到一块去。何况现实情况是美国很可能会干涉，美国干涉解决起来更加困难。故周认为打不如和。在越南，必须划界停战，然后“经过选举，达成统一”，以越南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经过普选实现和平统一的是完全可能的；在老挝和柬埔寨，应根据两国抵抗力量的实际情况酌情让步，实行就地停战或划区停战，抵抗组织应根据民主原则加入王国政府，争取两国保持中立。为说服越南代表，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频频通电，交换意见。毛泽东显然也认可了周恩来的观点，他同意：印支问题与朝鲜问题不同，它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缅甸、泰国，马来亚、印尼、巴基斯坦、印度等许多国家，对澳洲、纽西兰、锡兰、菲律宾也有影响。“稍一不慎，则影响 10 个国家近六亿人口。”因此“该让步的应让步，该坚持的应坚持，就可以达到孤立少数（美国），团结多数”，最终达成协议。[17]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明确支持，周恩来说服了胡志明和越南党中央，日内瓦协议最终得以签订。经历了三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而于 1954 年 7 月签订的这个协议，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得以完全控制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 1200 万人口。但越共中不少领导人对这个协议究竟对自己利大还是弊大，却始终意见分歧。因为，在越南，停战前越共实际影响下的人口就不少于这个数字。而在老挝和柬埔寨，无论法军，还是王国的军队，也都注定挡不住人民军的进攻。特别是从南方根据地退到北方的领导人，意见更大。因为退出南方，是否能够根据协议通过两年后的普选取得全越南，实在令人怀疑；而退出老、柬，则可以肯定是要把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交给地主资产阶级去支配。对此，毛泽东当然不会毫不知情。联系到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史达林 1945 年抗战胜利时“不许革命”，逼迫他去与蒋介石握手言和一事耿耿于怀，和几年后他曾反复就自己赞同在日内瓦妥协之事向越南党做自我批评的情况，可以想象，对于让正在军事进攻势头上的越南党做如此大的让步，多半也不是出于他的本心。

从主张和平共处，到主张冷战共处

受到过世界革命思想的熏陶，兼具诗人气质，豪气干云，自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自豪感的驱使下，自然不会把其人生的斗争目标仅仅局限在统一和巩固中国革命成果这一点上。继承马克思、列宁的事业，通过中国的榜样作用，引导世界被压迫阶级，至少是引导亚洲被压迫国家和民族进一步实现解放，无疑是他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赞成在印度支那向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妥协呢？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用列宁讲过的一段话来为自己辩解。说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被杀死，要嘛交出自己的金钱和汽车。他主张交出金钱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金钱、汽车都收回。[18]换句话来说，毛泽东认为，妥协是暂时的，在自己的政权还明显地不那么巩固，而越南一时也无力取得胜利的时候，这是不得已的一种策略。但由此可以了解到的是，对中国自身安全和建设需要的考虑确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毛泽东按其既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目标来行事。在一度把向苏联“一边倒”和反对帝国主义奉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特别是 1950－1953 年间经历了与美国的军事较量之后，毛泽东这时显然同意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想法，即增强国力的工作必须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19]而要想加速实现大规模发展重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强国力，确实应当求得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仅仅依靠苏联是不够的。从周边地区的安全角度考虑，中国必须争取更多的介乎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与支持，甚至有必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间开展外交工作。尽管，这是一种以国家间相互妥协为基本内容的，更适合于和平，而不适合于革命的国际沟通方式。但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方面谋求妥协的积极态度，和它这时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党，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动。

一个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明显的例子是，日内瓦会议后不久，美国就以防止“共产党侵略”的名义，组织了一个带有某种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该条约不顾日内瓦协议关于老、柬应保持中立地位的规定，公开把南越、老挝和柬埔寨列为该组织的“保护地区”。美国报纸甚至公开宣称，这个条约就是为了对付中国的。[20]可以想象，这一条约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越南党，对于正在致力于通过妥协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中国无疑也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但即便如此，毛泽东也没有改变争取和平的姿态。他甚至公开宣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反复讲：“没有战争就好”，“不打仗最好”，说打仗的结果其实主要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利，因为战争的结果必然引起革命，造成更多的苏联和中国。这些话出自于一向以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为号召的革命家毛泽东之口，听起来多少有些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解释说：我们正在加紧工业建设，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因此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21]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担心，他甚至一度公开保证过绝不支持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人进行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不独对老挝和柬埔寨是如此，就是对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等国也是如此。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专程前往缅甸访问，并与吴努(U Nu)总理联合发表声明，不仅提出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两国关系，而且公开承认：革命不能输出，各国人民有权

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别国不应干涉。做出这样的承诺，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在缅甸一直存在着共产党的和少数民族的反政府活动。再加上缅甸与中国接壤，一些反叛者长期以来一直利用中国领土作为其藏身之所。这时，在中国仍有数以百计的武装人员和缅甸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声明，无疑是要给缅甸政府一个定心丸。而几个月后吴努总理访问北京，又提出这个问题。对此，毛泽东更明白地告诉吴努说：五项原则中的一条就叫做互不干涉内政。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因此缅甸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承认吴努总理的政府。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我们也绝不会在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也不会从内部策动反政府。对华侨中的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政府的政党发生联系。华侨中的共产党支部已经解散。至于对缅甸共产党，我个人的建议，你们自己最好先与他们非正式地谈谈，试试看，不要把路堵死。谈得拢，最好，如果谈不拢，就暂时放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谈。他并且举出中国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办法，供吴努参考。说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有些事情，我们并不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妥协。[22]

缅甸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而泰国则是这时东南亚国家中仅有的几个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由于泰国在东南亚国家中是美国最主要的伙伴，而且也是东南亚条约组织中三个亚洲国家之一，毛泽东显然希望能够争取使泰国改变对华政策，至少能够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泰国对我们不很友好，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关系。他多次请缅甸等国领导人帮助向泰国领导人转达他的愿望，说明中国政府绝无干涉泰国内政的企图。在终于有泰国代表来华访问时，他特地接见了来人，并保证说：我们绝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做朋友，我们尤其愿同任何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做朋友。只要我们的朋友有一点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都支持。当然，你们站在我们这边有困难，因为美国这个朋友不大好惹，但走印度的道路，站在中间还是比较妥当的。[23]

马来亚共产党同样也受到毛这时和平政策的影响。马共对日抗战期间就曾组织过游击队，抗战结束后一度停止了武装斗争，却遭到当局的镇压，一些人被杀害。1948 年马共又重新开始组织武装反抗，到 1954 年已经组织起数百人的游击队，并派代表来中国寻求援助。基于日内瓦协议的精神，中苏两党于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对马共的发展道路在莫斯科进行了专门的磋商，最后就马共的武装斗争问题形成了一个联合意见书。意见书明确认为：马来亚与社会主义国家不接壤，搞武装斗争过于困难，建议马共改变策略，改取和平民主方式发展壮大。于是，马共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很快停止了游击战争，与马来亚政府举行了谈判，放弃了武装。[24]

除了上述努力之外，从 1954 年到 1957 年，中国政府还对争取亚非欧等许多中小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外交争取工作。包括积极参加亚非万隆会议，周恩来外长出访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国。很显然，这些都是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的。而 1955 年 8 月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的开始，事实上也得益于毛泽东这时对缓和中美关系方

面所表现的热心。[25]

但是，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既不是其意识形态的逻辑使然，也不是其深为骄傲的经验使然，它更多地其实是基于现实政策需要的一种外交策略。事实上，稍微细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发觉，即使在他突出强调妥协与和平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改变他对革命和战争的原则看法。几乎就在日内瓦会议进行的同时，英共总书记波立特( )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段话删去。说是这会给英国党带来许多麻烦，而且也不符合英共目前的纲领。英共 1951 年通过的这个纲领已经明确宣布：苏联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对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复信拟表示同意，毛泽东得知后当即予以批评。随后，在与外国共产党人的谈话当中，他又多次提到这件事，并且特别强调说，这一论断不仅对中国是如此，对外国也是如此；不仅过去是对的，就是现在也还是对的。[26]注意到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这种经验式的近乎神圣的强烈信念，不难想见他对东南亚地区妥协与和平的看法和政策，一旦遇到某种适合的时机和条件，难免会发生摇摆。

导致毛泽东重新开始重视革命与战争问题的导火索，多半是苏共二十大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对史达林的全盘否定，和他关于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得知赫鲁雪夫报告几天之后，毛泽东就明确表示过对赫鲁雪夫这一作法和说法的某种程度的怀疑。[27]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以及 1957 年中国的反右运动，进一步绷紧了他思想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根弦。在 1957 年 11 月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泽东与赫鲁雪夫之间围绕着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已经开始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虽然最后在会议文件上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毛泽东对革命与战争问题的看法无疑进一步得到了加强。随之而来的 1958 年和 1959 年，毛泽东借中东危机的机会炮击金门、马祖，因西藏叛乱而与中立的印度发生边界磨擦，都与赫鲁雪夫这时起劲儿鼓吹的美苏缓和形成鲜明对照。1959 年 10 月，两党领导人更围绕着紧张与缓和等问题发生激烈的争吵。受到中苏分歧的这种刺激，毛泽东很快又开始转向积极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性，重视反帝，强调革命与战争了。

1958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已经在公开讲：是紧张好，还是缓和好？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我看不尽然。紧张局势固然有有害的一面，但它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你看金门、马祖这样几炮，现在这个世界闹得满城风雨，烟雾冲天。还不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因此，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毛泽东同时讲了一堆国际现象，突出强调的就是“不要怕”，说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28]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基于前此和平共处政策的一种延续和对现实国家安全的考量，毛泽东对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问题，也还相对比较谨慎，还经常叮嘱外国党，不要给人家留下印象，好像中国正在支持东南亚反政府的武装斗争。关于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对老挝人民党领导人的谈话当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老挝人民党在日内瓦会议后改名爱国阵线，经过一段反复后，于 1957 年 11 月交还了独立控制的两个省，将部队编入了王国军队，自己也公开参加了政府。但是，随着 1959 年 2 月美国宣布有权在老挝建立军事顾问团，老挝的右翼势力迅速强硬起来。人民党的部分领导人遭到软禁或逮捕，其他领导人被迫避往山地或北越，原已确定编入王国军队的两个营的人民党军队，一个被缴械，另一个也被迫跑到北越去了。对此，中国和北越政府公开谴责了老挝王国政府的作法。毛泽东在接见秘密来华的人民党领导人时，明确地表示支持人民党重新开始武装斗争，说你们的斗争方针定得好，要持久。但与此同时，毛还是建议老挝党在现阶段队

伍不要太大，小一点好；活动不要太猛，避免引起敌人过分注意。他说：因为现在美国造谣说中国和越南帮助你们打，联合国派调查小组到老挝找证据，要证明你们得到外援，一定不要让西方搞到这方面的证据。[29]同样的情况，当 1958 年越南重新在南方，进而在老挝推动武装斗争以后，中共中央最初的态度也还是强调：南方“目前不可能实现革命变革，而只能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联系群众，等待时机的方针”。等到形势变化了，“越南南方便可通过这样那样的形式取得解放”。[30]

中国与苏联之间的意见分歧，在 50 年代末已经发展到方方面面。尽管这时的许多分歧都同历史上的恩怨、民族情感和利益的冲突相联系，但归根结底，毛泽东对苏联最不满的，就是它不革命了。而革命，不论是阶级革命，还是反帝革命，恰恰是毛泽东经验之所在，也是中国革命胜利所依据的列宁主义理论之精髓。否定革命，特别是否定暴力革命，无异于否定中国革命道路在落后国家的普遍适用性，无异于否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特创造”。正因为如此，1958 年，毛泽东就下令在党的高级干部当中印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达林论不断革命的语录，其寓意就是要党的各级领导人认清中苏分歧的实质。1959 年，他更是多次讲：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我们之所以也讲和平手段，仅仅是因为广大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利用这一点恐吓群众，我们为了接近群众，所以提和平手段。但是，所谓国家就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不经过战争如何能够打碎剥削阶级的暴力机关？在 1957 年 11 月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还明确肯定过“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提法。说：“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31]到 1960 年以后，毛泽东干脆连他不久前还在积极倡导的“和平共处”原则也否定了。他说：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这是毫无道理的。冷战共处，这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32]

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分歧从一开始就导致了中共领导人对越南党的某种批评。1960 年在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当中，周恩来就明确地讲道：“越南在反帝方面是坚决明确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不很明确。”这个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而周所提到的“其他一些问题”，既包括越南对苏联的态度，也包括它自身所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越南愿不愿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彻底革命的问题。还在几年之前，毛泽东就发现越南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态度暧昧，不愿意照中共的经验搞彻底的土地改革。中苏围绕革命与战争的分歧发生后，越南党也总是力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两边劝和，缺少是非感。为此，毛泽东当面就告诫过胡志明：你们能够坚持反帝是好的，但反美反帝反各国反动派，要有理论、政策、策略。一定要辨明谁是敌人，谁是最反动的。就是对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印尼的反动派，也要认清，分别对待，不这样是不行的。可是胡志明的思维方式明显地更接近于西方，而与毛泽东有距离。关于这一点，1960 年 11 月双方的一段对话表现得相当典型。当时，双方谈到老挝和南越武装斗争的进展情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强调越南党在老挝和南越武装斗争搞得好，对整个东南亚各国的革命都会起到推动作用。由此，毛泽东开始感叹反动派滥施暴力的好处，说他们杀人是好事，蒋介石对革命做的最大的好事就是杀人。胡志明当场表示异议，说：说杀人好，这不人道。毛泽东当即反驳说：他杀来，我杀去，没有人道可言。刘少奇更是补充说：对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没有人道可言。而且，人道主义不讲

阶级性，也违反马列主义。讲人道主义，说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有理智，以为这样可以保卫和平，行吗？要知道艾森豪威尔的理智同我们的不一样。[33]不过，围绕着老挝和南越的斗争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在60年代初的中共领导人内部多少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在1961年11月毛泽东等人接见胡志明的谈话当中，我们就可以多少感觉到这种情况。对于老挝和南越，中国领导人的意见都很一致，就是一定要打。问题是怎么打，以及要不要搞联合政府？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很明确：游击战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国不会出兵。大打，占西贡、堤岸等大城市，把吴廷琰（Ngo Dinh Diem）政府完全推翻，美国就有可能出兵。周恩来则说：小打（如目前打游击战）、中打（即在国内大打）、大打（美国出兵），应考虑中打。而毛的说法是：不要怕，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也是暂时的，最后也还是要打。鉴于这时中、苏、美、英、法、越、老等十四国正在日内瓦就和平解决老挝问题进行谈判，胡志明特别问道：如果要在老挝继续打，越南的部队还得参加，这样战争会不会扩大？毛的答复很痛快：继续装做越南并没有派兵到老挝，还可以这样做。[34]

1961年到1962年前半年，大概是中共党内思想比较活跃和民主的一段时间。对中苏分歧以来毛泽东日趋激烈的外交言辞和作法，终于引发了一场党内分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人1962年上半年通过写信给周恩来等人和主持起草有关中国对外政策建议的文件，清楚地表达了他们对毛泽东激进态度的担忧。他们主张，应当继续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不能笼统地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在对外关系方面有必要采取缓和的而非紧张的政策。比如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要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在对苏斗争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要考虑从政治、外交、舆论等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打开僵局。[35]

到1960年为止，中国对外援助的总金额已达到67.5071亿美元。其中根据协定提供的无偿援助共十七笔25.1503亿元；根据协定提供的贷款共二十一笔32.5814亿元；对外赠送的共十五笔0.8056亿元。这里面对越南的援助最多，约占对外援助总金额的将近三分之一，为197600万元；对柬埔寨的援助次之，为13391万元；直接对老挝的援助较少，为67万元。但总起来看，从1950至1960年，平均每年援外支出仅约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18％，所占比例还不是很大。[36]而随着1960年底毛泽东与胡志明商定由中国通过北越向老挝和南越提供粮食与武器，1961年美国在南越实施“特种战争”，印支战争的难度加剧，中共中央一次就决定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武器[37]，对外援助的规模明显地趋向于进一步扩大。考虑到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大跃进运动所带来的严重灾难，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王稼祥等人明确提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对外援助应谨慎从事，似乎不宜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对将来我可能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38]正是受到党内这样一种心态的影响，这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39]

然而，王稼祥等人的意见，很快就受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党内刚刚出现的赞同缓和的空气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更是开始大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复辟问题，并且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问题引入到国内的各种问题上来。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大谈阶级斗争，不仅讲国内阶级斗争，而且讲国际阶级斗争，宣称只要有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

义和修正主义存在，阶级斗争的任务就没有解决，我们就必须高举反帝旗帜，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等国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主张激进革命和批判国内外修正主义的调子迅速升温。连周恩来都宣称：“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进到一个新阶段了”,“现在阶段斗争在我们兄弟国家的关系上,起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40]

既然相信自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苏两党分歧自然也就迅速进入到公开摊牌的阶段了。而面对这种严重趋势，极需借助中苏两国力量来实现自己统一目标的越南党，再度表现出困惑和不解。而这不能不再度引起中共中央的不满。特别是由于苏共暗中鼓动欧洲国家共产党写信写文章公开批评中国党，毛泽东等人已经把中苏分歧看成是关系到还要不要搞世界革命，要不要继续革命，人类到底是解放还是永世让资产阶级压迫下去的根本原则问题；强调它是决定整个世界革命前途、人类前途和中国前途的命运问题；断定两党不仅在原则观点上已经对立，就是在政治上组织上也将迅速走向破裂。[41]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尤其希望受到自己极大援助并且站在反帝第一线的越南党能够站在自己一边。越南党的暧昧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批评。刘少奇在 1963 年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为此甚至点名批评了越南党。说：自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赫鲁雪夫公开指名反阿尔巴尼亚，反史达林，实际是反华，并且提出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搞阶级斗争熄灭论，结果是左派各党进一步坚定起来。表现最好的是朝鲜，其次是印尼、新西兰、古巴、委内瑞拉、马来亚、缅甸、泰国、日本等国家的共产党。胡志明动动摇摇。这位同志是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最终他也不做劳动党主席，当党外人士，要当超阶级的超党派的全民领袖。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史达林一说，史达林把他臭骂了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以后战争停止了，究竟是搞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搞无产阶级共和国，他也不定。我们提出来以后，他才下决心搞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次中苏两党争论，越南是既转播我们的，也转播苏联的。当有 6 万多封信要求读我们的文章时，他就把转播停止了。[42]

对越南党不满的程度，通过毛泽东批准 1963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报》不加评论地发表越南党针对中苏争论主张不偏不倚的几个文件，已经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中共中央随后迅速下发了党内通知，提醒各地还不要将越南党与修正主义同等对待，但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党紧接着发表的公开呼吁加强团结的联合声明还是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在准备发表公开中苏分歧的重要文件《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他对特意请来对文件提意见的朝鲜党领导人金日成(Kim Il Sung)讲：越南、捷克斯洛伐克那个联合声明是冲着我们来的。越南党说我们反对赫鲁雪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有理无情，应该多加糖少加辣椒，而我们恰恰认为过去糖加得太多了，现在应当多加些辣椒了，我们不想总是当软体动物。[43]很明显，随着毛泽东越来越强硬地把中苏分歧归结为革命与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他也就越来越难以容忍越南党在中苏之间保持调和态度。

从反对越美和谈，到转向联美抑苏

越南党不愿意看到中苏关系破裂，除了党的部分领导人长期接受法国教育，受欧洲思想影响较多，在一些问题上容易接受苏联党的观点以外，很大程度上还是从越南争取统一斗争的自身利益需要出发的。特别是受到 1962 年东西德关系紧张和古巴导弹危机的鼓舞，越南党多数领导人相信苏联正在回到公开对抗美国的道路上来。他们生怕中苏关系破裂会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对其抗美斗争的支持。毕竟，苏联是共产主义世界中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苏联周围还有众多国家和兄弟党，得罪苏联，只靠中国，越南与美国的对抗将会处于相当不利的境地。让胡志明等人深感失望的是，赫鲁雪夫对越南并不领情。原本，基于国际缓和的方针，苏联在援助越南问题上就不是十分积极。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雪夫更是很快向美国做出妥协，不仅拒绝公开支持南越和老挝的武装斗争，而且严格限制对越南的军事援助。这种情况使得越南党内对苏联的不满日渐高涨起来。结果，就在毛泽东对金日成尖锐批评越南党之后不过两周时间，越南党就开始向中国党靠拢了。

1963 年 6 月，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Le Duan）等率党政代表团前来中国，明确表示赞同中国党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并且对苏联压制南越和老挝武装斗争的种种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此，毛泽东十分满意。他当场许诺说：如果苏联给越南找麻烦，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担子很重，又要建设北越，又要支援南越和老挝的斗争，我们没有理由不多替你们分担一些。南越的斗争，老挝的斗争，我们支援的不过是一些武器，你们是牺牲生命。你们是在第一线的。因此，实际上首先是你们支援我们，其次才是我们支援你们。[44]

这个时候，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中国已经开始设立专门的学校和基地，对准备开展武装斗争的亚、非、拉美各洲的共产党人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毛泽东开始频繁接见前来学习的各国党的年轻学员，鼓励他们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并且向他们传授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经验，甚至为他们提供部分经费和武器。毛泽东显然特别重视东南亚各国党的武装斗争。包括对有着上百万党员，在国内民主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他也再三提醒他们要做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党，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甚至开始相信，自己 50 年代中后期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实际上是犯了错误。他这时不止一次地向越南党的领导人表示说：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犯过错误，日内瓦会议时我们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的武装一撤走，吴廷琰就开始杀人。后来改变了一下，但还是说要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只小打不大打。这都是错误的，是美帝和吴廷琰教育了我们。现在看来，日内瓦协议是一个失败，你们和我们都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使南越人民付出了 16 万人的生命代价。[45]

1963－1964 年间，美国通过逐步升级的办法扩大对越南的军事卷入和军事干涉，越南党及其在它秘密支持下的南越游击战争经受着越来越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而苏联对援越又态度消极，这促使越南党不能不更加依靠中国。同样，毛泽东也开始设想要用一种更紧密的方式把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联合起来，以便推进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革命。在此期间召开的中、越、老三党会议，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而这段时间里，这几个国家的党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态度也与中国比较一致。1964 年 2 月黎笋率团前往苏联访问，路经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曾当面问他：你们估计，这次赴苏会谈能谈得好吗？黎回答说：这次去肯定不会有什么成果的。越苏关系，今后恐怕不会有很大变化，也可能变得好一些，但也可能变得差一些。我们希望维持现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我看差一些好。苏联专家不撤，我们自己的自力更生也搞不起来。还是自己搞靠得住。黎说：我们中央全会一致认为，如果不是中国党顶住，那么修正主义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更大的损失。我们的党员和群众都认识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鼓励黎说：阿尔巴尼亚只有一百多万人口，他们顶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和南斯拉夫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从人口来说，你们比阿尔巴尼亚大十倍，还顶不住？我同朝鲜、日本、印尼同志都讲过，要独立思考，不要一股风来了，就随风倒。[46]后来，黎笋的苏联之行也确实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不仅如此，由于黎笋在会谈中对苏联过分强调与美国和平共

处、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不力，以及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等明确表示了不满，还引起了双方的争执。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都公开站在中国党一边，赞成革命，毛泽东的战斗精神也进一步受到鼓舞。还在 1963 年，中越双方就已经在研究一旦美国进攻北越，中越两军协同作战问题。毛泽东在 1964 年更多次向越南客人表示说："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你们不消灭法军的主力，法国人怎么会轻易放弃北越？恐怕应当多派些部队过到南边去。最好也要派几千人到老挝去，这个国家 200 多万人口，打了几年，打不出什么名堂。应当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不然战争永远不能结束。他许诺说：用不着怕美国干涉，无非就是再来一次朝鲜战争（即韩战）。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开过去。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美国人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加入到反对共同敌人的战斗当中去。[47]正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越双方于 12 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即为中国将派遣 30 万军队（5 个步兵师和 5 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48]中国军队由此开始直接出兵援助越南党的抗美战争。

1964 年 8 月初，北越海军鱼雷艇与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有争议的东京湾海域发生交火，使备受南越游击战困扰的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个进一步使战争行动升级的适当借口，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中苏两国对东京湾事件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苏联方面极力保持低调[49]，中国各地则公开举行群众抗议集会，先后有 2000 万人参加示威活动。毛泽东对刚好在中国访问的黎笋说：我们赞同你们中央不去主动惹美国的决定。但是，我们也要准备美国军队在北越登陆。为此，我们要在南线部署 30－50 万的兵力。同时我们要在云南蒙自地区修建一两个大机场，准备万一越南被攻，援越飞机无法降落。这次已经有一个空军团、36 架飞机装备训练结束回到越南去了，我们还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黎笋提出，一旦打起来，有必要考虑在整个东南亚发动革命。东南亚如果发生战争，会起很大变化。这个地区共产党都有基础，搞革命一定胜利。毛泽东则估计：如果爆发革命，南越和老挝应当可以基本解决。问题是泰国和缅甸，如果没有整个形势的变动，恐怕会很难。因为东南亚各国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他特别关心泰国有没有革命形势？他相信，在东南亚泰国是一个关键。如果得不到泰国帮助，美国要打仗也不好办。美国不仅要用泰国的基地，还要利用泰国陆军打仗。因此，他强调要设法帮助泰国搞一些武装力量，能够在五年、十年内把泰国革命搞起来就好了。[50]

让毛泽东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两个月之后，赫鲁晓夫突然下台了。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苏共领导人对印度支那战争，特别是对美国轰炸北越，完全变了一种态度。1964 年 11 月，苏共中央公开声明将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1965 年 2 月，苏联总理柯西金亲自访问越南，保证向越南无偿提供其所需的大炮、坦克和地对空导弹。随后，苏联大使馆口头通知中国方面，要求通过中国境内向越南输送兵员和武器。中苏两国政府因此于 3 月 30 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各种苏制武器从此开始成批运往越南，其中包括大批越南急需的用于防空的高射武器和战斗机。[51]

苏联向越南大批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要走陆路经过中国，使中国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52]让苏联装备和人员过境，在两国关系已经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安全首先就要受到

严重挑战。并且，让苏联放手援越，其武器装备的先进和数量的巨大，中国可能会望尘莫及，结果越南必然亲苏。反对苏联援助，不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而且阻挠苏联武器和人员过境，它走海路绕道冒险一样可以送到，结果越南更要倒向苏联一边，且同中国感情交恶。从情理上考量，当 1965 年 2 月柯西金（A.N. Kosykin）访越路过北京时，毛泽东不能不当面许诺为苏联武器过境提供便利。[53]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认定苏联党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之后，中国党对苏联援越动机和目的不能不从心底里就表示怀疑。结果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上的任何一点小的技术上的分歧，都会可能引发一方对另一方道德的严重怀疑，从而导致两国政府间发生很大的争执与冲突。[54]但不论中苏之间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发生怎样的纠纷，也不论这种纠纷是非如何，由于越南从对抗美国的角度考虑，自以为更需要的是倚重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因此，中国方面即使再努力，最终都不可能阻止越南向亲苏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围绕着苏联援越物资的纠纷越多，越南人就越是不理解；中国越是抹黑苏联，要求越南远离苏联，越南人就越是与中国形成感情隔阂，甚至和历史上的中越关系联系起来，怀疑中国有控制越南的企图。这些都只能促使越南更加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

不过，在苏联介入印支战争的问题上，让毛泽东最感到不安的，还是苏联的“和平阴谋”问题。这是因为，1965 年 2 月 16 日，即柯西金访越回国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向越南和中国提出了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随后，由中国视为头号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发起，17 个不结盟国家也发出“呼吁书”，主张和平解决印支冲突。3 月间，苏联在莫斯科又召开有 19 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公开声援印度支那的革命斗争，又讲团结，又讲革命，又讲反帝，这就更是让毛泽东倍感困惑：明明已经是修正主义了，为什么又回过来头来唱革命高调？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阴谋？联系到美国一面大规模轰炸北越，一面扬言要打击越南的庇护所，他一度甚至怀疑美苏会不会打算南北夹击，“共同对中国开战呢？”当然，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苏联其实是看到反对印支革命没有效果，于是投下诱饵，引越南上钩后再勾结美国来熄灭印支革命的战火。[55]

为了打破苏联的“阴谋”，中国方面采取了各种方式反对越美和谈。[56]为增强越南党战斗到底的决心，毛泽东这时批准了一系列的更大规模的援助越南的计划。这包括直接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规定云南、广东、广西、湖南等省负责越南七个省的经济建设与发展等。据不完全统计，从 1962 年至 1966 年中国援助越南各种枪支 27 万支、火炮 540 多门、枪弹 2 亿多发、炮弹 90 多万发、炸药 700 多吨、军服 20 万套、布匹 400 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讯器材等。而根据 1965 年 4 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提出要求中国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的有关协议，这一年 6 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了第一批军队入越。至 1968 年 3 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达 23 个支队 32 万余人。[57]

与此同时，注意到越南党在美军大规模卷入和大举轰炸北越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倾向于赞同苏联和谈建议的心理，毛泽东多次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反对现在和谈。6 月 5 日，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时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胡志明委婉地解释说：如果越南不表示愿意走向“和谈”，美军就要增加到十万，就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毛泽东当即回应说：怕什么？美国还说要炸中国。炸就更好，炸广州、南宁、昆明、海南岛，甚至炸新疆的原子弹基地，那就更好。[58]10 月 20 日，他在接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时也指出：你们应该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

样把美国人赶出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你们遵守协议把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了，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只好重新搞武装斗争。不是不能谈，到一定时候还可以谈，但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59]到了 1966 年，毛泽东一度干脆把对苏联“阴谋”的态度公开地摆到兄弟党面前，要求各党公开表明立场。

这一年 3 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宫本显治(Kenji Miyamoto)率团访华，双方商定发表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一致谴责了修正主义，只是考虑到苏联新的领导人采取了援越抗美的态度，日共建议不在公报中不点苏联的名。毛泽东得到消息，当即把公报要来做了修改，不仅点了苏联的名，而且增写了苏联援助是假，出卖是真的内容。毛泽东随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宫本说：“由我个人观察，我的改法对你们有利，对我们也有利。在叛徒和工贼面前，不要表现灵活。北京的同志和你们搞了个不痛不痒的文件，我看了不舒服。”“只讲修正主义，指的是哪一个？没有勇气。我批评你们软弱无能，怕孤立，怕战争。”对此，宫本详细解释了日共的立场，说明日共曾多次指名批评“苏修”，也相信苏联援助越南是别有用心，但苏联援助越南大量武器来打美国是事实，从反美统一战线的角度苏美矛盾也应当利用，况且也不能不顾事实否认其有反美援越的行动。对此，毛泽东非常不高兴，最后表示：你们这种态度是受苏共领导欢迎的，但是我们不欢迎。[60]发表两党公报事自然只好告吹，双方不欢而散。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越两党关系。几乎与此同时，中越两党领导人也因此发生了直接的意见分歧。中方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越南领导人坚持不同意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双方为此发生尖锐争执。在实在无法说服越方的情况下，周恩来等强硬地要求越方今后不要再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认为这样提对中国是个污辱。并且说，如果你们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想要控制越南。我们可以立即撤走我们派往越南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可以回到内地去。[61]

毛泽东坚持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同他的世界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始终是以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为依归的。按照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不可避免，而战争的结果则必然导致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都为列宁主义的这一预见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赫鲁雪夫之所以遭到毛泽东的尖锐批判，并被钉上现代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竟然与帝国主义头子美国打得火热，扬言可以与美国携手创造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阻挠世界革命。[62]因此，印度支那的战火，正好是毛泽东用来证明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揭露苏联修正主义欺骗嘴脸的最直接的例证。这也正是毛泽东害怕苏联借援助为名插手其中，诱导越南党与美国握手言和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迫越南党及其他各兄弟党公开与苏联划清界限，其实只是反映出他对苏联修正主义影响扩大的极度不安和严重担心而已。

在苏联积极援助越南的情况下，要想靠强迫各国党与苏联划清界限，是极其困难的。1968 年 5 月，不顾中方的强烈批评，越南党还是与美国在巴黎开始了和谈的进程。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要想彻底揭露苏联假援助，真妥协的嘴脸，非得要有更大范围的革命和战争不可。而进入到 6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毛泽东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差，他对预计中的新的世界大战迟迟没有爆发，世界革命局面迟迟不能出现，也已经越来越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总是讲：“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但他也渐渐看出，在美苏两国都掌握了大量核武器之后，世界大战也远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发生了。“打一场世界原子

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问题是美苏两国人口就少，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却怕消灭本国的人口。更何况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因此，他的结论是：“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63]

注意到战争与革命的趋势，还是革命更多一点，毛泽东自然要寄希望于各国共产党的革命了。只是，现实的革命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他再三说：亚非拉是个火炉，但有些地方还未动，如泰国。有些地方动得不那么厉害，如马来亚、印尼、菲律宾、南朝鲜。当 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尼亲共的总统卫队发动清除军队内反共高级将领的政变失败，印尼共产党遭到镇压后，毛泽东反倒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印尼共产党从此可以开展武装斗争了。他在内部明确讲：不要认为印尼革命搞坏了。显然，他很高兴地看到印尼共产党中央听从了他的劝告，“上山”去了。[64]据此，他甚至开始不顾脆弱的外交关系，积极支持起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起武装来了。

毛泽东这时尤其重视在有着美军基地的泰国搞革命。为此他多次要求老挝党要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说在泰国境内发展游击战争很重要，最好把解放区扩大到泰国去。因为主要的敌后地区在泰国，不在你们本国。你们把泰国赤化了，这个地方它就走不掉了。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你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呀？谁让美国飞机以泰国为基地起飞轰炸老挝的解放区呢。当他得知在中国的帮助下，泰共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小块的根据地时，他高兴地告诉泰国共产党人：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65]他并且多次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泰国共产党搞得好，很有前途，很有希望。1967 年缅甸发生反华事件后，毛泽东更进一步批准缅甸共产党在中国公开露面，并同意协助已来华 17 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他甚至明确地告诉老挝党和缅共的领导人：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中国军队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有时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过战斗。[66]

随着印度支那战争的继续，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陆续开始展开武装斗争，毛泽东一度颇感欣慰。他说：“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67]

不过，随着 1968 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1969 年中苏爆发边界冲突，进而导致苏联威胁要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毛泽东吃惊地发觉苏联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了。要革命，首先必须保存革命的本钱，这是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 20 多年间所得出的最重要的革命经验。想当年：暴动时违抗中共中央命令不打长沙，率队落草井岗山；苏区时坚持兜圈子的游击战术，宁愿被戴上“右倾”帽子也不同意实行所谓“进攻路线”；长征时为保存数百干部、数千部队，不怕被人骂为“逃跑路线”，力主红军北上苏蒙边界取得国际援助；抗战时不顾苏联、国民党和党内多方面的怀疑，对日长期避免正规战，始终奉行游击战……。对于有着长年军旅生涯，尤善军事指挥的毛泽东来说，这样做也许可能会有一时间的感情上的怅然，却不会有多少观念上的困扰。在异常紧张地渡过了“深挖洞，广积粮”和“准备打

仗”的战备阶段之后，他对世界革命的热心程度明显地开始降温了。[68]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毛泽东被迫批准与美国开始进行高层秘密接触，决心联美抑苏。这回中越关系再度受到影响，不过不再是中国批评越南牺牲革命，而是越南基于对中美秘密接触的不满反过来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想要牺牲越南了。自然，中国确也逐渐地不再反对越美和谈了。还在 1970 年，毛泽东其实就已经开始委婉地表示不坚决反对越美和谈了。尽管当年美国入侵柬埔寨的行动，一度妨碍了毛加速自身政策的转变，但在 1972 年前后，毛泽东在接待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和尼克松（Richard M.Nixon）访华时，一方面劝告美国撤出越南，公开拒绝美国要求中国向越南施压的建议；一方面就考虑到有促使美苏对抗的需要了，故在实际上已开始劝告越南同志要适时结束战争，争取谈判有所成果。[69]毛泽东这时对越南领导人说：如果谈判成功，那么不仅越南南方，而且北方都将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甚至还先后为过去对越南的批评表示了歉意。称“你们自 1968 年以来实行的打和谈的策略是对的。起初，你们刚开始谈判时，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你们采取了错误的行动。”看来，“你们的决定是正确的。”[70]

1973 年 1 月 27 日，越美巴黎会谈达成和平协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赞扬，说越美协定让美军走是个好办法。但这并不足以让越南回到中国一边来，而且他还得罪了中国反对修正主义最坚定的同盟国阿尔巴尼亚。因为阿党过去和中国一起坚决反对越美和谈，更反对轻易让美国人从印度支那抽身。它这个时候对毛的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深表不满，不仅反对越美达成妥协，尤其反对中国与“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搞到一起去。阿党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相当一批过去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左派共产党人。可是毛泽东在苏联威胁面前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再度端出列宁关于遇到强盗应当交出汽车和金钱的故事，否认自己有什么过错。年迈的毛泽东固执地说：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指阿尔巴尼亚）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71]

结　论

依据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从 1949 年到 1973 年大致经历过以下四次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1949－1953 年支持其抗法战争，不赞成妥协。

第二个阶段：1954－1957 年赞同和平与民主，主张停止武装斗争。

第三个阶段：1958－1969 年支持其抗美战争，反对越美和谈。

第四个阶段：1970－1973 年赞同越美和谈，主张结束战争。

毛泽东第一阶段所以积极支持印支战争，其受到意识形态及其与此相联系的革命经验是相当明显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他更多地考虑的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支援世界革命。而在革命经验方面，中国武装斗争的胜利道路则是他坚信越南等亚洲国家共产党争取自身解放的唯一途径。在这段时间，虽然从减轻朝鲜战场上美军压力的角度，推动印

支战争或许具有某种战略牵制的意义，但由于法军是印支战场上的主要敌人，这方面的考量应该不大。

毛泽东 1954 年所以会转变态度，史达林去世后苏联力促停止韩战，提出和平外交政策当是一个主要的外界影响因素。而内部的影响因素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内部决策机制尚较民主，关于这一点只要了解毛泽东当年虽然力主出兵援朝，受到党内反对也不得不几度反复的情况，即不难有所印象。[72]由于决策尚较民主，1953 年韩战停止和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实施，国家整个战略方针调整的客观需要就自然会成为党内务实派领导人要突出强调的问题。受此影响，注意到韩战停止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重心南移，中国在越南对美作战的各种不利因素，毛泽东开始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意识，赞同通过确保北朝鲜和北越安全，以东南亚和平换取对美缓和，为自己创造一个和平建议的国际环境，就成为可能。

毛泽东再度转向支持武装斗争，民族主义悲情意识的发酵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内在因素。中国近百年来长期落后挨打，受人欺侮，“一唱雄鸡天下白”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外抗美国取得骄人战果，新中国在亚洲地位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继续在联合国代表权以及台湾等问题上采取敌视态度，苏联又每每习惯于依仗其经济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对中国颐指气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民族主义情感迅速膨胀。而这个时候苏联党对战争与革命等问题的模棱两可态度，又极大地损害了毛泽东最以为自豪的东西，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贡献。为了证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发动了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越南和平民主尝试的严重挫折以及印度支那战争的重新开始，都明显地有助于毛泽东证明自己的正确。以战争划线，反对和平妥协，自然成为毛泽东的一种政治选择。

毛泽东重新转回到比较灵活的态度上来，毫无疑问是受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需要的极大触动。1969 年新疆铁列克提事件之后中苏两国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和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严重局面，使毛泽东重新开始重视力量对比问题。正是在中苏关系严重危机时孤立无援的外交境遇，和多年输出革命毫无结果的困惑，使他重新拾起以往的统战策略，即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因而产生出联美制苏的新政策。当然，美国这个时候在印度支那战争上的困境以及对抗苏联的需要，也便利了毛泽东态度的转变。

概括言之，作为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人，执政的现实并没有使毛的观念更接近于实际，恰恰相反，国家统一的迅速完成，经济恢复与重建工作的顺利实现，以及国内政治的异常稳固，使毛泽东再无战争时期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广袤的国土，无尽的资源，所有这些都只是极大地刺激着毛泽东的政治使命感和民族自豪感。对革命经验的执着，捍卫革命理念的需要，以及实现革命使命的冲动，都促使毛泽东在对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日趋激进，不仅为实践其革命理念而置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的现实需要于脑后，而且为捍卫其意识形态之正统不惜对所有的“兄弟”翻脸。当然，毛泽东也还是会在一定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回归现实。这就是：当他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现实的力量对比，渴望尽快地跻身于强国之列的时候（如建国初期）；或者是当他意外地发现战争的威胁已极大地危及到共产党政权的时候（如 1969 年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后）。很明显，这样的时候在毛的那个时代都太少了。

----

[1] 印度支那，前为法国在东南亚的一块殖民地，法国占领前曾分别是三个国家，即安南（即越南）、寮国（即老挝）和高棉（即柬埔寨）。对印度支那，台湾以往又习惯称之为中南半岛。

[2] 越南，1954 年以后又分为北越和南越。

[3] 在这方面比较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Zhai Qaing 的 Chian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f 1954(China Quarterly no.129, 1992);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The Kent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94); Transplanting the Chinese Model: Chinese Military Advisers and the First Vietnam War, 1950-1954(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no.57, October 1993); Opposing Negotiations: China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1968(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8:1, 1999)；Chen Jian 的 Chian and the First Indo-China War, 1950-1954(China Quarterly no.133, 1993); China’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1964-1969(China Quarterly no.142, 1995)，和李丹慧的〈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4] 已经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利用最多的资料除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997 年版）以外，主要参考的多是二手资料。这包括《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郭明主编《中越关系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两卷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5 年版），等。在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唯一利用到近年来最新披露的涉及到中越之间重要分歧的档案资料的，当属 Zhai Qiang. Opposing Negotiations: China and the Vietnam Peace Talks, 1965-1968.

[5] 在中文方面，相关资料披露较多者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越、俄两国的新资料多半已译成英文。有关英文资料可参见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Paper, No.22; Cold War International Project Bulitten, Winter 1995/1996; 1996/1997; March 1998; Winter 1998, 等。

[6]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529 页。

[7] 参见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 年 5 月 31 日。

[8] 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 年 11 月 16 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4－135 页。

[9] 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12 日；〈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 年 12 月 24 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 年 1 月 31 日，同上引，第 165，187－188，347 页。

[10] 1949 年 6 月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与史达林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除了曾经在战后受到苏军占领的北朝鲜以外，亚洲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应由中国党负责联络、指导和帮助。参见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的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2 页。

[11] 〈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 年 7 月 26 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 年 10 月 6 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 年 10 月 10 日；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2－74，96－97 页；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1－22，56，60，88－89 页；《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第 42 页。

[12] 1950 年，国家财政支出的 52％是军费，其中 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到 1952 年，虽然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军费开支仍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 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根据有关方面公布的资料，为了这场将近三年的战争，中国耗费了约 100 亿美元。参见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61 页；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

[13] 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3－244 页。

[14] 《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 88－99 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8 页。

[15] 〈毛泽东致彭德怀信〉，1954 年 4 月 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74－475 页。

[16] 〈毛泽东致黄（克诚）、粟（裕）电〉，1954 年 4 月 17 日；中央致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电〉，1954 年 6 月 20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卷，第 480，509 页。

[17] 〈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三次）〉，1954 年 7 月 3 日；〈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七次）〉，1954 年 7 月 5 日；《周恩来传》（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31－1132 页。

[18] 〈毛泽东范文同谈话记录〉，1961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记录〉，1973 年 7 月 4 日。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 1975－1976 年内部油印材料，以下不另注。

[19] 在 50 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曾反复谈到中国落后的问题，并把它主要归结为工业化欠缺。对工业化问题则主要理解为要在钢铁产量上缩小与美国的距离。他发动大跃进，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赶上美英等国的钢铁产量，使中国实现工业化。

[20] 《纽约先驱论坛报》，1954 年 8 月 8 日。

[21] 〈毛泽东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尼赫鲁谈话记录〉，1954 年 10 月 19，23 日。（为了节省篇幅及行文通顺，笔者在此对毛的谈话原文进行了压缩。以下引文也有类似的情况，恕不一一注明。）

[22] 〈毛泽东缅甸总理吴努谈话记录〉，1954 年 12 月 1，11 日。

[23] 同上引注；并见〈毛泽东接见泰国代表庵蓬等人谈话记录〉，1955 年 12 月 21 日。

[24] 毛在 1967 年与马共总书记谈话时，马共领导人特别提到这段历史。参见〈毛泽东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 年 1 月 17 日。

[25] 毛泽东在万隆会议结束后很快就表示赞同周恩来关于愿意与美国坐下来谈判的公开提议。〈毛泽东巴基斯坦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谈话记录〉，1955 年 4 月 27 日。

[26] 〈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954 年 8 月 13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 卷，第 530－532 页；〈毛泽东长征、艾地在宴会上的谈话纪要〉，1956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等人谈话记录〉，1956 年 9 月 14 日，等。

[27] 关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雪夫报告从部分批评到根本否定的详细经过，参见杨奎松：《走向破裂：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13 章；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28]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1958 年 9 月 5 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等 1994 年版，第 341－347 页。

[29] 〈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主席凯山·冯维汉谈话记录〉，1959 年 10 月 4 日。

[30] 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6 页。

[31]见《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7 日。

[32] 〈毛泽东会见澳共领导人夏基谈话记录〉，1959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 年 5 月 21 日；〈毛泽东接见委内瑞拉革命左派运动主席安东尼奥·德尔加多·洛萨诺谈话记录〉，1961 年 4 月 3 日。

[33] 前引〈毛泽东金日成谈话记录〉；〈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0 年 8 月 10 日，11 月 2 日。

[34] 〈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1 年 11 月 14 日。

[35] 〈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致恩来、小平、陈毅同志信〉，1962 年 2 月 27 日；〈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1962 年 6 月 23 日，参见《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46－460 页。

[36] 〈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援外工作情况及今后安排的请示报告〉，1961 年 9 月 1 日。

[37]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3 月版，第 159 页。

[38]〈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3月31日，参见《王稼祥选集》，第444－445页。

[39] 这次会议于1962年7月21日达成了和平协议。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同意，老挝王国政府将坚持和平、中立政策，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或联盟，并且不接受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

[4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6日。

[41]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7－248页。

[42] 〈刘少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1963年2月25日。

[43] 见《人民日报》1963年3月12日；〈中央关于在对外接触中有关越南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应注意事项的通知〉，1963年3月19日；〈毛泽东金日成谈话记录〉，1963年5月29日。

[44] 参见〈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毛泽东接见崔庸健谈话记录〉，1963年6月16日。

[45] 同前引〈毛泽东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毛泽东接见巴西共（新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3月6日；〈毛泽东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12月5日；〈毛泽东接见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谈话记录〉，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等。

[46] 〈毛泽东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4年1月30日。

[47] 同上引；毛泽东在接见文进勇等谈话记录〉，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接见陈子平等越南客人谈话记录〉，1964年7月27日，等。

[48] 参见 Gaiduk, Ilya. 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Chicago: Ivan R. Dee, 1996), p.16.

[49] 苏联《真理报》8月3日对东京湾事件只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次日赫鲁雪夫的声明也同样语调温和。参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1, Vietnam, 1964, Washington, D. C.:GPO, 1992, p.637.

[50] 〈毛泽东接见黎笋谈话记录〉，1964年8月13日。

[51] 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65、267页。

[52] 据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之后，中方即曾向越方表示过不赞成越南单方面接受苏联援

助的态度。前引 Gaiduk 书，p.16.

[53] 〈毛泽东与柯西金谈话记录〉，1965 年 2 月 11 日。

[54] 转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矛盾与冲突（1965-1972）〉（Sino-Soviet Dispute over Aid to Vietnam's Anti-US War ，1965-1972）。未刊稿。

[55] 〈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艾波斯坦谈话记录〉，1965 年 3 月 19 日。

[56] 这种表态可见 1965 年 3 月 10 日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 2 月 16 日关于召开印度支那新的国际会议的建议的答复；〈周恩来 1965 年 3 月 30 日在阿尔及尔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的谈话〉；〈周恩来 1965 年 4 月 2 日与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等。分别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5－266 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4，445 页。

[57] 前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 35 页；韩怀智等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 6 月版，第 514 页；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第 616 页。

[58] 〈毛泽东胡志明谈话记录〉，1965 年 6 月 5 日。

[59]〈毛泽东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 年 10 月 20 日。

[60] 〈毛泽东接见日共代表团宫本显治等谈话记录〉，1966 年 3 月 28－29 日。

[61] 〈周恩来、邓小平等与黎笋、阮维桢等会谈记录〉，1966 年 3 月 23 日，4 月 13 日。

[62]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11 月 19 日，转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50－481 页。

[63] 〈毛泽东接见澳共（马列）中央主席希尔谈话记录〉，1968 年 11 月 28 日。

[64] 后来印尼共总书记艾地因下山来见苏加诺总统，被军方捕杀，毛亦大加批评，认为对武装斗争态度还是不坚定。参见〈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 年 12 月 11 日。

[65] 〈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 年 7 月 7 日；〈毛泽东接见泰共江洪、张实等谈话记录〉1967 年 11 月 9 日。

[66]〈毛泽东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 年 11 月 26 日。

[67] 〈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 年 7 月 7 日。

[68] 关于 1969 年中苏战争几乎爆发，毛泽东高度紧张，加紧备战的情况，可以参见杨奎松前引书，第 18 章，战争即将爆发？。

[69] 有关中美高层秘密接触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美越巴黎和谈及其结束印支战争的态度，可参见 William Burr, ed.,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jing and Moscow, （New York, 1998）, pp.30-31, 102-106.

[70]参见〈毛泽东阮氏萍的谈话〉，1972 年 12 月 19 日；〈周恩来与黎德寿的谈话〉，1972 年 7 月 12 日；〈毛泽东黎德寿的谈话〉，1973 年 2 月 2 日。

[71] 〈毛泽东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记录〉，1973 年 7 月 4 日，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 604 页。

[72] 杨奎松前引书，第十一章。

抗战结束前后中共争取"联合政府"的斗争

1944 年 9 月 15 日，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上公开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建立各党各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是连续 7 年来始终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向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这一公开挑战曾经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得到了国内国际各种民主势力的响应和支持，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最终改变了国共两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屈从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代由此一去不复返。

"联合政府"口号的由来

抗战期间的国共两党关系，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但是，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两党合作是建立在中共公开承认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的基础上的。

关于中共事实上承认国民党在政府中的领导地位的种种表示，自两党合作开始以来，在许多政治文件中都有所记载。如 1937 年国共商谈合作之初，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四项保证"，表示它所领导的陕北特区政府和红军愿意接受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的指导。[1]而后，中共中央虽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责任"，但它明确承认在实力原则下，共产党目前的"政治领导"地位还只限于"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它只能"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来实现它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要走到"实力领导地位"，还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它这时多次指示其谈判代表：在保证中共组织独立的条件下，应当"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或承认"国民党在中国的指导地位"。[2]

又如，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虽然也提出过国共两党关系应当向着“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方向努力，但它仍再三表示“拥护”依然是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国民政府，并很快就提出：“不要太急于在形式上求得平等(如‘共同宣言’‘共同领导’等)”，要“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要肯定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3]

又如，在 1941 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尽管在两党领导人之间，感情上已经根本破裂，毛泽东已经开始决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排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政权”，但是，在公开场合下，中共中央仍旧继续“争取以蒋为统帅”，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直至 1944 年春，毛泽东仍旧公开宣称：“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4]

国共两党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上述中共对自身地位以及对国民党态度的措辞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渐变的痕迹。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实力对比的改变。毛泽东是重视“实力原则”的。早在 1936 年 1 月，当得知张学良有可能领导人数众多的东北军与中共红军合作时，他就曾依据实力原则力主由张学良来担任未来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5]1937 年国共谈判合作，毛泽东也清楚地了解，当时军力尚不足国民党 1/20 的共产党只能改制改编，服从国民党一党当政的南京中央政府。即使在 1938 年，八路军的力量发展到 20 余万人，毛泽东依然承认，在统一战线中，军事力量上 10 倍于中共的“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但是，当 1940 年前后，中共的武装力量发展到 50 万人左右，并且可能迅速发展到上百万人的时候，依据实力原则争取相应的政治军事地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共这时明确提出委任朱德为鲁察冀热四省战区司令官兼河北省主席，委任贺龙为察哈尔省主席等项政治要求[6]；毛泽东这时新民主主义政权思想的提出，更鲜明地反映出军事上开始举足轻重的共产党人，在政治上想要改变前此的不平等地位，并一展鸿图的强烈冲动。虽然，考虑到国民党的军力仍四五倍于自己，再加上还有强大的日伪军需要抵抗，中共最终仍旧不能不表示：“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但仅仅承认蒋个人的领袖作用，而不再承认国民党在全国居于领导和基干的地位，这说明中共对国民党前此的一党专政已经在根本上予以否定。由此可知，从 1937 年初承认国民党领导，到 1944 年秋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逐渐变化，导致这两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利益要求的政党必然要逐渐改变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中共中央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向国民党要求合理分配政权，却是 1944 年春夏以来国际国内一系列复杂因素推动的结果。

到 1944 年上半年为止，中共军事力量仍在 50 万左右，而国民党的军队数量这时比它的 4 倍还多。而且，1943 年底，蒋介石刚刚应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邀请，出席了开罗会议，取得了“大国领袖”的资格，政治上风头正健，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根据苏联党的要求，接连来电劝告毛泽东注意改善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中共中央最初不仅没有设想过刺激国民党的问题，而且估计今年“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决定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之门，并要求各地力避刺激国民党。[7]所以，在 1944 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中央不仅明确提出派林伯渠前往重庆与国民党重开谈判，而且对于大后方掀起的宪政运动，积极参加，要求开放党禁，重选国大，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毫无涉及。

联合政府问题的提出，更多地源于当时意外出现的两大因素。这首先是因为国民党河南战役的惨败。河南战役是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阶段作战。它开始于 1944 年 4 月中旬，历时一个多月，国民党一战区 40 万军队中许多部队竟不战自溃，以致损失人数达 20 万人以上，郑州、洛阳等 38 座市县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这一仗不仅反映出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和士气的低落，而且也是国民党军事上和政治上种种弊端的一次大暴露，因而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

河南战役开始之际，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刚刚从延安出发。当时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还着重于缓和两党关系，因此所提条件政治上不外要求承认中共党、边区及各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军事上则只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领导下的一切抗日武装，并同意八路军、新四军扩编到五军十六师，最低限度则为四军十二师。正因为如此，林伯渠等 5 月 2 日到达西安，还在西安停留期间，就同前来摸底的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达成了一项初步交涉书面意见书，约定“双方共同签字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再作最后决定”。[8]而书面意见中突出强调的只是：第一，八路军及新四军扩编为四军十二师；第二，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原有地区，但改称为陕甘宁行政区，直属行政院；第三，给予中共合法地位，停止捕人及迫害八路军、新四军之军人家属，释放一切在狱之共产党员。[9]

恰在林伯渠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在西安达成书面妥协意见之际，国民党中央军在日军发动的河南战役中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的消息陆续传来，延安不断得到情报，国民党军内部或者勾心斗角，你争我夺，或者花天酒地，贪污腐化，已经大部分失去战斗力，国统区因此舆论大哗，民怨沸腾，中共中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根本解决中共及边区地位和敌后抗日武装的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机会。毛泽东据此迅速指示林伯渠等改变谈判策略。他明确说：目前情况“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随后，中共中央于 5 月中旬重新提出全面解决两党关系二十条，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无条件地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和敌后政权，停止一切针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进攻、经济封锁和特务活动，释放一切被捕的中共人员，甚至要求公平分配美国援助中国之各种武器、弹药、药品和金钱等。[10]中共中央并且开始公开宣传，它所抗击的伪军已经占到整个伪军总数的 84%以上，而它所抗击的日军则是日军在华兵力总数的 64%。“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11]

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与军事上的无能，激起了共产党人领导抗战胜利和未来中国的历史责任感。但是，在这时中共中央所提各种条件和方案中，仍未提出联合政府问题。不过，在 5 月中旬提出新的条件之后，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的态度开始变得十分明确了。在中共新的二十条和 6 月初进一步修改提出的十二条中，第一条就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的文字。[12]

要求实行民主，与要求解除党禁一样，其矛头无疑是针对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来的。但是，要根本否定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又不损害国共之间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这是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自宪政运动开展以来，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了国民党之外各党派谋求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形式的主要话题。但宪政的实施毕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且蒋介石已明确宣布，实施宪政必须到战争结束一年之后。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坚持要以国民党战前一手制造的国民大会来作为实施宪政的工具。承认以这种方式来达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的目的，不仅战争结束前没有可能，就是在战争结束一年后，恐怕也很少可能。因此，要想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同时又不给人以共产党打算根本推翻中央政府的印象，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和形式在这时具有关键意义。美国人这时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提议，正好适合了中共谋求以新的统一战线政权形式替代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实需要，因而迅速成为中共中央新的斗争口号。

联合政府的设想最初是罗斯福提出来的。1943 年 11 月，在开罗会议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在谈到中国内部纷争时曾经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13]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建议，蒋介石当然不会加以理睬，美国方面此后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美国方面重新提出这一设想，也是震惊于国民党军队在日军打通大陆架作战中的节节败退。6 月前后，美国驻华大使高思开始在大使馆范围内提出“由委员长召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派别和他一起组成军事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以便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确保中国尚存地区不致进一步落入日本手中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了其他外交官的一致认同，也迅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认可。国务卿赫尔甚至直接打电报给高思称：总统和我已仔细考虑了你的意见，我们赞同使中国政府成立一个强有力的并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宽容精神的政府的一切努力，而“一个代表中国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并在蒋介石领导下拥有全权的委员会或某种机构，将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的形式”。据此，7 月 4 日，艾切森代办在与立法院院长孙科的谈话中第一次正式向中国政府官员提出了这一建议。之后，高思同外交部长宋子文以及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也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并且亲自向蒋介石正面提出了这个问题。[14]

考虑到蒋介石对自身地位的过分敏感，高思以及美国政府这时更多地还是从军事方面着眼，建议立即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组成一个有职有权的联合军事委员会或联合最高统帅部，以便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共同承担战争责任，解决目前军事方面的严重困难。高思明确告诉蒋介石，他并没有设想过立即改组政府，尽管他相信，在目前这种危机时刻，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也许不失为有效办法。但是，不论高思这时如何考虑，对于那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而反感国民党的年轻外交官来说，根本改组现行政府，组织联合政府，多半是一种更好的选择。随着 7 月下旬美军观察组进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向对国民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谢伟思也受命一同前往执行任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了谢伟思与中共领导人热心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

中共中央最早公开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在 8 月 13 日。周恩来这一天就国共谈判发表公开讲话，一面继续表示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一面却直截了当地要求国民党必须放弃一党统治与限制、削弱和消灭异己的方针，声言国共关系的症结，根本就在于此。[15]但是，周恩来这时还没有谈到应当以何种形式来取代国民党的一党统治的问题。四天之后，即 8 月 17 日，当在重庆的董必武电询周恩来是否应当赞同民主党派领导人张澜、左舜生扩大参政会的主张时，毛泽东才开始提到联合政府问题。毛泽东在董必武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左商各党派联合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第二天的复电中请董必武、林伯渠考虑，目前如果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各团体代表会议，改组政府，然后由此政府召开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讨论反攻，实行民主，能否引起大后方各党派的响应和各地方实力派的同情?不难看出，这是中共中央最早开始考虑联合政府的提议，当时他们对提出这一主张的可行性还存着某种疑问，因此叮嘱重庆方面的代表就此一设想先行在民主党派领导人当中暗中征询意见。[16]

中共中央注意到联合政府这样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是与随同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的谢伟思有关的。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明确的说法。9 月 1 日，毛泽东第一次把联合政府问题提到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上进行讨论，征询党的各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他当时特别说明：是谢伟思说，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显而易见，在得到了谢伟思的这一消息之后，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提法很感兴趣，但最初并非毫无顾虑，故仍多方征询意见。[17]直到 8 月 23 日毛泽东与谢伟思第一次长谈时，虽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体制，尖锐批评国民党的中央政府不合法，断言蒋介石的主席地位也只是一个政党的仅仅 90 个特殊党员举手举出来的，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明确提出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必须改组，但是在谈话中仍没有明确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8]

中共中央最初的顾虑不是没有理由的。中共中央这时对国民党的态度一方面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争取自身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仍旧是要继续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但是，这样一种方针的确定，必须适合于自身的实力，过右达不到目的，过左又难免激怒国民党，破裂合作关系，甚至失去民主党派的同情。根据国共两党这时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直接提出与国民党联合执政的问题上还多少有些保守，因此，他在决定打出联合政府的旗帜时，不能不十分慎重。事实上，中共中央未尝没有过与国民党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想法，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政治主张，说到底其实也是一种联合政府的设想。但一方面共产国际相信这没有好处，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当时两党力量悬殊太大，这一主张最后只好放弃了。[19]如今这样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一向自大主义十足的蒋介石，是否能够接受与共产党分享政权的事实呢?[20]很明显，只是在 9 月 1 日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才最终确定了要以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争取联合政府来作为自己当前的斗争目标。

为“联合政府”而斗争

9 月 4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周恩来根据 9 月 1 日会议讨论结果起草的给重庆董必武、林伯渠等人的电报，通知后者应当以联合政府作为中共当前的政治主张。中共中央的电报称：“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事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21]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代表林伯渠 9 月 15 日上午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局的办法，是必须对政府机构人事政策来一个改弦更张，这就需要“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才能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彻底打垮日寇。[22]

就在林伯渠在参政会报告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召见了美国大使高思，委婉地拒绝了高思关于组织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并含蓄地表示：希望美国人不要设想改组中国政府，因为在目前试图改变政府结构是错误的，他将来会考虑让少数党派的代表进入政府的问题。[23]不难想象，蒋介石这时对来自美国和中共的两面夹击深感恼火，但这时他与美国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正闹得不可开交，不能四面出击，因此他在公开场合还不能不对此轻描淡写，有意置之不理，甚至表示对林参政员的态度"甚为佩慰"。[24]

蒋介石的反应多少有些出乎中共中央的意料之外。而高思大使同孙科、王世杰等谈"中国应组联合政府事"的消息也为延安所知。与此同时，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更得到了大后方民众的积极响应和拥护。人们或集会游行，或著文讲演，来表达他们对厉行民主政治，废止一党专政的渴望。9 月 24 日，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 500 余人齐集四川大厦，公开进行民主宪政的宣传与鼓动。著名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李璜、左舜生、黄炎培、张申府、刘清扬、胡子昂，以及国民党著名人物冯玉祥、邵力子、钟天心、王昆仑、邓初民、屈武等均出席了集会。发言者不泛激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改组政府，制定提早实行民主的具体办法者，多数亦表示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而后，国共之外最有影响的中国民主同盟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赞同"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重庆、成都、昆明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等数百人，也分别签署了同样的声明与宣言，与中共相呼应。[25]

这种局面的出现，极大地增强了中共中央的自信心。毛泽东在 9 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对此颇有感慨，说：过去我们的思想常跟不上形势，估计不足，总是认为国共之间，蒋介石强大，天下是他的，没有看到重心正在逐渐转移到我们一边来。日本打河南之际，我们对国民党还是麻痹政策；直到后来提二十条、十二条，也未想到要求改组政府。现在看来确实时机成熟了，谁都看得出中国有了两个平等的东西，不再是一大一小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态度再强硬，坚持不妥协，结果也是拖的局面，不致有太大的危险。[26]但是，当有人提出应当准备成立解放委员会，争取发展成第二个中央政府时，毛泽东却颇多犹豫，毕竟这里存在着一个革命和改良的重大区别。他明确讲："对蒋，我们不是不要，事实上非要不可"；同样，对国民党，也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非联合不可。他特别告诫全党："国民党既然这样坏，为什么还要他?原因是日本人还在面前，这是基本原因"。其次，"外国人还要他"。第三，也"不要轻视国民党的力量，虽然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它还有相当大的反动力量"。同时，目前"群众还未觉悟"，也还承认他们，我们"不可因为一时气愤就'打倒'他们"，"要照顾群众"。因此，马上提出革命的口号则不免有脱离群众、自我孤立的危险。毛泽东强调认为：还是联合政府的口号好，虽然它还不是一个革命口号，但它也不是改良主义的改良口号，而是带有革命性的改良口号，是等候群众觉悟、发展自己力量，最终走向革命的过渡性的口号。[27]

肯定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并不等于中共中央相信他们真的能够迫使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同意改组政府。毛泽东、周恩来这时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讲得很清楚，他们并不认为存在着国民党同意召集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蒋介石充其量只会邀请几位共产党领袖到国民党的政府里面作官，摆摆样子罢了。因此，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或者干脆象英美两国抛弃南斯拉夫的米哈伊洛维奇政府转而援助铁托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撇开国民党，直接与延安打交道。[28]出人意料的是，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这时突然出面调处国共关系，竟然使联合政府的实现真的一度产生了希望。

赫尔利出面调处国共关系，基本目的其实是军事上的，是想要促使国共两党军队消除彼此间的对立，在统一指挥下全力对付日本人，从而挽救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军事危机。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相信有必要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来促成军队的国家化。为此，赫尔利从一开始就向国共双方许诺，一方面保证支持蒋介石实现政治和军事统一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对中共驻重庆代表表示“中国现政府不民主”，中共“应取得合法地位”，“军事领导机关中应有中共党员参加”，甚至租借物资的分配也“不应偏于那一党”。他最初提出的方案也明确主张，中共承认军队统一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而蒋介石则必须同意根据民主原则组织政府，并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29]鉴于赫尔利两次同中共代表谈话都要求中共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表示愿意支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毛泽东明确认为，在承认蒋存在的条件下，看来可以迫使蒋“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30]这样的“交易”在 11 月上旬似乎轻而易举地就接近于达成了。

11 月 7 日，赫尔利带着他与蒋介石商定的方案飞往延安，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修改过的这一方案，其核心在于突出强调了“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其中对改组政府问题一句未提。[31]尽管赫尔利当场许诺说，蒋介石正在考虑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军事委员会的问题，毛泽东却明确表示：首先应当改组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否则一切都谈不上。双方谈来谈去，最后赫尔利被说服修改条文，将第二条改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第三条改为：“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治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立即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32]对于修改以后的五项协定，不论赫尔利，还是毛泽东，都感到相当的满意。赫尔利在与毛泽东双双在协定上签字之后，就立刻打电报给罗斯福，声称“这一修正案中的基本原则几乎全是我们的”。毛泽东也致电罗斯福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所在”。[33]

与美国总统特使就联合政府问题签订协议，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发动要求联合政府的政治攻势以来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毛泽东为此再度向党内解释说：要知道国民党还有 200 多万军队，并且还得到国际国内的承认，而我们还只有 63 万军队，地区也很分散，与之妥协仍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在这个五点协定上，我们最大的让步只是同腐败的政府再合作，但我们没有损失我们的解放区，没有损害我们坚持的民主原则，相反，只要蒋介石签了字，我们就攻破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取得了合法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

把一个明确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协定条文拿到重庆去要蒋介石签字，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不论蒋介石如何依赖于美国的援助，但在触及到他和国民党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绝不会听任美国人的摆布。何况，蒋介石也很清楚，中国并不是南斯拉夫，美国政府在国共两党之间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话，它也只能选择国民党，而不会选择共产党。因此，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拒绝了赫尔利带回去的五点协定。在得到蒋介石同意的所谓“复案”中，唯一的让步就是公开承诺，在中共同意将一切军队移交国民党政府统辖之后，国民党政府同意“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34]当然，这一回赫尔利又悄悄告诉周恩来，蒋介石并非不允许你们参加政府，只是他不愿写在纸上，不想让人认为是共产党要求的结果，反对

用“联合”这个字眼儿。其实，是不是一定要逼国民党承认联合政府并不重要，你们可以一步一步地干，先参加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最高统帅机构，最好里面既有国共代表，也有盟国方面参加，设置一个盟国的统帅，以公平的态度来指挥和装备双方的军队。11 月 22 日下午蒋介石召见周恩来、董必武时也说，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他同时向赫尔利许诺说，只要中共接受他的复案，马上就可以开始改编和装备中共军队。[35]

面对蒋介石的不妥协态度，毛泽东显得十分气愤。他开始电示周恩来：应立即与有关朋友商谈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事，准备召开中共七大，同时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据此，周恩来在重庆与有关人士进行了秘密磋商。孙科等人建议，不妨提议扩大国防最高委员会，并通过联合的国防委员会来改造政府，筹备选举，制定宪法。考虑到从争取美援的角度不宜让美国为难，但也不妨提出解放委员会来逼一逼国民党，周恩来于 29 日致电延安，提议另提新案答复国民党。周恩来在新拟的草案中提出：“国民政府为达成中国境内军事力量之集中与统一，以实现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之目的，允将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并由这个联合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和颁布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并改组行政院使之成为各抗日党派的联合内阁，改组军事委员会，使之成为各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如果此议一时不能实行，“中国敌后解放区根据战争之需要与人民之要求，将先组成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以统一敌后各解放区政府军事的领导，并便于参加今后的联合国防最高委员会。”同时，“为适应目前战争最迫切之需要，中国战场应设立联军统帅部，由美国方面的代表担任统帅，中国所有抗日军队应有负责代表参加统帅部以统率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抗日军队，并负责进行各军的编制、装备、训练和补给。”[36]

周恩来的提议意味着中共事实上可能要从联合政府的要求上后退。毛泽东对此颇有些疑问。他得知周准备提出复案，当即要周返回延安进行讨论。在 12 月上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甚至进一步提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继续依据延安协定进行谈判，坚持联合政府的要求，结果仍是拖；一种是干脆准备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准备我们的将来，但要冒险，蒋介石可能有词可藉，美国可能不同我来往，结果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公开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如何办?是否会孤立?但是，毛泽东看来还是对此抱有某种希望。为了唬一唬赫尔利，也是为了要看看风色，毛泽东和周恩来于会后马上找来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宣布说：“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受命写信给赫尔利，表示中共准备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37]

中共方面的表示果然惹得赫尔利大发脾气，特别是周恩来关于单方面公布延安协定的威胁，使赫尔利坐立不安，声称毛不可信赖。包瑞德急忙通过中间人转告中共驻重庆代表王若飞，说明他本人虽然相信中共的要求都是合理的，不赞成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但中共应当知道华盛顿今天还是支持蒋的，许多美国人，包括罗斯福、赫尔利，对中共也不了解。况且毛泽东与赫尔利当初都曾答应对条约内容保守秘密，不应使他太难堪，并如此之快就准备破裂步骤。他明确提出疑问：中共突然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是否存在着苏联背景?无论如何，从 9 日起，进攻贵州的日军已经开始撤退，蒋介石已可以挺直腰杆儿宣布不需要利用中共军队来抵抗日本进攻，这个时候宣布成立解放委员会，一旦蒋宣布你们为分裂行动，转而以汉奸名义打击你们，对你们十分不利。[38]

赫尔利和包瑞德的反应使毛泽东深为不满，但恰恰证实了他此前的担心。得到王若飞来电的第二天，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就召开会议，与会的领导人几乎一致主张将成立解放委员会的计划暂时放一放。没有人不了解，搞解放委员会就是做另立中央政府的准备，也没有人不希望尽快搞垮蒋介石，问题是自身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时机是否已经成熟，舆论是否已经造好，人民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毛泽东讲：我对此事一直感到有些不安，我们的一切计划是要打倒蒋介石，蒋介石现在也确实相当衰弱，但他毕竟还有一点优势，即还占有一些二等城市，而我们拥有的只是三等城市。恐怕要到反攻的时候，我们才能占据更多的城市，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本准备胜利。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包括第七次代表大会，可能都还要提要求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解放委员会要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只在内部酝酿，谨慎有利，美蒋可以放心。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当天致电王若飞，要求他通过包瑞德等向赫尔利说明：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延安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解放委员会几个月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所拒绝的只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当然，毛泽东同时也并没有忘记提醒党的领导人：“这次抗战，我们一定把中国拿下来，这个准备一定要。”[39]

12 月 15 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再提联合政府问题。他宣布：“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40]16 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谈判之门并未关闭，但若不能废止一党专政，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只是在国民党一党政府内进行个别人事更动，继续谈判毫无意义。[41]此后，赫尔利虽仍再三要求恢复两党谈判，但中共中央始终以“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为由，予以婉拒。中共中央这时的策略很明确，抓住联合政府的口号不放，以此来继续对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同时全力发展自身力量，争取在最近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掌握整个中国的命运。为此，周恩来于 12 月 28 日进一步致书赫尔利，声明：“关于国民政府有无可能接受我们提议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方针来进行谈判问题，我们不愿再继续抽象的探讨。”国民政府如果真有与民更始的决心，就应当首先自动释放全国的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及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并停止一切特务活动。“诚能如此，则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根据人民意志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方可窥其端倪”。[42]

“联合政府”主张的变化

中共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变得极端被动。蒋介石所做的关于战后一年实施宪政的许诺，也因此变得一钱不值，社会上几乎人人都相信国民党应当尽快改组政府。赫尔利清楚地了解这种情况，但他更担心的显然是国民政府会不会因为各方面的压力过大而濒于崩溃。相对于他曾经赞同过的政治民主和联合政府而言，蒋介石的存在以及保持中国的稳定对美国的利益更是第一位的。因此，赫尔利在刚刚取得了新任驻华大使职位之后，很快就致电美国国务卿，要求确认他的主要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43]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地位稳固和根本解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赫尔利费尽心思地设想了一个用所谓战时内阁来换取中共交出军队的连环计。经过赫尔利的反复劝告，蒋介石终于在 1945 年元旦发表了一个堂而皇之的文告，公开宣布，他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而后，国民党中央决定了新的三项办法，准

备在行政院以下设置具有战时内阁性质之机构作为行政院决策之机关，延请中共及其他党派之人士参加其中。以此为条件，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不过在形式上指派国共及美国军官各一人负责中共军队的指挥、改编及军事补给等事，以美国军官为总指挥官，直接向蒋介石负责。[44]

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让步之后，赫尔利相信他又有了与中共方面讨价还价的资本了。他一面致电罗斯福，声称只要能够进一步确认苏联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就不难把共产党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来；一面再次于 1 月 7 日致函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允许他与国民党代表一同前往延安重开谈判。[45]而在蒋介石公开表示战争结束之前准备召集国民大会，"还政于民"之后，中共中央也不能不急谋对付。毛泽东因此明确表示同意派周恩来再度前往重庆，前提是国民党应同意"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中共中央此举旨在用党派会议反对蒋介石的所谓国民大会，因为，如果让战前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那些国民大会代表来行使"民主权利"，结果丝毫也不会改变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46]

24 日，周恩来再赴重庆。当天，宋子文向周恩来提议行政院下设置由国共及其他党派合组的直属蒋介石的最高决策机构—行政委员会(或曰最高国防委员会)，被周恩来当面拒绝。第二天，赫尔利与宋子文再向周恩来提议国民党正式决定的新的三项办法，又遭周恩来的反对。周 25 日公开发表声明称，此次来渝，就是来与政府及各方面商讨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的，第一步首先应当召开党派会议，以此来作为召开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并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及其实现步骤。"目前全国人民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甚望政府速加采纳。"[47]

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提议，再度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欢迎，甚至国民党内众多高层人物也在私下里对此表示赞成。2 月 2 日，国民党方面不得不开始让步。王世杰当晚向周恩来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仍照国民党所提组织有各党派参加的国防最高委员会，但冠之联合政府的名义；一是同意召开党派会议，但名称应加以改变，并加入无党派人士。周当场表示，不论何种名义，只要是有各党派代表参加，不受国民党干涉，有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能够改组五院和军事委员会的决策机构，共产党就会赞成。至于党派会议问题，最主要的是要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会议名称最好不改，至多也只能改为政治会议。第二天，王世杰又带来国民党方面的新提案，同意召开政治会议，讨论"结束训政与实施宪政之步骤"，"今后施政方针与军事统一之办法"和"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之方式"，前提是这一会议的性质应为"咨询"，会议名称应改为"政治咨询会议"。[48]王世杰并解释说，他们同意"国民党以外党派参加政府"其实就是同意改组政府，只是文字上不便直接表示而已。但是，国民党的这一让步远不是中共中央所希望的。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周恩来，要求他除坚持废除党治外，请着重取缔特务、给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四条，并直告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如这四条不先办到，不能证明废党治行民主不是骗局。[49]

2 月初，苏联红军迫近柏林，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苏联明显地已有可能转过身来参加对日作战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相信美蒋会"急于和我们求得政

治妥协”，因此主张周恩来在成功破坏了蒋介石关于“还政于民”的鼓惑宣传之后，就迅速找理由返回延安，不必就党派会议问题在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周旋。在从收音机中听到美国新闻处电台广播美州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消息后，毛泽东更是断定“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国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不怕他们生气，不怕他们大骂”。[50]鉴于此，周恩来接连会见赫尔利与蒋介石，除坚持党派会议必须讨论结束党治、改组政府和起草共同纲领外，又再度口头提出四项要求。赫尔利虽百般劝说，但不起作用。蒋介石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对开党派会议，声言他只能将政权交还人民，而不能交给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说什么改组政府就是推翻政府，宣称只有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后，人民才有权组党等等。至此，国共谈判再度陷于僵局，周恩来乘机返回延安。想不到，蒋介石于 3 月 1 日竟进一步单方面宣布将于 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毛泽东因此极端反感，提出：国民党既然一意孤行，“国内团结问题的谈判再无转圜余地”。他甚至一面指示各地准备成立具有独立地方政权性质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一面亲自挥笔为新华社写文章，严厉地提出：中国人民应该振作精神，“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城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51]

当然，报纸上的谴责是一回事，实际政策又是一回事。毛泽东明确讲，我们今天对国民党还是洗脸政策，而非砍头政策。这叫“留有余地”，否则会犯政治错误。因此，毛泽东这时为他称之为“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写的报告，仍旧题为《论联合政府》。他明确讲，我们长期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终于找到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没有料到这个口号很快的抓住了群众，这是一个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考虑到战争临近结束，自己的军队还不足 90 万，美苏英等国也把蒋介石的政府视为正统，毛泽东估计这个联合政府多半还会有三种可能，即一是要我们交出军队，蒋介石给我们官做；二是形式上废止一党专政，实际上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三是以我们为中心，我们的军队发展到 150 万以上，人口 1 亿 5 千万以上，那时把政府设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毛泽东明确主张：“我们是准备胜利的”，因此我们要争取第三种前途，“在蒋介石缩小到无联合的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52]

1945 年 4 月 23 日，中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公开宣布：“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他认为，应当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动员全国力量，配合盟军作战。战争结束后，再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十分清楚的是，他这时所主张的未来的联合政府，更多的其实是那种“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他明白宣称：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这个制度应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只不过，它仍然应当是“几个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53]

自 1945 年开始，中共的军事力量增长很快。据 2 月份的统计，其军队人数已由年前的 63 万增加到 70 万以上。而到中共七大召开时，仅两个月时间，其军队人数竟猛增近 20 万，达到 90 余万人。但是，中共这时军事力量还很不集中，根据地相当分散，另外装备也十分欠缺，仅有各种步骑枪约 39 万枝，各种机枪 9 千余挺，迫击炮、掷弹筒等数百架，大炮极少，

更没有坦克、飞机之类的现代装备，与 200 多万正在陆续得到美国装备和训练的国民党军队相比，不仅数量上相差甚多，装备上相差得更远。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上明确讲：必须要“武器加数量”，“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了。可是，现在我们的军队太分散了，根据地人口太少了，“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即使能集中几万人，拿步枪打北平也不行，“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我们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我们集中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条件就不同了”。[54]

除了军事上存在着不利因素之外，这个时候政治形势也出现了新的困难。本来，中共中央对通过美国逼迫蒋介石在政府问题上让步抱有某种期望，七大召开期间却得知赫尔利 4 月初一反常态地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共是中国统一的障碍，过去有关中共作用的说法都是夸大的，美国政府将只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而不同中共合作。[55]这说明，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毛泽东估计“美现在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独霸东方，决不退让”，“不到山穷水尽，不会改变”。由于德国已经战败，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面援助与支持，从而大大加强国民党的力量，毛泽东不能不对战后国内形势开始作种种最坏的准备。据此，中共中央一面再度表示愿意就前此提议的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实施民主改革问题与国民党重开谈判，一面下决心公开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议，以抵制国民党的国民大会。当然，毛泽东告诫说，我们这个代表大会仍旧可能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最好的结果是向着“以我们为中心”的联合政府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可能是经过一段曲折，先是成为以重庆为主的联合政府，即经过独裁加若干民主的形式，然后再变为真正的民主的联合政府。[56]

7 月 4 日，中共中央通过前来延安推动国共谈判的 6 位参政员，再度向国民党表明愿意谈判的立场，即愿意在国民党停止召开国民大会和同意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前提下，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民主的政治会议。[57]随着 8 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盟军最高司令公开发布命令，规定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政府投降，国共两党之间爆发全面内战的危险一度空前加剧。中共中央一面加紧做好应付内战的一切准备，一面又不能不审时度势，再度强调与国民党恢复谈判的必要性。它这时再三向国民党提议：“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58]

形势的发展颇为出人意外。毛泽东始终相信：国共反映美苏，战后中共应该可以背靠苏联来抗拒美蒋，想不到这个时候苏联政府却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承诺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都只给国民政府。不仅如此，苏共中央还专门打电报来，要求毛泽东务必要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绝对不能和国民党打起来。考虑到“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而苏美英关系复杂，都不想打仗，国共两党间全面对抗的条件也不成熟，中共中央于 8 月 23 日正式决定提出包括要求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成立联合政府在内的紧急措施若干条，以便重开谈判。但事实上，中共中央对通过谈判争取联合政府并无任何幻想，毛泽东一面表示，由于美国的干预，“我们现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要准备相当长的时期都是“独裁加若干民主”；一面又说：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多半“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主张作最坏的打算，准备“作城下之盟”，即准备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并准备必要时放弃长江以南的根据地，以便换取成立由自己领导的华北政治委员会，和取得在东北的优势地位。毛泽东就此解释说：

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因为问题决定在美国，倒不决定于蒋介石。[59]

8 月 27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至此，中共中央除在报纸上仍有过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结束党治，成立联合政府的个别宣传之外，在实际政策上已经放弃了关于联合政府的要求。周恩来在谈判开始后不久就明确告诉国民党代表：中共为了两党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已经在政治方面作了重大让步，这包括：第一，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第二，召开党派会议产生联合政府之方式，国民党既认为有推翻政府之顾虑，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党派会议；第三，国民大会之代表，中共主张普选，但国民党既认为不可能，中共虽不能放弃主张，亦不反对参加，现亦未打算在北方另行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60]但是，正如毛泽东曾经估计到的那样，即使放弃联合政府的要求，放弃对长江以南根据地的控制，国民党也还是不能允许共产党取得对华北的自治和在东北占据优势。双方谈来谈去，除了蒋介石许诺可以允许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及国民大会，允许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外，两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并没有得到丝毫的解决。因此，民盟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明确认为，放弃要求结束党治和要求联合政府这种让步形式，是不可取的。他们一再宣称："联合政府是中国和平、团结、统一的唯一途径"。[61]

重庆谈判没有实现中国的和平，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开赴原本为共产党占优势的华北和先行进入的东北地区而愈演愈烈。为了设法阻止苏联利用中国的混乱扩大其势力范围，美国总统杜鲁门于 1945 年底再度决心介入国共冲突，并派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作为自己的特使前来中国调停内战。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明确提议："支持民盟主张，先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去筹备自由普选的国大"。中共中央很快表示赞成。紧接着，杜鲁门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分别发表声明，主张中国废止一党训政，改组政府，容纳全国各党派代表参加，使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共中央乘机重提联合政府的主张，要求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执行各党派代表会议的职权，结束一党专政与改组国民政府"。[62]战后几个月间中共军事力量在华北和东北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使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要求组成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具有了更强有力的资本。

由于有马歇尔的干预，苏联大使的劝告，国共两党终于在 1946 年 1 月 10 日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也于同时召开了。面对美国的压力和中共的强大实力，蒋介石已不能不同意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改组政府的问题了。甚至，国民党提出的"扩大政府组织方案"，试图坚持国民党人必须在政府中占有特定程度多数，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政府委员要由蒋介石提名，和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也因受到中共及民盟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在马歇尔的劝说下，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作出重要让步，同意国民党在政府中的人数不超过一半，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且无须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蒋虽有否决权，但其否决之议案于复议时如有 3/5 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则否决无效，同时，凡重要决议须有 2/3 以上出席委员赞成才能通过。这一结果虽然与中共中央所希望的还"存在着距离"，但无疑打破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因此相信这是"很大胜利"，相信"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并因此正式宣告："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正式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从此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并为此具体拟定了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人员名单，准备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张闻天等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的人选，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个部及不管部的部长人选。[63]

政协决议的达成，国民党被迫同意改组政府，以及中共方面准备走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的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国际上美苏两国相互牵制，国内国共两党力量日趋接近在政治上的反映。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的结束和中共联合政府主张的成功呢?这个问题很快就开始困扰共产党人了。这不仅在于蒋介石于政协会议结束几天之后就开始反悔他所承诺的妥协，密谋推翻政协决议[64]，而且也在于中共领导人对根据政协军事问题决议紧接着将要开始的整军谈判抱以严重的怀疑，担心交出军队是否真能换得政治民主化?2 月 10 日，就在蒋介石扬言不赞成政协决议的当天，重庆国民党特务分子就在较场口对庆祝政协成功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消息传来，毛泽东迅速开始对中共是否应当走法国式道路的问题表明了怀疑的态度。他断言：“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我们不能象法国共产党那样，交出军队到资产阶级的政府里去当部长。因为蒋介石绝不会把他的军队真正国家化，更不会真正实行政治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逃脱，到头来很可能被消灭。[65]

一方面是蒋介石绝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体制，从此拖延和阻挠政府改组工作的进行；一方面是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的独裁本质，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坚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66]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转眼之间就丧失了。蒋介石很快开始发动全面战争，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毛泽东也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较量。这种结果无论在这时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看来，恐怕都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只是，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得到它所盼望已久的种种物质条件，今非昔比。战争的结果，共产党日益强大，而国民党日益衰弱。终于，毛泽东所盼望的那种“以我们为中心”来建立革命的联合政府的前途渐渐出现了。新的“联合政府”注定要成为排除蒋介石国民党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政权。那种曾经被共产党人几乎视为必须经过的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计划，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历史。

----

[1]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85—386 页。

[2] 《毛泽东选集》(竖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53 页；《洛毛致周并告彭任电》，1937 年 3 月 1 日；《苏区党代表大会》，1937 年 5 月；前引《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 429 页。

[3]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 10 月 12－14 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 年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141，167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卷，第 670 页。

[4]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 1 期，1940 年 1 月 15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800，605，677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卷，第 28—30 页。

[5] 《毛泽东致德怀转克农电》，1936 年 1 月 20 日。

[6] 参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四章。

[7] 《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董必武电》，1944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677 页。

[8]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 年 5 月 10 日。

[9] 《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 年 5 月 12 日。

[10] 《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迫问题的二十条意见致林伯渠电》，1944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693—696 页。

[11] 《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谋团的谈话：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944 年 6 月 22 日，《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0 日；《解放日报》(社论)，1944 年 7 月 7 日；毛泽东：《关于时局问题》；《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卷，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12]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意见书与委托林祖涵提的八条口头意见》，1944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702—705 页。

[13] 埃利奥特·罗斯福：《耳闻目睹》，纽约 1946 年版，第 249—250 页。

[14] 《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第 6 卷，第 116—117，120，124—126，132，561，567—569 页。

[15] 《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1944 年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724 页。

[16] 《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80 页。

[17] 《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1944 年 9 月 1 日。

[18] 转见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251—255 页。

[19] 1938 年 1 月，因得到国民党有意拉共产党代表加入政府的消息，共产国际专门电示中共中央：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据此明确决定不参加国民政府。转见《洛毛致朱彭任电》，1938 年 1 月 14 日；《新华日报》，1938 年 1 月 18 日。

[20] 谢伟思 7 月 22 日到延安，四天前，即 7 月 18 日，毛依然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他对外国记者说：我们的政府是国民党政府下属的地方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11 页。

[2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卷，第３２３页。

[22] 见《新华日报》，1944 年 9 月 17 日。

[23] 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第 6 卷，第 573—800 页。

[24] 《董必武关于参政会情况的报告》，1944 年 9 月 24 日。

[25] 见《新华日报》，1944 年 10 月 17 日；1945 年 2 月 13 日；2 月 22 日；《中国民主党派史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1985 年发行，第 121—122 页。

[26] 毛泽东年谱》(中)，第 546—547 页。

[27]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783 页；《毛主席在党校的报告》，1944 年 10 月 25 日，参见《毛泽东年谱》(中)，第 552—553 页。

[28] 党史通讯》，第 20—21 期，1983 年 11 月 5 日。

[29] 赫尔利在 10 月 13 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明确认为，中国目前实际上还是一个独裁国家，有必要将其推向民主道路。并见《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中国卷，第 659 页。

[30] 《毛泽东年谱》(中)，第 552 页。

[31] 《赫尔利带来之五条》，1944 年 10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第 395－396 页。

[32] 该五项协定中另外三条内容分别为：（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重建中国。（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延安协定草案》，1944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第 393－394 页。

[33] 《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第 6 卷，第 699 页；《毛泽东致罗斯福函》，1944 年 11 月 10 日。

[3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 294 页。

[35] 《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第 6 卷，第 697—698 页。

[36] 《周恩来致毛主席电》，1944 年 11 月 29 日。

[37] 《毛泽东年谱》(中)，第 564 页。

[38] 《王若飞致毛、周、董电》，1944 年 12 月 11 日。

[39] 《毛泽东年谱》(中)，第 564—565 页；《毛泽东在董必武报告上的批语》，1944 年 12 月 20 日。

[40] 《解放日报》，1945 年 12 月 16 日。

[41] 《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第 6 卷，第 739—740 页。

[4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 卷，第 432—434 页；《周恩来致赫尔利将军的信》，1944 年 12 月 28 日。

[43] 《中美关系资料》，第 1 辑，第 139 页。

[44]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 294—295 页。

[4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 297—298 页。

[46] 《毛泽东年谱》(中)，第 572 页。

[47] 《周恩来抵渝后的声明》，1945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788 页。

[48] 《国共谈判文献》(三)；《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 302—303 页。

[49] 《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1945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790 页。

[50] 《毛泽东年谱》(中)，第 576，579 页。

[51] 《毛泽东年谱》(中)，第 583 页；《解放日报》，1945 年 3 月 9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803—804 页。

[52] 《毛泽东年谱》(中)，第 586—587 页。

[53] 《毛泽东选集》，第 1056，1062—1063 页。

[54] 《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45 年 4 月 24 日。

[55] 关于赫尔利的这次讲话，延安的《解放日报》于 5 月 8 日作了公开报道，这说明延安得到这一讲话内容的时间应不早于 5 月初。

[56] 《毛泽东年谱》(中)，第 608 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807，

810—813 页。

[57] 《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国民大会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建议》，1945 年 7 月 4 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 814—815 页。

[58]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3，7 页。

[5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249 页；《毛泽东年谱》(下)，第 10—11，14 页。

[60] 关于联合政府的继续宣传问题，自重庆谈判开始后三个月内，仅见于 1945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通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303 页；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 44—45 页。

[61] 《中国民主党派史资料选编》，第 140 页。

[62] 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于 11 月 28 日首先提议美国应促使蒋介石同意召开党派代表会议实行改组政府，他们确信这是消弥中国内部冲突的重要途径。此后，杜鲁门及国务卿贝尔纳斯与马歇尔 12 月 11 日谈话时明确表示赞同这一观点，希望中国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联合的国民政府。《美国外交文件》，1945 年，第 7 卷，第 745—746，767—769 页；《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35，38 页。

[63] 《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 43—45，58—59，70—71 页。

[64]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全集》，第 37 卷，第 333—335 页。

[65]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第 57 页。

[66] 《毛泽东选集》，第 535，1159 页。

中共武装接取苏联援助的一次失败记录

——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的尝试

中国和苏联有着太长的边界，正是这种便利的陆路连接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许多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要想方设法争取苏联的支持。几乎每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都清楚地了解，这种支持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将意味着什么。难怪孙中山先生在苏俄的势力刚刚达到远东地区，就接二连三地开始提出从陆路接通苏俄的设想乃至具体的军事计划（1）。而不论这种援助的方式如何，孙中山、冯玉祥和盛世才经过苏联援助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种援助所具有的几乎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是，在中国，究竟有谁同苏联的关系会比中国共产党来得更密切呢？如果不是孙中山、或者不是冯玉祥，也不是盛世才，而是中共得到这种援助……？然而，在中共历史上到底只有两次大规模接取苏联援助的情况发生：一次是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一次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前一次失败了，历史差一点把中共抛进了灭顶之灾，于是有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可是，假如换个提法：如果中共这一次而不是十年之后取得了成功，那么情况又会怎样呢？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不是南京政府的一统天下，包括张学良在内的诸多地方实力派都在背地里与中共暗通信息，甚至秘密结盟，而他们与中共结盟的公开与否，很大程度上其实正是取决于中共是否能够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一旦这种援助成为事实，有谁能保证他们不会纷纷象张学良那样与中共站在一起呢？

当然，本文并不讨论上述可能性，也不打算说明这一时期中共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李宗仁的桂系、刘湘的川军、以及宋哲元、韩复渠、马占山、甚至阎锡山等各个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秘密联系。本文只打算介绍中共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打通国际路线”的来龙去脉。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多半还只知道一九三六年有个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或风闻中共与个别地方实力派有关系，而不清楚当年的西安事变以及中共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等等，恰恰都与此一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南下”与“北上”之争

中共最早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设想是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份，当时因宁汉决裂武汉政权在军事上开始陷入困难时期，苏联政治总顾问鲍罗廷明确提出应当利用武汉军队继续北伐，占领平津并张家口，从西北接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从而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这一主张自始就被多数激进的共产党人批评为“逃跑主义”。可见，“打通国际路线”的主张，在中共党内，从一开始提出就背上了个不大好的名声。这种情况显然在此后中共与苏联的军事关系上蒙上了一层阴影。直到一九三三年，中共各军事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鄂豫皖苏区才又有过一个向西北发展的计划，再度考虑过在向陕甘扩大苏区的同时，有朝一日接通苏蒙，与苏联打成一片。但此仅计划而已。

重新提到打通国际路线问题，据说是在一九三四年。在张国焘出版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 以靠近外蒙古。（２）

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张所回忆的内容与目前中共保存的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首先，会议并非由毛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而是周恩来。其次，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张闻天，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因此，张在回忆如此不准确的情况下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确实，值得怀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的行动方向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这样一个指示的任何计划，在他们一度所争取过的重新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有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贵州、滇东北、川西，却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３）。

根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份。当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苏联在新疆的影响，故决定向北发展，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４）。随着六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汇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在六月十六日朱德等人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５）。不想，张国焘对此却颇表怀疑。

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我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决一切”。于是就有了两河口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进的北上计划并没有遇到象目前一些中共党史著作中所形容的来自张国焘的反对，当然也不存在象张国焘在回忆中提到的那种争论不休和议而不决的情况。相反，张国焘表现得十分随和圆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过草原，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很大的减员，向南往成都打虽不成问题，但敌人会很容易调集兵力，故“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做具体计划”，“政局应赶快决定迅速的定下”（６）。因此，会议决定“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并迅速弄好具体计划。两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先后拟定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关于向松潘前进的部署》和《关于松潘战役计划》，各部队由此开始了具体的北上作战行动。

两河口会议并没有具体的提出接通苏联的问题，但是其北上方针明显地包含着力图把甘肃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里，背靠西北”，退可依托苏联，进可逐鹿中原的战略设想。只是，要想实现这一战略设想在这时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苏联军事顾问李德明确认为这种作法会给苏联造成麻烦，以至危及苏联安全。更多的人担心“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有退却畏缩之嫌，因此强调北上计划“不是打通苏联，而是向前”，是进攻。张国焘则考虑更多，他对打地方军阀的部队似乎很有信心，但对北上要与蒋介石的中央军胡宗南部交战，却顾虑重重，以致在同意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之后，很快又开始拖延部队行动。七月十日，一方面军已经进至岷江西岸的毛儿盖地区，开始逼近松潘，四方面军主力却迟迟不进。朱德、毛泽东等不得不急电张国焘，称：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各部真能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７）

为迫使张国焘能确实执行北上计划，中共中央于七月十二日经张闻天提议，军委设总司令及总政治委员职，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为军委的总负责者，并由四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和陈昌浩兼前敌部队指挥和政委（８）。部队至此才开始协调行动，实行北上进攻松潘计划。但随后又因各部队严重缺粮，原定七月二十八日各部队到达预定位置的计划再度被打乱，松潘战役计划遂因敌情变化而取消。

松潘战役计划取消后，张国焘再度对是否继续北上发生动摇。加以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之间的团结接连出现问题，中共不得不重新开会统一思想。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举行会议，讨论由张闻天提出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报告进一步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作的北上决定的必要性，并明确地强调了争取西北地区，背靠苏联的意义。

毛泽东在发言中也集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解释了西北地区具有“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等特点之后，特别强调了“苏联在这地区影响大”的问题。他说：

地理上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对我国内战争有很大意义。五次围剿开始堡垒主义，我们对技术方面应很大的作准备。……我们基本上靠自己，但〖应〗得到国际的帮助。……因此要用全力达到战略方针，首先是甘肃这区域，但要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修兵工厂。（９）

张闻天、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和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傅钟等虽未直接反对，但话里话外却明显地表示出不那么赞成。比如说什么不管苏联援助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共党应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不要以为与苏联接近就是要从苏联得到技术帮助；说什么同志们对西北方向讲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数民族问题看成是一个困难；说什么从西北发展到东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决定整个革命问题不能偏向一边，不应限于一种因素，如此等等。很显然，张国焘等人对北上方针实际上并不同意，但他们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数，一时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对，因此说起话来只好含糊其辞。结果，会议通过了张闻天的报告，而张国焘又在会后提出了避开北面胡宗南部，西去青海、宁夏和新疆的主张。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制定了新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和《夏洮战役计划》，明确批评张国焘的西进青、新、宁的方针“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客观上正适合于敌人的要求”，因而坚持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战役行动。但既然张国焘等人内心不赞成北上，其领导下的四方面军又人多枪多，张又在名义上是军委总负责者，部队调动指挥及其具体军事行动仍不免多方制肘。当九月初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军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之后，张国焘终于以缺粮和部队不能徒涉葛曲河等理由下令其率领下的左路军离开北上路线，西进阿坝地区，不走了。九月八日，张更避开中央，下令正在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回头南返。至此，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势不可免。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获张八日电令后，当晚即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包括陈昌浩、徐向前在内的政治局成员扩大会，提出反对意见。但张九日再电坚持原令之后，陈即改变态度准备执行南下命令。不得已，在右路军的几个中共中央常委于十日讨论并制定了紧急对策：

（一）致电张国焘，说明“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二）以周恩来改任右路军指挥，并秘密下令一方面军主力连夜北上。

（三）指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于日内尾随一方面军主力后前进。

（四）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挨冻，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１０）

然而，中共中央摆脱张国焘四方面军的制肘，率一方面军主力一、三两个军单独北上，情形

也并不乐观。因为这时整个一方面军和中共中央，作战部队很少，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四千余人，重新编制后的部队只有六个团的战斗部队，而实际的兵力其实只是六个营。以这样少的兵力，要想实现原定的北上在川陕甘乃至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都是很少可能性的。尽管李德建议看个把月结果再定方针，不一定要到蒙古去，但在九月十二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显然都同意毛泽东所提出的行动方针，即：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１１）

在从最初撤出江西苏区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几千人之后，每一个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领导人都明白，现在这种形势对于他们将意味着什么。彭德怀估计：改编后的部队，在进攻作战中一个团只可以对付国民党军的一个营，这也就是说，对付国民党军，全部红军力量只能与其两个团的兵力作战。这自然“要谨慎，不能冒险”。因为国民党军队可以调动的兵力有几十个师，而红军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就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以至成为瓮中之鳖，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够通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自然就可能保存这几百名干部和几千名战士，将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

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９月１２日，中共最终确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并开始具体实施了。他们不再等待张国焘的四方面军，由俄界兼程北上，于六天后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占哈达铺，进而抢渡渭河，锋芒直向外蒙。

斯大林的支持与东征战役

如上所述，“打通国际路线”方针的确定，在中共中央这时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在历经一年之久的长途征战、大量减员、冻饿累病之后，红军必须找到一个立脚点切切实实地喘口气了。而如今，奔走了两万多里，损失了将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员，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停下脚来。形势异常危急，就连一向反对红军接近苏蒙边界的李德也犹豫起来了，难道他能够眼睁睁的看着中共中央得不到保护，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追堵截中被打散被消灭？其实，在人们的谈话中间，可以看出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苏联是不是真的会直接援助自己，是不是愿意自己在苏蒙边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他们只是相信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苏联没有理由拒绝帮助自己。但他们也了解，这种贸然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正因为如此，当九月下旬他们了解到陕北存在着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之后，他们迅速召开常委会议，又决定改变打到苏蒙边界去的方针，以陕北苏区为自己的立脚点，以后再派一支队打通国际路线，争取援助。十月中旬，红军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可以停下来歇歇脚了。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支队去接通国际联系求得技术帮助，仍旧是党的主要任务之一，但目前条件还不具备。这样，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又中止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为传达共产国际的关于抗日反蒋策略方针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苏区。林传达

了一九三五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有关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重要意图，这包括（一）实行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的基本的策略方针；（二）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统一战线的最广泛和最高的形式；（三）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四）改变富农政策。与此同时，林还特别说明了斯大林对红军发展方向的建议，即：

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

斯大林同意中国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打通国际路线。这对于将近一年来极端渴望得到苏联援助，但又对打通苏联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令人高度兴奋的消息。张闻天当即于二十日和二十五日接连写信给在前线的毛泽东等人，主张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迅速准备经宁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术援助并建立更加巩固的战略根据地。显然，考虑到这时的陕北苏区只有安塞、赤安、瓦窑堡三个县的中心区，其余都是与敌犬牙交错的游击区，而红军兵力自入甘南向陕北开进以来又骤减一千五百人以上，此时与陕北红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六千人左右，仅陕北地区的各种国民党部队就有数万人，张闻天等对坚持陕北根据地并不十分乐观。他们相信，迅速取得苏联援助将会对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但作为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却有另外的看法。他们同样对红军突破腊子口以后人数锐减感到吃惊，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加注意到长途跋涉给部队带来的严重损害，更加看重根据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义。因此，毛泽东明确认为当前最紧要的是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在十二月一日毛给张闻天的复信中他这样解释了这个问题：

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去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开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１２）

对于扩大红军的信心是这些军事领导人从与正在围剿他们的张学良东北军的作战中得来的。最初他们估计以红军的现有兵力，最多只能对付国民党几个团，因此，到陕北后，他们提出的最初的扩红计划也只不过是一千二百人。但十一月下旬与东北军初次正式交手，就以两千人之数一举歼其一０九师全部和一０六师两个团，毙伤俘获达六千人之众，仅师以下各级军官就达数百人。这显然使红军指挥员大受鼓舞，并对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开始充满信心。因此，打通国际路线在他们看来，一时变得不是那么紧迫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军事会议，毛泽东作军事问题的报告。同时提出打通苏联与巩固和扩大苏区问题，主张：“打通苏联是中心口号，与巩固和扩大苏区联系起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将此一目标分三个步骤来实现，即：第一步，在陕西扩大红军，巩固苏区，准备东征；第二步，进攻山西西部，击破晋军主力，进一步扩大红军，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第三步，转进绥远，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线。按照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打通苏联只是计划中的第三步，而最终能否实现尚要看已经进抵热察和平津一线的日本军队是否会进入绥远而定。也就是说，毛事实上仍旧把巩固和扩大苏区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打通苏联放在了第二位。但在会议上，多数与会者实际上并不这样主张，他们力主把打通苏联放在第一

位，至少也应把二者并列起来。因此，在决议的行文上，毛泽东对于打通国际路线与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关系问题并没有予以严格的说明，而是把前者规定为最终目标，结果决议所规定的整个一九三六的三步作战计划实际上变成以打通国际路线为中心任务了。这样一来，部分军事领导人乃至地方领导人自然要表示怀疑。

一九三六年一月，红军主力开始受命移师黄河东岸，中共政治局亦随军行动，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数地方红军和游击队保卫苏区，东征战役即将开始。由于相信这一军事行动的基本目的在于打通苏联，因而有使红军再度脱离苏区根据地的危险，彭德怀等相继致电中央表示不安。彭德怀于二十四、二十六和三十日接连致电中央，强调“巩固的发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则上不应有所改变，但目前行动步骤上我已感觉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因为：

陕北苏区是中国目前第一个大苏区，是反蒋抗日有利的领域，是全国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块最高的旗帜，应以如何手段使之巩固扩大，如红军行动有脱离这个苏区危险性可能时，都是不正确的。……战略上佯攻调回孙李，求得肃清残敌巩固基本苏区与外蒙更加接近，这是正确的，但须估计到河东堡垒及阎敌各种防范，并须保障能渡回的技术。（１４）

李德此时亦上书中共中央，主张慎重考虑力量对比，因为“我们有一万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战士和三千新的俘虏兵”，“敌人阎锡山一个就有八万人”，特别是：

同苏联的联系不应当作为自己的主要战略目的，战略上的联系应当看作配合行动（在苏日战争爆发的前后一个样），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我们应当从我们的战略计划取消向绥远先机接近外蒙的条文。……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１５）

甚至，留守陕北苏区的周恩来与博古等也对原定之战略方针应改变表示赞同，只是，他们并不认为以打通国际路线的为中心任务是错误的，他们感到怀疑的同样是东征是否符合红军目前的利益。周、博电称：

战略总方针下应将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及打通苏联并非平行，而是联系着的。中心任务应以扩大赤区服从于打通苏联。……打通苏联我们认为不是一个单独的技术问题，这包含整个党的政治任务及战略总方针之实现问题。而且也不应解释为单纯的技术条件之取得。一方面，将我们的战线靠拢与联接起来；另一方面在敌人后方开展我们的战线，这是万分重要的事。因此，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与游击区，更成为急迫万分的事。（１５）

根据各方面的提议，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变更原定计划的设想。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中共中央此时的总负责人张闻天，这时开始注意到：“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原定的“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将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之首也是“不对的”。因此，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与军事负责人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重新讨论了战略方针，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原定的第三步骤被取消，一九三六年的军事行动仅以扩大苏区和红军为目的，东征山西的作战在保证回渡黄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则继续准备实施，全部作战“着重在巩固的发展，反对冒进与脱离现有根据地的危险”（１６）。但与此同时，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势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军之间起调解作用，故中共中央这时特地通知张国焘斯大林的建议，希望四方面军和在云贵交界处的红军二方面军立即设法

北上，共同实现打通苏联的任务。其二月十四日电称：

关于战略方针弟等有如下意见：……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过一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真正成为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１７）

二月二十日，红军发动了东征战役。到三月初已击溃或歼灭阎锡山部五个团，俘虏一千二百余人。一个月后，红军更打败阎部达十九个团之多，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并占领了同浦路之一段。于是，人们对于东征可能带来的危险的担心迅速消失，中共中央对军事形势的估计重又乐观起来了。3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得到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张闻天再度提出："东征并不取消打通国际路线"，只是打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仍公开的讲需要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毛泽东亦明确表示应当坚持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下决心与苏联打成一片，在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条件下，不要怕对苏联不利。他说：

中国红军与苏联靠拢，对红军帮助很大，即根本取消技术帮助，只讲政治帮助亦是大的。而苏联亦得帮助。

据此，毛泽东已经开始具体考虑与苏联方面建立密切的军事关系，这包括：

（１）对日作战彼我双方之共同步骤问题；

（２）两军委通信联络问题；

（３）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４）技术问题，能否接济步枪、步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步兵炮、新式架桥设备、无线电器材，如可接济，我军在秋天全部开赴绥远接运一次至二次。

（５）人的帮助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１８）

东征的成功使毛泽东等人已经改变了对于过去所说的“打通”的概念。过去说“打通”，是因为过去红军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与苏联联成一片的大规模的根据地，而今天这种可能性似乎出现了。毛泽东批评那些对实现这一设想表示怀疑的干部是对革命形势和对战略任务了解不足，他指出：现在红军的任务是

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在此根据地内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将此根据地与外蒙连接，与苏联打通。（１９）

但是，中共中央的估计过于乐观了。随着南京方面急调汤恩伯等部进入山西，原来与红军作战的二十多个团很快增加到五十个团之多，东征山西的红军被迫转入防御。而陕西方面张学良、杨虎城等部约十五个师在蒋令下也被迫向陕北苏区推进，并迅速切断了陕北与关中的交

通，使得留在陕北苏区的四个团和几个独立营难以招架。至四月下旬，形势已经根本变得对中共不利，在山西及华北几省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已经无从实现，整个东征作战方针不得不根本改变。五月初，红军全部撤回陕北，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了。

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与西征战役

五月八日，中共再度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由于这时中共已经说服张学良转而支持中共的抗日反蒋方针，红军与东北军首领的统一战线关系已经秘密确立，双方并且约定了寻求苏联支持的具体方法。加上这时中共已经先后与杨虎城、高桂滋等西北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秘密联系，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自然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推进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局面的重要时机。因此，毛泽东在报告中具体提出了“为西北国防政府斗争”的政治任务，准备推动张学良和东北军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并和外蒙一样联合宁夏、新疆与苏联结成抗日反蒋的联盟。正是在这次会上，中共中央初步确定了向西发展的计划。

四天后，周恩来应张学良之邀于四月九日初次会见之后再度前往延安与之秘密会谈，双方共同商讨了实行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并基本商定以兰州为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大本营，以张为西北国防政府主席和抗日联军总司令，和东北军协助红军打通国际路线。至此，“西北大联合计划”初具端倪。

五月十八日，中共制定《西征战役计划》，决定全力向西发展，一方面在陕甘宁边扩展根据地，一方面相机夺取宁夏，以便打通国际路线。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四方面军及二方面军通报了这一计划的要旨，并要求他们立即北上：

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２０）

随着六月初两广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明显感到“西北政府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２１）。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了组织和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的的工作。六月十六日，中共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获得成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第一封电报就明确提出了“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电称：

为了策应两广及华北的局面，西北的发动决定提早，发动的时机拟在两个月内，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大体以红军一方面军经于甘北，二四方面军经于甘南，以东北军一部入兰州，解决朱绍良并控制兰州到哈密要道。（２２）

电报同时要求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和军火的援助。毫无疑问，西北的发动，“国际的援助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一条件，不仅张学良东北军将缺乏信心，即使发动成功，十多万军队粮饷弹药也将难以为继。因此，毛泽东特别告诫说：无论如何，“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

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都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提出了打通国际路线的道路和时机问题，指出：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部；一是甘凉肃三州。时机一是夏秋，一是冬季”，“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２３）。

然而，时机转瞬即逝。就在中共全力以赴地准备八月左右发动西北地区抗日反蒋大联合，以响应两广反蒋事变之际，两广事变迅速失败了。两广的失败，使西北的发动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而打通苏联接取援助更加成为整个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因此，八月十日，当中共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关于应当以南京政府为统一战线主要对手的指示时，他们并没有理解共产国际这一指示的真正涵义。相反，他们仍旧准备继续实施西北大联合计划，并首先实现打通苏联的设想。在他们给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中，关于这一军事计划有着十分具体的说明。电报说：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有如下的建议：

一、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二、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隔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之。

三、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于学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控制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洲马步芳家乡，目的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转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径入于甲军之手。再消灭青马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２４）

在共产国际考虑到应该以南京政府为统一战线主要对手的情况下，继续准备实施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是否仍有可能呢？八月十五日，共产国际发来关于策略转变的重要政治指示，明确要求中共放弃前此实行的抗日反蒋方针，改行逼蒋和联蒋抗日的方针，这一指示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共关于在西北建立由各抗日反蒋势力组成的与南京政府对立的国防政府的计划。

从八月下旬开始，中共迅速开始按照共产国际的新的策略展开对南京方面的统战工作，并通知张学良予以支持和配合。但是，取消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和转而以南京为统战的主要对手，并不意味着中共的生存和发展从此不再受到威胁。南京与中共之间为寻求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办法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秘密接触和商谈，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差甚远，任何一方又都不愿降低自己的条件，因此国民党军队仍旧随时可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与围剿。与各反蒋派别的秘密接触与结盟虽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包括张学良在内，各派均十分重视中共背后苏联的作用，没有苏联方面的出面支持也不敢轻易与中共站在一起，因此一旦大战发生，红军势将孤立无援。与此同时，红军所在之陕北及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匮乏，非向外发展和战争，兵员补充和物资供给都不能持久。而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太大，加之对外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接连不断的扩张和战争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无论是战是和，要想保持中共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仍旧必须寻求苏联的直接帮助。为此，当共产国际改变统战策略的政治指示刚一到达，中共中央当即意识到问题之严重，于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不得不联名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正式给予援助。其电文扼要如下：

一、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且北不出宁夏，东不出山西，亦无红军活动之余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

二、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进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的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如此，（甲）将被迫放弃现有陕甘宁苏区，（乙）红军发展方向不是与日本进攻方向迎头，而是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丙）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用此时机截断中苏关系的可能；

三、我们所希望的地区为青海、甘西、宁夏至绥远一带，我们除在九月以下三个月中加紧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求得在一般基础上要求他承认划出红军所希望的防地外，还须解决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因为即使蒋承认红军占领这个地带（这个可能是极大的），也不见得能使这一地带的土著统治者自动的让出其防地（这个可能是很少的）；

四、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在时机上进取这一地带仅能利用冬季黄河结冰之时，但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

五、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先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丙）以二方面军位于甘南，建立苏区，并使之与陕甘苏区相联系；

六、以上是基于今冬至明年以占领黄河以西为基本方针之作战计划，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有关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如果苏联不赞成目前直接援助之方针，而我们与南京之谈判不能及时成立协定，或协定中不能达到使宁夏甘西土著统治者自动让防

之程度，或红军久攻不克结冰渡河时机又已过去，则我们只好决定作黄河以东之计划，把三个方面军之发展方向放在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２５）

中共中央的电报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担心之所在，形势看起来对红军相当不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那么从生存角度考虑，红军必须要向内地发展，结果自然是内战，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的要求以及国内和平与一致抗日的局面，统统都将成为泡影。苏联方面显然不会希望发生这种情况。九月十一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取得斯大林的支持后，致电中共中央：

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２６）

这无疑是一个让中共盼望已久的鼓舞人心的好消息。然而问题是，共产国际的来电打乱了中共中央原来的部署。根据原部署，红军应分兵进攻宁夏和甘西地区，并且是在国共两党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协议的情况下，即不存在来自南京军队的拦截与进攻。但人们这时显然对这个姗姗来迟的援助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他们对于来自南京军队的威胁没有作出象他们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所作的那种多少有些保守的估计，何况现在可以全力以赴地攻取宁夏了。在这几乎是千载一时的机会面前，他们无论如何必须排除那些已经存在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开始行动了。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先后通知一、二、四方面军：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预望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

（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西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部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电报特别说明："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箝制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２７）随即，中共中央提出了组织"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要求二、四方面军全力北上，与一方面军合力夺取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至此，"打通国际路线"的方针终于开始具体实施了。

宁夏战役的发动与失利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红军一方面军全部二万一千余人除少数配合约五千地方部队守卫陕北甘北苏区外，其余二十七个团约一万八千人全部集中于盐池、定边至同心、豫旺堡一线，向南推进。二、四方面军三十七个团约五万六千人已进至甘肃中部的通渭、陇西一线，集力向北。这时，国民党军除甘南有三十余团三万余人尾随于二、四方面军之后外，甘北有九十一个团大约十四万人的兵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之间的平凉、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及西兰大道一带，和与红军一方面军平行之海原、同心、中宁、金积、灵武一线。而南京方面由长沙等地调援西北主持围剿的胡宗南部三十二个团约五万余人，则已先后入陕并陆续西运黄河东岸和静宁、会宁、定西地区。加上土著军阀马鸿宾、马鸿逵布署在黄河两岸的大约二十个团的兵力，红军主力这时至少面对着将近四倍以上的敌人。所幸在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中间有约四十个团的兵力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红军主力之会合一般已经不成问题。只是胡宗南部之到来颇让中共中央感到担心，由于张学良与红军的结盟在东北军中并未完全公开化，多数部队并不了解，一旦胡部主力楔入，张学良在军事调动上与红军的配合将变得十分困难甚至将成为不可能，如此，不仅红军会合行动受到箝制，尤其是打通国际路线的计划将大受威胁。为此，毛泽东等再三电告张国焘等：四方面军主力宜在两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其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两三天内控制此地，红军有被切断之虞。“机不可失，千祈留意”（２８）。为确保无虞，中共中央同时命令第一师迅速向界石铺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由于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因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和其后另立中央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实际上还未得到解决，张国焘对于三个方面军的会合仍旧有所犹豫，而对以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与胡宗南作战，同样颇多顾虑。特别是为等到十二月黄河冰冻保证一方面军渡河，四方面军将不得不在西兰大道这一交通线上几面受敌，与超出自己几倍的胡宗南等部鏖战两个月之久，其结果颇想象。为此，张对夺取宁夏的方针和静会战役的计划，都有所怀疑。九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等，一连提出八个问题：

一、向宁夏及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甘肃抑在宁夏？

二、如我军攻宁夏，城仍为敌所占，是否地区狭小不便活动？

三、宁夏通外蒙有那些道路，冬季能否通汽车？

四、衣服单薄之步兵冬季能否通过？宁夏到西部须多少天？

五、不结冰你们有无办法造船过河？造船速度如何？

六、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箝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顺利渡过黄河？黄河何时在何段结冰？

七、如四方面军经河州附近过河抢占永谋，箝制兰州，是否便利一方面军转移宁夏和甘肃西部？

八、陕甘北粮食能供一四方面军吃多少时间？（２９）

对此，毛泽东等答复称：

一、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说甘西。

二、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三、外蒙宁夏间有许多路通汽车，过去苏联即从这些路接济冯玉祥。

四、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且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待明年春暖后再行攻打甘西，同时我们将为你们制备一批冬衣。

五、攻宁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上均结冰。

六、因马鸿逵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单独攻宁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实占领静会定区域，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全力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特别提醒张国焘注意："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站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拒止胡军把一、四两个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紧迫，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３０）

终于，张国焘在一阵犹豫后，在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会议上赞同了实施静会战役的计划，"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间开进，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迎击胡部为目的"（３１）。鉴于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中共中央立即根据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提议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与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组织军委主席团，集中于同心城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的军事行动（３２）。不料，张国焘与陈昌浩于九月二十日赴前线了解敌情和地理条件后，再度改变主张，认定照中央方案与一方面军会合，将使四方面军背腹受敌，陷于严重困境，故下决心单独西进甘北黄河以东地区，与一方面军形成犄角之势，确保四方面军安全。其九月二十二日电大要如下：

一、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力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二、宁夏地区狭小，一、四方面军集中宁夏不免后有黄河沙漠之险，前有敌人封锁，如在该地区作战，须停留六个月，物质补充不便，万一决战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敌人时，则将陷红军于不利地区。

三、为迅速实现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的战略方针，和实现全国红军大会合目的，我们提议：

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并抢占永登、红城子一带地区，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两个军暂留漳县一带吸引胡敌，然后三个也全部转进凉州、永登一带，以一部向静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由靖远宁夏段渡过黄河。（３３）

随即，张国焘下令四方面军立即开始准备西渡黄河，正在北上的部队主力当即转向西进。在胡宗南部源源而至，国民党军已经形成强大优势力量的情况下，此举自然置准备很快进攻宁夏的一方面军于孤军奋战的不利地位。因为一方面军为坚守盐池、豫旺一线和准备照原计划占领海固地区转攻金积、灵武，进而进攻宁夏，所要对付之敌仅马鸿逵部即有二十余团两万余人，且据有坚固城寨，加上汤恩伯、何柱国等约三十个团直接威胁其东北和西北两侧，他们已经很少有力量能够顾及其南面新增之胡宗南，而事实上张国焘的计划中留在西兰大道附近吸引敌人的两个军也只是暂时性质，其军力与胡宗南部相比，也起不到真正的阻遏作用。因此，中共中央极为担心即将展开的宁夏战役因此受阻。为此，他们决定改变原定计划之第一步，以主力南下，先以三个方面军之力打击胡宗南部，使之不能形成威胁。进而，他们又告以胡宗南部在咸阳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二方面军均将前后策应，但张国焘仍旧反复去电，坚持认为西渡黄河有充足理由，并断言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即可接通外蒙新疆，吸引胡军，打乱敌军堵截计划，又可东西两面夹击黄河两岸宁夏段之敌，顺利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防止红军陷于狭小地境被强敌所制。且张国焘相信，如此行动，一、四方面军至多一个月也就能在靖远、中卫附近会合了。因此，他反要中共中央“勿使全党全军对会合失望”（３４）。

不过，西渡计划毕竟与国际指示从宁夏提供援助和反对红军进入新疆的意见相左，而中共中央又早已同共产国际发生了正式关系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承认，再度分庭抗礼，已不合时宜，万一发生严重后果，张国焘更是难逃其咎。因此，思前想后，张国焘终于不敢独断独行，其一方面坚持已见，擅行西进，另一方面则又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天，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３５）

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３６）

既然张国焘表示愿意按照中央命令行事，中共中央自然不再取协商态度，决断断行，于九月二十七日下达命令如下：

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３７）

时至于此，张国焘不能不表示“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并于二十九日制定“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决心

迅速进到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堡地区，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敌一部，巩固扩大甘陕宁抗日根据地，争取抗日友军，拥护外蒙苏联为目的。（３８）

九月二十七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通知苏联只能从外蒙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定远营前伸至外蒙边境接取物资。十月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明确提出需要飞机、大炮等各种武器物资的清单，同时再度说明了红军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通过宁夏接取援助的困难，要求苏蒙军队帮助运送和保护尽可能的深入到中国境内来，以确保红军能够接运成功。但十八日，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

你们对于你们实际上所能得到的给予你们的帮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确，我们……负责供给一百五十辆汽车，并保证提供司机和所需的汽油，以便来回两次将货物运送到你们指定的地点。但货物并不象你们二日来电所要求的那样多，它大约有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重左右，其中没有飞机和重炮。……（并且）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　　（３）

不管苏联方面对于运送援助物资的方式和数量与中共中央的想法有多少不同，自从共产国际九月二十七日确定从定远营方向提供援供之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改变原定十二月待黄河冰冻之后再攻取宁夏的计划了。在三个方面军都已经集中到甘北黄河以东狭小的地区来以后，要想持续抵抗数倍于已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达两三个月之久，无论从作战角度、粮食等后勤供应角度，还是从与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那样做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对于张国焘所担心的一旦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向宁夏和甘西行动的意图大明，国民党军将全力围堵并构成严密封锁的情况，中共中央这时也已经注意到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下决心提早举行进攻宁夏的战役行动，不等黄河冰冻，立即造船渡河。

十月三日，四方面军遗失“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张国焘决定改变原定行动部署，主张除继续下令部队兼程赶至在一方面军控制下之会宁、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会合外，应立即以四方面军主力进占黄河东岸之静远地区，抢占渡口，争取渡河，避免与胡敌决战。中共中央迅速同意了这一建议，只是要求四方面军“在甘谷、庄浪一线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敌”，并接防会宁、界石铺，以便一方面军前锋转置隆德、静宁以北和固原以南地区，防堵固原、平凉之敌，避免被国民党军切断后路（４０）。

十月八日，国民党方面在得到四方面军遗失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之后，拟定了“通渭会战计划”，准备各部队分别从秦安、陇县、陇西、定西进击，并在平凉、静宁、庄浪、固原防堵，决心与红军主力决战。此一计划因东北军各部受命拖延推进时间，并未能对红军四方面军北进形成任何阻碍。至十月中旬，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三十军已经进抵靖远及打拉池一带，并业已准备二十日开始渡河。

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决定开始实施宁夏战役。其部署大体如下：

一、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十一月一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其主力在通渭、马营镇、静宁和会宁地区就地休整，并派支队进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之敌，争取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二、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镇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后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

地区，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以北之防御任务。

三、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之枢纽地段豫旺堡于手中。

四、攻宁部队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攻宁时间依造船情况而定，至迟不得超过十一月十日。

尽管作战纲要提议三个方面主力利用现有条件进行必要的休整，以便准备攻宁，四方面军此时却并无任何休整之条件了。由于红军这时渡河意图已明，蒋介石急令西兰大道一线之胡宗南等部北进，固、平、陇一线的东北军西进。随后，他又亲赴西安，严令各部三面出击，要求于短期内聚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勿任窜过”。蒋甚至还亲飞兰州督战。一时间，国民党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四方面所在的静宁、通渭、会宁地区猛进，战争全面展开，至二十三日，国民党方面已经占领了华家堡、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西兰大道已失。形势转瞬间即变得对红军极端不利。据此，朱德、张国焘于二十三日下令四方面军之三十军立即渡河，九军跟进。二十四日晚，三十军渡河成功，二十五日，九军跟进，接着，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也于二十六日过河。宁夏战役就此展开。

渡河行动开始的当日，即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就紧急致电共产国际，要求苏方立即准备实施援助计划。毛泽东等并指示在打拉池前线就地指挥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渡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４１）。但因胡宗南部推进快，威胁大，张国焘又积极主张四方面军渡河避战，彭德怀于二十五日提议首先集中四方面军全部及一方面军之四师在郭城驿打击胡宗南之一路，并争取以一方面军进占定远营。毛泽东于次日同意彭关于集中在河东岸的四方面军以打击胡宗南为中心的考虑，但指出：张国焘的关键是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而目前则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故同意以四方面军之四、五、三十一军和二方面军全力打胡，惟仍应以已经渡河的九军占领定远营，因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不失时机”（４２）。

二十七日，朱德、张国焘和彭德怀商定，先以四方面军河东之四军、三十一军集中郭城驿一带准备诱歼胡宗南轻敌冒进之先头部队。二十八日，朱、张并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脱离四方面军建制，直接归红军总部和前线总指挥彭德怀指挥。当日，根据河西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朱德和张国焘又建议三十一军仍应渡河，因为以四军、三十一军两军很难保证完成击破胡敌的任务，不如以一个军担任牵制，另一个军过河以加强河西之力，争取“在十一月十日前，四方面军主力能达到占领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之目的”。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对此表示同意。但因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坚持三十一军应留在河东参加作战，军委遂又于三十日电令三十一军停止西渡，在河作战，“胜利后直由中卫渡河”。毛泽东并特别强调：“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把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４３）。十月三十日，朱、张遵令执行。同日，因胡敌逼进打拉池，留守河东看护渡船的五军被迫随船西渡。次日，国民党部队推进到郭城驿、大卢子地区，并控制了靖远附近的河岸。至此，红军渡河攻取宁夏的行动被迫中止，河西与河东的部队被切为两段。战争形势对于红军变得更加严重。尽管彭德怀指挥河东前线部队仍旧节节抵抗，寻找机会给国民党军以重大打击，以便再度实施渡河攻取宁夏战役的计划，尽快接取援助。但事实上，由于七万多红军有将近三分之一被截在黄河以西，河东红军力量已经大大削弱，并且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甘北地区陷入国民党军的强大包围，回旋余地越来越小，除非有重大胜利，否则，再度攻取宁夏，将成为不可能。

故毛泽东这时竟不能不致电张学良，请其想方设法使战争停止下来。

就在红军被迫放弃渡河行动的几天之后，中共中央突然意外地收到了共产国际关于改变援助地点的电报，内容扼要如下：

在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坚决认为从外蒙帮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１）在严冬和沙漠的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２）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３）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帮助的方法。同时，我们正在研究经过新疆帮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约一千吨货物运到哈密，你们有无可能占领甘肃西部来接收？并请通知接收办法及你们将采用何种具体方式运输？　　（４４）

苏联方面的突然变卦来得正是时候，如果红军已经经过了重大牺牲夺取了定远营，这封电报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而如今，中共中央的反映是无可奈何的。其复电称：

从哈密输送货物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无用处，这个改变已经迟了。已渡河的红军约两万一千人，可令其向哈密方向前进，但通过五千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并且除非你们用汽车送到安西，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无人烟的沙漠。（４５）

宁夏战役失败了。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明确承认：本来打宁夏就是没有多大把握的，只是过去没有看得这样严重。现在计划失败了，红军必须改变行动方向，以求生存，先南下平凉、泾川、长武、宁县、正宁，然后根据情况再东进山西，或南下河南和湖北，准备在外线作一年左右的长途征战再设法返回西北地区。换言之，为了生存，内战将不可避免地延续下去，而红军又将面临着一次新的长征。当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这一决定。但同时通知后者确实准备援助物资，因为他们将命令河西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４６）。

尾　声

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红军全部南下，并先后通知正在前线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和张学良等。但张学良力劝中共熬过一、二个月，看西北局势变化再定。随后，张极力向南京及蒋介石游说，直至劝说无效，终于在十二月十二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公开与红军及杨虎城的西北军结成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从而迫使南京方面的大规模剿共计划流产，并最终促成了国共两党之间的和平。红军从此在西北立下脚来，南下内地的战争计划因此取消。但是，红军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行动并未因此停止。

还在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已决定将黄河以西部队改称为西路军。随即，红军总部告知西路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速打通远方为要着"。为此，西路军经过苦战于十一月中占领了河西走廊要冲的古浪。但十一月十八日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始终得不到共产国际关于在新疆提供援助的具体答复，担心西路军过早前往新疆，苏联"恐准备不及"，同时也希望西路军能够在甘西建立一块根据地，保持东回和牵制甘北敌军之可能，故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仅派五军前往肃州，其余集中创立根据地。而后，中共中央通知共产国际：西路军已达甘州

地区，正派一部向肃州、安西前进，本月至迟明年一月即可到达安西，“你们政治上物质上援助务请迅速决定，告知我们”（４７）。十二月六日，共产国际终于回电表示：“正采取方法给你们以数量很可观的帮助，第一批货物大约在两个半月内送到你们所指定的地点”。据此，西路军又开始做西进的准备。但是，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南京方面与陕西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位一体一度形成战争状态，中共中央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再度改变西路军的任务，命令西路军改向东进。然而，当西路军准备东进之际，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故中共中央军委又重新要求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一九三七年一月，西路军在西进高台后严重受挫，五军损失两团共三千人。至此，西路军决定东返。二月，西路军被围于倪家营子，经过左突右拼，到三月中旬终于全军覆没。至此，中国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接取援助的尝试完全失败了。

（１）参见拙作：《关于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一期。

（２）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０年版，第二二六页。

（３）分别见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版，第四页；《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我军渡乌江的作战计划》，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关于在川黔滇创造苏区的指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中央军委关于消灭白水曲靖等地敌军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４）《周恩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５）《朱毛周张为建立以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给张徐陈等电》，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６）《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７）《朱毛周关于四方面军北上致张电》，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

（８）《中央军委关于朱德总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朱张周王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组织前敌指挥部决定》，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９）《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

（１０）关于中共中央决定独自率领一方面军主力脱离四方面军紧急北上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较为流行的是多数中共党史书上关于张国焘密令陈昌浩等以武力胁迫中共中央南下，被叶剑英发觉报告毛泽东，毛迅即决心采取此一行动的说法。但考虑到九月十日后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一度十分频繁，双方各陈已见，说明原因，却均未提到密电一事。

而后中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一事件专门会议也丝毫未提及此一密电，故笔者对上述说法表示怀疑。参见《中央致国焘同志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央政治局指令－给陈昌浩、徐向前同志》，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中央致国焘同志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１１）《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与结论》，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１２）《毛泽东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策略问题给洛甫的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１３）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的问题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１４）《彭关于目前反蒋抗日争取统一战线及巩固扩大苏区问题致洛毛周博王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１５）《周、博关于战略方向问题致张、毛、彭等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１６）洛甫：《对夺取三原战略计划的意见》，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１７）《育英、闻天致朱德、国焘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四日。

（１８）《德怀、泽东关于邓发同志去苏联任务致恩来、洛甫并邓发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

（１９）《彭、毛关于形势任务及战略问题给林、聂电》，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

（２０）《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关于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２１）《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德怀关于二四方面军北出甘南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九日。

（２２）《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

（２３）《毛泽东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德怀电》，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致德怀电》，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

（２４）《洛育恩稼怀凯泽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

（２５）《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２６）《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一日。

（２７）《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军事部署问题致朱、张、任三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四日。

（２８）《毛、周、彭致朱、张、任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

（２９）《朱、张、陈致毛、周、彭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

（３０）《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３１）《朱、张、陈致林、毛、洛、周、彭、徐电》，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日。

（３２）《英、洛、恩、博、稼、泽关于组织军委主席团事致朱、张、徐、陈、任贺、刘、关同志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３３）《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３４）《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３５）《朱、张、陈、徐致洛、泽、恩、博等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３６）《朱、张、徐、陈致贺、任、关、肖、刘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３７）《党中央命令－－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并告一二四方面军首长》，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３８）《朱、张、徐、陈关于通庄静会战役计划致英、洛、泽、恩等电》，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３９）《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４０）《毛、周、彭关于同意渡河计划致朱、张、徐、陈电》，一九三六年十月四日。

（４１）《毛、周关于准备袭取定远营事致朱、张、彭电》，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４２）《毛关于打胡取定远营的战略部署致彭电》，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４３）《毛、周关于先打胡敌后攻宁夏致朱、张电》，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

（４４）《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

（４５）《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八日。

（４６）《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４７）《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中共历史上最早的政治运动

——“江浙同乡会”事件始末

这是发生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失败前后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它伤害了很多人，包括一些很有才华的、已经很有名气的共产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第一次“政治运动”－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几乎可以被视做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缩影。然而，它更多的却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

时至今日，知道这件事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为，它当年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留学莫斯科的近千名中国学生的中间。我们今天重新提起它，不仅仅是因为它同样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伤害，同样在中共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沉重阴影，而是因为我们过去对这一事件的了解，差不多都是来自于当年少数亲历人支零破碎、心态各异的回忆，因此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知识，始终也只能是道听途说、影影绰绰，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今，当我们有机会进入前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逐件查阅俄国人保存下来的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文献档案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派别缘起

“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发生，严格说来并不是偶然的，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中国留苏学生中间的某种派别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要搞清楚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的经过，不了解或者忽略中国学生内部之间早期矛盾冲突和派别分歧不谈，是不可能的。

中国学生中间的矛盾是怎样形成的，最初的派别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还要从中共旅莫支部的问题说起。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以前，中国的留苏学生人数有限，最初都是由中共早期组织从国内派送来的，他们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里学习。至 1922 年 12 月，中共旅莫学生中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总共只有十一人。至次年 4 月中国旅欧的学生转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后，党员才增加到二十三人。4 月 28 日，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正式组织了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它从一开始就自行管理，独立于联共（布）党之外，直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行事。第一任书记是由国内派去的中共党员罗亦农，至 1925 年 1 月罗奉调回国，王一飞接任，仅数月也奉调回国。自 1925 年 6 月起，旅莫支部改由从欧洲来的袁庆云、刘伯坚等人负责。

从现有的关于中共旅莫支部的各种资料看来，在 1925 年上半年以前，中共旅莫支部的工作和存在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引人注目的问题。只是就这个旅莫支部的合法性问题上，俄国人和中共之间开始出现了一些分歧。据旅莫支部这时给中共中央的信说：“大学俄国共产党支部委员会决定解散中国学生中早已成立的组织，代之以依照俄国党的原则建立的新的组织。而

我们认为，这种组织结构不利于今后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与相互的合作，我们请求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就此提出异议”。在接到这封信后，陈独秀当即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表示支持旅莫支部的意见。信称：“我们不了解他们那里组织结构的详细情况，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要为学生开设特别的课程，要研究许多中国的特殊问题，新到的学生不懂外俄语等)，我们认为，中国学生需要有特殊的、本民族的组织，这个组织应该在俄共大学党支部的监督和领导之下，在中国学生中进行工作”。陈独秀的信发生了一些作用，旅莫支部被暂时保留下来了。但是，中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由此看出一些端倪。

自 1925 年下半年起，情况开始有些不同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自 1924 年下半年到 1925 年上半年，国内来东方大学学习的党员干部日渐其多，而旅莫支部的负责人却换成了清一色的原旅欧支部的领导人，这些人大部分还是当年同赴法国和比利时勤工俭学的四川同乡。紧接着，1925 年底苏联政府为中国革命开办的中山大学（即孙逸仙大学）正式宣告成立，同时东方大学中国班也开始招收一年级班，总计约数百名学生陆续到达莫斯科，国内来的学生更占绝对多数，其中甚至有相当一批党龄较长，资历较深的中共党的干部，包括中共中央指定带队来莫的俞秀松、董亦湘等人。但是，旅莫支部却没有考虑在新组建的中山大学旅莫支部中发挥这些来自国内的老干部的作用，而是指定同一时间由欧洲转来的原旅欧支部书记任卓宣[1]担任中山大学旅莫支部的组建工作。这个任卓宣同样不依靠来自国内的干部，由他选定的中山大学首届旅莫支部的其他几名负责人，也是他前此在旅欧支部中的亲密同事。这种作法，不可避免地在人数较多的国内来的学生与人数较少的从欧洲转来的学生之间，造成了某种人为的隔阂。其二，1925 年底，旅莫支部由于相信大批国内来俄留学者成份复杂、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涣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2]，根据中共中央必须把留莫学生培养成坚定的革命战士的有关指示，拟定了一个《关于训练工作具体的方针》，明确规定：

“打破家庭乡土民族观念—无产阶级没有家庭地方国家的限制”。

“消灭感情的结合—感情上的结合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我们的感情是党的利益上的”。

“除努力研究外还应注意俄文—绝对不要存先学俄文后研主义的错误观点”。

“始终要绝对的维持团体在行动上的一致”。

“有意见应发表—隐藏意见不发表即是站在团体以外反革命的动机”。

“每次写信不要忘了宣传—宣传是每个共产党人最小限度的义务”。

“对外态度和行动要十分谨慎—泄露团体的秘密即是敌人的侦探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和意志不要处在个人主义和个人意志的地位－－在团体生活意志之下，我们的生活和意志要绝对的团体化群众化，绝对无个人生活和个人自由意志之可言”。

“要严格的批评同志错误，要虚心接受同志的批评—怕批评或不接受批评和不批评同志都非共产党员态度。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要以互相监督的关系(共产党员互相的关系即互相监督)批评同志监督同志—批评是达到培养我们成为铁一般的共产党党员的手段”。

根据这种颇有些极端的“训练”计划，东大和中大的旅莫支部坚持在中共党员和团员学生中贯彻思想改造的原则，强化党内批评制度，甚至鼓励相互之间的揭发批判和打“小报告”。这种作法，更引起过去几乎从未过过集体生活的相当部分青年学生的不满。反对旅莫支部的情绪和斗争很快表面化，在几次支部大会上，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卢贻松等公开与任卓宣等语言冲撞，一些中国学生更是接二连三地致书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求对旅莫支部进行批评。终于，俄国人有了充分的理由，很快出面将这个独异于它的领导之外的中共旅莫支部解散了。

确切地说，在大批国内学生来到莫斯科之后，由中共旅莫支部进行管理的时间并不长。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中国班一年级到 1921 年 12 月底才正式开学，大批中国学生也只是在此之后才开始接受中共旅莫支部的管理，而中共旅莫支部在四个月之后，就因学生反映强烈和它的指导方针与学校相左，被苏共中央明令解散，任卓宣、袁庆云、刘伯坚等也很快回国工作了。因此，一般中国学生与旅莫支部相处的时间，只有这短短的几个月。但旅莫支部的解散，并没有使中国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就此消失。恰恰相反，由于按照苏共组织原则新组织起来，并隶属于苏共区党委的新的校总支部委员会，仍旧主要由前旅欧支部的负责人控制着，无论在东大，还是在中大，学生中间的意见分歧仍没有根本解决。渐渐地，中国学生中间日益开始分裂出两个派别。一派人过去同情旅莫支部的作法，现在拥护新的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反对过去的旅莫支部，现在同样对新的总支部委员会表示不满。只不过，在整个 1926 年乃至 1927 年春，中山大学里虽然存在着明显的派别性质的意见分歧，但这种分歧尚未形成系统，派别界限也不十分明显。

根据规定，东大和中大新成立的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均由俄国人来担任。在中大，新任总支部委员会书记为斯可尼柯夫。由于这个斯可尼柯夫来校不久即与教务处主任阿戈尔产生矛盾，从而很快都介入到中国学生原有的矛盾之中，并利用学生间的这种矛盾各自建立自己的系统，因而使中国学生中这种派别的界限日益明朗化。当然，这种派别的对立和斗争，这时只较多的存在于学生干部之间，即表现在支部委员会系统和教务处系统的学生干部之间。至于多数中国学生，他们既不满意支部委员会动辄上纲上线，继续保持旅莫支部的某些工作方法，又不满意教务处指导下的脱离实际的教学方式，特别是不满意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把持翻译工作，领取高额工资的情况。因此在两派争论中，多数学生的立场并不十分清楚。甚至，他们中许多人最初还往往站在支部委员会一边，要求校方解除俞秀松、董亦湘等人翻译工作，收回发给他们的薪水。

不过，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毕竟更具号召力。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从国内来的担任过高级职务、有过相当革命实践的学员越来越多，学生中不满总支部委员会掌握在毫无革命实践经验的前旅欧支部成员手中的人也就越多，这些人本能地会站在反对旅莫支部所谓“余孽”的斗争的一边；另一方面，旅莫支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早就为多数中国学生深恶痛绝，苏共中央解散旅莫支部，更使多数中国学生确信反对旅莫支部是正确的，因此新组成的支部委员会依旧保持着小团体倾向，而且或多或少地坚持旅莫支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众多学生继续保持一种抵触的、甚至是反抗的心理。特别是将近两年以后，随着中国革命的失败，许多中国学生深恶痛绝的前中山大学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投降了国民党，这似乎更加证明旅莫支部不是好东西，因此反对旅莫支部更是迅速形成一种潮流。最后，就连共产国际也不得不加入到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中来了。在 1928 年 1 月，共产国际曾专门派库秋莫夫来中大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决议。该决议认定旅

莫支部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１）思想方面－－旅莫支部是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产物，同时它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怀疑研究列宁主义的必要，以为列宁主义仅仅是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否认苏联的革命性，断定世界中心已移往中国，怀疑联邦共产党[3]的指导作用；和否认联邦共产党有指导孙大中国共产党员的可能与权利，反对联邦共产党支部及学校校长“官僚式”的指导等等。）

２）组织方面－－旅莫支部是企图组织一个与联邦共产党支部分离的独立的自治的组织。这个组织事实上是与联邦共产党支部并立的第二个党的支部。这个第二个党的（旅莫支部的）内部组织系统，是建立在“小团体式”的组织原则上的。同时，旅莫支部是非常坚决的为反对党的领导的工人化而争斗。

３）教育方面－－旅莫支部对党员的教育是把个人私德的问题提在第一位，因此，对于政治斗争的问题便很少注意。在道德观点上（如对于恋爱的观点），旅莫支部是建筑在禁欲与消极上面的。

４）整个的讲起来，旅莫支部的本身是小资产阶级分子（流氓无产阶级、半手工业者、知识分子与左派士绅等）对党压迫的结果。这些分子只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加入的。

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最初只是乘机将旅莫支部解散，并不十分重视旅莫支部遗留的问题，到1928年1月不得不把旅莫支部问题上升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并上纲上线到如何程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旅莫支部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造成了严重后遗症的问题。只是，到这个时候再来进行严厉判决，为时已晚。因为东大和中大内部部分中国学生干部之间的意见分歧乃至派别之对立，早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

矛盾激化

莫斯科的中国学生之间的派别斗争逐渐激化，是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以后。由于“四一二”事变恰好发生在整个俄国都在热烈欢呼中国革命迅猛发展，莫斯科的中国学生正充满自豪地预言胜利之际，它给广大中国学生心理上所带来的打击，可以想象是极其沉重的。事情很清楚，蒋介石的叛变必将极大地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甚至给中国革命投下失败的阴影，几乎没有人能够成功地解释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自然会在广大中国学生中间造成空前的思想混乱。多数学生不可避免地把失败的责任归结为中国党领导机关的指导错误，而联系到学校工作，许多学生很自然地把总支部委员会视为中国党错误领导的代言人。这种情况同学生中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和派别倾向混合在一起，迅速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派别之争。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以支部系统干部傅钟、李俊哲、张闻天、沈泽民为一方，以教务处系统干部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为一方，双方围绕着许多问题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7年6月24日晚，中山大学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改选校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因中大国民党执监委实际上全在总支部委员会控制之下，俞秀松、董亦湘等基于对总支部委员会国民党工作的不满，当场发难，批评国民党党部对于国内政治问题毫不注意，特别是宣传部的工作完全失败，致使一般党员对中国革命遭受挫折毫无思想准备，思想陷于严重

混乱。对于改选，俞秀松明确表示反对提名自己为国民党执行委员，并根据国民党组织原则拒绝会议组织者要求他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劝告。俞秀松等人的批评态度，自然立即遭到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的坚决反对。他们不仅在大会上进行辨驳，而且于次日联名上书中大联共总支部委员会，强烈要求给予俞秀松等以纪律处分。内称：

１）国民党宣传部的工作，每个同志都知道是在我党指导下工作，……他们攻击宣传工作，无异于在群众中攻击我们的党……；

２）煽动的结果，使前届国民党工作的同志，完全失掉了一般同志的信仰，……破坏了我们造成"左派"、吸收"左派"参加工作的策略；

３）俞秀松同志在国民党内担任工作，系我们党的指派，……他反对他的工作，以民党的"原则"来反对党的"命令"，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务望委员会加以严刻的纠正！

紧接着发生的有关选派学生回国及进入军事学校学习的问题，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关于选送学生进军事学校学习的问题，原本应该是由学校人事与党务两方面来决定。但这时原校长拉狄克因反对派问题被免职，副校长米夫前往中国尚未回来，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阿戈尔同时兼校长职务，一方面大权在握，一方面又忙得不可开交。加上他与学校负责党务的斯哥尼柯夫素来不和，平时工作上一向较多依靠俞秀松、周达明这些教务处领导下的学生干部，而俞秀松等在他与拉狄克等反对派的斗争中，也鼎力相助，态度鲜明，更加赢得他的信任。故在这一重要人事问题上，他不去与总支部委员会商量，而是首先与俞秀松、周达明进行讨论，然后再根据与俞秀松等讨论的结果自行修改补充，最终确定了选送名单。尽管此一名单最后确实是照顾到了方方面面，象支部委员会的几个负责人傅钟、李俊哲等，也都在入选名单上。但因最初名单并未公布，风传甚多，斯哥尼柯夫立即利用此一机会大事煽动，批评阿戈尔宁肯相信俞秀松等普通学生，而不肯相信党的领导，总支部委员会一派人因此愤愤不平。这样，双方的关系更是剑拔弩张。终于，在国民党党员大会刚刚开完不久，两派间的斗争完全公开化了。

7 月初，即在放假前召开的二年级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一些学生就总支部委员会派（简称党委员会派）与教务处派之间的矛盾提出质问，要求二年级支部书记顾谷宜给予说明。顾谷宜就此"作了答复，并说出组织委员吴近与宣传员郭寿华之间的冲突。吴近是党委员会派的，后面有傅钟等，郭寿华是代表教务处派的，后面有顾谷宜、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文等。他们各方面都提出理由。教务处(派)的理由是：党的指导能力薄弱，……党委会(派)的理由是：党应当指导教务处，而教务处脱离党委员会，无论做什么都不同党部商议。"鉴于冲突已经公开，两派人迅速开始在学生中间进行游说，宣传自己一方的观点。"党派说教务派把教务弄得一塌糊涂，教务派说党派办事无能力，各自宣传，各自煽动"，从学校一直争论到休养所，终于引起苏共区党委的重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连续争论了五天时间。其实，由于党委员会派和教务派两派干部公开争论，而多数学生既不满意于支部委员会，又不满意于学校的教学方式，因此一些人已经开始独树一帜，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大地左右着多数学生情绪的、举足轻重的所谓"第三派"。而在这个五天大会上，由于这一派人首先支持了支部委员会关于应当撤换教务处领导人及部分俄国教员的意见，因而很快促使苏共区委在这场争论中实际上站在了支部委员会一边，宣布阿戈尔以及另外三名俄国教员应当受到批评，并离开中山大学。尽管无论是与会的多数中国学生，还是苏共区委的代表，事实上都不曾把矛头指向教务处派的学生干部，可解除阿戈尔职务本身毕竟是对教务处派的一个沉重打击。

轻而易举地处罚了教务处领导人和俄国教员，党委员会一派人看起来确实是有些乐不可支，他们显然相信多数学生在支持自己。然而事实上，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误以为学生们反对学校教务处主任和部分俄国教员，就是反对俞秀松等人。其实，与党委员会一派人相比，教务处一派人通常与一般学生接触更多，也有人缘一些。更何况，大多数学生没有也不可能忘记总支部委员会同旅莫支部之间所存在的那种藕断丝连的关系。不少人早就在谋划如何把总委员会一派搞下台了。因此，处罚教务处领导人的大会刚刚开完不过一个多星期，所谓第三派人立刻就与教务处一派联起手来。进而，在有苏共区委参加的改选总支部委员会的大会上，斗争的矛头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出人意外地转向了党委员会派。据当事人胡建三事后不久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五天大会之后，群众很快看出党委员会派与旅莫支部有关系，因而又掀起了反对旅莫支部的斗争。他说：

当时反对旅莫支部的理由大概有下面几点：

１、傅钟、李俊哲是旅莫支部的主要人马（他们现在列宁格勒）。

２、傅钟是总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是四川人，而中山大学的重要工作，都是用四川人负担……。只有同乡关系，没有同志关系，这是旅莫支部的表现。

３、张闻天、沈泽民与傅钟、李俊哲等联合，欺骗群众，在群众中宣传煽动，弄得中山大学满城风雨。

说“群众”只在五天大会之后才迅速看出党委员会派与旅莫支部有关，转而又来反对党委员会派，多少让人感到有些牵强。其实，下面两个当事人事后不久描述情况可能更要接近事实一些。通过他们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所谓第三派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们如何能够左右局势。这两个人，一个是王培吾，一位是苏美一，两位都是工人党员，当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据他们说，还在暑假去休养所之前，第三派就已经开始做他们这些中间派的工作了。把教务处派拉下马之后，他们立即就把矛头指向了党委员会派。王培吾讲述说：

一九二七年上学期，中大的党部实在是被一班旅莫支部的余孽所把持着，当时的党部委员是傅钟、李俊哲、左权等；而在教务处方面，也被最坏的分子……如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所把持，两方互争地盘，……这时大半的同志都对他们表示非常大的不满意。同时，恰恰不久前曾有一部分失意的委员想用着这个机会企图复辟，如刘汉清、黎本益、阎玉珍、焦有功、相玉梅、何尚志、余秀女、林登岳、胡建三等。于是他们就四出煽动。一日，刘汉清、黎本益二人在俱乐部找我谈话，说现在有委员会派、教务处派，如何的坏，我们一定要反对他们，将两派都打下台。（中略）总委员会开改选会了，在大会上有一百多人签名谈话。在批评过去工作及旅莫支部余毒的过程中，阎玉梅、刘汉清、焦有功、林登岳、千如常……等，都说由法国来的都是旅莫支部，还有由四川来的都是旅莫支部，理由是由于任卓宣、傅钟是由法国来的，是四川人。同时说凡是怀疑有第三派的人都是旅莫支部的走狗。

苏美一的说法与王培吾略有不同。在他看来，第三派与教务处派在反对党委员会派问题上其实是站在一起的。他也提到：在放假前刘汉清就找过他，说了旅莫支部许多坏处，要他注意“现在我们中山大学还有旅莫支部哩!”而五天大会过后不几天，

我就看见一件最奇怪的使我注意的事，就是被打倒的人忽然就同前几天骂他最 利害的人交头接耳起来。……有很多同志，如林登岳、阎玉珍、焦有功、刘汉清等，到处宣传，……在这种形势之下，就指出了党部的傅钟、吴近是旅莫支部，张闻天、沈泽民也是旅莫支部。……在未开会前我又得到消息，听说群众领袖有个进攻的计划，第一步推主席团；第二步不让党委的人发言，特别是张闻天、沈泽民；第三步要将会场空气掀扬起来。结果他们(的目的)通通都实现了。

应当指出，上述三人讲述这些事情的时间已经到了追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关键时期，他们说明这些情况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三个人的立场也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但他们所讲述的基本情况还是大体一致的。通过他们所讲述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党委员会派和教务处派斗争的结果，并没有给任何一方带来利益。教务处派首先受到压抑，紧接着党委员会派也倒了台。根据当时的记载，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一片混乱，前几天还得意扬扬的总支部委员会一派的人，在这次会议上被压得几乎抬不起头来，会场上的气氛十分激烈。又连着开了三天会，最后苏共区委的代表竟不得不宣布支持多数与会者对上届总支部委员会所做出的指责，宣布撤换前总支部委员会书记斯哥尼柯夫和其他两个从事党务工作的俄国人，并且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张闻天、沈泽民二人给予口头批评，只是他们最终顶住了与会者关于处罚二人的要求，建议将这个问题留给下届总支部委员去考虑。很明显，苏共区委对于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这场斗争的策略，实际上是“和稀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在中大出现的这场斗争，几乎很快地也同样在东大发生了。只不过这一次惊动了苏共中央。但很显然，苏共中央对东大中国学生矛盾斗争的处理方式与结果，与苏共区委对中大问题的处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东大中国学生中的矛盾，与中大如出一辙。虽然东大这时的支部委员会副书记是 1925 年从国内来莫的武胡景，但支部委员会中的其他三人全都是前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即刘明俨、黄士嘉、宗锡钧。由于这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是 1926 年下半年和 1927 年初从国内来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曾在国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干部，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同样对东大支部委员会的组织构成和工作方法看不惯，加上学校的教学内容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学生几乎得不到有关中国党的任何中文文件，而支部领导人及其属下的翻译们则对校方的作法一味袒护，因此支部委员会和部分学员之间不断发生意见分歧乃至矛盾冲突。特别是 1927 年 7 月中国革命失败前后有两百多中国党的干部前来东大参加军事班短训，他们刚刚进行入东大就发觉自己已经完全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脱节，不仅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无法适应，翻译的态度和水平让人不能接受，而且支部委员会竟连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决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决议都不予提供，这种情况迅速激化了东大内部的矛盾。

1927 年十一月底，在一年一度的支部工作年度总结大会上，许多学生尖锐批评党务和教务方面的工作脱离实际，指责支部领导人员从未接触过中国的实际革命斗争，拿着高工资养尊处优，至今奉行的仍是旅莫支部那一套，可支部委员会却反过来批评部分学生中存在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和自由主义倾向。总结大会的风波还未平息，12 月中国广州公社暴动失败，东大年轻学员马员生向学校墙报投搞，题目是《中国革命失败了，我们怎么办？》。在这篇短文中，马员生宣称：“马克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因在巴黎伦敦图书馆仔细研读，才完成马克斯主义。列宁在一九 0 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也是在巴黎图书馆学习了一遍，因此才完成了列宁主义。所以我们应在国内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头颅的时候，硬着头皮读一点书”。支部委员会立即抓住此文大做文章，专门组织了一期墙报，公开称马员生的观点为“取消主义”。

此举再度引发了中国学生之间的意见冲突，以李侠公、朱代杰、鲁易、童庸生等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高级党代表等重要职务的一些学生迅速站出来，严厉批评支部委员会，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旅莫支部残余的口号。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据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介绍，由于“旅莫支部余毒的害处，中国的报纸不给看，秋白的小册子不给看，一切的文件材料不能供给同志们的需要”，加上学校“党内训练和教育工作不积极，弄得同志们愈读愈糊涂，学校教务更是形式的敷衍的（军事班尤甚），无论教材、讲师、翻译，在质量上和数量方面都不能满足一般需要，学校当局执迷不悟，反说是少数人故意煽动捣乱，不去根本改善，反而以消极的高压蒙蔽欺骗应付了事”，东大学生忍无可忍，纷纷上书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提出质询，而军事班百余学生更于 1 月中旬集体示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到第三国际请愿”，弄得共产国际东方部束手无策，不得不请当时正在共产国际总部的向忠发出面调解。经向忠发以中共中央名义劝说之后，示威学生方才退去，同时派出代表正式反映东大中国学生的三条要求，即（１）肃清旅莫支部；（２）改良教育方法，供给中文材料；（３）撤换一切翻译。

结果，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并派工作组到东方大学，调查处理此一事件。因东方大学校方坚持不承认自己工作上的错误，致使委员会的决议未能实行。最后苏共中央解散了特别委员会，直接派人处理此事，其解决办法是：“（一）撤换教务主任，以后注意供给各项材料；（二）党的路线并无所谓机会主义，但在工作上确有缺点和错误，因此党的负责人武胡景、黄士嘉、刘明俨、宗锡钧同志均须调开东大；（三）群众领袖如鲁易、李侠公、马员生、朱代杰、童庸生五位同志亦犯有错误，因此也须调开东大。但结果只是在表面上执行了这椿决议，事实上则完全不似一种处罚，直然是一种奖励。鲁、李、童三同志都送在(往)党的最高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马、朱两同志亦升入列宁学院”。“至于党的负责同志四人，本决定离开东大便送回中国，但……他们还留在苏联”。

节外生枝

在 1927 年暑假之后，包括俞秀松、卢贻松、蒋经国在内的中大二年级学生大多已经毕业离开学校，除少部分留校工作或就读教员班、职员班外，多数学生都被分配到苏联各个军事学校里继续深造。毫无疑问，一些学生在中大期间形成的亲疏关系仍旧继续保持着。这种关系的纽带，有些是建立在同乡关系的基础上的，有些则是同过去在中大时的派别倾向联在一起。显然，正是这种情况的存在为一些人提出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提供了口实。

“江浙同乡会”事件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关于这一点，有必要看一看刚刚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的向忠发 1928 年 7 月 14 日向中共代表团所作的报告。

向忠发是 1927 年 10 月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前来俄国参加 10 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当时他还只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来莫时组织部长李维汉还委托他对留苏中国学生政治及学习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改进意见。在参加过 10 月革命庆祝活动之后，他就前往中大、东大及莫斯科各军校向各校负责人了解中国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学习情况。在与各校负责人座谈的过程中，他第一次得知在中国学生中间存在着派别问题。十一月底，他特别”向此地一位中国同志问，此地中国同志中是不是有派别“。向忠发在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位“中国同志”的名字，但据他说，正是这位“中国同志”明确肯定了这一情况。同时还告诉他说：“有一个江浙同乡会

及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一个秘密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密(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者)，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的分子”。

本来，同乡之间的感情联络，或者同学间经济方面的友情互助，并不值得特别大惊小怪，更不应当当成一件什么了不起的政治事件来追查一番。但这件事同向忠发正在调查的派别问题联系在一起，又得了一个秘密组织的印象，自然立即引起向忠发的高度警觉。他当即告诉这位“中国同志”：“不要告诉别人，每个真(忠)实的党员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交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向忠发又“向东方部去说明这个东西有大的政治意义”。但是，在开始时，此事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和俄共方面的重视。

12 月中旬，向忠发率李震瀛、江浩等前往德国、比利时参加反帝大同盟委员会扩大会，之后转往苏联南高加索黑海疗养地休养。1928 年 1 月中旬，向忠发得到共产国际要他和李震瀛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再回莫斯科，正好赶上处理东大学潮。这时，向忠发再度得到一个消息，东大风潮刚一发生，列宁格勒的中国学生竟有人“开会祝胜”。据报，开会之人，恰为此前传闻的“江浙同乡会”中之人，为首者即为俞秀松、蒋经国、卢贻松等。而后得知的莫斯科炮校朱茂臻 1 月 23 日给蒋经国的信也证实了这一情况。信称：

东大风潮扩大，大家都到共产国际去示威，共产国际因恐慌都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在此运动中，军事班只有曾肇时一人指导，政治班内指导人以后都软化动摇了！当着中央委员会告诉他们不要再闹，他们真正就不作声。真是笑话！从得知“江浙同乡会”的消息至此已经将近两个月，就连向忠发自己也把这件事放在了一边，但列宁格勒所发生的这一情况再度引起向忠发高度重视。向忠发后来说明了他因此而采取的行动过程。他说：当着这个风潮起时，列宁格勒有同志开会祝胜，这就值和我们注意了。于是(我）找米夫秘密的谈话，他说我远(原)不大清楚，但你们既然提出了，当然要注意。乃决定检查他们的信件。又找军事学校由党部中国同志负责去收集材料。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与诸多回忆和著作中所说的不同，第一，所谓“江浙同乡会”事件并非有人蓄意“制造”，关于“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多半久已有之，但在向忠发调查中国学生派别情况之前，此事仅仅是传闻而已。第二，把有关“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传闻当成重大政治事件，极力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者，实为向忠发，既非米夫，也非陈绍禹（即王明）。不仅如此，既然米夫迟至 1928 年 1 月底尚不了解有关“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可知作为米夫“亲信”的陈绍禹，也并非那个向向忠发介绍或者“制造”此传闻的“中国同志”。事实上，这位“中国同志”的名字叫郑家康，周恩来后来曾提到过他的名字，并指出他当时正在苏联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专门负责华人方面的情报侦察工作，而他的妻子安娥正好又是中大学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最先了解这些情况，并把问题讲得那样严重。

说到陈绍禹，后来确是这一“江浙同乡会”事件的推波助澜者。不过，在这件事尚未爆棚之前，他的态度却未必十分明朗。这是因为，陈绍禹自入中大以来，就因迅速掌握俄文而与学校里的苏联教员打得火热，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对反对注重学习理论和俄文的旅莫支部抱以

反感。相比之下，他同与苏联教员关系较好的教务处派的干部反而更为接近。在中大党部派与教务派斗争最为激烈之际，陈绍禹恰好随米夫去了中国，暑假开始之后才回来。等二人来到休养所的时候，阿戈尔已经被宣布免职，教务处派刚刚被压了下去，党委员会派正在势头上，陈绍禹不加选择地立即加入了正在秘密酝酿中的反对党委员会派的行动。据胡建三说："在反对旅莫支部的时候，即反对傅钟、张闻天等的时候，米夫同陈绍禹两同志都从中国回来，陈绍禹同志也是当时反对傅钟、张闻天等最力的一个"。他甚至在第三派和教务处派的合力推举下，当上了总支部委员会改选大会主席团的主席，可见第三派和教务处派对他都颇为信任。难怪后来当上支部委员会副书记的陈原道明确说：当教务处派与党委员会派较量失利后，"即组织了第三派，与另一派加名以旅莫支部"，要处罚党委员会派之首领，"当时第三派(势)力大"，"陈绍禹也是其中首领之一"。

当然，陈绍禹之加入反对支部委员会的行列，与教务处派或刘汉清等人目的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他们之间其实结合得并不紧密，陈绍禹未必真的可以说是什么第三派的首领，只不过他作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和能够陪校长米夫出访的干部，地位特殊一些罢了。从王培吾下面这段说明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情况。王培吾说：当时休养所里到处都有人在游说反对旅莫支部，陈绍禹也很活跃。有一日陈绍禹曾找他谈话，问他对反对党委员会派及教务处派的意见，他说：这两派人我个人是绝对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在反对这两派的同时，一定要提防第三派得渔人之利。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绍禹听了这话，就大骂我，说我顾忌，不应该怀疑第三派起作用等"，搞得王培吾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王解释说刘汉清、黎本益等曾如何如何鼓动他和他们一起联合起来将两派统统打倒之后，"陈绍禹才相信"。这件事很清楚地反映出陈绍禹当时对反对党委员会派态度相当坚决，但与第三派的刘汉清等联系并不十分紧密。同时由于他多少有点心怀不轨，又生怕别人怀疑自己另有目的，因而显得有些紧张，只是当他得知对方怀疑的不是他，而是与他并非一路的刘汉清等人时，这才松了一口气。

陈绍禹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头几天确实与反对党委员会派配合默契，弄得党委员会一派人几乎没有招架的机会。"结果，区委派来的代表认为他们（傅钟、张闻天等）都有错误，犯错误的俄国同志撤职，中国同志交下届委员会处理"。但在联共（布）区委发话之后，陈绍禹和反对派的态度就开始明显地出现分歧了。联共（布）区委的代表宣布上述决定后，会场上一片反对之声，多数发言认为对总支部委员会的人，特别是对张闻天、沈泽民"处罚很轻"，有些人甚至大呼小叫，主张"不应当用教育的方法，而应当枪毙，而应当开除，而应当充军西伯利亚"。"这时在主席团方面，陈绍禹已是尽力拥护区委决议了"。于是，有人"开始向陈绍禹进攻，说陈绍禹靠不住了，背叛了群众"。因此，在选举新的总支部委员会时，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绍禹却未能入选。

暑期刚刚结束，俞秀松等参加讨论的中大二年级学生选派军校学习名单正式公布，共有七十余名学生被派往各军校。结果，俞秀松等人迅速引起中大众多学生的好感。尽管俞秀松等随后均离开中大，前往列宁格勒军政学院　列宁学院深造，但其影响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之势。这种情况自然使中大众多在校学生对原教务处派表示同情，而对继续留在学校的张闻天、沈泽民等原党委员会一派的代表人物颇有成见，继续以"旅莫支部余孽"视之。陈绍禹因转而袒护张、沈二人，处境也颇显尴尬。很快，新的总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何尚志再度提议处罚张闻天、沈泽民，以便清算旅莫支部的余毒。但经过几次大小会议的讨论，张、沈二人分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加上米夫出面干预，终于否决了处罚的意见。不料，当随后共产国际派库秋莫夫前来调查处理有关旅莫支部的问题时，张、沈二人竟利用墙报和总结大会

重提暑期派别之争，宣称自己和旅莫支部毫不沿边，而“反对旅莫支部的人，自己就是代表旅莫支部的余毒”。这样一来，争论又起，大会小会十来次，你说我是旅莫支部，我说你是旅莫支部，陈绍禹再度偏向张、沈一边，反对组织处理，又一次引起众多学生的不满，连陈绍禹一并斥为旅莫支部“余毒”。这一次一直吵到 1928 年 2 月，再由米夫出面，一面批评张、沈二人重兴意气之争，一面向党员们担保张、沈、陈都不是旅莫支部，禁止再行争论。照胡建三的说法就是：“指出张、沈的错误，同时将群众骂一顿了事”。根据米夫意见通过的总支部委员会的决议称：

一、本委员会认为张、沈二同志在此次讨论关于　旅莫支部　报告的时期中做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使关于问题原则上的讨论，降低到了个人意气争论的水平线。……

二、本委员会在本年一月×日委员会会议上曾经因张、沈二同志在委员会上已承认自己的错误，故认为可以不采取某种处罚。但在最近党员大会上，张、沈二同志的谈话，尤其是张同志的谈话，证明他们不诚恳，并不是完满地把自己错误的问题提出来，反而利用了说话的机会，以继续攻击他人，以在大会上辨护自己，因此破坏了本委员会及本支部积极分子会议的决议案。

三、张、沈二同志既犯了上述不可许可的行为，故委员会决定对他们下以警告,且决定取消其一切党的负责工作（即副指导员与情报编辑的工作）。

四、同时，委员会要解释参加讨论的许多同志们，对张、沈二同志不要用些不适当的名词，如“反对派”、“旅莫支部的人”等等。……本委员会认为，在本校没有形成“旅莫支部”的组织存在，故向本支部一切党员提议，以后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

确切地说，这时中大多数学生并不在意米夫的意见怎样，也不在意总支部委员会通过了什么样的决议，其反对肃清旅莫支部“余毒”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问题在于，在为张闻天、沈泽民问题作结论的总支部委员会的会议上，米夫已经公开宣布，在中国留学生中间有一个秘密组织，就是“江浙同乡会”。他严厉斥责中大学生过分注重意气之争，告诫他们：现在不要再揪住张、沈的问题不放，“张、沈不是危险物，而危险物是江浙同乡会，它是破坏党的”。此论一出，象是抛下一颗炸弹，顿时把中大学生惊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学生们的一切注意力都转到这个“江浙同乡会”问题上来了。

事出有因

向忠发要求米夫秘密调查“江浙同乡会”问题，是在 1928 年 1 月底。将近一个月后，米夫公开宣布“江浙同乡会”事件成立，这说明，米夫已经多少掌握了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从哪里来的呢？从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米夫这时已经做了中大校长，并且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副部长。最初，向忠发代表中共中央要求他出面调查“江浙同乡会”时，他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他仍旧通知了格伯乌，请其协助秘密侦察中国学生中的可疑分子并检查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没想到，他很快就得到消息：格伯乌已经搜集到若干证据。证据之一，为秘密侦察到的卢贻松 1927 年 9 月致美（黄仲美）、师（张师）、山（刘移山）、山（甘青山）、景（郭景纯）、策（周策）、尤（尤赤）、寿（刘仁寿）、榛（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

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时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因此地经济部今晨来问我们 8 月份的零用钱领了没有，这是一笔小小的例外。近接款后，李翔梧等回莫时你们或者可以收到我们的会费。

证据之二，同样为秘密侦察到的刘宜山、张师、周策等人年 9 月 17 日给胡世杰、刘仁寿、朱茂榛等人的信。内称：

他们的名誉会员已经交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但现在究竟怎样，还未得到分文，实在焦灼得很。

格伯乌负责此项调查的米利斯明确认为，这个名为"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还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这时，恰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同党内托洛茨基反对派尖锐斗争的时期，人们对党内小组织格外警惕。面对这样一些证据，米夫不能不相信确有其事，只是最初他还不能断定，这个小组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一种性质。因此，他和新来的总支部委员会书记别尔曼商量后，于 2 月 26 日召开了中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动员党员干部协助查清此一组织的情况，并不顾格伯乌的反对，宣布成立一五人调查委员会，动员学生检举揭发，决定先靠自己的力量来追查此事。

要在矛盾重重的中大学生中间搞什么检举揭发运动，不可避免地会与学生间的各种矛盾纠纷搅在一起。于是，追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刚一开始，学生之间就你攻我，我攻你，你揭发我，我指责你，整个中大搞得象开了锅似的，人人不得安宁。前一时期因一味迎合苏联上级机关的意见而受到学生指责的陈绍禹等人，这时变得异常活跃，到处找人谈话，动员揭发。陈甚至公开在墙报上撰稿，第一个上纲上线，指责"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和不满意中国革命，准备脱离党另找出路的人，组织起来的一个反革命集团，他们与第三党保持着秘密联系。这一说法立即引起相当一部分学生的不满，五人调查委员会委员之一董亦湘当众批评陈绍禹不负责任，强调"江浙同乡会"有无尚未调查清楚，即使存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党内教育问题。双方因此争论不休，你说我是"旅莫支部余孽"，我说你是"第二条路线"。不几天，就有人写信揭发董亦湘本身就是"江浙同乡会"的首领。结果，米夫和别尔曼又再度出面召集党员大会，宣布"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中大就是其大本营，它的正式成员有六十多人。"此种反党的危险组织，有它的党纲，有它的组织－中央与支部－此种组织必须打破它"。因此，关于它的性质也没有必要进行争论，它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性质如此，学校组织调查实属不当，调查委员会即日解散，一切工作交格伯乌解决。随后，向忠发又赶到中大，在学生大会上明确宣布"江浙同乡会"已经基本上调查清楚了，两周后即可公布调查结果。这个反革命的秘密小组织有中央、有支部、有章程、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还有会费，与蒋介石、第三党、联共反对派都有联系，他们的领袖够得上被枪毙。这件事再不许有什么怀疑了，"谁怀疑谁就是反革命"。

米夫和向忠发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是根据格伯乌的调查结果。3 月 24 日，格伯乌第五部负责调查此一事件的米利斯就将近两个月的调查提出了一个书面的结论。内称，"江浙同乡会"查实者至少有二十二个人，其首领是俞秀松、周达明和蒋经国等。该组织有集中的指导，如中央委员会等，经常开代表会议，各个学校中都有他们的人组织的支部。其目的是要夺取在苏联境内的中国学生的指导权，帮助中共机会主义领袖陈独秀、谭平

山等。并称它已经与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国民党右派发生了关系。按照米利斯的建议，这二十二个人（二十个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在海参崴）都应当马上逮捕。但此一结论报到格伯乌总部后，未得批准，主张继续调查进而报苏共中央提请解决。

一周之后，当米夫专门请米利斯前来共产国际东方部向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和中共代表团报告调查结果时，米利斯的报告又有变化。他宣布，根据他们目前掌握的情报，至少有一百十一至一百三十个中国学生参予了 江浙同乡会 的活动，而他们搜集到的各种材料也已经有一百三十份之多。而当向忠发索要这些人员的名单时，米利斯却一口回绝了，声称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多数人只是教育问题。最后，米利斯只提供了据说是证据确凿的八个首要份子的名单。这就是：

1、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2、朱务善

3、朱代杰

4、卢贻松

5、刘仁寿

6、黄仲美

7、周 策

8、陈启科

“如何蒋经国做首领呢?”根据向忠发后来的解释就是:“这个小孩子比较聪明，理论比较好些，经济由其母亲名义供给了七次之多”。

显而易见，与格伯乌的前一名单相比，这个名单里缺少了俞秀松和周达文两人。事实上，格伯乌所有有关“江浙同乡会”的材料，都是根据一个关于“储金互助会”或“助金互助会”的传言，结合以中大教务处派的成员演绎推理而来的。可是，这个“互助会”，俞秀松和周达文自始至终就没有沾过边。并且，当俞秀松得知卢贻松、蒋经国等在与莫斯科同学的来往信件中拿此事开玩笑，引起原中大学生的风言风语后，还立即写信叮嘱蒋经国、卢贻松:“以后写信给中大要谨慎，不然要引起误会”。因此，刚刚从中山大学传来他们二人与“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有关系的消息之后，他们二人就理直气壮地上书米夫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进行申辩，否认指责，并明确认为有人故意兴风作浪。函称：

近来听说此间中国同志中有一种“互助会”或“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并传说我们两人间接或直接与此组织发生关系云云。为此，我们不得不郑重声明如下：

第一，我们对于此组织的详情不甚清楚，无从下确切的断语，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党内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小组织。……

第二，我们两人郑重声明，我们绝对没有和小组织发生任何关系。现在孙大一部分负责同志没有对我们两人的事情查调清楚，任同志们公然在党的群众中宣传，我们认为完全不对的。……

第三，我们认为此问题……党部应审慎查调办理，不能根据一部小数同志的私见，……他们以私人为出发点，有意的蒙蔽党部，造出种种谣言，诬害同志的，……此风一长，则党的前途将 不堪设想了。

但是，究竟有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储金互助会”呢?看起来，这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

自米夫、向忠发在中大放炮点火之后，不仅中大内部而且在几乎所有前中大同志中都迅速掀起了一场揭发检举和坦白交待“江浙同乡会”的运动。陈绍禹、沈泽民、李竹声等人迅速成为追查运动的骨干，上窜下跳，唯恐天下不乱。经他们加油添醋地到处散布消息之后，许多多少沾过“储金互助会”的边的人，很快就沉不住气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出来解释或交待事情的经过。从这些解释或交待的情况可以看出，“储金互助会”确有其影子。

3 月，因中大风传陆军大学的屈武同“江浙同乡会”有关，屈武曾专门写信给向忠发、苏兆征等，解释自己与 储金互助会 的关系。其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个“储金互助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内称：

储金互助会的来源—当我们去年暑假中野营军事训练完结回来，回到炮兵学校共处一室，军委当日就把派往各军事学校的名公布出来，共分政治军事大学、陆大、飞机，及步、炮、工六校。但步、炮、工三校就当时所知，生活方面非常苦，每月听说只发一两个卢布，并且饭也不大好。……当随便聊天的时候，前两校的同志(我也在内)提议假若这两校的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当时就有那个同志（大约是炮兵学校的)说，好罢，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来，我们去吃饭好了。并且同时陆大和军政大学两校的全体同学（共十人）同意愿将尚未领得之 8 月份薪水……完全先给炮兵学校全体同学去吃中国饭（但此薪水后来并未领下）。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后来因为他们生活改善了（除吃中国饭外，每月当发给三十个卢布），所以后来谁也再未曾提起以前的话。我回想当时的谈话，实因生活的不平，同志间亲善关系自然的表现，丝毫莫含有其他的作用。

同样，在莫斯科的步、炮两校学生胡世杰、朱茂榛、郭景纯、周策、刘仁寿等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上书中共代表团并转中大调查委员会，说明的确是他们提议“助金互助”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听说自己今后每月只有二个半卢布左右的生活费，自然就想到请陆军大学、军政大学和飞机学校中“感情较好的同志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因为据说他们的月薪分别在一百卢布和六十卢布以上。

于是就有同志在炮兵学校及别处，公开的谈说这个提高生活的好方法。……并有同志在玩笑中称此为“助金委员会”，大家都希望他们（陆大等校）发钱以后能够请我们吃几次中国饭。所以当时我们彼此的信札中多是些“敲竹杠”的玩笑话。后来陆大同志……因为要做军服与买各种日常用具，而没有多剩余的钱可以请我们吃东西。列宁城军事政治大学同志领了两个月的薪水，而且有剩余的钱，可以给我们用的，因此那时卢贻松和蒋经国就托李翔梧同志转

给朱茂榛四十个卢布……拿去吃中国饭。又经过几天，军事委员会已决定每人月给卢布三十个，于是我们的生活程度不仅没有减低，而且稍较前提高。当时我们致信各校，宣告“我们的生活独立”。……这些开玩笑的和敲竹杠的话从此消失。

那么，什么会员、章程、会费之类的，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显然，所有这些名词，最早都是在一向爱开玩笑的卢贻松给莫斯科军校同学的信中发现的。因此，看看卢贻松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必要的。这时，卢贻松也从列宁格勒写信给中共代表团，说明了这件事的原委。他在讲述了当时在炮校莫斯科军校的同志提出成立一个储蓄会，叫列宁格勒同志寄钱来之后，写道：

当时我曾说，只要我们领得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国饭是有希望的。日后，我来到列城，他们就写讯来要价(饭)钱，在我复讯时我记得就写上了会费不久寄来这类的玩笑话。正因为过去在同志中说惯了这类的无聊的玩笑话，亦未曾碰过钉子，因为写得来几个字，提起笔来觉得无多话可说，亦就弄上点花色，因此而发生这样大的误会，(这)自然是下次提笔时一大教训。

在中山大学也好，东方大学也好，中国学生之间的矛盾磨擦不可谓不多，派别之间的分歧与斗争也不可谓不激烈，但争来斗去，充其量不过是谁对谁错，谁台上谁台下，还从来没有闹到今天这种地步，同学之间，因为几句玩笑话，竟可能转瞬之间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不论那些明里暗里被指为“反革命”的学生们怎样解释和争辩，他们的处境却越来越险恶了。

查无实据

1928 年 4 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召集中共代表向忠发、苏联军委代表和格伯乌代表开会，再度听取格伯乌代表说明调查取证情况。格伯乌代表明确提出一个十二人的名单，包括蒋经国、卢贻松、陈启科、左权、尤赤、胡士杰、刘仁寿、郭景纯、朱茂榛、周策、张师、甘青山，肯定这十二名军校学生都是“江浙同乡会”的骨干。紧接着，在第二次会议上，联席会议正式决定：

（1）开除蒋经国等十二人的党籍和团籍，其中蒋经国、刘仁寿、朱茂榛和周策 4 名首要分子交格伯乌拘押审查。

（2）共产国际东方部与中共代表团联名写信给列宁学院党部，请其对俞秀松、周达明等中国学生进行审查。

会议通过了中共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决议。值得注意的是，该项决议竟出自陈绍禹的手笔。这是因为，这一时期，陈绍禹正做向忠发的俄文翻译，不仅陪同向忠发出席各种重要会议，担任翻译工作，而且事实上也在解决“江浙同乡会”等问题上扮演着参谋和秘书的角色。决议宣称：

（一）承认在苏联有一反党的小组织存在，其名称为联合会（互助会）。其分子为军校与大学学生中的青年团同志和党员。该组织虽带有表面上工会的名义，但是毫无疑义的含有政治

上的性质。

（二）认为参加该组织的分子未表现很明显的政治目的，但倾向于拥护中共以前的机会主义的指导。……

（三）该组织现已吸收那些最动摇的少共团员和党员（特别是对于中国问题和联共问题为反对派的分子）加入其内，甚至不拒绝与右派国民党员发生直接的关系。

（四）认为用党的纯粹教育性质的方法，对于该组织已用尽了。这些同志未曾利用党部给他们的可能，以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停止活动，解散组织，……因此本会认为必须经过相当的机关，采用组织上与法律上的办法，以达肃清此组织之目的。

（五）委任米夫和米利斯二同志起草一详细信致中国学生所在学校的党部，该信中应说明该组织的历史和行动，及其有害的性质。……同时委任米夫同志与相当机关发生关系，采取相当办法以肃清该组织。

（六）党部根据此信除相当机关的组织办法以外，应依自身方面的路线采取办法以肃清该联合会在学生中的影响，且对各个参加者为党纪上的处罚。

这是自“江浙同乡会”事件发生以来，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和苏联有关部门正式提出的第一次处理意见和为事件定性的决议。由于会议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秘密的反党性质的小组织，因此它所采取的处置方法，不仅仅是党纪上的，而且还准备动用专政机关给以制裁。此种态度之严厉，可以想象。

但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米夫就感觉到这次会议的决议不尽成熟。他亲自调阅了一些所谓的证据，却发现在众多格伯乌认为确凿的证据中，没有一件可以直接证明这个组织事实上的存在与它的性质的。他随后又专门就此询问了米利斯，问他是否找到了“江浙同乡会”的章程或者其他文件？米利斯告诉他说：“炮兵学生孙发立及王长熙看见朱茂榛那里藏着一个秘密同乡会的‘党纲’（互助会的章程），内中有很多条文。”而且，另外也有中大同学看到同乡会的会员轮流抄写一个同乡会的“工作计划”，米利斯认为这实际上就是同乡会的章程或文件。根据格伯乌提供的线索，米夫亲自布置调查了此事。不想，“当着一个学生如获珍宝似的拿给了米夫，以为这就可以破获一切‘同乡会’的罪人。米夫将这件东西拿给翻译一看，原来是一九二六年党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这件事让米夫深感困惑。结果，“东方部未通知（中共）代表团就停止了这一决定”，把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事情暂时放到一边去了。

火是向忠发和米夫放的，如今米夫忽然住了手，这不能不让向忠发大惑不解。向忠发因此再三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要求米夫和东方部迅速实行决议，却得不到米夫的任何答复。迫不得已，中共代表团正式致书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详细说明“江浙同乡会”的反党性质和严重危害，要求立即解决此一问题。函称：

１）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之反党的特性，不仅因为它的一切行动绝对秘密，而且因为：

Ａ）它的成分是：反对派、拥护中共机会主义者的人、有各种形式的取消派和先锋主义(倾向)的人，并且与党外的反共产党成份有关系；

B）它的目的：口头上要推翻中共现在的领导，事实上从内部和外部破坏和消灭共产党；

C）它的形成时期是：中共 8 月会议以后，即中共机会主义者正脱离党之时；

D)它的工作内容是：在苏联各共产大学及军事学校分裂共产党员的队伍，对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及中共作种种造谣与诽谤，帮助和庆祝东大军事班向共产国际的示威行动，等等。

因此，这种小组织绝对与普通在吾党内因发生某种争论而形成的小组织完全不同。

2）中国现时斗争之剧烈与残酷，不仅在反革命与革命之间，党内斗争也表现特殊激烈的形式。如广东同志反对机会主义者而采取恐怖手段，开除一切知识分子；及北方同志被害事件，……等等。这个小组织的行动早已超出党的范围以外了。试举数例为证：

A）它集中一切力量和精神在军事学校工作，欲依靠军事力量为基础而采取所谓"谁有力量些，谁即胜利"的手段。

B）它经过自己的东大全权代表曾昭示领导军事班反国际示威，而它的会员纠在列宁格勒开庆祝会。

C）它的会员刘宜山、黄仲美在海参崴工作，即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机关(国家政治局）及党的机关，驱逐和压迫非它们组织内和不同意它的宣传和煽动的同志。

毫无疑义的，如果这组织到中国去活动，则其危害于中国党更甚百倍，或者成为中共的敌人。所以绝不能如有些同志的意见，以为它的行动是未超出党的范围以外。

3）无论何时我们未曾设想过（现在也还未如此设想）这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已成为共产党不可容纳的仇敌，……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各个人单独行动对党的危害总比他们还保存着整个的党内小组织来活动为小。

4）因此，我们提议用下列方法解散这个反党的组织：

A）对于这组织的首领及最积极的活动分子，不仅采取党的组织路线，并且根据国家政治局现有的材料，对各个人分别给以党以外的路线的办法。

B)对于这组织的一般会员，按其对于这组织的关系如何等而采取党内组织的和教育的方法。

5）我们提议尽可能的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比较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和中共代表团这时再度提出的提议，可以看出，中共代表团对这个"江浙同乡会"的性质的估计，正在进一步升温。根据纷至沓来的各种各样的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代表团渐渐认定：这个"江浙同乡会""在孙大占多数，东大少些，开会在炮兵学校占多些，步兵学校少些。""他们也有中央，也有支部，大本营在中山大学，中央在另外地方，孙大是总交通的地方"。为此，向忠发一再要求米夫彻查中大学生派别的历史及其现在的联系，以便进一步深入获取该组织的核心机密。同时，向忠发也几次指令陈绍禹等务必以中大

为突破口，查出更可靠的材料，以便促使米夫迅速解决问题。然而，自 6 月以后，因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领导人包括中共代表团的成员，甚至中大清查活动的主要骨干，全部集中精力于“六大”的工作，进一步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结果，正当中共“六大”召开之际，米夫忽然在中大宣布：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在中大已经结束了！

这件事首先发生在 6 月 26 日，在中大党务报告会上，米夫突然提到“江浙同乡会”问题，称清查“江浙同乡会”并不是学校党支部的责任，它是共产国际的事情，而共产国际东方部已经就此得出了结论，即：

１）江浙同乡会是一小组织，是有危险的－－它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在将来中国党内增加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破坏这种小组织；

２）同乡会的领袖是必须要加以组织上的处罚的；

３）被影响的同志，我们应当加以解释，不加以处罚。

米夫声称：“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已经解散了，本校没有他们的会员”，不能说中大是江浙同乡会的大本营，甚至“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不能说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因此我们学校里用不着很急的解决这个问题。”他明确要求中国学生要停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迅速停止互相猜疑和揭发检举，务必着手改善同志关系。

米夫的发言当即引起一些学生的异议。有人大声喊道：“你是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对于这些反党分子不再追查了？”米夫当场答道：“江浙同乡会问题已解决了，这个组织已不存在了，他们的首领仅仅在军事学校和列宁学院，可是已经开除了。在中大是没有首领，没有组织，不过有少数同志曾受了一点影响，所以对于中大这部分同志是仅仅采取教育方法，不再用处罚”。对于有人提出“忠发同志曾说江浙同乡会的大本营在中大，难道忠发同志说谎吗？”这一问题，米夫竟回答说：“向同志的话我没有听到，我想他不是这样说的。他一定是说江浙同乡会的首领是中大过去的学生。至于中大，是没有它的首领，非它的大本营”。

米夫本来就对是否存在一个“江浙同乡会”的组织持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格伯乌的材料一度使他多少相信确有其事，但他仍然注意到，没有一件材料能够证实这个组织是否仍然存在，和它除了经济互助以外是否真的具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在几个月揭发检举仍毫无进展的情况下，米夫已开始相信，事实上不可能找到这个组织，即使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小组织，也无法给它戴上反党或反革命的帽子，否则必然要在长期存在派别纷争的中国学生中间引起难以想象的后果。为此，东方部通过了上述决议，并决定迅速平息由于此一事件在中国学生中间引起的政治风波。作为中大校长，米夫显然已经注意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他在一份书面材料中写道：目前的清查已经“破坏了许多同志的关系及相互的信仰，因此发生了许多相互猜忌及无根据的谣言，要求枪毙‘互助会’的参加者，等等。”

人人自危

清查”江浙同乡会“，究竟在中国学生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很容易想象的。开始的时候，一些受嫌疑的学生还曾极力抗争，象最初被

怀疑的军校学生胡世杰、朱茂榛、周策等人，就曾多次写信要求上级领导注意“野心家”的阴谋。他们宣称：

我们希望党能于最近发现在政治上及党组织上有危险性的”助金互助会“以及其他政治组织的集团。我们并且希望党一方面对于这问题急速的解决，把党的这种野心家－小组织不仅以党纪对付之，而且对这种反叛的组织必须以苏维埃革命的法律处罚之。……但要是有同志以捕风捉影的方法，离间同志关系，把玩笑的过程当作撼动波浪的材料，把事实涂抹替上恶意以欺骗党，鱼目混珠的牵涉到我们过去玩笑中所说的“助金互助会”来破坏同志相互的关系，自然我们希望上级……彻底露暴出那些借端造谣欺掩事实的企图。如果一旦这种情形发露时，我们以为对于这些野心家不仅应以党纪处之，而且应该详察其野心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及其已有的事实与将来的倾向。

但是，这样的抗争很快就变得毫无意义了。用学生自己的话来说，整个形势迅速变得“天昏地暗，阴雳四布”，学生们“整天在‘满城风雨’中过不安的的生活”。不少学生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讲述了这种恐怖的气氛。其中一封信说：

自去年“暴露江浙同乡会”的声浪高唱入云以后，中大就充满着恐怖的不自安的空气。……不但江浙的一般同志不敢谈论其事，低头不敢讲党委的工作和党的生活，即许多各省的同志，也个个自危。同志间互助猜疑，互助嫉视，同志关系变为非同志的互相暗里侦察的关系。

在另一封信中，一个学生在表示他对这种追查不满的同时，也说明了此事所造成的后果如何严重。信称：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再继续这样拖下去，恐怕“可以影响到大部分同志的政治生命”。可惜的是，这件事迁延到这么长久，使同志相互的怀疑、猜想、倾陷、刁拨，不断地发展和增加，这样继续下去，将达到什么地步！……据向忠发同志的报告说得怎样严重，如说要枪毙他们的首领等等；如沈泽民、陈绍禹同志向同志们中的宣传说他们的组织怎样严密，他们的人数如何之多，如中山大学有一百余人，而炮兵学校、东方大学、列宁格拉到处都有他们的组织。忽而同乡会，忽而储金互助会，捕风捉影，弄得风雨满城，许多同志犯了嫌疑不能参加一切学习和工作，许多同志犯了嫌疑开除党籍和遣派回国。

这里说“许多同志犯了嫌疑”，甚至说“大部分同志的政治生命”受到影响，丝毫不带一点儿夸大的色彩。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究竟指的是那些人。清查刚一开始不久，有人就揭发说：“要知道中山大学的名单，最好是去找去年暑假时拥护周达文、俞秀松两人的人名单，和今年 3 月在党大会上拥护第二条路线，反对党委员会的人名单”。一些人则更直截了当：“以前所谓教务处派，现在就是江浙同乡会的领导了；以前所谓第三派，就是现在同乡会的雏型”。因此，过去所有教务处派的人，所有在暑期休养所第二次大会上因参加反对党委员会派而被视为第三派的人，包括与俞秀松等人关系较好，或者在 3 月中大党员大会上一度倾向董亦湘等人意见的人，这时统统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而且随着清查的不断“深入”，这个名单还不断地扩大，今天是我揭发你，明天是他揭发我，后天又有人揭发他。几乎每个人都在怀疑别人，而且每个人都在提防别人。同学之间过去有过的那种亲密关系荡然无存，就连上厕所时都得小心，因为确实有不少人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放过，到处打小报告，连同学们在厕所里讲的一句无关痛痒的话，也要拿去汇报一下。一些好事者还主动地根据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写出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报告，别出心裁地提出不仅要搞清楚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名誉会员”，而且还要搞清楚它的“同情

者”。按照这个报告绘制的“江浙同乡会”组织系统表，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无论如何要在百人以上。[4]查最初中大总支部委员会提交的可疑人员名单，有二十六人被认定为“主要者”，十九人列为“次要者”，四人列为“怀疑者”。到第二次提交的名单即达到七十一人，而且全无主次可疑之分。综合已经查阅到的中大总支和中共代表团几次提交的可疑人员名单，可以看出，至少有大约一百五十名学生曾被列为嫌疑对象。

如此之多的学生在嫌疑之列，并且被怀疑者还在与日俱增，怎么能不使多数中国学生感到人人自危？！何况，那些鼓动者和揭发者又往往表现得比向忠发更革命、更仇恨反革命，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又怎么能不让人心惊胆战？其实，就象一位学生这时所反映的：“在莫斯科的同志，他如果头上被人加上了‘幌子’（‘帽子’），如什么主义、或什么倾向，……特别是犯了江浙同乡会的嫌疑的同志，他根本就失丢了大部分的政治生命，可说是没有工作的可能！这是多么的严重而可怕呀！”即使是生命没有危险，因为政治上犯了错误，一生的前途也就葬送了，这在许多被嫌疑者看来，恐怕是最残酷不过的了。当何尚志听到苏兆征、张国焘说，同乡会的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好象自己的党的政治的生命死亡了似的”。军校学生张师因受怀疑被派送回国之前写信给中共代表团，也明确表示：我不怕回国，希望回国参加战斗，“我从未曾在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的尸斧前畏缩不前”，“我已准备好一切！准备着与我们阶级的敌人作殊死战！”但问题是，我不希望这样回国。请告诉我，我“是不是因为江浙派的关系而被停止学习派回国？倘若是，请将我参加江浙派的证据公开宣布”。同时受到怀疑的军校学生傅汝霖给代表团的信则明显地给人一种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感觉。当他被苏俄军方连同几位被开除的中国学生集中在一起，准备送回国之际，他接二连三地写信给中共代表团，大呼冤枉，一方面要求代表团当面询问揭发人，是不是搞错了。“如其证明我亦参与其谋，则请照以前向忠发同志的说法，准予枪毙”。一方面又请求不要把他和这些“小组织”的人放在一起，因为两边的人都不信任他，“真是难过”。日后“纵使回国，定请不要派我同他们一路，免受意外的危险”。

当然，更多的受怀疑学生的反应是极力证明自己的无辜。蒋经国给调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在反复解释同学们搞“助金互助”的经过之后，一再说明自己和国民党以及他的父亲蒋介石已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自己和一些同学关系较好，“过于着重同乡的情谊有些封建的”色彩，但他明确认为自己在忠实于中国革命和忠实于中国共产党方面“从不后人”，因此他“坚决提议处罚任何参加小组织的同志”。在这方面屈武的态度更具典型。他在写给中共领导人的信中一面申辩自己与小组织无关，有时只是“太相信同志了”，一面明确提议：“赶快的解决，公布调查结果，凡参加小组织的同志一律严重处罚，以免同志间相互猜疑”。而“为了表明”他的“积极的态度”，他特别“提出下列几个口号”：

１、一切小组织从布尔什维克的党中滚开去！

２、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

３、要与第三党拼命到底！

４、共产党是我的家室！

５、共产主义是我的生命！

6、为生命与家室和敌人决战而死是我的职责！

那些被无辜怀疑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的学生们的感觉，几乎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但无论抗争也好，申辩也好，在那样一种形势之下，无论自觉或不自觉，那些处身事外的同学，往往并不理解那些被怀疑的同学的心情。不仅如此，当米夫和别尔曼公开宣布中大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问题之后，许多学生竟纷纷告状，质问中共代表团：“对中大的江浙同乡会会员仅用教育的方法……是否能完全消灭它的组织？”“留些敌人在党内……将来这种责任应当谁负？”他们因此大骂米夫“鼠首两端，实有意作恶，他直是不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强烈要求中共代表团不要妥协，追查到底，断言“此等反党的危险组织，有他的党纲，有他的组织—中央与支部—此种组织必须打破它”。“这个反革命组织不彻底地解决”，不仅中大的工作将长期坏下去，而且“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不难葬送在他们手里！”主张“党应当不姑息的将调查的结果严厉执行党的纪律及无产阶级国家的纪律”，要“斩草除根”。

可是，所有这些态度激烈的学生是不是真的掌握了什么具体的罪证呢？其实，在绝大多数学生看来，最关键的证据只有一条，就是上级领导人的“证词”，既然米夫和向忠发都肯定了这个秘密组织的存在，还能错吗？至于究竟谁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谁可能是这个组织的同情者，那就完全看各个人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如何了。但有一点，只要过去反对过总支部委员会的，即教务处派和第三派的学生及其同情者，都可以大胆怀疑。因此，许多揭发纯粹只是一种逻辑推理或大胆想象。试举几例：

（1）一则揭发董亦湘的材料所举的证据，只是董在一次党员大会上的发言，因为他在发言中曾批评说：“现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都是旅莫支部余孽，中国革命失败，就是这班人弄糟了！”“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有改造的必要”。

（2）一则揭发蒋经国的材料，完全是道听途说，把蒋经国母亲那里寄来的钱当成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因而断言：“蒋经国现在还秘密地保存着父子的关系，曾有钞票来，数约千余元”。

（3）几则揭发胡建三、胡锡奎和黎本益、林登岳、相玉梅、郭莹珊、营尔斌、阎玉珍、林启铎、张玉符的材料纯粹是想象，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对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不特不积极的反对，而且抱着一种对于党的处置不满及辨护的态度”；因为“每天晚上他们回来睡觉很晚”，成天三个五个地一起往人少处去。

（4）一则揭发何尚志的材料同样武断，它的根据只是在于“当冯弗能、赵显亭二个女子要回国时，何尚志写给他们上海党部的负责人地址。冯、赵是国民党的人，是冯玉祥的亲戚女儿，是反革命的人，何尚志竟这样的勾结他！”

5）一则揭发材料更是离奇，它的根据只是有过一个国民党学生曾经给蒋介石写过信，而一个叫潘锡朋的党员与这个国民党学生关系较好，由此推论潘多半是江浙同乡会的，再进而推论江浙同乡会与蒋介石有关，说什么：“我固然不能肯定的证明这些人们（指‘江浙同乡会’的会员－引者）已经与蒋介石有了什么具体的关系，然而我可以断言他们是在企图与蒋勾结”。

孰是孰非

“江浙同乡会”事件闹到如此翻天覆地的地步，毫无疑问是向忠发一手促成的。米夫的点火之后又熄火，看来也挡不住向忠发必欲追查到底的决心。7 月 11 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宣告闭幕，向忠发出人意外地在随后举行的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而他做了中共最高领袖之后放的第一炮，就是公开向中共代表团宣布“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和中央查处此一反党秘密组织的决心。

7 月 14 日，向忠发召集代表团开会，当众宣布了这一事件发生经过及最初的处理过程，要求“同志们绝对不要怀疑，这完全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此一报告立即在与会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家纷纷要求“严重调查确实”，然后将这些小组织分子“一个一个判铲除出去”。有人甚至明确主张对这些人应当：

１、唯一的领袖－－枪决；

２、二等领袖－－坐格伯乌；

３、三等分子－－放逐；

４、四等分子－－用教育方法训练他。

值得注意的，向忠发的报告更多的只是说明情况，而陈绍禹在这一天会议上的发言，则俨然成为对“江浙同乡会”盖棺论定的系统结论。陈的发言分为五个方面，即（１）江浙同乡会的来源；（２）江浙同乡会的实质；（３）江浙同乡会的行动；（４）江浙同乡会的前途；（５）我们对江浙同乡会应采的办法。

关于“江浙同乡会”的来源，陈绍禹明确认为它起源于中大前此的派别斗争，即所谓“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之争。“江浙同乡会”的基础，就是教务处派。俞秀松等参予派遣学生学习军事的分配工作，就是对于组织“江浙同乡会”的一种重要步骤。按照他的说法，“如果说江浙同乡会组织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军营中为互助开玩笑，但其历史根源则是与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派人学军事时之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而他提出的处理办法是：“首要者除用党纪制裁外，还须采用其他办法，次要者用党的组织办法解决，一般会员用党的教育方法解决”。会后提出的《对于江浙同乡会的意见》，除了在处理办法上与陈绍禹的意见有区别外，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陈绍禹的看法。此项〈意见〉明确认为：

一、江浙同乡会的来源和形成原因：

１、主观上的来源：

（１）１９２７年暑假时孙大发生“教务处派”和“党委员会派”的斗争，结果教务处派被打下去，由是蜕化形成　第三派　，这是以后江浙同乡会的雏型。

（２）１９２７年暑假后，东孙两大分派学生到各军校学习同志，多是周达文、俞秀松接近的人，所以在各军校都有江浙同乡会的会员，在野营中以互助为开玩笑，从中有人利用而形

成组织。

２、客观上的形成原因：

（１）它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反映；

（２）它是中共“八七”反机会主义的反响；

（３）它是联共党内反对派的破产。

二、江浙同乡会的性质：

１、江浙同乡会会员的成份：

（１）在实际工作中继续旅莫支部方法而招党员群众反对的老党员；

（２）刚从国民党加入ＣＹ的分子，右派的国民党员，反对党的领导的先锋主义者；

（３）反对派分子；

（４）一部分不注意政治问题而专作个人意气斗争、时时想取得委员地位的分子，企图利用同乡会的势力，结果反为同乡会所利用；

（５）一切反对共产国际、联共中央、中共中央政策表示满意的人……。

２、他们的理论：

（１）中国党过去是机会主义的领导，现在的领导不力；

（２）谁有力量谁就战胜。

３、他们的组织：

（１）有章程；（２）按期缴纳会费；（３）有正式会员和名誉会员；（４）有中央有支部；（５）在党内秘密组织和行动；（６）秘密开会……

因此，江浙同乡会是一切反对和不满意共产国际、联共中央，及“八七”后中共中央的政策的分子的集团；它是有政治作用的、破坏党的组织，有反中国党（甚至是反苏联党）的危险性，在客观上它是反革命性的。

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制定的这个文件，无疑是中共中央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一项正式文件，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新中央解决所谓“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基本依据。但是，在这时的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李立三在7月14日会议的讨论中当时就对所谓“江浙同乡会”有理论、有目的的说法表示怀疑。而这时最尖锐地否定“江浙同乡会”事件

的，恐怕要数曾长期与项英、许白昊、刘少奇、林育南等一同在武汉工作的方绍原了。方到中山大学学习还不足一年，但他已经注意到，中大内部同志关系极不正常。他极其尖锐地指出：中大“党的生活、同志间的关系，只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互相拉拢、互相攻讦、互相猜忌，甚至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好者所不屑有的行动，而我们的同志居然行之若素，毫不以为可耻。此种现象，在孙东两大里，盖已成为狠普遍的公开的秘密了”。因此，他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根本就不存在。他认为，之所以闹出这样一场政治风波，根本上只是由于“孙大同志间过去的历史关系”和米夫、向忠发两人不负责任的煽风点火。他在写给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要求代表团务必格外注意中山大学学生内部历史形成的种种矛盾，说：

孙大同志间的关系，向来是盘散沙，毫无党的整体利益的结合，只有利用封建式的私人情感的联络，不过往往在某一种利害相同的情形之下，各个派别同欲推翻其唯一仇视的一派，暂时才有互相结合的趋势。但时间一过，彼此都依然恢复原状，你攻讦我，我攻讦你，你想推倒我当领袖，我要取消他卖风情，明枪暗战，舌剑唇刀，闹得不可开交了。关于这样的事实，孙大四年内不知要闹了几多回了（东大里也是一样）。什么反党路线派啊，旅莫支部派啊，反旅莫支部派啊……闹到现在的江浙同乡会上，那一次不是因私人得失才引起来的同志纠纷？……很明显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称，就是几个党部负责的造谣生事的主要分子，故意把它煽动扩大起来，准备一网打尽反对他们的同志的一个例子。

据此，他声称：“江浙同乡会，我现在敢断定的说，不但党部造谣生事的主要分子将手足无措地拿不出证据来，就是大部分被诬指为江浙同乡会会员的同志，还不明白他们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被大众所攻击的恶名词”。

根据新中央的决定，“江浙同乡会”的问题，委托中共参加共产国际“六大”的代表团负责。中共代表团毫无疑问只能根据中共中央的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决定（即《意见》）来认识和处理此一问题。因此，方绍原或者其他怀疑者的信件事实上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到是 6 月 29 日陈启科、左权、胡士杰、尤赤、郭景纯等军校被开除学生写给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迅速起了作用。7 月 22 日，胡士杰等再度前往克林姆林宫求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斯大林等因参加共产国际“六大”不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列夫斯基亲自接见了这几位中国军事学生。雅罗斯列夫斯基告诉他们，他已经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他过去并不知道关于开除中国军事学生的事，也不知道关于“江浙同乡会”的问题，他当时即打电话给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要求后者提供有关情况并决定调阅全部材料。两天后，苏共监察委员会即分别从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格伯乌收到了有关的资料。

这时中共代表团的书记为周恩来，主要负责人有瞿秋白、苏兆征和张国焘。恰好，他们这时也正前往格伯乌要求查阅有关材料，刚看过一次即得到通知，知道所有此一事件的资料要被调往苏共中央监委。到监委后，他们又得知监委已经决定接受中国学生的申诉，于近期内召集有关各方人员开联席会议，重新调查解决这一问题。监委并准备为此成立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以雅罗斯列夫斯基为主席，包括共产国际、苏联军委和格伯乌的负责人。鉴于此，中共代表团不得不立即着手同有关学校党部进行讨论，以便准备材料。而中大党部陈原道、李剑如等反映相当强烈，明确认为代表团不能妥协，“中共代表团不将江浙同乡会根本解决了，则对党的前途非常危险。首领应枪决，活动分子应开除”。周恩来等则当场解释说，不能认为代表团有妥协，事实上问题十分复杂，秘密的文件尚未得到，名单也成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对人的问题，而“对人的问题非常重要”。因此，他要求中大总支部委员会能够协助提供一个确切的“江浙同乡会”人员名单。

清查了半年多的时间都不能确定“江浙同乡会”会员的名单，要在几天之内搞出一个“确切的名单”，这当然是做不到的。虽然中大支部委员会很快就提供出一个七十一人的名单，俞秀松、周达文等首当其冲，然而在雅罗斯列夫斯基于 7 月 27 日召集的听取俞秀松、周达文等人关于自己与所谓“江浙同乡会”关系的声明书的听证会上，中共方面的代表周恩来、瞿秋白、陈道原等人几乎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俞秀松、周达文的申辩与事实不相符合。

无效裁判

7 月 27 日，“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正式组成，中共正式代表为瞿秋白与周恩来（而后中共代表团曾一度建议暂由苏兆征、关向应二人代替，最后主要由周恩来负责，瞿秋白因病未参加）。8 月 1 日，雅罗斯列夫斯基通知委员会有关委员：自当日起到 8 月 6 日止，所有委员都应到监察委员会看材料，并有权向任何与此事件有关的同志提出问题，调查工作由此开始。经过前后近两周的工作，阅读材料、听取证词、与各方面负责人谈话等，雅罗斯列夫斯基于 8 月 10 日正式向委员会联席会议提出了《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或“互助会”事件的报告大纲》，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革命性质。报告说：

我很详细地研究了所有的材料，与好多与此事有关的中国学生的谈话，与我谈话的还有许多其他的同志，如格伯乌的负责者库马罗，还有皮亚尼茨基、勃哈林、米夫、中国代表团等，使我觉得多数中国同志所提出来的罪名是没有根据的。……我很相信，江浙同乡会之所以造成的基础，是由于中国学生中间为争夺影响之各派互相的斗争，从中国送来的学生成份和其他在国内所受的革命教育都不甚佳。他们有地方主义的色彩。但对于部分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的同志，最大的罪过(只是)：一方面有互助会的组织，另一方面他们这样组织并没有通知党部，没有用适当的方法来反对这样没有监督的公共组织的存在。

报告接着详细说明了以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为代表的一派人在反对旅莫支部和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问题上的积极作用，肯定了他们在拥护与帮助阿戈尔及教务处反对拉狄克的斗争中尽到了一个党员所应尽的义务。同时，报告根据大量的信件，说明在军校同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次关于互助问题的议论，因而“断定组织互助会的企图是存在的”。但报告指出：“关于这个会的组织上的存在是绝没有确实证明的，也更无有材料可以证明他现在仍然存在”。报告接着对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所提出的关于“江浙同乡会”的章程、组织、反革命行动、帮助反动派等等所谓“证据”，逐一进行了剖析。在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的章程问题里，报告做了如下的分析：

章程是任何人都没有看着的。陆贻松的信中曾有章程第一条是缴纳会费这一句话。陆贻松自己现在解释说，这完全是一个笑话。许多其他的同志也这样说过的。李沛泽给委员会的声明书中说，王长熙曾看见章程的。但将李沛泽唤到监察委员会我问她的时候，她说王长熙是看见了一封信，这封信上说了章程的。格伯乌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曾说了以下一个关于有章程的事实。他说：

“炮兵学生孙发立及王长熙看见了朱茂榛那里藏着一个秘密同乡会的‘党纲’（互助会的章程），内中有很多条文”。王长熙及孙发立看见了什么，关于这，一点材料也没有。假使再来看格伯乌的答复，则他又说：“暑假的前几天，张式沅曾看见了一个同乡会的会员，他在抄

写一本小书，书面叫做‘工作计划’，有很多条文，狠小的字”。……米夫同志曾调查了这件事的，当着一个学生如获珍宝似的拿给了米夫，以为这就可以破获一切“同乡会”的罪人，米夫将这件东西拿给翻译一看，原来是 1926 年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计划。这就是所谓秘密章程，这就是张式沅看见的！我请问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以及各负责的同志：一个一百五十人的组织，存在了一年多，格伯乌以及中国代表团关于这件事得了许多报告，格伯乌由“同乡会”的会员也得着了许多的材料（据格伯乌 7 月 13 日调查），而任何人都不知道章程是什么样，这个道理是否讲得过去？我请问：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他有政治的目的（照格伯乌的结论说），是要夺取中国共产党及军事中的领导，而他的章程的第一条偏偏是说的会费，这个道理是否讲得通？我敢断定，谁人也没看见章程，章程是没有的，互助的企图是有的，不是到处都有组织，这些同志没有任何政治目的。

没有章程，也谈不上有什么组织，那么中大党部以及中共中央所列的那众多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成员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报告分析说：在材料中间的所有调查，有许多自相冲突的地方。同是一个人，又是“同乡会”中间的积极分子，而又出来很积极的反对他（何尚志）。甚至于中共中央委员也有被说成与江浙同乡会有嫌疑的。有一个调查上说瞿秋白道：“这是一个政治投机者，在中国共产党分化的时候，夺取了总书记的位置，他想组织自己的一派，来用以进攻其他的负责人”。而在底下又说：“为使同乡会发展起见，必要与瞿秋白这一部分发生部分的关系”。在这一个“同乡会”中间，内中有俞秀松、周达文、刘仁静、彭泽湘，但是稍为比较接近(熟悉)一点的同志都知道，前两个与后两个中间，都是时常不断的冲突的。为什么做出了这样的调查？这仅仅是根据着个人的倾轧、猜忌、仇恨吧？

结论：这些消息(是)不能相信的，所根据的都不是事实，而是猜想、谣言、不正确的报告。

报告在逐项否定了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的指认后，最后明确提出，这个问仅仅是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因此解决这件事的正确办法应当是，对于企图组织互助性质的小组织而未向党报告的党团员，”进行必要的党的教育“。同时：

１）组织一个委员会，其成分以（１）皮亚尼茨基、（２）国际监委、（３）中国代表团、（４）雅罗斯列夫斯基、（５）米夫(构成)。委托委员会起草一个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要向他们解释在现在中国共产工作困难与白色恐怖之下，虽有一点小的党内斗争，小的派别，小的纪律的破坏，虽有一点组织秘密团体之小的企图，虽然为的互助等等，他都可以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有非常之大的危害。要号召同志们坚决起来肃清到处同志关系中之不健全的地方，加紧理论与实际的工作，认清这种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预备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２）在各校中国同志大会中宣读这封信，要与同志们谈话，要完全肃清同志中间之相互不信任的空气，警告苏联境内之中国学生，虽然(如果)有了小的派别，相互的斗争、倾轧、无根据的毁谤……，都要受党之适当的组织的制裁。

３）肃清格伯乌关于“同乡会”的材料。

雅斯罗列夫斯基的报告轻而易举地说服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甚至格伯乌的领导人也主动承认米利斯等负责此一工作的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只有与会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苏兆征两人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坚持了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看法。为了说服中共的代表，会议几乎是不间断地进行了十一个小时，最后，会议放弃了这种努力，通过了苏共监委提出的决议。对

此，周恩来和苏兆征当场表示，他们不能同意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和联席会议上其他同志的态度，尤其不能接受这一决议，因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这样一种重大的结论，无论如何”过于仓卒“，只不过，他们目前不打算继续在这次会上提出另外的提议，他们将以代表团的名义向俄共中央政治局说明他们的看法。

联席会议的决议明确肯定："1927 年之'同乡会'是一种苏联境内各校之中国学生企图组织物质上之互助团体，其他的政治目的是没有的"。并且，联席会议"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断定它已经有了成形的组织"。所有关于参加互助的中国学生与反党反革命的右派、第三党相勾结，企图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凡因此而受到嫌疑被派遣回国或受到处分的学生，一律重新审查。一切有关这一组织的材料均停止生效。并且今后苏联境内任何中国党员团员的反革命罪名，均应由中央监委和国际监委立案审定。

几天之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前此文件和代表团意见起草了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8 月 15 日，代表团正式讨论和通过了这封信。在这封信里，周恩来宣称：中共代表团一直认为此事应该由中共与苏共两党共同组织委员会进行讨论，但没有想到"办理此事的中共代表团差不多仅仅站在一个与闻的地位来参加讨论，并没有一贯地负过什么共同解决的责任"。中共代表团确信："依照中央监委的决议，只有使群众更加愤懑，同志的关系更将无法改善"。因为，不仅代表团，而且多数中国同志都确信"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信中再次列举了陆贻松等关于"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的信件，肯定"江浙同乡会或是互助会已经存在，它并有名称、会章、会费、会员和登记手续等等"。并且批评雅罗斯列夫斯基关于一个政治组织的章程第一条不可能是讲会费的说法，说"假如我们从追究这个秘密组织着眼，又乌知他们这种秘密组织不会故意将会费列在第一条？"至于该组织同反革命党派的关系问题，信中一方面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还无材料可以证明"，另一方面又举出蒋经国 1927 年 8 月还得到其母亲所寄的三百元钱，和潘锡朋袒护过国民党右派分子，董亦湘曾主张吸收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邓毅生入党的事，说这几件事都表明，"江浙同乡会的个别分子的确与其他党派还有些牵连的关系，这在客观上是要有反革命的嫌疑的"。

但是，在苏共中央监委以及格伯乌等各苏联有关部门已经根本上否定了这一事件之后，中共代表团自己要想单方面的继续追查下去，或是坚持对上百名受嫌疑的学生进行处罚，显而易见是不大可能的。何况，通过雅罗斯列夫斯基的报告和联席会议的讨论，周恩来等人也清楚地意识到，前此向忠发等人和格伯乌用来为所谓"江浙同乡会"及其嫌疑者定案的种种证据，确实很难完全成立。自己无论如何不能指望，苏共中央政治局会支持自己建立在过去那些"证据"基础上所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中共代表团不能不在两方面作出重要的妥协。

其一，既然前此绝大多数的指控都只是建立在推测和派别观念的基础上，如今只好放弃对众多学生的这种指控。结果，代表团相信有根据可以指认的"江浙同乡会"分子，只剩下了十二个人，因为这十二个人的通信中都明明白白地提到过"互助会"的事情。于是，由于找不到类似的证据，周达文干脆被排除在外了。至于俞秀松，因为是教务处派的首领，又曾对卢贻松、蒋经国说过写信要小心，毕竟仍值得怀疑，但也只能列入"嫌疑"之中了。信中就此说道：

我们现在提到他的分子，只能依据实际的材料指出：蒋经国、卢贻松、朱茂榛、周策、刘仁寿、胡世杰、刘宜山、张师、尤赤、郭景纯、甘青山、黄仲美十二人是有直接证据参加互助会的秘密组织的。俞秀松则是犯有重大嫌疑的。曾肇时、薛萼果[5]（在东大翻译室会谈的

事便是指他的地方，薛当时回答是在他那里烧鸡吃）、

陈启科（李沛泽所见的会谈地方便是在陈启科处）、董亦湘、西门中华、潘锡朋是犯有嫌疑的。

其二，根据中共中央通过的决定，代表团自然不能放弃对“江浙同乡会”的存在及其反党性质的严重怀疑，但既然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组织的存在和它具有政治目的，他们已不能指望苏联专政机关会继续参予对此事的处理，只能把它当作自己内部的问题来定性和处置。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由他们起草的新的决议草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已经从原有的决定上大大后退了。草案称：

１、根据现在所有的材料，证明在苏联境内有一部分中国学生的党员团员于一九二七年秋季曾开始组织了“互助会”（或名江浙同乡会）这一对党秘密的组织。它有名称、会章、会员、会费及登记手续等等。

２、因为过早公开了这个问题，所以未能继续发现这个组织的章程内容和其他更严重的材料，以致对于这个组织整个的一定的政治纲领和目的，现在还是不能确实判定。

３、但这个组织……绝非纯粹的“互助”或“同乡”性质的组织，必然要有政治意义的，至少也已存在了党内小组织的派别。

４、对于已经证实参加这种秘密组织的分子和嫌疑人，须分别加以组织上的纪律制裁，前次关于十二个军事学生党的决定，也在这个条件下重新审查。

8 月 17 日，中共代表团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上述文件之后，也向苏共中央监委提交了它们的复本。次日，雅罗斯列夫斯基也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一份有关情况的说明，再度指出，有关“江浙同乡会”问题上，格伯乌的调查人员根据　没有证实还不十分可靠的材料　即草率得出结论，明显地是错误的，米夫和向忠发“根据还未证实的消息，在学生群众中间作了那么严重的报告”，同样地犯有错误。他不能理解，在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各有关方面重新全面核对了所有事件材料之后，在所有与会的委员“一致同意”中央监委所提出的报告和决议的情况下，中共代表团仍旧根据那些几乎不能成立的材料坚持要处罚俞秀松等同志。他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中共代表团坚持要处罚的多数同志，事实上恰恰是“比在苏联学习的一般的中国党团员要好些的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视为“反革命”？

8 月下旬，苏共中央政治局受理了中共代表团的来信，并派出代表参加有苏共中央监委、格伯乌和中共代表团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几方面的意见。但苏共中央政治局调和苏共监委与中共代表团分歧的努力，显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这时，苏共中央监委已经起草了一份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及党团员书，指出中国部分学生只是“企图组织”一种物质上的互助团体，并“把能够引起严重而且有危害的结果的东西当作开玩笑”，肯定“没有证据来确切地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曾经存在过”，但强调这种行动仍旧是错误的，只是“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应采取党的教育方法”。而中共代表团明显地不同意这一文件，经过周恩来修改之后，“企图组织”变成了“曾经组织过”；“……当作开玩笑”变成了“……当作开玩笑来掩饰对党秘密的组织”；“没有证据来确切的断定这

种互助会的组织曾经存在过”，变成了“党没有证据来确切的断定这种互助会的组织现在还存在没有，但根据党内现有的材料，却能指出这种组织过去曾存在过且是对党秘密的，故党必须对于这种组织给以坚决的裁判”；“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应采取党的教育方法”，变成了“我们对于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们主要的是采取教育方法，然而，同志们应该了解，如果党的教育方法显出不足　　时，则党对于不通知党而参加在党的机关监督之外，由苏联境内中国学生所构成的这种互助会组织以及其他任何派别或组织的同志们，不能不采取最后的组织办法”。

应当指出，周恩来事实上仍旧再度作出了妥协。因为它已经不再坚持该组织“必然要有政治意义”和必须对其成员“加以组织上的纪律制裁”。但他仍旧坚持：（１）“江浙同乡会”事实存在过；（２）它的性质至少是党内以同乡或亲友为基础的秘密派别组织，“这种组织的发展前途有不只限于互助同乡的性质，而成为政治性质的可能”；（３）对其成员必要时仍须诉诸组织办法加以制裁。但这时周恩来的处境确实比较难。在一次会议上，鉴于“同志关系坏到万分”，周恩来强调了一句同志间要取消一切政治名词性的无原则的相互攻击，结果就立即受到与会者的批评，说是现在说这种话“很容易被人误解，被人利用之反对党以与党部对立”，迫使周不得不马上发表“声明”，说明自己毫无否认这种政治名词在某种必要时的批评作用。

显然，周恩来等人已经让无可让了。再让，不仅新任总书记向忠发过去的一切说法和中共中央就此得出的结论，必将全部推翻，而且各校党部必将成为众矢之的。结果，不仅有可能影响新中央的威信，而且可能使众多因此一事件受到影响的中国学生和前此怀疑他们的其他中国学生，特别是各校党部，形成严重的对立。面对这一极为复杂微妙的情况，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代表也很快放弃了公开解决这一事件的努力。9月初举行的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代表提出的建议，中共代表团必须停止利用前此一切与此事有关的材料，放弃追查“江浙同乡会”的一切努力和处罚有关学生的任何尝试。同时，联席会议也须停止就此一事件做出公开结论，以免进一步恶化中国学生之间已经极不正常的关系。为了解决中国学生之间的矛盾，联席会议决定发表一告苏联境内中国学生书，要求中国学生必须把一切精力集中到学习列宁主义理论和研究苏联及中国革命经验上来，必须加强党的纪律的教育，根本改变因经济落后而盛行的地方主义情绪，放弃一切无原则的同乡观念乃至派别倾向。

阴云难消

“江浙同乡会”事件，由此不了了之。但“江浙同乡会”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在多数中国学生中间却没有解决。一些列席联席会议的受嫌疑学生回校以后眉飞色舞，奔走相告，而那些认定存在着一个反党的秘密小组织的学生或党部，则侧目而视，怒不可遏。于是，一边认为有，一边认为没有，中国学生中间很快分裂成两大对立的派别，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逢会必吵，情绪对立日趋激烈。由于学校总支部委员会仍大权在握，并且上级亦无人为过去受嫌疑者公开洗刷罪名，因此，事实上各校中，特别是中大内受嫌疑学生及其同情者仍占少数，甚至继续受到政治歧视。面对这种情况，在暑假休养期间，他们不仅公开游说，而且私下串连，征集签名，准备致信共产国际监委和苏共中央监委，要求立即公布有关“江浙同乡会”的调查结论，为受嫌疑学生恢复名誉。结果，这件事为部分工人学生所侦知，并在中大党支部一些人的暗中支持下，以查找所谓“反对派文件”为名，演出了一幕强行搜查同学寝室，双方大打出手的“全武行”。于是，受嫌疑学生的联名信没寄出去，到引来一

个中央调查委员会来解决中国学生之间的打架问题。

中央调查委员会如何解决这一打架事件，严格说来并不重要。既然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与中共代表团等各方面达成了协议，这件事的解决也只能就事论事，它不会给受嫌疑学生带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但在这次调查过程中，调查委员会曾召开过学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通过这些会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时中国学生之间究竟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矛盾，“江浙同乡会”事件究竟在他们中间留下了怎样严重的后遗症。

在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召集的党内同志谈话会上，两种意见就针锋相对。一种意见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问题是造成此次打架事件的根源，不解决“江浙同乡会”问题，就不能根本解决同志彼此之间的猜疑和对立。而“江浙同乡会”问题，其实是两部分同志造成的，一方面是学校领导，如米夫、别尔曼等轻听轻信所做的不负责任的报告，把事情说得无比严重，另一方面是党支部委员会和一些学生干部，如陈原道、陈绍禹等，搞无原则的斗争，借机蓄意宣传，上纲上线，无根据的鼓动学生们互相在公开和背后揭发检举，造成同学之间的互相猜疑和感情对立。然而陈绍禹、秦邦宪、何子述等人却针锋相对地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斗争，都是原则上的斗争；领导者说“江浙同乡会”有反革命的性质，“完全是这些小组织的同志们的错误，而不是领导者的罪过”。“要是米夫不报告出来，现在恐怕已经成为事实了”。

在调查委员会召集的中大教员班和职员班学员谈话过程中，以西门中华、薛萼果等为一方，以陈绍禹、李竹声、盛忠亮等为一方，双方又再次发生面对面的争吵。西门中华明确认为：“江浙同乡会”问题，是“指导机关的大错误”，不仅是学校指导机关，而且也是党支部委员会的原则上的错误，它在同志之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完全破坏了同志关系。直到现在，党支部委员会仍旧不做自我批评。“休养所之事，收(搜)查不是偶然的，而是支部有组织有系统的准备的，目的在于妨碍自我批评”。陈绍禹等立即反唇相讥，称：什么自我批评，还不是“有一部分同志要在自我批评的口号之下来煽动反党”？休养所事件，说到底就是“联合几个同志专门反对党的决议”。陈甚至明确指责西门中华为“先锋主义的代表”，理由是他身为青年团支部书记却一再与党支部唱对台戏，不接受党的领导，公然怀疑党所决定的清查“江浙同乡会”的工作。他再次宣称：“如果没有米夫和向的宣言，这个组织有到反革命组织的可能”。对此，薛萼果等当场反问：请你说明“江浙同乡会”“是谁组织的？”你说“党的争斗都是有原则的，一般的是对的，但江浙同乡会有什么政治意义和理论呢？没有。不是政治性质的嘛。可是领导机关不能引导争论，却在大会上宣言是反革命的等等，这是正确的吗？”而且，最先在墙报上说这个组织是反革命，说它与第三党有关系的不是陈绍禹吗？米夫和向忠发还说在陈的后头，陈绍禹又是根据什么呢？现在米夫又说“江浙同乡会”不存在了，你们怎么解释呢？对此，陈绍禹等当场群起而攻之，斥责薛萼果等继续为“江浙同乡会”辩护，是严重的“反对党的决议”。薛萼果毫不示弱，称：“江浙同乡会”问题根本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是党部为压制批评而挑起的政治纠纷，“支部口头上说赞成自我批评，实际上批评了就说他是第二条路线或江浙(同乡)会”。

从以上的谈话过程中可以清楚了解的一点是，陈绍禹的地位确实不同一般，他已开始成为中大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派别。显而易见，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这场反“江浙同乡会”的事件。这一事件最初固然不是他所挑起，但因为他可以接近米夫，因为他一度作为向忠发的俄文翻译早早了解到格伯乌的掌握的各种材料，从而便利了他在中大的这场反“江浙同乡会”的运动中充当一种未卜先知、呼风唤雨的角色，迅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正因为如此，陈绍禹不仅不会轻易承认这场斗争的错误，并且还要千方百计地把自

己的这种角色演下去。可以肯定，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稀泥”的决定和中共代表团继续认定“江浙同乡会”为秘密小组织的情况，便利了陈绍禹继续充当反对“江浙同乡会”领袖的角色。与此同时，学校里多数工人出身的学生与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之间矛盾的存在，也为陈绍禹一派提供了某些群众基础。

在中大，第一届学生中工人学生非常少，第二届则明显增多，但在第二届学生的总数中仍占绝对少数。因此，在前两届学生当中，工人学生与一般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学生之间，一般看不出明显的矛盾。但在中大的派别斗争之中，由于工人学生通常较为靠近党组织，守纪律，加上自己在理论及俄语学习等方面往往跟不上学习进度，对教务处工作及俄国教员，特别是拿着高薪的翻译的工作不满意，因此，他们多半倾向于党支部委员会一派，事实上多反对教务处一派。只是，因为这时工人学生人数相对较少，所起作用还不十分明显。可是，到了第三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届学生的成份恰好相反，工人学生已占到了整个学生人数的将近四分之三。这些学生自来校之日起，就与小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矛盾。由于他们到校之后，第一届学生多数已经毕业离校，因此他们在学校中的作用自然举足轻重。当清查“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来到时，他们理所当然地站到了党支部委员会一边，必欲清算所谓教务处派和第三派。这样一来，陈绍禹更是如鱼得水，他的观点在一年级学生当中颇有市场。而这次强行搜查并打架，也正是一年级的工人学生干出来的。

要了解一年级工人学生这时的心态和倾向，只要看一看 10 月 5 日一年级关于打人事件的讨论会就可以了。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明显地占据着压倒的优势，不仅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而且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做得对。称：“江浙派竭力宣传，反对学校当局，暗中串连，并有宣传品”，为什么不能搜查？当有发言者讲：“我们有党，应用党的纪律解决一切问题，不应当打人；我们是共产党员，应当展开批评，不应当互相搜查，而应用教育的方法，……对同志不应当加以政治帽子”时，其他人则大声鼓噪：“他们宣传不应该搜索他们，试问我们应当反对他不？他们要反共、反苏联啊！”“工人同志打人，因我们缺乏知识”，可对于“江浙同乡会”的存在，“我们有证明文件”，谁让他们“说我们造谣的”！况且“每次开会都是乱七八糟，都是反对派挑拨，不是江浙派是谁？”当有人发言说应该尊重事实，“不能不考察事实就乱放炮，说有江浙派”。一些发言者则大呼小叫：江浙派是有的，反党行为、第二条路线都是有的，这些“我们工人看得清楚，他们有知识，来造反对派，我们工人都应该起来与他们奋斗”，“打倒这些王八蛋们！”有些工人发言更坦率：我们没有知识，不会说话，来苏联是想跟大家学习，将来也可以提高地位，但“来此一看，不然了！高等的、中等的、低等的，不平等了”，“你们也有一百多元的，二百多元的，你们要革穷人的命吗？”“在预备班提出打倒教员的口号，这是谁提出来的？他们想谋害我们工人同志，不叫我们学习，他们学习得多，他们回国可拿大皮包，我们给他们拿枪。他们只想他们知识阶级学习，不使我们学习”。

不难想象，一个小小的调查委员会是不能解决中国学生中这许多问题的。事实上，他们前后只进行了不到十天的调查，就草草地宣告调查结束，结论是：“休养所事件，有同志搜查同志文件，以为这是很好的事情，被搜查者则以武力相抗，这只有在中共的大学中才会发生。搜查的同志是不对的，是呆的，即使有同志是反对派，或者反革命，可以由格伯乌或党检委去办，所以搜查的同志是不正确的。当然，被搜查的以武装方法来反抗也是不对的。”但是，对于学生中反应强烈的“江浙同乡会”问题呢？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只不过，在报告会上，当有人继续指责休养中一些人秘密征集签名为“江浙同乡会”事件翻案是“反党行为”时，报告人还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向上级写信反映意见是有权利的”。问

题仅仅在于，当各个中央已经决定放弃公开解决和评价“江浙同乡会”事件之后，这种权利实际上是不受重视的。

当然，还是得庆幸受到“江浙同乡会”事件牵连的这些中国学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没有变得象后来那样多疑，苏联也尚未开始搞肃反，对反对派也还未大开杀戒，因此，苏共领导人看上去比中共领导人还要清醒许多，从而使得这次被怀疑和处分的那些中国学生，包括俞秀松等，一时多半都得到了解脱。但既然没有人宣布“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中共代表团既然拒绝为一切嫌疑分子解除嫌疑恢复名誉，陈绍禹一派整人者仍可以而且必须要利用这根大棒子打人，在其视力范围所及的那些被嫌疑者也就永远也脱不了干系。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或新的运动来临，他们必将首当其冲。

中山大学从此后直到最终解散，几乎再无宁日了。不仅学生之间斗来斗去，各种名目的斗争没个完，苏联党也日渐兴起了整肃和清洗之风。纵使逃过了学校内部的斗争，阶级斗争的大棒子被高高祭起之后，“江浙同乡会”这样的政治帽子随时都可能成为整人的工具。尽管像周达文这样的人始终没有放弃过同陈绍禹的斗争，但最终仍旧不是对手。后来，“江浙同乡会”之所以被说成是什么托陈分子（即所谓托洛茨基和陈独秀分子）的秘密组织，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人之所以被说成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并先后受此牵连而被捕冤死，何尝不是由于这个倒霉的“江浙同乡会”事件?其实，不要说涉嫌“江浙同乡会”的学生，就是中大那些曾经拥护教务处派、第三派，或同情俞秀松一派的仍在苏联的中国学生，后来又有几个不曾受到迫害的呢?

在整个“江浙同乡会”事件被怀疑人中，唯一没有受到严重政治迫害的，大概也只有蒋经国一个人了。从苏联档案中可以看出，蒋经国不仅曾被视为“江浙同乡会”的首恶，而且苏联当局还清楚地知道他曾积极参予过莫斯科中国学生中反对派的活动。显然是因为考虑到他的特殊背景及可能的用途，俄国人坚持不能动过他一个指头。至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所描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充其量也不过是因为俄国人在他没有太大用处时将他下放到偏僻地区去“冷藏”了几年而已，与那些先后因为“江浙同乡会”事件被处置，甚至死去的同学们相比，他幸运得太多了。

当然，由于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和死亡，由于苏共中央很快介入并在事实上使事件不了了之，因此，“江浙同乡会”事件也许算不上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案件。但是，考虑到这一事件的后果，联想一下我们后来经历过的种种运动，它是不是仍旧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呢？

----

[1] 任卓宣，即叶青，四川人。早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1926 年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 年底回国，1927 年底被国民党逮捕，后遭枪毙未死。伤愈后向国民党告发中共同事并投降。此后即以叶青为名从事反共宣传工作。1949 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最后病死于台湾。

[2] 有关这时来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学生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行的报告 ，可详见于 1925 年 11 月 6、7、13、17、24、28 日党部召集新到组长谈话会记录。在这些记录当中，分批率队前来的各队指导员、书记，根据袁庆云、刘伯坚等旅莫支部负责人的要求，对同队人员品行大

多评价不高，较多的评语是“性燥”、“粗暴”、“个性强”、“有个人色彩”、“作事无条理”、“对团体认识不好”、“无政府主义色彩很重”等。

[3] 联邦共产党，即联共或称联共（布），亦即苏共。因为苏俄于 1923 年改国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简称苏联，故苏共渐改称为联共。

[4] 有报告甚至声称，“江浙同乡会”的中央机关为“中央干事会”，下设三个部，即“组织部”、“宣传部”、“宣传煽动部”，还直辖四个组，即“侦探组”、“军事组”、“翻译组”和“交通组”。组织部下还另设有“党部”、“党团组”，管理着各校支部及支部下的各小组。

[5] 薛萼果，即经济学家孙冶方。

请放下你的棍子

——质疑沙健孙教授对胡绳先生的批判

胡绳先生自 1997 年起就陆续在刊物上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说法，甚至区别于他本人过去说法的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的色彩”。他自己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建国以后要过十多年的时间才能搞社会主义，至少也要用这样长的时间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在 1953 年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后，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只用了三年时间就人为地促成了所有制改造的飞速完成，并且从此开始采取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包括彻底消灭其“尾巴”的极端作法。实践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过急过快的结束新民主主义，放弃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使中国的发展走了太多的弯路。

我国的宪法有言论自由之规定，且即使不以言论自由论，胡绳先生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学术探讨，纯属个人见解，是耶非耶，百家争鸣，应当也为政策所允许。同样，对胡绳先生的观点，开展一些讨论，一些人赞同，一些人反对，改革开放到今天，平等交换看法，打些笔墨官司，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1999 年《中流》杂志接连发表的几篇文章，有时却不像是在讨论问题，冷嘲热讽，口诛笔伐，动辄气势汹汹地加以质问和谴责，甚至慷慨激昂地把胡绳先生的上述看法同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罪名联系起来，声称：“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依着他们吗？”这种文章读起来，时常会使人联想起当年的那种“文革语言”，实在有些让人不寒而栗。

何谓“文革语言”，其实归纳起来主要就是两点。一是片面武断打棍子；二是上纲上线扣帽子。所谓片面武断，就是只讲一，不讲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所谓上纲上线，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问题，非给你扯到政治高度上去批判不可。试想，打你一顿棍子，没问题也变成有问题了，然后“验明正身”，自然不难扣上一顶顶帽子。沙健孙教授在《中流》上两度发表的长篇打头文章，也多少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

沙教授的第一篇文章，上纲归上纲，多少还有点笔下留情，只说“有人”如何如何，没有像同期杂志上黄如桐、范庥的文章那样火药味十足。但沙教授的第二篇文章，不仅接过黄、范两文的论据与文风，而且赫然宣称要批判胡绳先生“对毛主席的批判”了。文中给胡绳先生扣的政治帽子实在吓人。比如说胡绳先生的观点是列宁、邓小平都严厉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说“对于毛泽东所作的这种指责，带有严重的、根本的性质”，实际上是认为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说胡绳先生的观点，不仅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是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而且是违背党章总纲、背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随便把这里面的一顶帽子拿来扣在一个普通人头上，倒回去二三十年，不被打成反革命，也得被打成右派。想当年，邓小平不就曾经被“四人帮”用一个“庸俗生产力论”的罪名在全国上下批得“体无完肤”吗？

沙教授凭什么把胡绳先生对以往历史的一种个人看法上纲上线到如此高度呢？那就是靠片面武断的分析法了。表面上看，沙教授的文章不是不讲道理。他虽然照搬黄、范两文的论据，但引经据典，环环相扣，分析起来也头头是道。问题是，明眼人一望即知，他的经典和依据，往往是些似是而非的一面之辞。

比如，他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的断语，来批判胡绳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被人为加速的说法；他用胡乔木关于五十年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来证明三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水到渠成，然而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选择的这种必然性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长短、彻底与否，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逻辑联系？作为中共党史教授，他当然知道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本来规定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要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即 15 年以上的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他也很清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表是被毛泽东改变了的，是毛泽东 1955 年 7 月 31 日批评党内“小脚女人”，才促使各级干部运用政权的力量，全力以赴，把原定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神奇地变成了只争朝夕的一年半，即从 1955 年下半年起到 1956 年下半年就飞速完成了这一工作；他当然更熟悉历史决议中对社会主义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被人为加速的那些批评，即“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等，但他对这些都避而不提，仿佛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并不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谁要是说社会主义改造人为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等，就是企图否定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企图否定中国对社会主义的选择。

又比如，他强调邓小平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的进步”，以此来证明胡绳先生批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是“无稽之谈”，却对邓小平关于这三十年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发展太慢”，尤其是“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这一重要判断不置一词。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落后国家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的仅有的一些语录都罗列出来，以此来指责胡绳先生不过是重拾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却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社会主义必须也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这一常识性观点闭口不谈，好象马克思所谈到的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极大地优越于封建主义的人类文明的重要发展阶段，只不过就是一个“工业化”问题而已。

沙教授等人的武断片面，最让人难以接受的可能还不是这一类生吞活剥的“语录战”。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谁都明白那些摘章断句的“语录”里面陷阱太多。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对毛泽东都不搞“两个凡是”了，谁又会相信马克思、列宁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呢？沙教授等人的文章中，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还是他列举的那些所谓的“历史事实”。因为按照沙教授等人的说法，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不仅毫无失误可言，“而且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比如，“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 4.8％，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此后中国所创造的举世公认的成就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取得的。”黄如桐就此提供的数据是：“从 1952 年到 1979 年，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以年增长率 11.2％的速度增长。尽管‘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言外之意，这种历史决议已经批评了的“简单划一”的公有制形式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由此推演下去，人们大概完全有理由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那就是，1978 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恢复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的局面，重新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不仅动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成果，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客观上也没有多少必要性。－这难道是沙教授等想要得出的结论？

事实真是如此吗？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量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实际情况与沙教授等人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 21 年，即从 1957－1978 年这段时间，无论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远不如 1949－1956 年七年新民主主义时期和 1979－1998 年的改革开放时期。那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确实有必要进行改革，而且不改不行。

首先看改造前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年均增长指数：（表一）

	1952 比 1949	1956 比 1952	1956 比 1949	1957 比 1956
国民收入总额	19.1%	10.0%	13.9%	4.5%
农业增加值	14.2%	3.9%	8.2%	3.1%
工业增加值				

34.6%
21.7%
27.1%
11.6%

表一所列数据中，1952 比 1949 年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6 比 1952 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前期，1956 比 1949 年七年时间实际均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由表一可以看出，在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七年当中，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相当高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1957 年的经济年增长率就比 1952－1956 年低了一半甚至更多。如果说 1957 年的数字可能受到了反冒进的某些影响，那么从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其经济增长率仍大大地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见表二）

改造后 1957 年及其以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年均增长指数：（表二）

1957 比 1956
1962 比 1957
1965 比 1962
1970 比 1965
1975 比 1970
1978 比 1957

国民收入总额
4.5%
－3.1%
14.7%
8.3%
5.5%
5.3%

农业增加值
3.1%
－6.0%
11.7%
3.0%
3.5%
1.8%

工业增加值
11.6%
1.8%
21.3%

12.3%
8.3%
9.4%

表二所列数据中，1962 比 1957 年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 比 1962 年为经济调整时期，1970 比 1965 年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5 比 1970 年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78 比 1957 年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 21 年总的统计。其中除了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因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为负增长，因而增长幅度看起来较高外，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 1978 年，整个这 21 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如沙教授等人所声称的那样，“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

为便于读者直观地比较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时期和改革开放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情况，我们不妨将三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指数和切实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指数列表说明如下：

三个时期经济总量、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指数：（表三）

新民主主义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后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79－98）

国民收入或国内生产总值
13.9%
5.3%
9.8%

农业增加值
8.2%
1.8%
5.0%

工业增加值
27.1%
9.4%
11.7%

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4.2%(1957 比 1952)
1.8%
7.3%

农民
 3.1%(1957 比 1952)
 1.4%
 6.9%

非农业居民
 4.8%(1957 比 1952)
 2.5%
 6.5%

（注：以上指数均按可比价格计算。表中所以分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是因为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用来反映经济增长指标的统计口径有所变化，改革以前主要用国民收入，改革以后主要用国民生产总值。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国民收入中不包括第三产业，而国内生产总值中包括第三产业。但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很小，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基本上是不断萎缩的趋势。如果把第三产业包括在内，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还要更低一些。）

由表三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经济增长率是三个时期中最低的。虽然在牺牲农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工业的增长保持了一定的速度，但也比新民主主义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都低得多。当然，沙教授可能会说，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基数较小，因此经济增长率容易较高，而 1957 年以后经济的基数逐年增大，增长率理应会小一些。但是，1957 年经济的基数比 1956 年又能大多少呢？为什么改造刚刚完成，经济增长率就成倍成倍地往下掉呢？而改革开放后的基数与以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增长率反而相当高呢？

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粮食产量问题上反映得尤其明显。农业合作化刚刚完成，1957 年的粮食产量就比 1956 年的粮食产量有所下降了（后来公布的数字略有增长，还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修改过的）。以后的情况更加严重。如按人均产量计算，新民主主义时期的 1956 年已经从 1949 年的 418 斤猛增到 612 斤，改造以后即大幅下降，最低的年份只有 400 余斤，到 1970 年也只有 586 斤，到 1975 年时才开始多少超过 1956 年的水平，达到 621 斤。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均粮食产量才迅速攀升到 800 斤。

社会主义改造后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有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在表三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五”时期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率为 4.2%，改造后则逐年下降，最低的时候干脆成了负增长，到改革开放前，年平均增长还不到 2％。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一般百姓可能有着更多的切身感受。在 1957 年以前，虽然少数工业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不大好买，粮、棉、油已凭证限量购买，但政府对猪肉、水产、鸡蛋、豆腐之类的主要副食品尚能敞开供应。改造以后则每况愈下，政府一项一项地开始对城市居民实行定量配给，弄得几乎所有东西都要凭票证购买。即便如此，商店的货架上还经常是空空如也。对此，沙教授等应当不会没有印象吧？根据上述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种种情况，沙教授凭什么说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呢？

说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新民主主义应该按照毛泽东 40 年代的设想和《共同纲领》

的规定多搞一段时间，其实也都只是些“事后诸葛亮”而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在理论务虚会、决议草案大讨论中早就表示过这种意见的人们，无论是十几年前就公开发表文章和著作批评这一点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还是当今年事已高、久病不愈的胡绳先生，有谁打算要把今天的中国拉回到过去那个时代去呢？讨论和研究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有些什么意义的话，说到底不过就是想要提醒人们：改革开放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千万牢记历史的教训，不要再犯恐“资”病，走回头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有一些人不是从生产力的观点出发，不是想办法从民主和法治的角度来解决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总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社”姓“资”，使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即使在邓小平公开批评了这种作法之后，也仍旧有少数人热衷于此。甚至有人著书立说，直接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声称对任何事物都要以其性质作为评判标准，说不问姓“社”姓“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并且批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民主社会主义。

不错，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已经难以解释当前的实践。不仅单一公有制已让位于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份，计划经济已被合理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所代替，分配形式也已经日趋多样化，甚至公有制的概念和内涵也在发生改变，以往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三大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多半已不复存在。再加上非国有经济蓬勃发展，而大批国有企业因改革长期不到位却陷于困境，一些人基于传统观念，对自己心目中的那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究竟何以立足难免充满了危机感。但即便如此，难道人们真的认为把中国拉回到过去的年代，恢复“一大二公”、“简单划一”的公有制体制，重新再把毛泽东请回来，就能解决我们自己所面临的，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到的种种问题吗？坦率地说，今天我们面前的问题确实非常多，但从街谈巷议被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官相护、权大于法，到普通职工迫切需要、却至今仍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有多少是利用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问题呢？如果沙教授等能够看到这许多问题其实是久已有之，不是从十九世纪，而从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高度来认真检视社会主义，是不是比简单地怀念过去，把一切批评过去问题的人视同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张挞伐，更有益于社会呢？

最后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恐怕都不应回避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这 50 年的历史进程当中，新民主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是经济发展最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同时社会政治生活也最为宽松与和谐的两个时期。沙教授等要想证明自 1957 年至 1978 年这 21 年的成就更大，道路更正确，必须找到真正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仅仅用几条伟人的语录，列举几个含糊不清、时期混淆的数据，是不可能让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巨大好处的众多读者改变看法的。

同样，无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沙教授等还应当了解，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是法律赋予每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今天不管法制健全与否，毕竟不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了，甚至也不是 1957 年以后那个人治盛行，万马齐喑的年代了。胡绳先生也好，其他先生也好，都有权表达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研究和思考。沙教授等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不论同意与否，恐怕都应当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地交换看法，为什么非要把问题扯到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的高度上去，禁止别人思想，甚至总是想将对方置于死地呢？请记住：真理不是靠上纲上线和嗓门大取胜的。还是放下你的棍子吧！

何谓“历史事实？

——再质沙健孙教授

《请放下你的棍子》一文在《百年潮》发表后，我一直有些担心。一是编者对文章中的个别地方做了改动[1]，改后的文字显得多少有点“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不像是在讲道理。果然，有读者读后即打电话就此提出了批评。二是文中数字只说明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材料，而没有注明它们来自《1949－1984 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和《1998 年国民经济统计摘要》，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些读者疑惑的并不是文中数字的出处问题，而是它们的可靠性。他们不仅根本不信沙健孙教授等人所列举的那些过于片面、时期混淆，且水份很大的数字，而且连我使用的“文革”后国家统计局经核查缩过水的数字也表示怀疑。说是依据现实的经验和大量历史事实，他们认为，不要说中国的会计制度特别是审计制度至今尚未健立完善，就是 80 年代有可能进行审计，要重新对许多年前为适应上级需要而层层虚报的某些渗了水的假数字进行科学审计，也没有可能。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后到改革开放前 21 年“政治挂帅”期间的经济数字，在他们看来，怕是仍然有太多的水份。

上述读者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年前在一学术会议上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某研究员，他们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负责编辑大型档案资料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据他表示，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核查，他们已经编选和正在编选中的五六十年代的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和数字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这里面既有当年统计手段落后以及方法不科学造成的，也确有地方为适应上级需要和自身利益而虚报瞒报的情况。如今要想挤干这里面的水份，得到比较真实的，可以用来科学评估当年实际经济状况的经济数字，即使是搞经济史的专家，也相当困难。

对过去统计数字的这种不同看法不会影响我文章的逻辑和结论，但由此却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事实”？因为，至少在形式上，我们和沙教授等人的争论，似乎也都是围绕着对某些“历史事实”的不同看法而展开的。比如，对是否存在着过急过快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历史事实”，双方至少在形式上都是在力图依据史料讲话。只不过，沙教授等人在论证这个问题时，不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能用他们自认为的“真理”语录倒过来评判前人闻所未闻的新的实践；不知道应当区分不同时期的经济统计数字；不知道某一方面的数字不能反映整个经济状况的好坏；不知道对他们所列举的数字和某些成就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知道评估历史或现实不能仅仅靠列举几个证据和数字。

要论证某一“历史事实”存在与否，远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由于档案资料的不完整，更由于要对保存下来的史料进行科学验证，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完全可能发生岐异。关于这种情况可以举一个近年来引起颇多争论的问题为例。1995 年，俄国披露了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的部分内容，其中明确提出说：“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对于这封电报，中国的历史学界很快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根本否认毛有这样的想法，因而有伪造说，“与史实完全不符”说，以及毛只是为试探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有意搞的政治烟幕说，理由是此前此后均有文献记载毛是坚持要搞统一战线和民主联合政府的。一是相信毛确有排斥资产阶

级政党的想法，因为此后所发现的一些文献记录表明，毛等人对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心理上是十分排斥的，他们确实也讲过资产阶级政党应离开政治舞台的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是坚持要一党来“领导一切”的。一是认为毛当时既想搞一党制，也坚持统一战线，二者并不矛盾。理由是毛发电时恰逢民盟刚刚被国民党解散，因此毛认为已没有与他党合作建立政府的问题，但毛并不否认统一战线，而且还要搞联合政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工农政府也是联合政府，党与非党联盟也是联合政府。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即使是历史学家，即使占有同样的史料，由于个人的训练、经验、情感和认识角度不同，对究竟什么是“历史事实”，看法也可能很不一致。有分岐并不奇怪。

历史研究中的分岐，有主观解读的问题，也有客观上史料发掘的多少与迟缓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历史事实”，严格说来大都是由大量看似孤立的单个史料构成的。对“历史事实”的理解要求我们必须把这许多单个的史料有机地排列组合起来，使之相互发生联系，从而构成一幅可供解读的线索或画面。因此，对“历史事实”解读的正误深浅，史料本身的发掘就是一个关键所在。如同考古学家对某一文物的发掘可能改变对一个时代存否的判断一样，近代任何一件史料的发掘和披露，也都可能极大地影响历史学家对已知的“历史事实”的认识。受到沙教授批评的“有人”讨论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关系的文章就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按照传统的观点，毛泽东从来都是受到共产国际压制和打击的，毛在政治上的崛起纯粹是长期与共产国际抗争的结果。如果没有发现那些从来不曾引起人们重视甚至是鲜为人知的新史料，我们也许很难改变我们对这一“历史事实”的认知。但是，作者发掘出许多新的史料。我们于是开始发现，1927 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出来就受到共产国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并把毛视为中共党内反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楷模；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上井岗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之举，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最初虽然不甚重视，但 1928 年底以后已是不断地在各种报刊上给予高度评价和表彰；1932 年“左”倾中央虽然依据共产国际的所谓“进攻路线”打击排挤军事主张不同的毛泽东，共产国际领导人却不仅明确指示要爱护毛、尊重毛、重视毛的经验，而且下令提升毛的政治地位，因此 1935 年共产国际大会及其莫斯科的报刊上公开颂扬毛、宣传毛，1938 年王明与毛泽东争权，共产国际领导人决定支持毛，这并不是偶然的。把这样一些新的史料与传统的说法相比较，不论你是否同意他的结论，至少都会相信有必要对以往所知的“历史事实”做进一步的研究。历史研究之所以总是会有争论，之所以必须不断地深入研究，而不能设想一劳永逸地停止在某个水平上，或某种结论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沙教授等是不是也研究历史，尚不得而知[2]。但可以肯定，沙教授也是讲“历史事实”的，而且非常强调要“尊重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他在批评上述文章中，一上来就说：“尊重事实，这是进行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的起码品质。”但让人奇怪的是，在批评伊始，他所依据就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党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写道：上述说法之所以不是“历史事实”，就是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党的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就不能成立了。因为决议明确肯定：‘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姑且不论他所谓的“有人说”是否与他所引的决议文本相矛盾，他评判一种新的看法的基本依据首先是“本本”，而不是“历史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他文中涉及到的所谓“事实”只有两条，即“人所共知”毛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有分岐，和“人所共知”毛受到过“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对于作者文中那些人所不知的新史料，他却不置一辞。显然，他完全不清楚

讨论历史问题的起码规矩，即必须用“证据”（即史料）讲话。

与沙教授等讨论问题，给人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双方对究竟什么是“历史事实”，认知上差距太大。在历史学工作者这里，“历史事实”是建立在大量经过验证的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的，是需要根据史料的发掘而不断补充和修正的，并且是应当允许不同的研究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做出未必一致的解读的。一句话，它首先是一个学术问题，是可以百家争鸣的问题，绝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到了沙教授等那里，“历史事实”却变成了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变成了不能补充、不能修正，甚至不能讨论，不容异议的某种“人所共知”、某种政治结论。而所有“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又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观念当中。符合他们既定观念的，就是符合“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否则就是违反“人所共知”，就是“太肤浅、太没有说服力”，甚或就是违反决议。如此一来，在沙教授等手里，“历史事实”似乎也成了一根可以用来打人的棍子。

如果仅仅是围绕着沙教授等观念中的“人所共知”进行讨论，如果他们仅仅是自以为代表真理，也未必就是什么问题。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沙教授等一面口口声声强调“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一面却随心所欲地演绎批评对象的观点，以便于他们上纲上线来把对方打成“政治错误”。比如，仅仅因为胡绳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急了，他们就断言胡绳教授是要“退回去搞资本主义”；仅仅因为上面提到的文章对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崛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说法，他们就武断地得出结论，说作者认为“毛泽东同共产国际并没有什么分歧”，并且张冠李戴地批评说：“仅仅以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直接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个现象为根据，来证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据此给作者扣上个违反决议的大帽子。更有甚者，最近读到一些署名的或匿名的文章和信件，其中演绎乃至编造“政治错误”的功夫更是了得。任何一篇与他们的观念不尽一致，提出了新的看法，特别是批评了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文章，他们都能够用移花接木和生吞活剥法，摘章断句地生造出许多“严重政治错误”来，然后义正言辞地号召进行“斗争”或要求予以惩处。

改革开放后比较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就是社会又开始出现了相当的活力。这种活力首先就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没有思想的解放，经济和社会的活力是不可想象的。而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前提，首先就要允许在学术上进行研究和探讨，允许学者们依据新的实践提出不同于已有认识和传统观点的新看法。特别是历史学界，也包括中共党史学界，深入研究历史事实，探求历史真相，总结经验教训，对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找到切合实际的前进道路，避免重犯以往的错误，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阻塞言路，甚至像沙教授等那样动辄上纲上线，把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学术上的分歧视同异类，开展政治斗争，搞一言堂，其结果只能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万马齐喑的年代去。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根本方针的一种否定。

当然，沙教授等未必会理解我们的观点。但有一点他们其实应当想一想。即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总是有些人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习惯于政治批判，而一次又一次顽强表现自己的结果是否对社会、对群众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呢？是否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对现实的看法呢？从1991－1992年组织收集学术界的“自由化”言论，到1994年开始批评否定邓小平的理论观点；从起草散发反对思想解放和现行政策的“万言书”，到借科索沃事件否定中央关于世界今天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观点、把加入WTO视同投降资本主义，甚至怀疑“三个有利于”、怀疑生产力标准……，他们是否唤起了更多普通群众对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呢？

还是那句话，评估历史与现实，既要重证据，重数字，但也不能简单地只注意几个“人所共知”的证据和数字。特别是对今天人们亲身经历过的那段历史，事实上一般人的评估靠的主要也不是个别的证据和几个数字，最主要的还是靠他们过去实际的生活体验。正是这种实际的生活体验使他们，也使邓小平选择了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践。邓小平不知道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更有利于集中国力发展工业和国防？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引来竞争机制打破平均主义对于个人来说比“吃大锅饭”有更多的风险？但是，邓小平也好，亿万中国老百姓也好，他们之所以坚定地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走上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市场经济的探索之路，决心摆脱过去左的错误，根本在于他们从亲身的体验中实在厌恶了被阶级斗争的克利达摩剑高悬在头顶，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你斗我、我斗你的“斗争社会主义”；根本在于他们从亲身的体验中实在厌恶了那种时时处处强调“政治挂帅”、“不断革命”、“反修防修”，却要求群众勒紧裤腰带的“贫穷社会主义”。

何谓“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也可以同意说：“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其实也是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只不过，这样的“历史事实”，同样也还是可以得到史料的印证的。即使不相信这样或那样的政府统计数字，城市居民每家每人严格限量配给粮、油、棉、蛋、肉、糖，乃至豆腐、瓜子的票券购物本之类的东西，总是实实在在的凭据吧。

国民党代表谁？

——由胡绳生前对国民党的评论所想到的

一

读《胡绳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1]，能够深切体会到胡绳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相当深邃的思考。他的许多看法，都深具新意，比如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比如指出中国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人都很少，大多数是中间势力，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势力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肯定“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有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次是 1927 年国共合作；另一次是 1946 年旧政协达成和平协议之后。甚至在抗战时期“也可以利用抗战来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一些条件”的。因此，按照他生前的看法，如果当时条件下国民党能够走资本主义道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换言之，如果国民党当年在大陆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间力量大多数跟着国民党走，最后成功的很可能会是国民党。

历史固然很难假设，但是胡绳先生的上述观点还是很能够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和联想。尤其是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是因为没有满足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势力的愿望而失败，这对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史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只是，笔者却马上想到了一个问题，即国民党究竟代表谁？

之所以会马上联想到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看中国近代史的时候，通常会习惯于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这种分析的方法，要求为每一个政党贴上阶级的标签。因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那么做为它的对立面的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代表资产阶级。中国的情况虽然比较特殊，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依照传统，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当中与封建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大概不会有错。既然国民党的基本阶级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它也就自然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论对它在大陆实践资本主义的成绩如何评价，其到台湾后，像胡绳先生所说的：很快“发展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应当是可以印证这一观点的一个事实。然而，胡绳先生如今却告诉我们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搞资本主义。而“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说“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那么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就多少成了一个问题。国民党代表谁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要被提了出来。但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却并没有改变传统的说法。他依然强调：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至于何以说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不搞资本主义，他的解释是说：“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很复杂。”应该说，“国民党代表着资产阶级中不同层次的人，是个复杂的集团。”比如宋庆龄，至少宋子文、于右任、孙科、冯玉祥等，就多半“倾向民主主义，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的倾向本是比较多的”。问题是，“蒋介石为首的主流派，1927 年后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

那么，是不是说，因为国民党的主流派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者干脆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它就不搞资本主义了？这大概也不是胡绳先生对问题的准确解答。因为在世界各国历史当中，以大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形式掌控政权，大行资本主义之道的例子有许多，说大资产阶级或官僚资产阶级就不搞资本主义，也不通。可以想象的是，胡绳先生生前想到了需要肯定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的进步意义，而他对由此所带来的对传统观点的冲击，却尚未来得及做出更加周密的思考。因为我们在他时断时续的十次谈话当中，发现他实际上给了我们留下了至少四种并不完全一致的解释。

一是说蒋介石主观上就不想搞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蒋即使有过想搞资本主义的动作，也不过是为了拉拢中间派所做出的某些“姿态”而已。

一是说蒋介石主流派也不是一点不搞资本主义，问题是“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敢真正反帝，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即“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只能“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十年间（指 1927－1937 年－引者）经济虽有所增长，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

一是说搞资本主义就要赞同民主，蒋介石政治上搞“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结果就搞成了法西斯独裁”。本来抗战时期“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蒋介石依靠的美国也有些人是支持中国搞资本主义的。可是就在这时候，蒋介石却公开提出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

一是说国民党在大陆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关键在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因为按照胡绳先生说明的

情况，其实蒋介石到台湾后，也还只是“半独立的地位”，照样没有实行民主，但他搞了土地改革，就成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二

其实，说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它不搞资本主义，得不到中间势力支持的结果，这个问题本身就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因为一个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共产党也并不就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何以它就成功了呢？胡绳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最早讲应当让资本主义有发展前途的，新民主主义就是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发展。这看起来没有错。问题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奋斗目标，且它正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的，也并不就是资本主义，而是“又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便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形式。它容许资本主义暂时存在和适度发展，但在毛泽东眼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至少是起主导作用的，也应当是社会主义因素，而非资本主义因素。换言之，主张新民主主义，不仅不等于主张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其言外之意，就是主张中国下一步就应当发展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何以还未开始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建国，毛泽东等人就已经在强调新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何以 1949 年“共同纲领”规定以新民主主义为目标不过两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公开改变方针，决心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关于这种趋势，其实还在 1949 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之际，不少中间派人士就已经看出来了。他们不仅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当时就曾建议，不妨直接写上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

更进一步，如果因为强调中国中间势力的倾向具有决定作用，强调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进而使人得出他们是因为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发现毛泽东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因而选择了共产党的结论，恐怕距离事实就更远了。

蒋介石确实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主张。这不仅有其《中国之命运》一书为证，而且也有蒋自五四时期至二十年代许多言论文字为证。但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却不是偶然的，是与当时条件下中国社会思想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师法欧美的，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了。二人百日维新失败，先后流亡到美洲和日本。但目睹了资本主义因贫富悬殊而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之后，他们却极大地动摇了以往的想法，转而开始对正在欧美日本如地火运行般的社会主义平等主张和理想，抱以了同情的态度。康有为随后做《大同书》，梁启超在日本疾呼“社会主义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就是他们思想出现变化的一个写照。

同样的情况，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同样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

值得一提还有 1903 年激情膨湃地写下《革命军》一书的留日学生邹容，在日本两年左右的时间，同样受到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其 1905 年回到上海时，竟在法庭上公开宣告，他今后将以争取社会主义为毕生之事业。

这种情况，即使在十年之后，也同样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五四运动兴起，陈独秀等虽以提倡民主、科学开其端，但在目睹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和亲历了巴黎和会上列强各国的出卖行径之后，这场运动最后也不能不转而以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讨论而收其尾。

综括这一段历史，我们所能了解到的是，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群起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际，恰逢资本主义各国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战争频仍，危机四伏，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接连两度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及其穿插其间的造成世界性大恐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比较社会主义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成长为强大国家的鲜明例证，国人对资本主义抱以怀疑态度，几不可免。即使是胡绳先生提到的少数坚持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其实也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在去过一趟苏联之后，他甚至颇为感慨地告诉他的朋友说：如果中国能够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强大起来，哪怕要暂时牺牲一些自由和民主，他也愿意。直到 1947 年之后，他才开始公开检讨他对社会主义和苏联 20 多年的“梦想”和推崇是一个“错误”。不难想象，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不要说蒋介石，中国多数政治领袖和知识精英，恐怕都染上了某种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比如，以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等为首的中华革命党（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自初创之日起，就确定了“超资本主义的”目标，主张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劳动平民阶级政权，然后“开始非资本主义的建设，而达于社会主义”。

比如，胡绳先生特别提到的，在五四时期曾经主张应当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张东荪、张君劢等人，在目睹 1929 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也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张君励等人之创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标榜的也是要引导中国不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主张用“国家社会主义”的办法，使农民人人都有土地，使工人人人都成股东，然后把公私经济统一在计划体制之下，以达成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目标。

尤具代表性的还有集合了包括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会、乡村建设协会和救国会等诸多党派在内的中国民主同盟，它在 1940 年代初成立伊始，就公开主张要以“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以保障人民经济上之平等”为目的，“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它清楚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存有某种恐惧乃至排斥的心理。

当然，鉴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现实，国人对资本主义的了解和认识，也不能不是相对发展和变化的。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近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多半不希望看到中国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并部分地肯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显而易见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受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曾试图找到一条多少不同的道路。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众多中间势力的想法未必有太大的区别。与其说它是因为不搞资本主义，失去中间势力的同情而失败，倒不如说它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找到一条能够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状态的发展道路，使中间势力失去了耐心与同情，而不在于他是不是赞成资本主义。因为，历史清楚地显示，中间力量并非不曾寄希望于蒋介石。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胡绳先生所谈到的蒋抓住了大题目的那个抗战前期，而且也发生在胡绳先生批评国民党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事实上民族资本在此期间有过明显的发展！）的 1927－1937 年的十年里。只要注意到 1936 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在全国所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他平安返回洛阳和南京引发举国庆贺的

盛况，就足以了解当年中间力量曾经对蒋在此十年中所做的努力，给予过以多么大的肯定。

三

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是由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人所选择的。由于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所制约，这种选择当然不见得尽善尽美。经过半个多世纪讳言资本主义之后，转而承认 1949 年以前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相信“对于国民党统治 22 年间那些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总的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人”，应当“重新作出估价”，这种大胆反思和探索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若是由此使人得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共产党当时更接近资本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或至少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国民党，反而更远离资本主义的认识，难免会让人有点不容易理解。毕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也好，官僚资产阶级也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它都必定反映或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某种生产关系。说一些人代表着，甚至本身就是某种资产阶级，同时却又说他们不搞或没有搞资本主义，这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一种困扰，说起来可以讨论的原因很多。比如蒋介石说的和做的也许未必一致，只看到他不赞成资本主义的一面，却可能忽略了其政策的实际倾向与后果。又比如也许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概念的理解不同，过多地看到 50 年代以后的那个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的变革中的资本主义，却可能忽略了蒋所反感的其实是那个充满了太多的私欲、放纵和贫富悬殊的自由资本主义。再比如可能对历史事实的认知有所不同，过分强调了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作用，却忽略了作为一种现实的生产方式，其虽确有半封建的一面，但它也具有半资本主义化的另一面。（类似的情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左派知识分子中间发生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就出现过。当时一派人认为中国的生产方式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化，另一派则坚决否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有丝毫改变。）但另一个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却在于，一方面注意到历史上的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之间未必能够划上等号，一方面却还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分析的框框。胡绳先生在这一点上的的突破仅仅在于，他强调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问题是他同时又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也不能说错”；说：“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说：蒋介石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官僚资产阶级。”既如此，不宜“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话等于没说。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问题，至少就历史学研究来说从来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历史研究重的是证据，它甚至未必要对国民党究竟代表了哪个阶级的问题做出回答。即使有必要了解国民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历史学者也更多地应当侧重于先就具体时间的具体问题进行考察，看国民党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具体做过些什么，它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及其他有关领域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具体对哪个阶级（亦或是哪些阶级）最为有利。但是，过去的近代史研究当中，谈到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人们却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只是简单地照抄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的种种政治结论。结果，因为国民党在不同时期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共产党对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定性不同，谈及国民党阶级属性的近代史著作，通常也无法得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结论来。1924 年前后的国民党被说成是四个阶级联合的党；1925 年冒出一个“西山会议”派，才开始有所谓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说法；大资产阶级既然已经离开，1926 年蒋介石发动“三・二 0”事件，通过《整理党务案》，就只好被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民族资产阶级走开后，武汉时期的国民党就只好被判定为小资产阶级的代

表了。1927 年以后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被定性为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抗战开始前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又有了统战关系，国民党的地主阶级头衔自然被取消，于是得以被重新判定为资产阶级政党；1940 年以后国共两党磨擦冲突愈演愈烈，毛泽东遂将资产阶级划分成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决心把蒋介石排除在外，由是国民党“顽固派”又开始与地主阶级相提并论，并被戴上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帽子；等到 1947 年内战爆发，共产党人逐渐注意到国民党政权手中的国有资本问题，进而将其划入官僚资本的范畴，据此又认定了蒋介石等人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份。

十分明显，历史上对国民党的这种种定性，更多的是基于瞬息万变的激烈政治斗争的需要，简单地照搬过去政治斗争时期的说法，在今天当然有所不妥。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当年的共产党人也还要因时因地，依据国民党不同时期的具体行动和政策，随时改变对国民党的政治判断，我们今天在谈论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及其历史作用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不加慎密考据，完全离开具体的历史时段和历史环境，用一个阶级或一顶帽子就盖棺论定了呢？当然，历史研究不反对“大胆假设”，问题是这种“假设”性的看法必须建立在“小心求证”的基础上。也就说，当准备我们提出某种看法和观点，纵使是那些可能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观点时，在今天都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否做到胡适先生所要求的：“拿证据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共产党人在 1927 年把蒋介石归类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时，一个美国学者却用实实在在的证据告诉我们说，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 1927 年建立南京政府之后，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其实相当紧张。

国民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严格说来极为复杂，并非三言两语和简单化的一个结论就能说清。尤其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情况就更是复杂。在目睹了共产党几十年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艰难过程，了解到革命党与执政党大相径庭的特性和使命之后，我们今天理应在谈及国民党的阶级属性的时候，表现得更加谨慎和客观。因为国民党毕竟也是一个有过二十多年执政历史的执政党。作为执政党，无论它愿意或不愿意，它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国民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此即涉及到我们今天经常提到的“合法性”问题）。何况国民党从来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共产党那样的革命党，它从来没有共产党人那样强烈的阶级抱负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政治理想。它摆脱革命党的角色，开始扮演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单一阶级利益和阶级目标的执政党的过程，照理远比共产党人要容易得多。

当然，笔者并非认为需要改变对国民党阶级属性的判断。但正如笔者所强调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们怎样去提出问题，包括做出假设，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问题或假设是正确的。可惜的是，至今大陆学者随意使用“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头衔来定义国民党的人很多，真正深入去研究过国民党与国内资产阶级关系的人却寥寥无几。结果是，几乎所有人都理直气壮地继续使用着传统的说法，甚至胡绳先生进行了全新的理论思考，肯定了国民党不等于资本主义之后，也仍旧无法不按照传统观点来看待当年的国民党，可是却没有人具体地研究过那些被国民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金融工商资本中究竟所指为何？以及就历史事实本身，包括从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严格意义上，为什么说蒋介石国民党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2000 年《近代史研究》第 3 期刊登了汪朝光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从日本人当年留下来的档案中找到了蒋介石等人用私人名义在外国银行分存巨款的一些记录。这些来源不清的记录为相信蒋介石国民党是“大资产阶级”代表或“官僚资产阶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

信息，可是却很少人真正重视这一值得深入去考据和研究的材料。因为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个问题都好象早已是盖棺论定，无可置疑的了。也许，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问题相比，这种对一切以往结论全盘照收，不加思考的态度，才是一个更亟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呢。难道人们真的就如此健忘，真的再不记得历次政治运动中轻信他人，不重证据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了吗？政治生活中是这样，历史研究中又何尝不是这样？

要想避免在学术研究上出现明显的错误，甚至要想避免在生活中重演历史的悲剧，我们都有必要时时记住胡适先生的那句话："拿证据来"！

关于重庆"共产党"及其他

——答曹仲彬、郑雅茹两先生

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一文发表后，有幸得到曹仲彬、郑雅茹两位先生的指正，笔者特在此表示感谢。本来，学术研究就应当允许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直接交锋乃至争论，并通过这种在相互尊重对方研究的基础上的交锋和争论，来达到使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目的。尽管，拙作只是有感而发的一篇小文章，曹、郑两位先生的驳论又只是就其中两个十分具体的史实问题提出异议，其看法也确有相当道理，笔者本不应作答，但考虑这一问题实因我们双方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而引起，使人们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可能会对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相互沟通有益，故冒昧再作此文，还望编者和读者谅解，并愿得到曹、郑两位先生的进一步指教。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拙作所考察的共产主义组织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而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曰早期一度"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共产党"，这个"共产党"当然是打了引号的。关于这一点，相信曹、郑两先生都是了解的。问题仅仅在于，能不能把它们看成是早期的一种"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按照曹文的看法，这是不可以的，即使打引号也不行。在曹先生看来，是否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早期共产党组织，都必须具备几个条件。这就是，第一，必须有"原始资料证实"，而这些原始资料又必须是"像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等，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报告》这样有说服力的原始文件"，至少也必须是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样的重要文献才行。第二，必须有"当事人的佐证"，而这种当事人又必须是像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这样的老中共党员才行。第三，必须"符合党的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又必须"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由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与俄共直接帮助下"，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其关键则是"共产国际、俄国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指导"。第四，必须"符合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即"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强调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强调民主集中制的苏维埃管理制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等等。笔者不知道，曹先生是否意识到，他所列举的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在拿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来衡量一切。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只有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和

中共早期参加者的回忆中提到过的，并且是直接得到共产国际、俄共以及上海共产党帮助和指导过的组织，才可以看作是“早期共产主义”的或“共产党”的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不论是否是打引号的。

毫无疑问，曹先生观察问题的角度与笔者有很大的不同。这导致曹先生在讨论重庆“共产党”的问题时与笔者立于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第一，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作为它衡量重庆“共产党”真伪存否的唯一根据，并以当时受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帮助指导的上海共产党对重庆“共产党”的了解及承认与否，作为认定其政治倾向的唯一标准。因此，曹先生全文都是在论证这个重庆“共产党”是否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在他看来，只要能够证明它没有得到过上海共产党的承认和指导，就足以证明它不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共产党”。第二，曹先生是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活动来囊括一切共产主义思想及其组织在中国生长的全部历史过程的，他不相信在中国早期除了在共产国际和俄共指导下由陈独秀等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过其他什么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曾经一度倾向过共产主义，并且一度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相应地组织过有关的组织和团体。在曹先生看来，如果有过什么“早期共产主义组织”，那只能是与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的”已经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共产主义小组”。

笔者的看法与曹先生确有很大的不同。笔者在曹先生所提出问题的这一部分之所以列举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几乎同时存在的几个“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其实只是想要说明一个观点，即“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是如此，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也是如此。而曹先生却力图告诉我们，任何中国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都必须是在共产国际、俄共和上海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之下的，否则，就是不符合共产主义（或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实际”，即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曹先生的这样一种观点，正是笔者所不赞同的。也正因为如此，笔者不能同意以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资料和以它的承认与否来作为衡量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存在与否的唯一标准，更不同意以有无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来作为评价中国是否会发生共产主义运动和产生共产主义组织的历史依据。

有必要指出的是，曹先生显然并没有切实了解笔者在文章这一部分所力图说明的观点，否则，他应当知道拙作所说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绝不是指他所说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共产主义小组”，自然也就不必去论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否是如同“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武汉共产党支部、广州共产党等党的早期组织”一样的“地方共产党”，不必去论证在中国共产党早年的历史资料及党员的回忆中是否有有关的佐证，更用不着去考察它是否出席过中共“一大”。因为这种论证完全没有意义。曹先生应当注意到，笔者在文中已经特别强调过，笔者所提到的几种“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包括“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内，都是“相对独立”的，它们多半并不是在共产国际和俄共的帮助指导下，自然更不是受上海共产党领导的那些“共产主义小组”。因此，我们当然不大可能在诸如曹先生所列举的中共早期历史文献中、中共“一大”会议上、马林和陈独秀的报告中，以及张国焘、陈潭秋、张秀熟等人的回忆里找到有关的记载。事实上，笔者所列举的几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大多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中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多半也并没有得到过当时上海共产党的承认与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组织绝对不存在。有关１９２０年６月在苏俄建立起来的“中华共产党”的资料无疑是近些年来在苏联发现的，在中共早期文献和中共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始终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间在中国存在过的

另一个“中国共产党”，即以姚作宾为代表曾前往苏俄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那个“共产党”当然也不曾见诸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党员的回忆，更不曾得到过他们的认可和帮助，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这个组织确实存在过，并且还在上海共产党成立之前就接受过由朝鲜人巴克京春带来的来自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１９２２年２月在北京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长期以来也没有得到有关文献和回忆的佐证，人们甚至根据一些中共１９２２年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相信他们从没有得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承认，甚至断言“今日”派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些“反动官僚和投机政客”（１）。但近些年来在苏联和中国发现的文献资料都证明，不仅“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确曾存在过，而且它确是试图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的，并在１９２３年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最终并入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尽管，上述历史情况可能“尚不十分清晰”，还应该进一步发掘有关的史料以便给以更多的说明，但曹先生或许应当承认，一个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与否，不应该仅仅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和它的早期党员的回忆中去寻找根据，更不应该仅仅以它是否是属于上海共产党领导并“在上海共产党具体帮助指导下逐次建立起来”，作为论证其真伪的标准。

当然，具体到所谓重庆“共产党”的问题上，除去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文献和有关回忆为依据的那些论证不计外，曹先生的某些论点并不是完全没有讨论价值的。曹先生指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的“可靠性值得探讨”，这一点笔者也深有同感。无论这个组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它关于自身组织规模的说法都不能不让人深表怀疑（２）。但是，曹先生的其他看法却值得探讨。比如，曹先生说：“如果四川确有一个规模宏大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的话，一定会有原始文献或其他历史资料加以证实。可是，现在除这份报告外，却没有任何原始文献或资料能够加以证实”。同时，曹先生又说：“它不像上海共产党、北京共产党小组、广州共产党等，有《中国共产党宣言》、《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这样有说服力的原始文件给以证实。”的确，它“如果”规模宏大的话，但事实上它可能并非如此，只是自吹而已，这一点先生也是明白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求它必须有相应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历史资料呢？至于说这份报告不是原始文献，而《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和《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就是原始文献；同样送往共产国际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远不如《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具有“说服力”等等，笔者更是不明其中奥妙之所在。至少，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也是被当作原始文件对待的，它也并没有被打入另册，而是堂而皇之地与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放在一起。何以说它就不如北京、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有说服力呢？

曹文中最有讨论价值的观点，是他关于“共产党的建党标准”的观点。他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最高形式”（３）。据此，他批评笔者：“不能仅仅根据它‘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这一点，就断定它是‘共产党’组织”。理论上，曹文的观点是无懈可击的。但在文章的行文上，曹先生却似乎犯了两个逻辑上的错误。第一，并非是笔者“断定”“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是“共产党”的，这个概念来自于共产国际的舒米亚茨基，是他在收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之后在给张太雷的信中称之为“在重庆的共产党”的（４）。而这个说法也未必有多少错误，因为既然曹文可以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中引伸出“北京共产党”的说法，那么舒米亚茨基在见到“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的报告”后称它为“重庆的共产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无可厚非。第二，曹文所说的作为无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共产党，和他紧接着提到的那个在笔者文章中的带引号的“共产党”并不是同一个东西。显然，曹文在这里偷换

了论题的概念。曹文论述的共产党，是理论上的共产党；而他批评笔者根据“旗号”“断定”的“共产党”则是历史上的一个实际现象。按照曹文的逻辑，只要是共产党，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可以有人“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断定”它是“共产党”。但会不会有人因此而自称是“共产党”呢？曹先生看来是否认这种情况的存在的。因为他完全不理会笔者在文章中对重庆“共产党”所加注的引号，并把他的不加引号的共产党与笔者的加了引号的“共产党”完全混为一谈。然而，无论是这种作法还是这种认识都是不妥当的。事情很清楚，无论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着这种加了引号的“共产党”的，它们名曰“共产党”，却未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华共产党”难道不叫“共产党”吗？姚作宾不也明白宣称他所代表的党是“中国共产党”吗？显然，叫不叫“共产党”与实际上是不是共产党完全是两回事，不能说一个党因为实际上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能叫作“共产党”。事实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萌芽的早期，存在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到底是不是曹文所说的那种共产党，笔者与曹先生似乎没有多大的分歧。由于拙作当时只能着重于论证那些“相对独立”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因此没有可能对于这些组织的实际政治目标和政策进行具体的分析，但这并不等于笔者相信包括“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内的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是曹文所说的那种共产党。笔者也同意，如果“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确是曹文所说的共产党，那么它最终将会与中国共产党合为一体。然而，这样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发生。不过，能不能因此就推论它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组织”或“无政府主义一类的党”呢？对于曹文的这种看法，笔者也很难苟同。这是因为，在１９２０年秋天至１９２１年春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已经发生了重要争论的情况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恐怕是不会再专程到共产国际去寻求“支持”（５）的。至于说在它的报告中“不强调阶级斗争”、“不提暴力革命”、“未提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没有强调组织纪律”等，因此“不象共产党组织”；那么，在它的报告中也没有提到任何“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６）之类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因此也不像“无政府主义一类的党”。不仅如此，如果曹先生能够注意到报告中关于“我们要建立红军来取代现有的军队”，注意到该组织建立了“书记处”之类的领导机关，确定了正式成员与候补成员之类的人员区别规定，就应该看到它们是与无政府主义关于“无军队”、“无首领”和“自由组织”、“自由联合”，“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宗旨（７）格格不入的。

因为没有达到某种特定的标准，就断定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是非共产主义的或非共产党的，这在现时政治上也许是可行的，但在历史研究当中却未免过于简单划一了。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是复杂的。一个人、一个组织、一种思想、一种运动，都可能存在着由不确定到确定，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我们很难因为他或它在开始阶段或萌芽时期的不确定、不成熟，就简单地否定他或它的基本倾向，甚至在政治上判定他或它的死刑。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曹、郑两位先生考虑问题的角度也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在前文中已经再三说明了笔者所介绍的几个组织的基本性质，即“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笔者之所以提出“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是为了区别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共产党”。这一点，看起来曹、郑两先生似乎不大了解。否则，两先生何以会不约而同地使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即所谓“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暴力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等标准来衡量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呢？要知道，用这样一些标准（据曹文说这还只是“一些主要标准”）建立的组织，多半已经不是什么“早

期共产主义组织”，而已经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共产党了。而“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意思，自然是在这样的党成立以前存在过的，具有初步的但同时又是不确定的和不成熟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不错，这样的“组织”在逻辑上一般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前期的组织，如共产主义小组在内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是或者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甚至也不等于说它一定会变成或并入中国共产党。其实，“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个概念并不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概念而来的，它只是与毛泽东所说的“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相对应的。正是由于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某些“崇尚共产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就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也正是由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后人在评价这样的组织时就无论如何不能简单地拿共产党的建党标准来衡量这种本身尚不确定、不成熟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性质。事实上，即使就中共“各地早期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而言，这种最初的不确定、不成熟也是相当明显的。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参加者相当多数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上海共产党是在成立了几个月之后才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拟定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确定了它的共产党性质。北京、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更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在上海共产党的“具体帮助指导下”为自己规定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及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标准。这些也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能不能说它们因此就不能被看作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或者在明确确定自身的共产党性质之前就不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呢？相信曹、郑两先生也并不这样看吧。既然如此，为什么两先生不能对其他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也一视同仁呢？

什么是“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基本性质？对此，我们当然不能以共产党的建党标准来作为衡量的尺度，而只能以它的组织者及其参加者的基本倾向来作为衡量的尺度。目前人们一般所认定的关于“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标准主要有两条，即一，在政治观点上，同情和拥护十月革命，并初步认识到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才应该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二，在理想观上，认识到人类未来的社会应当是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与剥削，没有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并充满了为实现这一美好理想而奋斗的愿望与决心（8）。关于这两条，多半也可以作为我们历史地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团体是否属于“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标准。正是因为同情十月革命，人们才学有方向；正是因为崇尚共产主义理想，人们才求有目标。也正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大体一致的方向与目标，他们组织的基本政治倾向才只能是“初步共产主义”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别的什么。至于他们最终是否走到了共产党的道路上去，那充其量只是事物发展的进一步的结果，这种结果还要取决于其他各种主客观条件。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某些人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断定他们从来就没有崇尚过共产主义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一度公开打出共产主义旗号的组织后来没有成为共产党，就断定它们从来就不具有某些初步的共产主义倾向。

但是，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个问题看来也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在郑文中，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说法让人有些莫衷一是。作者的观点是：不能把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混同一起”。但应当了解的是，恰如上述，郑文也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因为笔者并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去混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笔者只是或多或少地把“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共产主义”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混同”一起了。二者是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的。因为笔者只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出发的，而事实上并不是笔者把它们“混同一起”，倒是它们自己把自己“混同一起”的。无论上海共产党，还是北京、广州的共产主义小组，它们最初组成的

时候显然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同一起”的。甚至在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分离出去之后，他们在许多社会工作和社会运动上也还是“混同一起”携手并进的。这种情况相信郑文作者应该是多少有所了解的。但是，他对此似乎不屑一顾，断言“当时无论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或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他们“对两者的区别还是有一定识认〖认识〗的，并没有混为一体”。的确，笔者也同意郑文所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对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有比较明确的认识的（而不仅仅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笔者不同意郑文所说他们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的“共产主义”“混为一体”。事情很清楚，郑文的作者在这里再一次偷换了论题的概念。

什么是被“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一度“混同一起”的“共产主义”呢？郑文说：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即“主张生产工具”“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废除政权”，“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以便“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提出的“本党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这样的概括对不对呢？考虑到人们这时对“共产主义”一词的使用具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形式，这种概括不能认为毫无道理。但问题是，郑文所谈论的“共产主义”与它所批评的笔者所谈论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概念？毫无疑问，郑文作者与笔者并不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的。笔者的“共产主义”指的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形式与内容，而郑文却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它开始是泛指一种意识形态，如其在最初谈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时，是把“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与他们的政治纲领“混为一体”的。而后却又在进一步的归纳中，用第二个文件中提到的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偷换了前一个文件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概念，说是：当时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提出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观点“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主张阶级斗争；二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难看出，郑文最终把作为“理想”和“目标”的“共产主义”一笔勾消了，只留下了一个“为达此目标所需之手段”，并以此为论据向笔者的“共产主义”商榷。

一个是作为目标的“共产主义”，一个是作为手段的“共产主义”，两者当然不能“混为一体”或“混同一起”。然而，笔者又何尝把它们“混同一起”了呢？倒是郑文作者把它们“混同一起”了，以至郑文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也因此而搞混乱了。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表面上，郑文的说法是对的，即双方的根本区别是对待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双方所分歧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所需之手段”问题。但在文章中，郑文作者所讨论的却不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手段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什么不同，而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手段有什么不同。的确，按照郑文这样进行对比，双方的确是南辕北辙。因为郑文所列举的双方观点完全是针锋相对，一个主张实行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一切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实行按劳分配；一个却要“废除统治权，消灭无论什么形式的政治”，“求经济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组织，自由契合”。二者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集产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式的“共产主义”吗？如果人们由此得出这样的疑问恐怕是一点也不

奇怪的。因为作者所列举的例子，不论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还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几乎都是这样断言的。真不知郑文作者是不是也是这样看的？否则，郑文为什么要拿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歪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话，来作为自己的论据呢（９）？

要知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有作为自己理想的“共产主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是有作为自己理想的“共产主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有作为实现自己共产主义理想的手段的“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可以这么说的话），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也是有作为实现自己共产主义理想的手段的“共产主义”的（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也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讨论问题，必须在同一意义和同一层次上使用同一概念，即必须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来比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手段，来比较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手段。同时，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们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当今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和说明它们之间的同与不同。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有可能进行正常的对话，真正有可能了解历史上不同倾向的人们在观念上和现实中的区别与接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之间有没有分歧？当然有。正是这种分歧导致双方日渐走向对立。但是，他们之间有没有一致或接近之处？当然也有。否则他们就不可能一度“混同一起”。那么，他们之间根本的分歧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如郑文所说的什么一方要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方则主张废除国家、要求绝对自由和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类；而是一方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过渡时期，必须经过有国家起作用的、实行按劳分配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另一方面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过渡，必欲立即推倒一切政府，反对一切强权，主张一步走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那么，他们之间的一致或接近又是什么？那就是，他们都渴望实现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曾经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存在过某种程度的一致或接近，是不是有事实上的根据呢？郑文断言：他们“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一个‘共产主义’，尽管从字面上看都是一个词”。他并举出李达的文章来证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承认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是“同志”。可是，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郑文作者本身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曾经一度在同一个组织中，既然曾经在一个组织中，难道不就曾经是“同志”吗？以后虽然分道扬镖，但李达也还是不能不承认他们是“朋友”。为什么是“朋友”？难道不就是因为他们有大体上接近的理想目标吗？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多看一些“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很明白的告诉人们说：“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目的没有甚么两样”（１０）。我们“并不是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我们“承认”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即“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是人类努力的最后目标”，“而且我们也是向这方面做的”。“共产主义非但不与这几条原理冲突，而且只有将这几种原理完全见诸实行，然后共产主义才算园满达到”（１１）。当然，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理论内容上到底还是有很多差异的，但是，正如笔者在拙作中所说，由于人们这时对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了解多半还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很长时间不了解：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差异到底在哪里？”（１２）这也是不足为怪的。甚至，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中还曾经有相当多的人是受到过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的，可以说，在他们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无政府

共产主义还或多或少地曾经是他们通往共产主义道路的一种桥梁。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笔者不知道郑文作者有什么理由否认“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所信仰和崇尚的并非仅仅是同一个词，而且还是一种看起来十分相近的“理想”。更何况，如前所述，笔者所论述的还并不是郑文所说的那种明确作为中国共产党前身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而只是泛指“崇尚共产主义”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就它们中的多数而言，这种“共产主义”理想观的大体一致或接近，恐怕更是无可否认的。而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把“无政府共产主义党”与“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归为一类，是否就一定是毫无道理的呢？

（１）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册上册，第４４０页。

（２）即使我们照曹文的说法把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看成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组织，也无法证明重庆是四川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因为从１９２１年无政府共产主义一派的《民声》杂志有关四川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报道看，四川无政府主义的活动比较突出的几个地方是成都、达县、泸州、合江、华阳等，而“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报告中提到的该组织的几个活动中心，大多数并不在内。见《民声》，第３４号，１９２１年8月。

（３）这里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最高形式”的说法可能是作者的笔误，根据历次党章中的说法应当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

（４）（５）见《舒米亚茨基给张太雷的信》，１９２１年。（该信没有具体的年月和日期，年代是根据信的内容判断的。）

（６）《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１９１４年７月，《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页。

（７）同上，并见《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１７号，１９２０年5月２３日。

（８）参见《近代中国人物》，第2辑，第１００页。

（９）郑文用来作为主要论据之一的就是《民声》杂志第３０号关于《无政府共产党派与集产派之歧点》一文中的一段话，其中明确认为“集产派”政治上之终极目的，“是保留统治权，变更贵族式的政治为平民式的政治”，经济上之终极目的，“是取所有属于资本家的生产机关而尽属于国家，则国家强迫人民从事于生产的劳动，而给以相当的工值”。（１０）（１２）邓中夏：《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觉悟》，１９２２年1月１５日。

（１１）ＣＴ：《我们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月刊，第５号；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月刊，第５号；无懈：《我们为甚么主张共产主义？》，《共产党》月刊，第４号。

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之探讨

中国革命得益于俄国革命，不仅仅是在思想理论上。它更直接地体现在来自共产国际的组织帮助上。这种组织上的帮助在 20 年代以及 30 年代初对中国革命影响之大，是众所周知的。从向中共党、团、工会及其相关组织派驻代表，到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到指导协助中共召开各种重要会议、帮助组建中共地下交通线，一直到干预中共中央人事、干预中共中央各种决策、遥控指挥中共军事作战等，可谓面面俱到，无孔不入。其实，俄共和共产国际的这种直接介入，从 1920 年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形成时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时至今日，由于文献资料欠缺的缘故，我们对这方面情况了解得还不是很深入。比如，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史实的说明，我们至今主要依据的还是一些并不十分准确的回忆材料。近年来，俄国公开了部分共产国际早年的档案材料，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使我们的解释能够比过去更贴近于历史事实。

对上海发起组问题的不同说法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所利用来了解中共上海发起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大都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提供给我们的线索通常十分有限，并且充满矛盾。因此，尽管多数著作已经就几个关键问题，如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参加人员等，基本达成共识，问题其实并没有完全解决。

目前有关中共上海发起组问题的比较权威的说法，分别见之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1981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和 1991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一书。其中，前者肯定“一九二 0 年八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后者则进一步说明：“1920 年 4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到达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1920 年 5 月，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1920 年 8 月，首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达、李汉俊等”。[2]

但是，无论是在对上海发起组参加者的认定上，还是在对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的考察上，中共党史学界长期以来都有不同的看法。关于上海发起组的参加者问题，因为对何谓“上海发起组”概念不清，凡这段时间涉足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有关活动者，均可视为其成员，因此从 5 人到 20 人的各种说法都有。考虑到举证烦琐，故这里暂置不论，仅以上海发起组成立时间为例加以讨论，亦可知分歧之大。

中共上海发起组究竟是何时成立的？尽管相当多数学者赞成 1920 年 8 月说，但是，由于回忆材料众说纷纭，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上述所谓 1920 年 5 月先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三个月后再成立上海发起组的说法。

比如，同样在 1981 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册)即称：1920 年“五、六月间，首先由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等发起，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由上海小组与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联系筹建统一的中国共产党。”[3]稍晚如李新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则认为：“一九二 0 年六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七、八月间正式成立。”[4]以后如专门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黄修荣，在其专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一书中，也认为上海小组的筹建，应该是在“1920 年 6—8 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实现的。[5]1993 年出版的周文琪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更进一步认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 1920 年 4 月发起，8—9 月间正式成立起来的。[6]

出现以上不同说法的原因，根本上在于许多研究者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持有疑议。这里面的问题自然是出在研究者们凭藉的不同人物的回忆上。1993 年，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任武雄先生的一篇文章曾对此作过解释。他指出：目前的许多历史著作都说：1920 年 5 月左右，上海建立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 8 月左右，才建立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但原始的文献中，未见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记载。上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说法，主要是根据早期上海党组织的成员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如沈雁冰、施存统、李达等，或者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存在加以否认，或者从未提及。如沈雁冰明确地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7]施存统也回忆说：“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 1920 年 6 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它的机关刊物也叫《共产党》，有的地区党小组领导的外围组织，取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李大钊同志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很有名，但在上海，并没有用这个名称”。[8]公认的上海发起组成员，也是对上海发起组回忆最多的李达，在他的历次回忆当中，也从未提到过上海发起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这回事。据此，任武雄先生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可能并不存在”。[9]

否定先有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观点，由于 1991 年新发现的俞秀松 1920 年的一篇日记，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俞秀松在这一年 7 月 10 日的一篇日记当中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以后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就取甚样的方法来改造他是不行”。[10]显然，不少研究者都认为，俞秀松在这里所谈的那个“社会共产党”，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因此，上海小组的成立时间，至少应当在 1920 年 7 月 10 日以前。任雄武先生“估计”：“成立时间是在 5、6 月中”。[11]日本京都大学的石川祯浩先生则进一步根据俞秀松日记从 6 月 17 日起，直到 7 月 9 日都未曾提到过这个“社会共产党”，和最初积极参予上海发起组筹建工作，后因孙中山反对流泪退出的戴季陶 6 月 17 日前后因心情“烦闷”，“精神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湖州疗养等情况，具体“推测”上海发起组应该成立于 1920 年 6 月 17 日之前的“6 月中旬”。[12]

在缺少文字档案资料的情况下，要想靠对说法各异的回忆录进行分析推理来厘清谁是上海小组的成员，小组究竟成立于什么时间，是很难做到的。即使发现了弥足珍贵的当事人俞秀松从 1920 年 6 月 17 日至 7 月 25 日的日记，也于事无补。其实，从上面提到的俞秀松 7 月 10 日的文字当中，我们也未必就能够肯定地得出结论说，他日记里提到的那个“社会共产党”，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毕竟，在那个时候，“社会党”、“共产党”之类的字

眼儿颇受中国激进青年的欢迎，已知的号称“社会党”或“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就出现过好几个[13]，无论如何不能见到“共产党”三个字，就认定它一定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

稍微仔细地推敲一下这段日记的文字，我们应当不难看出，俞秀松在这里表达的是一种若有所失的情绪，并不是为“前回”成立了“社会共产党”而感到兴奋。造成人们理解上出现问题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其日记中不仅提到了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而且还有所谓“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这句话。一方面提到组织过“社会共产党”的事实，一方面强调对安那其主义感到“茫无头绪”，肯定“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看上去确乎容易使人得出俞秀松这时已经因为加入“社会共产党”而放弃无政府主义的印象。但是，如此理解这段文字的研究者们，显然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是忽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不仅不排斥无政府主义，而且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同道的这一事实。同样经过上海发起组帮助成立的北京和广州的两个小组，最初干脆就是以无政府主义者为骨干的。第二是只注意到俞秀松关于“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一句话，却忽略了他关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这句话的含义。“波尔雪佛克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是当时苏俄共产党人用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那个革命的列宁主义。既然作者表示对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他所提到的组织过“社会共产党”这件事，对于我们又有多大意义呢?何况，如果将“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作为因，而将其后的“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作为果，按照语顺联系成一句话来理解，恐怕不仅得不出他们刚刚建立起共产党的意思，而且会得出对“前回”尝试着建立共产党感到失望的结论来。所谓“前回”，即使照字面理解，也应当是指“前一次”、“上次”、“上回”的意思，不含有“前些天”、“前些日子”的意思。

综上所述，我们恐怕应当这样来诠释俞秀松这篇日记的意思，即：

经历过上次组织社会共产党那件事以后，我们对于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特别是从前信无政府主义，的确是盲从的。以后如果不是自己对于现在社会有很明了很正确的观察，随便拿一种方法来改造社会是不行的。

如果以上的诠释是正确的，那么，俞秀松的这篇日记，当然不能成为证明 5、6 月间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文字依据。它唯一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是，俞秀松曾经一度因为愤世疾俗，向往共产主义，参加过组建“社会共产党”的活动，但此事已经成为过眼烟云，时至 1920 年 7 月，他和其他参加组织那个“社会共产党”的成员，对于推崇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仍不甚了了，颇感失落，尤其是对无政府主义失去信仰。考虑到一个多月以后俞秀松在陈独秀委托之下积极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这个时候的他不可能不了解陈独秀等人正在进行的工作。因此，从逻辑上，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判断：或者发起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问题这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或者陈独秀等人这时并未以“共产党”的名义筹建这个上海发起组。

上海小组与上海“革命局”

要真正弄清楚上海发起组的问题，需要发掘历史档案。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我们几乎没有能够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可喜的是，1994 年底在俄国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和

中国》(文献，1920—1925)一书中公布的几件共产国际档案文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判断上海发起组的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这几件文件是：(1)1920 年 6 月维经斯基致某同志的信；(2)1920 年 8 月 17 日维经斯基致伊尔库茨克东方民族部的信；(3)1920 年 9 月 1 日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4)1920 年 9 月 1 日威连斯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5)1920 年 12 月 21 日勃朗施坦和阿布拉姆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等。这些来自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当时派往中国的代表及其领导机关的书信报告中讲述的情况，和我们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可以大大促进我们对上海发起组问题的深入了解。

综合上述文件的内容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员前往上海推进中国革命的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 1919 年夏。当时在莫斯科的威连斯基和在西伯利亚的加蓬分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在东亚民族中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建议书，得到批准，威连斯基并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加蓬则被任命为副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确指示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根据这一指示，威连斯基当年 9 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 1920 年 2 月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担负起了具体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国等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和开展革命宣传的工作。[14]

1920 年初，根据威连斯基的提议，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下设了一个外国处，主要负责人为东方学院毕业，懂中文的阿布拉姆松，其工作人员有我们所熟知的维经斯基，以及马马也夫、埃尔杰列夫斯基、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等。关于维经斯基来华的情况，根据有关报告可知，他前往中国的确切时间是 1920 年 4 月。报告称：远东局外国处“于 4 月派遣以下同志去中国(上海)：维经斯基(格里戈里耶夫)作为全权代表，季托夫(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作为助手。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从此奠定了我们在远东各国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开端。而在此以前，中国的工作都是由个别俄罗斯侨民来做的。例如，天津大学教授鲍立维(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教授和法文社会主义报纸《北京新闻》执行编辑 A・A・伊凡诺夫(来自巴黎，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等人。同时，还从哈尔滨派了一位懂法语的工人共产党员 K・A・斯托扬诺维奇同志(矿工)去天津。”[1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相当熟悉的名字，除了维经斯基以外，还有尽人皆知的俄侨鲍立维(又译为柏烈伟)和伊凡诺夫(又名伊文阁)，后来受命前往广州帮助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其中成员之一的斯托扬诺维奇。只不过，和我们过去的了解有些值得注意的区别是，报告提到的维经斯基的两个助手，似乎没有我们过去一直当作维经斯基主要同行人来介绍的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16]

从已知的情况看，维经斯基来华后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给外国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可惜我们目前还见不到这封信的内容。现在公布的维经斯基最早谈及在华工作的信，已经是 6 月份的了。但在这封信里，我们仍不难看出维经斯基来华后主要作了哪些工作。他说：

自我寄出第一封信后，工作的进展只限于巩固联系和完成我所拟定的计划。现在我们事实上和所有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有了联系。虽然我们在汉口、广州、南京还没有代理机关，但是我们的地方工作可以通过地方的革命者朋友直接在那里反映出来。……现在我们主要致力于将分散的各个革命小组统一到一个中心上来。“群益书局”可以成为团结这些小组的核心。中国革命运动的最薄弱方面就是行动的分散性。以协调和集中为目的正在开始准备

召开全华北(原文如此)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一位当地很有名望的教授(陈独秀)正在给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以确定大会讨论的课题以及大会召开的地点、时间。大会有可能于 7 月初召开，我们将不仅参加准备工作(制定议程及决议)，而且参加会议。[17]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第一，维经斯基 4 月出发，在 5 月经天津、北京转到上海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是建立与发展同中国各地革命者的联系。这一工作收获显著。第二，自 6 月以后，维经斯基开始致力于促进中国各地分散的革命小组织之间的联合与统一，为此特委托陈独秀向各地革命者分发信函，准备于 7 月间召开有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联合大会。这也就是说，维经斯基来华后的主要注意力一时还不是放在组建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纯而又纯的中国共产党上，而是致力于使中国的绝大多数革命者，甚至包括日本和朝鲜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组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大同盟。

维经斯基的工作进展，以及中国革命者不断有代表前往俄国远东寻求援助的情况，使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意识到在中国存在着加紧革命鼓动工作和组织共产党的极大可能性。还在 5 月份，威连斯基就指示维经斯基迅速在上海筹组一个临时的工作机构，定名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和朝鲜部，书记处全体委员会分设一个局，由三人组成，威连斯基亲任临时局主席。他特别强调，远东书记处在中国的主要工作是：(1)组织共产党，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在此之后不久，为就近考察中国工作的情形，推动组织宣传工作的更大规模展开，威连斯基更通知正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的俄共党员统统到北京，参加由他主持的会议。7 月 4 日，他亲自从海参崴来到北京。第二天便举行了包括维经斯基、鲍立维、斯托扬诺维奇等十余名俄共党员参加的重要工作会议，一面总结前一段的工作，一面部署下一步的任务。会议讨论的各项工作中，一项格外引人注目的议题，就是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是完全可能的。[18]

众所周知，在 1920 年 7 月初以前，中国还不存在一个可以召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的相应条件。因为，我们所熟悉的，也是后来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产生基础的上海、北京、广州、武汉、济南、长沙和日本等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尚未建立。那么，何以北京会议会郑重讨论“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问题呢？显然，这种讨论不可能是文不对题或空穴来风。具体负责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这时固然没有“在最近期间召开代表大会，彻底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的计划，中国各地这时固然也不存在党组织或类似的共产主义小组能够产生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的“代表”，但是，维经斯基却有一个“在最近期间召开”中国各地社会主义小组织代表会议，建立统一的组织中心的计划。联系到早期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成也是鱼龙混杂的情况，联系到俄共(布)同本国的无政府主义派别直到十月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旧保持着某种合作关系，不难想象威连斯基等人关于迅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提议，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设想之上的。似乎可以认为，俄国人 7 月初在北京会议上讨论的“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代表会议”，就是维经斯基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和组织的这次会议。只不过，威连斯基更倾向于把维经斯基组织的这个社会主义者大会，直接变成一个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会议。

维经斯基委托陈独秀召集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大会，于 7 月 19 日在上海正式召开，多半是由于受到会议组织者的影响，与会者专门讨论了要不要把自己变成共产党的

问题。关于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义来命名这个大会所产生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问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与会的多数人能够接受“社会党”的名义，只是比较激进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才更赞成使用“共产党”的名称。[19]会议最后产生了一个足以显示其包容并蓄特点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而由此派生出来的包括维经斯基在内的五人领导核心，则定名为“革命局”。[20]紧接着，在这个“革命局”之下，还根据维经斯基的建议，设立了三个部，即出版部、情报宣传部和组织部，负责整个同盟的日常运作。[21]

关于在维经斯基参加下，这个社会主义者同盟上海“革命局”工作的情况，我们在当时曾经参加过出版部工作的郑佩刚的回忆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隐约的轮廓。它很明显是各派社会主义者们实行统一战线的生动表现。据郑回忆说：1920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维经斯基、杨明斋与随同维经斯基来的那个朝鲜助手，再加上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一个印度人，和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尉克水、郑佩刚等，“在陈独秀家中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当晚议决先建立一个有力的战斗的印刷所，委托郑佩刚全权负责。维经斯基后交 2000 元给陈独秀转给郑，作为印刷所的开办费。很快，这个取名“又新”的印刷所就建成了，并迅速印刷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22]

郑佩刚的回忆同维经斯基报告中所说明的情况相当吻合。维经斯基的报告称：

出版部现有自己的印刷所，并印刷各种小册子。几乎所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按即海参崴)寄来的材料(除书外)，都已翻译并在印刷中。《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有 15 种小册子和传单正在付印。

结合郑佩刚的回忆，可知从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到成立上海“革命局”，再到建立印刷所，印出《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的工作，都是在 7 月下旬到 8 月中旬这 20 余天里完成的。据报告称，在 8 月 22 日星期日，他们还将要开始出版一新的中文的工人周刊，即《劳动界》。印数两千，也是在又新印刷所里印刷。

根据我们已有的知识，无论是出版《共产党宣言》，还是出版《劳动界》，显然都是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为。因此，不难想象，维经斯基报告里谈到的这个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中共上海发起组。维经斯基有关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证据。他报告说：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宣传工作，指导他们走向联合工人和士兵的方向。目前，这方面尚未取得很大成就，但已经有了几个首先倡议的小组，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他们进行工作。本周我们组织部从十个地方工会和车间各召集两名代表，以组建工会中央局，该局代表将加入我们上海革命局。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我用英文写成的。经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已译成中文，决议的提纲现已作为工会在工人中的宣传材料。

目前我们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类似上海局的组织，然后通过各局代表会议将工作集中起来。现在还只是在北京有一个局，该局接受我的以及米涅尔(按即斯托扬诺维奇的匿名)同志和鲍立维教授的工作指示。如今我拟派米涅尔同志从天津去广州，在那里他将要组建一个革命局，设两个部：情报部和组织部。 ……在广州局成立的同时，我们正在安排汉口局的工作。[23]

这一年的 8 月，原先设在海参崴的远东局下属的外国处撤销，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下设了一个以布尔特曼为主任，加蓬为副主任，勃朗施坦为部主席团书记兼情报处长的东方民族部。原远东局外国处的阿布拉姆松担任东方部中国处负责人。从阿布拉姆松与勃朗施坦这一年 12 月 21 日联名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份报告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上海“革命局”下属的组织部还直接推动并策划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报告在说明组织部已经成功地在中国的各大工业城市建成了相应的“革命局”之后称：

组织部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工作，引导他们活动，同工人及士兵建立联系并组织他们。为联合革命的大学生组成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我们在中国各城市举行了一系列大学生的会议，在此基础上，8 月 17 日在北京召开了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团组织的代表进入了我们的革命局。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直接并积极对大学生运动施加影响，指引他们到工人和士兵中间去开展有效的革命工作。我们在上海的分部利用这一影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领导大学生的革命运动，指引他们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商人集团划清界限，这些集团的方针是反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而倾向于美国式的民主的。我们的方针与此不同，主张社会革命和坚持面向劳动人民大众。[24]

稍微熟悉早期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过的读者都能够了解，上述报告中的各项工作，从前都是挂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名下的。而维经斯基在报告中提到的工会中央局，很可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他所报告的由上海局，而北京局，而广州局，而汉口局的情况，恰恰与早期共产主义小组从上海、而北京、而广州、而武汉这一发展顺序相一致。他报告中提到的派斯托扬诺维奇前去广州组建“革命局”的情况，也恰恰符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此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所报告的内容。据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 年的报告说，1920 年底斯托扬诺维奇与另一俄国共产党员佩斯林受命到达广州，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共产党”。[25]长期以来，我们不十分了解，斯托扬诺维奇为什么会到广州去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了解了 1920 年 7 月社会主义者同盟产生的经过与性质，以及上海“革命局”的作用，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很明显，斯托扬诺维奇去广州与无政府主义者合组“共产党”，既不是技术上的失误，也不是象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是由于对当地情形不了解。他早就知道他要去与哪些人合作。这完全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其领导机关—上海“革命局”所希望的。同样，东方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关于上海“革命局”已经成功地于 8 月 17 日在北京召开大学生代表会议，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说明，也正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功绩之一。[26]所有这些都进一步说明，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中心而派生的上海“革命局”，多半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发起组。

几点分析

根据上述，我们或许可以对众说纷纭的上海发起组及其成立时间、参加人员等问题，作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分析判断。

第一，包括中共上海发起组在内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最初其实是各派社会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产物，也即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正因为如此，我们所熟知的上海、北京、广州这几个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初，其成员的派别背景与思想倾向都极为复杂。

第二，相信各派社会主义者可以结成统一战线并兼容于共产党，这与维经斯基的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维经斯基原本是美国社会党党员，十月革命以后才回国并加入俄共(布)。[27]在维经斯基看来，社会党、共产党，或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相互之间的转换不应当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形式来达到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有其特殊的背景。[28]

第三，作为维经斯基在华工作的指导者，威连斯基及其俄共(布)远东地区领导人显然不反对维经斯基所进行的努力。但威连斯基的 5 月指示以及他所领导的 7 月北京会议，清楚地显示出俄共(布)更倾向于在中国直接建立纯粹的共产党。很可能是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指导协调机关的上海“革命局”在这一年的秋天迅速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即由维经斯基协助陈独秀等起草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地组织的分裂和各地革命局向纯粹共产主义小组的转变。

第四，包括上海发起组在内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多数最初都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派生物—“革命局”而产生出来的。它们从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转变为纯粹的中共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经历过一个过程，人员构成也有过较大的变动。但其性质与人员的变动，并未中断其组织形式的延续。因此，计算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立时间，仍可以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为准。而上海“革命局”的成立时间，不早于 1920 年 7 月初俄共(布)党员北京会议，应当是在 7 月 19 日社会主义者联合大会以后，但也不应晚于 8 月上旬。

第五，最初作为社会主义者同盟主要工作机关而产生的上海“革命局”，开始向作为中共发起组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转变，在时间上有着明显的界限。这就是 1920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和 11 月 7 日《共产党》月刊的出版。但是，这个转变的完成或许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直到 1921 年初，党的小组和青年团均分别召开“肃清无政府党的大会”，且在提议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失败后，解散了青年团，这一过程才算最终完成。[29]

第六，既然上海发起组最初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指导协调机关，并且下设各种工作部门，它最初的成员自然派别各异，而且人数较多。随着这一组织在维经斯基以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下，日益标明共产主义的倾向，从统一战线组织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小组，它的成员也就自然日渐减少。所以，简单地争论或肯定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是 5 人、6 人、7 人、8 人、或 15 人、20 人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当注意到它的构成是随着时间和其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七，应当肯定以威连斯基、维经斯基为代表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在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以及组建上海、北京、广州等“革命局”的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以往对中共上海发起组所做的各种说明中，不仅很少提到威连斯基及其背后俄共和共产国际的相关作用，而且也忽略了维经斯基正是这一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一事实。

第八，上海“革命局”最初由 5 人组成。[30]已知这 5 人中包括维经斯基，另外 4 人是中国革命者，其中有陈独秀和李汉俊，其他两人的姓名在上述档案文献中没有记载。需要注意的是，从维经斯基 8 月 17 日的报告看，上海“革命局”成立后并非一成不变，它至少已计划增加两人，一人是新组建的上海“工会中央局”的代表，另一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后者似乎是指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

----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 页。

[2] 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9—50 页。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也持大致相同的说法。

[3]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 页。

[4]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26—327 页。

[5] 黄修荣:《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59 页。

[6] 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17 页。

[7] 《"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6 页。

[8] 《"一大"前后》(二)，第 35 页。

[9] 任武雄:《1920 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党史研究资料》，1993 年第 4 期。

[10] 《上海党史》，1991 年第 7 期。

[11] 同前引任武雄文。

[12] 石川祯浩:《青年时代的施存统—论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日本小组及其建党问题》,(日本)《东洋史研究》，第 53 卷第 2 号，1994 年 9 月 30 日。

[13] 参见拙作:《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资料》，1991 年第 4 期。

[14] 见《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8－39 页。

[15]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50－51 页。

[16] 当然，无论是否维经斯基的正式助手，两人随同来华仍是事实。且据李达回忆，杨明斋曾"在俄国东方大学读过书"，故那个"毕业于东方学院"的季托夫是否即是杨明斋，仍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参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 年 8 月 2 日，《"一大"前后》(二)，第 7 页。

[17]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28 页。

[18]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41—42 页。

[19] 陈独秀 9 月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公开使用“社会党”自诩，看来也是适合多数人意愿的一种需要。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2 页。

[20] 有学者认为革命局成立时间为 1920 年 5 月，成员也主要是俄国人，但从 1920 年 6 月和 8 月维经斯基的信中，以及威廉斯基等人当时的报告中，无法得出此种结论。见谢荫明：《俄共（布）在华革命局与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党史》，2000 年第 5 期。

[21] 参见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党史研究资料》，第 3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8 页；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31－32 页。

[22] 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58—959 页。

[23]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33－35 页。

[24] 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51—52 页。

[25]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1921 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0 页。

[26]《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远东人民》，1921 年第 4 期)关于青年团正式成立的时间与这里所说的略有不同，是 8 月 22 日。

[27] 见贾比才等著，张静译：《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1—62 页。

[28] 这个时候维经斯基也在积极联络日本等国社会主义者，推动他们组建共产党。无独有偶的是，他在日本也同样是以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同盟”为先导，进而促成日本共产党准备委员会产生的。参见前引《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第 31 页；犬丸义一著：《日本共产党的创立》，日本青木书店 1982 年版，第 62—63，76—77，84—86 页。

[29] 参见瞿秋白：《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61 页；前引舍维廖夫文。

[30] 1921 年中共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中一共只有五个人”一事。前引《共产主义小组》(上)，第 52 页。

究竟是谁说服了谁？

---关于一九三六年延安会谈结果的再探讨

对延安会谈可以盖棺论定吗？

西安事变距今已有五十八年，仍有不少谜没有解开。但是，这里面有些谜确是因为年代湮久，史料疏失，当事人亡故，以致死无对证，弄不清如何然、所以然，比如至今仍为许多人所关心的蒋介石事变期间在西安承诺若何，以及对周恩来说了些什么之类。但有些谜却是纯粹是因当事人误忆错记、望文生义，而为人后者孔步亦孔、孔趋亦趋，生吞活剥出来的东西，比如所谓张学良促使中共实行"逼蒋抗日"之类。

说张学良曾促使中共放弃"反蒋"主张，与之共同实行"逼蒋"策略，可谓由来久矣。目前所见最系统、最权威的说法，大概要算是张魁堂先生在国内以及香港所发表的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著作文章了（包括张著《张学良传》一书和他在《党的文献》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发表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以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在香港《明报》"西安事变大揭密"专号上刊登的那篇披露"张学良'联共'之谜"的文章，等）。说它们最系统，是因为张先生在这些著作或文章里明白声明他是利用大量"未披露"的电报档案、回忆录、访谈录，来具体介绍那个"张学良告周（恩来）不能反蒋"的延安会谈的。说它最权威，是因为作者赫赫然标明自己为"北京《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而它利用得最多的资料，又恰恰是这次会谈的亲身经历者、前任"北京《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刘鼎先生的"札记"。由这样权威的作者，利用这样权威的资料来"揭开张学良'联共'之谜"，应该说是登峰造极之作了。

当然，如果追根溯源，后来曾经活着的那两个延安会谈的主角也都有过类似的文字。最先提出此类说法的是那个尽人皆知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在这篇多少有点违心的文字里，张学良明确说：延安会谈时，他曾与周恩来为蒋介石抗日与否的问题"辩论多时"。最后，终于促使"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１）据说，周恩来也曾有过类似的说法。张魁堂先生介绍说，周恩来曾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对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夫妇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劝告中共应当实行逼蒋政策时，周回答说："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认真考虑再作答复"（２）。

在延安会谈中只有五名参加者，五人中如今有三个人有过大致接近的回忆，另两人早已故去，这也就难怪几十年来几乎从没有人对此表示过怀疑。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依据的都只是这些亲身经历者的回忆，即使包括在这个问题上拥有最完整的档案资料的张魁堂先生在内，在说明这个问题时竟然更多的也只是依据这些回忆。可是，在明明存在着大量足以证明事实经过的重要历史档案资料的情况下，何以放着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于不顾，而只把眼睛盯着几个当事人的回忆录上？在事隔几十年之后，难道这些当事人的回忆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不尽准确？

回忆史料不足靠

稍稍留意过台北和大陆学者研究延安会谈的著作文章，就会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台北学者更多的依据张学良在《忏悔录》中的说法，而大陆学者更多的依据的却是传说中周恩来的说法。换句话说，这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按照张学良所说，延安会谈所讨论的，主要就是使红军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与共产党具体服从蒋介石领导的问题，周恩来甚至已经明确地接受了张学良所提出的"输诚"条件。而按照周恩来所说，周当时只是表示愿意将张的意见带回去向中共中央报告而已，并未有过多少具体的讨论，周更不曾有过附和张的联蒋主张和与之商定输诚条件的情况。不难看出，这两种说法确实相距甚远。唯一能够使两者较为接近起来的是刘鼎的回忆。因为刘鼎也强调说，当时讨论最多的就是联蒋问题，况且，不论周当时所谈内容如何，他回去毕竟很快就此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并表示了对张学良建议的赞同态度，因此经中央讨论后，很快"联蒋抗日的问题就定了下来。五月五日红军回师通电就不再提反蒋口号"了（３）。也就是说，不管周恩来是会谈当时就接受了张学良的劝告，还是回去后才决定接受劝告，总之是中共按照张学良的意见改变了自己前此的反蒋方针。

但注意一下当时的历史档案，不难发现这里面至少有两点值得怀疑。第一，中共中央提出停止公开使用反蒋口号的问题，是在延安会谈之前，并非是在延安会谈之后。早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举行延安会谈之前，中共中央就曾经举行过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开宣传上改"打蒋介石"为"打卖国贼"，强调"这个口号更便于打卖国贼"，最便利于取消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在四月九日白天，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改变这一策略口号的意义。在一封要求放弃公开发布"讨蒋令"的电报中，他明确地肯定：这样做才是"最聪明的一种办法"。因为目前全国还有许多群众受蒋蒙蔽，发"讨蒋令"不易为群众所理解，不如发"讨日令"，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逼蒋暴露其真相。因此，所谓"目前不应发讨蒋令"，其目的却是要"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因为他相信，"在讨日令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它"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４）。由此可知，用提不提反蒋口号来作为评价中共是否放弃反蒋态度的判断标准，是靠不住的。因为，从四月开始，实际上中共中央就已经停止公开使用反蒋口号了，五月五日红军通电中没有再提反蒋口号，不过是这一新策略的具体延伸而已，与延安会谈的结果并无直接关系。第二，延安会谈以后，在中共中央陆续发布的各种内部文件当中，反蒋的指示仍旧随处可见，完全看不出中共受到延安会谈中张学良劝告影响而放弃反蒋态度的影子。就在中共中央发布红军回师通电不过两周，它就在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明确指示：目前"唯一的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此后甚至直到七月间，毛泽东也还在强调红军向国民党军队秘密宣传"抗日"、"反蒋"、"联俄"、"联共"的重要意义。只是到了八月中旬以后，我们才能看到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的政策指示。这说明，中共中央停止了反蒋口号的宣传，而其反蒋方针却一直实行到八月中旬才最终得以改变（５）。上述情况无疑让我们对张学良回忆中的说法和传说中周恩来回忆中的说法表示疑惑，因为按照这样的事实，所谓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上的劝告改变了中共中央的反蒋方针的说法，根本就难以成立。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有必要问一下：张学良是不是提出过不要反蒋的劝告呢？遍查档案的结果，我们确实找到了相关的证明。但那是在延安会谈之前，而不是在延安会谈之中！

档案证明，在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周恩来前去延安谈判之前，李克农曾代表中共方面与张学良

有过接触，中共中央根据李克农报告作出的关于与张学良进一步谈判的原则规定，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即既不要接受任何有损苏维埃政制与红军利益的要求，也不要因为张学良不同意反蒋而与其发生争执，但必须"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６）。这足以说明，张学良在与李克农的谈话中曾经有过关于中共应当放弃反蒋态度的表示。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就此明确规定：必须坚持自身的反蒋方针，只不过不要因张学良不赞成反蒋而放弃争取张的努力。很难想象周恩来会置中共中央的这一规定于不顾。不仅如此，在延安谈判之前，为避免因为对蒋态度的不同引起争论，中共中央还特别强调了要回避了对蒋问题的讨论。关于这一点，中共方面在会谈之前也特别通知了张学良（７）。因此，说延安会谈中"占时最多的问题"就是对蒋策略和中共红军与南京政府的关系问题，这无论如何值得怀疑。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延安会谈不到两周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一次重要的决定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所谓晋西会议），会上刚刚肯定了蒋介石属于必须反对的"民族反革命"，说周恩来刚从会议上下来就轻易地被张学良说服联蒋，更是情理不通。况且，即使是周恩来真的被说服改变观点，说什么"毛泽东同志也有这样的想法"，也绝对不合逻辑，因为在三月底关于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继续肯定那个强调"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的训令仍旧"适用"的，正是毛泽东；正式宣布蒋介石是"民族反革命"并明确肯定他仍旧是主要打击对象的，同样是毛泽东（８）。这时的毛泽东何来什么"逼蒋""联蒋"的"想法"？

周恩来当年如是说

说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没有劝告中共放弃反蒋，这是否有什么根据呢？

其实，笔者所有的根据与张魁堂先生，甚至最早系统披露延安会谈内容的申伯纯先生或大陆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资料并无不同。那就是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于四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问题是，几乎所有引述报告的人，包括几乎全文引述过此报告的张魁堂先生都没有做到完全忠实于报告的原意。比如，张魁堂先生在他的《张学良传》和《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著作文章中，几乎是全文引述了这个报告，但与此同时却又添枝加叶地增加了不少报告中没有提到的内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把报告中根本不存在的"联蒋抗日问题"说成是整个延安会谈中"张学良最关心和希望解决的'大问题'之一"，用了足足有上千字来大谈会谈双方关于蒋有抗日可能，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但只要"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的讨论。可事实上，报告中谈到的有关对蒋态度的问题，只有下面几句话：

"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

"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９）

此报告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部分是张学良提出的一些问题和重要观点；第三部分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基本估计。但由于报

告较长，又分两次写成，有些问题略有重复，加上当时收报有误，个别字读不出，个别段落被分割颠倒了，不过整个报告的内容还是非常清楚的，其中没有任何一点谈到“联蒋抗日”问题。为便于读者清楚了解笔者的这一看法起见，以下特将此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概要整理如下：

报告首先说明了张学良对于周恩来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反蒋抗日、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问题的意见。称张的意见是：

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先，不能不接受蒋令，进驻苏区。他认为红军与日本接触，不打红军，共同抗日的运动便可引起。

二、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赞助，但他认为应避免在山西，因恐难立足，但目前出河北太早，最好争取绥远，以绥宁为根据，靠近外蒙。

三、如我坚决东向，他可通知东北军在直南平汉路西所属四师与我联络。四方面军如北上，他可使陕甘部队让路。二、六军团则须取得中央军同意方可，他愿为此事活动。

四、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

五、派代表友邦，他由欧洲去，我们的人，他可送至新疆，他并派人联络盛世才。

六、他再不听命，无以回答，问题是蒋有电责他，并转阎电报，说他隔岸观火。他原意先取关中，并求直罗鹿阝县封锁，但蒋坚令其留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延川。

七、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他愿酝酿此事。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

八、最后商定红军在关中积极行动，在韩城澄城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张设法送去），令陈先瑞向蓝田雩阝县活动，威胁西安，以便东北军借口而进行洛鹿阝甘肤间的筑碉修路（彼此交通仍旧）。如此推延一月，看形势变动再定以后行动。

九、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由我们在他防地设店自购，无线电、药品他可代为购办，并可送弹药。应互派一得力人伪装侦察，保持交通。另派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活动，克农因公开，不便在他处任事。

在报告中，周恩来总结谈话过程中张学良就抗日、联苏、蒋介石国民党各派基本倾向及其前途等问题，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看法是：

一、张谈抗日的问题，（1）抗日战争发生后日本将在中国沿海树立许多御用政府，封锁中国沿海，中国抗日沿海困难。（2）抗日是否能引起日本内部变化，或日本集兵阻隔，我将如何？

二、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已？

三、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红军东向可与日本接触，有了导火线，东北军即可响应。但他不相信红军进入山西立得住，到河北能胜日，故他希望红军到时由绥出察，可靠外蒙。

四、他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

五、他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国，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也知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

六、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职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络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

七、张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脱离党的叛徒）。他的内部有秘密组织，梁干乔在内。国家主义派在张处的已失败，李石曾等已降日。蒋在张周围有侦探，其特务均为蒋的人。

八、张认为阎太保守了，但不要逼之过甚。两三星期后张拟仍往太原，问阎是否有意联红军。同时，张亦认为阎与日人来往要领不得。

九、南京各派蒋系，（１）蓝衣社（真名复兴社）为蒋信徒。（２）陈果夫则主联俄，冯、于则主联俄联共，唐生智主抗日，翁、蒋、蔡主抗日联共，陈诚、胡宗南主抗日不再剿共，政学系、安福系、何应钦、张群等均亲日，宋子文与蒋关系未恢复，张主张我们写信给陈、胡，并找ＣＣ派。

十、表示不愿打红军，但现在不能停，蒋之政策仍靠剿匪，故现处苦闷。北进想驻清涧绥德大道，道路旁山区可为苏区，亦可让出通黄河交通。同时他承认剿共北进就不能抗日。他承认在东北军中仍要提出红军抗日便是我们朋友、拥护红军抗日口号。他说明东北军北进肤施至少一月，他目前常驻洛川。（１０）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关于对蒋策略问题的讨论，在延安会谈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因此周报告中只谈到简单的几段话。不仅如此，在会谈过程中，张学良也不曾劝说过要中共放弃反蒋转而逼蒋或联蒋。恰恰相反，从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谈话过程中实际上是周恩来在劝说张学良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张学良关于“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以后要看形势发展再做决定的说法。其实，张对蒋的评价已经清楚表明他对蒋这时已经心存异念，因为他相信蒋是两面的，既有民族情绪，可能抗日，又为亲日派所包围，可能降日。在这种估计下，他对蒋也是两手，现在还想帮蒋，认为帮蒋才能抗日，同时也注意到另一种可能，故暗中准备在西北联俄联共，另立局面。有谁能够想象，处在这样一种将信将疑，连自己都准备另立局面的矛盾态度之中，张学良会力劝中共应当逼蒋甚或联蒋、拥蒋？

其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这种态度也是心中有数，因此周向张解释抗日之必要与可能，解释苏联援助中国之必然与真心，解释红军在山西站得住，对日军作战有把握，却并不多谈对蒋问题。并非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避免一切争论而已。因此，说什么

周恩来被张学良的拥蒋、联蒋主张所打动，表示要回去劝说中共中央改变政策，完全不合逻辑。不仅如此，事实上周恩来仍旧把“抗日反蒋”视为一体，他明确认为，张学良现在之所以还不能“揭旗抗日”，就是因为目前“揭旗抗日”必然要与蒋介石相对抗，而他还不能完全改变对蒋介石的幻想。周于会谈后第三天即说明过此点，称：“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事实上，周已断定，张学良具备这种转变的基础，只要条件成熟，他肯定会站到共产党一边来。周恩来总结他的印象是：估计张，

一、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１）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２）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３）或蒋介石急〖激〗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

二、目前行动，只要我们在关中能打击东北军，杨部在宜川不进，沿潼关到肤施大道发展游击战争，摧毁其沿途工事，并乘其主力回调，击中央军，打通永和关以南两岸交通，判断东北军北进行动可暂停止，以便促进局势开展。

三、张对经济、通商、交通上助我，确有诚意。（１１）

周恩来痛斥蒋介石为“蒋贼”

从上述报告及相关文件的内容中，我们怕是很难相信延安会谈有所谓张学良力劝中共实行拥蒋、联蒋，周恩来为之心动的情节。周会谈后所谓“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的评论，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此次谈话到底是谁劝谁。而且，关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究竟是继续坚持中共中央“抗日反蒋”方针，还是接受了所谓“联蒋抗日”思想的问题，从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信称：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１２）

在这里，周恩来主张张学良反蒋的态度可以说是再明白也没有了。蒋介石为日帝所要挟，屈服难免，其进兵山西、抗议苏蒙互助协定，足以为证。以蒋势力之大，排斥于抗日战线之外，固足可惜，但不能为了要抗日，就替蒋介石这样的人做殉葬品。故真要是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就应当迅速准备联合红军，另立局面，揭旗抗日才对（１３）。这就是周恩来的态度。其中岂有“联蒋”之意？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回瓦窑堡后向留守后方的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谈的全部内容之后，给毛泽东的第一封电报中，就直截了当地称呼蒋介石为“蒋贼”（１４）。周同时起草的向东北军宣传的口号，明确地主张东北军应以蒋介石为敌。主张东北军官兵：“反对接受蒋介石命令自相残杀”，提醒他们认识到：“强迫东北军捣乱抗日后方是蒋介石卖国铁证”、“强迫东北军开入苏区分散兵力是蒋介石阴谋”（１５）。可想而知，延安会谈如果说促成了什么人对蒋政策的改变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被改变的决

不是周恩来。

刘鼎报告吐露天机

既然关于周恩来和中共被张学良劝说联蒋之事其实并不存在，那么，无论是张学良、周恩来，还是刘鼎有关这个问题的回忆看来都不可靠。事隔多年之后，人的记忆出现一些阴错阳差之类的事情，说起来也并不奇怪。问题只是在于，为什么许多研究者明明掌握着大量史料，却不是束之高阁，便是视同无物，眼睛只盯着某些当事人并不可靠的回忆。而更为奇怪的是，有的研究者，如刘鼎先生，既为当事人，又掌握着诸多第一手的报告和电报，却偏偏只相信自己数十年后的记忆，而不顾自己记忆中的事实与当年出自自己之手的那诸多报告中所记录着的事实，有着如何遥远的距离。其实，诸般事实，只要查一下当年刘鼎先生自己事后所写的报告，就一清二楚了。

延安会谈后，刘鼎先生最早的一份报告是在他从瓦窑堡回到洛川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后第二天写的，所谈内容是关于刘回到洛川的当天晚上张学良与刘谈话的情况。刘在信中说："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原来人们所想到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儿（指张学良——引者注）昨夜同我见面，短简的一段谈话中，除了我预备了要说的都谈了以外，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刘鼎解释说：

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俄）联×（共）、分土地的旗帜。内容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的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那么，他那个"不小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报告称：

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道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了"爱×"、"抗×"话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１６）

对于这封信想要说明的意思，也许用不着太多的解释。张学良想干什么，相信明眼人一望便知，至少绝不可能由此得出什么张学良这时要求中共"联蒋抗日"之类的结论来。事实上，张学良不仅从此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且根本上就是分道扬镖了。奇怪的到是，为什么延安会谈时张学良还在那里搞"外交"，幻得幻失地谈什么，相信蒋有民族情绪，帮蒋能抗日之类。从张学良介绍《活路》一书的出笼过程看，延安会谈之前他其实就已经同《活路》的作者谈过类似联俄、联共、抗日，乃至反蒋的话题，并且同意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印成小册子在东北军中秘密散发。但在延安向周恩来正式表明态度时，他反倒犹豫退缩了。当然，延安会谈时他其实也隐隐地谈到他准备离开蒋介石另起炉灶的想法，只不过他说得不那么明确

罢了。而如今，他多少象是有点破釜沉舟的劲儿了。这里的原因，据刘鼎信上说，就是：不久前的谈话和宣传已经发生作用，“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１７）。

从刘鼎报告的情况，可以看出，张学良之突然准备反蒋，大致不外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抗日，二是保存实力，而这两者事实上又密切相关。过去张寄希望于帮蒋介石能抗日，现在则发现等到蒋介石开始进行抗日，他的东北军大概也因为被迫剿共而差不多不存在了。张学良之所以称赞《活路》作者把他想要讲的话一口气都说完了，也正是因为如此。要知道，前此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一一０师、一０九师，这时竟被取消番号；张要求给阵亡的何立中、牛元峰两位师长家属各特恤十万元，结果也是“碍难照准”。气得张学良大骂：“我张某人混的不值十万块钱了”（１８）。这也难怪张学良在回忆中称所谓“恶缘种种，不啻火上加油”者，第一条就是“请求抚恤、补充，皆无结果”一事（１９）。照这样下去，他张学良拿什么去面对那些靠着他吃饭，指着他带他们回老家的东北父老乡亲。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而“他家大大小小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想必也即为此。

张学良要反蒋而非逼蒋

不过，张学良固然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活路”，但作为一名军事统帅，张学良也十分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揭旗反蒋的时候。第一，所谓“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这表明张此时尚无完全把握东北军之力；第二，所谓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反映出张这时还缺少可依靠的、有能力的干部；第三，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即仅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日，不仅兵力上过于悬殊，而且武器弹药各种军事装备的补给也将完全中断，因此，如果没有苏联的直接援助，没有各地反蒋实力派的响应，要想与蒋介石抗衡和实行抗日，无论如何难以想象。这也就是为什么张明确表示，“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的几个小伙子和严老老等相好去”。这里所说的“邻近各房本家”，自然就是指杨虎城等原西北军将领；这里所说的“严老老等”，恐怕指的就是阎锡山以及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渠等与张私交较好的实力派领导人。当然，这种活动终难逃过蒋介石的耳目，因此，张学良表示，他只是“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下他的毒手。”刘鼎在四月三十日的信中报告说：“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２０）

难怪刘鼎夸赞他“实在可爱”呢！延安会谈不过两周之后，张学良迅速变得如此直率、坦诚、疾恶如仇，连刘鼎都感到极其意外。尽管刘鼎这时象中共中央一样，对张学良计划牵延到十一月再发动反蒋多少有些担心，但他们看起来也明白张学良这里面的苦心。正如刘鼎所说：他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因此总想最后从蒋那里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同时，一方面想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到十一月时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２１）。

这里所说的“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无疑就是指望到时候能够得到苏联愿意援助他的表示。很明显，之所以要拖到十一月才起事，这个考虑实在是再关键没有了。

虽然刘鼎强调“新爱人方面可由爱情上获得一切”，对此张学良也未必不清楚：苏联即使不愿意直接援助他张学良，它难道还能不愿意援助中共与红军吗？但张学良毕竟因为中东路事件得罪过苏联，赴欧治病时要求访苏被拒而心存些许疑虑。因此，在延安会谈中，张学良特别着重地与周恩来讨论的，也就是如何与苏联打通联系，求得援助的问题。他之所以在会谈中积极表示愿意协助中共代表前往苏联，表示他也将迅速派代表前去联络，自然也正是为此。这里的原因很容易明白，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与援助，他张学良要造蒋介石的反，以及揭旗抗日，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刘鼎的信因为用了许多隐语，写得还不够明白，还容易让那些不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就这一点或那一点产生某种疑问，那么，下面的两份电报应该能够进一步证实我们上面对刘鼎信的内容的解释。

电报之一为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于五月五日致彭德怀和毛泽东电，内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２２）。

电报之二为五月七日负责做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工作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给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电，内中同样说明张反蒋决心已定，但要求给他时间准备并保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他希望红军不要写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他将我党口号修改后，一下印了许多”（２３）。

也许用不着举再多的资料来证实笔者的观点了。张魁堂先生所谈的那个“张学良‘联共’之谜”，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被自己搞乱了。延安会谈之后，究竟谁说服了谁，谁受了谁的影响，应该是一清二楚了。颇为遗憾的是，据笔者所知，以上所引绝大多数资料或者公布多时，或者大多数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久已了解，可竟长期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错误的说法竟以讹传讹长达十数年之久（２４）。

（１)张学良甚至声称，延安会谈时双方已经就中共向南京政府输诚问题达成大致协议如下：“（１）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准备抗日。（２）担保不欺骗，不缴械。（３）江西、海南、大别山等地共产党武装同样受点编。（４）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５）共党停止一切斗争。（６）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８）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９）待抗日胜利后，共党武装一如国军，复中遣散。（１０）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然，等等。”见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转见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２)据说此话为周恩来一九六一年七月四日与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夫妇谈话时所说，笔者未见原文，不了解此话之上下文究为如何，因此无法确认通常被利用的那两句引文是否完全忠实于周回忆时的原意。转引自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　　那里工作的时候》，《党的文献》，１９８８年第三期。

（３）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二）》，《党的文献》，１９８８年第三期。

（４）《毛泽东致洛甫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９日。

（５）《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同志给朱、张、刘、徐等电》，１９３６年5月２５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１９３６年７月１日。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反蒋方针的指示，最早见之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红军总政治部的一份电报中，其中明确提出："对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应改变过去抗日必须讨蒋的口号"。此后明确的关于改变"抗日反蒋"方针的指示，见之于《中央关于"　　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１９３６年9月１日。

（６）训令原文称："（一）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二）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三）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信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国辱权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但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订立。……"《中共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１日。

（７）《毛泽东、彭德怀致王以哲并转张学良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６日。

（８）张魁堂先生对这次会议的内容所做的解释显然不尽确切并容易产生误导。据张称，此次会议"已提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原则，〖这就是〗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问题上不退让，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保持对国民党批评的自由等等"。事实上，此次会议虽然决定在斗争口号上将"打蒋介石，现改为打卖国贼"，但"抗日反蒋"方针没有任何改变。其决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目的仅在于：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揭破蒋介石的真面目，分化国民党，联合其左翼，中立其右翼，集中打击蒋介石。见张魁堂：《揭开张学良"联共"之谜》，《明报》月刊，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号；《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７日。

（9）（１０）（１１）《周致张、彭、毛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１日；《周恩来给贾托夫的密写信》，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３日，前引中共党史资料，第３３辑，第３－５页；并见周恩来年谱，第３０５－３０６页；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７页。

（１２）《周恩来致汉卿先生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２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７页。

（１３）由张魁堂整理的《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称，周恩来信中所谓"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是"中共主张有条件地联蒋"。此说曲解文意之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前引《党的文献》，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１４）《周恩来致彭德怀、毛泽东电》，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３日，前引周恩来年谱，第３０６页。

（１５）《周恩来致理治、劲光并告张浩同志并告毛、彭主席》，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９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辑，第３０１页。

（１６）（１７）（２０）《刘鼎给李克农并转周恩来的信》，１９３６年4月２７、３０日。

（１８）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第１１页。

（１９）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２１）《刘鼎给李克农的信》，１９３６年5月２日。

（２２）《曾希圣致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电》，１９３６年5月５日。

（２３）《朱理治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１９３６年5月７日。

（２４）笔者最早见到前引各种档案资料还是在１９８０年，距今已经有整整十四年时间了。

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

——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谈起

陈独秀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从一个前清秀才，一跃而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进而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1]，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甚至是中共五届中央的总书记[2]。曾几何时，斗转星移，陈独秀成为“反对派”，遭共产党唾弃，被国民党判刑，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对陈独秀的一生，至今人们的评价不一。有的是因为观点不同，有的却是因为资料欠缺。综其一生，与共产党关系最大。恰恰是陈独秀在共产党的这一段时间，许多资料长期不得披露，研究起来困难最多。国内几乎所有谈及陈独秀生平的文章和著作，都肯定地说，由于他“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成了“中国的孟什维克”，“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对中国共产党 1927 年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一时期陈在党内主持工作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文献资料都不了解的话，焉知他的那些“主义”的背后，没有更复杂的背景？何况，中国共产党自始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并直接受到莫斯科派来的代表的监督指导，我们又如何知道他没有进行过内部的抗争？

1929 年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个《告全党同志书》，历数自己当年五度“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被迫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情形[4]。但共产国际早已给陈独秀的“错误”定性，声称中国革命的失败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机构中存在着“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于是，什么“右倾分子”、“投降主义”之类的政治名词纷至沓来。[5]陈独秀的辩白，自然引不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直至今日，即使那些为陈独秀鸣不平，高度评价陈是那个牺牲自己、造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们，也仍旧口口声声地说：“我们并没有疏忽他投身革命，尤其是第一次国内革

命战争后期应承担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责任，以及在理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关系方面，和在与国民党右翼斗争方面的缺失。”[6]然而，有谁真的能够说清楚，那些“责任”和“缺失”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陈独秀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党、一个领导人在成长过程中不过避免的碰撞或探索？更何况，前些年中俄学者中已经有人在指责陈独秀犯有“左倾”的错误了。[7]于是，陈独秀“左”耶“右”耶，时左时右，亦或“形左实右”的问题也出来了。

坦率地说，“右倾”也好，“左倾”也好，未必是历史学家应该讨论的话题。是非对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角度，人们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研究陈独秀主持中共工作期间的这段历史，关键在于搞清楚基本史实，即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它们是怎么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特别是要弄清楚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以便使我们最终能够知道，真实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的。在陈独秀留下的那许许多多文字中，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其实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和决定。近年来，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所展开[8]，但一些关键性资料的欠缺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障碍。随着俄、德、中三种版本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1920－1927)》（文件集）的出版，这样的条件得到了重要的改善。本文即准备在此基础上，就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某些传统的说法，作深入一些的探讨。

陈独秀“幼稚”，全党更“幼稚”

和列宁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俄共前身）时的条件比较起来，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无疑要“幼稚”得多。根据《毛泽东选集》中的说法，陈独秀就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的。[9]这句话，逻辑上的意思大概可以理解为：因为党初创时期“幼稚”，所以才选了“幼稚”的陈独秀来做总书记。

说共产党当时“幼稚”，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当年党成立起来了，但党的领导人以及党的其他成员，“理论准备”普遍欠缺。通俗地说，就是大家当时都还不很清楚用于指导俄国革命成功的列宁主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相对来说，陈独秀在当时接受列宁主义则确实是比较早的和比较彻底的。

陈独秀何时开始信仰列宁主义？1920 年夏天。这一年的 9 月 1 日，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开始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而就在 4 个月前，即 1920 年 5 月 1 日，他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他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10]仅仅几个月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如果我们依据目前所知的情况，相信在 1920 年 6 月间，陈独秀等人组织过一个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11]，一个月后又受俄共代表维经斯基的委托，组织筹备“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和组织，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12]。如果我们进一步相信它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或至少在同一时期他还在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等共产主义小组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认为，陈独秀在六七月间应该就已经开始倾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了。

在很短的时间里，一跃而成为列宁主义者，这在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而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并迅速开始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那就是他曾经有机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俄共代表维经斯基那里得到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帮助。

维经斯基从 1920 年 5 月到上海，到 1921 年 1 月回国，他在中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与陈独秀的接触和交往超过他认识的任何中国人，时间长达几个月。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不论是组建中国社会主义者同盟，筹建中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或者是创办《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起草诸如《中国共产党宣言》等重要文件，维经斯基都曾与陈独秀等人密切协商，给了陈独秀十分重要的帮助。因此，从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随后这段时期“对于政治的见解”，几乎都是从俄国革命经验中得到的。而这些理念和经验，自然都是得益于维经斯基的介绍与灌输。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当上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声望，而不是他在理论和经验方面比当时党的其他成员更成熟。关于这一说法的可靠性，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中共一大通过的那个众所周知存在严重缺陷的决议和陈独秀此前的文章，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科书，包括最新出版的中共党史读物都认为，有关中国革命需要“两步走”的思想，中共一大期间基本上还不存在，直到 1922 年初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人们才认识清楚，然后才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下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什么叫中国革命“两步走”？简单地说，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之所以存在严重问题，也就是因为它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存在的客观需要，不仅没有提到反帝反军阀的问题，一厢情愿地主张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为党的基本政治纲领，而且反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共同敌人。是不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真没有人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首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呢？我们只要仔细地读一读陈独秀 1920 年九十月间发表的文章，我们就会发觉，陈独秀实际上早就提出了类似的主张。

陈独秀当时就明确指出过：“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是一样，要用他来造成多数的幸福，简直是妄想。”“在最近的将来，不但封建主义要让共和，就是共和也要让社会主义。……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虽是一定的轨道，然这轨道却不能够说必须要经过若干岁月才可能改变方向。……俄罗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会主义代替了，封建和社会主义之间不必经过长久的岁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当然，“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13]

陈独秀上面的话表达了几层意思。第一是肯定历史的进步必然要经过由封建到共和（即指资本主义），再由共和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跳跃。第二是强调他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能谋全体人民的幸福。第三是相信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第一步必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社会革命未必一定要等着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时间再来进行，它完全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迅速发生。第四是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该联合民主派，

帮助他们反对封建势力。在这里，中国革命要“两步走”的思想，可以说已经呼之欲出了。当然，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都相信，中国从 1911 年帝制被颠覆之日起就已完成了从封建到共和的革命转变，陈独秀也不例外。因此，他并没有因为认识到革命要“两步走”就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摆到第一位来。此后的陈独秀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并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乃情理中事。但是，他长人之处在于，他毕竟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民主派”与“君主派”的斗争在中国其实依然存在，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应当支持，而遇着“民主派”反对“君主派”的斗争的时候，“吾党”应该帮助前者反对后者。很显然，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当国民党占据广州，邀请陈独秀前往主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时，已经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才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从 1920 年九十月，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的 1921 年 7 月，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共一大却因为维经斯基回俄，陈独秀在穗，通过了一个既不能清楚表达共产党最高纲领，又极端自我孤立，无论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都明显较前有所倒退的决议。决议对于中国当前的实际需要一句不提，反而硬性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断绝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切联系，主张必须对现有的其他政党一概采取攻击的态度。会议虽然仍旧不能不推举陈独秀做领导人，实际上却明显地在反对陈独秀关于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不赞成陈独秀继续与国民党合作。[14]不论中共一大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是否就此有过争论，会议的决议已经清楚地表明，当时全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远较陈独秀更加“幼稚”。在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是因为“党在初创时期的幼稚，当了党的总书记”，也是说得通的。

既然全党“幼稚”，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自然也要接受共产国际，其实也就是俄国共产党的帮助与指导。除了由中共通过决议，明确承认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以外，莫斯科从中共成立之初，就开始向中共中央派出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任务，就是监督和指导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意图。共产国际最初甚至规定，党的领导机关的会议，必须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是因为陈独秀的坚持反对，此一规定才没有具体执行。[15]但是，在中共，乃至作为中共中央第一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组织关系，则是确定了的。不仅如此，由于数十名各地知识分子初步结合，尝试革命，知识、实践均十分欠缺，因此，他们最初对俄国的经验，甚至对俄国的代表，也只好抱着一种“孔步亦步，孔趋亦趋”的学习心，决心以俄人的理论为理论，以俄人的政策为政策。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有人说陈独秀一开始就向共产国际闹独立，从上面的情况看，这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16]

陈独秀：“暂时支持国民党”

对俄国人“孔步亦孔，孔趋亦趋”，当然不是说双方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许多人都回忆过陈独秀的性格，对他的“家长作风”印象深刻，尤其蔡和森关于陈独秀对 CY 中央的一个决议“大发雷霆，碎之于地”的描述，人们更是耳熟能详。[17]甚至有人极而言之，称陈独秀是“性格刚毅，意志顽强，脾气暴烈，桀骜不驯”。[18]不管陈独秀的性格是否真的到了“脾气暴烈，桀骜不驯”的程度，他对共产国际不会完全服服贴贴大概是真的。

有记载的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冲突，是因为国际代表马林 1922 年春“提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若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他们的宣传前景暗淡”。不知道陈独秀与马林是否为此

有过口舌冲突，至少马林当时就记下了这一情况，说：他 4 月间几度同中共领导人谈话，建议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而“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19]“我们的同志”，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

如前所述，深知先有民主革命，后有社会革命的陈独秀是不会拒绝联合国民党的。他从广东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之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赞同联合战线的政策，主张同这时唯一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就在他反对马林建议的同时，他还在写文章呼吁劳动阶级要援助国民党革命成功。[20]他之所以反对马林的建议，纯粹是因为把自己变成国民党员，必然要以服从国民党的领袖和主义为条件，这难免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损害其利益。正如他得到马林的建议后，写给这时已回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所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都不同，国民党联合美国，甚至联合张作霖、段祺瑞等军阀，与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主张太不相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受其束缚，绝不可能。[21]

但是，这时共产党只有几十个人，要想推动中国革命，非联合在南方有相当影响和基础的革命的国民党不可。为此，陈独秀不止一次地写文章呼吁，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来华后也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党外合作的主张，却均被孙中山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合作这种形式，实际上已经成了实行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几乎唯一的途径了。[22]

1922 年 8 月 12 日，马林从共产国际回来，带回莫斯科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指示[23]，再度劝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共领导人赞同党内合作。8 月 28－30 日，马林和中共中央领导人进一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最终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不难想象，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未必十分理解，但现实条件的困难，以及共产国际指示的权威性，都促使陈独秀等不能提出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如同陈独秀一年以后报告所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但马林当时的笔记却显示，更多的讨论其实是在会前，会上的争论已不严重。他写道：除了广州方面以外，“我们团体内没有重要的反对意见。”[24]

不论陈独秀是否对加入国民党仍旧心怀疑虑，他几乎马上就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颇能反映此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特点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说法，开始公开宣传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国民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与错误，然终为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自然算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在国民党为民主政治及统一政策斗争时期，无产阶级不但要和他们合作参加此争斗，而且要在国民党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为工人阶级利益与自由的口号，以扩大其争斗”。他并且承认：“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 [25]然而，宣传归宣传，这并不等于说陈独秀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要“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了。[26]只要看一看他 1922 年 11 月前后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对国民党所做的分析，和为中国共产党规定的任务，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即他并非如我们许多文章所说的，一下子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他当时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为的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这个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的错误，“向国民党中工人分子宣传促进他们阶级的觉悟，使他们了解国民党终非为无产阶级利益争斗的政党”。因为中国工人是共产党的基本依靠力量，而工人运动前景广阔，

深受压迫的中国工人甚至会比先进国家的工人更具战斗精神。因此，根据他的归纳，由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宣布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任务，概括起来其实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我们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27]

真的按照陈独秀的上述方针来指导共产党人，大概是很难适应国共党内合作这一特殊形式的。需要注意的是，陈独秀的这些说法并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任何批评。不仅如此，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共产国际这段时期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就不难发觉，共产国际其实同样赞成把争取工人群众当作共产党人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即使是在马林 1922 年 8 月带回来的那个国际指示当中，也是突出强调要组织劳动群众，建立工会，争取国民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28]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2 月 5 日就中国问题通过的决议，更是明确主张："共产党人应该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组织工人群众、成立工会和建立坚强的群众性共产党方面。" 决议对国共合作的问题几乎一句没提。[29]这同共产国际后来的方针有极大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

陈独秀真的打算“二次革命”？

要求中共将主要注意力都用于发展自身，这未免与共产国际刚刚确定的联合战线政策有些矛盾。由于回莫斯科述职的马林坚决反对，一个月之后，即 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又专门就国共关系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一上来就宣称：“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重申了共产党人要加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观点，但强调的重点已经明显变化，原来要求共产党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如今则强调，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只是共产党人“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它并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由于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共产党应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30]

一面强调民族革命是中心任务，一面要求共产党仍旧要把组织工人当成“重要而特殊的任务”，这无疑给中共中央出了一个难题。

其实，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需要实行联合战线的观点，与陈独秀的看法并无太多矛盾。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加紧在革命的过程中为社会革命的目的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去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

自建党伊始，陈独秀就认定，落后于俄国的中国，一定要按照俄国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即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功二月革命，再联合工农成就自己的十月革命。他几度公开发表文章，说明中国革命之所以要两步走，就在于“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只不过，陈独秀一直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也同样幼稚。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远远大过资产阶级，两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的力

量最后势必大过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成功后，紧接着自然是一场“十月革命”，“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制度”。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认为，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放在争取和组织无产阶级，壮大自身力量的基础上，以便民主革命成功时，即可在最短时间一举而成就社会革命。[31]共产国际转而突出强调民族革命，这与陈独秀最初的观点显然有多少差别。

1923 年 2 月 7 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国内舆论与社会对此竟没有太强烈的反响，对京汉铁路罢工负有领导责任的共产党人因为自身力量太小，虽义愤填膺，却也一筹莫展。这一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有它一定的道理：必须首先集中全力打倒封建军阀，否则难有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实行阶级斗争的有利环境。

“二七”惨案之后，国际代表马林首先开始写信给莫斯科，尖锐批评共产国际根本就不该强调在中国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说这纯属“幻想”[32]。当然，马林未必真的主张取消共产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他其实就是希望共产党人只要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就好了。[33]

来自共产国际和马林的影响，也促使陈独秀更深刻地体会到走好革命第一步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目前工作,首先要做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而“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负破坏及建设的责任。中国民主革命至今未能完成，军阀政治得以存在，唯一的原因，就是民主革命的势力未曾集中。”如今，“凡属民主革命的分子，若当真要革命，便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共产党人很清楚：“虽然明知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34]至少，在目前还不能直接从事社会革命的情况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幼稚的劳动阶级和幼稚的社会主义者，要想在推翻帝国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做他能做的工作，除了国民革命运动，还有何路可走？”[35]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与马林结成了统一战线，突出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推动国民党左倾的工作上来。三大通过的决议反映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即一面强调保存党的组织，努力从工人群众，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有觉悟的革命分子，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一面解释说：由于工人阶级尚未强大，不能发生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国民党。而整个决议的中心在于说明：“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故“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36]

过多地注重国民党，并且把整个工作的重心放到发展扩大国民党的问题上来，也难免产生陈独秀过去曾经担心过的问题，即使共产党人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11 月，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一面坚持：“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并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一面又叮嘱说：这一切作法要自然，“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可见，涉及到任何可能引起国民党反感的行动，中共领导人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37]

中共三届一中全会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陈独秀等人当初之所以反对加入国民党，很大

程度上就是担心会因此受到国民党的纪律束缚。而中共三大刚刚开过不久，孙中山和广州的国民党人就因陈独秀等在《向导》等刊物上批评国民党，而大起纠葛。孙中山甚至当着马林的面提出警告，扬言陈独秀若再不收敛，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面对这种局势，中共中央自然不能不通过决议，决定避免在报刊上过多刺激国民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 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孙中山开始启动国民党改组工作，一批国民党元老再度借机抨击陈独秀“欲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结果又引起新一轮矛盾。[38]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除在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强调谨慎以外，陈独秀还不得不发表文章，公开表示共产党纯以国民革命为重，并无社会革命之计划。他表示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若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如俄国 1917 年从二月革命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39]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陈独秀的这段说法，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二次革命论”，批评陈独秀想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40]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联系到在他主持下刚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人应“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决议，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虽然是含混地，却是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他之所以没有像过去那样断然否定存在着资产阶级建立稳固政权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上面的文章本来就是为了消除国民党人的疑虑而作的，不能不讲得比较含混些。我们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划上等号。

据说，有关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与“二次革命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将无产阶级领导权贯彻到底的问题。前者主张无产阶级不仅要领导十月革命，而且要领导二月革命，以便由二月革命紧接着就不间断地转向十月革命；而后者则放弃二月革命的领导权，等于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任由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实现资产阶级专政，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十月革命。然而，这种看法大概多少有点“事后诸葛亮”。不要说陈独秀依据的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布尔什维克没有掌握二月革命的领导权没有错，陈独秀何错之有？何况陈独秀也并非不想要所谓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的力量对比，当力量对比太过悬殊，公开利用党内合作的条件从国民党内部来夺取其领导权又势必导致统一战线破裂，进而导致民主革命严重受损的情况下，想像一下中国可能也将不得不像俄国那样，经历一个从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到十月革命劳农政府的转变，又何错之有？

关于领导权问题要随着力量对比的现实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只要比较一下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的一些谈话就应该能够有所了解了。毛泽东当时曾多次讲：未来只能是与国民党一道，并且是以国民党为主体来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用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独裁加若干民主”，领导权多半仍旧在国民党手里。他开始时甚至讲，那时不用十月革命了，到一定时候要不要搞社会主义，国共两党大家开个会讨论讨论，“通不过，慢慢再来”。即使在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说法也还相当慎重，

只是使用了“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说法。[41]很显然，没有人因为毛泽东一度讲过这样一些话，就认为他右倾，或是说他主张“二次革命论”。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多半只是因为陈独秀、毛泽东他们认识到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因而对未来前途的估计变得比较实际一些而已。同在 1923 年，身为陈独秀（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比陈独秀的看法实际上更为悲观。他不止一次地谈到，以中国当时的落后，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中国商人的作用较工人、农民“尤为迫切和重要”，强调“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42]如果我们说陈独秀主张的是什么“二次革命论”，那么毛泽东呢？

陈独秀与鲍罗廷的冲突

陈独秀是不是准备“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是不是从此把国民党的利益置于共产党的利益之上，准备让“资产阶级”来当权，这一点从陈独秀 1924 年同鲍罗廷的冲突中间，可以看得更清楚。

1924 年 1 月，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全力推动下，国民党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依照俄国共产党的形式进行了全面改组和重建。新设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党部等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都是中共党员。尤其是负责组织发展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本上都是依靠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共总共只有 200 多名党员，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重要发展工作[43]。以致从 1923 年 10 月以后到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几个月时间里，中共自己的活动大大减少，党员人数几乎没有增加。担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三常委之一，并兼任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明确告诉鲍罗廷说：我们的党员无法抽出时间做群众工作，已经失去了同工人群众的直接联系。仅以广州为例，国民党 9 个区委会，64 个支部，党员 7780 人，共产党的干部党员只有 30 余人，目前主持 9 个区委中的 5 个，和 64 个支部中的 13 个，就已经忙不胜忙，自然无暇顾及自己组织的发展问题。[44]

对于这种情况，负有苏联外交部使命的鲍罗廷似乎比较满意。因为在他看来，共产党的整个组织都“萎靡不振”，不过是读些小册子然后把它们散发出去而已，只是在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当中，他们才变得“人心振奋”和“异常活跃”起来。在莫斯科对中国事务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兴致勃勃地称赞中国共产党人有纪律，说他们没有用任何左派言辞给国民党一大制造麻烦。[45]话里话外不难看出他们对中共的发展不仅毫不关心，而且生怕中共惹麻烦。但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此却明显不满意。维经斯基就专门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共的同志们加入国民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他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来建立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停止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和知识分子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这是不妥当的。他明确认为：“在国民党内做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在合适的地点和时间为国民党工作。[46]

1924 年 5 月，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在上海召集陈独秀等领导人召开了中央执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一反共产国际决议过去关于国民党是一个包含四个阶级的民族革命集团的含混说法[47]，肯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党[48]；一反鲍罗廷必欲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真正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党的计划，断言“国民党依它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49]；一反中共三大关于“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的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的主张，提

出：党现时的根本任务是“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组织纯粹阶级的斗争的工会”，“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狠（很）大的错误”。会议的基本目的，明显地在于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共产党自身的组织和发展，认为只有成功地训练好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精神及阶级意识，使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国民革命，才能“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50]

根据已有的资料，可以知道维经斯基在五月扩大会议开会前半个月就来到上海，与陈独秀等人“不断地开会”，陈独秀所介绍的国民党内右翼势力强大的情况给维经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会上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主张与国民党决裂”，陈独秀虽与维经斯基同一立场，决心一面加强自身的发展壮大，一面在国民党内加强阶级斗争，但不难想象，他未必没有同样激烈的想法。[51]会后，陈独秀马上就向鲍罗廷提出了公开共产党人的左派面目，使派别斗争合法化的问题。国民党内这时批评苏联对华政策和中共党团活动的舆论正烈，鲍罗廷穷于应付，也乐得把这一分歧归结为派别斗争。他于是公开讲：“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52]

这个时候，国共两党在许多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暴露无遗。由于党内合作的关系，所有共产党员都已是国民党员，不管陈独秀等人以何种名义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都不免被国民党人看作是党员反党的证据。不过几个月时间，国民党内检控共产党人违纪，进而联署反对共产党“跨党”的案件就有 20 多件，党员达 2000 余人。到 6 月 18 日，更进一步发生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共党案。让陈独秀深感意外的是，孙中山对此不仅不压制，反而决定开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陈独秀自国民党一大以来，一直都把孙中山视为国民党左派。因此他坚持适度的批评，并不担心会引起严重问题，因为他相信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力量完全可以压制右派。但进入 7 月，孙中山同意讨论弹劾案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看法都开始变化。鲍罗廷断定：“让左派去打击右派是困难的，这样做国民党必然灭亡”。而陈独秀却告诉维经斯基说：国民党内大部分都是右派反共分子，“如果说那里还有一定数量的左派，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孙中山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只是中派，而不是左派”。“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他建议：“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53]

五月会议本来就激起共产党人对党内合作形式的潜在的不满，随之而来的两党矛盾的白热化，不可避免地在党内激起了一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浪潮，陈独秀显然也在考虑万不得已时的办法。鲍罗廷见状急忙做广东区委的工作，劝说广东区委于 7 月 15 日通过一项决议，批评中央准备退出国民党“实际上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他同时写信给瞿秋白，通过瞿转告陈独秀：“我们的同志现在对可能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考虑太多”，不了解“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召集和组织国民党左派”。[54]

不论陈独秀是不是得到了来自广州的劝告，他显然我行我素。在 7 月 21 日的中央通告当中，他以“委员长”的名义通告全党称：五月扩大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此时国民党只有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为此，陈独秀要求各地党组织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要以各种方式公开表示对右派的不满，努力获得和巩固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并且“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吸收一切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的左倾分子，以“形成国民党左翼与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陈独秀虽然没有在通告中谈及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并且仍然主张“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他无疑是做好了万一破裂，另组“新国民党”的准备的。[55]

8 月 19 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始专门讨论容共问题。瞿秋白刚好应鲍罗廷之邀前往广州，被鲍罗廷推举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也一同与会。当他从鲍罗廷处得到消息，得知鲍罗廷和孙中山内定成立一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国共分歧问题时，马上专信告知上海。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当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直接致电鲍罗廷和瞿秋白，极其强硬地规定：（一）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56]

由于当时上海与广州之间的通讯条件十分落后，陈独秀得到瞿秋白通知，再开会做出决定，发往广州，实际上已经成了马后炮。没有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全会上采取进攻的态势，鲍罗廷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辩解，反对国民党中央监委提出的请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提议，但仍旧赞同了那个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以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57]

消息传来，上海的中共中央内部一片愤怒。蔡和森等人强烈要求致电莫斯科，控告鲍罗廷和他所实行的一整套妥协路线。陈独秀则倍感沮丧。他在随后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明了这一可悲的情况，称：“这次会议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孙中山等人虽然不能开除我们，但却利用右派来压制我们，“目的在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令人气愤的是，“鲍罗廷同志不是站出来反对，而是建议他们成立所谓国际联络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且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58]

经过一系列紧急磋商后，陈独秀派高尚德赶往广州，以传达中共中央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贯彻中共中央进攻路线，决心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并通过决定规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工作。瞿秋白 9 月 23 日刚一回到上海，陈独秀等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禁止他再去广州。不管瞿秋白如何解释说，国民党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中共中央还是强硬地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批评瞿秋白的同时，谴责鲍罗廷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陈独秀一面要瞿秋白通知鲍罗廷：中共中央决定召鲍罗廷同志前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一面上书共产国际远东部，要求共产国际对鲍罗廷提出警告。[59]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在上海严厉批评鲍罗廷的同时，高尚德在广州也推动广东区委的领导人展开了同鲍罗廷的辩论。

广东区委这里与鲍罗廷的争论也颇为尖锐。共产党人不赞成孙中山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江浙军阀卢永祥来对抗直系军阀吴佩孚，鲍罗廷却不予反对；共产党人不赞成国民党工人部部长廖仲恺以支持北伐，服从大局为名，强迫广州印刷工人停止争取改善自身权益的罢工，鲍罗廷却坚持劝说共产党领导人要工人复工；共产党人反对听任商人资本家组织武装威胁广州政府，鲍罗廷却赞同孙中山搞所谓“新经济政策”，用所谓实行广州自治的办法来缓和紧张

局势。不仅如此，共产党这时与国民党还有许多具体矛盾，如共产党人前脚帮助农民成立了农民协会，国民党区党部后脚就强行予以解散；共产党人刚刚召集了民众大会，就有国民党军队前来抓人。由于共产党人始终是以国民党干部的身份出面做群众工作，国民党人的破坏已经使共产党人的工作开始陷入困境，使民众也产生了恐惧或困惑的心理。对此，鲍罗廷更是熟视无睹。

正因为如此，当高尚德带来陈独秀等人的意见到来后，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区委立即召开会议，同鲍罗廷进行了长达几天时间的反复辩论，明确主张，即使不退出国民党，也应该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尤其应该拒绝在工人部和农民部工作，否则无法独立地出面争取和保护工农的利益。会议并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做出决定：鲍罗廷无权领导广东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涉及有关地区性的问题时，鲍罗廷只能参加由谭平山、冯菊坡、周恩来等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并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进行工作；涉及全国及全党性的问题，鲍罗廷则必须与中共中央代表协商，并报中共中央同意。

由于 10 月中旬突然爆发了广州商团叛乱事件，10 月下旬又突然发生了冯玉祥领导的北京政变，中共中央以及广东党组织与鲍罗廷之间的冲突，不得不暂时地搁置起来了。但到一个多月后，即维经斯基再度来到北京和上海，先后参加了 12 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和 1925 年 1 月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这个问题仍旧成为陈独秀等人突出抱怨的一个重点。

1924 年 12 月上旬，维经斯基同陈独秀等在上海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其中的一些谈话内容很清楚地反映出了陈独秀对鲍罗廷乃至对共产国际的某些不满。陈独秀等人不仅对鲍罗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态度表示了极大的困惑。陈独秀明确说：我们给他送去了许多决议，发去了许多电报，他从来不予答复。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工作。他在广州非常清楚地知道，整个国民党的工作几乎都是共产党员做的。他的理由是，在中国，在现在这个时期，一切工作都必须通过国民党。如果共产党员想要进行工作，他们可以在国民党内进行。因此，他从来不谈共产党的工作，甚至答应给张国焘的 1000 元，也是通过孙中山给的。事实上，不仅是鲍罗廷，就是共产国际也是如此。举个例子，我们每个月只能得到 1000 元来搞中国的全部工作。中国的国土如此之大，派一个人到北京去，就得给他一百元，没有钱就办不成这件事。香港一家微不足道的国民党的报纸，每月却能够得到 2000 元来写文章反对我们。用于黄埔军校和国民党组织的开支，苏联一年提供的费用就达到 200 万元。而我们甚至没有经费为党的机关报《向导》在报纸上做广告，没有办法把它们免费散发到更多的工人手中，因为每期如果不卖到五六分钱就无法维持出版。[60]

不难看出，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其他共产党人，在涉及到共产党切身利益和政治立场的问题上，没有谁真的能够做到“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对鲍罗廷，就是对莫斯科也颇多怨言。他们相信，莫斯科过分重视国民党了，共产党的发展不该受制于鲍罗廷。值得注意的是，维经斯基事实上是倾向于支持陈独秀的，他告诉他们，莫斯科并不等于共产国际，共产党没有必要听鲍罗廷的，它应当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而不能一心不乱地为国民党做苦力。

让大多数中共党史著作津津乐道的中共四大，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召开的。它通过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共产党自身独立性和斗争性的决议。尤其是陈独秀起草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突出地表达了陈独秀这时对整个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它明确提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不但在推翻外国帝国主义的争斗中，

须依靠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之努力，即此等争斗得着胜利，亦须无产阶级及农民等一切劳动群众有他们强固的阶级组织及其政党，才能够保障革命的胜利，并抵抗新的反动势力，进行自己阶级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着胜利”。反对资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断定中国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担任，宣称革命成功即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这是左倾；若是忘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革命之准备，忘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经济组织及党的工作，便是右倾。

据此，决议案明确认为：国民党固然是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但决不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全部。“我们固然要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上在组织上发展，同时也不可忘了在国民党中的争斗：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争斗，农工阶级的经济争斗。”“对于国民党政治上妥协政策，尤其是不利于工人农民的行动，我们必须暴露其错误，号召工人农民群众起来反抗。”

会议由此做出决定：“引导工业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革命的小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以至于乡村经济中有政治觉悟的农民参加革命，实为吾党目前之最重要的责任。”当然，会议对五月扩大会议决议也有修正，如规定今后必须独立地组织工农的同时，不再笼统地反对中共党员及在中共指导下的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只是强调：非工作需要不再加入国民党。[61]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决议案，用瞿秋白的话来说：“只有几个与群众和党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同志”，对决议中关于“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一句，有过一些不同看法，“作出某种‘不断革命’的暗示，但这种暗示很快就消失了”。[62]很明显，这个观点同陈独秀 1923 年的说法有某些相似之处。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瞿秋白等在内，都是赞同的这一观点的。他们并不同意泛泛地谈论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革命”。因为他们了解，以现有的力量对比，要想一举实现俄国 1917 年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飞跃，几乎是不可能的。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社会革命，确实要看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自身的革命准备能至何种程度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如何。

陈独秀的所谓三次“大让步”[63]

1925 年 1 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无疑是中共历史上具有突出意义的一次旨在加强自身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大会。不少对中共后来有重大影响的观念，如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等，都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来的。何以不过一年时间，它就重新陷入妥协的泥沼，以致有了人们所谓的陈独秀的三次“大让步”了呢？这种转变之突然，同样有些让人难于理解。

陈独秀的第一次“大让步”，指的是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破坏了广东党组织以共产党人和左派占据国民党中央绝对多数的选举计划。其实，作出这一判断的前提是颇值得考虑的。即，能否认为以共产党人和左派（事实证明国民党内部几乎没有几个确定的“左派”）来占据国民党中央肯定是一个好计划呢？是否占据了国民党中央就能够阻止发生“三二 0”事变，或其他旨在排除共产党控制国民党的类似事变呢？这是很令人怀疑的。

当时的形势是，中共四大之后，中共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

七个月，党员由 423 人只增加到 900 人，不过 1 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 1925 年 10 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 9 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 2428 人。尤为重要的是，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前后，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右翼势力公开分裂，在北京西山成立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此即后来史称西山会议派之前身），随后因上海的日本厂主和英国巡捕枪杀示威工人和学生，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64]

共产党势力与影响的迅速扩大，进一步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支持容共政策的廖仲恺遭到暗杀，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胡汉民卷入暗杀事件，过去曾经被中共视为左派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站到右派一边，公开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这在最初显然是鲍罗廷不愿意看见的。

还在 1925 年 5 月初，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在上海开会，双方就再度发生严重争执。鲍罗廷坚持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放到广州去做国民党的工作，即使损害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不仅陈独秀，就连共产国际在上海的工作人员也深感鲍罗廷要求过份。而讨论到即将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新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产党员人数问题时，双方之间更是意见冲突。陈独秀提出 7 人，鲍罗廷却坚持不要超过国民党一大时的人数，说是“为的是不吓跑中派和不无谓地刺激右派”。争到最后，陈独秀不得不妥协至 4 人，鲍罗廷这才勉强同意下来。[65]

鲍罗廷回到广州以后，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他利用孙中山逝世后自己在国民党领导层中的特殊身份，纵横捭阖，大刀阔斧，挤走了胡汉民，赶走了国民党内最高的军事领导人许崇智，把与苏联顾问靠得最近的汪精卫和蒋介石扶上了政治、军事领袖的显赫地位。因此，鲍罗廷胆子明显地变大了。不过陈独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他虽然肯定汪精卫、蒋介石是“左派领袖”，称赞他们“实实在在在那里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的军阀奋斗”。但他对鲍罗廷必欲限制共产党的情况，始终难以释怀。注意到共产党影响进一步扩大势必会更加刺激国民党，导致国民党或共产国际反过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陈独秀再度明确提议：适当时机应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66]

这个时候，形势之复杂与微妙，就连共产国际内部也意见分歧。如果说过去共产党因为过于弱小，不得不借用国民党的旗帜，在国民党内进行群众工作的话，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继续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占据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可避免地要更加加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冲突。维经斯基就明确认为，共产党在广州与国民党混同一起，稍一突出便引起左派的怀疑和右派的攻击，再加上“过于突出他们要占有国民党机关的意图”，自然会导致关系紧张。他相信：同国民党的关系有必要“从联盟转向联合”，否则将蕴含着很大的危险性。但共产国际却相信，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变为党外合作，难免会使国民党内右翼倾向抬头，使苏联控制和影响国民党的力量减弱。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反对任何退出国民党的企图。它的书记瓦西里耶夫 9 月 21 日上书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警告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有产生左倾的危险，必须赶紧重新审查它同国民党相互关系的性质。不是退出国民党，而是“对国民党的领导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共产党不应当要求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67]

1925 年 10 月，带着共产国际的意见来到中国出席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的维经斯基，贯彻了共产国际反对退出国民党的意图。[68]不过，陈独秀与维经斯基对国民党的看法仍然不尽一致。陈独秀为全会起草的有关国共关系问题的决议，仍旧坚持要同戴季陶等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决议称：过去将国民党分为左中右三派是不妥当的，等于把自己等同于左派，把靠近

自己的国民党人视同中派，实际上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汪精卫等为左派，戴季陶等为右派。“现在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维经斯基却鉴于戴季陶等与西山会议派有所矛盾，坚持将戴季陶等视为中派，说什么：“当我们对中派进行批评和论战时，应当考虑到合作”。因为我们要保持国民党的统一，并通过国民党实现全面的统一战线。[69]

1925 年 11 月底，利用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守北京地区的机会，国共两党联合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示威游行，试图发动一场“首都革命”。尽管革命本身没有成功，但在北京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维经斯基显然进一步为他的妥协主张找到了根据，因为没有巩固的国共合作，包括与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共产党无法在北京发动如此规模的示威行动。因此，他强调说：“在那些无产阶级数量很小，特别是没有像在上海那样出现革命运动的地方，不巩固统一战线，不加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工作，是不行的。”而要想建立巩固的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就要学会自我克制，“委员不妨少些，多做基层工作”。对于右派，也不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方针，“要揭露、批评，但不要把他们当反革命看待”。他这时有句很有名的话，叫做对右派“不要实行打掉牙齿的政策，而要实行更加谨慎的策略。”[70]

正是由于维经斯基坚持的结果，陈独秀在这之后与在上海正动摇于广州国民政府和北京西山会议派之间的孙科、叶楚伧等人进行了谈判，劝说他们改变初衷，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他为此保证说，共产党绝没有包办国民党的企图，并可以“把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如三分之一等。[71]比较一下 5 月间陈独秀费尽口舌才争到 4 个名额，可以想见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在陈独秀未必是个妥协的数字。何况，陈独秀对此也并非心甘情愿。联系到陈独秀这时还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措辞尖锐的政论文章，坚持把国民党分为左右派和联合左派反对右派的立场，断言戴季陶乃国民党右派思想之集大成者，断言右派乃资产阶级在国民党内的代表，断言中国的资产阶级不革命甚至反革命，……[72]可以清楚地看出，把维经斯基所说的这些“中派”请回去，并许下若干让步的保证，并不是陈独秀所主张的。

不论陈独秀意愿如何，请回孙科等人，与广州的鲍罗廷和广东区委这时的意图是矛盾的。在巧妙地运用策略手段改造了广州政权之后，鲍罗廷已不那么缩手缩脚了。共产国际和维经斯基等主张团结和妥协，而鲍罗廷却对军事受到苏联顾问控制，政权在左派汪、蒋手里的广州局势充满信心。对于 1926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与汪精卫商定的初步方案，一反过去反对多选共产党人的态度，决定国民党中执委中应有一半，或至少三分之一为共产党员，候补委员中至少一半为共产党员。中共广东区委对此举双手拥护。只因随后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鲍罗廷才转而同意把戴季陶等重新选入中央，在新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里，让共产党员所占的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但最后仍然把掌握着国民党实际权力的中央党部中将近 80％的领导职位，交给了共产党人。[73]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共产党人没有在国民党中执委中占据多数，只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结果还是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强烈反弹。“三二 0”事变发生，以及随后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显而易见都是针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来的。换言之，在不掌握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下，占据国民党的中执委也好，占据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好，最后的结果恐怕没有太大的区别。

陈独秀的第二次“大让步”，指的是“三二 0”事变时不敢反击，让蒋介石轻易得逞。但这个说法明显与事实有距离。

当时的情况是，由于莫斯科不满鲍罗廷擅自在广州策动政变，搞掉胡汉民、许崇智。国民党右派公开提出要求撤换鲍罗廷，深知此中内情的维经斯基也不表示反对。再加上在广州的苏联军事顾问也对鲍罗廷大权独揽颇多怨言，主张撤换，竟至迫使一向支持鲍罗廷的加拉罕不得不同意召回鲍罗廷。国民党二大闭幕后，鲍罗廷以回国述职为名，打道回府，实非得已。[74]但由此也可以看出莫斯科这时对国民党现状的担心所在。而事实很快也就证明，莫斯科的担心可能并非毫无道理。

鲍罗廷对当时的广州形势自然是信心十足的。他在路经北京时，向刚刚到达北京，准备前来广州的苏共中央书记兼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汇报过国民党内部状况，他明确肯定，包括他所选定的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和站在左派立场上的。但就在布勃诺夫刚刚到达广州不久，鲍罗廷打过保票的蒋介石就在 3 月 20 日发动了一起令人目瞪口呆的军事政变。他一举包围了苏联顾问的住所，收缴了苏联顾问卫队的武器，逮捕了自己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所有共产党员，并且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在广州实行戒严。这就是所谓的“三二 0”事变。

“三二 0”事变的直接诱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季山嘉过于自负的处事态度，与蒋介石“天性多疑”和“虚荣心特别重”的性格发生了冲突，引起了蒋的严重疑惧。但从事变后蒋介石采取的一系列排斥共产党的措施看，不难看出政变归根结蒂是冲着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太大的权力来的。如果这时布勃诺夫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加上有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支持，再争取到其他与蒋有矛盾的军事领导人的附和，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压制蒋介石，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莫斯科几个月来一直在谈论：“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反对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占据国民党领导机关，再加上包括鲍罗廷在内的几乎所有苏联顾问都曾报告说，蒋介石是坚定的左派，因此，布勃诺夫几乎毫不犹豫地就采取了妥协的作法，同意了蒋介石关于撤换季山嘉等一系列要求。[75]结果，季山嘉被布勃诺夫带回苏联，汪精卫孤立无援，被迫去职赴欧，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就攫取了党政军大权。

上海的中共中央得到关于“三二 0”事变的具体消息，已经是在事变发生的一周以后了。远在上海的陈独秀对事变临机的指导实际上起不到任何作用。[76]事变后不论广东的共产党人内部有无争论，在布勃诺夫批评军事顾问和共产党人过分突出自己、发号施令是引起事变的重要原因之后，中共广东区委的态度事实上与布勃诺夫没有两样。3 月底广东区委已经发出公开信，保证说：“共产党是要国民党团结的”，“把国民党认为是现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并且宣布说：“我们广东现在已有很好的革命领袖，但我们还要使这领袖更团结，更强固，更有指挥能力”。[77]很显然，当时在广州实际指挥退让的，是布勃诺夫，并非陈独秀。

至于陈独秀的第三次“大让步”，则是指陈独秀派张国焘等到广州，逼迫广东党组织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但第一，应当看到，陈独秀对蒋介石的认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的。第二，接受《整理党务案》既不是陈独秀的主张，也不是张国焘能够说了算的，它是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决定。

对于“三二 0”事变起因的具体了解，陈独秀主要是听路经上海回国的布勃诺夫介绍的。在

这种情况下，他头脑里对事变起因的认识，自然比较多地是俄国顾问和共产党人所犯错误，引起了误会之类的印象。陈独秀在 3 月 29 日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就明确肯定事情是国民党右翼的孙文学会成员蓄意制造，蒋介石误以为真造成的。但他同时也谈到，“蒋介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对共产党人疑心很大。从这一点出发，考虑到蒋介石还是左派，蒋、汪关系破裂和国民革命军因此发生严重军事冲突，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陈也同意“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主张“应该全力‘拯救’他”，使他认识到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从而不再害怕我们。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很快发表文章，公开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决不会去推翻他。[78]有许多人批判他这时“千方百计地向国民党讨好，结其欢心，瞻其马首，绝对服从命令，不敢越雷池一步”。[79]查一查他在“三二 0”事变后这段时间的文章，对蒋介石几近阿谀的言论也确实可见。问题在于，远在上海，不清楚事变真相，又不能火上浇油地把蒋逼到右派一边去，以致丢掉广州，在当时情况下，陈独秀除公开向蒋示好，消除“误会”外，如何能够去表示强硬的敌视蒋介石的态度？

由于事变过于突然，多数人又相信其中确有误会，共产党人解决事变问题的全部希望，最初自然都寄托在了对蒋最了解的鲍罗廷身上。事变发生后，布勃诺夫就提议将正在返国途中的鲍罗廷紧急召回广州。蒋介石事变后也确实很快发表了反对西山会议派的声明，并讲了不少高度称赞共产国际的话，陈独秀相信蒋介石可能还不是右派，也不无理由。据说，鲍罗廷回到广州后，曾同广东区委商量，“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而这时恰逢蒋介石专门写信邀请陈独秀到广州，共同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汪精卫也已离开，陈独秀又始终担心广州国民革命军其他将领更加反动，他自然没有表示赞同的意见。[80]中共中央这时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电报说明了它的设想：国民党 5 月 15 日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解决国共关系问题，我们已派张国焘、彭述之与蒋介石商谈，争取在全会召开前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下一步的策略是正确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向左转，而不是向右转。”当共产国际来电，询问中共中央是否有退出国民党的打算时，陈独秀明确答复说：“我们不打算退出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也无意开除我们，他们只是想限制我们在国民党里开展工作。”[81]可以看出，陈独秀直到这时在上海仍然没有得到更严重的情报，因此仍旧相信有可能争取蒋介石。

5 月 15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而 4 月底莫斯科实际就已经做出决定，并通过电报通知了鲍罗廷。决定的内容很明确，即“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要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82]因此，不论鲍罗廷是否曾经提出过“进行一个自己的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主张，他的态度已经迅速转向了妥协。在与蒋介石反复谈判后，他转而力劝中共代表张国焘等人采取妥协态度。有莫斯科的指示，张国焘等自然也只好转而去劝说广东区委的同志们。最终，蒋介石的整理党务办法被认可了。据蒋介石日记描述，当他提出这一方案时，“全场相顾惊愕”。但无论鲍罗廷，还是与会共产党人，均未争辨与反驳，蒋当然喜不自胜，马上与鲍罗廷重叙友情，并兴致勃勃地下令去鲍公馆“看影戏”。 [83]

会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恐惧心理。它规定共产党必须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者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凡中共给其党员的训令，均须先交联席会议通过。[84]结果，共产党人纷纷被迫从国民党的重要机构和军事部门当中退出，国民党明显右转。显然，这并非是陈独秀预期的结果。只有

鲍罗廷出于迎合莫斯科的目的，报告说：《整理党务案》使国民党右派蒙受了比共产党人更大的损失，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个策略步骤，旨在消除共产党与诚实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误会”，但它“从右派手里夺走了他们用来反对我们的武器”。蒋介石对广州的右派领袖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员退出后，几乎所有部长都是左派。[85]

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较孙中山两年前的那个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明显地要苛刻得多。陈独秀当年对“国际联络委员会”的办法已经是怒不可遏，如今对《整理党务案》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事实上，对付《整理党务案》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退出国民党。维经斯基此前也在信中特别提到了需要调整方针，“不再与国民党一起组成混合联盟”的设想，莫斯科的命令当中其实也委婉地提出，如果问题严重，同意讨论改变党内合作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在不能破裂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关系的情况下，陈独秀只好一面公开否认《整理党务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称：“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于贵党党外之机构，则殊无所关涉”。一面召集会议，决定：“1、从内部联盟的政策过渡到联合的政策；2、制定明确的独立的政治路线；3、实现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成为国民党的基础；4、要使国民党不是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而是使它的组织采取俱乐部的形式。”简而言之，就是做好退出国民党的准备，不受《整理党务案》的束缚。他在随后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坚决“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86]严格地说，这才是陈独秀对《整理党务案》的真实心态的反应。

在蒋介石已经开始掌握国民党大权的情况下，退出国民党，是否对中共更有利，同样值得讨论。共产国际的态度是明确的。维经斯基 6 月下旬再来上海后，马上就反对陈独秀等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维经斯基“坚决同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作斗争”的情况下，7 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党内要求退出国民党的情绪被压制下去了。会议决议表态说：“主张现在就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关系而仅仅和他合作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只能便利资产阶级实现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对国民革命的指导。

这次会议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就是得出了蒋介石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结论。因为北洋军阀势力一向被认为代表封建地主势力，西山会议派只能被认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依照逻辑蒋介石也只能被定性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了。据此，会议一反陈独秀过去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不革命的观点，断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已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分，且有领导此运动之倾向”。基于不能退出国民党的考虑，会议只能强调：“依现时世界政治环境，中国的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对蒋介石，虽“明知其为将来之敌人，或者即是一年或三年后之敌人，而现在却不可不视为友军，且为有力之友军”。[87]

既然肯定蒋介石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会后，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当中承认：由于我们过去分不清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界限，把它们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壮大，结果“广东的革命领导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落到民族资产阶级手中去了”。为此，他明确提出了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强调当前的整个问题在于：“谁领导中国的国民解放运动？民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如果是资产阶级，那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断送革命；如果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进一步发展下去。”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应该是“怎样争取我们的领导权？”他的看法是：既然现在革命还不能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当然不要试图马上就去推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现

在对国民党，"'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全力争夺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在使蒋介石成为我们的同盟者的同时，努力排除他对国民党的领导。[88]不论如何解释陈独秀的上述说法，他并不打算对《整理党务案》做无条件妥协是可以断定的。

《汪、陈宣言》缘何产生？

应当看到，如果说"三二 0"事变前，特别是从孙中山逝世到国民党二大召开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政治上分崩离析、军事上群龙无首，鲍罗廷还可以背靠苏联，以谋略取胜的话，那么，"三二 0"事变，特别是"五一五"之后，蒋介石独揽军事大权，并成功地控制了党权和政权之后，继续运用谋略纵横捭阖地拉一派打一派，就成了一件带有极大冒险性的工作。不论是陈独秀，还是俄国人，显然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了。陈独秀明确讲：我们说争夺领导权，并不是要重新夺回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失去的那些组织上的领导地位，而是要做到"支配运动的政治领导和基本口号"。说到底就是要争夺群众。"我们应当在工农群众、革命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扩大我们的影响，使他们团结在我们的周围。"[89]

陈独秀的这一说法，其实也就是毛泽东 1937 年在国共合作之初，在国民党明显据有实力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提出过的那个"政治领导"权的主张。但是，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在国民党的地盘上同国民党争群众，同样是要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陈独秀很快就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了。在"五一五"之后，共产党影响下的广东地区的工农运动明显受到压制，陈独秀即以中央名义写信给广东区委，称："有些同志以为，我们不必变更现在中派政权，在这个中派政权之下我们亦可发展民众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切实际。因为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民众运动。"要想发动民众运动，就必须要设法取消蒋介石的权力。[90]

这个时候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北伐战争，战争本身具有革命性质，共产党人不免有一种投鼠忌器的顾虑。鲍罗廷说：我们目前没有实力同蒋介石斗争，最好是等着看"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反对采取任何与蒋介石对抗，或引起蒋介石疑心的作法。而这时直接负责指导中共中央工作的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虽主张"必须把中央交给左派"，又害怕刺激蒋介石，强调"不希望同蒋介石发生争斗"，"必须使蒋介石在前线安心"。对此，陈独秀的意见是必须让汪精卫回来，促使蒋汪合作，只要汪精卫回来，必可取得党权、政权，这时只要承诺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领袖地位，就能既不影响战争的进程，同时又便利工农运动的进行。[91]实际上，不论陈独秀如何苦口婆心地向蒋介石解释，"迎汪"的呼声一起，就埋下了新的危机。

"迎汪"热潮刚刚掀起，受到北伐军在两湖地区的顺利进展的刺激，两湖工农运动就迅猛开展起来了。维经斯基坐不住了，他坚持必须立即在南方和整个长江流域"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主张以此来阻止资产阶级最终取得胜利果实。陈独秀也致信各级党部，大声疾呼"党到农民中去！"[92]但无论维经斯基，还是陈独秀，其实都很清楚：国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不要说对中派或所谓新右派蒋介石，"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也）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他们注意到，目前情况下"正确地排列我们的要求，现在提什么，以后提什么"，是"发展农民运动但同时又不破坏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关键。

但农民运动已经起来，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似难满足农民的愿望。因此，1926 年 11 月初，考虑到当时两湖地区的革命形势，陈独秀提出的，并且得到维经斯基和远东局通过的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还是包括了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武装农民和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给农民等项相当革命的内容。如何既维持统一战线，又能发展工农运动，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这时显然都有些手足无措。在向莫斯科提交上述草案的同时，维经斯基就不无遗憾地承认，以他们和中共中央的能力，目前难以应付这些令人迎接不暇的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请求苏共中央能派一名有影响的代表到中国来指导整个政策。[93]

1926 年秋冬，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共产党人利用北伐军摧毁了占领区城乡各级政权的机会，成功地取得了组织和发动工农运动的领导权。工农运动越发展，共产党的声势也越大，表面上看，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正在取得积极的进展。实际上，陈独秀看得明白，力量对比距离共产党人所希望的相差甚远，未来政权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加国民党”，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这里军事因素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没有军事力量，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夺取政权。[94]“三二 0”事变以后，陈独秀的这一认识日渐加强。从其此后的一些言论中明显地透露出，他已不再谈论中国革命从二月革命一步迈向十月革命的可能性了。从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他相信，最好的前途，是争取造成一种政治上几个革命阶级联盟，而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特殊社会形态。

他明确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究竟建立一个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联合资产阶级，打倒国内外一切黑暗反动势力的革命民众政权呢，还是建立一个以反革命的大商人、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懦弱妥协的资产阶级为主体，“和国内外一切黑暗势力调和，在政治上建立压迫工农群众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政权”？[95]把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归结为“二次革命论”，似乎不能成立。主张以工农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体，建立革命民众政权，倒更符合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建立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观点。

当然，陈独秀不如后来的毛泽东，他其实连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不愿意看到。比较一下陈独秀在 1926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以及在 9 月和 1927 年 1 月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它们都谈到了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都明确肯定中国面临着两种出路，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并且都肯定反革命的出路不能走，说是会在经济上将造成托拉斯（译为道威斯）的资本主义之侵略，但对于革命的出路，1927 年 1 月的文章较前却有了明显的修改。陈在 1926 年肯定：那时可以“以革命手段达到民族的资本主义之建设”，“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在 1927 年 1 月的文章中，他却避而不提中国的资本主义，仅指出那时将“力图国民经济生活之发展”。[96]不难看出，陈独秀谈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前途时，由于没有毛泽东后来的那些理论分析做基础，因此显得还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可以肯定，他在 1926 年虽然谈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更多地其实也只是在做逻辑推演而已，感情上却未必真的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不管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97]

不愿意中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前途，是这时几乎所有共产党人的愿望。1926 年底，自年初以来一直担心共产党影响过大，反对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共产国际执委会[98]，突然在

它的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个十分激进的决议。斯大林也在共产国际发表演说，为中国革命迅速左转做鼓吹。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演讲的主旨，在于断言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越过了资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阶段，走到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结盟，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性阶段。革命胜利后的国家理所应当地“不会是资产阶级的民权国家，而将成为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权独裁制的国家。他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为实现这一向非资本主义过渡的任务，必须废除过去不让共产党员过于突出的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广东政府乃至国民政府，并“在革命军队中占据某些领导职位”。必须“利用国家机关，没收土地，减税，并给农民委员会以实力”，“归根到底必须做到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并实行土地国有”，以便使农民愈快愈彻底地卷入革命，同时要“逐渐没收属于外国资本的铁路、租界、工厂、矿山、银行、企业等”。据说是“中国革命若不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不能推翻帝国主义”，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等联合的民权独裁制”。 [99]

共产国际急于变动策略方针，其实主要是北伐军进展顺利，国民党有迅速统一中国的可能，苏共中央生怕中国再出现一个凯末尔式的噩梦[100]，因此想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工农运动高涨的机会，把共产党人推上历史舞台，迅速取得部分政权和军权，以便引导中国革命持续左转。过于相信群众运动的共产国际显然忽略了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不同特点。唯一注意到中国革命有着不同于俄国革命特点的斯大林，虽然谈到了中国的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他却弄不清楚那些打着国民党旗号的军队并非是他所说的那种“革命军队”，共产党人也不可能按照他的要求，在他所期望的时间内，把这些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底真正的和模范的代表者”。他居然主张“通过军队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通过军队实行正确的农民政策”。[101]结果，莫斯科在提出如此激进的革命目标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地把几个纯粹理论上的“阶级”加加减减，甚至把各种各样的军阀部队也统统算做是可以由共产党人为所欲为的“革命军队”，完全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估计不同力量配置的现实状况。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要求从一开始就略感困惑。尤其是诸如土地国有（没收土地）之类的口号，他早就表示过不同意见。当然，他原则上不反对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主张。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中央决议中，事实上只是集中讨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明过去总“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未到明天早晨六点钟以前，我们必须自己挪（绑）着自己的手脚，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102]

共产国际的决议促使中共中央内部一度充满了革命激情，他们开始断言：“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但是，眼见 1927 年 3 月底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占领上海，陈独秀还算保存了一份清醒。他明确告诫党内干部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纯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要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未必对革命不利。[103]不论陈独秀这时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认识到共产党与蒋介石之争的关键在武装的对抗，这不能不说是合乎实际的看法。说他这时有意妥协，显然不是事实。

莫斯科制定那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时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造反。他们未必不清楚国民党内部的危机，只是他们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应该策略地利用……矛盾"。同陈独秀一样，他们也一厢情愿地指望让汪精卫回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却没有想到此举恰好加速了蒋介石的造反。当蒋介石准备进攻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消息传到莫斯科之后，正在督促中共中央接受那些豪言壮语的苏共中央却变得手足无措起来，连起码的抵抗也不允许。斯大林等人一连数电给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同时，莫斯科暗示鲍罗廷可以对蒋做出妥协，称："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派格里高里（即维经斯基－引者注）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他认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104]

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是莫斯科，而不是陈独秀指望用策略手腕来暂时缓和矛盾。数十年来遭人诟病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出来的。陈独秀之所以放弃了预定的武装对抗的计划，转而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否认国共有冲突的准备，其目的不外是为了依照莫斯科的指令，安抚磨刀霍霍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尽可能地阻止蒋介石采取极端行动。

随着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广州发生"四·一五"事变，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公开"清共"，共产国际担心的凯末尔噩梦在中国重演了。但是，共产国际的思维仍旧被它的革命理论和经验禁锢着。明明武汉政府所控制的两湖和江西的部分地区已经被围在拥护南京政府的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和四川诸省区之中，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危机四伏，大大小小的蒋介石到处都是，处境日趋险恶，莫斯科却继续坚持进攻政策。越来越不能理解莫斯科思维逻辑的陈独秀，最终站出来拒绝共产国际的主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陈独秀"右倾投降"？

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期间最大的罪名，就是"右倾投降"。而这个罪名最早也是共产国际给加上的。原因很简单，进入到武汉政府阶段，国共关系破裂在即，共产国际坚持进攻，陈独秀却力主退却。最后，共产党失败，共产国际自然就让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的罪责。然而，共产党的失败真的是因为陈独秀的退却主张造成的吗？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分歧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工农运动"过火"的问题上。

还在 1926 年 12 月，广东、两湖，特别是武汉地区，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就不断出现手工业者、店员同中小商人、店主之间的尖锐冲突，使国民革命赖以依存的统一战线内部呈现出严重危机。陈独秀虽初遇这类问题，无经验及政策可循，却已经意识到必须对工农运动加以适当引导，并限制其"过火"行为。为此，他专门召集了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决定，主张"在工农群众实际斗争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分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105]联想到 20 年后中共土改、进城，有政权、有军队，仍旧反反复复研究颁布各项政策法令，反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时时注意引导

和规范工农行为，可知陈独秀此时防左的动机未必有多少可以指摘之地方。

当然，一方面想要靠民众运动的规模与国民党右派抗衡，一方面又没有明确的政策和有相当经验的干部，中共中央没有，也不可能对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真正进行约束。自共产国际七次执委扩大会决议传到中国以后，工农运动有了更加迅猛的发展，而由此带来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引起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它们已经直接刺激了大批军官和将领，从而使武汉国民党上层也发生了严重敌视工农运动的情绪。据陈独秀说，他 4 月上旬赶到武汉，“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当时汪精卫到武汉也不过才几天时间，可见当时武汉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已相当不满。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决议中的激进措施，自然更是表示疑问。他明确讲：“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却很难，需要时间。”比如在农村，就“不能为了削弱反动派的基础来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106]

陈独秀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仅武汉一地，两三个月内，有报道的罢工就发生了 150 余起，由于政府没有约束能力，工会权力极大，各行各业的工人、店员都群起要求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一系列无政府主义的“过火”行动。再加上南京政府实施经济封锁，物价飞涨，市场萎缩，结果是企业停工，银行歇业，商店倒闭，失业工人猛增至 10 万以上。湖南农运则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过激口号，大搞贫农专政，“法津由心，刑戮在口”，不仅随意捕杀，而且罚款、游街、吃大户、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禁养猪鸭、强迫妇女剪发、逼寡妇改嫁，甚至阻禁谷米出境、截扣军粮、抗捐抗税、捣毁税局厘局，一时间形成“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恐怖现象”。结果，武汉政府控制的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财政收入较占领前锐减三分之二以上。尤其是湖南，月收入竟由占领前的 360 万，锐减为 70 万。武汉政府这时主要靠湖南唐生智的部队来同蒋介石对抗，但恰恰是湖南农运对其部队的军官刺激最大，再加上武汉政府欠饷，光是欠唐生智属下一个军的军饷，就在 200 万元以上[107]。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战争难以为继，就是武汉政府本身的维系也大成问题。所有这一切，自然都被武汉国民党人归罪于共产党了。

5 月中旬，汪精卫找陈独秀谈话，尖锐地提出了群众跟谁走的问题。他断言，正是由于共产党人不负责任的宣传鼓动，才导致武汉政府在对外关系和军队状况方面陷入到今天这种困难的地步。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陈独秀很清楚：“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者是和他们决裂。”但这个时候决裂，对共产党究竟更有利还是更不利呢？很明显，没有人做好了决裂的思想准备。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鲍罗廷，考虑来考虑去，基本的态度还是暂时退却，采取让步政策。在 1927 年 5 月召开的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就明确主张：在相当时期内，我们必须保持中间路线，无产阶级必须对小资产阶级让步，即使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进一步推进，使农民运动进一步扩展之后再进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开的程度来逐步加深革命。但实际上，正如鲍罗廷所说，更主要的问题其实是，中共中央已发过不少文件，做过不少决定，几个月来毫无效果，“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108]

鲍罗廷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共产党一无军队，二无政权，三无经验，四缺干部，既不能保护工农，也难以指导运动。北伐以来，党员发展虽快，但新加入的大批基层党员本来就缺少有关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知识，再加上中央与地方工作衔接不易，下级各行其是，普通党员鲜有训练，一些工会、农会又受地方帮会的把持，中央连武汉地区的罢工示威都无从约束，更不要谈去控制武汉以外的农民运动了。

偏偏莫斯科根本无视中共的种种困难。它甚至对中共中央上报的只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赞成，电令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把革命进一步向左推进。说是必须“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他们“现在就应开始组建 8 个或 10 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不得拖延”。[109]

注意到组建自己军队的重要性，这说明莫斯科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旗下的那些军队并非是可以“帮助农民反对地主”的什么“革命军队”。但是，建立自己几个师的军队，而不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偷天换日般地往部队里塞进一些士兵和军官，需要大量的金钱、武器和可靠的军官，同时还需要相当的时间，更需要武汉政府，特别是它的那些并不听话的将军们有足够的宽容度。所有这些条件，这个时候都不存在。这又是莫斯科典型的纸上谈兵。

5 月 21 日，长沙驻军许克祥部发动事变，查封了工会、农会，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并通电斥责工农运动，史称马日事变。事变一发生，湖南湘潭、衡阳、武冈、益阳、湘阴、桃源、永州、浏阳、临湘、安乡、辰州、叙浦等地的驻军和地主，都纷纷开始向当地的共产党人和工会、农会反攻倒算。27 日，许克祥等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通令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一律改组。武汉国民政府因此迅速失去了对湖南大部分地区的管辖权。

因为马日事变，新来不久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团长罗易同鲍罗廷、陈独秀大起冲突。鲍罗廷、陈独秀坚持应该派代表出面，以制止湖南工农过火行为的名义前往长沙进行和平调解，平息军队的愤怒，重新控制湖南。罗易却强烈主张武装农民，组织反击，说是“共产党人应当鼓励和发展这些‘过火’行为，而不是去‘纠正’它们”。[110]

对此，陈独秀很不以为然。他在 5 月 23 日的联席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情况下，“假如我们想同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合作的话，问题主要在农民。”因为第二、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都是湖南的军队，军官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家乡的坏消息，什么家属被农民协会戴高帽游乡，土地被没收，父亲被逮捕，如此等等。整个湖南现在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将军们要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农民们想要平分土地，而且还不限于此，还想平分一切。为此，我们现在需要让步，但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是让步政策；不能说我们不赞成分配不动产、房屋等，是让步政策。“纠正幼稚的行为和过火行动，这不是让步政策，必须坚决这样做。”我们所说的让步，是指目前情况下暂时不提出土地问题。这样做的目的，说到底是为了有时间逐步“准备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便对付那些不可靠的将军，“有朝一日把他们打倒”。鲍罗廷也明确讲，如果我们不准备明天就转入地下，就必须要在群众运动的问题上有组织地实行退却，而不是继续进攻。[111]

对于陈独秀、鲍罗廷和罗易的激烈争论，共产国际 6 月 2 日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1、“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

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

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

4、“必须消除对不可靠将军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

5、“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112]

五月指示表面上很激进，坚持不得妨碍土地革命、建立新军、改组国民党中央等等，但它却肯定了工农运动存在“过火”的问题，赞成在争取中小地主和中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让步政策，约束过火行为。问题是，指示的中心旨意仍是一厢情愿地幻想在不破裂两党关系的情况下，能够马上组织自己的军队，改组国民党中央，依靠汪精卫等个别真正的左派国民党人，搞土地革命，使武汉政府革命化。这不能不让陈独秀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候，发生了江西朱培德借口“制止过火的工农运动”，武装递解共产党员出境，并查封工会和农会的严重情况。面对这一更加危急的形势，不要说不准备破裂国共关系，就是有心破裂，要实现共产国际所提出的要求也几乎没有可能。在讨论莫斯科来电的专门会议上，陈独秀针锋相对地对五月指示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国民党人曾经表示赞同解决土地问题的意向，但是，“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也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他同时批评指示的另三项内容称：“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在承认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总之，“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113]

6 月 15 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陈独秀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了解决土地问题受阻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共中央怀疑土地革命的方针，而是因为“农民运动在湖南发展得特别迅速。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整个军队对农民行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里受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我们就难免要同国民党人分裂。而在目前条件下，在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必要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且与国民革命军的将领们保持良好关系。[114]

陈独秀这时很清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但他一方面深知莫斯科不会同意退出国民党，一方面深知力量对比相差太远，因此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虽不断抱怨"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的道路了"，却想不出解决问题的适当办法。情急之际，竟同蔡和森等想出了一个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袭击租界，占领银行和工厂，引起外国干涉，转移武汉国民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暂时稳定武汉统一战线的下下策。[115]

罗易对陈独秀的态度异常恼怒。他大概是共产国际里面第一个给陈独秀扣帽子的人了。他直言不讳地把陈独秀说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断言陈"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扬言"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罗易同样给鲍罗廷也扣了许多顶帽子，因为他清楚鲍罗廷是陈独秀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只是，无论他怎样强调现在的一切危机都是鲍罗廷造成的，他却不能提出开除鲍罗廷的想法。在无法取得陈独秀和鲍罗廷的理解的情况下，更加书生气的罗易天真地把连同五月指示在内的共产国际的几份密电统统送给了汪精卫，孤注一掷地企图从他所信任的左派领袖汪精卫那里找到回天之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6 月 22 日，共产国际在得知了罗易这一愚不可及的行动之后，下令把他召回了莫斯科。[116]

共产国际当然也不会满意陈独秀的态度。它在 6 月 20 日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复电当中，尖锐地批评："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117]

但是，所有这些争论和批评其实都毫无意义。政权和军队都在国民党手里，共产国际想到并提出组建自己的军队以对抗不可靠的将军，都已经是 5 月中和 6 月初的事情了。即使武汉国民党中央不反对（实际上不可能），一个多月的时间要组建几个能作战的师，也绝对办不到。何况莫斯科尚未提供任何物质方面的援助，共产党人靠什么来建这么多的部队？没有自己军队的保护，指望国民党来搞土地革命，或者逼迫国民党中央改组，要汪精卫等人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唐生智手下的军官，纯粹是天方夜谭。

6 月 17 日，武汉政府正式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21 日，武汉方面所有人都指望并以为依赖的冯玉祥发表通电，要求遣送鲍罗廷回国并驱逐共产党人，宁汉合作，共同北伐。28 日，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公开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而莫斯科居然仍旧相信可以拉住汪精卫。它一面决定给汪数百万卢布，以诱使汪不致倒向南京，一面去电报谆谆告诫汪说，国民党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必须同共产党联合起来，改组国民党，并从工人、农民中提拔新的领导人。[118]

6 月 26 日，中共中央和鲍罗廷等一同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联席会议。从记录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已不胜其烦。其实，进入武汉政府时期以后，无论进攻，还是妥协，都未必能够找到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了，更何况这样不进不退，争论不休。陈独秀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右的，一条是左的。右的一条是放弃一切，左的一条是反对一切。走这两条道路我们都将垮台。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就是把目前的状况继续下去，然而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可以找到第四条道路？"而他最终表明的态度其实就是：只要我们还参加国民党，我们就不能不妥协，就没有真正的独立可言。"如果我们想在政治上独立自主，我们就应当退出国民党"。[119]

没有人赞成退出国民党，鲍罗廷甚至说，莫斯科认为退出国民政府都是冒险。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因为共产党毕竟在国民党的军队中还开展着不少的工作。[120]

6 月底，眼见武汉政权陷入危机，国共破裂在即，莫斯科突然火烧眉毛起来了。又是发电打气，又是大笔汇款，说是要通过武装工农，组建新军来“挽救革命”，为此“应该准备做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但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并且莫斯科仍旧寄希望于汪精卫，仍旧坚持共产党“必须在国民党内”，仍旧坚持要由国民党来领导革命。它给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电报明确讲：必须“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 [121]

陈独秀已经不再相信共产国际有什么神奇的力量了，他更不相信靠国民党可以“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从 6 月中旬起，他已经在全力部署恢复湖南党组织的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对许克祥的“救党委员会”进行反击，展开抗租运动。对敌军，他主张“大队来则避，小则与之打”，实在站不住的，赞成毛泽东的提议：A、上山；B、投入军队中去，认为“可以上山”，“当兵最好”。陈独秀很明白，为应付国共关系破裂非预做准备不可了。[122]可是，陈独秀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下去了。

7 月 5 日，陈独秀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鉴于“上面国际责难，下面同志非难”，败迹已显，却不知出路何在，陈独秀终于赌气辞职了。区区一介书生，仅凭一腔热血，一肚子墨水，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激流险滩中，摸爬滚打几年下来，他始终不曾真正跟上莫斯科多变的思路。到了这个时候，他更是适应不了莫斯科的思维方式了。在他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如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123]

至此，陈独秀离开了他曾经呕心沥血地为之操劳了 6 年之久的中共中央。他因此也背负起了“右倾投降”的罪名。继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在陈独秀辞职几天后就公开发表文章，点名批判“陈独秀这样一类机会主义倾向最严重的领袖”。又过几天，《真理报》进一步给陈独秀戴上了“右倾分子”和“投降路线”的帽子，说他是“中国共产党最突出、最道地的机会主义代表”，是实行“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的“右派领导人”，说他提出退出国民党就是“将整个革命领导权统统交给资产阶级”，“是在民族资产阶级面前投降”。[124]毫无疑问，俄国人当年的这种批判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的。令人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了，仍旧有不少研究者在借用这类政治批判的语言来讨论陈独秀历史上的是非功过。

未必多余的话

与 1927 年共产党所遇到的危机比，共产党在江西时期的遭遇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当时共产党在偏辟的农村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终于有条件按照自己的愿望建工农政府，搞土地革命了，一时间轰轰烈烈。但同时，其消灭一切富裕阶级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左倾政策，再度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最后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了百分之百，几乎又回到了白手起家的地步。但是，在最危急的关头，他们重新拾起了曾经被他们抛弃了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取得国民党的谅解和社会各阶层的同情，再行国共合作，他们放弃了激进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政策，并且承认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中

央政府，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挥。中共的基本方针，也从强调两个政权的生死决战，主张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到转而强调“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强调要争取政治领导而非组织领导；强调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毛泽东甚至重提党内合作建议，保证可以照当年蒋介石那个《整理党务案》的办法，共产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决不在国民党内组织秘密党团和秘密支部，决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125]很明显，共产党人做了重大的原则性的让步与妥协，但他们换取了国共合作，同时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新生。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们再也没有实行过土地革命的政策，只搞减租减息，实行团结争取从贫农到地主的农村统一战线。结果，经过了 8 年时间，他们从极其弱小的一方，变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举足轻重的大党，有了足以同国民党抗衡的上百万军队。

比较两次国共合作，第一次对共产党而言是失败的，第二次对共产党而言却是成功的。同样强弱悬殊，何以第一次失败，而第二次成功？

比较的结果，第二次的成功，有许多因素，比如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虽然仍旧容易引起磨擦和冲突，却因为划地为界，因为党员没有双重身份，不能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内身居高位，不能以秘密党团形式实际掌控国民党的党务、政务，不大容易使国民党人感受到太直接、太强烈的威胁，再加上有外敌强大的压力存在，形式上共产党始终还是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国共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大容易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全面破裂。但是，第二次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共产党人的政策得宜。所谓政策得宜，就在于第二次合作期间，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共产党都没有实行如同第一次合作时的那些激进的革命措施，没有搞土地革命，从而保护了统一战线，争取了舆论，赢得了人心。

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因为在第二次合作期间，在共产党有军队、有政权、有地盘，有干部的情况下，还实行比较温和的社会政策，而指责其“右倾”。同样的道理，在第一次合作期间，在力量对比异常悬殊的 1927 年武汉政府时期，陈独秀主张暂时退却妥协，不搞土地革命，如何就能定性为“右倾投降”？实际上，在共产党既无军队，也无政权，又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经验、政策、干部等等等因素都成问题，根本无力引导和约束工农运动的情况下，坚持在中国推行土地革命之类的激进政策，恐怕只能说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盲目的政策选择。共产党后来不是没有再搞土地革命，但那已经是 1946 年以后的事情了，即是在国共关系再度破裂的情况下，在有强大军队的护卫，又有大批经过训练的干部指导，并且是在自己占领区内等种种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进行的。即使如此，其政策规定也反反复复经过了两三年时间的修订。而当他们终于可以占据城市之后，他们也根本反对把农村的方式搬到城市里去，坚持维持城市现状暂时不变，不仅不触动小资产阶级，而且不触动资产阶级，坚持有政权的、由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缓慢而温和的渐进式的变革。同时他们仍旧特别注意反对工人、农民中的无政府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126]何以陈独秀当年在既无军队，也无政权的情况下，就不能限制工农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不能主张暂时退却呢？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看出，1927 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严格地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之下，陈独秀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既没有多少神来之笔，也不曾惹下过滔天大祸，他在多数情况下对共产国际是言听计从的。但是，恰恰是在少数情况下陈独秀的某些独立见解和不服从，却显示了他作为一代中共领导人所具有的求实态度。比如，他几次提出的改行党外合作

的建议；比如他较早地提出军事因素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问题；比如他自 1926 年底以来力主引导工农运动，约束“过火”行为，以及最后几个月坚持退却而不是进攻的策略思路。当然，由于理论、经验的欠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也由于当时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陈独秀的一些主张未必很妥当，未必真的具有可操作性。但就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而言，这种独立思考恰恰是推动中共领导人逐渐成熟起来，最终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页。

[2] 这里谨按习惯称法。

[3] 《陈独秀评论选编》（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23 页。

[4]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 年 12 月 10 日，转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五册，第 394－396 页。

[5]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 年 7 月 10 日，转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5 年版，第 503 页。

[6] 参见王观泉：《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 页。

[7] 参见格鲁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1－117 页。（原文发表于 1978 年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与东方》）；杰柳辛：《中国 1925－1927 年革命》（原书俄文版出版于 1982 年），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4 辑，291－293 页；袁南生：《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史实的新佐证》，《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2 期。

[8] 1990 年，围绕着陈独秀是否要求将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中国学者中间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争论，郑超麟先生也曾加入到争论中来。争论虽然只是就几个基本的史实问题而展开，但已涉及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问题，并且至少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退出的主张是“左”倾的，一种认为是正确的。但这些讨论还没有摆脱固有的模式，即陈独秀总的来说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分别见《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 2、5、6、9 期。笔者同年也曾发表《大革命前期的国共关系与共产国际》（载《文史哲》1990 年第 6 期），具体讨论了 1924－1925 年间陈独秀及其中共领导人同共产国际的分歧问题。比较深入地讨论到这一问题的，还有国外的部分学者。早先如俄国学者格鲁宁所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译文见徐正明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近年如德国陈之宏的博士论文《鲍罗廷与中国革命》。

[9] 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竖排版），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32 页注。

[10] 陈独秀当时明确讲：“不但马尔塞斯的人口论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说，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说，弥尔自由论，布鲁东私有财产论，马克斯唯物史观，克鲁泡特金互助论，也

都是这样。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因此，“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希望从分配上下功夫来解决社会上贫富不均问题。分别见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1919 年 12 月 1 日；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新青年》第 7 卷第 4 号，1920 年 3 月 1 日；陈独秀：《我的意见》，《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1920 年 5 月 1 日，以及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

[11] 《俞秀松日记》，《上海党史》1991 年第 7 期。

[12] 参见拙作：《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13]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第 8 卷第 1 号，1920 年 9 月 1 日；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 8 卷第 3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

[14] 《中国共产党宣言》比较清楚地描述了俄国式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革命手段，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此所做的说明含混不清，特别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一条，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俄国革命的方式大相异趣，而且明显与此后共产党人反对军事革命的主张不同。不知所据为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 页。

[15] 见《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 年 7 月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等编译：《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 页。

[16] 关于早期闹独立性的问题，仅见于包惠僧的回忆，但颇不可信。比如，包不止一次提到陈独秀因担心被人指为“卢布党”，因而反对拿莫斯科的钱。而事实上从已经披露的陈独秀当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陈独秀明确认为中国共产党一时间很难自行筹款，因而“希望国际有所接济”的文字。参见包惠僧：《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百科知识》1979 年第 2 期；《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 年 6 月 30 日，等。

[17]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35 页。关于陈的个性，陈自己也有过公开的检讨。如在中共三大的报告当中，他就承认自己“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172 页。

[18] 王观泉前引书，第 34 页。

[19] 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Dov Bing 与 Muntjewerf 和 Adrian Chan 在“China Quarterly”（No.54,56）上曾激烈争论有无第一次杭州会议的问题，从 Dov Bing 的答复中以及从现有资料中，都看不出这一次的讨论是在杭州进行的。

[20] 陈独秀：《告做劳动运动的人》，《先驱》第 7 号，1922 年 5 月 1 日。

[21] 关于陈独秀多次赞同或主张同国民党人合作的情况，可参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 年 5 月 2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8 页。《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31 页。

[22] 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显然对党外合作的前途也感到了绝望。他在 6 月 30 日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明确讲，与孙中山联合的希望很小。

[23] 见《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0 页。

[24]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169 页；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同上引书，第 92 页。

[25] 参见只眼：《国民党是什么》，《向导》，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0 日；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1922 年 11 月，《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93－94 页。

[26] 蔡和森坚持说："这时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去'的口号，甚至认为不要共产党的右倾主张，仲甫是赞成他的。"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1926 年，《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 47 页。

[27]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目前的策略》。并见《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62－63 页。陈独秀率刘仁静、王荷波前往莫斯科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同时还提交了有关中国工人运动、农民状况、统一战线以及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等 4 份报告。

[28] 前引《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0－81 页。

[29]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22 年 12 月 5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1），第 163 页。

[30]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76－77 页。

[31] 见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第 8 卷第 3 号，1920 年 10 月 10 日。独秀：《答张东荪》，《时事新报副刊》，1922 年 9 月 17 日；独秀：《造国论》，《向导》，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0 日。并见陈独秀：《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民国日报》，1922 年 8 月 26 日。

[32] 《马林给拉夫斯坦的信》，1923 年 4 月 3 日；《马林给布哈林的信》，1923 年 5 月 31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146、194－195 页。

[33] 马林在事实上并没有要求中共中央放弃独立性。他不仅鼓励中共中央公开监督和批评国民党的政策，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地以孙驿的笔名撰文批评国民党。

[34] 独秀：《怎么打倒军阀》，《向导》，第 21 期，1923 年 4 月 18 日；陈独秀：《资产阶级的

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 22 期，1923 的 4 月 25 日。

[35]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问题》，1923 年 5－6 月。

[36]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1923 年 6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146－148 页。

[37] 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00－201 页；《国民党代表大会中共党团领导小组会议纪录》，1924 年 1 月 17 日。

[38] 参见《马林致达夫谦和越飞的信》，1923 年 7 月 20 日，《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96－297 页。

[39]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 2 号，1923 年 12 月 1 日。

[40] 胡华：《试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 65 页。

[41] 毛泽东：《两党合作问题》，1938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 年第 2 期。

[42] 见马林所记毛泽东在中共三大前后的谈话笔记。《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213，236 页；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第 31－32 期，1923 年 7 月 11 日。

[43] 据陈独秀会前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哈尔滨、北京、天津、湖南、湖北、南京、安徽等地的已经以共产党人为主，发起建立了国民党党部。《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3 年 12 月 27 日。

[44] 《鲍罗廷与谭平山谈话纪要》，1924 年 1 月 10 日。

[45]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1923 年 12 月 10 日；《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 年 2 月 9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368，373，412 页。

[46] Tony Saich,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pp.864-866；《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1924 年 4 月 2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493－494 页。

[47]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 年 1 月 12 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76 页。类似的说法其实是马林的观点。见前引《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 年 7 月 11 日。

[48]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扩大会议决议的说法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同时又肯定其党内“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他们的阶级利益每易趋于妥协”。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党内

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30，243 页。

[49]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 1924 年 2 月 1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461 页；《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31 页。

[50] 同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37，244 页。

[51] 见《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 年 5 月 6 日，《瞿秋白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38 页。《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书面报告》，1924 年 6 月 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496 页。

[52]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4 年 6 月，《瞿秋白选集》，第 2 卷，第 607 页；《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 年 6 月 25 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13 页。

[53] 见《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 年 7 月 12 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 年 7 月 14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503 页。

[54] 《中共广东组织就鲍罗廷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 年 7 月 15 日；《鲍罗廷给瞿秋白的信》，1924 年 7 月 1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508，511 页。

[55]《中央通告第十五号》，1924 年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282－283 页。

[56] 《中共中央致鲍罗廷、瞿秋白电》，1924 年 8 月 27 日。

[57]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75 页。

[58] 《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 年 9 月 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528－529 页。

[59]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就瞿秋白同志关于广东政治路线的报告作出的决议》，1924 年 10 月；《陈独秀给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信》，1924 年 10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532－534，

[60]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24 年 12 月 5 日。

[61] 见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1925 年 1 月；《对于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 年 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329－341，379－380 页。

[62] 《瞿秋白给鲍罗廷的信》，1925 年 1 月 2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

运动》（1），第 573 页。

[63] 三次“大让步”的说法，始见于周恩来 1943 年整风期间在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所做的报告：《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以后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种定论。《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8－123 页。

[64] 《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25 年 10 月。另据维经斯基 1925 年 8 月 4 日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称“我们党共有 2500 人”。《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646 页。

[65] 见《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5 年 5 月 1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613－615 页。

[66] 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并见 1928 年 6 月中共代表在中共六大预备会期间提出的要求斯大林解答的 18 个问题。

[67] 《瓦西里耶夫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5 年 9 月 21 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 年 8 月 19 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 年 9 月 2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第 678，656，692－693 页。

[68] 陈独秀回忆说：“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见《告全党同志书》。另外在 1928 年 6 月中共代表所提 18 个问题当中，也谈到吴廷康反对的情况。

[69] 《陈独秀在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1925 年 10 月；《维经斯基关于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1925 年 10 月 7 日；《维经斯基的书面报告》，1925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四届一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第 488－490 页。

[70] 《维经斯基的报告》，1925 年 12 月；《维经斯基关于与北京国民党（执行部）委员会谈的报告》，1925 年 12 月 4 日。

[71]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2 册，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1 年版，第 66－67 页；邹鲁：《西山会议》，《邹鲁文存》。

[72] 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 136 期，1925 年 11 月 21 日；独秀：《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向导》，第 137 期，1925 年 12 月 3 日；独秀：《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第 139 期，1925 年 12 月 20 日。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使团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1926 年 9 月 1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北京图书馆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9－450 页。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 151－154，210－211，226－227 页。

[74] 维经斯基 1925 年 12 月同国民党右派领导谈判时，对右派领袖提出的解除鲍罗廷职务

未置可否，仅表示国民党的工作一时离不开，现在暂时不宜让鲍走。鲍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不满，提出辞职。与此同时，苏联代理军事顾问季山嘉也写信状告鲍罗廷，说他无端干预军事工作，要求撤换鲍。加拉罕这时不得不决定让鲍罗廷回国。

[7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录》，1926 年 2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60 页。

[76] 关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大让步导致共产党失去反击机会的说法，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1 页。

[77]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大会上的报告》，1926 年 3 月 24 日；《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 年 3 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169－171，184－187 页；《中共广东区委给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人民周刊》，第 7 期，1926 年 3 月 30 日；太雷：《怎样巩固革命基础》，《人民周刊》，第 8 期，1926 年 4 月 6 日。

[78] 《张万和（中共中央化名）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 年 3 月 29 日；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第 148 期，1926 年 4 月 3 日。

[79] 见陈哲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剖析》，《陈独秀评论选编》（下），第 54 页。

[80] 参见《中央委员会的信》，1926 年 6 月 9 日；《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 年 4 月 29 日，《中共党史资料》，第 3 辑，第 36－37 页。

[81]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的电报》，1926 年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1926 年 5 月。（电报 5 月 11 日由北京转发莫斯科）

[8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2 号（特字第 16 号）记录》，1926 年 4 月 29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236－237 页。

[83] 参见中国第二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6－588 页。

[84]前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 233－234 页。

[85]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 年 5 月 3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272－282 页。

[86]《维经斯基给陈独秀的信》，1926 年 4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22 号记录》，1926 年 4 月 29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220－221，236－237 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1926 年 6 月 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142 页； 转见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1927 年 4 月 5 日，《国际共运史研究》，第 2 辑，第 209 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87]《维经斯基致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主席团的信》，1926 年 7 月 1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321 页；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1926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168－171，176－177 页。

[88] 《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全会情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的报告》，1926 年 7 月 21 日。

[89] 同上。

[90] 《中央致粤区的信》，1926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315 页。

[91]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 年 8 月 9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记录》，1926 年 9 月 16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1926 年 9 月 1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369－370，498，503－504 页；《中央局报告（九月份）》，1926 年 9 月；《中央给广东的信》，1926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326，340 页。

[92] 《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6 年 10 月 2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589 页；《陈独秀给各级党部的信》，1926 年 10 月 17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636 页。

[93]《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6 年 11 月 5－6 日；《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6 年 11 月 6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611，617－620 页。《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1926 年 11 月 4－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436－437 页。

[9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第 8 号记录》，1296 年 10 月 2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589，600－601 页。

[95]陈独秀：《中央政治报告》，1926 年 7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170－171 页；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 172 期，1926 年 9 月 25 日；独秀：《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 184 期，1927 年 1 月 21 日。

[96] 同上，陈独秀后一篇文章发表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尚未传到中共中央。维经斯基在《向导》注明的出刊日期当天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特别说明，决议刚刚收到，尚未翻译成中文。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99 页。

[97] 陈独秀回忆称，1926 年底曾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出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贯彻革命目的，一是资产阶级领导背叛革命，建议强调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但遭到远东局的反对。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9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速记记录》，1926 年 2 月 1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3），第 54 页。苏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曼努伊斯基在发言中明确讲：如果我们在中国现在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那么在现时条件下，我们就可能触怒国民党。党是否已完全成熟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程度了呢？”

[9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670－678 页。斯大林在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上的演说：《论中国革命底前途》，1926 年 11 月 30 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36－151 页。

[100] 凯末尔，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领袖，20 年代初领导土耳其民族运动得到过苏俄政府和土耳其共产党的帮助。革命刚一成功，即大举反共。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讨论过程中，共产国际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有走上土耳其的凯末尔道路的危险”。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230－231 页。

[101] 前引斯大林：《论中国革命底前途》。

[102] 根据 1927 年 3 月 6 日广东区委的会议记录，可以看出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决议持有某些保留态度。陈独秀反对土地国有化的谈话，见前引《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 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18－22 页。

[103]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 年 3 月 19 日；《特委会记录》，1927 年 3 月 24－25 日；《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 年 3 月 26 日。

[10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93 号（特字第 71 号）记录》，1927 年 3 月 3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94 号（特字第 72 号）记录》，1927 年 4 月 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167－169，172 页。

[105] 中央特别会议：《政治报告决议案》，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辑，第 569－800 页。

[106] 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27 年 4 月 1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200－201 页。

[107]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5 期；《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 年 6 月 20 日；《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7 年 2 月 6 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4 册，第 207－208 页。

[108]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 年 5 月 1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248－250 页；前引《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陈独秀：《告全党同胞书》。

[1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102 号（特字第 80 号）记录》，1927 年 5 月 1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252 页。

[110]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 年 5 月 3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296 页；《罗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 年 5 月 24 日，6 月 9 日，罗伯特·诺思等编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90，第 311－312 页。

[111] 《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 年 5 月 23 日。

[11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7 号（特字第 85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298－299 页。

[113]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 年 6 月 8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308－309 页。

[114]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 年 6 月 15 日，《罗易赴华使命》，第 324－325 页。

[115] 前引《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前引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1927 年 6 月 23 日。

[116]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 年 6 月 5 日；1927 年 6 月 17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 30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2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303，320－23，344 页。

[1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第 112 号（特字第 90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3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349 页。

[118] 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致汪精卫电》，1927 年 6 月 26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3 号（特字第 91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7 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 年 6 月 27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364，366 页。

[119]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 年 6 月 26 日。

[120] 同上引，并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1] 莫斯科 1927 年 6 月 29 日已紧急汇出 100 万美元，并决定日内再汇 50 万美元，以帮助共产党组建军队，挽救危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113 号（特字第 91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27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114 号（特字第 92 号）记录》，1927 年 6 月 30 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4），第 365，375－377 页。

[122] 《中央常委会议记录》，1927 年 6 月 17，22，23 日，7 月 4 日。

[123] 前引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4] 布哈林：《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 年 7 月 10 日；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 年 7 月 16 日；阿斯特罗夫：《论中国革命》，《真理报》，1927 年 7 月 27 日。

[125] 《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927 年 2 月 10 日；《毛泽东选集》，第 253，266 页；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 57 期，1928 年 10 月 12－14 日。

[126] 《毛泽东选集》，第 1209 页。

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

在今天的不少人看来，始终公开表示“拥护领袖”，捉蒋后仍反复声明愿意拥护蒋、服从蒋，最后为维护蒋个人威信，不惜丢下东北军，“负荆请罪”，送蒋回京，以致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对蒋介石几乎“忠诚”到了“愚”的地步。他自然是绝对不会有反蒋的念头的。

但是，近年来披露的多种档案资料却表明，张学良并非始终坚持“拥蒋抗日”，他一度曾经预备着联苏联共，实现西北大联合，自成局面，与蒋介石翻脸，并不惜动武。西安事变的发生与此不无关连。究竟如何理解这些新披露的史料，怎样看待张学良反蒋问题，目前近代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此略述己见，以备识者驳正之。

新近披露的几则史料

近年来，在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中，陆续披露出一些重要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其中，有几则资料颇为引人注目，它们对张学良生平研究和西安事变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这几则资料就是：

（一)1936 年 4 月 11 日周恩来就 9 日晚至 10 日凌晨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的内容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在电文中报告，张学良在谈到对蒋介石态度时表示：

１、对蒋问题。他的问题(是)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蒋)。

２、在国民党要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得力，故相信帮蒋能抗日。同时他知道

蒋之左右多亲日派，蒋不能下抗日决心，且极矛盾。张之立场，如蒋降日，张即辞而另干。故现时派人去新疆联盛世才，为打通西北，自成局面，张有把握。[1]

(二)1936 年 4 月 27 日刘鼎就 26 日晚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内中用隐语的方式转述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言论，和他所谈到的行动计划：

1、这位老头儿(指张学良)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 。这两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当然，不久以前的一些补剂(指李克农、周恩来在洛川及延安与张学良的谈话)已经发生大效用，同时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进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指蒋介石)越发在他面前现恶，他家大大小小(指东北军上上下下的军官)的嘴也利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意的布置。你看他的计划，大则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指东北军)的一角(靠他住的这一边)完全拿过来，东头一条大路(指东北军在河北河南的部队)他也企图着，小则把他的几个佣人(指他在东北军里的亲信)都要练为强干的打手。最近他预备出去大活动，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赶这功夫要向他邻近各房本家(指陕甘地区的地方实力派领袖如杨虎城等)，以及住在他大门口的爱好老蓝布袍子的几个小伙子(指兰衣社人员)和严老老等(指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渠等)相好去。他已经开始用“爱×(国)”“抗×(日)”话开始向内向外活动，将使大老板无法公然反对。同时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也可也。

2、所谓东西，是一本小册子，名叫《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分土地的旗帜。其中分四篇内容，约二千来字。内中有一些笑话：每个士兵打回东北分土地五十亩。内中又有些过于乐观：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起。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内中除讲外蒙苏联之帮助外，又说及日本内部革命将爆发。……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印成。现在他也只是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2]

(三)1936 年 4 月 30 日刘鼎就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内中进一步转述了张学良计划对蒋采取的行动步骤：

他一方面不愿意远在外方的子孙们抓山渡水的回来省亲，那是对前途不妙；同时他也不愿缺人缺才有害他的生意。另一方面他还要暂时与大老板周旋，趁此作最低限度的准备，同时还要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据老头儿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我已提醒他，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为机谨计，安得不有所准备以应对明日之遭遇么!我提出姑且以一月为期，一方面保持旧病状态，不使加剧；另一方面把一切后事之筹备赶急地先告一段落。如此，才进可以不畏一切，不进也可再作更深切之筹备。彼大以为然。[3]

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张学良上述谈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得知张学良上述谈话内容的共产党人毫不怀疑这是张学良转向抗日反蒋的表示。最早听到张学良谈话的刘鼎不用说了。几天之后，即 5 月 5 日、7 日、8 日陆续得知这一消息的中共各级领导人所得到的认识也都是

一样的。

5 月 5 日，负责中央联络局电台的曾希圣即电告中共中央称："近因蒋愈恶，张颇悟，已有抗日反蒋决心，言要干就彻底干。惟为准备计，反蒋事暂不公开"。7 日，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中共陕甘省委领导人朱理治也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张学良反蒋决心已下，但要求给他时间并保守秘密。电称："他希望我们不要迫他太急，他希望在十一月骗到蒋介石一些武器补充后，再约公开。"[4]

在接到刘鼎密信和有关报告之后，在 5 月 8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肯定："现张由反日的决心开始进到决心反蒋的程度"了。基于这种情况，他立即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一个以红军和东北军为基础，创立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实现陕、甘、宁、新、蒙大联合，与苏结盟，"战胜蒋日"的重要战略构想。[5]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由此开始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显而易见，正是根据前述新近披露的从 4 月中旬到 4 月下旬的几则资料，中共中央当时确信：张学良已经开始转向抗日反蒋了。

但是，今天的一些学者却不这样认为。

长期以来，人们看到、听到的张学良从来都是拥蒋抗日的，充其量也只是主张"逼蒋抗日"的。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也是张学良有力劝说的结果。从申伯纯最早发表的《西安事变纪实》，到全国政协"西安事变领导小组"组织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一直到 1996 年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才出版的张友坤等主编的《张学良年谱》，几乎都一口咬定：张学良是坚持抗日必须联蒋的意见的，中共中央本来坚持抗日反蒋并举的方针，只是在慎重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之后，才改行了逼蒋抗日的正确方针。[6]这种观念之根深蒂固，使得许多人即使在了解到上述资料之后，仍旧不相信张学良有反蒋可能。如新近出版的《张学良年谱》，几乎全文发表了周恩来 4 月 11 日报告、刘鼎 4 月 26 日和 30 日密函的内容[7]，并且也公布了朱理治进一步证实刘鼎密函关于张学良转向反蒋的电报，但与此同时，它却还是照抄照录以往的说法，称张学良在延安会谈中坚持说"要抗日，不联合蒋介石不行。周恩来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不久，中共中央分析了发展着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接受了张的建议，放弃了'反蒋抗日'的过时口号"。它甚至把延安会谈后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也当成了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劝告的证据，称信中关于"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也"的说法，就是"中共中央已决定有条件的联蒋抗日"的表示。[8]

不难看出，对于周恩来、刘鼎转述的张学良的上述谈话，我们今天一些研究者的理解与当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解，可以说截然不同。陈铁健先生在《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以下简称陈文)中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共中央当时对张学良上述谈话作出反蒋判断，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写道："刘鼎与张学良相识是在 3 月底，仅有过几天的接触，对张了解尚浅。至 4 月底，刘鼎衔命回洛川，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以不辱使命，故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张 26 日晚与刘谈话，推心置腹，情绪冲动，难免有夸张之词。受张的情绪影响，刘在其报告中不免掺入主观的分析。刘以隐语密报，阅报者对其中某些语句，极易作出符合主观需要的估量，从而形成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9]

“一厢情愿”辩

在这里，陈文所说造成中共中央“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的理由，似乎有些让人生疑之处。

首先，陈文在强调张学良 4 月 26 日晚谈话“情绪冲动”，说法“夸张”时，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张学良这时与中共代表已有多次谈话，每次谈话均在数小时以上，最长的延安会谈长达 6 小时之久，几乎是无话不谈，而 26 日晚据刘鼎报告却只是“短简的一段谈话”，并且主要是张学良自己谈。为什么数小时的谈话和劝说都不能使张学良“推心置腹，情绪冲动”，只“短简的一段话”，张学良就能够在相识尚浅的刘鼎面前“冲动”起来?陈文说：刘鼎带来的周恩来亲笔信中“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一句“打动了张学良”，但这也只是作者的主观判断或主观的分析，似不足为凭。何况此前毛泽东、彭德怀与张学良通电中早有类似的劝告，周恩来在延安天主堂委婉解释反蒋之必要，又焉知不会有如此说法?因此，简单地说张学良当晚谈话是“情绪冲动”下夸大其辞的产物，似乎不足以服人。

其次，陈文对刘鼎带着“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主观愿望，“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误把张学良“情绪冲动”下的过激之词当成张真实想法的批评，逻辑上似难以成立。事情很清楚，这个时候与张学良谈话的共产党人没有不带着“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愿望的，他们自然也多会“从‘反蒋’的角度审视张的言行”，但除了刘鼎这次以外，他们中人并没有谁因为有了这种愿望和角度，就只抓住张学良的只言片语，主观地判断张学良已有了反蒋意向和决心。恰恰相反，他们的报告通常都相当谨慎。从 1 月 20 日第一次洛川会谈后李克农的报告可知，当时张学良是力劝共产党拥蒋抗日，放弃苏维埃和暴动政策的，其拥蒋态度鲜明，双方围绕对蒋态度曾小有争执。而 3 月 5 日第二次洛川会谈时，李克农虽根据中共中央训令，准备好一套与张辨论的说辞，想不到张却不再提起对蒋问题和中共政策问题。尽管这显示张对蒋态度已有变化，但不论是李克农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因此把张算作是自己的盟友。在 3 月下旬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只是把张学良看成是中间力量，相信其可以反日，赞同联苏联共，但仍属于民族改良主义者，不同意中共政策方针。[10]至 4 月上旬末第三次延安会谈时，周恩来再提反蒋必要，张学良已不拒绝与争论，只表示“现在反蒋做不到”，但承认，蒋介石左右亲日派太多，在对日问题上表现得很矛盾，不是没有降日可能，故他要做两手准备。这显示张学良实已有了反蒋的希望与可能。然而，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报告的结论仍旧相当客观，称：张“确有抗日联共联俄要求及初步决心，但揭旗抗日，必须情况发展到下列程度：(1)红军与日本直接冲突；(2)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开展；(3)或蒋介石急他，蒋降日卖国状况益显著时”。[11]显然，报告者有“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的主观愿望，和容易“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的倾向，并不等于一定会产生错误判断。何况，刘鼎亲身参加了刚刚举行不久的延安会谈，他很清楚张学良对蒋态度和周恩来的判断，张 26 日晚的谈话如果与延安会谈中的谈话相比没有重大变化，他也不会发出惊叹。至少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这个变化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几乎可以说是“一日千里地进步着”，远比他临从瓦窑堡出来时周恩来等人估计的要“短促”得多。这时周恩来、刘鼎以及共产党人期待的，意想不到如此“短促”的张学良“一日千里”的“进步”是什么?不正是反蒋吗?[12]比较李克农、周恩来与刘鼎的报告，或可看出，我们很难简单地因为刘鼎“切盼张早日联共反蒋抗日”和“多从‘反蒋’角度审视张的言行”，就断定他一定判断失误。

再者，陈文说：因为刘鼎报告使用隐语，因此中共中央阅报时“对其中某些语句，极易作出符合主观需要的估量，从而形成一厢情愿的判断和对策”，似乎也难以成为理由。第一，就逻辑而言，或者是刘鼎误解了张学良的意图，或者是中共中央误解了刘鼎传递的信息，二者应居其一。说刘鼎误解了张学良的意图，中共中央又误解了刘鼎传递的信息，让人费解。第二，就事实而言，刘鼎密函使用的也并非都是隐语，他对《活路》小册子内容的说明就是一例。对此，陈文其实是了解的[13]，但在说明自己的观点时却忽略了这一情况。可以肯定，如果说阅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理解密函中所谓“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因此他不得不“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要干就彻底干”等隐语时，可能不易准确理解张学良原话的本意，那么，它在理解刘鼎报告《活路》小册子内容的时候，是不可能受隐语误导的。刘鼎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报告把张学良想要干什么讲得再明白不过了。刘鼎称：《活路》“最鲜明的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分土地的旗帜”；主张在苏联和蒙古的援助下，“晋秦绥宁甘新以及河北河南一部都会联成一气，红军就是彻底抗战的主力”。对这样一个连刘鼎都觉得太过乐观的小册子，张学良却表示：这是“他本人嘱某起草，未经他校阅而书已成”，“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显而易见，把密函中的那些所谓隐语同这里的大白话联系起来，是不难看出那些隐语的意思的。说中共中央因为刘鼎密函中的隐语和自己的“主观需要”，误解了张学良本意，“形成了一厢情愿的判断”，是不是武断了些?

“自成局面”辩

究竟刘鼎和中共中央当年是否误解了张学良的本意，是以我们今天如何理解张学良本意为标准的。而不少研究者之所以认为刘鼎和中共中央误解了张学良的本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刘鼎信中所传递的那些信息是不准确的，而他们的理解才是准确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刘鼎信中的那些隐语的呢?

仍以陈文为例。陈文确信，刘鼎所谓张学良准备“硬干”、“彻底干”、“和大老板打一架”的说法，只不过是张学良“力求摆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束缚，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的一种设想，并不含有与蒋分道扬镳乃至反蒋之意。为了证明这一点，陈文甚至把“张学良自 936 年 1 月接见被红军俘而释归的高福源，随即与李克农举行洛川会谈，继之与周恩来进行延安会谈”，都说成是“张学良早有在西北另立局面的准备和行动”，而非延安会谈后才有的“突然”的“惊人”之举。这等于说，还在张学良第一次洛川会谈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方针时，他就已经在密谋在西北“自成局面”了。既然密谋“自成局面”发生在张还决心拥蒋之时，它当然不应含有反蒋之义。

但是，在有关张学良密谋“自成局面”、“硬干”、“彻底干”，不惜“和大老板打一架”的种种资料披露之后，要想根本否认张学良有反蒋之意，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便能够看到一种颇为矛盾的现象。就象前述《张学良年谱》一面公布张学良密谋的有关文件，一面继续照录张学良力劝中共放弃反蒋主张的说辞一样，陈文一面强调“硬干”、“彻底干”、“和大老板打一架”只不过是“力求摆脱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束缚，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绝口不提反蒋二字，一面却有些含糊其辞地承认：张学良那个“辞而另立”的计划，半年之后确是准备在苏联的帮助下，联络西北和华北地方实力派“自成局面”，公开联共联红，揭旗抗日。而那时，“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他就拥蒋抗日，即刘鼎所谓‘捧大老板登峰造极’[14]。如此，则既可联共抗日，又不必冒

险反蒋，实为两全之策”。那么，如果蒋介石不改弦更张怎么办?陈文到这里嘎然而止，没有了下文。但在逻辑上这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蒋介石能够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他就拥蒋抗日；如果蒋介石不改弦更张，不停止内战，张学良就不得不“冒险反蒋”。不知这样来诠释是否符合陈文的意思?假如符合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刘鼎以及中共中央当年的认识是“主观的分析”和“一厢情愿的判断”呢?

事实上，张学良的那个“辞而另立”的“自成局面”的计划，就是准备“冒险反蒋”的计划。什么“硬干”也好，“彻底干”也好，“辞而另立”也好，“自成局面”也好，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反蒋。就象周恩来在其报告中谈论张学良“揭旗抗日”的条件一样，即使没有用“反蒋”这个字眼儿，那个时候谁能不清楚“揭旗抗日”这四个字的涵义呢?凡了解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历史的人很少不知道，那个时候某几个地方实力派要“自成局面”，不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打出什么样的旗号，结果会是什么，都必定要走反蒋的路。因为蒋是中央，不反中央不能“自成局面”。1933 年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用说了，1934 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人民政府不用说了，就是 1936 年 6 月那个由西南政务委员会发动的两广事变，表面上“请缨抗战“，其实不也是要“反蒋抗日”吗?在那个年代，张学良既要“自成局面”，又要拥蒋，这可能吗?一言以蔽之，所谓“勇敢地与中共携手，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而斗争”，说到底也就是反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讳言“反蒋”这两个字。

“政见之争”辩

在众多相关史料披露之后，要根本否认张学良曾有意反蒋，无论如何都是困难的。与《张学良年谱》自相矛盾的写法相比，应该说陈文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尽管陈文坚持不把张学良那个“自成局面”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与抗日反蒋划等号，但是它毕竟在文章中讨论了“关于中共与张学良‘反蒋’之比较”，承认“1935 年后，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有一个“张之‘反蒋’”问题存在。不过，陈文这里的表述仍旧是值得讨论的。陈文怎样谈论“张之‘反蒋’”问题呢?它说：“所谓张之‘反蒋’，纯属客观作用。就主观上说，1935 年后，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直到西安事变爆发，他仍以拥蒋、劝蒋、谏蒋为第一，即使有疑蒋之念，亦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并无个人恩怨，更无深仇大恨。可以说，张有对蒋批判之意，而无加害之心。”纵使最后捉蒋，亦“终不脱政见之争范围”。

对此，有几点需要讨论。第一，如果“张之‘反蒋’，纯属客观作用”，那么，“主观上”“张对蒋的态度始终处于矛盾状态”何解?所谓“矛盾状态”难道不是指张学良在拥蒋与反蒋之间犹豫不决?“纯属客观作用”，是否说“张之‘反蒋’”全然外力所迫，与张无涉?第二，既肯定张有“反蒋”问题，何以一涉及到对蒋问题时又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断定张之对蒋始终是“以拥蒋、劝蒋、谏蒋为第一”，似乎“张之‘反蒋’”充其量也不过是“即使有疑蒋之念”、“有对蒋批判之意”。“即使”者，未必真有之意也。“疑蒋之念”都未必有，又何来“张之‘反蒋’”?第三，所谓张蒋矛盾“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并无个人恩怨，更无深仇大恨”，何解?反蒋一定要有“个人恩怨”、“深仇大恨”?仅因“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就不会反蒋?

显然，说来说去，陈文虽难以否认张学良存在反蒋事实，但感情上仍难以接受，故而多方为张解释开脱，避之唯恐不及。只是，如此说明，反会让人如入五里雾中，并无助于理解问题。

坦率地说，张学良反蒋既有言论(对刘鼎等人谈话)，又有行动(在西北自成局面之计划)，并没有谁拿枪指着他的脑袋逼着他说，逼着他做，如何说没有他个人的作用在里面?其实，即使只是承认张学良有“疑蒋之念”和“对蒋批判之意”，也就等于承认张学良主观上存在着反蒋的思想因素，“张之‘反蒋’，纯为客观作用”即不成立。至于说张与蒋“并无个人恩怨”，因此不会反蒋，则同样不通。陈文既然明确表示同意说张学良“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15]，这岂不等于承认张蒋之间当时就存在着某种“个人恩怨”?况且刘鼎密函对此也有所披露，函称：张学良已几次谈到：“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必须“提防大老板先来下他的毒手”等等。这些话足以说明张学良当时对蒋介石确有相当不满。把它们同张学良主动提出的关于“预备着硬干”、“预备着和大老板打一架”、“我要干就彻底干”的种种“自成局面”的设想联系起来，应当不难看出，张学良反蒋并非“纯属客观作用”。当然，从张学良以后未因其个人及东北军的遭遇根本放弃劝蒋、谏蒋的情况来看，“个人恩怨”在张学良反蒋问题上未必起如何关键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即断言张蒋之矛盾“终不脱政见之范围”，更不能说“仅属国策不同，政见相左”就不会反蒋，非要有“个人恩怨”、“深仇大恨”才会反蒋。历史上从汪精卫、胡汉民，到冯玉祥、阎锡山、吉鸿昌、方振武、陈铭枢、蔡廷锴、陈济棠、李宗仁等等，哪个没有反过蒋，他们最初有几个是因为“个人恩怨”和“深仇大恨”而反蒋的呢?

在这里，不能不谈到陈文观念上的一个误区，即认为反蒋定会存“加害之心”，“必欲诛之杀之”。因为张学良对蒋向“无加害之心”，所以其虽有“硬干”、“彻底干”、乃至“打一架”的种种说法，也不能说是“反蒋”，因为找不到张有“加害之心”的证据。故陈文每遇张学良有疑蒋、恶蒋、反蒋说法之处，必定为之解释开脱。殊不知，反蒋既非一定要有“个人恩怨”或“深仇大恨”，因而也未必一定要存“加害之心”，非“诛之杀之”不成反蒋。陈文引用张学良在蒋逝世后挽蒋联：“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来证明张学良对蒋之“忠诚”，然而此联亦恰恰可以说明，即使仅仅因为“政见之争”，仍然可以成为仇敌，这与加害与否无关。张学良所谓“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就是告诉世人，他是因为什么走上与蒋为敌的反蒋道路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是什么呢?就是“攘外必先安内”，还是“非攘外不足以安内”。蒋介石顽固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而张学良则逐渐认识到，要等到蒋介石的安内统一实现才去抗日，他的东北军也在内战中消耗光了。从根本上说，双方的矛盾冲突并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什么时候抗日，也就是先抗日还是先统一的问题。陈文举周恩来报告关于张学良“揭旗抗日”三条件来说明张学良绝无揭旗反蒋可能，其中一条就是“蒋介石‘降日卖国’，事实上并不存在”，“谈何揭旗抗日?”如此论证似不妥当。因为即使到西安事变，张学良也未必是因为认定蒋“降日卖国”才铤而走险的。

政见之争是否会导致张学良与蒋介石反目为仇，只要看一看这种矛盾冲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命运会有何种影响就清楚了。从张学良的角度来看，他“既不信任国民党南京当局有抗战决心，又疑心蒋介石有借刀杀人之意”，在陕北与红军交战东北军接连两个多师被歼，南京又取消了被歼部队番号之后，他自然会怀疑继续按照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打下去对东北军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事情很明显，等到东北军在内战中损失殆尽，他拿什么去面对那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东北父老乡亲？！拿什么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所以会慨叹“大老板越发在他面前现恶，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很明显就是由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到进一步怀疑蒋介石为了统一而对东北军居心不良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当然会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进而为东北军前途另谋出路了。

作为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承担着丢弃东北四省的罪责和带领那些背井离乡的东北人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使命。不论张学良与蒋介石有多大的矛盾，只要蒋介石有助于他保全东北军和收复东北失地，即使他个人遭受若何损失，张学良都不会与蒋介石反目为仇。但问题是，张早已看出，不仅蒋介石不能也不想保全他的东北军，甚至也不会帮助他收复东北。一来，正如张学良对周恩来所说，蒋之左右亲日派太多，下抗日决心太难，最终会否抗日他亦不能打保票。二来，国民党高层中人多半“勇于内争，怯于御外”。抗日不积极，争权夺利却无所不用其极。结果是共产党打不尽，自己还内讧不已，如此等下去，抗日岂非河清无日?三来，蒋介石一向主张量国力而行，近年来已多次强调“东北四省向有特殊情形，不是革命军势力所能达到”，“当留待东亚问题全部之解决”方可解决[16]。既然如此，即使有朝一日蒋被迫决心抗日，以他的实力他又如何会打出关外去?即使敢打，又如何能有获胜的可能?既然等蒋抗日无期，收复东北更难指望，蒋反而通过内战逐渐将东北军消灭于无形，张学良不设法自成局面，另谋出路，又待何时!

总而言之，在张学良与蒋介石，和张学良与东北军这一三角关系中，张学良更看重的是东北军，而非蒋介石。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以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的作用为转移的。蒋介石的政策有利于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拥蒋；蒋介石的政策不利于甚至危害到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张学良就会反蒋。张学良后来几次讲：“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了力量”。但“我有两个最好最精锐的师统统打光了。我很痛心，除了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请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重编两师部队，但中央未拨抚恤，两师番号也予撤消。”“中央不发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17]这就是张学良当时所处的利害关系。离开了这一基本的利害关系看问题，简单地把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的经过概括为“不惜脱离东北军这条命根”，并据此论定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高于他对东北军的重视，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事实上，张学良西安事变后送蒋回京，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与原因，用“不惜脱离东北军这条命根”来概括张学良这一举动的动机，也不准确。[18]

“决心反蒋”辩

张学良有反蒋可能与意图，那么，他到底有没有反蒋的决心呢?这一点也是目前颇值得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对于不少注意到新披露史料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往往并不否认张学良确实曾经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强烈不满态度，承认张确有反蒋的倾向和意图，但如果具体说张学良有过反蒋决心，却往往难于接受。在这方面，陈文的观点亦有代表性。如陈文即明确讲：4 月 26 日的谈话，只不过是张学良“情绪冲动”时的“夸张之词”，稍一冷静下来，他就变了。文称：“张学良决心‘硬干’的愤激之词，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5 月 2 日刘鼎密报中就说张学良‘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一他既恋着共产党，又舍不得蒋介石，不要说‘决心反蒋’，即使是‘另立局面’‘揭旗抗日’也还是纸上谈兵。直到这时，刘鼎才算是摸到了张学良的真正心态。”陈文在列举了不同时期张学良“拥护领袖”的豪言壮语之后，断言：“张学良本有拥蒋真意，而无反蒋决心”，因为“张学良对蒋介石改变国策、领导抗日始终抱有真诚的期望”。

在了解了张学良有“目下还要装得老实些”,“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捧大老板登峰造极”的预谋之后，我们当然不会把张学良那些公开的拥蒋言论当作判断其对蒋态度真诚与否的一种根据。实际上，张学良有无“拥蒋真意”，是很难从他的公开言论中寻找证据的。至少张学良 4 月 26 日对刘鼎的谈话就足以说明，他并非“对蒋介石改变国策、领导抗日始终抱有真诚的期望”。当然，陈文坚持 4 月 26 日谈话是“情绪冲动”的产物，并以 5 月 2 日刘鼎的报告为依据,因此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陈文所说 5 月 2 日刘鼎报告张学良态度又有所变化的问题，做些具体的说明。而要这样做，我们似乎必须对 4 月 9 日夜与周恩来谈话时的张学良，和 4 月 26 日与刘鼎谈话时的张学良；以及 26 日刘鼎报告中的张学良，与 30 日刘鼎报告中的张学良，以及到 5 月 2 日前后张学良对蒋态度变化的经过略作考察。

前已述及，张学良对蒋态度根本上是取决于东北军的利益与前途的，1935 年 10—11 月连遭三次失败后，照张学良自己回忆，他已开始怀疑蒋之内战政策，“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产党之念生焉”。[19]之后便有了第一次洛川会谈。因为是想用“和平”办法解决共产党问题，因此当时张曾力劝中共放弃抗日反蒋和苏维埃政策。会谈后张即赴南京、上海，在得知与红军作战损失之两师被取消番号备受“刺激”的同时，又先后与为抗议南京政府对日妥协在中山陵前切腹自杀的续范亭，因发表讽刺日本天皇杂文而入狱的《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以及转道苏联返回上海的前东北军抗日将领李杜等讨论东北军前途而深受启发。至 2 月 14 日返回西安后，再意外得知南京当局密遣董健吾等赴陕北联络中共，致使张迅速开始与蒋介石离心离德，决心通过中共努力实现联苏抗日目标。于是，第二次洛川会谈时，张学良既不批评中共政策，也不再提拥蒋问题，只致力于解决高层会晤和派代表联苏问题。

二次洛川会谈的时间为 3 月 5 日。至 3 月下旬，张已得知苏联与外蒙古订立互助协定，这使张倍受鼓舞，更重视联苏问题。因为苏联与形式上仍旧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签订这样的条约，显示苏联完全可能给予邻近苏联外蒙的主张抗日的中国区域政治军事实体以实力援助[20]。新资料显示，这之后的张学良与接近中共的高崇民(即刘鼎 4 月 26 日报告中所提到的“某”)等专门讨论过东北军的出路问题，他明确同意高等关于联苏联共，以红军为抗日先锋，联络西北华北各省地方实力派组织西北抗日大联合，自成局面的设想，并赞同高等秘密印刷《活路》小册子。

延安会谈时，面对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劝其反蒋，尚无足够思想准备的张学良还无法下决心，因其虽已有自成局面的想法，但尚未开始进行，距离取得苏联援助的条件尚远，且张还不能肯定苏联是否真的会援助自己。关于苏联与南京间的接触，张早有耳闻。再加上他始终忘不了因为 1929 年中东路事件，苏联人 1933 年拒绝与他接触的情景，张对苏联人究竟是否会帮助中国抗日，帮助中国究竟会帮助谁，均毫无把握。由于既不明苏联态度，手中现在又没有掌握争取苏联援助的任何资本，张学良自然态度含混。但他再三询问:“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并明确告诉周恩来：打通西北，自成局面，他有把握。这已清楚地反映出他需要的是什么。

延安会谈显示，张学良虽表示信心十足，但他对自成局面、揭旗反蒋其实并无充分把握，话更多地怕是说给苏联人听的。然而，延安会谈结束不几天，张学良意外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抗议苏联与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着，南京方面更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自 1932 年底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发展缓慢。至 1935 年底 1936 年初，双方交流与商谈才开始日渐密切和深入。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不可免地使两国关系的发展受到意外打击。中苏外交谈判的停顿，只会使南京政府在抗

日问题上更加退缩。眼看日本不断加紧对中国华北的蚕食，唯一可能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对日态度正渐趋强硬，南京政府却在这个关节眼儿上不惜搞坏与苏联的关系，这不能不促使张学良萌发了争取苏联转而援助自己的强烈愿望。26 日晚刘鼎回到洛川后，张学良所以会突然迫不及待地"很兴奋，很热心"地把他的惊人想法和盘托出，正是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当然，张学良虽然已经决心自成局面，但他的计划仍旧很小心、很慎重。他很清楚，目前还不是他公然揭旗抗日反蒋的时候。第一，"要把他家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一边）完全拿过来"还需要相当努力；第二，要"把他的几个佣人都练为强干的打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第三，仅以东北军和红军之力，要对付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又要实行抗日，实难想象，因此，他必须要切实得到苏联援助的保证，并争取得到各地反蒋实力派的响应。而此"最低限度的准备"，也非易事。因此，即使是在 4 月 26 日的谈话中，张学良也并没有"冲动"到语无伦次的地步。尽管在这天晚上"短简的一段谈话中"，他没有谈到他行动的时间表。

与刘鼎谈话两天后，张学良得知中央军入晋阻挡红军东征得手，有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可能，急忙飞往山西太原了解情况，并试图劝阻。张到太原后，向阎锡山、陈诚等力陈陕北苦况，红军必不会在陕北立足，大军入陕给养困难，但阎锡山等坚持要入陕作战。[21]眼见陕北将再燃战火，张 30 日从太原匆匆飞回洛川，当晚就约刘鼎再谈，对形势表示忧虑。他一方面发愁身边可用之人太少，又不能从外面或红军中调用，因此准备西北发动将费时费事；另一方面也担心夜长梦多，行动被蒋侦知，"先来下他的毒手"，因太原之行他已了解到前次在洛川会见李克农事已经泄露。[22]但即便如此，张决心不变，仍坚决表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友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23]

为什么要牵延到 11 月再动手呢？刘鼎对此颇不理解。国民党中央军已在开入陕甘，一旦中央军大批介入，东北军届时必将处境困难，那时再与蒋翻脸，谈何容易！况且，刘鼎也不能不担心张学良这种表面文章能够做多久。因此，他不能不一再告诫张学良："时间太危急了，谁能担保此不生不死之状态到半年之久呢？"力主"先以一月为期"，"加速一切动作"，张虽"大以为然"，但对一月之后即行起事，坚不松口，并且生怕再泄露秘密，对刘鼎外出行动也颇多限制。弄得性急的刘鼎多少有些烦言：其实这件事东北军上上下下许多人已经知道了，"但她还要……""顾虑暴露秘密"，使双方关系象"偷汉子"似的，真是不可理解!因此，刘 5 月 2 日报告认为：她本来就在歧路间，又恋新又舍不得旧。这个矛盾变化得虽然快，究竟离终点还远，还有些难关哩！但是，这是不是象陈文所说，"张学良决心'硬干'的愤激之词，言犹在耳，只过了几天"，就变卦了呢?当然不是。听张学良多次解释后，刘鼎明确讲：张学良"所谓舍不得旧"，并不是象陈文所说的"舍不得蒋介石"，而是"还想最后从他家得着一些最后的钱财，来同新爱人渡岁月"。即是说，为了今后"同新爱人渡岁月"，他除了想要"到十一月可以得到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以外，还必须预先做好金钱和物资等方面的各种准备。所谓"新爱人的老亲们的表示"，就是指中共背后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他相信，花半年时间来取得联络和莫斯科方面的明确表态是最快的了。至于"同新爱人渡岁月"需要大量物资钱财，深知陕甘物质条件和红军窘况的张学良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从后来张把大批武器弹药和钱财陆续从平津、武汉、上海转移到西安和平凉地区，到西安事变时他胸有成竹地告诉中共中央：各种物资金钱和武器弹药坚持几个月不成问题[24]的情况看，可知张此言不虚，也确属必要。从张学良的以上表示和准备看，说张这时已经变卦，"不要说'决

心反蒋’，即使是‘另立局面’‘揭旗抗日’也还是纸上谈兵”，恐怕是缺乏根据的。刘鼎报告表明，张的计划未曾稍变，而且态度十分明确，即他的一切准备，都是为着到 11 月好“宣布新的同居”。这里所说的“同新爱人渡岁月”，“宣布新的同居”等等，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张学良这个时候确实曾经“决心反蒋”吗?什么叫“同新爱人渡岁月”?什么叫“新的同居”?不就是与蒋介石绝裂，公开站到中共和红军一边来的意思吗?如果这话说得还不明白，那么刘鼎回忆张学良当年的说法应该是再明白没有的了，那就是，到时候要“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25]

张学良真的不急吗?

张学良从有心反蒋，到公开向中共表白其反蒋决心，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到 4 月底 5 月初可以说双方已就此达成共识。5 月 12 日，应张学良的要求，周恩来与张学良再度会谈于延安。不论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对刘鼎 4 月底 5 月初报告的内容做何种理解，此次会谈后，经过周恩来与张学良当面交谈，至少中共中央已得出结论：张学良决心反蒋已不成问题。一周之后，中共中央在给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领导人，以及给张学良、王以哲的电报中都已明确讲：已与张学良商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行动计划，“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与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惟“准备以兰州作大本营，建立局面”。[26]6 月初，基于西南方面广东、广西两省地方实力派联手发动抗日反蒋，中共中央相信东北军与红军加速准备，提前行动，起而配合，“此其时也”，故专门拟定行动计划书，提交张学良以“坚定其信心并促其实现”。据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电报说明：“我们与东北军间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的局面，目前因两广的发动，华北宋哲元与四川刘湘等的酝酿，西北发动有加快的必要”。以红军与东北军两个西北主力起而举事，西北局面已能控制，西北国防政府已有他坚定的基础了。发动的部署以接近苏联与解决西北蒋介石力量为原则。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27]不难判断，如果张学良在二次延安会谈时没有表明坚决的反蒋态度，中共中央是不会如此信心十足并且紧锣密鼓地推动这一以东北军控制的兰州为大本营的西北国防政府计划的。

但是，陈文对此仍旧提出了疑问：正当中共中央加紧推动张学良“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时，“张学良到哪里去了?”根据陈文开列的时间表：6 月 10 日，张驾机离开西安往兰州，11 日转飞南京，20 日回西安，7 月 7 日再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至 24 日返西安。“此时，作为事变主角的广东一方已被蒋介石完全瓦解。中共中央准备迅速以西北发动来响应两广事变的计划，自然搁浅”。在陈文看来，从“两广事变中中共与张学良的急与不急”似乎也可以证明，张其实并不打算反蒋。不过，陈文这里开列的时间表，多少有些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从 6 月 20 日到 7 月 7 日之间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情况。

张学良 6 月 10 日在西安见到了中共中央派赴莫斯科的代表邓发，并接到了中共中央为配合两广事变而提出的行动计划书。据刘鼎报告，张与邓纵谈良久，彼此称快。而当天张学迫不及待地亲自驾机送邓发到兰州，又打电报又写信给新疆的盛世才请妥为关照。第二天张又匆匆赶往南京，以考察两广事变真相和南京以及各方之动向。这一系列紧张的活动和积极的反应，均可看出，张学良对中共提出的加紧配合两广发动的行动计划并非毫不动心。

张 6 月中旬在南京、上海四出活动，了解形势一周，明显对因两广事变而兴起的抗日舆论看好，信心增加。20 日，张又赶回西安，匆匆准备一天后，前往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他那篇题为《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著名演说，大谈："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战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谈准备了!" [28]在西南方面正高举抗日大旗公开反蒋之际，张学良在西安发表空前激烈的抗日讲演，其目的何在，似不难明了。

从王曲回西安后，张学良很快找刘鼎密谈，明确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问题。从刘鼎事后报告可以看出：西南事变起后，北方韩复渠和宋哲元等都暗中商量响应，并试图拉张入伙，张亦愿意与谈。同时为加速准备计，张学良已不再如过去那样害怕暴露秘密，而是主动提出要中共帮助训练干部，甚至要中共为其配备发报人员，以便与中共中央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系(过去都是利用王以哲六十七军军部电台)。与此同时，张要求加入中共，并请求中共中央派专人前来帮助他。[29]

刘鼎电告中央张学良有入党要求的时间为 6 月 30 日。这时两广与南京之间仍在相持之中，形势尚未变为对两广不利。由此可知当时张学良之心态。当然，张学良之要求入党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其争取苏联信任和支持的一种作法，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张已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不顾一切与中共和红军一起来发动西北国防政府。忽略这样重要的事实，断言对响应两广事变中共急而张不急，明显不妥。其实，有关这时张学良准备响应两广事变的情况，在不少当事人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据杨虎城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回忆，这时张、杨二人已经暗中商议了一个响应两广事变的行动计划，计划甚至已经考虑到了兴兵讨蒋的具体步骤。[30]正是因为张学良下了如此大的决心，当 7 月上旬得知广东陈济棠的空军被蒋拉走，广东军队内部开始动摇，整个形势迅速转为对两广不利时，我们才能够理解刘鼎在回忆录中给我们讲的那个让人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据刘鼎说，7 月初，张学良突然把他找去，对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蒋介石"自成一系，损人利己，太阴毒"，"全国各党派各部队都斗不过蒋介石，只有共产党能与之抗衡"。"不如明着跟你们干"。"请你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31]从掌握的资料看，刘鼎与张谈后确实乘张的飞机赶往延安，然后又从延安前往安塞，在 7 月 5 日与早几天就等在那里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见了面。听到刘鼎报告后，毛泽东对加紧西北发动问题显然更具信心。他在第二天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称："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32]由上不难看出，说两广事变发生后，"面对中共方面的急切和热烈，张学良却异乎寻常地沉稳和冷静"，中共急他不急，是不确切的。事情很明显，张学良这次多半想破釜沉舟地干一场。要不是两广失败得太快，另一种形式的西安事变恐怕是再所难免的。

张学良的反蒋与不反蒋

张学良要"自成局面"，就必定要准备反蒋；而他公开联苏联共、揭旗抗日的结果，也必然走到反蒋。因此，张学良在 1936 年曾一度决心反蒋当属无疑。但是，正如前述，张学良之反蒋纯因东北军的利益和前途而起，而这个时候的东北军非抗日则无出路，故张学良之反蒋其实是反蒋之以内战拖延抗日，是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而非反对蒋介石个人。就此而论，张学良可以说是又反蒋又不反蒋。如果蒋介石能够迅速走向抗日，如果他

发现蒋介石正在改取联苏联共的政策，那么，他注定会放弃自成局面的企图。注意到这种情况，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的结果。首先，无论有没有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影响，象当时诸多反蒋派别一样，张学良若发现蒋介石有使东北军在内战中逐渐消耗和瓦解的任何意图，他都会由“拥蒋”走向“反蒋”。这与中共的“反蒋抗日”方针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次，历史上的张学良也并非简单地从“拥蒋”就走向了“反蒋”，直至弄出个西安事变。[33]应当看到，张之反蒋，并非没有变化。

7 月 24 日，张学良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回到西安，曾一度与从莫斯科回来的中共代表潘汉年商谈过西北发动问题。中共中央 8 月 9 日有一长信，托潘汉年来西安转交张学良，并进一步细商西北发动的行动部署。按照中共中央的提议，东北军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 9、10 月间有利时机，决定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但 8 月中旬潘汉年到西安后，张学良却一连几天托病不见。反复催促后，张才在 8 月 21 日和 24 日晚与潘汉年密谈了两次。但谈话结果显示，张虽然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长信所提一切基本问题，对于具体落实却犹豫不决。直接电台未建立；要中共派干部事一推再推；就连红军要求其部队在甘北让道事，也吞吞吐吐，不能痛快答应，说是任凭红军去打，他愿意牺牲少数部队，以免秘密外泄，“落证据给蒋”。[34]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8 月 29 日。

8 月 29 日，张意外得知中央军一部突然不打招呼直开西安三原一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便衣侦探当晚又公然密捕与东北军联系密切的东北籍激进分子，这使得张怀疑蒋已侦知一切，准备对自己下手。因此，张对中共的态度又转趋积极。在派兵一举抄了省党部，夺回被捕之人以后，张次日晚即约潘谈，终于下决心说出了自己这一段的顾虑所在。据张讲：他参加二中全会时，蒋亲自向他表示过想要联苏，张乘机提出又要抗日又要打红军是不行的，蒋很神秘地向他看看说，不用着急，将来他有办法的。会上，蒋廷黻曾两次找他，要他出面向蒋提出联苏容共建议，蒋自己还不敢提，似乎蒋介石还没有下此决心。故会后张虽已有所顾虑，回西安后仍与潘讨论过西北发动问题。想不到，不足一月，南京已决定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这说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都有新的变动，意图联苏联共的迹象已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他张学良自然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了。潘报告说：“他正是因为蒋有可能与我们妥协，所以怕做得太难看，使得蒋说他投机而不满意他，或者误会他要与蒋争一日之长短”。[35]不管潘汉年如何开导张学良，如果蒋介石真的有意联苏联共实行抗日，他无论于情于理确实都不宜再树异帜。如仍旧继续加紧准备西北发动，弄到尽人皆知的地步，即所谓“做得太难看”，势必给人以“投机”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抗日的发动会产生反作用也说不定。实事求是地说，张学良的这种顾虑并非毫无道理。

这多半也就是为什么，当 9 月间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决定改抗日反蒋方针为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并发布致国民党中央公开信之后，张学良立即要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对那个信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36]从此，张学良放弃反蒋，转取劝蒋、谏蒋的方式，极力配合中共逼蒋抗日。至于后来蒋迟迟拖延联苏，并且不惜大举进剿陕北红军，再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陷于危险境地，迫使张铤而走险，发动西安事变，是为后话，限于篇幅，似可略去不提了。但不难判断的是，西安事变的发生，确与张学良此前的种种反蒋企图与准备，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只是，在经过了劝蒋、谏蒋和逼蒋阶段之后，它已经很难简单地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反蒋”了。

----

[1] 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 33 期，第 3—4 页；并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89—990 页。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共党史资料》公布 4 月 11 日电时在日期和文字上都有不确之处。首先，公布的日期是 1936 年 4 月 10 日，实际应为 4 月 11 日。引文(1)原文为“他的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公布时的文字整理为：“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但从原文看，“他”(除最后一个“他”)多半应该是指张学良自己，而非指蒋介石。正是因为他的部下现在确有公化，自己现在还很矛盾，因此才有后面的“他现在反蒋做不到”的说法。公布的文字加上两个“蒋”字后，此段原意不免发生了变化。

[2] 参见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 996—997 页。

[3] 参见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 998—999 页。

[4] 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 1003 页。

[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6 年 5 月 8 日。

[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7—48 页；西安事变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9—30 页；《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87 页。

[7] 需要说明的是，《年谱》公布的三件文献还有一些错讹之处。如周恩来报告中的“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是如(蒋)确降日，他定离开他”一段，《年谱》公布时变成了“对苏联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若确降日，他则离开蒋”。另外，前引周电“在国民党人中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一句，《年谱》发表时的文字多出来一个“吴佩孚”，成了“在国民党要人中，只有吴佩孚，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大有力”。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

[8] 见《周恩来致汉卿先生函》，1936 年 4 月 22 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7 页；此种说法最早来自张魁堂，张的原话见于《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4 年第 4 期；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 987、1000 页。

[9] 陈铁健先生在《历史研究》本年度第二期专门撰文评论拙作，颇多褒奖，对拙作观点基本肯定。能得到陈先生的褒奖，笔者倍感荣幸，惟对陈先生怀疑张学良反蒋或有反蒋之心的问题，笔者尚须稍加解说，尚祈陈先生鉴谅。见陈铁键：《西安事变简论—读〈西安事变新探〉札记》，《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10]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36 年 3 月 27 日。

[11] 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 989—990 页。

[12] 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 996 页。

[13] 陈文不止一次地引用了刘鼎对《活路》小册子的说明文字。

[14] 说刘鼎所谓“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即是“拥蒋抗日”之意，与刘鼎原意大相径庭。原句为“据老头提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方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半年功夫，大事可济。”稍加分析即可看出，张学良这里所说的“捧大老板登峰造极”，是故意使劲儿吹捧蒋介石的意思，目的是在暗中准备 11 月起事的同时，取信于或者不妨说是欺骗蒋介石的一种手段，并非真的要“拥蒋抗日”。对此刘鼎在另一封密函上说得更明白，他说：张学良之所以要拖半年才起事，“一方面(是)在这几个月中去进行欺骗，另方面似乎到十一月才可以见得到新爱人(指中共)的老亲们(指苏联)的表示”。

[15] 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版，第 51 页。

[16] 分别见蒋中正：《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1933 年 5 月 8 日；蒋中正：《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1934 年 6 月 16 日，《蒋总统集》(一)，第 624，722 页。

[17] 《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1990 年 8 月；《张学良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谈话》，1991 年 4 月 25 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 1165，1185 页。

[18] 因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具体说明张学良事变后送蒋回京的背景与原因。但可以略加提示的是，张学良送蒋回京时以及到南京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都没有想到过他会再也回不了东北军。详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五章(从革命到兵谏)。

[19] 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1955 年，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香港同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38 页。

[20] 当时这样看问题的不仅仅是张学良。中共中央同样也相信这是一个信号。毛泽东在 5 月 8 日政治局会上就明确讲：“三月间订立的苏蒙条约，就是告诉中国革命者，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这是重要的事!”

[21] 《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0 年出版，第 417—418 页。

[22] 徐永昌记，杨虎城、阎锡山及在山西的国民党高层这时均已知悉张学良与中共代表举行过“洛川会议”，且有人怀疑张已与红军暗中勾结。前引《徐永昌日记》，第 3 册，第 379、412 页。另 5 月初张学良与上海来陕之中共人员周建屏谈话时也特别提到这一情况，并说上海、南京均已知道“他和共产党在洛川开会”事。前引《张学良年谱》(下)，第 1003 页。

[23] 这段话刘鼎特别加注引号，说明是张学良原话。

[24] 参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 336 页。

[25] 见张魁堂：《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党的文献》，1988 年第 4 期。

[26]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致朱、张、徐、陈、任、贺、肖、关、夏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电》，1936 年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7—149 页；《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致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诸同志电》，1936 年 5 月 25 日，《文献和研究》，1988 年第 5 期。

[27] 转见拙作：《西安事变新探》，第 101 页。

[28] 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第 968—980 页。

[29]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 110—111 页。

[30]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5—136 页。

[31] 前引《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三)》。

[32]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 年 7 月 6 日，《毛泽东年谱》(上)，第 556 页。

[33] 陈文在讨论拙作时，提出了一个论点，即："贯穿《新探》全书之义，就是张学良在中共'反蒋抗日'方针影响下，由'拥蒋'走向'反蒋'，终至引发西安事变"。但此说似与拙作立意及解说不符。

[34]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 148—150 页。

[35]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 154 页。

[36] 前引《西安事变新探》，第 184 页。

关于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包括过去长期被称之社会主义三大特征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也大都面貌全非。这种种变化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究竟应当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或者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属于它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社会主义做历史的定位呢？

要讨论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问题，首先要为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下一个基本的定义。毕竟，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社会主义始终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其次应当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或区别。最后则不能不把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以及所谓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社会主义做些比较与对照。

一、社会主义——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美好追求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并非是共产党人的一种专利，而且也不能把它简单地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作为一种理想社会的代名词，社会主义式的幻想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从欧洲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中国春秋时期孔老夫子的大同说，古代思想家们早就设计过人类理想社会的各种蓝图。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固然直接起源于近代欧洲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理性批判，但他们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仍旧集中了人类过去对于未来理想国的一切幻想。比如反对阶级压迫，反对贫富悬殊，相信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在于私有财产制度，主张建立公有制，组织劳动公社，有计划地安排生产，大家团结互助，每个人既从事脑力劳动，又从事体力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甚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此等等。总之，近代欧洲社会主义者渴望的理想社会中，再没有剥削压迫，再没有高低贵贱，再没有尔虞我诈，“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1]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别于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它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同样是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立脚点，马克思却创造了剩余价值学说，用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同时并提出了唯物史观，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并且通过阶级斗争学说，发现了产业无产阶级可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物质载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最终使社会主义从一种思想家的幻想，变成了千百万人的政治诉求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

但是，具体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理想形态的设想，他的基本认识与早期思想家们的构想，严格说来并无原则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早期思想家们的构想存在着什么不同的话，大概主要还是他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比如通过组织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取得政权）和具体过程（比如经过革命的过渡时期以及实现最高理想要经过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的考虑更具实践性。他对未来理想社会本质特征的理解，却未必有多少独到之处。作为欧洲历代进步思想家的继承者，他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于人的自由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对阶级社会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劳动与人的异化深恶痛绝。他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仍不外寄希望于通过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彻底消灭阶级与剥削，使每个人获得充分的自由与平等。他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好处就在于，那时人将能够回归到其本来的自然状态，可以给予每个人以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而这种社会的基本理念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2]

继马克思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逐渐分成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派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最初之所以分成两派，也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社会主义未来设想的问题上存在着多少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而是它们对究竟应当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只是随着

苏联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它们之间围绕着何谓真正社会主义的争论才开始浮上台面。但既便如此，比较 50 年代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的看法，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它们有相当一致之处。

按照 1954 年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明，所谓“社会主义是以两种形式的－国家的（全民的）和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计划的，其目的是用不断提高生产的办法来最充分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且实现着按劳分配的原则。”[3]

而 1951 年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兰克福声明》则强调：“社会主义的目是要把人们从对占有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到全体人民手中，以建立一个自由人能以平等地位共同工作的社会。”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危机与贫富悬殊现象，有必要根据有关国家的本身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同时保证“个人有按照其努力取得报酬的权利。”[4]

比较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主张，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围绕社会主义问题的分歧，其实更多的还是表现在政治层面上。前者多半因所在国经济落后和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下的关系，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们对自由和权利的重视难以理解，主张以暴易暴，相信唯有通过阶级革命和共产党的专政，才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创造新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目标；后者则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政治模式已经基本建立，人们对自由和权利高度重视的现实，相信社会主义必须是多数人的事业，坚持要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主张通过民主的程序，逐步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对自由的剥夺。但是，共产党也好，社会党也好，他们至少在理论上都同意，资本主义造就了庞大的没有财产和社会权利、靠工资生活的劳动阶级，它被迫依附于少数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使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愈加严重。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消灭剥削与压迫，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理想形式。而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最主要方法，就在于通过以公有制取代或相当程度上取代私有制，以计划经济取代无限制竞争，和实现按劳取酬等各项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途径，来消除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病。

通过对历史上各主要派别对社会主义理想基本内容的简单考察与比较，我们应该大致可以对以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共同点做出如下归纳：第一，相信社会主义是解除资本主义弊病的唯一出路；第二，其核心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第三，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基本要件。换言之，如果我们不是把社会主义简单地看成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它看成是人类理想中可以真正实现社会公正与正义的一种社会形态，那么，至少在上百年的时间里，凡是否定或批判资本主义，相当程度上致力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意在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政党和国家，应当都可以被归入社会主义之列。甚至，如果我们更着重于理想的目标，而不过分重视具体的实现手段和方法的话，那么，凡是致力于否定资本主义制度，追求经济和社会平等理想的政党和国家，即使它们对实现理想的方式方法，如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存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也应当肯定其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否认社会民主党追求社会主义的主观努力，或者否认共产党追求社会主义的主观努力，一味将对方妖魔化，显然都有失偏颇。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人为制造均平社会的失败尝试

中国较俄国更为落后，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观念更为淡漠。因此，它最容易接受的社会主义自然是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从俄国革命那里学到的第一条就是革命暴力加阶级专政，用他当年解释自己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话，就是：这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知道俄国的方法恐怖，但基于救国救民的理想又无良法可寻，毛泽东等一代激进知识分子向苏联共产党寻找出路并最终“一边倒”，应该说不可避免。[5]

靠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难免会习惯性地运用革命的思维来建设国家。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大量中俄档案可以清楚地了解，自从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建国的设想之后，他们就不断地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提出问题，从如何保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如何建立政府各级组织机构，如何有效地组织经济生产，如何制定各项计划和政策，到如何尽快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都十分虚心地在向苏联学习。[6]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之日起，其虽一度有过联合政府的形式，而其政权的基本架构和实质追求，与苏联毫无二致。它同样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运用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办法管理国家，力图通过将生产资料全部转变为国家和集体所有，将整个国民经济纳入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的轨道，并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以达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目的。[7]

但是，随着 1956 年中国宣布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却渐行渐远，最后甚至分道扬镖。促成中国社会主义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原因颇为复杂，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实现步骤的不同理解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是相当典型的近代中国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既上过传统私塾，也读过西式学堂。但由于从未出过国门，他不仅受传统文化影响深厚，且其早年田园式小农经济环境下的生活经历，与列强欺凌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残酷性造成的强烈对比，使他象众多旧式知识分子份子一样，对资本主义的进步与发达鲜有体认，却更多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罪恶。这样一种学习经历，再加上俄国革命的榜样力量，及其在革命过程中亲身体会到通过主观意志改天换地的巨大成功，自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他，自然难免会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忽略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过份迷信自身的经验，以为只要政策和路线对头，不仅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从失败转向胜利，而且可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就走向社会主义，就成为一种必然。

建国伊始，由于从未管理过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器，毛泽东还颇为看重斯大林的意见，处处小心谨慎。但随着政权日益巩固，经济渐入正轨，再加上误以为只要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即等于进入了社会主义，毛泽东自信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加速迈向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了。正是由于把社会主义事业看成是可以依靠政权及其行政力量，借助于战争经验，用打歼灭战的方法聚而歼之的简单过程，毛泽东才会不顾先前根据苏联经验决定的时间表，以及党内众多领导人的怀疑与反对，坚持加速合作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把原定 15 年的目标突击在一年半时间即全面完成。而剥夺私人资本这一过程的轻而易举，更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重主观轻客观、重精神轻物质、重政治轻经济的倾向，促成了他思想的进一步激进。

毛泽东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是在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正式形成其雏型的。由于最初

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缺少研究，他一度也还是以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为依据，相信公有制基本实现后剥削阶级将不复存在，“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将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8]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样一些观点甚至被写进了政治决议案。[9]但是，随着这一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和匈牙利事件，以及随后 1957 年反右运动的发生，毛泽东意外地发现，马克思、列宁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他所面临的现实。因为即使完成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仍旧必须要面对敌对势力的强有力挑战。而这些敌对势力的产生，显然多半来自于自己内部，并不像斯大林当年所声称的那样，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干涉和渗透。据此，毛泽东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很快开始批评得到中共八大肯定的关于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相信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仍旧应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10]

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要修正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因为，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描述，他所设想的通向人类理想社会最高阶段的道路，是要经过三个阶段，即革命转变时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首先是“革命转变时期”，这是指从资本主义到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中，丧失政权的资产阶级和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因此，“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如此才可能完成改造所有制和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11]

其次是社会主义社会，亦即所谓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在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而彻底消灭了阶级存在的基础之后，人类将会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但是，“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时通行的仍旧是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即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以一定量的劳动交换同量的劳动。“这种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即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中。但是，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因此，按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说法，在这个阶段，虽然阶级已经消失，国家作为阶级压迫机器的功能也已消亡，国家作为管理机关的部分功能还将要予以保留，因为还必须保卫这个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12]

最后才是人类理想社会的最高阶段，即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迫使人们奴隶般以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劳动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高度发达，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已充分涌流，资产阶级法权不复存在，人们可以在各尽所能的基础上各取所需了。[13]

显然，即使依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存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前，亦即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旦消灭了私有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阶级存在的基础理应消失，阶级专政也应当归于消亡。对此，毛泽东明显地有所怀疑。只是，直到 1958 年底 1959 年初，毛泽东还无法解释这一切。他更多地只是在译文上寻找答案：会不会大家误解了马克思的意思？马克思所讲的“过渡时期”也许不是单纯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个阶段，而是包含着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这整个历史时期？由于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是一个可以轻易完成的短暂时期，他无论如何

看不出，他已经迈入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能够在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和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由于把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实现等同于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完成后国内国外发生的种种风波，只能更加坚定了他的这种怀疑，即马克思所说的这个充满阶级斗争，必须实行阶级专政的“革命转变时期”，是理应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程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的存在从来都是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阶级存在的基础就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对此，斯大林的做法是，把一切矛盾都归结为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而这在毛泽东看来显然是不够的。在这方面，他与苏联人的最大不同，就是他更看重社会的平等问题，并能够透过各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逐渐地“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之所在。

毛泽东对平等问题的担心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初其实就开始了。根据斯大林概括的说法，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主要就是“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的关系。[14]无论从苏联的经验，还是从中国的经验，毛都很容易看出，在这三个关系当中，所有制关系不难解决，只要掌握了政权就行。实行按劳分配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也很容易办到。真正困难的，只有一个人们在劳动生产中平等关系的实现问题，因为这种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按劳分配实现了，“闹级别、闹待遇”的现象，以及各种不平等的现象反而比战争时期更多了呢？对此毛当时百思不得解，反复思考后的结论只是，当初不该轻易地放弃供给制，引入等级制和工资制，把人在级别及其收入上分成三六九等。在他看来，工资制和等级制的实行，不可避免地会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大打折扣。

毛对平等的执着追求，与他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他的头脑中充满着中国传统均平思想的痕迹，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缺乏深刻的理解。基于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伦理观，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社会平等。因而他总是高度关注平等问题，这也是他再三强调战争时期供给制的好处，对一切具有“等贵贱，均贫富”性质的作法都要大力赞扬推广而无所不用其极的重要原因。从 1957 年号召整风反对官僚主义，随后取消军衔制，提倡供给制，提出知识分子“皮毛论”[15]，指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包括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到发动“四清”运动整农村干部，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一切当权派，毛泽东的种种作法都透露出其内心对现实社会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的强烈不安，他逐渐把这种不平等看成是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源，势不能免。他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许多问题都是从这个工资制来的。因为接受了工资制，就“接受了等级制”，就必然会出现“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就必定会有相当一批既得利益的“新权贵”。他们官做大了，有汽车，有好房子，薪水高，还有服务员，自以为了不起，比资本家还厉害。[16]毛泽东之所以最终走到相信“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大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不能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言，平等理应由起点（权利）平等逐渐走向结果（分配）平等。但中国社会落后的现实却使共产党人难以顾及起点问题，只能用强力直接创造结果的平等。殊不知，强力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新的权利上的不平等，而只要起点不能平

等，结果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指望通过限制分配形式，消除人与人之间贫富贵贱高低上下的差别，事实上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这是因为，要根本消除这种经济收入和社会身份的差别，不到生产力高度发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已经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情况下，同样无法实现。毛泽东极力试图通过不断革命来创造奇迹，虽然确实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大体均平的社会：大家基本上吃一样的东西，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甚至使用几乎同样的语言和思想。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等级制依旧存在，出身及脑体差别、权力以及官阶的大小依旧是区别社会身份高低乃至个人和家庭权利多少的标志，相当多数的农民还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这也就难怪毛泽东临终之前，还是无法满意，以至不无遗憾表示：中国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17]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和展开阶级斗争，不仅丝毫不能触动社会政治体制的现实结构，而且还造成了太多的社会冲突和积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他去世之后，他所倡导的这种社会主义实践自然无法进行下去。

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名义下的新民主主义

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无论叫什么样的一种名称，都极大地区别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了。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把中共当年批判苏共的“九评”中的一些观点拿出来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九评”中有一篇专门讨论何为社会主义的文章，叫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文章虽然意在批判南斯拉夫，但它所提出的判断标准，仍旧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是如何定性的。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个“重要根据”，是强调南共对私人资本不是采取同中国一样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而是采取了扶植和鼓励的政策。比如它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有权购买外汇，并且从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帮助，致使南斯拉夫出现了年收入达到数万美元的私人企业主。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南共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鼓励农村个体经济，允许土地租赁和自由雇工，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造成农村资本主义泛滥，有些农民公然非法经商，制假售假，自己做生意，却雇用劳动力从事农田生产；有些农民则用各种投机办法购买拖拉机，通过代耕剥削邻近的贫苦农民。因此，南斯拉夫的农村，已经成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成为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个“重要根据”，是批评南共不仅允许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而且提倡所谓工人自治。文章断言：唯有把一切生产资料化为国有，才是社会主义，任何直接或间接把工厂交给工人自治的作法，都是放弃社会主义，并且必然导致企业经理等管理阶层拥有高薪，掌握和支配企业分配大权，甚至利用职权，巧立名目，接受贿赂，贪污盗窃，侵占工人劳动成果。再加上南共公开鼓励发挥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南斯拉夫的公有经济实际上已经成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控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文章否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第四个“重要根据”，是指责南共取消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度，允许企业独立经营对外贸易，放宽进出口限制，向帝国主义大开门户，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和农产品进入南斯拉夫市场，使许多外国资本直接打入南斯拉夫，导

致大批南斯拉夫的原料输往西方，而大批南斯拉夫工业企业则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现成零件，加以装配，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当作自己的产品出口。再加上南斯拉夫大量接受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贷款和援助，甚至公开表示同意促进个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制度，其明显地已经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18]

比较上述四项判断，我们不难发觉，今日之中国早已陷入到当年被批判的境地。除了南共当年所搞的工人自治一项外，从鼓励私人创办企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允许自由贸易和个体经营，到积极争取外国贷款与投资，大力发展加工工业，开放门户，甚至主动溶入全球一体化潮流，中国今天的做法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南斯拉夫。这清楚地显示出，今日中国确非毛时代之中国。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

中国是在 1978 年，即邓小平重新复出之后逐渐开始走上这样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的。围绕着这条道路的性质，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始终存在争议。但不论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如何解释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好，是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怀疑论者相信他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进而怀疑中国有无必要还公开坚持社会主义[19]；反对论者则坚持“九评”的观点，断言中国正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20]在中国国内，围绕着这一问题，始终存在着相当尖锐的争论。一些人甚至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把矛头指向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共中央。

究竟如何给邓小平所开创的今日中国定性？在这里，我们似乎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考虑问题。第一是邓小平和共产党的主观意图问题；第二是为在邓小平和共产党主观意图下所产生的今日中国客观定性的问题。

之所以需要考虑主观意图，根本上是因为人们的主观努力未必能与客观结果相一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以成败论英雄，尤其不能从结果来倒推动机。就社会主义理想而论，它之成为社会实践已经有 100 多年的时间，尽管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符合理想家理想模式的社会主义产生出来，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那些理想家或实践者抱有真诚的动机。以毛泽东时代为例，我们也许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依据其经济发展的程度和经济活动的形式，将当时的中国纳入到某种经济学体系当中加以评判，但是我们绝难否认毛泽东主观上所要追求和尝试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平等制度而非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没有理由根据中国今日之结果来猜度邓小平当年可能“是以‘资本主义’为目标的”。[21]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们应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同大多数人一样，邓小平对如何找到一条有别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也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的认识和实践过程的。直到最后去世，他的所有认识都没有离开过实践本身。也正因为他在世时改革实践的局限性，因此他最终也没有能够提出一套完整明晰的理论思路来。如果说他曾留给后人一些重要的理论思考，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高度重视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事实上根本否定了毛泽东建立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坚持回到马克思以生产力为衡量标准的观点上来。但他还是共产党人，他依旧向往社会主义。把中国当前的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是邓小平最好的一种理论选择了。

无论邓小平的主观意图如何，今日中国能够说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何谓社会主义。毕竟，不论初级、高级，社会主义总有其质的规定性。如果我们坚持按照马克思当年的标准，即社会主义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无法容纳其生产力的客观结果，那么，不要说今日之中国不能被视同社会主义，就是昨日之中国、昨日之苏联，也都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坚持列宁，特别是斯大林当年的标准，即相信可以首先创造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造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那么，今日之中国也难与社会主义完全划上等号。甚至，即使我们拿社会党的理想标准来衡量今日中国，我们也仍然会发觉其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待社会主义问题，我们当然不必特别在意意识形态的分野，而应当更多地注意到人类理想目标的共同之点。换言之，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关键其实不在于公有制是否占主体地位，因为今日之所谓公有，其实只是国有。而实行国有制若不能与透明的行政体制和民主的监督机制密切结合，就难免在事实上变成官有，公众或国民因之失去控制和所有之权。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甚至也并不在于看其是否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因为进入现代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继续以简单劳动作为分配的计量单位，也明显行不通。我们衡量今日中国是否社会主义，主要应看其是否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为特质的整体政策与实践。因为，诚如前述，无论各派社会主义，不论它们在政治的和经济的实现手段方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它们在批判资本主义，决心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斗争目标上，基本上都是趋于一致的。不论何种社会主义，不论其处于何种阶段，也不论其采取何种形式和方法，如果它不能使人民在权利、地位、机会，特别是分配方面，享受到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平等，它就不能被视为社会主义。

用这样一种观点来衡量今日中国，我们大概很难把它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直接划上等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日之中国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特征，而且在根本上打破了分配平等的局面。它不仅还不能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机遇和权利，使他们享有相当的生活水准，而且目前还难以为他们提供最低生活需求的保障。即使对城市居民，它在实际上还远未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大幅度地取消了过去用以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人民生活、医疗、居住、养老和受教育等条件的各种国家福利政策，使中低收入家庭承受到前所未有的教育、住房、养老，特别是大病医疗的沉重压力。[22]再加上其经济运行完全市场化，各种形式的私人及类私人（以集体形式为掩护的）资本迅速成为国家产业的重要支柱，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在多数地区渐呈两极化，从而使它不仅比受到社会党政策极大影响的欧洲众多国家，甚至比当今的美国，在通过社会福利创造较为平等的机会和收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差距。这也就难怪一些人会把今日之中国等同于"资本主义"了。

严格地说，今日中国的确带有资本主义的许多特点。与其说它是社会主义，倒不如承认它更接近于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是否能因此断言今日之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呢？显然不能。首先，它仍旧是在以社会主义为诉求的共产党一党的全面掌控之下；其次，它的整个意识形态和主流的宣传舆论，本质上仍旧继续排斥资本主义；再次，它的经济活动及其体制的运行仍旧极大地受制于现实政治的左右和影响。换言之，今日中国，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是随时可能被引向另一种经济体系的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更类似于某种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它理应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提出来的。它的本意是说，中国经济落后，距离社会主义目标还相当遥远，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将不会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

主义革命那样，最后走向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方向必定是一种新型的民主主义或可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既一方面在经济上借助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共产党将会依据客观情势，逐渐将其引向社会主义。[23]根据这样一种观点，在 1949 年新中国政府成立前夕，由各党派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还就此专门通过了一个具有约束性的共同纲领，规定了这样一个发展目标。[24]只是由于建国后从经济恢复到政权巩固，从互助合作运动到城市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一切都进行得过于顺利，导致毛泽东很快中止了新民主主义的进程，迅速转向了社会主义。而事实证明，过早过快地取消多种经济成份，迅速实现国有化和集体化，取消市场机制的作用，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简单拉平社会分配差距，极大地妨碍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978 年的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上来，要走先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说到底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的观念当中，即是以资本主义为手段，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态。提出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因是囿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信非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否则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这一观点上的突破及其实践的失败，促使邓小平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重新回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市场经济的体制上来，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敞开国门，吸引外资，鼓励私营，乃至在分配政策上取消“大锅饭”，打破“铁饭碗”，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之所以主张：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应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此应当允许让一部分人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先富裕起来，不怕暂时出现贫富不均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25]正是因为他注意到多数发达和次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年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因为，要想在保持旺盛的经济发展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实现分配平等和共同富裕，只能通过税收及福利政策进行调节。而要想能够通过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来造成共同富裕，就必须要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才有可能做到。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结果，导致中国更接近于资本主义；而坚持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则显示了邓小平主观上仍旧不忘社会主义的理念。两相结合，今日中国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更近似毛泽东当年那个新民主主义，彰彰明矣。当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今日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我们大概只能说它是社会主义名义下的一种新民主主义，是一只脚跨在社会主义门槛上，身子却尚未完全进入门内的社会主义。

四、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出路之前瞻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迄今已有 100 年的历史。当年立场极端对立的近代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和革命派首领孙中山，几乎都是社会主义的欢呼者。此后几十年中，注意到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资本主义世界自身弊病丛生和危机不断，鉴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国家迅速强大的事实，绝大多数有志于救亡强国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都曾经对社会主义心向往之。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确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50 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力主中国应当大步跨入社会主义者，首先就是民主派人士，而非共产党领导人，足以见社会主义在中国确有其社会基础。

新中国建国初年，同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经济恢复，政治清明，抗美援朝战绩显赫，工业建

设成就斐然，鼓舞着亿万中国人自觉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从反右，到人民公社，到大跃进，共产党登高一呼，举国上下桴鼓相应，虽因政策错误，致饿殍千万，多数人亦抱定毁家纾难之决心，未稍动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之信心。其热情与真诚之可感，令人叹为观止。

曾几何时，中国再陷于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之中，反观资本主义经济却朝气蓬勃，毗邻之同等水平国家与地区也后来居上，成龙成虎。更由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迅速走上溶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致富之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朝倾覆，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弦更张，社会主义遂渐失去其号召力。但即便如此，至今中国多数下层民众，受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化，及拜金主义风气盛行之刺激，反而对大家两袖清风，不愁吃穿和生老病死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戚戚然抱以同情，且对恢复以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期期然寄予希望。此种心态，往往亦非外人所能体会。

不论马克思的理论如何推定，近百年的人类历史给今人的经验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体系，往往更适合于发展中的落后国家，而未必完全适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只有在经济相对落后，人民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竞争恶性发展充满恐惧的国家里，以平等为号召的社会主义才具有较强的号召力；二是只有在经济相对落后，人民对暴力和专制司空见惯的国家中，主要靠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制造平等的社会主义才比较容易发生效力。中国是一个有将近 13 亿人口的国家，并且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同时久经专制统治和战争动乱，社会主义在中国能够取得影响，并发生效力，与此不无关系。

强制的平等固然可能抑制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社会活力，损害人民自由发展和取得财富的机会，它却未必不能为落后国家中相当多数普通民众带来经济上的满足感与国力提升的荣耀心。如果苏联不是把它有限的国力用来与美国竞争军备，如果毛泽东在 1957 年以后没有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许会走出另一条道路。换言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际体系之所以归于失败，它或主动或被迫地把自己摆在与强大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长期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以致耗尽物力与精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尝试完全没有意义，更不意味着落后国家的多数民众一定会从心底里反感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无前途，既不取决共产党的理想如何，也不完全取决于多数民众的欢迎程度。在今日这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它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受社会公众监督和制约的程度。毕竟，当中国再也无法把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之后，中国的任何发展都必须，也只能紧随世界进步的节拍，由起点的平等逐步走向结果的平等。换言之，以今日世界之潮流，如果真有社会主义，它理应建立在能够为国民提供资本主义所不能提供的更充分的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其历史意义。要实现这一切，需要经济的迅速成长为其奠基。没有经济的迅速增长，就没有诞生于强大经济动力和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对自由和平等的广泛需求。但今日中国却断然不应重蹈自由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竞争的覆辙，因此政治特别是思想的开放，不可忽视。因为经济增长的同时，以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难免要经受各种利益关系、资源配置调整和相应的权力结构变动的挑战与考验。坚持固有的意识形态观点，“唯我独革”，必然四面树敌，难免会把手段当目的，把形式当本质，进而迷失方向。而继续坚持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传统体制，听任政治权力不受社会舆论监督的现象持续发展，不仅政治腐化无以遏止，而且可能因长期的压制导致矛

盾积蓄引发严重的失控局面。总之，仅仅把眼睛盯住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以及行政结构上久以存在的种种弊病势必会使已经大量出现的严重问题恶性发展，最终造成南辕北辙的历史悲剧。

最后应当指出，追求作为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主义未必有错。而迄今为止的所有社会主义，不论其实际价值和命运如何，其实都是在人们的主观想象和大胆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任何依据主观想像而提供的创造理想国的实践方法，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期的灾难性的后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就应当完全停止对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如果能够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中国人今后也未必就不能通过主观的努力，创造出较资本主义更适合于人类生活和发展的社会形态来。今日中国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它未来就一定不能发展成为较资本主义更平等、更自由的社会主义。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第一，这种社会主义必须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客观结果，而不应当是依靠政权强行拉平分配的产物；第二，这种社会主义必须是从寻求起点平等开始，逐步迈向结果平等，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靠不平等的权利来创造虚幻的平等。共产党人若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而主动地利用其目前所掌握的行政权利与资源，把为民造福的主观意愿同自觉融入时代潮流的行动结合起来，则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许不是毫无可能的。

----

[1] 参见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三联书店 1956 年版；托马斯·康帕内拉：《太阳城》，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马布利选集》，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版，第 62－63 页；《欧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20 页；《傅立叶选集》，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26 页，等。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260 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2 页。

[3]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07 页。另，其随后的修订本进一步表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为（1）以国家所有制和合作集体农庄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2）劳动者不受剥削，建立了同志式的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3）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有利于劳动者本身的产品分配。

[4] 社会党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1951 年 7 月 3 日，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 页。

[5] 参见《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 年 12 月 1 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48 页；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1477－1478 页。

[6]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少奇 1949 年 7 月 4 日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8 页。）和 1952 年 10 月 20 日写给斯大林征询他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的信（参见《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 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94－695 页），等。

[7] 参见范若愚、江流主编：《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0，162 页。

[8] 此即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无产阶级一旦取得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384 页。

[9]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1956 年 11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5 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6 年 2 月 27 日（油印件）。

[10]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 1998 年印，第 121 页。

[1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99 页。

[12] 同上引注，第 90－91 页；列宁：《国家与革命》，1918 年，《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45－247 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同上引注，第 91 页。

[14] 毛泽东：《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1958 年 11 月 9－10 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 67 页。

[15] 毛泽东评论知识分子的典型语言是：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依附于某个阶级的。"现在，知识分子依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们饭吃？就是工人、农民。"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2 页。

[16] 同上注，第 67－68 页。

[17] 参见《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 年 10 月－1976 年 1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86 页。

[18]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 9 月 26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7 册，第 92－117 页。

[19] 参见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第 50 次全国学术大会执行委员会：《写在企画共同论题"现代中国研究的 50 年"之际》，2000 年 5 月 6 日。

[20] 有关议论可参见《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1994 年）；《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1995 年）；《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

论和政策问题》（1996 年）；《1992 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1997 年）；《应当引起关注的政治思想和舆论导向问题－苏联变质解体教训问题座谈会述要》（1999 年），分别参见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2－251，276－281，312－317，351－353 页，等。

[21] 同注 19。

[22] 在毛时代城市居民由于没有失业下岗等问题，因此不愁吃喝。看病实报实销，不必担心大病无钱治。住房由单位提供，房租极低。子女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国家负担，家庭花费极少。而如今尽管工资收入较过去增长甚多，但由于医疗制度、住房制度、养老及教育制度全面改革，低收入家庭负担远较过去增大。

[23]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55－704 页。

[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 29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7 页。

[25] 转见本社编：《20 世纪的巨人邓小平与现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5－306 页。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之谜

张学良证实周恩来所言不虚

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周恩来会面的问题，向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但迄今为止，人们都没有多少收获。在过去，大陆学者依据周恩来当年的电报，断定蒋、周曾经会面，蒋且许下诺言，然而却说不清见面的具体时间；台湾学者过去则往往否认有见面的事实，当然更不承认蒋有任何许诺，可是却无法证明周恩来电报纯属虚构。所以会弄出这许多争论来，关键在于事变后公布的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述了宋、周会面的情形，对蒋、周会见却未置一词。尽管蒋、宋事变后发表之文字，事实均为其幕僚手笔，但既以蒋、宋名义发表，又经蒋、宋亲阅亲改，一般人自然会以此为据。故这些文字给人印象很深。人们通常据此认为，周只见过宋美龄，并未见到蒋介石。再加上张学良事变后即被关押，失去自由，1956 年底虽写有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之文字，对此也毫无记述，周恩来之电报遂成孤证。争论亦由是而生。

正因为如此，蒋、周会面一事，遂成为人们格外关心的问题。张学良刚一恢复自由，捷足先登的日本 NHK 电台记者，就抓住这个问题对张学良穷追不舍。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张当即摆手表示不愿回答，说：「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但依张之性格，张又忍不住要说明：「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等到记者进一步追问：「您不愿意谈当时他们谈话的内容？」张则再度摇头拒绝，称：「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

[1]而后，美国之音记者也特别提出这个问题，并特别询问：是否周、蒋及您三人的单独会面对结束事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张的回答再度表现得很犹豫，称：「此事现在我应该说不应该说，你叫我想一想。」自然，他最后还是忍不住谈了几句，说：「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承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2]

张学良关于蒋、周会面欲言又止的态度，无疑更增加了人们的好奇感。而张所谓不愿意伤害他人，说到底不过是因为蒋介石、宋美龄都早有公开文章摆在那里，只字不提蒋、周会面之事，张不能不顾及当事人不愿提及此事的态度。不过，不管张学良的证言在披露令人倍感神秘的蒋、周会面内容方面能否满足多数人的好奇心，它毕竟证实了蒋、周会面的事实。这意味着周恩来的电报远较蒋介石的〈西安事变半月记〉更为可信。

周、张、蒋、宋说法各异迷雾未除

细读蒋介石〈西安事变半月记〉和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发现蒋、宋二人其实也并未直接否认周恩来有见到蒋介石之事实。台湾部分学者对此力持否定态度，很大程度上看来也是基于对蒋之崇信而发生的一种误判。所以有此说法，除张学良之言已证实此种判断不当外，具体讨论蒋、宋当年发表之文章，亦不难发现二人不过是有意避免提及此事，并存心在文字上预设迷宫而已。

已知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开始谈判为 12 月 23 日。双方谈判达成一定妥协并经蒋基本认可后，才有周恩来见蒋之可能。而蒋、宋、宋 25 日下午即离开西安，故周见蒋只能是在 24 日或 25 日蒋离西安前之两天之间。可是，蒋公布之〈西安半月记〉，这两天之记述十分简单，并无只字片语提到这方面的情况。[3]到是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隐约提到：24 日，张学良「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勉之史实。」[4]在这里，蒋以日记形式记述事变期间每天发生之事，却避而不提周恩来的介入与二人见面的情况；宋则隐约承认与周见面，却又强调因「委员长所不愿见」之故，如此文章自然难免会使人得出错误的印象。

不过，纵使我们能够确定周恩来见蒋之事实，依据周、张二人的说法，却依旧无法完全确定周恩来见蒋时所谈之内容，甚至也难以确定二人见面之时间。这是因为，目前公开谈到周见蒋谈话内容的文字，只有 1936 年 12 月 25 日晚蒋、张离开西安后周发给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电报文字十分简略，它只谈到五项内容。一是谈「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说宋子文绝对负责组织满人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同时两宋均保证停战撤兵，担保蒋停止剿共，准备改编后统一指挥，发动抗日；二是谈他见蒋情形；三是谈蒋、宋、宋要今日走，杨虎城和他认为应有一政治文件做保证，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飞洛阳；四是对形势估计，认为问题不大，宋子文很有诚意；五是强调仍应加强戒备，以防万一。在第二项谈他见蒋情形时只有简单几句话，即“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5]从上面的文字当中，我们显然无法判断周见蒋的时

间，而仅依周个人之叙述，我们也难以周所述之三条，即为二人谈话之内容。毕竟张学良有所谓只是周向蒋问候，自承部下，二人「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的说法。

蒋介石密档透露事实真相

1998 年夏，台北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对外开放。其中披露西安事变期间各种档案资料甚多，尤以根据蒋日记类抄编写之《困勉记》（卷四十）对蒋事变期间目睹及经历之史实，记述较为客观。比照蒋之〈西安半月记〉，不难发现前者重在记述史实，而后者则侧重宣传，为求宣传之效果，其在内容上自不能不有相当之修改与删节。对此，虽因篇幅关系，不能一一加以对照，但略做比较，相信多数读者亦可发现《困勉记》中所述当更为真实。[6]

如 12 月 23 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侥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等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在这里，蒋只字未提这时已是重要谈判对象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而《困勉记》依据日记则并未回避本日中共参加谈判之事实及周恩来已提出见蒋之要求等情况。称：「晨醒在床，语夫人曰『此事症结在共党，共党代表周恩来要求见余，余坚持之。今可令宋子文与之相见，察其态度如何再定对付方针。惟余终不愿与相见。如彼必要见，夫人可代见之。』夫人起床，召宋子文告以公之意。宋子文乃出。晚，宋子文入见，谓『已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会谈，无甚难题，惟要求委员长与之一见已足。虽不谈话亦可。』公乃令于明日十时与夫人相见。」

比较以上两者，不难看出其间的不同。由《困勉记》23 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可得两点重要收获：第一，23 日宋子文、宋美龄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乃得蒋批准而后行之。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宋美龄之时间可确定为 24 日上午十时，原因是周此前提出见蒋，蒋未同意，但 23 日谈判后蒋已松口，同意先由宋美龄接见之。

再如 24 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这里仍未见有任何提及中共及周恩来之处。而《困勉记》则明记曰：「上午，共党忽提七条件，并言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蒋先生在西安。公曰『是何与昨夜所谈者相反也？此必张学良故使共党作黑面，彼乃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乃嘱宋子文退回条件，并嘱转言『此条件不能视蒋先生也。』宋子文出，告张学良，张学良出而调解，未几，入见谓『已

痛斥之矣。共党不再言条件，惟要求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公乃允之，嘱张学良曰『尔必同来。』晚十时许，周恩来见夫人已，夫人导入，公已睡起，而与之握手相见，曰『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周恩来乃辞出。」

两两比较，亦可看出其显著之差异。而由《困勉记》24 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仍可得两点重要之收获：第一，周恩来第二次见宋美龄的时间可确定为 24 日晚十时前；第二，周恩来第一次见蒋的时间为 24 日晚十时后，且由宋美龄引见。惟因蒋已睡下，虽起而与周握手相见，但双方似未多谈周即知趣而退。

又如 25 日条，依〈西安半月记〉，内容如下：「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虑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营分校。」此段之内容与《困勉记》中所记大同小异，但后者则较详细地记述了蒋介石再度与周恩来会面及谈话的情节。称：「晨，宋子文入见。谓『张学良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委员长出城，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然后彼与委员长化装出城。』夫人闻之，往访张学良，曰『如委员长不离此，余亦不离此。』张学良乃允设法同行。十时许，周恩来又入见夫人谓『愿蒋先生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足矣。』夫人入告，公嘱夫人导周恩来见夫人与宋子文求公强允之，公不许。周恩来入，公曰『此语此时决不能说！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听命中央，受余指挥，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曰『红军必受命，决不破坏。』公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与汉卿详谈可也。』周恩来辞别，宋子文嘱以说杨虎城赞成蒋先生今日回京，周恩来允之。下午二时半，宋子文入见，谓『可行』。张学良亦入谓『杨虎城已不反对。』公乃命张学良招杨虎城入见。逾半小时，杨虎城入，公乃命张学良、杨虎城坐床前，切训半小时，训毕问『尔等之意如何？有否他言？』二人诺诺而退。公乃与夫人宋子文出城登机，时已四时半余矣。张学良愿同行，公却之再三，不得乃同登机。五时二十分到洛阳，宿军营分校，见高级将领已。乃睡。」

比较上述文字，其最大之不同点仍在记述周恩来的问题上。由《困勉记》25 日条，对蒋、周会面问题更有重要之收获两点：第一，可知周恩来有第二次见蒋，时间当在 25 日上午十时许。第二，可知周与蒋确曾谈到其当日电报中所说明之关键内容，即「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蒋对此则表述为：「听命中央，受余指挥，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至于周电所述其他二点，由宋、宋、张代表解决一切及蒋回南京后周可再直接去谈，想来更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是蒋或《困勉记》作者未详加记述而已。

听说大溪档案中原藏有蒋之日记，因多年前被蒋家索去，迄未归还，无从利用，不知是否事

实，但总令人遗憾。《困勉记》等，系根据蒋日记抄本分类加工整理之作，其真实性和客观性自较读日记有较大差距。但仅以此比较蒋之〈西安半月记〉，足以证实《困勉记》有更多利用价值。至少在西安事变期间蒋、周会面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可以据此以澄清以往的许多推测，并基本上得出肯定的结论，即不仅事变期间蒋、周确有会面，而且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两次会面的时间一次在 12 月 24 日晚十时左右，一次在 25 日上午十时左右。周恩来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谈到的与蒋谈话的内容，主要是第二次会面时的谈话内容。而双方的谈话，既不能说「政治上并没谈什么」，也没有如人们长期所猜测的，还有什么另外的对事变结束更为关键的内容。

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解放战争期间苏联是否向中共提供了军事援助，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个问题历来是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引人注目，却又长期得不到确切答案的问题。而在我们自己避而不谈的时候，我们却无法避免前苏联公布它所掌握的资料，更无法避免中国和世界的读者会去相信它的资料。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渐渐变得不那么敏感了。一些回忆录的出版和一些档案文献资料的公开已经或多或少地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当年曾担任过东北局重要领导人的陈云也曾公开表示过不能因为强调自力更生，就否认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过重要帮助的意见。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做秘书工作的胡乔木也肯定地说：当时“苏联在东北和我们配合默契，实际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1]但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广大读者，甚至是多数研究者，还是无法接触到中国方面保存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档案资料。由于看不到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又不能全面掌握前苏联的相关档案文献，今天的人们，无论在中国、在外国，自然也还是只能主要依据一些零星的资料来分析和认识这段历史。笔者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以下简称《恩怨》）一书中，就是把中国方面披露的片断的文献史料与前苏联披露的总体援助数字的文献档案结合起来，讨论这段历史的。

笔者不是研究军事史的专家，当然更不是专门从事东北解放战争史研究的专家。根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档案文献与回忆资料，对这一长期困扰史学界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和判断，不过是想从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做些学术探讨。而研究的结果，笔者既不赞成抹杀苏援的存在，也不赞成夸大苏援的作用。笔者的结论很清楚，即：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笔者的这一研究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和关注，也引起了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军事问题的刘统先生的重视，并且为其提供了一个可以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刘统先生的文章[3]（以下简称刘文）能够引用少量的档案资料，且注明了出处，这至少较过去有关的军史论文多了一些可信性，也为其他研究者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以参照的依据。就这点而言，刘文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在读过刘文之后，笔者却发觉刘文并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来讨论问题，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带着一种批判的意味，将笔者的努力一概否认。关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在

结语中坦率地表示，他写此文其实是想告诉读者，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的有些说法，同那些传记文学的作者一样，也犯了“热衷于编造‘秘闻’”的错误，“缺少严肃的治学态度，根据片面的材料和国外资料，提出一些‘惊人’的论点，来获取社会轰动效应”。[4]由于刘文的这种讨论已经超出学术范围，不仅涉及到刘文自己所说的所谓基本治学态度问题，而且涉及到学术评论乃至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问题，因此笔者非加辨正不可。尽管，这多少让人有些遗憾。

一、关于刘文讨论问题的方法

进行学术讨论，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实事求是。这就要求讨论者清楚地了解对方所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根据对方的确切意思来讨论问题，不能生吞活剥，张冠李戴，更不能搞莫须有和想当然。而刘文开篇的四段话就离开了这一最基本的前提。

刘文开篇四段话，第一段是介绍笔者《恩怨》一书中关于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的“论断”和引用的苏方资料。作为讨论问题，这是一种常见的切入方式，确有必要。第二段用“这个观点不是杨奎松先生的首创”，引出《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关于“苏联的援助是人民解放军力量壮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观点和苏方资料，文字上虽可斟酌，两相映照亦不为过。而第三段所谓“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持这种观点”的引语，就颇让人疑惑作者的目的所在了。显然，纯粹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提出第一段内容即可，补充第二段之情况加强讨论之力度也属正常。但随后举出“台湾国民党”的观点，就不仅是画蛇添足，而且多少让人怀疑作者的目的了。很明显，加上第三段，即使按照刘文自己的逻辑都不通。因为，按照刘文第四段紧接着得出的结论，即所谓上述三段“三方面的观点的依据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云云，细心的读者一望即知，那个“台湾国民党”方面参与接收东北的某官员回忆当年目睹苏军后撤时向佳木斯运送武器例证，与几十年后公开的苏方资料根本不搭界。说它“其实都是来自苏方的资料”，纯粹是霸王硬上弓。

刘文开篇四段，其实用的是一种归谬法，先把笔者的观点一步步归入应当否定批判的谬误之列，然后再一语定性。其定性的话也在第四段中，形式上是一句质问，即“东北解放战争真的是依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吗？”弦外之音十分明白，那就是：笔者、苏联、国民党，其实都是一个观点，即都认为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把笔者的观点同前苏联的观点相提并论，给人印象如何不难想见；再把笔者的观点等同于台湾国民党方面的观点，其效果更可想而知。但问题是：笔者何时何地说过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呢？刘文很清楚笔者的“论断”：苏援“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如果不是故意曲解，大概没有谁会认为这句话与东北解放战争是靠苏联援助才取得胜利的在语义学上是一个意思。

学术上有异议，提出来讨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我们对历史资料的判断和理解，对历史事实的认知，经常可能会有差别甚至不同。通过学术讨论，达到相互切磋，截长补短，深化研究的目的，是十分有益的。但许多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简单的批判，对正常的学术讨论反倒有些陌生。笔者欢迎刘统先生真正从学术角度商榷问题，尤其希望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一时期军史档案的刘统先生，本着尊重客观事实的精神，勇于面对苏联援助的这段历史。不是随意举出一个 1947 年 4 月和 1946 年 5 月底东北各野战军[5]武器数量之差，然后不加分析地告诉人们说苏军援助微乎其微，而是要依据中国方面自己的档案资料，全面地进行分析考证，具体地告诉读者：苏联当年究竟提供了多少援助，这些援助在解放战争期间起到了什么

样的作用，前苏联档案或俄国档案所举出的援助数字，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查证的，哪些是不大可信的，需要订正。显然，如果刘统先生不相信前苏联提出的援助数字，就应该从事这样具体深入的研究工作，而不是轻率地断言说那些讲到苏联援助的资料和观点都是编造“秘闻”，坚持认为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的加强与苏联的帮助根本没有多少关系。其实，历史研究的常识是，肯定容易否定难。一条史料就可以言其有，上百条史料也不能轻信其无。何况，有关这一时期苏援的史料已经披露者就不止十件八件，怎么能轻率地罗列几条没有得到或很少得到苏援的资料，就断言当年苏军既没有留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予什么帮助呢？

二、关于刘文中的史料运用

在历史研究上，任何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首先取决于对史料的掌握程度，其次则取决于对史料分析和运用的水平。由于无法接触到某些史料，以致对其他一些史料过于相信，造成偏听偏信的情况，这在历史研究中是一种可以允许的错误。但刘统先生以其特有的专任军史研究工作者的身份，在不少涉及苏援的档案文献已经公开，不少提及苏援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情况下，不能说不了解相关的史料。一方面有条件接触和了解更多更全面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一方面却任由主观印象驱使，为我所用；一方面批评别人不该根据片面的材料提出“惊人”的论点，一方面自己却以偏概全，无视史料运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这就是不应出现的错误了。

说刘文为我所用，以偏概全，有什么根据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刘文所说的情况，与《恩怨》一书中的相关内容略加比照就可以看出一二。

同样是讲贝鲁罗索夫中校到延安与中共中央交涉，刘文只讲贝鲁罗索夫正式传达的关于在苏军退出之前，蒋军及八路军目前均不应开进满洲的原则要求，却不讲在当晚非正式谈话中，贝鲁罗索夫表示只要不用八路军、共产党的名义，不打旗号，不与苏军接触，一切好办的意见，和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满洲就近交涉，协调行动的建议。给人印象，不仅“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而且刘少奇等匆匆决定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贝鲁罗索夫飞往沈阳，得出目前是“千载一时之机”的重大判断，进而制定十万大军开赴东北的重要战略部署等，都是在苏军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做出的，是受了陪同贝鲁罗索夫到延安的曾克林“非常乐观”的汇报的假像所蒙骗。

同样是讲彭真一行和各部队赶至东北，刘文只选用彭真 9 月 21 日电和黄克诚 11 月 25 日电，及彭真 12 月 30 日电，偏偏对《恩怨》一书中举出的东北局 10 月 4 日、5 日、25 日、28 日致中共中央各电只字不提。给人印象，中共军队最终只得到七五山炮 11 门，迫击炮 70 门，步枪 12000 支，机枪 300 挺，六五子弹 500 万发，七九子弹 40 万发，三八子弹 80 万发，手榴弹 15 万个，97 架日本飞机和皮鞋、帽子、大衣各万余。这点儿武器实在是“少得可怜”，“绝大部分日军武器库的装备都被苏军用火车运往苏联”。至于 10 月间东北局报告的苏军决定提供的那些武器弹药的情况，对刘文好象不存在一样。

同样是讲苏联援助问题，刘文所用电文资料只讲到 1945 年底便戛然而止，好像此前援助“少得可怜”，此后就更没有援助问题可谈了。一面否认苏方曾表示过援助，一面又承认苏军确曾许诺援助，只是落空。最后更是宣称：“东北野战军的炮兵，是靠‘拣破烂’建立起来的”，

飞机、坦克是自己“搜集、缴获”的，军工生产也是自筹粮食、资金，招收当地工人，使用日本技术人员“白手起家”的。与苏联在武器问题上发生关系，只是“在 1946 年底到 1947 年初这个时期”，但也不过是用粮食换了些武器过来。这段时期真正援助过东北野战军的，只有北朝鲜，而且数量也不多，虽无确切统计，比较 1947 年 4 月和 1946 年 5 月两次部队装备统计可知，枪至多不过万余，机枪至多不过数千，炮至多不过数百，如此而已。刘文好像完全不曾想过，在苏军占领下，少量枪可以拾，个别一两门炮可以拣，如刘文自己所谈到的成百上千门炮、97 架飞机，没有苏军帮助，自己怎么去“搜集、缴获”？至于《恩怨》一书中提到的 1946 年 3 月以后的苏援电报，和驻朝苏军随后大量向东北和关内输送武器弹药的情况，刘文就更是视若无睹了。

学术商榷，即是学术对话。对话首先就要有的放矢，也就是要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问题、观点和论据进行讨论。就历史研究论文或论著的商榷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直接针对被商榷者提出的史料说话。历史研究的观点，均产生于相当的史料之中。史料可靠，运用得法，观点自可成立；史料片面，利用不当，观点自会受到质疑。然而刘文的所谓商榷，却基本上是在自说自话。它把笔者以为依据的几个不同时期的具体史料放在一边不管，找出几件意思不同的史料，便批评笔者“无视这些事实，单纯依靠苏联的个别资料解释东北解放战争的进程”。问题是，《恩怨》一书此章 45 个注释，涉及与苏援有关的注释不止五分之一，除被刘文抓住不放的 251 页注释 1 以外，都是引述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只讨论一个注释 1，断言笔者的观点只出自此一则“苏联的个别资料”，然后就轻下断语加以批驳，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当然，说刘文全篇只讨论了《恩怨》一个注释，也不很准确。其实刘文还讨论了 235 页中东北局的一个报告，并且很“遗憾”笔者对此没有加注。该报告谈道，苏方已决定将抚顺一个军火库中的 300 万发炮弹交给东北局，并要中共赶快加紧组建炮兵。刘文因此批评笔者没有“军事常识”，说“300 万发炮弹是什么概念？东北野战军在规模最大的锦州战役中，共使用了 263 门重型火炮，是我军解放战争中集中使用火炮最多的一次战役。战后统计，耗费榴弹炮、野战炮弹 13469 发（小炮、迫击炮弹未计算）。我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重炮炮弹消耗的总和也不到 300 万发。”对于此一批评，笔者实在深为感谢，因为笔者确实不知“炮弹”这一名词在“军事常识”中是指“重炮炮弹”，不算迫击炮、六 0 炮、步兵炮、机关炮、平射炮、钢炮、山炮、高射炮等其他各种大小炮的炮弹。[6]只是，第一，此 300 万发并非笔误或抄写错误，确为当年东北局所报之数。[7]第二，当年东北党政军领导人也和笔者一样缺少刘文所讲的“军事常识”，因为他们在电报中也经常把迫击炮弹等不该称为“炮弹”的炮弹叫做炮弹。[8]不知刘文对此当如何解说？而这类炮弹的消耗，从 1946 年开始就已经相当惊人了。据 1946 年 2 月沙子岭战斗详报，此次仅一天三夜的作战，七个团就消耗了各种非重炮的炮弹 2074 发。[9]照此计算下来，300 万发是否还算是个离奇的数字呢？

刘文所以会无视商榷对象的论据，除了过于强烈的主观倾向左右其判断以外，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作者似乎并不完全掌握史学研究中的史料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取得第一手资料至为关键。但并非有了几件第一手资料就可以不加分析地拿来建立自己的观点。因为任何史料所反映的情况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两份电报说明不了问题。比如刘文所举 1945 年 9 月 21 日彭真电，其中表示对得到的武器装备数量感到失望，甚至认为“将来能否取得武器，还是个谜”。但不过半天之后，他在另一份与陈云合署的电报中就有了另一种说法，称沈阳市政府和奉天省政府我日内即可接收，已获武器虽不多，资财弹药却稍多，且“尚有获得大批武器之可能”。[10]又如刘文花了很多文字来描述东北军工如何没有苏联帮助，“白手起家”，意思大概是想证明说东北解放战争所用的武器弹药多半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刘文所用资料大部来自东北

军工部的工作报告，也理当可信。问题是刘统先生是否读懂了报告中所包含的意思，是否有所分析？刘文再三提到大连军工生产的作用，但它却像对待 97 架日本飞机的问题一样，没有想过大连当时是在谁的控制之下，难道不是苏军在为中共在大连的军工生产提供便利并充当保护伞？[11]而且，如果刘统先生对历史能够有所联想，有足够的经验，他更应当想到，假如东北的军工生产真是像他描写的那样，很少机器，只是招几个当地工人，利用几个日本技术人员，赤手空拳一年多就能造子弹数千万、炮弹数百万，那么抗战八年，延安等根据地也用了不少日本技术人员，也搞了一些机器，八路军为什么连黄色炸药都生产不出来，还只能靠游击战对付日本人？事情很清楚，东北的军工生产从制造大批子弹、炮弹直至钢材和冲压设备，没有哪一样不是借助于日本留下来的兵工、化工和钢铁工厂的基础。这些工业设备，又都是在苏军的控制之下，必须要由苏军提供便利才能取得，怎么能说东北军工生产完全是“白手起家”，与苏援无关呢？刘统先生哪怕稍微细心一点，就更应该能够从军工部的报告当中看到，东北军区后勤部军事工业部之建立，主要目的就是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及南满地区的工业企业，特别是兵工厂。[12]而军工部成立伊始，就接连从苏军手里接收了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只是由于后来苏军受到国民党的外交压力，要求中共所有单位撤出沈阳，这些工厂才又交回到苏军手中，但苏军还是允许中共东北军工部拉走了 30 多部机器和 200 多吨物资。同样的情况，苏军也先后将抚顺、本溪、辑安、鞍山、辽阳、延边等地及其兵工厂、化学工厂交予中共接收，中共撤出时更运出了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中共 1946 年 6 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 300 多车皮。[13]中共后来能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鸡西等地建立军工生产基地，能够大批生产并及时供应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也都与苏军提供便利甚至是提供帮助有关。讲东北解放战争，怎么能完全不考虑这一极大不同于延安时期的特殊背景呢？对于这一点，刘统先生只要在分析他所看到的史料时，稍加推敲，就应当可以想到。

三、关于苏援及其转交武器数字的简略分析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深入讨论解放战争期间苏联在东北提供援助的各项具体例证。[14]但针对刘文武断否定苏援的态度，在此仍有必要简略地讨论一下有关苏援的基本史实问题。

必须承认，目前无论是根据俄国解密的档案资料，还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档案资料，我们这些外围的研究者，都还难以将当年苏方提供军事援助或帮助的详细经过描述出来。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根据已有的中俄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肯定解放战争期间苏方提供过相当程度的军事援助。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怎么看当年部队领导人表示不满的个别电报呢？

当年部队领导人确实有过对苏援不满的电报。但既然是研究历史，就要注意分析：第一，是哪些部队不满？第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满？就第一点而言，曾克林部“非常乐观”的看法就与黄克诚部十分悲观的看法有所区别。[15]之所以会产生区别，就是因为两支部队进入东北的时间不同，他们所体会到的苏军态度和得到援助的及时程度也不相同的缘故。换言之，我们应当可以看出，苏军并非所有时候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就第二点而言，刘文所引彭真和黄克诚表示不满的电报的时间，一是在 9 月 21 日，一是在 11 月 25 日，而《恩怨》一书所举的彭真等高度兴奋地准备接收大批武器并与苏军合作的电报，一是在 10 月间，一是在 1946 年 3 月以后。这更进一步说明，苏军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在有的时候“相当恶劣”，在有的时候相当友善。对苏军态度及援助问题，不能仅以一时一地的资料一概而论。刘文显

然忘记了对问题应当做这样的具体分析。

那么，苏军的态度何时好，何时不好呢？刘文说：彭真到达沈阳后，就"发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刘文对这句话既没有加引号，也没有注出处。以当时苏军最高司令官刚刚派联络官前往延安，并将彭真等人接来沈阳，此前对曾克林等八路军态度相当友好的情况判断，笔者对此点颇有些怀疑。当然，即使不看刘文，从曾克林、聂荣臻、伍修权等人的回忆录也可以看出，9 月下旬这段时间苏军的态度，确和中旬以前的态度有了不小的区别。只是，真正让中共一些领导人感到"苏军的态度相当恶劣"的时间，还不在这时，而是在 1945 年 11 月 17 日以后。因为那时苏军真是蛮不讲理地把中共军队从城里往外驱赶，确让许多中共部队的干部深感寒心和愤慨。问题是，这毕竟只是个别时间的情况。即使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刘统先生，所能举出的当年部队领导人对苏援不满的文电，也委实寥寥。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文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妨在下面简单地以苏军态度冷热做一时间的区分。

第一阶段是 1945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这段时间苏军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双方不仅有过协同作战的情况，有过盛大联欢，而且中共军队还被接入沈阳等各大中城市，让其担负城市卫戍任务，准其接收政权和重要工厂及武器库等。

第二阶段是在 1945 年 9 月下旬前后。这十几天时间里苏军发现美军准备在中国华北登陆，为在外交上立于主动，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第三阶段是从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中旬期间，这期间因发现美军不仅不打招呼，而且完全不顾苏联态度，在紧邻东北的华北地区大举登陆，因此怀疑美军有意在苏军撤退后进入东北地区，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中共大规模进入城市，接收政权和工厂、武器库，甚至直接接防苏军允诺国民党军登陆的沿海口岸，武装拒止美舰运载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上岸，都是在这一时期。

第四阶段是 1945 年 11 月 17 日至 1946 年 2 月中旬前后。这时国民党发现中共军队已经开始先期进入中心城市并占据交通要道，进行接收，遂采取断然措施，撤退东北行营，并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苏方撤军不成，迫于外交压力，不得不考虑与国民党进行外交和经济谈判，力图与蒋介石达成妥协。为此，因急于与中共撇清关系，苏军不顾中共方面的反对与不满，在一些地方采取了强行驱赶中共军队出城的做法。

第五阶段是 1946 年 3 月以后，由于美国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苏联与国民党谈判不成，苏军态度再度改变，全力推动中共抵抗国民党进入东北。故其撤军时处处让中共预先接收，抢占先机，并主动提供了许多积极的帮助。在此以后，苏联与美蒋交恶，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逐渐趋向稳定。

由上述说明可以看出，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过程中，苏方态度"恶劣"只在个别时段。除了第二、四两个阶段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以外，其他三个阶段三年左右时间苏军对中共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论其利益着眼点是否与中共不同，但其放手让中共发展，甚或帮助获取武器的态度是明显的。否认中共有过不满固然不可，只根据上述两个阶段的一些言论就否定存

在着苏援的事实，显然更不可取。

既然苏援是事实，那么当年苏军到底向中共转交了多少武器装备呢？严格地说，刘文也没有完全否认存在着苏援的事实，只不过它的看法是，即使有，苏方也是有条件的、不情愿的，并且“少得可怜”，对战争进程不起任何作用。苏军当年转交的武器真的像刘文所说的那么少吗？这是笔者要进一步稍做分析的问题。

首先，我们应当了解，前苏联档案所讲当年苏军转交的武器数，既包括给东北野战军的，也包括通过东北方面转交给华北、乃至西北等关内部队的，因此不能像刘文那样，只拿东北野战军自身的武器增长情况来判断苏方资料的可信与否。关于此点，《恩怨》一书中其实已有所说明，在此仅具体补充三点资料以引起重视。一是 1945 年 9 月 21 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16]实际上，这时来自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的这种电报还有不少，大都谈到与苏军合作及获取武器帮助的问题。二是曾克林回忆提到，9 月及 10 月，他所在部队曾不止一次地将他们在沈阳、锦州等地接收的大批武器弹药，转运给了关内的部队和山东的部队。[17]三是 1946 年 5 月 20 日东北局曾致电中央，说明苏军坚决支持东北野战军死守四平，并已经指示驻朝苏军立即提供弹药应急，并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希望中共能够组织海上运输，从东北向山东运送武器弹药，说要多少给多少。随后驻朝苏军即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了第一批武器弹药。5 月 28 日，第一批 82 挺轻机枪，32 挺重机枪，43 万发子弹和一万箱炸药及大量电器材料等即由海路运往山东。至 6 月下旬初即已运送三批。以后运送则更为频繁，数量也更大。到 8 月间，步枪已达数万支，机枪达上千挺，最多一次朝鲜苏军即提供了上百车皮武器弹药。对此，刘统先生并非完全不了解，但却断言这些事情只发生在 1946 年底 1947 年初中共部队最困难的一个短暂时期，并且坚持说苏联和朝鲜的态度大相径庭，苏联不仅两度拒绝帮助，后来同意也是要求以粮食作为交换，而朝鲜方面却“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然而已有的资料却显示，至少在 1946 年，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得到粮食已经是 10 月下旬的事情了，此前除了中方发现苏军好饮酒故建议山东军区找些白兰地过来以联络感情之外，并未见任何以货易货的问题提出。与此同时，除开始两三个月以外，中方从朝鲜政府方面获得的，也主要是其炸药厂生产的炸药，并且是用朝币买的，虽然价格低廉，但说完全“无偿”，似乎也不尽然。以上情况都表明，计算苏方转交武器数，不能只拿东北野战军武器装备增长的数字来对照苏方数字，必须考虑到这些武器装备的相当部分已转运到关内去了。

其次，计算苏军当年转交中共武器数，不能只拿 1945 年底以前的个别数字做论据，也不能只计算 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 4 月之间的差数，甚至不能简单地拿不同时期东北野战军实有武器数相加减，还应考虑到因种种原因受到损失的数字。事实上，刘文提到李运昌部从叶柏寿及马三家向锦州那次运送枪弹物资，路途上被截留、偷盗和私拿就相当多，“大部武器在运送过程中遗失”。我们不能因为黄克诚部仅得 1200 支枪，就无视苏军当时曾转交 12000 支枪的事实。[18]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军队出关最初的一年里发生得相当多。不考虑这些情况，仅以 1945 年底以前的两个电报中的数字作为根据，断言苏军转给中共的武器“少得可怜”，显然是过于轻率的。况且，只举出 9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两封电报中提到的武器数，也并不能据此就断言说 1945 年底以前中共所得武器只有这么多。注意一下刘文所引彭真 12 月 30 日的通报文字：“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弹药物资（七九子弹 40 万发在内），三八子弹达 80 万发，手榴弹 15 万个”，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所以把“七九子弹 40 万发”括起来，显然是因为在前面已有过通报。这至少说明，在 1945 年 9 月 21 日至 12 月 30 日之间，绝非只有

这两封电报谈到过苏方转交武器弹药问题。事实上，刘文随后所举李运昌之报告也能够说明，彭真 12 月 30 日电报所提到的李运昌部运送的那批武器弹药，也并非就是当时苏军在东北转交中共武器之全部，因为它不过只是总部离沈阳后，将原存沈阳总部的物资西运至“叶柏寿及马三家”的那一部分而已。再仔细注意一下刘文所举李运昌报告黄克诚师得到的武器当中，我们也能够发现，有些武器就不是刘文所举 9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那两份电报中所列的东西。[19]很明显，仅仅依据 9 月 21 日和 12 月 30 日两封电报，要证明苏军转交的武器“少得可怜”，是无法成立的。要说明 1945 年底以前到底有过多少苏援，不说明 1945 年 9 月下旬以前中共出关部队得到武器的情况，和 1945 年 9 月下旬至总部离沈，即至 11 月下旬之间所得武器的情况，是不行的。

1945 年 9 月下旬以前出关部队得到过多少武器呢？仅据曾克林回忆，当该部被苏军迎入沈阳后，苏军就已将沈阳兵工厂，及沈阳、抚顺、辽阳、本溪等地的军火库、军需被服仓库等交给了该部，甚至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也交给了该部。当然，9 月下旬苏军态度转变，又将这些仓库大部收回。但该部还是运出步枪 20000 支，轻重机枪 1000 挺，和 156 门各种炮，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将一部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此后，该部仍陆续利用没有交回的仓库取运武器，包括拉出一批军火于 10 月前后“发给三五九旅和山东鲁中部队、胶东部队和延安来的教一旅等部队”和“用船向山东龙口送去一批武器、弹药，其中有 500 万发子弹、炮弹”。[20]该部甚至还完整接收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21]与此同时，进入承德、滦平、叶柏寿、朝阳和山海关、绥中、兴城、锦西、锦州、锦县、北镇、黑山、新民等地的中共军队也得到了大量武器。仅进驻锦州担任卫戍任务的周家美部 500 余人，就在苏军的协助下，通过解除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 5000 余人的武装，获得火炮 28 门，轻重机枪 216 挺，步枪 3200 余支，手枪 150 余支，炮弹 100 余箱，子弹 500 多万发，汽车 20 辆。另外，“苏军还从缴获的日伪武器仓库中，交给卫戍司令部大批武器弹药，计有各种火炮 50 余门，轻重机枪 480 余挺，步枪 1 万支，手枪 200 余支，各种子弹 500 多万发，以实际行动援助中共军队。”[22]曾克林一部原仅 4000 人，一举发展到数万人，并仍能以大量武器装备运送给其他出关及关内部队，可见中共这一时期所获得的武器数量绝非“少得可怜”。

同样，彭真等到沈阳后，也仍旧陆续得到大批武器。除 9 月 21 日电所报告之数字外，其 9 月 30 日又告“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次日再告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八十门，迫击炮百余门，子弹稍多”。特别是 10 月 3 日与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会见后，整个情况更加乐观。正如东北局 4 日致中共中央电称：“苏军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受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23]这里的所谓“此间家务”，指的就是在东北的全部日军武器。所谓现在只能接受一部分，是因为这个时候在东北的中共部队还不够多，几十万装备拿不了。即便如此，也还是拿了一部分，这就是《恩怨》书中所讲会谈后一次得到的步枪 30000 支，机枪 100 挺，大炮 15 门。也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考虑到苏军即将撤退，只能代为保存一月，东北局因此明确电告中共中央，说这里的武器数量极大，全部交给我们确系远方（指苏共中央）决定，要求中央下最大决心抽调 30 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东北，以便接收“大批武器”。到 25 日，东北局更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苏军要求中共速派人接收东北工业中心城市及其各工厂，苏军除已搬走者外，都交中共，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以使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 300 万发炮弹可供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在此期间，中共陆续运出了一些武器弹药，但因各地出关部队还在路上，大量的武器库也只是派兵看管而已。随后因

11 月 17 日国民政府撤退东北行营，苏军态度改变，致使许多已经接收到手的武器库和兵工厂等，又重新被苏军收了回去。因此才会有黄克诚等部虽赶来东北，却未能很快获得想象中的大批武器的情况。

但此后自 1946 年 3 月初起，苏军态度再度转变，并且十分强硬，坚持中共应该全力阻止国民党进入东北，为此特将沈阳以北地区全部交给中共接收，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因此再度得到大量武器装备。只要比较一下刘文所举 1945 年底与 1946 年 5 月这两个时期东北部队的武器装备增长情况，就不难了解在此期间中共得到了多少武器。据刘文称，1945 年底中共出关部队的武器数为：步枪 39641 支，轻机枪 1139 挺，重机枪 105 支，掷弹筒 59 支，迫击炮 64 门，其他“能够用于战斗的重武器如榴弹炮、坦克、飞机，更是一无所有”。[24]几个月后，部队有长枪 160881 支，轻机枪 4033 挺，重机枪 749 挺，各种炮 556 门。[25]两相对照，在此前后各部队得步枪超过 12 万支，得轻重机枪 3500 余挺，得掷弹筒近千支，并得各种炮 492 门。而尤其需要了解的是，1946 年 5 月底这一统计数字，是在东北部队几乎全部主力在四平及本溪作战遭受严重失利之后的数字，必须把战争中损失的装备数加上去。而此次作战，仅人员损失就将近 20000 人[26]，不少部队甚至丧失了战斗力[27]，再加上撤出战斗时极其艰难紧张，北撤时又遭受追击，以致“散的散，叛变的叛变”，逃亡现象十分严重[28]，武器装备的损失自然很大。如果把战争损失的武器，和林彪等战役发生前所报尚未装备部队的库存武器数加上去[29]，1946 年初的几个月里中共得到的武器数显然是颇为可观的。如果在此基础上，把刘文所列 1947 年 4 月部队装备增长的各项数字加上去，再把 1946 年以后陆续运往关内的武器数，和 1947 年以后我们还不十分了解，但明显存在的其他可能的武器数加上去[30]，说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似乎并不为过。[31]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并不认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一定就是中共接收到的数字。笔者之所以强调苏方提供（不论有偿还是无偿）的武器足够装备几十万人，就是对前苏联的数字有所保留。因为前苏联公布的数字，即 70 万步枪，12000 挺机枪，4000 余门各种炮及 600 辆坦克等，按当年中共东北野战军的配备，已足够装备上百万人的部队了。[32]但这并不等于说苏方的数字一定是编造的。在这里，真实是相对的。因为在当年那种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势下，苏军一会儿把一些武器库交给中共，一会儿又把一些武器库收回来；今天将一批武器交给中共，明天又将一批武器搬往北方；在察哈尔、热河这样做，在东北诸省那样做，在北朝鲜又是另一种做法，如此等等。再加上初时苏军纪律松弛，实际负责看管或上报的单位五花八门，一些人责任心不强，甚或有心邀功，上报数字与实际有较多出入并不奇怪。对后来的俄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当年已经把统计表上的这些日本军火都交了出去，至于这个数字准确与否，每次交给了谁，何时何地怎么交的，是不是确实交给了中共，移交或搬运中是不是有所损失，其中多少已是废品，对他们来说都不重要。真正有必要关心和弄清这个问题的，首先应当是中国人自己。

然而，前苏联公布这些数字距今已经有 30 年了，海内外众多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相信它们也已经 30 年了。奇怪的是，身为受援方，又不同意这些数字的中国方面，迄今并无任何具体澄清的系统研究，甚至几十年来连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都未见发表。既不便开放相关档案，提供人们进行研究对比，也不鼓励相关研究者做深入探讨，弄清史实，结果，在涉及到苏援问题的各种档案文献、回忆资料在国内外以各种方式被逐渐披露出来的今天，笔者试图略做尝试，自然也就会出现像刘文这种全盘否定式的回应。

其实，拒绝接受俄国档案并非自刘文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俄国档案陆续开放以来，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与我们过去的解释不同的文献史料。对此，多数学者的态度是欢迎的，他们会把任何新史料的披露都看成是深入研究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总是有少数学者像刘统先生一样本能地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过去的认识，因此坚称俄国档案"不可靠"。笔者在此想要介绍给这些学者的一个值得记取的例子是，我们九十年代初研究抗美援朝出兵问题时，常常会引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所公布的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以便说明毛泽东这一天已经表明了决心出兵的态度。但是，后来俄国学者在俄国总统档案馆中发现了 10 月 3 日由毛泽东口授，苏联罗申大使记录并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原件，并将其公之于众，于是毛泽东 10 月 2 日电报的真实性很快受到怀疑，甚至中国政府公布文献的可靠性也立即成为美俄等国报纸炒做的题目。面对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档案保管及文献研究机关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而是主动配合国际学术界查验并提供了毛泽东 10 月 2 日电报稿原件的复印件。经过将两份档案原件的复印件认真比对和研究，最后中外学者达成了共识，即两份文献都是真实的，不过中国方面公布的 10 月 2 日电报稿实际上并没有发出，发出的是 3 日罗申记录的那份电报。从这件事当中，我们似乎应当可以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可能与我们过去说法不同的东西，不论它们是来自俄国，还是来自我们国内。

随笔杂议

说"谢谢"不容易

——台北印象一

刚到台北，住进中央研究院的学术活动中心，早上起来下楼吃饭，要了一份小米粥加豆包，按照价目表伸手从兜里摸了 40 元台币递到柜台里面，只见那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舞动着两只裸露的皮包骨头般细白胳膊的厨子，一面敏捷地接过钱丢进钱箱，一面从嘴里响亮地吐出两个字来："细细！"

"细细！？"乍到台北，多少还有点不适应，一下子没反映过来。眼见他转过头去笑容可掬地同后面的顾客打招呼，我急忙端起盘子溜到一边去了。

当然，等到第二天早上吃饭时，我对这两个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因为我一天里经常会听到这两个字，只不过，那不是"细细"，而是"谢谢"。

把"谢谢"读成"细细"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多少有些让我们这些听惯了普通话的大陆人感到有趣的是，不少台北人会把这两个字平均发音，并且有人会把后一个字念得更重些。甚至，

有些叠声词的发音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哥哥”会被读成“戈格”，爸爸会读成“把拔”……，听起来有些嗲嗲的，也难怪有些年长些的台北朋友不承认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台北人目前讲的“国语”，照理说与大陆的普通话没有太大差别。至少和大多数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交谈，不会有任何语言上的障碍。当然，有些字的读音还是有差别的。比如，我就曾和台北的朋友讨论过，“淑”是发“书”的音呢，还是发“熟”的音。争论的结果，在他们的国语字典里，“淑”同“熟”，而在大陆的字典里，“淑”同“书”。又比如，一次有位朋友告诉我，他嗓子有些不适，我表示他可能有“炎症”，而他立即否认，说不会，只是偶感风寒而已。其实，偶感风寒，使嗓子发炎，并不矛盾。讨论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弄明白，原来在台湾，“癌”字音同“炎”字，说“炎症”，会被人理解为“癌症”。

在台北，因为年纪和工作的关系，同年轻一辈有不少交往，我发觉他们的国语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除受闽南话的影响，“四”“十”不分、“疵”“吃”不分，把“二”读成“恶”的情况较为普遍以外，他们使用的一些习惯用语也很有些独特。比如，我们要麻烦别人的时候，往往会说“对不起”，而他们则通常会说“不好意思”；我们说“很”什么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说“蛮”什么；我们在讲做过哪件事时，一般只要在关键动词后面加个“了”字就好了，而他们通常会在那个动词前面加上一个“有”字，像“吃了”，他们会说“有吃过”；“看见了”，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有看见”，“跟他讲了”，他们要说“有跟他讲”，如此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差不多在叙述某件事情或讲述某种看法时，通常都会频繁地使用一个口头语：“那”。尤其是在正式些场合里，说不了几句话，他〔她〕一定要搬出一个“那”字来，“那我想……”，“那台湾的教育……”，“那每一个人……”，好象不用“那”字来引导，下面的话他〔她〕就说不出来似的。

注意到台北人的“国语”正在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我这个“大陆仔”。来台北几天以后，为了看档案方便，我搬到国史馆的招待所里去了。正巧香港科技大学的齐锡生教授也住在那里。齐教授是 50 年代从台湾远渡重洋到美国去留学的，虽然在美国教了二三十年书，然后又到香港教书，毕竟是从台湾出来的。他也很感慨地注意到如今台湾的“国语”同他们那个时候所说的“国语”有很大的不同。他告诉我说，现在台北电视台里面那些主持人或播音员说话的语调都与他们所学的“国语”有很大不同，不仅句子重音后移，而且语调趋向软化。

不过，更让齐教授感慨的，还是如今的台北人的礼貌。用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如今的台湾人真是客气多了，连上下公车（指公共汽车）都会说谢谢，当年可不是这样”。

台北人如今喜欢说“谢谢”是因为语言变化，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这个问题一次在政治大学学苑宿舍旁边一家影带租赁店里我与那里的小老板也聊起过。记得那位有着大学学历的小老板的看法别俱一格，他的解释是：“台湾人的性格很温和”。我当时脑子里就打了一个问号，因为我立即想到的是时常发生在议会里的那些胳膊腿横飞的“肢体冲突”，和电视政论节目中经常可以听到的那些充满火味药的激烈语言。而小老板的答复再度让我有些意外，他说：“那是做秀，是政客们做给自己的选民看的。”回去想想，也不无道理。

不管如今台北人的客气是怎样来的，身在其中你会感到，他们的那种客气并非仅仅是挂在嘴上的。记得在国史馆住宿时，有一次外出上街我把房门钥匙丢在外面了。第二天去见负责接待的陈秘书时，我难免忐忑不安。想不到我把情况讲明后，陈秘书首先担心的不是钥匙丢了会给国史馆带来什么样的麻烦，而是关心我头天晚上是否得到了很好的休息。紧接着，得知

情况的总务处长当即决定赶紧再为我配一把钥匙，并抱歉地对我说，这样可能白天我的房门就不能锁了，但他保证不会丢东西，请我放心。事后，他们甚至没有向我收取重新配钥匙的钱。

类似的服务，在台北遇见过很多。有一次，我在一家电脑连锁店想找一架可以用于近摄的数位相机，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店员不厌其烦地把几种不同规格的相机一一在电脑上为我做演试，清晰度我都不大满意，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很是过意不去。想不到最后小伙子反倒是一脸歉然，连声说："真是不好意思，没有给您帮上忙，还耽误了您的时间。"我在北京也是经常逛商店的人，我的印象当中，如果你挑了半天一样不卖，不要说商家向你道歉，不看到对方的白眼已经算谢天谢地了。因此我不能不生出一种感慨：不知道大陆上的服务什么时候也会普遍提升到这样的水平。

提升服务到自觉的程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凡事要习惯才能成自然。就像说"谢谢"两个字一样，看起来简单，但你要是想把它们常常挂在嘴边上，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台北的最后一个月，我经常要坐国史馆的交通车，每到下车时，与我同站下车的林小姐都会很自然地大声向开车的先生说声"谢谢"。由于在北京坐惯了公共汽车和单位的班车，从没有道谢的习惯，因此，记得我第一次几乎是下意识地跟着林小姐说出来的"谢谢"声小得像蚊子叫，以后我虽然刻意提高了嗓门，但直到最后一次下车时我觉得我说出的那两个字还是不那么很自然。同样的情况，在不少类似的场合，尽管已经相当注意，我事后还是会发觉自己本应该说声"谢谢"却不习惯于张口。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位文质彬彬，有着学者模样的厨子，耳边又响起了他那响亮的"谢谢"声。我希望，下次再去台北时，我说"谢谢"时会更习惯一些。

"男生"、"女生"

——台北印象二

来到台北，就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嘴里提到什么"男生"、"女生"。在我的印象里，"男生"、"女生"的概念只是针对在校的年轻男女学生而言的，但在台北，人们却经常拿它们来泛指男人、女人。一次在中研院近史所招待日本东京大学著名教授滨下武志的晚宴上，听着某位教授"你们男生……"、"我们女生……"的说个不停，看着在坐头发花白的诸多教授，不免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以后，我和台北的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她们的解释很简单，用"你们男士"、"我们女士"太过严肃，用"你们男人"、"我们女人"不够文雅，用"你们男的"、"我们女的"也嫌不甚礼貌，于是人们会把学生时代的这种用语沿用过来，既可以给人一种亲切感，也可以让人感觉年轻。于是，在台北停留一个月以后，我发觉自己在习惯性地提到"男的"、"女的"的时候，有时候竟也会突然停顿下来，想一想要不要换个更雅致些的说法。

提到“男生”、“女生”，我不由得会想到那些在周六周日一早就背着书包，赶往各个补习班的孩子们。台北孩子们补习功课之盛行，从台北市大多数汽车站牌的广告都是补习班广告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周末的上午，台北的商店多半要到 11 点左右才会开门，而在街上三五成群去上补习班的孩子们就成了周末上午台北特有的一道风景线。和前几年大陆上中小学一度盛行过的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相比，台北这里只是不允许学校借办班来创收而已，但孩子们的负担大概是一样的。

台湾重视教育，我在 1995 年访问时就有所耳闻。当时一位县里的官员很自豪地介绍说，他们不会让一个孩子失学，哪怕在某座偏远的山上只有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会派老师去为他上课。政府其他的钱可以少花，教育的钱不能省。对教育的重视，甚至会反映在汽车站牌上。我住文山区政大时，经常会坐 236 路公共汽车，全程 37 站，以大中小学校命名的车站就有 12 个之多；住南港中研院时，坐 205、276 路公共汽车，全程 50 余站，以中小学校命名的车站不少于 10 个。我在台北市公车导游图上约略数了一下，以大中小学校命名的台北的公共汽车站竟有百分之十几之多。可以想见，就象台北餐馆里喜欢标明“招牌菜”一样，既然学校都已成为某一地方或某一地段的“招牌”之物，它的校舍、设施自然也不会差。唯一让人感到有些遗憾的，是台北中小学校体育设施虽然齐全，也从未见过学生们跑到马路边去上体育课，但我所见过的学校大都没有足球场，反倒是并非本地人特长的蓝球场随处可见。影响到世界杯足球赛时，台北的大小“男生”、“女生”们反映平平，以致台北的电视台也仅仅在半夜以后才会有那么几场关键场次的转播，其他评论、分析、精彩进球……等，一概没有。结果，那些天我只能想办法在新闻节目里去找比赛结果，让人扫兴。

其实，在台北，孩子们玩的时间也还是有的。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早已取消，初中升高中的考试据说也在取消之列，最后剩下的就是考大学了。而整个台湾今年的高考升学率已经高达 70％左右，用那些我在台北的朋友的话来说，如今的孩子只要能进考场，想要不上大学都难了。在这种情况下，相信孩子们的学习压力不应当很大。当然，升学率如此之高究竟好不好，即使在台北也是人云亦云，尤其是那些当年奋力打拼才考上大学，如今已是教授级的“男生”“女生”们，通常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如今那一所所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大学。由此可知，那些把周六周日花在补习班上的孩子们，心里想的大概并不是要考上大学，多半是想要考上理想的大学，甚或想到国外去读书，以便将来能有好的出路。

不管升学率过高好还是不好，台北的孩子爱读书给我很深的印象。在我去过的国家和地区，印象最深的是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那里的人乘地铁一多半都会读书或看报。我就算是比较爱读书的人了，但我向来还没有养成抽空儿在车上看书报的习惯。除了俄国以外，台北的年轻人爱读书也令我有些吃惊。

台北的书店很多，最大的如“诚品”，不仅规模大、联锁多，而且设计布局都别巨匠心。“三民”、“联经”等规模也不算小。至于其他各种名目的书店，乃至租书店，在台北就更是星罗棋布，给人一种遍地开花的感觉。尤其台北车站附近的重庆南路上，要数清楚那里大大小小的书店、书局和图书公司的牌子都难。

我在国内经常逛书店，到海外公干也喜欢去书店转转。到台北后，习惯依旧，一赶上双休日，不论有无应酬，我通常都会抽时间到书店去看看新书。第一个周日依照朋友的指引，来到台大附近的新生南路，一连进了五六家书店，发觉家家都人丁兴旺，而且颇多少男少女。由于那里临近台湾最有名大的大学，故以为可能有些例外。因为台北的朋友也说目前台湾的图书

市场不很景气。想不到后一个周日自己去重庆南路，一连进了七八家书店，给我的感觉依旧是门庭若市，而且触目皆是二十岁上下的小“男生”、小“女生”。一次应酬前后两次同进一家书店，竟发觉有些小男女竟三个多小时没有动地方，只是姿势略有变换而已。

以后去台北大小书店的次数多了，对此也就习以为常了。因为台北的书价较高，碰到那种想看但又没有保存价值的书，我有时也会在书店里站到天昏地暗才离开。回到北京，我又再度几次进出书店，比较感觉，发觉果然不差。一是我们的书店如今比台北冷清许多，二是北京书店里的人大多是中年人，把周六周日花在书店里的年轻人少得可怜。不管台湾的教育导向是否尽如人意，如此多的年轻人喜欢读书，仍旧令人羡慕。

比较台北的书店与北京的书店，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英文版图书通常有一定的市场。我这里所讲的英文版图书，指的是由欧美国家的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读物，它们在“诚品”这些较大型的书店里，竟然也有较多的读者和稳定的销路。严格说来，台湾岛小多山，又没有理想的海滩，旅游资源十分有限。在台北两月有余，从未见到过在北京经常可以见到的成群结队的外国观光者，零星在闹市见到几个外国人，也以黑人为多。因此，这些外版书明显地不是卖给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

外版图书站得住，除了价格上与台版书相差不多外，最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因为台北的“男生”、“女生”中能够阅读英文书的人比例较高。这一方面可能与台湾重视高等教育有关，另一方面大概也与台湾人出国留学的风气较盛有关。

台湾留学的风气一向很盛，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还很落后的情况下，留学就是许多台湾人的梦想，并且从此一去不回。像如今在美国各大学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华裔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其中相当多数就是当年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后留在那里生活的。台湾留学生大批开始回国工作，也是近十来年的事情。因此，台湾虽然没有经历十年“文革”，它的学术界却也存在着“断层”的现象。近史所有成就者要不然就在 60 岁以上，要不然就是 50 岁以下，50 多岁留学归国的很少。

大陆的出国留学热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才兴起的。十几年来，大多数出国留学者也都留在了国外。为什么，记得几年前一位在学术界颇有名望的老先生夫妇俩均患重病，唯一的儿子抽空回国尽孝，问及今后的打算，表示仍要回去；问其是否有适合的工作，答曰所学专业在英国找工作甚难，仅在餐馆打工；再问何不回国工作同时也可照顾老人，答复是：孩子已经不适应回中国的生活了。不过他最后又意外地补了一句，说：“其实，在英国打工不像你们想象的，收入不低，我家就有两辆本田轿车，双排汽的。”由此也可以想象到当年台湾人为什么大多选择在海外生活。

不过，八十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已相当发展，物质生活及研究条件极大提高，再加上在海外谋职因大陆留学生多，更占优势，回台者逐渐增多。仅近史所，年轻一代研究者当中，就有一半是从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各大学的教授中，也有相当数量是这种情况。由于“洋博士”多，再加上这些年本省培养的“土博士”也与日俱增，外语程度高在台北这种政治文化中心地区自然不可避免。在台北开会，你不时会听到那些年轻的主讲人嘴里蹦出一两个洋文来。多少有些让人纳闷的只是，嘴里洋文蹦得多的，多半都是些“女生”。

此次台北之行，“女生”雄起给人强烈印象。由于各机关多年来实行考试录用制，在台北你

大概不会听到如同大陆那样的抱怨，说是招收单位重男轻女。在台北现在令人担心的怕不是重男轻女，而是重女轻男了。因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女生”在考试方面的特长经常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不少“男生”名落孙山，过去男性为主的机关渐渐已成女性居多。以国史馆为例，近 100 名左右的正式工作人员当中，如今“男生”人数仅占四分之一强。

“女生”雄霸一方的局面，已不仅仅是在国史馆。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师范大学等大学文史专业的学生，特别是研究班中，“女生”人数如今也往往超过了“男生”，有的老师会慨叹：他的课堂上清一色是“女生”！就连中研院近史所这种过去从来是“太史公”们指点江山的地方，如今也一分为二，成了男女平等的好去处。除去 10 位左右六十以上的老先生，其余近 40 位年轻些的研究人员一半已是“女生”。有时开学术研讨会，你会发现在报告人连同听众当中，“男生”之少几乎快成了点缀。我在国内国外参加过许多学术会议，这种情况从未见过。

“女生”阵容如此发展，究竟利弊如何？我在台北多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听到的意见也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被我问到的人，至少有一半表示，“男生”未必比“女生”强。而这并非只是“女生”的看法。在台北的史学界，巾帼不让须眉以致于此，令人称绝。然而，想想近几年来大陆文史学科“女生”也渐增多的情况，我有时候真会怀疑，台北是不是真的领潮流之先了。日月轮回，也许百年之后，史学泰斗真的应该不是“太史公”，而改“太史婆”了？

可怕的“第四台”

----台北印象之三

因为爱看电影，我坐长途飞机最怕坐在离投影屏太远的位置上，前面隔着十几、二十排人，屏幕又小，又没有坡度和错位，伸着脖子探头探脑，那滋味太难受了。早就听说在有些波音 767 客机上，每位旅客的眼前都有一部液晶显示的电视可看，却一直没碰上。这回从香港转乘华航的飞机，却意外地有了这番小小的享受。只是，从香港到台北总共不过一个多小时，根本不可能放电影，只好拿它看电视，真觉得有点奢侈过了头。

飞机升空后，我随便转了几个频道，偶然发现有一个频道上几个操着国语的台湾电影人在侃“国片”。一向很少关心台湾的“国片”，闲来无事，于是便停下来准备看几眼。想不到，关于谈话的内容没引起我的兴趣，倒是那位发式和长相有那么点像胡慧中的徐娘半老的女主持人，惹人注目。她一头短发好像起床后就没梳理过，还故意在扎起一绺横在一侧，说起话来脸部夸张至极，并且手舞足蹈，活脱脱一个跳大神的。尤其是她那放浪形骸的大笑，能让你起一身鸡皮疙瘩。

从中正机场出来，与前来迎接的朋友在汽车里谈起这件事，他当即摇头，说“那些节目烂得很，我从来不看。我家的电视到现在都没有第四台”。

“第四台”，算是台湾的一个专有名词，指的就是那些有线电视节目。因为台湾过去公共的

电视节目只有三个频道，后来出现有线电视节目，即被称为第四台。以后，台湾的电视节目迅速发展到近百个频道，但人们至今仍旧笼统地把所有那些后来的有线电视节目称作第四台。说“第四台”统统都“烂”，当然也是极而言之，毕竟所谓“第四台”里面也有不少是新闻台、体育台、经济台，甚至有的还是专门传授功夫或佛法的。

据说把“第四台”视作洪水猛兽的，大都是一些有小孩子的家庭。来台不几天，我就开始领教了家长们为什么厌恶“第四台”。卡通台不用说了，每天都是日本卡通片，从早到晚打打杀杀，让孩子成天迷在那里面，多数家长自然不放心。综艺台的节目，用大陆人的话来说，就是品位太低，千篇一律的搞笑，媚俗得厉害。其主持人差不多找的都是像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老大姐似的，长得怪怪的，至少也是打扮得怪怪的。在台上只要能搞笑，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动作都敢做，马桶也可以搬到台上做主持人的坐骑。至于什么拉屎放屁、打情骂俏之类的话和动作，早已是见怪不怪了。但说到底，家长们最怕的，还是第四台“泛黄”。

台湾的影视片一般分为四级，即普通级、保护级、辅导级和限制级。早就听说台北有的电视台一过夜里 12 点，就放些“限制级”的片子。这种情况在欧美国家见过，因此并不令人吃惊。那天干完活，打开电视正是黄金时间晚 9 点整，赫然发现电影台正在上演日本的电视连续剧《失乐园》之“大结局”。《失乐园》这部小说在日本争议很大，它有点类似我们过去看过的日本故事片《绝唱》，只是它所讲述的是一对老夫少妇的婚外恋，小说以某种赞美的态度着力描写了两人性关系的和谐，和为反抗社会与家庭的干预，相携绝命于意大利的故事。根据小说改编的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台北虽然很有些销路，但毕竟已属于“限制级”，因此通常也要到年满 18 岁才能进入的专门的影视店里才可以买到，而电影台居然周末黄金时间只在人体上做两点或三点的虚化，就公开放映，这确实让人难以接受。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似乎也不大能见到。

“第四台”“泛黄”，不仅仅在电影台，有些综艺台也是一样。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综艺台会没完没了地挂“色”。今天搞一个节目是介绍去香港演三级片的小“脱”星的，明天搞一个节目是介绍各种性工具的，而且找来坐在台下当观众的，全都是一群十几岁的男女学生。女主持人还会煞有介事地挨个儿问这些小观众的岁数，然后作出大惊小怪的样子，说什么：“哟，你们还不到十八岁怎么就进来了？”这显然是在故作深沉。她的电视节目根本就是放给全台湾人看的，哪里有什么岁数限制？

“第四台”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是否是社会普遍性的反映？至少，大陆人很容易把它同台湾的色情业联系起来，想到以往一些写到台湾的电影里的醉醺醺的美国大兵，想到那些在灯红酒绿的街头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各色妓女……。听说中南部的城市确实还存在着公开或半公开的色情服务，但在台北，多前年国民党当局就取缔了色情业，把它赶到别处去了。如今，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台北的街上在这方面可以说比美国的许多大城市都要干净，因为你不会见到那些你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妓女。

和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台北在性方面也算不上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城市。在台北的市面上，你不会像在柏林或哥本哈根那样，随便在一个报摊上就可以见到许多“黄色”杂志。台北的报纸一般也比较规矩，很少能够见到它们像俄国报纸那样，公开刊登裸体照片。当然，这样的东西不是没有，但多数属于日本、香港流行的什么“写真”集。按照规定，“写真”一类的杂志是必须加封塑料封套，不得供人翻阅的。而“限制级”的影视节目，也只能在专门的卖售点卖给 18 岁以上的成年人。当然，管理上的问题仍然很突出。比如在台北最大的电脑市

场一光华市场，每天都有大批的青少年前往，而那里的这种专卖点店虽标明“十八岁以下请勿入内”等字样，店主实际上对进入店中的青少年睁一眼闭一眼，只有发现有人检查时，才会赶紧将中学生们赶出去。

不过，近年来，随着民主化的过度发展，台湾这方面的情况似乎较当年国民党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一本 5 年前已经被新闻局明令禁售的，以写真手法讲述性爱方式的书，竟然在今年 7 月间被法院判定新闻局败诉，要赔偿出版商一大笔损失。而法官的解释是说，因为社会进步了，因此人们对性的观念也开放了，公开发行这种正面传授“性知识”的书不算问题。如今有的“第四台”所以会“色”胆包天，也许与近年来社会上的这种认识不无关系。

说“第四台”节目“烂”，很大程度上与“第四台”的生存竞争有关。它们较多地把目光瞄准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腰包，各出高招以争取提高收视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太多的低级趣味，是与太多的低层次的文化需求相适应的。这反映了台湾大众文化教育的现实状况。据我所知，多数台北知识分子和文化品味较高的观众，几乎没有太固定的节目可看。大陆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虽然办得过于死板，既缺少特色，又没有多少针对性，在台北却仍有一些观众，大概也就是因为它有个别节目文化品味要高一些吧。

当然，在台北，那些新闻台的节目通常是不可不看的。尽管不同背景的新闻台报道新闻和组织评论节目时有不同的倾向性，但它们报道新闻的及时与监督政府的作用至少在大陆人看来，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大陆电视新闻节目有个最让人头痛的问题，就是不少新闻不“新”，一些重大新闻因为审查较严，或顾虑太多，结果会出现该报的没报出来，不少没有新闻价值纯粹宣传性的报道却太多的情况。在这方面台湾的新闻台似乎很少顾虑什么，报道消息相当及时，弊病是有些消息未经核实，或报道者主观随意性过大，时有错报的情况。

大陆电视新闻节目另一个让人不能满意的问题，是对各级政府起新闻监督作用不够，因为所有电视台都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的宣传工具，宣传什么不宣传什么，要由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说了算。目前唯一具有威慑力的新闻节目，大概只有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了。地方的一些官僚，不论其在当地如何称王称霸，横行无忌，碰到“焦点访谈”，多半都得屈尊就范，否则的话，升官的路变得坎坷不平不说，搞不好还要受处分，甚至摘乌纱。但“焦点访谈”一天不过一次，365 天还不能天天都揭露黑暗面，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再加上有些大案要案牵涉面广，不能访或不能播，有些问题揭出来也解决不了，一年下来实打实地能解决多少问题？单靠一个“焦点访谈”，一些“土皇帝”依旧有恃无恐，感受不到太直接的威胁。

台湾也有麻烦的问题。由于经济暴富和民主化转变过快，地方上“黑金”政治盛行，不少黑道人物摇身一变成为各级议员，甚至是各级父母官。这大概是从极权政治快速转向民主制的通病。1995 年访台，就遇到过一出怪事，我们在台时刚出面接待过我们的一位地方父母官，在我们回来后不久竟因涉嫌枪杀一对立议长而入狱。新闻披露，这位当初口口声声为当地民众谋福利的父母官，原本就是位黑道人士，大把金钱花出去，竟由黑“漂白”了。类似的情况在台湾大概不少，在台北时也见过新闻台有论坛专题讨论。但至少在台北，黑道势力还不像如今在俄国那样，几乎可以左右中央政府的人事和政策。新闻，特别是电视新闻在这方面的报道和监督很能起些作用。上至李登辉，下至各级政府官吏，稍有越轨或可疑之处，必遭曝光。去之前即知李登辉因财产问题遭到舆论质疑，因查无实据没有闹大。在台北时又赶上台北市长陈水扁因儿子继承房产等事被新闻界一度炒得沸沸扬扬。台湾没有香港那样的廉政

公署和类似大陆的反贪局，但电视、报纸如此透明，再加上虎视眈眈的反对党，要在台北这种地方搞腐败，大概不会是太轻松的事情。这里有两个有趣的例子似乎不可不提。

一个是“宝宝日记”。到台北不久，一次聚餐，同桌教授议论之中突然频频提到“宝宝”两个字。咋听之下，误以为是谈还在襁褓中的小孩子，但越听越糊涂。直到后来才弄懂，这原来是台湾的一个“克林顿绯闻”。它讲的是台湾前省政府发言人黄义交因个人生活丑闻被新闻曝光被迫下台的故事。这个人当时政治上大红大紫，上镜率极高，没想到被新闻界捅出一段婚外情。作为公众人物，同克林顿一样，他不得不矢口否认。不想又被新闻界挖出另一位情人的日记加以公开。最后查明，他先后或同时有几位情人，对每一位都以“宝宝”相称，花言巧语。尽管台湾没有独立检查官制度可以将之诉上公堂，但“宝宝日记”到底还是将他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他的官运也因此被彻底断送。

另一件事是法务部调查局代理局长程泉因丑闻下台。这件事刚好发生在我在台北的那段时间里，也是炒得沸沸扬扬。事情最初也是新闻界捅出来的。说是在法国的一位程代局长老友的女儿向人诉说程某曾有过非礼行为。消息捅出来后，程泉也是矢口否认。法务部，再加上调查局，照理说够恐怖的了。但电视、报纸照样穷追猛打，法务部不得不派员赴法国调查。查得结果是程某人当年以会气功治病为由，曾经为老友的女儿发功治病，至少是不必要地接触了女方胸部。据此，碍于公众形象，法务部不能不要求程辞职。程虽大闹，最后把法务部长也拉下了马，但自己到底还是因为这件丑闻而丢了官。

因为新闻透明度比较高，迫使政治人物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和手脚，虽然监督的深度尚可怀疑，但毕竟威慑了那些敢于明目张胆地做坏事的官吏和政客，对百姓未必不是好事。新闻台通常收视率较高，这自然是一个原因。由此看，所谓“第四台”的“烂”确实也未可一言以蔽之。

在台北看档案

----台北印象之四

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档案。可是实际上，在台湾，既没有政府颁布的档案法，也没有作为公共事业的档案馆。唯一的一家所谓“档案馆”，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创办的。这说起来似乎有点离奇，但事实如此。

没有档案馆，有点历史原因。中国传统上就没有档案馆之说。编修历史向来就是当政者的特权，普通人哪里有看档案写历史的资格？无论是当年的北京政府，还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继承了这一传统，最多也就是成立一个国史馆，收藏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档案，找些御用文人根据上面的要求来编写历史罢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档案，还要保存在当政者自己的手里。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依旧照此办理，最重要的档案由自己的侍从室掌管，密级稍低

一些档案交由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务档案则成立了一个国史馆来保存。由于当初从大陆撤退时过于匆忙，有些档案运抵台湾，无人照管，比如部分北京政府的外交档案之类，成立中研院近史所之后，就被近史所收藏起来，于是乎近史所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一个档案馆。但这样一来，在台湾看档案也就变成了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它那里没有一个像大陆、俄国和美国那样的成系统的档案馆网络，可以按照时期或门类集中保管和查阅档案。

大陆搞档案馆，是建国以后跟苏联人学的。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历史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含国家档案馆）主要保管中共中央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历史档案，军事档案馆主要保管军队系统的档案。另外各省市还有各省市自己的档案馆，负责保管本地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根据档案法的规定，中央及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超过一定时限的档案资料，均应分别交由上述档案馆进行保管，并应在档案形成 30 年以后陆续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阅和利用。

在台湾，由于没有档案法，政府部门各行其事，愿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谁愿收就交谁。因此，目前台湾仅收藏其在大陆阶段的历史档案的部门，至少就不少于 6 个。一是国史馆；二是党史会；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调查局；六是近史所档案馆。另外像教育部等各部会也有自己的档案保管部门。除党史会目前主要收藏国民党党的历史档案，和调查局主要收藏情侦资料以外，其他各处收藏的档案门类则互有交叉。虽然国史馆严格说来是政府档案最主要的收藏点，但要查某一个部门的档案，光跑一个国史馆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或者该部门未将已过时的档案全部移交，或者它将部分档案转交给了其他方面，比如近史所档案馆。

没有档案法，又没有正规的档案馆，是否学者查阅利用档案就很困难呢？情况并非如此。大概这也是台湾众多令人称奇的地方之一吧。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参加了一个“档案与历史研究”的研讨会。研讨会嘛，自然是学者们各谈各的题目，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引人注目的是，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等收藏档案的部门均有最高负责人带多人来参加。1995 年在台北时，也见过同样的阵式。而他们参加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听取学者们对他们各自部门工作的意见。和我在 1995 年那次看到的情况有些不同的是，这一次学者们对这些单位的批评似乎不像上次那么多。相反，很少讲客套话，喜欢放炮的众多台北学者，这回对上述单位服务工作虽然仍有直率的批评，但明显地多了一些赞许之辞。比较大陆的档案机关从不与学术界发生关系的情况，不禁让人感慨系之。

其实，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也多是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之列，属于官本位体制，它们完全可以像大陆的档案部门那样与学术界“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反正乌纱的大小与对学者和公众的服务态度的好坏无关。但近几年来，台湾搞所谓“民主化”从某一个方面也加强了舆论监督的地位，以为上级服务为能事的官本位体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听台北的学者讲，包括国史馆、党史会、史政局在内的各个档案收藏部门，过去许多怠慢学者的衙门作风这几年都大大改变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学者们可以在报纸上乃至在议会中公开批评。这不仅会影响到这些部门的形象、官员的升迁，还会影响到要由议会批准的行政拨款。

台北这些收藏档案的部门服务改善到了什么程度？在会上我听说，有学者去看档案，他们的工作人员甚至会给你倒咖啡喝。哇，我当场差点晕倒！会后我就急急忙忙去了国史馆，想享受一下咖啡待遇，结果连个咖啡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后来才听说咖啡待遇是党史会某位接待人员热情服务的见证。可惜我到党史会查档时，此公已经退休。当然，我还真的赶上过一次咖啡待遇，只是那位负责接待的年轻的刘姓先生给屋子里所有查档者都送上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却独独没有我的那份。也不知道他此举是冲着当时满屋子的日本学者呢，还是向那几位受聘为日本人服务的年轻女大学生献殷勤，或者干脆就是反感大陆人？反正由此我知道，倒咖啡的服务在今天大概是只剩下了个美好的记忆罢了。

不过，无论有没有咖啡服务，在台北查档案总还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在国史馆以及党史会几乎是一日不拉地“蹲”了两个月，的确感受到了他们服务的热忱与周到。和大陆目前的档案利用情况相比较，至少有以下几点明显的区别。

第一，在大陆，虽有 30 年解密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因行政干预造成档案馆内定的解密限制甚多。这是因为我们一些部门观念上总是认为历史档案的解密事关“形象”问题、恩怨问题，把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总是认为一切应该按照我的口径去认识，有些问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连那些已经在海外公开多年的外国档案，都不想让我们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结果，档案法有关解密的规定自然也就很难得到严格的执行。台湾虽然没有档案法，但各档案保管部门近年来都不约而同地实行了 30 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国史馆、党史会等，已严格按照 30 年的时限开放档案，以 30 年为期，过一年解密一年，包括过去密级最高的蒋介石、阎锡山等人的个人档案，都已完全解密，学者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查阅和利用。

第二，大陆档案馆系统完备，但查阅利用档案有时手续繁琐。有的档案馆实行内外有别，海外学者利用困难；有的档案馆规定学者利用档案要经过某一级部门批准，然后转报更上级同意，再由它转批档案馆办理。这么一圈章盖下来不说，还要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调档（其实半小时足矣），不花上几个月时间你绝对进不了档案馆。这次没有查到，想要扩大查阅范围再查，又必须再走一遭上述审批过程。凡有过这种查档经历者，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再去查档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没有这种种麻烦。任何人，包括大陆人和外国人，只要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明或证件，就可以直接到国史馆、党史会等档案收藏部门去要求查阅档案。也没有人会限制你查档的范围和次数，你只要去了，就可以随时调阅目录，随时请工作人员为你调档，根本用不着回家去等几个星期每天每天地打电话去问自己要的档案是否调出来了。

第三，大陆的档案馆大都不提供具体的档案分类目录，你要查档，就要自己提目录，提得不具体或太具体，经常会被告之找不到。许多查档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辛辛苦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长的时间，跑了很远的路，总算进了档案馆，结果只给你调出来几件人所共知的文件，让你那个沮丧就别提了。我在大陆的几个档案馆都“蹲”过，知道其实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档案都不存在，多半只是调档者不想费事给你找，或因为种种原因（有时甚至是因为保管者自己想写论文提职称）不想给你看罢了。在台北，各个档案收藏机构，如国史馆、党史会、近史所档案馆等，都不存在这种情况。负责档案利用的人员一般只走行政系列，不走职称系列，提级只考虑工作年限、工作态度等等，与发表论文无关。那里凡 30 年前的档案目录都是公开的。虽然它们各自目录整理水平不一，读者查阅起来难度各异，但至少你一进入档案馆的阅览室以后，就有大批档案目录供你检索。通过仔细检索目录，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够到哪些卷宗里去找你想要的东西。

第四，大陆的不少档案馆不重视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大陆的学者中间有句玩笑话，说是研究者总是嫌档案资料不够开放，而档案馆总是认为档案资料公布太多，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这话也许有些过份，但档案馆不少工作人员只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为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却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反，如今台北国史馆和党史会的解密工作已经制度化，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已很强。他们很清楚，对于已经解密的档案，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研究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为查档者提供方便。国史馆档案阅览室的几位工作人员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有两次我到阅览室较早，当班负责开门的刘小姐在门口一见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并赶紧开门、开灯，迅速拿钥匙推车上楼到机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档案推下来，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负责调档的陈先生更是位细心人，每当你调出来的档案快要看完时，他都会主动前来提醒你是否要继续调档，并给你拿来目录，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档案后再调档等候太多时间。为查档者想得如此周到，实在是难能可贵。

第五，说到服务意识，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内外众多学者对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批评。比如我们一些档案馆的服务收费问题，就是一例。在这些档案馆，调阅一个卷宗，不论其中有几份文件，要收调卷费 3－5 元，涉及所谓“重要档案”的复印费，一页要收 10 元。查阅档案收取调卷费，这在我所去过的美国、俄国、德国和台北，都不曾听说过。据说在日本、英国也无例可循。把档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为重要与普通，复印收取高额费用，这大概也是一种独创。在这里，档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种商品交易行为，档案馆成了用档案赚钱的地方，它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事业的性质荡然无存。据了解，各国的档案馆中，只有俄国的个别档案馆这些年曾经做过出售档案复印件的事情。然而我在俄国看档案时，他们当时经济上已经相当困难，有时工资都开不出来，即便如此，他们调卷也分文不取，复印也是一个标准，不曾漫天要价。我们的档案馆今天似乎还远未困难到这种程度。在台北看档案，情况和各国一样。唯一收费的只有复印，并且也只是收取复印本身的一个成本费 2 个台币（相当于人民币 0.5 元），这个价格同北京一般街头复印点的复印费差不多，比较台湾以及欧美日本学者的收入，可以说是相当便宜的。

由台北看档案，竟至写到大陆档案利用方面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点跑题。不过，比较一下两岸档案利用的情况，用以自鉴，相信读者也会有所理解。

公教人员致“富”之道

——台北印象之五

每年到北京来的旅游团多得不可胜数。记得文革结束后最先看到的旅游团多是高鼻子凹眼睛的“洋鬼子”，然后多是小个子的日本人，以后是香港人、韩国人、台湾人……。比较这些旅游者很有意思。那时来北京的的旅游团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老年人居多。对老“洋鬼子”，只要一看他们的装束和皮肤，就知道他们的生活大都比较悠闲，懂得保养。日本人也差不多，通常一个个皮肤白里透红，充满光泽，旅游包也透着“高档”。再看那些韩国人和台湾人就差些了。同样是老年人，一脸的“车道沟”不说，还饱和着烈日热汗蒸烤后的沉

积色，再加上簇新的旅行包和自顾自的大嗓门，一看就知道他们多是些“苦出身”。记得一次外出坐软卧包厢，遇见一位返乡归来的台湾游客，领带歪在一旁，眉飞色舞地大侃他如何向乡里的远近亲戚派送红包，中间突然打住，咳嗽两声，脖子一伸，“啪”的一口痰吐在门口的地毯上。那感觉，仿佛正坐在他家的炕头上。

亚洲经济的腾飞发生在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除了日本是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以外，“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都是七十年代中期崛起的，它们中间差了十几年的时间。正是这十几年的差距，就有了我们十年前经常能够看到的情况：来中国旅游的老人中，韩国和台湾的劳动者居多，他们还不大会保养享受，并且许多人至今还在辛勤劳作。这种印象在台北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我发现，不少台北学者和年轻的博士、硕士，都是“红五类”出身，他们的父辈虽然有些已是腰缠万贯，却至今也不会养尊处优，依旧过着典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

说如今不少年岁大的台湾人腰缠万贯，大概并不过分。在台湾，“荣民”死后被发现藏有数百万新台币的新闻早已不新，甚至有报载，某些窃贼专以老年孤身的“荣民”为对象。在政大时，曾与单身宿舍的数位老人吃饭聊天，得知他们目前的月收入不过四五万，但每年都要外出旅游，跑大陆已是家常便饭，去过十几个国家的人不在少数。因为他们吃住在学校提供的单身宿舍，平时花不了多少钱，一年下来几十万，真的积蓄个十年八年下来，有个上百万元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些靠政府津贴过日子的公教人员尚且如此，一些土生土长有房有地的本地人，往往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受益更大。

几百万新台币是个什么概念？新台币和人民币的比值 1998 年上半年以前是 3：1，亚洲金融风波开始台湾自己主动贬值，现在大约是 4：1。也就是说，月收入 4 万元左右新台币，相当于月收入人民币将近 1 万元。而 4 万元，在台湾实在是很普通的收入。

台湾科研教学人员的收入是以级职为标准，外加工龄津贴等，同时每年根据各人工资增 3％左右，一般人不大容易弄清楚其中的具体情况。但简单说来，以中研院为例，最低一级是研究助理，月薪约为 2 万元；往上是助理研究员，月薪约 5 万元；再往上是助研究员，月薪约为 7 万元；然后是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月薪都在 8 万元上下，相差不多。干到五六十岁，连工资带工龄津贴等加起来，最多可以拿到十一二万元。如果兼任行政职务，一般每月还可以另外拿到一两万或者更多。高校教师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

政府公职人员收入情况相对要复杂一些。台湾现在实行文官制度，公务人员通常有三种考量标准，即官等、职等和职务三部分。官等由低到高分为委任官、荐任官、简任官、特任官四等；职等从委任官至简任官都算在内，最低一等，最高十四等。最低为书记官，属委任官，内分三四五各职等；然后是科员，又分五六七各职等，升至六职等即为荐任官；往上是专员，又分七八九各职等，科长一般为荐任官最高一等，即九职等；再往上就是简任官了，通常是主任、处长、局长之类的了。而这些主任、处长、局长之类就属于职务了。在国史馆、党史会这样的单位，除科、处、局长这些职务外，依照传统，还有助修、协修、纂修的职称设置，大约分别相当于高校的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助修通常为七职等，协修从八职等到十一职等不一，纂修最高也不过十一、十二职等。计算工资，是以职等高低为标准。在各职等中，一二职等的工资，月收入应该不超过两万元。三四职等大约有 3 万元左右，五六职等即科员一级可到 5 万元左右。到九职等，即科长和协修一级，月薪可达 7 万元左右。再往上处长、纂修一级，应在九万元上下。到十三、四职等的局长一级，每月拿上个十万以上不成问题，而

除了工资外，凡担任职务者还按职务高低有相应的职务津贴可以拿。

台湾的公务人员要经过政府统一考试，通不过统考者，即使你是博士，也只能做雇员，而雇员的工资相对就低多了，并且很难改变，干上十几年仍是两三万元的并不少见。由普通雇员最低工资一两万元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台湾日常生活费用的状况。台北的物价算是比较贵的，但吃饭在台北花钱不算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住在市中心的人来说。中式自助餐在学校附近一个人一顿四五十个台币可以吃得不错，城里要七八十元。西式快餐如麦当劳之类的贵些，通常一餐不低于百元，折成人民币，比起北京来也差不多。吃一顿上好的牛排，不在市中心，几百元就可以，比北京还便宜。一般说来，在台北，如果有房子住，每个月收入一两万元，一个人维持生活应该说大致是可以的。

公教人员的工资收入不算高，但还有一些福利方面的待遇可以享受。已知的有专门为公教人员提供的低息贷款，如头期购买房屋、汽车之类。贷款利息只有 3.5%，远低于一般贷款 9％－14％的利息。同时，公教人员还可以享受公共保健待遇，俗称“公保”，看病住院基本上不花钱。当然，整个社会在看病方面，也已实行了全民健康保健制度，每人每月交三四百元，看病只要交 50－100 元挂号费，其他则不再收费，住院也只收取 7％的费用，只是用药不像公保，限制多些。比较大陆现在越改普通人看病负担越重的“医疗制度改革”，其公教人员这方面的福利还是高不少。

我问过几位开始进入中年的朋友的月开销，情况大致相同。即一个人一个月的花销，房屋贷款四五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养一辆汽车一万元，水、电、煤气各种费用及生活费几千元，不算其他消费，平均要两万元左右。当然，这是属于要还房屋或汽车贷款的。有了房子的，一个人平均每月开销 1 万多是正常的。一个三口之家，节省的月平均开销可以不超过 4 万元。也就是说，月收入最低的雇员，一万多台币一个月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成为公职人员者，收入超过 2 万元，日常生活应当没有问题了。对于那些工龄在十年以上，月收入已到达四五万的多数工薪阶层来说，两个人月收入近十万，相对就可以过得不错了。不仅可以贷款买房子，买车，拼上几年工夫还掉大部分贷款后，每月还可以存上个几万元，十年下来有个上百万元，应该不成问题。

这也就难怪，1995 年大陆打飞弹威吓“台独”，闹得岛内人心惶惶，很多人花数百万新台币办移民加拿大、新西兰等。原来以为这些移民者都是台湾的富裕阶层，到台北后才了解，原来其中有不少还是公薪阶层的家庭。中研院、国史馆这样的清水衙门，都有把家人移民到国外去的，现在每年利用休假来回跑，开销不小，但也还支付得起。同样的情况，台湾公职人员的家庭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的也不少。记得 1992 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问过亚洲中心主任范力沛教授，为什么他们中心的学生中几乎没有大陆来的留学生，他当时就告诉我说，这主要是因为钱的问题，学校需要台湾人的钱，台湾来的学生几乎都是自费来读学位的。

说中研院、国史馆这样的机关是清水衙门，只是说它们中的研究及编纂人员几乎没有以权谋私的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像大陆的公职人员那样取得某些“灰色收入”。比如，赚取稿费之类。与欧美日本不同，台湾还是有少数学术性刊物是有稿费可拿的。可是，由于他们的收入较好，他们中多数人很少有人对稿费收入感兴趣，他们多半宁愿找那些没有稿费，而学术地位较高的刊物或出版单位发表自己的成果。这和大陆目前多数编研教人员的心理有较大的差别。

当然，台湾人的收入其实是很不平均的。用有些朋友的话，可以说是贫富悬殊得厉害，尤其是这几年，房价狂飚，公教人员，特别是那些近十年才工作，要买房子，又没有父母帮助的公教人员，生活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有一对年轻夫妇，月收入 10 万，刚积蓄到 100 万，就咬牙买了一处三室两厅的公寓，加上装修，总共借了 800 余万公教贷款和银行贷款，现在每月要还六七万元，就这样也要还上个一二十年，生活自然相当紧张。这还是咬咬牙买得起的。在台北，有一周的时间去阳明山的党史会看档案，每天坐他们的公车从山上下来，都能看见一片日占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平房，大概因为那里人口的密度太高，各家乱搭乱盖，十分拥挤，很像北京如今那些挤得不能再挤的大杂院。相信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买不起房子的。据说，在台北至今还有数千人月收入不足万元。特别是 1998 年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大增，情况更糟，连市府招收清洁工都有近百人报名。相反，在台湾，有些职业收入之高，令人瞠目。流行歌手、银行业主不用说了。一位私人医生月收入即可达到七八十万元，几乎十倍于教授的收入。即使是在台北公立医院里的医生，每月收入二三十万元也是常事。

普通的公教人员怎样才能致“富”？政大的蒋永敬教授曾经向我“传授”过一个经验，说是要乘经济起飞之际买房子。他的观点是，有钱与其存起来，不如置成房产。以他为例，60 年代他贷款 30 多万新台币买了一处几十坪（一坪约合 3.3 平方米）的房子，十年后以 100 多万卖掉换成一处面积更大些的房子，再十年后又卖掉换成一处 100 多坪的新的二层小楼，价值已增至七八百万新台币。也就是说，他如今价值七八百万的房产，等于只花了当年的 30 多万。这的确是台湾人的一种经验之谈。因为仅从 80 年代末到现在，台北的房价就涨了七八倍之多，有不少台湾人甚至利用地价飞涨的机会，成为了暴发户。

当然，工薪族要靠此发财是很难的。毕竟，即使有点钱把房子买下来，自己住，也富不起来。关于致“富”之道，我在台北唯一“学”到的一着，就是办“互助会”，据说是稳赚不赔。这里不妨简单介绍给有需要的朋友。

在台北，不少公教单位里都有公职人员自发组织的“互助会”。与大陆的情况截然不同的是，这种会并没有哪一级部门或组织来领导，而是有人缺钱用了，比如要买房子需要一大笔头期款，或买了房子想早还贷款，向银行借利息高，又要抵押不动产，于是他就自己起一个会，告诉同事们自愿参加。多数同事都愿意帮忙，也有赚头。这就是所谓的“互助会”。

一般情况下，起一个 2 万元的会，有 30 个人参加，会期即为 30 个月。第一个月每人交 2 万元总共 60 万元，即归会头（指起会者）所有。从第二个月开始，其他 29 人竞标，以决定谁得这个月的 60 万元，每月如此。因为台湾买房买车的人多，所以竞标的人总是有的。底标一般不低于 1800 元。最高者如果出 2 千元得到第二个月的 60 万，第三个月以后他每月就要交 2.2 万元，2 千元实际就是利息，28 个月下来等于要交 5.6 万元。银行借款利息年 10％上下，如此筹 60 万显然比向银行借款划算。如用来还贷款，一次付掉 60 万，等于少付掉 30 个月的利息总额 15 万左右，也划算。即使拿去整存，以现行 6.5％的利率来计算，30 个月可得利 9.75 万，减去 5.6 万，也稳赚 4 万多。对于那些不想用钱，只想存钱的人来说，假定第十个月不再有人需要用钱，剩下 20 个人就要抽签决定谁得当月的 60 万。抽到越晚，得利润越多，因为他付利息的月份少。即使抽到第十个月的 60 万者也还是划算的。因为他连同前面 8 个竞标人的利息的平均利润，他将得到 60.43 万，以定期方式存入银行 20 个月，20 个月后得利为 6.53 万元，再加上他还可以得到后面 19 个月（最后一会者不出利息）其他与会者每月 2000 元利息的平均利润 1.3 万元，扣去他 20 个月要付的 4 万元利息，也还是比

每月将 2 万元按零存整取的方式（利率 5％）存入银行 30 个月得利 3.9 万元要多得 1.4 万元。

在台湾，不少单位里有好几个这样的会。一个人同时参加两三个会的情况，用在这个会“标”来的钱养其他的会，成倍地赚取利润的人也不少。民间这种会似乎更普遍，只是多数并非为了互助，而纯粹是为了赚钱，底标能够定到五六千元之高。报载，民间的会时有发生起会者居心不良，卷款而逃，使入会者损失数十万、数百万者的。据说农历年底这种情况更多。因此，一般公教人员在单位组织这样的会相对保险些。

大陆现在买房买车的势头正在兴起之中，不知道这个经验对于那些有心买房买车的朋友是不是有些用处。

向读者交心

——代新年献辞

1996 年，我们这些有感于“地摊史学”泛滥成灾，而严肃史学却得不到传播的历史学同仁，聚集在一起，开始创办一份能够让普通读者看懂的，反映百年中国史，特别是建国以来新中国历史研究重要成果的杂志。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虽然困难重重，几经波折，有时甚至经济拮据到发出不稿费，但在众多关心历史、对《百年潮》抱有深切希望和同情的人们的帮助下，我们总算还是基本上按期把饱含着我们心血和劳动的杂志送到了读者的手中。

三年来，我们把历史研究与历史普及结合起来的工作做得还不是很好，因为不少为我们提供稿件的处于中共党史和现代史前沿的研究者还不大会写通俗的历史文章。这或许也是我们的杂志至今发行得还不是很理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我们还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欢迎。这是因为我们的文章不仅能够始终坚持讲实话，讲真相，而且向读者介绍的多是最具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和发人深省的亲历文章。

当然，三年来，我们也屡受批评并备感压力。因为我们这些过去很少迈出书斋半步的读书人，对如何巧妙地把握科学研究与政治宣传的不同尺度，难免有些愚钝。我们从来都注意要以讲述正面历史为主，但何为正面，何为负面，有时似乎难以截然分清；我们从来都强调要与有关文件保持一致，但明明并不违反有关文件精神的内容，有时还是会引来一些批评。我们为此也经常感到困惑：为什么那么多胡编乱造，抄来抄去，专门用来骗人钱财的所谓纪实文学可以畅行无阻；为什么一些满纸假、大、空的文章还会有人欣赏，而我们发表的一些文章，仅仅因为利用了在国内外最新发掘的档案资料，仅仅因为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仅仅因为根据新的史料和史实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却可能遭致物议。也许，我们太过书生气？

三年来，我们所走过的每一步都颇为艰辛。面对千禧之年，我们不敢奢望我们所处的环境会有多少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我们不敢说些昂首跨入二十一世纪之类的豪言壮语。我们只是希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能够保持住这样一块使史学界同仁面向广大普通读者的阵地，能够让广大普通读者继续通过它来了解一些历史的真实。

“我只是平凡的人”

——张学良去世感言

张学良走了。他坚持不愿忍受插管子的痛苦，坦然面对死神的精神，让人不由得想起十年前老人恢复自由后充满豪放气概的四句打油诗：“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这本来是张学良被软禁期间所坚持的一种信念，但似乎也可以用来写照他的一生。

张学良这一生，少年得志，抽过鸦片，玩过女人，因判断错误丢了东北不说，还格外耻辱地丢掉了热河，一度背负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张学良这一生，也做过两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一件是东北易帜，即把一个长期割据的东北三省，重新隶属于中央政府，实现了东北与关内的统一，使日本野心军人非用武力不能顺利割占东北；一件是西安事变，即在蒋介石坚持安内攘外政策，必欲消灭共产党的情况下，捉蒋放蒋，促成了国共两党的妥协与合作，推动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就是这两件事，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突出地位。

无论是把“东北王”张作霖割据了 20 年的东三省，重新交归中央统辖，还是犯上作乱，捉蒋放蒋，甘做阶下囚，对于张学良个人利益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重大损失。试问当年像张学良一样，有实力，有地盘，权倾一方的诸多地方诸侯，有几个甘心让中央统一军政权力，或愿冒杀头之险，做出如此大的个人牺牲？但是，尽管有过这般足以自慰和炫耀的历史，每当晚年有人问起张何以能有如此魄力，何以能坦然面对这种牺牲时，老人却总是打趣地回答说：“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并且会告诉你说：“我曾写过一段话，‘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这就表示我用的只是小聪明，没有大的高见。”如果有人对他说，许多人认为他当年这样做全是为了国家，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时，他更是会不断地摇头，表示拒绝接受，说：“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

晚年的张学良，的确是一个再平凡没有的老人了。远离尘世的宁静，事奉上帝的热忱，使老人生活在自我的内心世界当中，保持着怡然自得的安祥心态。但是，偶尔，透过记者的追问，我们还是不难发现燃烧在老人内心深处的那股强烈的爱国情感。当记者问他为何会决定实行东北易帜时，他的解释是：因为他“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当记者问他何以会发动西安事变时，他的解释是：“外为国家民族（停止剿共集中抗日），内可平慰东北军民”。显然，他始终没有忘记，也不可能忘记：他曾经是一个“东北人”。“因为我们是东北人啊”！他会大声地告诉记者说：“您知道我们东北受日本的压迫，二十一条的时候，我真是痛苦，我到现在还是痛苦的。”正因为如此，恢复自由后的张学良，第一次见记者谈历史，就是直接面对日本人。因为他想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告诉日本的年轻人：不要沉醉在过去日本那种傲慢与狂妄之中，不要总是试图使用武力，用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增加民族间的仇恨与不信任。

一个远离尘世的人，当然不会在乎别人怎样评价自己。张学良就反复表示：对于他的一生，褒贬由人，他毫不在意。然而，他也并不是完全不关心后人准确地总结他的过去。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众多耀眼的"头衔"当中，只愿意选择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同样带有褒意的"头衔"："爱国者"。甚至，一旦兴起之际，当记者问道：什么是您一生的理念时，他也还是会像年轻时那样，脱口而出："我为我的国家，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为我的国家！国家要用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自然，张学良到底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他的这一理念。当抗日战争真正开始之后，为抗日雪耻费尽心机的他竟没有机会参加战争。这不能不成为他"心中最难过的"事情。如果这确实是由于蒋介石对他的软禁使他身不由己的话，那么到晚年，当他最终恢复了自由，再三公开表示"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他也确实有机会回来时，他却没有能够回来看看，这就不是某种权力在起作用了。以至于，百年行过，身为爱国者的他，竟不能魂归故里，安眠于生斯长斯的祖国大地。

说到底，张学良到底还是张学良。放眼豪情三千丈，回眸依旧平凡人。

关于《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联想

凡粗通中国历史的人，大都知道《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区别。《三国志》是所谓正史，而《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志》记录的历史演绎出来的小说、故事，是文学作品。如果要学历史，当然要读《三国志》；如果是为了于消遣中获取某些历史知识，《三国演义》足已。

年前巧遇一工程师朋友，闲话中言及中共党史，于是以专家自居，夸夸其谈。不意朋友听后不仅连连摇头，而且断言我不是曲意宣传，就是白学了这么多年。据他说，他所了解的党史"内幕"全然不是我说的那回事。

数百年来，只知有《三国演义》而不知有《三国志》者，不在少数。本不为怪。此事之可悲，仅仅在于，以往凡知道《三国志》和《三国演义》者，通常还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而如今，《演义》版的三国史的流传，竟然导致大批读者把本来是真历史的《三国志》看成是假货。听到朋友津津有味地谈论他所看到的种种"内幕"，真让我这个搞史的人有一种"铜钟弃毁，瓦釜雷鸣"的凄凉之感。

自从１９８７年部队作家黎汝清"越俎代庖"地充当起皖南事变史的裁判官以来，大批作家浩浩荡荡地"杀"进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领域里来了。他们中有许多有志于用文学之笔来书写春秋大义之人，但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眼睛盯着读者钱包的"剪刀加浆糊"的致富专家。结果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纪实"、"揭秘"的诱人牌号下，无数普通读者用他们口袋里的钱，换来了一脑子耸人听闻、似是而非的所谓"内幕"。脑袋里"内幕"装得多了，正史自然会被看成是用来宣传的门面货甚至是演戏了。

从叶永烈的"纪实文学"作品里不断出现重要史实错误的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使是有

相当良好愿望的“纪实文学”作家，由于他们缺乏足够的历史学方面的训练，由于他们追求“高产”、“稳产”，没有可能“板凳坐得十年冷”，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上，因此，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通常都带有“演义”的成分（更不要说那些原本就是冲着读者钱包来的致富专家们的“创作”了）。而这种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的又“纪实”、又“文学”的作品，就象《三国演义》一样具有极大的读者市场，令我们这些搞史的人真是到了望而生畏的地步了。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和《三国演义》相比，以《三国志》的形式，可以说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家喻户晓的东西。要想在读者中间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必须设法找到一条使历史接近广大读者的有效途径。我很高兴，《百年潮》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它把史家专业的眼光和作家生动的文笔结合了起来。它的文章可贵就可贵在不杜撰、不演绎，不添“油”加“醋”，既保持了严谨、准确的史家风格，又做到通俗、生动，使凡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都可以接受。

希望《百年潮》问世，给广大读者一个接近《三国志》的机会，让《三国演义》重新回到它的文学作品的位置上去，让那些东拼西凑的“地摊史学”从此休矣！

愿那样的历史不再

一个人一生能够经历多少个十年？纵使按今天国人的平均寿命七十岁计算，我们每个人有记忆的，可以感觉到自我存在价值的岁月又能有多少个十年呢？记得我十几岁进工厂当工人时，不要说见不到五六十岁的老工人，就是四十来岁的工人看上去都已是老态毕露，很少还能直接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继续发光发热了。换了那种劳动量极大和工作条件很差的工厂，情况更是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做脑力劳动的人情况要好一些。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过了退休年龄，甚至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老专家的身影，活跃在方方面面。但是，方正集团过去的老总王选讲过一句很实在的话，那意思是说，即使是一个科学家，他真正可以做出重要成就的时间，也只有 20 多至 50 多岁这短短的二三十年而已。人活一辈子，不讲空话大话，至少要能够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要对社会和家庭有用。算下来，20 岁以前靠家庭养，60 岁以后靠社会养，真正值得自己记忆的，年富力强又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时光，就多数人而言，大概也只有三四十年吧。三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又何其短暂！

很小的时候，常喜欢雨后天晴时到楼门外大柳树下去用小树枝逗弄蚂蚁。看着那些蚂蚁在洞口用细如针尖的粒粒新土堆出的土堆上，翻山越岭，川流不息，来来往往忙碌的样子，总想给它们找点麻烦。几乎每次我都会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比如舀些雨水来在蚂蚁洞外制造“洪水”，或把洞外的土堆重新推平，然后兴灾乐祸地看着蚂蚁们怎样转来转去找回家的路。想起来，自己当时的作为，很有点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味道。当年周幽王只为博新后褒姒一笑，于是点燃烽火召来各路诸侯。那成千上万从各地匆匆赶来的将士没头苍蝇似地在城下乱哄哄挤成一团的样子，确实很像是被愚弄的蚂蚁。

人慢慢地长大了，每当我想起 60 年代初和妹妹抢着把食堂打来的菜汤舔得干干净净，想起

1966 年小学教导主任众目睽睽之下从高高的烟囱上喊着革命口号摔下来时那沉闷的声音；想起刚上中学一年级不得不远离京城随父亲下干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跟着国家计委副部级干部去十几里外的水库边放羊；想起十五六岁进工厂，披星戴月，挥汗如雨，二十三四岁就成了“老师傅”；想起 1976 年只因想表达一丝不满，就被投入监狱，差点儿没上了枪毙名单……。想到这一切，真觉得自己当年其实也和那些蚂蚁差不多，还不是被人摆弄来摆弄去？

今天 40 岁以上的人，大概很多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触。为了打倒“帝修反”，挖出“黑五类”，他们或其乐无穷、或战战兢兢地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损失的年华远比我多，有些人甚至丢掉了性命。虽不能说没有例外者，比如像钱学森那样受到特殊保护的国防科技事业方面的专门家，以及像厉以宁教授那样因不配参加运动被分去看资料室，从而借机埋头读书的有心人，他们的情况很让人羡慕。问题是更多的人没有这份幸运，他们的命运不比那些被人摆弄的蚂蚁好多少，最好的时光不少都耗费在无休止的窝里斗之中了。

把人和蚂蚁相比，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在一个崇尚集体主义和强调权威的社会大环境当中，人的价值几何，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不要说普遍人权得不到承认，明明社会还十分落后，明明国家需要大量人才，各行各业的众多菁英却被扣上“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打入另册，无数可造之材的美好青春也都做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每当我想到那些当年与我一同进厂当工人，后来却没有考上大学，今天不是下岗就是提前退休的众多兄弟，心里总是会泛起一股酸楚的感觉。因为他们中一些人当年远比我聪明，也比我有抱负。如果没有文革，谁能说在他们中间不会产生几个大有作为的科学家或工程师呢？当然，看了太多名人沉痛的回忆，听了诸多 60 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白白浪费十多年青春年华的可悲经历，注意到即使像巴金、曹禺、茅盾、郭沫若等这样三四十年代就已经驰骋文坛的巨匠，建国后也大都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再没有传世之作问世，相比之下，我的那些兄弟的遭遇也许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崇尚个性和自由，生在中国多少会是一种悲哀。因为，强调某种形式的集体主义目标而忽视个人权利，原本就是我们这种东方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特点。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历来是家国同构，君权至上，和为之服务的官僚政治制度。与此相适应，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也是重在维护家长制和等级制，强调上下尊卑和个人对家族单位的依附关系，坚持“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面对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即使像毛泽东这样最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旦延袭了旧有的体制，无论其怎样关心重视“小人物”，推动造旧体制的反，到头来其实也还是只能在传统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里翻斤斗。

中国对个人及其权利真正开始给予关心，源于改革开放。但根本上，对个人及其权利的重视，靠的还是大力引进和发展市场机制。这是因为，只有在市场机制逐渐成为全社会经济制动杠杆的情况下，个人的价值和个人权利的作用才会日益突显出来。也只有当普通个人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巨大动力的条件下，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权利问题才会成为整个社会必须关注的话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直至九十年代初，人道主义的思想仍旧会受到批判，普遍人权的观念始终被拒之门外。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我们才终于不得不开始把“人权”这两个字纳入到自己的话语系统中来。

当然，应当看到，我们接受普遍人权的观念，容忍人道主义的提法，才不过六七年时间。我们虽然取消了“反革命罪”，而鼓吹阶级斗争，主张从政治上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声音却还是不绝于耳。对人，以及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与保护，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其实还比较陌生。包

括何谓人权，什么权利可以给，什么权利要加限制，今天也还存在着相当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涉及到如何处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说，如何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实现集体利益的目标，而不是以集体利益为由压抑甚至牺牲个人权利，仍旧是我们这个东方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走到街上，看到少男少女们越来越个性化的鲜艳装扮，看到他们如花如画，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幸福憧憬的灿烂笑脸，我们这些过来人怎能不感到肩头责任的沉重？逝去的年华不再，但愿那样的历史不会重演。

对 1999 年《中共党史研究》的点滴解剖

1999 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上有了一些题材、内容和研究水平都堪称上乘的文章。首先值得一提的，当然是胡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与此同时，张化的《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李向前的《旧话新题：关于中国改革起源的几点研究》、田松年和李可玉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写作动因新探》、丁伟志的《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ー对于“五四”过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鲁振祥的《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限估计考略》，唐正芒的《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写作的主题思想考》等，也是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说这些文章好，无非是它们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有了一些新的开拓，即在观点或史实的研究上颇具新意，可以在某些方面给人以新的知识或新的启迪。

我们评价一篇文章好与不好，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新意。但这并不是说凡是有新意的文章就一定是好文章。1999 年第 1 期所载陈国权的《关于遵义会议研究两个问题之我见》一文，就很有新意。它提出，以往关于 1935 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说法是不对的，应该说：自 1934 年 12 月黎平会议起，到 1935 年 8 月毛儿盖会议止，周恩来都是处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直到毛儿盖会议后，毛泽东才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样的观点的确很新鲜，问题是文章竟然对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谈到的“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一事实不置一辞。陈云的提纲已经发表了十几年，有关张闻天（洛甫）在遵义会议后事实上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情况，至少在中共党史学界也早已成为常识，对此不做任何辨正如何就能提出周恩来的“核心地位”问题？严格地说，这样的文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共党史研究》上。

喜欢提出新的观点，或从理论高度大发宏论，显然是中共党史研究论文的一种偏好。但重论而轻史，同时又不注意严格把握所使用概念的历史内涵，任何新论都可能经不起推敲，或者可以迎合政治于一时，却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第 1 期刘永平的《中国共产党为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奋斗》、第 5 期胡凯的《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之比较》等文章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前者对“人权”的概念缺乏严格的界定，泛泛地把党的历史上所有谈到工农、人民、阶级权利的文字统统都等同于“人权”，而完全不理会党几十年来对“人权”问题在认识和理解上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后者同样没有清楚界定何为“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就展开论述，而且名为比较，实际上不过是把两者中相似的论述稍加罗列排比而已，结果是认定“长远目标完全一致”、“基本理论一

脉相承”，读后让人几乎不知所云。道理很简单，如果真如作者所说两者并无多少差别，那又何必一个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一个定义为“社会主义”，50 年代的那个“过渡”岂不更是多此一举？（莫非作者的意思是想要说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就是“新民主主义”？）

总的来说，1999 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出了一些好文章，因此也多了一些朝气。包括新辟的“探索与争鸣”、“热点聚集”和“海外来鸿“之类的栏目，都有助于活跃研究者的思想，促进学术交流和探讨的进一步开展与深入，应该坚持下去，争取办得更好。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一年里谈意义、讲贡献、议作用之类的论说文比例仍嫌过大，一些文章过于空洞，水份太多，编辑选用文章有时从学术上把关不够。而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能够依据新的史料和档案进行深入的史实研究的论文实在太少，因此给人印象是有不少文章并不是论从史出。对此，其实今天相当多的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也已经注意到了。第 5 期张保军的文章中介绍的众多党史教师的看法就很值得重视。他们指出，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中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以论代史，论从论出非常突出。讲来讲去只是些条条，说服力很不够。宣教意图明显，史学功能不足。”我想，要想真正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从而帮助提升整个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编辑部恐怕应该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引导。

学术研究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

所谓前沿问题，就是与现实联系较为紧密的问题；所谓热点问题，就是引起较多人关心的问题。而无论前沿也好，热点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肯定有一定的敏感度，不会是那种四平八稳，引不起任何争论的问题。但是，与现实联系较紧，引起较多人关心的党史问题，能争论吗？于是，我们又回到党史研究的老问题上来了：中共党史研究能不能有新意？

任何一门学问，要想存在下去，都必须要不断求新。自然科学是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惟独中共党史研究有些例外。大同小异的内容，大同小异的资料，十年前是它，五年是它，拿到今天，题目变变照样发。许多人不爱看党史文章，写得八股不八股不论，缺少新意是最大的问题。

讲深化党史研究，未必是哪儿前沿往哪儿去，哪儿热闹往哪儿钻。实际上，基础问题研究不透，研究前沿问题也难有深度；整体研究上没有新意，研究热点问题同样难以给人多少启迪。中共党史研究，不论是就它的研究队伍，还是就它的研究成果来说，这些年一直在逐渐萎缩。这一方面是社会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党史研究本身远离社会需要，总是在炒冷饭有关。

是不是社会大众不需要党史研究？当然不是。看一看报摊上那五花八门的杂志，看一看书店里那琳琅满目的图书，凡是谈历史的，一多半都是谈党史问题的。只不过，它们所讲的，大都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讲的内容。的确，我们许多研究者不屑一顾，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有不少胡编乱造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这些杂志和书籍买得那么火？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杂志和书籍里面讲的内容或者前沿，或者热点，而关键在于有新意。

《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 2 期刊登了李向前的一篇小文章，介绍美国哈佛“费正清中心”的 Seminar。其中讲到，在那里，Seminar 隔三差五就是一场，但参加者仍旧非常踊跃。联想到我们这里做研究，大家各自为战，连班都懒得上，更别说热心去听谁做学术报告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这里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有一个原因是应该提到的，那就是，那里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每个讲演人都是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每个听讲的人也都想利用这个机会受点启迪，或发点议论，从而帮助自己考虑问题。

事实上，每一个在欧美国家做过一些研究的研究者，都能够注意到一个重要的情况，那就是，那里的研究几乎不存在炒冷饭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研究论文和论著，都被要求列出前人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说明你的新意何在。一句话，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

要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不是一件容易事。它要求我们研究者一定要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力，要有较好的史学功底和理论能力。鼓励这一点，事实也有助于党史队伍的建设，奖勤罚懒，优胜劣汰。

当然，要做到能够发人所未发，言人所未言，首先是我们的主管部门要很清楚学术研究和政治宣传的不同，要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讨论，要避免先入为主地对有新意的研究成果发议论、做判断。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学术讨论的氛围，要想深化党史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学术问题，不讨论是不能进步的。只有允许我们的研究者去大胆地探索，党史研究才有可能进步，我们也才有可能真正去深入研究那些无疑是会比较敏感的所谓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

在陈独秀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第一次发言：我想讲两点看法，第一，我们谈论历史时最好不用“左”和右这样的名词，最好不带或少带个人感情的色彩。研究历史，首先应当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上，从史实出发，着重于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为陈独秀正名，也应当以这样的心态并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我们不同意以往那种对陈独秀的武断的批判，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左”或右的帽子再反扣到当时国民革命实际的指导者俄国人的头上去。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当年是不是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也许是。但历史地看问题，简单地把苏联和共产国际当年所做的一切都归结为民族利己主义，可能也有欠公道。有一点恐怕还是应当承认，俄国共产党人当年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在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认识问题的，他们并不完全是基于自己民族的立场，至少在许多人的主观上是这样想的，他们把苏联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了。同时，我们对共产国际与苏联也不能完全等同看待。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它的任务是世界革命。从世界革命的角度，许多人相信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不保卫它保卫谁？当年不仅俄国人这样看，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的中国党其实也这样看。这是当时特定历史的背景，研究历史问题时绝不能忽略不计。否则我们就可能简单地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其实，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会带有自己的民族色彩，甚或带有民族主义的倾向，但共产党人首先认为自己是阶级中的一分子，然后才看重自己的民族属性。这一点应当有所了解。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够理解，他们当年主观上首先想要保护的，还是苏维埃政权，即共产党的领导和制度，然后才是一个民族国家，比如俄国或中国。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我

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三四十年代苏联党同中国党闹了那么多矛盾，最后还是选择了支持中国共产党，而没有去支持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国民党的政府。总之，在分析历史问题时，我们可能应当尽量不要用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评断历史上的是非与对错。

第二次发言：我想必须对上次的发言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因为可能有些同志误解了我的意思。好象我改变了我的看法，本来是率先起来为陈独秀洗刷右倾罪名的，怎么现在反过来又替给陈独秀戴上右倾帽子的俄国人和共产国际说话来了？第一，我当然认为以往对陈独秀的评价是不公平的，扣给陈独秀的帽子是错误的，这也是我写《陈独秀与共产国际》，认为必须为陈独秀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原因。但是，我不认为为陈独秀摘掉帽子，就得把这样的帽子戴到别人的头上去。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从历史的角度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客观地分析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过分情绪化地看待陈独秀所受的冤屈，很可能会形成新的笔墨官司。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我们今天说陈独秀如何如何正确，如何如何英明，客观上就意味着说当时那些与陈独秀意见不同的人如何如何错误。表面上看，我们好象只要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就可以了，实际上当年与陈独秀意见不同的远不止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包括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任弼时等，也都与陈独秀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歧。结果是我们开陈独秀的会为陈独秀鸣不平，人家开其他人的会为其他人打抱不平，各唱各的调。而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就应该可能发现，许多事情当时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是非。当年的共产党人自然都是相信自己是从革命的立场出发，张三李四都一样，只不过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别，各自的理论、经验水平不一罢了。所以我不赞成过多地纠缠于什么"左"和右，不赞成给陈独秀戴政治帽子，也不主张给历史上其他人戴这样的帽子。第二，说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是基于"工人无祖国"这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但它在当年毕竟是影响着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的概念。你看看早期的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在内，有几个是真正在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谈革命的？1924 年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公开地替苏联驻军蒙古辩护，甚至主张让外蒙古实行民族自决？1929 年的中东路事件，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喊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甚至准备调动红军牵制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不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和政治情结。这并不是共产国际强迫的。陈独秀表示反对意见，中共中央还要把他开除出党，以显示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我们一定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和当时的思想水平上来考察。苏联的问题也是一样。一方面，它有民族主义的问题，因为它的国家，即使它自认为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也还是建立在俄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它的成员自然会带有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感情，或者如列宁所说的，带有太多的俄国色彩。但另一方面，作为共产党人，它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它看不起中共，是因为它认为中国没有像样的产业无产阶级的基础。但即使如此，它在同国民党打交道时，也还是要借助中共的力量，去占据国民党的核心机关，去掌握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到头来也只能被共产国际列为同情党。为什么？因为与阶级合作的国民党相比，中共到底还是更符合苏联共产党人的阶级标准。第三，对于民族利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历史地看问题，要设身处地站在当事者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能只是从我们今天的感情出发来批判过去。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在它成为执政党之后，都有一个如何处理革命与外交，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而且往往是外交的需要最终会占据上峰。如果说在援助他国革命的问题上过多地考虑了自己国家的外交需要就是民族利己主义，那么不独苏联如此，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1954 年日内瓦会议我们要求越南党划界停战，1970 年中美实现缓和我们从反对越美会谈转到劝告越南与美国停战谈和，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试想，如果我们只会简单从革命的角度来讨论这种问题，我们到头来是不是会把自己挤到死胡同里去出不来呢？

浅议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

我对创建中共党史学的提法始终存有疑义。中共党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应当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遵循历史学的研究规范，这已经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在今天的条件下，于历史学的门类中，再建一个“中共党史学”，有多少实际意义，让人怀疑。有人说，研究中共党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是因为中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二是因为现有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和研究资料、成果等等已经相当庞大系统，事实上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研究体系。如果《红楼梦》研究、甚至连对钱钟书的研究都能称“学”，中共党史又如何不能称“学”？这里的问题在于，“红学”也好，“钱学”也好，更多的其实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形象说法，其科学意义未必完全成立。一个独立学科的成立，根本上取决于它是否具有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完整的科学体系，而不是看研究对象的影响如何、研究它的人多人少。毕竟，我们这里所讲的××“学”，都是就学术范围而言的，指的只是学术上的分类或科学领域中某一科学的分支。中共党史难以成“学”，一是因为它不具有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二是因为我们其实还很难完全把它纳入到学术研究的范围里来，以致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队伍到今天几乎不复存在。

许多人都强调中共党史研究具有特殊性，这当然不错。但它最大的特殊点不是因为人们所强调的研究中共党史需要较多的理论素养，而恰恰是一般学术研究避之唯恐不及的，那就是它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对中共党史的说明多少会涉及到执政党的形象问题，因此，自开国以来，如何讲述中共党史从来就是受到执政党高度重视，甚至直接指导的一件事。即使改革开放到今天，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多少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侧重于从政治的角度，而非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研究中共党史，依旧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主流。特别是在高校全面取消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课，大批教师脱离中共党史研究之后，中共中央主办的中共党史机构，几乎成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唯一重镇和仅有的组织力量。中共党史研究政治化的趋势，似乎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共党史研究独立起来，简单地当成学术的一个门类，势必会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或者使人误以为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也像在其他学术研究领域那样，并不存在多少禁忌；或者使人把大量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论文论著，也都混同于一般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与其建立所谓中共党史学，倒不如听其自然的好。因为听其自然，学者们可以按照历史学的方法与规范去研究那些可以研究的问题；非学者也可以按照政治的需要去发表那些并不属于学术范畴的论文论著。人们用不着拿同一标准去要求它们、规范它们；也不致造成分不清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甚至把政治标准也混同于学术标准的情况。

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并不等于不承认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更不等于说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不重要。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也是有其重要作用的。问题是，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要真正得到社会的承认，也必须与学术的中共党史研究找到契合点。我主张不必单独设立中共党史学科，就是相信在当前情况下，唯有坚持历史学力求真实地再现历史的目的，日渐萎缩的中共党史研究才可能重现其生命力。因为，即使是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其与学术的中共党史研究的不同之处，也不应当是研究的基本目的，而只应当是研究的范围和程度。换言之，学术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好，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也好，它们在有一点上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最大限度地寻求接近历史

的真实。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固然需要强调研究结果对现实的积极影响，但如果离开了真实，不仅难以达到政治研究者们所期待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因对读者造成严重误导而自毁前程。前苏联充满粉饰和虚假内容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社会后果就是明显的教训。它虽能蒙蔽世人于一时，终不能蒙蔽世人于一世。真相稍一曝光，不仅斯大林个人在世人眼中顿时由神变成鬼，就连苏联共产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不免蒙受耻辱并遭受打击。凡熟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者都很清楚，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最初的动摇和分裂，社会主义的声誉在世界范围内由如日中天而迅速下堕，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苏联党被迫向自己的党员半吞半吐地讲真话那天开始的。讲真话之能够造成如此轰动和严重的后果，不正是因为过去假话讲得太多了吗？

历史真实的社会效用究竟能有多大，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同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样以马列主义为指南，毛泽东当年坚持“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而邓小平后来却坚持生产力标准，把经济建设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就或多或少与他们对历史的认知不同有关。毛泽东积二三十年阶级斗争之经验，包括依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例证，始终坚信一切社会矛盾（乃至党内矛盾）归根结底也还是阶级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社会问题也只能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来解决。邓小平却从亲身经历的“文革”悲剧中，发现过去的观念和作法存在很大问题。在进一步联系到历次政治运动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之后，他最终认识到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不是解决当今社会矛盾的好办法，社会发展完善的最主要动力还在于生产力，许多问题都只有通过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才有逐渐解决的条件与可能。邓小平能够得出这种认识，千千万万与邓小平有着相同经历和体验的干部群众都得出这种认识，中国前进的道路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对历史的感受与认知不同，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前途不同，在此一望即知。如果邓小平没有亲眼看到“文革”，没有几上几下的亲身体验，没有举一反三地联系到建国以来历次运动的负作用，他大概同样不会怀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更不可能有大胆推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作为了。

其实，历史研究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能够让人们通过真实的历史图像，正确地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后来者都像邓小平那样通过亲身体验历史来得出正确的认识，何况这种体验的社会代价也过于沉重。而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所得出的认识，事实上也比依据个人体验所得出的认识会更全面、更深刻一些。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由于每个人所处环境、地位或立场不同，价值判断及感受不同，即使都是亲身经历，他们所得出的看法也未必完全相同。更何况处于特定环境与条件下的个人，不论地位高低，其视野和知情的程度都注定是有相当局限的，这就更会影响其判断和结论的准确程度。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就因为他们所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各异，两人对历史真事的看法就大相径庭，结论更是完全相反。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够不受当事人的情感因素和意识形态倾向的困扰，真正站在毛泽东所说的“客观”的立场上，于事后利用已经可以看到的大量丰富的、多层面的各种文献及口述史料，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到历史的场景和内幕之中，提供出一个远比个人感受更全面、更真实的历史图像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没有真实、准确和全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仅做不到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而且还可以因错误的总结经验教训而重蹈历史的覆辙。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坚持认为：“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其意义多半于此。

当然，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支持。要推动中共党史研究发生积极的社会效果，仅仅立足于揭示历史真实的愿望还是不够的。邓小平为什么能够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念中摆脱出来？除了他从亲身实践中逐渐发现许多敌情认识其实是过度反应之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发现毛泽东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同样依据马克思主义，如果邓小平不能找到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新的角度，即使他能够意识到历史上的许多真实，感觉到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他也还是难以否定毛泽东所坚持的阶级斗争的既定思维模式，无法根据实践的结果来改变前进的方向。由此不难看出，重视理论思维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仍旧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今天，无论学术的还是政治的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会陷于一种比较不受社会重视的尴尬境地，在相当程度上其实也是与研究者对理论问题的思考不够解放和深入有关。在理论观点上不解放、不深入，仅仅满足于按照传统的观点去解释历史，或者把精力放在引进西方的某些研究方法上面，都难以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种种重大历史问题，这样的中共党史研究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已经与过去马克思、列宁所谈论的社会主义，包括与毛泽东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一个实现方法的问题，比如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还是用发展经济的方式之类。这种改变早已遍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甚至过去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三大特征的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如今或者解释全然两样，或者地位大大降低，或者干脆不复存在。过去许多长期被斥之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如今也都堂堂正正地列为我们现实的政策。像人权问题、依法治国问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地位问题，等等，今昔之变，俨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许许多多的改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和历史上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今天的改革就难以真正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社会上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造成一些人在政治上的摇摆与动摇。

坦率地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功利主义地强调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效用。因为急功近利，对学术研究来说通常都是可怕的陷阱。但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现实就是两种形式的研究并存的局面，我们希望也罢，不希望也罢，研究中共党史在今天客观上总是会主动或被动地与现实政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既然如此，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积极地推动中共党史研究，使它有助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进步，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者来说，也还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已经 20 多年的今天，在社会的大踏步前进早已大大突破了我们过去的许多传统观念之后，人们看到中共党史研究读本依旧不能清晰地解释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毛泽东的方式继续革命，而必须另辟新路，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我们从中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因此，深入开展中共党史研究，以便能够深入、系统、全面和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更显得格外必要。毕竟，我们进行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合法性问题却至今未能真正解决，以至今天依旧有一些人能够堂而皇之地拿过去的观点来批评甚至是否定现在，这或多或少应当看成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种悲哀。

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始末

——瓦尔德事件始末

（一）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东方才蒙蒙亮，沈阳城里就响起了枪声。接着，整个城市象开了锅似的，乱成了一团，到处都可以看见成群的国民党兵在逃命。但在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门前的交叉路口，却看不到混乱的人群，只是有几家大门口不知什么时候用杆子挑起了白旗。

位于五纬路与三经路拐角处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大门一早起就紧闭着。院子里看不见一个人影。窗户上也只是偶尔有人头小心翼翼地向外探望一下，然后又赶紧缩了回去。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一个人心情紧张地坐在办公室里，隔壁副领事哈巴特的办公室里虽然聚集着副领事兼新闻处主任司徒克、助理参赞罗卡格几个人，但屋子里同样显得十分沉闷。

“中共!”身高马大的麦克林斯特上尉在二楼楼梯转弯处的窗口前猛然间向楼上跑来，闯进了哈巴特的房间。几乎所有楼里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涌到最近的窗口前，小心地向外张望。瓦尔德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把身体隐在一侧窗帘后面，探着头向外看。

果然，至少有一个排身着浅黄色军装的中共士兵正陆续出现在街口，他们显然是在一位军官的指挥下，沿着街道两侧的墙根，警惕地端着枪，小跑着穿过了街道。整个过程中只听见纷乱的脚步声，既没有枪声，也没有人破门而入。

瓦尔德似乎松了一口气。

在最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沈阳城里几乎从早到晚都处于一种惊恐不安的状态中。长春被围，锦州失陷，注定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命运，国民党在东北占据的最后一个中心城市沈阳已经成为中共军队的囊中之物。于是乎，沈阳城里当官儿的携家带口开始外逃。直到昨天晚上为止，出城的汽车喇叭声和国民党溃兵乘乱哄抢的枪声还四处响个不停。

美国政府自从抗战结束以来，花了差不多２０亿美元来支持蒋介石对付中共。中共对美国政府的痛恨不亚于对蒋介石。“美蒋反动派”的提法在中共的公开宣传中比比皆是，没有人不知道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态度达到了何种程度。但是，即使如此，还在１９４８年初，美国国务院就已经在考虑，一旦东北落入中共手里时，有没有必要撤出沈阳的总领事馆？而最后的决定非常明确，沈阳总领事馆继续保留下去。因为在中国东北保持这样一个外交机构，对美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何况这样还可以尝试着与中共保持某种接触的渠道呢。

没有人知道中共将怎样对待继续留在其解放区的西方外交官，特别是没有人能够知道深受反美教育的中共士兵会怎样对待站在国民党方面的美国政府官员。因此，瓦尔德多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但瓦尔德觉得冒点风险是值得的。国民党毕竟太腐败，太不得人心了。很难说这个国家最后会不会整个落入中共手中。不管未来如何，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为了保持美国人能够继续留在最接近苏联远东地区的中国东北，美国政府说什么都需要与这个必定要控制北中国的强大势力打交道。尽管他清楚地记得两天华盛顿关于保留领事馆不等于承认中共政权的重要指示，但一想到自己能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成为第一个与直接中共政权打交道的

美国外交官，瓦尔德就从心眼儿里感到兴奋。谁知道不久的将来美国政府会不会承认中共政权呢？

夜幕降临了。领事馆前面的街道上人来人往。从昏暗的路灯灯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成群的中共士兵漫步街头，东张西望，好象连电灯泡也要看个究竟。虽然入夜以后城里还有零星的枪声，但整个沈阳城的夜晚差不多有一年多时间没有这样安静了。

第二天，领事馆门前的大街上有更多的军队在通过，但秩序井然，领事馆的官员们如今可以放心地与外面那些显然从未来过大城市的好奇的士兵对望了。而更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傍晚时收到美国代理国务卿的来电，正式批准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国的利益，设法以非正式和私人交往的形式，与中共地方当局建立起有效的工作关系。

几乎所有领事馆的人员都感到，这是一个良好的兆头。

（二）

在军事行动期间，多数中共领导人都担心部队在入城时出乱子。特别是对于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问题，中共中央这时相当重视。１９２６年北伐军南下攻入南京，乱军冲击并抢劫了一些国家的使馆和外国人住宅，造成了美英等国炮舰的直接干预，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很少有人不了解这件事。因此，从中共中央到东北局领导人，在部队入城前都再三进行宣传和教育，要求部队不得侵犯和冲击外国使领馆及外人住宅。受命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陈云这时尤其紧张。还在离开哈尔滨之前，他就几次召集赴沈阳干部动员会，说明外交问题之重要，告诫各级干部在外交方面不得出乱子。在军管会的几次预备会议上，更是几度讨论过处理沈阳外国领事馆、外人银行及其相关问题的办法。同样，中共中央这时也高度重视对外国人的保护问题。它除了同意陈云等人提出的，在沈阳解放后允许外国人继续从事他们的金融及商务活动外，并明确告诉东北局：我人民政府有派兵保护其领事馆安全，防止国党特务捣乱的责任，一俟秩序恢复，军管会撤销，此项武装保护亦即撤销，但仍应派出人民警察在领事馆门外站岗，这是各国通例。根据中共中央前此发布的保护在外华外国人的有关指示，对于西方国家领事馆，中共中央显然也准备一体加以保护。因此，沈阳军管会刚一成立，就迅速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具体执行保护外国人及外国领事馆的任务。

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从１１月２日起开始在大和旅馆办公。除了军管会主任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东北局成员陈云外，还有副主任伍修权和陶铸。伍修权并兼沈阳卫戍区司令，陶铸兼卫戍区政委。同时，朱其文受命担任中共第一任沈阳市市长。由于陈云到得稍晚，伍修权和陶铸首先以卫戍区司令部的名义发布通告，开始整顿和恢复市区秩序。陈云到后，沈阳特别市军管会又接连发布通告，宣布保护中外一切公私财产及其人身安全。

从１１月３日早上开始，沈阳街上经常都可以看到穿着军装的政治宣传人员在张贴告示。两天来，大街上穿流不息的军人渐渐地开始减少了，虽然大多数商店仍旧大门紧闭，但市民们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在街上了。瓦尔德试着步行穿过一条街，由领事馆办公处回到二经路３０号私宅妻子身旁，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于是，领事馆人员重又开始恢复作息时间，每天往返于领事馆和他们在三纬路３０号和七纬路２４号的住宅之间了。

同一天，留在沈阳的美、英、法等三国领事，与苏联商务代办还得到了朱其文就任沈阳市长

的就职通知。这使得瓦尔德对于与中共当局建立的工作关系，更加抱有信心。他很快就起草了一封公函，专门派罗卡格送往市政府的办公地点。函称：

市长鉴：自贵处得到口头通知，先生荣任沈阳市长，请允许我藉此机会祝贺先生就任新职并工作顺利。希望不久能有机会与先生晤面。甚望在先生最近方便时，往访先生。我期望并确信能与先生建立亲密关系。此致市长先生公鉴。驻沈阳美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瓦尔德启。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３日。

第二天，瓦尔德就得到了朱其文市长的复函，邀请他及英、法两国总领事与苏联商务代办第二天下午２点３０分前往市长办公室晤面。这使瓦尔德颇感振奋。尽管，根据军管会关于收缴一切武器的公开通告，这一天一队中共士兵第一次进入到领事馆内，进行了搜查，但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就连瓦尔德一度十分担心的数百名围观的市民，也没有做出任何有威胁性的举动。

不过，5日的接见很大程度上却只是寒暄性质的。根据头一天陈云在军管会例行会议上关于与外国人的晤面必须十分慎重，说话一问三不知的要求，年轻的朱市长只是面带笑容，介绍新政府保护外国人的一些必要措施，这包括发放证件、机动车通行证和标志旗，以及派兵守卫各领事馆和重要的外人住宅等。瓦尔德看上去对派兵把守领事馆和他的住宅一事颇有些异议，但他无法说服朱市长改变其决定。对于瓦尔德最关心的邮政通信与外交信使的来往等问题，朱市长也没有能够立即给予满意的答复。当然，最让瓦尔德感到不满的，是朱市长在会晤临结束前，意外地邀请苏联商务代办留下来单独晤谈。这使得瓦尔德多少有些忿忿不平。他在随后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不无妒忌地声称：他不明白，几个月来始终只是步行的这位商务代办怎么会有了一辆崭新的吉普车。他猜想这种着意对苏联表示友好的行动是中共最高当局指示的结果，因此，今后西方国家的领事可能不会象这位商务代办那样享受到单独向市长申诉的机会，而后者则可以轻易地要求并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

让瓦尔德感到意外的是，三天之后，朱市长竟亲自进行了回访。而且，还表现出极为友好的态度。

８日一早，朱市长在林莉、周砚两个翻译的陪同下先后前往法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进行回访。在美国领事馆内，朱市长特别参观了由美国新闻处创办的图书室，瓦尔德有意详细地向朱市长展示那些工业及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试图引起朱市长对利用美国的技术来重建东北的兴趣。朱市长看来确实对与美国建立贸易联系表示关心。当瓦尔德提出，美国对中国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只是希望能够在商业和技术方面重新回到东北来，朱市长当场表示：美国人是受欢迎的，他很愿意看到美国商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恢复在东北的贸易活动。对于瓦尔德提出的可否与美国通信等问题，朱市长也很痛快地答复说：只要美国的船只能够到达大连港，就可以将信寄到解放区。总领事也可以试着走走苏联远东这条线，因为可以通过满洲里的铁路线送进解放区。

瓦尔德刚刚把朱市长一行人送出领事馆大门，就喜滋滋地转过身来拍着司徒克的肩膀说："我敢肯定，你的那些书是最起作用的。"

瓦尔德当然不会想到，朱市长的这次回访成了他政治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陈云就从翻译那里得知了朱其文对美国总领事的谈话内容。他当即把朱其文叫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进门就把这位年轻的市长披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通。

他厉声问道："关于外交工作已经再三重申过了，务必小心谨慎，一问三不知，你怎么随便乱说！""美、英、法三国领事留在沈阳的目的，完全是对我作各种试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试探我与苏联的关系，你不想一想，你的答复不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吗？"

朱其文这时额头上也开始冒出汗来了。他不住地摇着头，连连说："我本来只是想向他们证明在我党的领导下，市政恢复如何迅速……"

"太幼稚！"坐在一旁的陶铸也严肃地批评说。"美、英、法外交人员都是些职业帝国主义分子，对他们决不能象对待一般人民的态度一样，一个负责干部，连这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

次日，陈云、伍修权和陶铸三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就此事向中央进行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

（三）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０日，河北阜平县西柏坡村。在夕阳余晖照耀下，村外山顶处一片稀稀落落的枫树林在微风中泛着淡淡的红光。毛泽东在山下一间农舍的庭院里，正低着头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猛然间，周恩来从门外急步走了进来。

"主席"。周恩来走近前来，将手里的一份电报递给毛泽东，说："沈阳那里来的。我看这个问题要早下决心了。"

毛泽东读着电报，走到院子中央的磨盘旁站下，将手背到身后，自言自语地说："是要下决心。"说完，他转过身来，声色俱厉地说："这个朱其文，完全丧失立场嘛！刚才老高也从哈尔滨打电报来，谈到这件事，苏联总领事的看法也是一样的，认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不撤是有政治企图的。他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呆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当然，这件事很麻烦，我刚才一直在想，赶他们走也不是办法，……"

"美国人呆在东北，苏联同志肯定会很敏感。是不是可以想些办法让他们自己觉得呆不下去？"周恩来接过话头，问道。"现在是战争时期，通过军事管制的办法，限制他们的活动，我估计时间一长他们自己也呆不下去了。"

毛泽东点点头："我也在这么考虑。不承认他们的领事地位，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来起草一个电报吧！呵，等一等。最主要的是要重申一下，一切外交上的问题，都必须向中央请示，并且在处理上要留有余地，不要搞被动了。"

当晚，在给毛泽东看过之后，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从西柏坡发了出去。中共中央在电报中明确提出：美、英、法等国政府未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对他们现在的领事亦应采取不承认而只承认为普通侨民的方针。并且，我们要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达到封锁和孤立他们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撤走。即使他

们坚持不撤，我们也一样对待，使他们无所作为。电报特别提醒东北局和沈阳军管会，凡外事上的问题，必须严格遵循中央方针行事，如果没有中央既定方针可循的，一概不要忙于答复，应向中央请示，并留有回旋余地。

（四）

１１月１１日下午３时，在沈阳大和旅馆二楼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陈云正在通过电话与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林彪商量东北军区迁到沈阳之后的各项事宜。林彪告诉陈云，毛泽东４日就有电报来，打算调东北部队入关参加攻打平津的战役。不管东北部队何时入关，沈阳的后勤及安全保障工作必须做好。谈到美、英、法等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其中美国领事馆人员相当活跃的情况时，林彪首先关心的就是这些领事馆有没有电台。如果有，一定要缴下来。谈到朱其文的问题时，林彪生气地说："这个时候搞什么花样？乱弹琴！严格照中央的指示办，下令不要见什么外国人，有问题一律写信来，搞不清的一律讲不能回答。"

４时许，陈云召集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委员会负责人开会，会议一致决定就外交问题作出严格规定。这包括：一、未经允许，各部门一律不得接见外国人。二、对方有问题，应用书面提出。三、答复外人有关问题，照决定范围参词，不准多讲。四、超出范围的问题，以不能回答对之。陈云同时在会上提到了收缴电台的问题，说："我们入城之后已经发了一个通告，武器、电台都在收缴之列。武器现在搞得比较彻底，当然还会有一些暗藏的，或秘密仓库，我们不知道，还要下工夫。电台也收了一些，但多半都是国民党溃军的，国民党政府的，但国特的，包括外国人的电台，我们还没有一个眉目。这个电台比那些暗藏的枪炮都要厉害，不能麻痹。要准备再发一个通告，下决心把电台搞干净。"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１０时，一位自称是军管会参谋的军官乘车来到美国总领事馆，向瓦尔德递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第四号通令明确提出，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３６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而第二号公函则明确要求美国领事馆在规定时间内将电台全部送交军管会。

自１１月８日以来，瓦尔德的脸上始终春意盎然。尽管他再也没有见过朱市长，但领事馆大门口人来人往，也看不出有任何异常的情况。甚至两天前，由于有些人在领事馆墙上画政治宣传画，瓦尔德还向市长递送过一份公函，要求市政当局尊重美国政府的财产，劝告人们不要在美国领事馆的墙上刷写标语或作画宣传，而后也果然再没有人这样做，因此，瓦尔德对军管当局下令收缴电台一事也没有放在心上。他虽然很快致电国务卿说明了这一情况，但他暗自相信，只要向市政当局说明这部电台是属于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且是领事馆目前保持正常工作的基本手段，也就够了。

他当天致函沈阳军管会陈云主任称：

今晨１０时奉到公字第二号公函及第四号布告，略称："一切无线电台及其设备须向本会报告"。查敝总领事馆自１９４６年３月重行办公以来，即设有无线电台，以便向华盛顿国民党及驻南京大使馆拍发美国政府公报。此项电台现设置于三经路及五纬路拐角处之美国总领事馆内。该项电台之存在及使用，系由中国国民政府之承认与批准者。再自本年１１月１日

因邮政及公用电报发生阻碍，上项电台已成敝总领事馆与国务院及南京大使馆之唯一通讯方法。既无任何相反的指示，敝人推想本地当局方面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而敝总领事馆之存在则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故希望贵会即予批准此项电台及使用为盼。

瓦尔德看来相信，共产党需要美国总领事馆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它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直到１１月１６日白天，他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象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声称：中共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他们将不能不考虑解决各种生产和交通的问题，他们需要外国的商业合同，为此必须与外国人建立正常的交往，并建立国际通行的金融制度。因此，这里没有任何逮捕或骚扰留在沈阳的外国人的例子。（他们的）态度仍旧是正确的。相信共产党人将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的和友好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再试图压迫外国人，或者利用中国的行政权利和政策来制造中国人自己的特权。同时，外国人的建议将被接受或给予考虑，虽然最后的结论和行动要由共产党政府自己来决定。

瓦尔德甚至估计，中共对美国尤其充满兴趣。所以，对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

不管瓦尔德是不是过于乐观，反正象瓦尔德估计的那样，从１５日上午１０时至１６日晚上１０时整整３６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尽管，在军管会规定的时限即将来临的前一个小时，即９时许，军管会的那位参谋再度出现在领事馆门前，但只有一名士兵陪同的他显然不是来行使管制权力的。他只是通知瓦尔德说，军管会负责人将于１７日上午１０时在大和旅馆军管会办公地就收缴电台问题向他作出说明。但次日上午９时许，瓦尔德再度得到通知说，会见时间改至１８日下午３时。时间一推再推，瓦尔德更加断定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了。

１８日上午，瓦尔德得到国务院的电报，要求他务必坚持领事馆惯常的权利和特权。这就更加确定了瓦尔德所必须采取的态度。

下午３时，瓦尔德在副领事哈巴特的陪同下，准时来到大和旅馆一楼军管会的会客室。一位中等身材，有着知识分子气质的军人出面接待了他们。据他自我介绍，他是军管会副主任兼卫戍区司令伍修权。

双方简单寒喧之后，伍修权当即切入正题。称：“瓦尔德先生相信已经了解了军管会关于收缴电台的通告内容，我们也接到了先生的信件。但是，关于这件事，因为是在军事管制期间，恐怕没有转圜的余地。不论先生的电台有何重要作用，也不论电台由谁人所属，在军事管制期间，一律不得使用。当然，先生所有收发报机及其零件，本会将妥为保管，并不使用。此点还望先生能够遵行。”

瓦尔德声称：“我们确实认为这样做会有损于本领事馆的存在。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电台，我们将无法与国务院和大使馆取得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行使保护美国侨民利益的正常使命。”

伍修权回答说：“继续使用你们的电台将是违抗军管会命令的行为，我相信先生能够了解它

的严重性。至于先生与美国方面的联系，我想重要电报可用明码电报，转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交新华社代发。”

看到伍修权毫无商量余地，瓦尔德开始知道事情有些不妙了。在和哈巴特低声耳语了几句之后，他转过脸来做出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把手一摊，说：“请您了解，电台是美国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我们是无权交出的。既然电台被禁止使用，那么，是否可以由军管会派人就地查封，等我们向国务院通报之后，获得批准后再做处理？”

“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电台必须交出。”伍修权斩钉截铁地说。“希望瓦尔德先生能够将全部收发报机及其相关零件等，如数送交军管会保管。”

双方为此争论甚久。最后，伍修权站起身来，说：“既然先生等不肯自动点交，那么我们只好派人到领事馆去取了。”

瓦尔德也一脸不高兴地站了起来，态度傲慢地说：“那是你们的事情。”

“那好。我们一定要取。”伍修权毫不示弱地回答他。“现在请您立即回领事馆，将有关物品点验清楚，十七点时我们会派人去取。”

（五）

瓦尔德的沮丧是不言而喻的。就在一天之前他对他的对手还是那么充满信心，而现在，他竟充满了失落感。失去电台，又没有可靠的通讯途径，领事馆将难以发挥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中共军管会官员不容置疑的强硬态度，给今后领事馆在沈阳的命运蒙上了一层阴影。他唯一能够用来安慰自己的，就是英、法两国领事馆本来就没有电台，这下也算是扯平了。既然英、法两国领事馆没有电台能够生存下去，美国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例外的。

“但愿中共说话算话。”瓦尔德也只好暗自向上帝祈祷了。

一回到领事馆，瓦尔德就忙不迭地接连起草了两封给沈阳军管会的信，和一份发给美国国务院的明码电报稿，派人送给军管会。给军管会的第一封信内容如下：

敬启者：查敝领事馆之电台既已不能使用，今日午后已蒙贵会伍副主任同意，请即将内附之电报，密码５９０７，时限午后４时，代为拍发至华盛顿国务院。蒙代拍之电报费用，敝总领事馆随时可以奉还。知荷鼎助，先伸谢悃。此致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特别委员会陈主任委员阁下。驻沈阳美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瓦尔德。

所附电报声称：

我于本日下午３时被召至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该会副主任通知称：目前沈阳军事管制期间禁止使用我政府之电台，并应将全部收发报机及其真空管和相关零件，交予军事管制委员会。该会于军事管制期间将妥为保管，并不使用。……当我声明国务院期望与沈阳总领事馆继续保持经常联络时，该副主任称：必要时明码电报经军管会审查后，可交由新华社代发。这一

电报即按此规定发出。请用同样方法，或其他可使用的方法通知我：是否接到此电。

同时，瓦尔德在给军管会的另外一封信中，对军管会的收取电台的行动提出抗议。声称："敝人不得不声明，此项机件系美国政府之财产，敝人并未受权交与任何人，因此敝人不能自动交出"。"贵方认为应当将此项机件取去，敝人无力反对，但敝人必须抗议此项机件之取走，因该机件系美国政府财产，所有保管及使用权系敝一人负责也"。

在匆忙写完了上面几件函电之后，距离军管会来收取电台的时间只剩下不到３０分钟了。瓦尔德急忙来到收发报室，向报务员张仲英匆匆口述发给司徒雷登大使的电报。其内容如下：

大使。沈阳电台现在关闭，将不再开通，它正在被没收的过程之中。尽快通知国务院。瓦尔德。

电报发出之后，瓦尔德与哈巴特叫来的无线电技师希克尼、报务员蒋正侠，和张仲英一起，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将 2 台台式发报机，9 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大批真空管及其他无线电零件分别集中在领事馆的发报室和译电室里，等着军管会的卡车和士兵按照规定的时间前来收取。

但是，５点、６点、７点……，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了，门外并没有出现军管会的卡车和士兵。

为什么沈阳军管会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收取电台呢？

这时，在大和旅馆门口早已准备好了卡车和一个排的士兵，负责执行收取任务的参谋人员已楼上楼下跑了个够，早等得不耐烦了。在陈云的办公室里，伍修权、陶铸等四五位领导人也一直在就要不要立即派队去领事馆收取电台不停地争论着。终于，长时间没有吭声的陈云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说："我看还是叫林总直接给中央发电催一催，今天不去取了"。说完，他拿起电话机，一边拨号，一边向伍修权挥挥手说："叫他们撤回去吧！"

原来，军管会在发出第四号通令，决定限期３６小时收取电台之前没有特别考虑到外交问题。待美国总领事来函说明该馆拥有电台，但不同意交出，方才意识到此事涉及外交，掌握政策界限较为复杂，于是致电东北局并中共中央说明情况。致使３６小时期限未能执行。１７日，原定约瓦尔德来谈，发出最后通牒，因未见中央回电，陈云又下令改期。陈等再发电报致中共，请示办法。因估计１８日定能得到回电，故而由伍修权约瓦尔德下午３时见面，发出最后通牒，再次限期下午５时。不料等到傍晚，仍不见东北局或中共中央的回电。不得已，陈云这时只好拨通了林彪的电话，向他说明了这一情况，请他立即用军区的电台直接报告中央，请示办法。这样一来，下午５时的期限自然又难以执行了。

晚７点半，林彪根据电话商量的结果，向中共中央发电报告了此事。电称：

今日下午修权接见美领，请其将电台交出，美领顽拒不交，谓：此系美政府财产，未经国务院准许，彼无权交出。又谓：交出后无法对外联络。我答：重要电报经我审查批准可由新华社代发。后在交接手续上争执甚久，彼坚持不肯自动点交给我。最后我……通知对方今十七时去取并准备好了通知信和人员等，

但一则现已黑天，二则此事在形式上是属于入领事馆强制收取，请中央指示是否可行，故决定今夜暂不取。

（六）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８日，晚９时许。西柏坡。

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早了一些，院子里的杨树叶还没有落光，天上就已经纷纷扬扬地飞起了细细的雪花。周恩来刚一迈进院门差点儿和飞跑出来的胡乔木撞个满怀。

“唉哟”，胡乔木急忙一闪身，抬头一看，笑了起来。说：“副主席呀！正好，主席正找你”。说着，陪周恩来走进了毛泽东的房间。

“恩来同志”，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支毛笔，坐在炕上，一边示意周恩来坐下，一边抬起头来问：“给沈阳的回电带来了吗？”

“带来了”。周恩来从衣兜里掏出电报稿，递给毛泽东，说：“我和少奇同志商量过，他也认为我们有权进领事馆检查和收取电台。”

毛泽东接过电报，飞快地读了起来。猛然间，他又抬起头，问站在一边的胡乔木：“高岗的电报给少奇同志看过了吧？”

“看过了”。胡乔木点点头。但他马上又问道：

“对了，少奇同志还特别问了那个马里宁是不是就是那个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我说是。但是，１６日电报里说，莫洛托夫对于我们采取挤走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将会很高兴，这是不是等于说马里宁要求我们没收美、英、法沈阳领事馆的电台这件事，其实也是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

“当然是。”看到毛泽东仍旧埋着头读电报稿，周恩来接过去答复胡乔木说。“因此主席告诉他们：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嘛！”

毛泽东读完电报，抬起头来，说：“不知道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顾虑？”

“外交上没有经验，怕出乱子。”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是在说沈阳的同志，于是回答说。

“那就不要先斩后奏嘛！”毛泽东有些生气了，“自己下了命令，自己又不去执行，难道中央不同意就取消命令不成？人民政府的尊严不要了？我看这样好，既然敢于蔑视我人民政府的命令，我正好有理由把他们软禁起来，没有我们的准许，不让他们随便出入，逼他们走。但是，也要批评沈阳的同志几句。”

说着，毛泽东拿起毛笔，在电报稿的空白处做了一些补充。然后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电

文小声读了起来：

此事你们没有事前请示，自己做了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电台的决定，并已发出了通知，限期已满又不去取，等候中央回电是否同意，难道中央不同意你们就准备取消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吗？中央早有指示要你们令各旧领事馆交出电台。你们既已发出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的命令，现限期已过，美国旧领事仍未将电台交出，即应由军管会给以最后命令，说明如在令到后若干小时内再不交出，本军管会即认为该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本会有权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几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战时的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

周恩来一边读，一边顺手拿起毛泽东放在桌上的毛笔将毛泽东修改过的地方勾划清楚。然后站起身来，说："我马上让电台把它发出去"。

但周恩来走了不过两个多小时，又急匆匆地返了回来。一进门就说："那封电报刚刚发走，林彪他们又来了一封电报。他们又给美国人规定了一个期限，因为没有接到我们的回电，又作废了。"

毛泽东接过周恩来手里的电报，看过之后不满地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领事馆强取罢了，怕它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它什么权利关我们屁事。声明态度严厉些，让他们知道，那里是解放区，不是国统区，他们不遵守我解放区政府和军管会的命令，我有权禁止他们的出入自由，直到将他们驱逐出境!"

"好，我马上就照主席的意见起草一个电报给他们。"周恩来说着转身走了出去。

将近１２点的时候，周恩来又来到了毛泽东的房间里，将他起草的电报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只改动了其中几个字，在报头"毛、刘、朱、任阅"几个字中的"毛"字上圈了个圈，说："我看可以。"

电报随后又被先后送给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政治局成员看过，到第二天凌晨5时左右发了出去。

电报的主要内容如下：

美领拒不点交电台给我，其目的在逼我入馆强取，造成我进入领馆检查及强取美政府财产的两种籍口。我之对策，应立于主动，首先向其声明，我解放区政府与美国政府并无外交关系，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并非正式外交来往。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实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馆停止电台连络，交出电台由我保管封存，待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旧领馆人员既拒绝接受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进入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中共中央在接连两封电报里已经表明了他们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强烈不满，这种态度一方面来自他们既定的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一方面也与瓦尔德以美国政府为要挟拒交电台的傲慢态度有关。不管他们这么快就明确决定禁止瓦尔德等人行动自由，是不是被瓦尔德激怒的结果，反正瓦尔德这回是注定要倒霉了。

（七）

１９日下午４时左右，在大批警卫人员和参谋人员的陪同下，东北局常委高岗、张闻天等人分别从两辆美式吉普车和一辆苏制卡车上跳了下来，笑容脸面地与早就等在沈阳大和旅馆门前的陈云、伍修权、陶铸等军管会负责人握手寒暄。随后，高岗等在陈云等人的陪同下走进大门，来到临时用两间客房改造成的大会议室，坐下来听取军管会和市委工作人员的汇报。

当陈云谈到他们刚刚接到林彪那里转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必须迅速进入美国领事馆，收缴电台，并禁止美国领事馆人员与外界来往的电报指示时，高岗当场打断他的话，问道："中央的电报我刚才一到军区就看到了。问题是这件事你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什么时候动手？怎么禁止美国人出入，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陈云答道："这件事具体实行起来还要准备一下，首先要准备一个书面的通知，说明我们强行入馆取台的充分理由，还要教会执行参谋及有关部队一些技术上的方法，比如进入领事馆要注意什么事情，如果他们坚决不配合怎么办，如果拿到电台怎样办理接收手续等等。同时，既然要禁止其自由出入，也要有一些明确的规定，还要考虑三处的美国人是统统赶在一起好呢，还是分别看管？我看，今天我们商量好这一切，明天采取行动，如何？"

伍修权这时插话道："还有一个情况也要考虑。上午苏联商务代办专门来过，是我接待的。他好象是专门为这件事来的。他不仅要求我们尽快没收美、英、法领事馆的电台，而且强调对这些西方外交特务不要客气，应设法赶他们走，因此他建议我们不仅要禁止他们自由出入，还可以切断他们的电灯、电话，一方面防备他们留一手，继续隐藏电台，秘密通讯，一方面也使他们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络的可能，失去呆下去的条件。他说，过去他在沈阳，国民党就是这么干的，长期不给他供电，说是坏了，弄得你没办法。"

高岗点点头，看来对伍修权所提供的这个消息很感兴趣。他说："我在哈尔滨时苏联朋友再三向我说，他们对我们同意美、英、法继续呆在沈阳很不以为然。这不仅仅是一个没收电台的问题，电台必须没收，否则他们很可能搞特务活动，这对我们军事上很不利。因此，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挤他们走，让他们滚蛋。这是最主要的。苏联商务代表这个办法我看很好。那我们就这么办，今天具体商量一下行动步骤，明天上午把一切都准备好，明天中午开始行动。"

２０日上午１１时半，两辆急驶而来的军用卡车在三经路和五纬路拐角处的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大门口，急速停了下来，刹车时发出了一长串刺耳的响声。接着，大批士兵从车篷里先后跳了下来，沿着领事馆两边的街道迅速排开。

两名军官模样的中等身材的军人带着５名持枪士兵敲响了领事馆的大铁门。

瓦尔德迅速走下楼梯，来到前厅，示意已经跑到门廊里的一名职员打开大门。

门开了，两名军官踏上台阶，站在楼门口，其中一个用英语冲着里面的人问道："哪位是瓦尔德先生？"

瓦尔德快步走到两位军官的面前，伸出手去，说："我就是。"

正面的那位军官只是看了瓦尔德一眼，对瓦尔德伸出去的手毫无反应，而是从上衣兜里拿出一张印着字的纸在他的面前展开，开始大声宣读。这位军官的讲话带有某种地方口音，瓦尔德的汉语本来就不好，这回更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站在这位军官身边的一位显然是翻译，他很快地将军官宣读的文件翻了一遍，似乎是说："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但瓦尔德仍旧不明白，他既然已经允许军管会取走电台，这些人凭什么还要将他们软禁起来。不过，当他大声质问军官有什么理由禁止他和他的馆员的人身自由的时候，只见这位军官连眼皮都不抬地吐出了几个字。这回不用翻译他也听清楚了，军官说的是："这是你们故意违抗军管会命令的必然结果。"

瓦尔德觉得头皮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两只眼睛直冒火。军官后来又说了什么，他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听见。直到军官和几名士兵在他的日裔随员巽四郎的带领下走进前厅，他这才意识到他该干什么。

瓦尔德尽量做出顺从的样子，带着两位军官来到收发报室和译电室，清点已经整理好的电台和其他相关零件。清点工作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只是在巡查到底层的电机房时，那位负责的军官坚持要连为领事馆准备停电时发电和抽水用的发电机也要收走，瓦尔德不得不争了几句，但仅此而已。最后，军官拿出几张写着字的纸，一张一张地填写，然后由翻译一一交给他签字。

瓦尔德看清楚了，这第一张是一份收据，上面写着萧桂盾代表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出据的证明一份，证明彼收到的 3 台发电机、手摇马达 3 个、2 台发报机、9 座无线电收发报机，及真空管与其他无线电器材等，均为美国政府之财产。

第二张是一份军管会收到的物品清单，说明除上述电器以外军管会未从美国总领事馆带走其他物品。

第三张是一张保证书，要瓦尔德保证除军管会已收取的电台以外，领事馆及其美国政府在沈阳所有的院落及住房内，没有也不再使用任何无线电台。

瓦尔德无可奈何地一一在这些文件上签了字，然后眼看着士兵们进来把电台等全部搬到门外，装到卡车上。他再次提出，希望能够和朱市长或军管会的负责人见面，讨论有关软禁的问题。姓萧的军官头也不回地回答说：软禁期间会有一位宋参谋来管你们的事，你随时可以找宋参谋来提出你们的请求，或要求转送有关的函件。瓦尔德目光阴沉地看着这位军官和那个翻译走出门去。这才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到楼上，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发呆。

整个收取电台的工作进行到大约午后 1 点钟。瓦尔德注意到，当卡车运走了那些士兵和他们收取的电台等物品之后，领事馆的大门被从外面关上了，代替过去市政府派来站岗的警察的，是两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一名配戴手枪的军人。瓦尔德猛然间想起应该给在安息日会院的妻

子打一个电话。他拨通了电话，他听到妻子紧张的声音，知道安息院的大门口已经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守住了，就连孩子们也不允许随便出入了。他小心地安慰了妻子几句，放下电话，急忙又拨通了美孚院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哈巴特，他的消息与他所想到的一样，没有人能够自由出入了。

瓦尔德头都大了。他很清楚共产党当局想干什么。这位曾经在东北干过3年，以后在苏联干过１２年，又在伊朗干过8年，从未栽过跟头的老资格外交官，如今心里不能不开始打鼓：自己的外交生涯是不是到此就要结束了？

（八）

美国政府这时不仅不承认共产党，而且一直在帮着国民党打共产党，可在共产党占领沈阳之后，它却坚持要在沈阳留下来。即使到这时，明知沈阳的电台被没收，沈阳领事馆的人员被软禁，不论是司徒雷登大使，还是美国国务院的负责官员，却都没有想过要将瓦尔德等人迅速撤出来。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重新与沈阳领事馆恢复联络，先是试着经过大连的美国领事馆就近送信去沈阳，接着又试着通过北京的领事馆派人走北宁线去送信，最后没办法，又电令驻香港的美国总领事设法与中共在香港的代表取得联系，探询有关瓦尔德等人的消息与中共的意图。总之，美国政府还是希望瓦尔德能够在沈阳坚持下去。

把领事馆留在共产党的占领区，真的是象瓦尔德当初对朱市长所讲的那样，纯粹是为了以沈阳的美国侨民的商业利益吗？当然不是。事实上，如果不是苏联人坚持把中国的东北看成是他们的势力范围，美国政府早就想在东北插上一脚了。１９４６年，当美国外交官随着国民党军队来到沈阳，建立起他们在东北的第一个总领事馆之后，他们就极力在东北扩展自己的影响。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进一步向北沿伸，那仅仅是因为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在哈尔滨等城市设立领事馆，而长春等大城市又长期处于战争的边缘。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国东北在它对苏关系中的战略价值，特别是在１９４７年美苏在欧洲进入冷战状态之后，它就对东北的地位更加看重，必欲在东北保持自己的影响。利用其在沈阳的领事馆，打着照顾美国侨民的名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保持自己对苏联的观察站，这显然是一些美国官员的如意算盘。甚至，冷战刚刚开始不久，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在派人以沈阳领事馆雇员的身份，在中国东北建立专门针对苏联的秘密特务组织了。眼看中共军队即将占领沈阳，他们还专门向有关的情报人员发放了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小型发电机以及密码本等特务工具。多半是由于中共占领沈阳过于神速，美国情报人员的这一工作未能进一步展开，以致会被解放军军管会在收缴沈阳领事馆电台时，收缴到9台无线电收发报机。显而易见，在一个领事馆内，在拥有两台台式发报机的情况下，仅仅为正常的外交业务而保存9台便携式无线电收报机，是毫无道理的。

苏联人早就在怀疑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具有从事情报工作的职能，他们极力主张中共将美国人赶出东北，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这种情绪也同样影响到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当如此多的无线电收发报机被送到大和旅馆的大厅里时，在场的伍修权、陶铸等人也禁不住大吃一惊。高岗在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这个领事馆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务窝子！"常委们也几乎一致认为，美国领事馆确有从事特务情报活动的嫌疑。因此，他们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认为：美领不会如此老实，领馆内或美孚院、安息院等很可能还藏有秘密电台。因此，继续允许他们留这里有弊无利。至少，"美领馆内有这许多电台，

似乎已有逐其出境之理由”。另外，既然美领馆内有这样多电台，相信英、法领事馆也不象他们所说的没有电台，估计也藏有电台，是否应对其进行搜查。至少，他们相信，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断其水电和电话，加强监视是有益的，因为这样可以使其无法与外界联络，也难以进行情报传送工作。

东北局领导人的怀疑几乎当天就得到了证明。

２１日下午３时，根据有关情报，东北局社会部抓获了潜伏特务伯彦苍，在伯的住处起出与美国领事馆同样型号的便携式无线电收发报机两台。当晚，据内线，又抓获另一特务分子吴人俊，起获同样的电台两部。经过连夜审讯，又捕获佐佐木等人，再起获两部同样的电台。这三人口供如下：

伯彦苍供称：１９４７年经美籍日人中村介绍，充任其总部在上海的美军联络团驻长春分团负责人私人蒙语教师，后被发展为情报人员，月薪５０美元。１９４８年８月到奉命来沈阳，归美军联络团驻沈阳分团美籍日人西田领导，负责调查外蒙及苏联的有关情报，月薪增加为每月１００美元。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７日去美军联络团取款时，接到负责保管两部电台与密码，以待上海受训之情报员来后使用。

吴人俊供称：１９４７年１２月经美军联络团的巴兰德森介绍参加美国情报工作，受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内自称亨特的大个子领导，担任沈阳至天津间的交通工作。每月薪金为４０美元，外加旅费１０美元。一般每两月跑一次至两次。信件由沈阳美籍日人北迁卓二送交其住处，再由他送至天津一美国人住处，薪金均由该美国人付给。亨特于１０月２８日召其去领事馆，说明中共即将占领沈阳，送信工作不再进行，今后改用无线电联络。当天亨特交给其１４两金子，作为半年之薪金，并将两部电台和６本密码本藏于箱子内送至其往处，叮嘱他目前任务即为保护电台，潜伏下来，待他派人来时，即可启用电台。

佐佐木供称：１９４７年１０月经美籍日人北迁卓二介绍认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雇员美籍日人西田，初被聘为翻译。后西田转任美军联络团付队长，介绍其加入情报工作，集中搜集苏联和解放区的情报，接连发展情报员３人。１０月２７日被召至西田住处，西田交其两部电台，说有一上海来的情报人员将会去取。

刚刚从美国领事馆收缴大批电台，又接连破获特务案件，不仅起获的６部电台与美国领事馆收缴的电台完全相同，而且所有供述人均一致供称被美国人雇佣从事情报工作，而雇佣者又都曾利用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为掩护。这件事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有着从事特务活动的嫌疑。

２３日下午４时，东北局领导人集体听取了社会部负责人的汇报。而后，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美国领事馆仍很可疑，但一时又想不出适当的办法抓到证据。

张闻天问：“是否能够找到所有领事馆人员的照片，让那几个人对一下？”

社会部负责人答复说：“我们已经找到贴有照片的美国侨民的名册，让他们看过，但没有结果。”

“这两个美国特务会不会化名藏匿在领事馆里？”高岗问道。

“不会”，列席会议的陶铸接过去回答说：“领事馆里最初关了２２人，２１日晚，根据瓦尔德的请求，我们已将其中１８人送回他们在美孚院和安息院的住所，现在里面只有瓦尔德和那个巽四郎，其他两个，一个是在我们禁止出入前进去阅览图书的德国侨民，另一个是他们雇用的一个中国职员”。

“那么，美孚院和安息院查过了吗？”林彪问。

“没有。我们现在确实应该搜查一下这两个地方，也许里面还藏匿着电台和特务分子。”陈云回答道。

最后，会议决定电告中央，请示是否可以根据供述人提供的亨特和西田的特征，前去美孚院和安息院进行搜查，也许可以找到化名的或藏匿的特务指使人和秘密电台。

（九）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清晨。西柏坡。

光秃秃的树枝在半空中发出嗖嗖的响声，北风翻过北面的山梁，沿着山沟刮到村子里来，凸凹不平的路面上不时地卷起阵阵尘土。

毛泽东的警卫员正在小心地把一大团棉花塞到窗纸的破洞里。屋里的毛泽东正在和周恩来、刘少奇大声谈论着什么。忽然，他冲着窗外喊道：“搞那个做甚！没得用！”听得出来，毛泽东此时的心情不大好。

刘少奇说：“这件事做得是很欠考虑……”

“不是一件事，也不是两件事！”毛泽东打断了刘少奇的话，大声说。“朱其文的问题就很幼稚。那里的报纸又去替美国涂脂粉。现在好了，态度端过来了，又一下子走到另一边去，把什么电线、电话统统给人家割断了。”

“不是不可以割，问题是这么大的行动不事先请示。刚刚批评了限期收缴电台不请示，这次断电又是不请示。”周恩来补充说。

“报纸的事是怎么一回事？”坐在炕边的朱德问了一句。

周恩来回答说：“是这样。我们的电台那些天破译了沈阳美领的电报，电报说沈阳的报纸报道了沈阳美领抗议国民党轰炸沈阳。当然，这不会是军管会领导的报纸，可能是别的什么报。”

“恩来起草的电报看过了么？”毛泽东转过脸去问刘少奇。

“看过了。主席补充的几个地方我认为很有必要”。刘少奇回答说。“我同意对美国和英、法在态度上要有所区别，现在集中矛头对付美国。”

朱德这时站起身来，拿起桌上的电报稿，指着毛泽东加在左页空白处的一段话，说："我看主席这段话加得好。一定要我们的同志看远一点，现在不承认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这是为了使我们自己在外交上立于主动，不是说我们永远不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也不是说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毫无区别。"

"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大懂得策略。"毛泽东接过了话头，说："东北那个地方比较特殊嘛！入了关，是不是也都象东北一样要把这些国家的领事馆统统赶走？英、法都在设法和我们华北的解放区做生意，统统都不做了？对英、法领事馆无论如何不能同对美国领事馆一个样子，不要限制他们的出入，断了的电也要恢复。当然也不必马上修复，那样也不适当，一件一件来。"

毛泽东这时的看法已经变得比较清晰了。他虽没有明明白白地讲出来，但熟悉毛泽东思路的周恩来，已经开始暗暗地在头脑里整理出一些基本的轮廓出来了。

几位领导人走出毛泽东的院子之后，周恩来一边走，一边向身边的朱德概括他所理解的毛泽东的想法。据他说：毛泽东的设想多半包含以下几点。第一，尽管美国等国仍在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一定要与它们为敌，只要它们能够与南京断交，停止支持国民党，转而承认共产党，中共未必不打算同它们发生外交关系。第二，即便美国等国政府这时不能放弃国民党，只要它留在解放区，愿意遵守中共当局所规定的各项法令，我们也未必要采取处处与之尖锐对立的态度。因此，在东北采取挤走的方针是特例，那是因为东北同苏联、外蒙及北朝鲜接壤，中共中央需要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利益。第三，即使在东北，即使估计到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国民党和承认共产党，从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出发，也不宜对美、英、法三国同等看待和对待。因为顽固地、并且是有效地支持国民党的，其实也只有美国，英、法两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态度颇为暧昧。区别对待的政策，将会有效地孤立美国，最终加速美国抛弃国民党的过程。

显然，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在内，大家都同意周恩来的这种概括。刘少奇也强调说：从意识形态角度考虑，特别是注意到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的现实情况，我们对美国政府当然不信任。在９月政治局会议上，主席明确讲过，一旦新中国建立，能够承认我们的恐怕只有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我们的估计都是一样嘛！现在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变。只是，两个月前，我们估计还要三年才能解放全中国，那时当然不用特别考虑西方国家的承认问题，现在，东北全境解放了，美国等国领事馆也坚持留下不走，这至少说明存在着外交接触的可能性。不管美国政策变或不变，不要从我们方面把门关死总是有益的。一方面赞同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又强调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这些西方国家政府建交，因而主张即使在沈阳贯彻挤走这些国家领事外交人员的方针，也应留有以后转环的余地，这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一种有机的结合。我看，可以告诉东北局，即使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象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设想和做法，突然被２４日东北局发来的关于抓获美国间谍的报告给打断了。

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人意料的。

当毛泽东读过电报之后，脑子里立时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看样子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还不小呢！

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这下子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此，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开始发生变化。周恩来在随后起草的电报中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毛泽东还特别告诉周恩来：“不光是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是这些国家的记者也要小心。应该加上一条：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但其目的是要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这对正在沤心沥血地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要谋他的命根子。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不禁勃然大怒，拍案道：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这种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

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具体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同与中共有过良好关系的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

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不能不促使他们对美国政府以及它在沈阳的领事馆开始充满强烈的反感。

（十）

被软禁在领事馆里的瓦尔德可谓百无聊赖，每天除了可以从窗口上看到街道上的来往行人以外，几乎与外界完全隔绝。一周里，尽管他的那个中国厨子可以有两到三次机会在一名士兵的武装监视下，前往市场里去购买食品，但瓦尔德并不屑于从他嘴里知道外面的情况。其实也探听不到什么消息。

瓦尔德在２４日按照前次谈话中伍副主任同意的方法，又交了一封明码电报给门外的军官，请其转交军管会审查后托新华社代发香港美国总领事。几天过去了，还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瓦尔德其实心里清楚，军管会不会代发任何电报，更不要说这封电报了。

在这封电报里，瓦尔德将共产党软禁沈阳领事馆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做了说明，着笔时虽尽量不带感情色彩，避免触怒军管会，但其内容仍旧犯忌。除了其中所说中共“虽然无礼，但我

领馆人员未受极大凌辱或虐待，我的身体与健康甚好”一句以外，其他所说美国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三处被软禁的情况；没收电台甚至停电时发电和抽水的发电机；从２０日中午起开始断电断水，连腊烛和煤油灯也不准使用，致使领事馆内开始被软禁的２２人，从２０日下午到２１日下午只有一桶水饮用，２１日下午以后才得到足够的水煮饭和做有限的个人卫生之用，等等情况，都绝对不会令沈阳中共当局感到满意。

事实上，瓦尔德几乎处于无人理睬的境地。２３日，军管会派人送来卫戍区和公安局关于收缴小型武器弹药的公告，他立即起草一信交给来人，说明在他的私宅内可能存有少许旧式三八口径或点三八零口径的手枪子弹。他很愿意送交地方政府机关。只是需要与军管会代表见面，以便向后者说明子弹存放的具体地点。但此信去后也石沉大海。

２５日，瓦尔德写信给军管会，要求以美元兑换解放区所发之东北票，并要求军管会派人前往被软禁在安息院的副领事司徒克处取来领事馆保险柜钥匙，以便开保险柜取钱。但未得答复。

２６日，瓦尔德再度要求转信给其妻子，请其妻提供火柴、剪发剪子、自来水笔、蒙文字典、英俄字典、皮大衣等物，结果也毫无消息。

瓦尔德当然不会知道，中共破获沈阳美特，已使他的领事馆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引起军管会的严重怀疑，担心他就是美国特务活动的直接参预者或指使人，会利用各种机会传递情报或销毁证据。因此，尽管中共中央曾明确来电，说明在我监视之下，不必禁止瓦尔德与其妻来往，一切有关美国领事馆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必须首先设法从已捕人犯口中获得，掌握确实证据后才能采取必要行动，但为谨慎起见，东北局仍旧坚持暂时不给瓦尔德等人互相来往的机会。

进入１２月以来，鉴于淮海战役顺利进行，改编成第四野战军的东北解放军已经完成对平津塘沽地区敌军主力的切割包围，沈阳敌特活动已经不足以威胁自己的军事进程，在毛泽东的正式批准下，周恩来明确指示东北局恢复了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之间的往来，并于圣诞节当天恢复了对领事馆等三处地点的供电。但对领事馆人员的侦察监视仍在继续，卫戍区专门派出人员和电台在三处设点，进行长时间电波跟踪，并几次通过电台跟踪，发现美孚院内副领事赛本斯的房间里偶而有无线电波发出。为谨慎起见，东北局要求侦听人员必须掌握确实证据，故而一直没有采取行动。

２８日，零点４０分，侦听单位终于追踪到赛本斯房间内发出的电波，此次电波断断续续达３０分钟之久。由此似可证明美孚院仍藏有秘密电台向外发报。据此，张闻天兴奋地以东北局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主张继续侦听，在有把握时，当其正在发报时进行突然搜查，争取当场照像，收缴电台，逮捕报务员，并乘机进行全面搜查。３０日，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送交毛泽东等批阅后，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此项行动。但很可惜，自此之后，侦听单位再未截获由美孚院发出的无线电波，致使搜查行动一直未能进行。

不管能否当场抓住沈阳美国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至少在此之后，要想让中国共产党人相信沈阳的美国外交人员没有卷入针对苏联和中共的特务活动，是不可能的了。

（十一）

１９４９年1月间，在被白茫茫的积雪覆盖着的小小的西柏坡村，几天来经常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毛泽东等人一起，高一脚浅一脚地来往于通向村南一间大屋子的又硬又滑的道路上。原来，中共领导人正在这里召开重要会议，坐在小板凳上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外交问题被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准备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

毛泽东坐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异常严肃地说："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

他说到这里，用手在空中比划着说：这就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免得我们的这些客人老是想在我们的屋子里扬些个灰尘，给我们制造些麻烦。

在进行了长达将近３０年之久的浴血战斗之后，没有人不愿意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承认自己的胜利。即使是那些一直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转而承认新中国，不仅会加快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进程，而且还会极大地提高共产党的地位与威信。但问题是，一贯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在沈阳的特务行径，和它执意要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坚持在中共的政权中扶持反对力量的企图，使得对于未来政权的巩固极度担心的中共领导人感受到严重的威胁。

１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

不过，两周之后，情况又出现了某些变化。

１月中旬，鉴于国民党桂系领导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密谋和共反蒋，和斯大林提议抓住和平旗帜，一度坚持反对和谈的毛泽东开始准备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建议。就在这时，蒋介石于１月２１日在国民党内部压力下，被迫宣布下野，解放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毛泽东立即注意到在外交上采取一种积极态度的必要性，试图动摇美国政府继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１月２５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１９日外交工作指示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

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沈阳方面对美国领事馆的软禁也相应地相当放松了。瓦尔德甚至可以在晚上和休息日回到妻子和孩子们的身边去了。到了６月７日，瓦尔德甚至第一次收到来自美国国务院关于准备关闭沈阳总领事馆的电报副本，沈阳军管会也明确同意瓦尔德等人迅速开始撤离沈阳的准备工作。瓦尔德半年多来第一次脸上开始露出了笑模样。在他看来，一切恶梦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十二）

瓦尔德又一次估计错误。

一方面，在３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仍旧再度重申了他在１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警告说：尽管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

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之后，在５－６月间，中共代表黄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可以考虑在“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的情况下，与之进行建交问题的接触的指示，与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进行了火力侦察式的交谈。然而，交谈的结果却证明，美国政府不仅不同意迅速改变与国民党的关系，而且千方百计地试图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还明显地企图干预和分化新中国政府，坚持要美国承认新中国，未来中国的政府里必须吸收一切被美国政府认可的民主人士。执政在即，毛泽东本来就最担心美国人贼心不死，在新中国内部实行分化政策了。司徒雷登的这些说法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不啻是要他们在新政府中“吸收一切美帝走狗”。这自然使毛泽东不再对美国抱任何幻想了。

６月上旬，已经进驻北平西山的毛泽东接连收到华东局及南京市委接连报来的司徒雷登谈话内容的报告，并得到美国政府已经在 5 月 31 日公开宣布了其驻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的消息。毛泽东为此很快告诉周恩来：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也让他们见见阳光。通知新华社拟一个消息，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在我们这里想干什么。

６月１９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宣布在沈阳破获美国间谍案，其幕后指使人为美军联络团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

６月２４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看到了关于英美等国外交人员在东欧民主国家进行间谍的新闻，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明确指出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针对新中国的一切活动都带有敌对性质。

总结前此一系列经验和尝试，毛泽东有感而发，一夜挥就《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下决心根本破灭美国政府离间中苏关系的罪恶企图。

毛泽东后来明确讲，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因此，我们一定

要联合苏联，要以苏联为首。这样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６月３０日，毛泽东在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同时，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

不久，美国国务院公开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为其在中国的失败寻找借口。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这几篇文章洋洋洒洒，辛辣幽默且气势磅礴，最典型地表现出了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那股子傲视一切的神气。他并且在文中公开警告国内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彻底丢掉“崇美”、“恐美”的自卑心理，切不可靠向美国一边。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新中国诞生了。共产党的这一历史性胜利使亿万普通的中国人挺起了腰杆儿。于是，包括在沈阳美国领事馆内被颐指气使惯了的中国雇员，也开始敢于顶撞从来都不可一世的美国人了。终于，由于撤离工作被勒令停止，又被指责涉嫌间谍活动，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的瓦尔德，同中国雇员姬玉衡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将其解雇。而当姬玉衡再度理直气壮地前来要求付给他当月的薪水时，双方又发生言语冲突，瓦尔德盛怒之下，竟挥拳打人，并将姬玉衡踢下楼梯致伤。毛泽东得知这种情况，当即指示东北局将瓦尔德等涉嫌殴打中国雇员的５个美国领事馆人员一律拘捕，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上，毛泽东明确批示：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对于瓦尔德来说，最倒霉的时刻来到了。

这是１０月２４日下午３时。大约５辆军用吉普车停在沈阳美国领事馆的门前，三位军官率领多名士兵进入领事馆，当众宣布了对瓦尔德等人的逮捕令。在大门外数以千计的围观群众“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面色苍白的瓦尔德被押上了“囚车”，送进了监狱。在中国的历史上，堂堂总领事瓦尔德大概算得上是第一位，可能也是最后一位被关进中国监狱的高级美国外交官了吧!

６天后，沈阳市公安局正式以间谍案和伤害他人案对瓦尔德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１１月１日，在这个一年前曾经是充满了梦想的日子里，瓦尔德却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听着公诉人和一个个证人的指控，瓦尔德禁不住懊悔万分。当然，他并非是因为自己无辜代人受过而悔恨，他不能否认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中确实有过某些从事特殊任务的职员，这也许不是自己的责任，但他当初决定留下来，现在看来是完全是灾难性的。这一决定，不仅毁了他的前途，而且也使美国人丢尽了面子。他深知，这一事件对于二战以来在世界上已居于头号强国的美国政府来说，可谓羞辱极深。以致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甚至不惜提议派飞机和武装突击队突袭沈阳，劫回被捕的总领事，以挽回政府的面子。好在军方领导人还比较清醒，知道要在沈阳这样一座大城市里进行这种突袭，不仅救不了瓦尔德等人，反而会卷进针对新中国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

好在恶梦很快就结束了。当月下旬，瓦尔德等人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并被宣布驱逐出境。

１２月１１日，瓦尔德忐忑不安地在武装人员的押送下，登上了南行的火车。他这回再也笑不起来了，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这场恶梦对于瓦尔德个人来说，确实太长了。但他还不知道的是，这场恶梦对于中美两国来说，还要继续２０年之久呢！

李宗仁、白崇禧“和共”内幕

李济深策动桂系倒戈　白崇禧密谋和共反蒋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６日以后，徐蚌会战前线遮天蔽日的滚滚硝烟渐渐消散了，轰隆隆震响了一个多月的枪炮声，一时间也突然沉寂下来。在豫皖鲁苏四省交界的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随处都可以看到整师整师的国民党官兵被缴械俘虏。只剩下河南永城东北陈官庄一带，还可以看到大批失魂落魄的国民党士兵，互相依偎着，蜷缩在临时挖成的战壕和掩体里，四面尽是人民解放军发着余热的黑洞洞的枪口和炮口。

在和共产党打了三年之后，如今谁都看得出国民党气数将尽。但国民党一向由不同的派系组成，内部矛盾甚深，过去一些较有势力的派别不过屈从于蒋介石的强力之下，而今蒋系元气大伤，个别实力尚存之派系反而暗中庆幸。桂系即是其中之一。

桂系这时最有实力的人物有两人，即李宗仁与白崇禧。李宗仁向为桂系头号人物，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地位仅在总统蒋介石之下。白崇禧为桂系二号人物，前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此时领衔华中剿总司令，统率３０万大军镇守华中一带长江天险。本来，桂系兵力不多，不敢稍有“造次”。如今东北剿总所部５５万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华北剿总６０余万人被围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和塘沽之线，覆灭之期可待，而徐州剿总所部７０万大军中之大部也被解放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尽行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１０余万人于陈官庄、青龙集一带陷入重围，也已插翅难逃。徐州防线一失，郑州－蚌埠－海州之线即全部陷落，解放军将迅速进占长江北岸，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城已经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之下。负责长江中游江防的白崇禧，其地位和作用自然变得举足轻重。

李宗仁、白崇禧这个时候的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起来。几个月前的副总统竞选，李宗仁在美国人的暗中支持下坚持竞选，搞得蒋系与桂系关系异常紧张。李宗仁当选后，蒋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更使得两派领导人之间感情十分对立。再加上蒋介石军事上一味瞎指挥，经济上发行金圆券搞得一塌糊涂，外交上美国人开始不给蒋介石好脸看，李、白都巴不得能找个机会逼蒋下台。现在，这个机会已经摆在他们的面前了。

徐蚌前线噩耗传来，李宗仁很快就从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那里得知，蒋介石有让李宗仁来代理总统的意思。白崇禧听到消息后颇为震动，显得特别亢奋。他对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消息的程思远说：“跟德公说，蒋下野必须辞职，由德公正式就任总统，不能用代理名义。如果名不正，那就什么事都办不了。对于这一点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不能有所让步。”

不过，向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并不相信蒋介石会如此轻易就范。想当年国民党宁粤两方闹

得不可开交，再加上日军侵占东北三省，蒋介石也是一度主动隐退，但依旧暗中运作，过了不过一个月时间就又重掌大权。因此，白崇禧深知，如果只靠自己在华中所掌握的那些部队，要把蒋介石完全搞倒，根本就没有可能。虽然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以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兵团司令张轸等，都已明确表示出愿意联手逼蒋下台的态度，但这两人权位虽高，实力却极其有限。

２２日，白崇禧接到同为桂系要人之一的黄启汉从广州转来的在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的密电，电称："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至所望于故人耳"。李济深要求白崇禧，务必与各反蒋派共同携手，积极配合共产党，"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李济深同时还有电报给李宗仁、黄绍竑和程潜等人。李济深为粤系将领，在国民党地方势力中颇有号召力，再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反蒋在先，并公开主张与中共联手，白崇禧不能不有所心动。因为，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要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白崇禧考虑再三，终于开始加紧活动，努力联络周围各实力派，决心和共倒蒋了。

１２月２４日晚，白崇禧致电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停战议和。几天后，由于始终不见蒋的动静，白崇禧又推动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各省军政各界要人一同于３０日前后再电蒋介石，要求停战议和。这些电报的目的，自然都是要求蒋介石下台。因为要让共产党接受和谈要求，被共产党视为内战罪魁的蒋介石非首先下台不可，否则根本就没有停战的可能。

除夕之夜，蒋介石终于被迫发表元旦文告，言不由衷地表示赞同议和，声称他个人的进退，全凭国民之公意是从，表面上似乎愿意下野求和。但实际上，文告并无妥协之意，它公开扬言，国民党的法统地位绝对不允许因和谈而有丝毫的动摇，否则必与共党周旋到底。难怪还在宣读文告的晚会上，蒋介石就含沙射影地宣布说：他既不愿和谈，也不愿下野，"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元旦刚过，白崇禧已听说蒋介石发表文告内幕，知道要蒋真正下台比登天还难。正好蒋介石从南京撤往广州的足以装备十余师的大批军火路经武汉，白崇禧犹豫再三，终于找借口将其全部扣留自用。白、蒋之间顿时形同水火关系。他不得不找来与中共有过关系的刘仲容，请他经南京前往上海设法联络中共共同反蒋，并向李宗仁转陈他和共计划。而后，为保险起见，他又致电南京召来与李济深有较深交情的桂系头面人物之一黄绍竑，要他尽快前去香港，向李济深说明桂系愿意联共反蒋的意向，希望李能够代为引见中共代表，切实争取中共的谅解与支持。

黄绍竑香港晤汉年　刘仲容上海会克坚

最先接通与中共关系的是刘仲容。刘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３日晚即到上海，见到在上海的秘密联络人员吴克坚，向吴说明了白崇禧的想法，请吴帮忙接通与中共的关系，并告诉他中共方面的态度。

但开始时，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和谈意图，统统视为缓兵之计，而斥之以鼻。毛泽东改变对和谈问题的态度，是在斯大林１月１０日转来国民党政府的求和电报之后。考虑

到应当挫败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同时也是注意到利用桂系反蒋有可能大大缩短解放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时间表，毛泽东才在１４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可以与南京政府进行和谈。只不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八项前提条件正好与蒋介石的条件相反，他不仅要惩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战争罪犯，而且要根本推翻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所谓法统。

就在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的当天晚上，黄绍竑也到了香港。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李济深在香港的宅邸。不想，李济深这时已经乘船转去大连，参加中共所召集的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去了。黄只好打电话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黄琪翔联系。幸好黄琪翔还留在香港没有走。

黄绍竑第二天一早就来到黄琪翔的住处。简单寒暄之后，黄绍竑就急不可待地向黄琪翔说明了来意，并交给后者一封信，声言一切详情尽在信中。黄琪翔打开信一看，只见信是写给李济深的，里面写道：健兄（即白崇禧）早有反蒋决心，只因时机未熟不敢发动。上月２５日致电蒋介石，实际就是为了倒蒋。蒋发表元旦文告，不过想接过和平运动的旗帜，以此卸去好战之责任而继续作战罢了。健兄认为，蒋决不会轻易下野，必须更进一步表示，发表宣言，公布蒋氏罪行，如再不悔悟，则须以武力解决。只是，表示这种宣言，必须有军事行动之准备，事前尤其应当与中共方面取得谅解与合作。因此，他特派黄绍竑为全权代表，负责向任公（即李济深）报告，并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洽商连络。请任公向中共中央通告：（一）武汉反蒋经过及以后决心与行动；（二）请中共中央转知华中当局与武汉当局成立军事谅解，以免误会；（三）商定以后共同作战之计划。健兄认为，时机紧迫，早日得到中共答复，宣言即随发表，军事立刻行动。若迟延时日，蒋得从容布置，殊为不利。健兄并郑重表示：（一）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迁入武汉；（二）绝不维护南京宪法法统，拥护新政协解决国是。

黄琪翔读过信，告诉黄绍竑说：任公等健兄的这封信已经多时了，可惜到得晚了些，任公已经等不及了。但此事任公早与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通过气，相信他们会愿意与你接洽的。

黄绍竑走后，黄琪翔就连忙打电话给潘汉年，要求潘出面见黄绍竑一次。潘表示现在见面不会有具体结果之后，黄琪翔还是再三要求潘务必见黄绍竑一次，哪怕不作任何答复也是好的。潘汉年在与方方商量之后，同意见黄绍竑。

三天后，黄琪翔领着黄绍竑前往一家饭店去见中共在香港的重要联络人潘汉年。黄绍竑又对潘汉年讲了白崇禧准备反蒋的经过情形，并说明白目前与蒋系已成敌对，而桂系军力在华中只及蒋系的三分之一，程潜虽可联合，但如不得中共配合反蒋仍无成功可能。他并介绍说，他离开南京前，美国驻华大使秘书傅泾波曾表示，美国认为蒋不下野，和平不能实现，即美援也不能解决危机，故美国已决心不介入中国内政。因此，桂系反蒋决无美国背景。

潘汉年这时虽已得知毛泽东的声明，但对于和谈的具体策略问题尚未得到指示，因此对黄绍竑的要求无法作出任何答复。他只是告诉黄绍竑：他会将其来意报告中央，有无答复，何时答复，却不能预告。黄绍竑听说后颇感焦急，但仍表示无论如何都想等到答复，同时希望潘能介绍找到华中正面刘伯承部的关系，以便联络。潘汉年则表示：此地无法介绍，但完全可以直接从前线去联络。

与此同时，刘仲容在上海也秘密转告吴克坚，说李宗仁已派人到武汉去，要白崇禧将武汉让给中共，并联合程潜一同发动反蒋。如果程潜不肯，白崇禧可以向长沙进攻；如程潜同意联

合，桂系军队就可以放心配合中共军队进攻南京。李宗仁还特别转告白崇禧，不要因他在南京而有所踌躇。刘仲容声称，李宗仁希望知道中共方面的意见如何。吴克坚答复称：中共中央对李宗仁先生的意见很重视，但不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先生对毛泽东先生提出的八项条件态度如何。请刘务必问清楚这个问题之后再谈其他。另外，白崇禧先生也可以直接派人与我方前线部队进行接洽。

２０日和２１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起草电报指示给香港的潘汉年和上海的吴克坚，称："望告黄绍竑，只要白有决心，我们可以和白联合对蒋"。但中共对时局的态度以毛泽东１月１４声明为准，"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如白确有诚意，可派人带带电台密码波长呼号到郑州，通过市政府介绍至刘伯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进行接洽。中共中央同时通知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准备接待武汉白崇禧派来的代表。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事前，白崇禧正在指使黄启汉等草拟电报，准备宣布蒋之罪状，不想李宗仁来电要白稍候勿燥。紧接着李宗仁竟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一时也有些莫明其妙。按照白的想法，李宗仁无论如何不应当顶这个"代"字，不仅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且蒋不过"因故不能视事"，随时都有重新行使职权的可能。只可惜如今生米煮成熟饭，白崇禧已无可奈何，原来的计划也因此失去意义。他当即要黄启汉到南京去，告诉李宗仁，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那就一不作二不休，先来个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争取人心；然后下令将蒋介石的嫡系干将陈诚和薛岳撤职，削其左膀右臂；同时与行政院长孙科商谈合作办法，不行就改组内阁。总之，冒险一搏，假如搞不过蒋，那就与蒋撕破脸。为此，白要黄启汉去南京后立即转去北平，找共产党联系。

蒋介石宣布下野的第二天，北平傅作义宣布接受和平改编，整个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和国民党的将近２００万军队已经基本落入中共之手，形势对南京更加不利。李宗仁这时的思想也颇为矛盾。黄启汉来，李宗仁对白崇禧的建议不无同感，相信背起烂包袱也不是办法，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条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但是，他同时也担心在南京军事上全无依靠，真的闹僵了走都走不脱，谁知道蒋介石急了会要什么流氓手段。

当然，李宗仁之所以不顾白崇禧的劝告硬要当上这个代总统，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到蒋介石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就是蒋系内部也成土崩之势；想到选举副总统时蒋虽极力反对自己当选，结果还是取得了多数票，李因此不能不心存幻想，希望一旦他能够与中共和下来，能够进一步取得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再借助美国人在幕后的支持，最后取蒋而代之。想到这些，李宗仁刚一上台，就马上发表声明，表示"愿即开始商谈"和平，同时宣布以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五人为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随时准备与中共谈判。同时，李宗仁一面秘密派专人送电文给李济深，请其力劝中共军队缓和攻势，开始和谈，以符人心，一面秘密派过去曾为中共工作过的刘仲华与黄启汉同去北平，带信给毛泽东等，希望后者也能"迅速推动和谈"。１月２７日，李宗仁更进一步向毛泽东发出一封带有明显不满意味的电报，说什么："以往恩怨是非倘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苦之罪人矣"。

李书城前线晤刘邓　刘仲华北平作中人

２４日，潘汉年在香港主动约黄绍竑密谈。两人一见面，黄就迫不及待地询问中共中央的答复。潘汉年明确告诉他，中共中央已同意和白崇禧联合对蒋，要白立即派代表经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前线负责人联络。黄绍竑听后当即表示：一定马上打电报给白崇禧，要他派人前去接洽。

黄绍竑同时告诉潘汉年，他一得知李宗仁代总统的消息之后，就立即给李宗仁发了一封电报，要李宗仁务必停止所谓的“戡乱”，取消紧急法令，释放政治犯，恢复言论自由，否则的话无法与中共商谈和平。在黄看来，李宗仁当这个代总统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位置把战争停下来。他明确表示，他绝不想充当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但愿以私人身份奔走和平。他问道：你们能否设法派人和我一同到北平去，同你们的中央负责人商谈出一个和平基本协议的草案，然后我拿给德公和健兄去考虑？

潘汉年对此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说明：李宗仁最好是能够效法傅作义，先明确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作为先决条件，然后再具体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如果象李宗仁现在这样，在南京空谈什么议和停战，恐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当然，他主张尽快劝告白崇禧与刘伯承、邓小平洽商军事反蒋。因为如果局部商洽能够成功，将来很容易发展成全面的和平。

黄绍竑第二天按照与潘汉年约定的离开了香港，经广州飞回武汉向白崇禧报告接洽结果。２５日当天，白崇禧派鄂省和平促进会主席李书城和促进会干事李瀛刚二人经信阳到漯河解放军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经军委批准，四纵政治委员雷荣天等接见了李书城和李瀛刚。李书城多少有些遗憾地表示：临动身时，白崇禧一再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中共方面宣布的战犯太多，尤其不应包括他本人在内。但白崇禧称，他不会因此而放弃与中共合作。若得中共同意，他甚至愿意充任江南进攻蒋系军队的先驱。

雷荣天答复称：白崇禧愿意反蒋我军欢迎，但白近几年来助纣为虐与中共为敌的事实也不容抹煞。因此，白崇禧应认清形势，尽快放弃一切幻想，如能协助我军解放江南自然最好，如若不能，象傅作义将军那样，接受和平改编，也可以将功折罪。他希望知道白崇禧有何具体计划。

李书城和李瀛刚对此显然毫无所知，只是强调白崇禧希望能够保全军队，最好是只改变部队名称与指挥系统。根据他们的想法，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中还应给白崇禧以相当的位置。

注意到在座的解放军领导人对这一建议明显不满，李瀛刚表示：若对白崇禧施加一定的压力，相信也会接受改编军队的条件。只是最好能够讲求方式，并允其立功赎罪。

二李关于白崇禧希望保全军队的一席谈话，比较清楚地反映出白崇禧这时的心态。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之后，白崇禧也象李宗仁一样对于和平问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幻想。他在给黄启汉的指示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争取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劝说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他甚至在１月２２日写给李济深的信中声称：现在李宗仁既已就位，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应全力求和，并努力扫除独裁祸根，至于将来国是，则应“由国人公意决择。”这种话，共产党人爱听与否，可想而知。

黄启汉与刘仲华于２６日由南京飞来北平。２８日上午与中共中央任命的北平市长叶剑英谈话约一个小时。黄首先介绍了白密谋反蒋的经过，但同样也没有提到白崇禧有什么具体方案和设想。唯一引起叶剑英注意的只是，黄明确讲：照理，解放军没有李白两先生，也一样可以胜利，但如欲更有可为，还是以争取真和平为好，否则全成为历史罪人。

刘仲华看来知道中共方面想要了解的是什么。他详细介绍了李白两人手下可以掌握的军队情况，说李宗仁交待，他所设想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非两种：第一是局部和下来，并与中共并肩作战；第二是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而李的计划是想等蒋离开后，真正拿到政权再与中共言和。为此，李宗仁要求他们作为李白二人的私人代表留在北平，以便成为他们与中共联系的固定中间人。

叶剑英听了两人的说明后，回答说："我只讲四句话。第一，欢迎你们来。第二，所谈各节，我即转报我党中央，如有答复，当会转告你们。第三，既然你们打算在北平与我们建立固定联络，刘先生还想在北平家中暂住，我们会加以适当关照。第四，你们既然没有带来具体方案，请原谅我也只能如此答复。至于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在毛主席的声明里可以说是讲得很明白了。"

在北平市委随后举行的碰头会上，与会者对叶剑英介绍的谈话内容都表示不满意，认为没有重要价值。可是，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读到简报后，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稿上，明确指出：黄刘二人的谈话是有具体内容，有文章可做的。基于"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方针，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使李白反美反蒋，与蒋系火并，以利我各个击破。因此，周具体指示了叶剑英下一步谈话的策略办法。毛泽东阅后，也大笔一挥，表示同意。

２月２日，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再度接见刘仲华，要其立即返回南京，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确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就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如此方能站住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社和ＣＣ系，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社和ＣＣ系的特务分子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果李白确有反蒋反美的实际行动，你还可来北平，并且可以带来密码等准备建立直接联络。如果李白并无诚意，只是搞骗人的把戏，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与他们周旋。"

刘仲华听后，面露难色，停了半晌才若有所思地答复说："这件事德公做起来怕有些困难。德公这个人通常比较稳重。昨天上午我曾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蒋这次公然释放冈村宁次等战犯，他作为代总统却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如果他确实想要争取民心，就应当立即把冈村宁次扣起来，听候人民处理。但德公却以在电话里听不清为由不置可否。据我观察，德公是打算首先分化南京的政治力量，争取一部分军队为其所有，然后再有所作为。如此计不成，他那时或者会回武汉举旗反蒋，与中共并肩作战。"

叶剑英说："我看你还是抓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李先生，请他当机立断。如果照他的想法慢慢搞下去，不要说他搞得成搞不成，我军恐怕也奉陪不起。"

刘仲华说："不过，我估计，德公在南京既无力量，也无胆量逮捕叶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人，就是冈村也怕没有可能。既然如此，我去南京，如德公太稳重而不敢有所作为，我就由南京

飞武汉，与健兄谈判，策动健兄单独行动。那时再来北平具体商谈行动步骤。”

但是，随后离开北平回南京赴命的只是黄启汉，李宗仁在电话中坚持要刘留平，协助安排南京所派和谈代表来平事宜。因此，刘仲华一时没走成。

李明扬过江面陈毅　叶剑英受命迎客人

这时，人民解放军正在逼近和夺取长江北岸所有重要渡口，李宗仁在南京城里大谈和平似乎毫无效果，这搞得他颇为被动。为了能够确实造出和平气氛，他不得不三天两头地打电话给刘仲华，一会儿要刘向中共开放煤运，以解宁沪煤荒；一会儿要刘与中共协商南京和谈代表名单。而为了阻止宁沪正面陈毅领导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继续推进，他更亲自找到过去曾经和陈毅在苏北有过交往的李明扬，请他秘密前往江北陈毅部所在地，向陈毅解释他的难处，要求缓以时日。

李明扬于２月４日在南开大学教授姜颖初的陪同下离开南京，秘密渡江北行。行前李宗仁曾亲自接见与中共有关系的姜颖初，声泪俱下地表示对过去的忏悔，说是“从北伐至今，蒋一贯企图消灭桂系，而我却仍受蒋的驱使，当了蒋二十多的走狗，实在痛心之至。”而今我确实想与蒋决裂，同中共一起实现全国和平。“人家说我这是要投降，但我为了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痛苦，向人民投降，并不算是耻辱。这些还希望中共谅解才是。”

５日，李、姜二人到达淮阴中共军队驻地。随后被送至野战军前线指挥部，陈毅和饶漱石一起接见了他们。

据李讲，蒋已将嫡系部队及实权机关随同主战分子，一同撤至粤、闽、台，表面上说是政府南迁广州，实际上主要机关和重要物资全部移往台湾，准备解放军渡江后在台湾组织政府，与美、日建立东亚反共同盟，订立军事协定，继续顽抗。蒋介石甚至还有计划，想要建立日本志愿军，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此。对释放冈村一事，李宗仁表示十分遗憾。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曾命顾祝同将其抓回，但顾假装派人去搜捕，然后只用“不知去向”来打发他。现在，蒋介石把江防大部都交给了桂系军队来防守，而让汤恩伯留守京沪。蒋的如意算盘是这次决不能谈成和平，中共非过江不可，那时首先倒霉的必是桂系，而他的嫡系将能够顺利后撤并监视李宗仁的行动。现在李宗仁在南京其实只是光杆司令一个，因此李宗仁对于逮捕在南京的战犯一事，颇感为难，称：“不要说逮捕他们，今天我不被他们捉去已算很好了”。

但据姜讲，李宗仁临行前曾对他说，在蒋介石现在军队中，他已经能够掌握百分之二十，如李延年、刘汝明等部，他有把握可以争取。黄旭初在广西的部队也可以参加反蒋，进兵广东。整个桂系有３０万军队，加上正在广西招募的２０万新兵，可以和蒋一拼。只是现在必须设法把桂系军队一部调至江西，一部调来南京附近，同时逼迫汤恩伯所部１０余万军队退出京沪杭防区，另外改组国防部和联勤总部，撤换蒋之嫡系徐永昌及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等人。那时候，如果汤恩伯还不听话，他就可以想办法把汤恩伯给解决掉。

陈毅听来听去，没听出什么明堂，不禁问道：“两位先生来此，大概不会只是要来替李宗仁先生诉苦的吧？李先生是老朋友了，我们用不着打圈圈，有什么只管说来听听。”

“陈毅先生依然是快人快语”。李明扬被问得一时语塞，不免有些尴尬。

“哈哈……，不忙，不忙。两位先住下，慢慢谈。”陈毅站起身，双手背后，大声笑着。

还在陈毅等人与李明扬进行谈话之前，李宗仁就在南京那边一个劲儿地给北平的刘仲华打电话，要求中共方面尽快安排南京和上海的代表来平，说是要来北平谈和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老先生甚至闹到总统府来，那些中外记者更是吵着嚷着要来北平。那个南京人民代表团早在3日就飞到青岛，等着进去了。

刘仲华在电话中问:“听广播说，甘介候先生将作为你的正式代表前来北平，这是怎么回事？”

只听见李宗仁在电话的另一头吞吞吐吐地说：“甘先生是自愿来平的，这件事我当然不能反对。”

刘说：“不论内情如何，甘介候昨天所发表的声明让这边非常反感。说什么他‘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这分明是自讨没有趣！中共现在怕是不会让任何政府代表来北平的。”

中共中央这时确实对接待南京政府的代表没有兴趣。还在2月2日，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听到南京方面的电台说，有一个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要来北平，上海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团要来北平为沪宁局部和平游说。毛泽东3日凌晨起草专电给北平的叶剑英和彭真等，要他们“不要拒绝”，而且要“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可见，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前来求和者，只要是以私人资格前来的，几乎是来者不拒。因此，4日清晨，所谓南京人民代表团的代表吴裕後拨通了北平电讯局的电话，叶剑英通过电讯局转话同意代表团飞来北平，但规定（一） 6日下午2时由青岛起飞；（二）各代表名单、籍贯、经历、现任职务，必须先送中共方面，取得同意；（三）新闻记者不许同来。吴一一承诺，并当场将代表情况详加介绍，叶记录后表示认可。对此，毛泽东明确电示：“此种处置是妥当的”。对上海代表团亦可照此处理。只是，对于任何象甘介候那种敢于发表狂妄声明，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则决不许其前来北平。

毛泽东7日挥就一篇声明，称：“甘介候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候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南京代表遇险惊魂魄　和平使者北平谈和平

2月6日下午3时，青岛上空阳光明媚。南京人民代表团代表8人，连同工作人员邱致中、吴裕後、曾贤生、邓季雨、宋国福、聂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诰等，乘坐美式运输机飞向北平。作为第一批飞往共产党控制区的民间和平代表，机舱里的人显得十分激动。飞机早已飞离了青岛地区，人们还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大声议论着，为青岛机场方面拖延了代表团一个小时时间感到不满。

一个小时之后，飞机飞临北平上空，在西斜的阳光下，已经可以看到故都皇城琉璃瓦闪耀的

金光了。代表团首席代表邱致中从座位上猛地站起来，几步来到驾驶舱门口，冲着驾驶员大声喊道：“降下去，降下去！在北平上空转一圈。”

飞机降了下去，机舱里的人们都拥到窗口兴奋地喊着：“那是故宫！”“这是中南海！”“我看见西四牌楼了！”……

突然，机身象猛地被谁推了一把，机舱外紧接着响起一声沉闷的爆破声。

“高射炮！”当过军人的吴裕後大叫一声，然后冲着驾驶舱扯着嗓子大喊：“拉起来！拉起来！”。只听见飞机两翼的发动机发出一阵亢进的轰鸣声，人们眼看着那一团团绽开的白色烟团渐渐被抛到飞机后面去了。

经过一阵既惊又险的紧张场面之后，飞机终于平安地在北平的南苑机场降落了。代表们下飞机时，一个个还有点惊魂未定的样子，好几位脸色煞白，半天缓不过来。代表团最后一位成员刚刚落地，前来迎接的北平市副市长徐冰乘坐的美国吉普也嘎然而至。徐冰跳下汽车，老远就向留着花白胡须的邱致中伸出双手，充满歉意地笑着说：“受惊了，受惊了。今天前半天来了两批国民党的飞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我军炮兵又是刚进北平，电话还没有接好，让你们受惊了。”

“还好，还好。”走在前面的邱致中抓住徐冰的双手握住，也不住地解释着迟到的原因。

为代表团准备的大轿车把代表团送到了北平最好的六国饭店，工作人员为代表团成员早已安排好了一切。整个代表团都为自己能受到如此礼遇而有些受宠若惊。

第二天，根据徐冰的电话通知，代表团成员留在饭店里写各自的意见。晚上，叶剑英亲自来到饭店，与代表团成员见面坐谈，并举行宴会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

在六国饭店灯火辉煌的宴会厅里，叶剑英红光满面地向坐在同桌的邱致中、吴裕後等人具体解释了毛泽东声明中所提出的八项条件。“我们从来主张和平的，请诸位来的目的，就是要听听各位对实现和平有什么高见。”叶剑英说。“但是，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谁发动了这场战争，谁坚持要把人民的力量赶尽杀绝，这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要想实现真正的和平，首先就要承认毛主席提出的这些条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那些战争贩子把和谈当成继续战争的手段。”

窗外开始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宴会厅里的气氛却异常热烈。代表团的成员在亲身对比了南京的混乱和北平的宁静之后，显然对共产党的能力和和平意愿有了全新的印象。一些代表感慨万千，几杯酒下肚后，已经有些情不自禁，他们面红耳赤地发誓说：不论这次来平有无具体结果，回去以后一定不顾一切迫害，把人民解放军良好军纪军风的实际情况告诉南京人民。“共产党是要和平、爱和平的，战争贩子在南方”。

8 日，根据日程安排，双方整日进行分别谈话。叶剑英上午专门接见了邱致中和吴裕後。吴一上来就提出：“政府实际已经表示承认八条为和谈基础，中共为何对和谈仍旧反映消极？中共迟迟不指派和谈代表和指定谈判地点，不免使人民产生误解。”邱致中也表示：“再不能打了，国家元气损伤太大，而且不出一年，国军必然全面崩溃，解放军为民众武力，损耗过

大不免可惜。南京有主战主和两派，如能谈判，则主战派军心民心立时瓦解，和平不难取得。况且战犯早已席卷资财，远扬海外，就是打到广州，也无损其生命财产，所苦者只是人民和国家仅有之建设基础。”

叶剑英听了不置可否，只是问道：“你们认为，在蒋介石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真有和平的希望吗？你们说李宗仁、白崇禧是主和派，但是，李宗仁上台以来，南京政府又做了哪一件根本区别于蒋介石，利国利民的事呢？残害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还不是放掉了，特务还不是照样在南京上海肆意捉人，人民团体还不是一样没有自由，南京、武汉还不是一样在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吴裕後和邱致中两人面面相觑，又都苦笑着摇了摇头。邱答复说：“叶将军的话当然有道理。蒋介石没有和平诚意，李宗仁、白崇禧也并非好人，所作所为让人激愤。但蒋桂之间确有矛盾，应该利用。李求和心切，若能将蒋李分化，自可兵不血刃获得十省左右之土地，并先行解决桂系军队和其他非蒋系军队。那时组成联合政府，明令讨蒋，要夺取蒋系军队控制的三五个省份，必然容易十倍不止。”吴也补充说：“国际国内所公认，和平谈判达成统一，不仅为人民所拥护，而且便于人民政府接收旧政权，由此而产生的联合政府，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叶剑英微笑着说：“二位致力和平的善意，我们会转报我党中央。如有回音，一定设法转达。只是，一切都要本着取得真正和平、持久和平的精神来解决。”

当天其他代表的谈话与邱吴两人大同小异。由于不明来人底细，叶剑英在谈话中都特别询问每个人在南京时是否与美国人有过来往。但只有邱致中一个人称见过司徒雷登。

综合 8 日代表团成员的谈话，彭真与叶剑英两人致电中共中央报告说：代表们的基本意见在于，第一，主张利用蒋李矛盾。第二，另立新政府，不如通过和谈接收旧政府，便利控制全国和得到国际承认。第三，和谈成功，至少西到宜昌，东到上海，都可解放，那时蒋只剩下台、赣、闽、粤四省，容易解决。第四，和谈策略应注意轻重缓急。中共中央复电称：“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但“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据此，叶剑英通过电话向代表团转达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

9 日，代表团一行使命完成，准备返回南京。不料，接连两天的大雪，使机场无法起飞飞机。于是，叶剑英等安排代表们参观北平故宫等，并再次设宴招待。

当天，邱致中等起草代表团公开声明一份，交给叶剑英转报中共中央，得到批准。内中特别说明：“本团此次来平，承叶剑英将军及中共在平当局热烈招待，同仁至深感谢。连日以来，先后与叶将军等会谈二次。第二次谈话达四小时之久，业将人民对和平的愿望，及必需和平之理由，详细陈述。叶将军态度异常诚恳，表示愿将吾人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并告以中共对于和平向具诚意。如南京政府确有和平诚意的事实表现，吾人当准备与他们谈判，以期获得有利于人民的真正和平。本团认为和平前途，颇可乐观。”

１０日，北平雪停。１１日上午，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登上离平返宁的飞机。走上飞机弦梯时，代表们一个个看上去满面春风，好象他们已经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似的。

高龄人颤巍巍述衷肠　毛泽东笑骂中做文章

就在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离开北平的当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开始准备接待“上海和平代表团”。他与刘仲华约定，该代表团应在１３日上午飞抵北平。

１３日上午，徐冰、艾秀峰与刘仲华三人乘车前往南苑机场迎接该代表团。但没能接到。返回城里，才从电话中得知，因代表团成员多为老人，身体欠佳，飞机起飞后遇到不稳气流，异常颠波，只好先飞青岛稍加休息，待次日再飞北平。

显然，对于这个代表团，中共中央更加重视。所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不过是已经被封闭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的成员，知名度相对来说并不高。而这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却是由国内享有盛名的四位年事已高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他们分别是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其中，颜惠庆已７３岁，是著名的外交家，历任驻美、德、苏、瑞各国公使或大使，早年当过外交部长和国务总理，后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作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远东区域委员会主席。章士钊６８岁，是著名的律师兼教育家，早年也担任过大学教授、校长，办过报纸，做过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政府顾问及历届国民参政员。江庸，７２岁，早年做过北洋法政学堂教习、学部参事，也当过司法总长、大学校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抗战期间任历届国民参政员、是修订法律馆总裁、法权研究会总长。邵力子，６８岁，是著名的国民党人，曾任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驻苏大使、中宣部长等职。这些人显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因此，代表团１４日到达北平不过两小时，中共中央就电示叶剑英等：在北平的高级军政负责人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参加接见和宴请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代表团提出的要求应尽量满足，一般不予限制。

１４日下午５时左右，上海代表团乘坐的飞机飞抵北平。徐冰、刘仲华等再次在机场迎接，并陪同来到六国饭店，为客人们安排住宿。同机到达者除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四人外，还有他们各自的秘书龚安庆、张丰胄、傅树苍和潘伯膺。颜惠庆因身体欠佳，另带有私人医生焦湘宗。同行者还有李宗仁私人代表黄启汉及夫人李素平、为恢复南北通航充任联络工作的电影演员金山和中航公司副主任雷仲仁，以及江庸、刘仲华的家眷等，合计达２５人之多。

在六国饭店等候住宿的过程中，徐冰顺便问诸位代表：南苑过来，一路上对北平印象如何。众人一致说好。颜惠庆和邵力子当时就提出应当迅速恢复通航通邮，因为他们这次来不得不帮很多人带了钱和信来。徐问：各位打算在北平留多少时间？江庸、章士钊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个把礼拜”。颜惠庆也表示，北平有很多亲友，想去看看，希望提供方便。徐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徐同时问：这次谈话打算如何进行，是集体谈，还是个别谈？黄启汉在一旁道：大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还是个别谈的好。最后，邵力子、刘仲华、黄启汉围着徐冰漫谈时，徐问邵力子：“蒋介石现在情况如何？”邵力子称：“蒋先生仍在活动。不过李宗仁先生确是要和平的。”他接着诚恳地说：“我不是捧你们，只要你们力量强，不腐化，站得住，就是愿意战争的人，要打也是打不下去的。”

１５日上午，叶剑英只身前往六国饭店拜访颜惠庆等。一阵寒暄之后，五人分别坐下来进行第一次座谈。颜惠庆首先表示："我们四人合起来有３００岁了，我还有心脏病，本来不适宜坐飞机的，但是还是带着医生来了。此次来北平是个人来的，不是当什么代表，是希望全国和平统一，这样对内对外均好。此意请转达毛先生。"颜说着转过头去指着邵力子又说："此次能得邵先生同来，更有意思。我与邵先生先生同事。此行班子不错。"说完，眼睛眯成一条缝，嗓子里发出沙哑的笑声。

"颜先生也也做过三年驻苏大使，还在香港办中苏文化协会。"邵力子也笑着补充说。"三位老先生远道而来，负的使命很重大。当然，和平并非几句话可以说完的。三位很客气，都说只是代表个人，其实都是代表人民的，来此也是李（宗仁）先生请求的，因为李先生要和平，煞费苦心，处境困难。原来还请了冷老先生，因冷先生的工厂闹工潮，几至不能解决，走不开。后来李先生又请了世界制碱权威、永利化工厂总经理候德榜先生、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先生和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先生，只因通知北平方面太晚，刘仲华先生在电话里没有提到，所以没有来。所以最后李先生又要我来，虽然我也６８岁了，但看到来的三位先生都比我年龄大，我也不能不答应。其实，张治中先生对和平很热心，只是现在回兰州处理中苏贸易纠纷去了，如果和谈开始，我想他还是可以来的。李先生已有电报同意以毛先生的八条做商谈基础，只是如果八条一点都不折不扣，李先生实在为难。"

叶剑英听罢四位老先生的谈话，当即表示感谢各位代表的和平诚意，并说明一定转达他们的意见给中共中央。他同时解释说："李宗仁先生感到困难的我想主要是八条中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问题。其实这一条我党不提出，人民也必然会提出来的。１９２７年以来，由于蒋的反动，使中国历史走了２０年的弯路，人民和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这一责任应由谁来负，是中共，还是国民党？是全体国民党员，还是四大家族中的少数反动集团？必须明是非，追责任。但是，象傅作义，以前也列为战犯，因为他过去一样是一贯反人民反革命的积极负责者，北平和平解决对人民有功劳，人民就可以重新考虑傅的问题。李先生嘴上主张和平，可是一上台就放走了冈村宁次……"

"放冈村的决定，并非李作的。李先生还亲自去上海研究补救办法，但冈村已经被秘密送回日本了。"邵力子补充说。

"最主要的是怎么样使人民跟上来。"颜惠庆不紧不慢地插话说："人民不能跑的，走到半山，要休息。领袖走得太快，人民在道德上、知识上都可能跟不上你们，要等等他们，你们在北平、济南做出样子来，人民就理解你们、欢迎你们了。就好象武戏唱了，唱一唱文戏，于国计民生更有利。"

江庸接过去说："其实哪一党执政都可以。当年我们曾希望过国民党，现在失败了。这个班子唱不好，就换一个班子唱一唱。我不是说空话，现在中国需要改革，什么人能够实现这个改革呢？只有中共了。最希望中共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彻底刷新政治。"

叶剑英问道："蒋介石并未放弃政权，还在幕后导演，究竟蒋李之间关系如何？有人说只是双簧而已，对不对？"

邵力子答称："蒋李不是双簧。去年选举时，感情已经闹坏了。并且历史上蒋对李也是不放心的，怕李不听话。蒋下台，是形势所迫，蒋不想放弃政权，但亦无办法。因此，蒋介石最

希望战争。假使不能和平，李非走不可。这不是演双簧。”章士钊插话道：“凡读过中共文告的，只有蒋介石高兴。因为蒋一读，便知道和平是不能实现的。”颜惠庆望了章士钊一眼，急忙解释说：“和平问题还是一步一步谈，大家商量，最好是见见面。我们不是代表，国共双方都有自己亲信的人，可以另派代表来谈这些问题。”但章士钊好象并不在意，仍自顾自地接着说：“依我看，楚汉之争，韩信举足轻重。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现在桂系就似韩信，应该与之接近。这恰恰是蒋所害怕的。如果李不能成功，到时候蒋就会重新发号司令。”

李宗仁这时究竟什么态度，当天下午徐冰报告上午与黄启汉的谈话称：上午与黄启汉谈，黄转达李宗仁的意见是：（一）决心推动全面和谈，如遇少数人反对，则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尽力对付；（二）决不依靠外援打内战，一旦和谈开始，他愿就此发表公开声明；（三）以毛先生之八项条件为基础，绝对不成问题，只是第一项战犯问题，希望由新政府去做，因目前要做极为困难；（四）希望中共首先承认李为和谈对象，并愿早日指定代表开始谈判，如和谈失败，定当引退；（五）对蒋问题，吴忠信已表示，最好让蒋出国，如中共认为蒋出国可以减少和谈障碍，他愿意就此向蒋提出出国问题；（六）外交方面希望成为苏美友好的桥梁，不希望成为苏美两国的战场。李特别希望能在中共指定的地点，和毛先生密谈一次。

黄说：白崇禧仍比李宗仁积极，还是主张马上更换内阁，撤销陈诚、薛岳等人职务。他认为全面和平，局部破裂不要紧，如局部和平，全面破裂则不妥。而李也认为现在不能操之过急，应与中共取得默契后再开始着手进行，因李在南京牵制太多，搞不好被逐出南京，必然全面破裂。因此，李白此时均处于夹缝中。李对中共还可以派黄与刘仲华来表达真意，对蒋介石和孙科，连派个人与之谈真心话都不可能。黄认为，中共与李白接近，只会对革命有利。他同时还告诉徐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也找过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和平，成立联合政府，但鉴崐于上次美国调处的失败，这次绝不会出面进行调处。

当晚，叶、徐二人设宴招待代表团，同时还邀请了傅作义、邓宝珊、郭宗汾、焦实斋、周北峰等出席，中共方面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也都专门出席作陪。颜惠庆、邵力子等人见到傅作义十分惊喜，连连作揖道：“幸会，幸会。美国方面的报道说，傅将军被扣起来了，看来是一派胡说。”

１６日，叶剑英专门约邵力子谈话。因中共中央历史上与邵力子和张治中接触较多，对两人印象不坏，因此早有电报要叶剑英“对邵力子应表示尊重与倾听他的意见，并和他单独谈一次，并探询他和张治中是否愿意参加联合政府”。

但是，与邵力子的谈话并没有使中共中央感到满意。邵力子关于应当缓和对美关系的说法明显地刺激了中共领导人。在看到邵力子关于中共应当看到美国也有很多人同情中共，将来中共建设亦须美国帮忙的说法时，毛泽东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替美国作说客！”看到邵谈苏联大使赞同双方直接谈判的说法时，他更气愤地敲着桌子，冲着正在对面读电报的周恩来大声说：“你知道吗，苏联也是要和的！”看到邵力子谈中国地大人多，中共应当尽量采取温和手段进行政治变革，双方和谈不要一上来就提出战犯名单迫使战败方承认时，他更是大声痛斥道：“这就是说，革命必须带上温和色彩”，“谈判还要承认对方与我平等”！看到邵力子对参加联合政府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一面回答说现在谈这个问题恐怕别人会以为我是为了想参加联合政府才来参加和谈的，因此最好和谈实现时再提，一面又忙不迭地解释说：也许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应该从工作上着想，暗示不反对参加联合政府，毛泽东禁不住大声笑起来，说道：“这怕是想以此求得保护他那个阶级的利益吧！”

第二天，叶剑英单独与章士钊谈话。章士钊的谈话也同样不受听。章又重提桂系举足轻重的话，说蒋迟走两天，白崇禧就宣布两湖独立了，现在白仍有力量，白一动作，四川也会跟着走的。因此，他再次讲中共文告“同情中共者则担心，反对中共者则高兴”。认为如果中共寸步不让，美国会援蒋到底，甚至组织日本志愿军，从而增加解决的难度。不如现在就和下来，仿照当年承认国民党领导组织政府的例子，要各党派承认中共为领导，用策略的办法来收拾残局，争取人心，平稳过渡。对此，毛泽东得出结论：章士钊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和，美必援蒋到底，结果使帝国主义者及大资本家害怕，中共亦不能成功。

共产党连蒋介石最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庞大兵团都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垮了，它这时当然不会把桂系的３０万军队放在眼里。毛泽东对任何过高评价美国和桂系作用的说法，都不以为然。因此，毛泽东对邵章两人的谈话大为不满，断言：“邵章很狡猾，是受美国人教示出来的”。他明确要求叶剑英等，在以后的谈话中，“痛骂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特别要当着章士钊的面骂日本，说如果美国人装备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我们必须并完全有把握彻底干净歼灭之。美国在中国的走狗必须肃清，决不许其存在。要当着邵章的面痛骂桂系，说桂系的军队比蒋系军队还要野蛮，白崇禧过去是主战最力的人，他是仅次于四大家族的战争罪犯，将来人民法庭审判难免要被枪毙，李宗仁完全是骗子，他一月二十七日给毛主席的电报以‘千古罪人’威胁毛主席，完全是做和平攻势。蒋系也是做和平攻势，但蒋系比桂系老实，蒋系始终是凶神恶煞，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是笑面虎”。当然，应当把握的一个原则是，“对桂系形式上要打，实际上要拉”。

不过，毛泽东也并非完全不重视代表们的谈话。颜惠庆一辈子搞外交，说话十分策略，虽讲得与邵章并无根本不同，但却让毛泽东听得很入耳。他很重视颜所说的“学唱文戏”的问题，明确表示赞同颜所提“先用武力，到一定程度改用政治。政治无效，再用武力。表明中共态度，不是好用武”，以此来取得民心的意见。毛当即与周恩来商定，接受颜惠庆的建议，与南京来一个非正式会谈，作为初步交换意见的方法。为此，毛泽东很快起草了几点意见，准备专门接见几位代表一次，然后交他们带回南京。

２０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叶剑英，同意颜、邵、章、江要求会见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要求，批准四位代表及颜的私人医生，另外加上傅作义、邓宝珊和北平市委一人，总共８人于２２日经石家庄前往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

２２日上午１０时，颜惠庆等乘机飞往石家庄并转往西柏坡村见毛泽东等。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次交谈，毛泽东明确表示可以考虑与李宗仁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但必须“速议速决”，一切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谈得成解放军立即过江，谈不成解放军也立即过江。

劝说中共同意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这是代表团此行的基本目的。既然中共方面能够同意和谈，各位代表自然深感满意。根据毛泽东所谈诸点，章士钊迅速起草了一个八项协议，提交讨论。经过简短的讨论之后，双方就协议的基本文字达成妥协。这一秘密协议规定：中共和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在北平，以毛泽东所提八条为基础，进行秘密谈判，一经达成协议，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终于说服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了。这个结果实在让四位代表兴奋不已。２４日下午，

四位代表返回北平后，仍长时间沉浸在激动的情绪之中。

２７日上午１１时，上海代表团再次来到了南苑机场。叶剑英亲到机场送行。临上飞机前，颜惠庆松驰的脸上每条皱纹几乎都充满了微笑。他右手颤巍巍地握着叶剑英的手，左手轻轻拍着叶的肩膀说："你们应该成功，应该成功，希望很快能在上海见到你。"叶剑英也注视着老人的眼睛，和声细语地说："颜先生多多保重。我们很快会见面的。"在和小个子的邵力子握手时，邵神秘地把叶拉到一边，问道："你们是不是把《世界日报》给封了？"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深感遗憾地摇着头说："依我看，《世界日报》似乎完全不必封，况且你们进城时没有立即封闭，进城后２０天才将其封闭，这容易给人造成共产党的政策是先宽后紧的印象，影响不好。"

在一一握手道别之后，几位代表依依不舍地登上了返回的飞机。随着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巨大的气浪卷起一片遮天蔽日的黄沙。当人们重新看清蓝天时，飞机已经高高地飞上了天空，向着南方飞去了。

李宗仁意图自成局面　刘仲容得令火速北上

３月５日，受桂系影响的南京《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蒋公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的社论，象是在舆论界平空甩了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一片喧哗。卫戍司令张耀明当即派军警把该报主笔龚德柏逮了起来。龚在李宗仁与孙科竞选副总统时，曾冒险刊出一篇揭露孙科养"小妾"蓝妮的消息，为李宗仁助阵，立有汗马功劳。况且，这次逼蒋出国，也是李宗仁策动，并亲自透露给甘介候，甘介候又转露给龚德柏。因此，李宗仁得知龚被捕，也顾不得许多，两次打电话要张耀明放人。但有ＣＣ系、黄埔系齐声鼓噪，张硬是顶着不办。气得李宗仁在总统府的办公室里直转圈子。还在２月中旬，蒋介石一个电话撤了主和的浙江省省主席陈仪时，李宗仁就有点儿后脊生风的感觉，不得不下决心把他原来的警卫团调进南京来保驾。这时，李真有点六神无主了，不住地问白崇禧该怎么办。白这时恰在南京，他其实也毫无办法，只是七窍冒火地在国防部里大叫大嚷，威胁着要调四十六军来南京。程潜也跑到李宗仁的家里，大骂蒋介石无耻已极，咬牙切齿地主张无论如何也要逼蒋出国，明确表示无论和战都支持桂系。这一通折腾，搞得个南京沸沸扬扬的，象开了锅似的。蒋桂两派，更成冰炭之势。

劝蒋出国，最初其实是还是蒋身边的吴忠信提议的，李宗仁自然赞成，但没有人敢去当这个冤大头。张治中２月下旬从兰州回京后，自告奋勇地愿意去做说客。《救国日报》社论发表之前，张治中和吴忠信刚刚离开南京前往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几天时间张没有电话打来，急得李宗仁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一个劲儿地担心张治中被蒋介石扣起来了。而７日午后张治中打电话来，说何应钦过两天即由奉化返京，蒋已同意由何应钦组阁。这一来，李宗仁又让人莫名其妙地兴奋得了不得。直到程思远问他，才知道，据说是张临走前曾约好，如果劝蒋出国有戏，就打电话出来。而搞倒孙科，改换何应钦，也正是李宗仁的提议。因为何与白曾长期共事，关系还不错，历史上何也曾与李、白联过手，长期指挥军事的何这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也更倾向于和，再加上除了蒋之外，也只有何才能镇得住那成千上万的黄埔生。如果何应钦与李、白联手，蒋介石又听劝出洋，他李宗仁的整盘棋就活了。这也难怪他转眼间又有些飘飘然了。８日孙科内阁总辞职。１２日，李宗仁公开宣布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长，重组内阁。

中共中央这时对李宗仁的组阁行动十分注意，尽管邵力子在北平时曾再三替何应钦开脱战争责任，说何其实是主和派，但中共中央仍旧把何看成是蒋系的顶梁柱。因此，当得知李宗仁准备让何出面组阁的消息后，叶剑英当即打电话给仍住在六国饭店的黄启汉，要他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要李务必选最能够顺利进行和谈者担当行政院长之职，以免引起各方误会。但李宗仁显然有自己的主意。

３月１３日，即李宗仁正式宣布任命何应钦组阁的第二天，他把刘仲华和刘仲容都找了来，要刘仲容转告毛泽东先生，说他是诚意和平的，希望中共相信他。据他说，蒋现在已经完了，无论军队、政治、经济、党，都崩溃了，大势已去，就是特务也不足虑了。这次拉上何应钦就是明证，何是主和派，用何可以控制军队，并便利今后的军队改编与裁减。他希望中共给他一段时间，用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在和谈时或和谈前渡过江来，那样他只好一走了之。他甚至半威胁半诉苦地说什么："我很害怕把一个好好的局面搞乱了。现在和平民主力量已经有了战胜封建死硬势力的基础，只要不打仗，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相反，如果解放军渡江，那么不要说蒋介石会重新出来，白崇禧也会打的，美国、日本都会放手支持蒋，那样的局面是我所不愿看见的。"不管二刘怎样向李宗仁解释，对中共无论如何不能以不渡江来作为条件，解放军渡江只会对宁沪杭一带的蒋系军队形成威慑，而不会威胁和平，李宗仁始终不改变态度。即使在中共中央得知此一情况后，专门去电上海转告李宗仁："不要惧怕我军渡江"，李也还是不做答复，并且要黄启汉转电中共中央称：正当和平初现，和谈将开之时，中共部队连日向麻城、罗田、英山、望江、安庆、无为、巢县、泰州之线大举推进，迫近江边，致使此间人心惶惶，影响和谈进行甚大，务请从事考虑制止，并酌予后撤。为免生枝节，中共中央这时还真的一度下令前线部队暂停向计划中的花园及其以南之孝感、黄陂、黄安、阳罗、黄冈、麻城、浠水等地前进。

中共中央这时已决定要联合李、白，故而不惜迁就李宗仁的上述要求，但对李宗仁、白崇禧的表现也早有疑惑，特别是因为李宗仁身处南京，未必能有多大作为，而白崇禧控制着大批军队，中共中央对争取白更加重视，急欲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因此特别要求调长期在白身边工作的刘仲容到北平来。还在３月５日，当白崇禧找刘仲容商量，要刘取道武汉进入解放区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就明确指示刘化名王志廉从武汉经驻马店向解放军前线部队接洽进去。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要求刘行前应向李、白问清楚他们对颜惠庆、章士钊等人带回去的协议的具体答复，并带来电台呼号波长密码等，以便联络。中共中央之后接连数电中原局，要求他们立即向驻马店前线部队说明情况，迅速派人接引刘仲容进来，并派人送至郑州，乘火车赶往济南，再转送石家庄。毛泽东并亲自批示："勿误至要"。

３月１６日，刘仲容从南京飞往武汉，由白崇禧用装甲车送至信阳，再由张轸派兵于２０日送到驻马店。之后，中共中原局社会部高洵东、卢声涛二人接引刘至郑州，再坐火车于２７日送至济南。因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由西柏坡搬入北平，周恩来２８日专门致电社会部负责人康生"派要人在济南接待，并乘汽车附警卫人员护送至德州转乘火车经天津赶来北平。"２９日，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凌云受命带警卫人员专程送刘仲容转赴北平。３０日下午，刘仲容终于被送到北平，并被立即齐燕铭接送至中南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处住下。

刘刚刚被安排住下还不到一小时，毛泽东就派人用车把他接到西山双清别墅自己的住处去谈话。可见毛泽东希望了解白崇禧情况的心情是如何急迫。两人一直谈到晚上，毛泽东对他所介绍的情况看来还比较满意。尽管毛泽东早就知道李、白已了解了刘仲容和刘仲华的秘密身份，他们对二刘所谈的一些情况未必完全出于真心，但在得知李宗仁等基本赞同颜惠庆等人

带回去的八条协议之后，毛泽东还是得出结论：李、白有联合反蒋的诚意。因此，他当晚就打电报给华中前线高级指挥官，称：与白崇禧之间的电讯联系即将建立，“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望前线各部准备与白崇禧在军事上进行配合。

白崇禧毛泽东通密电　代表团争面子枉摇舌

为了与中共进行和谈，整个３月间南京方面都在积极准备方案。得到蒋介石批准的作为最后退让尺度的谈判腹案，第一条就明确要求“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第四条则要求“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第八条更要求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中国共双方名额相等。

４月１日，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飘着一丝丝细小的雨滴，连续几天江南都是这种阴雨天气，但是今天的南京机场上却是人声鼎沸，官盖如云，热闹非凡。原来，今天是南京和谈代表团离京前往北平与中共和谈的日子，包括李宗仁在内的大批政府官员都整整齐齐地列队送行，再加上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代表团的家属和众多新闻记者，就连飞机发动时的轰鸣声也被人群中发出的一阵又一阵兴奋的叫喊声给淹没了。直到飞机飞离南京上空很远之后，代表团的成员们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南京和谈代表团可谓阵容庞大，浩浩荡荡。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以下分别是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代表团另有顾问４人，即刘仲华、屈武、李俊龙、金山。代表团的秘书长为卢郁文，另有秘书１０人、译电员２人及随员５人。仅张治中一个人就带了一个秘书（谢超），２个速记（余湛邦、袁永竹），两个缮写（周光宇、任宝华）和一个随员（张立钧），另加２个译电员，总共８个人。张治中解释说，他带这些人是因为他还要在北平同时指挥西北的军队。

飞机临北平时，已是下午３时许。当机翼下的北平城区透过一道道阳光渐渐清晰可见时，坐在靠近驾驶舱门口的黄绍竑大声要求驾驶员在市区上空盘旋两圈，以示礼貌。“党的方面周恩来一定会来，政府方面估计会派叶剑英来接。”他高声预测着。“希望不要有南京那么多的记者，我真是烦死这些家伙了。”刘斐边说着边把领子上的风纪扣扣好。

飞机下午３时４５分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当轰隆隆的马达声渐渐消停下来之后，人们从机舱的窗户上惊奇地发现尘土飞扬的机场上似乎一个人也没有。直到打开机舱门，代表们扶着梯子鱼贯而出，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机场上冷冷清清，平地卷起的阵阵黄沙中只站着两位身着军便服的中年人，再远处就是几辆吉普和大轿车旁边正在聊天的十几名士兵了。“这简直是莫名其妙！”刘斐第一个瞪圆了双眼，气呼呼地压低了嗓门儿吼着。黄绍竑也半晌儿转不过弯儿来。走在前面的邵力子则显得很老道。他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迎上来的徐冰走去，一边握手，一边转身向身后的张治中介绍道：“这位是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先生。”然后转过脸来又把张治中介绍给徐冰和徐冰身后的另一位先生。

北平机场和南京机场的强烈反差给了代表团成员强烈的刺激。在前往六国饭店的路上，代表们一反在机舱里那股兴奋劲儿，一个个象霜打了似的直犯蔫儿。直到住进饭店，看到房间里的报纸时，有些人才又活了起来。不过，这回不是兴奋，而是愤怒。刘斐手里挥动着他刚刚

看到的一张报纸，冲到张治中的客厅里，炸雷般地吼着：“这简直是侮辱！”李蒸这时也拍着手里的报纸，大声问道：“这里满篇都骂我们是匪，那找我们来谈什么？这也未免欺人太甚了！”

黄绍竑也拿着一份《进步日报》来到张治中的房间，递到坐在沙发上闷不作声地喝茶的张治中面前，说：“你看看，点名骂你是蒋系的走狗。这件事应有所表示，我们既然来了，可以不客气地提出来。”李蒸也说：“此事应提出抗议。”但在一旁背着手踱步的邵力子却慢条斯理地说着风凉话：“共产党骂政府是老早就骂了，正因为骂，所以我们才来。如果受不了，就不必来了。既来了，受得了得受，受不了也得受。况且《进步日报》是大公报的前身，我们如果提出来，他们会说是新闻自由。我看没必要小题大作。”张治中一边读着那篇署名的评论文章，一边做出一幅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这个杨刚是不是共产党？”邵力子答复说：“这个人怕不是共产党，只是他过去在上海没少受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与国民党恐怕有血海深仇吧！”黄绍竑问张治中：“我们好心好意来，他们一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不有些过分了吗？”“见到周恩来时，有机会可以顺便提一提。”张治中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卢郁文这时蹑手蹑脚地跑进来，神秘兮兮地小声说：“中共要人来了。”张治中听罢迅速站起来，走到房外。果然，周恩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七、八位中共领导人已经笑容满面地出现在走廊里。“久违了。”周恩来一面热情地握住张治中的手，一面用眼神向张治中身后的国民党代表们致意。分别介绍寒暄之后，周恩来带头领着张治中等一齐走进了饭店的宴会厅。一走富丽堂皇的宴会大厅，等候在宴会厅里的中共方面的人员就纷纷鼓起掌来。代表团的情绪又重新高涨起来。丰富的晚宴和热情的招待，使代表们又开始恢复了来时的那种心情。代表们开始相信，共产党一切都是重新建设，工作很忙，因此这样招待他们已经很不错了。因此代表团决定：招待和商谈等等，均随中共的便，不做特殊要求。新闻宣传的事，也暂时避开不提。但是，晚宴后周恩来找张治中谈话，严厉质问张治中为什么临行前专程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个代表团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林伯渠约章士钊谈话，坚持在战犯问题上决不让步，也说明中共立场难以松动。因此，代表们刚刚兴奋起来的神经顿时又倍感压抑。张治中忿忿不平地说：“他们也未免太势利了，过去我三次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来接，后来我们驱逐他们，我还不是一样亲自送董必武到机场？如今我们打了败仗，就接也不接了。晚上周恩来甚至提也不提一句，我真气不过。照这个样子，恐怕就是我们再努力，也难成功。”章士钊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其实就是一个面子问题。此次六个代表，除本人之外，均属国民党。如果一定要抓蒋介石，等于让儿子签字抓老子，你们怎岷么签字？”

从 2 日以后，双方代表开始进行个别交换意见。双方争执的焦点明显地集中在战犯问题上。多数代表认为，我们是第二号战犯派来的，第二号战犯怎么能办第一号战犯呢？这件事根本办不通。纵然签了字，不仅南京不会同意，而且我们根本就回不了南京了。可是，中共代表在战犯问题上毫不松口，只是同意谈判期间军队暂不过江。

在接连两天个别谈话摸底之后，中共中央对于南京代表团内部情况和要求已经十分了解。鉴于代表团中相当一部分人都与蒋系有关，因此他们对代表团谈判求得根本和平解决不抱太多幻想。中共方面这时的策略是尽量分化争取代表团中的动摇者，而对坚持与共产党为敌者置之不理，使其无所作为。同时，在北平的报纸上接连刊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等文章，激烈地批评南京政府及其张治中等人，不断施加政治压力。同时，眼看长江快到涨水期，毛泽东更多的在暗中拉拢白崇禧，力图促使白崇禧能够在解放军渡江问题上保持中立甚至给予配合。

4、5两日，白崇禧接连给刘仲容来电，要求解放军在安徽停止进攻安庆，在河南停止向花园推进。毛泽东当即复电，表示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可以由双方代表谈判解决，黄冈、黄陂、花园、孝感、汉川、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解放军将暂不进攻，只须将该线以东地区及安庆以西地区部队撤退即可。毛泽东并具体说明了白崇禧前线部队与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系的方法。

对于毛泽东的提议，白崇禧9日复电表示基本赞同，称已通知前线将领，但又解释说：要他从安庆撤退军队，还些有困难。因该地属京沪区指挥，他不便擅令守军撤退。对此，毛泽东表示充分理解，一面复电白崇禧，告诉他同意在安庆保持现状，一面指示前线部队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

同样，对于这时李宗仁通过电话提出的请解放军不要占领镇江、芜湖，以免南京因可能受到炮击而政局动荡的要求，也迅速给予满足。

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了中共方面急于与李白合作的迫切心情。

北平谈判柳暗花明　南京政府翻云覆雨

李宗仁这时“和共”的急迫心情，也足以与中共相比。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如果他和不下来，南京政府必将南撤，蒋介石搞不好还得上台。到那时，怕是再没有他李宗仁的位置。因此，代表团临行前，李宗仁曾专门把黄绍竑找去谈了两三个小时，求和之心表露得情真意切。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如中共条件真难接受，和谈破裂，我便下野；如中共条件并不太苛，尺度相当的放宽，大家仍不同意签字，因而和谈破裂，我亦下野；另外，不管中共条件如何，只要你们同意签字，即令溪口方面反对，我都可以完全负责”。可见，李宗仁这时应该十分明白他自己的处境。

但是，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却无论如何不敢擅自主张接受中共的条件。代表们苦撑数天，天天与中共代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商谈，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和约不要象个投降文件，得使我们面子上还过得去”。

在经过几天时间的个别交换意见，和通过报纸发动政治攻势之后，中共中央注意到代表团内部的态度越来越混乱了。代表团内部经常意见相左，这边吵得不可开交，那边却仰头大睡，鼾声如雷；这个轻描淡写地说什么：“既来之，则安之”，那个忿然大叫：“如果明天有飞机，王八蛋不回去。”争来争去，其实只是两个问题，即能不能同意惩办战犯和解放军渡江。4月5日，在中共中央的提议下，各民主党派派出朱蕴山、李民欣为代表，在刘仲容陪同下前往南京，邀请李宗仁亲自来北平进行和谈。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团深感困惑，斗志顿挫，态度迅速软化了。他们于次日作出决定：第一，战犯应受惩处，只要不正式提名，并且凡赞成和平条款及对人民作有益贡献者，均可酌情减免处罚。第二，同意解放军渡江，但应给南京政府必要的准备时间，不过也不必拖至联合政府之后。7日，代表团果然又收到何应钦来电，要各位代表本悲天悯人的态度，荣辱在所不计，务必达成和平。看上去，南京政府方面也已放下架子，准备签城下之盟了。这一下，那些曾经强硬的代表都象泄了气的皮球一蔫了，而那些极力主张接受中共意见的成员，则如释负重，脸上神采飞扬。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开始采取决定性步骤。8日上午，张治中被接往香山双清别墅。刚下汽车，周恩来就亲自接出门外，微笑着伸出手来与张治中的手握在一起，同时说："今天毛主席想和你谈谈。请。""毛先生？"张治中惊讶地张大了嘴，然后不禁高兴地笑了起来。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院子，只见毛泽东已经走到院子里来迎接张治中。张治中与毛泽东相互问候着，然后一同走进屋里谈话。这次谈话总共进行了4个小时。当天晚上，张治中召集代表团开会，刚说明他要报告的题目，底下的代表们就立即打断他话，问：你先讲：好，还是不好？张微笑着答复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十分热烈。张详细讲述了他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他声称，毛、周的意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战犯问题，可以不在和平协定条款中提名，可以不提蒋介石三个字，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困难表示理解，并同意将此问题拖到最后办。（二）改编军队问题，所有国民党军队的数额、番号、官长均可照旧不动，驻地问题可以研究。（三）渡江问题，是否签字后马上渡江，也可以商量。（四）南京政府在和谈至新政协开会，即到联合政府成立前这一段时间内，都要继续负责，不要散了。（五）和谈方案正在草拟，拿出方案正式谈判时，两小时内便可解决问题。将来签字时，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等都来参加最好。他最后兴奋地讲："你们知道吗？整个谈话过程中，毛先生态度闲畅，对蒋亦称蒋先生，只有一次称蒋介石。可以肯定，按毛主席精神，和谈是可以成功的，因为今天双方谈判距离不大，甚至于没有距离。争执的焦点为战犯问题，但我们对战犯问题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正在这时，何应钦突然从广州打来电报，声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代表团要求中共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停止一切施行暴力的政策；坚持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双方同时实行。

何应钦的电报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一片哗然。谁都知道这是蒋介石在背后指使。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上海现在成了恐怖世界，他妈的皮，真不知耻！"刘斐也忿忿然，称："我最痛恨蒋介石的军队。我几次去故宫，遇到中共军队，四五次从队中穿过，战士们总是很和气，并无不悦之色。如果碰到我们中央军，早已张牙舞爪，甚至拳打脚踢了。即使不打，骂也将你骂死。"

气愤之下，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斥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而黄绍竑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４月９－１１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竑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

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１２日，代表团电告李宗仁：目前只等中共方案提出，一旦中共提出方案，代表团讨论后，即派黄绍竑、屈武飞回南京，如南京同意，即与李宗仁等一同飞返北平签字。如不同意，亦请派于右任等来平，以便讨价还价。

１２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除表示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外，明确要求对解放军“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即使签约，双方军队也应各驻原防。

代表团很清楚，解放军渡江不可避免，故对南京试图划江而治的企图深感绝望。

李蒸悲观地说：“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邵力子当场劝告说：“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章士钊也表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但李俊龙却以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

尽管意见不一，张治中最后还是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定后能够暂缓渡江。

和谈代表弃暗投明　李白食言自吞苦果

１２日，刘仲容回到北平，说明李宗仁求和的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何应钦的电报实际上也正是李宗仁同意的。李的目的，颇有点儿想划江而治。按照李宗仁对他所说的来看，所谓执行中共的八项和平条款，都得由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同样，白崇禧到南京后，虽仍反蒋，但也不主张与中共局部和平，更反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

得知李、白态度如此暧昧，长江涨水期已到，毛泽东决定不再与代表团继续周旋。周恩来立即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１２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于这一草案措辞严厉，并历数国民党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因此代表团中多数一时颇难接受。

在反复商量和交换意见之后，代表团仍旧决定接受这个文件。１４日晚，张治中向中共正式提交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取消原草案中的各种刺激性字眼儿。

在第二天的代表团会议上，刘斐眼睛瞅着天花板，风言风语地发着感慨：“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这样做。倒是代表中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看得开些，他笑着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张治中经过几天长喘短叹之后，至此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心情沉重地表示：“连日来之所以争论不休，实在因为两种东西在束缚我们自己：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

于政府，我们个人的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今日的政府又是国民党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意见又受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双重的束缚下，自然甚为矛盾与苦闷。”邵力子颇有些不以为然，说：“今日已是所谓宪政时期，我们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国民党。况且清党以来，国民党越弄越不像样，连‘民族’主义都不许讲，而要讲‘宗族’主义了，将总理遗训抛得一干二净。今日之下，要我代表国民党，这点我不能承认”。

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

１５日晚，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并声明，如果到４月２０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我们就只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全然想开了。他坦率地宣称：“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于是，１６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

当晚，黄绍竑、屈武向李宗仁当面报告了全部谈判情况和代表团集体的意见。虽然李宗仁当初曾保证不管中共条件如何，代表团同意他就敢负责，这时却全然缩了回去。白崇禧看到黄绍竑带回来的协定内容后，也气呼呼地表示反对。结果，李宗仁不顾周恩来的劝告，把牌摊给了何应钦，以使来使自己脱身。他随后告诉黄绍竑：以后不要再提接受中共协定的问题了，这是不可能的。

１９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中央社的广播公开宣布，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１８日已经发表声明，明白告诫任何人主和都不得超越元月一日蒋介石发布的文告及国民党中常委４月初的有关决定。至此，黄绍竑自知安全难保，决定远避香港。２０日，他专门打电话告诉代表团，他已被迫辞去代表职务，南京方面绝不会批准和平协定，和平谈判事实上已完全破裂。

４月２０日，李宗仁、何应钦联名致电南京和谈代表团，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协定，称“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希望中共方面能够“确认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对此项协定之基本精神与内容，重新予以考虑”。而为了说明他之不得已，李宗仁随后又单独致电章士钊等，解释说：昨日立法院开秘密会议，何应钦宣读协定全文后，即使彻底主张和平之立委，亦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主张。他自己即使同意也无济于事。

国共和谈至此宣告正式破裂。但李宗仁既也没有象他当初所反复声明的那样，自动下野；白崇禧也没有象他屡次向中共表示的那样，联合中共实行反蒋。说来说去，李、白的“和共”反蒋，归根到底还是想向蒋夺权罢了。

２１日，解放军这边大举渡江，连张治中等人也看出国民党将寿终正寝，决定留在北平不走了。可是李、白那边却一面指挥桂系军队节节抵抗，一面先后联络张发奎、阎锡山、居正进一步向蒋夺权，企图彻底破灭蒋再起之幻想。只可惜，李、白自视过高，他们既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到头来，“落得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一个被逼海外，亡命天涯；一个被夺兵削权，饮恨而终。

书评书序

《西安事变新探－中共与张学良关系之研究》书序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5 年）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多半是在１９８０年，至迟不超过１９８１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在一位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相当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的几件资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就是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７日和３０日刘鼎给李克农的报告，以及５月 初朱理治和曾钟圣两人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这几件资料清楚地表明，还在１９３６年４月底５月初，张学良就已经开始做反蒋的准备了。不过，那个时候西安事变对于我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课题，这些资料还不可能使我对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兴趣。

毕业以后，由于从事编辑工作的关系，我开始较多地接触到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其中自然也包括西安事变的研究。象吴天威先生的《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申伯纯先生的《西安事变纪实》，李云峰先生的《西安事变史实》，乃至李云汉先生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大致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陆续拜读的。使我感到好生奇怪的是，包括海外的著作在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谈到张学良与周恩来那次颇为著名的延安会谈时，都一口咬定，张学良当，时力主“联蒋抗日”（或称“逼蒋抗日”），并且说得周恩来口服心服，最后就连中共中央也确信张学良是对的因此在延安会谈结束后不久，即４月底５月初中共就改行了“逼蒋抗日”的策略。同是一个４月底５月初，我们的研究者们竟得出了如此不同的结论！

也许，这些西安事变的研究者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就已经看到的那几件资料？１９８７年，我试着鼓动两位朋友利用有关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刊登在１９８８年《近代史研究》第三期上，对上述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也许是人微言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少反应，唯一一位提到这篇文章的学者，还在他的论文里把这个观点好好地批评了一通。可想而知，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西安事变研究硕果累累的几年里，我们众多的研究者们照旧人云亦云，把过去那个说法抄来抄去。但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刘鼎先生自己：他竟然也支持这样的说法！

刘鼎先生的说法公开发表在１９８９年。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的文献》杂志连载了一篇题为《刘鼎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的时候》的长文。传主刘鼎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期间始终作为中共联络员驻在张学良身边，并且亲身参加过延安会谈等一系列当时发生在张学良与中共之间的重大事件，以后并作过全国政协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这篇文章的基本资料，恰恰就是刘鼎先生自己在１９７５年所做的追忆笔记。而介绍刘鼎这段经历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是继刘鼎之后担任过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组长，在西安事变研究上颇有成就的张魁堂先生。其份量可见一般。

既然是刘鼎先生自己所做的追忆笔记，按道理刘鼎先生应当对当时事情的大致经过有所记忆，更应当记得自己当年所写的报告，即使是忘了，他也应该看过留存下来的那几份已经不再神秘的历史资料。可是，在这篇文章中，或者勿宁说在刘鼎的笔记里，不仅关于报告及当时朱理治、曾钟圣两人的电报内容一句也没有提到，而且竟然也人云亦云地大谈张学良在延安是怎样说服周恩来赞成联蒋抗日的。文章中居然把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后写给张学良的信里的一句主张反蒋的话，即“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也说成是中共“主张有条件联蒋”的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刘鼎先生的回忆并不否认张学良曾经有过准备反蒋的事实，可是，照文章中所记，这段史实被安排到１９３６年７月去了。结果事情的经过就变成了一个怪圈：即在４月间延安会谈期间刚刚劝说中共联蒋的张学良转而反蒋，而刚刚在延安会谈时劝说张学良反蒋的中共中央，这时却又倒过来劝说张学良应当联蒋。呜呼哀哉！堂堂当事人，又是西安事变史写作组的组长都这样记述历史，难怪在此之后陆续出版的《西安事变简史》、《东北军传》、《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传》，包括海外学者所作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也都异口同声地如此说。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事实。

在以往的西安事变研究中，究竟还有多少这种不是事实，或者似是而非的说法呢？有一位资深的张学良问题研究专家明确地告诉我说，有关西安事变的基本史实都已经写清楚了。言外之意，在有了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而众多成果已经大同小异的情况下，重新再来系统讨论西安事变的史实经过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可是，时至今日，在我仔细地研究过有关的著作之后，我发觉，尽管不少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西安事变的发生同中国共产党有关系，但却没有一本书对中共与西安事变，或者说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甚至，当许多读者从近几年公开发表的报刊杂志上已经知道张学良曾经有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却很少有人进一步就此提出疑问：在那个打算加入共产党的张学良，与我们通常在西安事变史书上所看到的那个力主联蒋的张学良之间，是否存在着矛盾？当然，尽管这些年来人们已经听说了太多的有关“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联军”、“西北大联合”……这些曾经风行于当年大西北的明显地带有反蒋色彩的政治词汇，可又有谁具体地研究过它们同张学良，特别是同西安事变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有关西安事变史的研究无疑已经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但是，说以往的研究已经完全解开了西安事变留存于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怕是言过其实。自张学良先生完全实现了人身自由之后，新闻界以及历史学界之所以频频重提西安事变的问题，正好说明了有关西安事变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至少，在笔者看来，在西安事变研究当中，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关于张学良与中共关系问题还没有深入地进行研究。而前此关于西安事变的研究，更多的还只是围绕着张学良个人经历以及他和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形成过程来进行的，多数研究者只是用很少的篇幅来描写有关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些描写往往还是简单地建立在诸多当事人真假难辨的回忆录的基础上的。

西安事变研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它的回忆史料十分丰富。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大概还没有哪一次事件有过象西安事变这么多的回忆资料。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过多地依靠回忆史料来描述史实，也成了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翻开有关西安事变史的著作，把回忆录当成判断史实唯一根据的情况可以说司空见惯。回忆录（或者用时髦的字眼儿：口述历史）与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相比，有其特殊的功用。其最大优点，就在于它比文字档案资料更具有直观性，可以提供独特的个人视角，告诉人们那些发生在文献资料背后的东西，给人以较强的立体感。但人所共知，如果回忆资料没有当事时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作为依据，它们通常并不是那么很可靠的。而在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回忆录中，

又有多少是以当年的日记、笔记或文献为依据的呢？甚至，即使是对那些有足够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的众多当事人来讲，由于几十年之后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们回忆中的许多事情也难免走样。象刘鼎先生关于延安会谈内容的回忆，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研究多半只是建立在众多这些回忆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依靠第一手的历史文献，由此得出的许多说法必然是大可怀疑的。

当然，以前的研究者之所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回忆材料来进行有关西安事变的研究，确曾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记得在十二年前，当时我刚刚开始做编辑，我的上司曾经提示过我有关的宣传纪律，其中就包括西安事变的问题。据说此前上面曾经就西安事变问题的宣传与研究打过招呼，提醒有关部门在发表涉及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文章时，要注意到张学良先生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情况，不要给张学良先生带来意外的麻烦。因此，在张学良先生恢复自由之前，我们曾经很小心地回避那些在西安事变研究上有任何新的说法的文章。但事实上，还在１９８５年以后，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从１９８５年《文献和研究》公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关于‘联蒋抗日’方针的一组文电”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一组文电”开始，直到１９９４年《毛泽东文集》（第一、二卷）和《毛泽东年谱》相继出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陆续公布了大批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历史文献。被公布的文献不仅涉及到中共中央这一时期的策略方针的演变、国共两党秘密接触谈判、红军打通国际路线问题、西北大联合计划、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与张、杨谈判交涉（包括张学良与李克农的洛川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延安会谈以及杨虎城与张文彬的西安会谈等）的大量报告，而且还包括了西安事变发生期间中共中央与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学良之间的各种来往电报。在这些文献中间，有些资料在过去无疑是属于高度保密的。比如象关于张学良要求入党及被共产国际拒绝的文件；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主张一旦西安被围，就应对蒋“取最后手段”，张学良也表示赞同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期间讨论如何处置蒋介石的会议记录和共产国际电报指示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共历史档案公布得最多的，正是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发生前后这段时期的档案。粗略计算下来，光是这一年前后的文件，至少就公布了近二百件之多。这还不算在那些尚未正式公开，但已经在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的数量更多的与西安事变相关的文件。

事实昭然，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研究西安事变，这也许不错。但如果说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利用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西安事变，那就大谬不然了。可是，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即使在张学良先生已经完全恢复自由多年之后，我们至今还是看不到这样的研究著作，它更多地利用的是这些已经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而不是那些明显地不那么可靠的回忆录。也许，有些研究者会解释说，所有这些档案文献的公布当时还只是“内部”的。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不要说这些所谓“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大量流传国外，为外国学者所引用，即使是在国内，利用这些已经在“内部”公开的文献进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俯拾皆是，为什么偏偏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不能或很少利用它们呢？（况且，从两年前开始，《党的文献》，即《文献和研究》，和《中共党史资料》等过去限制国内发行的刊物已经公开发行，前此的刊物也因此全部对外公开出售。）其实，说到底，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即人们对于过去的说法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多半严重地忽略了那些新公布的文献中所揭示的各种新的事实。甚至，一方面有关中共与张学良关系的档案大量公开，另一方面诸多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研究的著作文章却越来越多地开始否定中共曾经直接对张学良发生过重要影响。有人公开宣称，中

共当时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不仅在整个事变中，过去有关周恩来的作用的说法是夸大其辞，而且在整个事变的形成过程中，张学良也始终是居于支配的、决定的地位，完全凭据自我意志行事，与其说是中共影响了张学良，到不如说是张学良帮了中共的忙。因为，张学良不仅帮助中共制定了唯一正确的“逼蒋抗日”的政策，而且还在关键时刻救了中共的命。

很可惜，我从来不是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也很少对西安事变的问题作个案的研究，因此，长时间以来，我只是站在旁观的角度来评头品足。我希望有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他将解开许多仍旧是谜一样的问题，并且告诉那些关心西安事变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的读者，过去写在书里面的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则需要重新去了解。在这方面，我一直寄希望于我的朋友米鹤都。作为米暂沉先生的公子，他差不多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在协助他的父亲进行有关杨虎城生平的研究，以后更进一步致力整个西安事变的研究工作。他显然和我有着许多相同的看法。但在过去了一些年之后，在我读到他在美国断断续续写出来的部分书稿时，我感到很惋惜，因为我发现指望我的这位朋友在现有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下来及时地完成这项工作是困难的。在美国“下海”之后，他的研究及写作已经很难再象过去那样继续下去了。在莫斯科看到了俄国人已经解密的一些相当重要的档案以后，我相信我应当把他曾经做过的工作继续下去。我很感谢候样祥先生和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编辑们约我来写一部有关西安事变的书。尽管我很清楚，这在我本人很可能是“越俎代庖”了，但我仍旧相信，我所选择的区别于前人的独特角度，将使我能够做得比以前的一些研究者要好些。因为，我始终认为，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主要利用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其结果通常总是更可靠的和更重要的。

不论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新的解释能否为多数读者所承认，在西安事变的研究中缺少了这种角度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陷。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要使那些关心西安事变历史的读者注意到我书中所介绍的那些极为重要的新的史实，关于这些情况，我曾经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在今天的这本书里，我终于有机会把它完整地并且是相当细致地描绘出来了。我唯一想请读者原谅的只是，为了使那些十分珍贵，却长期被人忽视的历史文献重新为人所重视，我在书中对于某些我认为有助于说明历史事实的文献资料，作了较详尽的引证。当然，它们的数量并不是很多，而且我相信，无论我的这本书的读者是否愿意详细地研究这些资料，在读过这本书之后，都会对当年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留下与前不同的印象。

为了这本书，我当然必须首先感谢我的朋友米鹤都。我记得，最早让我开始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感兴趣的，就是他。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我深感抱歉的是，我没有再等下去，等到他继续完成他的研究。但我希望他知道，如果我的这本书揭示了某些历史的真实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的帮助的结果。

为了这本书，我还要感谢台北的蒋永敬教授。我们虽然相识的时间并不很长，但蒋教授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关心使我深为感动。本来，我对于写这本书一直相当犹豫，正是蒋教授的鼓励和他为我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所写的书评，促使我下决心完成这样一本书。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挪威诺贝尔研究所韦斯塔博士和俄国社会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舍维廖夫教授。由于韦斯塔博士的帮助，使我有机会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文献；而舍维廖夫教授则帮助我克服了我在阅读资料方面所遇到的许多语言上的困难。

杨奎松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翠微园

《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书序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

中国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但是，通向成功的道路又是如何向前伸延的呢？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中国最初并不是 共产主义思想的故乡，如果我们还记得最早的中共党组织只有几十个人，如果我们注意到共产党在二十八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几乎始终处于强大敌人的压迫之下，我们就应当想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毕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同时，也正是在这许许多多的失败与牺牲中，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才逐渐摸索出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明确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运动在国际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它对世界的特殊影响。

中国革命的成功，正如它所经历过的种种失败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多少年来，我们深入地探讨了它的内部原因，分析说明了国内社会、阶级、党派集团以及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我们对于外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似乎还缺少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还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生长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国际环境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中国革命的任何一种成功和失败都是不可想象的。

比如，我们可以试问：为什么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会在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很快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为什么中国共产主义者最初要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确立自己的政策？为什么中国革命者会主动接受来自外国的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指导？为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策是出自一个外国人的主张，而整个合作的进程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外国顾问和代表人物来规划和设计？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对中国革命者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苏维埃”革命口号？为什么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的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为什么中共领导人在抗战期间既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存在矛盾，而又明确地把它们看成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为什么共产党要把政治民主化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并且一度把资本主义的“总司令”美国看成是自己实现这一目标的助力，而它最终又为什么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与此相关连，我们似乎更应当试问：这样一种状况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条件下，究竟对中国革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方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呼应的？而 40 年代中共与共产国际及其国际无产阶级领导中心苏联关系若即若离之际，中共的理论观念又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影响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目标和政策？换句话说，中国革命的策略，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我们多半都相信，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还告诉我们，任何事物至少都存在两个方面，它们往往也互为因果，即内因往往也要通过外因才能发生作用。比如，没有适当的温度，鸡蛋也不能孵出小鸡来，而鸡蛋距离热源的远近，热源本身的变化，以及整个气候条件对于热源温度的作用等等，都可能对鸡蛋的孵化过程产生直接的影响。比如，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距离苏联较近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多，而距离苏联较远的国家，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较少。同样，在革命和战争期间，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多，而在和平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出现较少。这种情况告诉我们，外部原因确实在发生作用。

中国之所以会不断发生革命，这无疑是由中国社会的内部原因决定的。但中国革命究竟将要达到何种目的，这又是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形势和条件密不可分的。中国革命之所以从 20 年代而不是从 1905 年开始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艰难道路，显然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密切关系的。毛泽东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高度形象地概括了这种关系的本质。它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就其基本内容和方向而言，都是得益于俄国革命性质的影响和规定的。恰恰是由于中国革命及其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指导，由于后者对于前者的援助乃至干预，中国革命才走上了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条通向社会主义的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

当然，我们不是外因决定论乾。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取决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干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办，而不能由共产国际那些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办。事实证明，完全依照苏联人的方式来处理中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种种复杂关系，多半都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革命最初的十几年里，共产党所经历的种种挫折无疑都与这种办事方式有密切关联。但结果，不论苏联在中国革命身上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精力，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并没有完全按照苏联人的意志去发展自己，从主张世界革命，主张保卫苏联，主张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问题，以致提出"中间地带革命"的思想，他们曲折地却又是勇敢地走出了比较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尽管如此，失败还是成功之母，成功中也依旧包含着失败，外因也仍旧通过内因在起作用，历史总还是一种合力的结果。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历史联系来看，在整个国际大气候、大环境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与外国世界的联系越紧密，它考虑和制定中国革命策略的因素就越复杂，其成功与失败的机会也会同时存在。通向成功的道路依旧充满了荆棘。

从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来考察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及其策略变化，是本书写作的目的。如果我的这种研究能够使人增加对于中国革命曲折程度以及艰难程度的了解，并注意到中国革命产生和发展的极其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它们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因果关系，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本书中因为我自身的水平和对问题的理解程度而存在的各种不足之处，还希望能够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和指正。

杨奎松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书序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的，概念差不多是在 55 年之前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它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以摆脱苏联人控制，决心根据中国革命利益的实际需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命运的一面旗帜。毫无疑问，这样的口号是不可能得到长期垄断着马克思主义解释权的苏联共产党人的赞同的。于是，当新中国建立之初，在苏联人帮助修订后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消失了，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口号，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样一种四平八稳的提法所取代了。在此之后，几乎是在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看来也都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提法。

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然性，多半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再度意识到他们必须重新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特殊条件的独特发展道路之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再度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历史似乎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它原来的起跑线上来了。当然，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每一个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在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时，肯定会受到远比当时人要深刻得多的历史性启示，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将不会再走回头路了呢？事情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简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面政治旗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历来是共产党人用来划分敌我的一道分水岭，但它同时也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人们进行创造性的思维。而创造性的思维，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本身的生命力所在。可是时至今日，对于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不同解释或修正，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仍旧是一件相当困难的甚至是充满危险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从事着前人所未从事过的改革事业的时候，种种政治上的顾忌甚至不可避免地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种种经济问题及其后果的看法，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前国家的改革决心与进程。

没有必要讳言历史发展本身的复杂性与曲折性。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了解，当今所面临的一切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就曾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过苏联人所设置的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禁区”，走自己的路，取得了成功。尽管，在今天，在我们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中国化这个题目的是时候，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其实并不因为毛泽东的出现就“天堑变通途”，中国革命主客观环境及其条件的复杂与特殊，决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共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认识不能不表现出同样的复杂性与曲折性。但可以肯定，正是这种复杂与曲折，也决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决策过程不能不总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点。邓小平用“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来形象地比喻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探索与实践，它其实也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系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一切。了解这一切，真正理解它所具有的深刻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实践应该不无教益。

研究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过程，毫无疑问是有它的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尽管，成功的意义在这里并不意味着完善无缺。恰恰相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向政权的每一步都是极为艰难的，任何一种错误的政策选择，都可能给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历史提供给共产党人进行正确选择的条件又是十分欠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很难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会有中国共产党；同样也不能设想，没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作依据，共产党人能够成功地找到最终战胜国民党的社会力量。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就是灵丹妙药，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方法，由于不能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几十年里曾经几度大吃其苦头。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幸运，其实还在于他们必须而且能够把他们奉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即“中国化”。之所以“必须”，是因为他们曾经始终是在强大敌人的围攻和压迫之下，不能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常注意调整变化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模式，甚至不能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之所以“能够”，是因为他们中有着像毛泽东这样典型地习惯于用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的语言系统来理解、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并且习惯于从中国革命实际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中国人；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与努力，“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它的俄国形式，经过不断的修正和改造，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独特形式。

“变则通，不变则亡”。这句老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适用。正如笔者在本书最后一章所总结的那样：“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从而不能不决定着人们思想和主义的某些内容也要相应地有所改变。……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变化是正常的，相反，不变化却是不正常的。时间在变，世界在变，环境和条件都在不断地改变，把自己的思想、主义固定起来，僵化起来，不能怀疑、不能修正和创新，其结果只能是在变化的大千世界面前失去应变的能力，从而丧失自己的生命力。”看来，正是由于共产党人后来坐稳了江山，这一逻辑的客观力量表现得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因此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不再像战争时代那样“战战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人们真的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只不过，在战争年代里，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任何一种机械的、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作法，都可能迅速把他们引上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过程看上去却要缓慢得多。然而，正因为其来得缓慢，正因为其容易使人感到麻木，当它为害之际，往往危害更甚，以至难以补救。

历史向来都是无情的。它从来不以主观动机论英雄，它所看重的只是客观的效果。因此，任何一个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都有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中国共产党人过去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他们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因而他们敢于根据斗争的实际需要修正它和发展它，而并不是把它视为一种教条。本书从一个方面深入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他们从俄国人和共产国际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当中来的。从本书所说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以及政策的不断变化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按照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准确地规定不同时期与不同条件下的斗争目标，特别是要找到并认可一种灵活适时的斗争策略，曾经是多么的困难，又是多么的必要。在这里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斗争的条件和环境都在不断地改变着，因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切具体的斗争目标、政策策略、行为规范，也统统都在不断的变化和修正中，统统要根据实际斗争的各种不同条件和需要来改变。

任何“经验”、“成熟”、“完善”之类的字眼儿，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毛泽东在革命期间的长处，多半也就在于他能够比其他人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能够更主动地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方法，来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策略尽可能接近于不断变化的斗争实际。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纯洁性”，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公式化、教条化，而且还要把自己也变成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本书并不试图对自己所说明的每一个问题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评论，尽管这里有些可能确实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所在，而有些在今天人们的观念看来确实值得讨论。但是，笔者历来认为，一切发生过的事情都有必然的甚可能是合理的一面。一个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其实首先在于他能否让后来的人们知道过去发生过什么和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在于他能否让人们看到历史上真实的一面，使他们能够真正了解过去。因此，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首先并不在于它成功地使读者接受了什么样的结论和观点，而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多少新的真实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知识。这多半也就是本书写作的目的。

要深入地而且是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上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政治主张以及复杂的政策和策略的形成变化过程，在今天还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说明和再现历史，笔者在这里严格遵循了历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原则，即必须保证自己所研究和介绍的所有重要历史事实有可靠的尽可能是第一手的史料以为依据。正是由于笔者大量地并且是系统地利用了第一手的档案文献资料来研究和说明历史，本书才得以“披露了”－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当然，它们只不过是今天人们应该了解的历史的一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篇幅的原因，以及由于某些资料欠缺的缘故，有些可能是应该谈到的问题很遗憾没有能够在本书中加以研究说明。特别是关于 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具体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中国社会实际的关系，笔者暂时还无力做如此深入的全面的分析和解说。另外，由于笔者在研究功力上的不足，也由于笔者对某些史实的说明未必符合一些同行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本书可能还存在着某些不尽人意之处。凡此种种，笔者只能深表遗憾，并望读者海涵。

杨奎松

1993，3，30 于北京翠微园

《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书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机会，它可以使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双方，在一

种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形成某种合作的局面呢？毫无疑问，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论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这样的机会确实存在过。有谁能够否认，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为止，在这 28 年的时间里，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相互战争的时间丝毫不比他们“和平共处”的时间长。（计算自有中国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这 28 年的历史，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有 1927－1936（9 年）和 1947－1949（3 年）共 12 年左右的时间，而两党合作或处于非战争状态下的时间，却有 1921－1927（6 年）和 1937－1946（10 年）共 16 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双方战争的时间应少于合作的和“和平共处”的时间。

当然，过去的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始终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共处”而不是选择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的而绝不是单方面的妥协。时至今日，还有人在怀疑，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是否还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但是，人们为什么不从另外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从 1935 年开始蒋介石就在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也无法消灭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是否会冒险发动西安事变？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蒋何以要留这无穷的隐患，而与之和平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又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和政权？试比较一下 1949 年的国共谈判，蒋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不想与之妥协，结果竟想要保有部分的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而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

在 1937 年到 1946 年这 10 年的时间里，恐怕再没有什么字眼儿比“国共合作”这个字眼儿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了。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既象征着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他们却始终在努力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统一战线。从 1936 年国共两党谈判政治解决两党关系开始，到 1946 年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为止，他们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 11 年之久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内容固然每每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固然比比皆是，但是，他们之所以谈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达成和实现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为了保持某种形式的和平与合作。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政治地位和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而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最终导致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基础与谅解方式。当然，机会总是有的，无论是 1937 年，1938 年，1942 年，1944 年，还是 1945 年和 1946 年，我们事实上都能够发现这样的机会。但是，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它们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客观环境、力量对比和一方甚或双方的妥协意愿所使然。也正因为如此，机会总是不能保持永远。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可能使本来存在过的机会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注意一下 1942 年和 1944 年上半的两党谈判情况，就可以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也恰恰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似乎有必要注意到两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

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 1936－1946 年间，国共两党几乎所有重大的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

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一种“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具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磨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

本书的目的，在于努力研究并说明在国共关系史中最复杂也最富戏剧性的两党谈判的情况。也许，人们今天可以从中得出某些有益的教训和启示。

杨奎松

1991 年 2 月于北京翠微园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书序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1980 年，一位意大利记者在采访邓小平的时候，曾经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你们今后将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

邓小平回答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文革”对社会进步的毁灭和对我们个人灵魂的虐杀，早已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大潮冲刷得痕迹模糊了。甚至，“文革”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财之道了，从“文革”像章、“文革”歌曲、“文革”中的样板戏，直到以“文革”为题材的书籍……。但是，那位意大利记者提出的，也是当年我们许许多多人冥思苦想的问题，即如何避免再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问题，解决了吗？

“文革”是怎么发生的？直至今日，人们更多强调的仍旧是毛泽东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也正因为如此，当一些人看到种种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腐化官僚横行一方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怀念毛泽东，甚至怀念“文革”。他们往往会口出惊人之语：“真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幻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来杜绝各种社会腐败现象，这未免有点像天方夜谭。所谓“文化大革命”，不就是一次规模大些的运动吗？建国以来，这样的运动发动得还少吗？1951－1952 年是“三反”、“五反”，1957 年是“反右”，1959 年是“反右倾”，1963－1966 年是“四清”，1966－1976 年是“文革”，中间还有“镇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运动等等，哪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结果呢，运

动来运动去，问题总也解决不了，最后还要搞“文化大革命”。“文革”搞了十年，要多长有多长，要多彻底有多彻底，除了造成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滞后以外，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其实，“文革”搞了几年之后，毛泽东自己就意识到这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出路了。只不过，他老人家的思想已成定式，钻进“阶级斗争为纲”的死胡同出不来了。无可奈何之余，他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毛泽东讲这话时，已是垂垂老矣。人老多健忘，从 1952 年到 1957 年，从 1957 年到 1959 年，从 1959 年到 1963 年，从 1963 年到 1966 年，他亲自发动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隔最短者不足两年，最长者也不过五年，“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如何使得？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辑录了历次运动中一些较典型的亲历者的回忆。辑录这些亲历记的目的，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为了暴露所谓的“阴暗面”。事实上，具体到某一个运动本身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而言，人们今天的评价也不尽一致。并且，即使这些运动的亲历者，不少人也不否认毛泽东当初发动运动时具有良好的动机。问题是，靠运动，或者用“文革”这种令人发指的“打倒一切”的方式，能够达到目的吗？看一看这些亲历者的回忆，体会一下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凡有人性、有良知者，谁会期望通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这种毫无理性可言的运动，来解决我们面前那些令人愤愤不平的社会问题呢？

“文革”过去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仍然有人会赞赏 “文革”，主张再搞运动呢？除了那些“文革”中的受益者，和少数思想极端偏执者外，多数普通人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社会腐败现象强烈不满，但又看不出解决的出路何在。

是不是真的没有解决问题的出路呢？当然不是。几乎所有国家在走向经济富裕的过程中，都经历过社会腐败现象严重这样的问题，但很多国家都渡过了这样的难关，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邓小平 1980 年对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显示，他对这个问题也早有认识。因为他当时就已经很明确地讲，我们的有些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这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改革制度方面来解决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切问题要通过民主监督和法律制裁的办法有序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再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狠抓了经济建设，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但却没有能够下大力气及时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致使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社会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已经在不少地方造成了如同朱熔基总理在本届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民怨沸腾”的局面，并导致不少人得出了应该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糊涂观念。

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搞不行了。党的十五大突出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体制改革的光明前景：不是没有办法。我们编辑这部集子，更是希望所有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能够了解：搞运动不是出路，中国决不能再搞运动。无论对国家、对人民、对自己，搞运动都有百弊而无一利。

中国实现经济发达、政治清明的唯一方法，只能照邓小平当年讲的那样：摈弃一切沾染着封

建主义痕迹的制度和体制，真正使我们的国家走上民主和法制的轨道。

避免重犯“文革”错误在于此，恢复人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在于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在于此。

杨奎松

1999 年 5 月于翠微园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书序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香港三联出版社（2000）

如今在国内国外，写毛泽东的书，已是汗牛充栋，多得不可胜数了。但专门谈论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书，迄今为止，国内的出版物中还只有个别当事人的片断回忆[1]，和根据这些片断回忆大胆想象、浓墨重彩地铺陈出来的几本纪实文学作品[2]，称得上专门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3]

是这个问题不重要吗？毛泽东作为一代豪杰，左右了中国几十年的历史命运，不要说他的那些丰功伟绩，就连他的喜怒哀乐、生活趣闻，都成了文人墨客笔下生花的重要题材，被一遍遍地写进书里，更何况极大地影响着毛泽东一生的他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呢！

为什么写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著作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文献资料欠缺。因为资料欠缺，以反映历史真实为己任的历史学家敢于大胆涉足这一课题者自然少。于是它就成了那些稍有文采，又喜欢演义的文学爱好者纵横驰骋的天地。只可惜，那些绘声绘色地描写毛泽东如何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斗智斗勇的纪实文学作品，造成了一个让所有历史学家都深感头痛的问题，即这些一遍遍重复着那几本原来就不是十分可靠的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并加上自己大量主观想象的纪实文学作品，使得本来就有些扑朔迷离的历史事实本身，变得更加面目不清，给历史学家澄清历史，说明真相，增加了更多的困扰。

近年来，历史档案的解密成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潮流。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的有关机构先后公布和发表了相当一批十分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其中就有大量涉及到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问题的电报、指示和谈话录等。90 年代初以来，俄国相关档案的大批公开，更使研究中苏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历史学界当中渐渐变成一门“显”学，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了。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研究，竟开始成为许多国外学者关心的课题之一。

从国外近年来接连出版的几本谈论毛泽东与斯大林关系的专著来看，国外学者积极利用新披

露的资料，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趋势已经很明显。[4]在这方面，中国学者显然已经落在了后面。充分掌握这些新的资料，对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做出我们自己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说明，无疑也应当是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之一。

当然，研究毛泽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许多情况还没有搞得太清楚。但是，作为一代领袖人物，他的一生早已盖棺论定，包括他的几乎所有政治活动，不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也似乎都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要想写出新意，同时又让读者相信你讲的确有根据、确有道理，很难。

目前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也确实还有一些明显的困难，最主要的是因为档案资料的公开还存在着一些盲点，要想清楚连贯地按照编年体的方式讲清楚毛泽东一生中与莫斯科发生关系的全部情况，也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能不能等到一切条件全都具备，等到所有档案资料全部公开以后再来写这段历史呢？我以为不能。

考虑到种种困难，本书的叙述虽然严格按照历史的顺序，但却主要是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研究的重点。因为，正是围绕着这些历史上分歧最多、也是读者最关心的事件，各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最多，研究和叙述起来比较容易做到言之有据。

探讨那些直接关系到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历史恩怨的重要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毛泽东自己的一些说法。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有过长达 40 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既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在很长一段时间束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手脚。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毛泽东，只是按照莫斯科的计划、经验和需要来进行中国革命的话，共产党人大概绝不会有 1949 年的胜利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经常抱怨莫斯科的重要原因所在。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就只能依据他自己的那些充满感情色彩的回忆和解释呢？

毛泽东对他与莫斯科关系历史的说法，长期以来被我们当作金科玉律，并据此来说明当年发生过的许多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毕竟，对于毛泽东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他自己的说法理应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是，任何一个历史学工作者都清楚，对于当事人的回忆，必须抱着十分审慎的态度，而不能简单地依据它们来描述历史，就是对毛泽东本人的回忆也不能例外。

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即使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一个严肃的官方研究机构，也注定是要根据确凿的史实，而不会主要依据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来书写有关他的历史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毛泽东 1936 年向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其中谈到 1920 年他在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正是这三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5]许多年来，谈论毛泽东早年经历的书籍都无一例外地照此说明。可是，80 年代后期，人们已经发现，毛泽东谈到的这三本书，当时其实并未出版。很显然，毛泽东的记忆也一样有不准确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毛泽东传》时，就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这段回忆来说明当时的历史。[6]

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即使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的了解和认识也必定是片面的。人类之所以需要历史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们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从多方面入手，利用一切可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对过去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研究，以便能

够对当年究竟发生过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事情发生的时间、经过及其结果，做出尽可能少带个人主观色彩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那些可能会“误人子弟”的纪实文学作品的影响，本书在写法上尽量做到通俗易通。但不可否认，本书仍是一本带有学术研究性的著作，它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解释也还只是一家之言。笔者的最大愿望，就是通过对大量新披露的资料的分析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人的认识能够比较地接近于历史真实。

本书的部分内容自 1997 年下半年以来陆续在《百年潮》杂志上以青石的笔名公开发表并连载，引起了许多读者的热烈反响，并被一些报刊摘登或转载。但不少读者都表示过某种程度的遗憾，因为限于篇幅，在《百年潮》杂志刊载的内容，没有能够将文中引述的重要论据的资料出处一一标注出来。他们担心这会影响文章的说服力。比如，不止一个读者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你提出的这些新的说法，是否掌握了足够的证据？你是否只是片面地使用了俄国的档案而没有利用到我们自己的资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回答读者的这些疑问，并且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那些格外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进一步推敲和研究的愿望。

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发现，与已经连载过的内容相比，本书在某些章节中做了一些增删和修改。这一方面是得益于那些热心读者的意见的启发，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教授的指点。金教授为了给本书写序，在百忙中逐字逐句地反复审读拙稿，订正了原稿中一些明显的失误，并且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在本书定稿过程中，我已尽可能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本书成稿过程中，承蒙《百年潮》杂志社长郑惠先生、主编杨天石教授、副主编郑海天先生，或审读原稿，或提出宝贵意见；另外，《百年潮》杂志徐庆全亦主动承担了为本书配图的工作，在此特一并致谢。

一些读者曾经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不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这样的书名，担心它可能会使人误以为本书讨论的只是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个人感情问题。其实，只要读过本书之后，相信大多数读者都能了解，尽管领导人个人之间的感情好恶对党和国家关系确实存在着重要影响，但我在本书中通常是在党和国家关系这个更大的范围内谈论它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的，我丝毫没有把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都简单地归结为领导人个人感情纠葛的意思。考虑到这个标题已经为相当多的读者所接受，我在此只好请那些对此有过建议的读者谅解了。

杨奎松

1998 年 12 月 12 日于翠微园

《走近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书序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既远又近。说远，是因为哪怕是昨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只要我们不是亲身经历并直接参预决策全过程，就未必能够说得清楚，因此今人和过去未免越来越隔膜；说近，是因为今天永远是昨天的继续，过去发生的一切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今天，甚至对明天产生影响、发生作用，想躲也躲不过。

中国有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也许，今天来探讨半坡村文化或炎黄二帝如何影响我们现如今的社会文化和生活，多少有点感觉遥远。但是，自从有中共以来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却距离我们很近很近。站在今天历史的高度，回过头去重新认识一下曾经血雨腥风、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深入考察一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关注一下“革命”给我们今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种体制及其思想文化观念留下了怎样的一些铬印，也许能让我们活得更明白。

看革命的历史，要离开革命的那个时代。所谓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就是强调要有一定的距离感。以红海洋中红卫兵的那颗赤热的红心来感觉那个红彤彤的世界，是一种感觉；用丰富的历史对比和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趋向的深邃理解，来冷静地俯视过去，所得到的则是另一种感觉。后一种感觉无疑会比前一种感觉，更可靠，更真实。

距离对历史研究会带来很多遗憾，距离过远，今人关心的热度也越低，反过来对历史研究的推动力也越小。而且距离远了，史料－包括活的史料（当事人）和死的史料（文献档案等）损耗越大。但距离对研究近现代历史，比如中国革命之类，却也有相当好处。除了可以获得更多理智和冷静的判断力以外，还因为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规定了文献档案 30 年解密制度。也就是说，有许多引人注目的近现代历史之谜，差不多都要到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根据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来深入了解它的来龙去脉。

距离所带来的好处并不止于档案开放。熟悉中国革命历史的读者都清楚，即使在十几年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文章著作，只是凭借某个讲话、指示、社论和本本上的精神就来解释过去。而随着时间的远去，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随着人们历史敏感度的降低，要客观地研究和说明半个世纪以前的许多问题，如今应该不再是一件很受束缚的事情了。

当然，有了这许多足以让前人羡慕的条件，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写出发聋震聩、启迪新知的历史文章。研究历史，贵在求真。求也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努力探索之谓也。即为探索，就难免要对过去的研究和定论有所问、有所思、有所辩。而问也罢，思也罢，辩也罢，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非要有全面深入的史料搜集功夫、实事求是的客观精神，和清晰有力的逻辑判断不可。正因为如此，由于个人心态不同，社会及教育环境不同，知识积累不同，对史料的掌握和理解各异，历史学家的研究心得有时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提供的知识和新意也未必一样。时至今日，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仍会有这样或那样不尽一致的解释，实难完全避免。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历史就没有真实可言了呢？当然不是。尽管存在着种种普通人难以想象

的困难和局限，努力探求历史真相，争取让读者更加贴近历史真实，仍旧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反映了笔者个人在这方面的部分努力，它选择了一些可能引起读者关心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为讨论的重点，并尽可能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语言，以期引起读者对这段历史的重视与共鸣。当然，以笔者个人的观点，来对一些传统说法做出新的解释与说明，是否真正实现了更加贴近历史真实的目的，最终还是需要让读者认可，特别是还要经过历史本身的检验。不过，笔者可以确信的是，本集所呈现给读者的研究成果，至少能够将已有的研究向前推进，并提供给读者一些新的经验和新的思考。

实事才能求是。只有当我们真正贴近了历史真实时，我们才可能对我们的昨天和今天有更加透彻的认识，才有可能触摸到历史发展的脉搏。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社会发展到今天，由于缺乏对历史的深刻检讨，无视历史的教训，看不清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曾经走过太多的弯路。但愿我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能把历史当成一面镜子，既用来照人，更用来照己。而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指望历史研究工作者来做出努力。因为只有造出的镜子质量高，镜子中的影像才不会扭曲和失真，照镜子的人才可能不被假象所误导和欺骗。

杨奎松

2000 年 8 月于北京美丽园

末代的皇帝与末代的命运
（再读《我的前半生》有感）

很早以前就看过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当时岁数还小，脑子里总也抹不去皇帝被成功改造成平民的印象，看着皇帝半傻半呆的那些片断，只是觉得新鲜、稀奇。前不久读到俄国解密的一些档案，因为涉及到这个溥仪，于是又把这本书翻出来加以对照，不承想 却越读越不是滋味儿了。

人人都知道溥仪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汉人一个辛亥革命赶了下来，而他的好日子却因为袁世凯的那个优待条款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他依旧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听着下面的人“皇上”长“皇上”短的叫着，并享受着几乎和皇帝一样的待遇。不同的只是他再不用上朝，也不用看那些让人心烦的奏折。然而世代都是做皇帝的，到了自己竟然做不成皇帝，溥仪心理上却极难平衡。因为他还想当皇帝－当像太祖高皇帝那样至高无上，并且能够呼风唤雨的真皇帝。这也正是为什么，20 年后，当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一脸卑谦地请他去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时，他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这可是背叛祖宗的行为。他问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新国家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帝国？“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老祖宗所创立的那个“大清国”，那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事情了。只要能当皇帝。

溥仪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着实过了一把皇帝瘾。这回的时间要比他头一次当皇帝长得多，做了

有十几年。然而这个皇帝溥仪做得也未必痛快，因为他做的是日本人的“儿皇帝”。无论公私，凡事都要听凭日本人做主不说，而且居然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能认了，要改成祭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溥仪在自传中解释说，他其实并没有忘记祖宗，“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他甚至说他的屈从，只是想实施“屈蠖求伸之计”。但我相信这只是溥仪事后对自己当年丑行的一种辩解罢了。那时候整天提心吊胆怕日本人要了他的命，张嘴闭嘴不忘“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的这位“儿皇帝”，未必对自己的祖宗还有那么多的礼数，更谈不上有什么“求伸”之计了。

溥仪心理的扭曲，与他生来所处的环境有关。人被捧到了一定的位置上，往往就下不来了。有的是因为周围的人，跟班跑腿的、提颅效命的，在在都要指着自己吃饭，你下去了，他们怎么办？比如 30 年代中期的那个丢了东三省的张学良，何尝想过要当什么民族英雄，却不料背上了东北军这么一个大包袱，必须天天面对几十万父老乡亲眼巴巴望着他的那些眼睛，结果生生把自己送上了西安事变的不归路。一个天生喜欢吃喝玩乐搞女人的公子哥儿，最后竟成就了一个“人间四月天”的爱情神话。当然，溥仪的皇帝梦不是他周围人逼着他做的，其根子还在于他自己内心里不情愿下来。被人拿了下来，还要三天两头地梦着想着有谁能把他重新扶上去。在这方面他倒有点像蒋介石。蒋介石登上最高统帅的位置之后，也曾几度被迫下野。无论他口头上怎样表示，内心里却从来都是认定了那个位置只能由他来坐，别人是不够格的。当然，和溥仪不同的是，蒋介石这样想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他相信只有他做才能做得够好。溥仪远没有这种自信，更不具备蒋的那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溥仪之所以做梦都想着恢复他的皇位，唯一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这是祖上留给自己的位置，凭什么到自己手里就不能继续做了呢？因为想要保住祖上留下来的这个位置，就盼望着有人帮自己复辟。溥仪当年兴奋于张勋的辨子军起事也就罢了，张勋到底还是中国人，也没有分裂国家的想法。想不到他最后竟然投靠了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可恶的日本人。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最可恶，倒不是指后来发生了南京大屠杀，而是说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明明把手伸到你兜里来摸钱包，却还要满脸堆笑地告诉你那只钱包其实是他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看到溥仪记述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吉冈安置的那幅嘴脸就够了。在这位吉冈还需要控制溥仪的时候，他满嘴里都是所谓“手足”情。等到他发现溥仪纯粹只是一个傀儡之后，他很快就开始兜着圈子要溥仪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什么手足的关系，而是父子的关系。他公然告诉溥仪说：“日本犹如您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哈！”“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嗯！”在中国话里，骂人要骂得最难听，不是去侮辱别人的八代祖宗，就是去骂别人是自己的“孙子”。真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一定要赤裸裸地告诉溥仪说，他在日本人眼睛里不过是个“儿子”罢了。是不是他们觉得，没有骂溥仪是“孙子”就已经是很抬举他了呢？

做人要能屈能伸，但伸屈也要有个限度，更何况是一国之君，代表着一国的尊严与主权。可惜作惯了皇帝的人通常对这些道理都不会真正懂得。他们所要的尊严，多半只是皇帝个人的面子。为了面子，他们不惜拿国家的安危去做赌注。近代以来中外之间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战争，除了列强欺侮以外，这些满清的皇帝把四海之内、率土之滨视为一己之私，任意支使处置，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因为把国家社稷视为自己一家一姓的私物，也就难免会在气盛的时候趾高气昂，凡外人外邦均以蛮夷视之，非学会四肢着地俯首称臣，断不与之往来；而一旦被外力所征服，马上就会为了保全皇位而割地赔款，甚至做出管人家叫爷爷叫爸爸这类的荒唐事。

溥仪的荒唐，还不仅仅在屈辱地认下日本人做自己的祖宗和“父亲”，更表现在他为了活命，可以对任何人俯首称臣。最近读到俄国解密档案，其中有溥仪写给苏联政府的几封效忠信和感谢信，更足以证明像溥仪这种皇帝胚子，除了在意祖宗留给他的皇位和自己的性命以外，别的对他都未必有多少重要性。什么祖宗神灵、江山社稷、民族国家；什么做人的自尊、气节和精神，统统都是假的。他们嘴上的高调唱得比谁都响，遇到天崩地裂之时，他们其实比谁都更看重实际利益。

溥仪是在 1945 年 8 月 16 日准备逃往日本时，在沈阳机场被苏军占领军拘捕的。不管这位深居皇宫的末代皇帝对外部世界了解多少，他当然知道这回帝国算是彻底完了。天下没有了，保命就成了第一位的了。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在日本人手底下割裂祖宗的江山，充当日本人的傀儡，是犯了叛国的重罪，有杀头的可能。其实，说起来，如果溥仪真的爱他的“国”，“国”都亡了，身为亡“国”之君是不妨学一学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当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不甘俯首受辱，自缢于煤山，至少还保全了其作为亡国之君的一种自尊。无奈这世道发展到大清国，末代皇帝连一个崇祯都不如。“国”亡之际，他首先想到的只是千万不要落到中国人手里，说是“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准死无疑。”

因为怕死，溥仪先是想逃往日本。被苏军俘虏后，也仍旧深感庆幸，说是像再次落到了日本人手里一样。那意思很清楚，日本人也好，苏联人也好，反正比中国人强，因为他们不会要自己的命。他手下的总理大臣张景惠说得最得意，说是“行啦，这回又捞着啦！”何谓“又捞着啦”？就是当年呆在北京没事干，却被日本人弄去满洲享了十几年荣华富贵，算是天上掉馅饼，捞着了。这回眼看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不想又被苏联人弄去养了起来，这岂不是又捞着了？

当然，苏联人是不会凭白无故地把一个下了台的伪满洲国废帝白白养起来的。皇帝再笨，这一点还看得明白。他于是像当年极力表示效忠于日本人那样，开始竭力去讨好苏联人。他一面积极帮着苏联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的罪行，一面把自己带在身边的价值近百万卢布的金银手饰主动送给苏联政府“作为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战后基金”。与此同时，他则三番两次地写信给苏联政府，表示感恩戴德。从 1946 年 1 月起，溥仪不止一次地向苏联政府表示了自己的这种强烈意愿。明明是罪孽深重，他却偏偏要大诉其苦，说自己生平“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身受蹂躏”，“呼吁无门，离脱无术”，所幸 1945 年苏联仗义出师，击破日本关东军，使他得脱日本军阀之桎梏，得精神上生命之复活。明明是害怕回国有生命之虞，他却反复声称自己是因为感激苏联，所以极愿能长期居住苏联境内，一方面得以研究新学识，一方面也便于对苏中两国人民之亲爱、团结和幸福“尽全心全力”。

溥仪的种种表白与表现，自然是一厢情愿。对此，就连跟着溥仪一同被押到苏联来，家口却留在东北的张景惠等前“满洲国”大臣和将军们心里也明镜似的。他们再三劝说溥仪放弃留在苏联的幻想，并且热切地关心着国内战争的局势，以寻找减罪的机会。然而溥仪对这些劝说始终无动于衷。用他的话来说：“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

眼看共产党胜利在即，张景惠这些人再也沉不住气了。1949 年 4 月 1 日，毛泽东给北平守将傅作义的电报提出，国民党政府文武官员只要“认清是非，翻然悔悟”，“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消息传到集中营之后，他们很快就甩开溥仪联名起草了给中共领袖毛泽东的致敬信，表示愿意回国，以求自新。函称：

“张景惠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 14 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 20 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从 1948 年 12 月开始，苏联报纸不断报道，满洲，然后是华北，相继完全解放。中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人民到处欢迎解放军，到处支持解放军。现在可以指望将很快解放全中国。

我们阅读了您 4 月 1 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您在电报中指出有罪和无罪的界限，指出了该走哪条路，给了我们完全自新的机会。我们认为，在和平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在极短的期限里顺利地实现全国和平。这将是我国人民的幸福!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张景惠等人公开表态要求回国，不能不使溥仪紧张起来。他也很快又给苏联政府写信，而且这回他干脆把申请书直接写给了“斯大林元帅阁下”，极其谦卑地表示自己是如何“爱慕”斯大林，声称他读了那些他在背后斥为“莫名其妙”，“不懂也不想懂的”“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之后，已经“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因此，他“最希望居住在苏联”。为此，他保证，他会“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

没有人会相信溥仪的这些漂亮话。何况，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结束之后，斯大林也没有必要留着这些伪满洲国的遗老们在苏联吃干饭了。中国新政府成立之后，苏联内务部很快就提出应当把溥仪等人，连同他们交出的金银手饰，一起交给中国共产党人去处理了。

1950 年 3 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把现押在苏联的原满洲国皇帝溥仪及其随从和官员共 58 人，交由中国当局处理。中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于 7 月 1 日正式做出回应，表示准备接收溥仪等人。两周之后，中苏两国正式达成交接协议。

刚一得知自己将要被送回中国时，溥仪的神经都差点崩溃了。他一度表现得歇斯底里，甚至扬言送他回去他就自杀。苏联看守人员似乎不了解溥仪的性格，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自杀的勇气，或者也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总之干脆把溥仪与亲属和其他被押官员隔离开来，单独看管了事。然而，溥仪很快就恢复了常态。在 1950 年 7 月底被送达绥芬河车站准备交接时，

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他，还没有忘记应该给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元帅留下一封感谢信，感谢苏联人在他留驻苏联期间所给予的厚待。

让溥仪完全没有想到的是，他“这回又捞着啦”。带着死亡的恐惧回到中国土地上的溥仪很快就发现，他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共产党向来不杀像他这么大的“反革命”。不仅不杀，而且还是好吃好喝好待遇，要拿他来证明改造政策的无穷效力。不难想象溥仪会怎样竭尽心力地来配合政府的改造计划。只是，我们过去似乎对把这个末代皇帝改造成“普通劳动者”一事的意义太过夸大了。

这倒不是说，1959 年把一个溥仪改造成“普通劳动者”的同时，有太多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反被送去改造，二者的反差太大，让人难于理解。而是说，上面所举的种种事实已足以说明，这个为了权位，不惜做日本人的儿皇帝，为了求生，不惜想方设法讨俄国人欢心的溥仪，面对强势的中国人，他又如何会不表现得谦卑和顺从呢？这种改造，本来就不会遇到多大的阻力。

我们在这里更应当关心的是，为什么这种看起来高高在上，曾经让老百姓充满敬畏感的专制国君，皮囊里包着的竟然只是几根软骨头？联想到慈禧辛丑年间不可一世地对各国政府宣战，转瞬即落荒而逃，然后马上就回过头来向列强摇尾乞怜，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那付丑态，我实在怀疑，如今被我们的电视剧当成领袖楷模来写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之流，事到临头怕也不过如此。

至少，有一点不会有错，那就是，一个专制封闭的政权结构，终究是会堕入近亲繁殖的物种退化泥潭而无以自拔的。无论始祖皇帝如何了得，其一代不如一代，势不可免。溥仪之如此，并非偶然。

大历史，小道德
——黄仁宇《黄河青山》一书读后

一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见到大学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小姐，也第一次听说黄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熊小姐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而引起我强烈兴趣的，更多的却是因为熊小姐提到了书中讲述的一个细节，即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那情景，听得人头皮发麻。

几天后，我终于借到了黄仁宇先生的这本遗著。还好，读到有关林彪的“人海战术”那一段时，我发觉事情原来并没有太超出我的想象。黄当时作为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前往东北参加接收工作，恰好赶上 1946 年 5 月四平街战役结束。他写道：“我们抵达前线时，刚好是战役结束后没几天，看到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的尸体。一位新一军总部的参谋对我形容何谓‘人海战术’。他说：‘他们会在前线摆出一千人，但空间只有几百码宽，通常只能容下一

个连。你会想：这些人不傻，他们只是疯了！但让我问你：你可以砍杀多少人呢？四百、五百或甚至六百？你把这些人打成碎片，可是这些人的后面还有数百人在那里。相信我，他们绝对可以收拾你和你的机关枪！'"至于为什么这些士兵能够如此效命，黄相信林彪使用了"残忍"的手段，他为此引述了战役结束后投诚到国民党一边来的林彪部队的一个作战参谋的说法，即："林彪对自行撤退的将领处以唯一死刑，有一天他就下令枪决两名连长。"

黄的这段描述，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并非亲历亲见，而是"道听途说"。这并不是说黄听来的事情一定不可靠，而是说当黄不再是以一名国民党军官，而是以一名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这种听来的资料理应做到更加谨慎。因为，类似的说法，在国民党人当中曾经十分流行，但未必十分准确。记得几年前在台北国史馆做韩战问题的报告，当时就有听众提问：听说中共作战主要是用俘虏在前面打冲锋，出兵朝鲜，也主要是担心几百万国民党军的俘虏不可靠，因而要把他们派去朝鲜送死？

中共士兵是作战勇敢，还是被逼送死？站在不同的角度，难免会有不同的回答。问题是历史学家必须深入考察表象背后的具体原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士兵尸首横陈归结为林彪"残忍"的结果。毕竟，稍有军事史研究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在当年，枪决作战中不听命令、"自行撤退"的军官的，并不只是一个林彪，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将领也同样如此。即使事情发生在美军中，也一样要上军事法庭。至于为夺取和坚守一个阵地，投入过多的兵力，造成过多的死伤，也与"人海战术"的主观意图没有太大的关系，黄书中提到的 1937 年的淞沪战役和 1938 年的台儿庄战役，其实也都有同样的问题。但黄在提到蒋为了固守上海，将数十万军队"挤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因此蒙受重大损失"的这次作战时，却表现出高度的理解和同情。事实上中共 1946 年之所以在四平街附近投入相当多的兵力来阻击国民党军队，其理由与黄解释蒋当年的考虑，也颇有相近之处。黄解释说："在这个例子中，蒋的考虑远超过战略需要。他必须向西方强调证明，中国决心打一场生死之战。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些牺牲，来巩固他新接总指挥官的名义及实质。在国民党半数以上的部队里，组成分子属于军阀、准军阀和前军阀。……蒋介石绝对要展示他的意志，不能逃避。"中共 1946 年发起四平街保卫战，其理由也相去不远。因为当时苏军突然撤退，要求中共军队自行接收东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阻止国民党军接收。中共虽试图通过马歇尔达成国共两党事实上分割东北的意图，蒋介石却坚不让步，不惜武力接收。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为宣示中共决心，故亦不惜一战。而对于林彪来说，他刚到东北掌军不久，东北的各路武装仓促成军，一盘散沙，也需要来一次大战以确立其指挥权威并锻炼部队。林彪指挥投入兵力过于密集，作战死伤多，就说是"残忍"的"人海战术"；蒋介石指挥投入兵力过于密集，作战损失惨重，就说是深谋远虑的"精心策划"和"展示意志"，这似乎多少有些牵就了作者自身的主观情感。

关于"人海战术"的问题，其实在美国作者描写当年中共军队在朝鲜与美军作战的书中，也有写过。经历了与德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大规模战争，同时受过单兵作战严格训练的美军官兵，注意到战争初期一些部队的中共士兵不顾美军优势炮火的打击，前仆后继，一波一波地发起冲锋，以致尸横遍野的情景，也曾形容中共军队这种战法是"人海战术"。但严格说来，这种"人海战术"的战法并不是中共军队作战的一种范式或主观意图所使然，它具有复杂得多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来，它其实是部队装备长期落后，影响到战术落后的一种反映。这多少有点像十九世纪直至二十世纪初发生在欧美战场上的那些战争。由于武器的杀伤力有限，交战双方甚至往往会排出整齐的队形，挺胸昂首，敲鼓踏步，发起进攻。由此也就不难发生"人海战术"和惨重伤亡的问题，当年欧洲战争之惨烈，与此亦不无关系。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中国军队的装备，相对于十九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军队的装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中共从 1927 年建军伊始，就是一支典型的农民武装。直到 1945 年抗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部队的主要作战武器都是从各种不同渠道得来或缴获的制式不一的长短步枪，自动火器数量很少，火炮几乎没有，甚至连所有武器使用的火药，也还都是杀伤力有限的土制黑色炸药。这也是中共为什么始终不打正规战，坚持打游击战的一个原因。装备落后，正规战经验少，在江西中央苏区反国民党围剿战争中就曾经吃过大亏。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坚持用阵地战抵抗国民党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进攻，结果广昌附近接连两战就损失几千人。抗战中中共也两次主动对日军大举出击，一次即平型关战斗，一次即百团大战，但两次都蒙受严重损失。平型关战斗近两千人主要伏击日军装备不强的辎重部队，歼敌不过四五百人，自己就死伤 400 余人。百团大战打的主要只是“破袭（公路铁路交通）战”，结果也伤亡数千人。注意到战斗后部队的战斗详报和总结之类，我们很容易发现，指挥员们并不存在利用“人海战术”造成屠杀恐怖的任何主观意图。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共部队的兵源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讲到的，并不是随便拉来一个农民就能学会瞄准打枪和冲锋杀人的。更何况所有的军官都会格外珍惜自己部下那些熟练使用武器的战士，因为部队的战斗力几乎全靠他们。没有哪一个指挥官会无视自己部队的伤亡。因此，他们每每要检讨自己部队伤亡大的内在原因。而所有检讨中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由于部队作战频繁，扩展快或补充多，大量新老战士集合在一起，班组作战不会运用战术，单兵作战不善于自我掩护，冲锋时或兴奋或紧张，常常挤成一团，不注意散开队形，如此等等。而历次作战的经验证明，打仗少的新战士越多，上了战场就越容易挤成一团。1946 年四平街保卫战时，部队恰恰多半都是新战士和收编过来没有战斗经验的伪满军警人员，而且刚刚编组成军，其战术训练之差，以致影响到战术运用，导致战场上有时会乱成一团，也可想而知。甚至，即使在经历了三年国共大战之后，当中共部队准备入朝作战时，也还有同样问题存在。因为当时相当一部分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已经转成生产单位，或开始大批复员，不仅没有战术组织和单兵训练工作，就连枪炮都已生锈甚至被鸟筑巢，临时拉上前线，其作战时的战术运用当然不可能令人满意。不过，在三次战役后，即随着各部队反复强调战术运用和对美军强大火力的逐渐适应，美国人已不再能见到这种“人海”式的战法了。这说明，“人海”并非中共既定的“战术”，与“残忍”与否亦无太多直接关连。

二

一方面提倡“大历史”观，相信人类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之类的主观意志会因时空的影响而有别，不赞成美国学生讨论现代中国历史过分强调国民党的“贪污无能”，或共产党“太过暴力”，但另一方面在叙述自己的内战经历时，却不断使用“残忍”之类的字眼来表达对自己当年对手的道德评价，这是黄书中明显存在的一个矛盾的现象。其实，当我们把当年国共内战中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当成一段历史来研究的时候，与其笼统地谈论林彪的战术如何“残忍”，不如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一下林彪的军官和士兵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听从那些“残忍”的命令，一上战场就“疯了”？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说明抗战结束后的国共内战，但很遗憾，他并没有讨论两党军队之间的差别，以便说明中共为什么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在军事上由弱变强，进而一举打败了国民党。他反复提到的四平街战役，在中共的军事史上是最著名的几场败仗之一，因此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所谓“战术”，即使存在，也只能是个失败的战术，它并不足以反映

中共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取胜。

其实，国共两党的军队是存在相当差异的，而黄仁宇先生所经历的内战期间最突出的一点差异，就是部队的士气和纪律。黄书中提到的张治中是蒋介石的亲信部属之一，1949 年率南京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共和谈。他在谈判期间曾给蒋介石去过一封长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作为长期带兵打仗的将领，他在北平时发现，国共两军的士气和纪律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曾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天他去故宫参观，不留意间从正在行进的士兵行列中穿过，意外地发现中共士兵不仅停下来让他通过，还微笑示礼。他为此感慨万千，称：如果这是一队国民党士兵，他即使不挨一枪托，也免不了要被臭骂一顿。由此他明确告诉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无可挽回。

士兵士气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十九世纪欧洲人敲鼓排队迎着飞来的枪弹进攻，未必都有军官们拿着手枪在后面顶着。1900 年义和团举着大刀长矛，赤膊上阵，与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开战，也没有人在后面施加“残忍不合理”的“严苛纪律”。中共军队从 1927 年一路打下来，有过许多挫败。1934 年第五次反“围剿”自不必提，长征途中湘江一战就曾损失三四万人，西路军两万人在甘肃河西走廊甚至全军覆没，皖南事变时一个军部被消灭，1946 年四平街一战也伤亡近两万人，但是，它却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高，这显然也不是军官的威胁或不合理的严苛纪律造成的结果。

中共靠什么来提高部队的士气呢？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香港中文大学服务中心收藏有韩国翰林大学出版的，由该校亚洲文化研究所编辑的一套相当宝贵的文献资料，它们是美军在韩战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廿六、廿七军等部队作战中遗失的大量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其中恰好提供了中共如何使士兵变得服从和效忠的一些证据。

根据缴获资料中几个连队的“政治质量统计表”，可以知道的是，志愿军士兵的成份基本上是贫苦农民，党团员就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虽然国民党俘虏兵也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但多数士兵的思想却已经发生了转变。因此，在韩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也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强。[2]

一个 15 岁就参加国民党军的士兵这样说明自己的转变：“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3]

另一个俘虏兵的转变也大致相同：“（在成都被）解放后，不了解共产党，想开小差，恐怕开不脱，后来在壁山经过阶级教育后，始明白了一些，知道了为自己打仗，为人民打仗。在重庆五十厂，看到有人开小差，自己也有动摇，看到又抓回来，自己也就不想开了。但对上级讲的国家胜利的形势有些不相信。”“在剿匪中，看到优待军属，人民政府照顾穷人的情形，我们直接帮助了农人翻身，更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此次新的任务号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来。我家里还有困难，怎样办？经过全班的反复讨论，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而是抗美援朝，家里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看到同志们的信上说，优待军属如何好，我的问题才解决了。”[4]

综合这套资料中的相关材料，不难看出中共确实善于做士兵的工作。其原因概括起来大致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引导和影响：一是当时在解放军里待遇较好，官兵比较平等，鲜有打人骂人现象；二是政工人员，包括老战士，如班长等，大都随时做劝导工作，并现身说法；三是部队里动辄诉苦、阶级教育、全班学习讨论，有很强的政治氛围；四是亲眼见到和从家信中了解到部队、政府确实帮助穷人，分田分地，照顾军属。在这方面，资料中公布的美军缴获的 20 封来自国内亲属的信件，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尤能说明问题。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容易产生从众心理，因而追求进步，表现勇敢，也很自然。近来读到钱文忠先生谈知识分子思想变化的一篇论文，他用了一个很传神的字眼："劫魂"。如果知识分子都会发生这样的思想变化，农民出身的士兵们会变得服从和效忠，又何足为奇呢？[5]

黄仁宇先生其实也注意到中共善于影响和整合农民的这种能力了。他在书中多次提到：抗战期间，中共把自己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努力制定适应自然经济要求的各项政策，从而使自己成功壮大；国共内战期间，"整个乡间完全被动员整合"，"共产党已经找到使用无尽人力和乡间资源的模式，据以打造新的战争机器"。它甚至能够使农民全力为中共军队提供食物、住处、运输、急救等等后勤服务，并协助设置路障、捕捉国民党军队逃散官兵。既然能够注意到普通农民被影响整合的情景，何以看不到集合在军队中的农民士兵会更加效命呢？

三

黄仁宇先生书中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大历史"观。所谓"大历史"观，就是认为不应当把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党派或一个事件一时的社会政治效果绝对化，相信只有把中国 150 年，甚至是更长时期的历史视为一个单位，才能看清它的事件之间的内在历史逻辑及其真实的意义。因此，历史家学应当避免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情感好恶，来做道德和或是非的武断评判。他解释说："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表示我们对人类的受苦必须无动于衷，或是对道德应置之不理，或甚至是（认为）极端的手段有其必要。"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历史采取道德诠释并不恰当，无视于时空背景就贸然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们，关心的是更直接的问题：'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如此才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简而言之，历史学家应当致力于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应当为它们一一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

十分有趣的是，黄仁宇先生其实仍是一个性情中人。书中多处提到他在美国教书，不时与美国学生及同事争辩的情形，就极能反映他的这种个性。而以其如此倔犟的性格，要想对人对事完全做到从"大历史"的角度出发，并不容易。黄书对自己经历过的历史的描述和说明，就没有能够完全站在"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这既包括他对国共内战的描述，也包括他对自己在美国学界遭遇的说明，笔下都有明显的情感流露。给人感觉是他不断地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因此，当我在读到他详尽解释自己为何会被学校除名，又如何因为这部或那部书稿而与费正清、柏金斯、莱特等美国教授发生分歧或争执的种种内容时，不能不认为他太过张扬了自我的感受。我当然不是认为他被学校除名不值得同情，特别是他描述家人因此而备感困窘和屈辱的情形，当然要为他抱不平。问题是，他所谈到的不幸遭遇，以及与美国权威教授的种种磨擦，与他所受到的高度肯定和大力提携相比，实在不可以相提并论。而把将近二十年前尚未成名时遭遇不平和阻力的种种感受，用数百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一吐怨气"，去赢得那些对此毫无经验的华人读者的同情，这对一个主张用"长镜头"看"大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否确有必要呢？事实上，即使

不提几十年来大陆许多知名或不知名学者的遭遇，就是与那些在美国历经坎坷却始终不曾得到白人权威学者承认和提携的华人学者相比，他的境遇也实在好太多了。

不过，人是感情的动物，人的思想、观念，甚至思维模式，不可能不受到家庭、社会、教育以及人生经历等各种特定环境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如何提倡，没有人能够完全离开既有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来看历史。问题在于，正像黄仁宇先生所强调的，价值和道德这些东西是会随着时空条件的不同而转换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过分的行为，昨天看却可能是正常现象；包括现在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人权问题，在越战结束前连现在最强调人权的美国政府都不放在眼里。又何况由于发展程度不同，影响到人们关心的问题不同所造成的认识差异呢？即使到今天，人类社会中仍旧存在着价值判断上的极大差异，并非那么不可思议。一味地强调某种价值观或道德观，结果势必会制造出太多的争论和对立，无助于认识历史和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黄仁宇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把一二百年以来的中国视为一个单位，多问些“为何以这种方式出现”，而不是充满激愤地质问“为何不依照我认为合理的方式出现”，我们对历史的认识至少能够少一点偏激与片面，更接近些真实与客观。

在大陆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们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的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辨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他例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大历史”观使黄仁宇先生对历史多了些理解，而少了些批判。这显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应当极力提倡的一种态度。注意到那些充斥于书肆坊摊的极力“妖魔化”自己研究对象的大量历史作品，我不能不深感黄仁宇先生书中对他所接触到的国共两党人士的描写，颇具启发性。当读者在国共关系中看到太多血腥和仇恨之后，猛然注意到身为共产党人的“田（汉）伯伯”与国民党的众多将领竟然存在着那样深厚的私人情谊，一定会像我当年在台北读到国民党中央谈话会记录时一样，备受触动。因为，那些在我们印象中从来都是代表上层有产阶级的国民党骨干，当时却在大谈应当立行财产登记，拒绝资本家、官僚毒化国民党，必须使党能“代表农工及被压迫民族被剥削的人民，实行民生主义”。[6]

台北中央研究院当年设置近代史研究所时，曾遭到众多历史学家的反对。其理由很简单，这段历史距离今人太近，目前还没有客观研究的可能与条件。今天看来，这种看法并非杞人忧天。当我们今天研究秦始皇时，由于过去的时间久远，我们既会带着遗憾的心情分析他何以焚书坑儒，也会带着欣赏的态度研究他如何一统天下。而当我们研究蒋介石或毛泽东时，由

于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甚至至今影响尤存，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像对秦始皇那样，丝毫不带个人主观色彩地去描述他们的功过是非。尽管，当我们真正深入到他们内心世界去的时候，可能会发觉他们其实和我们周围许多人一样，无论他们按照我们今天的价值判断当年做错了什么，其主观上未必真有任何邪恶的动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他们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也只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它们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去加以检验，不是仅仅从道德的角度，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他们对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历史作用。进而再放眼于更长的历史时段，以比较他们的作为哪些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哪些滞后了历史的发展。更何况，我们今天仍然无法消除，也不应当试图消除社会上不同观点的存在，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历史上的人物一定要按照我们今天并不一致的观点去生活和行动呢？与其雄心勃勃地准备充当可以裁判一切的上帝，而冒可能重演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历史悲剧，不如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时，学会在道德批判问题上尽可能保持沉默。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种事说来容易，做来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学习黄仁宇先生那样，努力放大我们的历史观，即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尽可能大的时空中去观察，同时尽可能减少我们的道德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影响。黄仁宇这样试过了，我们后来的人理应比他做得更好。

----

[1] 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第 4 卷，第 551－563 页。

[2][2] 在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的 1951 年 3 月 1 日第 80 师政治部所做的总结报告中说明，该师入朝以来逃亡 95 人，临阵脱逃 33 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八十师政治部：《入朝作战战时政治工作总结》，1951 年 3 月 1 日，同前引书，第 103 页。

[3] 《叶生明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 2 卷，第 1－2 页。

[4] 《许泗才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 2 卷，第 9－11 页。

[5] 见钱文忠：《当代中国的劫魂运动》，《百年》第 4 期，1999 年 7 月。

[6] 台北党史会藏，特交档案（党务）012 卷 40295。

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

——读胡绳遗稿札记

（一）

近来，有幸读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为编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而进行的十次谈话。[1]（此谈话于胡绳先生去世后始得发表，以下姑且称之胡绳遗稿。）读过胡绳遗稿，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一直在努力尝试着从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中国近代历史。自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提出生产力标准，举国上下以实现现代化为奋斗目标以来，在历史学界主张应当以同样的标准来反思和检讨近代历史者，胡绳先生可谓倡其先者。他今天所做尝试步幅之大，甚至又大大超过了他以前曾经提出的一些看法。[2]而在刚刚发表的胡绳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十次谈话中间，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其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明白地告诉人们：中国革命客观上就是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3]这大概是胡绳先生临终前几年，反复研究，深入总结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之后，所得出的又一个十分新颖和大胆的结论了。

胡绳先生是怎样说明他的这一观点的呢？概括言之，胡绳先生认为：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进程。"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是中国这种落后的小农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进步的道路"，也是得到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阶层同情和支持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因为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干预，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没有能力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会失败，正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和封建[4]势力有着太过密切的联系，它只能在基本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范围内搞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不起来。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得到胜利，则恰恰是因为它坚持彻底反帝反封建，推倒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座大山，毛泽东又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因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有效地争取和联合了广大的中间势力。[5]

胡绳先生的这一观点与我们过去传统的说法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过去我们通常是以 1949 年划线，1949 年以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1949 年以后就是社会主义的了。为什么不经过资本主义，一步就跃进到社会主义？理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由此出发，中国近代史自然也只能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分水岭，用胡绳先生概括后的话来说，就是"五四运动以前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是完全好的；'五四'以后不是了，社会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再主张资本主义，就是反动的了。[6]殊不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的社会性质其实是新民主主义的，在迈进社会主义之前，经过这一过渡阶段是完全必要的，1955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原定 15 年的过渡期一下子缩短为一年半，多少犯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7]这也就是说，中共中央早已明确肯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迈进社会主义之间，是有过并且也是需要一个过渡阶段的。说中国不应该经过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宣称中国实际上一步就跨入了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强调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迈进，客观上需要一个中间的过渡阶段，这是与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新民主主义说的核心之点就在于，承认并且肯定落后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首先通过加速发展生产力造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要想迅速发展生产力，也只有通过自由贸易、开放经济和充分借鉴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帮助，才有可能。一句话，"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8]但是，

承认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需要一个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生产力的过渡时期，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解释多少有些简单化，需要有所改变。显然，胡绳先生极为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谈话中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五四运动以后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前途了。尽管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制，资本主义仍旧是中国当时条件下社会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并且是受到足以影响国共两党命运的广大中间势力的欢迎的。不仅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也并不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了。比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条件下，“既反帝，又反封建土地制度，资本主义发展就有了条件”。“如果一直搞下去，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后阶段，搞了“双十协定”和政协五项决议，共产党是准备付诸实践的，当时在内部就明确讲过以后要准备用选票代替子弹了。“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是搞资本主义”。“结果，国民党撕毁了协定，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9]

为了印证自己的这一观点，胡绳先生在谈话当中还反复举了中间势力的态度变化为例子。他指出：过去讲这段历史，动辄就是国共斗争，其实，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只是社会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正如胡乔木说过的，“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而“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27 年国共分家，中间势力为什么拥护南京政府？就是因为他们当时认为国民党能够统一中国，从而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抗战结束后中间势力为什么逐渐倒向共产党一边，也正是因为他们注意到蒋介石“不但要反对共产党，而且要反对民主主义，这样他当然不可能去搞资本主义化”。相反，“这时中共这边毛主席已自觉地提出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解决反帝、反封建问题”，这就极大地满足了中间势力的愿望。因此，胡绳先生的观点很清楚，那就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五四运动以后，问题并不在于谁讲资本主义，谁讲社会主义。问题在关键在于谁能真正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他们最后所以选择了共产党，正是因为他们最终发现不能再指望国民党，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有可能迅速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为国民党既不能彻底反帝，也不能彻底反封建，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因而也就难以帮助中国资本主义顺利发展。只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共产党才能真正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和土地问题，从而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10]

（二）

作为一篇谈话记录稿，生前又未能经过作者修订校正，胡绳遗稿在文字表达、观点概括以及史实说明上，可能存在着某些不十分准确和严谨的地方。这是需要首先加以说明的。比如，在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面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物欲横流、弱肉强食和危机四起的混乱状况，中国广大中间势力，亦即胡绳先生所说“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以及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是否主观上倾向于认定资本主义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恐怕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至少，根据笔者多年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体会，情况似乎并非完全如此。特别是在二、三十年代，注意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帝国主义列强围攻、封锁的重重压力之下，自力更生地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稳步迈向现代化的情况，中国不少中间势力的人士和党派团体都曾对社会主义抱以某种程度的同情与向往。一些中间党派还在自己的政纲中鲜明地写上了社会主义的未来目标。[11]1949

年新政协召开，讨论《共同纲领》时，也主要是一些民主派人士积极主张应当在文件上写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12]换言之，即使在 1949 年以前，中国究竟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还是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现代化好，就广大中间势力而言，也还是一个引起相当争议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舆论中存在着不喜欢资本主义，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不论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与共产党人后来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多少差异，共产党人的胜利未必与其自身的社会主义标志毫无关系。泛泛地谈论中国中间势力"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观倾向，容易造成谁能够实行资本主义，中间势力就跟谁走的印象。比较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撰稿并亲自审定发表的谈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相关文章，似乎不能认为这就是胡绳先生的本意。

那么，胡绳先生在这里想要说明的主要意见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深入分析胡绳先生讲话的前后逻辑，我们不难发现，他这里所强调的，其实并不是"主义"问题，而是走什么道路才真正有助于国家富强的问题。换言之，在他看来，在二十世纪前半期，摆在中国志士仁人面前最大的问题，只是如何使积贫积弱的国家能够迅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重新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围绕着"主义"问题的争论，更多的不过是在方法和手段问题上的见仁见智罢了。在当时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方式，在推进国家现代化方面均各有所长，影响到中国的中间势力只能依据耳闻目睹的体验。有倾向资本主义方式者，有倾向社会主义方式者，也很自然。在这里，影响人们选择倾向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只是在于采用哪种"主义"能够在中国以最快速度，花最少代价实现现代化。诚然，由于教育背景、利益关系等等的影响，人们对于所需付出代价的心理承受力会有很大不同，这正也是胡绳先生更强调中间势力"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的重要原因。但无可否认，这里问题的核心不在于什么主义，即像胡绳先生自己所说："在'五四'以后，问题倒不在于谁讲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得厉害，到底是主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关键在谁更能便利中国走向现代化。[13]

"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是胡绳遗稿中所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样的观点，自然也不是胡绳先生自己的创造。就像先有资本主义，后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观点一样，它们原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并不因为其一穷二白就更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列宁早就告诫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是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而"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14]毛泽东也公开讲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且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5]

但是，"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却未必是一个准确

的科学概括。[16]这是因为，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不具有确定的内涵。它是指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力？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其自身早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看到“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乃至列宁当年所谈论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究竟何为资本主义，何为社会主义，在今天无疑是一些需要重新深入探讨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承认传统的对资本主义概念的定义，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之后，也没有谁能够简单地断言，推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只有靠资本主义私人资本自由竞争的一种方法，靠社会主义国家积累计划经济的方法，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条件下，就一定毫无效果。十分明显，当年列宁和毛泽东谈到需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也只是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谈问题的。因为每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都了解，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成员的基本成份还是农民的落后国家中，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即使共产党能够造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如果不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宣布进入社会主义 30 年后，邓小平还在反复告诫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还不够格”，必须要等到生产力高度发展，“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17]

如何才能有效地迅速发展生产力呢？这才涉及到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然而，在共产党人看来，这却更多的只是一个手段问题，不过是学习、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一切有效方法而已。无论这种认识正确与否，胡绳作为共产党人，自会得出在他所谈论的那个时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最便利也是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方法，就是坚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道路的观点。即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使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18]从这样一种分析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对胡绳先生来说，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确不如说“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更准确一些。虽然，胡绳先生所谈到的“现代化”，的确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为标志的，它并非可以通过自发的方式或由外国和平输入来轻易完成，非根本变革整个社会关系以及生产关系不能有所建树。所谓“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亦即为此。但“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与“要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两个断语的着眼点却大不相同。前者是着眼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上，后者却是着眼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事实上，即使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150 年来，不仅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概念严格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而且是否能够创造出适合资本主义水平的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有利社会条件，也未必一定要照搬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中共建国初在经济恢复与建设方面的成功尝试，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六七十年代经济的腾飞，都不同程度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充分体验到生产力在社会和国家发展进步中的决定性作用之后，今天多数的中国人显然都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前途，乃至人民的福祉，必须首先取决于它在彻底告别农业文明，实现现代化方面，能够以怎样的速度赶上世界次发达国家乃至发达国家。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不论我们是否完全赞同胡绳先生使用的历史概念和他对历史的解释，我们还是很容易理解胡绳先生生前最后几年所极力尝试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用心，并对此给予高度的评价。毕竟，现实生活早已清楚地向历史学家提出了理应由他们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即何以用了 150 年的时间，中国至今仍然远远落在世界发达国家的后面？为何中国近 20 年的发展速度，竟远远超过了过去的 100 多年？为什么中国不能早些走上更适合自己

的独特发展道路呢？然而，迄今为止，普通的中国人还只是在根据自身的体会和经验来得出个人的看法，还没有哪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能够有系统地为读者提供有充分历史依据的答案。

现有的近代史专著不能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的着眼点往往只是停留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没有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它们所关心的并不是站在今天历史高度的人们正在关心的问题，而仅仅局限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的表象上面。像过去近代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一根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高潮”，像近、现代史争论中究竟应当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应当以新旧中国的更替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线；像今天许多学者坚持 1949 年以前的中国近现代史只能以阶级斗争为考察的主张，反对突出现代化的需要，甚至把革命问题与现代化问题对立起来，如此等等，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目前的近代史教学和研究所讨论的内容，还太过于偏重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问题，太少关注今天人们所关心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问题。

偏重于研究中国革命，这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所使然。因为任何历史学家都只能面对历史已经提出的问题。但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这种研究虽有必要，却过于偏狭。罗教授在《现代化新论》一书中就此有过一段评论。他说：“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被革命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历史研究的趋向性也是历史的现实运动的反映。近代中国被外国的侵略伤害得太厉害了，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个过程’或许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佳视角。但革命毕竟只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一个方面，况且即使要全面理解中国革命的过程，不研究这一时期社会演变的诸侧面也是不深不透的。中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伟大而复杂的政治斗争，但它本身并不等同于社会变革，并不能代替对社会变革全局的研究。”[19]

太过于偏重特定时期的特定矛盾冲突，也无助于贯彻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唯物史观。因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只有把复杂的政治斗争还原为社会最基本的矛盾状况，才能够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具体地解释过他眼中的社会革命的发生原因。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0]在这里，马克思的看法很清楚，即物质生产力直接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最终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1]，并且是一切思想和社会趋向的根源。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革命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一种结果。历史研究如果只是着眼于结果本身，只是重视社会关系的冲突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甚至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看待一切，而不是“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22]问题，忽略了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考察，不注意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就注定是片面而不全面的。

以过去中国近代史所着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专制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专制“两个过程”的

研究为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问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这种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大量反映在上层建筑的领域内。研究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关系变动，仅仅着眼于其具体的矛盾冲突发展过程，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同样是解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冲突，人们既可以从道德层面上来谈问题，也可以从爱国主义的角度来谈问题；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权利的斗争，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基于经济利益的捍卫与争夺。同样是谈论专制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冲突，人们既可以从阶级角度看问题，也可以从民主自由的角度做文章；既可以把它归结为农业文明之必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几千年历史文化与社会矛盾的一种沿习。站在不同的角度，做出不同的解释，人们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难免会有不同。问题是，究竟哪一种解释真正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这些矛盾冲突存在的客观历史根源，从而深刻理解中国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呢？显然，如果人们真的想要按照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历史，就绝不能只满足于简单地描述这“两个过程”，而应当按照列宁所说的那样去做研究，即：“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23]

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就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还原过程。但没有这样的还原过程，至少在马克思看来，是无法发现历史的本象的。而看不到历史的本象，所谓的近代史就只能满足于某种单线式的过程研究和现象描述，不仅无法使人正确了解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线性，而且势必对读者产生误导，造成不良的社会效果。以往的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就带有这种偏向。笔者在 12 年前就曾批评过这种情况。即：它们往往只是着力于证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就是反帝反封；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反对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就是实现社会主义。衡量历史上一切党派人物政治主张的进步与反动，统统以此为转移。表面上也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实际上却把生产力的作用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一切以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来划线，形成了某种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标准。其实，反帝反封也好，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也好，变革生产关系、实行社会主义也好，统统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人们用来达到某种革命目的的手段，它们绝不是革命的目的。应当认识到，中国经济政治落后的根源，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发展生产力才是革命的首要目标。因此，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只能是推进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现代化（包括民族化和民主化）的历史进程，而不能是别的什么。”[24]

要还原历史，首先应当重视从生产力及其需要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历史。物质生产力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甚至影响着生产关系并最终影响到一切社会关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促成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这一观点就宏观的历史发展而言，至今应该还是基本上可以成立的。既然如此，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首先就应当注意到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物质生产力的状况及其需要，具体考察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状况或矛盾状况，进而考察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情况及其问题。把具体的研究对象同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及其需要联系起来，自然也就会重视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关系是否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问题。笔者高度肯定胡绳先生的最新探索，就是因为注意到他正在积极尝试着侧重于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谈历史，而不是简单地以现实的生产关系或观念中的理想社会关系来做为衡量历史功过的价值尺度。

这样做，是不是就等于否定“两个过程”的认识，否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意义呢？未必。但它与简单地拿“两个过程”之类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却是有重要区别的。因为，

这样做的结果，就要求任何像“两个过程”之类的认识，都必须产生于对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状况的深入考察之后，而不能产生于这一考察之前；就要求任何对历史功过成败的考察与评价都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及其需要为标准，而不能简单地拿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来做检验一切的尺度。胡绳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就明显地不同于以往。他在谈话中解释“两个过程”的问题时，不再是从过程本身出发，从矛盾本身出发，而是倒回去，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出发了。他是这样谈问题的：中国革命之必要是因为要解放生产力。而当时条件下最先进的生产力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此革命必须要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怎样才叫做真正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第一，就是要独立。不独立就很难顺利地发展资本主义。“而要独立，就要反帝啊，不反帝怎么独立啊。”第二，就要反封建。因为从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就必须要解决土地问题，打破地主经济、封建割据。“真正是为这两个问题在努力，就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25]这种解释虽然还是很初步的，并不深入，但比过去无疑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因而也有了一些说服力。

（四）

提出历史研究中应当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意味着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应当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做为观察问题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及其需要将是考察历史的唯一标准。一方面，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已经清楚地发现，社会历史的进程及其变化，有着远较过去所了解的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的各种因素在起作用，并非拿一个生产力标准就能解释一切。另一方面，苏联乃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经验也都清楚地证明，假如我们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可以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实现和保障国民基本权益的综合性指标而加以考察的话，单纯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尤其是事关国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预程度时，是不现实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标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绝不能仅仅表现为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强大和工业化水平的极大提升，它必须也理应伴随着国家政治的民主化以及国民对国家政治生活参预的制度化。没有实现政治民主化与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制度化的国家，纵使工业化程度提升较快，国家经济实力相对较强，其所谓现代化，充其量也只能是经济的现代化、工业的现代化，或者毋宁说只是一种畸型的现代化。经济上的巨人与政治上的侏儒相结合，不仅不足以保证政治上的稳定与持久，而且也难以使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势头，曾经创造出强大经济实力的苏联这一庞然大物的轰然瓦解，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或工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现代化本身的形成过程中，生产力固然起着相当基础的前提的作用，但单纯提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却未必相应地使政治、文化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就世界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保护经济自由化的某种现实需要而形成的。一个主要依靠国家政治行政权力所推进的经济发展进程，却不会直接产生出这样一种需要，它甚至还会使执政者过分看重手中的权力作用，而忽视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因此，相对于先经济自由化而后政治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而言，那种依靠政治集权化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其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通常是与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以及工业化的实现相脱节的。注意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在确信世界各国逐渐摆脱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而走向现代化，是一个必然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的同时，也能够清醒地看到，生产力的单一发展未必会带来人们理想中的现代化，也未必会导致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一定会经历同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

无疑比笼统地谈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会更周全一些。

正是基于上面所谈的原因，我们才能够理解，何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民主主义的传播和影响，远远赶不上民族主义的发展浪潮；何以中国民族国家的实现，更多地只是表现为民族独立，而很大程度上缺少了政治民主化和国民高度参预国家政治生活这一环。

十分明显，虽然经历了从维新派到革命派，从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这一连串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尝试，中国真正实现其创立民族国家的目标，还是靠了共产党人的激进革命。一个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毫无疑问地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而借助于政治集权的极大便利，共产党人也确实一度创造了经济恢复与成长的历史奇迹。但是，就像生产力水平的简单提升，并不等于就是现代化一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与独立。因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过的那种"现代国家"。[26]即使按照马克思本人的看法，这种"现代国家"也至少要包含两大要素，一是族群的、文化的和领土主权的要素；一是在平等基础上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要素。在这里，国家是实现和保护民族独立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国民则需要通过国家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来代表和争取他们的共同利益。这种标榜"主权在民"（即民主主义）的"现代国家"的先后成立，是自十七、八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它也只有在生产力达到相当水平，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已经初步形成的情况下，那些"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才会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27]。也只有当城市完全统治了乡村，交通与通讯的发达使得整个社会紧密地结为一体，民族主义以及民主主义的观念也才会伴随着商品经济，即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出来，并逐渐成为催生和构成"现代国家"，亦即"民族国家"的重要意识形态。

20 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结果，不仅不会使民族的界限很快归于泯灭，恰恰相反，它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觉醒。尽管，落后国家的发展历程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同一步调。但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国家的经济力的持续发展，都是首先立足于自己本民族的市场发展的。而一个统一的民族市场的真正形成，需要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不仅有利于形成和保护本民族发展的国内市场，使本国国民享有同外国竞争者同样的发展权利，而且可以为他们创造出种种向外发展和参预国际竞争的机会，获得自如进出世界市场的条件与可能。[28]1949 年新中国的建立与随后一度兴旺的经济恢复与发展的势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不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统一而有效率的中央政权，培育和形成本民族的经济实力，必然会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被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多数落后民族之所以会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甚至一度被置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不仅在于它们自身积贫积弱，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民族国家。

从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这种需要出发，落后国家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民主主义萌芽的生长，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中国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进程，不难想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所以会出现反帝和反专制两大革命浪潮的内在历史原因。但落后国家中的民族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它们的生长却仍旧会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局限。这也是中国自 1840 年以来历经波折，不可能一步建立起现代国家，必定会经过诸如北京政府、南京政府这样一系列过渡阶段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胡绳先生的遗稿中似乎没有提供多少可资谈

论的观点。[29]不过，深入研究，并且客观评价这种过渡所带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发展，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毕竟，无论中国当年生产力发展水平多么落后，殖民主义或列强入侵的强烈刺激，以及落后民族中的菁英分子在面对某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所受到的现代观念的影响，已经使它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观念出现了早熟现象，由此也就推动了中国历史不得不顺应世界发展的大潮而缓慢地向前发展。但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民族经济才略现雏型。而这种初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型态，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却无法迅速促成国人对实现自由、民主、法制这些保障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秩序的政治手段的广泛认同和强烈需求。虽然，受到外国资本所带来的市场规则、法律制度以及欧美政治读本的启蒙，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早早就接触到democracy (民主)之类的政治词汇，在政治斗争的氛围里也曾经高唱过政治民主的口号，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始终只是处于从属的地位，上百年来国人对民主主义的理解往往更多的仍旧停留在政治斗争的层面上。

了解到这种情况，我们自然也就更容易理解，胡绳先生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关注和肯定，确有其重要的意义。中国能够最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实现统一，建立起完全独立的新国家，很大程度上正是与其民族主义的逐渐成熟分不开的。而 1949 年胜利的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像 160 年前法国革命那样，把人权、民主、自由的口号同时也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却又是与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发展的客观现实密切相关的。法国革命能够响亮地提出人权、民主和自由的口号，根本上在于法国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第三等级。而中国革命之所以无法真正举起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旗帜，也正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占统治地位，因而近代中国社会不存在这样一个由于其经济上担负了国家的几乎全部开支，进而对整个政治运行规则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的第三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都不是建立在少数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的基础上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参预意识，必须依据于国内第三等级成长起来的力量。一个国家能否形成强大的第三等级，也不是看它培养了多少工商业资本家，而是取决于整个纳税人阶层及其利益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能否取代封建的或专制的统治力量，而占据主导的地位。历史上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形成与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1789 年法国革命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法国虽已居于主导地位，却也并未能取得支配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很初步，其革命的第三等级中，实际上起着领导作用的雅客宾党人也绝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一个民主化社会的形成，虽然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却未必一定要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适应。

我们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未来前途，同样需要完成这一政治演化的进程。无论是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政治民主化和国民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去先造成一种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培养出一批怎样的资产阶级，再来推进这一进程。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终结，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与完善，国家政权直接支配经济生产和社会财富的局面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变。而随着集体、民营和私营经济的日益兴起，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个人存款积蓄的大幅增加，国民税收部分所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大。这种情况已经显示出，中国的第三等级其实正在迅速形成之中。随着地方各级行政管理和税收机关对第三等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日渐依赖，第三等级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正在潜移默化地迅速加强中。一旦第三等级的自身利益与地方和国家财政开支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地方和国家整个财政的预算又不得

不极大地依赖于第三等级的税收来保证的时候，从地方，进而到国家，对国民权益的重视程度也就自然会提高起来，第三等级为保护自身利益和为争取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努力，也必定会取得明显的进展。只要改革开放的方针继续下去，这无疑将会成为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必然的趋势。中国的现代化，自然有赖于这种趋势的发展与延续。

----

[1] 见《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出版。书中除录有胡绳先生谈话外，并附有根据胡绳先生意见起草的《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部分初稿。

[2] 读过胡绳先生《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载于 1987 年 3 月 1 日《人民日报》）一文的读者当能记得，十多年前胡绳先生就已经尝试着主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中国近代史了。

[3] 胡绳前引书，第 51 页。

[4] 本文所使用的“封建”概念，无论引文内外，均系依据胡绳文中的概念而引用，并非意味着笔者同意中国社会具有欧洲意义上的封建性质。

[5] 同上引书，第 5，1530－32，33－34，45 页。

[6] 同上引书，第 43 页。

[7]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修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18 页。

[8]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00 页。

[9] 胡绳前引书，第 13－15 页。

[10] 胡绳前引书，第 2，15，45。

[11] 可参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革命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之政纲文件。

[12] 参见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 年 9 月 22 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6－17 页。

[13] 胡绳前引书，第 45 页。

[14]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614 页。

[15] 转见谢伟思：《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327－329 页；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945 年 3 月 3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 53－56，100－101，126－127 页。

[16] 鉴于此遗稿是胡绳谈话记录稿，故文字方面不十分严谨。这里所讨论者相信并非胡绳先生准确概括后的语言。有关胡绳先生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系统论述，可参见胡绳先生近些年来已发表的其他文章。

[17] 邓小平：《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1987 年 4 月 26 日，《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5 页。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 年 9 月 21 日，《建国重要文献选编》第 1 册，第 2，7 页。

[1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38 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版，第 194 页。

[21] 同上引注，第 194 页。

[22] 同上引注，第 195 页。

[23]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 页。

[24] 《首都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会纪要》，《近代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25] 胡绳前引书，第 45 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6 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3 页。

[28] 较详细讨论到这一概念的有日本学者西村成雄，他在《中国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民主主义》（日本研文出版社 1991 年版）和《现代中国の构造变动》（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0 年版）两书中，对此都有具体的解说。

[29] 涉及到有关北京政府，特别是南京政府以及国民党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大概是胡绳先生谈话中最为薄弱之处，且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

平等与人权的悖论
——读《冷眼向洋》一书想到的

读资中筠主编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倍感一些问题的归纳和分析颇具深意，让人获益非浅。特别是编者在绪论里所强调的，本世纪社会变迁的两大原动力：人类“求发展”和“求平等”的渴望，与笔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尽管严格说来，“求发展”不自二十世纪始，“求平等”也不由二十世纪终，但二十世纪因人类“求发展”、“求平等”的两大冲动而造成一次次重大历史变迁，毕竟令人印象深刻。让笔者略感不足的是，书中讨论发展的主题似乎一以贯之，对人类“求平等”的努力却从最初的浓墨重彩逐渐转为轻描淡写，到后半卷干脆不见了踪影。以至全书后记中也悄悄改变了论题，断言二十世纪也好，二十一世纪也好，世界的两大主题是：“一个和平问题，一个发展问题”，平等问题不知所终。

百年历史，前半期“求平等”轰轰烈烈，下半期“求发展”日新月异，发展与平等两大主题，称得上各领风骚五十年。谈百年风云，又是多人分头撰稿，谈平等前重后轻，也多少有情可原。但问题是，本书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对于正在经历社会转型之苦，又眼见苏联东欧政治巨变的相当部分中国读者来说，他们更关心的，也许未必尽是“求发展”的必要，反倒是更愿意从作者描述的世界大势之中，看出“求平等”的未来前景。在这方面，《冷眼向洋》一书显然没有能够满足这部分读者的愿望。

中国今天有多少人重视平等问题，并无统计数字可考。但是，只要注意到当今权钱交易日趋严重，贫富分化日渐加剧的社会现象，就不难估计出平等的呼唤在中国的今天会有怎样一种群众基础。毕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们曾长期受到社会主义平等思想的熏陶，并且过惯了虽然得不到物质享受，却不必担心生老病死和子女教育等压力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后，“铁饭碗”被打破，各种福利政策被取消，生活压力空前加重，社会地位迅速改变，加上大量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社会弱势群体和相当部分理想主义者对现状不满。这也就难怪，知识界中近年来后现代派招摇过市，谈论平等、批判现实的言论日渐其多，且越来越有市场。包括对“文革”，也很有些人称颂备至，言谈话语之间，大有非再来一次“文革”不能铲除权力腐败的毒瘤，创造平等未来的想法。

中国今天的问题由何而来，自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不容置疑，那就是权力腐败以及权钱交易愈演愈烈，它极大地加剧了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多几乎是赤裸裸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已经成为损害人民对政权信心和影响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恶性隐患。一些人之所以怀恋毛泽东那个时代，之所以肯定和推崇包括“文革”这种极端激烈的造反形式在内的政治运动，很大程度上正是社会上弱势群体对权力腐败恶性发展的强烈反感情绪的一种反映。问题是，祈灵于回归旧体制和再来一次“文革”而解决因权力腐败形成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似乎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求平等”的梦想，古已有之。但饱读唯物论的中国人理应了解，真正平等的实现还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即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冷眼向洋》一书对人类近代关于平等的概念有所说明，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尤其是它对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所做的澄清，即“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在它看来，欧洲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平等问题上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在对其内容的不同理解上，即是强调起

点平等，如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呢，还是强调结果平等，分配公平呢？然而，该书理应进一步告诉读者，这种对平等的不同理解，其实更多地也还是人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的不同感受所使然。十七、十八世纪人们对平等的主要要求是政治上的，即强调所谓天赋人权，生而平等云云，追求的是人人都应享有均等的权利与机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人们对平等的要求更多地转向经济问题，于是就有了节制资本，公平分配，甚至有了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主张。之所以会有这种区别，是因为不同的时代欧洲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主要问题是封建专制及其等级制度对社会和人的严重束缚，因而才会产生以强调天赋人权思想为特色的自由主义思潮；而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问题则更多地表现为人们对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状况下贫富悬殊两极化的强烈担心，也因此才会促成以要求分配平等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而所有这些的关键，严格说来都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与之相关联的不同社会环境作用于人的主观感受的客观结果。马克思所谓存在决定意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同意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那么，我们对中国今天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就应该有客观的分析。权力腐败或权钱交易的前提，是因为首先存在着不受制约的特殊权力，金钱ー由自由贸易、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才能对权力者发生效力。一味地强调金钱的腐蚀力而忽视权利的不公平、不合理，一心希望回到旧体制去消除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不仅是开历史的倒车，而且根本就是本末倒置。其实，一方有权，一方有钱，未必就会导致交易关系，新加坡、香港都属于“金本位”的社会体系，也曾经发生过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它们对权力进行公开监督与制约之后，至少极大地抑制了金钱对权力的腐蚀作用。同样，有权没钱也未必就不会产生权力腐败。事实上，最早引起广泛非议的权钱交易现象，就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各级干部中盛行一时的“走后门”之风，说到底还不是为自己及其家族子女谋取个人经济物质利益？更何况，权力腐败也并非仅指受金钱腐蚀一点而言。“文革”期间诸多地方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入党、提干、招工等种种权力诱奸女知青的恶性案件，包括利用权力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以至对他人打击报复，等等，其实都是权力腐败的某种表现形式。十分明显，中国目前问题的症结，首先还不是结果平等与否，而是在基本的起点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起点尚不平等，又如何能指望结果平等呢？

马克思是在什么条件下谈论平等问题的呢？是在“形式上平等，实质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已经牢固确立之后。“形式上平等”，即《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所称：“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换言之，每一个人生来就享有相同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得本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把他人置于自己的政治权力之下，不得限制他人在法律范围内的思想言论的自由。也恰恰是因为已经存在了这种形式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才得以产生，也才有了马克思谈论“实质上平等”的必要与可能。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许多人讨论平等问题时，却完全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前提。他们没有意识到，当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平等，即起点平等还不具备的时候，要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即结果平等，无异于缘木求鱼。

“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早在二十世纪上半期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中就已经被定性为典型的资产阶级口号。为了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导致否定形式上的平等，二十世纪各国共产党人一度走到根本否定普遍人权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苏联以大检举、大揭发、大逮捕、大处决为内容的“大清洗”运动，中国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标志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带来实质上的平等，反而造成了难以数计的冤假错案和人与人关系的严重不平等。平等与人权的悖论，最终使以平等为号召的社

会主义渐渐失去了它最初耀人的光芒；对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否定与排斥，实际上早已成为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世人诟病的问题所在。比较半个多世纪前社会主义运动蒸蒸日上，资本主义气息奄奄，而如今资本主义气势如虹，社会主义实践或是半途而废，或是改弦更张，如果还仅仅从苏联自身体制弊病和俄国模式影响的角度去找原因，显然是太过偏狭了。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受挫，根本上并不在于它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采用了错误的模式，致使它的发展速度落后资本主义太远。在俄国革命最初的那些年里，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民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经济状况，都存在许多严重困难，但在无论苏联、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那些对资本主义弊病强烈不满的普通人看来，这丝毫不足以动摇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往和信心。甚至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之际，仍然有许多人真心希望能够从此创造一个足以荡涤资本主义污浊，彻底净化人类心灵的新世界。经济的发达、物质的享受，对大多数人来讲远不是那么重要。问题是，当燥动和狂热过去之后，人们最终吃惊地发现，他们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他人的权利，实际上并不能创造他们理想中的平等。不论他们是否不自觉地充当了上层权力斗争的工具，至少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制造了更多的不平等与不公正。何况远不是所有人都真诚地追求平等，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时，往往有许多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准备来捞取个人的实惠或满足其挟嫌报复的私欲的。而无休无止的斗争，造成无休无止的猜疑、诬陷与仇恨，制造出大批"能力不行要嘴皮，政治问题来找齐"的告密小人，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直至走向你死我活。而这些，正是世人把苏联的大清洗、中国的"文革"视为同类相残的历史浩劫的原因所在，也正是社会主义内在凝聚力和外在形象被破坏，使多数人逐渐由向往社会主义，到远离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

为了追求平等，必须要制造新的不平等吗？为了争得自己的自由权，一定要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吗？这种逻辑其实就是马克思也未必赞成。不错，马克思设想过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它只应当存在于消灭制造了太多不平等的私有制，从而根本取消阶级存在基础的短暂的"过渡时期"。既然阶级已经消失，它当然不会也不应当造成任何新的不平等。因为马克思理想中紧接着到来的社会主义，正如《冷眼向洋》一书中所说，一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人在得到了基本的生存权、自由权之后，再进一步从异化劳动中解脱出来，真正复现人的本性、尊严和创造力的"真正合乎人性"的社会。社会主义之所以一度被世人相信优越于资本主义，并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其魅力也正在于此。但俄国也好，中国也好，恰恰缺少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观所赖以存在的那个"形式上平等"的社会基础，自由权对于人们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斗争目标。换言之，在当年的俄国和中国，开始成熟了的其实还不是平等问题，而是人权和民主问题。一步跨过争取人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最基本的社会进步阶段，直接迈向结果平等的终极目标，不能不造成人们认识上的严重误区。好象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什么自由、什么人权，统统都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就连用来维护普通人基本权益的法律制度，也被当成了可有可无、可方可圆的的橡皮泥。在这种情况下，高度集权的体制、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的建立，乃至传统官僚体系的延袭，都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权力的滥用与失控，当然不可避免。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实现他理想中的平等，其原因盖莫出于此。同样的道理，注意到现实的社会问题，指望回归毛泽东时代，甚至重演"文革"，来寻求平等的实现，也绝不可能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存在着重发展，轻平等的偏向。这一方面是市场经济客观发展的条件所使然，另一方面也是人们主观认识跟不上形势变化所致。面对这种情势，因噎废食固不足取，听之任之亦不可为。一面努力推动政治改革，厉行法制保障个人权利，开放民主自由使一切

权力置于公共监督之下，从而为每个人争得发展起点上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均等；一面努力抑制结果的不平等，设法通过宏观调控从社会分配的角度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基本权益，力求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造成社会公正与公平，这是中国今天的社会进步与发展不得不两相兼顾的重要课题。但如同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一样，没有起点的平等，注定了不会有结果的真正平等，这是一个必须要有清醒认识的客观现实。在承认这种客观现实的条件之下，如果真心"求平等"，世界各国中已有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未必不能找到抑制贫富两极化的有效方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重蹈历史复辙，干那些为"求平等"却硬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蠢事。

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印象之一：锐意求新，但尚有欠缺

听到陈永发教授的名字，是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在和范力沛（Lyman Van Slyke）教授的通信中，得知他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在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写中共抗战时期的历史。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大概是在 1986 年，范教授寄来了这本他十分推崇的著作：《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陈永发教授出版的这本书，给史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往西方的中共史研究著作，通常以讨论中共上层的权力消长和路线方针为主，陈教授的这本厚达 690 页的著作，却着眼于中共在传统乡村中的作用与反应，深入地探讨了抗战期间中共在华东和华中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的复杂情况，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极具新意，且有相当说服力的关于当时历史场景的描述。它获得当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有关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陈永发教授的第二本书，即他用中文在台湾出版的《延安的阴影》，笔者是 1992 年在美国看到的。这本书同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有关延安整风的情况，在各种文章中谈论得不少，系统的研究却鲜有人做。他不仅抓住了这个十分重要的题目，而且深入了进去，做得很有特色，再度显示了其治史的深厚功力。

几年前，已听说陈永发教授开始根据吴大猷先生的意见，与刘广京、张玉法两先生共同编写一套专门写给年轻人读的"最近两百年中国史"，陈教授主笔"中共篇"。既然是写给年轻人读的，自然要通俗、简明，提纲挈领，字数尤其要少而精，以他 20 年来研究中共专史的功夫和经验，写成这样一部小书，自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不期然，8 年过去，他竟然再度推出一部厚达 1000 余页的大著出来，直逼当年台湾中共史权威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鸿篇巨制了。[1]

以个人力量写成一部中共通史，这在台湾似已成为一种"传统"，但其难度之大，对写史者各方面的知识、训练，特别是对其掌握资料要求之高，却未必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在大陆中共史研究尚未开放，海内外相关档案资料还十分有限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主要凭

借台湾所藏中共历史文献，出版几部中共史著作，虽然缺漏错讹在所难免，但也必有些许新意，总是聊胜于无。记得笔者当年初涉中共历史，就曾津津有味地翻阅过郭华伦、王健民、司马璐等几位先生的中共史大作，从中有所受益。

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共史研究早已越过了从郭华伦、王健民等人的著作中汲取知识的年代了。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欧美，无论是就其深度，还是就其广度而言，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开放，中共史研究较之当年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这十年来，中共史研究已经大大突破了郭华伦、王健民他们那个 30 年（1920－1949）史的范围，更多的已经转向了后 40 年（1949－199？）的研究，这就使得任何以个人的力量来编写一部中共通史的努力，变得益加困难。正因为如此，当笔者听说陈教授正在把他那个 10 万字左右的小书扩展成一部通史之际，第一个感觉就是担心。

陈教授的勤奋与刻苦大概鲜有人能够企及，但他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快手”。[2]他写《Making Revolution》，研究抗战 8 年期间中共在华东、华中根据地的历史，用了 10 年时间；写《延安的阴影》，研究延安一个地区 3 年左右的整风运动史，也断断续续用了七八年时间[3]。可想而知，同样用 8 年时间，要想写出一部高质量，且具有相当新意的中共 70 年史，岂是易事？

凡是读过陈教授第一本书的读者，当然记得，他的这本书，除了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视角以外，尤其重要的是，其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的文献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并辅之以一定数量的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很少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征引及参考资料多达 650 余种，直接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仅 80 余种，80％以上的资料是其他人很少利用，甚至是作者独自发掘的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或回忆资料。也正因为如此，该书才会新意迭出，让人刮目相看。

在这方面，陈教授的第二本书似乎稍有欠缺。再加上作者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深入研究不够，对其“谋略”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难免对一些史实的判断有所失误。[4]但严格来说，作者在书后开列的 140 余种中文文献中，属于今人研究成果者，不足 40 种，仍有将近 60％左右的资料还是作者首次深入研究和利用的。因此，该书的新意，明显地也还是建立在作者发掘和掌握的相当数量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的。

读过其新著《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以下简称陈书），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显得相对就更薄弱一些了。写通史，要通才。通常写通史者多为集体，而鲜有个人，也正是因为靠个人功力将所有方面通下来，大不易。看得出，陈书走的是捷径，即主要借助于现有的各方面研究成果。根据书末标明的征引及参考书目统计，全书利用各类资料约 900 种，属于第一手文献资料和回忆资料者，仅为 230 余种，70％以上利用的是今人已经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与他前此出版的两种著作的情况恰好相反。这对于陈书而言，很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今天的研究者不应当在较多地利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和写作。考虑到自郭华伦、王健民以后，台湾再不曾出版过能够反映新的研究成果的中共通史著作，利用各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一部比较通俗的中共通史，像吴大猷先生所希望的那样，提供给台湾有大学程度的普通读者，也确实是很必要的。但问题在于，陈书的写作离开了当初的设想，它目前的定位并不在给台湾普通知识分子提供一段脉胳清晰的中共史知识，而是着重于理性的分析与总结，这对于缺少专业训练的读者来说，似乎显得艰深了些。

陈书以其目前的形式，多半只能给像笔者这样的一些专门家来读。既然主要是写给专家看，就有必要考虑专家们已有的知识结构。可以肯定，陈书从立意、架构到议论，都是锐意求新，对中共史做了相当深入的探讨，有些问题的视角也很独特，但太多地利用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注定了会在主要史实的组织和叙述方面，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不管这些成果来自大陆、香港，还是美国，也不论它们注重于赞扬，还是揭露，对研究它的专家是一样的。况且这种通史的写法又束缚了作者像他过去写第一本书时那样变换新的研究角度，从而使陈书能够提供给专家们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新情况和新知识显得不那么丰富。尽管笔者十分钦佩陈书的诸多议论，但花了两周的时间读完了陈书后，笔者还是留下了这个多少有些遗憾的印象。

印象之二：研究深入，但着力不均

过多地借助现有成果来研究，还会产生一种负作用，那就是对于有些作者研究比较深入，或者现有成果比较成熟的问题，可能写得很精彩，而对那些作者不十分熟悉，或者瑞有成果较少较浅的问题，议论时就可能经不起推敲。原因很简单，现有的研究成果本身就存在着此厚彼薄、深度不一和青黄不接的情况，如果作者搜集到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对手头掌握的研究成果又阅读不细或理解不透，一旦于不经意中把它们嫁接到自己的成果中来，就很容易出错。陈书就有这样的情况。

陈书中有些错误大概是手边缺少工具书，或写作时不仔细造成的。比如 97 页说周恩来赴法留学前曾“先后前往日本和英国留学”（其实未去过英国）；第 278 页称 1934 年毛被“撤除”“政治局委员”一职（无其事）；300 页说 1936 年 3 月“中共首先和东北军的王以哲师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应是王以哲军）；310 页说 1937 年中共“加速改组陕甘宁共军国民政府新编第八路军”（措辞有误，应为加速改组红军为……，且第八路军并非“新编”军）；353 页说 1935 年朱理治等以肃反的形式“处死了包括刘志丹在内等数十人”（刘志丹 1936 年死于东渡黄河作战）；355 页说王明 1937 年回国后“把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国际派）三人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另由同机陪同他返国的陈云和康生递补”（无其事）；707 页说“一平、二调、三收款”的“收款”是将“生产所得直接用于投资，而不归农民分配享用”（应是指银行强行收回贷款）；716 页说毛于 1962 年开除了彭德怀的中央委员一职（彭从未被开除中委）；742 页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苏“终于正式断绝外交关系”（从未断交）；846 页说 1991 年 5 月“江青在北京秦城监狱自杀身亡”（是在女儿家）；915 页称 1989 年 4 月 25 日“邓小平终于出面发表公开讲话了”（无其事）；916 页说 5 月 19 日清晨“赵紫阳和李鹏又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无李鹏）；995 页称从 1927 年到 1935 年中共中央实际领导至少改变了四次，“最先是瞿秋白，后来依次是苏兆征和向忠发，再后来是博古”（没有苏兆征）。

陈书中另外有些错误多半是所据资料出处不同，最后定稿时过于匆忙，没有认真通读检查造成的。比如对 1927 年“四一二”事变中被杀人数的说法，106 页说“共有 300 人被杀，500 人被捕，5000 人失踪”，176 页却说“有 1000 余工人遭到死难，2000 余人被捕，6000 余人失业”。如对 1927 年武汉政府解散工人纠察队问题，108 页上面说 6 月汪精卫就“要求中共交出工人武器并解散工人纠察队”，中共不得不委屈求全，下面却又说 7 月 15 日汪才“要求中共交出工人纠察队武装”。如对 1927 年秋收起义后所剩武装人数，211 页说毛当时率“残部约 1000 人”另谋出路，223 页却说毛当时“率领 1500 的残余人马南下逃窜”。又如对国

共关系破裂前后的中共党员人数，211 页说“党员的人数从 60000 锐减为 10000”，226 页就变成了“党员的数量由 40000 陡减为 10000”。如对毛泽东 1943 年取得的最后决定权的内容，286 页说是“取得思想、组织、政策、战略、军事五大方面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377 页却是“举凡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方面的重大问题，都由其决定”。再如对 1934 年江西红一方面军突围人数，289 页说“有 86000 人之众”，291 页则成了“在 7 万战斗部队之外，又有机关人员 9 千和民夫 5 千随行”。（这里数字的使用不规范－引者注）另外，对 1936 年红军三个方面军甘北会师时的人数，290 页说“合计不到两万人”，295－296 页则说二方面军不到一万人，四方面军有万余人，仅此两部就已经在两万人上下了。又对 1958 年的农业生产，686 页说“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丰年”，696 页又说“其实，1958 年的农业生产只比 1957 年多了几个百分点而已”。关于彭德怀 1959 年的意见书，709 页变成了两封，称有一封“用词尖锐，语多讥讽的意见书”批评人民公社的，还有“一封私人意见书”，批评毛泽东不民主。再者，816 页说 1976 年 4 月 4 日深夜华国锋派人移走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并驱散群众，但群众拒绝散去，“经过 12 小时的对峙之后，中共中央乘夜幕低垂，动员十万民兵和工人，配合警察，以棍棒进行强制驱离和逮捕群众。”既为“深夜”行动，说群众对峙 12 小时，当是 5 日正午，如何又“乘夜幕低垂”？还有，901 页说 1984 年底中共决定废止价格双轨制度，让全部产品价格自由化，904 页则说 1984 年“冬天，官方废止官定价格不成，又恢复了一些重要商品的官价，形成价格双轨制度”。

陈书在述及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问题时出现的一些错误，也能够其显示依靠二手资料研究的缺点。如 367 页说“1940 年 6 月，希特勒悍然发动对苏战争，一时势如破竹，苏联失地千里，四个月后，便被迫通知国民政府无力继续军事援助。”（众所周知，苏德战争爆发是在 1941 年 6 月）又如 532 页称 1949 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访问时，因史达林未到车站迎接，“有遭轻视之感”（史达林从不到车站迎接外宾）；说毛泽东“暗示外蒙古应该回归中国的话，严重冒犯了史达林，以致史达林把他冰冻在莫斯科郊外的角落里，不闻不问达半个月之久”（实际上毛未与苏联领导人晤谈只有四五天时间，且与外蒙古的话题无关）；说当时谈好苏联提供 4 亿卢布贷款，后因卢布贬值，中共实际只得到了 3 亿（谈的是美元，并非卢布，且谈的就是 3 亿）；说“毛泽东在 1950 年 3 月上旬返抵北京。……三个月后，美国宣布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范围之内，北韩的金日成利用此一表示，迅速得到史达林的支持，于是不顾毛泽东有攻打台湾的心愿，抢先发动韩战。”（毛 3 月返京，三个月后则是 6 月，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其实美国国务卿这一表态在 1950 年 1 月）再如 547 页说史达林因中国出兵朝鲜，“投桃报李”，“决定尽快退还中东铁路，提前从旅顺撤军，并取消苏联所一手垄断的中苏合营公司”，而后还同意向中国提供 156 项大型工程的技术援助（此乃赫鲁雪夫上台后所为，156 项此时乃 141 项，1954 年赫鲁雪夫增加 15 项后达到 156 项[5]）。另外，664 页称 1956 年 6 月波兰发生波兹南工人暴动，工人上街游行，波共不惧苏共反对，恢复被罢黜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的领导职务，“哥穆尔卡派军队镇压，导致 200 余人受伤，84 人死亡，但是迅速平息了动乱。”（哥穆尔卡正是因为军队镇压波兹南事件，引发全国抗议而重新上台的，他如何会派军队镇压？）681 页称“赫鲁雪夫答应援助 20 亿美金，但因为随后又要求优先偿还韩战以来积欠苏联的贷款，实际上只给了中共 4 亿元。”（全无根据。）

另外，737－743 页讲述“中苏分裂”一段中的许多内容，也不准确。如说赫鲁雪夫为争取中共支持，“派人到北京来谈原子弹和原子能工业问题，而且剑及履及，立即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同意协助中共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随后他又签订了两国间的科技工业协定，答应从 1958 年起，分五年共同进行或由苏联援华进行重大科研项目 103 个，并在原已达成的 156 项经济合作项目以外，增加 55 项。”其实不是赫鲁雪夫派人到北京，而是中共派人到莫斯科；

国防新技术协定也不是关于研制火箭和喷气战机的协定，而是关于提供研制导弹和原子弹技术的协定；随后的科技工业协定，也不是 103 项，而是 122 项；至于 156 项上另增项目问题，更是另外协定的内容，也不是 55 项，1958 年 8 月协定是 47 项，1959 年 2 月是 78 项。[6]又如说 1957 年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雪夫与毛泽东发生口舌之争，中共无法从苏联得到更多援助，毛泽东因此"失去自我克制，让自己对赫鲁雪夫的轻视和不满全部爆发，而赫鲁雪夫不甘受辱，也不再掩饰他对毛泽东的憎恶和愤恨了"，则纯属子虚。事实是莫斯科会议期间双方印象均不错，此前已定有国防新技术协定，莫斯科会后两国又接连签订了至少三项大规模经济技术援助协定。此外关于建立长波电台问题，毛泽东发动"八二三"炮战问题，赫鲁雪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发难问题，1962 年刘少奇提出"三和一少"主张缓和中苏关系问题等等的说明，均与事实有不少出入。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辨正。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本学术著作，在基本史实、引文及文字表述上出现过多讹误，是不应该的。

陈书在讨论农村问题时，包括写中共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中的农民动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以及农业集体化等等，由于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写起来显得游刃有余。对某些自身研究薄弱，同时可借鉴的成果较少的问题，如关于 50 年代初的肃反运动，由于作者下功夫读了不少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也写得实在、可靠。值得注意的是，陈书中的不少错误并不是现有研究不深入，或作者缺少资料，无所凭据的结果。恰恰相反，许多研究是深入的，资料作者也是掌握的，但理解和利用时却出了偏差。当然，我们并不是说陈书不可以对某些即使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得出不同的理解。事实上，这可能恰恰是值得称道的。问题仅仅在于，推陈才能出新。也就是说，凡立新说，必须对陈说有所交待和辩难，不能自说自话，置他人的研究成果和种种成说于不顾。否则，新说何以成立？

比如，关于 1926 年"三二 0"事件的起因，陈书引用了杨天石教授的著作，了解杨教授关于事变起因的解释说明，但陈书却强调蒋介石是"不满汪对鲍罗廷言听计从的态度"，"不满汪精卫的种种削权措施"而发起事变。整段行文也不甚严谨，颇多错误。如说"中共或许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汪精卫驾御得了蒋中正，而军队模仿苏联红军的政委制，纷纷设置党代表，几乎全由跨党党员担任，更可以保证国民党'党指挥枪'"。（第 101－102 页）其实在陈书反复引用的拙作《中共与莫斯科》一书中，对此已有说明，即中共从未有此乐观想法。至于说蒋不满汪精卫对鲍罗廷言听计从，也恰好说反。因为蒋恰恰是喜欢鲍罗廷，不满意因鲍回国"述职"而代替鲍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的。至于说事变后鲍罗廷与苏共访华使团团长布勃诺夫及季山嘉三人共同决定妥协，致使汪精卫被迫出国，也与事实不合，因为妥协决定作出时，鲍罗廷早在回国路上，且决定也与季山嘉无关，因为季被指责要对蒋发动事变负责，妥协决定即包含要季去职的内容。

比如，关于"四一二"事变前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估计问题，陈书所征引的一些著作也都有所涉及，而陈书却说陈当时"低估了蒋中正敢于向武汉政权公开挑战的决心，仍然接受鲍罗廷的意见，认为国民党是列宁主义的政党，可以从支持汪精卫返回国民党中央来控制蒋中正"。（第 105 页）实际上陈独秀 3 月就在党内公开扬言，不打倒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武装，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上海工人纠察队必须准备与蒋一拼。[7]况且，这时在武汉的鲍罗廷与在上海的陈独秀也并无直接联络，陈独秀 4 月 5 日与汪精卫共同签署联合声明，那纯粹是莫斯科直接指令的结果，与鲍罗廷无关。

比如，关于罗易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的情况，谈到的书更多，但陈书却仍旧弄错，说罗易当时"刚从莫斯科前来，完全不了解情况，电文没有交给中共中央，便拿给汪

精卫看。”（第 108 页）其实罗易 2 月即到中国，一直参加决策讨论，并非不了解情况。况且莫斯科来电当时只能发至苏联领事馆，然后转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接收，印度人罗易并不能最先收到电报。国际此电到后，鲍罗廷即向中共中央传达，根本不可能出现电文还没交给中共中央，罗易就拿给汪精卫看的情况。[8]

另外，像 1932 年宁都会议，1935 年遵义会议，都是近些年来公布资料甚多，研究也相当深入的问题了。但陈书所谓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坚持己见，反唇相稽，严辞批评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战略”（第 273 页）；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随而接替朱德和周恩来两人，负责军事指挥。不旋踵，毛泽东又敦请周恩来和王稼祥两人组织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第 293 页）等，都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公开的史料相距甚远。像 1936 年西安事变前的情况，尽管陈书多次征引拙作《西安事变新探》一书，却坚持说中共在改行“逼蒋抗日”方针后，仍“暗中筹组‘反蒋’的大结合”，说张学良一面答应中共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面也仍准备“万一说服无效，愿意成立并领导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军三者共组的西北军事大联盟，进而在共产国际的军事援助下，直接对日本宣战”。实际上，拙作已经深入说明，此一“反蒋”大联合的计划，是在中共实行“抗日反蒋”方针时，即 1936 年 9 月以前的事情，改行“逼蒋抗日”方针之后，此计划已为莫斯科所否定，因此中共中央不论感到如何困难，也没有再重新运行这套计划的想法。

实际上，由于研究不够深入，陈书中仅史实部分值得商榷之处也很多。下面仅举几例：

55、68 页。作者多半是根据 Dirlik 教授的说法，不加分析地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 1917 年前后“可以算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实际李大钊一直是梁启超进步党的同情者，甚至担任过进步党机关报《晨钟报》编辑主任，这时刚刚脱离进步党，倡导民主政治，力图调和改良派与革命派。到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即逐渐开始倾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虽然如当时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兼收并蓄，尚不定型，却完全算不上是“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9]

66 页。作者多半仅根据包惠僧的回忆，就断言陈独秀不愿在党纲中明文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也不愿接受资助。只因秋天被捕全凭共产国际营救，才了解到“尚未十分成熟之前，坚持完全的独立自主，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所谓陈独秀当时不愿接受国际资助，全无根据。1920 年陈独秀办《共产党》月刊、《劳动界》杂志，以及创办外国语学校，印刷各种宣传小册子等，无不从魏金斯基那里取得资助。他又何尝会因为一大召开反而拒绝资助，甚至不愿加入共产国际？[10]

89 页。称马林 1923 年 3 月提出国共党内合作提议，陈独秀反对，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终于体会到现实政治的复杂性，遂不再幻想在落后的中国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意把中共的近程目标降低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实际上有关陈独秀反对马林加入国民党提议的理由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中早已公开，与要不要联合国民党无关。并且陈独秀早就主张联合民主派反对军阀势力，从来不拒绝与国民党合作，且身体力行，中共一大召开时即在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11]

90 页。称“马林不旋踵离开中国，而继任人又把精神集中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合作之上，对中共并未施以太大的压力，所以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把工作重点放在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上面。然后随着共产国际联合国民党政策的落实，尤其是 1923 年 2 月吴佩孚对平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陈独秀终于不得不面对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了。”

这里的问题是，马林离开中国已经是 1923 年 7 月。如果说他有“继任人”的话，也只能说是鲍罗廷，鲍来广州则更晚，已到当年 10 月。可是陈独秀 1922 年 9 月即已加入国民党了，不仅在马林走之前，而且还在吴佩孚镇压平汉铁路工人之前。如何能够说马林的继任人“仍任由陈独秀继续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老政策”？

类似的问题在陈书中可以说还有不少。依笔者所见，关键是两个问题，一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二是作者多少有些粗心。事实上，如果仅仅是过多依靠第二手资料，作者细心推敲，小心求证，严密逻辑，科学行文，恐怕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问题。

说作者有些粗心，并非捕风捉影。笔者尚未字斟句酌，却已经在陈书中发现许多不该出的技术上的偏差。这些偏差似乎不完全是出版校对时的失误。包括上册中的错漏衍字比例之高，有时真有点“触目惊心”。注文格式、引用数字之不严格，病句之多，也足够让作者警觉的了。如 92－95 页 4 页，错 2 字，漏 3 字，衍 1 字。139－140 页，也是错 2 字，漏 3 字。衍 1 字。一个《党史研究资料》，注文中有的是“第×集，页××”，有的是“第×辑，页××”，有的是“×：××”。其他像用词不慎处也不少，如将“围魏救赵”写成“围赵救魏”（第 233，266 页），将“隐忍不发”写成“稳忍不发”（第 357，361 页），将“批倒批臭”写成“批斗批臭”（第 680 页），将“自给自足”写成“自给自养”（第 681 页）之类。下册中还有将意思写反的情况，如说什么“对中共言，私有财产制度是万恶之源，对农业集体化予以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更有抄资料将原文抄错的，如第 709 页抄写一小段打油诗竟连错三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煤（应为铁）去，收获（应为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农（应为人）民鼓咙胡。”甚至还有行文或校对不严，出现整句重复的情况（第 690 页）。这些小问题一旦超过了正常的比例，就会影响全书的质量，这是作者应当注意的。

印象之三：客观平实，但规范不严

科学的生命在于严谨。历史学之成为科学，同样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严谨的学风之上的。严谨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从著作之构思、立意，史料之推敲、引证，到行文之启承转合，乃至遣词造句，无不要求精益求精。而对史学家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做到持之有据。

持之有据，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也正是因为要我们每一个写史的人都要做到这一点，因此就有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研究规范。尽管各国史学传统不尽相同，规距不完全一样，但对引注的要求是一样严格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凡涉及有助于说明作者观点的任何重要史实及论据，均须注明出处，包括对原始材料的可信度做出解释。

陈永发教授的第一本书，英文 600 多页，书末注及文内注加起来估计有将近 2000 条，凡重要史实及引文均严格标明出处，并对必要者做详细之注释，确实训练有素。但陈教授写第二本书时，这方面的标准似乎已经降低了许多。《延安的阴影》中文 350 多页，引文仅注释 347 条，平均一页一注。此书文字写得相当生动，细节尤其丰富，遗憾的是许多重要情节，经常大段大段无注，使人不知道其所据何在，无法判断其故事的真实性如何。

《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可以说重现了《延安的阴影》一书在这方面的问题。陈书中文 1000 多页，引文注释 892 条，平均一页还不到一条。即使说，作者并非以写学术专著为目的，意在写大部头教科书，同样存在不规范的问题。按教科书写法，只要有注释问题，即应有必要

之规律，该注则注。而陈书注释全无规律可循，有时整段整段，甚至整页整页无注，有时却具体到一句话一注，让人不明所以。[12]

由于缺少注释，或者引非所引，陈书的不少说法令人生疑。比如：

361 页称 1938 年“毛泽东尽管取得政治局领袖的地位，但显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向六大（届－引者）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挑战。但是他知道时机尚未成熟，尤其六大（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表面上是国际派所制定，实际却是他们秉承史达林和共产国际的旨意所提出，并没有多少国际派自己的见解。”“从 1939 年初开始，到 1941 年 9 月为止，毛泽东主要是伺机而动，以便完成遵义会议所未完成的工作，也就是打倒国际派中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 1938 年底至 1939 年上半年都在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政策变来变去，毛泽东始与共产国际发生意见分歧。对此如何解释？）

578 页称中共以韩战有可能扩大到中国大陆为借口，实行土地复查时强调阶级斗争，“以致有一、二百万地主被杀，而其家属以及悻存的地主则被扫地出门，成为农村中的政治贱民。”尤其是在南方工作的北方干部，没有亲情系绊，“迹近心狠手辣，以致土地革命中充满暴力。本地出身的地方大员难免不满，……实际主持两广工作的叶剑英就是一个例子。他对土地革命的过左现象希图弥补，不料却因此而招致了中共中央的指责，要他在地方主义的大帽子下自我检讨，随后将其调离广州。另派外来干部接替其职务，继续完成土地革命。”（此说不知所据何在。另检讨地方主义有之，但在 1952 年 6－7 月间，事后叶仍主持工作，直到土地革命 1953 年 4 月宣告结束以后，叶才于 10 月调离。）

582－583 页称“尽管统购统销会妨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可能造成农民暴动，但两害相冲（应为权－引者）取其轻，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全面采行；中共中央宁愿冒农民反抗和暴动的险（应为风险－引者），也不愿在城市冒险，让物价波动，从而激起城市居民群起抗议。”“在考虑统购统销政策对农村的冲击时，中共认为……在全国 100 万个自然村中，或许会有 10 万个会出现‘逼死人’、‘打扁人（应为担－引者）’以至暴动的事故。可是最后竟然不此之顾。”“中共坚持采取统购统销似乎还是以意识形态的考量为重，因为文化（？！－引者）对他们而言，此项政策乃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轨道，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段话并非完全无注，但第一、注文错误：“《陈云文选》，3：202－16”不确。《陈云文选》只 1 册，并无第 3 卷。此乃《陈云文稿选编》，并非《陈云文选》，且页码也错误，应是 189－203 页。第二、中共当时主观上是否就是想要用强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仅此似不能完全说明。）

648－649 页称毛泽东发动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高级党官没有被戴上‘帽子’，但是一些中下级的涉案者仍然遭殃。一些接受中共动员、参加对他们文字围剿的作家……把他们批评成‘反革命分子’。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中，敏感的知识分子开始醒悟，……必须迎合中共的思想标准。否则，随时随地有受到官方围剿的可能。其严重后果不只是失业而已，极可能是长期坐牢，或沦落为政治贱民。”（此说结论由前述史实引出，但有什么文章、把谁批评成反革命分子？）

673 页称反右运动并非“一个不杀”，“像历年整风运动一样，必须杀鸡儆猴。汉阳第一中学就是学生运动的重镇，有三名右派学生便当着 1 万名师生面前被枪决。”（历年整风运动都必须杀鸡儆猴，为何前面述及延安整风等整风运动时并未提及？另汉阳一中被杀者罪名也并非

“右派”，且不是学生。三人中王建国为副校长，钟毓文为语文教研组长，杨焕尧为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

697 页称“毛泽东青睐人民公社的体制，就是因为透过这一体制，可以把农民生产所得的主要部分变成积累，而无限扩大投资”。（无所据，仅以结果倒推动机？）

709－710 页称毛泽东为了斗倒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在彭德怀头上硬加上‘里通外国’的汉奸罪名”。而彭则在意见书中“指责毛泽东在反右倾胜利后，‘得意忘形’，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事实上是第一书记说了算数，毛泽东所定的钢生产指标过高，而高指标正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他甚至指责毛泽东滥用威信。在湘潭老家人民公社的增产问题上，相信弄虚作假，不够‘实事求是’。若不是毛泽东命好，工农太善良了，中国老早已经发生匈牙利事件，而不得不向苏联请求派兵了。”（这些均未注明出处，但他处有注明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者，查李锐书，可知上述均出自李锐书。但奇怪的是，上述除“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句外，均非彭德怀意见书中内容，有的来自会议简报，有的来自火车闲谈。而关于彭“里通外国”一说，会议上虽有人提出疑问，但毛在庐山会议上也从未明确表过态。）

711－712 页称庐山会议批评彭德怀的一次会议上，朱德说彭脾气执拗，固执己见，“毛泽东听着，忽然翘起腿来，用手在鞋底故作搔痒状。尽管毛泽东的动作迹近狎侮，但是没有一个人抗议。”（李锐书原文：朱“还没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将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两相对照，意思相差似乎远了些。）

严格注释，是史学著作的生命。引述而不注，或所注非所出，都是史学研究之大忌。大陆一些中共史著作缺少注释，有档案开放客观局限，在台湾似乎不必有类似的顾虑。因此，陈书之犯忌，让人不大容易理解。

除了注释以外，陈书行文及用词上的主观和随意性似也有可指摘之处。以前台湾中共史研究政治色彩过浓，用陈书导言中的说法，就是基本属于敌情研究的性质，很难谈得上学术性。立足于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陈书的出版，毫无疑问对改变这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吹毛求疵的话，陈书中恐怕也仍旧残留有用词随意性大，甚至个别时候仍带有某种主观倾向性的情况。

如 92－93 页，谈 1924 年国共合作之初，国共两党合组上海执行部事，前页称毛泽东等在谭平山配合下，“打入了上海执行部”，后页则称其“出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胡汉民的秘书，工作异常投入”，甚至“因此遭到共产党同志的讥讽”。无论就行文逻辑，还是就史实本身，“打入”一词用在这里都属不当。

如 228 页，称红军二次进攻长沙城时，打了两周都无法攻破守军工事，“百无聊赖之际，红军甚至想到田单的火牛攻势”。作者在本书中两三度使用这个“百无聊赖”，都不妥贴。“百无聊赖”是实在无聊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其实是百般无奈的意思。

如 442 页，谈到当年学生运动时，提到中共推动学生运动，用的是“有意推波助澜”；提到国民党一次次镇压学生运动，则都用“处理不当”；提到国民党特务刺杀联大教授闻一多等人的事件，还使用了“政府特务热心过度”这种说法，那意思近乎肯定。

如 483 页，称高岗第一次自杀“未能成功”，“再次自杀，未再获救”。这里“未再获救”令人费解，意思是说他本来可以获救，却没有人救他？这样说有何根据？

如 492 页，称“中共借口财政负担太大，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被中共包下来的 900 万国民政府留用人员“非常能共体时艰”，“因为环顾周围，他们不难发现，中共确实有财政困难。尤其是中共自己的干部，根据补给制，仅能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比起他们，更辛苦万倍。”这里，“借口”两字显然多余。

如 611 页，称中共通过“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总共榨取了约 20 亿美元的罚款，足够共军打韩战一年之用”。这里 20 亿美元之数未注明出处。1950－1956 年中国总共欠苏联各种债务才 13 亿美元，一半为军火贷款[13]，韩战一年战费如何要得了 20 亿美元？同时，笔者完全同意作者在此所得出的观点，即采取这种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实属错误，但“榨取”一词用在这里似乎也有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嫌疑，毕竟向偷税漏税者罚款等不能说完全不当。

必须指出，总的说来，陈书的研究是客观平实的。这一点在上册表现得尤其明显。下册中值得推敲的遣词造句似乎多了一些，但 1949 年以后的中共史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也确实比 1949 年以前多得多。在长期受到意识形态的熏陶和影响之后，要使我们的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真正学术化，使我们大多数研究者不仅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尤其是能够真正地摆脱情感的困扰，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上的一切，这大概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唯其如此，坚持这样做，并且努力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规范，就更是必要的了。

印象之四：议论风生，也有可商榷之处

陈永发教授有很强的文字功底，《延安的阴影》已是证明。当今世界，已经是信息时代，那种坚持坐冷板凳，不食人间烟火，抱残守缺，只满足于弄出一些佶屈聱牙，鲜有人懂，鲜有人读的文章著作的史学家，应该越来越少了。写了书，就是要让人读的。尽管搞历史啃的是故纸堆，关心的人却未必少。问题在于我们搞史的人能不能写出一般读书人能读并且爱读的东西来。看陈书，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是在努力尝试着这样做的。但坦率地说，与《延安的阴影》比，陈书目前的写法似乎不是很成功。

陈书为了加强对读者的引导，颇费心思地写了长篇的导读和结语，并且别具匠心地又在每章、每节都设有引言，层层提出问题，节后复有小结归纳。照理说，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设计，如果作者能细心把握线索明晰、循序渐进的原则，对读者理解作者议论主题及观点，确实是可能很有帮助的。但是，两周读下来，本为同行的笔者竟常常会有一头雾水的感觉，理解上仍时感吃力。

原因何在？概括起来，陈书立意以观点统率全篇。为说明观点，又受篇幅所限，叙事反而备受局限，只好尽量精炼，结果行文稍有不慎，即出偏差。像第一章“知识分子搞革命”，与第二章第一节“从知识分子到职业革命家”，内容多处重复，怕就是受这种过分注重形式的想法所害。其实，写历史叙事当先，议论其后。没有好故事，议论也缺少好基础。陈书长在议论，有些议论确实相当精彩，只是全书篇幅太大，亮点散落，要让读者把它们串连起来，

没有一个个好故事相衔接，靠自己形成一套清晰的逻辑，着实困难。细想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与陈书目前尝试的这种写法有关。比如，陈书提出了太多的问题，又不能一一就近解答，难免让读者因之受累。

以第一章为例，陈书开篇在引言中，就提出了 10 个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为什么从羡慕先进的法兰西转向羡慕落后的俄国？其他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否相同？共产国际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会转而拥抱马列主义？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为什么前倨而后恭？为什么舍己耘人，愿为国民党的改组和发展效力？陈独秀如何使中共在国民党变得几乎具有主宰能力？为什么又眼睁睁地看着中共在国民党反共打击之下一筹莫展，几乎陷入毁灭的边缘？如此等等。(第 51－53 页)这些问题照理应当由本章下面的两节来回答，但接下来的两节却还有自己的问题。如第一节一上来就提出了 3 个与上面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价值取向多元化，为何独信马列主义的中共却自认为是这一运动的光大发扬者？中共到底是不是中国无产阶级成长的必然产物？莫斯科在中共诞生过程中担当了什么角色？（第 54 页）第二节上来则提出了 2 个同样与本章引言 10 个问题缺少关联的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难免矛盾重重，中共如何因应？一旦矛盾冲突导致分裂，中共如何自处？（第 86 页）两节中各有三段，有的段下面还有层，内容庞杂，读者根本无法对应前述如此多的问题来自找答案。再加上章有引言，却无结语，各节虽有结语，又未能紧扣自己前面提出的问题梳理各段内容，一一对应地得出言简意赅的结论，更遑论回答本章引言提出的众多问题了。结果是问题提得越多，读者就越会感到不知所踪。

不过，不论有什么样的缺陷，陈书中的议论仍旧是精彩纷呈，有时足令我们这些搞中共史的人自叹弗如。

比如，陈书在讨论到抗战期间中共为什么能够坚持敌后时，与国民政府的部队做了相当深入的对比。称“一般说来，国军在这两个省区的军队主要是军阀残余部队，各部队自成山头，彼此猜忌甚深，而共军虽然散处各地，但同心协力，浑然一体，更针对国民政府的弱点，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共军除了团结以外，最大优点是能自食其力，并不依赖后方支持。当时国军在中共和日军的双重压力之下，防区缩小，虽然他们有中央政府提供薪饷，但是在粮食和其他日常需要方面，仍然依赖就地摊派。因为国军所能控制的人口和资源减少，开支却未紧缩，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呈反比例增加。摊派之时，富户转嫁贫户的现象，犹如往昔，极为平常。因此农民对中共合理负担的口号越加欢迎。另一方面，国军各部队因为农民抗拒，不仅不容易摊到款，甚至连粮食也无从购买，于是不得不把士兵分散到各农村就食。这样一来，军队便无法避免和农民直接接触，易招民怨，甚至激起民变。另一方面，军队分散各地，共军更容易将之各个击破。……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就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技。所以结果有宵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以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对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维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第 232－236 页）

又比如讨论到国共两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时，作者的观察与概括更是令人叹为观止。陈

书称“中共最重视的是社会基层，也就是县以下的单位，要在这个层次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结构。这个政治结构是由四个不同指挥系统的延伸所组成，亦即政权、军事系统、群众团体和党部。以政权为例，县以下要设置乡长、村长和各级人民代表。军事系统设置地方武力和民兵，群众团体则设置农村抗敌会、工人抗敌会、青年抗敌会和妇女抗敌会等等。这些不同系统的组织后面是农村支部和区分部，各级党部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党一元化政策，指挥同级的政权机构、军事武装以及群众组织。”“中共的基层结构是国民党所没有的。一般说来，国民党的统治只到达区这个阶层，再往下虽然有村长和保甲长之类的设置。村长和保甲长，虽然是政权的延伸（原文如此－引者），但是人单势孤，缺乏社会威望，理论上是无所不管，实际上却因为人手不足，除征兵征粮以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他们并不是正式官僚结构中的一员，没有薪水，收入来自实际‘征收’和上缴所‘征收’之间的差额，故贪污中饱的情形，势所难免。他们的素质一般也不高，摆架子的情形很普遍，因此很容易便成为中共‘反贪污’和‘反官僚’的打击对象。最严重的问题是，乡以下的官吏背后，既没有群众武装，也没有群众团体为后盾。农村基层若有群众武装或群众团体，则这些组织多半受农村士绅以及其他地方自然领袖掌握。这些军事和社会领袖，多半是既得利益者。他们要不是地主，也至少是富农或富裕中农。乡长以下官吏对他们优礼有加，所以征粮征兵、派夫派工之时，也不敢公平执法，通常要与他们合作，而把重担加在无权无势的贫苦农民身上。虽然有一些乡长、保甲长、地主、士绅加入国民党，或拥有良好的党政关系，但基本上可（以）说，国民政府的农村并没有党组织存在，……况且国民党内部派系纷繁，彼此斗争激烈，又如何判断谁是真能代表国民政府发号施令呢！”

研究之深入，在于能够从宏观而微观，再由微观而宏观。只知宏观，而无微观做基础，是为雾里看花；只重微观，而无宏观之眼界，则是管中窥豹。陈书议论之妙，自然不止于此。但其议论深入精当者，莫不是在微观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概括所得。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相反，陈书个别研究尚未深入的问题，议论起来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了。

据导言说，陈书的中心旨意在于解释“三个大问题”，即“第一、中国共产党究竟和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中共是如何动员群众，建立其基层政治结构？”“第三、中共究竟是如何建立一个庞大无比而又上下整合的党国体制？”（第 37－38 页）就这三个问题而言，第二个问题，即基层权力结构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作者第一本书研究和论述的内容，因此总体上说也是本书中议论较为充分和深入的一个问题，很值得一读。第三个问题是作者第二本书和其他几篇文章所涉及到的问题，尽管作者的研究未必全面，讨论也很有可争议之处，但大体言之有据，自成一家之说。然而对民族主义的问题，陈书的解释就很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了。

陈书对中共与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大致可以用其结语中的这段话表述出来，即“从根源来看，中共毫无疑问是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大部分党员们是以民族主义为起点，走上马列主义的道路；一旦皈依了马列主义，又让马列主义回过头来影响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诠释。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中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从而有别于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在这里，作者提出了至少两种“民族主义”，一是“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一是“带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因素”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第 970－971 页）。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用作者的话来说，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认同、情绪和立场，通常并无具体的政策内容。所以中共尽可以根据其马列主义的信仰和观点，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第 14 页）如果这一解释说得通的话，那么，世界上大概也就

没有“一般所谓的民族主义”了。中共是“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那么国民党呢，自然就是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了。甚至世界上只要有一个党，一种主义，一种宗教，一种流派，怕是也都有一种民族主义了，因为它们各有各的信仰和观点，难免会“提出不同于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政策内容”。

正是因为作者的这种说法缺少合理的依据，陈书在解释中苏关系的问题上就不免遇到了麻烦。因为，如果肯定上面的逻辑，那么，同样是信仰马列主义，何以中共与苏联会分道扬镳，甚至反目为仇呢？对此，陈书在导言、结语以及正文中有四五处涉及这个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释，但读后并不能令人感到信服。

作者在一处的解释是说：双方因三面红旗而起矛盾，赫鲁雪夫“看到三面红旗带来的三年大饥荒后，冷嘲热讽，毫不留情，甚至直指毛泽东为旷古未有的大狂人”，毛的反应是指责赫“犯了严重千百倍的大国沙文主义”，并且“出卖社会主义的理想，把苏联带向了修正主义的错误道路”。结果“两人相互攻讦谩骂，犹如不共戴天的仇人”。（第 736 页）

三年大饥荒是指 1959，1960，1961 这三年。“三年大饥荒后”，应当是指 1961 年以后吧？但在下面的说法里，两人“相互攻讦”的时间，又被提前到了 1956 年，提前了至少 5 年：

“中苏所以水火不相容，追究其原因，可以从两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着眼，也可以从两国对世界局势的看法和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方法的差异来分析。但是，最关键的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亲自主控中共的外交政策，而他和苏共领袖赫鲁雪夫从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早在 1956 年毛泽东和赫鲁雪夫已因为史达林鞭尸（是不是应该写成史达林被鞭尸？－引者注）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的歧见，而彼此交互攻讦。”（第 738 页）

说 1956 年事实上也有问题。因为如果说毛、赫“最初见面开始便彼此深怀恶感”，那就应当是指 1954 年，而非 1956 年，因为两人最初见面是在 1954 年 10 月。但问题是，当时史达林刚死，苏共新中央的领导人正在交替接班之中，地位严重不稳，极需毛泽东的支持，赫鲁雪夫带来许多“见面礼”，毛泽东也相当满意，双方如何会立即“深怀恶感”？甚至说毛、赫因为赫鞭史达林尸事“彼此交互攻讦”，也与实情相距甚远。事实是毛对赫鞭尸虽感不安，但打破史达林不可怀疑的神话，毛也还是高兴的，因此当年他对赫此举明显地是表扬多于批评。至于说这一年毛、赫对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产生歧见，似乎也有问题，因为对中国提前实现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并未见苏方当年表示过不满。

到写结语时，作者再度总结这一问题，又强调事情与“中共的独立自主性”有关，说是：

“从 1950 年代中期史达林逝世之后，毛泽东鉴于农业集体化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政策出奇的顺利，开始改变其对苏共的看法。毛泽东甚至敢于冒共产阵营的大不韪，轶出苏联模式，采取大跃进的政策，抢在苏联老大哥的前面，大胆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因此触怒了对他本来便有恶感的新苏共中央，被痛诋为极端的中国沙文主义者。自反而不缩（何意？－引者）的毛泽东则反唇相稽，发挥其‘与人斗争（应为与人奋斗－引者），其乐无穷’的精神，严辞批评苏联已堕落为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第 970 页）

然而，中共的独立自主倾向，从 1935 年遵义会议后就开始显现，到延安整风时已惹恼莫斯科，也并未破坏双方关系，何以这个时候就一定会闹出个分裂来？至于说毛轶出了苏联模式，

抢在前面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苏方愤怒，同样不妥。因为苏联 1936 年就已经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共 20 年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并未抢到苏联前面，苏共中央有什么理由感到不满？

中苏两党的矛盾磨擦乃至关系的最后破裂，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个人因素肯定有，但这种涉及到党和国家关系这样重大的政策问题，离开民族和国家利益，离开双方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立场，也不去讨论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理论冲突与争论，只是从毛泽东与赫鲁雪夫两个人斗嘴的角度去解释，如何能够说得明白？

其实，陈书对中共民族主义问题解释的不尽周延与合理，还不止于此。由于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一般政策，陈书在解释中共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策略的关系时，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内容。结果，“结语”第一节“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最后，我们看到了如下一段令人费解的结束语：

“中共最初根据阶级斗争的观念来界定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随着阶级敌人的逐一消灭和改造，中共越来越难从客观的矛盾来把握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了。1955 年邓小平说，谁是富裕中农，很难认定，但只要看他是否反对农业集体化就应该不错了。中共本来便有谁反对中共党国体制，谁就是阶级敌人的倾向，但从此以后就越来越严重了。……这时，毛泽东和他指挥的中共党国体制透过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民族主义的桂冠，在中国大陆没有什么人敢问：到底中共所谓工农阶级的利益在那里？毛泽东和中共党国体制是否真正反映所谓工农阶级的阶级利益，并继续以之来界定中共民族主义的具体内容呢？”

我不知道，有哪位读者能够明白作者在这里想要表达的观点。我能够了解的情况是，自 50 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共用以规定阶级成份的经济关系已经改变，继续根据客观上占有生产资料多少来划定敌对阶级已经成为不可能，结果，以思想言论的倾向来判断阶级敌人的作法逐渐盛行起来。但这与要不要“界定”或“把握”民族主义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只要我们细心一些就能够发觉，中共从来就是把“民族主义”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它都是严厉批判民族主义这一倾向的。它又如何会在意要不要时时“界定”和“把握”民族主义呢？

依笔者看，民族主义不过是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的人们，在感情上的一种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的情绪和立场。它与党派无关，更不因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变异。它可以表现在一种政策、一种方针之中，但却不可以把它和政策或方针完全等同起来。二战以后的历史显示，越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国家，相互之间民族主义的排斥现象也越明显，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共同尊奉的“马列主义的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同样，这种民族认同感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民族情感，也只存在于不同民族交往之间，它同本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或党派斗争不发生必然联系。硬要把民族主义划分为不同意识形态的政策需要，我们就无法理解 1945 年的蒋介石和 1950 年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同样为中苏条约感情冲动，就无法解释中共与苏共之间为何会存在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14]

写在结尾的话

从 90 年代初起，笔者就经常在留意台湾学者评论大陆学者的书评。这些书评通常批评得很

直率。并非评论者的意见都有道理，但笔者还是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即大陆的学者确实很应该看看这样的评论。

台湾的学者是不是也一样尖锐地评论他们自己的同行呢？很遗憾，在我近年所能看到的台湾近代史界的刊物当中，这样的评论几乎没有。为什么？据说是大家不愿意伤了和气。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轻易地发表文章和著作（据我所知，台湾学者发表文章和著作远比大陆学者容易得多），同时我们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又得不到及时的批评和指正的话，我们自己的研究水平是不是会逐渐因为自我满足而止步不前，甚至日渐退化呢？

陈永发教授是笔者的朋友，并且可以算是笔者的学长。在读过他的这本大著之后，笔者也有过片刻的犹豫。但我还是冒昧地把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并不十分全面的书评写了出来。我很感谢陈教授同意我发表这样一篇尖刻的评论。我相信，善意的批评远比虚假的奉承更能使我们大家受益。

----

* 本文乃应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编辑部所约而成，并已刊登于该通讯。

[1] 如果考虑到郭华伦、王健民著作中附录的大量文献，陈书在字数上似乎还要远超过郭、王二位的著作。

[2] 当然，“快”并不是评价一个学者能力的标准。麦克法夸尔教授花了 14 年才完成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但没有人不承认他在美国中国现代史研究当中的权威地位。

[3]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8 年版，第 xi 页；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 年版，序文第 4 页。

[4] 仅以其“第一部分”前言之后的开篇一章“整风运动的缘起及其初期发展”中第一节“中共中央权力结构的改变”而论，就有若干硬伤。如称王明 1937 年底回国后“建议洛甫辞职”，“在王明提出建议之后，毛泽东则顺水推舟，主张废除总书记一职，另采政治局常委领导制”，“自此以后，毛泽东则可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直接领导党务”云，就不实。事实是王明回国后从未提议洛甫辞职，毛泽东亦不曾建议废除总书记一职，中共中央也从未采用过所谓“政治局常委领导制”，王明回国所带来的中共中央领导方式的唯一变动，就是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指示，加强了书记处的地位，重新划分了各自的责任范围，但洛甫仍是总书记，直到 1940 年洛甫才主动辞去了这一职务。有关洛甫辞职的经过，可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 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9 页，等。其他如毛泽东早就看重刘少奇，二人有“攻守同盟”，毛先是“支持”刘去恢复北方局，后“乘机派刘少奇到华中”“相机取得该地区的党政军大权”，“同时也派娴熟俄语的任弼时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进一步改善毛泽东和史达林之间的关系”，以及参加 1941 年 9 月政治局会议的人名、议程及内容等，都有不实。恕不一一加以辨正。

[5]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9－40 页。

[6]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0－222 页。

[7]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2－133 页。

[8] 前引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 152－154 页。

[9] 参见彭明、杨奎松：《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近代中国人物》，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 1985 年版，第 82－117 页。

[10]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第 8－10 页。

[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 页。

[12] 如第 68 页三注，说李大钊用无政府主义弥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足一注，说青年毛泽东思想中有矛盾思想一注，说张申府融孔子、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罗素于一炉一注。随后引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毛泽东对陈独秀观点的看法时，却不做注释。

[13]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2 页。

[14] 参见杨奎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八章（中国共产党观念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评《抗美援朝战争史》

四十多年来，有关朝鲜战争史的研究，在美、韩、日，以及在中国，都深受重视。尤其是各国军事研究部门，对此项研究更是不遗余力。已知美、韩、日都有大部头多卷本朝鲜战史研究专著[1]，并有相当多的专文具体讨论分析战役战例。不过，与中国的情况不同，西方国家中从事外交史、政治史和战争史研究的众多普通学者，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及其国际背景，对于它对相关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的影响等问题，都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讨论。[2]

在中国大陆，虽然迄今几乎没有朝鲜战争史的研究专著问世[3]，但十几年来从中国自身的角度，即从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这场战争主要进程的著作，也同样数量可观。引人注目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它们基本上都是由军队的研究机构和军队研究人员出版的[4]，真正由学术界发表的成果少之又少，有也通常只是讨论当时条件下的中美关系。[5]这固然与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在战争研究上具有专业特长有关，却也得益于他们在资料上占

有近水楼台之便。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成绩，可以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相关研究成果、回忆史料和档案文献资料的数量中得到证明。但是，过去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不足。第一是历史档案资料保存有限，一些关键性会议和重要事件没有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可资利用，回忆材料说法不一，再加上开放不够，以致留下诸多历史谜团；第二是军队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发表的成果，通常更侧重宣传目的，习惯于简单地论证“英明”、“伟大”，不大注重学术性，以致多数出版物容易千人一面，众口一辞，反映不出研究的深度，更缺少学术上的交流与交集。国防大学教员徐焰的《第一次较量》一书 1990 年出版以后，之所以会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几乎是能够对这场战争中志愿军方面历次重大军事决策，包括个别战役指挥的利弊得失及外交运用问题，大胆进行独立思考和深入反省的唯一一位军队研究人员。[6]

90 年代中期以后，即从 1994 年俄国开始对外开放它所保存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档案以来，国内和国外的朝鲜战争研究都明显地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这是因为，已经披露并被译成各种文字的相关档案文献，就已有数百件之多，而且相当部分都是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来往电报或会谈记录。如此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开，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新一波研究热潮，并引发许多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面对国外学者对事件和档案的种种不同解读，中国一些普通的研究者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对各种新公开的史料进行系统搜集和梳理，并尝试着做出自己的解读。[7]但十分明显，面对大量新公开的中、美、俄档案以及它们所提出的新问题，一向对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深具研究的军队研究人员的看法，更引人注意。令人欣喜的是，在中国出兵抗美援朝 50 周年之际，笔者终于读到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出版的洋洋 150 余万字的新著《抗美援朝战争史》（以下简称《战争史》）。

值得肯定的尝试与努力

军事科学院军史部早在 1982 年就开始集中部分研究人员着手编写抗美援朝战史，到 1990 年已几度修订出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以下简称《战史》）。但以往各版《战史》，与国外军方战史的写法近似，基本上以志愿军五大战役和停战谈判期间历次战役战斗的作战经过为主，而辅之以简单背景和经验总结作为全书开篇和结语。《战争史》一反过去的写法，全书 150 多万字，只有不足 50 万字讲述具体作战经过。也就是说，虽然书名较过去几乎只有一字之改，即从“战史”变为“战争史”，其编写内容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战争史》增写的比较引人注目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朝鲜战争爆发的过程；二、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的各种因应与准备；三、中国出兵决策过程；四、美国战争政策的调整；五、外交斗争；六、停战谈判经过；七、中国反细菌战与反登陆作战的情况；八、中国国内状况及其对前线的支持；九、落实停战协定；十、中国撤军问题，等。

写战争史，是否有必要把主要内容放在战争背景、外交斗争以及后方支持等方面，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凡了解近年来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在朝鲜战争研究问题上进展情况的学者都清楚，有关朝鲜战争各方作战史的研究，由于各自的战场统计数字相差悬殊，对话困难，许多年来并没有多少新的讨论。近年来有关朝鲜战争研究的深入与展开，主要是集中在朝鲜战争爆发原因与背景、中国出兵决策及其与苏联的关系、朝鲜战争期间的有关各国外交运用的

检讨，和促成停战的原因等问题上。《战争史》适应这一形势，用相当篇幅来说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理应得到肯定。

关于战争爆发问题，《战争史》基本上秉持以往的观点，但对三八线的由来、美苏两国军队占领期间的对立政策，以及南北政府在美苏军队相继撤出后为谋求统一所展开的激烈斗争，都使用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笔墨。过去有关这方面的说明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只强调一方"坚持'武力统一'"，另一方面"也做了必要的准备"，结果，"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注释 1，第 2－3 页）如今的写法，显然比以往《战史》的写法更容易让读者了解内中的复杂情形。不仅如此，《战争史》还第一次利用了新公开的俄国档案，在浓墨重彩地说明南方政府战争挑衅的同时，也具体地提到了自 1950 年 1 月以来，北方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等情况。[8]增加了这部分的说明，无疑将有助于解开许多读者过去长久不解的一个疑团，即为什么说南方政府不断扩军备战，对"北进"信誓旦旦，而战争刚一打响，迅速展开大规模攻势的却是北朝鲜军队？

有关朝鲜政府求援前中共中央"未雨绸缪"，预先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的情况，《战争史》的说明应该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各种相关著作中最为具体而详尽的。它很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向南方推进，整个军事进攻相当顺利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会那样忧心忡忡，并不惜迅速开始向鸭绿江边集中十几个师的庞大兵力，以备不测。（注释 1，第 24 页）[9]据《战争史》说明，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后，刚一得知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周恩来就明确向苏联人提出，中国将在东北集结 9 个师的兵力，万一北朝鲜军队被美军打败，三八线不守，中国就将派遣部队入朝协助抵抗美军。在 7 月 7 日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正式决定了组建东北边防军，就连将来使用志愿军的名称，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来的。而书中关于 8 月 4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谈话内容和 8 月中旬聂荣臻报告内容的引述，更有助于进一步说明中共中央当时的主要忧虑，确实是担心北朝鲜军队没有大战经验，无法与兵力不断增加的美国军队长时间抗衡，必须把中国的力量加上去，否则朝鲜战局难免生变。

作为军方的研究成果，《战争史》根据军方掌握的详尽档案资料，对部队准备期间政治动员、武器配备、后勤保障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做了具体的说明，不少内容引人注目。像当时多数部队都已担负了生产建设任务，官兵作战意识淡化，战备松弛，忽视训练，车辆及各种装具损坏严重，20－30％以上的武器和火炮锈蚀损坏，甚至麻雀已在炮筒筑巢。而有些人对与美国作战也存在着恐惧心理，比如害怕原子弹，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等等，都极有助于说明当时出兵入朝作战的难度。（注释 1，第 92－93，95 页）特别是对部队装备及其后勤保障情况的详细说明，更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入朝与美军作战的具体困难是什么。

有关出兵决策过程的研究与说明，是《战争史》一书最具争议也是颇具特色之处。根据以往的说法，金日成所派外务相朴宪永携带求援信于 1950 年 10 月 1 日赶到北京，10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注释 2，第 14 页）而《战争史》却提出，金日成派来的特使不是外务相朴宪永，而是内务相朴一禹；到达时间也不是 10 月 1 日，而是 10 月 3 日。因此，书中否认政治局 10 月 2 日曾经开会，指出开会时间是在 10 月 4 日和 5 日。特别是在关于由谁挂师的问题上，《战争史》也一改过去关于"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

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注释 3，第 736 页）的说法，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初考虑挂帅出兵人选时，首先考虑的是粟裕或林彪，并非只是一个林彪，而后来改为彭德怀，也不是因为他们害怕不肯去，而是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注释 1，第 159 页）

《战争史》中另一处表现作者开始力求实事求是的文字，是对志愿军作战目标问题的讨论。书中相当具体地说明了中共中央在志愿军最初入朝时原本十分谨慎，再三强调避开美英军队，专打南朝鲜军，以“停止敌人的进攻”，争取“在朝鲜北部控制一大块地区”为目标，并且不排除“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注释 1，第 3，15 页）第一次战役部队在朝鲜站稳脚跟后，毛泽东的想法已有所变化，开始相信志愿军虽然装备十分落后，但仍可对美军展开大规模战役行动，甚至设想一次歼灭美军一两个师，因而提出了要根本扭转朝鲜战局的设想，力争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一线。待第二次战役胜利，毛泽东和志愿军总部则均力主必须打过三八线。到第三次战役成功，部队占领汉城，逼近三七线之后，从志愿军总部到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又有了进一步变化。“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曾设想，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再经过几次战役，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不但是上层的考虑和在部队中提出的口号，而且也明确地确定为部队部署和准备的要求。”毛泽东甚至告诉斯大林说：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只有两种可能性：“（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二）敌人在大丘、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南朝鲜。”总之，现在志愿军的一切准备，就是争取尽快把敌人赶下海去，“解放全朝鲜”。《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认为，这种估计和方针是脱离实际的。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志愿军入朝后作战发展如此顺利，战场形势发展如此之快，这是中共中央在决策出兵时没有料想到的。”（注释 1，第 194 页）言外之意，中共中央虽然也再三强调战争的艰苦性，当时的想法还是太过乐观了。

学术上的欠缺与遗憾

《战争史》值得肯定的内容很多，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检讨，其中的不足与问题也十分明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和份量。

《战争史》最值得讨论的一点就是它对引文及其注释的处理太过随意。通常，各国军事部门编写作战史，因大量直接利用部队战报加以分析叙述，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注释资料出处者甚少。《战争史》一书的作者显然受此习惯影响，虽然在此书中试图按照一般学术规范对引文资料加以注释，但却没有一定规范，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如全书第一卷中引用美国政府官方文件，即《美国外交文件》中的文电，极其详尽，不仅注文不做缩写，而且不厌其烦，一则电文有时能分做三条引注。[10]然而书中引用俄国档案处，除少数例外，大部均未加注释。少数注释者，也不按照规范注明引文资料的原始出处和转引出处。甚至就连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文电，也不时出现想注就注，想不注就不注的情况。[11]即使是那些直接引自原始档案的资料，作者的处置同样随意性极大。如对 1950 年 8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的谈话内容，作者在 60 页连注两条，且使用的都是直接引语，显示其来自原始档案。但在 90 页再度提到此会及其发言内容，却只是将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历史的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有关文字全文照录了事，既不加引号，也不做注释，结果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真的看过原档，前面的注释是否真实。

引文注释规范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问题。尽管中国多数学者目前还没有条件直接查阅档案以检验某些著作中的某些引文的真确性，但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要使自己的研究成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研究者就绝不能不加注释、不做说明地随意处理那些一般人目前看不到的档案资料。况且，引文注释的随意性，通常一定会伴随着对引文处理和解释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不可避免地会使整个研究的基础发生动摇，从而使读者对其研究成果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从根本上发生怀疑。遗憾的是，《战争史》一书就明显地存在着这种情况。

就引文处理而言，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该书第一卷在直接引用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时，在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改动了电文原来的排序。原文总共八条，该书引用时将其删成六条，除最后一条节略不予说明尚属正常外，其中第四条被删去理应照惯例以“节略”说明，书中引文不仅没有说明，而且后面的排序也完全改变，（五）变（四），（六）变（五），（七）变（六），以致使读者误以为这一引文即是历史原貌。（注释 1，第 153－155 页）

当然，对 10 月 2 日电报做如此删改，始作俑者多半是《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之编者，以后各种文集均照抄不误，甚至写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12]但这种不顾历史真实擅改历史文献的作法，不仅不可取，而且在国际上会造成相当负面的影响。《战争史》一书作者既然清楚了解电报原文，此次全文引出这则电文又有意不加注释，以显示作者并非引自公开出版物，而是直接来自于档案原件。既如此，为何不就此一错误稍加订正呢？毕竟，毛泽东这封给斯大林电报的真实性，近年来已因为在俄国总统档案馆发现了 10 月 3 日毛泽东另一封内容完全相反的电报，而受到严重质疑。为了向国际学术界证明此则电文的真实性，中共中央档案馆在两年前就已经将毛泽东这封电报手稿的影印件提供给了美、俄学者。从已经在海外公开的这一影印件可以清楚地看出电报的全貌。而被档案馆在影印时隐去的第（四）点，即批评北朝鲜方面的相当部分文字，也已在逄先知、李捷的新著中得以披露。[13]在这种情况下，不加注释，却又照搬原来的文字，显然不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作法。

就引文解释而言，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有关中共中央对志愿军参战后战局发展可能性的判断的说明。作者强调，在决定出兵的同时，中共中央估计战局发展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志愿军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协同朝鲜人民军，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有可能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队，从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第二，尽管中国军队是以非官方的志愿军名义参加的，但美国仍可能对中国公开宣战，或至少以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以其海军攻击中国沿海地带，并且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同时，由于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朝鲜不能大量歼灭美军，战争形成僵局，影响中国整个恢复和建设计划，引起国内许多人不满。这是最不利的结果。

“第三，在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的情况下，志愿军实施灵活的作战指挥，充分发挥自己在作战上的战术特长，能够在朝鲜坚持作战，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那么，有可能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注释 1，第 170－171 页）

有关此一说明的根据，作者特别注明是见于毛泽东 1950 年 10 月 2 日给斯大林和 23 日给彭德怀并高岗的两封电报。作者这里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毛泽东虽然希望根本解决朝鲜问题，但客观上需要苏联空军支援。如果没有苏联空军支援，战争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言外之意，毛泽东战前就已经预见到最终的结局。但凡熟悉这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决策复杂过程的学者，一眼就能发现，上述三种可能的解释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首先，把 10 月 2 日和 23 日毛泽东的两封电报简单地混为一谈，就事实逻辑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从 10 月 2 日到 23 日之间，中共中央仅就出兵问题就进行了多次讨论，意见也几经反复。不论《战争史》一书对此间的反复情况做何种解释，至少苏联空军出动与否对中共中央的形势估计影响甚大应无疑义。把毛泽东 10 月 2 日的形势估计与 23 日的形势估计，相提并论，甚至混为一谈，显然不妥。

其次，上述解释与毛泽东 2 日和 23 日电报的内容也相距甚远。就上述解释而言，第一种可能情况和第二种可能情况无疑是就 10 月 2 日电报内容概括而来的，但问题是细读电报，其中既没有谈到中国出兵作战要“在苏联志愿空军的掩护和支援下”这一前提条件，也从没有设想过要“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更没有谈到所谓“美国支持台湾蒋介石军队或美蒋军队联合进攻大陆”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毛泽东明确认为：“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换言之，毛泽东从实际考虑出兵之日起，就准备让美国连朝鲜和中国一块来打，决心要牺牲些“坛坛罐罐”。只不过，毛泽东相信：“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么，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对于战胜美军的条件，毛泽东着重谈到的，也主要是增加火炮数量的问题，他显然相信苏联可以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至于对制空权，其电报中虽有提及，却无一字言及苏联志愿空军参战问题，只是对自己的空军要到 1951 年初才能参战，表示出某种遗憾。纯粹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毛泽东才做了“最不利的情况”估计。电报的基本精神是，毛泽东相信出兵朝鲜是有利的，各种困难是能够解决的，即使应当考虑到“最不利的情况”，在他看来也主要是两军万一相持而成为僵局，可能会影响经济建设计划和部分人的情绪而已。（注释 4，第 539－540 页）[14]

第一、二种可能情况概括得不准确，第三种可能情况的说明同样与毛泽东 23 日电报的内容差得很远。就事情的逻辑本身而言，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的同时，已经因苏联不能出动空军直接支援作战，而将战争目标确定在逼迫美国与我进行外交谈判上，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直到五次战役结束之前，即使在作战效果最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都坚持拒绝与美国进行外交谈判，它又如何会在还未出兵之时就预先准备好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呢？而且，说不得不走谈判之路是因为苏联不能出动空军支援作战，与毛 23 日电报本身的内容对照也说不通。因为毛泽东在电报中并不认为空军支援的问题不可解决，只是认为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如何会以没有空军支援为前提来具体设想战争的结局问题呢？事实上，毛泽东在电报中所以提到“谈判”二字，也并非是从我们后来看到那种因为战成僵局，被迫以三八线为界相互妥协的情况出发的。他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敌人飞

机杀伤力不大，战局发展顺利，志愿军必定能够占领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以外的整个朝鲜半岛，到时候朝鲜问题将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二是“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总之，都将是胜利的局面，而非是妥协的局面。如果敌人飞机杀伤力太大，那么，不要说与美国不可能进行外交谈判，就是志愿军在朝鲜半岛的作战都将会陷入严重的困境。（注释 4，第 588—589 页）[15]

《战争史》一书作者对学术研究规范的生疏，还突出表现在作者过分自说自话，述而不考的写作方式上。历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强调缜密考证，反对不看对象，自说自话。何况有关抗美援朝问题，许多史实早有说法，要做出新的解释，不仅要自己能够前后一贯，不致自相矛盾，而且一定要对前人的说法加以考辨，以证明自己言之有据，确能自成一说。否则，既不考辨，又不善于逻辑分析，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读起来就会疑窦丛生，如堕五里雾中。

比如，书中再三说明南方穷兵黩武，扩军备战，战争爆发前部队已达到 15 万多人的规模，北方的人民军却只有 13.5 万人。而读者看到的结果，却是战争一打响，北方气势如虹，摧枯拉巧，几乎不废吹灰之力就一举拿下汉城并直下釜山，虽然书中讲明北方也做了进攻的准备，但按照书中的描述，北方的兵力及装备似乎都不如南方，对此不加解释，还是多少有些让人费解。况且，比照已公开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已经出版的国内著作，实际情况均与《战争史》中所说明者不同，国内外学术界多认为战争爆发前北方的军力早已大大超过南方，甚至北南两方的力量对比已经达到兵力 2：1，火炮 2：1，机枪 7：1，半自动步枪 13：1，坦克 6.5：1，飞机 6：1 的程度，所以北方才会初战即取得赫赫战果。[16]对此，《战争史》不做任何考据和说明，势必使看过其他著作的读者倍觉困惑。

比如，书中谈到 1950 年初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称，由于其“已无法挽回在大陆的失败”，“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美国当局只好无可奈何地面对中国的现实”，不仅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公开宣布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岛屿防御圈不包括朝鲜和台湾在内。但之后突然笔锋一转，称“美国的岛屿防御圈战略，并不意味着放弃台湾，而是等待时机，随时准备寻找借口，实施直接军事入侵。”其提到的理由是，美国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中都留有伏笔，如继续给蒋介石集团以经济援助；不称台湾而称福摩萨；强调无意干预海峡两岸目前局势时，特别加了“现在”一词作为限制。说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以台湾地位未定为由，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就是“借此机会实现其对台湾既定的政策”，准备“制造中国的分裂”。如此简单化地说明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不仅太过牵强，前后叙述自相矛盾，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作者突出描写的，中共自 1949 年 7 月以来制定的攻台计划及其各项准备的根本性的批评与否定。因为作者随后即写道，中共中央因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决定停止攻台计划，是完全正确的。原因是：“在缺乏充足的海、空力量掩护下进行渡海作战，很可能变成一场灾难”。（注释 1，第 27，29，33，61 页）假如上述说法都能成立，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中共中央当初的攻台计划带有太大的冒险性，完全没有能够正确地判断出美国正在“等待时机”，“寻找借口”，以便“实施直接军事入侵”。幸亏爆发了朝鲜战争，才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可怕的军事灾难。这是否就是作者的意思呢？

又比如，书中谈到朝鲜劳动党政治局 9 月 28 日紧急会议决定求援，不加分析地使用了“同时”这一概念。说朝鲜方面“在向苏联请求给予直接军事援助的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注释 1，第 148 页）但从文章叙述的过程之中，读者却吃惊地发现，朝鲜方面最初其实并未向中国提出同样的请求。28 日会上通过的是以金日成和朴宪永名义给斯大林的

求援信，要求苏联援助，或由苏联方面帮助组织中国等国家的志愿人员参战。苏联方面 9 月 30 日收到这一求援信，并于 10 月 1 日凌晨 2 时 50 分送至斯大林处。斯大林当即给苏联驻朝鲜大使及军事总顾问发电，要他们转告金日成和朴宪永，苏联不能参战，只能设法组织志愿部队，而这也必须直接与中国同志去商量。同时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国方面能派五六个师出兵朝鲜救援。只是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才于 10 月 1 日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正式向中国方面求援。10 月 3 日，其特使才到达北京向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转达朝鲜方面的请求。

再比如，书中提出，由于带有金日成、朴宪永联合签名的求援信来京的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到京时间是 10 月 3 日，也由于在京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尚未到达北京，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2 日并未开会，会议是在 10 月 4 日召开，5 日结束的。但奇怪的是，书中也未提到 2 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其表述的方式，似乎 4 日以前中共中央并未开过专门的会议研究出兵问题。然而，几乎所有谈到志愿军出兵问题的书都相当肯定地指出，10 月 2 日下午中共中央曾召开过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形势和出兵问题。（注释 5，第 14 页）[17]《战争史》对此不置一辞，也不做任何考辨以证明自己的说法源自何处，有无史实根据，至少在学术上是不合要求的。

上述所列，仅为第一卷中内容，所涉及的文字还不足全书的五分之一。限于篇幅，本文自不便再一一举例，但这里仍应就太过明显的战史方面的问题再举一例。这就是，书中谈到第二次战役全歼新兴里美守军问题，与自己过去的说法出入极大，同样未做任何说明，令人费解。10 年前，同为军科院军史部所著之《战史》一书明确写道：第二次战役中防守“新兴里之敌为美第 7 师第 32 团和第 31 团第 3 营及师属炮兵营”，12 月初被志愿军全歼。过去国内有关抗美援朝战史书也多持相同说法，认为此次作战歼灭美军“一个团部、四个营”，甚至有说此次作战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志愿军成团建制歼灭美军的唯一战例”的。（注释 6，第 400 页）如今，《战争史》一书不加任何说明、不做任何考证就改变了以往的说法。称“新兴里战斗，志愿军全歼美第 7 师第 31 团”，“共歼敌 3191 人，击毙美第 31 团指挥官麦克里安上校和继任指挥官费斯上校”，“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 1 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18]一般说来，战史中双方统计的伤亡数字通常都会有很大差距，即使是具体的交战双方的部队番号也难免会有个别差错，对此细节也许可以不必特别在意。问题是，有关中美两军作战死伤数字及比例，原本就是容易引起极大争议的问题，作者又特别强调此战之意义，更断言此次作战为志愿军全歼美军 1 个加强团的“模范战例”。此战如此重要，若连被歼部队番号都没有弄清楚，甚至变来变去，岂不贻笑大方？对于这种十分重要，且直接关系到志愿军荣誉的问题，如此轻率地改来改去却不加说明与考证，即使不从学术角度考虑问题，也是不妥当的。[19]

值得深入探讨的两个问题

目前，即使排除个别否定参战为必要者不计，史学界在有关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上也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国内多数学者中间最主要的分歧有两个：一是在入朝作战乃至后来的各项重大决策过程中，对苏联方面的作用应如何估计[20]；二是在前几次战役进行过程中，有无因过分看重军事上的暂时胜利，没能抓住重要的外交机遇，造成了不必要损失的情况。对于这种分歧，《战争史》一书的作者理所当然地站在传统观点一边，也就是坚持：第一，志愿军入朝作战及其所有决策，都是独立自主做出的，与苏联无关。第二，

志愿军在朝历次战役决策乃至整个外交处置都是绝对正确的，联合国 1951 年 1 月的停火提议并没有为志愿军在军事上取得休整提供任何外交机遇。[21]在《战争史》一书中，作者同样坚持了这样的看法。但坦率地说，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及其结论明显地值得讨论。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最容易反映出《战争史》一书作者对苏联作用太过敏感的，就是书中对 1950 年 10 月 2 日和 3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两封内容相反的电报的解释。

1950 年 10 月 2 日电报的问题，早在几年前就曾引起过国内外学者间的争执。原因是中国学者一向按照档案公布者的说明，认为这则反映毛泽东出兵决心的电报已经发出。然而俄国学者在斯大林个人档案中，没有查阅到这封电报，相反却找到了一封 10 月 3 日经由苏联大使转发给斯大林的毛泽东表示暂时不能出兵的电报。此事很快引起美、苏两国舆论的注意，并开始出现指责中国政府伪造档案的新闻报道，影响十分恶劣。鉴于这种情况，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同中央档案馆，对 10 月 2 日毛泽东电报手稿进行了严格的核对，确认公布的档案确为毛泽东手稿，并根据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相关电报发报通例与其他已发出之电报进行了比较，最终确认此则电报没有发出。随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非正式地向海外学术界提供了电报手稿原件的影印件，并进行了解释说明，此事近年来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基本上取得了共识。负责公布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近来出版的著作中，也十分肯定地说："这份电报没有发出"。[22]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共识，《战争史》一书的作者却基于怀疑俄国公开档案"有其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而坚持毛泽东 10 月 2 日电已经发出。坚持己见并无不可，但不做任何解释，就理所当然地把 10 月 2 日电当成是已经发出的电报来使用，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至于因为不同意说由于多数人 2 日表示异议，毛泽东曾一度改变态度，因而干脆不承认中共中央 10 月 2 日当天曾经开过会议，以便给人以党内争论发生在 4 日以后的印象，这就更难让人接受了。[23]

那么，《战争史》又是如何解释 2 日电和 3 日电内容的不同呢？书中这样写道："表面看来，毛泽东这份电报（指 3 日电－引者注）的意思与上一份电报的意思相反。实际上，毛泽东在这个电报里并没有说中国不出兵，而是强调了中国出兵援朝，可能会造成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个是靠中国出动几个师很难解决问题；一个是最大的可能是苏联也将被拖进战争。因此提出，最好'暂不出兵'，'准备力量'，这样'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毛泽东这个电报的根本意图不是中国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了解苏联方面对电报中所提两个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的态度。这个电报与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另一个电报不但不矛盾，而且恰恰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出兵援朝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这一问题上的深谋远虑。"因为中共中央必须了解："一旦美国对中国公开宣战，甚至苏联也被拖进战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将是什么态度。"[24]

一面坚持毛泽东出兵决策并无反复，丝毫不曾受过斯大林的影响，一面又强调毛泽东 3 日的电报根本是出于担心自身安全的目的而不得不预先探测苏联态度，再来决定出兵与否，这明显地有些自相矛盾。何况，毛泽东 3 日电与 2 日电真的只是表面上意思不同，内容完全不矛盾吗？

2 日，毛泽东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3 日他却说："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

2 日，毛泽东说："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

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3 日他却告诉斯大林：朝鲜只能让美国人占去了，“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于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但希望朝鲜同志能忍受暂时的失利，“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

2 日，毛泽东已经估计到美国可能会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并用空军和海军攻击中国大城市、工业基地和沿海地区，但他仍坚信出兵“是必要的。”3 日他却告诉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对中国宣战，更为严重的是“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因此许多同志认为必须谨慎行事。

2 日，毛泽东表示相信，只要初期防御能够顶住，等到苏联武器到达，将我军装备起来，就能够歼灭美国侵略军。而在 3 日电中，他却表示：“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对中国不利。

2 日，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而且说明：“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3 日他却表示说：中国只能出动几个师，“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 [25]

比较上面两份电报的文字，谁又能否认二者意思截然相反呢？当然，毛泽东在 3 日的电报中确实没有说过中国已决定不出兵这样的话，但他毕竟清楚地讲出了我们考虑“暂时不出兵”，和“我们不派兵援助”朝鲜同志虽然“于心不忍”，但“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请朝鲜同志“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这样的话。说此电只是为了了解美国对中国宣战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完全不合逻辑。何况，发电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如果明明已经决心出兵援朝，却偏偏要说一些自己作战没有把握，最好暂时不出兵，让朝鲜同志去打游击的话，以此来探测对方愿不愿意援助自己，岂不是南辕北辙？

其实，要证明毛泽东的“深谋远虑”，未必一定要证明毛泽东从来不曾有过思想反复。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回忆说，“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是毛主席一生中最难做出的决策之一。为了确定这一决策，毛主席多少天睡不着觉，反复思考”，[26]如果毛泽东思想上毫无反复与担忧，又怎么会表现得如此焦虑不安，夜不能寐呢？何况这种反复，很大程度上也不纯粹是由于毛泽东本人，而主要是考虑到党内其他领导人提出的问题与担心。毛之所以在 3 日电报中说：“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想同您商量一下”，也正是因为他内心其实并未完全放弃出兵的想法，但却拿捏不定，不得不反复权衡和比较各方面的意见。要听取自己最重要的盟友和武器装备提供者斯大林的意见，更是情理中事。一定认为说毛泽东出兵思想有过变化，就会给人以服从于“苏联压力”之嫌，恐怕是太过敏感了。

事实上，不知作者是否想到，因为想要否认毛泽东思想上有过反复，转而把 3 日毛泽东电解释为对苏联的“探测”[27]，结果反而会给人以毛在出兵问题上优柔寡断，扭扭捏捏，非要苏联表态兜底，又不愿把话讲明，以至于不得不拐弯抹角，用非常隐晦，甚至暗含不想出兵的要胁方式来逼迫斯大林亮出底线的消极印象。读者因此不仅不会明白作者的良苦用心，反而会认为毛泽东出不出兵有赖于斯大林的表态。这恰好走到了作者初衷的反面。总而言之，无论是过分强调毛泽东不受苏联影响，还是过分强调毛泽东对苏联的期望，都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自己的事情，当然是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在当年的斯大林看来也是天经地义的。但中苏两国既结为同盟，中国与美国作战又需要苏联援助并为后盾，中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必须与苏联方面取得一致，甚至尊重苏联方面的意见，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 2 日凌晨起草电报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对中国宣战，可能导致苏联被迫参战问题，当天书记处会上意识到情况的复杂性，因而次日接受了多数与会者的意见，收回了已经起草好的电报，另外对罗申转达了会议的不同意见，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正视这种情况，如实地描写这些历史，未必就会有损毛泽东的“深谋远虑”。

与对苏联作用的认识问题相比较，外交机遇问题上的分歧应当不是十分复杂。因为在战争过程中，真正存在过的外交机遇只有两次，头一次是 1950 年 12 月，由美国控制的联合国第一次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发生公开的意见分歧，13 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团联合向中国和朝鲜发出呼吁，并起草了《朝鲜和平方案》，主张立即停火；中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军撤离台湾海峡；南北朝鲜军队解除武装，由联合国成员国组成的少量部队和联合国朝鲜委员会留在朝鲜，完成选举后撤走。随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亚洲 13 国提案，提议立即成立三人小组商定可以在朝鲜实现停战的条件，以提交大会讨论。尽管这时志愿军在军事上的优势依然明显，美国及联合国军尚未从打击中清醒过来，军事上是否应该利用此次机遇促成停战，值得讨论，但利用联合国内部的分裂，从外交的角度做灵活的表态，争取同情，加剧联合国内中立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以便在万一军事需要时利用此种矛盾，在策略上无疑是必要的。而对于这一点，《战争史》一书似乎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书中较多地强调的却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期望，“愿意知道美国对中苏所提停战条件的意见”，“迅速结束战争的关键在美国”，“必须要美国表明它对停战条件的意见”，[28]如此等等，这显然搞错了对象。

第二次是 1951 年 1 月，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小组”正式提交了达成朝鲜停战和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五步方案，包括立即安排停火并确保它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发动新的攻势的准备；非朝鲜的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设立包括美、苏、英和中国四国政府代表在内的适当机构，讨论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在内的远东和平问题等。《战争史》一书中对五步方案的看法明显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它承认：这个五步方案“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维护远东和平还是有利的。”因此，“美国当局对这个五步方案感到左右为难”，又不敢否决，生怕在联合国内失去支持，最后不得不违心地投票赞成，暗中却期待中国反对。但它同时却强调：中国政府当时公开拒绝五步方案，也是完全必要的。理由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看透了这一点”，即“只要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美国就有可能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并武装日本，而谈判则可无限期拖延下去。”[29]这种解释显然有些自相矛盾，它在逻辑至少存在两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既然五步方案对朝鲜、对中国都有利，无论美国实际上态度如何，中国都理应欢迎和支持。只因注意到美国实际意图是想要“利用停战保存实力”，并不真的打算实践停火以外的其他四步方案，就断然拒绝，结果只能是拒绝了对自己有利的外交条件和那些本来可能站在自己一边的中立国家。美国不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中国赞成五步方案，却因为害怕美国以后不执行方案而公开拒绝，这无论如何不合逻辑。况且，美国既然因害怕失去支持而被迫投票赞成，未来停战实现后它也未必就能够完全否认其他四项方案，拒不谈判。而只要美国承认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可以讨论，即使美国采取各种方式拖延拒绝，中国在外交上也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并必然会赢得广泛的同情，为以后外交的开拓及中美争端的解决打下一个有利的基础。中国拒绝五步方案，导致原来赞同五步方案的多数国家转而支持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大会决议，也足以

从反面证明这种拒绝的消极后果。

第二，对五步方案的态度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外交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军事问题。即使外交上没有价值，也不等于军事上没有价值。从军事角度看问题，在 1950 年 1 月，究竟是美国更需要停战，还是中国更需要停战，这一判断的正确与否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国外交应对正确与否的关键所在。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关于 1950 年 1 月谁更需要停战的问题，已经是再清楚也没有了。志愿军自 10 月下旬开始发动第一次战役，至这时第三次战役结束，前后两个多月，部队几乎没有休整，在紧张的作战中，完全徒步跋山涉水长驱几百公里，其疲劳程度可想而知。再加上部队战斗损失严重，大批官兵冻伤，后勤补给又跟不上，致使志愿军与美军在装备、火力、空中掩护等各方面的差距更加突显，部队显然已经到了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的危险境地。就连彭德怀都已明确表示，打第三次战役就很勉强，若再不休整补充，继续作战，朝鲜战局难免会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第三次战役时志愿军已经推进到了极限。从此之后，第四、五次战役，志愿军都打得极其艰难，不仅被迫全面后撤，而且伤亡被俘人数大量增加。但是，在 1950 年 1 月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却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正如《战争史》一书所承认的，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的想法不是更实际，而是更乐观，更大胆，不仅准备再打一仗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对前线的危险形势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包括对彭德怀提出的困难，毛泽东也明确认为问题不大，说没有补兵，弹药不足，“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总之，绝对不能让敌人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封锁汉江。美国要想在“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也“是决不能允许的”。[30]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当时会坚持认为五步方案有利于美国保存实力并在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而不是认为五步方案是志愿军获得军事上喘息，保持住已经得到的土地和胜利的重要外交机遇。《战争史》一书既承认五步方案对朝鲜和中国有利，又承认 1951 年 1 月中共中央形势判断过于乐观，胃口过大，对美军的反扑和军事优势缺乏足够的估计，志愿军存在严重困难，但却不承认接受五步方案是在外交和军事上绊住美国手脚，使志愿军获得军事喘息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机遇，坚持必须以美国是否真心愿意谈判台湾问题等来作为应否接受五步方案的前提条件，这在逻辑上亦颇难让人理解。

简短的结语

坦率地说，笔者上述对《战争史》一书的批评和讨论，可能略过严格。因为在事实上，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集体编著的著作，通常并不属于学术研究成果的范畴。它们往往被赋予了较多的宣传教育的目的，甚至编撰它们本身就带有政治任务的性质。包括对《战争史》坚持当年一切决定与决策都无可争议地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这种态度，纯粹从学术的角度来讨论它们，都未必是很适当的。但是，就本书而言，作者的编写方式明显与以往的集体著作不同，它不仅大量使用了引文和注释，注意到遵循通行的学术规范，而且研究范围涉及美、苏、朝、韩各国，利用各国研究史料和学术成果甚多，这与过去单方面编写自己军队战史，用于部队教育和政治宣传时的做法大不相同。而作者在后记中的说明也反映出，他们也力图通过此书与国内外学术界相互交流沟通。既能大量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试图回答国内外学术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乐于看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批评与讨论。这也正是促使笔者大胆抛砖引玉的原因所在。而且，本文这里的批评与讨论，其实也并不仅仅是针对《战争史》一书的。笔者只是希望，通过对《战争史》一书中问题的批评与讨论，能够使研究者们更多地从学术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严格要求，力争使我们国内的朝鲜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史的

研究，也能像历史研究中的其他问题那样，逐渐形成有较高水平和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注释：

1、《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2000 年版。

2、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3、《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5、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6、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

----

[1] 已经由中译出版的美、日、韩大部头著作就有（美）沃尔特·G·赫姆斯：《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一战争爆发前后》（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韩）韩国国防部编：《朝鲜战争》（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朝鲜也有相应的著作，如《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朝鲜外国文出版社 1961 年版），等。

[2] 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章仅到 1986 年就达 2000 种之多。这里值得提到的两部在西方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著作为：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s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ailan, 1960;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

[3] 齐德学曾著有《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一书，但内容其实还是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决策经过。

[4] 由军方研究机构及其人员出版的著作，如姚旭：《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柴成文、越勇田：《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沈宗洪、孟照辉：《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当代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齐德学前引书等。

[5] 如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年版）。

[6] 在徐书之前已经出版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史的著作，除作家文学出版社 1989 年出版的叶雨蒙的纪实文学作品《黑雪》以外，均未引起太多反响。而徐书出版后，却立即引起日本、美国军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台湾报刊择要连载。

[7] 如青石：《1950 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斯大林力主中国出兵援朝》；《朝鲜停战内幕》，《百年潮》1997 年第 1－3 期。沈志华：《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 1995 年版；《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出版公司 1998 年版。

[8]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国内已有文章详加说明，如青石前引文。而特别应当提到的，还有张盛发的新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一书。作者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朝鲜战争”一目中，更为详尽地运用俄国新解密的档案说明了这方面的情况。

[9] 1950 年 8 月上旬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全部进入指定集结位置的部队，就有第 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4，125，126 师，及担任战勤任务的第 169 师和炮兵第 1，2，8 师，另外还配备有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团及一个高炮团。8 月中旬又增调另一个军（后确定为第 50 军）三个师编入东北边防军。9 月初更确定要准备动员部署 11 个军 36 个师，连同特种兵和后勤部队，共约 70 万人。第一线即集中 5 个军 15 个师的兵力。

[10] 如该书第一卷第 135 页，一则潘尼迦电报，只因叙述时分为三段，即分别列出了三条引注。但即使对《美国外交文件》及其他引自英文的注释，其引注也不尽统一，有注中文者，有注英文者，更有中英文混注者。

[11] 以第二卷第二章为例，其中引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文电约 15 条，注明者 10 条，漏注者 5 条，引注方式也颇不规范。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6 卷和《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等均照抄不误，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标明“根据《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刊印”以外，其他各种文集均写明“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3] 已经披露的内容为：“还在今年四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所有这些建议都未能引起朝鲜同志的注意，以致陷入敌人预先设好的圈套，人民军主力被敌人切断。”见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13 页。

[14] 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入朝作战给斯大林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2 日。

[15] 毛泽东：《关于朝鲜战局问题给彭德怀、高岗的电报》，1950 年 10 月 23 日。

[16] 《苏联外交部致苏共中央备忘录：关于 1950－1953 年朝鲜战争与停战谈判》，1966 年 8 月 9 日，转见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Fall, 1993, No. 3, p.16; Sergei N. 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s-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47; 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18 页。

[17] 并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00 页。

[18]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2 卷，第 121 页。

[19] 关于这一战例的问题，不仅在于当时新兴里美军团的番号，《战争史》书中关于继任指挥官费斯的军衔也明显是错的，费斯当时还只是 32 团 1 营营长，也不可能是上校军衔。另外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有被歼美军是否一个加强团及死伤的数字，也应考证。根据古格勒《朝鲜战争战斗经验实录》和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两书中的说法，当时负责防守长津水库东侧新兴里一带的美军为 32 团一营，31 团 3 营和 57 野战炮营，并非一个整团，也不是一个加强团。31 团另外的部队或与第 1 海军陆战团驻守下碣隅里，或被编入特遣队负责打通到下碣隅里的道路。另外，当时在新兴里方面的 32 团 1 营 1053 人，31 团 3 营人数相当，炮兵营人数较少，三个营的兵力只有 2500 人。32 团 1 营最后仅回来 181 人；其他两营伤亡比例也差不多。最后幸存者仅为 1051 人，而肢体健全者仅 385 人。换言之，三个营 2500 人，死伤达到 2115 人。在这里不清楚的只是，这三个营中是否还编有南朝鲜籍士兵。

[20] 在注重苏联作用的论文中，沈志华的《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颇具代表性。

[21] 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22] 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 18 页。

[23] 对于当天会议的形式，绝大多数学者，包括逄先知等，都表述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逄先知、李捷前引书，第 14 页，等。

[24]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1 卷，第 163－164 页。

[25] 同前引注 16；并见《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菲利波夫电》，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 45，卷宗号 1，目录号 334，第 105－106 页。

[26] 参见徐焰前引书，第 20 页。

[27] 见齐德学前引文。

[28]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2 卷，第 161 页。

[29] 前引《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2 卷，第 211 页。

[30] 转见《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2 卷，第 224－225 页。

著作者说

自从在《百年潮》连载《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以下简称《恩怨》）一书的部分章节以来，听到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反响。多数读者叫好，但也有少数读者提出批评。无论是叫好的，还是批评的，引起读者高度关注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即这本书对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做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新的解释。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科学的生命就在于创新，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持续发掘和深入的研究，不断推出具有新史实、新观点的历史著作，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也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性的学问有其存在价值的最重要的证明。《恩怨》一书因为史实和观点新而引起关注，包括引起一些批评的意见，应该说是好事。

笔者研究中共党史问题已有多年，出版的专著也有七八种之多了，自恃不少都深具新意。但像《恩怨》一书引起读者如此多的反响，却还是头一遭。想来一是写法取巧，如比较通俗易懂，标题有了一些包装等；二是本书的内容和题目容易引起多数读者的关心。毕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对不少读者有吸引力。

说实话，《恩怨》一书中所涉及的许多问题，笔者都不是第一次谈到了。但是，以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真正了解它们的只是少数同行，而且还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比较敏锐和勤奋的同行。换句话来说，不论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多么重要，由于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它们不仅经常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很多时候甚至连许多搞历史这个行当的教授、研究生也不甚了了。于是，我们常常看到不少同行在那里“炒冷饭”，写“假大空”的应景文章，而大批读者却在那些专事“揭秘”的“地摊史学”和多少有些离经叛道的港台政治历史类盗版书中，苦苦寻找他们所关心的历史问题的答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历史学家们辛辛苦苦发掘来的史料和研究的心得，有时反倒是靠那些以“剪刀加浆糊”生财的书商们，打着纪实的名义，缺胳膊缺腿地给推到社会上去了。

历史研究有必要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这似乎不应当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历史学家不能总是搞一些佶屈聱牙、高深莫测的东西，没人读没人看，只为了评职称，否则这个社会要历史学家干什么？问题是，长期以来，没有几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愿意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搞成通俗易懂的形式。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研究的成果都适合于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身在象牙塔尖的人，往往也不敢轻易把脚伸到地面上来，因为那很可能遭人诟病。记得笔者的一位搞民国史的同事，只因为越界搞了一部电影史，就好受了一顿批评，并且影响了评职称，又何况要把原本是庙堂之上的研究通俗化。不难想见，要使我们的研究保持相当的学术水准，同时又能够成为众多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东西，着实要冒一点风险。正因为如此，当《恩怨》一书印出来后，笔者内心反倒多少有些忐忑。

让笔者心存忐忑的，其实还不只是历史学界的态度。九十年代以来，俄国档案的大量公开，对中苏关系史，乃至对中国现代历史的研究，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恩怨》一书所以

能够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提出许多新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此。但利用俄国档案研究有时也会引起麻烦。记得两年前刚开始发表书中有关朝鲜战争的章节，就听到一个意见，说是文中太多的依据了俄国档案。有权威机构的专家甚至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特别谈了“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说俄国公开档案是有倾向、有选择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应当多利用中国方面的档案。

研究历史，特别是涉及到与核心政治有关的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利用档案文献资料的不便。任何国家开放档案都会有一定的限制，也会有倾向性，这是不必讳言的。问题是，美国等欧美国家的档案公开有法可依，除被认为事关国家安全的个别档案要适当延长保密年限外，一般 30 年一过就自动解密。自九十年代开始，俄国档案也基本上照此办理了。不过，由于那里改换了朝代，新政府对公开旧政府的许多秘密，有时反而更彻底。台湾方面公开档案的情况也大致相似。目前，最困难的反倒是查阅我们自己的档案。我们开放档案的时间按理说不比俄国和台湾晚，而且我们在八十年代就颁布了《档案法》，也规定了 30 年解密的时间界限。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开放党和政府的历史档案，还只是一种形式，即由政府委托的部门负责在大量档案中筛选出极少数加以整理和刊布，不要说一般人，就是相关学者也很少能直接前往有关档案馆调阅查档。在这种情况下，把我方已经公布的档案资料与有关国家已经开放的档案资料参照起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不可避免。

应当说，历史研究是没有国界的，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去研究，人家也会去研究。利用本国档案，与利用外国档案，在研究者本身并无多少分别。何况，《恩怨》一书其实还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方面公布的档案的。不论海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在开放档案时有无倾向和选择，两相参照，相信是完全可以得出客观的判断的。

当然，利用近年来大量新公开的档案文献来重新探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问题，还有一个容易让笔者心存忐忑的因素。那就是此问题难免会牵涉中共党史上的一些传统的说法和观点。由于中共党史研究曾长期脱离历史学的范畴，被提升到政治理论宣传的高度，成了政治运动的风向标和宣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直到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成为一切工作的重心以后，它才渐渐复归本行，有了从学术角度来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可能。但凡事积重难返，并不是所有人都习惯于在这个领域里听到不同声音的。

记得在《百年潮》杂志初发《恩怨》一书第一章的内容，旨在于对我们过去所熟知的一个观点，即“共产国际始终压制毛泽东”提出不同看法，强调：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崛升，除了其主观的因素以外，莫斯科的态度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有人表示难以接受，批评说，人人都知道共产国际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思想，并支持王明路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仅以斯大林或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直接地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个现象为根据，来证明毛泽东与共产国际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性，这种说法是不是太肤浅、也太没有说服力了？”

其实，莫斯科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是有变化的，而毛泽东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受到共产国际主席的高度赞扬，因领导红军和成功创立根据地被莫斯科批准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政治领袖，进而被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颂扬为“伟大旗手”，又是印讲话小册子，又是出个人选集，最后当王明争权时，国际领导人更明确表态支持毛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包括“左”倾中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背后虽然有国际“进攻路线”的错误影响，但莫斯科反对排斥打击毛泽东，并且坚持要利用毛泽东的丰富

经验，要宣传和提升毛泽东，也有大量文献可以证实。历史有时是很复杂的，有分歧不见得没有共同利益，有联系不见得就思想一致。

也许有必要指出，对于一部历史著作来说，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它的政治批判力如何强，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充分占有史料，并依据可靠的史料，将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描述清楚。对错谁属，责任大小，并不是一部历史书必须要讨论的问题。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两个字非常重要。如果研究者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和感情色彩，基于鲜明的政治功利主义，着眼于批判的目的，其研究就难以做到实事求是，许多问题的来龙去脉甚至根本就搞不清楚。以往关于中苏关系，特别是毛泽东与莫斯科关系研究的文章著作，之所以很多不尽人意，这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检讨的原因。

这里有个很简单的的例子。70 年代前苏联出版了早年曾经到中国来充当青年共产国际代表的达林的一本回忆录。其中引述了他在 1923 年写给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维经斯基的一封信，信中明确批评毛泽东右倾，说毛作为中央代表，在青年团中央全会上却主张加强对官员和乡绅的工作，宣称在贫苦农民中间工作很难有什么作为，实际上是在农民问题上放弃了阶级路线。按照我们通常所得到的印象，毛泽东生来就是站在左派一边的，在中共党内更是历来代表农民讲话，因此，尽管 80 年代这本回忆录在中国出版了，却没有人重视这则资料，甚至有些研究者公开认为这封信是伪造的。其实，这封信确实是存在的，90 年代我们在莫斯科的档案馆里就亲眼见到了这封信的原件。很明显，由于不重视，甚至有意忽视这样的史料，对毛泽东早年生平的研究就缺少了一段很重要的环节，就不可能完整和系统地说明毛泽东早年思想发展的轨迹。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当中是很多的。

容易先入为主是传统的党史教育留给我们的一个相当负面的影响。它使我们对复杂历史的理解往往会趋于简单化和概念化。凡事非此即彼，不是黑就是白。因为断定毛泽东从来都是革命路线的代表，因此任何反映毛泽东当年可能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革命"的史料一概不予置信；因为相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因此认定莫斯科必定支持当时的"左"倾中央压制毛、打击毛，根本否认莫斯科曾经器重毛、宣传毛；因为强调中国革命是"毛主席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因此一切以 1935 年遵义会议划线，过去统统错误，以后统统正确，坚称中共中央此后各项政策策略的制定再与共产国际无关，中国革命不仅再未得到莫斯科的任何帮助，而且是在抵制莫斯科错误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但是，历史真是如此泾渭分明吗？非也。读一读《恩怨》，读者会发现，这段历史实在复杂。毛泽东的受压与崛起，中国革命的失败与成功，很难说哪一方面与莫斯科没有关系。

除了传统党史教育的影响以外，还容易给读者，甚至给我们许多研究者造成极大困扰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当事人对历史的评说与回忆。中国社会，凡一统天下之时，都要搞"定于一"。毛泽东时代个人崇拜盛行，自然更是"一句顶一万句"。改革开放以后，否定了"两个凡是"，又强调实事求是，历史学家才有了思想的可能，但有些人也还是习惯用"尊者"之言来衡量一切，从而使任何试图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的研究都有越雷池之险。

但是，在摒除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之后，继续搞"定于一"是否有些有违历史大潮呢？仅以历史研究而论，其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当事人的观点和回忆一般不能被简单地用来说明历史，因为事过多年，再加上当事人通常都带有很强的主观倾向性和感情色彩，其评论和回忆难免会有失实失真的地方。至尊如毛泽东者，也不例外。例如，毛泽东在 1936 年向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口述自己的历史，其中谈到 1920 年他在北京期间读了三本书，说正是这三

本书促使他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八十年代后期，研究者们已经发现，这三本书，即毛泽东提到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这一年并未翻译出版。也就是说，不懂外语的毛泽东这一年不可能看到他说的这三本书。而将这一点考证清楚，以往关于毛泽东 1920 年春夏开始转变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说法，也就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了。对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做深入研究之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以往谈论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通常都是以毛泽东的看法为准绳的。因此，《恩怨》一书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从对毛泽东许多充满感情色彩的言论和回忆的深入考证与辩析入手，来展开这一纷繁复杂、色彩斑澜的历史画卷的。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从写作的技巧上考虑，层层设置悬念，以便引人入胜，也是为了避免大量重复那些人所共知，可以忽略的事实经过，以便对这一问题多少有些知识的读者能够直接切入主题，引发思考。

引发更多读者思考，可以说是《恩怨》一书真正想要达到的目的。除了让读者深入了解毛泽东与莫斯科，以及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变化经过以外，笔者希望众多读者能够读懂的意思之一就是：毛泽东是人不是神。1949 年以后犯过重大错误的毛泽东是如此，1949 年以前常常过五关斩六将的毛泽东也同样如此。既然是人，他就有成功，也有失败；靠能力，也靠机遇；可能“高瞻远瞩”，也不能不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心中不满，却不得不借力于莫斯科；虽然破釜沉舟，登高而呼，到头来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换言之，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经纵横驰骋，就倒装葫芦，断定毛泽东从来都有未卜先知、百战百胜的神机妙算；同样，也不能因为毛泽东曾经翻云覆雨，就认为毛泽东总是一步步不露声色地设计好了将对手一网打尽的政治陷阱。

可以肯定，有不少读者对毛泽东还是抱有某种神秘感的。寄希望从那些名为请下神坛，实为再塑金身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去体会其“平凡”，大概是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经常听到人们谈论毛如何深谋远虑，其实，看看《恩怨》一书讲述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相信不少读者都会发现，毛泽东与我们大家严格地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甚至他所犯的许多错误，也与我们日常所犯的错误大同小异。只不过，到了他那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小的错误积累起来都会酿成巨大的社会灾难。而在缺少制衡和监督机制的体制之下，他的错误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其自身难以发现和克服的。不要说聪明如毛泽东，换了其他人，也不会两样。

人活着就应该活得明白。希望这部旨在引发思考的《恩怨》可以让多数读者在这方面得到一些满足。

孙中山与日本关系再研究
——兼谈近代中国革命党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转变

（一）

我们从来都被告知，孙中山是“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这一概念，今天在中国已被用来泛

指对祖国的关切与眷恋之情。此关切之深，达到不惜以个人生命来捍卫，并能举全国民众共同来争取，即可谓之为“伟大”。孙中山敢为中国近代革命之先驱，成功地推进了中国民族解放的事业，称其为“伟大的爱国者”，当不为过。

但是，我们对历史的讲授或说明，往往太过简单化。简单化到动辄只提供给读者一方面的历史，让其只知其一，不其知二。比如对孙中山，一般的传记和评说都只谈其如何爱国，如何伟大，却不谈其赤手空拳打天下时，为借助于外力帮助曾不得不向野心的日本军阀和财阀许愿出让中国权益的情况。没有人会去想一下，这样误导历史，会不会使后来人把政治与外交概念化、简单化，使人以为要爱国，就要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做到最激烈，对外若有丝毫妥协退让，就是大逆不道，必诛之讨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殊不知，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党，恐怕没有哪一个不曾接受过外国的帮助，没有哪一个能够在对外问题上真正做到彻底的。

关于孙中山曾试图用租让中国满州地区权益或提供其他特权的办法，来换取日本军阀或财阀援助中国革命的情况，许多年前日本学者就先后撰文加以披露。对于这一说法，习惯于为尊者讳的一些台湾学者当年自然拒之唯恐不及了。奇怪的是，并未将孙中山奉若神明的大陆学者，很多人对此也始终抱以怀疑甚至否认的态度。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披露出来，不信不谈到底是不成了。于是，经过十多年深入发掘史料和细心研究，我们在 90 年代末终于看到了李吉奎教授的《孙中山和日本》与俞辛淳教授的《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两本专著，内中对孙中山出让中国满洲权益的问题颇多讨论。[1]

李吉奎教授的讨论，基本肯定孙中山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历次承诺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是事实，并对此类言行一一持以批评的态度，甚至提出了孙早期“民族意识是淡薄的”的看法。[2]俞辛淳教授则坚持传统的观点，强调已经发现的所有这类史料，基本上都还只是从日本一方发现的，“正如法官对人命关天的重大案件做出最后判决一样，对事关中国国家主权的这一重大问题做出结论时，必须具备有关直证和旁证的材料，但现在缺少孙中山的直证材料。”当然，俞辛淳教授是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很清楚，既然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重大秘密交涉，作为直接责任者的孙中山，未必会堂而皇之地自己把这种直接的史料证据保留下来。因此，他其实并不认为李吉奎教授的考证和叙说真的存在史实基础或事实判断上的错误。他的解释是，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不能简单地对孙中山的这种做法一概予以否定。第一，孙中山对日本的野心始终还是有所认识的，其“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是因为他必须优先考虑推翻国内政敌的革命任务；第二，孙中山即使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确实争取到了日本在资金和武器方面的一些援助，这对“革命的短期利益”是有帮助的。[3]

应该承认，俞辛淳教授的解释颇有些道理。说有些道理，是因为不仅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其实也都是一样，在他们势单力孤地开始其革命运动之际，多半都会向外国寻求帮助，也都或多或少地会得到外国的一些援助。列宁及其大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顺利回国，就直接得到了敌国德国的帮助和资助；中共早期更是因为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从莫斯科获取主要活动经费，而曾被国民党指为所谓“卢布党”。对于这种事情，纯粹要看你打算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比如，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这就未必有什么错。为此“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先安内而后攘外，自然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无论是德国资助列宁，还是苏联援助中共，都不是无条件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被援助的革命党在关键问题上要站在援助提供国的一边。比如，德国就是希望通过帮助布尔什维克夺权，最

终促使俄国与德国停战，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协约国，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确实通过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忍痛割地满足了德国的愿望。苏联也同样要求中共在中苏外交关系问题上要站在苏联的一边。如 1924 年春中苏两国政府谈判中，为推动解决悬案的外交谈判，共产党就对北京政府的对苏外交颇多批评，并且与国民党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坚持，中国方面没有必要坚持苏联必须从外蒙古撤兵，并且相信外蒙古人民应当享有民族自决的神圣权利。1929 年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强行收回控制在苏联人手中的中东铁路。一方面是举国舆论沸沸扬扬地支持这一“爱国”行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准备调动红军采取牵制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比较上面的情况，我们不难了解，如果我们因为孙中山有过这样或那样“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言行，就相信孙中山当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并不爱国，那就如同说列宁或中共不爱国一样，大概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二）

如今争论孙中山在对日关系问题上，有没有不爱国的言行，多以争论《中日盟约》的真假为关键。怀疑及否认论者似乎认为，只要找到了日本史料上的破绽之处，就可以澄清孙中山所受到的类似种种指责了。然而，事情真是如此简单吗？不要说中方直证材料无处寻觅，即使是围绕着日方史料的签字、印章真假问题的讨论，看起来也将旷日持久而不得结果。

《中日盟约》问题的经过在于，1915 年 1 月日本政府以赞成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求中国接受其“二十一条”要求。包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延长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的租借期限至 99 年；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军事、财政顾问；中国所需军械半数以上向日本购买，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由日本建造武昌至九江、南昌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湖洲之铁路；日本对于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包括船厂）有贷款优先权，等。注意到这种情况，有资料显示，孙中山马上于 2 月 5 日与陈其美一道，和日本人山田纯三郎等先行订立了《中日盟约》，内共 11 条，与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相近。如盟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在发现袁政府刻意将消息泄露，引起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应，日方大举增兵中国进行威胁，孙甚至更进一步于 3 月 14 日具名写信给小池张造，将此盟约送交日本外务省，恳切表示：贵政府与袁政府的交涉手段，只能暂时给日本带来收获，却必定会使日华之疏隔日益扩大。而《中日盟约》，则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两国友好问题。

对于日方史料的上述记录，台湾和大陆学者歧见颇多。但很少有学者考虑过，孙中山此种记录的有疑无疑，未必一定要把这一两件史料考据清楚才可能获致答案。事实上，不仅日本方面有诸多记录孙中山类似言论的史料，而且事实上孙中山也是有过类似的行动的。比起讨论个别可能有争议的史料来说，那些具体的行动本身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比如 1895 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谈判《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之际，康有为等在北京上书建言变法强国，孙中山却看准清王朝自顾不暇，乘机在广州策动起义。策动起义也罢，毕竟也可以算是“爱国”的一种。然而，他为了起义，却数度前往交战之敌国日本驻广州领事馆，再三恳求日本政府为其提供武器援助，以帮助他推翻当时风雨飘摇的满清政府。

比如 1911 年孙中山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消息后，绕道欧洲回国，首先即电召日本友人在香港接船，然后与大批日本人同船抵沪。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仅在财政、银行等方面求助于日本财阀，而且很快就任命了大批日本人，包括极力主张策划满蒙独立的日本浪人头目内田良平，来做自己的经济、法律、海军和政府等各方面的顾问。

又比如 1915 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强夺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东半岛及其胶济铁路，孙中山当即委派党务部长居正前往刚被日军占据的青岛去成立在日军庇护下的"中华革命党东北军"。为此，孙中山全力疏通日本官方，很快得到了日本占领军的支持，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并任用了大批日本浪人、学生，甚至日本军人。这支以日军占领区为后方的革命军，一度攻占了山东昌乐、安邱、高密、益都、昌邑及寿光等县。只是由于袁世凯很快去世，日本政府改变态度，孙中山才没有能够在日本浪人和军人的直接帮助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和战果。

了解到孙中山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向敌国日本求援，辛亥革命一成功就大量聘用日本人做自己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军事顾问，以后更公开依靠日本侵略军的支持来反对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人们固然可以继续研究《中日盟约》的签字、印章之类的真假问题，并各执己见，但如果试图用否认其真实性来使人改变对孙中山这一时期对日态度的看法，至少不会有太大的意义。

（三）

如何理解孙中山当年的这些做法呢？俞辛淳教授强调要注意到孙中山之对日有策略上的考虑和态度上的变化，反对从"思想认识论"的方法出发，把历史人物的言论行动与其思想认识的水平简单地等同起来，但是他却并没有真正跳出他所批评的这个"思想认识论"的框框。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进而推断说孙出让满洲权益之类的言行是基于"革命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策略手段，也就是把用人物言行来推断人物思想的方法倒过来，用人物思想来倒推人物言行的动机罢了。[4]何况，俞教授关于"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这一判断，说起来其实也只是根据孙中山的一些只言片语所推断的孙中山的思想认识而已，其未必比李吉奎教授等人从孙出让满洲权益的言行，所得出的孙民族意识淡薄和对日侵略本质认识不清之类的推断更加有力。

当然，说"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对不对呢？至少也不能说错，因为俞教授确实找到了一些李吉奎教授等不大注意的孙中山对日求援期间批评或警惕日本的片断言论。但俞教授和其他许多为孙中山辩护的学者忘记了一点，即"孙中山对日本侵华有一贯明确的认识"，却并不等于孙中山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一贯明确的概念。

研究历史，最要紧的方法，是要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它们当时所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孙中山所处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是中国刚刚开始接受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准备重塑中华国家的那个对主权和领土概念正在熟悉和形成过程中的十分混乱的过渡时期。同其他中国的志士仁人一样，孙中山最初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主权和领土概念，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孙中山最初成长的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帝国，国家及其权利，从来都是少数人之私，或予或夺，任由其便。正如慈禧辛丑年对列强之作为，爱国也好，卖

国也好，在其眼中，都与国人无关。

如果要拿我们今人的观点来看当年的孙中山，李吉奎教授所说孙中山最初革命时“民族意识是淡薄的”，自然是有道理的。回避或者隐瞒孙中山当年不那么“爱国”的事实，实在大可不必。对历史上的问题，关键在于理解。此即所谓不为古人讳，但为古人解，这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条原则。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话可以记在这里。他说：今人研究历史，首先要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脂，表一种同情。”在这里，“同情”两个字或许容易给人以太强的感情色彩，因此我更愿意用“理解”一词来对其稍加限制。即对历史上的人或事，应在理解的基础上表一种同情。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孙中山当年对日本的态度，我们应当能够发现，这种理解的同情态度也许比什么都重要。因为众多学者之所以极力为孙中山辩诬，不承认孙中山曾经不那么“爱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在用今人的观念来要求古人。他们以为，既然孙中山最早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到了列强瓜分的危险，他自然也就是最爱国的。问题是，在当时的孙中山看来，无论是暂时出让满洲权益，还是引入日本顾问，借助于日本援助，与爱国并不矛盾。因为，孙中山当时内心里想要去爱的那个国，既不是满清统治的大清国，也不是袁世凯后来闹帝制丑闻的那个假民国。

习惯于把国家看成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私物，相信这个国是你的，那个国是我的，牺牲你的国，不等于牺牲我的国，在近代民族主义生长过程中绝难避免。专制皇帝如此，革命者也莫不如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近代任何民族国家的形成，都需要经历相当的过程。不仅要经历一个大多数人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启蒙，逐渐认同自己的特定国民身份，进而自愿履行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义务的情感归属过程；而且还要经历一个对现代意义上自己国家主权和领土范围的认识和界定的过程。想当然地把我们今天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理解与当年孙中山的理解混为一谈，只能是对历史的不求甚解，是不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意识”，并非与我们这个民族与生俱来，而是要经过许多年的生长和发展才可能成型的。

以当年清王朝签订不平等条约为例，难道所有那些主权丧失和领土租借都是列强威逼索取的结果吗？深究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相当一些问题的造成根本上就是清王朝缺乏主权领土意识，害怕麻烦，主动放弃的结果。像治外法权的让予，协定关税办法的提出，最初都是清廷图省事的自以为得计之作。包括最初在广东沿海租让一两个小岛给洋人屯货暂居，不也是不愿意开放口岸，害怕洋人进城的结果吗？堂堂国家之代表清廷上下尚且如此认识，一个单枪匹马，一意以整个国家为敌的造反者，又如何会为自己的革命设定不切实际的斗争目标呢？

革命的最高目标就是夺权。要夺清廷之权，根本上先要找到国内大批志同道合、不满清廷者做革命的动力。但直至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签订割让辽东及台湾的《马关条约》，除了康有为等近千举人利用京城会试举行“公车上书”，建议拒和、迁都、变法之外，国内各地及其各界人士，何曾有过任何对清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满的抗议行动呢？拿我们今人的眼光去想象甲午战争及其随后的“瓜分狂潮”一定带来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既无助于了解康梁维新派何以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颇多期望，也无助于了解孙中山最初的革命何以完全不拿清廷的“卖国”做文章。十分明显，这个时候孙中山最关心的还不是日本与其他列强侵略的危险，而是如何利用国内满汉矛盾，运动带有“排满兴汉”色彩的南方秘密会党来帮助自己推翻清廷的统治。其从 1894 年创立兴中会，到 1905 年创立同盟会之后，十余年里始终高举“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也清楚地反映出他这时的中华国家观，并没有

与大清帝国完全重合。其中满蒙地区是否已确定无疑地列入其必欲保全的未来中华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之中，就颇成问题。

既然孙中山相信革命的目标首重“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凡有利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者，孙中山都会举双手赞成。即使它可能会对现存的大清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有所损害，也没有妨碍。同样的情况，当孙中山发现袁世凯当政的民国徒有虚名，非彻底推翻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国时，他自然也就不会在意借助于日本人之手来打击北京政府了。这也是为什么孙中山会在中国甲午战败之际向敌国日本求援，而 1915 年又会在日本占领军支持和武装下对北京政权发动军事进攻的重要原因。对此，唯一可以做出的解释只能是，孙中山确实不爱国，因为这个国在他眼里并不是自己的国，而是满族统治下的大清国，和袁世凯统治下的假民国。他想爱的，则是其计划中且日思夜想的，按照他的主张并由他的党所领导的那个“中华民国”。

（四）

用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来代替现实中的这个中国或那个中国，以至于有意无意地把党派利益与国家利益相重合，这使得近代中国为本党牺牲彼“国”的现象层出不穷，也使得谁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三四十年代国共之争时尚且如此，更遑论处于中国民族国家尚在萌芽，民族主义初起之际的孙中山？

为有助于理解孙中山当年对日行为逻辑的内在合理性，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至今仍会受到一些台湾学者批评的抗战时期共产党“不爱国”的问题。他们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共产党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和在敌后扫除异己势力的问题上，同时也有批评共产党不惜“出让”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比如，1941 年 4 月 13 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这件事自然引起当时的中国政府，即重庆政府的严重不满，然而共产党人却对这一条约明确表示欢迎。[5]同样的情况，1945 年 8 月 14 日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同意外蒙古独立和租让旅顺港等有损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党方面对此耿耿于怀，共产党方面的态度也明显与之不同。如果我们把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泛泛地当成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带任何党派色彩的父祖之国，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当然不能被看成是“爱国”之举。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共产党人的角度，也就是相信未来共产党的中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话，那么，共产党的态度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很清楚，共产党人并非不爱国，当它准备建国伊始，中共中央马上就向苏联政府提出了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强烈愿望。此举尽管未能成功，他们还是通过外交努力，很快就收回了被国民党租让出去的旅顺军港及交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此后，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中国与共产党苏联之间更是磨擦矛盾频频，终至关系根本破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却也还是因为共产党坚持“爱国”，因为他们相信，非如此则不足以维护中国的国家权益。

其实，在历史著作中以“爱国”或“不爱国”作为一种道德尺度，来评判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政治斗争各方的是非优劣，是一种极不科学的作法。文革后一部名为《苦恋》的电影遭致禁演，就因为其中表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对“我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的痛苦与困惑。其实，这段话不仅混淆了“祖国”与“国”的区别，而且头一个“祖国”与后一个“祖国”也远非同一个意思。这也就正如今天世界上的华侨，大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中有些人却未必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祖国”和现

实中的“国”混淆起来，就会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就把他们视同为“不爱国”。这当然是非常不妥的。

必须指出的是，历史上几乎任何取得了中央政府资格的党派政府，通常都会以煽动“爱国”心的办法，来作为动员民众和取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一种重要政治手段。当年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是如此，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也是如此。我们绝难依据是否响应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来判断历史人物的爱国与否。因为，从对父祖之国的角度而言，这种爱国其实未必就是真爱国。与此相反，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力主欧洲各国共产党引导工人群众抵制战争，鼓吹失败主义，停战后更宁愿割地求和；一些德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帮助敌对国美国制造足以摧毁自己出生国的原子弹等等，这些看起来近乎卖国的做法，其实又未必是不爱国。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复杂。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爱国”甚或是“爱国主义”的问题呢？霍布斯鲍姆的如下看法或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参考。他说：“爱国主义最原始、最革命性的概念，乃是以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因为这种概念来自主权人民，也就是说，国家是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爱国主义者们“所效忠的‘父祖之国’（patrie）并不是现存或先前存在的国家，而是经由人民的政治选择所创建的‘民族’，这些人民借由民族的创建，打破或至少是疏离了他们与旧权威的关系。”“在这个定义下，民族乃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公民才会真心觉得国家是‘我们自己’的。”即在民众的眼中，这个国家理应与过去私利与特权的国家相区别，即应当是公益和公利的代表。[6] 换言之，理想意义上的“爱国”或“爱国主义”，首先就要确定：这个国家是否是经由人民自己的政治选择，并事实上是经由人民自己来行使治权的，代表全体国民自己利益的国家。

（五）

“以人民之名来行使治权”，这是近代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革命党人势必要高唱的口号，也是自孙中山以后凡中国革命党人都必定要高揭的一面旗帜。正是因为必须打出人民的名义，因此，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益觉醒，那种把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的利益简单地混同于民族国家利益的作法，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逐渐受到某种制约了。

民族主义的觉醒未必会为民主政治开辟道路，但立志于创建民族国家的各个政党，不得不以人民的名义进行鼓动和号召的现实，却自然而然地会激起国民要求参预和监督国家政治外交的强烈愿望。民族主义的动员幅度越广，国民对国家大政方针，特别是对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重大外交事务，关心参预的渠道和程度也就会越多。所谓国民外交运动的兴起，也就难以避免。由于广大国民开始具有监督和参政的渠道，过去那种个人的，乃至于党派的民族主义意识，自然要受到整个国家的，也就是国民整体民族主义意识的影响和制约。换言之，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日渐发展，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来处置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的历史，势必会开始发生改变。任何对公认的父祖之国的利益的严重背离，都难免会直接危害到其政权（甚或政党）的合法性。孙中山 1919 年以前十年对日秘密交涉的作法，到“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骤然停止的这种变化，就清楚地显示了来自民族主义觉醒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的作用。

“五四”以后的孙中山在对日问题上发生怎样了的态度变化呢？在此之后，孙中山固然也还曾向日本要求过援助，但却再也不曾有拿涉及主权和领土一类的国家权益做交换的记录了。

不仅再没有这种记录，而且孙中山还开始公开声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以及 1895 年的《马关条约》，斥责日本占据胶东半岛，甚至要求日本应于旅顺、大连 25 年租期满后，即 1923 年以后即应“退出满洲各地”。[7]和 1918 年以前孙中山所留下的那些以满洲等权益为诱饵要求日本援助的种种记录相比，这一变化实有天壤之别。

孙中山为何会突然改变了过去的作法？当然是因为“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爆发；参预“二十一条”对日交涉的外交官被殴、官邸被焚；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迫于国内民众压力拒签和约；学生、商人乃至工人空前动员，对野心日本同仇敌忾，罢课、罢市、罢工，并实行抵制日货运动。所有这一切，不仅标志着中国国民中民族主义的极大觉醒，而且标志着过去一向由一家一姓或一党一派操纵的秘密外交时代，已经开始要步入“国民外交”的时代了。从此之后，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党组织，都再难背着国人牺牲父祖之国的重大权益而不受谴责了。孙中山当机立断，改弦更张，既是情势所迫，也是顺应潮流，转而引领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有远见的政治谋略。当然，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孙中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意识开始明确起来了。

这之后，孙中山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有过的最大的妥协，大概只有 1923 年《孙文越飞宣言》一件了。为了取得苏俄的援助，孙中山当时声明同意在中国政府无力阻止白俄利用外蒙反对苏俄的情况下，“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但十分明显地，孙中山坚持了外蒙主权应当属于中国的前提条件，并迫使越飞明白承诺：苏俄无意“使其与中国分立”。[8]也正因为如此，当 1924 年春中苏外交谈判时，孙中山对共产党人力主应予外蒙古人民以民族自决的充分权利的宣传，曾明确表现出强烈不满的态度。

当然，孙中山很快就去世了，我们无法预料在此之后的孙中山是否就绝对再不会为“革命的短期利益”，乃至于政权的暂时巩固，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了。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当拿我们今天对国家及其主权领土之类的观念，来评判历史。同样的情况，我们也不应当把爱国与暂时的妥协、退让和暂时牺牲部分国家权益的外交行为简单地对立起来，斥之为不爱国。历史需要分析，更需要理解。

----

[1] 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俞辛淳：《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2] 李吉奎前引书，第 6 页。

[3] 俞辛淳前引书，第 328 页；俞辛淳：《〈孙中山与日本〉评介》，《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4] 俞辛淳前引书，第 305－312 页。

[5]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941 年 4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3 卷，第 75-76 页。

[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会 2000 年版，

第 103-104 页。

[7] 李吉奎前引书，第 511 页。

[8]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52 页。

学术讲演

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

请问您是怎么想起要就这个问题特别是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作演讲呢？这个演讲所面向的对象是谁？眼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受到社会高度物质化、技术化发展的重重包围，面临着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人文学科的意义何在？比如说人们常常会问，研究历史到底有什么用？作为一个在大学里从事历史研究与教育的学者，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历史研究有用没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的论文有多少人看？写本专著，有多少人读？今天一本学术性历史论著，通常只能印到两三千本，多数还收进了图书馆。一篇学术性历史论文，读者通常多不过百人，少的干脆可能只有几人。如果你一生的努力不过如此，你自然会有人生价值的困惑？

不少前辈史家说，要做历史研究，首先就要能够做冷板凳。即所谓“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但要坐十年冷板凳，说的不过是要做好历史研究，需要打下一个好基础，没有长时间的积累不行。它既不等于现实生活允许你去做十年冷板凳，更不意味着你真的做了十年或二十年冷板凳之后，你的东西就会有更多的读者，会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如果你的研究远离社会现实，和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你坐冷板凳的时间并不会与你可能拥有的读者的数量成正比。因为，历史总是与现实生活存在距离的。尤其进入到一个越来越商业化、快捷奏的社会里，注重严密考据和需要大量去翻故纸堆的历史学，注定了只能扮演一个不为那些每日奔波于生计的普通人所重视的角色。

为了鼓励同学们学历史，几乎所有教历史的老师都会告诫学历史的同学说，历史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耐得住寂寞不等于自甘寂寞，更不等于应该要所有学历史的人都去自找寂寞。“人生几何，醉酒当歌”。在极为有限的生命小溪中，人能够成就事业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三四十

年。如果三四十年虽生活窘迫，形孤影单，但登高眺远，发聋震聩，引领潮流，也足堪告慰；如果三四十年饮食无忧，家庭美满，桃李纷芳，虽然事业的影响力可能仅及于个别子弟，倒也不无让人满足之处；如果因寂寞弄到生活堪忧，且被社会遗忘，辛劳半辈，寥寥可数的文章著作只能被人束之高阁，与白蚁、老鼠和灰尘伴舞，此生的失败就再明显不过了。

人的一生，总要有所成就。创造，然后享受。或者生活，或者事业，或者生活、事业兼而得之。历史学能够给人提供这种成功的机会吗？注意到今日教育体制改革之趋势，注意到海外诸高校师生之比例，注意到多数著名高校历史系本科同学中几乎没有以学历史为第一志愿者，将来历史研究怕是不仅后继乏人，而且要靠收费学生人数来维持生计的历史系部分教师的饭碗，或许都会成为一个问题。

那么，是不是说历史研究就真的没有用了吗？当然不是。要知道，历史研究有用没用，并不仅仅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论文、论著有多少人读。有人读没人读，或读的人多读得人少，关键还是历史学家本身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注意到今天历史研究的论文、论著鲜有人读，就断言研究历史无用。其实，只要注意到自 20 世纪末以来，一些报刊杂志的文章动辄呼吁维护传统史观及“正史”地位，提出有所谓“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的严重危险；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历代当政者都极端重视史官的工作，并且极力试图左右历史的记载与历史的教育，我们就不难了解，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目中，历史及其研究，不仅事涉个人、政党功过是非的评定，而且简直具有与国家运命几乎相等的地位。

历史研究之有用，尤其在于，无论有没有历史学家的参预，人们都会以各种不同方式去“研究”历史，历史的记载和教育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作用。这是因为，人会本能地希望了解自己的过去和现状的由来。人类之不同于动物，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具有知识兴趣、自我认识、道德规范、经世致用等种种主动的意识需求。没有历史学家的参预，人们即使通过文学、诗歌或口头传说等等，也总是想要记录或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知识兴趣）；想要认识和探究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会那样（自我认识）；想要用历史上是非善恶的事例，告诉世人及后人，理论上人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道德规范）；想要提醒或教会人们如何参照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经世致用）。

正因为人类对历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与历史叙说或研究的题材和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与这种历史叙说或研究的成果，能否表现成易于为今人和现实社会所接受的语言及其形式，密切相关。同样是学术专著，讲古代史的就不如讲现代史的读者多；同样是说明历史，写成诘屈聱牙的就远不如写成通俗生动的受众广。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和《柳是如别传》之所以能弄到广为人知，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读过这两部艰深的文字，而是得益于陆健东介绍陈寅恪最后 20 年生命轨迹的通俗文学作品。一部《雍正皇帝》的电视剧之所以能弄到街头巷议的地步，恰恰在于它的题材与内容搔到了当今社会政治的某些痒处。

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是否有用，或者说作为一项精神活动的成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自身能给社会提供一系列知识，满足人们关注自身的现实与未来的需要，而且还与其承传形式有关。不过，作为一门现代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研究活动，历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以规制严整的学术表述方式表达出来。那么在这种专业的、甚至是艰涩的研究与时下流行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乃至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二者之间，在价值体现上是否有所分别？

普通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历史小说以及纪实文学等等，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通大众的某种兴趣，有多种原因，这里面既有其形式为普通大众喜闻乐见，能够引人入胜的原因；也有它们中有些内容能够使人基于对现实的关怀而产生某些联想的原因；更有其某些内容能够解答一些人对历史的迷惑，满足一些人求知渴望的原因。但普通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毕竟与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在价值取向上还是有所不同。

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混饭吃，因为学了历史，研究或教学已经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论文论著更多的只是换取职称和工资的一种手段，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心。一种是个人兴趣，因为喜欢历史，喜欢从故纸堆中梳理出新的史实线索，找到区别于前人成说的那种成就感，并不关心别人怎么想，社会怎么看。一种是受责任心的驱使，因为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又学了历史，因此想要通过历史研究略尽自己做为社会一员的一点义务与责任。显然，在这里，我们所谈的更多的还是指后两种历史学家，尤其是能够把个人兴趣和社会责任感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家。只有这种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才可能基于扎实真实的史实基础，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说和总结历史，给普通大众真正答疑解惑。在这方面，那些历史剧、历史小说或传记文学通常是比不了的。

当然，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存在着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问题。没有适当的形式，再好的思想内容也表达不出来。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学术研究内容都可以通过通俗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生存于现代学术体系之内的学术研究活动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现代社会不能没有学术，真正的学术研究活动当然应当具有其独立、自由，能够超然于社会现实政治之外的，哪怕是阳春白雪的专业特性。但是，这并不等于学术的表现形式不可以多种多样。

形式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人创造出来的，历史学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的趋势，不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不反对有人坚持走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道路，就某些历史研究门类而言，如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等等，其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要求确实会高一些，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历史学家是不是能够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经常考虑一下自己研究的课题和内容所具有的意义，有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读者看懂这种强烈的意识。其实，把学术研究的成果尽可能地推广开来－并非是指一定要让“普通大众”所接受－未必与学者的学术志向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不同。大家所熟悉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 80 年代初推出中文版至今，仍旧不断有新版本问世，其销量无疑相当可观，读过它的读者相信不下几十万，有谁说过他的这部书不是学术著作？黄仁宇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台湾拥有大量读者，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在两点，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读了会有一定的启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为有知识的普通读者所接受。

那么，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是不是只能通过比较通俗的表述形式来表现呢？

这倒也不尽然。陈寅恪的东西今天的人读起来并不容易，但这并不等于说陈寅恪缺少对现实的关怀。哪一个历史学家愿意自甘寂寞，不想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现世得到回响，只寄希望于来世的人能读懂自己的文字？从历史上看，一个正直历史学家的寂寞，往往都是不容于社会大环境、大背景的一种无奈。陈寅恪晚年之所以“著书唯剩颂红装”，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两个清代女子生平故事的研究上面去，说到底还是因为生不逢时倍遭困厄，才不得不“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绝非其心之所愿。不见其诗云：“文章存佚关兴废，怀

古伤今涕泗流”？他哪里是不关心民族盛衰文化兴废，实在是他对现状充满了无奈，以致只能学乾嘉学派，钻故纸堆以远离现实而已。他内心深处振兴民族文化的抱负与志向，怕是比我们今天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大得多。从振兴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角度，陈寅恪坚持半文半白的书面语言表述形式，自有其意义，故无可厚非。

但是，历史研究毕竟不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多的还是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又恰恰是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才是广大读者关心的重点所在。而这种史事和人物的研究，并不要求历史学家们非用文言文或专业术语来表述不可。因此，形式问题就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争读者、争学生，乃至于争历史研究生存权的问题。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问题是，说明历史的工作，历史学家不去做，文学家，甚至是编书匠就会捷足先登。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早已被研究清楚的问题，完全不为社会所了解，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或历史小说当中旧说陈袭，却影响甚广。这种情况的造成，当然不能怪社会，怪他人，绝对是历史学家自己的责任，甚至应当说是历史学界的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我这里讲三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大约十年前，近代史研究所评职称，一位专职研究民国史的青年学者参评，本来写了一部关于民国电影史的专著，既属于民国研究的范畴，也是民国史的一部分，却因为被研究所的众多专家批评为不务正业，以致不敢填报成果。

另一例子是茅海建教授写过一本非常好的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名叫《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

再一个例子是我几年前为《百年潮》杂志编稿子时，发现许多好的专业学术论文，就是找不到几个能够改写成通俗文字的理想作者。找那些编书匠来改，文字倒是通俗了，原作的思想性不是被阉割，就是被弄得支离破碎不成思想了；找原作者来改，这些能够写学术论文的学者们往往费尽力气，改出来的东西不是扭捏造作令人不忍卒读，就是生硬呆板让人味同嚼蜡。

在这样一种历史研究的环境下，也难怪诸多历史学家纷纷都去钻象牙塔了。这不能不是当今中国历史研究的一种悲哀。

那么历史学家又如何实现其学术研究价值的同时表现其现实关怀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理应提到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即“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这一说法在于强调，历史必须由今天的历史学家加以重新体验和赋予生命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如何才能赋予历史以灵魂，使之有生命呢？要达到这一数千年来治史者所渴求的幽深境界，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用今人所能理解的情感和思想去重新体验历史，必须能够带着自己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去和历史进行对话。

史学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就历史的还原工作而言，要得出绝对准确和真实的景象是不可能的。今人所看到的历史，永远都只是过去史实的真实景象的部分缩影。能否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再现历史真实，取决于历史学家的良心（史德）和能力（史才），但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进行研究，和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进行还原工作，却要看历史学家具有怎样一种眼光（史识）。

选择历史研究的题材之所以重要，在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中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才能和生命的价值，历史学家就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远见与卓识。而任何一种远见卓识的培养，都与他对现实的关怀程度是分不开的。因为一个对现实缺少关怀，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的。只有立足于对现实的透彻和独到的观察，历史学家才有可能找到那些能够对现实社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作用的题材。一个历史学家也只有在他选对了适合于自己，同时也能够为社会所接受所需要的适当题材之后，他才有可能在其成果中最大限度地展现出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赋予历史以灵魂。

历史上人类最伟大的史家其实大都是基于现实关怀而思考，并研究和总结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成就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就在于他首先是极具思想性的社会人，对现实有着深切的体察和忧虑。司马迁之“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清楚地反映出其研究历史的志向所在。修昔底德之所以能写出不朽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也正在于他立志要“擎起历史的火炬，引导人类在摸索中的脚步”，决心通过正确总结历史，来创造正确预未来的重要途径。通过其在著作中对民主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的公开颂扬，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和建立在这种关怀基础上的思想的前瞻性。

现实关怀，也是历史作品思想性的源泉。

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有思想性，也可以没有思想性。具体史实的考证，是揭示历史真相的工具，就像考古的野外发掘工作，做得好，就有价值。但是，历史研究并不都是具体的史实考据，1949 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在波士顿年会上曾经这样谈到过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他说：“事实上，他（历史学家）在历史中发现的东西往往就是他想从历史中寻找的东西。在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的事实材料时，他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某种图式（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概念）进行工作的，他经常用这个目标来研究社会的进化。对他来说，朝向自己的这个目标发展的就是进步，背离这个目标的就是腐朽。这样，用寓意的话说，他为过去描画的曲线当然也就会延伸到未来。他要么就是像斯宾格勒那样指向灭亡的道路，要么就是像托因比那样指向得救的途径。正是在这里，他拥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会；正是在这里，他掌握着不是造福社会就是危害社会的有力工具。”

这段话的意义在于讲明了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注定会有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他必定会依据自己所认定的进步或腐朽的标准来看待历史，并且按照他自己心中的某种他认为对社会有利的图式来选择、安排和强调他研究的题材及其事实材料。换言之，每一个历史学家其实都有为社会服务的条件和机会，问题在于你是否真能立足于现实，有充当社会良心的强烈责任感。因为只有当你与众多普通人一样能够深切地感受这个社会的危机和问题时，也只有当你相信作为知识分子理应充当社会良心的艰巨角色时，你才可能成为被现世所重视的有所思想、有所创造的人。这也正是为什么，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所题纪念碑碑文中特别要写下这样一段话，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

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就是绝不人云亦云，敢反潮流而动，于不疑处有疑，不仅敢而且能“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脂，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自由之思想”，就是要能够“神游冥想”，大胆思考，勇于探索，不拘泥于一党一派之立场，不固守任何意识形态的界限，真正做到创造性思维。而只要我们能够跳出党派立场情感和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能够发现，历史上许多恩怨是非，你死我活，其实并不都是如我们过去和今天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只要我们能够“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我们就有可能摆脱情感和观念的纠缠，对于过去我们所不理解的历史对象“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脂，表一种（理解的）同情”。而一旦我们不再把视野局限在党派斗争、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对立的范围之内，我们就会发觉，相对于我们今天的现实，过去历史中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和去总结借鉴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现在学科分工日益细密，就中国历史研究来说，至少可以粗略地到分为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三大领域，这三大领域里，是否都能很好实现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愿望？

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去思考和总结历史，我们理应发现，历史研究具有相当广阔的发展天地。

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都有很好的例子可以表现出历史学家们如何表现他们的现实关怀。比如我们读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就不难了解到作者的现实关怀之所在。我们读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更可以清楚地体会到作者尝试总结历史教训的良苦用心。任何一种历史研究的成果，如果仅仅满足于过程叙述和细节的探讨，而缺少了作者本身眼光独到的深邃思考与现实关怀，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读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在吸引读者这一方面，现代史研究自然最具优势。这首先是因为现代史距离今人最近，一切刚刚过去，人们记忆中许多事情依稀可辨，惟对许多耳熟能详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内幕缺乏了解。更何况，每个关心自己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人，都会想要活得明白些，都会关心今天如何来，明天如何去，因而自然想要知道昨天的事情，想要了解何以今天会是这个样子，许多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有没有历史的经验或教训可以借鉴。对此，也只有具有相当思想性的历史作品才能部分地为今天的读者答惑解疑，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现代史研究之容易做出成绩，还在于这一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受政治干扰和意识形态左右，研究基础薄弱，但又具有任何其他历史时期所不具备的丰富资料。近年来大量公开的各种历史文献档案和口述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而具有极大的研究潜力。

当然，现代史研究因为距离现实政治较近，研究起来也必定会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风险越大，机会也就越多。当别人还没有研究的时候，你能捷足先登，最先的开拓者自然是你。何况，这种研究上的风险通常是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而变化的。时间越往后移，距离今天越远的问题也就越会失去其政治敏感性。昨天不能研究或不易研究的问题，今天可能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因此，我们不必因为有风险就不敢去尝试，更不能因为有风险就主动放弃这块阵地，不去想办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千万读者寻求他们想要了解，也有权知道的历史答案。

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在中国其实有着很深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提到司马迁是没有争议的。而且在我的理解中，自从历史学以一门现代学科的身份逐步确立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学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相当密切的。或许可以说在历史学界有着古代的和现代的两个关怀传统。它们之间也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所以如此强大传统的失落是很让人深思的。其中原因除了前面指出的外在社会情势外，是否还有历史学界自身的原因？比如你说的现代史研究的风险问题。过于与现实切近，甚至要历史来注释现实，看起来是实现了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而经验却告诉我们，这反而会损害其固有价值的实现？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之间，是否需一定的超越？

我们不能否认，历史学家表现其现实关怀的结果，有造福社会，也有危害社会的可能。造福还是危害，根本上取决于历史学家是否能够顺应并且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方法。我们固然无法要求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能够把握住时代前进的主流和精神，但是，历史学之不同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社会科学，恰恰在于它通常并不具有政治学、经济学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那种操作性。历史研究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或是非正误的历史评判，充其量不过是建立在严格的史实研究基础上的一种事实判断，它不仅不会对现实社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和影响，而且根本上也只能是在其专业技术范围内的一种现实关怀。你可以拿自己的研究来注释现实，但我相信没有了过去那种政治氛围和领导人的偏好之后，这种简单化的直接注释能够产生多大的效力，颇引人怀疑。其实，现在的党史论文和论著，相当多数仍旧在重复着这种简单的直接注释和解读现实的工作。问题是，有多少学界中人会把它们看成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呢？因此，我想对于这类问题大可不必担心。目前中国的学术研究，包括历史学研究，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不怕学者逾矩。现在需要担心的，倒是有太多的学者因为怕逾矩，坚持不越雷池半步，害怕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某种现实关怀的倾向，而被学界中人指为媚俗。

我还是那句话，人是思想的动物，人活在现世，就应当让自己活得明白些。历史学家不仅有必要让自己活得明白些，而且有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最有助于人们理解的语言文字乃至图像形式，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传播开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活得明白些。

关于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问题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的文献档案资料。但档案的利用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还远不像在图书馆查阅资料那么简单。尽管同样利用图书馆里的资料做研究，不同的研究者也会因方法不同、理解不同，产生出个人能力或研究结论上的差异，但是，档案利用方面所存在的种种限制和不便之处，给历史学家带来的，就远不仅仅是方法上或理解上的问题了。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中共历史的研究，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就尤为明显。由于中共历史档案目前开放的程度还不很高，查阅档案还有种种限制，一般的研究者，包括海外的研究者，要想直接利用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全面地研究中共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离开了对所需主要档案资料的占有，要想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无论是对事件的经过，还是对传主的经历，做出客观和准确的说明，通常都会变得极其困难。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研究中共历史的成果，之所

以水平上参差不齐，解说上五花八门，在不少情况下并不完全是不同的研究者观点、情感上的不同，或者是研究功力上以及对资料的理解上存在着多大的差距，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占有得太少，以致于不能不更多地利用主观的推测或并不可靠的各种二手资料。

当然，现状如此，不等于不能研究。毕竟，即使就中共历史档案而言，其开放程度较前已有相当进步，陆续开放的档案已经相当之多。并且，除了大陆以外，可以利用的有关档案资料如今还可以从俄国、台湾以及美国等多处得到。而在大陆，相关的档案资料除了北京的有关机构陆续在公布以外，各地的档案馆这些年也以地方档案的形式先后公布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直接利用已公布档案进行专题性的研究，是完全可能的。以下我分几点谈谈个人的看法。

中共历史档案保管之现状

中共历史档案资料的保管工作主要是由中央与地方两级档案馆来负责的。中央系统的档案，包括历届中共中央、中央所属各机关、中央系统的会议以及在中央系统工作过的领导者个人的所有有查考价值的文字的和图片的资料，均由中央档案馆保管。除中央系统以外的档案资料，一般则交由各地的档案馆负责保管。但历史上各中央局的档案，如有关江西时期的苏区中央局、上海中央局，抗战时期的北方局、长江局，抗战后的南方局及东北局等的档案资料，形式上虽有地方性质，实际上属中共中央代表团性质，故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另外，1949年以后中央政府系统的档案，也由中央档案馆保管。只不过，它们是与中共中央系统的档案相区别的，属于国家档案，在档案馆内部分别由两个专门的部门保管。

相对而言，由于 1949 年以前中共基本上处于流动的、甚至是地下的状态，档案资料的保管相当困难，许多重要资料没有留存下来。像建党期间的档案，大部分已经遗失，目前所能找到的档案资料，多数都是从前苏联搜集来的。像江西时期的档案资料，大部分在 1934 年秋天红军撤退时被烧掉或遗失。另外几个根据地的档案资料，情况也都如此。现在我们多半只能从当年保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档案里，从俄国档案馆的一些档案里，以及在国民党人的档案里，如陈诚个人的档案里，看到这个时期的一些文献资料。

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这段时期的基本档案，大致上有四个来源，一是在上海秘密保存下来的二三十年代的档案资料，主要是 1927 年以后到 1933 年中临时中央撤出上海以前的中央档案；二是中共中央 1935 年到陕北后十几年积累下来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这一部分档案内容最为丰富，包括大量的毛泽东个人的文献资料，中共中央各种会议的记录，对各地工作的指示和来往电报，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档案资料；三是 30 年代中后期到 1949 年这一段时间里各中央局的档案资料，抗战期间各个根据地的一些档案资料也在其中；四是 50 年代中后期前苏联归还给中共中央的当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资料，其中不仅有代表团自身的档案，有代表团与共产国际交涉的文件，最大量的还是代表团与国内中共党的组织，尤其是与中共东北地下组织往来的文献档案资料。

中央档案馆保管的档案资料中，最大量的无疑还是 1949 年以后的档案。这些档案保存之完整，对研究中共历史变迁之重要，自不待言。但众所周知，有些极具价值的关键性档案并没有保存下来。如毛泽东参加的相当部分最高层会议记录，只因毛泽东不喜欢会场上有人记录而将这项工作废止，致使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经过时，几乎无所

凭据。熟悉中国文革的人都知道，作为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经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为留下毛的言论，瞒着毛偷偷录音，后来成了一大罪状。

中央档案馆全面系统整理和复制档案的工作开展得较晚。另外《档案法》出台之前，国家档案部分收集得也较迟缓，一些政府部门迟迟不能将过期档案交由档案馆保管。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后，1949 年以前的档案才基本上整理完毕，开始有了比较详尽完整的工作目录和可以提供给读者的利用目录，并将多数文件制成了缩微胶片。至于 1949 年以后的数量庞大的档案资料，整个整理工作相信会更加艰巨。

中共历史档案的保管，除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档案馆保管以外，事实上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直属机关里，也有规模不同的档案资料室。从研究中共历史的角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属中共中央的两个专职的党史研究部门和一个教学培训机构，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校。作为专职的研究部门，从研究的需要，这两大研究室也保管着相当重要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室侧重于通史和历史事件等专题方面的研究，文献研究室侧重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个人生平思想的研究，因而两个研究室保管的档案资料又各有侧重。当然，它们作为文革以后新成立的部门，自己积累的档案资料并不多，因而实际上是在协助中央档案馆代管部分档案或档案的复制品。它们代管的档案资料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自 50 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在陆陆续续在系统归类和整理并且已经编辑成册的成套文献资料，一部分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和摘抄的零散档案。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两机构成立后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主要是有关近 20 年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它们保存这些档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自己部门的研究者进行研究。

中共中央党校的情况与上述两机构有所不同。它虽有负责党的历史教学的部门，可以保存与上述两机构级别相似的部分成套文献资料，但是，它保管的最具价值的档案资料多半并不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而是它作为中央机关之一自 1949 年起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中共中央下发的，以及中央、国家各机关相互通报的几乎是全套的文献资料。因此，从研究 1949 年以后中共历史的角度，中央党校保管的档案颇具利用价值。

与党的部门相似，在中央军委以下还设有军事档案馆和中共军事史的专业研究部门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以及类似中央党校，负责培养军事人材的国防大学。它们也都程度不同地负有保管档案的责任，只是着重于中共军事史而已。

在地方档案馆中，最重要的是省一级的档案馆。它们通常保管着一些很有价值的地方党的历史资料。不过，由于所有的地方档案馆实际上都是 1949 年以后才陆续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们所能收集和保管的档案的主要部分，无疑是从 1949 年开始的。它们目前更侧重的，通常也是如何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服务于地方的经济建设。它们所保管的 1949 年以前的档案，大部分其实是来自于中央档案馆的复制品。而这部分档案资料，经过多年整理之后，一些省馆已经将它们印刷成册，因此利用起来比较方便。

另外，像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性的纪念馆，也都在搜集中共历史文献资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它们保管的少量文献资料，对某些专题的研究以及对弥补某一方面档案资料的欠缺，有时会有所帮助。

除了中国的档案馆以外，从事有关中共历史的研究，不能不注意国外的一些档案馆。尤其是在保管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方面具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俄国的档案馆。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可以说是除了中共中央档案馆以外，在保管中共历史文献方面最重要的档案馆了。在它的许多卷宗里，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中共历史的重要资料。它甚至还辟有专门的卷宗系统收藏中共历史档案资料。这是由于这个档案馆专门收藏前共产国际的档案，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历时 20 多年，中共的大批干部曾经来过前苏联，或在前苏联学习培训，不少人甚至死在那里。并且，在这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乃至中共地方组织，都曾经常性地向共产国际通报工作，并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的会议记录甚至也要定期译成俄文并送往莫斯科。在这些档案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在中共中央档案馆里找不到的。当年，即 1947 年毛泽东撤离延安时烧掉的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报，大部分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至于对研究这一时期中共历史不可或缺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就更是这家档案馆所独有的档案了。

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所保管的档案，基本上截止于 50 年代初，即斯大林逝世以前。但 1953 年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仅仅是外交关系的问题。因此，我们除了可以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看到有关 1949 年以后中苏外交关系的档案资料以外，我们还可以在莫斯科的另一家档案馆，即专门负责保管斯大林死后苏共中央文献档案的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里，看到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共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与外交政策档案馆里的档案不同，这里保存的有关中共问题的档案，虽然不少涉及苏中关系问题，但更多的是属于党的关系，即涉及政治层面的内容。

在莫斯科保存中共历史档案层次最高的，也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在那里，保存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与苏共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以及赫鲁晓夫之间的许多来往电报和会谈纪录，保存着斯大林的私人代表以及苏联驻华外交和顾问人员就与中共领导人谈话等问题给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报告，等等。许多资料是中方所没有的。比如，1949-1950 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记录；朝鲜战争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些来往电报；1959 年 10 月毛泽东与来华访问的赫鲁晓夫等人之间的谈话记录，等。当然，有些很重要的文献资料应当有，但目前在那里还找不到。如 1945 年 8 月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电报；1950 年 10 月周恩来、林彪在苏联与斯大林谈判苏联援助中国出兵朝鲜的会谈纪录，……这些事关中共历史的很重要的资料，至今尚未找到。

保存有中共历史文献资料的外国档案馆还可以提到日本、美国、荷兰等国。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里，保存有一些涉及中共早期一些成员在日本活动的资料，以及三十年代日本从中国获取的一些有关中共地下党活动的文献资料。在美国的一些档案馆里，藏有当年美国外交官以及迪克西使团与中共领导人来往所获得的一些情报、谈话纪录和中共领导人的电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我们可以从斯内夫利特档案中看到一批相当有价值的有关中共早期活动的档案文献资料。

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之现状

保管档案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而利用中共档案资料的形式通常有两种。

首先是直接查阅原档。

从查原档的角度来看利用的问题，结果可能要让人多少有些悲观。因为目前查原档的限制还很多。

中央档案馆的档案，从 80 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做解密工作。按照《档案法》，30 年以前的档案应当都在可以公开利用的范围之内。但实际上，包括俄国的档案馆在内，都有不少的限制。比如涉及到个人生平的档案资料，通常要等到人死之后，俄国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规定要 70 年以后才公开，目前查阅一般要有家属的授权。又比如涉及到党与党关系的档案，通常也不在开放之列，俄国人一般也不对普通研究者开放有关中共问题的专门卷宗。另外，中央档案馆目前还只限于接待国内各单位需要阅档者，不对海外学者开放。再加上即使能看，申请起来也比较费时费事，手续繁琐，还有交通不便（如中央档案馆远在西北郊，距离城里有一两小时的车程）等等，因此，真的能够经常利用原档的研究者少而又少。

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原档，一般程序是先向自己所在单位党委部门提出专项申请，经由省市党委批准后报送中央档案馆（有时还须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根据同时送交的具体的阅档要求，中央档案馆在得到批件，调出相关档案并正式通知查档者后，查档人才能在规定时间前去查档。并且通常一次只能提交一个具体题目的申请，再要查阅其他问题或扩大查阅范围，则须再报再批。凡有过查档经历者都深有体会，即如果提出的内容不具体，比如说不清哪年哪月哪日的具体文件，往往调不出几件可看的档案；要具体说清年月日，不仅过于困难，而且其他相关内容的档案又看不到。一次查不到，或有些线索再想查阅，重新审批起来不仅费时费事，而且结果也常常仍旧不能令人满意。反复个一两次，除非是公家的任务，大概再不会有几个人愿意去那里查档了。

因此，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原档的，比较多的是三部分人，一是中央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者，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二是一些具有相当高地位的领导人的写作组成员；三是外地一些经过多年申报要求查阅地方具体历史资料的研究者。三部分人中，前两部分人的效果比较显著些，因为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不必经过反复批准，又了解档案的具体情况，并且能够看到已经整理出来的目录，可以不断地提出要求，反复前往。不过，即使是这些人，查阅档案也有一些限制，那就是根据档案的保密级别，查档者也要受到级别上的影响，级别高的查档范围宽，级别低的查档范围小。如果查档者级别不是很高，即使前去查了档，有些关键性的会议或资料仍不能查阅，问题就能以真正搞清楚。而级别高者，因是负责干部，往往不会亲自前往查档，即使查得一二，也未必能写什么。

与前往中央档案馆查档比起来，去国外的档案馆去查原档相对来讲要容易许多。美国、日本这些国家不必说了，只要到了那里，懂外文，提出要求就可以了。即使是俄国，虽然有预先申请等一些较麻烦的手续，但只要进了档案馆，就可以依照档案馆提供的目录，反复提档和阅档，不必再办任何手续，也用不着像我们中央档案馆一样，非得事先提出自己所要的文件名称，阅档后更用不着非得把复制及抄录好的复本交给馆方审查通过再取回。当然，在美国、日本这些国家能够查阅到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比较有限，最重要的还是俄国的档案馆。

前面提到的莫斯科的几家档案馆，从 1990 年以后实际上已陆续开放。几年来，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前往那里查阅过档案。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还曾专门组团或派人去查阅和收集过档案。但到俄国的档案馆去查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学者

还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是受到语言的限制，因为今天大多数中国学者不懂俄语；另一方面是受到经费的限制，因为去俄国不同于去美国和日本等国，一般都需要自己负担一切费用，而目前大多数中国学者还很难做到这一点。再加上俄国的档案馆在管理上距离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档案馆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可能经常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原因闭馆，申请阅档也还比较麻烦，所以中国学者到莫斯科去查档的还属于凤毛麟角，成果出的也不多。反而是美国、德国等国懂俄语的学者捷足先登，搞出了不少与中共历史有关的重要档案资料。

其次是利用经过整理和编辑的档案资料。直接查阅原档过于困难，利用经过整理和编辑，已经出版，或在内部发行的档案资料，就成了我们今天研究中共历史的最重要的一种选择了。

目前这种制成印刷品的档案资料数量相当多。但在选择这种类型的档案资料的时候，有必要对它们的可信度有所了解，以避免在研究中走弯路。

比如《毛泽东选集》（不包括 40 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那上面有不少内容照理说都是当年的文件、电报之类，属于档案文献资料的范畴，但该书的编辑带有强烈的宣传色彩，内容经过经心的修改，因此多数篇目的内容已与原件不相一致。文革后编辑出版的有关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文集，数量甚多，也编入了相当数量的档案文献资料，但文字改动也较大，有些重要篇目删节较多，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使用须十分谨慎。

从成套资料的角度来看，可信度较高的当属《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版 14 卷出得较早[1]，随即改出公开版 18 卷[2]，内容较内部版更多），它基本上是根据未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1949 年前部分编辑而成的，后者收集的文件从建党一直到 90 年代，每年少则两本，多则四五本，不仅有中央的文件，还有地方的报告，因此数量庞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则集中了 1949 年以前各个时期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较为精炼，文字上和内容上也均未加工修改，甚至鲜有删节。这套文件集只编到 1949 年因故停止，以后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些人另外编辑了一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3]，有续编的意思，也有十几卷之多，但就它所收录的文献看，收入已公开发表过的文件太多，不少篇目发表时已经过修改加工，因此价值不高。后面的情况似有些改进。

国防大学编的一套《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十一册）[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略微弥补以上之不足。这是因为它在选择档案文献资料时注重的事件经过，而不是时间顺序，故所收资料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不尽一致，可以某种程度上填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缺。同时它的文件一直收集到文革以后，其中不少内容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因此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所没有的。

在成套资料中最具价值的是有关毛泽东的各种文献资料。由于毛泽东其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作用至关重要，因此，对他的研究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中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水平和深度。据笔者所知，除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书记处等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外，他的绝大部分讲话、文章、指示、电报、信件，都已印成了文字。在中共领导人当中，他的资料可以说是目前公开得最完整的。

谈到毛泽东的资料，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日本学者早些年编辑的 20 卷本的《毛泽东集》与《毛泽东补集》，它收录了不少未经加工过的毛泽东的文章和指示，可以补《毛泽东选集》之不足。与此同时，1949 年以前的毛泽东资料，已知大陆出版的就有《毛泽东文集》、《毛泽东

军事文选》、《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四五种之多。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从尚未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中选编而来的，后者是文革后为了编辑毛泽东全集而收集起来的有关毛泽东 1949 年以前几乎全部文电、讲话的手稿和记录稿，文字上未作任何加工，故可信度较高。《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军事文集》都是从《汇编》中选出的文献资料，同样未做修改和加工，只是不知编者为何没有把主要的篇目都编进去，以致不少很重要的内容没有收入。而《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内容虽与《汇编》内容基本相同，但不知为何有的篇目编者未选取《汇编》中的记录稿，而是选用了另外的内容不尽完整的记录稿。当然，《毛泽东著作资料汇编》也还有一些缺陷，比如《毛泽东选集》上已经收录了的内容，它只保留了篇目名称，略去了原文，使人仍看不到原稿。另外，它缺少毛泽东在各种中央级会议上的发言和报告的内容，缺少 40 年代毛泽东与莫斯科之间的来往电报。好在如上所述，有关与莫斯科的来往电报，近年来正在得到陆续披露出来的俄国档案的弥补。比如，抗战期间毛泽东与季米特洛夫之间的来往电报，1948-1949 年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来往电报，1949 年初毛泽东等人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会谈纪要，等等，目前均已公开发表。

1949 年以后的毛泽东资料，一般人最熟悉的，莫过于文革期间印刷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了。其中有些版本，至今仍是研究者利用来研究 1949 年以后毛泽东及中共政策变迁的重要史料依据。那里面有不少毛泽东的讲话和党内指示，都是当年造反派从中央和国家各部门档案资料室辗转传抄出来的。对照中央档案馆里的手稿和记录原稿，大多数内容是可靠的，只有少部分内容因为传抄的关系，有错讹之处。此外一般研究者利用较多的还有文革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五卷编辑时还在强调阶级斗争，因此它收录的 1949-1957 年间毛泽东的讲话、文章，比较多地注意了这一方面的内容。这和以后出版的毛泽东资料，有明显的倾向上的不同，但它对人们了解毛泽东的这一面，颇有帮助。当然，1949 年以后最值得利用的，还是 13 卷本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5]。《文稿》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 1949-1976 年间毛泽东的大部分手稿都收录进去了，并且没有在文字上进行加工和修改，因而利用价值甚高。《文稿》的不足，是某些篇目实际上经过删节，编者却未注明；个别电报指示照录照发，未细心考证其是否曾起过作用。同时，《文稿》所收录的只是毛泽东的手稿，没有收录有时更为重要的毛泽东在许多会议上的讲话和与有关人士的谈话记录，这使得研究者在利用它来研究毛泽东时，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但这方面的不足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弥补。像《毛泽东思想万岁》，就是以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为主要内容的。另外像尚未公开出版的《毛主席与外宾谈话记录汇编》等，也比较完整地收录了毛泽东与外国领导人以及与外国共产党人的历次谈话。比较多地利用了这一《汇编》材料编出公开发表的《毛泽东外交文选》[6]，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这些谈话的某些重要片断。另外，近年来俄、美、挪威等国学者根据俄国档案，发表了相当多的毛泽东的资料，像毛泽东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与苏联大使的谈话记录等，像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的大量来往电报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已有的毛泽东资料。[7]

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大陆公布中共历史档案的渠道相对来讲比较多些。当时不少刊物都可以公布档案。如中共中央党校办的《党史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文献和研究》、中央档案馆办的《中央档案馆馆刊》等，都曾公布过文献档案。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主持的专题性的资料集，也刊布过相当一部分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比如像利用价值较高的，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由中央档案馆编的《皖南事变（资料选辑）》[8]、由档案馆与统战部合编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9]、由档案馆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10]等。但是，80年代中期以后，公布档案文献的刊物渐渐地只剩下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党的文献》一家。专题性地刊布档案文献的书，也出得少了。90 年代前后出版的专题性中共历史资料书，大概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文献”部分，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战史资料选编等几套军事史方面的书籍，较有份量。过去出版过的专题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以后只出版过一本《抗战时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11]。

除了上述情况以外，应当特别提到的，还有地方档案馆出版的档案资料集。相对于中央档案馆，地方档案馆的开放程度要大得多，对海外的研究者也没有太严格的限制。近几年，地方一些档案馆还与美国的一些档案馆和研究机构建立了交流关系，参加了由美国学者主持的某些档案研究项目。地方档案馆编辑出版地方革命史档案汇编，应该说开始得较早，广东等省的档案馆 80 年早些时候就已经印行了大部头的档案资料汇编，以后接连又有几个省印行了这样大部头的档案资料汇编。在这些资料汇编当中，有许多是具体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在出版成套中共历史档案资料方面，还应当特别提到俄、德、美、荷等国学者所做出的努力。俄国 80 年代中期在内部出版了一部颇有价值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它所收录的 80 件共产国际重要档案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近几年，俄德两国学者同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合作，又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套更为重要的档案资料集，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2]，目前已经出版了 1920-1925 年卷和 1925-1927 年卷，很就要出版的还有 1927-1931 年卷。由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共历史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不多，因此，这套资料集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使我们能够重新去了解和认识这段时期的中共历史。有关俄国档案中与中共有关的成套资料，可以提到的还有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在组织出版的前苏共历史档案资料丛书，包括已经出版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和正在出版的有关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等资料。与此同时，美国学者 Joseph W. Esherick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编辑的《在中国失去的机会》一书[13]，以及荷兰学者 Tony Saich 根据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马林的档案编辑的《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一书[14]，也都是较有利用价值的资料集。

目前中共历史档案利用中的一些问题

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现有条件下利用中共历史档案资料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还有一定的难度。

首先是档案资料保存不尽完整，这就使得研究者在一些具体史实的把握和判断上，难免要过多地借助于主观推断和二手资料，以致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说法各异的现象。

比如，关于早期中共成立的问题，现存的档案资料，包括目前俄国方面已经公开的资料在内，都还不足以清楚地说明它的整个成立经过。过去的研究，基本上是依靠一些当事人几十年后并不可靠的回忆口述资料，并主观认定先有这，后有那，然后依样画葫芦般地组织资料，形成定论。而后发现前苏联方面的一些史料，知道俄共代表作用甚大，于是开始出现不同说法。近年来，随着《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公布了几件新的档案资料，人们对建党经过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因此又有新的解说。但是，由于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仍旧不够具体，

不少环节缺少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印证，因此目前只能是众说纷纭，难以盖棺论定。

又比如，关于中共 1950 年决定出兵朝鲜的问题，由于当时的许多关键性会议，包括毛泽东与金日成、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等，都没有找到保存下来的记录资料，因此，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就难免出现意见分歧。像 10 月 1 日斯大林、金日成的求援电、求援信到北京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否开过紧急会议？毛泽东为什么 10 月 2 日凌晨会写电报表示愿意出兵；2 日政治局会又如何争论；3 日毛泽东为什么又表示暂不出兵；6 日军委会为什么又动员出兵；8 日发出组织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金日成出兵意图，为何当天前往苏联谈判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带去的两种意见，谈判结果又是不出兵；13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出兵，后来周恩来与斯大林商量的结果又是怎样的，究竟苏联让了步，还是中共让了步，如此等等。就这么两周之间的事情，由于档案资料匮乏，直今在中国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尚未争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说法来。

其次是有不少档案在公布的时候就变动了时间和内容，极易对研究者产生误导。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莫过于《毛泽东选集》了。如它对阶级分析问题的修改，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修改，不少都是事过多年之后，认识和实践都已经变化了以后重新修订的。依据修改过的文字来讲述中共历史或毛泽东个人的作用，是根本不可能看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中共历史文献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们并非是后来修改造成的问题，多半是当时发布时就已经造成了问题。如果研究者不能比较深入地去鉴别它们，同样会被误导。

例如 1936 年 12 月 19 日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之重要，在于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中共中央是早于共产国际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党内决定的。特别是在多数研究者已经知道季米特洛夫 16 日来过电报，中共中央收到后因电码错乱要求重发，再次收到来电已经是 20 日时，19 日《指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出来了。但实际上，《指示》真是 19 日作出的吗？非也。只要将 19 日政治局会后当天发出的《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与 20 日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内容，同《指示》稍加对照，就不难发觉，《通电》内容与《指示》内容大不相同，而指示内容实际上是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的翻版。由此可知，《指示》发布的时间，严格说并非 19 日，而应当是在 20 日以后。换句话来说，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式，基本上是参照了共产国际的意见的。[15]

其实，在研究中共历史文献时，我们经常能够发现，有不少文件的落款日期不是以正式修改定稿发布的日期为准的，而是以起草的日期的为准的。这在很多情况下未必是出于什么特殊的目的，中共中央当时确定上述《指示》的日期时多半也是如此办理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研究这些文献时不够细心，就很可能会在史实叙述上或判断上发生错误。

第三是公布的档案不完整、不准确，极易引起研究者的判断错误。

关于公布档案不准确的情况，大致有两种原因。一是出于某种需要，有意删改了某些内容。

比如《皖南事变（资料选辑）》，比较说来，尽管它发表的档案文献大都是节录，但就选材而言，它仍是大陆 80 年代出版的专题性档案资料中编选得较好的一部。就在这样一部编得比较好些的资料集中，却有一些让人毫无必要的改动和删节。如第 65 页 1940 年 10 月 12 日

电，将序号甲、乙改为一、二，将“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数字中的“曾生”两字删去；同页 5 月 23 日电“项英同志几个报告收到”，实际应为“项英同志数电收到”；第 100 页 11 月 15 日电“向顽固派取谣言攻势”中“取谣言”三字被删掉；第 102 页 11 月 21 日电“这些谣言与政治攻势”中“谣言与”三字被删掉；第 139 页 1941 年 1 月 31 日电中“同意胡、陈十二日电”被改为“同意刘少奇、陈毅十二日意见”；第 184 页 1 月 20 日电中“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只剩下“问题是……相左”，中间全部用方框表示。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凡是像“苏武官”、“崔可夫”等名字统统删去了。删去的地方几乎全用方框表示，但有些地方又注明“原件为抄件，其中错漏字较多”，给人印象似乎凡方框处均为错漏字，其实不然。

另一种情况多半是属于习惯问题了，就如同编某些领导人的选集时一定要把文字理顺，把不适宜的内容删去，甚至按照时兴的观点把不明确或不正确的意思拧过来一样，这些档案资料的编辑者一定要来一番加工。而当他们过份自以为是时，难免会把档案搞得面目全非。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1990 年公布于《中共党史资料》第 33 辑上的《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 年 4 月 10 日）了。编者特别标明“本文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电报抄写稿刊印”，然而对照抄写稿，却发现公布稿几乎是错误百出。首先，编者搞错了时间，抄写稿写明 4 月 11 日，编者误标为 4 月 10 日。其次，原稿分甲、乙、丙、丁四项，发表者仅一“甲”项，缺少另外三项，未加说明。而最重要的是，编者随意改变原稿文字，完全不顾必要与否、正确与否，令人吃惊。如“与张说明的基本及具体问题”，改为“与张谈的基本及具体问题如下”；“他在公开抗日之先”，改为“他在未公开抗日之先”；“运动便可兴起”，改为“运动便会兴起”；将原稿中“对蒋问题。他的问题部下确有分化问题，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问题如确降日，代异离开他”，改为“对蒋问题，他认为蒋部下确有变化。蒋现在歧路上，。他现在反蒋做不到，蒋如确降日，他决离开他。”同时，编者还自作主张地变动了原文的段落层次及顺序，擅改并自拟序号，实在令人感到不可理解。这样公布档案史料，对历史研究危害之大，可想而知。[16]

第四，由于编译者工作不够细致也会造成公布的档案文献资料出现问题。

前面谈到的情况，不少都与负责公布档案的编者的业务水平和研究水平有直接关系。但我们发现，即使是一些主要由研究者直接从原档中整理翻译出来的文献资料，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可能给直接利用它们的其他研究者造成不小的麻烦。

比如，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照理说他们对有关毛的档案资料是有研究的，该书确实也编得不错。但该书第一册第 539-541 页上发表的 1950 年 10 月 2 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仍旧出现了问题。这封电报是证明毛泽东当年力主出兵朝鲜的一件最有力的证据。长期以来，人们也正是根据这封电报来判断中共当年决心出兵朝鲜的时间的。但是，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被收录在《文稿》中的这封电报，有两个缺陷，一是电报并非全文，而是节录，但未注出；二是文末编者虽注明电报“有手稿”，但没有直接查过原档的人，不清楚这封电报是否有签发的文字和时间。结果，1996 年俄国学者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斯大林的档案里，发现了 10 月 3 日毛泽东通过苏联大使罗申转发给斯大林的一封与这封电报意思几乎完全相反的电报。于是，这位俄国学者接连在美国的报刊上尖锐批评大陆公开档案时可能有意伪造。其实，经过多方查证，10 月 2 日的这封电报确有手稿，不能说是伪造。只是，与其他电报不同，它上面没有签发人的签字

和发电时通常所标有的具体时间，再证之以 10 月 3 日罗申电，可以基本判定毛 10 月 2 日这封电报没有发出。没有发出的电报作为手稿之一，不是不能收入〈文稿〉，问题是应当将工作做细，注明疑问，以免以讹传讹，被人当作发电到处引用并由此得出不正确的结论。[17]

又比如，大陆 1989 年曾出版马林档案有关中国部分的内容，档案也是直接来自于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研究所马林档案，编者也大都是长期从事这方面历史资料翻译和研究的学者。但对照 1991 年托尼·塞奇编的几乎同样的资料集，可以发现大陆版的问题较多。如第 169 页记录 1923 年 5 月 9 日马林收维里杰电一条，就与托尼·塞奇书中的内容有很大差异。大陆版的文字是："收维里杰电谓：今天北京转来 78 英镑；其中三分之二用于组织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劳动大会。一千美金（S1000），救济受中国政府迫害的同志。一千五百（S1500），中国共产党 3-5 月份的预算。额外给一千金币（S1000）帮助中国共产党。共二百七十八（278）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显然，即使从表面上也可以看出，大陆版的说法有问题，前面英镑是 78，美元三笔至少也是 3500，而后面得出的数却是"共 278 英镑和三百七十五美元"。对照托尼·塞奇的资料集，发现那里的数字是"今天北京转来日方 2000.78 英镑,……共二千零七十八（2000.78）英镑和三千五百（3500）美元。"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们在引用时稍不注意，就可能造成判断上的错误。[18]

第五，大概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利用档案资料时能否做到准确判断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许多关键性的档案资料仍旧是未公开的，即使是一些引用较多，有部分人可以看到的档案，也未必是其他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如何确保自己转引他人的研究成果，即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不犯错误的问题。这一点不仅对于海外学者尤为重要，即使对于多数大陆学者来说，也差不同样重要。

举一个例子，中共历史权威著作向来说，193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开始在党内推行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是在会议上唯一进行了坚决抵制的人。并称，由于毛泽东的抵制，会议没有形成决议，因而王明的右倾路线没有形成对全党的统治。[19]能够看到政治局会议记录的研究人员在大陆是相当有限的。写出这种权威性著作的作者当然看过这次的会议记录，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正确。至少，会议并非没有形成决议，记录上清楚地写着："决议：王明起草"。至于王明后来因为赶往武汉，忙于统战，没有写决议，与会议没有形成决议无关。在 1938 年 2 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就明确讲过，称自己太忙，以致十二月会议没有搞出一个决议，是一个损失。[20]

为什么一个如此明显的事实，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视而不见呢？这当然不是说持有类似看法的研究者有意歪曲史实。在很多情况下，事情要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过这种体会，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人往往很容易受到某种观念的影响。而当人们对某个问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主观印象之后，他们即使能够看到第一手的与宣传材料不同的原始资料，通常也很难用一种超然事外的客观态度去分析和理解他所面对的那些资料。这件事多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其实，只要不带任何偏见地去读一下当时的会议记录，就能够很容易地注意到，不仅决议问题是如此，就是毛泽东的态度也并非像有些权威著作所强调的那样是坚决"抵制"的。如果读过会后的大量文献史料，我们甚至可以肯定，毛泽东当时不仅没有反对王明的主要观点，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王明带回来的共产国际的主张。不少研究者实际上是把毛泽东后来对王明的批判，当成了当时的历史。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看不到原始的档案资料，又不够细心的话，我们很可能会误以会那些权

威著作的作者是最有发言权的。

另一种危险是引文。要判断一部中共历史著作是否可靠，一个简单的方法是看它的作者有无接触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同时看书中的论据是否大量使用了引文并注有出处。在这方面，长时间以来，我们的党史著作和论文是极其欠缺的，除非我们熟悉并相信某些作者，否则，一般严肃的研究者是很难相信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可靠性的。当然，也并不是使用了引文的著作，就一定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需要相信某些具体引文的时候。因为事实上如同公布的档案不完整可能造成某种假象一样，过于相信那些片断的引文也有同样的危险。

要判断那些片断的引文是否可靠，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但也不是看不到原始档案，我们就完全不可能判断这些片断引文的真假。

记得十年前笔者曾经撰文讨论过一个流行于中共党史界的观点，即 1937 年底季米特洛夫是否曾派王明回国来夺毛泽东的权？问题的提出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笔者注意到这一命题在逻辑上存在着一个矛盾现象。因为据说几个月后任弼时去莫斯科汇报了王明与毛泽东意见分歧的情况，紧接着在 1938 年 8 月，季米特洛夫就把王稼祥派回国来宣布莫斯科支持毛泽东当领袖。不过半年多时间，季米特洛夫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从逻辑上来判断，这里面只能有两种可能，即或者是在此之间发生了某些足以使季米特洛夫对毛另眼相看的重大事件，或者是季米特洛夫原本对毛就没有恶感，从未有过要王向毛夺权的想法。遍查这半年时间的大小事件，找不到毛能够突然取悦于季的任何资料，于是笔者只能向另一条路上走，即寻找季未曾准备向毛夺权的证据。而这方面的证据，可以说俯拾皆是，只不过过去那种说法已成定论，没有人向这方面想罢了，并非一定要多少原始档案。至于笔者为什么断定季米特洛夫事实上并无向毛夺权一事的根据，可见《百年潮》杂志《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和《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两文[21]，这里不再赘述。

注重资料之间的比较与鉴别，也是判断引文可靠与否的一个方法。下面再举一例：

在大陆最权威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中谈到国共 1937 年谈判经过时，两度用引文提到蒋介石在谈判中的一个条件，即“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说周严词驳斥了蒋要朱、毛“出洋”的安排，并称双方因此争执很久，无法解决。该两处均加注了引文出处，一处为周恩来 1945 年 4 月 30 日所作《论统一战线》，一处为 1936 年 6 月 15 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22]首先，前一引文根据事隔 8 年之久，可信度不高，不足为凭；而后一引文为当时文献，似乎可信。但可疑的是，除 1936 年 11 月陈立夫与潘汉年谈判时曾经提出过请红军师长以上军官出洋半年，回国按材录用以外，再未见有任何文献资料提及出洋事，而以当时谈判气氛，也未到兵临城下之地步，看不出蒋非得强共所难逼成破裂不可。笔者虽未见 15 日周电原稿，然而查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 15 日电给共产国际，内中并无此要求，只说明蒋有“朱毛两同志须出来做事”的要求。出来做事自然与出洋不可同日而语。[23]再查 6 月 22 日周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致蒋电，所争也非朱、毛出洋问题，而是朱德不能外出做事，必须留在红军主持指挥的问题。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谈判对案，内中也未见谈到朱、毛“出洋”事，仍是强调朱不能出外做事的问题，提出“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政治名义可不拘，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则托故不去。”[24]把 22 日周电、24 日中央决定，与 17 日转发周电内容相比较，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是相符的。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所谓朱、毛“出洋”问题，中共中央及周恩来事后再不提及，则反而说不通了。当然，具体真相如何，核对周恩来

1937 年 6 月 15 日电报后相信更容易做最后之判断。

几点心得

1、从事中共历史研究，能查阅到原始档案与不能查阅到原始档案大不一样，查阅到原始档案能保持客观态度与不能保持客观态度大不一样。

2、一定要坚持从第一手资料出发研究历史。也就是说，不轻易相信他人引用的史料，尽可能自己去查阅原始资料，对他人的引文、回忆录和口述史料，须有较扎实的旁证方宜使用。

3、要善于比较和发现资料中的问题，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能够提出为什么并举一反三，就等于成功了一半。科学研究是如此，历史研究也是如此。

4、注重资料的完整性。按课题搜集资料时，遗漏了任何一条资料都可能会使研究的结果发生动摇；对自己使用的任何一条资料，如果不能确定它的出处、时间、形成经过和有无删节，就不能当做主要的论据。

5、注重资料的连贯性。在叙述历史经过时，任何资料的利用都必须严格地遵循当时的时间顺序，把它们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下，不可随意颠倒位置，把卯时才能形成的看法放到子时来说，把丑时曾经有过的看法硬安到寅时去讲。

----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发行），第 1-14 卷，中共中央党校 1985-1987 年版。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8 卷，中共中央党校 1989-1993 年版。

[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5 卷（仍在续出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1997 年版。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1-14 册，1979-1982 年印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5-31 册，1987-1989 年印行。

[5]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49-1976，1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1998 年版。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

[7] 在这方面公布较多的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出版的《Cor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8]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9]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卷），档案出版社 1986 年版。（该资料集 1988 年还出版有《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财政卷，工商体制卷，基本建设投资卷，农村经济体制卷，工业卷，农业卷，交通邮电卷，商业卷，对外贸易卷，金融卷，物资卷，劳动工资卷），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9-1995 年版。

[11]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武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有关中共中央局的成套资料，1986 年重庆出版社还出版有《南方局党史资料》5 卷本）

[12]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T.I. 1920-1925.

[13] Joseph W. Esherick, Lost Chance in China, The World War Ⅱ Despatches of John S. Service,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74.

[14] Tony Saich, The Orig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Netherlands, 1991.

[15] 《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936 年 12 月 16 日，《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1936 年 12 月 19 日，《文献和研究》第 6 期；《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6 年 12 月 16 日，《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

[16] 《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各项问题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1936 年 4 月 10 日，《中共党史资料》第 33 辑，第 3-4 页。

[17] Alexandre 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ermber 16-October 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6-7, Winter 1995/1996, pp.95-96; 沈志华：《中苏联盟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9 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92 页。内中写道：“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这些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新版（即 1998 年

版）《周恩来传（1898-1976）》对这句话仍未做任何修改。

19 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 年 12 月 9-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8 年 2 月 27-28 日-。

[21] 拙作:《抗战时期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7 年第 6 期;拙作(青石)《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百年潮》1997 年第 4 期;《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

[22] 前引《周恩来传》,第 361 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 年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 514-516 页。

[24] 《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方案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1936 年 6 月 25 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 517-520 页。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

上个礼拜,我应北大博士生联谊会的邀请做了一次讲座,讲的是新中国的革命外交。那天有同学问我,从我讲述的内容中,如何能够总结出一些有利于个人成长的东西来?今天应国关之邀来做讲座,听说听众大都是本科生,因此我想是不是换个题目,讲讲跟个人成长有关的东西?因此我就想到了这个人物研究的题目,希望能对满足同学们的愿望,对个人的成长有所借鉴和启迪。当然,我讲人物研究,并不是要在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性的意见来。其实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讲历史,目的不过是希望大家通过历史演进的过程,看到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了解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从而得出一些有助于我们了解、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或教训。

我看今天在座的未必都是本科生,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吧?今天讲的"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想来是大家都熟悉的两个人物,同学们都对他们一定都有所了解。选这个题目讲,也有我自己的目的。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说法,有太多褒贬的色彩,这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地去认识他们。从学者的角度,特别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客观的态度,需要不带感情色彩地去研究他们。我今天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比较研究",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即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不带明显褒贬的比较研究,更全面地来了解这两个人。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全面地介绍和评价这两个人物,只能是从这二人的出身、教育、成长过程等方面来比较他们各自的特性以及一些共性,从而总结出一些带有某种逻辑性或规律性的东西来。

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了解我的这一意图,我们现在要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否知道两岸的人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曾经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呢?上个世纪 70 年代中期,毛泽东和蒋介石相

继去世，同学们是否知道，台湾相当多民众当年对蒋去世和大陆人民 1976 年对毛去世的悲痛的感觉几乎一模一样？他们那里也曾出现过长街两旁挤满了送行和吊唁的民众。而由于台湾保留了更多的传统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发现有很多人是跪在地上痛哭失声，他们认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倒塌了。在当年很多台湾国民党人的心目中，蒋介石是最权威的领袖，是他们的恩人。如果我们当年看到这些场景，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蒋匪”在台湾竟会得到民众这样的拥护呢？（笑声）其实，换一个角度，站在当年台湾国民党人的角度，他们怕是也很难理解大陆人民当年对毛泽东的那种感情。因为他们多数人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大陆这边是共匪的天下。（笑声）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的影响力。我 1995 年随一个学术会议的团队到台北，从机场到中研院学术研究中心，刚一下车，就听到在楼门口迎接的研究生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声喊：“共匪来了！共匪来了！”（笑声）当时大陆已经实行对外开放很多年了，我们这里早已没有人叫他们“蒋匪”了，他们却还在习惯性地会叫我们是“共匪”。包括在学术讨论会上，台湾不少学者的发言也带有很明显的感情色彩。我们当时感觉很不习惯的就是，我们这边对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领袖人物早就不叫他们的官衔了，而他们提到蒋介石的时候，却几乎从不直呼其名，而是每每要尊称为“蒋先生”或“蒋总统”，甚至要用“先总统蒋公”这种称呼。很明显，大陆和台湾之所以在对待这两人的态度上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还是因为有着太深历史恩怨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共两党，对自己的领袖和对对方的领袖，有根本对立的政治和道德的评判。

讲到这里，很多同学可能会问：是不是蒋介石在台湾的建设上起过好的作用呢？这一点自然没有问题。但其实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共两党在 1949 年前后的命运如此不同呢？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40 年代末，前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朝气蓬勃，所向披靡，最后几年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着国民党。为什么建国以后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却走了很多弯路呢？与此相反，当年在大陆一败涂地的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却渐渐走上了成功发展的道路，实现了土改和政治稳定，经济也早早就迈入了次发达的行列。对此，有很多人分析过原因。有人说是因为蒋介石去台湾时带去了很多黄金（笑声），也有人说是因为台湾小好搞。对这些说法，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越南、朝鲜也很小，得到苏联和中国的援助也不少，为什么就没有台湾发展得好呢？

实际上，无论是站在大陆还是站在台湾的角度来评价，都必须承认，毛泽东和蒋介石对中国 20 世纪的历史都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上来看问题，具体地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话，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神化或者妖魔化。因为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他们其实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论成功与失败，都与他们自身的优点和缺点分不开。但有一点非常清楚，他们固然是政治上的对手，却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领导人，与他们具有这些相似之处不无关联。因此，他们之成为国共两党的一代领袖，既是时代使然，多半也是他们的共性适合了这个时代的需要的结果。大家想一想，20 世纪有那么多名人，知识程度、脾气秉性比他们两人强的绝不在少数，时势却造就了他们两个人，这是不是纯属偶然呢？中国的 20 世纪上半期可算得是内乱不已，外侮不断，群雄争霸，民不聊生的乱世了，“乱世出强人”，“时势造英雄”。那个时代有多少人想过要成为改造中国的第一人啊，但有谁能做得成呢？胡适也曾想当总统，但他学问再大也成不了总统，即使当上了，也起不了作用，因为那个时代需要的是强势人物，而不是胡适这样的文人所能够驾驭的。为什么毛泽东、蒋介石这样的人能成为国共两大党的唯一领袖呢？这就涉及我们要讲的他们的

个人的一些特有的气质和特点了。

下面我们先讨论一下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出身。看过他们传记的人都应该知道，蒋介石出身于普通盐商，祖籍浙江奉化镇，地位不太高，财富也不是很多，在当时也只是中等收入家庭。再来看看毛泽东的出身背景，他的家也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他的父亲辛劳了一世，才把家业弄到了富农的程度，在当时的湖南韶山也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的家庭。比较全国状况而言，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出身状况颇为相似，都属于当时中国的中间阶层。这样的出身，后来却都成为了最高领导人，这之间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

除了出身之外，二人的教育背景也很相似。简单地说，他们两个人即使在当时条件下，也都只是中等文化水平。从 20 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国内也陆续办起了一些大学，这些留学生和大学生构成了 20 世纪上半期的社会菁英的一个群体。但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们仅仅受过中等教育。毛泽东是小学毕业后入了师专，毕业以后又去当小学教员。那个时候的师专，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专，即初高中水平。蒋介石名义上读过军校，其实也只是培训式的速成学校。蒋后来的师爷们把蒋说成是日本士官生，结果台湾的李敖一考证，日本士官学校根本就没有蒋的名字。蒋当年从保定速成学堂转去日本后，上的只是一个补习班性质的军事补习学校，叫振武学校。毕业后，他再没有入过军校，只是在 1910 年冬天被分到日本的一个炮兵部队做了一段“弼马温”，就是养马的兵。蒋介石受的教育显然也是一种初高中水平。

这两人的教育状况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影响，不过，他们之所以没有再谋求深造，实际上也是他们两人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所决定的。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曾经是有机会像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那样去国外勤工俭学的。但是，所有一切都办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却坚持留了下来。在这方面，蒋介石与毛泽东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性格、气质之相似，可以从他们小时候的故事中清楚地看出来。比如，蒋介石从小就有颇具反抗心理，自尊心极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小“顽劣益甚”，就是非常顽皮、淘气。一些老人曾经回忆，说蒋介石小的时候如何不听母亲的话，如何顶撞老师，别人要打他手板的时候，还没有打上，他就哭开了，边哭还边在地上打滚。（笑声）过节的时候，孩子排队等长辈发给糖果，他偏偏不排队，去加塞儿，（笑声）孩子们把他挤出去后，他就跑到外面去弄上一身泥，再来加塞儿，（笑声）大家看他脏兮兮的只好让他。这些老人的回忆可能有点儿演义的成分，但太过顽劣不服管教的个性，蒋介石自己也是承认的。

毛泽东小的时候也有很相似的一面。他同样反抗心理非常强，自尊心也极强。他自己讲的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他几乎从来不服父亲的管教，甚至敢于当着众人的面与父亲顶撞。有一次父亲气得要打他，他也气鼓鼓地跑到门外的池塘边，威胁父亲敢打他，他就敢跳塘。父亲怕他真的跳下去，自然也就不敢打他了。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小时候至少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孩子那样“乖”。不仅不乖，而且极具反抗精神。他们在后来近乎残酷的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战胜各自的对手，成为一方的最高领袖，这种独特的性格气质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说他们二人性格相同，更多的只是指他们的极强的自尊心和反抗的心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性格真的完全一样。事实上，就具体的性格表现上，他们二人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蒋介石比较内向，而毛泽东却是相当外向。岁数越大，二人的这种差异也就越明显。我们平

时看纪录片时其实也能看到这种情况。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蒋介石在片子里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腰板笔直，连风纪扣都扣得一丝不苟，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军人气质和军人仪态。蒋的日常生活也是一样。据他的侍从官们回忆，蒋一向生活简单严谨，作息时间十分规律，每天 5 点半到 6 点之间必定起床，活动筋骨，然后早读。他在听汇报和开会时，除了必要的讲演之外，通常很少讲话，总是很威严地坐在那里听汇报和讨论。在这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完全不同。毛是那种不拘小节的人，不仅谈话喜欢嘻笑怒骂，海阔天空，就是日常生活工作也随心所欲，喜欢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毛泽东讲过他为什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个原因，一是对每每要接见外宾很讨嫌，因为他最不喜欢穿那种要纪风纪扣的正式服装；二是他不愿意被几点几点必须要干什么这种规矩所干扰，因为他想自由自在地生活和看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那种喜欢穿着睡衣在卧室或书房里召见政治局领导人，甚至接待客人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笑声）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谈到过一件让他很屈辱的事情，讲的就是毛泽东 1958 年如何在游泳池边训导赫鲁晓夫的故事。毛穿着游泳裤，一会儿下水游一会儿泳，一会儿上来披上浴衣和赫鲁晓夫谈一会儿话，（笑声）赫鲁晓夫不仅不喜欢游泳，而且不会游泳，他完全是被动地被拖到游泳池边上来看毛游泳和听他讲话，（笑声）他自然会感到很不舒服。但这就是毛泽东的个性，他未必是想要故意羞辱赫鲁晓夫。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证明。《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是在陕北保安，那里的条件相当艰苦。因为是黄土高原，天旱水缺，人们很难得有洗澡搞卫生的条件。尽管那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外国的记者，毛也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当时两人坐在院子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毛泽东一边与斯诺谈天说地，一边很自然地解开裤腰带，在裤腰里捉虱子。一边捉，一边把吸满了血的虱子用指甲挤破，挤得啪啪直响。（笑声）这个美国人显然没有赫鲁晓夫那样敏感。他反而把毛的这种不拘小节看成是一种魅力，心想：这个人好潇洒呀！（笑声）

我们再来谈一谈他们二人生长的社会环境。他们都生于 19 世纪末期，成长在 20 世纪初期，成长过程和环境有相似之处。蒋介石生于 1887 年，毛泽东是 1893 年，他们都是那种既读过几天私塾，也受过一些西式教育的跨时代的人，因此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新的思想的影响。在五四时期，他们其实同样都属于比较激进的革命青年。我们讲“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是反动头子”，但是他当年却并不反共。我们看他 1926 年年初之前的讲话，很多讲法都是与共产党人的说法相似的。在那个年代里，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因为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受过西式教育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都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到了 1920 年至 1922 年期间，流传得最广的已经是俄国式社会主义了。当时各种倾向的人都想向俄国学习，这是因为那个时候俄国的社会主义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让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社会主义。当然，俄式社会主义是基于列宁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它的核心内容是强调阶级斗争。对于要不要搞阶级斗争，在中国各进步人士中间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人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自然是强调要用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孙中山也看好苏俄，但其思想与共产党就有一定距离。他认为中国并没有分化出像马克思他们所讲的那种极端对抗的阶级，他主张三民主义，即强调要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不必用阶级斗争方法，即强行将阶级拉平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 1914 年以后就跟随孙中山革命了，但我们却发现，他在 1923 年去了一趟苏联之后，直到 1925 年底之前，他却与孙中山有些不同，大谈所谓阶级斗争，主张要通过打倒地主、资本家来解决中国贫苦民众受穷的问题。既主张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军阀，又赞同打倒地主、资本家，其言论显然与共产党人非常接近。尽管我们不能说蒋介石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共产党人相同，但从蒋的日记看，他在 1918 年之后，即五四运动开始前夕，他就已经在关心社会

主义问题了，不仅读马列的书，也看〈〈新青年〉〉，更崇拜苏联。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也大致相似。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成长过程中，都受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没错。

既然毛、蒋二人都受到过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赞同过相同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他们为什么又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去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大概要注意到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不同了。1914 年以后，蒋介石开始跟随孙中山，加入了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后来这个党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这是个有相当长的革命经历的政治团体。而它明显地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同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而且因为这两个党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

孙中山的党的主要支持力量显然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它在许多年里，其实始终是依靠海外那些爱国的华侨的赞助和参预生存发展下来的。从 1894 年成立兴中会开始，一直到 1919 年改组成中国国民党，它的势力虽然在国内逐渐扩大，吸收的却大都是一些中等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及其自身的地位，也都属于有“衡产”，即有稳定的经济收入的那一阶层。因此，他们的许多理念都与孙中山的理念相似，追求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但希望用些社会主义的措施来抑制资本主义的弊病滋生。中国共产党就不同了。它从一开始成立，就将自己的基础公开地放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民众当中，公开地反对有钱人，主张用暴力的手段，通过剥夺富裕者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达到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的。

由于两党依靠的阶层不同，他们的利益和政策目标也就不同。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建国的目标，到处找外援，最后不得不与苏联和中共合作。而他也因此遇到党内很多老党员的反对，原因就在于此。

由于两个党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策目标和利益所在不同，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加入到这两个党当中去，其成长时所受到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相同的。蒋介石再激进，再受五四新思想和苏俄革命精神的熏陶，他所依赖的那个党所给予他的影响毕竟要更大更直接。因此，蒋介石的思想再激进，最终也还是会服从于国民党的政策需要。何况，对于蒋介石这样一些深具抱负的人，组织本身就是他在政治上安身立命和实现其鸿图大志的看家本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某种并不成熟的理想，而放弃对组织的依赖。蒋介石最后会一步步走上反共的道路，并不是他没有或不曾有过激进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其抱负心和利益使然。

同样的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加入的就是另外一种政党组织。他因此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观念。这套观念从俄国传进来，争取和依靠的对象是工农大众。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表示过自己不同于国民党，并且优越于国民党的这种态度。以后的国共合作，两党之间之所以会发生那样多的矛盾与冲突，根本上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心态在起作用。我们从 1923 年至 1924 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过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工作的重视，和深得国民党领导人赏识的种种情况。这甚至使他在共产党内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样是抱负心很大，并有志于依靠党的组织成就一番事业的人，他当然不会因为国民党人的重视和给他较高的职位，就转到国民党一边去。从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人的成长过程来看，由于他们加入的组织和依靠的人群不同，接受的思想影响不同，也就使他们最终所选择的道路大不相同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里只能是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他们二人成长中那些颇为相近的方面。由于二人的出身、学历相对都比较

低，这导致他们明显地存在着某种自卑心理和不安全感。即使后来两人都成了党的领袖，我们看他们的日记或谈话，也还是能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在通常情况下，强烈的自卑感往往会与很强的自尊心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达到一定的地位时，自然会形成很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与自卑形成的强烈的反差，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多疑和敏感的共同的气质。

蒋介石因过度自尊而导致的过度敏感的例子很多，他自己在日记中就常有反映。有很多事情，本来未必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仅仅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内心里又缺乏自信，以致疑神疑鬼，认为是别人在背地里讲他的坏话，想整治他，结果他就往往会做出相当激烈的反应。比如蒋介石与中共决裂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直到 80 年代一直还有人在研究。大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蓄谋的，而国民党的史学家则认为是共产党和俄国人要绑架蒋，蒋没办法才决心利用这事件惩治共产党和俄国人。随着 80 年代以后人们对政治历史的研究心态日渐平和，再加上大量史料得以披露，人们才发现，造成中山舰事件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还在于蒋介石因自尊而导致的多疑。用当年在蒋身边工作的俄国顾问的话来说，就是蒋的自尊心强到了吓人的程度。中山舰事件，简单说起来，直接原因就是因为调走了一个与蒋介石关系非常好的顾问，接替他的顾问对蒋明显地不够尊重，对蒋的主张动辄设置障碍，并且有意削弱蒋手下的军队。这使得蒋非常紧张和愤怒，认为这是有意要搞他。于是，他想与当时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联手挤走这个顾问，但他后来发现汪精卫和这个顾问竟也一个鼻孔出气，甚至有愿意让蒋出国的意向。种种可疑的事情加在一起，最终导致他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在一起要整他。正好 1926 年 3 月 19 日国民革命军最好的一艘军舰中山舰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被海军局派往黄埔军校所在地虎门附近水面去执行缉私任务。当天下午海军局得知苏联顾问要用该舰，又得知蒋恰在广州，于是便请示蒋可否将中山舰调回来。这就导致蒋疑心大发，最终怀疑是汪精卫和俄国人是想要利用中山舰把他绑架到莫斯科去。于是，蒋怒不可遏，反复思量，最后下定决心利用手中的军权，调动军队发动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变。

蒋介石的这种敏感、自尊、多疑早在他跟孙中山时就表现得很突出了。孙中山对蒋很器重，把蒋介石看成是军事上的干才，任命他到前线当参谋长。蒋介石却因为与前方将领闹矛盾，前前后后跑了十几次之多。总是孙中山一个电报，蒋介石去了；去了不久，他说也不说就跑回上海去了；孙中山急了，再写信劝让他回去，他碍不过孙中山的劝说，只好又到前线去；去了又出问题，又是转身就跑。（笑声）如此反复，有十几次之多。蒋介石为什么要跑，一个根本上的原因，就是他受命于孙中山，职位很高，前方将领却不把他放在眼里，因为他手里没兵。这无论如何让蒋面子上受不了。其实“中山舰”事件时蒋介石也是打算要跑的，只是跑到半路上一想，不行！我这么一跑了之，不就正好让人说我自己心虚了吗？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干吗要心虚？！何况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不同于当年跟孙中山的时候，他利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第一军已经是国民党的绝对主力了。蒋介石很难丢掉他的这支看家本钱不顾，让别人夺了去。因此，蒋介石想明白了之后，马上就掉转车头，回到黄埔去连夜布置反击。结果是那个苏联顾问被赶走，汪精卫也被挤去欧洲养病，自己夺了党政军大权。

我们再来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同样是自卑感和自尊心并重的人。1936 年他在陕北和斯诺谈自己的经历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一件事情。那是 1919 年，他经李大钊的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登记来图书馆读书的人的名字。他当时讲了一句相当尖刻的话来形容他那时候感受。他说：那时那些来看书的教授们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人看。梁漱溟抗战时期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又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他问梁：你还记得我吗？梁漱溟摇了摇头，想不

起来。毛泽东告诉他，他当年在北京时曾住在他后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里，梁漱溟那时去过杨家，是他给梁开的门。而梁当时已是北大教授，自然不会记得这位给自己开门的青年人。（笑声）毛泽东反复提到这些事情，清楚地显示他内心里对此颇多感慨。联想到毛泽东在解放后只对一个大知识分子很好，即章士钊，而对其他大知识分子统统不喜欢，我们就更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这种复杂心态了。解放后，毛泽东发动过那么多针对知识分子和所谓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那样无情，但章士钊和他的后代却几乎没有受到多少冲击。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对章士钊很有感恩之情。这是因为章士钊早年在毛泽东非常困难的时候曾经慷慨资助过他 2000 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钱。只可惜，当年帮助过毛，或者看重毛的这种大知识分子太少了。因此，毛泽东只记住了一个章士钊，而对其他的教授、专家、社会名流印象很不好。

毛泽东和蒋介石之所以自尊心很强，与二人成长的时代背景也有些关系。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是中国受尽外国列强的侵略、欺压和凌辱，经常都会受到亡国亡种危险的刺激。因此那个时代的许多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都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悲情意识。毛泽东是如此，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会注意到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不够强硬，妥协退让，甚至有丧权辱国的做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蒋不爱国，不是民族主义者。从 1928 年“济南惨案”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再到抗日战争等，我们注意一下蒋的日记，就能够知道，蒋介石内心里对民族和国家的态度是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处理和共产国际，特别是和俄国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很强势地坚持过独立自主。比较一下蒋介石，他在处理与美国顾问的关系时，又何尝没有相同的表现？大家多半都知道史迪威事件吧？美国总统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战区来做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非常看不上蒋介石，对蒋不尊重，再加上两人在如何使用中国军队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常闹矛盾。最后史迪威极力想取得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于是把状告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罗斯福也一度想要压服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意见。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蒋介石硬是冒着破裂与美国关系的危险将这个五星上将赶走了。你能简单地说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走狗吗？

上次听同学说，有一位北大的老师在课堂上曾经讲过这样一则传闻。说的是新中国在保卫南沙群岛的斗争中，曾经不得不从黄海和东海调舰队前往南海。从黄海和东海穿过台湾海峡速度会快得多，否则绕公海就要耽搁很多时间。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冒险走台湾海峡时，毛泽东说了一句话。他说：没关系，我相信蒋先生是爱国的。其实，不管我们在过去怎样讲蒋介石是美帝走狗，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内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位老师讲的这个故事未必十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空穴来风。事实上，1958 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毛泽东就不止一次地讲到过，蒋家父子是爱国的，并且试图团结蒋介石，搞联蒋抗美。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点，对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执政党与革命党由于所处位置不同，承担的责任和风险也不一样，因此，当面对重大危机之际，它们所选择的作法很可能不会一样。革命党可以把口号喊得很高很响，因为它不需要承担执政党的失败责任。然而执政党却有它的难处。我们今天批评蒋介石 30 年代不该搞“安内攘外”的所谓“国策”，这在情理上是说得通的。国家都要亡了，你还要镇压异己势力，岂不是不讲民族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换个角度，从蒋介石和执政党当时的立场来看问题，不完成国家的统一，听任地方势力武装割据，甚至你在前面抗战，他在后面乘虚而入掏你的老窝，你又如何集中精力来抵御外侮？这种问题，对于当年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件很难把握好分寸的事。其实，这里的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这种政策最后是否达到了你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比如，1918 年，布尔什维克刚刚执政，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尚未停止。为了首先巩固内部，列宁不顾众多同事的反对，

坚持批准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割让了大片领土。等到政权巩固了，国家强大了，苏联最后又把这些割让的土地收回来了。我们的教科书里好像没有哪本说列宁当年这样做是丧权辱国吧。

同样的情况，中国 60 年代的外交非常革命，一直奉行最强硬的既反帝又反修的四面出击的战略。然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清楚地发现，如果不联合美国，中国很可能会成为苏联核打击的目标。为了中国自身的安全，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而这对于那些一直以中国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各国革命党来说，显然是一种致命的打击。本来中国的战略是鼓动世界上所有革命党来反帝的，现在中国自己却与帝国主义搞到了一起去了，怎么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就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妥协，正在与美国作战的越南人对此也深为不满。但是，毛泽东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仍旧坚持要与美国妥协。要知道，我们与美国妥协，不光是牺牲了过去的革命原则，牺牲了许多左派朋友，我们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我们过去一向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那就是要解决台湾问题。当时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明显地作了让步，以至于至今美国仍旧与台湾保持着某种特殊关系，甚至仍旧在向台湾出售武器。执政党处理外交问题时需要着重于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很难简单地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或革命口号，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之处，也会极大地影响到两个人的成长和成功。比如，在性格方面，毛泽东是很外向的，而蒋介石则比较拘谨。这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判断和想像力不能不有很大的区别。蒋介石自己生活规律，作风严谨，对部下要求也反映出他特别注意细节。比如一些台湾朋友讲述他们早年在台湾当兵时的经历，都会提到蒋介石如何关心厕所的问题。这是因为蒋介石一来视察，长官就会要求士兵赶紧把厕所打扫干净，而且蒋走之前大家都不能上厕所，因为蒋介石的视察，总是要去厕所检查卫生。（笑声）蒋介石太注重小节，使得他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管，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决断力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其魄力和想像力受到明显的局限。

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成败，军事指挥上的优劣具有很大意义。照理说毛泽东没有学过一天军事，而蒋介石到底还算是学军事出身。但是，蒋介石考虑军事问题时，战略上的考虑却十分欠缺。他关注的往往是一些细节。蒋介石一辈子有过无数次讲演，但 50 岁之前讲得最多的就要算是对士兵和军官的讲演了。而蒋介石讲演当中经常会提到的内容，大都是如何整饬军容军纪。反映到军事指挥上，他经常关注的也是一些明显应该是由那些团长营长去关心的问题。蒋介石当然也打过胜仗，但在有魄力、有丰富想像力的毛泽东面前，他必败无疑。因为蒋介石打的胜仗，更多的靠的还是政治谋略，而多半并不是军事指挥在战略上的优长。为什么他能打败冯玉祥这样一些军阀势力，却很难打败日本人和共产党呢？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与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打仗时，常常会采用这样的办法：即用金钱买通对手手下的军官，给他们封官许愿，搞分化瓦解。这样，蒋介石的军队还没有打过来，地方实力派阵线内部首先就乱了套。而对日本人或共产党人，这些招数就不灵了。再加上蒋介石一辈子都喜欢越级指挥，从当年对红军的围剿，到后来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蒋几乎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种事无巨细一插到底的坏毛病。许多国民党的将军在回忆录里都批评过蒋介石的这种作法。只不过，蒋在围剿红军时可以越级指挥到团一级，而后来军队多了，大了，蒋的越级指挥就指挥到师一级了。看看蒋介石指挥军事的电报，我们甚至会发觉，他连部队行军时应当怎样走路，怎样露营，怎样防空，怎样布哨，都要管。这多半和蒋介石所受的军事教育层级太低有关。不少战役就是由于蒋介石不顾国防部、军令部的总体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越过上一级

指挥机关，直接指挥到前方部队去，从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汤了。

毛泽东与蒋介石则恰恰相反。毛是个诗人，喜欢哲学，这影响到他具有很强的浪漫主义气质，不喜欢去管什么具体的细微末节，只喜欢海阔天空。他会见尼克松、基辛格时，一上来就明白讲，我不谈具体的问题，只谈哲学。（笑声）具体的问题让周恩来和基辛格去讨论。这其实很反映他的性格。1945 年，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他把自己 1936 年写的一首《沁园春·雪》送给了柳亚子，后来登在了重庆的报纸上，很是引人注目。蒋介石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不会写诗词，但还是曾要下面的人组织些文人墨客写些更高雅的诗词，以便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结果，国民党人硬是没有写出一首能够赶得上毛泽东的想象力的诗词。这件小事很能反映毛与蒋之间的差距。

毛泽东是诗人，但同时也是农民。这在军事上就构成了毛泽东的重要特点。那就是，他一方面相当注重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又注重战略，往往会有超人的想象力和魄力，不墨守陈规，敢于冒险，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在早年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弱小时，毛泽东注重保存实力的一面表现得较为突出。结果在俄国人和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眼里，毛泽东明显地是右倾保守的代表，因为他在军事上绝对不赞同共产国际所强调的"进攻路线"。如何保存实力？毛泽东的策略就是要能跑。他的十六字诀，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字："跑"。（笑声）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强敌日本，毛泽东也还是坚持这样一种策略。他不仅顶住了来自党内的和莫斯科的非议，而且也顶住了来自国民党的压力，始终坚持他的游击战方针，使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为后来战胜蒋介石国民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在毛泽东晚年，即我们上面讲过的珍宝岛事件之后，他的这一思想也再度表现了出来。当时为什么下决心要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惜与美国妥协？就是因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中国当时没有力量与苏联单独对抗，必须拉上一个个帮手，这样苏联就不敢打我们了。阿尔巴尼亚党批评中国右倾，毛泽东不管那一套，还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你能把我怎么样？（笑声）

不过，毛泽东军事指挥上更突出的地方却还是他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的那一面。因为只关心大的战略，关心大问题，他从不会去过问前线部队具体怎么做，更不会去干预前线指挥官的具体指挥行动。我不知道毛泽东会不会围棋，大概不会，但是他之善于布局，确有信手拈来的架式。1944 年欧洲战场刚刚取得胜利，毛泽东就开始考虑战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问题了。为了造成牵制国民党的有利战略布局，毛泽东硬是冒险将延安的两个旅从国民党和日本人占领地之间塞到湘粤边界一带去。此举虽然因日本很快投降最终没有实现，但毛泽东注重战略布局的特点反映得非常清楚。1946 年国民党坚持在东北大打，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用的也是同样的战法。尽管冒险，但却相当有威胁。1948 年至 1949 年的三大战役，更是典型地表现出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战略家的特质。他灵活地在战役指挥中使用运动战的战法，大胆地调动部队迂回穿插，忽儿内线，忽儿外线，这些战法不仅在蒋介石那里无法看到，而且习惯于墨守陈规的蒋介石也难以适应。毛蒋对抗，蒋介石失败，几乎是必然的。

当然，蒋介石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够浪漫，谨小慎微和墨守陈规，也有它的好处。蒋去台湾后始终坚持稳定高于一切，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就有相当的帮助。然而，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政权很快巩固之后，不再有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危机感之后，其特性中浪漫主义的一面就很自然地更加显露出来。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了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各种运动，结果是使得人们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几乎没有可能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大陆在经济上之所以越来越落后于台湾，与此不无关系。

另外还应当提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因过去的经历不同，生长环境不同，对社会的认知和对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态度也颇不相同。毛泽东向来是比较倾向于下层劳苦民众的，喜欢到农民和贫民当中去，并且能够乐其所乐，忧其所忧，甚至听到老百姓受苦就会难过，掉眼泪。但他对富裕人家或社会中上层的喜怒哀乐就远没有那么关心了。这一点与蒋介石恰好相反。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蒋介石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什么时候见到蒋介石关心穷苦百姓的生活和命运？从来也没有。他嘴里也讲过工农士兵，也讲过人民，但他真正重视和关心的只是社会的中上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其统治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他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在台湾却把经济搞上去了，与蒋介石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态度是有关系的。蒋介石是沿海的盐商出身，他对经商自然从小就不存恶感。沿海生长的经历，更使他相信与外界交往是好事。他出过国，去过日本，知道日本军事了得；去过苏联，知道苏联军队能打仗。因此，他非常看重外国的专家。为蒋介石工作过的外国军事专家从苏联，到德国，到美国，到日本，应有尽有。退到台湾后，他自然更是主动邀请外国专家到台湾来帮国民党设计经济发展的方案。蒋介石在上海做过股票生意，以后在统一国家的战争中，不能不倚重各种专门的人材来帮助他筹集经费，因此他很知道专门家的作用。国民党人执政后，大量接纳经济、文化、法律各种知识分子和专家入阁当部长，并非偶然。当然，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也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些大知识分子、专门家通常也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他们也愿意为国民党这种执政党服务，国民党从巩固政权和加速建设的角度出发，也乐于倾听这些人的意见。因为国民党相信这些人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才是国民党最为稳固的社会基础。

不过，过于重视社会中上层的利益，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土地改革。因为它依靠的阶层是有衡产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有相当部分生活在城市，却在农村有土地。要搞土改，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人的利益。国民党虽然几度想要搞减租，但真正推行起来，还是阻力很大。这与国民党自身的社会基础在中间阶层这一点不无关系。共产党则没有这样的负担，因此它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农民的欢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得不到农民的拥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然而，这种情况到台湾以后却改变了。因为国民党到台湾，与当地的地主及富裕阶层并无多少关系，牺牲他们的利益很容易。何况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用的还是孙中山的赎买的办法，台湾那些靠土地吃饭的地主，多数也乐得拿政府买土地的钱或股票去投资工商业。结果是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工商业也发展了，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一个社会阶层也没有因为土改而成为社会的牺牲品，反而在其他方面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的其实还是威权统治，只是这种威权统治只是着重于政治和军事，并不去干预经济。国民党退往台湾时，曾经设想过要搞国家社会主义。后来被美国人反对掉了，实行的是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体制。并且在经济上大搞“专家治国”，任用了相当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用经济的方法来改造和建设台湾。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放任态度，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位美国的教授在介绍台湾经济建设的成就时，就特别强调了国民党政府对专家的尊重问题。她指出：在台湾，经济专家的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专家们的意见也很重视，而且政府要人通常会支持专家的意见。

大陆过去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对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好有关。毛泽东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总是强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和“书读得越多越蠢”之类的道理，并且总是自诩为“小人物”的代言人，鼓动“小人物”来打倒大人物。当然，

我们也不应当回避，这种情况也与当年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有关。建国以后，我们经常会谈论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之所以会谈论，就是因为不好摆。我们过去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从阶级论的角度，知识分子算不得是什么阶级。于是就有了“毛”和“皮”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这堆“毛”，究竟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呢，还是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呢？多数知识分子当然想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问题是，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列宁早就讲过：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你要想改变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只好去改造它，因为只有改造好了才能使其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变得好一点了。那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 1956 年前后。因为，社会主义改造既然完成了，私有制既然基本上消灭了，那么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毛泽东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考虑如何面对阶级逐渐消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和新的现象。他之所以会写《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说到底就是想要提出一个可以适应新的时代的指导性思想来。在《正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对这个现象其实颇为困惑。他没有明确讲阶级是不是就没有了，而是说：“阶级斗争急风暴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将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要将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

这样一种观点其实是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谈到，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期中才需要暴力，因为要通过这样一个时期来剥夺剥夺者，即消灭私有制。但一旦私有制取消了，生产资料公有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国家的职能就将逐渐消失，而只剩下保护“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了，它只能是个“半国家”。1936 年，苏联宣布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工作，因此，苏联已经没有阶级了。既然没有阶级了，知识分子自然也不存在属于哪一个阶级的问题了。然而，这个问题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19800 年的反右运动，就再度把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属性问题提了出来。后来，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结果是，私有制消灭了，而阶级斗争却越来越厉害了。毛泽东本来就相信学校的教育有太多资产阶级的传统，本来就不信任知识分子，这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就更不可能好了。

中国大陆开始尊重知识分子，大概一直要到改革开放以后。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仍旧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到 80 年代中期这个问题才大致上得到了一个了断，但也还是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弄在一起，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在今天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存在什么样的阶级，究竟存不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或者是像在今天西方社会通常所能看到的那样，存在着一个蓝领的工人阶级和一个白领的工人阶级？总之，关于阶级的问题在时代已经大大变化了的今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尚未能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如何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

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最后要说的是，毛泽东也有过他自己的理论思考，只可惜他没有能够脱离阶级斗争的那套理论，结果就变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一成不变的既定看法，将以前知识分子留给他的不好的印象与意识形态上的观念结合起来，知识分子或专家的处境自然也就成了问题。毛泽东痛批知识分子的言论有很多，言辞有时相当激烈。数一数建国以

来毛泽东发动的历次大批判和政治运动，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知识分子是怎样地难以接受。中国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搞不上去，与毛泽东不重视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上面讲的，只是个人的一点研究和看法，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希望同学们多一些思考问题的角度。谢谢大家！

诗词作品

诗词习作题序

这里所录多为 20 年前之作，尤其多的是笔者因在 1976 年天安门事件中作诗反对“四人帮”而获罪前后的诗词。笔者向未精研格律，写诗作词纯属性情所致，信手拈来，言情言志，一抒胸臆。故这里选录者无论内容亦或对仗平仄均不十分讲求，皆为时代使然、性情使然，本意仅在与同时代者或性情中人共勉

送　　友

塞上风寒，天低目残。

怅怅北去，郁郁寡欢。

飞鸟东西，山高路远。

身前身后，回首何堪。

春秋当此，足始林园。

浩荡吾志，灰扬楼兰。

穷图破壁，卧薪尝胆。

剑鸣谁手，好男好男。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获罪诗四首

（后曾分别刊载于各种《天安门诗抄》中，一首误与他人诗词合并，另三首个别字同学当年抄写时或后来传抄时抄错。）

一、扫墓有感

英魂犹未去，平地起狼烟。

鬼火高低忽明暗，妄与君作难。

壮许几腔血，忠胆齐昭天。

人环但有臣民在，不教贼子弄王幡。

二、墓前抒怀

忠魂一去歌似尽，春风不到紫禁城。

夜半妖星寒气重，关山座座锁清明。

不悼总理心不死，庶民难却阶级情。

但使诸葛锦囊在，我辈岂随子胥行。

三、四四清明扫墓歌

谁说清明是四旧，谁说扫墓习惯臭？

年年祭奠我先烈，今发禁令何理由？

莫道文汇鬼火亮，自有人民写春秋。

寄言魑魅慢猖狂，勿学林贼把命休。

四、悼总理

悼君石碑旁，依依述衷肠。

瞩目总理生悲切，万感窒胸腔。

 名节存千古，精血五洲扬。

身与山河共沉浮，心在万民上。

七月二日暴雨

月去南天黑云卷，风起大地夜遁高。

青冥浩荡来万里，天兵汹涌下九宵。

雷鸣滚滚魂魄散，电闪烈烈鬼域烧。

忽如龙门银河倾，长安顿涌钱塘潮。

七月十五日感怀

风吹一天星，云压半边城。

雨夜凶机露，囚笛破三更。

默默拾布衿，凄凄慷慨行。

无言慰惊母，托梦抚妹深。

铁铸锁身去，铁窗长明灯。

单衣卧不住，狱警监视勤。

此去难回首，长歌自吞声。

忽见墙上字，豪气百倍生。

“为革命战斗，为真理牺牲！”

壮哉我同志，清明苦斗争。

输得头颅去，赢得心上明。

云遮天地终难久，

东风早晚会吹临。

狱中二首

狱友道，以我之罪，最高可判极刑，纵使有朝一日能出去，也是身败名裂。闻之口虽强辩，心亦不平甚矣。遂有诗二首记之。

（一）

莫道今囚若死囚，笑与神鬼共春秋。

人间纵有千般乐，皆化眉间一点愁。

昨夜秋风牵魂去，残花荡尽梗自留。

休许来世荒唐愿，谁见长江水倒流？

（二）

月圆难去心中斑，身在怎耐形已残。

平生不肯受人怜，功名亦然死亦然。

敢笑昆仑千重雪，不若冰心半点寒。

冷眼嚣尘天伦事，只念革命在胸间。

狱中自感

1976 年 10 月初“四人帮”虽倒，官方却依旧将“四五”运动称为反革命事件，狱吏态度不变，威胁不断，故我等仍旧看不到出路。有感于此，故有此诗以自励。

秋雷惊我梦，秋雨碎我心。

举目牢囚内，独有我自亲。

亲亦不解愁，愁生当有根。

长链锁忠勇，铁窗灭性灵。

廿年图安乐，今陷艰难深。

庆喜七尺汉，难能立足身。

回首不半步，少年倔犹存。
（半步，指所在半步桥第一监狱看守所）

问天

1977 年平反出狱，惟天安门事件仍未平反，故有感而发。

五岳峰欲动，江河浪争行。

万众齐奋进，金鼓催人征。

“四五”血痕在，风雨梦仍惊。

敢向天公问，沉冤何日清？！

既来五角楼，死生一笑泯。
（五角楼，看守所内我被囚所在，又称王八楼）

惶惶不数时，坦坦荡犹云。

含屈忍辱重，誉毁一身轻。

丙辰奇罕事，定多知情人。

纵担千家险，焉思己偷生。

堪叹时局易，清明复清明。

狼影长相弔，刀光仍杀人。

茫茫环宇大，啾啾雀小声。

二老心不死，东郭百念倾。

苍天空遗泪，莽原徒伤情。

愤然忆往昔，不信命中定。

总理碑前卫，谁道祸世兵？

万万守花人，何谓目不清？

百日残破状，一万不死心。

谗言不足信，恶语岂能惊。

今夕阴霾在，明朝红日升。

但能得自由，矢志追光明。

天安门事件平反有感二首

（一）

1978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有感而作。

少年坎坷非憾事，痴情却为清明时。

人走八方呼声厉，魂游四海血泪诗。

今日得见平反状，明朝敢赌报国痴。

四五精神昭天下，天安门前神心驰。

（二）

因天安门事件平反事应人民大学校报稿约而作。

丙辰诛心万马喑，赤子当年抖精神。

锋镝牢囚折箭处，血雨腥风逐日昏。

决定昨颁人尽醉，秋风今舞莽昆仑。

终得再吟龙虎赋，长天洒酒谢英魂。

考大学二首

（一）

1977 年出狱不久即闻恢复高考，忙于平反事和三班倒的同时，临阵磨枪匆匆上阵。考后竟得知未取，有感而作。

春风似近寒窗里，欲喜忽闻落榜声。

舞文弄墨人济济，不才难登大雅厅。

虽恨少壮不努力，犹怨十年四煞星。

光阴固逝当奋翮，岂能空余报恩情？

（二）

邓副主席指示扩大招生，落榜后竟再补中。兴奋之余命笔。

临阵磨枪未见光，黯然心伤气半颓。

散发弄舟犹未肯，冰天雪地不低眉。

忽来一曲高歌亮，春播万里暖风吹。

通知传来情如醉，新装一整当举杯。

告别工厂弟兄二首

（一）

挥手八年一朝过，在时不觉去时匆。

工装几套磨成洞，同事数载皆弟兄。

汗浸肌肤容颜改，掌生老茧苦乐同。

而今独往高枝去，怅然若失别意浓。

（二）

四月十日当记否，情深话密挚友多。

赞扬声声堪笑尔，掌故累累难辨驳。

四座举樽谢不够，一掬热泪听嘱托。

问君别意谁长短，东流之水不尽波。

呵，我生命的小船

草径

蛮荒

梦想裹着厚厚的冰霜；

深潭

细泉

幻影映着暗淡的波光。

荒凉的天空

没有飞鸟

没有炊烟

只有疏星点点

像摇曳的标灯

在黑漆漆的大海上飘悬。

呵

远处黎明的风

把生命的火点燃。

我抽取心中的枝条

编一只希望的小船。

意志的手

撑起破损的风帆，

感情的臂

搅动锈蚀的铁链

把太阳的锚

拖出没有波浪的海面。

噢

别了

死的疑虑

生的依恋。

让朝霞燃烧的云浪

把我生命的船

推出往事冰冷的港湾；

让涂满自由意志的

晨光的帆

把智慧和力量的风兜满。

呵

来吧

夜的雷

昼的电。

蓝天的大海

大海的蓝天。

我只要拾几只记忆的海贝

托我的船

把它们带出这阴霾密布的此岸。

我只想借这阳光的长弓

拉响彩虹的弦

奏一曲欢快的歌

祝福我的小船

能战胜大海的浪

驶向那遥远但充满阳光的沙滩。

呵

三维的空间

一维的时间。

你们广漠的深处

当可允许它自由地盘桓

管它什么规则

管它什么曲线

进化的法则其实永远不变

只要勇敢地前行

战胜者一定是明天。

呵

去吧

我生命的小船。

让我火热的双眼

随你闪亮在浪谷峰巅；

但愿我思想的风帆

有朝一日

也能够升起在人类希望的地平线。

念奴娇·新愁

一声轻别，心弦陡，

寂寞独守空楼。

无限情怀人竟去，

留下一腔新愁。

孤鸿影怜，沈园柳瘦，

东风谁人收。

夕阳魂断，问伊何处凝眸？

脉脉此情难妒，

暗敛忧容，吞声猛回头。

怕只怕离情别苦，熬不尽心上秋。

今夕梦死，明复何求，

把酒酹沙鸥。

沙鸥，沙鸥，凉热同此环球？

又 上 东 楼

月上东楼人依旧，痴心空盼风景又。

几番梦断卿故我，一夜泪飞呼不够。

伊心化影武陵远，我情如鲠形更瘦。

流水落花春难住，寻盟无奈当醉酒。

狂想曲

一弯明明月，

一泓亮亮水，

水里有我，

月里是谁？

昨夜上天摘月，

世人道我是贼，

逐我地狱里滚，

按我污水中睡，

弄不清是醒还是醉。

谁说我醉？

嘿，再来一杯！

天上云走，

地下人飞，

半空中印着红红的嘴。

嘴，嘴，

更是温柔最。

炉火般烫，

桃花般媚，

吻不尽千重万重夜，

只道是一朝仙人配。

噢，心肝宝贝！

温柔乡里梦几回，

令我心儿碎。

心儿碎，

沁肝肺，

管它倒海翻江不，

却也似头回乘风雷。

头一回，

管她谁？

纵然弯弯水中月，

舀尽东海我也追。

哪怕是换来眶眶泪，

哪怕是回头万念灰。

人生一世欲何求，

今朝有酒今朝醉，

为只为

来它一个醉乡国里比翼飞。

昨夕是何夕

昨夕是何夕？鹊仙搭桥时。

秋水望穿三百日，牛郎织女喜泪湿。

昨夕又何夕？吾人念伊时。

不知伊身在何处，千里一线犯花痴。

今夕竟何夕？老虎发威时。

敢向窗前窗后啸，吼断银河就银池。

今夕更何夕？小羊瑟瑟时。

从此忘却相思梦，只向大王求相知。

满江红·良心苦

夜半无眠，心如堵，泪垂几度。

望残月，云卷西流，欲归无路。

秋风起处听呜咽，周天寒彻冥虫舞。

冬将至，枯叶泊何处，谁人顾？

多少事，从来误；是非兴，猛如虎。

只缘在尘世，沧海难渡。

升帆岂为寻丹丘，远舟惟怨良心苦。

盼只盼，天地且相安，风雨住。

答不知名友人

新年得一不知名友人发来一首小诗，感怀之余，无以言谢，仅口占一首复之。

原诗：

天很蓝，阴云终要散。海不宽，此岸连彼岸。

梦很浅，万物皆自然。泪也甜，望您心如愿。

（新年将至，祝你明年交好运，一年好心情……）

回复：

寂寞闻问讯，心郁得稍舒。

年年迎新历，岁岁涂旧符。

无知搏浪勇，识途命已殊。

不求世人谅，我心还我读。